斯大林选集

四卷本总目录

本 书 说 明

新编《斯大林选集》共分四卷，是根据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和档案附卷十卷编辑的。各卷内容的起讫时间为：第一卷，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第二卷，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第三卷，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第四卷，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三年。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原《斯大林选集》，仅为两卷，按照当时的政治、理论需要，剔除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工人运动、暴力革命、论反对派、卫国战争，以及中国革命等方面的大量文献。现新编《斯大林选集》已尽可能予以增补、充实，以力求全面地反映这位历史伟人和革命导师的思想、理论和**非凡经历**。

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中，有众多关于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新编《斯大林选集》亦撮要单独编辑成“斯大林历史档案选”，作为附卷附于第四卷之后，供读者参考。第四卷之后还附有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总目录和档案附卷十卷总目录的下载地址。

本选集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

本选集中的注释，一为原书著者（斯大林）注，二为译者注，三为编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置于当页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选集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选集中的部分篇目标题，是我们拟加的。

本选集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书编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 1

《斯大林选集》第一卷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著者第一卷序言
（一九四六年一月）…… 3
编辑部的话
（一九〇一年九月）…… 7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一九〇一年十一、十二月）…… 12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一九〇四年九月一日）…… 26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
（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 43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一九〇五年五月）…… 51
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
（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五日）…… 83
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88
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
（一九〇六年）…… 104
阶级斗争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123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 129
一 辩证方法 …… 131
二 唯物主义理论 …… 141
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 154
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
（一九〇七年二月十日）…… 183
经济恐怖和工人运动
（一九〇八年三月三十日）…… 192
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
（一九〇九年八月一、二十七日）…… 195
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高加索来信）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203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一九一三年一月）…… 207
一 民族 …… 209
二 民族运动 …… 216
三 问题的提法 …… 222
四 民族文化自治 …… 228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 …… 237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 …… 248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 257
论工兵代表苏维埃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263
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 265
五一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26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节选）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 270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275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三日）…… 278
一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七月二十七日）…… 278
二　结论（七月二十七日）…… 286
三　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七月三十日）…… 288
四　对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七月三十一日）… 293
五　结论（七月三十一日）…… 296
六　就“关于政治形势”决议第九条问题
驳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八月三日）…… 299
两条道路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301
两条路线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304
苏维埃政权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307
我们需要什么？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310
在赫尔辛福斯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313
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十八日）…… 316
一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报纸纪要）
（一月十五日）…… 316
二　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草案 …… 317

三 关于民族问题报告的结论——报纸纪要
（一月十五日）…… 318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一八年四月三、四日）…… 32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的草案）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326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
（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 327
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 329
关于俄国南部——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330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十九日）…… 333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333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335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 338
不要忘记东方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341
两个阵营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343
帝国主义的后备军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346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摘要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349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351
一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 …… 352

二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 …… 354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
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358
关于波兰战线的情况——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一日）…… 360
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364
我们的意见分歧
（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369
一　对待工人群众的两种方法 …… 369
二　自觉的民主和被迫的“民主”…… 371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十六日）…… 376
一　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三月十日）…… 376
二　结论（三月十日）…… 383
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二一年三月）…… 387
论民族问题的提法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 389
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394
前途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402
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
——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09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417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420
一 要预先确定的几个概念 …… 420
二 战略计划 …… 428
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434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节选）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二十五日）…… 442
一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四月十七日）…… 442
二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四月十九日）…… 458
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467
关于党的任务
——在俄共（布）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471
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482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十八日）…… 494
一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一月十七日）…… 494
二 结论（一月十八日）…… 508
悼列宁——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523
论列宁——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527
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矛盾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青年工作问题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 536

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一九二四年四月）…… 539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 541
二　方法 …… 546
三　理论 …… 552
四　无产阶级专政 …… 566
五　农民问题 …… 576
六　民族问题 …… 587
七　战略和策略 …… 595
八　党 …… 608
九　工作作风 …… 620
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在俄共（布）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 623
外部状况 …… 624
结合问题 …… 627
劳动群众的教育和改造问题 …… 631
党 …… 634
关于县级工作人员的任务 …… 639
关于波兰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 641
给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的信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647
论国际形势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650
一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时代 …… 650
二　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和协约国的伦敦赔款协定 …… 654
三　欧洲工人运动中革命因素的加强。
苏联国际威信的提高 …… 657

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664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669
一 关于十月起义的一些事实 …… 669
二 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 …… 674
三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685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序言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693
一 十月革命的内外环境 …… 693
二 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或十月革命和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 695
三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几个特点 …… 709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 719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 1

《斯大林选集》第二卷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

女工和农妇们，要记住并实现伊里奇的遗训！
（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 3
致教师代表大会
（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 4
论“红色青年”杂志的任务
（一九二五年一月）…… 5
有关与托洛茨基争论的一些问题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6
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9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和德国共产党党员海尔佐克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 15
庆祝国际妇女节
（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 …… 20
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 22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 26
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 31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
——向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 …… 34
一 国际形势 …… 34
二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 41
三 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 …… 44
四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 …… 46
五 党在农村中的政策 …… 55
六 关于金属工业 …… 60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 64
一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
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所担负的任务 …… 65
二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
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担负的任务 …… 71
问题和答复——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 …… 76
关于东方革命运动——和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布施先生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 113
论共青团的任务——答“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117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节选）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三十一日）…… 123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十二月十八日）…… 123

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两次演说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185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192
一　列宁主义的定义 …… 192
二　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 …… 194
三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 …… 196
四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 198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党和工人阶级 …… 206
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 228
七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 …… 240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
——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
关于联共（布）中央全会工作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251
一　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 …… 251
二　工业化方针 …… 253
三　社会主义积累问题 …… 254
四　积累的正当利用。节约制度 …… 259
五　要造就工业建设干部 …… 264
六　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 …… 265
七　要巩固工农联盟 …… 266
八　要实行党内民主 …… 268
九　要保护党的统一 …… 269
十　结论 …… 270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 272
一　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 272
二　加米涅夫在为托洛茨基打扫道路 …… 286

三 不可思议的糊涂想法或
季诺维也夫论革命性和国际主义 …… 293
四 托洛茨基伪造列宁主义 …… 298
五 反对派的实践纲领。党的要求 …… 311
六 总结 …… 314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316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 …… 316
二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 317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 319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 320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 322
六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 325
七 中国的青年问题 …… 325
八 几个结论 …… 3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节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六日）…… 328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十二月七日报告）…… 328
一 几点预先的说明 …… 328
二 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 335
三 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 340
四 在工作中的反对派 …… 360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 363
六 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 367
七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 369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答杨—斯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371
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383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 383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 384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 386
四　反对派的错误 …… 387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390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 410
一　几个小问题 …… 410
二　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 412
三　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
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 418
四　论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 …… 420
五　两条路线 …… 427
时事问题简评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431
一　论战争的威胁 …… 431
二　关于中国 …… 437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节选）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 459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八月一日的演说）…… 459
一　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 …… 459
二　关于中国 …… 464
三　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 …… 483
四　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 …… 486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节选）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500
一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 500

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528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七日）…… 548
党和反对派——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556
一 争论的简短总结 …… 556
二 工人阶级和农民 …… 558
三 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 561
四 我国革命的前途 …… 564
五 今后怎样？…… 566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节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十九日）…… 568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十二月三日）…… 568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568
二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内部状况 …… 582
三 党和反对派 …… 606
四 总结 …… 625
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
——给联共（布）各级组织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628
论红军的三个特点
——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635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 639
一 关于自我批评 …… 639
二 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 646
三 沙赫特事件 …… 655

四　总结 …… 662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664
一　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 …… 664
二　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 …… 667
三　青年必须掌握科学 …… 669
在粮食战线上——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谈话节录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673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684
联共（布）中央全会（节选）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十二日）…… 692
论共产国际纲领（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 692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
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 703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715
一　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 …… 715
二　谷物问题 …… 723
三　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
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 …… 730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 1

《斯大林选集》第三卷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

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二月初）…… 3
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8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 11
一　“民族”概念 …… 11
二　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 13
三　民族和民族语言的未来 …… 17
四　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 …… 22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九年四月）…… 27
一　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 …… 28
二　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 33
三　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 …… 39
四　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 …… 45

五 党的领导问题 …… 94
六 结论 …… 101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叶·米库林娜“群众的竞赛”一书序言）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103
大转变的一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 106
一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 …… 106
二 在工业建设方面 …… 108
三 在农业建设方面 …… 110
结论 …… 117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19
一 “平衡”论 …… 120
二 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 122
三 小农经济“稳固”论 …… 124
四 城市和乡村 …… 128
五 关于集体农庄的本质 …… 132
六 阶级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转变 …… 135
七 结论 …… 138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 140
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144
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
（一九三〇年二月九日）…… 148
一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提出的问题 …… 148
二 斯大林同志的答复 …… 149

胜利冲昏头脑（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 153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159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178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178
二　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高涨和苏联的内部状况 …… 195
三　党 …… 248
致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摘自原信）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273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
——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 277
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
——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287
一　劳动力 …… 287
二　工人的工资 …… 289
三　劳动组织 …… 292
四　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问题 …… 295
五　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征兆 …… 298
六　关于经济核算 …… 301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领导 …… 303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一九三一年）…… 306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319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节选）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 333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的报告）…… 333
一 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 …… 333
二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 …… 341
三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346
四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352
五 五年计划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358
六 五年计划在城乡间商品流转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362
七 五年计划在和敌对阶级残余进行斗争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365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371
一 集体农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 371
二 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 …… 377
三 几点意见 …… 380
和罗宾斯上校的谈话（简要记录）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 385
和“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先生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394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398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398
二 苏联国民经济的继续高涨和内部状况 …… 414
三 党 …… 441
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九日）…… 464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471

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 487
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 490
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讲话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93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农庄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
（一九三五年二月）…… 497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499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见集体农庄
种植甜菜的女突击队员时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 505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508
1.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 …… 508
2.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 …… 512
3.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 …… 516
4.最近的任务 …… 519
5.简单的几句话 …… 520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522
一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 522
二　1924—1936 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 523
三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 529
四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 533
五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 539
六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 …… 548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
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至五日）…… 550
一 政治上的麻痹大意 …… 551
二 资本主义包围 …… 553
三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 555
四 经济胜利的阴暗面 …… 560
五 我们的任务 …… 562
结束语 …… 572
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
——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 586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导言
（一九三八年九月）…… 590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
（一九三八年九月）…… 592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
（一九三八年九月）…… 622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633
一 苏联的国际形势 …… 633
二 苏联的国内形势 …… 644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 662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 1

《斯大林选集》第四卷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三年

广播演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 3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9
四个月战争的经过 …… 10
“闪击战”的破产 …… 10
我军暂时失利的原因 …… 13
“民族社会党人”是些什么人？ …… 14
德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 17
我们的任务 …… 19
检阅红军时的演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 22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信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 …… 25
“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 29
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和取消政治委员制——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 …… 35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 37
1.后方的组织工作 …… 37

2.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 38
3.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 41
4.苏联、英国和美国反对希特勒德国
及其欧洲盟国的战斗联盟 …… 43
5.我们的任务 …… 46
关于盟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答美联社记者问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 49
应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最高统帅命令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 51
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问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 56
永远纪念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 …… 58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 …… 59
1.战争进程中根本转折的一年 …… 60
2.全民支援前线 …… 63
3.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法西斯同盟的瓦解 …… 67
关于盟国在法国北部登陆一事——答《真理报》记者问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 …… 72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 …… 73
1.德国处在两个战场的夹攻中 …… 73
2.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勋 …… 77
3.反德同盟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和平与安全问题 …… 80
关于《军事思想》和《军事通报》杂志——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 …… 85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最高统帅命令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 …… 87

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告人民书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91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93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时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94
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告人民书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95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98
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八周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110
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113
就邱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 117
原子弹是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的
——答《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斯先生问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 123
和美国共和党人士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记录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126
在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 136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七月）…… 138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 138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 160
答同志们 …… 166

评艾德礼的言论和联合国的行为——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五一年）…… 175
关于原子武器问题答《真理报》记者
（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 180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给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
（一九五二年二月至九月）…… 182
对于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 182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 216
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 222
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 …… 242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 251

附 卷

斯大林历史档案选

—生平综合篇—

苏维埃文化应在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 年 7 月 3 日）…… 256
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谦虚也更准确
——在同作家们会见时的讲话片断
（1932 年 10 月 26 日）…… 258
就《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问题的讲话
（1946 年 8 月 9 日）…… 259
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致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
（1924 年 8 月 19 日） …… 264
再次请辞“总书记”职务
（1926 年 7 月 22 日） …… 266

三次请辞“总书记”职务
（1926 年 12 月 27 日）…… 267
建议取消“总书记”的设制
（1927 年 12 月 19 日）…… 268
我老了，请大家另选一位书记吧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1952 年 10 月 16 日）…… 272
围绕着我个人的狂热从何而来
——与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的谈话
（1937 年 1 月 8 日）…… 274
我们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这种赞美
——致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信
（1945 年 11 月 10 日）…… 277
对《斯大林传略》第一版的批评
（谈话记录）…… 278
对身后的预言
（1939 年） …… 280

—党政建设篇—

中央组织局一九二六年三-八月的工作计划
——在中央组织局会议上的讲话
（1926 年 3 月 15 日） …… 282
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问题
——在联共（布）二、三月全会上的结束语
（1937 年 3 月 5 日）…… 287
要有年轻的新鲜力量注入中央委员会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1952 年 10 月 16 日）…… 309

关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
——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37年6月2日）…… 311
丧失警惕性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的片断
（1940年） …… 338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
（1938年10月1日） …… 341

—经济建设篇—

把个体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
（1928年1月20日） …… 382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和实际结论
（1928年4月6-11日） …… 396
关于工业化、集体化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28年7月9日）…… 412
发展农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撑点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28年7月11日） …… 445
展开一场宣传集体农庄的运动——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日）…… 453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
（1935年2月）…… 455

—中国革命篇—

关于目前中国大革命的形势
——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27年4月5日）…… 457

关于在中国成立苏维埃的问题
（1927 年 9 月 27 日） …… 468
周恩来记录的斯大林同瞿秋白等人的谈话
（1928 年 6 月 9 日）…… 470
同王明等谈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
（1937 年 11 月 11 日）…… 475
与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革命的谈话
（1936 年 11 月—1942 年 3 月）…… 478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二）
（1951 年 2 月 9 日）…… 482

—苏中关系篇—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诸问题——与刘少奇会谈纪要
（1949 年 6 月 27 日） …… 487
关于中苏条约及撤军、贷款、援助等问题
——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1949 年 12 月 16 日）…… 492
关于签订新约及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
——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1950 年 1 月 22 日） …… 498
关于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
（1950 年 8 月 27 日） …… 504

—朝鲜战争篇—

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出兵的关系——致毛泽东电
（1950 年 10 月 5 日） …… 506
对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展开攻势表示祝贺——致毛泽东电
（1950 年 12 月 1 日） …… 508

不宜过早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致周恩来电
（1950 年 12 月 7 日） …… 509
给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5 月 6 日）…… 511
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5 月 29 日） …… 513
关于持久作战和提高士气等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6 月 5 日）…… 515
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6 月 30 日） …… 517
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8 月 29 日） …… 519
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11 月 19 日）…… 520

—国际共运篇—

不要像老师那样对工人说话
（1934 年 4 月 7 日）…… 521
需要提出符合战争当前阶段的问题
（1939 年 10 月 24、25 日）…… 525
必须注意欧洲工人的这些特点
（1939 年 11 月 7 日） …… 527
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
——谈共产国际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1941 年 4 月 20 日） …… 529
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
（1943 年 5 月 8、11 日）…… 531

我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1943 年 5 月 21 日） …… 532
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德国革命提纲的意见
（1923 年 8 月 20 日） …… 533
对德国革命共产国际不应下达具体指令
（1923 年 8 月 21 日） …… 536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之一）
（1929 年 5 月 6 日）…… 539
力量不足以继续战斗的情况是会有的
（1939 年 4 月 7 日）…… 547
对法国共产党工作的建议
（1944 年 3 月 5 日）…… 549
关于在保加利亚成立劳动党的建议
（1946 年 9 月 2 日）…… 551
关于苏南关系诸问题给铁托的信
（1948 年 3 月 27 日） …… 553
关于蒙古与苏联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同乔巴山会谈纪要
（1946 年 2 月 22 日） …… 559
与哥穆尔卡和明茨关于波兰局势的谈话内容
（1945 年 11 月 14 日）…… 563
致伊朗人民党主席比雪华里的信
（1946 年 5 月 8 日）…… 566
关于印度革命道路的问题——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一）
（1951 年 2 月 9 日）…… 569
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资本家们分化为两大派别
（1945 年 1 月 28 日） …… 580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 ——答季米特洛夫
（1948 年 11 月 6 日之前） …… 581

—终卷篇—

一九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

——在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1948 年 3 月 14 日） …… 583

插图

马-恩-列-斯 …… 590

附录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i3sDSnN

包含在“新编斯大林全集及档案附卷”文件夹）

一、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总目录

二、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十卷总目录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五月制作

斯大林选集

第一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选集

第一卷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二〇一七年·中国

М. Горький.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 1

《斯大林选集》第一卷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著者第一卷序言
（一九四六年一月）…… 3
编辑部的话
（一九〇一年九月）…… 7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一九〇一年十一、十二月）…… 12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一九〇四年九月一日）…… 26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
（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 43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一九〇五年五月）…… 51
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
（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五日）…… 83
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88
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
（一九〇六年）…… 104
阶级斗争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123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 129
一 辩证方法 …… 131
二 唯物主义理论 …… 141
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 154
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
（一九〇七年二月十日）…… 183
经济恐怖和工人运动
（一九〇八年三月三十日）…… 192
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
（一九〇九年八月一、二十七日）…… 195
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高加索来信）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203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一九一三年一月）…… 207
一 民族 …… 209
二 民族运动 …… 216
三 问题的提法 …… 222
四 民族文化自治 …… 228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 …… 237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 …… 248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 257
论工兵代表苏维埃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263
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 265
五一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26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节选）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 270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275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三日）…… 278
一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七月二十七日）…… 278
二　结论（七月二十七日）…… 286
三　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七月三十日）…… 288
四　对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七月三十一日）… 293
五　结论（七月三十一日）…… 296
六　就“关于政治形势”决议第九条问题
驳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八月三日）…… 299
两条道路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301
两条路线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304
苏维埃政权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307
我们需要什么？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310
在赫尔辛福斯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313
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十八日）…… 316
一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报纸纪要）
（一月十五日）…… 316
二　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草案 …… 317

三 关于民族问题报告的结论——报纸纪要
（一月十五日）…… 318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一八年四月三、四日）…… 32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的草案）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326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
（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 327
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 329
关于俄国南部——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330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十九日）…… 333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333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 335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 338
不要忘记东方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341
两个阵营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343
帝国主义的后备军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346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摘要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349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351
一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 …… 352

二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 …… 354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
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358
关于波兰战线的情况——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一日）…… 360
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364
我们的意见分歧
（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369
一　对待工人群众的两种方法 …… 369
二　自觉的民主和被迫的“民主”…… 371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十六日）…… 376
一　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三月十日）…… 376
二　结论（三月十日）…… 383
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二一年三月）…… 387
论民族问题的提法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 389
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394
前途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402
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
——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09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417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420
一 要预先确定的几个概念 …… 420
二 战略计划 …… 428
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434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节选）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二十五日）…… 442
一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四月十七日）…… 442
二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四月十九日）…… 458
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467
关于党的任务
——在俄共（布）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471
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482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十八日）…… 494
一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一月十七日）…… 494
二 结论（一月十八日）…… 508
悼列宁——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523
论列宁——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527
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矛盾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青年工作问题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 536

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一九二四年四月）…… 539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 541
二　方法 …… 546
三　理论 …… 552
四　无产阶级专政 …… 566
五　农民问题 …… 576
六　民族问题 …… 587
七　战略和策略 …… 595
八　党 …… 608
九　工作作风 …… 620
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在俄共（布）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 623
外部状况 …… 624
结合问题 …… 627
劳动群众的教育和改造问题 …… 631
党 …… 634
关于县级工作人员的任务 …… 639
关于波兰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 641
给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的信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647
论国际形势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650
一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时代 …… 650
二　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和协约国的伦敦赔款协定 …… 654
三　欧洲工人运动中革命因素的加强。
苏联国际威信的提高 …… 657

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664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669
一 关于十月起义的一些事实 …… 669
二 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 …… 674
三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685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序言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693
一 十月革命的内外环境 …… 693
二 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或十月革命和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 695
三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几个特点 …… 709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 719

本 卷 说 明

新编《斯大林选集》共分四卷，是根据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和档案附卷十卷编辑的。各卷内容的起讫时间为：第一卷，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第二卷，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第三卷，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第四卷，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三年。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原《斯大林选集》，仅为两卷，按照当时的政治、理论需要，剔除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工人运动、暴力革命、论反对派、卫国战争，以及中国革命等方面的大量文献。现新编《斯大林选集》已尽可能予以增补、充实，以力求全面地反映这位历史伟人和革命导师的思想、理论和**非凡经历**。

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中，有众多关于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新编《斯大林选集》亦撮要单独编辑成“斯大林历史档案选”，作为附卷附于第四卷之后，供读者参考。第四卷之后还附有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总目录和档案附卷十卷总目录的下载地址。

本选集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

本选集中的注释，一为原书著者（斯大林）注，二为译者注，三为编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置于当页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选集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选集中的部分篇目标题，是我们拟加的。

本选集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书编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新编《斯大林选集》

第一卷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著 者 第 一 卷[①]序 言

（一九四六年一月）

编入全集第一卷的著作是著者在活动初期（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写的，当时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尚未完全形成。这种情况也多少反映到全集第二卷。

为了理解和恰当地评价这些著作，应该把它们看做一个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因此，这些著作中自然还留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论点的痕迹,这些论点以后都被我党纠正了。我指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纲领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问题。

从第一卷里（见《土地问题》三文）可以看出，当时著者主张把地主的土地分归农民所有。在我党统一代表大会[②]上讨论土地问题时，大多数做实际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赞成分配土地的观点，大多数孟什维克代表主张土地市有[③]，而列宁和其余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代表则主张土地国有；在这三个草案的斗争过程中，当土地国有的草案显然没有希望被代表大会通过时，列宁及其他主张土地国有的人就在代表大会上赞成分配土地的草案。

主张分配土地的人提出了三个理由反对土地国有：（甲）农民不会赞成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因为他们想把这些土地归为己有；（乙）农民将反对土地国有，因为他们会把土地国有看成废除当时已归农民

———————————————

① 指苏联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本书编者注

②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旨在把党内两派统一起来，故称“统一”代表大会。——译者注

③ 这里指的是把土地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支配。——译者注

所有的那些土地的私有权的一种措施；(丙)即使能够说服反对土地国有的农民，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仍然不应当主张土地国有，因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俄国不会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会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假使大量的收归国有的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国家手中，那就会过分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而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

当时主张分配土地的人依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也在内）所公认的前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会有一个相当长的革命中断时期，即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间歇时期。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将有可能更自由更蓬勃地发展起来，而且扩展到农业方面去，阶级斗争将更加深入而极其广泛地展开，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将增长起来，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将提到应有的高度，并且只有具备了这一切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会到来。

应该指出，两种革命之间会有长期间歇这一前提，在代表大会上并没有遭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对，当时无论是主张土地国有的人和主张分配土地的人，或主张土地市有的人，都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应促使俄国资本主义更蓬勃地向前发展。

我们这些做实际工作的布尔什维克是否知道列宁当时主张俄国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不间断的革命呢？是的，知道的。这是从他的小册子《两个策略》（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五年的著名论文《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里面知道的，在那里他说：“我们主张不间断的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但是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并没有好好钻研这个问题，没有了解它的伟大意义，这是由于我们的理论修养不够，也是由于我们犯了做实际工作的人不关心理论问题的通病。大家记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列宁在当时没有发挥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理论的论据，没有在代表大会上运用这些论据来论证土地国有的主张。他当时没有运用这些

论据，是不是他认为问题尚未成熟，而且没有指望出席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做实际工作的布尔什维克能了解和接受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呢？

只是过了些时候，当列宁关于俄国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路线时，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才消除了；因为当时已很明显，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特殊的发展条件已经给由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党除了土地国有的纲领而外，是不能有任何土地纲领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从第一卷里（见《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可以看出，著者当时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论点，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中间，同样在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是大家公认的。然而欧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列宁所发现的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一切都表明：这个论点已不适合新的发展情况，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发展的最高点、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资本主义阵线却薄弱得能被无产阶级冲破的个别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就是这样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间产生的。大家知道，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根据是：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而首先会在资本主义阵线薄弱、无产阶级比较容易冲破这个阵线、资本主义即使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里获得胜利。

对搜集在第一卷里的著作，著者的意见就是如此。

约·斯大林

一九四六年一月

载于《斯大林全集》
一九四六年版第1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卷第5—8页

编 辑 部 的 话[①]

（一九〇一年九月）

我们这一部分格鲁吉亚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深信创办一种自由的定期刊物对于觉悟的格鲁吉亚读者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们深信这个问题现在必须加以解决，如果再拖延下去，就只会使共同事业受到损害；我们深信每一个觉悟的读者都会欢迎这种刊物并给以各种帮助；因此，针对着这种需要，我们将竭尽全力满足读者的愿望。今天，我们办的格鲁吉亚第一个自由刊物《**斗争报**》创刊号出版了。

为使读者对于我们这个刊物，同时也对于我们本身有明确的认识起见，我们要讲几句话。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波及全国每一个角落，也波及我们称之为高加索的这一个俄国的角落，而和高加索一起，我们的格鲁吉亚同样被波及了。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不久以前才产生的，它一共只有几年的历史，确切一点说，这个运动的基础是在一八九六年才奠定的。我们这里也像其他各地一样，最初时期的工作也没有超出秘密活动的范围。我们近来所看到的那种鼓动工作和广泛宣传工作，当时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只好把一切力量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小组上面。现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已经在工人群众中间传播开来，于是工作也就超出了狭小的秘密活动的范围，而在很大一部分工人中间展开了。公开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向第一批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过去还不突出、也不十分需要加以阐明的问题。首先极其

———————————————

① 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报纸《斗争报》社论。——著者注

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更广泛地展开斗争？口头上回答这个问题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

对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说，主要的手段当然是广泛地宣传和鼓吹革命思想。然而革命者现在的工作条件却是如此矛盾，如此困难，并且要求作如此重大的牺牲，以致无论宣传工作或鼓动工作，往往都不能像运动初期所需要的那样进行。

靠书本和小册子进行小组活动渐渐不可能了，这首先是由于宪警的迫害，其次也由于工作的实际要求。只要有人被捕，鼓动工作就会松懈下来，要和工人保持联系，要时常到工人那里去，就成为不可能了，然而工人对于许多迫切的问题都盼望得到解释。残酷的斗争在工人周围进行着，政府用一切力量对付工人，而工人却无法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时局，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往往只要邻近某工厂遭到小小的挫折，就会使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消沉下去，对前途失掉信心，于是领导者又得重新吸引他们来参加工作。

靠那种只能解答某些具体问题的小册子进行鼓动工作，在大多数场合，效果是很小的。因而创办一种能够解答日常问题的刊物，就成为必要的了。这个尽人皆知的真理是无须我们证明的。在格鲁吉亚工人运动中，以定期刊物作为革命工作最主要手段之一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为了供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参考起见，我们认为关于合法报纸应该讲几句话。如果工人中间有人以为合法报纸（无论这个报纸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版的，也无论它的方针怎样）能代表他的利益，代表工人的利益，那末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关心”工人的政府对待合法报纸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一大群做书报检查员的官吏被派来专门监视这些报纸，只要有一丝真理的光芒从缝隙里透露出来，他们就用红墨水和剪刀来对付。一道一道的训令雪片似地飞到书报检查局：

“不得放过任何一点有关工人的消息，不许登载某某事件，不准讨论某某问题”，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报纸是不能真正办好的，工人要想在报纸上，哪怕是从字里行间寻找一点有关工人问题的报道和正确的评价都是徒劳无益的。假使有人认为工人可以利用某一合法报纸上面仅仅由于刽子手检查员的疏忽而放过的寥寥几行顺便涉及工人问题的文字，那末应该指出：谁要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片言只字上面，谁要靠这些零碎消息来建立一套有系统的宣传工作的话，那就证明他是不通事理的。

再说一遍，我们之所以要讲这一点，不过是供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参考罢了。

总之。创办格鲁吉亚的自由的定期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迫切需要的。现在问题只在于怎样办这个刊物，它应当以什么为指南，它应当给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一些什么。

如果从旁观者的地位一般地来看格鲁吉亚报纸的存在问题，尤其是内容和方针问题，那末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自然地简单地自行解决：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运动，并不仅仅是具有自己纲领的格鲁吉亚工人运动，它和全俄的运动携手并进，因而是服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由此可见，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应当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机关报，主要是阐明地方性的问题和反映地方性的运动。但是这样的回答却抹杀了我们所不能回避而必然要碰到的困难。我们所讲的是语文方面的困难。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有可能通过全党机关报来解释一切总的问题，而把阐明仅属地方性问题的事情交给各个地区委员会去做，然而格鲁吉亚报纸在其内容方面都处于困难的境地。格鲁吉亚报纸应同时起全党机关报的作用和区域性的、地方性的机关报的作用。由于大多数格鲁吉亚工人读者不能流畅地阅读俄文报纸，所以格鲁吉亚报纸的领导者就不能不阐明带全党性的俄文报正在讨论和必须讨论的一切问题。这样，格鲁吉亚

报纸必须向读者介绍一切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同时它必须领导地方上的运动，恰当地阐明每一事件，对任何事实都不能不加以解释，并且还要解答本地工人特别关心的一切问题。格鲁吉亚报纸应当把格鲁吉亚的战斗工人跟俄罗斯的战斗工人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它应当向读者报道本地生活、俄国生活和国外生活中一切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事物。

我们对格鲁吉亚报纸的看法，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现在谈谈这个报纸的内容和方针。

我们应当要求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战斗的工人身上。我们认为用不着多说，在俄国，而且到处一样，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显然，只有工人运动才有自己的坚固根基，也只有它才没有任何荒诞无稽的空想。因而这个报纸，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应当领导工人运动，给它指示道路，使它不犯错误。总之，这个报纸的首要责任是尽可能地接近工人群众，设法经常影响他们，使自己成为有意识的、领导工人群众的中心。

可是，因为在俄国今天的情况下，除工人以外，社会上还可能有其他阶层的人以“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姿态出现，并且因为这种自由是俄国战斗工人当前的目标，所以这个报纸对于任何革命运动都应该给以篇幅，哪怕这个运动是发生在工人运动范围以外的。我们说“给以篇幅”，不是仅仅顺便刊载一些报道或简讯，不，这个报纸必须特别注意其他社会阶层中间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革命运动。它必须解释每一社会现象，从而影响每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因此，这个报纸应该特别注意到俄国的政治形势，估计到这个形势的一切后果，而且要把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尽可能提得更广泛些。

我们确信，谁也不能利用我们这些话来证明我们似乎就是要与资产阶级保持联系和实行妥协的人。对于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哪怕这个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生的）给予应有的估价，指出弱点和错

误，也不会给社会民主党人涂上机会主义的污点。不过我们决不应忘记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斗争方式。如果我们以这个尺度来衡量每一个运动，我们就会避免伯恩施坦派的一切呓语。

这样，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必须对一切有关工人运动的问题经常给以明确的答复，解释各种原则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明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芒照耀工人所遇到的每一种现象。

同时，这个报纸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者，必须及时向读者报道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持的一切策略观点。它必须向读者介绍其他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在干什么，在怎样斗争，必须及时地号召格鲁吉亚工人起来参加斗争；同时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应不加以注意，不应不给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

我们对格鲁吉亚报纸的看法就是如此。

我们不能用依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就能全部完成这些任务的诺言来欺骗自己，又欺骗读者。要把这个报纸办好，就需要读者和同情者方面的帮助。读者会看出《斗争报》创刊号是有许多缺点的，然而只要读者能给以帮助，这些缺点是能够改正的。例如，我们可以指出地方新闻报道做得不够。我们远离故乡，没有可能注视格鲁吉亚的革命运动，没有可能及时报道和阐明这个运动中的问题。所以必须有格鲁吉亚当地人士的帮助。谁愿意在写作方面也帮助我们，那他一定会找出办法来和《斗争报》编辑部建立直接或间接联系的。

我们号召全体战斗的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亲切关怀《斗争报》的命运，对于它的出版和散发予以多方的协助，从而把格鲁吉亚第一个自由的报纸《斗争报》变成革命斗争的工具。

载于一九〇一年九月《斗争报》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 卷第 3—7 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一九〇一年十一、十二月）

一

人类的思维只是在经历许多磨难、痛苦和变化之后，才科学地研究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西欧社会主义者只是在乌托邦（空想的、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给自己开辟了道路，才探索出和论证了社会生活的法则，从而论证了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的必要性。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欧洲产生了许多勇敢的、忘我的、忠实于工作的学者，他们曾力图阐明和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才能拯救人类，使之摆脱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加剧和恶化的宿疾？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在西欧有过多次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伤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们应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法则，只是飞翔在实际生活的上空，好高骛远，殊不知真正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当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基础时，空想家们就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目标，并且依其结果讲来更可悲的是，他们（罗柏特·欧文、路易·勃朗、傅立叶等等）期待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难信服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的。这个观点完全抹杀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其实工人群众才是社会主义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家们是不能了解这一点的。他们想不依靠人民（工人）本身的帮助而用制定法律和发表宣言的办法来创造人间的幸福。他们对于工人运动并没有特别注意，甚至往往否认它的意义。因此他

们的理论始终是和工人群众不相干的理论，可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却有一种伟大的思想完全不依赖这些理论而成熟起来，这种思想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天才的**卡尔·马克思**宣布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现在连“瞎子”也看得清楚的真理：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必须有工人的独立自主的活动，必须使工人不分民族和国家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当时必须论证这个真理（这一点由**马克思**及其朋友**恩格斯**光辉地完成了），以便为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这个政党今天好似一个难逃的劫运笼罩在欧洲资产阶级制度的头上，威胁着这个制度，要消灭它，要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发展的途径差不多也和在西欧一样。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达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即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也有过社会主义者，也有过工人运动，可是两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会主义者走向无法实现的空想（“土地与自由党”、“民意党”），而工人运动则走向自发的骚动。两者在同一时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动，可是互不相识。社会主义者在劳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而他们的活动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根基的。工人则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者，因而他们的运动流为混乱的骚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仍然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坚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俄国社会主义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才和工人群众接近起来。当时他们看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救星，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随后，俄国社会民主派就把自己的努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时俄国工人中间所发生的运动上面。还不够觉悟的和对斗争还没有准备的俄国工人，力求逐渐脱离自己的绝望境地，总想设法改善自己的命运。自然，当时在这个运动中有条理的组织工作是没有的，运动是自发的。

社会民主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着手领导这个不自觉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运动。他们竭力发扬工人的觉悟性，竭力把个别工人集团反对个别业主的分散的斗争统一起来，融合成总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俄国压迫阶级的斗争，并竭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性。

最初一个时期，社会民主派不能在工人群众中开展自己的活动，因而只限于宣传鼓动小组的工作。当时社会民主派的唯一工作方式就是小组活动。这些小组的目的是要从工人中间造就出一批将来能领导运动的人材。因此这些小组是由先进工人组成的，也只有优秀的工人才有机会在这些小组里学习。

但是，小组活动时期很快就过去了。社会民主派不久便觉得必须走出狭隘的小组圈子，把自己的影响散布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外部的条件也促进了这一点。这时工人中间的自发运动特别高涨。你们谁不记得几乎整个梯弗里斯都被这种自发运动所席卷了的那一年呢？各烟草工厂和铁路工厂中无组织的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发生在一八九七年至一八九八年，在俄罗斯则稍微早一些。当时必须及时给以帮助，而社会民主派也就赶紧去帮助了。要求缩短工作日、废除罚款、提高工资等等的斗争开始了。社会民主派清清楚楚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这些琐碎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是运动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些要求是琐碎的，尽管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工人今天还是各自分散地进行斗争，但这个斗争本身将使工人认识到，只有整个工人阶级团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冲击他们的敌人时，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这个斗争也将向工人表明，他们除了自己的直接敌人资本家而外，还有另一个更警觉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整个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即拥有军队、法庭、警察、监狱和宪兵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然西欧的工人要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任何最小的试图都会碰到资产阶级政权的压制，

既然在已经争得人权的西欧，工人也得与政府当局进行直接的斗争，那末俄国工人在自己的运动中就一定更会和专制政权发生冲突，这个政权之所以是任何工人运动的警觉的敌人，不仅因为它保卫资本家，而且因为它既是**专制政权**，就不能容忍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特别是不能容忍这个比其他阶级更受压迫更受践踏的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俄国社会民主派就是这样理解运动的进程，并用全力在工人中间传播这些思想的。他们的力量就在于此，他们一开始便有伟大的和胜利的发展的原因就在于此。一八九六年彼得堡各织布厂工人的大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最初一些胜利竟使某些不坚强的人失去了理智，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从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最终目的，并为这个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视或者否认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现实的工人运动；现在某些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则恰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及其日常需要方面。当时（五年以前）俄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很低的。俄国工人还刚刚从百年大梦中觉醒过来，他们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当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需要，他们的要求也不高。俄国工人还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而已。至于必须改变现存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切，俄国工人群众是一点也不了解的。他们也不大敢想到结束全俄人民在专制政权下所过的苟延残喘的奴隶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社会民主派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另一部分人却醉心于经济斗争，醉心于局部地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斗争（例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甘愿把自己的伟大职责、自己的伟大理想完全忘掉。

这后一部分人也像他们西欧的同道者（所谓伯恩施坦派）一样地

说：“对我们，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工人阶级究竟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他们根本不去过问，只要有斗争就行了。于是所谓舍本逐末的政策就盛行起来了。结果有一天彼得堡《工人思想报》竟然宣称：“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恢复六月二日法令所废除的节日。”(!!!)①

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去领导自发运动，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不把群众引向我们的最终目的，反而成了运动本身的盲目工具；他们盲目地跟着一部分不够开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达当时工人群众所意识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话，他们是站在那里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去。他们竟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他们把俄国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这种大胆的思想吓坏了他们。不仅如此，依照社会民主派另一些人的看法，实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只是经济斗争，只要有罢工和工会、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就算成功了。他们认为老一辈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说，当政权尚未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改变现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它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区别；据他们说，把社会主义容纳到现存制度中去是很容易的，每一个工会，甚至每一个消费合作社零售处或生产合作社，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了。他们就想用这种补缀旧衣的荒唐办法来给受苦受

————————————————

① 必须指出，最近彼得堡“斗争协会”及其报纸编辑部已抛弃了自己原先那个纯粹经济斗争的方针，竭力把政治斗争的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著者注

难的人类缝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为革命者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把他们西欧的老师（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学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政治自由（即罢工、结社、言论等等自由）是和沙皇制度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别的政治斗争，即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单是经济斗争就足以达到目的，只要不顾政府禁令，更频繁地举行罢工，政府就会疲于惩治罢工者，罢工和集会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来了。

可见这些所谓“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想证明的是：俄国工人只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神用在经济斗争上，而不应当追求各种“渺茫的理想”。在实践上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天职仅仅是在某某城市里进行**地方**工作。他们对于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丝毫不感兴趣，反而认为组织政党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儿戏，会妨碍他们履行自己的直接“天职”——进行经济斗争。罢工、再罢工和为战斗基金募集几文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你们一定会想到，他们既然这样缩小了自己的任务，既然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那末这些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至少可以给这个运动做出许多成绩来。然而就在这点上我们也被欺骗了。彼得堡运动的历史使我们确信这一点。起初，在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间，运动有过辉煌的发展和勇敢的迈进，以后就变为盲目的徘徊，最后竟至停滞不前。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经济派”要给经济斗争建立坚固组织的全部努力，必然会碰到政府当局的坚壁，而且总是碰得粉碎。宪警的恶毒迫害使得任何经济组织都无法存在。罢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一百次罢工总有九十九次被宪警的高压手段所扼杀，工人们被无情地赶出彼得堡，牢狱的墙壁和西伯利亚的严寒残忍地消磨着他们的革命精力。我们深信运动之所以会这样停滞（当然是相对的停滞），不能只归咎于外部的条件、宪警的迫害，也要归咎于思想本身、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停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减弱。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经济斗争琐碎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国实际生活条件日益有力地推动俄国工人去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上述情况对运动造成的危害是会更大的。当时，哪怕普通一次小小的罢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这个问题，使他们与政权和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证明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所以和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愿望相违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觉醒了的俄国工人对于今天压得他们呻吟叫苦的政治经济现状公开表示不满的每一企图，他们想摆脱压迫的每一企图，都能推动工人举行经济斗争色彩日益减少的游行。俄国的五一节为政治斗争和政治游行示威开辟了道路。于是俄国工人在自己旧有的唯一斗争手段——罢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一九〇〇年哈尔科夫五一大运动时第一次试用过的政治游行示威。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由于自己内部的发展，便从小组**宣传**和经济罢工斗争逐渐转上**政治斗争**和**政治鼓动**的道路了。

当工人阶级看见俄国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抱着争取政治自由的决心登上斗争舞台时，这个转变就显著地加速了。

二

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专制制度沉重的魔掌也窒息着其他的社会阶级。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了的俄国农民，他们被苛捐杂税的重担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受唯利是图

的资产者和“高贵的”地主任意宰割。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国家机关和私人机关的小职员，小官吏，总之，就是人数众多的城市平民，他们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样地没有保障，他们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呻吟叫苦的有不能容忍沙皇鞭笞政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中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有学识的人，即所谓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律师、大学生和一般学生）。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乡土而其神圣情感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被专制制度蛮横地践踏了。呻吟叫苦的有经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其他俄国庶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即随处居住的权利、就学的权利、供职的权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他们被剥夺了开办本族学校的权利、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服从专制政权所疯狂推行的、可耻的、压迫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政策。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各种教派的千百万信徒，他们不愿依照正教神父的意旨而想本着自己的良心来信奉宗教。呻吟叫苦的还有…… 但一切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摧残的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要是他们都懂得这一点并明白谁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那末俄国的暴政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可惜俄国农民还处于数百年来由奴役、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他们现在还刚刚在觉醒，还不明白谁是他们的敌人。俄国各被压迫民族，在不仅有俄国政府反对它们，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民由于尚未认识专制制度是全国人民的公敌而同样也反对它们的时候，它们简直不敢想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剩下的就是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有学识的人。

但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极善于攫取并非由自己的胜利所得来的果实，都极善于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他们从来也不愿意在与强敌斗争中，在暂时还不大容易获得胜利的斗争中，拿自己

的较有特权的地位去冒险。尽管他们不满意，但他们毕竟生活得不坏，因此他们乐意把受哥萨克鞭打、被士兵枪杀、在街垒中搏斗等等权利让给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去独享。他们自己只是“同情”斗争，至多也不过是对凶暴的敌人那种镇压人民运动的残酷行为表示一下（在心里）“愤慨”罢了。他们是害怕革命行动的，只有在斗争的最后几分钟，当看清敌人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自己才转而采取革命的办法。这个道理是历史经验教给我们的…… 只有在斗争中除了自己的锁链而外别无可失的工人阶级和一般人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尽管俄国的经验还很贫乏，却也证明了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所教给我们的这个古老的真理。

特权阶层中，只有一部分大学生表明决心要为实现自己的要求斗争到底。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部分大学生也是那些受压迫的公民的子弟，并且大学生都是在学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

不管怎样，现在大学生几乎是以首领、以先进部队的姿态出现于“社会人士”的运动中。社会各阶级中不满意的人，今天都聚集在他们周围。起初，大学生企图使用从工人那里模仿来的罢工手段进行斗争。可是，在政府对他们的罢课报之以野蛮的法令（《暂行条例》），规定把参加罢课的大学生征去当兵的时候，大学生就只剩下了一种斗争手段，即向俄国社会求援，并由罢课转向**街头游行示威**。

大学生也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斗争得更英勇、更坚决了。被压迫的公民聚集在他们周围，工人阶级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于是运动就变成了威胁政权的强大运动。俄国政府使用大批军警和宪兵来对不驯顺的公民进行残酷而毫无结果的斗争已经有两年之久了。

最近几天的事件显示，政治游行示威是不会失败的。十二月初在哈尔科夫、莫斯科、下新城、里加等等城市发生的事件表明，目前公

众的不满已经是有意识地表现出来了，这些不满的公众已有决心从沉默的抗议转向革命的行动了。然而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即学习自由和大学内部生活的自由，对于广大的社会运动来说是太狭隘了。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一面旗帜，一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一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只有摧毁专制制度，才能建立起依靠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并保障学习、罢工、言论、宗教、民族及其他等等**自由**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给人民以自卫手段，使他们不受各种压迫者、商人、资本家、僧侣、贵族的迫害；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开辟出一条自由的道路，使人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并能自由地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

当然，大学生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这个巨大的斗争的，他们软弱无力的手臂擎不住这面沉重的旗帜。要擎得住这面旗帜，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手臂，而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工人群众联合的力量才是这样的力量。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必须把全国旗帜从大学生软弱的手中拿过来，在上面大书“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宪法万岁！”去引导俄国人民走向自由。对于大学生呢，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他们显示了政治游行示威在革命斗争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街头游行示威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使他们立刻知道我们的要求，并且造成广阔的肥沃土壤，使我们能够大胆散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种子。街头游行示威可以造成街头鼓动，使社会上一部分落后的怯懦的人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①]。在游行示威的时候，任何人只要走到街上，就能看见勇敢的斗士，就能明白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斗争，就能听见号召大家

————————————

① 秘密的书籍和鼓动传单，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很难传到每个居民手中。虽然散发秘密书刊收效很大，但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书刊只能散到一小部分居民中间。——著者注

起来斗争的自由演说，就能听到揭露现存制度和暴露我国社会疮痍的战斗歌曲。因此，政府当局最害怕街头游行示威。所以它恐吓大家：不但要严惩示威者，而且要严惩“好奇者”。在人民的这种好奇心中间，隐藏着对政府当局的主要危险：今天的一个“好奇者”，明天就会作为一个示威者把一批批新的“好奇者”集合到自己的周围。而这样的“好奇者”今天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是数以万计的。今天俄国居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一听到什么地方发生骚动就躲藏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乱子，可别把我也牵连进去，还是走开为妙。”从前他们总是这样说），今天他们却挤到发生骚动的地方去，“好奇地打听”：究竟这种骚动是为什么发生的，这样多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挨哥萨克的鞭打。

在这种情况下，“好奇者”再不会漠不关心地听着皮鞭和马刀的挥舞声了。“好奇者”看到，示威者集合在街头是为了诉说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而政府当局却用毒打和残酷镇压来回答他们。“好奇者”不惟不逃避皮鞭的响声，反而要挤上前去，可是皮鞭再也分辨不出：究竟哪些人是普通的“好奇者”，哪些人是“暴徒”。这时皮鞭遵照着“完全民主平等”的原则，不分性别、年龄甚至阶层地位而任意乱打这两类人的脊背。皮鞭就这样帮我们的大忙，加速“好奇者”的革命化。皮鞭就从镇慑人们的武器变成唤醒人们的武器。

因此，尽管街头游行示威还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效果，尽管示威者的力量今天还很薄弱，不能迫使政府立刻对人民的要求让步，可是今天我们在街头游行示威中所蒙受的牺牲，将来会换得百倍的补偿。在斗争中牺牲的或从我们阵营中抓去的每一个战士，都会唤 起成百成千的新战士。暂时我们在街头还不止一次要挨打，政府在街头搏斗中也还不止一次要成为胜利者。但这将是“皮洛士的胜利”[①]。再来几次这样的胜利，专制制度的失败就必不可免了。专制制度以今天的胜利给自己准备未来的失败。我们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天已

为时不远，我们要冒着皮鞭的毒打去散播政治鼓动和社会主义的种子。

政府也不亚于我们，它深知街头鼓动对于它是死刑的判决；只要再过两三年，**人民革命**的魔影就会出现在它的面前。前几天，政府通过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省长宣布：它“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来消灭街头游行示威的最小尝试”。显然，这个声明带着枪弹气味，可能还带着炮弹气味，但我们认为枪弹这种激起人们不满情绪的工具是不亚于皮鞭的。我们并不以为，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就能长期制止政治鼓动，从而阻碍它的开展。我们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也能使自己的鼓动工作适应因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而造成的新情况。无论如何，社会民主派应当警惕地注视事变，应当迅速利用这些事变的教训，并且善于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但是，为了这一点，社会民主派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紧密团结的组织，即**党的组织**，它将不仅按名称来说是团结的，而且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策略观点来说也是团结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建立这样一个以坚定的原则和不可摧毁的秘密活动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而奋斗。

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已经开始的新的街头运动，**应当把俄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拿到自己手里并把俄国民主主义引向大家所盼望的胜利！**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开始了一个**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时期。这种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现存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斗争（罢工）是不能得到什么重大结果的。罢工在自由国家里也是一种有利也有害的武器：甚至在那里，工人虽然有各种斗争手段，即政治自由、坚强的工会组织和富足的基金会，但罢工往往还是以工人的失败而结束。至于我们这里，罢工却是一种要遭受逮捕和武力镇压的罪行，任

——————————————

① 皮洛士是伊壁鲁斯王（公元前三一九年至二七二年）。公元前二八〇年他与罗马作战终于取得胜利，但损失惨重。他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也就完了！”“皮洛士的胜利”表示得不偿失之意。——译者注。

何工会组织都要受禁止，因此我们这里的罢工只有**抗议**的作用了。可是就抗议而言，游行示威却是更有力的武器。在罢工期间，工人的力量是分散的，参加罢工的只有一个厂或几个厂的工人，至多只有某一种行业的工人；举行总罢工甚至在西欧也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可能，但是在街头游行示威中，工人却能立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

由此可见，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末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至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中的其他抗议者，要知道，他们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只要给他们一个无伤大体的能赋予人民些微权利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就足以使这些抗议者唱起另一种调子来颂扬“新”制度了。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魔影”，在一切革命中他们总是当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力图把它结束。被工人所惊吓的资产阶级只要得到一点点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向政府伸出调和的手，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①]。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阶级才不会由于获得某种让步而和专制政权妥协，才不会因为人家弹奏宪政琵琶、唱起甜蜜调子便麻痹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有本事站在总的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头呢，还是作

————————————————

①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指那些已经背弃了自己的阶级而参加到社会民主派队伍中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例外，他们是“白色的乌鸦”。——著者注

为“知识界”即资产阶级的配角去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于俄国民主事业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在前一场合下，由于推翻专制制度，就会有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给工人、闭塞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在后一场合下，我们就只会得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宪法”，这个宪法在践踏工人的要求、只给**人民**一种自由的幻影方面，将不亚于专制制度。

但是，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时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人士”的任何叛变和出卖行为了。当这些“社会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事业时，工人阶级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引导这个事业前进；而这个独立的政党将给工人阶级以担当这种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载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月
《斗争报》第二、三两期合刊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 卷第 8—21 页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一九〇四年九月一日）

一

一切都在变化…… 社会生活在变化，“民族问题”也跟着在变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舞台上，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

例如，我们这里存在过所谓**贵族的“民族问题”**，当时（在“格鲁吉亚归并于俄国”之后）格鲁吉亚贵族感到丧失他们原先在格鲁吉亚国王统治时代所享有的特权和势力，对于自己是多么不利，他们认为充当“庶民”有伤自己的尊严，所以想要**“解放格鲁吉亚”**。**他们想借此使格鲁吉亚国王和贵族担当“格鲁吉亚”的领导者**，从而**把格鲁吉亚人民的命运交给他们**！这是**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如果不把格鲁吉亚贵族反对在高加索的俄罗斯统治者的个别阴谋计算在内，那末这个“运动”就没有做出任何一件能够博得荣誉的事情，没有在格鲁吉亚人的生活中留下任何显着的痕迹。只要社会生活事变稍微触到这个本来就很软弱的“运动”，就足以把它根本破坏。的确，商品生产的发展、农奴制度的废除、贵族银行的创立、城市和乡村中阶级对抗的加剧、乡村贫民运动的加强等等，——这一切都给格鲁吉亚贵族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给**“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格鲁吉亚贵族分裂成为两派。其中一派抛弃了任何“民族主义”而向俄国专制制度伸出手来，想从那里换得高官厚禄、低息贷款和农具，

要政府保障他们不受农村“暴动者”的威胁等等。格鲁吉亚贵族的另一派，更软弱的一派，则同格鲁吉亚的主教和大司祭串通一气，从而把受实际生活驱逐的“民族主义”置于教权主义卵翼之下。这一派热中于恢复那些已被破坏的格鲁吉亚教堂（这是他们“纲领”中的主要条文！），即“昔日伟业的纪念碑”，并且虔诚地等待一个能实现他们**农奴君主制**“愿望”的奇迹的到来。

这样，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就采取了教权主义的形式。

同时，现代社会生活又在我们这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当年轻的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很难和“外国”资本家进行自由竞争时，它就通过格鲁吉亚民族民主主义者开始嘟哝起什么**独立的格鲁吉亚**来了。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想用关税壁垒保护格鲁吉亚市场，用强力把“外国”资产阶级从格鲁吉亚市场赶出去，用人为的方法提高物价，并用这种“爱国的”手腕在发财的角逐场上求得成功。

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目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用说，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在无产阶级身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被阉割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注入生命力。必须把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民族民主主义者”就走上了舞台。他们费了许多气力来驳斥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民主党人大肆诽谤，劝告格鲁吉亚无产者离开这些人，同时赞美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劝它“为了工人本身的利益”设法加强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他们一再恳求格鲁吉亚无产者说：不要毁灭“格鲁吉亚”（或许是指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忘掉“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亲善起来等等。但这都是白费气力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的甜言蜜语麻醉不了格鲁吉亚无产阶级！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攻击，特别是把俄罗斯、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队伍的强大的阶级发动，给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并把他们从战场上赶走了。

“为了恢复被污辱的声名”，我们那些逃走了的爱国者“至少也得改变一下色彩”，即使领会不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至少也得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果然，秘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机关报“**格鲁吉亚报**”爬上了舞台！他们就想这样来诱惑格鲁吉亚工人！但是已经晚了！格鲁吉亚工人已经学会分清黑白，他们很容易就看破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只是改变了一下色彩”，并没有改变自己观点的本质，“**格鲁吉亚报”徒有社会主义的空名罢了**。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于是高声嘲笑格鲁吉亚的“救星”！“格鲁吉亚报”的那些唐·吉诃德式的希望并没有实现！

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又渐渐在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先进人士和“俄罗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这些人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俄罗斯”发生联系，从而使本来已经动摇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基础更加动摇起来。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第二个打击！

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走上了斗争舞台，于是新的“民族问题”即无产阶级的“民族问题”也跟着产生了。正如无产阶级不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民族问题”也不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民族主义”。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呢？

俄国无产阶级早就谈到斗争了。大家知道，任何斗争的目的都是要取得胜利。但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必须**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很明显，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把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

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如此。

然而，俄国专制制度是俄国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它经常阻挠

无产者的团结事业。它用强盗手段摧残俄国各“异”族的民族文化、语言、风俗和机关。专制制度剥夺了他们应有的公民权利，从各方面压制他们，口蜜腹剑地在他们中间散播猜忌和仇视，挑起他们的流血冲突。这表明俄国专制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离间俄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加强他们之间的民族纠纷，巩固民族壁垒，从而更加顺利地分裂无产者队伍，更加顺利地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小的民族集团，以便扼杀工人的阶级觉悟，破坏工人的阶级团结。

俄国反动势力的利益就是如此，俄国专制制度的政策就是如此。

很明显，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迟早一定要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发生冲突。事实果然这样，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应该怎样打破耸立在各民族间的民族壁垒，应该怎样消灭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以便使俄国各民族无产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呢？

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的内容就是如此。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应该分成各个民族政党并把它们组成一个“自由联盟”。“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也再三重复这样的话。

由此可见，他们劝我们不要团结成一个由统一的中央来领导的全俄政党，而要分成由几个中央来领导的几个政党，并且还说这都是为了加强阶级团结！我们想使各民族的无产者互相**接近起来**。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只要使各民族的无产者互相疏远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想把无产者联合成一个政党。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只要把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各个政党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想要消灭民族壁垒。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他们回答说：只要用组织上的壁垒来加强民族间的壁垒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一切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些

有着一个共同敌人并在相同的政治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俄国无产者出的主意！总之，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要干得使敌人拍手称快，并且亲手葬送你们的共同目的！

好吧，我们就暂且同意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的意见，跟着他们走，看他们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俗语说得好：追问撒谎人，就要追到撒谎的大门。

假定我们听从了我们那些联邦主义者的意见并建立了各个民族的政党，那末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这是不难了解的。在以前，当我们还是**集中主义者**的时候，我们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无产者的共同生活条件上、放在他们的一致利益上的，而关于他们的“民族差别”，我们只是在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抵触的范围内来谈的；在以前，我们认为最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之间一致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以便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俄工人的集中的政党。而现在，当“我们”已成为联邦主义者的时候，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一个新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以便在“民族差别”的基础上建立各个民族的政党。这样，在集中主义者是次要东西的“民族差别”，在联邦主义者都成为建立各民族政党的基础了。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那末我们迟早就要得出一个结论：例如，阿尔明尼亚无产者的“民族的”和某些其他的“差别”是和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的这些“差别”一样的；阿尔明尼亚无产者和阿尔明尼亚资产者具有同样的习俗和性格；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①]。这就离“共同行动的统一基础”不远了，不

———————————————

① “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刚刚采取了这样一个值得夸耀的步骤。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坚决地宣称：“决不能把无产阶级（阿尔明尼亚的无产阶级）和社会（阿尔明尼亚的社会）分开；[转下页]

论资产者或无产者，作为同一“民族”的成员都应当站在这个基础上，互相亲密地携起手来。这时，专制沙皇的伪善政策可能被认为是这种友谊的“新的”明证，而关于阶级对抗的言论将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教条”。何况还有人会用他那富有诗意的手“更大胆地”拨动暂时还存在于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中间的狭隘的民族琴弦，弹出他所需要的调子来。沙文主义的骗术将会博得信用（信任），朋友会被认作敌人，而敌人会被认作朋友，于是就要发生混乱，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就要降低了。

————————————

[接上页]团结起来的（阿尔明尼亚的）无产阶级应当是阿尔明尼亚人民的最有理性和最有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结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应竭力确定阿尔明尼亚的社会思想，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将是自己种族的嫡子”等等（见“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的“宣言”第三条）。

第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能把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和阿尔明尼亚社会分开”呢？难道它们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分开”吗？当团结起来的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于一九〇〇年（在梯弗里斯）对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阿尔明尼亚人宣战时，难道它不是和阿尔明尼亚社会“分开了”吗？“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如果不是一个和阿尔明尼亚社会其他各阶级“分开了”的阿尔明尼亚无产者的阶级组织，又是什么呢？也许“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是一个包括一切阶级的组织吧？！难道战斗的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于“确定阿尔明尼亚社会思想”吗？难道它不应当前进，向这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宣战并给它灌输革命精神吗？事实证明，它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不言而喻，“宣言”应当使读者注意的就不是“确定社会思想”，而是同这个思想作斗争，而是必须使这个思想革命化：这样一来，“宣言”就会更好地说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义务。最后，既然这个种族中的一部分——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像蜘蛛那样吮吸着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的血液，而另一部分——阿尔明尼亚僧侣——不仅吮吸工人的血液，并且一贯地腐蚀他们的意识，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又怎能成为“自己种族的嫡子”呢？[转下页]

这样，我们不是**打破民族壁垒**，而是依照联邦主义者的美意：用组织上的壁垒把它更加巩固起来；我们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向前推进**，而是把它**扔到后面**，使它受到危险的考验。于是，专制沙皇“就要兴高采烈”了，因为他永远也得不到像我们这样不取报酬的助手。

难道我们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吗？

最后，我们本来需要一个统一的灵活的集中的党，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在瞬息间发动全俄工人，并领导他们向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冲击，可是有人却硬塞给我们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他们给我们的不是锋利的武器，而是生锈的武器，并保证说：你们用这个武器可以更快地消灭你们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你们看，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要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要“巩固民族壁垒”，而是要打破这种壁垒，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锈的武器，而是锋利的武器，以便根除现时的

————————————————

[接上页]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简单的，而且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宣言”的起草人却看不到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是用从崩得（犹太工人联盟）[7]那里抄袭来的联邦主义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问题的。一般讲来，“宣言”的起草人似乎立意要处处模仿崩得。他们把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的决议第二条也列入了自己的“宣言”。他们把“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叫做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保护者（见上述“宣言”第三条）。“宣言”的起草人忘记了我党在高加索各处建立的委员会[8]几年来在高加索一直被认为阿尔明尼亚民族（以及其他各民族）无产者的代表，忘记了这些委员会在用阿尔明尼亚文进行口头的和印刷品的宣传鼓动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在斗争时领导他们等等，而“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却是不久前才产生的。他们竟把这一切都忘记了，并且可以想像得到，他们为了一丝不苟地抄袭崩得的组织观点和政治观点，一定会忘掉更多的东西的。——著者注

不公平制度，因为我们不是想叫敌人拍手称快，而是想叫敌人大吃苦头，并把他们消灭干净，所以很明显，我们应该撇开联邦主义者，而找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更好的答案。

二

上面我们所说的是不应该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社会民主工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①]。

首先必须记住，现时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显然它是想以此向我们表明，它不仅要把俄罗斯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而且要把俄国**一切民族**的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所以它将采取一切办法来消灭耸立在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壁垒**。

其次，我们党已经清除了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已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这样，党就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借此明白地指出了它所走上的道路和它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

“民族问题”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呢？

———————————————

① 不妨指出，下面所写的都是对我们党纲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条文所作的一些说明。——著者注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先生们要求些什么呢？

（一）要求“**俄国各民族的公民权利平等**”吗？

你们感到不安的是现在俄国盛行的公民权利不平等的现象吗？你们想把政府剥夺去的公民权利归还俄国各民族，所以要为这些民族要求公民平等权利吗？难道我们反对这个要求吗？我们非常了解公民权利对于无产者有多么大的意义。公民权利是一种斗争武器，剥夺这些权利就等于剥夺武器；谁不知道没有武器的无产者就不能很好地进行斗争呢？俄国无产阶级正需要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都能很好地进行斗争，因为这些无产者斗争得愈好，他们的阶级觉悟就愈高，而他们的阶级觉悟愈高，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也就愈紧密。是的，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因此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用全力为俄国各民族的公民权利平等而斗争！你们只要读一读我们党纲第七条上党所规定的“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权利”，就会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负有实现这些要求的责任。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还要求什么呢？

（二）要求“**俄国各民族的语言自由**”吗？

你们感到不安的是俄国各“异”族无产者几乎都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学习，几乎都被禁止在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内使用本族语言的情形吗？确实有理由感到不安！语言是发展和斗争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有充分权利使用**那种**能够保证他们更容易受到教育，更好地在各种会议上，在各种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中和敌人作斗争的**语言**。**本族语言**就被公认为**这样的**语言。他们说：各“异”族的无产者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被剥夺了，难道我们能够默不作声吗？究竟我们的党纲是怎样回答俄国无产阶级这个问题的呢？你们只要读一读我们党纲第八条上我党所要求的“居民有权用本族语言受教育，由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出资设立为保证实现这一权利所必需的学校，每个公

民都有权在会议上用本族语言发表意见；在一切地方的公共机关和国家机关中，本族语言应当与国定语言同样使用”，——你们只要读了这一条，就会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负有实现这一要求的责任。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还要求什么呢？

（三）要求“**俄国各民族的自治**”吗？

你们想借此说明同一法律不能同样适用于俄国境内因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个地方吗？你们想让这些地方都有权使**一般的**国家法律适合于它们的独特条件吗？如果是这样，如果你们要求的内容是这样，那就必须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这个要求，必须消除民族主义的烟雾即糊涂观念而直截了当地述说出来。如果你们听从这个劝告，那末你们就会相信我们丝毫也不反对这个要求。我们毫不怀疑，俄国境内因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个地方不能同样应用国家宪法，这样的地方应该有权用适当的形式来实施一般的国家宪法，以便得到更大的好处，以便更充分地发挥人民中间的政治力量。这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如果你们再读我们党纲第三条上我党所要求的“施行广泛的地方自治，保证各个具有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的地方有权实行区域自治”，那末你们就会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先要把这个要求的民族主义烟雾廓清，然后把实现这个要求的责任担负起来。

（四）你们是向我们指出沙皇专制制度野蛮地摧残俄国各“异”族的“民族文化”，横暴地干涉他们的内部生活并从各方面压制他们，野蛮地破坏了（并继续破坏着）芬兰人的文化机关，残暴地掠夺了阿尔明尼亚的民族财产等等吗？你们要求保证不受专制制度残暴的蹂躏吗？难道我们没有看见沙皇专制制度的暴行吗？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在反对这种暴行吗？！目前谁都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俄国政府是如何在压制和绞杀俄国各“异”族的人民。同样毫无疑义，政府的这种政策每天都在腐蚀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它受到危险的考验。因此，

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反对沙皇政府这种含有腐蚀作用的政策。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保卫这些民族的各种机关，使之免受专制制度宪警暴力的摧残，我们不仅要保卫它们的有益的机关，并且要保卫它们的无益的机关，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向我们提示：只有各民族自己才有权消灭或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但是，请读一读我们的党纲第九条吧。难道我们的党纲第九条不就是讲的这一点吗？要附带说一句，这一条无论在我们的敌人或友人中间都引起了纷纷的议论。

但是在这里，有人打断我们的话，劝我们停止谈论第九条。我们问道：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因为”我们党纲中的这一条和同一党纲中第三、第七、第八各条“根本矛盾”，如果赋予各民族以依照自己意志处理本民族全部事务的权利（见第九条），那末在上述党纲中就不应当有第三、第七、第八各条，——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条文在党纲中仍然保留，那末毫无疑问，就应当把第九条从党纲中删去。毫无疑问，“格鲁吉亚报”[①]也是讲的这一类的话，它居然以其固有的轻率态度问道：“对一个民族说‘我给你以区域自治权’，而同时又提醒这个民族，说它有权依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民族全部事务，——这是什么逻辑呢？”（见“格鲁吉亚报”第九期）“可见”纲领中含有逻辑上的矛盾，“可见”为了清除这个矛盾，必须把党纲中某一条或某几条删去！是呀，“无条件地”必须删去，否则怎么行呢？请看，逻辑本身在通过不合逻辑的“格鲁吉亚报”表示抗议了。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古代的故事。据说从前有一位“解剖圣手”，凡是“真正”解剖家“所必需的一切”：毕业证书、工作场所、解剖器具、无比的奢望，他样样都有。但是只缺少一样小小的东西——

——————————————

① 我们在这里提到“格鲁吉亚报”，只是为了更好地阐明第九条的内容。本文的目的是批判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而不是批判根本和他们不同的“格鲁吉亚报派”（见第一章）。——著者注

解剖学知识。有一次，人家请他说明那些胡乱摆在解剖台上的一套骨头彼此间有什么联系。于是我们这位“著名的圣手”有机会大显身手了。“圣手”堂而皇之、郑重其事地“工作”起来了！可是糟糕得很！这位“圣手”对解剖学却一窍不通，他不知道哪些骨头接在哪些骨头上才可以成为一副完整的骨骼！这个可怜虫忙了半天,出了一身大汗，可是白费气力！最后，当他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的时候，他就抓起几根骨头扔得远远的，同时带着哲学家的神情大骂特骂，说是“居心叵测的”人竟把一些假骨头放在他的解剖台上。当然，观众对这位“解剖圣手”只好报之以哄堂大笑了。

“格鲁吉亚报”也发生了这类的“怪事”。它忽然想要分析我们的党纲，但它却不知道我们的党纲究竟是什么东西，应该怎样加以分析，它不懂得这党纲中的各个条文彼此有什么联系，每个独立条文有什么意义，于是就带着“哲学家的神情”忠告我们说：因为我不能了解你们的纲领的某某条文，所以(？!)必须把它们从纲领中删去。

可是，我并不想耻笑这个本来就够可笑的“格鲁吉亚报”，因为俗语说，好汉是不打落水狗的！恰恰相反，我甚至情愿帮助它理解我们的党纲，不过要它履行下面几个条件：（一）要亲口承认自己的无知；（二）要仔细听我的话；（三）要顾到逻辑[①]。

请看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党纲第三、第七、第八各条是根据**政治集中主义**规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这些条文列入自己的纲领时所持的理由是：所谓“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即“解放”俄国各“异”族人民，一般讲来，在政治统治权还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时，是

———————————————

① 我认为必须告诉读者，“格鲁吉亚报”从最初几期起就向逻辑宣战，认为逻辑是必须捣毁的一种镣铐。你们不要理会“格鲁吉亚报”常用逻辑名义讲话这回事，因为它这样做不过是由于它秉性轻浮和患有健忘病罢了。——著者注

办不到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目前的经济发展在“各异族”和“俄罗斯”之间逐渐搭起一座桥梁，使其联系日益密切，因而在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领导集团中间产生友好的感情，结果就使他们的“民族解放”的意愿失去了依据；第二、**一般讲来**，无产阶级是不会赞助所谓“民族解放”运动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任何**这样的**运动总是只有利于资产阶级，而腐蚀和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这些理由就产生了**政治集中主义**的思想，以及由这个思想所决定的我党党纲第三、第七、第八各条。

然而，这正像上面所说的，是**一般的**看法。

但是，这并不是说不可能造成某种经济和政治条件，使各“异”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在这种条件之下要求“民族解放”。

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这种运动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有利的。

那时我们党应该怎么办呢？

正因为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才把第九条列入我们的党纲，正因为预见到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才赋予各民族一种权利，使他们能竭力本着自己的愿望（例如，完全“解放”，实行分立）去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我们党是一个以领导全俄战斗无产阶级为目的的党，它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去适应无产阶级生活中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应该把这样的条文列入自己的纲领。

任何一个深谋远虑的政党都应该这样做。

然而，“格鲁吉亚报”的“圣手”和某些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原来并不以第九条的这种意思为满足。他们要求“断然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问题：“民族独立”对无产阶级有利还是无利？[①]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的形而上学者，他们

———————————————

① 见“格鲁吉亚报”第九期所载“老(即老朽!)革命者”一文。——著者注

喋喋不休地向当时的辩证论者问到雨水对于收成有益还是有害，要求“断然地”回答他们。辩证论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完全是不科学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应该有不同的回答：雨水在天旱时是有益的，而在多雨时却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要求“断然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愚蠢的。

可是，这一类的例子并没有使“格鲁吉亚报”得到教益。

伯恩施坦的信徒们也曾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断然地”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合作社（即消费生产互助社）对于无产阶级有益还是有害？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很简明地解释了：一切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已提高到应有程度的地方，在无产者已团结成一个强固的政党的地方，如果合作社是由党着手建立和领导的，那它对无产阶级就会有很大的益处；而在没有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合作社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是有害的，因为合作社能使工人产生小商人的倾向和行会的闭关自守心理，从而损害工人的阶级觉悟。

可是，这个例子也没有使“格鲁吉亚报派”得到教益。他们还更加固执地问道：民族独立对无产阶级有益还是有害？请你们断然地回答吧！

可是我们看到，那些能在各“异”族资产阶级中间产生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此刻还不存在，而且将来也不一定会出现，——它们不过是我们所假定的一些可能产生的条件罢了。此外，究竟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那时会提高到什么程度，这个运动对于无产阶级有多大益处或害处，目前也无法知道！试问，有什么根据[①]来“断然地”回答这个问题呢？从什么地方能得出这样的回答？在这样的情

——————————————

① “格鲁吉亚报派”先生们总是把自己的要求建筑在沙滩上，根本就想不到有人能够为自己的要求找到更坚固的基础！——著者注

况下要求“断然地”回答，难道不是愚蠢吗？

很明显，这个问题必须让各“异”族人民自己去解决，而我们则应当为他们争取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让各民族在必要时自己去决定：“民族独立”对他们有益还是有害？如果有益，那末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实现？只有他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见，依据第九条的规定，各“异”族人民有按照自己愿望来处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而我们，依据同一条规定，则应该设法使这些民族的愿望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愿望，使这些愿望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的，为此就必须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去教育这些民族的无产者，而对某些反动的“民族的”习惯、风俗和机关则进行严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保护这些习惯、风俗和机关，使之不受宪警暴力的迫害。

第九条的基本意思就是如此。

很容易看出，我们纲领中的这一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原则有着多么密切的逻辑上的联系。既然我们的整个纲领建立在这个原则上，我党党纲第九条和其余各条有逻辑上的联系自然也就很明显了。

愚蠢的“格鲁吉亚报”之所以被称为“圣明的”机关报，也是因为它不能领会这种简单的道理。

关于“民族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谈到呢？

（五）是“**捍卫民族精神及其特性**”吗？

但是，这种“民族精神及其特性”是什么呢？科学老早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证明了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有谁驳倒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吗？历史告诉我们，谁也没有驳倒过。因此，我们应该赞同上述的科学观点，应该同科学一起重复说：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既然如此，既然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那末不言而喻，对于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要加以任何捍卫，在逻辑上是愚蠢的，这种愚蠢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历史上的

（不良的）后果。也许只有“格鲁吉亚报”，即“革命的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①]的机关报”（见“格鲁吉亚报”第九期），才适于谈论这种“哲学的”蠢话。

*　　*　　*

民族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把民族问题分成了各个部分，吸取了这个问题中的精华，把它注入自己纲领的血管中，并借此表明了在社会民主党内应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以便根本打破民族壁垒而片刻也不离开我们的原则。

试问，为什么需要单独的民族政党呢？或者：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借以建立自己的组织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究竟是什么呢？这种“基础”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也是不存在的。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是悬在半空中的。

他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一种方法是他们必须彻底抛开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采取巩固民族壁垒的原则（联邦主义形式的机会主义）；另一种方法是他们必须抛弃党组织内的任何联邦主义，而大胆地举起消灭民族壁垒的旗帜，并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阵营中。

载于一九〇四年九月一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七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 卷第 23—39 页

———————————

① 把自己称呼得这样奇怪的“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格鲁吉亚报”叙述说（见“格鲁吉亚报”第十期增刊第一号）：[转下页]

[接上页]“今年春天，格鲁吉亚革命者，即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格鲁吉亚报’的拥护者、格鲁吉亚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集会并且……结成……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 是的，正是这些一心一意轻视任何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崇拜政治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否认任何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措施的“格鲁吉亚报派”，——正是这样形形色色和互相排斥的一群人，居然结成…… 一个“党”了！这样理想的杂凑班子，真是人们任何时候也想像不到的呀！这就是人们不会感到寂寞的地方！有些组织家认定，要把人们结合成一个党就必须有共同原则。他们弄错了！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向我们说：“党”所借以建立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原则，而是没有原则！我们不要“理论”和原则，不要这些奴隶的枷锁！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用高谈哲理的口吻说道：我们把这些东西摆脱得愈快愈好。果然，这些人一摆脱了原则，一下子就建立了…… 一座纸房子——对不起——建立了“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原来“七个牛人”只要凑在一块，随时就能建立一个“党”！这班不学之徒、无兵之“将”竟密谈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等等，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是“沙文主义者”，我党高加索联盟“奴隶般地”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等等（见格鲁吉亚革命者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这怎能不令人发笑。本来也不应该期待巴枯宁时代残留下来的老古董能做出什么好事情。什么树结什么果，什么厂出什么货。

* 应当指出，我党各个部分的一致行动，在某些神经失常的“分子”看来就是“奴隶般地服从”。医生断定说：这都是神经衰弱的结果。——著者注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

（论党章第一条）

（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

大胆宣布“俄国是统一而不可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连小孩子也知道“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并不存在，它早就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谁都晓得这两个阶级间的斗争已变成我国现代生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

然而，在此以前这一点是难于看出的，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只有个别集团在个别城市和个别角落里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只看见斗争舞台上的个别集团，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作为两个阶级，当时还看不出来，也难以看出来。可是后来各个城市和各个区域联合起来了，无产阶级各个集团携起手来了，总罢工和示威运动爆发了，——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呈现出两个俄国即资产阶级俄国和无产阶级俄国互相斗争的一幅壮丽的图画。在斗争舞台上出现了两支大军即无产者大军和资产者大军，这两支大军间的斗争已波及我国整个的社会生活。

既然军队没有领导者就不能行动，既然每支军队都有自己领路的先头部队，那末就很明显，和这两支大军一起行动的还应有各自的领导集团，即通常所说的政党。

于是出现了如下的情景：一边是自由党率领的资产者大军，另一边是社会民主党率领的无产者大军，每支大军都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①]。

——————————————

① 我们完全没有讲到俄国其他各政党，因为要来阐明我们所分析的问题，根本没有讲到这些政党的必要。——著者注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点，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作个比较，从而简略地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面貌。

上述一切已经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一个战斗的领导集团，第一、按成员数量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小得多；第二、按觉悟程度和经验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更高些；第三、它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

在我们看来，上述一切是用不着证明的，因为很明显，只要有必然使人民大众贫困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整个无产阶级就不能提高到应有的觉悟程度，所以必须有一个觉悟的领导集团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军，把这支大军联合起来，并在斗争中领导他们。同样很明显，一个以领导**战斗的**无产阶级为目的的政党，就不应当是个人的偶然凑合，而应当是团结一致的集中的**组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指导党的工作。

简略说来，我们党的一般面貌就是如此。

先记住这一点，再来谈我们的主要问题：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党员呢？本文所论的党章第一条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那末，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呢？换句话说，党员的义务是什么呢？

我们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这就是说，我们党有自己的纲领（运动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有自己的策略（斗争方式）和自己的组织原则（结合形式）。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致**才能把党员结成**一个**集中的党。如果观点的一致被破坏了，党也就要瓦解的。所以只有完全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人才能称为党员，只有足够理解和完全承认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的人才能参加我们党的队伍，同时也就是参加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队伍。

可是，就一个党员说来，是不是只**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就够了呢？能不能把这样的人称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不能！第一、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空谈家很乐意“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可是除了讲空话以外，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把这种空谈家称为党员（即称为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那就会亵渎党的神圣尊严！况且我们党又不是一个哲学学派或宗教教派。难道我们党不是一个**斗争**的党吗？既然我们党是一个斗争的党，它就不能满足于抽象地**承认**它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它就一定要求自己的党员**实现**他所承认的观点，这难道不明白吗？这就是说，谁要想成为我们党的党员，谁就不能只以承认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为满足，而应该实行这些观点，实现这些观点。

但是，就一个党员说来，实现党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呢？只有当他进行斗争的时候，当他和全党一起走在无产阶级大军前头的时候。能不能单独地、分散地进行斗争呢？当然不能！相反地，人们首先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然后再投入战斗。否则任何斗争都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很明显，就是党员也只有当他们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时，才能进行斗争，因而才能实现党的观点。同样很明显，党员愈能紧密地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就愈能更好地进行斗争，因而也就愈能更完满地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有些人说得对，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而不是个人的凑合。既然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那末很明显，只有在这个组织中工作、认为自己的义务是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并和党一起行动的人，才能算做这个党的一员，算做这个组织的一员。

这就是说，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要实现党的观点，就必须为这种观点而斗争；要为这种观点而斗争，就必须在党的组织中工作并和党一起工作。显然，要做一个党员，

就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①]。只有当我们参加了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党员，才能成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

既然我们党不是一些空谈家的凑合，而是通过中央委员会来很好地引导无产者大军前进的领导者的**组织**，那末上述一切也就不言而喻了。

还要指出一点。

以前我们党很像一个好客的宗法家庭，愿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纳进来。可是我们党在成了一个集中的**组织**以后，也就抛掉了那副宗法的面貌，完全变为一座只对够资格的人开放大门的**堡垒**了。这对于我们是有重大意义的。正当专制政府竭力用“工联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等等来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时候，而另一方面，又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竭力摧残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竭力想控制无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应当非常警惕，决不应忘记我们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开放大门的**堡垒**。

我们已经阐明了做党员的两个必要条件（承认党纲和在党组织中工作）。如果再加上一个条件，即党员必须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那末有权取得党员称号的一切必要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这就是说，只有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

① 正如任何复杂的有机体都是由无数最简单的有机体组成的一样，我们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总的组织，也是由许多区域的组织即地方组织所组成的；这些组织一经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批准，便可称为党的组织。由此可见，并不只是委员会才称为党的组织。中央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指导这些组织使它们按照统一计划来工作；这些地方党组织便通过中央委员会而组成一个巨大的集中的组织。——著者注

列宁同志[①]所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是这样。

可见这个条文完全是从我们党是集中的**组织**而不是个人的**凑合**这一观点产生的。

这个条文的最大优点就在这里。

然而，竟有一些同志把列宁的条文当做“狭隘的”和“不方便的”条文而加以摈斥，并提出了自以为既不“狭隘”又非“不方便的”条文。我们说的是马尔托夫[②]的条文，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个条文。

依据马尔托夫的条文说来，“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者，皆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可见这个条文中略去了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即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竟认为这个明确而必要的条件是多余的，并在自己的条文内加进了“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样一个含糊的语句来代替这个条件。这样说来，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这像什么“党”呵！），不认为自己应该服从党的意志（这像什么“党的纪律”呵！）也可以成为一个党员！试问，党对于那些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应该绝对服从党的纪律的人，又怎能“经常地”加以领导呢？

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在这个问题上碰得粉碎了，而这个问题在列宁的条文中却解决得很巧妙，因为列宁的条文肯定地认为**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

这样，我们只有把马尔托夫条文中“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个含糊而毫无意义的语句丢掉。如果丢掉这个条件，马尔托夫的条文中就只剩下两个条件（承认党纲和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这两个条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任何一个空谈家都可

———————————————

① 列宁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著者注

② 马尔托夫是“火星报”编辑之一。——著者注

以“承认”党纲并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但这决不能使他享有做党员的权利。

看吧，这就是所谓“方便”的“条文”！

我们说：真正的党员决不应该只以承认党纲为满足，他们必须努力实现自己所承认的纲领。马尔托夫回答说：你们太严格了，因为就一个党员说来，如果他不拒绝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等等，那末实现他所承认的纲领就不十分需要了。马尔托夫好像怜悯某些“社会民主主义”空谈家似的，不愿意对他们关上党的大门。

其次，我们说，因为要实现党的纲领，就必须进行斗争，而要进行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所以愿意做党员的人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必须和党一起去领导战斗的无产者大军，就是必须组成集中的政党的严整部队。马尔托夫回答说：并不一定要求党员非组成严整的部队不可，非结成组织不可，各人单独进行斗争也成了。

我们要问：那末我们党究竟是什么呢？是个人的偶然凑合呢，还是团结一致的领导者的组织？如果说它是领导者的组织，那末能不能把不参加这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其纪律的人算做这个组织中的一员呢？马尔托夫回答说：党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确切些说，党是一个**无组织的**组织（请看，这是什么“集中制”呀！）！

可见照马尔托夫看来，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而是由一些承认我们党纲等等的地方组织和个别“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凑合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它也就不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才敞开大门的堡垒。的确，在马尔托夫看来，也正如他的条文所表明的那样，党并不是一座堡垒，而是一切同情者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宴会。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知识，只要表示一点同情，只要给一点物质上的帮助，那就成了，他就有充分权利算做一个党员了。马尔托夫给那些吓慌了的“党员”打气说：有些人认为党员必须参加党

的一个组织，因而必须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别听他们的话！第一、同意这些条件是很难的，因为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并不是好玩的呀！第二、我已经在自己的说明中指出过，这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好吧，先生们，请光临…… 宴会吧！

马尔托夫好像是怜悯某些没有决心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的教授和中学生，于是他在我们党的堡垒上凿了一个洞，让这些可敬的先生有机会偷偷地钻进我们党内来。他向机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是在成千上万的敌人压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时大开方便之门呢！

然而，还不止于此。问题在于马尔托夫那个可疑的条文使机会主义有可能在我们党内从另一方面产生出来。

我们知道，马尔托夫的条文只说到承认纲领，关于策略和组织却只字未提，其实为了保证党内的一致，不仅要有纲领观点的一致，同样还要有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的一致。有人会对我们说，列宁同志的条文也没有讲到这一点。不错！但是要知道，列宁同志的条文是没有必要讲到这一点的！一个人既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就必然和党在一起进行斗争，服从党的纪律，所以他除了遵循党的策略和党的组织原则而外，当然不能遵循其他的策略和其他的组织原则，难道这还不明白吗？然而对于一个只承认党纲而不参加党的任何组织的“党员”，你有什么可说呢？怎能担保这个“党员”所持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就是党的策略和组织观点，而不是别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呢！这就是马尔托夫的条文无法向我们说明的问题！接受了马尔托夫的条文，我们就不免会有一个奇怪的“党”，它的“党员”有同一的纲领（这还成问题！），而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却各不相同！真是妙不可言的多样性！我们的党又怎能不像一个宴会呢？

不过要问一问：究竟应当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嘱咐我们的、与马尔托夫条文根本矛盾的那个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集中制置于何地呢？毫无疑问，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那末丢掉马尔托夫的条

文是会正确一些。

这就是马尔托夫向我们提出的、和列宁同志的条文相反的多么荒谬的条文！

我们认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马尔托夫的条文是考虑不周的结果；我们希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能改正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采纳列宁同志的条文。

现在把以上所说的再略述一遍。无产者大军已经走上了斗争舞台。如果说任何一支大军都要有自己的先头部队，那末无产者大军也应有这样一个部队。因此，就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者集团，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既然是一定的大军的先头部队，第一、它就应当用自己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武装起来；第二、它就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如果要问究竟应当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那末这个党只能给一个回答：只有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的人，才能称为本党党员。

列宁同志在他那个杰出的条文中所表达的正是这个十分明显的真理。

载于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八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 卷第 46—53 页

略 论 党 内 意 见 分 歧

（一九〇五年五月）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考茨基

我们的“孟什维克”真是太讨厌了！我说的是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他们一听说党内有分歧意见，就喋喋不休地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谈论意见分歧，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反正总是要骂“布尔什维克”！于是他们就拚命地骂，好像发了疯一样。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间，总而言之，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数派”，这不是自己人，这是靠不住的人！单在“通常的”活动场所叫骂，他们还嫌不够，还把“案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从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的……讨厌。

“多数派”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我们的“少数派”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

“多数派”和“少数派”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〇三年)上开始产生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分散的力量本来应该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党。我们这些党的工作者对这次代表大会曾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当时欢呼：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就要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了，我们就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活动了！…… 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活动过，但我们过去的活动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会企图统一起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召开了党

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八九八年），甚至似乎是“统一起来了”，可是这种统一只在口头上存在：党仍然分散为一些单个的集团，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统一的。所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必须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并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党。

但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早了。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能够使我们团结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它只是为这样一个党奠定了基础。然而代表大会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火星报”(指旧“火星报”)的路线，一条是“火星报”反对者的路线。因此代表大会就分成两部分，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前者拥护“火星报”路线，并团结在“火星报”周围；后者则反对“火星报”而采取相反的立场。

这样，“火星报”就成了党内“多数派”的旗帜，而“火星报”的立场就成了“多数派”的立场。

“火星报”走的是什么道路呢？它所维护的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火星报”创刊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这是俄国工业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伴随有一系列同业罢工（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间）的工业繁荣,渐渐为危机代替了。危机一天天尖锐起来,而且成了同业罢工的障碍。虽然如此，工人运动还是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向前发展：许多细流汇成一条洪流，运动日益带有阶级色彩，渐渐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不过当时还看不见先进部队，还看不见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党[①]。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经济派”）究竟干了些

————————————

①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其中包括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战士，不论他是工人或是知识分子。——著者注

什么呢？他们竭力赞扬自发运动，漫不经心地重复说：工人运动并不怎样需要社会主义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它也能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运动本身。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既然如此，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他们断定说：它应该是自发运动的驯服的工具。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是我们的事情，领导这个运动也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只是徒劳无益的强制；我们的义务只是倾听这个运动的声息并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做自发运动的尾巴[①]。一句话，**社会民主党**被描绘成运动中的**累赘**。

谁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谁也就不应该承认社会民主党。正因为如此，“经济派”才这样固执己见，再三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说；让自由派去从事政治斗争吧，这种事情是比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干些什么呢？我们应该照旧以单个的小组形式存在，各小组在自己的圈子里单独活动。

————————————

① 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燃起了“批评”的热情（见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不过我应该指出，它对“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他们彼此的区别不大）估计得不正确。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蔑视政治问题”，而在于他们做运动的尾巴和只是重复运动所提示给他们的东西。过去有一个时期仅仅举行罢工。那时他们宣传的是经济斗争。到了游行示威的时期（一九〇一年），发生了流血事件，产生了失望情绪，于是工人就采用恐怖手段，以为这能拯救他们，使他们不受暴君的统治。这时“经济派—工人事业派”也加入总的合唱队并且神气十足地宣称：现在应该采取恐怖手段，袭击监狱，释放狱中同志等等了（见“工人事业”杂志“历史性的转变”一文）。可见还决不能说他们是“蔑视政治问题”的。该文作者是借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历史事实，那就比较有益了。——著者注

需要的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

这样，一方面，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它需要一个先进的领导的队伍；另一方面，以“经济派”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但不去领导运动，反而否认自己的作用，做了运动的尾巴。

当时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明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说明，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而不要冷眼旁观，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

同时还必须说明一个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是把无产阶级各个先进队伍集合起来，把它们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从而永远结束党内的分散状态。

“火星报”着手规定的正是这些任务。

请看它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火星报”创刊号）中是怎样说的：“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或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民主党应该反对的一种不良现象。可是，因为“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崇拜自发运动,因为他们轻视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火星报”指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琐碎化，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给这个运动指出它的最终目的，指出它的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什么责任呢？“火星报”继续写道：“由此自然要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的党。”这就是说，它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它的首

要任务就是把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

“火星报”编辑部[①]就是这样论证它的纲领的。

“火星报”是否实现了这个出色的纲领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样努力实现这些极重要的思想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全党的中央机关报。

既然如此，那末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谩骂”旧“火星报”，难道不是很可笑的吗？

请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火星报”所发的议论吧：

“它(‘火星报’)应当分析‘经济主义’的思想,摈斥谬误的观点,采取正确的观点,并把‘经济主义’纳入新的轨道…… **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引起了另一个极端，即轻视经济斗争，对它采取鄙弃的态度，只承认政治斗争有首要的意义。**不经济的**（应该说：‘没有经济的’）**政治**，——这就是新的方向。”（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评家”，这一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发生的呢？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做了些什么？他们既然在编辑部中占多数，为什么不把“火星报”引上“正”路呢？最可敬的“批评家”，在这以前你自己究竟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警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是警告了的话，那它就不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吧。

事情是这样的：“火星报”正确地看出了“迫切的问题”，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条道路，并且努力地执行了自己的纲领。

————————————

① 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斯塔罗维尔和列宁六人组成。——著者注

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做什么？”一书中更明确、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报”的立场。

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吧。

“经济派”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但谁不知道**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①]，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谁不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圈子里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围徘徊，即使有一天能达到社会革命，但谁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达到。工人们是在最近时期还是经过一个长时期、是经过容易的道路还是经过困难的道路才能踏上“乐土”，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难道都是无所谓的吗？显然，谁赞扬**自发**运动并崇拜**自发**运动，谁就不由自主地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挖掘鸿沟，谁就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意义，谁就把这个思想体系逐出实际生活之外，并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他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②]，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觉悟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③]。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八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一页）——著者注

②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第九十四页，中央委员会出版。——著者注

③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六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〇九页）——著者注

到处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说，如果就思想的传播来讲，那末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义的意识，比刚刚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对于**自发**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自发**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本来“就有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①。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这两种思想体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会问我们：怎么？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吗？是的，它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不然的话，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会是毫无结果的了**。然而同样正确的是：反对和阻碍这个倾向的，有另一个倾向，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

我刚才说过，我国社会生活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时也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装扮成社会主义者，竭力想使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也像“经济派”一样地毫不在意，做自发运动的尾巴（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态度时，工人运动就是自发的），那末不言而喻，自发的工人运动就将沿着这条老路走去并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当然要到长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联系而奔赴社会革命的时候为止。

这就叫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的：

“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八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一页）——著者注

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①]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发**的工人运动，当它还带着**自发性**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并且有受这种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②]。**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是多余的了，那末“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反对**这种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而促进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当然，将来总有一天，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后，自发运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走到社会革命的门前，因为“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③]。但在那时以前怎么办呢？在那时以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像“经济派”那样袖手旁观并且让位给司徒卢威和祖巴托夫一伙人吗？摈弃社会民主主义而促成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吗？忘掉马克思主义而不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吗？

不！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④]，它的责任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头，它的责任是“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二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二十八页。（同上，第二一一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二十九页。（同上，第二一二页）——著者注

④ 马克思：“宣言”第十五页。——著者注

⑤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八页。——著者注

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造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造出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法则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考茨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分子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①

因此，列宁说：凡是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对它袖手旁观的人，凡是经常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而让位于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一伙的人，都以为这个运动本身就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来。“但这是极大的错误”②。有些人以为在九十年代举行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经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但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

———————————————

① 列宁：“做什么？”，那里引用了考茨基发表于“新时代”杂志（见该杂志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第三期第七十九页）的一篇有名论文中的这段话。（同上，第二一〇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二十六页。（同上，第二〇九页）——著者注

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列宁继续写道：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他们两个都是工人）一类人的身份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多少能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多少参加这一创造工作”②。

这一切可以大致设想如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工人，也有厂主。他们之间进行着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当工人已在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却还无影无踪…… 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经济斗争，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已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也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确信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像确信旭日必然东升一样，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科学的注意。大部分学者有了一种想法，认为工人运动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骚动，不妨用皮鞭去开导他们。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富人应该分给穷人一点残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页至第二十一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〇二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二十七页。（同上，第二一〇页）——著者注

羹剩饭，即认为工人运动是乞丐运动，目的是要讨得一些施舍。在一千个这样的学者中间，也许只有一个能够科学地观察工人运动，科学地研究全部社会生活，注意阶级间的冲突，倾听工人阶级的怨声，并且终于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样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由无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来建立。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被创造着。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像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像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件东西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一直向前猛进，到达“乐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某些人断定说，似乎在列宁和“多数派”看来，工人运动如果不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联结起来，就会趋于灭亡，不能达到社会革命。然而这是一种臆说，是一些闲人的臆说，这种臆说恐怕只能从安恩之流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旅行家”杂志第六期

“什么是党？”一文）。

列宁确定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①]列宁之所以没有详细证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他认为用不着去证明本来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此外，列宁并没有打算研究**自发**运动，他只是想向实际工作者说明他们应该**自觉地**做些什么。

列宁在和马尔托夫论战的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如下一段话：

“‘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末我们的党……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②]

可见在列宁看来，即使不能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那种阶级斗争和阶级搏斗，也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的。

如果你们对另外一些“多数派”代表的意见也感兴趣，那末就请你们听听吧。他们中间的哥林同志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如果让无产阶级自行其是，那末事情会怎样呢？这就会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所发生的事情相似。资产阶级革命家未曾有过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然而资产阶级制度还是产生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家的无产阶级，当然，归根到底也会朝着社会革命方面工作的，不过是本能地工作…… 无产阶级也会本能地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不会有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过程不过是缓慢而较为痛苦罢了。”[③]

这段话是无须解释的。

总之，**自发的**工人运动，即**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必然会琐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二页）——著者注

②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五十三页。(同上,第四一五页)——著者注

③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二一九页。——著者注

碎化而带有工联主义的性质，它一定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工人运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这样说。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总有一天经济的发展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因而将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任何联系。问题只在于这将是一条很漫长很痛苦的道路。

另一方面，**没有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不管它是在什么样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终究还是一句空话，毫无意义。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运动就是一切，社会主义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发出这样的议论，他们认为意识既然是社会生活本身产生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主义可以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由空洞的词句变成锐利的武器。

结论呢？

结论就是：工人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实践活动和理论思想必须融合为一，从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①]于是，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就会由空洞的词句变成工人手中极大的力量。于是，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自发运动就会循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制度。

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何在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②]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团结成一个集中的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毫不倦怠地和一切阻碍这些任务实现的人作斗争，不管他们是敌人也罢，“朋友”也罢。

———————————————

①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九十四页，中央委员会出版。——著者注

②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出来的意识。——著者注

大体说来，“多数派”的立场就是如此。

我们的“少数派”不喜欢“多数派”的立场，他们说，这个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最可敬的先生们，真是这样的吗？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行星上有这种事情呢？他们说：读一读我们的论文，你们就会相信我们是对的。好，我们就来读一读吧。

我们面前有一篇叫做“什么是党？”的文章（见“旅行家”杂志第六期）。“批评家”安恩是怎样责备党内“多数派”的呢？“他们（‘多数派’）……自称为党的首脑……硬要别人服从他们……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甚至常常臆造出一些新理论，譬如说，工人群众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着重号是我加的）‘崇高理想’等等。”①

试问：“多数派”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是否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呢？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恰恰相反，“多数派”的思想代表列宁同志十分确定地说，工人阶级很容易领会“崇高理想”，很容易领会社会主义。请听吧：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完全是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②

可见在“多数派”看来，工人是很容易领会那些叫做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的。

那末安恩为什么要异想天开，他这个奇怪的“发现”是从什么地方挖掘出来的呢？读者们，原来“批评家”安恩所指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指的是“做什么？”一书中的一段话，列宁在那里讲到了**创**

———————————————

① 见“旅行家”杂志第六期第七十一页。——著者注

②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一页）——著者注

造社会主义并断言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①]。但你们会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创造**社会主义是一回事，**领会**社会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安恩忘记了列宁明白地说到**领会**“最高理想”的那些话呢？读者们，你们是对的，但安恩既然很想做一个“批评家”，他应该怎么办呢？你们想一想，这是多么英勇的事情：编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把它硬套在对方的头上，然后就对准自己幻想出来的果实开火。这就是所谓批评！不管怎样，安恩“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列宁的“做什么？”一书,这倒是毫无疑义的。

现在我们就打开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报”来看看吧。“多数派还是少数派？”（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一文的作者说了些什么呢？

他勇气十足、大喊大叫地攻击列宁，因为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的自然的（应当是“自发的”）发展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①]。可见作者并不懂得**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让作者去证明不是这样吧！），而**这样的**运动一定会受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支配，一定会倾向于它，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凡是前者不存在的地方，后者就一定出现并占据其地位（你证明这是相反的吧！）。是的，列宁正是这样说的。但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工人运动所特有的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过是暂时被那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所遮蔽罢了。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②]，并且正确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除其他办法外，也采取和“经济派”作斗争的办法来加速这种倾向的胜利。可敬的"批评家"，为什么你的文章里不引用列宁的这些话呢？难道这些话不也就是这位列宁说的吗？这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十四页。——著者注

②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一页）——著者注

样做是于你不利的，对不对？

作者又说：“依照列宁的意见…… 工人按其**地位**（着重号是我加的）来说，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资产者……”[①]真是蠢话，我简直没有料到这样的作者会说出这样的蠢话！难道列宁指的是工人的**地位**吗？难道他断言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吗？该要多么蠢的人才会说被剥夺了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呢？不！列宁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在于一个人按其**地位**来说可能是无产者而不是资产者，但他同时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在这种场合，工人阶级的情形也正是如此。而这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一般地说，作者爱说空话，不加思考就脱口而出！例如作者一味固执地说“列宁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②]，他这样反复地说，却不了解这种“思想”会把他引到哪里去。假定我们暂时相信他，以为列宁主义确实“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往下又怎样呢？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如下：“列宁主义把‘火星报’（旧“火星报”〉拉过去了”（这是作者也不否认的），可见“火星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并且对它的功绩大加称赞[③]，可见这次代表大会及其纲领和策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矛盾本的”…… 读者们，这岂不可笑吗？

作者仍继续说：“照列宁的意见，自发的工人运动是去和资产阶级结合的……”是的，是的，作者无疑是去和愚蠢结合了，如果他能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十四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十五页。——著者注

③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四七页。记录里载有一项决议，把“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真正维护者。——著者注

离开这条道路，那就好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来请教马克思主义吧。

可敬的“批评家”一味固执地说，“多数派”及其代表——列宁的立场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因为无论是考茨基，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都和列宁所坚持的相反！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吧！

作者告诉我们说：“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写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互相对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两个阶级的意向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不能结合起来。在每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工人阶级之参加政治活动**迟早**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而成立独立的**工人党**。’”

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无产阶级“迟早”要脱离资产阶级而成立独立的**工人党**（请记住：是**工人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工党）。作者以为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的意见分歧的！其实列宁是说无产阶级**迟早**不仅要和资产阶级脱离，而且要实行社会革命，即推翻资产阶级[①]。他又补充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竭力使社会革命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并且**自觉地**实现。是的，正是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实现，因为列宁所说的正是这种自觉性。

这位“批评家”继续从考茨基的书中引证说：“……在情况已经发展到建立独立的工人党的地方，工人党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受到社会主义倾向的感染，迟早必定能**领会**社会主义倾向，那末归根到底它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党，即**社会民主党**。”[②]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说工人党将**领会**社会主义的倾向。难道

————————————————

①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五十三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四一五页）——著者注

②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十五页。——著者注

列宁否认这一点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直截了当地说：不仅工人党，而且整个工人阶级也在领会社会主义[①]。既然如此，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大撒其谎的英雄为什么要胡说八道呢？他们为什么要乱说一通呢？俗语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这位迷糊了的作者正是这样。

可见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没有丝毫分歧的。但这一切却异常清楚地证明了作者的思考不周。

考茨基是否说过什么有利于“多数派”立场的话呢？请看，这就是他在一篇分析奥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出色论文中说过的一段话：

“在我们那些修正派的批评家（伯恩施坦的信徒）中间，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确认社会主义生产之必要性的**意识**（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于是这些批评家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于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奥国草案）看来，可以设想：奥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这一……观点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愈使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无产阶级就愈是不得不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愈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有实现的可能和必要。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分子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科学

————————————————

① 列宁：“做什么？”第二十九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一页）——著者注

社会主义）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　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加因斐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①

读者们，你们能否回忆起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类似的思想？你们能否回忆起“多数派”的那个众所周知的立场？为什么“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要隐瞒真情呢？为什么可敬的“批评家”讲到考茨基的时候在自己论文中却不引证考茨基的这几句话呢？那些最可敬的人是在欺骗谁呢？为什么它们这样“轻视”读者呢？莫非因为他们……害怕真理，躲避真理，以为真理也是可以隐瞒的吗？他们正像一种鸟，把自己的头藏在翅膀下面，就以为谁都看不见它了！他们正像这种鸟一样糊涂。

既然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既然这种意识要由社会民主党②努力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那末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时候，就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中说过如下一段话：

“……无产者至多只能领会资产阶级学者们所创造的一部分知识，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然而当他们还是无产者的时候，他

————————————————

① 见“新时代”杂志（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第二十卷第三期第七十九页。考茨基的这篇精彩论文曾被引用于列宁的“做什么？”一书第二十七页。（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〇九页至第二一〇页）——著者注

② 并且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著者注

们是没有空闲时间和经费来独立地把科学发挥到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所以独创的工人社会主义不免带有空想主义的一切重要特征。”[①]（空想主义就是虚假的非科学的理论。）

考茨基继续说：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往往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可是“……大家知道，凡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即指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而言。——考茨基注）真正深入群众而成为阶级运动的地方，尽管这种运动在表面上还带有激进的色彩，但迟早总要变为最狭隘的**纯粹的职工运动**。”[②]换句话说，工人运动若不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就不免会琐碎化而具有“狭隘职工运动的”性质，因而受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

“这是蔑视工人，这是抬高知识分子呀！”我们的“批评家”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大喊大叫起来…… 不幸的“批评家”，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他们把无产阶级看成一位任性的小姐，对她不能说实话，永远只能恭维她，使她不至于跑掉！不,最可敬的人们！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表现出超过你们所想像的坚强性来。我们相信它不会害怕实话！而你们…… 究竟对你们有什么可说：你们现在还是害怕实话，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把考茨基的真实观点告诉读者……

总之，**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些随便说说的空话。

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瞎闯，固然它有一天也会引导到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长期的磨难和痛苦的代价。

结论呢？

“工人运动应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

①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九十三页，中央委员会出版。——著者注

② 同上，第九十四页，中央委员会出版。——著者注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旧“火星报”）和“多数派”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同志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可见“多数派”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很明显，少数派“批评家”喋喋不休地说出的所谓“蔑视工人”、“抬高知识分子”、“多数派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诸如此类的奇谈，不过是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胡说和空想罢了。

相反地，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是梯弗里斯“少数派”自己，是“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但这一点容我们以后再说。我们暂时把注意力放在下面一点上吧。

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正确，“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作者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说：“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走到了的**结论。”①

二者必居其一。不是作者不懂格鲁吉亚文，就是排字工人弄错了。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不会说“**已经走到了的**结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或者“**正要得出的**结论”。如果作者是指后一种说法（**正要得出的**结论），那就应当指出：他把马克思的话转述错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如果作者是指前一种说法，那末他引证的句子就应当是这样的：“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得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那末，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十五页。——著者注

主义生活！

不幸的马克思！谁知道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会把多少荒谬的言论加在他的头上呵！

马克思真是这样说的吗？事实上他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上的代表“**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决定，就是小资产者**由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实践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务和决定。一个阶级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代表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就是如此”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根本没有说“**已经走到了**”。这些“哲学”词句是可敬的“批评家”捏造出来的。

在这种场合，马克思的话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

马克思在上述论点中所发挥的是什么思想呢？他所发挥的不过是：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相当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这也就叫做“在理论上得出什么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宣言”中说：

“因此，共产党人（即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上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社会前进的**一部分，而在理论上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是的，思想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要点也就在这里。思想家推动社会前进，正因为如此，所以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

① 如果读者手边没有“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就请参看“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一一页，那里引用了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著者注

可敬的“批评家”，你就是**为这一点**攻击“多数派”吗？那末你就和马克思主义诀别吧，你要知道“多数派”正是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自豪的。

“多数派”在这种场合的情形很和恩格斯在九十年代的情形相似。

当时唯心主义者硬说思想是社会生活的泉源。在他们看来，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借以建立的基础，所以他们被称为唯心主义者。

当时必须证明，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是生活本身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们证明：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因此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借以建立的基础。这样，他们也就替唯心主义挖掘了坟墓，而替唯物主义扫清了道路。

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都这样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极小的意义。

当时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

于是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伯恩施坦及其伙伴高声叫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叛变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俄国也有过一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即“经济派”。他们硬说，既然思想是社会生活产生的，那末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也就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当时必须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种意识，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瞎闯，无产阶级不知何时才能从瞎闯中摆脱出来而到达社会革命。

于是“火星报”出现了,它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做什么？”一书出版了，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强调社会主义意识的伟大意义。党的“多数派”形成了，它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然而这时一些伯恩施坦的喽罗们却跑出来叫喊道，这“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

“经济派”的喽罗们，你们可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吗？

——————————————

读者会说：真奇怪！读者会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反对列宁（见新“火星报”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他为什么非难“多数派”呢？难道梯弗里斯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重复着普列汉诺夫发表过的意见吗？是的，他们是在重复，但重复得很蠢笨，简直令人讨厌。是的，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批评的意见。然而你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普列汉诺夫跟“多数派”和列宁是没有分歧的。不止普列汉诺夫一人，而且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也是如此。真的，就我们上面讲的那个问题来说，“少数派”的领袖和旧“火星报”是没有分歧的。而旧“火星报”乃是“多数派”的旗帜。不要惊讶！请看事实吧。

我们读过旧“火星报”上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上）。我们知道，这篇论文完全表明了“多数派”的立场。这篇论文是谁发表的呢？是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谁参加了这个编辑部呢？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他们中间现在只有列宁一个人是“多数派”，其余五个人都在领导“少数派”，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火星报”的这篇纲领性的论文是在他们负责编辑时发表的，因此他们不应当自食其言，他们大概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吧。

但是，好吧，我们就撇开“火星报”不谈。

且看马尔托夫写些什么：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并不是在工人群众中间产生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的书房中产生的。”①

再看查苏利奇写些什么：

“甚至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思想……也不是这么简单而能从每个工人的头脑中独立产生出来的…… 社会主义……也决不是在工人的头脑中‘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 社会主义理论是由生活和知识的全部发展过程准备起来的……并且是由具有这种知识的天才头脑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间的传播，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是由那些在上层阶级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的。”②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曾在新“火星报”（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上郑重其事地反对列宁的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话吧。事情发生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驳斥马尔丁诺夫而为列宁辩护。当时，普列汉诺夫责备马尔丁诺夫，说他抓住了列宁的一句话，而忽略了“做什么？”一书的全文，然后普列汉诺夫继续说：

“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个书报检查官的话：‘给我一篇“祷告词”，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是应该判处绞刑的。’然而，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个人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倒霉话（列宁的话）的一切责难全是出于误解。马尔丁诺夫同志引证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的表达。’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话乃是一般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最先阐述了这一理

——————————————

① 马尔托夫：“红旗”第三页。——著者注

② 见“曙光”杂志第四期第七十九页至第八十页。——著者注

论上的表达。列宁所写的不是一篇论述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反对‘经济派’的辩论文章，‘经济派’硬说：我们应当静待工人阶级不用‘革命霉菌’（即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独自达到的结局。其所以禁止社会民主党向工人进行宣传，正因为它是‘革命霉菌’，正因为它具有理论的意识。但如果你们把‘霉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没有觉悟而必须从外面把意识灌输进去的群众了。假如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并把他这部书仔细地读一逼，那末你们就会看到列宁所说的正是这一点。”①

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正是受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等等唆使的同一位普列汉诺夫，过了几个月再出来说话的时候，竟抓住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辩护过**的列宁的同一句话，宣称列宁和“多数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如果从“祷告词”中抽出一句话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那末它的作者恐怕也要因背叛上帝而受绞刑的。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一个公正的批评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他还是从列宁的书中抽出这句话来，他还是不公正地做去，当众打自己的嘴巴。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塔罗维尔则附和着他，由他们自己负编辑责任，把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登在新“火星报”（第七十期和第七十一期）上，因而再一次使他们自己丢脸。

为什么他们表现得这样没有气节，为什么“少数派”的这些领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他们否认由自己署名登在“火星报”上的那篇纲领性的论文，为什么他们自食其言呢？什么时候听说社会民主党内有过这样颠倒是非的丑事？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发表以前这几个月内

——————————————

① 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二三页。——著者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原有的六个编辑中只选出了三个即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来担任“火星报”的编辑。至于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维尔和查苏利奇三人，代表大会则指定他们去担任别的职务了。代表大会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且每个人都应服从它的决定，因为代表大会是全党意志的体现者，是党的最高机关，谁反对它的决定，谁就是践踏党的意志。

可是这些固执的编辑却没有服从党的意志，没有服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也就是党的意志）。原来党的纪律是专为我们这种普通工作者编造的！他们痛恨代表大会没有把他们选为编辑，于是退到一边，并把马尔托夫勾引过去组成了反对派。他们对党宣布抵制，拒绝党的工作，并开始威吓党说，把我们选进编辑部、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去，不然我们就要制造分裂。于是分裂开始了。这样，他们又一次践踏了党的意志。

下面就是这些罢工的编辑提出的要求：

“恢复旧有的‘火星报’编辑部（就是说，让我们在编辑部占**三个位置**）。

把一定数量的反对派分子（即‘少数派’）加进中央委员会去。

让反对派分子在党总委员会中占两个**位置**等等……

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使党内不至发生威胁全党生存的冲突的唯一**保证**。”（就是说，要满足我们的要求，不然我们就要在党内制造大分裂。）[①]

党怎样回答他们呢？

党的代表者（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同志向他们声明说：我们不能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选举是代表大会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企图

——————————————

① 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二十六页。——著者注

恢复和平和一致，老实说，**争位置**已经是可耻的了，而你们都**为了争位置**要来分裂党，等等。

罢工的编辑们恼羞成怒了，——真的，他们为了争位置而发动斗争了，——他们把普列汉诺夫拉了过去[①]，开始干起他们的英雄事业来了。他们必须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硬找出**某种更**“厉害的”“意见分歧”**，借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争位置。**他们东找西找，结果在列宁的书中找到了一段话，如果把这段话同原文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地骂一通。**“少数派”的领袖们暗中想道：这个主意妙极了，列宁是“多数派”的领导人，我们糟蹋了列宁，就能把党拉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论调就来了，说什么“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他们今天拚命攻击的，就是他们昨天还在拥护的列宁书中的那种思想，但

————————————————

① 也许读者要问：这位热烈拥护过“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怎么会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呢？原来是他和列宁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当“少数派”暴怒起来并宣布抵制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认为必须完全让步。列宁不同意他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就渐渐倾向“少数派”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扩大了，普列汉诺夫终于变成了列宁和“多数派”的反对者。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

“……过了几天，我果然和总委员会一位委员去找普列汉诺夫，当时我们和普列汉诺夫的谈话经过是这样的：

普列汉诺夫说：‘要知道，世上常有一种爱吵爱闹的老婆（即指“少数派”），对这样的老婆必须让步，免得她们疯疯癫癫、当众大吵大闹起来。’我回答说：‘也许是这样，但让步要让得保证自己有力量能使更大的“吵闹”不致发生。’”（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三十七页，那里引证了列宁的信）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没有达成协议。从这时起，普列汉诺夫就开始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

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得知，普列汉诺夫又在离开“少数派”，并已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著者注

有什么办法：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称为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原则性的。

这就是他们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缘故，这就是他们颠倒是非的根源。

但还不止于此。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出，除了几个幼稚的人而外，谁也没有理睬他们反对“多数派”和列宁的那种煽动，他们看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再来粉饰一番。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同一个马尔托夫和同一个阿克雪里罗得又于一九〇五年三月十日用党总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他们向“多数派”说）…… 双方（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曾屡次表示自己确信：现有的策略上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种使双方不能在统一的党组织范围内进行工作的意见分歧。”[①]他们说，因此我们要召集同志裁判会（由倍倍尔等组成）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小小争执。

一句话，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过是一种可以由同志裁判会来解决的意气之争，而我们大家——他们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怎么会这样呢？人家居然号召我们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党组织中去，说我们大家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呢？“少数派”的领袖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叛变了党！难道可以委任“非马克思主义者”担负党的领导职务吗？难道社会民主党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立足的余地吗？或许是你们自己也叛变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改变了阵线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们回答，那就未免太幼稚了。原来这些妙不可言的领袖们在口袋里装着几种“原则”，需要哪一种就掏出哪一种来。你看他们是多么反复无常呵！……

——————————————

① 见“火星报”第九十一期第三页。——著者注

所谓“少数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

不难想像，跟随在这种领袖后面的喽罗们，即梯弗里斯的所谓“少数派”该是些什么样的人了…… 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时不听头脑的指挥，不肯服从它。例如在“少数派”的领袖们认为可能调解并号召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一致时，而梯弗里斯的“少数派”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在那里大闹特闹，说“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是“决死的斗争”[①]，所以我们一定要厮杀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少数派”埋怨我们把他们叫做机会主义者（无原则的分子）。可是，既然他们自食其言，既然他们出尔反尔，既然他们始终动摇，试问，这不叫做机会主义又叫做什么呢？难道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常常改变自己的信念吗？要知道，就连手帕也不是这样经常更换的。

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味固执地说，“少数派”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真是这样的吗？好，我们来看看吧。

考茨基说：“无产者比较容易接受党的原则，他倾向于不以一时情绪、不以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为转移的原则性的政策。”[②]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倾向于这种不以一时情绪和其他东西为转移的政策吗？恰恰相反，他们经常摇摆，他们永远动摇，他们憎恨坚定的原则性的政策,他们宁愿采取无原则的立场,他们听从一时的情绪的驱使。至于事实，我们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说：无产者喜爱党的纪律，“当无产者还是一个孤立的个人时，他是什么力量也没有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期待，都是从**组织**中汲取来的……”正因为如此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著者注

② 见“爱尔福特纲领”第八十八页，中央委员会出版。——著者注

所以他不为个人利益所诱，不为个人荣誉所惑，他“被派到任何岗位上都能尽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那浸透他的全部感觉、全部思维的纪律”[①]。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这样被纪律性所浸透的吗？恰恰相反，他们藐视党的纪律，嘲笑党的纪律[②]。“少数派”的领袖们就是天字第一号破坏党内纪律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马尔托夫及其他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吧。

考茨基继续说：“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他服从党的纪律是很勉强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于自愿的。“他承认需要纪律，但只是对群众而言，而不是对上等人物而言。至于他自己，那他当然是把自己列入上等人物里的…… 李卜克内西却是一位理想的模范知识分子，他浑身浸透了无产阶级情绪，他……在被指定的任何一个岗位上努力工作，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弃……知识分子落到少数地位时所常常发出的那种颓唐的啜泣。在这里还可以举出马克思，他从来也没有想争第一把交椅，在国际中他会不止一次落到少数地位，但他还是模范地服从党的纪律。”[③]

而“少数派”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表现过“无产阶级情绪”呢？他们的行为像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那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少数派”的领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我”服从于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看到正是这些领袖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沉溺于“颓唐的啜泣”；我们看到，在代表大会后，正是他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起来，并且正是为了争夺这种位置而挑起了党内

————————————————

①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九十三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四六六页）——著者注

② “同盟代表大会记录”。——著者注

③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九十三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著者注

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维克，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性格”吗？

孟什维克向我们问道：那末，为什么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们这方面呢？

是的，不错，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是站在“少数派”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玫瑰花，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难怪俗语说：

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

就把自己当做夜莺夸。

* * *

现在很清楚，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个“少数派”的驯服的奴隶！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诚然，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叫喊说他们反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并且他们还企图责备“多数派”有“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但这很像一个贼偷了别人的钱，却大声呼喊：“捉贼呀！”

此外，大家知道，谁害的什么病，谁就老是谈着这种病。

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一九〇五年五月出版的小册子原文刊印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65—96页

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

（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五日）

革命运动“目前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的地步了”，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的这个估计日益证实是正确的。革命的火焰燃烧得越来越猛烈，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引起地方性的起义。洛兹的三天街垒战和巷战，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几万工人参加的、和军队发生过多次不可避免的流血冲突的罢工，敖德萨的起义，黑海舰队和里巴瓦港海军的“骚动”①，梯弗里斯的“一周”②，——这一切都是暴风雨来临的先兆。暴风雨迫近了，不可遏止地迫近了，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会在俄国爆发；它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毁一切衰老腐朽的东西，洗掉俄罗斯人民身上那数百年来的耻辱——专制制度。沙皇政府最后的拚命挣扎：加紧采取各种镇压手段，在全国一半地区宣布戒严，大量增设绞架，同时对自由派发表诱惑的言论，假意允诺实行各种改良，——这一切都挽救不了它的历史命运。专制制度的灭亡指日可待，暴风雨必不可免。全体人民所欢迎的新制度已在萌芽，人民都期待它带来革新和复兴的气象。

日益迫近的暴风雨向我党提出了些什么新问题呢？我们应如何使自己的组织和策略适应实际生活的新要求，以便更积极地、更有组织地参加革命开端所唯一必需的武装起义呢？工人阶级不仅是革命的先

——————————————

① 一九〇五年六月至七月，黑海舰队的“波将金”铁甲舰、二六七号水雷艇、“胜利者乔治”铁甲舰和“普鲁特”教练舰相继举行起义。一九〇五年七月，拉托维亚里巴瓦港的海军举行起义。——译者注

② 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日，梯弗里斯开始总罢工。城内各处举行群众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言论出版的自由等等。六月末总罢工结束。——译者注

锋，而且是革命的主要行动力量；为了领导起义，我们作为这个阶级的先进部队，是应当建立一些专门机关呢，还是依靠现有的党的机构就够了？

这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摆在我党面前已经有几个月了。崇拜“自发运动”的人把党的目的降低到仅仅跟在生活进程的后面，做了运动的尾巴，而不像先进的觉悟部队所应做的那样走在运动的前头；对于这样的人，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他们说，起义是自发的，组织和准备起义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预定的行动计划都是空想（他们反对任何“计划”,因为计划是“自觉性”的东西,而不是“自发的现象”!），都是白费气力；社会生活有它自己的令人莫测的道路，它是会打破我们的一切计划的。他们说,因此我们只应限于宣传和鼓吹起义的思想、群众“自我武装”的思想；我们只应实行“政治领导”，至于“在技术上”领导起义人民，那随便让谁去做都可以。

反对“尾巴政策”的人驳斥说：可是要知道，我们向来都是实行这种领导的。显然，广泛进行鼓动和宣传，对无产阶级实行政治领导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若是仅仅限于这种一般性的任务，就等于我们不是避免回答实际生活所直接提出的问题，就是暴露我们根本不善于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不待说，现在我们应当大大加强政治鼓动工作，应当竭力设法不仅要使无产阶级受我们的影响，而且要使那些逐渐向革命靠拢的广大“人民”阶层也受我们的影响，我们应当在社会各阶级中努力传播必须举行武装起义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只限于这一点！要使无产阶级能够利用必将到来的革命以利于自己的阶级斗争，要使无产阶级能够建立最能保证以后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民主制度，就必须使无产阶级（在它的周围团结着沙皇制度的反对派）不仅处于斗争的核心地位，而且成为起义的领袖和领导者。**在技术上领导和在组织上准备全俄起义**，这正是实际生活向无产阶级提出来的新任务。如果我党要想成为工人阶级真正的政治

领导者，就不能而且不应当拒绝执行这些新任务。

那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我们最初的步骤应当是什么呢？

我们有许多组织在实践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人力和物力去武装无产阶级。我们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现已进入大家都承认的必须武装起来的时期。然而仅仅意识到武装的必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直接地清楚地向党提出实践的任务**。因此我们的委员会应当立刻着手就地武装人民，成立专门办理这件事情的小组，成立各区收集武器的小组，设立制造各种炸药的小工厂，制定夺取国家的和私人的军械库和兵工厂的计划。我们不仅应当像新“火星报”所劝告我们的，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武装人民，并且应当像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责成我们的，切实“采取最积极的办法武装无产阶级”。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也罢（只要他们是确实认真考虑武装问题，而不是只空谈什么“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和抱着同一目的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例如阿尔明尼亚联邦主义者等等也罢，都要比在其他问题上更容易达成协议。在巴库已经作过这样的尝试，那里在二月惨案以后，我们的委员会，“巴拉汉内-比比-爱巴特”集团和公察克党人委员会，曾联合设立了一个武装组织委员会。当然，要创立这样一种艰巨的事业，必须大家共同努力，所以我们认为派别的计较要尽量少妨碍一切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在这个基础上的团结。

除了扩大军火储藏、设法弄到武器和由工厂制造武器之外，还必须极端注意建立各种战斗队去使用获得的武器。把武器直接发给群众是绝对不允许的。由于我们的经费很少，并且很难隐藏武器不使嗅觉锐敏的警察发觉，所以我们无法武装比较广大的民众，如果这样做，我们的一切努力就会是白费的。当我们建立起专门战斗组织的时候，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了。我们的战斗队将学会很好地使用武器，并且在

起义时（不管它是自发的，还是早有准备的）都能成为主要的先进的队伍而行动起来，起义人民将团结在它们的周围，并在它们的领导下去参加战斗。由于战斗队的经验丰富和组织严密，又有很好的武装，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起义人民的一切力量，从而达到当前的目标，即武装全民并实现预定的行动计划。战斗队会很快地夺得各种军械库、政府机关、公用事业机关、邮政局、电话局等等，这都是革命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

但是，这些战斗队不仅在革命起义已普及全城时才需要，而且在起义前夜所起的作用也是重大的。最近半年来，我们看得很清楚，在社会各阶级的心目中已经丧失威信的专制制度，竭力把全国各地的黑暗势力，不管是职业流氓，还是鞑靼人中间那些狂妄无知之徒，都动员起来对付革命者。这种黑暗势力被警察武装起来并在其庇护下用恐怖手段恫吓民众，造成一种阻碍解放运动的困难环境。我们的战斗组织应当随时准备对这种黑暗势力的一切企图予以应有的反击，并设法把那由于他们的活动而引起的愤怒和反抗变为反政府的运动。能够随时走上街头去率领人民群众的武装战斗队不难达到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目的：“组织武装抵抗去对付黑帮及其他一切由政府领导的反动分子的行动。”（“关于在革命前夜对待政府策略的决议”——见“通报”）

我们的战斗队和一般军事技术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应当是制定本区域的起义计划，并使这计划和党中央所制定的全俄计划相适合。找出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指定向敌人进攻的出发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布置在本区各处，将全城的地形考查清楚,——这一切都应预先完成，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致措手不及。在本文中详细分析我们组织在这方面的活动是完全不适宜的。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应严守秘密，同时还要在无产阶级中间尽量广泛地传播进行巷战所绝对必需的军事技术知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当吸收党组织中的军人来参加这个工作。

为了同一目的，我们还可以把我们其他许多同志，按照他们的本领和性情说来对这件事情都会很有益处的同志，吸收来参加这个工作。

只有这样周密地准备起义才能保证社会民主党在必将到来的人民和专制制度间的战斗中起领导作用。

只有充分的战斗准备才能使无产阶级把与军警的零碎冲突变成全民起义，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将违背“尾巴政策”崇拜者的主张，竭力把武装起义的技术领导和政治领导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这种领导是保证我们能够利用必将到来的革命以有裨于我们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

载于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 卷第 97—101 页

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一

人民革命日益发展。无产阶级正在武装自己并高举起义的旗帜。农民正在伸直腰干，并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爆发总起义和“根除”那可恨沙皇的可恨宝座已为期不远了。沙皇政府将被推翻。在它的废墟上，将建立起革命的政府——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定会解除黑暗势力的武装，把人民武装起来并立即着手召开立宪会议。这样，沙皇的统治就将由人民的统治来代替。现在，人民革命正在顺着这条道路前进。

临时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呢？

它应当解除黑暗势力的武装，制裁革命的敌人，使他们不能再恢复沙皇专制制度。它应当武装人民，促使革命进行到底。它应当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的自由。它应当取消间接税，施行累进的利润税和遗产税。它应当组织农民委员会来调整农村中的土地关系。它还应当使教会和国家分离，使学校和教会分离……

除了这些一般的要求外，临时政府还应当实现工人的阶级要求：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国家劳动保险、保证劳动卫生条件、设立“劳动介绍所”等等。

总之，临时政府必须完全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①]，并立即着手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以立法手续把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变革“永远”固定下来。

——————————————

① 关于最低纲领，请参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报”。——著者注

谁应当参加临时政府呢？

革命将由人民来完成，而人民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显然，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担负起把革命进行到底、制裁反动势力、武装人民等等的责任。为此，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临时政府中就需要有保护自己利益的人。无产阶级和农民将在街头占统治地位，他们将流血牺牲，自然他们在临时政府中也应当占统治地位。

有人向我们说：这都是对的，可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有什么共同点呢？

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憎恨农奴制的残余，他们都在和沙皇政府进行决死的斗争，他们都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

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们忘记一个真理，即他们之间的差别比他们的共同点要大得多。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在于：无产阶级是私有制的敌人，仇恨资产阶级制度，他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共和国只是为了聚集力量，然后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农民对私有制却恋恋不舍，拥护资产阶级制度，他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共和国则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

不用说，只是在无产阶级想要消灭私有制的时候，农民[①]才会反对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只是在无产阶级想要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农民才会拥护无产阶级。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它不触犯私有制，因而农民今天没有任何理由掉转自己的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况且今天的革命是要根本推翻沙皇政权，所以农民愿意坚决向无产阶级这个先进的革命力量靠拢。很明显，无产阶级同样也愿意援助农民，愿意同农民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政府。无怪乎伟大的恩格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同小资

① 即小资产阶级。——著者注

产阶级一起反对现存的制度[①]。如果在革命的敌人还没有被完全制裁以前，我们的胜利不能称为胜利，如果制裁敌人和武装人民是临时政府的责任，如果临时政府应当负起完成胜利的责任，那就不言而喻，除了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应当参加临时政府而外，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保护者的无产阶级代表也应当参加临时政府。假如负责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单独地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太不明智，那就是背叛自己。只是不要忘记；反对私有制的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政党，并且一分钟也不应当走偏了路。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共同努力推翻沙皇政府，应当共同努力制裁革命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所以无产阶级跟农民一样，也应当有自己利益的保护者即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政府。

这个道理如此清楚，如此明显，再来加以说明似乎是多余的了。

但是，“少数派”对这一点却表示怀疑，他们一味固执地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政府是不合身份的，是和原则相抵触的。

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吧。“少数派”的论据是什么呢？首先他们援引了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文件。这次代表大会和饶勒斯主义相反，通过了一项决议，说社会主义者不应力图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因此参加临时政府在我们是不能容许的。“少数派”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如果像小学生那样理解代表大会的决议，那我们连革命也不应当参加了。实际上成了这样：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今天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就完全不应当参加这个革命！“少数派”的逻辑就是要我们走上这条道路。社会民主党却说，我们无产者不仅应当参加今天的革命，并且应当在这个革命中起带头作用，领导这个革命，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但是

———————————————

① 见“火星报”第九十六期。这段话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上转载过。见“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一文。——著者注

不参加临时政府，就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不容争辩，“少数派”的逻辑在这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仿效自由派，应当抛弃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于是我们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也就自行消失；或者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就要承认参加临时政府的必要性。但“少数派”既不愿抛弃前者，也不愿抛弃后者，他们既想做自由派,又想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就是这样残忍地糟蹋无辜的逻辑……

至于说到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那末它所指的是法国正式政府而不是临时革命政府。法国政府是反动的保守的政府，它保护旧事物，反对新事物；显然，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会加入这样的政府的。可是临时政府是革命的进步的政府，它反对旧事物而为新事物开辟道路，它为革命的利益服务；显然，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是要加入这个政府并积极参加完成革命事业的。可见这是两回事情。可见“少数派”死抓住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徒劳无益的，因为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并不能使“少数派”免于破产。

看来“少数派”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求助于另一个论据：他们现在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灵呼救。例如“社会民主党人报”顽固地重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反对”参加临时政府。但是，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反对过？例如，马克思究竟是怎样说的？原来马克思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向无产阶级鼓吹……要它力求建立一个大的反对党，这个党应当把民主党内的各种派别都包括进去……”“这样的联合对于无产阶级无疑是有害的，而只有对于他们（小资产者）才是有利的”[①]等等。一句话，无产阶级应当有单独的阶级政党。但是“渊博的批评家”呵，究竟有谁反对这一点呢？为什么你同风车搏斗呢？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著者注

虽然如此，“批评家”还是继续引证马克思的话。“和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联合。既然必须和这种敌人进行直接斗争，两党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因而…… 也就会产生一个只适合当时需要的同盟…… 在斗争时和在斗争后，工人在每一场合都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需要（应该说：要求），与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需要（要求）并列起来…… 一句话，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就必须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对那个想独占共同胜利果实的政党……表示不信任。”[①]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只有在不和本身利益相抵触的条件下，才支持小资产阶级。但是奇怪的“批评家”呵，究竟有谁反对这一点呢？你引证马克思的话有什么必要？难道马克思说过什么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话吗？一个字也没有说过！难道马克思说过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临时政府是和我们的原则相抵触的吗？一个字也没有说过！那末，我们的这位作者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狂喜呢？他从什么地方找到了我们和马克思之间的“原则上的矛盾”呢？可怜的“批评家”呵！他拚命想要找到这种矛盾，但是不幸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找到。

照孟什维克的声明，恩格斯究竟说了些什么？原来恩格斯在给屠拉梯的信中说过：必将到来的意大利革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应该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反对现存的制度，但他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政党；可是社会主义者假使在革命胜利后参加新政府,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样他们就会重复路易·勃朗和其他法国社会主义者在一八四八年所犯的错误等等[②]。换句话说，既然意大利革命将是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幻

————————————————

①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著者注

② 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把这几句话加上引号来引证的，使人觉得恩格斯的话被引证得丝毫不差。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这里引证的人只是用自己的话来转述了恩格斯那封信的内容。——著者注

想无产阶级能占统治地位和**在胜利后**仍然可以留在政府里，那就会是很大的错误，无产阶级只有**在胜利以前**才能够同小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然而究竟谁反对这一点呢？谁说我们应当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呢？为什么要援引伯恩施坦的信徒屠拉梯的话呢？为什么还要提起路易·勃朗呢？路易·勃朗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而我们所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在路易·勃朗时代还没有社会民主党，而这里所说的正是这样的党。法国社会主义者曾经打算夺取政权，而我们所注意的则是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 难道恩格斯说过，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临时政府是和我们的原则相抵触的吗？一个字也没有提过！那末我们的这位孟什维克，你为什么要这样夸夸其谈呢？混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你怎么不明白呢？为什么要无故地惊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灵呢？

看来“少数派”自己也感觉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不能挽救他们，于是他们现在又抓住了第三个“论据”。“少数派”向我们说：你们想给革命的敌人以双重的约束，你们想“使无产阶级不仅‘从下面’、从街头，而且从上面、从临时政府的大厦里去对革命施以压力”[①]。但这是和原则相抵触的呀！——“少数派”责备我们说。

由此可知，“少数派”断定我们应当“只从下面”影响革命的进程。相反地，“多数派”却认为我们应当以“来自上面”的行动去补充“来自下面”的行动，使我们所施展的压力更为全面。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谁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相抵触呢？是“多数派”呢，还是“少数派”？

让我们来请教一下恩格斯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爆发了起义。于是发生了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当时在那里活动的是巴枯宁

———————————————

① 见“火星报”第九十三期。——著者注

派（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否认任何来自上面的行动，而这一点曾引起他们和恩格斯之间的争论。当时巴枯宁派所鼓吹的正是今天“少数派”所说的东西。恩格斯说：“巴枯宁派多年来鼓吹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来组织和实行。”①在他们看来，“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政权或革命政权，都只能是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于无产阶级是同样危险的”②。恩格斯嘲笑这种观点，并且说实际生活已经无情地推翻了巴枯宁派的这一学说。巴枯宁派不得不对实际生活的要求让步，结果他们……“只好违反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而成立革命政府”③。于是他们“就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只是一种新的欺骗，只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叛变行为”④。

恩格斯就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少数派”的原则——仅仅“来自下面”的行动——，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这个原则确实是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根本抵触的。“少数派”认为任何参加临时政府的举动对于工人都是有害的，这种观点就是早已受到恩格斯嘲笑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同样也很清楚：实际生活必将抛弃“少数派”的观点，必将轻而易举地粉碎他们的这种观点，正像粉碎了巴枯宁派的观点一样。

“少数派”却仍然固执地说：我们是不会反对原则的。这些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抱着一种奇怪的想法。我们只就他们对于临时革命政府和国家杜马所持的原则观点来看一看吧。“少数派”反对参加为适应革命利益而将要产生的临时政府，说这是和原则相抵触的。而

---

① 见“无产者报”第三期，那里引证了恩格斯的这句话[44]。——著者注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他们主张参加为适应专制制度利益而已经产生的国家杜马，却说这是和原则不相抵触的！“少数派”反对参加由革命的人民创立并由人民使之合法的临时政府，说这是和原则相抵触的。而他们主张参加由专制沙皇召开并由沙皇使之合法的国家杜马，却说这是和原则不相抵触的！“少数派”反对参加负有埋葬专制制度使命的临时政府，说这是和原则相抵触的。而他们主张参加负有巩固专制制度使命的国家杜马，却说这是和原则不相抵触的…… 最可敬的先生们。你们谈的是什么原则，是自由派的原则呢，还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原则？如果你们能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你们就很不错了。不过我们对这一点总有些怀疑。

但是，我们且撇开这些问题不谈吧。

问题是“少数派”在探求原则时已滚到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去了。

这就是现在已经弄明白了的事实。

二

我们的孟什维克不喜欢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决议中真正革命的道理震动了孟什维克的“泥潭”，激起了孟什维克进行“批评”的欲望。看来，使他们的机会主义头脑受到刺激的，主要是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所以他们就着手“消灭”这个决议。但是他们在决议中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抓住和可以大肆批评的东西，所以就只好求助于他们那套惯用而又一钱不值的蛊惑宣传手段！这些“批评家”写道：这决议是为了引诱工人、欺骗和蒙蔽工人而草拟的！可见他们是很满意于自己所玩的这套戏法的。他们设想敌人已经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而自己则是得胜了的批评家，因而大声叫喊：“他们（决议的起草人）还想领导无产阶级呢！”当你瞧着这些“批评家”的时候，你就好像碰见了果戈里小说中一个因神经失常竟以西班牙国

王自居的主人公。这就是患狂热病的人的必然归宿！

我们且来仔细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上的那篇“批评”吧。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的孟什维克一想起临时革命政府的血迹斑斑的魔影时，就不免恐惧万分，于是去祈求自己的神仙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一流人物，盼望他们给自己驱除这个怪物，而代之以全俄缙绅会议，现在却要代之以国家杜马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把“全俄缙绅会议”捧上了天，力图把腐朽的沙皇制度的腐朽产物当做真货来卖。他们写道：“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没有临时政府也建立了**共和国**。”就只有这么多吗？“可敬的”先生们，此外什么也不知道吗？太少了！应该多知道一点！例如，也应该知道法国大革命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获得胜利的，而俄国的“革命运动则将作为工人运动而获得胜利，或是完全不会获得胜利”，就像普列汉诺夫公正地说过的一样。在法国，领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在俄国则是无产阶级。**在那里**，支配革命命运的是资产阶级，**在这里**则是无产阶级。在革命领导力量这样转换的情形下，这两个阶级决不能有同等的结果，难道还不明白吗？如果说在法国，资产阶级因领导革命而享受了革命的果实，那末在俄国，既然领导革命的是无产阶级，难道革命的果实也应由资产阶级来享受吗？我们的孟什维克说道：是的，凡是在法国**那里**发生过的，在俄国**这里**同样应当发生。这些先生好像棺材匠一样，拿早已死去的人的尺寸来量活人。此外，他们在这里还玩了不少骗人的戏法：他们去掉了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的头部，而把争论的中心移到问题的尾巴上去了。我们也和任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是在谈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们却藏起“民主”一语而大谈其“共和国”。他们鼓吹说：“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建立了共和国。”是的，法国大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但究竟是怎样的共和国呢？是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要求的那种共和国吗？这个共和国给了人民以普选权吗？当时的选举是完全直接的选举吗？施行过累进所得

税吗？难道在那里谈过什么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增加工资等等问题吗？…… 没有。这样的事情在那里根本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因为工人们当时还没有受过社会民主主义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利益竟被当时法兰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遗忘和抹杀了。先生们，难道你们就向这样的共和国低下自己“高贵的”头吗？你们的理想就是这样的吗？祝你们一路平安吧！不过，可敬的先生们，你们应该记住：崇拜这样的共和国，是和社会民主党及其纲领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这是最坏的一种民主主义，而你们却假借社会民主党的名义用走私的方式来干这一切勾当。

此外，孟什维克应当知道，俄国资产阶级及其缙绅会议，就连法兰西那样的共和国也不会赐给我们，因为它根本不打算消灭君主制。资产阶级明明知道在没有君主制的地方，工人们是“傲慢不逊”的，所以资产阶级力图把这个堡垒完整地保存下来，把它变成自己的武器去反对和自己势不两立的敌人——无产阶级。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就假借“人民”的名义和刽子手沙皇进行谈判，劝他为了“祖国”和皇位的利益召开全俄缙绅会议，以期避免“无政府状态”。难道你们孟什维克连这些也不知道吗？

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那种共和国，而是二十世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要求的共和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胜利的人民起义和它提出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把这样的共和国建立起来。只有这样的临时政府才能临时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并把类似的改革办法提交它所召开的立宪会议批准。

我们的“批评家”不相信根据我们的纲领召开的立宪会议能够表达人民的意志（他们既不能比一百十五六年前所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更前进一步，当然也就无法想像到这一点）。“批评家”继续说道：“有钱有势的人，有很多办法操纵选举，使之有利于自己，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人民的意志。为了使穷人中的选民不致代表富人的意

志，就需要进行巨大的斗争，就需要有长期的党的纪律。”（就是孟什维克所不承认的纪律吗？）“甚至在欧洲（？），虽然进行了长期的政治教育，这一切也没有实现。而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却以为这个法宝已掌握在临时政府手里了！”

真是十足的尾巴主义！“早已魂归九天的”“过程策略论”和“过程组织论”[①]又借尸还魂了！“批评家”教训我们说，要想在俄国要求欧洲尚未实现的东西，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最低纲领不仅在“欧洲”，并且在美洲也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按照孟什维克的意见，谁要在俄国接受这个纲领，并在推翻专制制度之后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那他就是不可救药的幻想家，就是可怜的唐·吉诃德！一句话，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虚假的，空想的，是和现实“生活”毫不相干的！“批评家”先生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按照你们的说法正是这样。既然这样，就请你们不要支支吾吾，大胆一些，把这一点爽直地说出来！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和谁打交道，而你们也就不必受你们所憎恨的这个纲领的形式手续的拘束了！不然的话，你们这样羞答答地，畏首畏尾地谈论纲领的不重要性，就会使得许多人（当然布尔什维克除外）还以为你们承认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但是又何必这样假惺惺呢？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我们意见分歧的根源了。你们不相信我们的纲领并且否认它的正确性，而我们和你假相反，总是以这个纲领为依据，力求使我们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和它相符合！

我们相信，在自由竞选运动的条件下，“有钱有势的人”要想收买和欺骗全体人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将用社会民主党的真话（我们和你们不同，丝毫也不怀疑这种真话）去对抗他们的势力和金钱，

——————————————

① 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五八四页正文和脚注。——译者注

并以此来阻遏资产阶级的骗人把戏。你们却不相信这一点，所以就把革命拉到改良主义方面去了。

“批评家”继续说道：“一八四八年，也有工人参加的法国（又是法国！）临时政府召开了连一个巴黎无产阶级代表也没有被选举进去的立宪会议。”这又一次表明你们完全不懂社会民主主义学说，而对历史抱着死板的看法！何必这样白费唇舌呢？“批评家”作出结论说：在法国，虽然工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可是什么出息也没有；所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也应当拒绝参加临时政府，因为在这里也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但是，难道问题就在于工人参加吗？难道我们说过任何一个工人，不论他是谁，不论他属于哪一派，都应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吗？不，我们目前还没有成为你们的追随者，我们决不会给每个工人发一张社会民主党人的鉴定表。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把参加法国临时政府的工人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你们何必作这种不恰当的比拟呢！况且，怎能把一八四八年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现今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相提并论呢？难道那时候法国无产阶级举行过一次反对当时制度的政治游行示威吗？它什么时候在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标志下纪念过五一节呢？它会组成社会民主工党吗？它有过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吗？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没有过。这一切，法国无产阶级连想也没有想过。试问，法国无产阶级当时能不能像俄国无产阶级一样，像这个早已组成社会民主党、具有十分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并自觉地为自己开辟走向目标的道路的无产阶级一样，享受革命的果实呢？每一个稍微能够了解真情实况的人，对这个问题都一定给予否定的回答。只有那些仅会死记历史事实而不能依据地点和时间去解释历史事实的来源的人，才会把这两种不同的情形等量齐观。

“批评家”再三再四地教训说：“所需要的是人民方面的暴力，是不间断的革命，而不是满足于选举，便各自分散回家。”这又是诽

谤！可敬的先生们，谁对你们说过我们满足于选举，便各自分散回家呢？请指出名字来！

我们的“批评家”还因为我们要求临时革命政府实现我党最低纲领而焦急不安，于是大声叫道：“这是完全不明事理；问题在于我们纲领上的各种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只能用立法手续来实现，而临时政府并不是立法机关。”当你阅读这篇反对“违法行为”的检察官式的演词时，你会怀疑：这岂不是一位崇拜法制的自由资产者献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篇论文吗[①]？否则，认为临时革命政府似乎无权废除旧法律和施行新法律的这种资产阶级妙论，又应作何解释呢！难道这种议论不是含有庸俗自由主义的意味吗？从革命者口中发出这种议论，岂不令人奇怪吗？这就好像一个判了死刑的囚犯，脑袋将被砍掉的时候，却恳求别碰着他脖子上的疙瘩。不过，这些“批评家”还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临时革命政府和普通的内阁有什么区别（这并不是他们的过失，而是他们的老师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之流把他们弄成这样的）。内阁是什么呢？它是正式政府**存在**的结果。而临时革命政府是什么呢？它是正式政府被**消灭**的结果。前者依靠常备军来执行**现行**的法律，后者则废除现行的法律，依靠起义的人民把革命的意志变成法律。试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

假定说，革命获得了胜利，而且胜利的人民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政府无权废除法律和施行法律，那它将怎么办呢？等待立宪会议吗？可是为了召集立宪会议，同样必须施

————————————————

① 这种念头之所以更加自然而然地发生，是因为孟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五期上宣布整个梯弗里斯的资产阶级中间只有十个左右商人是“共同事业”的叛徒。显然，其余的人都是孟什维克的拥护者并和他们具有一个“共同事业”。如果这些拥护“共同事业”的人当中，有谁忽然把一篇反对毫不妥协的“多数派”的“批评”文章寄给自己同事的刊物去发表，那又有什么奇怪呢！——著者注

行新的法律，例如必须施行普通、直接等等的选举制，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的自由。而这一切都已包括在我党最低纲领里了。如果临时革命政府不能实行这个纲领，那末它在召开立宪会议时又将以什么为指南呢？莫非以布里根起草而由尼古拉第二批准的那个纲领为指南吗？

再假定说，获得胜利的人民因缺乏武器而遭受很大的牺牲，他们为了和反革命作斗争，要求临时革命政府取消常备军而武装人民。这时孟什维克却宣传说：取消常备军而武装人民，不是这个官厅（临时革命政府）的事情，而是另外一个官厅——立宪会议的事情，大家去向它申诉吧，可别要求采取违法的行动，如此等等。还用说，出这种主意的人是多么高明呵！

现在我们且来看看，究竟孟什维克根据什么理由剥夺临时革命政府的“权能”。第一个理由，临时革命政府不是一个立法的机关；第二个理由,他们说立宪会议将无事可做。看,这些政治上的黄口小儿竟说出何等可耻的话！原来他们竟不知道，获得胜利的革命和代表这个革命的意志的临时革命政府，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乃是时局的主宰，所以它们有权废除法律和施行法律！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临时革命政府没有这种权力，那末它的存在就会毫无意义，起义的人民也就不会建立这样一个机关。奇怪的是孟什维克竟把这种起码的革命道理都忘记了。

孟什维克问道：如果临时革命政府实现了我们的最低纲领，那末立宪会议又应当做些什么呢？可敬的先生们，你们担心立宪会议会失业吗？请不要害怕，它的工作多着哩！它既要批准临时革命政府在起义人民帮助下所实现的改革，又要制定国家宪法，而我们的最低纲领不过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对立宪会议的要求！

“批评家们”写道：“他们（布尔什维克）想像不到小资产阶级本身和工人之间的分裂，想像不到这种分裂也会在选举中反映出来，

所以临时政府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就要压迫工人选民。”谁懂得这种奥妙思想！“临时政府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就要压迫工人选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究竟讲的是什么样的临时政府呢？这些唐·吉诃德究竟是在同什么样的风车搏斗呢？难道谁说过，小资产阶级在单独掌握临时革命政府时也仍旧会保护工人利益吗？为什么硬要把自己的糊涂思想加诸别人呢？我们说：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也可以和民主派的代表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假使是这样，假使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也参加的临时革命政府，那末，它按成分说又怎么会是小资产阶级的呢？我们主张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理由就是：实现我党的最低纲领，和民主派——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你们孟什维克邀请加入你们党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不矛盾的，所以我们认为和民主派一起实现我党的最低纲领是可能的。倘若民主派阻碍实现这个纲领中的某些条文，我们这些有街头选民即无产阶级来支持的代表就会设法用实力去实现这个纲领，只要这种实力已经具备（如果还没有这种实力，我们也就不会参加临时政府，人家也不会把我们选进临时政府）。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应当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正是为了要在那里保卫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即不让其他阶级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

临时革命政府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决不会像孟什维克随便设想的那样向无产阶级宣战，而是要和无产阶级一起向无产阶级的敌人宣战。但是这些事情和你们孟什维克有什么相干，革命和革命的临时政府和你们又有什么相干！你们的位置在那里，在“国[①][家杜马”]……

——————————————

① 手稿在此中断。——编者注

本文第一部分载于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斗争报”第十一期
第二部分根据手稿第一次刊印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卷第102—117页

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

（一九〇六年）

一

我们殷切期待的事情实现了，——统一代表大会已和平结束，避免了分裂，党内两派的合并在形式上确定下来了，因而奠定了我党政治实力的基础。

现在必须了解，必须更仔细地认识代表大会的面貌，冷静地衡量这次大会的优点和缺点。

代表大会做了些什么呢？

代表大会本来应当做些什么呢？

对前一问题，代表大会的决议已作了回答。对后一问题，要回答它，就应当知道代表大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召开的，目前形势向它提出了什么任务。

我们从后一问题开始吧。

现在已经很明显：人民革命并没有灭亡，它虽然遭到了“十二月的失败”，但仍然在扩大并向最高点发展。我们说，这是必然的，因为革命的动力继续存在,继续起作用,已爆发的工业危机日益加剧，使农村完全破产的饥荒日甚一日，——而这意味着人民的革命义愤很快就要像汹涌的洪流一样奔放起来。事实证明，在俄国社会生活中正酝酿着新的发动，比十二月进攻更坚决更强大的发动。我们正处在起义的前夜。

另一方面，人民深恶痛绝的反革命也正在积聚力量并逐渐加强起来。它已把权奸组织起来，它号召一切黑暗势力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下，

它领导着黑帮“运动”，它准备向人民革命进行新的袭击，它把嗜血成性的地主和厂主纠集在自己的周围，——可见反革命正在准备扑灭人民革命。

愈往前去，国家就愈加分明地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即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这两个阵营的两个首领——无产阶级和沙皇政府也就对立得愈加厉害，它们之间的一切桥梁已被烧毁的迹象也就愈加明显。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革命胜利和人民专制，**或者**是反革命胜利和沙皇专制。谁若脚踏两只船，谁就是出卖革命。谁不和我们一道，谁就是反对我们！可鄙的杜马和它那些可鄙的立宪民主党人正是脚踏两只船。它想调和革命和反革命，想把狼和羊豢养在一起，借以“一举”平息革命。所以杜马至今只是干臼中捣水的勾当，所以它没有能把任何人民集合到自己的周围，没有立足的基地而飘荡在空中。

斗争的主要场所仍然是街头。事实证明是如此。事实证明：在今天的斗争中，在街头的斗争中（而不是在只会空谈的杜马中），反革命势力一天天在削弱和动摇，而革命力量则在增长并动员起来；团结和组织革命力量是在先进工人领导下而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就是说，使目前革命获得胜利和把革命进行到底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只有**在这个革命今后还是由先进工人来领导的条件下，只有在觉悟的无产阶级能**胜任地**领导革命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因此，目前形势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什么任务，代表大会应当做些什么，就显而易见了。

恩格斯说，工人的政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换句话说，党应当自觉地走上实际生活本身所不自觉地走着的那条道路，党应当自觉地表达沸腾的生活所不自觉地提出的那种思想。

事实证明，沙皇制度没有能扑灭人民革命，恰恰相反，人民革命日益增长，日益高涨，并走向新的发动，——所以党的任务就是自觉地准备迎接这个发动并把人民革命进行到底。

很明显，代表大会应当指出这个任务并责成党员忠实地完成这个任务。

事实证明，调和革命和反革命是不可能的；杜马一开始就走上了调和它们的道路，但它做不出什么来；**这样的**杜马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永远不能把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不得不变成反动势力的附属品，——所以党的任务就是打破对杜马的幻想，纠正人民的政治错觉，并对全世界宣告：革命的**主要**场所是街头而不是杜马；能给人民带来胜利的**主要**是街头，是街头的斗争，而不是杜马，不是杜马中的空谈。

很明显，统一代表大会也必须在自己的决议中指出这个任务，以便确切地规定党的活动方向。

事实证明，使革命获得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以及建立人民专制，**只有**在以下场合才有可能：领导革命的一定要是觉悟的工人，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党的任务就是埋葬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把城乡革命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他们的革命斗争，领导他们今后的发动，这样来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

很明显，统一代表大会应该特别注意这第三个任务，即基本任务，借以向党指明这一任务的极重大的意义。

这就是目前形势所要求于统一代表大会的，这也就是代表大会所应当做的。

代表大会是否完成了这些任务呢？

二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就必须认识代表大会本身的面貌。

代表大会的各次会议谈到了许多问题，但主要问题是目前形势问

题，其余一切问题都是以它为中心的。**民主革命的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策略上一切分歧意见的焦点。布尔什维克说，城市的危机日益尖锐，农村的饥荒日益严重，政府腐败透顶，而人民的义愤则一天天增长，因此，革命不仅没有低落，反而一天天发展起来，并准备新的进攻。所以任务就是促成日益发展的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以人民专制来完成它（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目前形势”）。

孟什维克所说的几乎也是一样。

但是**怎样**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为此需要**哪些**条件呢？

据布尔什维克看来，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以人民专制来完成它，**只在以下场合**才有可能：领导这个革命的一定要是觉悟的工人，革命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手中。布尔什维克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其**必要条件就是它……引导**农民群众**前进**，使农民的自发斗争带有政治自觉性……”否则无产阶级就只好放弃“人民革命领袖”的角色，而成为那永远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见决议“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自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方面，它是和那被资产阶级享受了果实的法国大革命相似的。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两个革命之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在法国革命时期，还没有像我们今天在我国所看见的大机器生产，阶级矛盾也不像目前在我国这样尖锐，因此那里的无产阶级是软弱的，而这里的无产阶级却是较强大、较团结的。还应该注意到：当时那里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而目前这里的无产阶级却有自己的政党及其纲领和策略。所以毫不奇怪，领导法国革命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工人却成了这些先生的尾巴，“工人进行了斗争，而资产者却获得了政权”。另一方面也非常明显，俄国无产阶级并不满意做自由派的尾巴，它以革命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并且号召一切“被压

迫者和穷苦的人”集合到它的旗帜下。这就是我国革命比法国大革命优越的地方，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我国革命能够进行到底并能够最后建立人民专制。不过我们必须自觉地促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把战斗的人民团结在它的周围，**以便有可能**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而把革命进行到底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这个革命的果实不被资产阶级所独吞，是为了使工人阶级除了政治自由之外还能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得到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完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从而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谁若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谁若不愿使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而为它火中取栗，谁若争取使无产阶级变成独立的力量并利用目前的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谁就应当公开指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谁就应当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基础。

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就是如此。

孟什维克说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们说：当然，革命在加强着，并且需要把它进行到底，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需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让那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做革命的领导者吧。布尔什维克问道：为什么，是怎么一回事？孟什维克回答说：因为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资产阶级就应充当这个革命的领袖。那末无产阶级究竟应当做些什么呢？它应当跟着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并且“推动他们”，这样来“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被孟什维克推举为“报告人”的孟什维克领袖马尔丁诺夫就是这样说的。在孟什维克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也表现了这种思想，虽然表现得不这样明显。马尔丁诺夫早在他的“两个专政”中就说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危险的空想”，是一种幻想；资产阶级革命“应当由极端民主反对派来领导”，而不是由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来领导；战斗的无产阶级“应当跟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后面”，并且推动他们走上通

向自由的道路(见马尔丁诺夫的一本有名的小册子“两个专政”)。他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又重复了这种见解。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是蓝本，而我国革命则是较蓝本逊色的副本；既然在法国领导革命的，起初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民会议”，后来又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公会”，那末在我国领导革命并把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起初也应当是国家杜马，以后就应当是另一个比杜马更为革命的代表机关。无论在杜马中或是在这个未来的代表机关中，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将占统治地位，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权，而不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要寸步不离地**跟着**资产阶级走，把它继续推向前进，推向真正的自由就行了。值得注意的是孟什维克对马尔丁诺夫的演说报以响亮的掌声。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自己的任何决议中**都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领导权”一语在他们的决议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都被删掉了（见代表大会的决议）。

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这里有两种互相排斥的立场，其他的意见分歧都是由此产生的。

既然目前革命的领袖是觉悟的无产阶级，而在现今的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却是立宪民主党的资产者，那就不言而喻，现今的杜马决不能变成“国家的政治中心”，决不能把革命的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无论它怎样努力都不能成为日益发展的革命的领导者。其次，既然革命的领袖是觉悟的无产阶级，而要通过杜马来领导革命又没有可能，那就不言而喻，目前我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应当是街头，而不是杜马的会议厅。再其次，既然革命的领袖是觉悟的无产阶级，而斗争的主要场所又是街头，那就不言而喻，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参加组织街头的斗争，**加紧**注意武装工作，扩充红色队伍并在先进分子中间传播军

事知识。最后，既然革命的领袖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既然先进的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参加组织起义，那就不言而喻，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不能避开临时革命政府，我们应当和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参加临时政府[①]，因为革命街头的领袖同样应当是革命政府中的领袖。

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就是如此。

反之，如果像孟什维克所想的，革命的领导权将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又“近于这类民主派”，那就不言而喻，现今的杜马能变成“国家的政治中心”，现今的杜马能把革命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并变成斗争的主要场所。其次，既然杜马能变成斗争的主要场所，那末**加紧**注意武装工作和注意组织红色队伍就是多余的事情，**特别**注意组织街头的斗争也不是我们的事情，和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并参加临时政府就更不是我们的事情了。让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关心这件事情吧，因为他们将是革命的领导者。诚然，拥有武器和红色队伍不仅不坏而且还是必需的，但其意义并不像布尔什维克所想的那么重大。

孟什维克的立场就是如此。

代表大会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就是说，它摈弃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赞成孟什维克的立场。

这样，代表大会就清楚地证明了它不懂得目前形势的迫切要求。

代表大会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此，其余一切错误自然也就随着产生了。

三

代表大会既然摈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那末其余的问题如

———————————————

①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问题的原则方面。——著者注

“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关于武装起义”等等，它会怎样去解决，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吧。

首先从国家杜马问题谈起。

我们不来分析究竟哪种策略较为正确，——是抵制选举还是参加选举。我们只指出以下一点：既然今天杜马除了空谈以外什么事也不干，既然它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这就是说，主张参加选举的人是错了，因为他们号召人民去参加选举，就使人民产生幻想。我们暂且撇开这一点不谈吧。原来在代表大会开会时，选举已经结束（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我们已经知道选举的结果，因此当时可谈的只是过几天就要召开的**杜马本身**。很明显，代表大会不能回到已往的问题上去，而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杜马本身究竟是什么和我们对它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些问题上面。

那末，现今的杜马究竟是什么，我们对它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大家从十月十七日的宣言中就已知道，杜马没有特别大的权力：这是一个“有权”开会讨论问题而“无权”逾越现行“根本法”的代表会议。杜马受到“有权”废除其任何决定的国家参议院的监视。而全副武装的沙皇政府在警戒着，要是杜马不满足于谘议的角色，沙皇政府就“有权”把它解散。

至于杜马的面目，那末我们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前就已知道它将由谁组成，当时我们已知道杜马的大部分代表一定是立宪民主党人。我们并不是想借此说明，立宪民主党人一定将在杜马中占多数，我们只是说杜马五百个代表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将是立宪民主党人，还有三分之一是中间集团和右派（“民主改革党”、无党派代表中的温和分子、十月党人等等），这些人在和极左派（即工人集团和革命农民集团）作斗争时，一定会集结在立宪民主党人的周围并投票拥护他们，这样一来，在杜马中能左右一切的就会是立宪民主党人。

立宪民主党人是些什么人呢？能不能称他们为革命者呢？当然不能！那末立宪民主党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立宪民主党人就是**一帮妥恊分子**：他们想限制沙皇的权力，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主张人民获得胜利，——立宪民主党人想用来代替沙皇专制的是资产阶级专制而不是人民专制（见他们的纲领），——而是为了使人民也减弱自己的革命性，收回自己的革命要求，并尽量和沙皇妥协；立宪民主党人希望沙皇和人民达成协议。

可见杜马中的多数一定会由妥协分子组成，而不是由革命者组成。这一点早在四月上半月就已看得非常清楚了。

由此可见，一面是遭受抵制，软弱无力，权限微不足道；一面又是不革命的和妥协的分子占多数，——这就是杜马的面目。软弱的人本来就惯于走妥协的道路，若再加上他们的倾向也是不革命的，那就更容易滚到妥协方面去了。国家杜马也一定会这样。它不会完全站到沙皇方面，因为它希望限制沙皇的权力；但它也不会转到人民方面，因为人民提出种种革命要求。因此它必定站在沙皇和人民之间进行调停，就是说，必定干臼中捣水的勾当。一方面它必须说服人民，使人民放弃“过分的要求”而尽量向沙皇妥协；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以经纪人的身分在沙皇面前出现，请沙皇向人民让一点步，以便结束“革命的混乱局面”。

党的统一代表大会所碰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杜马。

党对这样的杜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不用说，党决不能支持这样的杜马，因为支持杜马就是支持妥协政策，而妥协政策是和加深革命这一任务根本抵触的，——工人政党不应担任绥靖革命的角色。当然，党应当利用杜马本身以及杜马和政府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党就应当支持杜马的不革命的策略。恰恰相反，揭破杜马的两面性，无情地批评杜马，暴露杜马的背叛性的策略，——这就是党对国家杜马应当采取的态度。

既然如此，那就很明显，立宪民主党的杜马不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它不能起人民代表机关的作用，不能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不能把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在这里，党的责任就是打破对杜马所抱的幻想，并且公开宣布：杜马不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所以它不能成为革命的工具；现在斗争的主要场所是街头，而不是杜马。

同时也很明显，在杜马中人数比立宪民主党少得多的农民“劳动团”,不会永远追随立宪民主党人的妥协策略，它很快就会把立宪民主党人当做人民叛徒而开始和他们作斗争，并走上革命的道路。党的责任就是支持“劳动团”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彻底发展它的革命倾向，使它的革命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不革命策略对立起来，这样来更明显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倾向。

代表大会究竟是怎样做的，代表大会在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中说了些什么呢？

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杜马是“从国民中间”产生出来的机关。这就是说，杜马虽然有它的缺点，但它似乎终究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

很明显，代表大会未能对立宪民主党的杜马作应有的估计，代表大会忘记了：杜马中的大多数是妥协分子，妥协分子既是摈弃革命的人，也就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因而我们无权说杜马是“从国民中间”产生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说：“现在已可看出（主要是）由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国家杜马无论**如何不能负起**真正人民代表机关的使命。”这就是说，现在的杜马不是从人民中间产生出来的,它是反人民的,所以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否决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代表大会的决议说：“杜马”虽然具有“伪宪制的”性质，但终

究“会变成革命的工具”……它和政府的冲突能够扩大到“有可能使这种冲突变成旨在推翻现存政治制度的广大群众运动的出发点”。这就是说，杜马似乎可能变成政治中心，把革命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举起革命的旗帜。

工人们，你们听见了吗：妥协的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居然能变成革命中心，能领导革命，——狗居然能生出羊来！你们何必操心，今后既用不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用不着使人民一定要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了，因为**不革命的**杜马自己是会把**革命的**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原来进行革命是这么简单呀，原来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是应该这样做呀！

看来，代表大会不懂得，两面性的杜马及其两面性的立宪民主党人必然会脚踏两只船，必然会在沙皇和人民之间进行调解，然后就像所有两面派一样，不得不投到给予更多诺言的那一方面去！

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宣称，“目前还没有可以使我党走上国会道路的条件”，就是说，我们暂时还不能开始过平静的国会生活，斗争的主要场所仍然是街头，而不是杜马（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代表大会在这一点上也否决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代表大会的决议丝毫没有确切地说明：杜马中存在着处于少数地位的革命农民代表（“劳动团”），他们将不得不摈弃立宪民主党的妥协政策而走上革命道路；我们必须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作斗争，帮助他们更加坚定地站在革命的道路上。

看来代表大会不懂得无产阶级和农民是目前革命中的两个主力；在现时，只要革命的农民和革命的敌人作斗争，那末作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无论在街头或在杜马中都应当支持他们。

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宣称：社会民主党应该无情地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不彻底

性和动摇性，特别留心地注视农民革命民主派的分子，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人对立起来，支持他们那些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发言”（见决议）。

代表大会也没有通过布尔什维克的这项提案。大概因为这项提案过于明显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在目前斗争中的先进作用，而代表大会，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却不信任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它说农民应当团结在杜马的周围，而不应当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的刊物“我们的生活报”就称赞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报”的那些立宪民主党人就异口同声地叫喊：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回心转意，离开布朗基主义了（见“我们的生活报”第四三二期）。

显然，人民的敌人——立宪民主党人称赞代表大会的决议决不是无缘无故的！无怪乎倍倍尔说：凡是我们的敌人所喜欢的事情，对我们都是有害的！

四

现在我们来谈谈武装起义问题。

现在谁都晓得，人民的发动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城市的危机和乡村的饥荒有加无已，既然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既然沙皇政府日趋腐败，既然革命因而高涨起来，——那末不言而喻，实际生活正在准备一次比十月和十二月两次发动更广泛更强大的新的人民发动。至于这种新的发动是否如愿，是好是坏，今天来说是多余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愿望如何，而在于人民的发动正在自然地成熟着，它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发动是各有不同的。不待说，彼得堡的一月总罢工（一九〇五年）是人民的发动。十月的政治总罢工是人民的发动。莫斯科的

和拉脱维亚人的“十二月搏斗”也是人民的发动。显然，这些发动之间都有不同的地方。在一月发动（一九〇五年）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罢工，而在十二月发动中，罢工只是一个开端，后来它就转变为武装起义，把主要作用让给了武装起义。一月、十月和十二月的发动证明：不管你怎样“和平地”开始总罢工，不管你怎样“客气地”提出要求，不管你怎样赤手空拳地走上战场，事情还是要由搏斗来结束（请回忆一下一月九日彼得堡民众举着十字架和沙皇肖像游行的情形），政府还是要使用大炮和长枪，人民还是要拿起武器，因而总罢工还是会转变为武装起义。这说明什么呢？这不过说明：将来的人民发动不会是普通的发动，它一定具有**武装**斗争的性质，因而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是**武装**起义。至于流血冲突是否如愿，是好是坏,那是不必谈的。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愿望如何，而在于**武装**起义一定要发生，避免它是不可能的。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建立人民专制。我们要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用总罢工能达到这个目的吗？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请回忆一下上述的情形）。也许杜马和它那些夸夸其谈的立宪民主党人能帮助我们，因而人民专制就会在它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吗？事实证明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所要的是大资产阶级专制而不是人民专制（请回忆一下上述的情形）。

很明显，唯一可靠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武装起义。只有靠武装起义才能推翻沙皇统治并建立人民统治，当然这个起义一定要以胜利来结束才行。既然如此，既然现今没有起义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胜利，而另一方面，既然实际生活本身在准备着人民的武装发动，既然这个发动不可避免，——那末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自觉地准备迎接这个发动，自觉地使这个发动获得胜利。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应当摈弃人民专制（民主共和国）而满足于君主立宪制，那末我们就有权说组织武装起义不是我们的事情；或者我们仍旧

认定我们今天的目的应当是建立人民专制（民主共和国）而坚决摈弃君主立宪制，那末我们就无权说自觉地去组织自发成长的发动不是我们的事情了。

但是，怎样准备武装起义，怎样促使起义获得胜利呢？

十二月的发动证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无产阶级面前除了其他一切过失外，还犯了一个很大的过失。这个过失就是我们对武装工人和组织红色队伍的事情没有关心或者关心太少。请回忆一下十二月事变。谁不记得当时梯弗里斯、西高加索、南俄、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巴库等处奋起斗争的人民呢？为什么专制政府能如此容易地驱散了这些愤激的人民呢？难道因为人民还不相信沙皇政府的腐朽无能吗？当然不是！那末究竟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人民没有武器或武器太少，——不管你怎样觉悟，赤手空拳是挡不住枪弹的！是的，群众骂我们：你们拿了钱，武器都没有看见。这是骂得很公道的。

第二、因为我们还没有受过训练的红色队伍来领导其余的民众前进，用武器去夺取武器并把民众武装起来：民众在街头战斗中是英雄，但是，如果武装的弟兄不引导他们，不给他们树立榜样，那末他们就会变成乌合之众。

第三、因为起义是零碎的，没有组织的。当莫斯科进行街垒战时，彼得堡却毫无动作。莫斯科已“被征服”了，梯弗里斯和库泰依斯才准备冲击。南方一带和拉脱维亚人已经“战败”了，西伯利亚才拿起武器。这就是说，在起义开始时，战斗的无产阶级是分散为一些个别集团的，所以就容易被政府“打败”。

第四、因为我们的起义所采取的是防御政策而不是进攻政策。政府自己激起了十二月起义,政府自己向我们进攻,它有自己的计划，而我们在应付政府的这种进攻时却是没有准备的，我们没有周密的计划，我们不得不采取自卫政策，于是我们就做了事变的尾巴。假使莫斯科

民众一开始就选定进攻政策，那末他们就会立刻占领尼古拉车站，政府就无法从彼得堡调遣军队到莫斯科。这样，莫斯科的起义就会坚持得比较久，因而就会使其他城市也受到相当的影响。关于拉脱维亚人的起义也应该这样说：假使他们一开始就采取进攻的手段，那末他们首先就会夺得大炮并会破坏政府当局的力量。

无怪乎马克思说：

“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 必须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也好；必须保持由于起义者初次的胜利进展所造成的精神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跟着较强的人走的和总是站到较可靠的一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一句话，要按照至今驰名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见马克思“历史随笔”第九十五页）

十二月起义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勇敢”和进攻政策。

有人会向我们说：十二月“失败”的原因还不止于此，你们忘记了，在十二月，农民没有能够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也是十二月退却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十足的真理！我们也并不打算忘记这一点。然而农民为什么没有能够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原因何在呢？有人会向我们说：由于没有觉悟。好吧，但我们应如何使农民有觉悟呢？散发小册子吗？这当然是不够的！那又怎么办呢？要斗争，要吸引他们参加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我们要领导他们。今天城市负有领导乡村的使命，工人负有领导农民的使命，如果城市的起义没有组织好，那末农民在这方面是决不会跟着先进无产阶级走的。

事实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代表大会应当如何对待武装起义，应当向党员同志提

出什么口号。党在武装工作方面有很多缺点，党的这一工作至今无人过问，——所以代表大会必须向党说：**要武装起来**，要加紧注意武装工作，以便多少有准备地迎接必将到来的发动。

其次，党在组织武装队伍的工作方面也有很多缺点，它对扩大红色队伍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所以代表大会必须向党说：**要建立红色队伍，要在人民中间传播军事知识**，要加紧注意组织红色队伍，以便今后用武器去夺取武器并扩大起义。

再其次，无产阶级是在分散状态下迎接十二月起义的，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组织起义的问题，所以代表大会必须向党提出口号，使党大力把战斗分子团结起来，按照统一计划把他们发动起来，积极组织武装起义。

再其次，无产阶级在武装起义中至今都是采取防御政策，从来也没有走上进攻的道路，而这种情况也就妨碍了起义的胜利，所以代表大会必须向党员同志指出：起义胜利的时机已经迫近，**必须转入进攻政策**。

代表大会究竟怎样做的，它向党提供了些什么口号呢？

代表大会说：“……目前党的基本任务是发展革命，其办法就是在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中以及在军队中扩大和加强鼓动工作，社会民主党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应当经常以参预全国一切政治生活来吸引他们参加积极反对政府的斗争……”党“不能承担会引起幻想的武装人民的义务，党的任务应限制于协助居民自我武装并进行组织和武装战斗队的工作……”“党必须反对一切引诱无产阶级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武装冲突的企图……”以及其他等等（见代表大会决议）。

这样说来，**今天，在目前**，当我们正处于人民新发动的前夜，**为了起义胜利，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鼓动工作**，而武装和组织红色队伍的工作却是一种不关紧要的事情，我们不应热中于这种事情，我们应把

自己在这方面的活动“限制于”“协助”。关于我们必须组织起义而不应零碎地举行起义的问题，关于我们必须采取进攻政策的问题（请回忆一下马克思的话），——关于这一切，代表大会竟只字未提。显然，这些问题对它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证明，必须武装起来和竭力巩固红色队伍；代表大会却回答说：不应太热中于武装和组织红色队伍的工作，要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活动“限制一下”，因为最主要的事情是鼓动工作。

这样说来，彷佛我们在这以前已十分关心武装工作，已武装了大批同志和组织了很多部队，而只是忽略了鼓动工作，——所以代表大会教训我们说：已经武装得够了，不要再去操心了，进行鼓动工作才是主要任务！

当然，鼓动工作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党的主要武器之一，可是鼓动工作难道会决定当前起义的胜利吗？如果四年以前，当起义问题还没有提到我们日程上来的时候，代表大会说出这些话，那还可以理解；但在今天，当我们已处在武装起义的前夜，当起义问题已提到日程上的时候，当它不顾并违反我们的意志而开始的时候，鼓动工作“主要地”又能发生什么作用呢，凭这种“鼓动”又能做出什么事情呢？

再则，假定我们已扩大了鼓动工作，假定人民已经发动起来，以后又怎么办呢？人民没有武器怎能进行战斗呢？难道赤手空拳的人民的鲜血没有流够吗？并且，如果人民不会使用武器，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红色队伍，那末给他们武器又有什么用处呢？有人会向我们说：我们并不拒绝从事武装工作和组织红色队伍呀。就假定是这样，但是你们若不充分注意，你们若不过问这一工作，那末事实上就等于你们拒绝这一工作了。

我们且不去说代表大会根本没有谈到**组织**起义和**进攻**政策的问题。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代表大会的决议比实际生活落后了四五年，在代表大会看来，起义问题仍然是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说：“……在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应当加紧注意**研究十二月起义的实际经验，**注意**以军事观点批判它并吸取直接的教训以供将来参考”，“应当**更加努力**扩充战斗队，改善它们的组织并供给它们各种武器。同时经验证明,不但应当组织党员战斗队,而且应当组织接近党的和完全非党的战斗队……”“由于日益增长的农民运动在最近的将来可能爆发为整个的起义，我们最好是努力**把工人和农民的行动统一起来，以便尽可能组织共同的和同时的战斗发动**……”所以，“由于新的政治危机日益增长和尖锐化，**从武装斗争的防御形式过渡到进攻形式**已有可能”……必须同士兵一起“……**以最坚决的进攻行动反对政府**……”等等（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

但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却被代表大会否定了。

由此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那么热烈的欢迎（见“我们的生活报”第四三二期），因为他们懂得：**这些决议**比目前革命落后了好几年，这些决议完全没有反映出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按照**这些决议**去做，无产阶级势必变成自由派的附属品，而不会变成独立的力量，——他们了解了这一切，所以才大为称赞这些决议。

党员同志的任务，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代表大会的决议，并适时加以相当的修改。

当我们着手写这本小册子时，我们所注意的正是这个任务。

诚然，我们在这里只谈到两个决议：“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但是毫无疑义，这两个决议是最确实地表明代表大会的策略立场的基本决议。

这样，我们就得出一个主要的结论,即问题在党内是这样提出的：**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成为目前革命中的领导者呢，还是应当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

我们知道，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都以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为转移。

因此，同志们必须更仔细地估量这两个立场的实质。

按“无产阶级报社”一九〇六年发行的小册子原文刊印
署名：科同志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85—203页

阶　级　斗　争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只有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动摇资产阶级的联盟。

——马克思

现代生活非常复杂！在实际生活中，处处都可看到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集团：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封建主、中等封建主和小封建主，帮工、杂工和熟练产业工人，高级僧侣、中级僧侣和低级僧侣，大官僚、中等官僚和小官僚，各种知识分子及其他类似的集团，——这就是我们生活所呈现的一幅五光十色的图画！

但同时也很明显，生活愈是向前发展，这个复杂生活也就愈加明显地呈现出两个基本的趋向，这个复杂生活也就愈加突出地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资本家阵营和无产者阵营。一月经济罢工（一九〇五年）清楚地显示出，俄国的确分为两个阵营了。彼得堡的十一月罢工（一九〇五年）和全俄国六、七两月的罢工（一九〇六年）使两个阵营的领袖发生了冲突，因而彻底揭露了现代的阶级矛盾。从那时起，资本家阵营就没有打瞌睡，这个阵营里在热烈地不断地进行着准备工作：建立资本家地方联合会，地方联合会结成区域联合会，区域联合会结成全俄联合会，创办基金会和机关刊物，召开全俄资本家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可见资本家在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以便制服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无产者阵营也没有打瞌睡。这里也在热烈地准备迎接必将到来的斗争。不管反动势力怎样迫害，这里也在建立地方工会，地方工会结成区域工会，设立职工基金会，增办职工会刊物，召开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可见无产者也在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以便制服剥削势力。

曾经有一个时期，生活中弥漫着一片“宁静”的气氛。当时这些阶级及其阶级组织还看不出来。当时固然也有过斗争，但这种斗争只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阶级性的：资本家们没有自己的联合会，所以他们每个人只有靠本身的力量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工人也没有自己的工会，所以每个工厂的工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诚然，各个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曾领导过工人的经济斗争，但大家都认为这种领导是薄弱的，带偶然性的，因为当时社会民主党组织甚至连党内的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好。

一月经济罢工是个转折点。当时资本家手忙脚乱，于是就着手组织地方联合会。彼得堡、莫斯科、华沙、里加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联合会的组织就是由一月罢工促成的。至于石油业、锰矿业、煤炭业和糖业的资本家，则把自己原有的“和平的”联合会变成了“斗争的”联合会，并开始巩固自己的阵地。但是资本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决定成立全俄联合会，于是在一九〇五年三月由莫罗佐夫发起，在莫斯科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全俄资本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成立了协定，保证不经彼此协议不得对工人让步，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则宣布**同盟歇业**[①]。从这时起，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剧烈斗争就开始了。从这时起，俄国大规模的同盟歇业时期就开始了。严重的斗争需要有严密的联合会，所以资本家决定再次集会，以便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合会。于是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三个月（一九〇五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资本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再次确认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再次承认了同盟歇业的必要性，选出了一个常务局负责起草章程和筹备召开下届代表

——————————————

① **同盟歇业**是厂主的罢业。厂主为了打破工人的反抗和拒绝工人的要求而故意关闭工厂。——著者注

大会。与此同时，这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已付诸实施了。事实证明，资本家是准确地执行这些决议的。如果回忆一下里加、华沙、敖德萨、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的资本家所宣布的同盟歇业，如果回忆一下十一月间彼得堡的七十二个资本家以残酷的同盟歇业手段来威吓彼得堡二十万工人的事实，——那末就容易了解，全俄资本家联合会已是一支多么巨大的力量，他们是多么准确地执行自己的联合会的决议。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资本家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一九〇六年一月），最后在今年四月间又举行了全俄资本家联合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通过了统一的章程并选出了中央常务局。据报上消息，这个章程已由政府批准了。

由此可见，俄国大资产阶级无疑地已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了，它有自己的地方组织、区域组织和中央组织，它可以按照统一的计划使全俄国的资本家行动起来。

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破坏无产阶级的组织，——这就是资本家总联合会的目的。

同时，工人的工会运动也增长和发展起来了。一月经济罢工（一九〇五年）在这方面也发生了影响。运动已具有群众性，它的要求扩大了。以后的事实说明，社会民主党组织不能同时既做党的工作又做工会工作。党和工会需要有适当的分工。党的工作必须由党组织领导，工会工作则由工会领导。于是开始组织工会。在莫斯科、彼得堡、华沙、敖德萨、里加、哈尔科夫、梯弗里斯——到处都成立了工会。固然，反动势力对此多方阻挠，然而运动本身的需要毕竟占了上风，工会日益增多了。随着地方工会的成立，不久就出现了区域的工会，最后在去年九月间召开了全俄工会代表会议。这是工会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它使各个城市的工会彼此接近起来，而且终于选出了中央常务局去负责筹备召开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十月大罢工的时期到来了，于是工会组织大大加强起来。地方工会和区域

工会日益发展。固然“十二月的失败”明显地阻碍了工会的建立，但是工会运动以后又恢复起来，并且进行得很顺利，到今年二月就召开了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其成分比第一次代表会议更为广泛，更为全面。第二次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成立地方的、区域的和全俄的中心机关，选出了“筹备委员会”负责召集即将举行的全俄代表大会，并通过了有关工会运动的迫切问题的决议。

由此可见，不管反动势力怎样嚣张，无产阶级无疑地也在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它在不倦地巩固自己地方的、区域的和中央的工会组织,并且在不倦地努力把自己无数的弟兄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

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改善劳动条件，制服剥削势力和破坏资本家联合会，——这就是工会的目的。

现代社会就这样分裂成两大阵营，每一阵营都组成单独的阶级，它们之间炽烈的阶级斗争在日益加深和加剧，其余一切集团都集合在这两个阵营的周围。

马克思说过：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就是说，今天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着经济斗争，明天他们也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就这样用双重性的斗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资本家有其私人的职业的利益。他们的经济组织就是专为保证这些利益而存在的。但是，除了私人的职业的利益以外，他们还有共同的阶级的利益，即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为了这种共同利益,他们需要进行政治斗争和成立政党。俄国资本家很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看见了唯一“公开大胆”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党是**十月党**，所以就决定团结在这个党的周围，并服从它的思想领导。从那时起，资本家就在这个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自己的政治斗争，利用这个党来影响现在的政府（这个政府封闭工会，但同时却急忙地批准资本家联合会的成立），把它的候选人选进杜马，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依靠联合会进行经济斗争，在十月党的思想领导下进

行总的政治斗争，——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今天所采取的形式。

另一方面，现时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无产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职业的利益，就建立工会来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等等。但是，除了职业的利益以外，无产者还有共同的阶级的利益，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无产阶级作为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还没有夺到政治统治时，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这里无产阶级既需要政治斗争，也需要一个能对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实行思想领导的政党。当然，工会大半是非党的和中立的组织。但这不过说明，它们只是财务上和组织上不依靠党，就是说，它们有自己的基金会，有自己的领导机关，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在形式上不必服从某一政党的决定。至于工会在思想上依靠某一政党，那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其原因之一就是参加工会的有各政党的党员，他们必然要把自己的政见带进工会里去。很明显，既然无产阶级不能不进行政治斗争，那它也就不能没有某个政党的思想领导。不但如此，无产阶级自己还必须寻找一个足以引导它的工会走上“乐土”即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党。然而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应当随时警惕，谨慎从事。它应当细心研究各个政党的思想内容，不受约束地接受一个能勇敢地彻底地保护它的阶级利益、能高举无产阶级的红旗并大胆地把它引向政治统治、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的思想领导。

到目前为止，这种使命都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担负的，所以工会的任务就是接受这个党的思想领导。

大家知道，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由此可见，依靠工会来进行经济搏斗，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政治冲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今天所采取的形式。

毫无疑义，阶级斗争将更加剧烈。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自己的斗争成为有系统有组织的斗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工会

并且把它们统一起来，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一定能大有帮助。为了使无产阶级组成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非党工人代表大会”，而是工会代表大会。同时无产阶级应当把那个能对它的阶级斗争实现思想政治领导的党竭力巩固和加强起来。

载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新时代报”创刊号
署名：柯……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卷第204—209页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

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大家知道，这就是社会主义。

决不能认为自由主义是什么不可分割的整体：它适应着资产阶级中各个不同的阶层而分为各种不同的派别。

社会主义也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也包含各种不同的派别。

我们暂且不在本文内研讨自由主义，最好等到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只想把社会主义及其各个派别向读者介绍一下。在我们看来，这对读者是更有意义的。

社会主义分成三个主要派别：**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改良主义（伯恩施坦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的而已，它事实上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并企图用和平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宣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合作，——这个改良主义一天天腐败下去，一天天失去任何的社会主义标志；所以我们认为在这几篇阐述社会主义内容的论文里研究它是毫无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在它们两者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派别，它们彼此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它们都力图向无产阶级表明自己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学说；所以把它们加以研究，加以对照，当然对读者的意义要大得多。

我们不是那样的人，一听见有人提到“无政府主义”就轻蔑地转

过身去，把手一挥说：“你们何必理睬它，它是连谈都不值得一谈的！”我们认为这种没有价值的“批评”既不庄重，又无益处。

我们也不是那样的人，自己安慰自己说，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群众，因而并不怎样危险”。问题不在于今天有多少“群众”跟谁走，而在于学说的本质。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代表真理，那它自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把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它是没有根据的，虚构的，那它就会维持不久，站不住脚。而无政府主义的没有根据是应当加以证明的。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只有策略上的分歧，所以在这些人看来，把这两个派别互相对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敌人。所以我们也就承认对真正的敌人要进行真正的斗争。因此，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从头到尾审察一下，并从各方面把它彻底衡量一番是必要的。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虽然双方登上斗争舞台时都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

显然，这是两个互相否定的原则，而不只是策略上的分歧。

我们这几篇论文的目的是要把这两个对立的原则加以对照，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加以比较，从而阐明两者的优点和缺点。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在这里先向读者介绍一下这几篇论文的梗概。

我们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开始，附带涉及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然后再来批评无政府主义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将首先说明辩证方法，说明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个方法的看法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说明唯物主义理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这里也将讲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专政、最低纲领并一般地讲到策略）；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哲学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批评意见；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和组织；最后则提出我们的结论。

我们将尽力证明：无政府主义者既是小村社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也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也要尽力证明：无政府主义者既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现在我们就来讲本题吧。

一　辩证方法

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着…… 生活在变化着，
生产力在增长着，旧关系在破坏着。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因此，阐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阐明辩证唯物主义。

为什么这个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辩证的，而**理论**是唯物的。

什么是辩证方法呢？

有人说，社会生活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这是正确的：决不能认为生活是一种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处在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有**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和反革命的东西。

辩证方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动的东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去？我们看到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和创造的图画，所以我们应当把生活当做既破坏又创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创造的是什么？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民粹派硬说：能够担负起“解放俄国”这个任务的主要力量是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质问他们：为什么呢？民粹派说：因为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现在占大多数，而且他们的生活又穷又苦。

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是的，乡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目前确实占大多数，他们确实是穷，但问题难道在这里吗？小资产阶级早已占大多数，但直到今天，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没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就没有表现过任何的主动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是在成长壮大，相反地，是在日益解体和分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另一方面，很明显，穷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决定意义：“流浪汉”比小资产阶级更穷，然而谁也不会说他们能担负起“解放俄国”的责任。

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哪一个阶级今天占大多数，或者哪一个阶级穷些，而在于哪一个阶级在壮大，哪一个阶级在解体。

既然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不断成长和不断壮大的阶级，是唯一的将社会生活向前推进、把一切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阶级，那末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现时运动中的主力，应该加入它的行列，把它的先进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

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回答的。

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地观察生活，而民粹派是形而上学地大发议论，把社会生活看成停滞不前的东西。

辩证方法就是这样观察生活发展的。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在社会生活中有过“十二月事变期间”的运动，那时无产阶级挺起胸来，袭击军械库，进攻反动派。但是也必须把前几年的运动叫做社会运动，那时无产阶级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只举行过零星的罢工，只建立过小型的工会。

显然，运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辩证方法说：运动有两种形式，即进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

当进步分子自发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

当这些进步分子联合起来，抱着一个共同思想向敌人的营垒冲去，

以期根本消灭旧制度，使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

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

自然界也有这样的过程。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神贯穿着全部现代科学。至于运动的形式，至于依据辩证法所说的小的变化、**量的**变化归根到底要引起大的变化、**质的**变化，那末这个规律在自然发展史中也是同样有效的。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系”清楚地表明，由量变而发生质变在自然发展史中有多么大的意义。在生物学上，继新达尔文主义而起的新拉马克主义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其他已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十分详尽地阐明了的各种事实，我们就不谈了。

辩证方法的内容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看辩证方法的呢？

大家知道，辩证方法的创始人是黑格尔。马克思澄清了并改进了这个方法。当然，这种情况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知道的。他们知道黑格尔是个保守主义者，于是一有机会就大骂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者，他们拚命“证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的哲学家……他赞美专制的官僚立宪制度，他的历史哲学的总的思想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复辟时代的哲学派别的”，以及如此等等（见“号召报”第六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

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证明”这一点（见他用俄文发表的“科学和无政府主义”）。

我们的克鲁泡特金派，从车尔凯兹施维里一直到沙·哥·都异口同声地附和克鲁泡特金（见“号召报”）。

其实，谁也不和他们争论这一点，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同意黑格尔不是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比谁都早地在“批判的批判之批判”一书中证明过：黑格尔的历史观点是和人民专制根本矛盾的。虽然如此，但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要“证明”并且认为必须每天“证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者。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大概想用这一切来破坏黑格尔的威信，使读者觉得“反动分子”黑格尔的方法也不能不是“令人厌恶的”和非科学的吧。

无政府主义者想用这种手段来驳倒辩证方法。

我们说：他们用这种手段除了证明自己愚昧无知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巴斯噶和莱布尼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所发现的数学方法现在被公认为科学方法了。迈尔和赫尔姆霍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在物理学方面的发现成了科学的基础。拉马克和达尔文也不是革命者，但他们的进化论方法使生物科学站住了脚…… 为什么不能承认黑格尔虽是保守主义者、但正是他黑格尔创造出了叫做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这一事实呢？

不，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手段**除了证明自己愚昧无知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继续讲下去吧。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他们既然“想把科学从形而上学桎梏下解放出来，想把哲学从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所以他们就驳斥辩证方法了（见“号召报”第三期和第九期沙·哥·的论文。又见克鲁泡特金“科学和无政府主义”）。

咳，这伙无政府主义者！真是“嫁祸于人”。辩证法是在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成熟的，它在这个斗争中博得了光荣，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辩证法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

变动的，自然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风俗习惯在改变，正义的概念在改变，真理本身也在改变，——正因为如此，辩证法对一切都采取批判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它否认一成不变的真理，因而也否认抽象的“一经发现后就只须熟读死记的教条”（见恩格斯“费尔巴哈论”）

形而上学向我们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套。在形而上学看来，世界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它是由某个人或某种东西永远确定了的，所以形而上学者一开口就是“永恒的正义”和“不变的真理”。

无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鲁东说：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正义**，这种正义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蒲鲁东被称为形而上学者。马克思借助辩证方法和蒲鲁东作斗争，并证明说：既然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那末“正义”也一定要变化，因而“不变的正义”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呓语（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形而上学者蒲鲁东的格鲁吉亚的门徒却一味向我们重复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承认各种含糊不清的教条，例如所谓“不可认识的东西”和“自在之物”，归根到底也就变为毫无内容的神学。与蒲鲁东和斯宾塞相反，恩格斯借助辩证方法来反对这些教条（见“费尔巴哈论”）。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和斯宾塞的门徒向我们说：蒲鲁东和斯宾塞是科学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形而上学者！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骗自己，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把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和他的**辩证**方法混为一谈。

不用说，以永恒观念为依据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彻头彻尾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同样很明显，否定任何永恒观念的黑格尔辩证**方法**却彻头

彻尾是**科学的和革命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给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以致命的批判，同时又称赞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认为他的辩证方法“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低头，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见“资本论”第一卷的跋）。

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方法和黑格尔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特别重视黑格尔**体系**的人可能在这两方面都很保守。而把辩证**方法**当做主要东西看待的人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都可能持最极端的反对立场。”（见“费尔巴哈论”）

无政府主义者看不出这种区别，却一味轻率地重复说：“辩证法就是形而上学。”

我们再往下讲吧。无政府主义者说：辩证方法是“诡计”、“诡辩方法”、“逻辑的翻筋斗”（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利用这个方法可以同样容易地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见“号召报”第四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

这样，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方法能同样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

初看起来，也许觉得无政府主义者的责难不无根据。现在请听听恩格斯论到形而上学方法信奉者的时候所说的话吧；

“……他们的说法：‘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一个东西决不能同时既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什么东西；肯定和否定是绝对互相排斥的……”（见“反杜林论”引言）

无政府主义者狂叫道：怎么能够这样呢！难道同一个东西能够同时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吗？这是“诡辩”呵，这是“玩弄字眼”呵，这就是说，“你们想同样容易地证明一个东西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呵！……

然而，我们且思索一下问题的本质吧。

今天我们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我们能不能说民主共和国在各方面都好或是在各方面都坏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共和国只有从一方面看，即当它破坏封建制度的时候，才是好的，而从另一方面看，即当它巩固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却是坏的。因此我们说：民主共和国既然破坏封建制度，所以它是好的，我们就要为它而奋斗；但是民主共和国既然巩固资产阶级制度，所以它是坏的，我们就要和它作斗争。

由此可见，同一个民主共和国同时既“好”又“坏”，既“是”又“非”。

关于八小时工作制也可以这样说，它在同一时候既然加强无产阶级，所以是“好的”；既然巩固雇佣劳动制度，所以又是“坏的”。

恩格斯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来描述辩证方法特征的时候，正是指这样的**事实**。

无政府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十分清楚的思想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诡辩”。

无政府主义者看见或看不见这些**事实**，当然可以随心所欲，他们甚至在沙岸上也看不见沙子，——这是他们的权利。但这和辩证方法有什么关系呢，辩证方法和无政府主义相反，不是闭上眼睛看生活，而是感觉到生活的脉搏，并且直率地说：既然生活总在变化，总在运动，那末任何一种生活现象都有两种趋势，即肯定的趋势和否定的趋势；我们应当维护前一种趋势，反对后一种趋势。

我们再往下说吧。在我们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辩证的发展是毁灭性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首先是过去的一切消灭干净，然后是将来的一切另行确立起来…… 居维叶的激变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毁灭则是由辩证法产生的”（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

同一个作者又在另一个地方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依据达尔文主义，并对它采取不批判的态度。”（见“号召报”第六期）

请注意一下！

居维叶否认达尔文的进化，只承认激变，而激变是“由一些**不知道的**原因引起的”**突然爆发**。无政府主义者说：马克思主义者**附和居维叶**，因而是**排斥达尔文主义**的。

达尔文否认居维叶的激变，承认逐渐的进化。于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又说，“马克思主义是依据达尔文主义，并对它采取不批判的态度”，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居维叶的激变**。

一句话，无政府主义者一面责备马克思主义者附和居维叶，同时又指摘他们附和达尔文而不附和居维叶。

这才真是无政府状态！这真是下士的老婆自己揍自己[①]！显然，“号召报”第八期上的沙·哥·忘记了第六期上的沙·哥·说的话。

究竟哪一期说得对：是第八期还是第六期呢？

让我们看看事实吧。马克思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 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但是，“不论哪种社会形态，当从它这里获得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如果把马克思这个论点应用到现代社会生活中去，那就可以看出具有**社会**性的现代生产力和具有**私人**性的产品占有形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是一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的（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章）。

————————————

① 引自果戈里的剧本“钦差大臣”中市长对赫列斯塔科夫说的话。——译者注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并不是由居维叶所说的“不知道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那些叫做“生产力的发展”的完全确定的和极端重大的社会原因产生的。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并不是像居维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

很明显，居维叶的激变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之间是没有丝毫共同点的。

另一方面，达尔文主义不仅摈斥居维叶的激变，而且摈斥包括革命在内的、按辩证法来了解的发展，但从辩证方法观点看来，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质变乃是同一运动的两个必要形式。

看来也决不能断言“马克思主义……对达尔文主义采取不批判的态度”。

这样，“号召报”在前后两种场合，即无论在第六期或第八期，都弄错了。

最后，无政府主义者责备我们说，“辩证法……并不使人有可能翻来翻去、跳蹦自如”（见“号召报”第八期沙·哥·的论文）。

可敬的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这完全是真话，诸位在这里说得十分对，辩证方法确实不使人有这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使人有这种可能呢？因为“翻来翻去、跳蹦自如”是野羊的消遣，而辩证方法是供人使用的。

秘密就在这里！……

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辩证方法的看法就是如此。

很明显，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他们虚构了自己的辩证法，并且正是这样无情地和自己的这套辩证法进行斗争。

我们瞧见这种情景只能付之一笑，因为看到一个人和自己的幻想

作斗争，粉碎自己的虚构，同时却竭力要别人相信他在打击敌人，这是不能不令人发笑的。

二　唯物主义理论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
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

我们已经认识了辩证方法。

什么是唯物主义理论呢？

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生活中一切都在发展，但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这种发展采取的是**什么形式**呢？

例如我们知道，地球原来是炽热的熔浆，后来逐渐冷却，然后生出植物和动物，随着动物界的进化出现了一种猿猴，最后才出现了人类。

一般说来，自然界的发展情形就是如此。

同时我们又知道，社会生活也不是停滞不前的。有过一个时期，人们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靠原始的狩猎维持生存，出没于森林，寻找食物。后来原始共产主义为母权制所代替，这时人们主要靠原始农业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接着母权制为父权制所代替，这时人们主要靠牧畜业维持生存。然后父权制为奴隶制所代替，这时人们已靠较为发达的农业来维持生存了。在奴隶制度之后出现了农奴制度，最后就出现了资产阶级制度。

一般说来，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形就是如此。

是的，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但这种发展的经过是**怎样**的，是意识引起“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呢，或者相反，是“自然”和

“社会”的发展引起意识的发展？

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有些人说，在“自然”和“社会生活”出现以前就有世界观念，以后这种世界观念成了它们发展的基础，所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观念的发展的外在形式或简单表现。

例如**唯心主义者**的学说就是如此，后来唯心主义者分成了几派。

另外一些人说，世界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互相否定的力量：观念和物质，意识和存在；与此相适应，各种现象也分为两类：观念的和物质的；这两类现象互相否定，彼此斗争，所以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就是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之间的经常的斗争。

例如**二元论者**的学说就是如此，后来二元论者也像唯心主义者一样分成了几派。

唯物主义的理论既根本否定二元论,也根本否定唯心主义。

当然，世界上存在着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但这决不是说，它们似乎是互相否定的。恰恰相反，观念的方面和物质的方面是同一个自然或社会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决不能把它们看做不相依存的东西；它们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因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设想它们是互相否定的。

由此看来，所谓二元论是没有根据的。

统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统一而不可分的社会生活也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我们应该这样去看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

唯物主义理论的一元论就是如此。

同时，唯物主义理论也否定唯心主义。

认为观念方面以至整个意识的发展彷佛先于物质方面的发展，这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没有生物的时候，所谓外部的、“无生命的”自然就已经存在了。第一个生物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它仅仅具有**感受**

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以后动物的感觉能力渐渐发展，随着动物的有机体构造和神经系统的发展而慢慢转化为**意识**。如果猿猴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没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带，因此也就不能说话，而这种情形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还有，如果猿猴没有用后面两只脚站起来。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也就不能不总是用四只脚行走，总是向下方看并从下方摄取印象，也就没有可能向上方看，向四周看，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头脑获得的印象较四脚动物为多。这一切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

由此可见，为了意识的发展，就需要有机体的某种构造及其神经系统的发展。

由此可见，物质方面的发展，外部条件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先于**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这样一来，自然发展史就根本粉碎了所谓唯心主义。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应该这样说。

历史表明：各种不同时代的人们之所以抱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愿望，是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和自然作斗争以求满足本身的需要，与此相适应，他们的经济关系也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起来。有一个时期，人们在原始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共同和自然作斗争，当时他们的所有制也是共产主义的，因而他们几乎不分“我的”和“你的”，他们的意识是共产主义的。后来生产中浸透了“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分别，于是所有制也就具有了私有性，即个人主义的性质，人们的意识中也就浸透了私有感。到了现在这个时期，生产又具有社会性，因而所有制也将很快地具有社会性，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意识也就逐渐浸透着社会主义思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假定有一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鞋铺，因为

竞争不过大厂主，结果只好关门，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厂老板阿德里汉诺夫那里当雇佣工人去。他进阿德里汉诺夫的工厂，并不是想永远当个雇佣工人，而是想积些钱，凑一笔资本，再开自己的鞋铺。可见这个鞋匠的地位虽然**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地位，但他的意识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换句话说，这个鞋匠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已经**消失，再也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没有消失，他的意识落后于他的实际地位。

很明显，就是在这里，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的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人们的地位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意识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我们还是回头讲我们那位鞋匠吧。我们已经知道，他打算积些钱，再开自己的鞋铺。这个无产阶级化了的鞋匠工作了一个时期就感觉到积些钱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领到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生活。而且他又看到开个铺子并不是那样吸引人：要付房租、顾客刁难、手头无钱、大厂主的竞争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麻烦，——多少令人操心的事在折磨一个开小铺子的鞋匠。而无产者可以少操这种心，既没有顾客的麻烦，也不必担心房租，早晨去上工，晚间“安心地”下工，星期六也同样安心地把“工钱”装进口袋。我们这位鞋匠的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就在这里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在他的心坎中就初次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意向。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这位鞋匠觉察到：领到手的钱连买最必需的东西也不够，增加工资对于他是极端重要的。同时他又发现他的工友们在谈论着什么工会和罢工。我们这位鞋匠在这里意识到：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和厂主作斗争，而不是开自己的鞋铺。他加入工会，参加罢工运动，并且很快就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了……

这样，鞋匠的意识终于随着他的物质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了：首先是他的物质地位发生了变化，然后经过一些时间，他的意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关于各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也必须这样说。

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条件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风俗习惯、人们的世界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内容**，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相当迅速地**发生变革。”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彷佛没有形式的内容是可能的，像沙·哥·梦见的那样(见“号召报”创刊号“一元论批判”一文)。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因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始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个内容，于是新的内容“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例如现在具有**私人**性的产品占有形式不适合于生产的**社会**内容，而现代的社会“冲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另一方面，认为意识是存在的形式，这并不是说，彷佛意识按其本性说来也是一种物质。只有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如布赫纳尔和摩莱萧特）才这样想，他们的理论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根本矛盾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很公允地嘲笑过他们。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来，意识和存在、观念和物质，这是一般称为自然或社会的同一

现象的两种不同形式。所以它们既不互相否定[①]，也不是同一现象。问题只在于在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中，在意识（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东西）产生以前，总是先有相应的物质变化（我们身外发生的东西）出现；随着某种物质变化之后，迟早一定会有相应的观念变化。

有人会向我们说：很好，这就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说来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头脑中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思想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所谓外部条件是否实际存在，或者存在的只是我们关于这些外部条件的观念呢？如果外部条件存在，那末可以感觉和认识它们的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一点，唯物主义理论说道：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我”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使我们的“我”发生印象的外部条件存在的缘故。谁要是轻率地断定说，除了我们的观念以外什么都不存在，谁就不得不否认任何外部条件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认其余一切人的存在，而只承认自“我”的存在，但这种观点是荒诞无稽而和科学原理根本矛盾的。

显然，外部条件是确实存在的，这些条件存在于我们未生之前，也将存在于我们已死之后，并且它们愈是频繁而强烈地影响我们的意识，我们就愈能容易地感受和认识它们。

至于**现在**我们头脑中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思想是怎样产生的，那我们应当指出，这里也是简略地重复着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中所发生的那种情形。在这种场合，我们身外的对象也是先于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观念而存在的；在这种场合，我们的观念即形式也落后于对象，即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我望着树，就看见了树，这只是表明，在我

——————————————

① 这并不与认为形式和内容间存在着冲突的意见相矛盾。问题在于这种冲突不是存在于一般内容和形式之间，而是存在于**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因为新内容寻求新形式，并且趋向于新形式。——著者注

的头脑中还没有产生树的观念以前，树本身就已存在，树使我产生了相应的观念……

扼要说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就是如此。

不难了解，唯物主义理论对于人们的实际活动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既然**首先**是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然后**是人们的意识相应地发生变化，那就很明显，我们要探求某种理想的根据，就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不应当在他们的幻想中去探求，而应当在他们所处的经济条件的发展中去探求。只有依据对经济条件的研究而创造出来的理想才是好的，才是可以接受的。一切不顾及经济条件、不以经济条件的发展为依据的理想都是坏的，都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实际结论。

既然人们的意识、人们的风俗习惯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既然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的不适用是决定于经济内容的，那就很明显，我们应当促进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以便使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其政治制度也随之根本改变过来。

以下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一点所说的话：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如果人是从感性世界吸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人在其中习惯于养成人的特性…… 如果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如果人不是由于有避免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惩罚个别分子的犯罪行为，而应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如果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见“费尔巴哈论”的附录：“马克思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这就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二个实际结论。

* * *

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辩证方法导源于黑格尔，那末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熟知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利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人的缺陷来糟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方法，我们已经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玩弄这种诡计，不过证明他们自己的愚昧无知罢了。关于他们对费尔巴哈和对唯物主义理论的攻击也必须这样说。

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刚愎自用地向我们说：“费尔巴哈是个泛神论者……”他“把人神化了……”（见“号召报”第七期杰连吉的论文）“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似乎马克思由此作出了结论：“因此，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经济地位……”（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诚然，费尔巴哈是个泛神论者，他把人神化了，同时还犯了其他类似的错误，这是谁也不怀疑的。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揭露了费尔巴哈的错误。但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认为必须把已经揭露的错误再“揭露”一次。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他们想在痛骂费尔巴哈的时候，间接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也糟蹋一番。当然，我们要是大公无私地观察问题，那我们也许就会看到：费尔巴哈除了有不正确的思想外，还有一些正确的思想，正如历史上的许多学者那样。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要继续“揭露”……

我们再一次声明：他们玩弄这种诡计不过证明他们自己的愚昧无知罢了。

很有趣的一点（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看到）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理论毫无认识，竟想凭道听途说妄加批评。因此他们往往互

相矛盾，互相驳斥，这当然就使我们的“批评家”陷于可笑的境地。例如，假若听信车尔凯兹施维里先生的话，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憎恶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的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就是庸俗的而不是一元论的了。他说：

“自然科学家的那种具有进化论体系、变迁说和一元论唯物主义思想的伟大科学，即**恩格斯极其憎恶**的科学…… 是避开了辩证法的”等等（见“号召报”第四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

这样说来，车尔凯兹施维里所赞同而为恩格斯所“憎恶”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而**是值得赞同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却不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而显然是不值得承认的。

但是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而**是应该摈弃的。他说：

“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是黑格尔隔代遗传的东西。一般地说，绝对客观主义的一元论唯物主义，其中也有马克思的经济一元论，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一元论唯物主义乃是一种掩饰不周的二元论，并且是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妥协……”（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这样说来，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是不可接受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憎恶它，恰恰相反，他们自己就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者，因此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是应该摈弃的。

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你去分辨一下看，谁说得对，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彼此之间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优点或缺点的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自己还不懂得这个唯物主义是不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他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比较可以接受的是庸俗唯物主义还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就大吹大擂地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粉碎了！

是的，是的，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今后还是这样彼此拚命粉碎对方的观点，那末不用说，未来是要属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了……

另一件同样可笑的事实就是某些“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大名鼎鼎”，但对于科学中各种不同的派别还没有初步的认识。他们原来不知道科学中有各种各样的唯物主义，不知道各种唯物主义彼此间有很大的区别，例如有否认观念方面的意义及其对物质方面的影响的庸俗唯物主义，也有科学地考察观念方面和物质方面相互关系的所谓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而无政府主义者把这种种不同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甚至看不见它们之间有显着的差别，同时却又神气十足地声称：我们让科学复活起来了！

例如克鲁泡特金在他的“哲学”著作中自信地宣称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以“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为根据的，但是他却没有用片纸只字来说明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究竟根据哪一种“唯物主义哲学”：是根据庸俗的或一元论的，还是其他的什么“唯物主义哲学”。他大概不知道各种唯物主义派别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他不了解把这些派别混为一谈并不是“让科学复活起来”，而是表现出十足的愚昧无知（见克鲁泡特金“科学和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及其哲学”）。

关于格鲁吉亚的那些克鲁泡特金信徒也必须这样说。请听吧：

“在恩格斯看来，以及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也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学说。这种意见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凡认为社会机构彷佛是受地理条件、气候和地球转动条件、宇宙条件、人类进化条件和生物条件推动的历史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全是唯物主义者**”（见“号召报”第二期）。

这样说来，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和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之间，或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摩莱萧特的“唯物主义”之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了！这算什么批评！具有这样的认识的人居然

也想来革新科学！俗语说得好：“皮匠做肉包，真是糟糕！……”

其次，我们那些“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不知在什么地方听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填胃的理论”，于是责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这个公式迷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经济地位，是生产关系……”接着，无政府主义者就用哲学家的口吻教训我们说：“如果**吃饭**和经济生产是达到这个目的（社会生活）的**唯一**手段，那就错了…… 如果**思想体系**主要地、一元地**由吃饭**和经济地位**来决定**，那末某些饕餮之徒就会是天才人物了。”（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你看，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驳倒，原来多么容易呵。只须从某个贵族女学生那里听到一些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街谈巷议，只须用哲学家的武断的口吻把这些街谈巷议在什么“号召报”上重复一下，就能马上博得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头衔了！

但是，请诸位先生告诉我们吧：究竟何时、何地、在哪个行星上，有哪个马克思说过“**吃饭决定思想体系**”呢？为什么你们没有从马克思著作中引出一句话或一个字来证实你们这种论调呢？诚然，马克思说过，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思想，可是谁向你们说过吃饭和经济地位是同一种东西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像**吃饭**这样的生理现象是和人们经济**地位**这种社会现象根本不同的吗？要是有某个贵族女学生把这两种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那还情有可原，但是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摧毁者”和“科学的复活者”，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地重复着贵族女学生的错误呢？

而且吃饭又怎能决定社会思想体系呢？请考虑一下你们自己所说的话吧：吃饭和吃饭的形式是不变的，人们吃饭、咀嚼和消化食物古今都是一样的，而思想体系始终在变化。例如古代的思想体系、封建

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以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也就是思想体系的几种形式。难道可以设想**不变的东西**能决定**经常变化的东西**吗？

我们再往下讲吧。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就是平行主义……”或者说：“一元论唯物主义乃是一种掩饰不周的二元论，并且是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之所以陷入二元论，是因为他把生产关系说成物质现象，而把人们的意向和意志说成虽然存在但**没有意义的幻想和空想**。”（见“号召报”第六期沙·哥·的论文）

第一、马克思的一元论唯物主义是和糊涂的平行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物质方面（内容）**必然先于**观念方面（形式）。平行主义却驳斥这个观点并坚决宣称物质方面和观念方面**没有先后之分**，它们两者是一道地、平行地发展的。

第二、即使实际上“马克思把生产关系说成物质现象，而把人们的意向和意志说成没有意义的幻想和空想”，难道这就表明马克思是二元论者吗？大家知道，二元论者是把观念方面和物质方面作为两个对立的原则而认为它们有**同等**意义的。但是，如果据你们所说马克思是偏重物质方面而把观念方面看做没有意义的“空想”，那末你们这班“批评家”先生们又是从哪里弄出马克思的二元论来的呢？

第三、连小孩子也知道一元论从**一个原则**出发，即从具有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的自然或存在这个原则出发，而二元论则从**两个原则**出发，即从物质和观念这两个按二元论说来是互相否定的原则出发，那末唯物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又能有什么联系呢？

第四、马克思什么时候“把人们的意向和意志说成空想和幻想”呢？的确，马克思会用经济的发展来说明“人们的意向和意志”，并且把某些书呆子的不适合于经济环境的意向叫做空想。难道这能表明马克思认为人的意向一般地是空想吗？难道这还需要说明吗？真的你

们不知道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会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话，即一般说来，人类并不追求空想的目的。很明显，我们这位“批评家”不是不了解他自己所说的话，就是有意歪曲事实。

第五、谁告诉你们说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的意向和意志是没有意义的”呢？为什么你们不指明他们在什么地方说过这一点呢？难道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及其他小册子中没有说过“意向和意志”的意义吗？如果马克思不承认“意向和意志”的意义，那他为什么又努力用社会主义精神来发展无产者的“意志和意向”，他为什么又在无产者中间进行宣传呢？再者，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间发表的一些著名论文中说的不是“意志和意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诚然，马克思认为人们的“意志和意向”是从经济地位中吸取本身的内容，然而，难道这就是说“意志和意向”丝毫不影响经济关系的发展吗？难道无政府主义者真是这样难于了解这一简单的意思吗？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还“责难”说：“不能想像没有内容的形式……”因此就不能说“形式**跟随着**内容(落后于内容。——柯注)……它们‘同时并存’…… 否则一元论就成为无稽之谈了”（见“号召报”创刊号沙·哥·的论文）。

我们这位“学者”又有点糊涂了。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能想像的，这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现有的形式**永远不会完全适合于**现有的内容**：前者落后于后者，新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包藏在旧形式中，因此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也表现在这一点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没有了解这一点，这当然只能怪他们自己，而不能怪唯物主义的理论。

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把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叫做观点的话，那末他

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看法就是如此。

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①]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认识了他的**方法**，也认识了他的**理论**。

我们从这个学说中应当作出什么实际结论呢？

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呢？

辩证方法说：只有天天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不倦地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阶级才会始终是进步的，才能粉碎奴役的枷锁。我们看到，不断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为未来而斗争的唯一阶级就是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应该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

这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得出来的第一个实际结论。

然而，服务和服务各有不同。伯恩施坦要无产阶级忘掉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克鲁泡特金向无产阶级提出分散的、没有广大工业基础的、村社式的“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去争取以广阔的现代大工业基础为依据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是为无产阶级阶级服务。

我们应当怎样使我们的工作有利于无产阶级呢？我们应当怎样为无产阶级服务呢？

唯物主义理论说：一种理想，只有它和国内经济发展不相矛盾，只有它完全适合于这个发展的要求，才能对无产阶级有直接的帮助。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表明：现代生产具有社会性，生产的社会性根本否定现存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资本主

———————————————

①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条件”的问题请参阅“著者第一卷序言”。文中说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本书编者注

义所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这就是说，鼓吹忘掉社会主义的伯恩施坦学说是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本矛盾的，它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表明：现代生产在一天天扩大，它不能局限于个别城市和个别省份的范围内，它不断地打破这种范围而遍及全国。因此我们应当欢迎生意范围的扩大，承认将来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个别城市和个别村社，而是统一与不可分的全国的领域，这个领域将来当然会更加扩大起来。这就是说，把未来的社会主义局限于个别城市和个别村社范围中的克鲁泡特金学说，是和大力发展生产的利益相矛盾的，它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

为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生活这一**主要**目的而奋斗，——我们就应当这样为无产阶级服务。

这就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中得出来的第二个实际结论。

很明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结论。

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

现代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说，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一小撮资本家的阵营，一个是大多数人的即无产者的阵营。无产者日夜工作，而依旧贫穷。资本家不从事劳动，却总是富有。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无产者彷佛缺乏智慧，资本家别有天才，而是因为资本家夺去了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为资本家剥削无产者。

为什么夺去无产者的劳动果实的正是资本家，而不是无产者自己呢？为什么是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而不是无产者剥削资本家呢？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到处都是买卖原则占统治地位。在这里你们不仅能买消费品，买食品，并且也能买人们的劳动力，买他们的血汗和良心。资本家知道这一切，于是就买无产者的劳动力，雇佣他们。而这就是说，资本

家成为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主人。无产者却失去支配这种已经卖出的劳动力的权利。就是说，由这种劳动力造成的东西已不归无产者所有，而只归资本家所有，只落到资本家的口袋里。也许你们卖出的劳动力一天能生产值一百卢布的商品，但这和你们无关，不归你们所有，这只和资本家有关，归资本家所有；你们应得的只是你们一天的工资，这工资也许能满足你们必不可少的需要，当然你们要过得很俭省才行。简言之，资本家买无产者的劳动力，雇佣无产者，因此资本家也就夺去无产者的劳动果实，因此是资本家剥削无产者，而不是无产者剥削资本家。

但是，为什么是资本家买无产者的劳动力呢？为什么是无产者被资本家雇佣，而不是资本家被无产者雇佣呢？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是因为工厂、土地、矿藏、森林、铁路、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变成了一小撮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是因为无产者被剥夺了这一切。所以资本家为了使工厂开工必须雇佣无产者，否则他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就不会产生任何利润。所以无产者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否则他们就会饿死。

这一切都足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性质。第一、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不能是什么统一的和有组织的生产，它完全分散成各个资本家的私人企业。第二、同样很明显，这种散漫的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生产出卖的商品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但是，因为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想多得利润，所以他们都尽量多生产商品，结果市场上商品充斥，物价下跌，普遍的危机就随之发生。

由此可见，危机、失业、生产中断、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乃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无组织性的直接结果。

这种无组织的社会制度之所以暂时还没有被摧毁，它之所以暂时还能坚强地抵抗无产阶级的攻击，首先是因为有资本主义国家保卫它，有资本主义政府保卫它。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是如此。

* * *

毫无疑义，未来的社会将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首先就是说，那里不会有任何阶级存在：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无产者，因此也就不会有剥削。那里只会有集体工作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就是说，那里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因此那里不会有劳动力的购买者和出卖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存在的余地，那里只会有自由的劳动者。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最后就是说，那里随着雇佣劳动的消灭，任何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会消灭，那里不会有贫民无产者，也不会有富翁资本家，那里只会有集体占有一切土地、一切矿藏、一切森林、一切工厂和一切铁路等等的劳动者。

由此可见，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来生产出卖的商品。这里不会有商品生产、争夺利润等等现象存在的余地。

同样很明显，未来生产将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它将顾及社会的需要，看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这里不会有生产的分散性，不会有竞争、危机和失业现象存在的余地。

凡是没有阶级的地方，凡是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地方，也就不需要国家，也就不需要压制穷人和保卫富人的政权。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马克思还在一八四六年就说道：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清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见“哲学的贫困”）

因此，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说道：

“由此可见，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会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各阶级时，国家就……成为必要的了。我们现时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再无必要，而且还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适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舘去,而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同时很明显，为了处理公共事务，社会主义社会除需要集中各种资料的地方局之外，还需要一个中央统计局来搜集有关全社会各种需要的资料，然后适当地把各种工作分配给劳动者。代表会议，特别是代表大会，也将是必要的；它们的决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占少数的同志一定要无条件地服从。

最后，很明显，自由而友爱的劳动必定使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需要都得到平等而充分的满足。这就是说，如果未来的社会要求每个成员能劳动多少就劳动多少，那末社会本身也应当根据每个人需要多少产品就给予多少产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就是未来的集体制度应借以建立起来的原则。自然，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上，既然参加新生活的还有一些不习惯于劳动的分子，生产力也没有足够地发展，而且还有“粗”工和“细”工的差别，这时要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一定大感困难，所以社会不得不**暂时**走上某一条中间道路。但同样很明显，当未来社会走上自己的轨道而资本主义残余被连根铲除的时候，上述原则就会是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原则。

因此，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说道：

“在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当迫使人们奴

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消失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后，当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其本身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当增长时……只有那时才能完全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哥达纲领批判”）

依据马克思的理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情景就是如此。

这都很好。但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可以想像的吗？可以设想人们能铲除本身的“野蛮习惯”吗？

还有，如果大家都各取所需，可以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够得上这种需要吗？

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现存资本主义所有制阻碍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估计到在未来社会中不会有这种所有制，那末显而易见，生产力一定会增长许多倍。同时还不应忘记，在未来社会中，现在的数十万寄生虫和失业者都会担任工作而补充劳动者的队伍，这样就会大大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人们的“野蛮”情感和观点，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永恒的东西：有一个时期即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是不承认私有制的；后来一个时期即个人主义生产的时期，私有制掌握了人们的情感和理性；现在一个新的时期即社会主义生产的时期快要到来，那时人们的情感和理性浸透着社会主义的意向，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存在不决定人们的“情感”和观点吗？

但是，有什么东西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建立起来呢？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要继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到来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知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美妙的理想或幻想呢？其科学证明又在哪里呢？

历史表明：所有制形式直接以生产形式为转移，生产形式一改变，所有制形式迟早也必然要改变。有一个时期，所有制具有共产主义性

质，当时原始人出没其间的森林和原野归大家所有，而不归个人所有。为什么当时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呢？因为当时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是共同的，集体的，大家共同劳动，谁也离不开谁。后来一个时期，即小资产阶级生产的时期，所有制具有个人主义的（私人的）性质，人所必需的一切（当然空气、日光等等除外）都被认为私有财产。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生产已成了个人主义的生产，每个人都藏在自己的角落里开始为自己而劳动了。最后，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成百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个场所、一个工厂里一起劳动。在这里，已看不见旧时那种自顾自、各干各的情形了，在这里，每个工人和每个车间所有的工人，在工作方面和本车间的工友、和其他车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只要某个车间停顿下来，整个工厂的工人就会无事可做。由此可见，生产过程、劳动已经具有社会性，已经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不仅个别工厂的情形是如此，整个生产部门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情形也是如此：只要铁路工人举行罢工，生产就会陷于困难的境地；只要石油和石炭的生产停顿下来，很快就会有整批的工厂关门。很明显，在这里，生产过程已具有社会的集体主义的性质了。既然占有的私人性不适合生产的社会性，既然现代集体主义的劳动必然引向集体所有制，所以不言而喻，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正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

历史就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 * *

历史告诉我们说：凡在社会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并掌握主要生产职能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经过一些时候必然成为这种生产的主人。有一个时期，即母权制时期，妇女被认为是生产的主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原始的农业中，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她们担负着主要的职能，而男子则出没于森林，寻找野兽。后来一个时期，即父权制时期，男子在生产中占统治地位了。为什么发生了这

样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以戈矛、套绳、弓箭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牧畜经济中，男子起着主要作用…… 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期到来了，这时无产者开始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一切主要生产职能都转入他们的手中，没有他们则生产一天也不能维持（且回忆一下总罢工吧），这时资本家不仅对生产无益，而且还妨碍了生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或者是一切的社会生活都要完全遭到破坏，或者是无产阶级迟早一定会成为现代生产的主人，成为这种生产的唯一所有者，成为这种生产的社会主义所有者。

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作临终祈祷并确定地提出**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现代工业危机，使这个结论完全明显，并一目了然地揭露了资本家的寄生性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历史又这样论证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悲天悯人的情感上，并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正义”上，并不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热爱上，而是建立在上述的科学根据上。

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缘故。

恩格斯还在一八七七年就说道：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根据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不合正义，认为正义总有一天定要胜利，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了……”这里最主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生产力和由这生产方式造成的财富分配制度，已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惊人的矛盾，并且矛盾到了这种程度：如果想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的话，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对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根据这个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根据某个学究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而奠定的”（见“反杜林论”）。

这当然不是说。既然资本主义已在腐朽，那只要我们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随时建立起来。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才这样想。社会主义理想并不是一切阶级的理想。这只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对实现这一理想直接关心的并不是一切阶级，而只是无产阶级。这就是说，当无产阶级还只占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旧生产形式的灭亡、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的扩大、以及社会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但是这还不够。社会大多数人可能已经无产阶级化了，然而社会主义可能还实现不了。这是因为要实现社会主义，除这一切而外，还需要无产阶级具有阶级意识，需要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并善于领导本身的事业。要获得这一切，又必须有所谓政治自由，即言论、出版、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一句话，就是必须有阶级斗争的自由。政治自由并不是到处都有同样保障的。因此，究竟无产阶级必须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斗争：在专制的农奴制条件下（俄国）、君主立宪制条件下（德国）、大资产阶级共和国条件下（法国）还是在民主共和国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党所要求的正是这种条件）进行斗争，这对无产阶级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政治自由在民主共和国里有最好的和最完全的保障，自然只限于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般能够有的保障。因此，一切拥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人都必须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把它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的“桥梁”。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现时条件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最高纲领，一部分是以开辟一条经过民主共和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目的的最低纲领。

* * *

要自觉地实现自己的纲领，要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怎样行动，应当走什么道路呢？

答案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不能靠和资产阶级妥协而达到社会主

义，它一定要走斗争的道路，而且这个斗争应当是阶级斗争，是整个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应当依据的原则。

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罢工（不论它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抵制和怠工，无疑地也是阶级斗争。游行示威、参加代表机关（无论是一般议会或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也都是阶级斗争。这一切都是同一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形式。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说明哪一种斗争形式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更大的意义，而只指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其中每一种形式都是无产阶级所绝对需要的，都是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必要手段。而觉悟性和组织性像空气一样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但也应该指出这一切斗争形式对于无产阶级都不过是**准备**手段，其中任何单独的一种形式都不是无产阶级能够借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单靠总罢工是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总罢工只能为摧毁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决不能想像无产阶级只要参加议会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利用议会斗争只能替推翻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罢了。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是什么呢？

这样的手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罢工、抵制、议会斗争、游行示威，——这一切斗争形式作为锻炼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手段是很好的。但是这些手段没有一种能够消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这一切手段集中成一个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无产阶级必须起来坚决进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种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

决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突然的、短促的打击，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群众用以击败资产阶级并夺取其阵地的长期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对战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在阶级冲**

突时期一个阶级的失败就是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应当采取的步骤。

这就是说，**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战败时**，当它的财富还没有被没收时，无产阶级一定要拥有军事力量，一定要有自己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以便用它来打退垂死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击，正如巴黎无产阶级在公社时期曾有过的那样。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无产阶级利用这种专政就能够剥夺资产阶级，并没收整个资产阶级的土地、森林、工厂、机器、铁路等等。

剥夺资产阶级，——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应当达到的结果。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就是如此。

因此，马克思还在一八四七年就说道：

“……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已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见“共产党宣言”）

如果无产阶级想要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它应走的道路。

其余一切策略观点都是由这个总原则产生的。罢工、抵制、游行示威、议会斗争等，只是在有助于组织无产阶级、有助于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

* * *

总之，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则应当从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就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以便利用它来剥夺资产阶级。

但是，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就必须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并使之不断地壮大起来。

无产阶级的组织应当采取哪些形式呢？

最普遍的群众性的组织就是工会和工人合作社（主要是生产消费合作社）。工会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工业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合作社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商业资本，用减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办法来扩大工人的消费，这当然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论工会或合作社，作为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手段，都是无产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此，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抓住这两种组织形式，巩固和加强它们，当然这要以现存政治条件所允许的程度而定。

然而，单有工会和合作社是不能满足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组织方面的需要的。这是因为上述组织不能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其目的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但工人所需要的，是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是根本打破这种范围，而不是只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兜圈子。因此，还需要一个能把**各**行**各**业工人中的觉悟分子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能把无产阶级变成觉悟的阶级、并以粉碎资本主义制度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为其最主要目的的组织。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

这个党应当是阶级的党，应当完全不依赖其他政党，——这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者只有靠自己的手才能获得解放。

这个党应当是革命的党，——这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只有用革命手段、用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

这个党应当是国际主义的党，党的大门应向每个觉悟的无产者敞开，——这是因为工人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对格鲁吉亚无产者，或是对俄罗斯无产者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都是同样重要的。

因此很明显，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得愈紧密，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民族壁垒破坏得愈彻底，则无产阶级政党就愈强大，无产阶级组成一个不可分的阶级就愈容易。

因此，必须尽可能在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中实行集中制原则，反对联邦主义的散漫性，无论党、工会或合作社都必须这样。

同样很明显，这一切组织都应当建立在民主基础上，自然要某些政治条件及其他条件不阻止这样做才行。

党和合作社、党和工会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合作社和工会应当是党的组织还是非党的组织呢？这个问题要以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斗争来决定。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无论工会或合作社，它们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愈友好，其发展就愈充分。因为这两个经济组织若不接近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往往就会琐碎化，就会只顾狭隘的职业的利益而忘记整个阶级的利益，从而使无产阶级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保证工会和合作社受到党的思想政治影响。只有这样，上述组织才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学校，把分散为各个集团的无产阶级组成为觉悟的阶级。

一般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如此。

——————————————

无政府主义者怎样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

首先必须知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单是哲学学说。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学说，是他们的旗帜，全世界无产者都尊重它，“崇拜”它。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单是什么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他们是日益发展壮大的活生生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活生生的领袖。谁要反对这个学说，谁想“推翻”它，谁就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一切，免得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这一点，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此他们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斗争时，使用着一种迥非寻

常的新武器。

这种新武器是什么呢？是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新的研究？是不是驳斥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不是！也许他们是用“新事实”和“归纳”方法武装起来，“科学地”驳斥社会民主党的“福音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吧？也不是！那末这种不寻常的手段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责备马克思和恩格斯“盗窃他人的著作”!你们以为怎样？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科学社会主义乃是一种捏造，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彻头彻尾都是从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偷来”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比的领袖”车尔凯兹施维里却神气十足地向我们讲这个滑稽故事，而有位什么拉姆斯这样一个轻率的、车尔凯兹施维里的“门徒”和我们的那些土产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如此拚命地重复这种“发现”，所以我们至少也要把这个“故事”简略地说一下。

请听听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话吧；

“‘共产党宣言’的整个理论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从孔西得朗那里拿来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合法革命民主派的这部圣经——不过是笨拙地把孔西得朗的‘宣言’改头换面一番。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抄袭了孔西得朗‘宣言’的内容，而且……甚至剽窃了个别的标题。”（见车尔凯兹施维里、拉姆斯和拉布里奥拉三人论文集“‘共产党宣言’的起源”德文版第十页）

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拉姆斯也重复着这一套：

“可以坚决地断定：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简直是一种盗窃（剽窃），一种无耻的盗窃，然而他们并不像普通的窃贼那样逐字逐句地抄，而只偷去了思想和理论……”（见同书第四页）

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号召报”、“工人报”、“呼声报”等报上面也重复着这一套。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原来是从孔西得朗“宣言”中“偷来”的。

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孔西得朗是什么人呢？

马克思又是什么人呢？

孔西得朗死于一八九三年，是空想主义者傅立叶的门生，始终是个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他认为只有阶级**调和**才能“挽救法国”。

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是唯物主义者，是**空想主义者的敌人**。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是人类获得解放的保证。

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理论。从这个理论的观点看来，社会生活的发展完全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继地主农奴制度而来的是资产阶级制度，那末这只能“归咎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制度必然产生出来。再就是，如果说继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那末这是因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样。由此就产生出资本主义毁灭和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就产生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应当在生产力的发展史中而不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探求自己的理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基础就是如此（见“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第二章）。

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讲过什么类似的话吗？孔西得朗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观点吗？

我们断定说，无论车尔凯兹施维里、拉姆斯或是我们的“号召报派”，都**没有**从孔西得朗的“民主宣言”中引出**一段**话或**一个**字来证实孔西得朗是个唯物主义者，证实他是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生活的演进的。反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孔西得朗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以空想派的唯心主义者闻名的（见波尔·路易“法国社会主义史”）。

既然这些奇怪的“批评家”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不能区别，那末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饶舌呢？为什么他们要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呢？难道是为了引入发笑吗？……

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是关于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用来夺取政权然后剥夺资产阶级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叙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策略**基础就是如此。

孔西得朗在“民主宣言”中讲过什么类似的话吗？孔西得朗承认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吗？

从车尔凯兹施维里和拉姆斯的论文（见上述文集）中可以看出，孔西得朗的“宣言”对这一点只字未提，而仅仅指出了阶级斗争是一件悲惨的事实。至于作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手段的阶级斗争，那末请看孔西得朗在其“宣言”中对这一点所说的话吧；

“资本、劳动和才干是生产的三个要素，是财富的三个来源，是工业机构的三个轮子…… 代表这三方面的三个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阶级的任务是迫使机器为资本家工作和为人民工作……这些阶级面前的…… 伟大目标是用民族统一原则把一切阶级联合起来……”（见考茨基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是剽窃”第十四页，那里从孔西得朗的“宣言”中引证了这段话）

一切阶级，联合起来！这就是孔西得朗在其“民主宣言”中所宣布的口号。

这种阶级**调和**的策略和坚决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反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策略，有什么共同点呢？

当然是没有什么共同点的！

那末，车尔凯兹施维里这伙先生们和他们的轻率的应声虫为什么

胡说呢？莫非他们把我们看成死人吗？难道他们以为我们不会使他们原形暴露吗？！

最后，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孔西得朗活到了一八九三年。他在一八四三年出版了自己的“民主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末写成了自己的“共产党宣言”。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已用欧洲各国文字再版多次。谁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虽然如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无论孔西得朗本人或他的朋友，**无论在任何地方，一次也没有**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孔西得朗“宣言”里剿窃了“社会主义”。读者，这难道不奇怪吗？

那末，究竟什么东西激起这些“归纳派的”风头家们……对不住，——“学者们”——胡说八道呢？他们究竟是用谁的名义讲话呢？难道他们比孔西得朗本人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宣言”吗？或许他们以为孔西得朗及其信徒们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但是够了…… 已经够了，因为连无政府主义者自己都没有认真地注意拉姆斯和车尔凯兹施维里的唐·吉诃德式的讨伐，这种滑稽的讨伐的可耻结局已经过于明显，用不着再去注意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批评的实质。

* * *

无政府主义者患有一种宿疾，就是很爱“批评”敌方的政党，但又不愿费一点力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些政党。我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在“批评”社会民主党人的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这样做的（见第一章和第二章）。他们讲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就拿下面一件事实来说吧。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这谁不知道呢？社会革命党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否认它的辩证方法，否认它的纲领，

否认阶级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这谁不知道呢？对于即使偶然听到一些有关“革命俄国报”（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和“火星报”（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论战的人，这种原则上的区别也应该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于那些看不出这种区别而竟叫嚷着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家”，又有什么话可说呢？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就硬说“革命俄国报”和“火星报”这两个机关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见无政府主义者文集“面包和自由”第二〇二页）。

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认识”就是如此！

说到这里，究竟他们的“科学批评”有多少根据也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种“批评”吧。

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责难”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复地说：你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你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看吧，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一点写道：

“……我们得出和……社会民主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的结论…… 我们……要达到的是自由的共产主义，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自然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作者注)要达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见克鲁泡特金“现代科学和无政府主义”第七十四页至第七十五页）

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看吧，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一点写道：

“德国社会主义者说，所有一切积累起来的财富都应当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将把这些财富交给工人团体，组织生产和交换，并注视着社会的生活和工作。”（见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第六十四页）

其次：

“集体主义者在自己的……草案中犯了……双重的错误。他们既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又要保存构成这个制度基础的两种制度：代表制和雇佣劳动制。”（见“争取面包”第一四八页）……“大家知道，集体主义……保存着……雇佣劳动。只有……代表制政府……能够做主人……”这个政府的代表“有权为大家的利益而使用从生产中获得的剩余价值。此外，在这个制度中规定出工人的劳动和受过教育的人的劳动之间的……差别；杂工的劳动在集体主义者看来是**简单**劳动，而手工业者、工程师、科学家等等则从事马克思称为**复杂**劳动的工作，并有权获得高额工资”（见同书第五十二页）。这样，工人在领取其必需的产品时，不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的比例为标准”（见同书第一五七页）。

格鲁吉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重复这一套，不过讲得更加神气十足罢了。他们中间素以鲁莽见称的就是巴顿先生。他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体主义是什么呢？集体主义，或者确切些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下述原则之上的：每个人愿做多少就做多少，或者国家规定多少就做多少，而他得到的报酬是用商品支付的自己劳动的价值……”于是，这里“必须有立法会议……（也）必须有执行机关，即阁员、各种行政人员、宪兵和侦探，如果不满分子过多，也许还要有军队”（见“号召报”第五期第六十八页至第六十九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对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责难”就是如此。

* * *

总之，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议论中得出的结论就是：

一、彷佛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非有政府不可，这个政府将以大老板的资格雇用工人，并且一定要有“阁员……宪兵、侦探”。二、彷佛照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粗”工和“细”工的区别不会消灭，那里将摈弃“各取所需”的原则而承

认“按功取酬”的原则。

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的“责难”就建立在这两点上。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这种“责难”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可以断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种场合所讲的这些话，不是糊涂，便是无耻的造谣。

请看事实吧。

马克思还在一八四六年就说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见“哲学的贫困”）

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共产党宣言”第二章）。

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写道：“国家将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所作的第一个行动——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就是它以国家资格所作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渐渐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反杜林论”）

同一位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又写道：“由此可见，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会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各阶级时，国家就……成为必要的了。我们现时正以迅速的步伐走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再无必要，而且还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归于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适得其所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而与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又重复过同样的话（见“法兰西内战”引言）。

由此可见，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乃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不会有所谓国家、政权及其阁员、省长、宪兵、警察和兵士存在的余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将是国家存在的最后阶段，那时无产阶级将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并建立自己的政府（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但是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后，在各个阶级已经消灭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后，就再不需要任何政权了，所谓国家就会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由此可见，上述无政府主义者的“责难”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诽谤。

至于“责难”的第二点，马克思说过以下的话：

“在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当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消失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当增长时……只有那时才能完全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界限，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哥达纲领批判”）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乃是这样一个制度：其中“粗”工和“细”工间的区分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矛盾已完全消除，劳动一律平等。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里没有雇佣劳动存在的余地。

显然，这一“责难”也是毫无根据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根本没有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著作，只凭道听途说妄加“批评”，或者是他们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作品，但是有意撒谎。

第一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二个“责难”就是他们否认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向我们这样说：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否认暴力革命，你们想单凭选票来建立社会主义。

请听吧：

“……社会民主党人……喜欢高谈‘革命’、‘革命斗争’、‘拿着武器斗争’等等题目…… 但是，如果你实心实意地向他们要武器的话，他们却会郑重其事地给你一张选票……”他们硬说：“革命者所宜于采取的唯一适当策略，就是和平地、合法地进行议会活动，同时宣誓忠于资本主义，忠于既有的政权和整个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见“面包和自由”文集第二十一页和第二十二页至第二十三页）

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说的也是这一套，当然是说得更加神气十足些。就拿巴顿来说吧，他写道：

“整个社会民主党……都公开宣称：用步枪和武器进行斗争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方法，党只有凭选票，只有靠普选，才能取得政权，然后经过议会多数和立法程序去改造社会。”（见“夺取国家政权”第三页至第四页）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就是这样议论马克思主义者的。

这个“责难”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说：无政府主义者在这里又表现了自己愚昧无知和热心诽谤。

请看事实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一八四七年末就写道：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地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整个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共产党宣言”。在某些公开版本的译文中遗漏了几个字。）

一八五〇年，在德国即将有新的发动时，马克思写给当时的德国同志们说：

“不论在什么借口下他们都不应当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工人**们应当……**组成一支有司令官和总参谋部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这是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注意的”（见“科伦审判记”中马克思“告共产主义者书”）

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二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 必须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也好……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一句话，要按照至今驰名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见“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我们以为这里所说的不仅是“选票”。

最后，请回忆一下巴黎公社的历史，请回忆一下巴黎公社是怎样和平地行动的，当时公社竟满足于在巴黎的胜利，放弃对凡尔赛这个反革命巢穴的进攻。你们以为马克思当时说过什么话呢？他号召过巴黎人去进行选举吗？他赞同过巴黎工人（当时整个巴黎都在工人手中）疏忽大意的态度吗？他赞同过他们对战败的凡尔赛人所表示的宽大态度吗？请听听马克思的话吧：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呀！挨了六个月的饿……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宽大’。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近卫军反动部分一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开始内战**，彷佛丑陋不堪的梯也尔在企图解除

巴黎武装时也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给库格曼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一味重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信徒们只对选票感觉兴趣，他们不承认暴力的革命行动！

可见这个“责难”也是一种诽谤，表明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为何物。

第二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 * *

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三个“责难”就是他们否认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性，把社会民主党人描写成一些官僚主义者，并且断定说：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使革命陷于灭亡，既然社会民主党人主张这种专政，那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想建立自己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请听一听克鲁泡特金先生的话吧：

“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已对专政宣告了最后判决…… 我们知道：任何专政,无论其意图怎样真诚,都会使革命陷于灭亡。我们知道……专政这个观念无非是把政府偶像化的有害产物，它……力图永远保持奴役制。”（见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第二二一页）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承认革命专政，并且他们“主张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他们对工人所以感到兴趣，只因为工人是一支被他们掌握的有纪律的军队…… 社会民主党力图利用无产阶级来把国家机器抓到自己手里”（见“面包和自由”文集第六十二、六十三页）。

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说的也是这一套：

“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主张专政的人们是国家派，他们的专政不会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自由活动，而是在社会头上建立一个现今也存在着的代表制政权。”（见巴顿“夺取国家政

权”第四十五页）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专政，不是为了促进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是为了…… **“用自己的统治来建立新的奴役制”**（见“号召报”创刊号第五页巴顿的论文）。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的第三个“责难”就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者的又一个专为欺骗读者而进行的诽谤，也是不难揭破的。

我们不在这里分析克鲁泡特金极端错误的观点，即认为任何专政都会使革命陷于灭亡的观点。这一点让我们在以后分析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时再说。现在我们只想就这个“责难”的本身谈一谈。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一八四七年末就说过，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取得政治上的专政，以便运用这个专政来打退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击并没收其生产资料，这个专政不应当是几个人的专政，而应当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专政：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 已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见“共产党宣言”）

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将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几个人对无产阶级的统治。

后来，他们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中，例如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反杜林论”等等著作中都重复过这种思想。

但是还不仅如此，为了要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要弄清楚他们认为这个专政能实现到什么程度，极有意义的就是要知道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态度。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遭到指摘，而且在包括屠夫和酒馆老板在内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在所有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庸人的人们中间都遭到指摘。下面就是恩格斯向这些庸人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话：

“近来德国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诸君，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引言）

由此可见，恩格斯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想像为巴黎公社那样的。

显然，谁想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所想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谁就应当了解一下巴黎公社。我们也来看看巴黎公社吧。如果巴黎公社真的是个别人物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末就打倒马克思主义、打倒无产阶级专政吧！但如果我们看出巴黎公社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那末……那末我们就要尽情耻笑无政府主义的诽谤家，因为他们在和马克思主义者作斗争时除了造谣之外是什么也不做的。

巴黎公社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由有名的“中央委员会”管理巴黎城内一切事情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中央委员会”任期已满而将管理权交给了刚刚选出的公社的时期。“中央委员会”是什么，它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面前摆着**阿尔努**的“巴黎公社人民史”，这部书，照阿尔努说来，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短的回答。斗争刚开始时，就有约三十万组成为中队和大队的巴黎工人选出了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组成的。

阿尔努说道：“所有这些公民（即“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是由自己的中队或大队分别选出的，知道他们的只是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小集团。这是些什么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想做些什么？”这是一个“无名的政府，差不多全由普通工人和小职员组成，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在本条街道或本事务所以外都是不知名的…… 传统被打破了。世界上发生了一种意外的事情。在那里没有一个是来自统治阶级的人。革命爆发了，代表这个革命的不是**律师**，不是**议员**，不是**新闻记者**，不是**将军**。代表革命的不是这些人，而是来自克列索的**矿工、装订工人、厨师**等等”（见“巴黎公社人民史”第一〇七页）。

阿尔努继续写道：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声明说，——是不出名的机关，是被攻击的人民手中顺从的工具…… 我们是…… 执行人民意志的仆人，我们在这里要响应人民的呼声，使人民取得胜利。人民要成立公社，我们就留下来着手选举公社。我们所要做的，不过如此而已。这些专政者没有升到群众之上，也没有降到群众之下。令人感觉到他们是和群众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群众中间，并且是依靠群众的，他们时时刻刻都和群众商量，他们听从群众的话，传达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力求用简单的形式……表达出三十万人的意见。”（见同书第一〇九页）

巴黎公社在其存在的第一个时期就是这样行动的。

巴黎公社就是如此。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讲巴黎公社的第二个时期，这时公社已经代替了“中央委员会”。阿尔努讲到为时两月的这两个时期，欢欣地说，这是真正的人民专政。请听吧：

“这里的人民在两个月内所体现出的雄伟的图画，给予我们力量和希望……正视未来。在这两个月内，巴黎有过真正的专政，有过最完备的和无可争辩的专政，不是一个人的专政，**而是**作为时局之唯一主宰的**全体人民的**专政…… 这个专政一直继续了两个多月，从三月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二日（一八七一年）……”其实“……公社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政权，它除了……公民的普遍同情外，没有其他的物质力量；**人民成了统治者**，成了唯一的统治者，人民自己创立了自己的警察和法院……”（见同书第二四二、二四四页）

积极参加过白刃战的公社社员**阿尔努**就是这样描述巴黎公社特征的。

另一个同样积极参加过公社工作的公社社员**利沙加勒**，也是这样描述巴黎公社特征的（见他的“巴黎公社史”）。

人民是“唯一的统治者”，“不是一个人的专政，而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

“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大声地对庸人们说。

你看，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像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对他们时常加以“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竟像我和读者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一样。

很明显，专政有两种。有少数人的专政，一小群人的专政，特列坡夫和依格纳切夫之流的专政，其目的是反对人民。这种专政通常由一群权奸把持，他们秘密决定问题，加紧绞杀大多数人民。

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这种专政的人，而且他们反对这种专政要比我们那些喜欢叫嚣的无政府主义者顽强得多，奋勇得多。

又有另一种专政，即无产阶级多数人的专政，群众的专政，其目的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少数人。这里领导专政的是群众，这里不容权奸立足，也不容秘密决定问题，这里一切都公开进行，在街道上进行，在群众大会上进行，这因为它是街头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是旨在反对任何压迫者的专政。

这种专政，马克思主义者是会“双手”支持的，因为这种专政是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雄伟的开端。

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把这两种互相否定的专政混为一谈，因而陷于可笑的境地：他们不是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而是和他们自己的幻想作斗争；他们不是和马克思、恩格斯搏斗，而是像不朽的唐·吉诃德当时那样同风车搏斗……

第三个“责难”的命运就是如此。（待续。）[①]

载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八日、二十五日和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新时代报”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各期
载于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我们的生活报”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各期
载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四日、五日、六日和十日“时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六各期
署名：柯……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16—269页

————————————

① 续文不曾刊印出来，因为斯大林同志在一九〇七年年中被党中央委员会调到巴库做党的工作，几个月后他在那里被捕了，而“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著作末尾几章的笔记则在被搜查时遗失了。——编者注。

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

（一九〇七年二月十日）

考茨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大家早就知道他是社会民主党的有资望的理论家。然而考茨基不仅在这方面著名，他还以切实认真、深思熟虑的策略问题研究家见称。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在欧洲同志中间，而且在我们这里也有了很高的威望。这并不奇怪：今天，当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两派的时候，当互相批评流为无谓争吵而常常把事情弄僵，阐明真理又极其困难的时候，听一听考茨基这样一位公正而有经验的同志的意见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同志如此热心地着手研究考茨基的策略论文“国家杜马”、“莫斯科起义”、“土地问题”、“俄国农民和革命”、“犹太人在俄国遭受的蹂躏”等等，就是这个缘故。可是同志们之特别重视这本书，是因为其中谈到了使社会民主党分成两派的一切主要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不久以前，普列汉诺夫请求外国同志阐明我们的各种迫切问题时，也以同样的问题请教过考茨基，请他予以相当的答复。从考茨基的话里可以看出这本书就是他的答复。既然如此，同志们自然应当更加重视。很明显，这本书对于我们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我们哪怕是大致回顾一下我们意见分歧的问题，并顺便阐明考茨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会是非常有益的。

考茨基站在哪一方面呢？他支持的是谁呢？是布尔什维克呢，还是孟什维克？

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两部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国革命的一般性质问题。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局应当是消灭封建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但试问谁来领导这个革命，谁来把人民中的不满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呢？是资产阶级呢，还是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像法国当时那样呢，还是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问题就在这里。

孟什维克通过**马尔丁诺夫**说，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是法国革命的重演，既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那末我国革命也就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有害的空想……”“无产阶级应当跟着资产阶级极端反对派走。”（见马尔丁诺夫“两个专政”）

而布尔什维克说，固然，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决不是说，它是法国革命的重演，它应当像法国那样一定要由资产阶级领导。在当时的法国，无产阶级是觉悟不高的没有组织的力量，因此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而在我国，无产阶级是觉悟较高的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它已经不满足于充当资产阶级附属品的角色，而要作为一个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当前的运动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是空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无产阶级实际上正在把不满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谁劝它“跟着资产阶级反对派走”，谁就是剥夺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谁就是把俄国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见列宁“两个策略”）。

考茨基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自由派常常引证法国大革命，却常常引证得毫无根据。现代俄国的条件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见本书第三章）……“俄国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于西欧的自由主义，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直接拿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今俄国革命的范例是非常错误的。

西欧革命运动中的领导阶级曾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见第四章）……“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的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就俄国说也已经过去了。在俄国，无产阶级不再像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是资产阶级单纯的附属品和工具，而是具有独立革命目标的独立阶级了。”（见第五章）

关于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对于无产阶级在目前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考茨基就是这样了解的。资产阶级不能够领导俄国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应当出来作革命的领袖。

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自由资产阶级是不是至少可以作为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同盟者呢？

布尔什维克说，不可以。固然自由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中曾起过革命的作用，但这是因为那里的阶级斗争没有这样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它满足于充当自由派附属品的角色；而在我国，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无产阶级的觉悟高得多，它不能满足于充当自由派附属品的角色。凡是无产阶级自觉地进行斗争的地方，自由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因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所吓倒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便想托庇在反动派的卵翼之下。因此，他们反对革命甚于反对反动派。因此，立宪民主党宁愿和反动派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却不愿和革命结成联盟。是的，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立宪民主党人是反动派的同盟者，是革命的“文明”敌人。贫农却完全不然。布尔什维克说，只有贫苦农民才会向革命的无产阶级伸出手来，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在目前革命的整个时期和无产阶级结成牢固的联盟。无产阶级也应当支持他们去反对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如果这两支主力结成联盟，如果工人和农民互相支持，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否则，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杜马内或在杜马外即在初选阶段都不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因此，布尔什维克无论在选举中

或在杜马内只支持革命的农民代表去反对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只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杜马中革命**部分**的周围，而不把他们团结在**整个**杜马的周围。因此，布尔什维克不支持任命立宪民主党人组阁的要求。（见列宁“两个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孟什维克的议论却完全不同。他们说，自由资产阶级固然摇摆于反动和革命之间，但归根到底，它仍然会靠近革命，仍然会起革命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法国自由资产阶级起过革命的作用，因为它是站在反对旧制度的立场上的，所以不得不靠近革命。依照孟什维克的意见，不能把自由资产阶级及其辩护人立宪民主党人叫做目前革命的叛徒，他们是革命的同盟者。这就是孟什维克在选举中和在杜马内都支持他们的缘故。孟什维克硬说阶级斗争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凌驾于共同斗争之上。正因为如此，他们号召人民群众团结在**整个**杜马的周围，而不只团结在杜马中革命**部分**的周围。正因为如此，他们全力支持任命立宪民主党人组阁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孟什维克甘愿把最高纲领**置**之脑后，**削减**最低纲领，并放弃民主共和制，只求不吓跑立宪民主党人。或许某些读者认为这一切都是对孟什维克的诽谤，因而要求列举事实。那末下面就是事实。

请看有名的孟什维克著作家**马里舍夫斯基**不久以前是怎样写的：

“我国的资产阶级不要共和制，所以我国是不会有共和制的……”，因而“……我国革命的结局应该产生立宪制，决不应该产生民主共和制”。因此，马里舍夫斯基劝告“同志们”抛弃“对共和制的幻想”。（见“文集第一辑”第二八八、二八九页）

这是第一点。

在选举前夕，孟什维克的领袖**切列万宁**写道：

“无产阶级如果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企图同农民一起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资产阶级以争取全权的和全民的立宪会议，那就是荒谬而

愚蠢的了。”他说，我们现在正力求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并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见“我们的事业”杂志创刊号）。

这是第二点。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写写罢了。孟什维克的另一个领袖**普列汉诺夫**却觉得写写还不够，他希望把所写的东西付诸实施。

当党内对竞选策略问题进行激烈争辩的时候，当大家问到在初选阶段可否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竟认为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还不够，而开始鼓吹直接结成联盟，鼓吹暂时和立宪民主党人**合并**。请回忆一下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九〇六年）登载着普列汉诺夫一篇短文的“同志报”吧。“同志报”的一位读者向普列汉诺夫问道，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能不能有共同纲领，如果能有的话，那末“共同的竞选纲领……会是怎样的呢？”普列汉诺夫回答说，共同的纲领是**必需的**，而且这种纲领应当是“全权的杜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另外的答复”（见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同志报”）。普列汉诺夫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话的意思不过是：在选举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应当**附和**企业主的政党（即**附和**立宪民主党），应当和它一起印刷传单发给工人，实际上应当抛弃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抛弃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而提出立宪民主党的全权杜马这个口号来代替它。事实上这就是抛弃我们的最低纲领去讨好立宪民主党人，抬高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声价。

这是第三点。

然而，普列汉诺夫说得不够大胆的地方，孟什维克的第三个领袖**华西里也夫**却特别大胆地说出来了。请听吧：

“首先让整个社会、全体公民……建立一个立宪政权，既然这个政权成了人民的，人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因阶级和利益而形成的集团

……着手解决一切问题。那时阶级斗争和集团斗争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需的…… 在目前，这种斗争却是**致命的和罪恶的**……”因此，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必须“**暂时放弃一切‘最好的纲领’而合并成一个立宪党**……”“我的建议总括起来就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作为纲领基础的是奠定一个全权的社团的始基，只有这个社团才能产生适当的杜马……”“这个纲领的内容……就是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的内阁……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等等（见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同志报”）。至于全民的立宪会议和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依照华西里也夫的意见，这一切都必须“放弃”……

这是第四点。

孟什维克的第四个领袖**马尔托夫**固然不同意孟什维克华西里也夫的意见，并因上述论文而傲慢地责骂他（见“评论”第二集）。可是普列汉诺夫对华西里也夫大加赞扬，依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华西里也夫是“瑞士工人的一个不知疲倦的和受人爱戴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他“对俄国工人的事业会有很大帮助”（见“世界”杂志一九〇六年六月号）。究竟相信这两个孟什维克中的哪一个呢？相信普列汉诺夫呢，还是相信马尔托夫？此外，难道马尔托夫本人不久以前不曾写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纷争正在加强专制制度的阵地，因而阻碍人民解放事业的成功”（见爱里马尔“人民和国家杜马”第二十页）吗？谁不知道，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就是华西里也夫所提的自由主义“建议”的真正基础呢？

可见孟什维克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迷恋到何种程度，他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抱着这么大的希望，以致为了讨好自由资产阶级而甘愿把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置之脑后。

考茨基怎样看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呢？他认为谁是无产阶级的真正同盟者呢？他对这个问题说些什么呢？

“现在（即在目前的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不再像以前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那样是资产阶级单纯的附属品和工具，而是具有独立革命目标的独立阶级了。但在无产阶级以这种姿态出现的地方，**资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的阶级了**。俄国资产阶级既然一般地是自由主义的并且执行独立的阶级政策，毫无疑义，它也就仇恨专制制度，但是它更加仇恨革命……既然它要政治自由，那末它之要政治自由，主要因为它认为政治自由是结束革命的唯一手段。由此可见，**资产阶级不是俄国当前革命运动的动力**……在革命斗争的整个时期内，只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才有利益上的牢固共同性。正是这种共同性应当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全部革命策略的基础……没有农民，我们现在就不能在俄国取得胜利。”（见第五章）

考茨基是这样说的。

我们认为这是无须解释的。

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国革命胜利的阶级实质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哪些阶级应当在我国革命中取得胜利？哪些阶级应当取得政权？

布尔什维克确认，既然目前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既然他们不互相支持就不能胜利，那末将来取得政权的就一定是他们，所以革命的胜利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见列宁“两个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

相反地，孟什维克却拒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和农民将取得政权。依照他们的意见，政权应当落到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手里，因此他们异常热心地支持成立立宪民主党的责任内阁这一口号。这样，孟什维克向我们提议的就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专政了（见马尔丁诺夫“两个专政”和“劳动呼声报” 、“我们的事业”杂志等）。

考茨基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对于这一点，考茨基直截了当地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及其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共同性。”（见第五章）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为共同的胜利而斗争，革命才会胜利，——立宪民主党人的专政是反革命的。

我们意见分歧的第四个问题是：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当然，所谓临时革命政府会自然而然产生出来，那末，社会民主党是否可以参加革命政府呢？

布尔什维克说，参加这种临时政府不仅从原则上看是容许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必要的，这是为了使社会民主党能够在那里，在临时革命政府中，严正地保护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利益。既然在街头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和农民共同摧毁旧制度，既然无产阶级要和农民一起流血牺牲，自然，无产阶级就应当和农民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把革命引导到预期的结局（见列宁“两个策略”）。

孟什维克则拒绝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他们说，这是社会民主党所不能容许的，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是不适合的，这似乎会葬送无产阶级（见马尔丁诺夫“两个专政”）。

对于这一点，考茨基说些什么呢？

“很可能，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社会民主党会得到胜利……”但这并不是说，“俄国所经历的革命能立刻在俄国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使革命**把政权暂时交给了社会民主党**”。（见第五章）

由此可见，在考茨基看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不仅是可以容许的，甚至可能把“政权暂时”完全转到社会民主党一党手里。

这就是考茨基对于我们意见分歧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最大的理论家考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点连孟什维克也不否认，不用说，某些“正统的”孟什维克是要除外的。这些人大概根本没有看过考茨基的这本书。例如马尔托

夫就坦白地说：“考茨基在最后结论中是同意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列宁同志及其同道者的。”（见“评论”第二集第十九页）

这就是说，孟什维克**不同意**考茨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考茨基**不同意**孟什维克。

那末，究竟谁同意孟什维克，而孟什维克到底又同意谁呢？

请看历史是怎样说明这一点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〇六年），在盐区（彼得堡）举行了一次辩论会。在辩论的时候，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司徒卢威宣称；“你们大家都将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已经被称为半立宪民主党人了。许多人都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确，普列汉诺夫现在所说的话，有许多是能够为立宪民主党人所欢迎的，只可惜在立宪民主党人陷于孤立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些话。”（见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同志报”）

请看，到底是谁同意孟什维克。

如果孟什维克也会同意立宪民主党人并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九〇七年二月十日

按该书原文刊印
署名：柯巴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2 卷第 3—11 页

经济恐怖和工人运动

（一九〇八年三月三十日）

工人的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采取同样形式的。

有过一个时期，工人和厂主作斗争就捣毁机器，烧掉工厂。那时工人说：机器，这是贫困的根源！工厂，这是压迫人的地方！既然如此，就捣毁它，烧掉它！

这是一个没有成形的、**无政府主义骚动式的冲突**时期。

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些情况：当工人对纵火和破坏的效力感到失望时，就改用“更激烈的形式”，如杀死厂长、经理、主任等等。那时工人说：机器和工厂是毁坏不完的，而且这种毁坏对工人也没有好处，但是用恐怖手段吓唬吓唬经理，使他们驯服总是可能的，既然如此，就得揍他们，使他们心惊胆颤！

这是一个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实行个人**恐怖的冲突**时期。

工人运动断然否定了这两种斗争形式，把它们抛弃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无疑地，工厂确实是剥削工人的地方，机器至今也还在帮助资产阶级扩大这种剥削，但这并不是说，机器和工厂本身就是贫困的根源。相反地，正是工厂、正是机器使无产阶级能粉碎奴隶的锁链，消灭贫困，推翻一切压迫，只是必须把它们从各个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变成人民的公共财产。

从另一方面来说，假若我们当真捣毁并烧掉机器、工厂、铁路，那末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要知道，那时生活就会变成一片荒漠，而工人首先就会没有饭吃！……

显然我们不应当捣毁机器和工厂，**如果我们真正渴望消灭贫困，那末一有可能，我们就应当占有机器和工厂**。

这就是工人运动摈弃无政府主义骚动式冲突的缘故。

无疑，经济恐怖能使资产阶级惧怕，所以它也有某种表面的“效果”。但是，如果这种惧怕是一时的，瞬息即逝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经济恐怖并非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使用，即使只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种惧怕只能是一时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我们背后没有工人的强有力的群众组织随时准备为工人的要求进行斗争并能保持住已争得的让步，那末资产阶级一时的惧怕以及因此而作的让步又能给我们什么呢？而且事实很清楚地证明，经济恐怖会取消工人对这种组织的需要，会消除工人对团结一致和独立行动的热望，因为他们有实行恐怖的英雄可以替他们行动。我们是否应当发扬工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呢？我们是否应当增进工人要求团结的愿望呢？自然是应当的！但是，既然经济恐怖会扼杀工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和团结愿望，那末，我们能不能使用经济恐怖呢？

同志们，不能！我们不应当暗中用个别的袭击去吓唬资产阶级，这种“事情”让那些有名的打手去干吧。我们应当**公开**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应当**时时刻刻**使资产阶级感到惧怕，**直到最后胜利为止**！要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不是经济恐怖，而是能引导工人去斗争的坚强的群众组织。

这就是工人运动摈弃经济恐怖的缘故。

鉴于上述种种，米尔佐也夫公司罢工工人最近通过的反对放火和“经济”杀人的决议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这个决议中，代表米尔佐也夫公司一千五百名工人的联合委员会指出焚烧锅炉房（在巴拉汉内）和由于经济关系杀死主任（在苏拉汉内）的事实，同时声明“反对这种杀人放火的斗争方法”（见“汽笛报”第二十四号）。

米尔佐也夫公司的工人就这样完全摆脱了旧日恐怖主义骚动的倾向。

他们就这样坚决地走上了真正的工人运动的道路。

我们向米尔佐也夫公司的同志们致敬，并号召全体工人同样坚决地走上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道路。

载于一九〇八年三月三十日
“汽笛报”第二十五号
本文没有署名
按报上原文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2卷第85—87页

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

（一九〇九年八月一、二十七日）

谁都知道我们党正遭遇着深重的危机。党员退党，组织缩小和削弱，各个组织彼此隔离，没有统一的党的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党病了，党正遭遇着严重的危机。

特别使党感到沉痛的第一件事是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的状态。有一个时期，我们各地的组织都有几千党员，领导几十万群众。那时党在群众中有牢固的根基。现在都不同了。各地组织已没有几千人，只剩下几十人，至多也不过几百人。至于领导几十万群众，那就更谈不上了。固然我们党**在思想上**对群众有广泛的影响，群众是认识党的，群众是尊重党的。“革命后”的党和“革命前”的党的区别首先就在这里。但是党的全部影响实在也仅限于此。单有思想上的影响，那还是非常不够的。问题在于广泛的**思想**影响限于狭隘的**组织**而不能巩固起来，——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状态的根源就在这里。只要指出彼得堡的情况，就立刻可以了解危机的全部严重性：彼得堡在一九〇七年约有八千党员，而现在连三四百人都难凑足了。至于处在同样状态中的莫斯科、乌拉尔、波兰、顿巴斯以及其他地方，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还不止此。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的各个组织彼此毫无联系，不是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而是彼此隔离。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么，高加索不知道乌拉尔在做什么，如此等等，每个地方都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严格地说，过着共同生活的统一的党，也就是我们大家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引以自豪的那个党，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正处在最严重的手工业方式的状态中。

现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一方面是“无产者报”和“呼声报”，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都没有并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系起来，不能使它们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如果以为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机关报能把早已经过小组活动阶段的党的工作连成一气，那就太奇怪了。诚然，在各个彼此隔离的组织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从思想上**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东西，——它们有一个经过革命考验的共同纲领，有经过革命肯定下来的共同的实际工作原则，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正是“革命后”的党和“革命前”的党的第二个重要区别。但这还不够。因为党组织**在思想上**的统一还远不能把党从组织涣散和彼此隔离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连党内普通的书信往来也没有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程度。至于把党真正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一）党和广大群众脱节，（二）党组织彼此隔离，——这就是党目前所遭遇着的危机的实质。

不难了解，革命本身的危机，反革命的暂时胜利，发动失败后的沉寂和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两年所享有的些微自由的完全丧失，都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原因。在革命向前推进的时候，在有自由的时候，党发展了，扩大了，巩固了。在革命退却的时候，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党就开始衰弱了。起初是知识分子脱党，随后一些最动摇的工人也脱党了。党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先进工人的成长，这局部地加速了知识分子的脱党，因为“一九〇五年知识分子”贫乏的知识已赶不上先进工人的复杂要求。

当然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将来的自由来到以前，党应当在危机中苟延残喘，像某些人错误设想的那样。要知道，第一、自由本身的到来多半取决于党是否能摆脱危机而以健壮的、新生的姿态出现，自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取得自由的条件之一是依靠组织得很好的工人政党。第二、尽人皆知的阶级斗争的法则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

组织性日益加强，必然会使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相应地加强起来。而谁都知道，先行革新我们的党——唯一的工人政党，是增强我们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组织性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自由来到以前，使党健全，使党摆脱危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全部问题在于要找出使党健全的办法，要开辟这样的途径，使党借以（一）联系群众，（二）把彼此隔离的各个组织结成统一的机体。

* * *

那末我们党怎样才能摆脱危机，为此需要采取什么办法呢？

有些人对我们说，尽量使党成为公开的党，并把它团结在公开的杜马党团的周围。但是，当最无关紧要的文化团体之类的公开机关都受到残酷压制的时候，怎能尽量使党成为公开的党呢？难道能采取放弃党的革命要求的办法吗？要知道，这是葬送党而不是革新党了！此外，既然杜马党团本身不仅脱离群众，而且脱离党组织，它又怎能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呢？

很明显，这样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混乱，使党更难摆脱危机。

另外一些人对我们说，尽量把党的职责交给工人，以便使党摆脱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无疑地，使党摆脱不需要的客人，而把职责集中在工人自己手中，这对于党的革新工作一定会大有帮助。但是同样很明显，仅仅“转交职责”，同时却保存旧的组织系统，使用老一套的党的工作方法，从国外进行“领导”，那是不能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不能把党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

显然用治标的办法是完成不了什么大事的，必须找到根本办法来根治党的疾病。

党首先苦于和群众脱节，所以无论如何要使党联系群众。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只有首先并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别为广大群众所

关心的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拿群众日益贫困的事实和资本家的进攻来说吧。大规模的歇业已像暴风似地从工人头上掠过，而缩减生产，任意解雇工人，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日，——总之，资本家的进攻，至今还在继续着。很难想像，这一切使工人多么痛苦，多么焦急，使工人和厂主间发生了多少“误会”和冲突，使工人头脑中因此出现了多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组织在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不倦地参与这一切小冲突，把这些小冲突同伟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支持群众日常的抗议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表明我们党的伟大原则。谁都应当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使“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摆脱”可诅咒的停滞状态。而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也正是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

工厂党委会就是能在群众中最有成效地开展这一工作的党的机关。参加工厂党委会的先进工人就是能把自己周围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活跃分子。不过工厂党委会必须不倦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保卫他们的日常利益，并且把这些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使工厂党委会成为党的主要堡垒，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其次，为了接近群众，还必须把党的其他更高级的组织建立得不仅适于保卫群众的政治利益，而且适于保卫群众的经济利益。党组织必须不忽略任何一个多少带有重要性的生产部门。为此就必须在建立组织时，除按照地区的原则外，还要采用按照生产部门的原则，例如把各种不同生产部门的工厂党委会按照生产部门分别组成各个不同的分区，再按照地区把这些分区联合为区等等。如果分区的数目增加得太多，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党组织却能获得坚固的基础并和群众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党组织的成分在解决危机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必须让最有经验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

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正是他们）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人经验不足，修养不够，即使最初常常跌交，那也不要紧，实际工作和较有经验的同志们的指点会扩大他们的眼界，终于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口号应当是：“给先进分子开辟更广阔的道路以参加党的各部门工作”，“给他们更广大的活动范围”！

不言而喻，先进分子除了要有做领导工作的愿望和主动性以外，还要有丰富的学识，而我国有学识的工人是很少的。这里就正用得着有经验而又积极的知识分子的帮助。必须建立一些高级的小组，即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即使每区建立一个也好，必须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切大可弥补先进分子的缺陷，而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演说家和思想领导者。同时先进分子必须在他们的工厂里经常做报告，“尽量实习”，不要因为怕在听众面前“丢脸”而裹足不前。要永远抛弃过分的谦虚和在听众面前的惶恐，要大胆勇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即使在开始时失败了也不要紧，跌一两次交，你就会像“基督履海”似地行走自如了。

总之，（一）根据那些和无产阶级总的阶级需要有关的日常需要，努力进行宣传；（二）组织并巩固工厂党委会，作为党在各区中的最重要的据点；（三）把党的最重要的职责“交给”先进分子；（四）组织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这就是使我们的组织能够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办法。

不能不指出，解决党内危机的上述办法是实际生活本身提供的。

中央区和乌拉尔早已不依靠知识分子，那里是由工人自己处理党组织的工作的。在索尔莫沃、鲁干斯克（顿巴斯）、尼古拉也夫，工人在一九〇八年印发了传单；在尼古拉也夫，除传单外，还出版了秘密的机关报。而巴库的组织，过去和现在都不断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过去和现在几乎没有放过工人和石油业主的任何一次冲突，当然，同时还进行一般的政治鼓动工作。这也就是巴库的组织直到现在还和群众保持着联系的原因之一。

党联系广大工人群众的方法就是这样。

但是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组织彼此隔离。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后一个问题。

* * *

那末，怎样把彼此隔离的各个地方组织联系起来，怎样把它们集合成一个有联系的过着统一生活的党呢？

也许可以认为时而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议就能解决这一任务，就能把各地组织联合起来。或者在国外出版的“无产者报”、”呼声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终于会把党的组织集合起来，团结起来。无疑地，不论前者或后者对于联系各地组织都有不小的作用。至少到目前为止，代表会议和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是联合彼此隔离的组织的唯一手段。但是，第一、代表会议，而且是不常举行的代表会议，只能暂时把各地组织连成一气，因而这样的联系并不像所需要的那样牢固。一般说来，在代表会议闭会期间，这种联系便断了，实际上仍旧用手工业方式进行工作。第二、至于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姑且不论它们运到国内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那它们当然落后于俄国的党的生活，不能及时觉察和触及工人所关切的问题，因而不能把我们的地方组织牢固地连在一起。事实证明：自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党虽能召开两次代表会议，在国外出版了几十期机关报，但是我们的组织之联结成一个真正的党这一事业，危机之解决这一事业，还只是勉勉强强地进展

了一点。

因此，代表会议和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对于党内的联系虽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对于克服危机，对于牢固地把地方组织联合起来还是不够的。

显然，需要治本的办法。

只有办一个全国性的报纸，使这个报纸成为联系党的各种工作的中心并在俄国国内出版才是治本的办法。

只有在共同的党的工作中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来综合地方组织的经验，然后把已经概括起来的党的经验推广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那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工作。而全国性的报纸正可能成为这样的中心，即领导党的工作、统一和指导党的工作的中心。但是这个报纸为了能真正领导工作，必须使各地把各种询问、声明、信件、通讯、控诉、抗议、工作计划、群众所关切的问题等等源源不断地寄给它，使这个报纸和各地保持最密切最牢固的联系，从而使这个报纸掌握足够的材料，能及时觉察、触及并阐明必要的问题，根据这些材料作出必要的指示，提出必要的口号，并使这些指示和口号成为全党和一切组织的武器……

没有这些条件，党的工作就失去了领导；党的工作没有领导，就不能把各个组织牢固地团结成一个整体！

正因为如此，我们着重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在国外出版的）报纸，正是起领导作用的（而不仅仅是通俗的）报纸。

不用说，能负责创办和领导这种报纸的唯一机关就是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工作这一任务本来就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但这个任务现在执行得不好，结果使地方组织几乎完全陷于分离状态。办得很好的全国性的报纸确能成为中央真正团结党和领导党的工作的最有效的工具。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中央从有名无实的核心变为名副其实的全党的核心，变为真正把党连成一气并真正在党

的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核心。因此，创办和领导全国性的报纸是中央委员会直接的任务。

总之，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报纸，使它成为把全党联合起来并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机关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克服党所遭遇的危机的办法。

现在把上面所说的总结一下。由于革命的危机，党内也发生了危机——党组织失掉了和群众的牢固联系，党分成了一些单独的组织。

必须使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这是地方的任务。必须使上述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彼此联系起来，这是中央的任务。

为了解决地方的任务，在进行一般政治鼓动的同时，必须根据迫切的日常需要来进行经济鼓动，经常参与工人的斗争，建立并巩固工厂党委会，把党的职责尽可能集中在先进工人的手中，组织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来培养坚定而有学识的工人领袖。

为了解决中央的任务，必须创办一个能把地方组织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起来并且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全国性的报纸。

只有解决了这两个任务，党才能摆脱危机而以健壮的新生的姿态出现；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党才能扭负起英勇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名副其实的先锋队这一重大使命。

克服党内危机的办法就是这样。

不用说，党愈能充分利用它周围的各种合法机会——从杜马讲坛和工会直到合作社和丧葬基金会，就愈能迅速地完成克服危机的任务，完成革新和健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

载于一九〇九年八月一日和二十七日
“巴库无产者报”第六号和第七号
本文没有署名
按报上原文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2卷第111—118页

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

（高加索来信）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在使取消派代表会议流芳百世的一系列决议中，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决议也占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请看这项决议：

“据高加索代表团报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各地组织的最近一次代表会议和这些组织的机关刊物都表达了高加索同志们的一个意见，即必须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代表会议在听取了这个报告以后，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认定对党纲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这样解释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并希望把民族问题列入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议程。”

这个决议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表现了取消派对已经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显出机会主义的模棱态度，它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这个决议简直是字字珠玉。

例如，决议中声明说，代表会议“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但加以“认定”并作出决定，这是多么珍贵？要知道只有在轻歌剧里才能这样作出“决定”！

又如这样的话，“对党纲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这样解释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真是耐人寻味！党纲的这一条（第九条）说到各民族的自由、各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和党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责任。一般说来，按照这一条的原意，民族权利是不应当受到限制的，是可以一直扩大到实行自治制和联邦制，甚至实行分离制的。这是不是说，某一民族，不管它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拥护中央

集权制或决定实行分离制，对党来说都是无所谓的,都是同样好的呢？这是不是说，仅仅根据一项抽象的民族权利，“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就可以建议（哪怕是间接地）一些民族实行自治制，另一些民族实行联邦制，再一些民族实行分离制呢？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但这是不是说，党就不应当影响民族的意志去作最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决定呢？党赞成宗教信仰自由，赞成人们有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党将拥护波兰的天主教、格鲁吉亚的正教、阿尔明尼亚的格列高里教[①]而不和这一类的世界观作斗争呢？…… 而且党纲第九条和民族文化自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可能互相“抵触”，就像海奥勃斯的金字塔[②]和臭名远扬的取消派代表会议可能互相“抵触”一样，这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可是要知道代表会议正是用这种圆滑的手腕去“解决”问题的。在取消派上述决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高加索取消派在思想上的混乱，他们背弃了高加索旧日的国际主义旗帜而使代表会议通过了这项决议。

高加索取消派转到民族主义方面去并不是偶然的。取消党的传统，这是他们早已开始了的。废除最低纲领的“社会部分”，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见“辩论专页”第二号），宣布秘密的党是附属合法组织的辅助组织（见“日志”第九期），这一切都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现在又轮到民族问题上来了。

高加索组织从刚产生时（九十年代初）起就具有严格的国际主义性质。格鲁吉亚的、俄罗斯的、阿尔明尼亚的和回民的工人结成统一的组织，同心协力对敌斗争，——这就是当时党的生活情形…… 一九〇三年，给高加索联盟奠定了基础的高加索（实际上是南高加索）

———————————————

① 格列高里教会是阿尔明尼亚基督教最早的组织之一，因该教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个大主教是格列高里，故名格列高里教。——译者注

② 该金字塔是埃及国王海奥勃斯时建筑的，故称。——译者注

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再次宣布按国际主义精神建立组织的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从那时起，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就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了。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本族的”民族主义者，同民族民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进行了斗争；阿尔明尼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本族的”达什纳克党人进行了斗争；回民社会民主党人同大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斗争。而且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在反对这些分子的斗争中不分党内派别，扩大并巩固了自己的组织…… 一九〇六年，在高加索区域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冒出个民族文化自治的问题来。一小撮库泰依斯人把它提出来并要求作正面的决定。照当时的说法，问题“被断然否决了”，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就是以柯斯特罗夫和本文作者为代表的两派都同样激烈地反对它。当时作了决定：所谓“高加索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最符合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高加索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是的，一九〇六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以后的几次代表会议上都曾一再申述此项决议，无论是孟什维克的或布尔什维克的、公开的或秘密的高加索报刊都维护它并广泛地传播它……

可是，到了一九一二年，“原来”“我们”也需要民族文化自治了，当然（当然！）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发生什么变化了吗？也许是高加索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降低了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末在工人之间树立民族组织的和“文化的”壁垒是最不明智的了！也许是高加索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末又该怎样称呼那些人为地竖起并巩固正在瓦解着的谁也不需要的壁垒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呢？…… 那末，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农民的库泰依斯拖走了梯弗里斯的“社会民主党的十月党人”。高加索取消派的活动今后将由被黩武的民族主义所吓倒的库泰依斯农民来支配。高加索的取消派挡不住民族主义的浪潮，他们已经失掉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且……去“随着”民族

主义的“浪潮”起伏，并把最后的财富扔到海里：“去它的吧，多么无用的东西。”……

但是，说了第一的人，必然要说第二，因为一切东西都有自己的逻辑！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回民和其他取消派的政党都将附和高加索取消派所提出的格鲁吉亚的、阿尔明尼亚的、回民的（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自治了。结果就不是共同的组织，而是按民族划分的单独组织，可以说就是格鲁吉亚的、阿尔明尼亚的和其他的“崩得”。

高加索取消派先生们不正是把民族问题的“解决”引到这个方向去吗？

好，我们但愿他们拿出勇气，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使他们相信，高加索组织中的另一部分人，即格鲁吉亚、俄罗斯、阿尔明尼亚和回民组织中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将坚决地和民族主义取消派的先生们，和这些背叛了光荣的国际主义旗帜的高加索叛徒们一刀两断。

载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二日（二十五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三十号
署名：科·斯大·
按报上原文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2卷第216—219页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一九一三年一月）

俄国的反革命时期不仅带来了“雷鸣电闪”，而且带来了对运动的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的怀疑顾虑。从前人们相信“光明的未来”，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进行斗争：共同的问题高于一切！后来人们心中发生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让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问题”高于一切！

同时国内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九〇五年不是白白过去的：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又受到了一次打击。连年饥荒之后的几次丰收和接着到来的工业高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增长，商业和交通的发展，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种情形在边疆地区尤其显著。可是这种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国各民族内部经济团结的过程。于是这些民族必然要行动起来……

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宪制”也起了唤醒各民族的作用。报纸和一般书刊的增多，出版事业和文化机关的某些自由，人民剧院的发展等等，无疑地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杜马及其选举运动和政治集团给各个民族的活跃造成了新的机会，给各个民族的动员造成了新的广阔场所。

可是从上层掀起的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权人物”用来报复“爱好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逆流，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锡安主义的加强，波兰的沙文主义的增长，鞑靼人中大伊斯兰主义的盛行，阿尔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一般庸人的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

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不受一般“时疫”的传染。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来势愈汹涌，社会民主党争取俄国各民族无产者友爱团结的呼声就应当愈响亮。各边疆地区直接接触到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点上需要有特别的坚定性。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各边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崩得从前强调共同的任务，现在却把它自己特殊的纯粹民族主义的目的放在首位，甚至把“过安息日”和“承认行话”当做自己竞选纲领中的战斗性条文①。高加索也步崩得的后尘：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从前曾和其余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否定过“民族文化自治”，现在他们却把它当做迫切的要求提了出来②。至于取消派代表会议用外交手腕批准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③就更不用说了。

由此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已经明白的。

显然，对于民族问题还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和全面的讨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一致努力消除民族主义的迷雾，不管这种迷雾来自何方。

——————————————

① 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著者注

② 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著者注

③ 同上。——著者注

一 民 族

民族是什么呢？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剌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

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

总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然而并非任何一个稳定的共同体都是民族。奥国和俄国也是稳定的共同体，但是谁也不称它们为民族。民族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区别是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语言不可，国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奥国境内的捷克民族和俄国境内的波兰民族不能没有各该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而奥国和俄国内部有许多种语言的事实并不妨碍这两个国家的完整。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官场的文牍语言。

总之，**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当然不是说不同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语言，也不

是说凡操着同一语言的人们一定是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没有一个民族会同时操着几种不同的语言，但并不是说不能有两个民族操着同一语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操着同一语言，但他们毕竟不是一个民族。挪威人和丹麦人，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也是如此。

但是，像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却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什么道理呢？

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上。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上，即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上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总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单有共同的地域还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英国和北美之间没有这种联系，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发达等等而联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那末北美利坚人本身也就不配叫做民族。

就拿格鲁吉亚人来说吧。改革时期以前的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上，操着同一语言，可是严格说来，他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彼此破坏，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来自相残杀。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而且在格鲁吉亚经济分

散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这样…… 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格鲁吉亚才成为民族，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格鲁吉亚各个区域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联成一个整体。

其他一切度过了封建制度阶段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民族也是如此。

总之，**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英吉利人、北美利坚人和爱尔兰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当然，心理素质本身，或者像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

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总之，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这样，我们就说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

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末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例如俄国的、加里西亚的、美国的、格鲁吉亚的和高加索山区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末他们仍然不是一个民族。例如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的日耳曼人和拉脱维亚人就是如此。

最后，挪威人和丹麦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可是由于缺少其他特征，他们也就不是一个民族。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也许有人会觉得“民族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其他一切特征其实都是民族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征。例如有名的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家石普林格尔，特别是鲍威尔，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他们的民族理论吧。

在石普林格尔看来，“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民族是“由一群现代人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①]（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总之，就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不管他们彼此怎样隔离，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鲍威尔却扯得更远了。

他问道：“什么是民族呢？它是不是那种把人们联合为民族的语言共同体呢？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操着同一语言，却不是统一的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②]

那末，民族究竟是什么呢？

————————————————

①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一九〇九年“公益”出版社版第四十三页。——著者注

“民族就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③

然而性格（这里讲的是民族性格）又是什么呢？

民族性格是“一族人区别于另一族人的种种特征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的总和”④。

鲍威尔当然知道民族性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他补充说：“人们的性格无非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而共同的命运又是“由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分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所处的情况决定的”⑤。

于是，我们就得出如鲍威尔所说的最“完备的”民族的定义了。

“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们的全部总和。”⑥

总之，就是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却并不一定和共同的地域、语言以及经济生活相联系。

这样一来，试问民族还剩下什么东西呢？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世世代代都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还谈得上什么民族共同体呢？

鲍威尔说犹太人是个民族，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⑦，可是，例如格鲁吉亚的、达格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

———————————————

②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九年“镰刀”出版社版第一页至第二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六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二页。——著者注

⑤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九年“镰刀”出版社版第二十四页至第二十五页。——著者注

⑥ 同上，第一三九页。——著者注

⑦ 同上，第二页。——著者注

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

这些犹太人无疑地和格鲁吉亚人、达格斯坦人、俄罗斯人以及美利坚人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文化的薰陶，这就不能不给他们的民族性格打上烙印；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什么相同之处，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残余。这一切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怎能认真地说，僵化的宗教仪式和日渐磨灭的心理残余会比这些犹太人所处的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环境更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命运”呢？要知道，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才可以说犹太人一般地是个统一的民族。

那末，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

鲍威尔在民族“特点”（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条件”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它们彼此隔离开来。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条件的反映，不是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那又是什么呢？怎能仅限于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由产生的根源割断分开呢？

其次，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当北美还叫做“新英吉利”的时候，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坚民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不是民族性格上的区别，因为北美利坚人是从英国迁移过去的，他们带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语言以外，还有英吉利的民族性格，虽然他们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大概已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但他们当然不会很快就丧失其英吉利的民族性格。当时他们和英吉利人在性格上虽然还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点,但他们究竟已经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一个民族了！显然，当时“新英吉利”民族不同于英吉利民族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民族性格，或者与其说是特别的民族性格，倒不如说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特别环境和生活条件。

由此可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个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

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

鲍威尔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成一个东西，这样就使民族脱离了它的根基，把它变成了不见形迹的独立自在的力量。结果就不是有生命的活动着的民族，而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的东西。试问，——我重说一遍，——像格鲁吉亚的、达格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

不，社会民主党不是为这种纸上的“民族”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的。它只能承认那些活动着的、运动着的、因而使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真正的民族。

鲍威尔显然把**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和**部落**这一人种志范畴混淆起来了。

不过，鲍威尔本人大概也觉得自己的立论是有弱点的。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虽然坚决地说犹太人是一个民族[①]，但他在该书末尾就自行修正，肯定说“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让他们（犹太人）保全为一个民族”[②]而使他们受其他民族的同化。其所以如此，原来是“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③]，例如捷克人却有这样的地区，因此，鲍威尔认为捷克人一定能保全为一个民族。简言之，原因就在于没有地域。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九年“镰刀”出版社版第二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三八九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三八八页。——著者注

鲍威尔如此推论，原想证明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①]，他这样一来却无意中驳倒了他自己那种否认共同地域是民族特征之一的理论。

可是鲍威尔扯得很远。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坚决地说：

“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②] 可是他刚刚写到第一百三十页就改变了阵线而同样坚决地说：**“无疑地，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③]（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鲍威尔在这里原想证明“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④]，但他同时无意中证明了他不想证明的东西，证明了自己那种否认共同语言的意义的民族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二 民族运动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

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一般的情况。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九年“镰刀”出版社版第三九六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二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一三〇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一三〇页。——著者注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国，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日耳曼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国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匈牙利，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坚——马札尔人，于是他们成了匈牙利的统一者。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民族的使命。

东欧的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展、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

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相继出现，各民族在经济上逐渐团结起来。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动作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哈斯拉特（奥国国会）和杜马（俄国国会）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

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

奥国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等等，俄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阿尔明尼亚人等等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在西欧（爱尔兰）是例外的，在东欧却成了通例。

西欧的爱尔兰用民族运动回答了这种例外的情形，东欧已觉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这样回答。

推动东欧各个年轻民族去进行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

资产阶级是主角。

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

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①]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量”既日趋统一，限制“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不仅为了追求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追求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但结果都是一样：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种场合总是联合一致的，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情形都是如此。

——————————————

① “只捉不放”是形容沙俄时代警察专横的成语，出自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篇中描写一警察名梅穆列佐夫者，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译者注。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触犯了他们，引起他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民族运动的力量决定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

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他们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像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末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阿尔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阿尔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阿尔明尼亚的民族主义。

以这些因素为转移，民族运动可能具有群众性而愈益扩展起来（爱尔兰、加里西亚），也可能变成一连串的小冲突，流为无谓的争吵和争取用本族文字写招牌的“斗争”（波希米亚的某些小城市）。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决定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自己的”官吏或组织自己的议会。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中

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语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鲍威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性格”这一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性格”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可捉摸的，石特拉塞尔说得对，“政治家对它是奈何不得的”①。

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但决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他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还被禁止入学读书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

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能转移广大阶层的视线，使之漠视社会问题，漠视阶级斗争问题而只注意民族问题，注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末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加重了工人们挣脱这种束缚的困难。

———————————————

① 见石特拉塞尔《Der Arbeiter und die Nation》（“工人和民族”）一九一二年版第三十三页。

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当然，后者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可能实现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高加索和南俄有过不少例子。“分而治之”，——这就是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灾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最大的阻碍。

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国际主义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他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他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维护民族的任何要求。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

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在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族斗争、继续并加紧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

正因为如此，鲍威尔提出的所谓“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策。鲍威尔企图把自己的“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现代工人阶级的”政策等量齐观[①]，就是企图使工人的阶级斗争适应民族斗争。

民族运动实质上既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消除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三 问题的提法

民族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事情，当然，也不能侵犯其他民族的权利。这是无可争辩的。

但是，如果注意到民族中多数人的利益，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

————————————

① 见鲍威尔那本书第一六六页。——著者注

那末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民族未来的宪法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呢？

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这样做，也不是说自治制或分离制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例如，南高加索的鞑靼民族尽可召开本族的议会，并在本族地主和毛拉[①]的摆布之下恢复他们的旧制度，尽可决定从俄国分离出去。根据民族自决的条文，他们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但这对鞑靼民族的劳动阶层是否有利呢？社会民主党能否漠不关心，听任地主和毛拉领着群众去解决民族问题呢？难道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干预这种事情，不应当给民族意志以一定的影响吗？难道它不应当提出最有利于鞑靼群众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吗？

但是如何解决才最符合于劳动群众的利益呢？自治制，联邦制，还是分离制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根据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的。

不仅如此，条件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是完全不可以采纳的。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曾主张俄属波兰分离，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问题是要把较高的文化从破坏它的那种较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当时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理论上的问题，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实践中、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十九世纪末叶，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却反对波兰分离，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近五十年来俄国和波兰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接近起来了。此外，在这个时期，分离问题已由实践

————————————————

① 毛拉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其中有的兼教长职），我国一般称阿訇。——译者注。

的问题变成至多只能引起国外知识分子注意的学院式的争论问题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此就不会出现某种内部和外部的情况，使波兰分离问题又成为迫切的问题。

由此可见，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

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便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一问题的唯一关键。同时，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

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崩得所创始的那种很流行而又很笼统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我们所指的是有人轻率地拿奥国社会民主党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①]做榜样，说它们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要抄袭它们的解决方法就行了。同时，他们竟以为凡在奥国是正确的东西，在俄国也是正确的。他们忽略了这方面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整个俄国的和俄国境内每个民族生活中的具体历史条件。

例如，请听听有名的崩得分子柯索夫斯基的话吧：

“当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到这一问题（指民族问题而言。——斯大林注）的原则方面时，代表大会中的一位代表根据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精神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博得了全体的赞同。”[②]

结果，“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民族自治。

如此而已！既没有分析俄国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弄清俄国境内犹

——————————————

① 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是在奥国南部进行工作的。

② 见柯索夫斯基“民族问题”一九〇七年版第十六页至第十七页。——著者注

太人的生活条件，首先抄袭了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解决方法，接着“赞同了”，然后“一致通过了”！崩得分子就是这样提出并“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的……

然而奥国和俄国的条件完全不同。因此，奥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九年在布隆代表大会上根据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精神通过民族纲领（固然有一些小小的修正）时，根本就不是俄国式地考虑问题，当然也就不会俄国式地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问题的提法。主张民族文化自治的奥国理论家、布隆民族纲领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解释者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

石普林格尔说：“对于多民族的国家一般能否组成，或具体地说，奥国各民族是否不得不组成一个政治整体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不来回答：我们应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不同意上述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人们看来，我们的研究当然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题是：这些民族**不得不**共同生活；什么样的**法权形式**才能使他们**生活得最好**呢？”（着重号是石普林格尔加的）①

总之，出发点就是奥地利国家的完整。

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

“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奥国各民族将仍然留在他们现时居住的国家联盟以内，于是我们就要问，在这个联盟范围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和他们全体对于国家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呢？”②又是把奥国的完整列在第一位。

俄国社会民主党能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呢？不，不能。其所以不能，在于它一开始就主张民族自决，根据这种主张，民族有分离权。

————————————

①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十四页。——著者注

②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九九页。——著者注

甚至崩得分子哥里德勃拉特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放弃民族自决的主张。当时哥里德勃拉特说：

“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为独立而斗争，那就不要阻拦它；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正式婚姻’，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妨碍它。”

这都是事实。可是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奥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出发点不仅不同，而且根本相反。既然如此，还说得上抄袭奥国人的民族纲领吗？

其次，奥国人是想用微小的改良、缓慢的步骤来实现“民族自由”的。他们提出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实际办法时，完全没有指望根本的改变，没有指望他们远景中所没有的民主解放运动。然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自由”的问题和可能的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和民主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理由指望改良。这就使俄国各民族可能的命运问题发生根本的变化。

鲍威尔说：“当然很难设想民族自治是靠一个重大的决定，靠大胆的坚决行动就可以实现的。奥地利将逐步走向民族自治，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是艰苦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立法和行政事宜将陷于慢性的麻木状态。不，新的国家法权制度决不是通过一次伟大的立法行动就建立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为各别区域、各别村社而颁布的许多各别的法律才能实现的。”①

石普林格尔所说的也是如此。

他写道：“我清楚地知道这种机关（民族自治机关。——斯大林注）不是一年也不是十年可以建立起来的，单是为了改组普鲁士的行政管理机构就用了很长的时间…… 普鲁士用二十年才完全建立了自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四二二页。——著者注

己的主要行政机关。因此，请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奥地利要用多少时间，要克服多少困难吧。”①

这一切都是很明确的。但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否不把民族问题和“大胆的坚决行动”联系起来呢？他们能否指望局部的改良，指望“许多各别的法律”作为争取“民族自由”的手段呢？既然他们不能而且不应这样做，那末从这里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国人的斗争方法和前途与俄国人完全不同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局限于奥国人那种片面的不彻底的民族文化自治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主张抄袭的人不指望俄国有“大胆的坚决行动”，或者是他们虽指望有这种行动，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最后，俄国和奥国当前的任务完全不同，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奥国生存在国会制度的条件下，目前那里没有国会就不能有什么发展。可是奥国的国会生活和立法工作往往因各民族政党间的剧烈冲突而完全陷于停顿。这就是奥国早已患慢性政治危机病的原因。因此，民族问题在那里是政治生活的轴心，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无怪乎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首先竭力设法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当然是以现存的国会制度为基础用国会方法去解决的……

俄国的情形却不是这样。第一、在俄国，“谢天谢地，没有国会”。第二、这是主要的，俄国政治生活的轴心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因此，俄国问题的命运即各民族“解放”的命运在俄国是和解决土地问题，即和消灭农奴制残余亦即和国家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说明为什么俄国的民族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而是总的和更加重要的全国解放问题中的一部分。

石普林格尔说：“奥国国会之所以没有成果，只在于每一种改良都在各个民族政党内部引起矛盾而使这些政党的团结受到破坏，于是

——————————————

① 见石普林格尔 “民族问题”第二八一页至第二八二页。——著者注

各政党的领袖对于一切带有改良气味的东西都竭力回避。奥国的进步只有在各民族都获得不可剥夺的法权地位时才谈得上；这样就使各民族不必在国会里保持常备的战斗队伍，使各民族有可能去解决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任务。”①

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

“民族和平首先是国家所需要的。一个国家决不能容忍立法工作因极无聊的语言问题，因民族境界上某个地方某些气愤的人彼此发生一些极小的争执，因每设立一所新的学校而陷于停顿。”②

这都是很明白的。但是民族问题在俄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这也是很明白的。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

总之，有不同的问题提法，有不同的前途和斗争方法，有不同的当前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顾空间时间而“解决”民族问题的书蠹才会拿奥国做榜样，才会抄袭他们的纲领，这难道不明显吗？

再说一遍：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问题当做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四 民族文化自治

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奥国民族纲领的形式方面，谈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简单地模仿奥国社会民主党和简单地采用它的纲领的那种方法论上的根据。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纲领的实质。

那末，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是怎样的呢？

一句话，这个纲领就是民族文化自治。

———————————————

①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三十六页。——著者注

②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四〇一页。——著者注

第一、这就是说，自治权不是给予主要是住着捷克人或波兰人的捷克或波兰，而是给予一般的捷克人和波兰人，不分地域，不管他们居住在奥国什么地方，都一律给予。

因此，这种自治就叫做**民族**自治，而不叫做地域自治。

第二、这就是说，分散在奥国各地的捷克人、波兰人、日耳曼人等等都以个人资格分别组成完整的民族，并以这样的民族的资格加入奥地利国家。这样，奥地利将不是由各自治区域组成的联盟，而是由不分地域建立起来的各自治民族组成的联盟。

第三、这就是说，为着这种目的而应当替波兰人、捷克人等等建立起来的全民族机关将只管“文化”问题，不管“政治”问题。专门政治性的问题都集中在全奥国会（莱哈斯拉特）手中。

因此，这种自治还叫做**文化**自治，民族文化自治。

下面就是一八九九年奥国社会民主党在布隆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原文[①]。

纲领上先提到“奥国民族纠纷阻碍着政治进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首先是文化上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制建立起来的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才能得到解决”。然后说：

“只有在完全平等和没有任何压迫的条件下，奥国各民族的**民族特点**[(2)]**的保存和发展**才有可能。因此，首先必须摈弃官僚政治的国家

———————————————

① 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代表也曾投票拥护这个纲领。见“党的布隆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九〇六年版第七十二页。——著者注

② 在帕宁的俄译本中，“民族特点”译成了“民族个性”（见鲍威尔此书帕宁译本）。帕宁把这个地方译错了，因为在德文原本上并无“个性”一词，那里所说的是《nationalen Eigenart》，即民族特点，而这和“民族个性”是完全不同的。——著者注

集权制和各个领地上的封建特权。

在这种条件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消除奥国的民族纠纷而建立民族秩序，其原则如下：

一、奥国应改组为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

二、应组成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团体来代替历代的皇朝封地，每个团体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手续选举出来的民族议院掌管。

三、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四、少数民族的权利由帝国国会颁布特别法律加以保障。”

纲领的结语号召奥国各民族团结起来[①]。

不难看出这个纲领中还留下一些“地域主义”的痕迹，但它大体上是民族自治的纲领。无怪乎第一个鼓吹民族文化自治的石普林格尔热烈地欢迎这个纲领[②]。鲍威尔也赞同这个纲领，称它为民族自治的“理论上的胜利”[③]；不过为了更明确起见，他才提议用更确定的条文代替第四条，其内容是说必须“把每个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组成公法团体”来掌管学校及其他文化事宜[④]。

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就是如此。

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的科学根据。

我们来看看奥国社会民主党是怎样论证它所鼓吹的民族文化自治的。

我们来看看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家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的意见吧。

——————————————

① 见布隆一八九九年《Verhandlungen des Gesammtparteitages》（“党代表大会的讨论”）。——著者注

②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二八六页。——著者注

③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五四九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五五五页。——著者注

民族自治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民族是和固定的地域无关的人们的联盟。

石普林格尔说：“民族和地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联系，民族是自治的个人联盟。”①

鲍威尔也说民族是“不在某个固定区域内独占统治的”“个人的共同体”②。

但组成一个民族的那些人并不总是密集在一个区域里的，他们往往分成许多集团而搀杂在别的民族机体中。这是资本主义驱使他们到各个区域和城市去谋生的缘故。可是这些集团既然搀杂在别的民族区域，并在那里占少数，于是在语言、学校等方面就会受到人数众多的当地民族的限制。由此就产生了民族冲突。由此就证明地域自治是“毫无用处的”。照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的意见，摆脱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把这个散处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组成一个共同的包括各阶级的民族联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才能消除民族纠纷。

石普林格尔说：“必须使各民族有正确的组织，必须给它们以权利和义务”③…… 当然，“法律是容易制定的，但它是否能发生人们所预期的作用呢？”…… “要想给民族制定法律，首先就要把这些民族建立起来”④…… “不组成民族便不能建立民族法制和消除民族纠纷”⑤。

鲍威尔也是这样说的，他借口“工人阶级的要求”，提议“根据

———————————————

①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十九页。——著者注

②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二八六页。——著者注

③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七十四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八十八页至第八十九页。——著者注

⑤ 同上，第八十九页。——著者注

个人原则把各个少数民族组成一些公法团体”①。

但是，怎样组织民族呢？怎样确定某人属于某个民族呢？

石普林格尔说：“用民族名册来确定某人属于某个民族，居住在一个区域的每个人都应当声明自己属于某一民族。”②

鲍威尔说：“个人原则的前提是根据成年公民的自由声明按民族划分居民……”为此就“应当编制民族名册”③。

其次。

鲍威尔说：“居住在单一民族区内的一切日耳曼人以及登记在杂居区的民族名册上的日耳曼人共同组成一个日耳曼民族，并选出民族委员会。”④

应该说，捷克人、波兰人等也是如此。

石普林格尔说：“**民族委员会**就是民族文化议会，它有权规定原则并批准经费，借以照管民族学校事宜，照管民族文学、艺术和科学，借以建立学院、博物馆、美术陈列馆、剧院”等等⑤。

民族组织及其中央机关就是如此。

照鲍威尔的意见，奥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这种包括各阶级的机关是想“使民族文化……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并且用这种唯一可能的办法**把民族的全体成员团结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⑥（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一切只和奥国有关。但是鲍威尔不以为然。他坚决认定在其他和奥国一样是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里，也必须实行民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五五二页。——著者注

②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二二六页。——著者注

③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六八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三七五页。——著者注

⑤ 见石普林格尔“民族问题”第二三四页。——著者注

⑥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五五三页。——著者注

族自治。

鲍威尔认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中的无产阶级都应当提出自己的民族自治的要求去对抗有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即夺取政权的政策”①。

然后，鲍威尔悄悄地用民族自治替换了民族自决而继续说：

“这样，民族自治，民族自决，就必然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各族无产阶级的立宪纲领。”②

但他还不以此为限。他深信他和石普林格尔所“成立”的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雏形。因为他知道“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把人类分成一些以民族为界限的团体”③；在社会主义时代，“人类将分成一些民族自治团体”④；“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社会无疑地是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⑤；因此“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是民族原则和民族自治的最高综合”⑥。

大概够了……

在鲍威尔和石普林格尔的著作中就是这样论证民族文化自治的。

最惹人注意的首先是他们用民族自治来替换民族自决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毫无理由的做法。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鲍威尔不懂得自决是什么，或者是他懂得，但不知他为什么竟故意把它缩小了。因为毫无疑义：（甲）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为前提的，自决却超出了这种完整的范围；（乙）自决是赋予民族以全部权利的，民族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三七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三三三页。——著者注

③ 同上，第五五五页。——著者注

④ 同上，第五五六页。——著者注

⑤ 同上，第五四三页。——著者注

⑥ 同上，第五四二页。——著者注

自治却只限于“文化”权利。这是第一。

第二、将来内外情况完全可能配合成这样，那时某一民族会决定退出多民族的国家，例如退出奥国，——小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的布隆代表大会上就曾这样声明他们要把本族人民的“两部分”合并成一个整体[①]。那时，对“**各族无产阶级必然要采取的**”民族自治怎么办呢？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各民族机械地塞进国家完整性的框子里去，这算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其次，民族自治是和民族的整个发展进程抵触的。民族自治提出组织民族的口号，可是，既然实际生活、既然经济发展使得整批的人脱离本民族，并使他们散居各地，试问，怎能人为地把这种民族结合起来呢？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民族逐渐团结起来。可是同样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开始了民族分散的过程，成批的人开始离开本民族出外谋生，以至于完全迁移到国内其他区域去；同时，这些移民就渐渐失去旧有的联系，而在新的地方取得新的联系，一代一代地养成新的风俗习惯，也许还会通晓新的语言。试问，能否把这些彼此隔离的集团合并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什么地方竟有这样一种魔箍能把无法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呢？例如，难道可以把波罗的海沿岸和南高加索一带的日耳曼人“团结成一个民族”吗？既然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不可能做到的，那末民族自治和那些力图使历史开倒车的老民族主义者的空想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民族的统一不仅因人口分散而逐渐消失，并且由于内部原因，即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消失下去。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还可以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共同性”开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谅解的时候，根本就谈不到民族的“文化共

——————————————

① 见“党的布隆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第四十八页。——著者注

同性”。在资产阶级渴望战争，无产阶级却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呢？能不能把这些彼此对立的分子组成一个统一的包括各阶级的民族联盟呢？既然如此，还谈得上“民族的全体成员团结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①]吗？因此，民族自治是和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抵触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们暂且假定“组织民族”这个口号是可能实现的口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会议员为了取得更多的选票而力图“组织”民族，那还可以理解。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什么时候竟也开始干起“组织”民族、“成立”民族、“建立”民族的事情来了呢？

在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代去组织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这算做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呢？到现在为止，奥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可是这个任务看来“已经陈旧了”。于是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现在提出一个“新的”更引人入胜的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组织”民族。

不过，逻辑上必然如此：既然采取了民族自治，当然就要接受这个“新的”任务，而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就是离开阶级立场，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

奥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纲领责成大家关心“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保存和发展**”，这也绝不是偶然的。真是异想天开：“保存”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在“沙黑西－瓦黑西”节日[②]自己打自己这一类的“民族特点”！“发展”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五五三页。——著者注

② “沙黑西－瓦黑西”节日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的哀悼日。伊斯兰教教祖穆罕默德的外孙忽辛于公元六八〇年被害，什叶派伊斯兰教徒每年在他的忌日举行种种哀悼仪式，痛哭流涕，以掌自击，甚至以剑自刺，借示同情。——译者注

这种条文只配列在十足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上，它既然出现在奥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上，那就因为民族自治和这类条文是相容的，而不是相抵触的。

然而对现在的社会不适用的民族自治，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更不适用的。鲍威尔的“人类将分成一些以民族为界限的团体”[①]这一预言已被现代人类的整个发展进程驳倒了。民族壁垒并不是在巩固下去，而是在毁坏下去，泯灭下去。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说过：“各族人民间的民族隔离性和对立性已日益消失下去”，“无产阶级的统治更将加速它们的消失”。人类后来的发展及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增长，各民族的杂居和人们在愈益广阔的地域上的结合，都十分肯定地证实了马克思的思想。

鲍威尔想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其实就是暗中企图把巴枯宁的学说改头换面来代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任何这样的企图本身都包含着必然破产的因素。

至于鲍威尔竭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原则”，在我们看来，就是想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如果民族自治是从这种可疑的原则出发，那就必须承认民族自治只能有害于工人运动。

固然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如此明显，因为它是用社会主义的辞藻巧妙地伪装起来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对无产阶级就更加有害。公开的民族主义总可以对付，因为它是不难识破的。要和伪装的不易识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那就困难得多。它既然装上社会主义的铁甲，也就较难攻破而更加顽强了。它既然存在于工人中间，散播各民族工人互相猜忌、彼此隔离的有害思想，也就把环境弄得乌烟瘴气了。

——————————————

① 见本章前一部分。——著者注

但是民族自治的害处还不止于此。它不仅造成各民族彼此隔离的基础，而且造成分裂统一的工人运动的基础。民族自治的思想为统一的工人政党分成一些按民族建立的单独的政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前提。党一分裂，工会就跟着分裂，结果是彼此完全隔离。统一的阶级变动就这样分成一些单独的民族细流。

奥国，“民族自治”的故乡，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惨痛的例证。奥国社会民主党本是一个统一的党，从一八九七年（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起它就开始分裂成几个单独的党。从党的布隆代表大会（一八九九年）采纳了民族自治以后，分裂的程度更加深了，最后竟使一个统一的国际主义的政党分成了现在的六个民族政党，其中捷克族的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愿和日耳曼族的社会民主党打交道。

但是工会和党是有联系的。奥国党内和工会内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工人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这就令人担忧党内的分离主义会使工会也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而陷于分裂。事实果然如此：工会也按民族分开了。现在甚至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捷克族工人破坏日耳曼族工人的罢工，或在选举市政局时和捷克族资本家一起反对日耳曼族工人。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仅如此，它还使民族问题更尖锐，更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

这就是民族自治的收获。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

上面我们说过，鲍威尔虽然认为民族自治对捷克人、波兰人等是必需的，但是他反对给犹太人这种自治。对“工人阶级应否为犹太人民要求自治”这个问题，鲍威尔回答道：

“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①] 根据鲍威尔的意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不让他们（即犹太人。——斯大林注）保全为一个民族”[②]。

简言之，犹太民族将不再存在，所以无从为谁要求民族自治了。犹太人在被同化着。

对犹太民族命运所持的这种观点并不是新的。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有过这种观点[③]，他当时所指的主要是德国的犹太人。考茨基在一九〇三年重述过这种观点[④]，他当时所指的是俄国的犹太人。现在鲍威尔在谈到奥国的犹太人时又重述这种观点，不过有一点差别，就是他所否认的不是犹太民族的现在，而是犹太民族的将来。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之所以不能保全为一个民族，在于“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⑤]。这种解释基本上虽然正确，但还没有说出全部真理。问题首先在于犹太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这样一个阶层是不仅作为民族骨干，而且作为“民族”市场自然地把一个民族联结起来的。俄国的五六百万犹太人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和农业有一些联系。其余百分之九十六从事商业、工业和在城市机关中工作，一般地住在城市里，并分散在俄国各处，无论在哪一省都不占多数。

可见以少数民族资格杂居在其他民族区域里的犹太人主要是以工业家、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身分为“异”族服务的，在语言等各方面自然也就适应“异族”。所有这一切，再加上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各个民族的日益杂处，就使犹太人受到同化。“特许犹太居住区”

——————————————

①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八一、三九六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三八九页。——著者注

③ 见马克思“论犹太问题”一九〇六年版。——著者注

④ 见考茨基“基什涅夫惨案和犹太问题”一九〇三年版。——著者注

⑤ 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八八页。——著者注

的废除只能加速这种同化。

因此，为俄国的犹太人要求民族自治的问题是有些滑稽可笑的：有人竟主张替一个前途被否定、存在与否尚待证明的民族要求自治！

虽然如此，崩得还是采取了这种滑稽可笑的动摇不定的立场，竟在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一九〇五年）通过了主张民族自治的“民族纲领”。

驱使崩得走这一步的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即崩得作为犹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而且仅仅作为犹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而存在。早在一八九七年以前，那些在犹太工人中进行工作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就已经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犹太工人组织”[①]。一八九七年，他们果然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即联合成为崩得了。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时候。从那时起，崩得不断发展和扩大起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处境惨淡的时候日益显露头角…… 可是二十世纪到来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开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犹太工人吸引到群众斗争中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崩得”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崩得那种没有地域基础的民族圈子愈见狭小了。一个问题摆在崩得面前：或者是融化到总的国际浪潮中去，或者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做一个超地域的组织。崩得选择了后者。

所谓“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崩得的“理论”就这样形成了。

但是要“简单地”随便为这个奇怪的“理论”作辩护已经不可能了，必须有某种“原则性的”根据、“原则性的”理由才行。民族文化自治就成了这样的根据。崩得从奥国社会民主党那里抄来了民族文化自治就抓住不放。即使奥国人没有这样的纲领，崩得也一定会想出一个来，以便“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独立存在作辩护。

————————————

① 见卡斯切梁斯基编的“民族运动的形式……”第七七二页。——著者注

这样，崩得在一九〇一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了一番怯懦的尝试以后，终于在一九〇五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纲领”。

第二种情况，即犹太人作为个别的少数民族在其他多数民族密集的各完整区域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地位使犹太人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使他们走上被同化的道路。但这是客观的过程。主观上，在犹太人头脑中，这一过程却引起了反应，提出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不受同化的问题。崩得既然宣扬犹太“民族”富有生命力，就不能不采取主张“保障”的立场；既然采取了这种立场，就不能不采纳民族自治。因为，如果崩得能够抓住什么自治，那就只能是民族自治，即**民族文化自治**：犹太人的地域上政治上的自治是谈不上的，因为犹太人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

值得注意的是崩得一开始就强调说，民族自治的特点就是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这就难怪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崩得代表哥里德勃拉特要说民族自治就是“**保障**它们（即各个民族。——斯大林注）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①]。崩得思想的拥护者也是抱着这种主张加入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的……

崩得就这样采取了主张犹太人民族自治的可笑的立场。

上面我们已经一般地分析了民族自治。这一分析说明了民族自治的归宿就是民族主义。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崩得果然得到了这样的结局。不过崩得还从特殊方面即从**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方面来考察民族自治。我们也就从这个特殊方面来分析问题吧。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是犹太少数民族问题）对社会民主党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之，就是“**保障**”各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着重

---

① 见“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一七六页。——著者注

号是我们加的。——斯大林）。但“保障……的机关”究竟是什么呢？

这首先就是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的“民族委员会”，一种类似掌管文化事宜的议会。

可是这种机关能否保障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呢？掌管文化事宜的议会能否保障民族免于民族主义的迫害呢？

崩得认为能保障。

但历史证明恰恰相反。

俄属波兰曾经有过议会，一种政治性的议会，它当然力求保障波兰人自由“发展文化”，可是它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在和俄国一般政治条件作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垮台了。

芬兰早就有了议会，它也力求保护芬兰民族不受“侵犯”，但它在这方面究竟有多少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议会是有各种各样的，对付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芬兰议会不像对付贵族的波兰议会那样容易。但是**有决定意义的**终究不是议会本身，而是俄国的一般制度；如果俄国目前还像过去一样，像废除波兰议会时一样，存在着野蛮的亚洲式的社会政治制度，那末芬兰议会的处境就要坏得多。况且“侵犯”芬兰的政策正在加紧推行，决不能说这种政策遭受过失败……

政治议会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古老机关尚且如此，年轻的议会，年轻的机关，尤其像“文化”议会这样软弱的机关，就更不能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了。

问题显然不在于“机关”，而在于国内的一般制度。国家没有民主化，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也就没有保障。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愈民主，对“民族自由”的“侵犯”就愈少，免受“侵犯”的保障就愈多。

俄国是半亚洲式的国家，所以这里的“侵犯”政策往往采取极粗暴的方式，即蹂躏的方式。不用说，所谓“保障”在俄国是少到最低

限度的。

德国已经是多少有些政治自由的欧洲式的国家。无怪乎那里的“侵犯”政策从来不采取蹂躏的方式。

在法国，“保障”当然更多些，因为法国比德国民主。

瑞士更不用说了。那里由于有高度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各民族都自由地生活着，不管他们是少数民族或多数民族都是一样的。

总之，崩得硬说“机关”本身能保障各民族充分发展文化，这是十分荒唐的。

也许有人会指出，崩得自己也认为俄国的民主化是“建立机关”和保障自由的**先决**条件。但这是不对的。从“崩得在俄国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中可以看出，崩得想在俄国现存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犹太教公会**去达到成立这种“机关”的目的。

有一个崩得领袖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说过：“犹太教公会能成为将来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核心。民族文化自治是民族自我服务的形式，是满足民族需要的形式。犹太教公会这一形式也包含着同样的内容。这是一条链子的几个环节，是一个进化过程中的几个阶段。”①

代表会议根据这一点决定必须争取“改革犹太教公会，**通过立法手续**把它变成世俗机关”，即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机关②（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斯大林）。

显然，崩得当做条件和保障的并不是俄国的民主化，而是犹太人将来的“世俗机关”，这种机关是用“改革犹太教公会”的方法根据“立法”手续，即经过杜马而成立的。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在整个国家内没有民主制度，“机关”本身是不能尽“保障”之职的。

————————————————

①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一九一一年版第六十二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八十三页至第八十四页。——著者注

那末，在将来的民主制度下究竟怎样呢？在民主制度下是不是也需要有专门的“文化机关”来“保障……”呢？例如民主的瑞士在这方面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里有没有石普林格尔的“民族委员会”之类专门的文化机关呢？那里并**没有**这种机关。那末，在那里占少数的例如意大利人的文化利益是不是因此受到损害呢？这类事情还没有听说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瑞士国内的民主制度使一切似乎能“保障……的”专门文化“机关”都成为多余的了。

总之，在现时是软弱的，在将来是多余的，——民族文化自治**机关**就是如此，民族自治就是如此。

可是，如果把这种民族自治强加于一个存在和前途都成问题的“民族”身上，那末它的害处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族自治的人必然要维护和保全“民族”的一切特点，而不管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只求“拯救民族”免于同化，只求“保全”民族。

崩得必然会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而它事实上已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所指的是崩得最近几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安息日”、“行话”等等尽人皆知的决议。

社会民主党努力**为一切民族**争取本族语言权，但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特别坚决地”捍卫“**犹太**语言权”[①]（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斯大林），而且崩得自己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宁愿选举他们（即复选人）中间答应捍卫犹太语言权的人”[②]。

不是**共同的**本族语言权，而是**单独的**犹太语言权、行话权！让各个民族的工人**首先**去为本族语言而斗争：犹太人为犹太语言而斗争，格鲁吉亚人为格鲁吉亚语言而斗争等等。为各民族共同的权利而斗争是次要的事情。你尽可不承认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本族语言权，只要你

——————————————

①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八十五页。——著者注

② 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一九一二年版第四十二页。——著者注

承认行话权，你就可以放心：崩得会投票拥护你，崩得“宁愿选举”你。

那末，崩得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社会民主党要求规定每周必须有一个休息日，可是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用“立法手续”“保证犹太无产阶级有权过安息日，不得强迫他们也过另一个节日”①。

应该想到崩得会“更进一步”要求有权过一切旧的犹太节日。如果崩得不幸，犹太工人已抛弃迷信，不愿过这种节日，那末崩得就要用争取过“安息日的权利”的宣传去叫他们想起安息日，在他们身上培植所谓“安息日精神”……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许多发言人发表的“热烈的言论”，要求设立“犹太医院”，说“病人在自己人中间觉得愉快些”，“犹太工人在波兰工人中间会觉得不愉快，而在犹太店铺老板中间会觉得愉快”②。

保存一切犹太的东西，保全犹太人的**一切**民族特点，以至保全显然对无产阶级有害的特点，把犹太人和一切非犹太的东西隔开，甚至主张设立特别医院，——请看崩得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崩得“要使社会主义适应民族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柯索夫斯基和像他那样的崩得分子可以骂普列汉诺夫为“煽动分子”③（纸上不妨乱骂），然而熟悉崩得活动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勇士们简直是怕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于是用“煽动”一类的恶毒字眼来掩护自己……

崩得在民族问题上既然采取这样的立场，在组织问题上自然就走上使犹太工人陷于孤立的道路，走上在社会民主党内结成各民族集团

——————————————

①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八十三页。——著者注

② 同上，第六十八页。——著者注

③ 见“我们的曙光”杂志一九二一年第九、十两期合刊第一二〇页。——著者注

的道路。民族自治的逻辑就是如此！

崩得果然从“唯一代表”论进到工人“民族划分”论了。崩得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组织结构上按民族实行划分”[①]。然后，它又由“划分”论“进一步”走到了“独存”论。无怪乎在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有人说“民族生存就是独存”[②]。

组织上的联邦主义包含着瓦解和分离主义的成分。崩得正在走向分离主义。

它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它那种超地域组织的地位驱使它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崩得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它是在“别人的”地域上活动的，然而和它来往密切的波兰、拉脱维亚以及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是国际主义的地域性的集体。结果便是这些集体每扩大一步都使崩得多受一分“损失”，使崩得的活动场所缩小。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应按民族联邦主义原则实行改组，那时崩得就有可能“保障”自己拥有犹太无产阶级；或者是这些集体的国际主义地域原则仍然有效，那时崩得就要像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按国际主义原则实行改组。

崩得一开始就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按联邦原则实行改组”[③]，原因就在这里。

一九〇六年，崩得因受下层群众要求统一的浪潮所迫而选定了中间道路，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但它是怎样加入的呢？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为了和平地共同进行工作，但崩得加入的目的是为联邦制而战斗。崩得首领麦迭姆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

① 见“关于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报”第七页。——著者注

②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七十二页。——著者注

③ 见“民族自治和按联邦原则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一九〇二年崩得版。——著者注

“我们不是为了太平生活，而是为了斗争才加入的。太平生活是没有的，只有马尼洛夫之流才会盼望在最近的将来能享受太平生活。崩得应当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去加入党。”①

如果认为这是出于麦迭姆的恶意，那就错了。问题并不在于恶意，而在于崩得的特殊立场，由于这种立场，它就不能不和建立在国际主义原则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崩得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自然就破坏了统一的利益。最后，事情竟发展到崩得违背了党章，在选举第四届杜马时联合波兰民族主义者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决裂。

显然，崩得认为决裂是它的独立自主活动最好的保障。

组织上“划分”的“原则”就这样导致了分离主义，引起了完全决裂。

从前崩得和旧“火星报”辩论联邦制问题时说：

“‘火星报’想使我们相信崩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联邦关系一定会削弱它们彼此间的联系。我们不能援引俄国实践来驳斥这种意见，原因很简单：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是联邦制的团体。然而我们可以援引奥国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因为奥国社会民主党根据一八九七年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变成了一个联邦性的组织。”②

这是在一九〇二年写的。

现在已经是一九一三年了。现在我们有了俄国的“实践”，也有了“奥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

这些“实践”和“经验”究竟说明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奥国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吧。一八九六年

——————————————

① 见“我们的话”杂志第三期，一九〇六年维里诺版第二十四页。——著者注

② 见“论民族自治问题……”一九〇二年崩得版第十七页。——著者注

以前，奥国还存在着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就在这一年，捷克人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上首先要求单独的代表权，并取得了这种代表权。一八九七年，在党的维也纳（维姆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取消统一的党，而成立了六个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联邦制同盟。后来这些“团体”又都变成了独立的政党。这些政党彼此又渐渐断绝了关系。接着国会党团也随着党而分裂，成立了几个民族“俱乐部”。后来工会也按民族分裂了，最后甚至连合作社也被殃及了，捷克分离主义者竟号召工人拆散合作社①。至于分离主义的宣传可以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往往推动他们走上工贼的道路，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奥国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证明崩得是错误的，旧“火星报”是正确的。奥国党内联邦主义造成了丑恶已极的分离主义，破坏了工人运动的统一。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崩得分离主义者也像捷克分离主义者一样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了。至于工会，崩得的工会，那末它们一开始就是按民族原则组织起来的，就是说，和其他民族的工人是隔绝的。

完全独存，完全决裂，——这就是联邦主义的“俄国实践”所表明的。

这种情形自然要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使他们的意志沮丧，而且这种沮丧现象也侵入崩得里面了。我们指的是犹太工人和波兰工人因失业问题而发生日益频繁的冲突。请看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所发的议论吧：

“……我们把排挤我们的波兰工人看成暴徒，看成黄色工人；我们不支持他们的罢工，而要破坏他们的罢工。第二、我们用排挤对付

——————————————

① 见“分离主义的文件”第二十九页所援引的瓦聂克的小册子的一段话。——著者注

排挤：他们不许犹太工人进工厂做工，我们就不许波兰工人进手工作坊做工……**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①]（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斯大林）

崩得代表会议就是这样谈论团结精神的。

这真是登峰造极的“划分”和“独存”。崩得已经达到了目的：它已经把各民族的工人分离得厮打起来，分离得做起工贼来了。不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

工人运动的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意志的沮丧，——这就是崩得联邦主义造成的恶果。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及其所造成的气氛，在俄国比在奥国更为有害。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抗拒不住民族主义“时疫”的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步崩得的后尘（虽然这很奇怪）而宣布了民族文化自治。

全高加索实行区域自治，高加索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上述社会民主党人（顺便说一下，他们是附和俄国取消派的）就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要求的。

请听听他们公认的领袖，并非无名的**诺**某所说的话吧：

“谁都知道，高加索无论按居民的人种成分或按地域和农业发展程度来说，都和中部各省大不相同。要开发并在物质上发展这样的边疆，就需要有本地的工作人员，需要有熟悉当地特点、习惯于当地气

① 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十九页。——著者注

候和文化的行家。一切以开发本地为目的的法律都必须由当地颁布，并由当地人材去执行。因此，颁布和当地各项问题有关的法律的权限是属于高加索中央自治机关的……所以高加索中央机关的职权就在于颁布旨在开发本地经济富源，促使边疆物质繁荣的法律。”①

总之，就是高加索的区域自治。

如果把**诺**某提出的那些有点含糊不清互不连贯的理由撇开不谈，那就应该承认他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高加索居民成分及其生活条件有许多特点，在全国性的宪法范围内实行高加索区域自治（这一点诺某也不否认）确实是必要的。这一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承认了的，它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宣布：“凡是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与俄国本部各地不同的边区皆得实行区域自理。”

马尔托夫把这一条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时，曾这样申述其理由：“俄国幅员的辽阔和我们的集中管理的经验，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芬兰、波兰、立陶宛和高加索这样大的地域单位实行区域自理是必要而合理的。”

由此可见，应当把区域**自理**了解为区域**自治**。

但是**诺**某还要更进一步。他认为高加索区域自治所包括的“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说的只是本地生活的物质上的发展。但可以促进边疆经济发展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活动，而且还有精神上文化上的活动”…… “文化上很强的民族，在经济方面也是很强的”…… “但是只有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发展民族的文化”……“因此，凡与本族语言有关的问题都是民族文化问题。教育、诉讼、教会、文学、艺术、科学、戏剧等等问题便是这样的问题。从物质上发展边疆的事业把各民族联合在一起，而民族文化事业却使各民族彼此分开，使每个

———————————————

① 见 “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十九页。——著者注

民族单独进行活动。前一种活动是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的”……“民族文化事业则不然。这种事业并不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而和一定民族的存在相联系。格鲁吉亚语言的命运是任何地方的格鲁吉亚人同样关心的。如果以为格鲁吉亚文化只和住在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人有关，那就太无知了。举阿尔明尼亚的教会为例。各地和各国的阿尔明尼亚人都参加管理教会的事务，地域在这里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或者，例如创办格鲁吉亚博物馆，无论梯弗里斯的格鲁吉亚人或巴库、库泰依斯、彼得堡及其他各地的格鲁吉亚人都是关心的。这就是说，一切民族文化事业均应由各有关民族自己去掌管和领导。我们主张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①。

简言之，文化不等于地域，地域也不等于文化，所以必须实行民族文化自治。诺某可以替民族文化自治辩护的不过如此而已。

我们在这里不再一般地谈民族文化自治，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把它的坏处说明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般说来是毫无用处的民族文化自治，如果从高加索的条件来看，那更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绝伦的。原因如下：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具有发达的文化和文学的、较为发展的民族为前提的。没有这些条件，这种自治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而变为无稽之谈。但是高加索许多族只有原始的文化，他们虽有特殊的语言，但没有本族的文学；况且这些族都处于过渡阶段，一部分在被同化，一部分在向前发展。怎样在他们那里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呢？怎样对待这些族呢？怎样以民族文化自治为必然前提把他们“组织”成一些单独的民族文化联盟呢？

怎样对待那些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学的明格列里人、阿布哈兹人、阿札里人、斯万人、列兹金人等呢？应当把他们列入哪个民族呢？能不能把他们“组织”成一些民族联盟呢？应当以什么

——————————————

① 见格鲁吉亚文的“我们的生活报”[142]一九一二年第十二号。——著者注

“文化事业”为中心把他们“组织”起来呢？

怎样对待那些在南高加索正受格鲁吉亚人同化（但还远没有完全被同化），那些在北高加索一部分正受俄罗斯人同化、一部分又正在向前发展，创造着本族文学的沃舍梯人呢？怎样把他们“组织”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

把那些操着格鲁吉亚语言但过着土耳其文化生活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札里人列入哪个民族联盟呢？是不是**以宗教事业为标准**叫他们脱离格鲁吉亚人而单独“组织”起来，同时又**以其他文化事业为标准**叫他们和格鲁吉亚人一起“组织”起来呢？还有科布列特人呢？英谷什人呢？英格洛伊人呢？

把许多族摈弃在外，这算什么自治呢？

不，这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这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好吧，我们就来假设一下不可假设的东西，假定我们这位**诺**某的民族文化自治已经实现了，那末它会把事情弄到什么地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例如拿南高加索那些识字人数的百分比少到最低限度、学校由万能的毛拉主持、文化渗透了宗教精神的鞑靼人来说吧…… 不难了解，把他们“组织”成民族文化联盟，就是让毛拉站在他们头上，就是任凭反动的毛拉去宰割他们，就是替鞑靼群众的死敌建立一座在精神上奴役这些群众的新堡垒。

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什么时候曾给反动分子助长声势呢？

把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圈到一个替最凶恶的反动分子奴役群众的民族文化联盟中去，——难道高加索取消派再不能“宣布”一种较好的办法吗？……

不，这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只有**把后进的民族和族纳入高度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是社会民主党所能采纳的进步的解决方法。高加索区域自治之可以采纳，在于它把后进的民族引上总的文

化发展的大道，帮助它们跳出小民族闭关自守的狭隘范围，推动它们前进，使它们易于享受高度文化的成果。民族文化自治却适得其反，因为它把各民族禁锢在旧的狭隘范围内，把它们固定在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妨碍它们走上高级的文化阶段。

因此，民族自治使区域自治丧失它的优点，把区域自治化为乌有。

正因为如此，**诺**某所提议的那种混合式的自治，即将民族文化自治和区域自治配合起来的自治，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反常的配合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它除了阻碍后进的民族的发展以外，还会把区域自治变成被组织在民族联盟内的各民族互相冲突的舞台。

这样，一般说来是毫无用处的民族文化自治，在高加索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反动的妄想了。

诺某及其高加索同道者的民族文化自治就是如此。

高加索取消派是否会“前进一步”，是否会在组织问题上也效法崩得，这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到现在为止，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总是先有组织上的联邦主义，然后才有纲领上的民族自治。奥国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八九七年起就实行了组织上的联邦主义，而民族自治纲领是两年以后（一八九九年）才通过的。崩得分子第一次明确地叫喊民族自治是在一九〇一年，而组织上的联邦主义远自一八九七年就实行了。

高加索取消派是从末尾开始，即从民族自治开始做起的。如果他们还继续跟着崩得走，那末他们就得先把目前这个早在九十年代末根据国际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全部摧毁。

但是通过工人暂时尚不明了的民族自治纲领是很容易的，而要摧毁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苦心培育出来、多年建立起来的机构，那就很困难了。只要一开始实行这种赫罗斯特拉特[①]的想法，工人们就会睁开眼睛，看出民族文化自治的民族主义实质了。

————————————————

如果说高加索人用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是一种平常的方式，即口头讨论和文字辩论的方式，那末取消派的全俄代表会议却想出了一种完全不平常的方式。一种简便的方式。请听吧：

“据高加索代表团报告……必须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代表会议在听取了这个报告以后，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认定对党纲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这样解释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

总之，首先是“对这一”问题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然后却来“认定”。真是一种新奇的方式……

究竟这个新奇的代表会议“认定”了什么呢？

就是认定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党纲“原意并不抵触”的。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论点吧。

民族自决的条文所说的是民族权利。根据这个条文，民族不仅有权实行自治，而且有权实行分离。条文上所讲的是**政治上的**自决。取消派竟企图曲解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早已规定的这种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权，这想欺骗谁呢？

或许取消派会规避问题，用诡辩为自己辩护，说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一切民族都同意按民族文化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那末所有这些民族就完全有权这样去做，谁也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别的政治生活方式。真是既新颖又聪明。是否还要加上一句：一般讲来，民族有权废除自己的宪法，有权用专横制度代管宪法，有权恢复旧制度，因为民族，也只有民族

——————————————

①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四世纪时的希腊人，据传说，他为留名于后世，竟纵火焚毁了有名的亚尔蒂米司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成为追求个人荣誉而不惜犯罪的人们的通称。——译者注

本身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民族文化自治或任何一种民族的反动措施都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

可敬的代表会议想说的是不是这一点呢？

不，不是这一点。它分明说：民族文化自治不是和民族权利，而是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这里所说的是党纲，而不是民族权利。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某个民族向取消派代表会议请求指示，那末代表会议就会直接认定民族有民族文化自治权。但是向代表会议请求指示的并不是民族，而是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团”，固然这个代表团所代表的是一些不好的社会民主党人，但究竟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他们所过问的不是民族权利，而是民族文化自治是否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矛盾，是否**和社会民主党党纲的“原意”**“抵触”。

总之，**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党纲的“原意”**并不是一个东西。

显然也有这么些要求，它们虽然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但可能和党纲“原意”抵触。

例如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上有信教自由一条。按照这一条，任何一群人都**有权**信奉任何一种宗教：天主教、正教等。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切宗教压制，反对压制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是否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等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社会民主党始终反对压制天主教和新教，始终维护各民族有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权利，但同时它要根据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去进行反对天主教、反对新教和反对正教的宣传，以便获得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要这样做，在于新教、天主教和正教等等无疑是和党纲“原意抵触”的，即和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抵触的。

自决权问题也是如此。各民族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自己的事情，有权保存自己的任何一种民族机关，无论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谁也不能（没有权利！）**用强迫手段**干涉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但这

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就不进行斗争，不进行宣传反对各民族的有害的机关，反对各民族的不适当的要求。相反地，社会民主党必须进行这种宣传，必须努力影响各民族的意志，使各民族按照最适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要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同时要进行宣传，比方说，既要反对鞑靼人实行分离，又要反对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因为二者虽然和这些民族的**权利**并不抵触，可是和**党纲“原意”**抵触，即和高加索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

显然，“民族权利”和党纲“原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党纲“原意”表现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纲领中科学地规定的利益，民族权利却可能依各阶级（资产阶级、贵族和僧侣等等）的势力和影响为转移，而表现其中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前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后者是由各阶级所组成的民族的权利。谈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是否“抵触”，正像谈论海奥勃斯金字塔和臭名远扬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是否“抵触”一样，二者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由此可见，可敬的代表会议竟无可宽恕地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结果得到的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而是一套谬论，依照这种谬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不抵触”，因此，民族的每一要求都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容，因此，力求自决的民族的任何一种要求都不会和党纲“原意抵触”！

他们太滥用逻辑了……

在这套谬论的基础上，也就产生了取消派代表会议臭名远扬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和党纲“原意并不抵触”。

但是取消派代表会议所违背的不仅是逻辑的规律。

它还违背它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所负的义务，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它确实违背党纲“原意”，因为大家知道，通过这个纲领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断然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请看这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个

问题的发言吧：

“**哥里德勃拉特**（崩得代表）说：……我认为必须设立一些能保障各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因此我提议在第八条上补充一句：‘**并设立一些保障它们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大家知道，这就是崩得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条文。——斯大林注）

马尔丁诺夫指出，应该设立也能保障局部利益的总机关，任何保障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都是不能设立的。

叶哥罗夫说：在民族问题方面，我们只能采纳消极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反对对民族的一切限制。但某一民族是否会作为一个民族发展下去，这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关。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柯里佐夫说：崩得代表一听见有人说到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感到委屈。然而一位崩得代表提出的修正案却带着纯粹民族主义的性质。他们竟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积极的办法去维持那些甚至已在衰亡的民族。”

……结果，“**哥里德勃拉特的修正案以多数对三票被否决了**”。

总之，取消派代表会议显然是和党纲“原意抵触”的。它违背了党纲。

现在取消派企图为自己辩护，竟求援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似乎这次大会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例如柯索夫斯基说：

“大家知道，根据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达成的协议，崩得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纲领（直到民族问题在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解决时为止）。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了民族文化自治无论如何和全党纲领并不抵触。”①

但取消派的企图是徒然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并没有考虑批准崩得的纲领，而只同意暂时把这一问题作为悬案。勇敢的柯索夫斯基

——————————————

① 见“我们的曙光”杂志一九一二年第九、十两期合刊第一二〇页。——著者注

竟没有勇气说出全部真情。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且看：

“加林提出修正案：‘民族纲领问题因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而留作悬案**。’（五十票赞成，三十二票反对。）

有人问：留作悬案是什么意思？

主席答：我们说把民族问题留作悬案，这就是说，崩得在下届代表大会以前可以保留自己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决定。”[①]（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斯大林）

可见代表大会甚至“没有讨论”崩得的民族纲领这一问题，只是把它留作“悬案”，让崩得自己在下届全党代表大会以前去决定自己纲领的命运。换句话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规避了这个问题，对民族文化自治未置可否。

可是取消派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确定的评价，认为民族文化自治可以采纳，并根据党纲批准了它。

差别是有目共睹的。

由此可见，取消派代表会议虽然用尽了一切狡猾手段，但并不能使民族问题有丝毫进展。

在崩得和高加索民族主义者取消派面前献媚，——这就是代表会议所能施展的全副本领。

七　俄国的民族问题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个积极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我们的出发点是：民族问题只有同俄国目前的形势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

俄国正处在过渡时期，“正常的”“宪制的”生活还没有确立，

———————————————

① 见“我们的话”杂志一九〇六年第八期第五十三页。——著者注

政治的危机还没有克服。狂风暴雨和“纠纷扰攘”的日子还在前面。因此，现在和将来的运动就是争取完全民主化的运动。

民族问题也应该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总之，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

在解决问题时，不仅要估计到国内的情况，而且要估计到国外的情况。俄国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奥国和中国之间。民主主义在亚洲的增长是必不可免的。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增长不是偶然的。资本在欧洲已感到地盘狭小，于是冲入异国去寻找新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新的投资场所。但是这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战争。谁也不能说巴尔干战争是纠纷的终结，而不是纠纷的开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由此可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

总之，**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其次，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宁愿留在整体范围内的民族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知道民族文化自治是不适用的。第一、它是勉强凑成的，不切实际的，因为它要把一些被实际生活拆散和转移到全国各地去的人勉强凑成一个民族。第二、它驱使大家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它主张人们按民族标准“划分”，主张“组织”民族，主张“保全”和培植“民族特点”，——这些都绝非社会民主党所应做的事情。莱哈斯拉特中的莫拉维亚族分离主义者离开日耳曼族社会民主党议员而同莫拉维亚族资产阶级议员合并为一个所谓莫拉维亚“集团”，这不是偶然的。崩得的分离主义者沉溺于民族主义，赞美“安息日”和“行话”，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杜马中还没有崩得议员，在崩得活动的区域里却有教权主义的反动的犹太教公会，崩得目前就在这个公会的“领导机

关”里策划犹太工人和犹太资产者“合伙”[①]。民族文化自治的逻辑本来就是如此。

总之，**民族**自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出路何在呢？

正确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就是像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

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最后，它使大家不必等待总的中央机关的决议而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并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职能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没有的。

总之，**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无疑地，不论哪一个区域都不是清一色的单一民族区，因为每个区域里都杂居着少数民族。例如波兰有犹太人，立陶宛有拉脱维亚人，高加索有俄罗斯人，乌克兰有波兰人等等。因此，有人就要耽心少数民族会受多数民族的压迫。但是只有当国家还保存着旧制度的时候，这种担忧才有根据。如果国家具有完备的民主制度，这种担忧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有人提议把散居各地的少数民族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但少数民族所需要的不是勉强凑成的联盟，而是他们在当地拥有实权。**没有**完全的民主化，这种联盟能给他们什么呢？或者**有了**完全的民主化，民族联盟又有什么必要呢？

少数民族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使用本族语言

——————————————

① 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中关于犹太教公会的决议末尾一段。——著者注

的权利。让他们使用本族语言，这种不满就会自行消失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勉强凑成的联盟，而是他们没有本族的学校。给他们这种学校，这种不满就失去任何根据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信仰（信教）、迁徙等等的自由。给他们这种自由，他们就不再会不满了。

总之，**在一切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必需在国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础上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无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任何妨碍或限制。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地而不是纸上空谈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关于组织上的联邦主义和民族文化自治彼此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可争可不争。但民族文化自治替那种可能演变为完全分裂即演变为分离主义的、漫无边际的联邦主义造成有利条件，却是无可争辩的。如果奥国的捷克人和俄国的崩得分子从自治开始，继而进到联邦制，最后竟转到分离主义，那末无疑地，民族文化自治自然而然散播的民族主义气氛，在这方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民族自治和组织上的联邦制携手并进不是偶然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者都要求按民族划分，两者都提议按民族进行组织。相同处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只是前者要求划分一般居民，后者则要求划分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

我们知道按民族划分工人会引起怎样的结果。统一的工人政党的瓦解，工会按民族的分裂，民族纠纷的尖锐化，民族的工贼行为，社会民主党内的精神涣散，——这就是组织上实行联邦主义的结果。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俄国崩得的活动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付这种情况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据国际主义原则来进行组织。

在各地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团结成**统一的完整的**集体，再把这些

集体团结成**统一的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显而易见，这样建党并不是排斥而是预计到**各个区域**在统一的党的整体内实行广泛的自治。

高加索的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形式是完全适当的。如果说高加索人已经能够消除阿尔明尼亚工人和鞑靼工人间的民族纠纷，如果说他们已经能够使居民避免互相残杀和互相枪击，如果说在巴库这个民族杂处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发生民族冲突的可能，如果说在那里已经能够把工人群众纳入强大运动的统一正轨，那末，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建党原则在这方面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他既在自己的组织中交往，每次都在那里和自己的别族同志相见，和他们一起在共同集体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当然就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就不能不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因此，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

按民族建立的组织却不然。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在这里，工人**首先**是自己民族中的一员，如犹太人、波兰人等等。无怪乎组织上的**民族**联邦主义只能使工人养成民族独存的精神。

因此，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原则上**不同的组织形式：国际主义团结的形式和在组织上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形式。

调和这两种形式的企图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成绩。奥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八九七年维姆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调和性的党章已成了废物。奥国党已经四分五裂，并殃及了工会。“调和”原来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石特拉塞尔说得对：“分离主义在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上初次奏了凯歌。”俄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和崩得的联邦主义所达成的“调和”，结果是完全破产了。崩得破坏了斯德哥尔摩的妥协。从斯德哥尔摩大会后第一天起，崩得就成了各地工人联合为各族工人**统一**组织的道路上的绊脚石。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再三要求最后实现各族工人自下而上的统一，但崩得还是顽固地继续实行它的分离主义的策略。崩得起初主张实行组织上的民族自治，继而事实上已转到联邦制，以便最后完全决裂，实行分离主义。它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也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离散和混乱。不妨回忆一下亚格洛事件。

因此，“调和”的办法应该抛弃，因为它是空想的，有害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主义，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那末崩得就要根据区域自治的原则，按照高加索、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来实行改组，而为犹太工人和俄国其他各族工人的直接统一开辟道路。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

总之，**工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九一三年一月于维也纳

第一次载于一九一三年三月至五月
“启蒙”杂志第三期至第五期
署名：科·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2卷第221—276页

论工兵代表苏维埃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俄国革命的车轮风驰电掣般地前进。革命战士的队伍到处在成长和扩大。旧政权的基石已经根本动摇并日趋崩溃。现在也和往常一样，走在前面的是彼得格勒，跟在它后面时而颠踬的是辽阔广大的俄国各地。

旧政权的势力日趋衰落，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只是隐藏了起来，等待适当时机，以便抬起头来向自由的俄罗斯反扑。环顾一下四周就可以看到，黑暗势力在不断地干着卑鄙勾当……

保持既得的权利，以便彻底消灭旧势力并和各地一道把俄国革命向前推进，——首都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就应当如此。

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做些什么呢？

要**摧毁**旧政权，起义的工人和士兵结成临时联盟就够了。因为不言而喻，俄国革命的力量在于工人和穿上军衣的农民结成联盟。

但是，要**保持**已经争得的权利并**继续扩大**革命，单靠工人和士兵的**临时**联盟是绝对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这个联盟成为自觉而坚强的、持久而稳固的联盟，使它稳固得足以抵抗反革命的挑衅性的袭击。因为谁都知道，俄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有无保证，在于革命工人同革命士兵的联盟是否巩固。

工兵代表苏维埃也就是这种联盟的机关。

这种苏维埃团结得愈紧密，组织得愈巩固，它们所体现的革命人民的革命政权就愈有力量，战胜反革命的保证就愈加实际。

加强这种苏维埃，使它们遍于各地，使它们在中央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人民革命政权机关领导下彼此连成一气，——这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作中应当遵循的方向。

工人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周围！

农民们！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在俄国革命的领袖——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士兵们！组织自己的联合会，集合在俄国革命军队唯一可靠的同盟者——俄罗斯人民的周围！

工人、农民、士兵们！联合到俄国革命力量的联盟机关和政权机关——各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去！

要完全战胜旧俄国的黑暗势力，其保证就在这里。

要实现俄国人民的基本要求，给农民土地，给工人劳动保护，给俄国全体公民民主共和国，其保证也就在这里！

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真理报”第八号
署名：科·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3卷第3—4页

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

革命正在前进。它在彼得格勒爆发之后，正向各地蔓延，逐渐续展到辽阔广大的俄国全境。不仅如此，革命还在不可避免地从政治问题转到社会问题，转到改善工人和农民生活的问题，因而使目前的危机更加深刻和尖锐。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俄国某些有产集团的惊惶。沙皇地主的反动势力正在抬头。帝国主义集团敲起了警钟。金融资产阶级正向没落的封建贵族伸出手来，以便共同组织反革命。今天他们还很软弱，还不坚决，但是明天他们就可能坚强起来和动员起来反对革命。不管怎样，他们现时正在毫不放松地干着卑鄙勾当，在一切居民阶层中(包括军队在内)纠集力量……

如何制止正在抬头的反革命呢？

俄国革命胜利所必需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彼得格勒一直是革命的根据地。搏斗和枪杀，街垒和牺牲，斗争和胜利，主要是在彼得格勒及其郊区(喀琅施塔得等地)发生的。地方只不过坐享胜利果实并对临时政府表示信任而已。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实际上分掌政权的局面，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这种局面使反革命的佣仆们感到不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斗争机关，临时政府是被革命的“极端行动”吓倒的、以地方的消极性为靠山的温和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情况就是如此。

革命的弱点就在这里，因为这种情况使地方和首都更加脱节，使

它们之间更加缺乏联系。

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地方也在革命化。各地都在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不断卷入运动并组织在自己的协会中。军队也在民主化，各地都在成立士兵联合会。地方的消极性正在消失。

因此，临时政府的立足之地动摇起来了。

同时，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也显得不足以应付新的形势了。

全俄民主力量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斗争机关，这个机关要有高度的威信，以便把首都和地方的民主力量联合在一起，并在必要时从人民的革命**斗争**机关变成动员人民中一切有生力量以反对反革命的革命**政权**机关。

只有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能够成为这样的机关。

这就是俄国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条件。

其次，战争也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一样，除了消极的方面还有积极的方面，就是说,战争既然几乎动员了俄国所有的成年人,就使军队有了人民的性质,因而促进了士兵和起义工人的联合。这也就是我国革命比较容易爆发和胜利的原因。

但是军队的流动性很大，特别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队必须经常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军队不能永久驻在一个地方来保卫革命，使它不受反革命的打击。因此，必须建立另一种武装力量，建立一种自然地和革命运动中心联系着的武装工人的军队。没有一支随时准备为革命效劳的武装力量，革命就不能胜利，如果这个原理是正确的，那末我国革命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和革命利益血肉相连的工人近卫军。

立即武装工人，建立工人近卫军，——这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二个条件。

许多国家革命运动的特点，例如在法国，表现在下面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上：那里的临时政府通常是在街垒中产生的，因此，它们是

革命的，至少比它们后来(通常在国家“安定”之后)召开的立宪会议要革命些。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最有经验的革命者总是推迟立宪会议的召开，力求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通过革命政府来实现自己的纲领。他们所以这样做，是想把立宪会议置于各种改革已经实现这一既成事实的面前。

我国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我国临时政府不是**在**街垒**中**而是**在**街垒**旁**产生的。所以它不是革命的，它只是勉强跟在革命后面，绊革命的脚，妨碍革命前进。如果根据革命正在一步步深入，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土地等社会问题并使地方革命化这个事实来判断，那末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全民立宪会议将比六三杜马所选出的目前的临时政府民主得多。

同时，令人担心的是，被革命的规模吓坏了的和渗透了帝国主义倾向的临时政府，在某种政治局势下**可能**成为正在组织起来的反革命的“合法的”挡箭牌和掩蔽物。

因此，无论如何不应该推迟立宪会议的召开。

因此，必须尽速召开立宪会议，因为这个立宪会议在社会各阶层中是唯一有威信的机关，它能够使革命事业完成，从而把振翼欲飞的反革命的翅膀一刀砍断。

迅速召开立宪会议，——这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三个条件。

必须在尽速开始和平谈判这样一个总的条件下，在停止惨无人道的战争的条件下来实现这一切，因为长期的战争及其所引起的财政、经济和粮食危机的后果，是使革命大船可能撞碎的暗礁。

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十二号
署名：科·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3卷第11—13页

五　一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自从交战国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把世界拖入血腥屠杀以来，已经快要三年了。

自从昨天还是同胞兄弟而今天已经穿上军衣的世界各国工人像敌人似地分兵对垒，自相残杀，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以来，已经快要三年了。

各国人民被大批屠杀，广大群众陷于破产和贫困，从前繁荣的城市和乡村变为废墟，无数的人忍饥挨饿，过着野兽般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一小撮在朝在野的强盗去掠夺别人的土地和攫取暴利)，——这就是目前战争所导致的结果。

世界已经被战争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欧洲人民感到窒息，他们已经抬起头来反对好战的资产阶级了。

俄国革命最先把那堵使工人彼此隔开的墙壁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普遍沉醉于“爱国”狂热的时候，俄国工人最先提出了已经被遗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俄国革命的霹雳声中，西方工人也从沉眠中惊醒。德国的罢工和示威，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游行，各中立国的罢工和群众大会，英法两国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前线群众性的联欢，——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日益迫近的先声。

而我们今天的节日——五一节，难道不是各国人民新的兄弟关系在血泊中锻炼成长的象征吗？

资本家强盗脚下的土地燃烧起来了，因为国际的红旗又在欧洲的上空飘扬起来了。

就让今天这个日子，这个彼得格勒数十万工人向全世界工人友爱地伸出手来的五一节的日子，成为新的革命国际诞生的保证吧！

让今天在彼得格勒广场上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飞扬全世界，把世界各国工人联合起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吧！

我们要越过资本家强盗，越过他们的强盗政府，向世界各国工人伸出手来，高呼：

五一万岁！

各国人民的兄弟团结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三十五号
本文没有署名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3卷第28—29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节选）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关于民族问题本来应当做一个详尽的报告，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只好把报告压缩一下。

在谈到决议草案之前，必须确定几个前提。

民族压迫是什么？民族压迫就是帝国主义集团剥削和掠夺被压迫民族的一套办法，就是他们用强力限制被压迫民族的权利的各种办法。这一切总括起来就构成了通常称为民族压迫政策的那一政策的轮廓。

第一个问题：一个政权是依靠哪些阶级来实行它的民族压迫政策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族压迫方式，为什么某一国家的民族压迫比别一国家的民族压迫要沉重和粗暴。例如在英国和奥匈帝国，民族压迫从来没有采取过蹂躏的方式，它所采取的方式是限制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权利。但是在俄国，民族压迫往往采取蹂躏和残杀的方式。而在某些国家则根本没有对付少数民族的特殊办法。例如在瑞士就没有民族压迫，那里自由地居住着法兰西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

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对民族有不同的态度呢？

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同。从前，当旧的土地贵族掌握俄国国家政权的时候，民族压迫会采取而且实际上采取了残杀和蹂躏的野

蛮方式。在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英国，民族压迫没有那么粗暴。至于瑞士，因为它是近于民主社会的，所以这个国家的各民族都有相当充分的自由。一句话，国家愈民主，民族压迫就愈轻，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既然我们认为民主和掌握政权的一定的阶级有关，那末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说：旧的土地贵族愈接近政权，像旧的沙皇制度的俄国那样，民族压迫就愈残酷，其方式也就愈野蛮。

但是，支持民族压迫的不仅有土地贵族。除他们以外还有别的力量——帝国主义集团，这些集团把他们在殖民地惯用的奴役各民族的方法搬到本国内部，因而成了土地贵族的天然同盟者。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上层分子，他们也分享掠夺的果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土地贵族和财政贵族为首的、包括各种支持民族压迫的社会力量的合唱队。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首先必须扫净地基，把这个合唱队从政治舞台上清扫出去。（宣读决议案）

第一个问题：怎样安排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生活？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这样回答：应当使俄国国内各被压迫民族有权利自己决定，愿意留在俄罗斯国家内还是愿意分离为独立的国家。现在我们面前摆着芬兰人民和临时政府之间的实际冲突。芬兰人民的代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要求临时政府把芬兰人民在并入俄国以前所享有的权利归还他们。临时政府拒绝这个要求，不承认芬兰人民有自主权。我们应当站在哪一方面呢？显然应当站在芬兰人民方面，因为承认把任何一个民族强留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也就把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提到了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斗争的高度。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帮凶。如果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拒绝承认芬兰人民有表示其分离意志的权利和实现这种意志的权利，那我们就会变成沙皇制度的政策的继承人。

决不容许把民族**有权利**自由分离的问题和某一民族在某一时期是

否**一定要**实行分离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在每个不同的场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截然有别地加以解决。我们承认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权利，有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的**权利**，但这并不是说这样我们就解决了某个民族在目前是否**应当**和俄罗斯国家分离的问题。我可以承认某一民族有分离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我一定要它这样做。一个民族有分离的权利，但是根据具体条件它也可以不行使这种权利。而我们有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来鼓动赞成分离或反对分离的自由。总之，分离的问题在每个不同的场合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加以解决，正因为如此，不应当把承认分离权的问题和在某些条件下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比如说，从南高加索和俄国的共同发展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些条件等等着想，我个人是反对南高加索分离的。但是，如果南高加索各民族仍旧要求分离，那末它们当然可以分离，而且它们是不会遭到我们的反对的。(继续宣读决议案)

其次，对于那些愿意留在俄罗斯国家范围内的民族怎么办？如果说各民族过去不信任俄罗斯，那末这种不信任首先是由沙皇制度的政策培植的。既然沙皇制度已经不存在了，既然它的压迫政策已经不存在了，那末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就必然减弱，对它的向心力就必然增长。我认为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后，十分之九的民族是不愿意分离的。所以党主张，凡是不愿意分离而具有特殊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的区域，如南高加索、土尔克斯坦、乌克兰等，都可以实行区域自治。这种自治区域的边界应当由当地居民根据经济、生活习惯等条件来自行决定。和区域自治相对峙的有另外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崩得而首先是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在很早以前就推荐的，他们都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原则。我认为这个方案是社会民主党所不能接受的。它的实质是：俄国应当成为民族联盟，而民族应当成为个人联盟，不管这些个人居住在国内哪一个地区，都应当凑成统一的共同体。所有俄罗斯人，所有阿

尔明尼亚人等，不分地域，都组织在自己的特别的民族联盟中，然后加入全俄国的民族联盟。这个方案是极端不适宜和不妥当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驱散了整批整批的人，使他们离开本民族而散居在俄国的各个角落。在经济条件所造成的民族散居的情形下，硬把各该民族的各个人凑在一起就是用人工方法来组织民族，建立民族。而用人工方法把人们凑成民族，就是陷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崩得所提出的这个方案是社会民主党所不能赞同的。这个方案在一九一二年我们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被否决，而且除了崩得以外，它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一般是不受欢迎的。这个方案又叫做文化自治，因为它从和民族有利害关系的各种问题中分出了一类文化问题，并把这种问题交给民族联盟去处理。这种分法的出发点是认为文化可以把民族联合成统一的整体。这个方案认为在民族内部一方面有分裂民族的利益，例如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有把民族结成一个整体的利益，文化问题正是这样的问题。

最后，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的权利应当给以特别保护。因此，党要求在学校、宗教等问题上给少数民族以完全平等的权利，取消对他们的任何限制。

第九条规定了各民族权利平等。但是实现这一条所必需的条件只有到整个社会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具备。

我们还应当解决如何把各个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组成一个共同政党的问题。有一种方案主张按民族来组织工人，就是说，有几个民族就有几个政党。这个方案被社会民主党否决了。实践表明，把同一国家的无产阶级按民族组织起来只能使阶级团结的思想归于毁灭。同一国家内一切民族的所有无产者应当组成一个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

总之，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条：

(甲)承认各民族有分离权；

(乙)留在同一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实行区域自治；

(丙)为少数民族制定特别的法律以保障它们的自由发展；

(丁)同一国家内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组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

第一次载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一书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36—41页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七月三日和四日的事变是国内总危机所引起的。战争旷日持久，全国疲惫不堪，物价空前高涨，人民半饥半饱，反革命气焰上升，经济破坏日益加剧，前线团队纷纷被解散，土地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国家疮痍满目，临时政府无力使国家摆脱危机，——这就是促使群众在七月三日和四日走上街头的原因。

如果把这次发动说成是某个政党恶意煽动起来的，那就是暗探的观点，因为暗探总喜欢把一切群众运动说成是由于“煽动者”和“挑拨者”的指使而发生的。

任何一个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没有号召群众在七月三日举行发动。不仅如此，彼得格勒最有威信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七月三日还号召工人和士兵不要举行发动。可是当运动终于爆发起来的时候，我们党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袖手旁观，于是尽一切可能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

但是，反革命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组织了挑衅性的射击，用流血事件给游行示威的日子罩上一层阴霾，并依靠从前线调来的一些部队向革命发动进攻。反革命的核心立宪民主党好像早就料到这一切，事先退出了政府，取得了行动的自由。而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保持已经动摇的阵地，于是背信弃义地把争取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游行示威宣布为反苏维埃的暴动，唆使从前线调来的部队中的落后部分进攻革命的彼得格勒。他们被派别的狂热冲昏了头脑，竟没有看到他们打击革命的工人和士兵也就是削弱整个革命阵线，鼓舞反革命。

结果，反革命势力猖獗起来，军事专政建立了。

捣毁“真理报”报馆和“士兵真理报”报馆，捣毁“劳动”印刷所和我们的区组织，殴打和杀害，不经审判进行逮捕和一系列“擅自进行的”迫害，下贱的密探卑鄙地污蔑我党领袖和被收买的 报纸的耍笔杆的强盗为非作歹，解除革命工人的武装和解散团队，恢复死刑，——这就是军事专政的“工作”。

这一切都是在“挽救革命”的幌子下遵照全俄执行委员会所支持的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内阁”的“命令”干出来的。同时，被军事专政吓倒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竟欣然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出卖给革命的敌人，庇护捣毁行为和横暴行为，不制止“擅自进行的”迫害。

在执行委员会的公开纵容下，临时政府和反革命的大本营立宪民主党成立了默契，以反对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和士兵，——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执政党愈让步，反革命分子就愈狂妄。他们已经从进攻布尔什维克转到进攻所有参加苏维埃的政党和苏维埃本身。他们捣毁彼得格勒区的和奥赫塔的孟什维克区组织，捣毁涅瓦关卡外的五金工会分会。他们闯进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场，并逮捕苏维埃代表(萨哈罗夫代表)。他们在涅瓦大街组织特别队来逮捕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肯定地说要解散执行委员会。至于他们“阴谋”迫害临时政府的某些阁员和执行委员会的首领，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反革命分子的狂妄性及其行动的挑衅性正在与时俱增。而临时政府却继续解除革命工人和士兵的武装来“挽救革命”……

所有这一切加上国内发展着的危机，加上饥荒、破坏、战争以及和战争有关的意外事件，就使形势更加紧张起来，使新的政治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切实地有组织地迎接这些搏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因此：

第一个训条就是不接受反革命分子的挑衅，要具有坚韧沉着的精神，养精蓄锐，迎接即将来临的斗争，不许举行任何为时过早的发动。

第二个训条就是要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付向我们进攻的无数敌人，把旗帜高高举起，鼓励不坚强的人，带动落后的人，启发不觉悟的人。

决不和反革命妥协！

决不和充当狱卒的“社会主义者”联合。

革命分子联合起来反对反革命及其庇护者，——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无产阶级事业报”(喀琅施塔得)第二号
署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委员科·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3卷第80—82页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三日）

一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七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包括中央最近两个半月即五月、六月和七月上半月的活动。

中央**在五月份**进行了下列三方面的活动：

第一、提出了改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中央认为我国革命正沿着和平的道路发展，用改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方法可以改变苏维埃的成分，也就是说，可以改变政府的成分。敌人硬说我们企图夺取政权。这是诽谤。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意图。我们说过，我们有可能用改选苏维埃的方法来改变苏维埃的活动的性质以符合广大群众的愿望。我们很清楚，只要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有一票的优势就能使政权走上另一条道路。因此，五月份的全部工作是在改选的旗帜下进行的。我们终于在苏维埃的工人代表组中争取到将近一半的席位，在士兵代表组中争取到将近四分之一的席位。

第二、进行了反对战争的鼓动。我们利用弗里·阿德勒被判处死刑的事件，组织了许多次抗议死刑和抗议战争的群众大会。士兵们很好地领会了这个运动。

中央活动的第三个方面是参加了五月份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中

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一起竭尽全力同反革命的主力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有意无意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战。彼得格勒有八十万人投票，我们得到了将近百分之二十的选票，并且争得了整个维波尔格区杜马。给了党以特别帮助的是士兵和水兵同志们。

总之，五月份是在(一)参加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二)进行反对战争的鼓动，(三)改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标志下过去的。

六月份。前线准备进攻的传说使士兵很受刺激。出现了一连串的命令，使士兵的权利化为乌有。所有这一切都激动了群众。每一个传说顷刻就传遍全彼得堡，在工人中尤其在士兵中引起波动。发动进攻的传说，克伦斯基的命令和士兵权利宣言，执政当局的所谓疏散彼得格勒“不必要的”分子（其实很明显，当局是想清除彼得格勒的革命分子)，愈来愈明显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使工人和士兵很受刺激。工厂里经常集会，各个团队和工厂纷纷建议我们组织发动。本来预定在六月五日举行游行示威发动。但是中央决定暂时不举行发动，而在七日召集各区、各工厂、各团队的代表举行会议来决定发动的问题。这次会议召开了，到会的代表约有二百人。已经判明特别激动的是士兵。表决时，绝大多数人赞成发动。会上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开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发动该怎么办。绝大多数发言的同志认为，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发动。既然如此，中央就决定把组织和平游行示威的责任担负起来。士兵们提出了可否携带武器出动的问题，中央决定不带武器。但是士兵们说不带武器出动不行，说武器是防止资产阶级分子捣乱的唯一实际保证，说他们携带武器只是为了自卫。

六月九日，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局举行联席会议。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问题：鉴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所有“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反对我们举行游行示威，我们应否延期发动。大家的回答是否定的。

六月九日夜十二时，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在宣言中利用它的全部威信来反对我们。中央决定六月十日不举行游行示威，延至六月十八日举行，因为中央考虑到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在六月十八日举行游行示威，群众可以在这次游行示威中表明自己的意志。工人和士兵心里很不满意中央的这一决定，但他们还是执行了这一决定。同志们，值得注意的是在六月十日那天早晨，当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许多发言人为了“打消举行游行示威的企图”在各工厂发表演说时，绝大多数工人只愿意听我党发言人的演说。中央终于说服了士兵和工人。这一点表现了我们的组织性。

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在六月十八日举行游行示威，同时宣布在游行示威中可以自由提出口号。显然，代表大会决定向我们党挑战。我们接受了挑战，并开始准备力量迎接即将来到的游行示威。

同志们都知道六月十八日游行示威的经过情形。连资产阶级报纸都说，绝大多数示威群众是在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下行进的。基本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参加游行示威的不下四十万人。只有崩得、哥萨克、普列汉诺夫派这三个小集团敢于提出“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可是就连他们也后悔，因为群众强迫他们卷起了自己的旗帜。苏维埃代表大会亲眼看见了我们党的力量和影响的巨大。大家都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这次比四月二十一日的游行示威更强大的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是不会白白地过去的。的确，它也不应该白白地过去。“言论报”说，政府的成分很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因为苏维埃的政策不受群众欢迎。可是正好在这一天，我国军队在前线开始了进攻，进攻是顺利的，因此，“黑帮分子”开始在涅瓦大街上举行游行。这种情形使布尔什维克在游行示威中获得的道义上的胜利化为乌有。而“言论报”以及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官方代表们所说的那个可能发生的实际效果也成了泡影。

临时政府仍旧掌握着政权。顺利进攻的事实，临时政府的局部成

就，以及关于把军队调出彼得格勒的一系列的计划，对士兵发生了相当的影响。他们根据这些事实深信，消极的帝国主义正在变成积极的帝国主义。他们已经明白新的牺牲的时期来到了。

前线对积极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有它自己的反应。许多团队不顾禁令对进攻与否的问题举行表决。最高指挥部不了解，在俄国的新的情况下，在群众还没有弄清战争目的的情况下，盲目地驱使群众去进攻是不可能的。结果正如我们所预料的，进攻注定了失败。

六月底和七月初是在进攻政策的旗帜下过去的。当时盛传着恢复死刑、许多团队被解散、前方士兵遭到毒打的消息。从前线来的代表们报告他们部队中逮捕和毒打的情形。精选团和机枪团也报道了同样的情况。这一切为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举行新的发动造成了基础。

现在我来谈谈七月三日至五日的事变。这一事变是于七月三日下午三时在彼得堡委员会的所在地开始的。

七月三日。下午三时。我们党的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正在开会，讨论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这个最一般的问题。这时来了卫戍部队某团的两个代表，他们提出了一个议程以外的声明，说他们那里“决定今晚举行发动”，说他们“不能再默默忍受前线团队一个个地遭到解散”，说他们“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分赴各工厂和团队”，建议它们参加发动。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代表沃洛达尔斯基同志回答说，“党已经做了不举行发动的决议，该团的党员不得违反党的决定”。

下午四时。彼得堡委员会、军事局和党中央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不举行发动。代表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代表们分赴各工厂和团队去劝说同志们不要举行发动

下午五时。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会议。斯大林同志受党中央委员会委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报告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并传达了布尔什维克的不举行发动的决定。

晚上七时。彼得堡委员会门前。有几个团队举着旗帜经过。口号

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他们在彼得堡委员会门前停下来，要求我们的党员“讲几句话”。发言人布尔什维克拉舍维奇和库拉也夫在演说中阐明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号召不举行发动。但是他们遇到了“滚下去！”的喊声。于是我们的党员建议各团队选出代表团，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陈述自己的愿望，然后回到各团队去。这一建议博得了震耳的欢呼声“乌拉！”乐队奏起了“马赛曲”……这时，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的消息传遍了全彼得格勒，使工人激动起来。继士兵之后，又出现了工人队伍。他们的口号同士兵的一样。士兵和工人都向塔夫利达宫走去。

晚上九时。彼得堡委员会的所在地。各工厂的代表陆续来到这里。他们都建议我们党的各个组织参与并领导游行示威。否则“会发生流血事件”。有人喊道，各工厂必须选出代表团，让代表团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陈述示威群众的意志，至于群众，他们听了代表团的报告后可以各自和平地散去。

夜十时。塔夫利达宫。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的会议。在工人们报告了业已开始的发动的情形后，工人部的多数人为避免发生过火行为决定参与游行示威，使游行示威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少数人不同意这个决定退出了会场。留在会场的多数选出了一个干事会以执行刚刚通过的决定。

夜十一时。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办公的地方改在塔夫利达宫。示威群众从黄昏起就向这里汇合。各区鼓动员和各工厂代表纷纷来到这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军事局、区联派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干事会等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议。从各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一）明天将无法阻止工人和士兵举行游行示威；

（二）示威群众将纯粹为了自卫而携带武器出动，这样可以造成真正的保证以防止从涅瓦大街方面来的挑衅性射击，因为“射击有武

装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会议决定：当革命的工人和士兵群众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举行游行示威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权利袖手旁观，不管运动，它不能让群众去任凭命运摆布，它应当和群众一起，使自发的运动具有自觉的和有组织的性质。会议决定建议工人和士兵选出各团队各工厂的代表，通过他们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陈述自己的愿望。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拟定了一篇号召举行“和平的有组织的游行示威”的宣言。

夜十二时。三万多名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来到塔夫利达宫前。举着旗帜。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选举代表。代表们向执行委员会报告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要求。塔夫利达宫前的士兵和工人开始散去。

七月四日。白天。工人和士兵的游行队伍。旗帜。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游行队伍向塔夫利达宫走去。走在最后的是数千名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据资产阶级报纸(“交易所报”)报道，参加游行示威的不下四十万人。街上一片欢腾气象。市民向示威群众欢呼“乌拉！”午后开始发生捣乱事件。资产阶级区的黑暗势力用罪恶的挑衅性的射击给工人的发动罩上了一层阴霾。甚至“交易所新闻”也不敢否认射击是从游行示威的敌人方面开始的。“交易所报”(七月四日晚刊)写道：“下午二时正，武装示威群众经过花园街和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聚集在路旁的大批观众安然望着他们，这时，花园街右方传来一响震耳的枪声，接着开始了连珠般的射击。”

显然，先开枪的不是示威群众，而是“身分不明的人”，是他们射击示威群众，而不是示威群众射击他们。

射击在资产阶级区的各个地方同时进行着。挑衅者并没有打瞌睡。虽然如此，示威群众还是没有越出必要的自卫范围。这里根本谈不到阴谋或起义。没有发生任何占领政府机关或公共机关的事件，也没有

这样做的任何企图，虽然示威群众依靠他们所拥有的巨大武装力量，不仅能够占领个别机关，而且完全能够占领整个城市……

晚上八时。塔夫利达宫。中央委员会、区联派及我党其他组织的会议。会议决定：既然革命工人和士兵的意志已经表明，发动就应当停止。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拟定了一篇宣言：“游行示威已经结束……我们的口号是：刚毅、坚韧、沉着。”（见载于“真理小报”的宣言）交给“真理报”发表的这篇宣言未能在七月五日刊出，因为“真理报”报馆在四日到五日的夜里被士官生和特务捣毁了。

夜十时至十一时。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讨论政权问题。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之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处境十分危急：他们“需要”同资产阶级联合，但是没有联合的可能，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不愿再同他们成立协议。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思想破产了。因此，由苏维埃掌握政权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了。

德军突破我军战线的传说固然还没有证实，但已经引起了惊惶。

传说明天报上将发表卑鄙地诽谤列宁同志的消息。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把沃伦团的士兵调来保卫塔夫利达宫，这是防备谁呢？原来是防备那些来到塔夫利达宫似乎是为了“逮捕”执行委员会和“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这里指的是一贯为加强苏维埃、为把国家的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

夜二时至三时。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把政权拿过来。它授权“社会主义者”部长组织新政府，并且要吸收哪怕是个别的资产者参加政府。部长们被授予“和无政府状态作斗争”的特别全权。事情很明显：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来应当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这是它所特别害怕的，因为它一向是从同资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联合”中汲取力量的),可是它却同工人和布尔什维克断然决裂，以便同资产阶级联合，掉转枪口来反对革命的工人和士兵。这样，对革命的进攻就展开

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革命开火，而使反革命拍手称快……

七月五日。报上(实际上就是“活的言语报”)刊载了卑鄙地诽谤列宁同志的消息。“真理报”没有出版，因为该报报馆在四日到五日的夜里被捣毁了。设法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社会主义的”部长们的专政建立了。不愿掌握政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次所以掌握政权(短时间地)，是为了镇压布尔什维克……街上出现了从前线调来的军队。士官生和反革命匪帮进行捣毁、搜查和凌辱。反革命彻底地利用了阿列克辛斯基、潘克拉托夫、彼列维尔节夫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动的攻击。反革命非常迅速地增长着。专政的中心是军事司令部。特务、士官生、哥萨克猖獗横行。逮捕和毒打到处发生。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的公开进攻，助长了反革命势力的气焰……

为了回答阿列克辛斯基及其伙伴们的诽谤，我党中央印发了“把诽谤者送交法庭！”的传单。中央印发了关于停止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单张的宣言(宣言没有发表在“真理报”上，因为该报报馆已被捣毁)。令人惊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的”政党没有发表任何宣言。布尔什维克是孤立的。一切比布尔什维克右的分子，从苏沃林和米留可夫到唐恩和切尔诺夫，都默默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七月六日。各处桥梁都被旋开。出现了刽子手马祖连柯的混合大队。在街上，军队镇压不顺从的人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戒严状态。“嫌疑分子”被抓到司令部去。工人、士兵和水兵被解除武装。彼得格勒已经处在军阀控制之下。尽管“当权者”希望挑起所谓“战斗”，但是工人和士兵没有上挑衅的当，没有“应战”。彼得巴甫洛要塞给解除武装者打开了大门。混合大队占据了彼得堡委员会所在地。在各个工人区进行着搜查和解除武装。策烈铁里于六月十一日第一次畏畏缩缩地表示出来的解除工人和士兵武装的思想，现在已付诸实施。工人愤怒地说他是“解除武装的部长”……

“劳动”印刷所被捣毁。“真理小报”出版。发卖“小报”的工人沃伊诺夫被杀害……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叫嚣，把对列宁同志的卑鄙诽谤说成是事实，并且它们攻击革命时已经不限于攻击布尔什维克，它们已经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到苏维埃，扩大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了。

很明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卖布尔什维克，同时也出卖了自己，出卖了革命，助长和纵容了反革命势力。反革命专政在后方和前线全力向自由进攻。昨天还在埋怨革命俄国的立宪民主党的和盟国的报刊，今天突然感到心满意足了。由此可以断定，本国的和盟国的资本家是参加了镇压的“事业”的。

二　结　论

（七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从讨论中可以看出，没有一位同志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反对党中央的口号。中央提出了三个基本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监督生产，没收地主土地。这三个口号得到了工人群众和士兵的同情。这三个口号是正确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斗争，也就保证了群众对我们的拥护。我认为这是有利于中央的基本事实。既然中央在最困难的关头提出了正确的口号，那就是说，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

批评所涉及的不是主要的问题，而是次要的问题。这些批评主要是说中央没有同地方取得联系，中央的活动主要是在彼得格勒。责备中央脱离地方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中央没有任何可能顾到全国各地。责备中央实际上变成彼得堡委员会是有一部分道理的。这是事实。但是，俄国的政策是在这里，在彼得格勒锤炼出来的。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这里。地方响应彼得格勒所做的事情。最后，这是因为掌握着全部

政权的临时政府在这里，作为整个有组织的革命民主派的喉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在这里。另一方面，事变正在迅速发展，公开斗争正在进行，谁也不能断定现存的政权明天不会垮台。在这样的情形下，要等待我们地方的朋友发表意见是不行的。大家知道，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革命问题是不等待地方的。他们掌握着整个政府机关。而我们呢？我们有中央委员会这个机关。中央委员会这个机关的力量当然是很弱的。要求中央没有预先征求地方的意见不要采取任何步骤，就等于要求中央不要走在事变的前面，而落在事变的后面。但这就不成其为中央了。只有运用我们一向采取的那种方法，中央才能担负得起自己的任务。

有些责难所涉及的是个别性质的问题。同志们说，七月三日至五日的起义失败了。是的，同志们，是失败了，可是这不是起义，而是游行示威。这次失败是因为背叛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变节行为破裂了革命战线。

别兹拉波特内依同志说，中央没有努力把说明七月三日至五日事变的传单大量供应彼得格勒和地方。可是我们的印刷所已经被捣毁，也没有任何实际可能在其他印刷所印刷东西，因为这样就会使这些印刷所遭到捣毁。

但这里的情形还不算太坏：虽然在某些区我们遭到逮捕，而在另一些区我们却受到欢迎，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现在彼得堡工人的情绪很好，布尔什维克的威信也很高。

我想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对我们领袖的诽谤。由于最近发生的事变，我们必须草拟一篇告全体人民的宣言来说明一切事实，为此应当选出一个委员会。如果你们选出这个委员会，那末，我建议这个委员会还要发表一篇报道七月三日至五日事变的告德英法等国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宣言，我们应当在这个宣言中痛斥诽谤者。我们是无产阶级最

先进的部分，我们对革命担负着责任，我们应当说明事变的全部真相并揭露卑鄙的诽谤者。

第二、关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回避出席“法庭”的问题。政权在谁的手里目前还没有明朗化。谁也不能担保他们出庭不会遭到粗暴的迫害。如果法庭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并担保不使用暴力，那又当别论。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当形势还没有明朗化，当正式的政权和实际的政权之间的暗斗还在进行时，让同志们出席“法庭”是根本不必要的。如果领导国家的是一个能够保证我们同志不受迫害的政权，那末他们就会出庭。

三　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七月三十日）

同志们！

俄国的政治形势问题就是关于我国革命的命运的问题，就是关于我国革命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胜败的问题。

早在二月里就已经很明显，我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因战争而穿上军衣的农民。当时的情况是：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和这两支力量处在同一阵营内彷佛是和它们结成联盟的还有另外两支力量，即自由资产阶级和盟国资本家。

无产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沙皇制度的死敌。

农民是信任无产阶级的，他们看到不推翻沙皇制度就得不到土地，所以跟着无产阶级走。

自由资产阶级对沙皇制度感到失望而离开了它，因为沙皇制度不仅没有替它夺到新市场，而且连旧市场也没有保住，把十五个省给了德国。

盟国资本家，即尼古拉第二的朋友和同情者也“不得不”背叛沙皇制度，因为沙皇制度不仅没有给他们保证他们所希望的“战线统一”，而且公然准备同德国单独媾和。

这样，沙皇制度陷于孤立了。

其实，这也说明为什么沙皇制度竟会如此“无声无臭地死去”这一“令人惊奇的”事实。

但这些力量所追求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自由资产阶级和英法资本家想在俄国制造一个类似青年土耳其党所进行的那种**小规模的**革命，以鼓起人民大众的热情，然后利用这种热情来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样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的根基就不会发生动摇。

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制造小规模的革命！

相反地，工人和农民的目的是要根本摧毁旧制度，进行我们所说的那种伟大的革命，以打倒地主并压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从而结束战争，保证和平。

伟大的革命与和平！

这个根本矛盾也就成了我国革命发展的基础，成了历次“政权危机”的基础。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的“危机”是这个矛盾的第一次公开表现。如果说在这几次“危机”史上胜利每次都是暂时属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那末这不仅因为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反革命战线组织得好，而且首先因为常常动摇到帝国主义方面去的、暂时还有广大群众的妥协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每次都破坏革命战线，投奔到资产阶级的阵营里，因而造成了反革命战线的优势。

四月的情形是如此。

七月的情形也是如此。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提出的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合的“原则”实际上成了有害的工具，资本家和地主的立宪民主党利用它来孤立布尔什维克并假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逐步巩固自己的阵地……

三月、四月、五月这三个月的前线沉寂时期曾经被利用来进一步发展革命。在国内普遍破坏的推动之下，在任何一个交战国所没有的那种自由的鼓舞之下，革命日益加深，把社会问题一一提到日程上来。革命侵入了经济领域，提出了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土地国有、供给无产农民以农具、组织城乡之间的合理的交换、银行国有以及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夺取政权等问题。革命已经逼近了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

有些同志说，由于我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所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空想。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破坏，如果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没有动摇，那末他们这样说是对的。一切国家都把干预经济领域的问题当做在战争条件下的必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在德国，这个问题也已由实际生活提出来了，不过它的解决没有群众的直接和积极的参与。我们俄国的情形不同。我国破坏的程度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任何国家在战争条件下都没有我国所具有的这种自由。其次，还必须估计到工人的高度组织性：例如我们彼得堡已经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五金工人组织起来。最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广泛的组织。显然，享有充分自由和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人，如果不想在政治上自杀，就不能拒绝积极干预国家的经济生活，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要求俄国在欧洲没有“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暂缓”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可耻的迂腐之见了。哪个国家有更多的可能，那个国家就先“开始”……

革命既然向前迈进了这样一大步，它就不能不引起反革命分子的

警惕，它就必然要使反革命受到刺激。这是使反革命动员起来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由前线的进攻政策开始的冒险行为和使临时政府威信扫地并使反革命鼓舞起来去进攻政府的一连串的前线溃败。传说在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挑衅时期。前线的代表认为，无论进攻或退却，总之，前线发生的一切，都是用来准备践踏革命和推翻苏维埃的。我不知道这些传说是否真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二日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三日开始七月事变，而四日就接到战线被突破的消息。多么凑巧！不能说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是由于对乌克兰问题通过的决议而引起的，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并不反对解决乌克兰问题。还有另一个事实也证明挑衅时期的确已经开始：我说的是乌克兰发生的互相射击的事件。根据这些事实，同志们应当明白，战线被突破在反革命的计划中，是要使革命思想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眼里破产的因素之一。

使俄国反革命力量加强起来的还有第三个因素，这就是盟国资本家。既然盟国资本家看到沙皇制度准备单独媾和而背叛过尼古拉政府，那末只要目前的政府无力保持“统一”战线，谁也就不能阻止他们和这个政府决裂。米留可夫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俄国在国际市场上被当做人力的供应者，并因此而获得金钱，如果事实表明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新政权无力保持进攻德国的统一战线，那末这样的政府也就不值得资助了。没有金钱，没有贷款，政府就一定要垮台。立宪民主党人在危机时期所以有很大的力量，其秘密就在这里。克伦斯基以及全体部长不过是立宪民主党人手中的傀儡。立宪民主党人的力量就在于他们有盟国资本家的支持。

俄国面前曾摆着两条道路：

或者停止战争，割断和帝国主义的一切财政联系，向前推进革命，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基础，开始工人革命的纪元；

或者走另一条道路，即继续战争，继续在前线进攻，服从盟国资本家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命令，那末结果就是完全依附于盟国资本家(在塔夫利达宫纷纷传说美国将供给八十亿卢布，将供给“恢复”经济的资金)，反革命获得胜利。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企图把七月三日和四日的发动说成武装叛乱，这简直是可笑的。七月三日，我们提出了革命战线统一起来反对反革命的建议。我们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也就是说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可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脱离资产阶级，于是离开了我们，这样就破坏了革命战线而满足了反革命分子的心愿。如果追究谁是造成反革命胜利的罪魁，那末罪魁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我们的不幸就在于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它暂时还跟着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走。而在群众对于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思想还没有感到失望以前，革命总是会遭到挫折和阻难的。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将军的专政的图画。表面上和这个专政进行斗争而实际上执行着它的意志的政府，不过是替这个专政阻隔人民怒火的屏风而已。被削弱被凌辱的苏维埃只是以自己的无止境的退让政策给这幅图画添上了几笔。苏维埃现在没有被驱散，这是因为“需要”它充当“必需的”和非常“方便的”掩护物。

可见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了。

我们的策略也应当改变。

从前我们主张使政权和平地转到苏维埃手里，并且我们推断：只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夺取政权的决议，资产阶级就会和平地让开道路。的确，在三月、四月和五月，苏维埃的每一项决议都被当做法律，因为每一次都可以用实力做决议的后盾。随着苏维埃被

解除武装并(在实际上)被降低到普通“职业”团体的地位，情况就改变了。现在谁也不理会苏维埃的决议。现在要夺取政权，必须先推翻现存的专政。

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这应当是党在目前的迫切的口号。

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搏斗和爆发的时期已经来到。

推翻目前的专政这一口号，只有在全国规模的新的强大政治高潮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国家发展的整个进程以及革命的根本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土地、工人监督、和平、政权等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规定了这种高潮的必然性

高压手段不能解决革命的任何一个问题，只能使形势尖锐化。

新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城市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他们一旦胜利，就要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反革命的措施都是假“社会主义者”之手实行的。反革命只有制造了这样的屏风才能再苟延一两个月。可是，既然革命力量正在发展，爆发就必然会到来，终究会有一天，工人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

四　对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七月三十一日)

第一点：“报告人想用什么样的战斗组织形式来代替工人代表苏维埃”，我的回答是，问题的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我没有反对把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但是决定口号的不是革命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构成这一机关的血肉的那种内容。假如参加苏维埃的有立

宪民主党人，我们决不会提出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口号。

现在我们提出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口号。可见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把政权交给哪个**阶级**，问题在于苏维埃的成分。

苏维埃是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但苏维埃并不是革命组织的唯一形式。这是纯粹俄国的形式。在外国，起过同样作用的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市政厅，巴黎公社时期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我们也想到过革命委员会。也许工人部能成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最适宜的形式。

但是应当弄清楚，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组织形式问题。

实际上，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人阶级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专政的问题，而其余一切都好办，都会由革命的创造力创造出来。

第二点和第三点——我们在实践中将如何对待现存的苏维埃，答案是十分明白的。既然这里说的是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那这个口号已经过时了。而这里说的仅仅是这一点。推翻苏维埃的问题是臆造的。这里谁也没有这样提过。我们提议取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苏维埃！”我们取消了这个口号，但同时我们甚至没有退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虽然它近来扮演着很可怜的角色。

地方苏维埃还能起作用，因为它们将来必须抵御临时政府的侵害，在这一斗争中我们将支持它们。

总之，我再说一遍，取消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口号并不等于“打倒苏维埃！”“我们对那些我们占多数的苏维埃”是十分同情的。愿这样的苏维埃永久存在并日益巩固。但是权力已经不在苏维埃手里。从前临时政府颁布一道法令，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颁布一道反法令，并且只有后者具有法律效力。请你们回忆一下颁布第一号命令的经过情形。而现在临时政府已经不理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没有撤销自己要参加七月三日至五日事变侦查委员会的决

定，可是因为克伦斯基下了一道命令而没有能够参加进去。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争得苏维埃中的多数(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很重要的)，而在于推翻反革命专政。

第四点——给“贫苦农民”这个概念下个更具体的定义并指明他们的组织形式，我的回答是，“贫苦农民”这个术语并不是一个新术语。从一九〇五年起列宁同志就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用过这个术语，此后几乎每一号“真理报”都用过这个术语，在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也能找到这个术语。

贫苦农民阶层是指那些和农民上层背道而驰的人。那个似乎“代表”八千万农民(连妇女在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是农民上层的组织。农民下层对这个苏维埃的政策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当社会革命党的首领切尔诺夫以及阿夫克森齐也夫等人建议农民不要立即夺取土地，而要等待立宪会议来总的解决土地问题时，农民对这一建议的回答是夺取土地，耕种土地，夺取农具，如此等等。我们从平兹、沃龙涅什、维切布斯克、喀山及其他许多省份都得到这样的消息。单单这一点就清楚地说明农村已经分化为下层和上层，说明农民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上层多半跟着社会革命党人走，下层没有土地就活不下去，因而采取反对临时政府的立场。下层就是指少地的农民，有一匹马或没有马的农民等等。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乎没有土地的半无产者阶层。

如果在革命时期不设法同这些农民阶层成立某种协议，那是愚蠢的。但是同时必须把雇农阶层单独组织起来，把他们团结在无产者的周围。

这些阶层将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现在很难预言。现在农民下层有的组织在自动建立的苏维埃里，有的竭力夺取现存的苏维埃。例如大约一个半月以前在彼得堡建立了贫苦农民苏维埃（由八十个部队和许多工厂的代表组成），它对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政策正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苏维埃一般是最适宜的群众组织形式，但是我们不应当强调**机关**的形式，而应当指出**阶级内容**，应当力求使群众也能区别**形式和内容**。

一般说来，组织形式问题不是基本问题。革命高潮到来时，组织形式也会创造出来。不要让形式问题遮住政权应转归**哪个阶级**这个基本问题。

今后我们不能再和护国派联合了。护国派各政党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连在一起，因此，从社会革命党人到布尔什维克都联合起来的这个思想已经遭到破产。当前的问题是同贫苦农民阶层结成联盟来反对苏维埃的上层并肃清反革命。

五　结　论

（七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

首先我必须提出几点事实上的修正。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驳斥我的关于俄国无产阶级最有组织性这个说法时，指出了奥国的无产阶级。但是，同志们，我说的是“红色的”即革命的组织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不像俄国无产阶级有这样强的组织性。

安加尔斯基说我似乎在传播联合一切力量的思想。这是完全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不同的原因，不仅农民和无产阶级，而且俄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也抛弃沙皇制度了。这是事实。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回避事实，那就不好了。后来前两种力量走上了进一步发展革命的道路，而后两种力量则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现在来谈问题的本质。布哈林把问题提得最尖锐，但是他也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布哈林硬说，帝国主义资产者同农夫结成了联盟。但是同哪种农夫呢？我国有各种各样的农夫。同右的农夫的联盟是结

成了，可是我国还有下层的、左的、代表贫苦农民阶层的农夫。要知道同他们结成这种联盟是不可能的。他们并没有同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只是不自觉地跟着大资产阶级走，他们纯粹是受了欺骗而跟着别人走的。

联盟是反对谁的呢？

这一点布哈林没有说到。这是盟国资本家、俄国资本家、军官和以切尔诺夫型的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的农民上层的联盟。这个联盟是成立起来反对农民下层和反对工人的。

照布哈林看来前途如何呢？他的分析根本不正确。在他看来，在第一阶段我们要实行的是农民革命。但是，要知道农民革命不能不和工人革命会师，不能不和工人革命汇合在一起。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工人阶级不能不同时为其本身的要求而斗争。因此，我认为布哈林的方案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布哈林认为第二阶段是在西欧支持下的、没有农民参加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已经心满意足)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反对谁呢？布哈林在他的儿戏般的方案中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回答。此外再没有人对事变进行另一种分析。

关于政治形势。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两个政权的并存了。从前苏维埃是实际的力量，可是现在它仅仅是个没有丝毫权力的团结群众的机关。正因为如此，现在不能“随便”把政权交给它。列宁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不存在，因为全部政权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现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那就是唐·吉诃德式的举动。

从前不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认可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可是现在甚至没有人谈论两个政权的并存了。就是把所有的苏维埃都夺过来，你们还是得不到政权！

在进行区杜马选举时，我们嘲笑过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当时

只是一个获得百分之二十选票的非常可怜的集团。现在他们嘲笑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纵容之下，政权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手里了。

同志们急于解决组织政权的问题。可是要知道你们还没有什么政权呀！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推翻**现存政权的必要性。我们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必须准备好。

应该使工人、农民和士兵懂得，不推翻目前的政权，他们就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土地！

总之，当前的问题不是组织政权的问题，而是推翻政权的问题，一旦我们取得政权，我们一定能把它组织好。

现在我用几句话来答复安加尔斯基和诺根两人反对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还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我们就说过，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时刻已经来到（宣读四月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决议的结尾）：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内，在小农居民的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或者必须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或者在向人民解释实行若干实际上业已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的迫切性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就是极大的错误，而在实践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这两位同志落后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小资产阶级分化了，下层正在离开上层，无产阶级正在组织起来，破坏日益加剧，因而更加迫切地把实行工人监督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如在彼得堡、顿巴斯等地）。这一切都证明还在四月就已经通过的决议中的原理是正确的。而这两位同志却拉我们后退。

关于苏维埃。我们取消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旧口号，这并不是说我们反对苏维埃。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苏维埃中，甚至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掩护反革命的机关中进行工作。虽然现在苏维埃仅仅是团结群众的机关，但是我们是永远和群众在一起的，只要不赶我们，我们是不会退出苏维埃的。要知道我们也留在工厂委员会和地方自治机关中，虽然它们并没有掌握政权。不过我们留在苏维埃里，就要继续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策略。

在反革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我国资产阶级和盟国资本家的联系之后，已经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在我国革命斗争中我们应该依靠三种力量：俄国无产阶级，我国农民和国际无产阶级，因为我国革命的命运同西欧的运动是有密切联系的。

六　就“关于政治形势”决议第九条问题驳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八月三日）

斯大林宣读决议第九条：

九、“那时这些革命阶级的任务将是竭尽全力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然后联合各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引导政权走向和平，走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我提议决议的结尾改用另外的词句：“然后引导政权走向和平，并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走向社会主义。”如果我们采用起草委员会的词句，那就会同布哈林提出的业已通过的决议发生分歧。

斯大林：我反对做这样的修改。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条件下像俄国一样具有这样的自由，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过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此外，我国

革命的基础比西欧广阔，在西欧，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面对面孤军作战的，我国工人却有贫苦农民阶层的支持。最后，德国的国家权力机关要比我国资产阶级的不完善的机关优越得多，并且我国资产阶级本身就是欧洲资本的纳贡者。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主席：现在表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修正案。没有通过。①

第一次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
一九一九年“共产党人”出版社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17—139页

———————————————

① 鉴于在代表大会两年后才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过于简短和显然不完全，编辑部认为在确定斯大林同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文时，除利用“记录”外，还必须参看与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有关的公报，这些公报曾经分别载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和八月的“工人和士兵报”第七号、第十四号和“无产者报”第三号。——著者注

两 条 道 路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目前形势的基本问题是战争问题。经济破坏和粮食问题，土地问题和政治自由，——所有这些都是战争这一个总问题的局部问题。

粮食恐慌是怎样引起的呢？

——旷日持久的战争破坏了运输业，使城市得不到粮食。

财政经济的破坏是怎样引起的呢？

——永无休止的战争耗尽了俄国的一切人力和物力。

前线和后方的高压手段是怎样引起的呢？

——战争和进攻政策要求“铁的纪律”。

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是怎样造成的呢？

——战争的整个进程还需要数十亿的巨款，而在没有消灭革命的基本成果之前，盟国资产阶级所支持的本国资产阶级拒绝给以贷款。

如此等等。

因此，解决了战争问题就等于解决了目前窒息着国家的一切“危机”。

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俄国面前摆着两条道路。

或者继续战争，继续在前线“进攻”，那末就必然把政权交给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便通过内债和外债获得金钱。

这样的“救”国就是靠榨取工人和农民(间接税！)来支付战费，以博得俄国和盟国帝国主义豺狼的欢心。

或者把政权交给工人和农民，宣布民主的和平条件并停止战争，以便把革命向前推进，把土地交给农民，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用

资本家和地主的利润来整顿崩溃着的国民经济。

这样的救国就是使工人和农民摆脱战争的财政重荷，使帝国主义豺狼受到损害。

第一条道路将导致地主和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专政，使国家担负极其繁重的捐税，把俄国一块一块地逐渐卖给外国资本家(租借！)，使俄国变为英美法三国的殖民地。

第二条道路将开辟西方工人革命的纪元，冲破束缚俄国的财政罗网，动摇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为俄国的真正解放扫清道路。

这就是反映两个对立阶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利益的两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这两条道路是无法调和的，正如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调和一样。

同资产阶级妥协(联合)的道路注定了必然要破产。

护国派先生们关于莫斯科会议写道：“在民主政纲的基础上实行联合，——这就是出路。”(“消息报”)

——不对，妥协派先生们！

你们同资产阶级建立过三次联合，每一次都碰到新的“政权危机”。

为什么呢？

因为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道路是掩盖目前形势中的痈疽的骗人的道路。

因为联合不是变成空话，就是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假手“社会主义者”来巩固自己政权的工具。

曾经企图站在两个阵营之间的目前的联合政府，难道后来不是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吗？

“莫斯科会议”的召开，不是为了在确立反革命的阵地之后去取

得“国人”对这一步骤的赞同(并获得贷款！)又是为了什么呢？

克伦斯基在“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忍受“牺牲”和实行“阶级自制”(当然是为了“祖国”和“战争”)，归结起来，这篇演说不是为了确立帝国主义又是为了什么呢？

普罗柯坡维奇声明说，政府“决不允许工人干预(工人监督！)企业管理”，这是什么意思呢？

同一位部长又声明说，“政府在土地问题方面决不进行任何根本的改革”，这是什么意思呢？

涅克拉索夫声明说，“政府不同意没收私有财产”，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直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事业效劳又是什么呢？

联合仅仅是合乎米留可夫之流和列布申斯基之流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假面具，这不是很明显吗？

妥协的道路和在各阶级之间随风转舵的道路是欺骗和愚弄群众的道路，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妥协派先生们！已经到了不应当再有动摇和妥协的时候了。在莫斯科，人们已经肯定地说反革命分子正在制造“阴谋”。资产阶级报刊正在试用它们那种惯用的欺诈伎俩，散布“放弃里加”[70]的谣言。在这样的时刻应该有所抉择。

或者拥护无产阶级，或者反对无产阶级。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正在抵制“会议”，他们号召走上真正挽救革命的道路。

倾听他们的呼声吧，不然就让开道路。

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无产者报”第二号
社论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3卷第158—160页

两 条 路 线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所谓政权危机，无非是各个阶级争夺政权斗争的外部表现。革命时代的特点其实就在于争夺政权的斗争在这时具有最尖锐和最明显的性质。因此就产生了我国“慢性的”政权危机，由于战争、破坏和饥荒，这种危机愈来愈严重。因此出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任何一个“会议”，任何一个“代表大会”在今天都不能不谈到政权问题。

在亚历山大剧院举行的民主会议也不能不谈到这个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关于政权问题出现了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同立宪民主党公开联合的路线。孟什维克中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护国派宣传这条路线。一贯的妥协分子策烈铁里在会议上捍卫这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是同立宪民主党根本决裂的路线。我们党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中和孟什维克中的国际主义者宣传这条路线。加米涅夫在会议上捍卫这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会确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因为联合政府的经验证明：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就是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农民得不到土地；就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工人遭到失业；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受战争和破坏、饥饿和破产的折磨。

第二条路线会确立人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因为同立宪民主党人决裂，这正是保证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实行监督，占大多数的劳动者得到公正的和平。

第一条路线表示信任现存的政府，主张全部政权仍留在这个政府手中。

第二条路线表示不信任现存的政府，主张把政权交给工农兵苏维埃的直接代表。

有人幻想把这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调和起来。例如切尔诺夫就是这样，他在会议上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但是又主张同资本家联合，只要(！)资本家放弃(！)自己的利益。切尔诺夫“立场”的内在虚伪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里问题不在于这个立场的自相矛盾，而在于它以走私的办法贩运了策烈铁里所主张的同立宪民主党联合的废物。因为这个“立场”给克伦斯基开辟了道路，使他能够“依据会议的政纲”把各色各样的布雷什金分子和基什金分子“补充到”政府中去，这些人对任何一个政纲都准备签名，但签名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这个政纲。

因为这个虚伪的“立场”把咨议性的“预备国会”这个武器交给克伦斯基，使他易于同苏维埃和委员会作斗争。

切尔诺夫的“路线”就是策烈铁里的那条路线，不过它“狡猾地”伪装了起来，以便使某些头脑简单的人陷入“联合”的罗网。

有理由推断，会议将循着切尔诺夫的足迹前进。

但是，这个会议并不是最后一级。

上述两条路线仅仅反映了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东西。但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两个政权：正式的政权——执政内阁，非正式的政权——苏维埃和委员会。

这两个政权之间的斗争暂时还是隐蔽的和未被意识到的，——这就是目前形势的特点。

看来这个会议的使命就是作为一个多余的砝码使政权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执政内阁。

但是，让隐蔽的和公开的妥协派先生们知道，谁拥护执政内阁，谁就是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权，谁就必然要同工人和士兵群众发生冲突，谁就一定会反对苏维埃和委员会。

妥协派先生们不会不知道，最后决定权是属于革命的委员会和苏维埃的。

载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工人之路报”第十二号
社论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3卷第224—226页

苏 维 埃 政 权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在革命的最初几天，“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一个新口号。四月间，“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同临时政府的政权对立起来。当时首都的多数人还拥护不包括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在内的临时政府。六月间，这个口号在示威中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的承认。临时政府在首都已经陷于孤立。七月间，围绕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爆发了首都的革命多数同李沃夫—克伦斯基政府之间的斗争。妥协主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借地方的落后性转到了政府方面。斗争的结局是有利于政府的。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被宣布为非法。黑暗的时期，“社会主义的”迫害和“共和主义的”监狱、拿破仑主义的陷害和军事阴谋、前线的枪杀和后方的“会议”的黑暗时期来到了。这是八月底以前的事情。八月底，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科尔尼洛夫暴动使一切革命力量都振作起来。在七八月间气息奄奄的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委员会现在“突然”又复活起来。它们复活以后就在西伯利亚和高加索、芬兰和乌拉尔、敖德萨和哈尔科夫等地夺取政权。不这样做，不夺取政权，革命就会被击溃。于是彼得堡“一小群”布尔什维克在四月间宣布的“苏维埃政权”，在八月底几乎获得了俄国各革命阶级的公认。

现在谁都明白，“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口号，而且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可靠的手段，是现时情况下的唯一出路。

最终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可是，“苏维埃政权”是什么,它和其他各种政权有什么区别呢？

有人说，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这就是说组织“清一色的”民主政

府，组织由“社会主义的”部长组成的新“内阁”，总之，就是“大大改变”临时政府的成员。但这是不对的。这里问题决不在于用另一批人来代替临时政府的这一批人。问题在于使新的革命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问题在于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手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换一个政府还是很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彻底清洗政府的一切部门和机关，把科尔尼洛夫分子驱逐出去，把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忠诚可靠的人安插进去。只有到那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谈到“中央和地方”的政权转归苏维埃。

怎样解释临时政府“社会主义的”部长们的人所共知的软弱无力呢？为什么这些部长成了站在临时政府外面的那些人们手中的可怜玩具呢？（请回忆一下切尔诺夫和斯柯别列夫、札鲁得尼和彼舍霍诺夫在“民主会议”上的“报告”！）首先因为不是他们支配自己的机关，而是机关支配他们。并且还因为每个机关都是一座堡垒，沙皇时期的官僚直到现在还盘踞在那里，他们把部长们的善良愿望变为“空话”，并准备对政府的任何革命措施实行怠工。为了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必须夺取这些堡垒，把立宪民主党—沙皇制度的奴仆们驱逐出去，把那些经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罢免的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工作者安置在他们的位置上。

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说从下到上彻底清洗后方和前线的所有一切政府机关。

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说后方和前线的所有“长官”都要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罢免。

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说城市和农村、陆军和海军、各“部门”和各“机关”、铁路和邮电机关的“政权代表”都要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罢免。

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说建立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

这个专政同不久以前科尔尼洛夫、米留可夫在克伦斯基和捷列申

柯善意参加之下所力图建立的那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

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是劳动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专政，即对地主和资本家、对投机分子和银行家的专政，这种专政是为了取得民主的**和平**，为了使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为了使农民获得**土地**，为了使人民得到**面包**。

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是公开的、群众性的、在大众面前实行的、没有阴谋和幕后活动的专政。因为这种专政用不着掩饰：它将毫不留情地对付那些用各种“疏散”办法来加剧失业的同盟歇业资本家和那些抬高物价、制造饥荒的投机银行家。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是不对群众使用暴力的专政，是群众意志的专政，是用以压制群众公敌的意志的专政。

这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阶级实质。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中的事件，战争的延长和对和平的渴望，前线的失败和保卫首都的问题，临时政府的腐败和“迁往”莫斯科的问题，破坏和饥荒，失业和疲敝，——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遏止地引导俄国各革命阶级去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国内实行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专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最终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革命口号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工人之路报”第三十五号
社论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3卷第280—282页

我 们 需 要 什 么 ？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在二月，士兵和工人推翻了沙皇。但是，他们在战胜沙皇之后并没有想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坏牧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导之下，工人和士兵自愿地把政权交给了地主和资本家的代理人米留可夫之流和李沃夫之流、古契柯夫之流和柯诺瓦洛夫之流。

这是胜利者的严重错误。现在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工农正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

工人推翻沙皇本来想得到面包和工作。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物价高涨和饥饿、同盟歇业和失业。

为什么呢？

——因为盘踞在政府里的是资本家和投机分子的代理人，他们想用饥饿征服工人。

农民推翻沙皇本来想得到土地。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自己代表的被捕和讨伐队的光临。

为什么呢？

——因为盘踞在政府里的是地主的代理人，他们决不会把土地让给农民。

士兵推翻沙皇本来想得到和平。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且有人还想把它拖到明年秋天。

为什么呢？

——因为盘踞在政府里的是英法银行家的代理人，他们是靠战争掠夺致富的，“迅速”结束战争对他们不利。

人民推翻沙皇本来想再过两三个月就会召开立宪会议。可是立宪

会议的召开已经延期一次，现在敌人竟公然准备把它彻底破坏了。

为什么呢？

——因为盘踞在政府里的是人民的敌人，及时召开立宪会议对他们不利。

二月革命胜利之后，政权落在地主和资本家、银行家和投机分子、包买主和奸商的手里，——这就是工人和士兵的严重错误，这就是目前在后方和前线发生各种灾难的原因。

必须立即纠正这个错误。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再拖延下去就会使整个革命事业遭到毁灭。必须以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

必须以人民承认的、由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选出并对这些代表负责的政府来代替目前这个不是由人民选出和不对人民负责的冒牌政府。

必须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府来代替基什金—柯诺瓦洛夫政府。

二月里所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应该做到了。

用这种方法，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争取到和平、面包、土地和自由。

工人、士兵、农民、哥萨克以及全体劳动者们！

你们愿意使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掌握政权吗？

你们愿意使俄国的新政府根据农民的要求宣布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并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吗？

你们愿意使俄国的新政府公布沙皇的秘密条约，承认这些条约无效，并建议一切交战国人民缔结公正的和约吗？

你们愿意使俄国的新政府彻底压制那些故意加剧饥荒和失业、加剧破坏和物价高涨的同盟歇业者和投机分子吗？

如果你们愿意这样，你们就要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一致奋起，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举行会议，选举代表团，并通过它们向明天在斯穆尔尼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们大家都同心协力、坚定不移地行动起来，那末谁也不敢抗拒人民的意志。你们的发动愈有力、愈有组织、愈强大，旧政府就会愈和平地让位于新政府。到那时全国就会勇敢而坚决地起来为人民争取和平，为农民争取土地，为饥民争取面包和工作。

政权应该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掌握政权的应该是由苏维埃选出的、苏维埃可以罢免并对苏维埃负责的新政府。

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保证立宪会议的及时召开。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工人之路报”第四十四号
社论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3卷第296—298页

在赫尔辛福斯
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同志们！

我被派到你们这里，是为了代表根本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俄国工人革命向你们祝贺。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代表俄国工农政府，代表在这次革命火焰中诞生的人民委员会向你们的代表大会祝贺。

但是，我到你们这里不仅仅是为了祝贺。我首先是要向你们报告喜信：俄国革命胜利了，革命的敌人瓦解了，在帝国主义战争筋疲力尽的情况下，革命的可能性正日益增长。

地主的奴役被摧毁了，因为农村的政权已经转到农民手中。将军的权力被剥夺了，因为军队中的权力已经集中在士兵手里。资本家被约制住了，因为工人对工厂和银行的监督正在迅速建立。城市和乡村，后方和前线，全国各地布满了正在夺取统治权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革命委员会。

有人拿克伦斯基和反革命将军来吓唬我们，可是克伦斯基被赶跑了，而将军们被那些也赞成工人和农民要求的士兵和哥萨克包围住了。

有人拿饥饿来吓唬我们，预言苏维埃政权必将在粮食恐慌的魔爪下灭亡。但是我们一制裁投机商人，一向农民发出呼吁，粮食就几十万几十万普特地流入城市。

有人拿国家机关的混乱、旧官吏的怠工等等来吓唬我们。我们自己也知道，新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可能简单地把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接收过来，变成自己的机关。但是我们一着手革新旧机关，清洗坏分子，怠工现象就开始消失了。

有人拿战争的“意外事件”，拿帝国主义集团由于我们建议民主的和平而可能制造纠纷来吓唬我们。的确，有过危险，而且是致命的危险。不过这种危险是发生在埃捷尔失守以后，当时克伦斯基政府准备逃往莫斯科，放弃彼得格勒，英德帝国主义者已经商妥牺牲**俄国**来缔结和约。在**这种**和约的基础上，帝国主义者的确可以破坏俄国革命事业,也可能破坏国际革命事业。但是,十月革命适时地爆发了。它把和平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击落了国际帝国主义手中最危险的武器，这样就保卫了革命，使它免遭致命的危险。帝国主义老狼只能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向世界各国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屈服而接受和平，或者在**继续**战争的基础上把斗争进行下去。可是，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全世界在战争的魔爪下喘不过气来,“即将来临的”冬季战局在各国士兵中激起了愤怒的风暴，肮脏的密约已经被公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战争显然要使自己遭到失败。帝国主义老狼这一次失算了。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者的“意外事件”是吓唬不了我们的。

最后，有人拿俄国要崩溃，俄国要分裂成许多独立国家来吓唬我们，并且暗示说人民委员会宣布民族自决权是一个“招致灭亡的错误”。但是，我必须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我们不承认俄国各民族有自由自决的权利,那我们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了(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切办法来恢复芬兰工人和俄罗斯工人之间的兄弟般的信任，那我们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但是谁都知道，不坚决承认芬兰人民有自由自决的权利，就不可能恢复这种信任。这里重要的不只是在口头上(即使是正式地)承认这种权利，重要的是这种口头上的承认将由人民委员会以行动来证实，这种承认将毫不犹豫地实现。因为讲空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老口号应当实现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芬兰人民和俄国其他各族人民都有安排自己生活的充分自由！芬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应该结成自愿的真诚的联盟！不应该对芬兰人民

实行任何托管和任何来自上面的监督！这就是人民委员会的政策的指导原则。

只有实现这种政策,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俄国各族人民才能团结成一支大军。只有实现这种团结，十月革命的成果才能巩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才能向前推进。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向我们说到俄国必将因实现民族自决权思想而崩溃的时候，我们总是一笑置之。

这就是敌人过去用来吓唬我们而且现在还继续用来吓唬我们的那些困难，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我们正在逐渐克服这些困难。

同志们！我们听说你们国家正遇到类似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夜所遇到的那种政权危机。我们听说有人也在拿饥饿、怠工等等来吓唬你们。请允许我根据俄国革命运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你们，这些危险即使真的存在,也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坚决而毫不动摇地行动起来，这些危险是可以克服的。在战争和破坏的情况下，在西方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和俄国工人革命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危险和困难经得住你们的猛攻。在这种情况下，站得住脚和能够取得胜利的只有一个政权，那就是社会主义政权。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的只有一种战术，那就是丹东的战术：勇敢，勇敢，再勇敢！

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帮助，那我们一定帮助你们，一定向你们伸出友谊的手。

这一点你们是可以相信的。

载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真理报”第一九一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3—5页

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十八日）

一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一月十五日)(报纸纪要)

报告人指出，民族问题是目前俄国特别关心的问题之一。由于大俄罗斯人不占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并被居住在俄国边疆地区的其他“弱小”民族团团包围着，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

沙皇政府鉴于民族问题的严重性，曾经极力严酷处理民族事务。它实行了强迫边疆地区各民族俄罗斯化的政策，它的方法是禁止使用本族语言、蹂躏和其他迫害。

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消灭了这些民族障碍，但是由于它的阶级性，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革命初期的政府不但没有走上彻底解放各民族的道路，而且往往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来镇压民族运动，像对乌克兰和芬兰那样。

只有苏维埃政权才公开宣布了一切民族都有直到同俄国完全分离的自决权。在这一方面，新政权甚至比某些民族内部的民族集团还要激进。

虽然如此,在人民委员会和各边疆地区之间仍然发生了许多冲突。不过，这些冲突不是围绕着民族问题，而恰恰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讲演人举出许多例子，说明由有产阶级上层代表匆忙拼凑起来的各边疆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如何极力借口解决自己的民族问题而对苏

维埃和其他革命组织进行一定的斗争。各边疆地区和中央苏维埃政权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冲突的根源都在于政权问题。某些区域的资产阶级集团力图给这些冲突涂上民族的色彩，只是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便于他们用民族的外衣来掩盖同本区域劳动群众的政权进行斗争。

讲演人详细说明了拉达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证明乌克兰资产阶级沙文主义集团如何利用自决原则来实现其本阶级的帝国主义目的。

这一切表明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关于俄罗斯共和国的联邦制度问题，讲演人指出：苏维埃联邦的最高机关应该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代表大会的职权。

二　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草案

(一)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在俄国各民族自愿联盟的基础上，是这些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

(二)联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会议至少每三个月举行一次；

(三)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机关；

(四)联邦政府即人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罢免(全部或部分)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

(五)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各个区域的苏维埃共和国参加联邦政府的方式以及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和区域机关职权范围的划分，在各区域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立即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这些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

三 关于民族问题报告的结论

(一月十五日)(报纸纪要)

斯大林同志就所提出的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做了结论。

他指出，所提出的决议并不是法律，它只是拟定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未来宪法的一般原则。在两个政治派别即民族主义反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以前，是谈不到制定明确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机构一切细节的严密宪法的。

这个决议只包含宪法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将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研究并提请下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最后批准。

有人责备苏维埃政权在和资产阶级拉达斗争时表现得过分严酷。**斯大林**同志在回答这种责备时指出，因为这是和披上民族民主外衣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进行斗争。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领导拉达的某些政治活动家(如文尼阡柯)的民主招牌决不是实行真正民主政策的保障。

我们判断拉达不是根据它的言论，而是根据它的行动。

拉达中的“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口头上他们在宣言中宣称自己主张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而实际上他们却在他们颁布的说明书中加以限制，宣布地主的一部分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应当交给人民。

口头上他们宣称自己顺从苏维埃，而实际上他们却和苏维埃进行殊死斗争，解除苏维埃军队的武装，逮捕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杜绝苏维埃继续存在的任何可能。

口头上他们说忠于革命，而实际上却表明自己是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们说在反对顿河反革命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而实际上却给卡列金将军以直接的和积极的援助，帮助枪杀苏维埃军队,不让粮食北运。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拉达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马尔托夫在这里所说的苏维埃反对民主派的斗争究竟是什么呢？

右派发言人，特别是马尔托夫，称赞拉达并替它辩护，大概是因为看到拉达的政策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政策。妥协派先生们把他们如此称心的这个一切阶级的联合政权——拉达看做立宪会议的雏型。大概拉达听到右派代表的发言以后也会衷心地称赞他们。难怪常言道：臭气相投。（笑声，鼓掌。）

其次，讲演人谈到高加索的自决，并且根据确实材料证明，高加索行政委员会正对高加索的苏维埃组织和前线的苏维埃实行公然侵犯的政策，同时和高加索反革命运动的英雄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保持联系。

根据这一切情况来看，必须继续进行所谓内战，这种内战实质上是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一个派别力图在各边疆地区建立妥协主义的联合政权，另一个派别则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为建立劳动群众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而斗争。

人民委员会和各边疆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联合政府之间所发生的那些尖锐冲突的内容和历史意义就是如此。这些政府说他们进行斗争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这种借口不过是他们向劳动人民进攻的一种虚伪掩饰而已。（热列鼓掌）

马尔托夫责备苏维埃政权自相矛盾，说它一面要求在俄国各边疆地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一面又对托洛茨基在布雷斯特所坚持的在库尔兰、立陶宛、波兰等地实行全民投票表示满意。**斯大林**同志在回答这种责备时指出，当西部地区还没有苏维埃，当那里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要求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那是愚蠢之至的。

讲演人说：如果依照马尔托夫的方案去做，那就不得不在不仅没有苏维埃，而且还没有开辟走向苏维埃道路的地方臆造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说通过苏维埃来实行自决，那是荒谬绝伦的。

报告人在结束报告时再一次谈到民主派右翼和左翼之间的基本分歧。左翼争取建立下层的专政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而右翼则建议曳足后退，退到已经走过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阶段上去。法国和美国的议会制度的经验明显地表明，经过普选制产生的表面上民主的政权，实际上是和真正民主制相去很远而且背道而驰的一种同财政资本结合的联合政权。在法国，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里，议员是由全民选举的，但是部长是由里昂银行指派的。在美国，选举是普遍的，但是执掌政权的是亿万富翁洛克菲勒的傀儡。

讲演人问道：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是的，我们已经埋葬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马尔托夫分子要把我们拖到三月革命[①]时期去是枉费心机的。(笑声，鼓掌。)我们工人代表必须使人民不仅成为投票者，而且成为统治者。执政的并不是选举者和投票者，而是统治者。(热烈鼓掌)

载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和十八日
“真理报”第十二号和第十三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21—25页

———————————————

① 三月革命即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旧历)革命。俄语中“三月”和“马尔托夫”两词的形容词是相同的。——译者注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一八年四月三、四日）

由于近日在苏维埃报刊上对建立俄罗斯联邦的原则和方式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报记者特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斯大林同志对本报记者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做了如下答复。

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联邦

在现有一切联邦制联合中，最能代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是美国和瑞士的联邦。这两个国家是在历史上由许多独立国家经过邦联而形成联邦的，但是它们实际上已经变成单一制的国家，仅仅保留了联邦制的形式。从独立到单一制的整个发展过程是经过许多次的暴力、压迫和民族战争的。只要回忆一下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瑞士的宗得崩德同其余各邦的战争就够了。这里不能不指出，瑞士各邦和美国各州不是按照民族特征，甚至不是按照经济特征建立的，而是完全由于偶然，即由于外来移民或村社偶然占领了某些领土而建立的。

在形成中的俄罗斯联邦同这种联邦有什么区别

目前俄国正在建立的联邦将是而且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第一、俄国分离出去的各区域就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来说都是完全固定的单位。乌克兰、克里木、波兰、南高加索、土尔克斯坦、伏

尔加河中游、柯尔克兹边区和中部的不同不仅在于地理位置(是边疆地区！)，而且还在于都是完整的经济地域，其居民具有一定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

第二、这些区域并不是自由独立的地域，而是被强迫并入全俄政治机体的单位，它们现在渴望得到必要的行动自由，建立联邦关系或完全独立。这些地域“联合”的历史就是旧俄当局施行暴力和压迫的整幅图画。在俄国建立联邦制度将意味着这些地域和居住在这些地域的各族人民摆脱旧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从单一制走向联邦制！

第三、在西方的联邦国家那里，领导国家生活建设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合”不会没有暴力，这是并不奇怪的。在我们俄国这里则恰恰相反，领导政治建设的是帝国主义的死敌无产阶级。因此，俄国可以并且必须在各民族自由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度。

这就是俄国的联邦和西方的联邦之间的本质差别。

建立俄罗斯联邦的原则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由此可见，俄罗斯联邦不是各个独立城市的联盟(像资产阶级报刊的漫画家所想象的那样)或一般区域的联盟(像我们某些同志所揣度的那样)，而是在历史上分离出来的、有特殊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一定地域的联盟。这里问题决不在于某些区域的地理位置，甚至不在于某些地域有江河(土尔克斯坦)、山脉(西伯利亚)或草原(土尔克斯坦)和中部相隔。拉齐斯所宣传的这种地理联邦制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联邦制毫无相同之处。波兰和乌克兰并没有山脉和江河同中部相隔，但是谁也不会武断地说，没有这些地理特征，上述区域就不能有自由自决的权利。

斯大林同志说：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莫斯科的区域分离派的特殊联邦制(他们力图把莫斯科周围的十四个省人为地联合起来)也和苏

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联邦问题的人所共知的决议毫无相同之处。总共不过包括几个省的中部纺织区无疑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单位，像这样的地区无疑将由自己的区域机关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个独立部门来管理。可是在没落的卡卢加和工业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之间能有什么相同之处呢？现在的区域人民委员会根据什么特征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呢？真是莫名其妙。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成员

显然，应该而且可以成为联邦的主体的不是任何地区和单位，也不是任何地理上的地域，而只能是自然地具有特殊的生活习惯、特殊的民族成分和某种最低限度的经济地域的完整性的一定区域。这样的区域就是波兰、乌克兰、芬兰、克里木、南高加索(而南高加索还可以分成若干一定的民族地域单位，如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鞑靼等等)、土尔克斯坦、柯尔克兹边区、鞑靼—巴什基里亚地区和西伯利亚等等。

加入联邦的区域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

这些加入联邦的区域的权限将在整个苏维埃联邦的建设过程中非常具体地规定出来,但是这些权利的一般轮廓现在就可以钩划出来了。陆海军、外交、铁路、邮电、货币、通商条约和总的经济、财政、金融政策，——这一切大概将是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其余一切事宜，首先是一般法令的执行方式、学校、诉讼、行政管理等等，则归区域人民委员会负责。无论在诉讼方面或在学校中，都不得强制采用任何“国”语！每个区域选择一种或者几种适应当地居民民族成分的语言，并且在一切社会机关和政治机关中都要遵守少数民族语言和

多数民族语言完全平等的原则。

中央政权的建立

中央政权的建立，它的组织方式是由俄罗斯联邦的特点决定的。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实际上形成了两院制：一方面是根据普选原则选出的议会，另一方面是由各州或各邦组成的联邦院。这也就是事实上造成资产阶级立法滞缓的那种两院制。不用说，俄国的劳动群众是不会同意这种两院制的。至于这种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完全不符合，那就更不用说了。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我们认为，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将是由俄国全体劳动群众选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或代行其职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且必须抛弃那种认为普选制“原则”绝对正确的资产阶级偏见。选举权想必只给那些被剥削的或至少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居民阶层。这是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这一**事实**的自然结果。

政权的执行机关

至于俄罗斯联邦政权的执行机关，即中央人民委员会，我们认为应该由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中央和加入联邦的各区域所提出的候选人中选出。这样，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之间就不会有而且不应该有所谓第二院了。毫无疑问，在建立政权方面，实践会创造出而且大概正在创造出使各区域的和中央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其他更适宜和更有伸缩性的形式。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实践创造出什么样的形式，它决不会复活已经被我们的革命铲除和埋葬了的两院制。

联邦制的过渡作用

我们的谈话人接着说：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眼前正在形成的俄罗斯联邦的一般轮廓。很多人倾向于把联邦制度看做最稳固的甚至是理想的制度，并且时常以美国、加拿大和瑞士为例。可是，历史证明迷恋联邦制是不对的。第一、美国和瑞士已经不是联邦国家。它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是联邦国家，从十九世纪末全部政权由各州、各邦转归中央联邦政府的时候起，它们事实上已经变成单一制的国家了。

历史证明，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是各州、各邦从独立走向完全联合的过渡阶段。联邦制作为从独立到帝国主义单一制的过渡阶段是一种完全适宜的形式，但是各州、各邦联合成统一的国家整体的条件一成熟，联邦制就被废除和抛弃了。

俄罗斯联邦政治建设的过程。俄国的联邦制是走向社会主义单一制的过渡阶段

俄国的政治建设是相反地进行的。这里沙皇时代的强制性的单一制正被自愿的联邦制所代替，以便逐渐使联邦制让位给俄国各民族和各部落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愿联合。**斯大林**同志在结束谈话的时候说：俄国的联邦制也同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一样注定要起过渡作用，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单一制。

载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和四日
“真理报”第六十二号和
第六十三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4 卷第 47—51 页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总纲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的草案）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目前过渡时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基本任务在于建立城乡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专政，即强有力的全俄苏维埃政权，以彻底镇压资产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并建立既没有阶级区分也没有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俄罗斯共和国是联合在城乡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的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具有特殊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各区域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联合成自治的区域联盟，受区域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机关领导。

三、各区域苏维埃联盟根据联邦原则联合成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受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领导，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

载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消息报”第八十二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55页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

（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

我六日抵达察里津。尽管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紊乱，但是还是可能整顿好的。

在察里津、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粮食垄断和固定价格被苏维埃取消，因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在察里津，现在已经做到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在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也应做到这一点，否则全部粮食都将从这些投机孔道流走。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也出面要求这些苏维埃禁止投机活动。

铁路运输因许多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都热心过问而被完全破坏了。我不得不派专员去主持，他们不顾各委员会的抗议，已经着手整顿。专员们在各地发现许多机车，各委员会没有料想到会有这些机车。根据调查，在察里津—波沃利诺—巴拉朔夫—柯兹洛夫—梁赞—莫斯科线上，一天可以行驶八次以上直达列车。目前在察里津忙着调集列车。过一个星期我们就宣布“粮食周”，把近百万普特粮食一次运往莫斯科，由铁路员工专门押运，事前会通知。

由于下新城不放出轮船(大概因捷克斯洛伐克人之故)，水路运输陷于停滞。请下令立即让轮船开来察里津。

听说，在库班、斯塔夫罗坡里有十分可靠的采购经纪人，他们在南部收购过粮食。从基兹里亚尔通往海岸的线路已经在铺设。哈萨夫尤尔特—彼得罗夫斯克线路还没有恢复。请派施略普尼柯夫、建筑工程师、能干的技工以及机车乘务组来。

我已经派信使去巴库，日内我就动身南下。商品交换特派员札依采夫因为盗窃公家货物，投机倒把，今天将要逮捕。请转告施米特不

要再派坏蛋来。让柯鲍捷夫下令，要沃龙涅什的五人委员会即使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别阻挠我的特派员。

据悉巴泰斯克被德国人占领了。

人民委员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于察里津

第一次载于一九三六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七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82—83页

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

列宁同志：

只说几句话。

(一)如果托洛茨基不加考虑地乱发委任状给特利弗诺夫(顿河区域)、阿弗托诺莫夫(库班区域)、柯培(斯塔夫罗坡里)，发证件给法国使团人员(理应予以逮捕)等等，那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高加索的一切将全部垮台，我们将完全丧失这个边区。托洛茨基现在的行径正和安东诺夫某一时期的行径一样。请让他牢牢记住，不得到当地人的同意不应该随意委任，否则就会给苏维埃政权丢脸。

(二)如果不给我们飞机和飞行员、装甲汽车、六吋口径炮，察里津战线就守不住，铁路也将长期丧失。

(三)南方粮食很多，但是要得到这些粮食，必须有一个不受各军用列车、各集团军司令员等等阻挠的健全的机构。不仅如此，还必须使军人帮助粮食工作人员。粮食问题同军事问题是自然地交织在一起的。从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须有军事全权。这一点我过去提过，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自己作主，不经形式手续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工作的利益要我这样做，当然，我决不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动。

约·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于察里津

第一次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85页

关 于 俄 国 南 部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人民委员**斯大林**最近出差回来，他向本报记者发表了他对南方战线情况的印象。

南方战线的重要性

只是处于顿河反革命和阿斯特拉罕—乌拉尔—捷克斯洛伐克匪帮之间的**战略地位，就已经**说明南方战线的重要性。和英国势力范围(恩捷里、克拉斯诺沃茨克)靠近，只是加深了这种重要性而已。俄国南部的富源(粮食、石油、煤炭、牲畜、鱼类)本身就使帝国主义强盗馋涎欲滴,所以他们力图夺取俄国这块重要的地方。此外,毫无疑问，由于秋季到来和萨马拉冒险行动被肃清，战事中心将移到南方。其实这也正说明南方反革命分子目前为什么正在展开“狂热的”工作，匆忙拼凑由沙皇的奴仆希波夫、萨宗诺夫、卢柯姆斯基组成的新的(崭新的！)“全俄政府”，把克拉斯诺夫、邓尼金和斯柯罗帕茨基匪帮合成一支军队，向英国求援等等。

察里津是被突击的中心

敌人攻击最猛的地点是察里津。这是很明白的，因为敌人拿下察里津，切断同南方的交通，就能保证达到他们的一切目的：可以使顿河反革命分子同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军队的哥萨克上层分子联合起来，

建立起一条从顿河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革命统一战线；可以使南方和里海一带都归国内外反革命分子所有；可以使北高加索的苏维埃军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就是南方白卫分子如此顽强地力图占领察里津的主要原因。

还在八月间，克拉斯诺夫就发出命令："拿下察里津。"克拉斯诺夫匪帮疯狂地向我方阵地猛扑，力图摧毁我方阵地，但是他们被我们红军击退并赶过了顿河。

十月初，又发出拿下察里津的命令，这一次是由罗斯托夫的反革命哥萨克会议发布的。敌人集结了四十多个团，这些团是在顿河、基辅(斯柯罗帕茨基的各军官团！)、库班(阿列克谢也夫的"志愿军"！)招募来的。但是，克拉斯诺夫匪帮这一次也被我们红军的铁拳击退了，而且敌人的许多团被我军包围歼灭，炮、机关枪和步枪都落入我军之手。马蒙托夫、安东诺夫、波波夫、托尔库什金等将军和一大群上校不得不拔脚逃命。

我军的力量在哪里？

我军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它有觉悟有纪律。惊人的愚钝无知，和外界完全隔绝是克拉斯诺夫的士兵的特点。他们不知道他们作战是为了什么。他们在被俘后受审问的时候说："命令我们，我们就不得不去打仗。"

我们的红军战士不是这样。他们骄傲地自称为革命战士，他们知道他们作战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是为了俄国的解放，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能自觉地勇敢地投入战斗。红军战士如此渴望秩序和纪律，以至他们自己常常处罚他们中间"不听话的"和不大守纪律的同志。

从那些在多次战役中受过战斗洗礼的士兵中出现了一批红色军官

干部，这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些红色军官构成我军的基本骨干，把我军结成一个统一的有纪律的机体。

但是军队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素质。军队没有巩固的后方就不能长久存在。要有巩固的前方，就必须使军队不断地从后方得到兵员补充、弹药和粮食。在这方面起巨大作用的是后方出现了熟练能干的、主要来自先进工人的、忠诚不倦地做着动员和供给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种行政管理人员，察里津就无法抢救。

这一切使我军变成能够摧毁敌人任何抵抗的可畏的力量。

一切情况都使南方形成一个新的国际焦点。英国傀儡组成的“新的”“全俄政府”在叶加特林诺达尔的出现，在察里津附近一度被我军击败的三支反革命军队（阿列克谢也夫、斯柯罗帕茨基和克拉斯诺夫的军队（的联合，英国打算干涉的传闻，英国从恩捷里和克拉斯诺沃茨克方面给捷列克反革命分子的供应——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萨马拉遭到破产的冒险行动，现在他们又力图在南方重演。但是他们不会有(决不会有)取得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说，不会有相信反革命的卑鄙勾当并能作战到底的军队。只要给予有力的一击，反革命冒险家的纸牌搭的房子就会被打得粉碎。保证这一点的是我军的英勇作战，克拉斯诺夫—阿列克谢也夫“军队”的士气低落，乌克兰不满情绪的增长，苏维埃俄国实力的增强以及西方革命运动的日益发展。南方的冒险行动的结局，将和萨马拉的冒险行动的结局一样。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二三五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106—108页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十九日）

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这在俄国革命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民族问题和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随着革命的进程和结局而迅速和明显地改变自己的内容。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九一七年二月)，各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带有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世世代代受“旧制度”压迫和剥削的俄国各民族，初次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奋起投入反对压迫者的战斗。“消灭民族压迫”，这就是当时运动的口号。俄国各边疆地区转瞬间布满了“全民族”机关。领导运动的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边区、立陶宛、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北高加索、柯尔克兹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民族委员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拉达”；贝萨拉比亚的“斯法图尔—采利”；克里木和巴什基里亚的“库鲁尔泰”；土尔克斯坦的“自治政府”，——这些就是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把各种力量聚集在它们周围的“全民族”机构。当时的问题是摆脱沙皇制度这一民族压迫的“基本原因”和成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当时民族自决权被解释为各边疆地区民族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利用二月革命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没有列入而且也不能列入

上述资产阶级机构所考虑的范围之内。并且没有注意到，前来代替沙皇制度的是赤裸裸的、不戴假面具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是各民族的更强大更危险的敌人，它是新的民族压迫的基础。

但是，沙皇制度的消灭和资产阶级的当政并没有使民族压迫消灭。旧的粗暴的民族压迫形式，被新的精致的因而是更危险的压迫形式所代替。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民族压迫的政策，而且还组织了反对芬兰(一九一七年夏季解散议会)和乌克兰(捣毁乌克兰的文化机关)的新进攻。不仅如此，这个本性是帝国主义的政府为了征服新的土地、新的殖民地和民族，还号召居民继续进行战争。推动这个政府这样做的，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内在本性，而且还由于西方存在着老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不可抑制地力图统辖新的土地和民族，有使这个政府势力范围缩小的危险。帝国主义国家为征服小民族而进行斗争(这些国家生存的条件)，——这就是在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展现的一幅图画。沙皇制度的消灭和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的上台，丝毫没有使这幅丑恶的图画有一点改观。既然各边疆地区的“全民族”机构表现出实现国家独立的趋向，自然它们就遭到俄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的猛烈反对。既然它们在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置诸不顾，所以就引起了工人和农民的埋怨和不满。所谓“民族部队”只是火上加油：对付从上面来的危险，它们无能为力，而从下面来的危险，它们又只能使它加强和加深。“全民族”机构既无法抵御外来的打击，又无法对付内部的爆发。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开始凋谢了。

这样，对于自决原则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释就成了空谈，失去了它的革命意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到消灭民族压迫和确保小民族国家的独立了。显然，不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由劳动群众自己来掌握政权，被压迫民

族劳动群众是不能解放的， 民族压迫是不能消灭的。

这在十月革命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二月革命包含着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革命是由工人和农民(士兵)的努力完成的，但是革命的结果，政权不是归工人和农民，而是归资产阶级所有了。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是想要结束战争，取得和平。但是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却力图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继续战争，反对和平。国内的经济破坏和粮食恐慌要求为了工人的利益剥夺资本和工业企业，为了农民的利益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是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却保卫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坚决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工人和农民的侵害。这是靠工人和农民的手进行的有利于剥削者的资产阶级革命。

当时国家仍然呻吟在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崩溃和粮食恐慌的重压之下。前线土崩瓦解。工厂时常停工。国内饥荒日益严重。含有内部矛盾的二月革命显然不足以“救国”了。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了。

为了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崩溃的绝境，必须实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随着十月变革而到来了。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代之以工人和农民的政府，一举而解决了二月革命的矛盾。废除地主富农的无限权力，把土地交给农村的劳动群众使用；没收工厂，把它们交给工人管理；同帝国主义决裂，结束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揭穿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最后，宣布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实行自决,承认芬兰独立,——这些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革命初期所实施的主要措施。

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中部开始的革命，是不能长久地停留在中部狭窄地域范围内的。革命在中部胜利后，就必然要扩展到各边疆地区去。果然，革命浪潮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从北部泛滥到全俄国，席卷了一个又一个边疆地区。但是它在边疆地区碰到了堤坝，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成立的“民族委员会”和区域“政府”(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原来.这些“民族政府”连听都不愿意听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在本性上是资产阶级政府,根本不愿意破坏旧的资产阶级秩序,相反地，它们认为有义务来全力保存并巩固这一秩序。它们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政府，根本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决裂，相反地，只要有机会，它们从不放松去侵占并统辖“异”民族的几块或几小块领土。所以，各边疆地区的“民族政府”向中部的社会主义政府宣战是并不奇怪的。它们一经宣战，自然就成了纠集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反动基地。谁都知道，所有被驱逐出俄国的反革命分子都奔向这些基地，他们在这些基地上编成了白卫“民族”部队。

但是，除了“民族政府”，在各边疆地区还有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仿照俄国中部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组织了自己的革命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从来没有同自己的北部弟兄断绝过联系。他们同样力求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同样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所以，他们和“自己的”民族政府的冲突与日俱增是并不奇怪的。十月革命只是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鼓舞了他们对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而“民族政府”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则使各民族的群众同这些“政府”的冲突达到完全决裂的地步，达到以公开起义反对它们的地步。

这样就形成了反对俄国各边疆地区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联盟的全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联盟。

有些人把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描绘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情的中央集权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完全不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像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允许如此广泛的地方分权制，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给予各民族如此充分的民族自由。各边疆地区“政府”的斗争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打出民族旗帜只是为了欺骗群众，因为它是一面便于掩盖民族资产阶级反革命阴谋的受人欢迎的旗帜。

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所进行的斗争是力量悬殊的斗争，“民族政府”两面受敌：外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攻击，内受“自己的”工人和农民攻击。因此，它们经过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就不得不退却了。芬兰工人、托尔帕利的起义和资产阶级“上议院”的逃亡，乌克兰工农的起义和资产阶级“拉达”的逃亡，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工农的起义和卡列金、科尔尼洛夫、西伯利亚“政府”的崩溃，土尔克斯坦贫农的起义和“自治政府”的逃亡，高加索的土地革命和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捷尔拜疆的“民族委员会”的完全孤立无援，——这些就是表明各边疆地区“政府”完全脱离了“自己的”劳动群众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被彻底击溃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者，求助于全世界各民族数百年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和农民。

这样就开始了外国干涉和边疆地区沦陷的时期，这个时期再一次揭穿了“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的反革命性。

只是现在大家才明白：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的并不是使“自己的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是从人民身上榨取利润的自由，是保存自己的特权和资本的自由。

只是现在才知道：不和帝国主义决裂，不推翻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政权不转到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手里,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

对自决原则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就这样被革命进程本身所揭穿了，抛弃了。对自决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看法和“全部政权归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口号则获得了被采用的全部权利和机会。

这样，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也包括民族压迫)，反对“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十月革命在俄国中部胜利并蔓延到许多边疆地区后，就不能局限于俄国领土范围之内了。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下层民众普遍不满的气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邻近国家。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摆脱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庄严地废除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认芬兰独立；宣告俄国为“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呼声，——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被奴役的东方和流血殆尽的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在波斯、中国和印度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工农苏维埃的事实，充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样并推动他们走上真正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的革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奥匈帝国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都十分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问题完全不在于东方的斗争乃至西方的斗争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杂质；问题在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并且一定会达到它的逻辑的结局。

外国干涉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占领政策，只是使革命危机尖锐化，把更多的民族卷入斗争，扩大同帝国主义作革命搏斗的地区。

这样，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这样，民族问题就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第二国际及其首领考茨基的该死的罪过之一，就是他们对民族自决问题的看法始终和资产阶级的看法相同，不了解民族自决的革命意义，不会或是不愿意把民族问题放在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斗争的革命基础上，不会或是不愿意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解放问题联系起来。

鲍威尔和伦纳一类奥国社会民主党人愚蠢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力图把民族问题和政治分开并把它限制在文化教育问题范围之内，忘记了帝国主义和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的存在这样的“小事”。

有人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高涨的情势下，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则已经被事变进程本身废弃了。事实上，被废弃的不是自决和“保卫祖国”的原则，而是对这些原则的资产阶级的解释。只要看一看呻吟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和渴求解放的沦陷区，只要看一看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不受帝国主义强盗侵害而进行着革命战争的俄国，只要想一想奥匈帝国目前爆发的事变，只要看一看那些已经自行组织苏维埃的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波斯、中国)就足以理解按照社会主义解释的自决原则的全部革命意义了。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在于：

(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问题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汇总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

(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这其实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东方和西方的劳动人民和被剥削群众现在以难于描述的热情对待俄国的无产阶级。

这主要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目前这样疯狂地攻击苏维埃俄国。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九日
“真理报”第二四一号和第二五〇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111—118页

不 要 忘 记 东 方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欧洲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际，在旧宝座纷纷倒塌和旧皇冠纷纷落地而让位于革命的工兵苏维埃的时候，在沦陷区正把帝国主义的走狗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的时候，大家的视线自然都转向西方。在西方，应当首先打断在欧洲铸炼而用来扼杀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锁链。在西方，应当首先沸腾起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在这样的时候，遥远的东方及其数亿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就“自然而然”从视野中消失了，被忘记了。

但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东方，至少因为它是世界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

帝国主义者一向把东方看做自己幸福的基础。东方各国的不可计量的自然富源(棉花、石油、黄金、煤炭、矿石)，难道不是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的“纠纷的苹果”[①]吗？这其实也就说明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在欧洲作战和**谈论**西方的时候从来没有不想到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为问题其实始终是在东方。他们那样热心地维持东方各国的“秩序和法制”，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不这样做，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就会没有保障。

但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富源。他们还需要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特多的“听话的”“人力”。他们需要东方各民族的“顺从的”廉价的“劳动力”。此外，他们需要东方各国的“听话的”“年轻小伙子”，从其中征募所谓“有色”军队，立即运用它们去对付“自己的”革命工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东方各国称为自己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休想完全战胜帝国主义。

俄国革命第一个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对帝国主义。波斯、印度、中国的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东方工人和农民从数百年来的沉睡中醒过来的鲜明标志。

西方革命无疑地会进一步推动东方革命运动，给它灌注奋发精神和胜利信心。

帝国主义者本身及其新的吞并行为会给东方的革命化以不小的援助，因为这种吞并行为会把更多的国家卷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世界革命的基地。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参与东方日益增长的自发运动，向前发展这种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在这个意义上，不久以前举行的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员代表会议〔36〕关于加强在东方各国即在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宣传工作的决议，无疑地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

我们希望我们伊斯兰教民族的同志们能执行自己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因为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

载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民族生活报”第三号
社论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121—122页

两 个 阵 营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世界已经确定不移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

在他们的阵营**里**，有美国和英国，法国和日本，他们有资本、武器装备、老练的代理人和富有经 验的行政管理人员。.

在我们的阵营**里**，有苏维埃俄国和一些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欧洲各国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没有资本，没有老练的代理人，没有富有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但是有善于在劳动人民心中燃起解放火焰的富有经验的鼓动家。

这两个阵营的斗争是整个现代生活的轴心，它构成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活动家当前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

爱斯兰和立陶宛，乌克兰和克里木，土尔克斯坦和西伯利亚，波兰和高加索，以及俄罗斯本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两种力量即力图巩固奴隶制束缚的帝国主义和争取摆脱奴隶制的社会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场所。

帝国主义的力量在于那些使主人发财致富而给自己铸造压迫镣铐的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但是群众的愚昧无知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前进，随着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随着革命运动的扩展，它必然会消失。帝国主义者的资本……但是谁不知道，资本在必然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的统治是不长久的，不稳固的。

帝国主义的弱点在于它**不**造成灾难，**不**加剧群众失业，**不**进一步掠夺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不**进一步侵占别国的土地，就无力消除战争。问题不在于结束战争，甚至也不在于战胜德国，而在于数十亿战费由

谁来负担。俄国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获得新生，因为它牺牲国内外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而消除了战争，它把战费加在直接发动战争的人们身上，剥夺了他们。帝国主义者不能这样做，他们不能剥夺他们自己，否则他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者了。要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消除战争，他们就“不得不”使工人挨饿(由于关闭“亏本的”企业而造成大批群众失业、新的间接税和物价飞涨)，他们就“不得不”掠夺德国、奥匈帝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高加索、土尔克斯坦和西伯利亚。

这一切都在扩大革命的基地，动摇帝国主义的基础，加速不可避免的崩溃，这还用得着说吗？

三个月以前，被胜利陶醉了的帝国主义以武力相威胁，恫吓说要以大军淹没俄国。苏维埃俄国既“穷困”又“野蛮”，难道它抵挡得住“纪律严明的”、“甚至”打败过以技术装备驰名于世的德国人的英法军队吗？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件“小事”，他们没有考虑到和平，即使是“屈辱的”和平也必然会破坏军队的“纪律”，唤起他们反对新战争，而失业和物价高涨必然会加强工人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者的革命运动。

结果呢？“纪律严明的”军队原来不适于进行干涉：它害了不可避免的病症——瓦解。曾经夸耀一时的“国内和平”和“秩序”变成了适得其反的国内战争。匆匆忙忙焙制出来的俄国各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政府”成了泡影，不适于用来掩盖干涉，这种干涉所追逐的目的当然(当然！)是“人道”和“文明”。至于苏维埃俄国，他们不但没有轻而易举地打败它，甚至认为对它必须作一点让步，邀请它参加太子群岛的“会议”。因为红军的胜利、以革命精神感染邻近国家的新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西方革命的发展、各协约国内工兵苏维埃的出现等都不能不发生非常有说服力的作用。不仅如此，事情甚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妥协的”克列孟梭昨天还拒绝签发参加伯

尔尼代表会议的护照并准备一口吞下“无政府主义的”俄国，而今天因为受到革命的一些打击，也就不拒绝利用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纪人考茨基老头子的效劳，派他到俄国来谈判……不，应该说来“调查”了。

真是：

“帝王的刚强，威武的力量，

大言壮语，而今安在？……”

这一切变化是在短短三个月中发生的。

我们有一切根据肯定说，今后也将朝着这一个方向发展下去，因为必须承认，在目前这个“多灾多难”的时刻，俄国是社会经济生活“正常”、没有罢工和反政府游行示威的**唯一**国家，而苏维埃政府是欧洲现存的一切政府中**最稳固的**政府，并且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和威信日益增长，这同帝国主义政府的力量和威信日益下降成了尖锐的对照。

世界已经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奄奄一息的帝国主义抓住最后一个工具——“国际联盟”，力图用纠合各国强盗结成统一同盟的方法来挽回局势。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环境和时代都对他们不利，而对社会主义有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正在不可遏止地高涨，围攻着帝国主义的堡垒。革命浪潮的吼声在被压迫的东方各国发出了回响。帝国主义脚下的基地燃烧起来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载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消息报”第四十一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162—164页

帝国主义的后备军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战争仍在进行。民族“自由主义”和“保护”“小”民族，协约国“爱好和平”和“放弃”干涉，要求“废除军备”和“准备”谈判，“关心”“俄国人民”和“愿意”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帮助”俄国人民，——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是遮掩他们加紧给社会主义的敌人运送坦克和弹药的屏风，不过是平常的外交手腕，其目的在于掩盖他们“寻找”新的、为“社会舆论”“所能接受的”形式来扼杀社会主义，扼杀“小”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大约四个月以前，盟国帝国主义打败了奥德敌手之后，尖锐而明确地提出了武装干预(干涉！)“俄国事务”的问题。不和“无政府主义的”俄国进行任何谈判！把一部分“空出来的”部队调到俄国境内，把他们编入**斯柯罗帕茨基之流和克拉斯诺夫之流、邓尼金之流和比切拉霍夫之流、高尔察克之流和柴可夫斯基之流**的白卫部队里，把革命的策源地苏维埃俄国压在“铁环”之中，——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被革命浪潮冲毁了。卷入革命运动的欧洲工人展开了猛烈的反对武装干预的运动。“空出来的部队”显然不适于用来和革命作武装斗争。而且他们一和起义的工人接触，自己就被布尔什维主义“传染了”。苏维埃军队占领赫尔松和尼古拉也夫(两地的协约国军队拒绝和工人作战)一事特别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他们所准备的“铁环”，不仅不“可畏”，而且发生了许多裂口。因此，直接的、不隐蔽的干涉计划是显然“不适当的”。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劳合—乔治和威尔逊最近才发表了“容许”同布尔什维克谈判和“不

干预”俄国内政的声明，伯尔尼委员会才被派赴俄国，协约国理事会才打算邀请(第二次！)俄国一切“实际存在的”政府参加“和平”会议。

但是，决定放弃**不隐蔽的**干涉的原因不仅在于此。其原因还在于在斗争进程中策划了新计谋，即新的、隐蔽形式的武装干预，固然这种干预比公开的干预更复杂，但是对“文明的”和“人道的”协约国却更加“方便些”。我们指的是帝国主义匆忙拼凑起来的罗马尼亚、加里西亚、波兰、德国、芬兰等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联盟。固然这些政府昨天还在为了“民族”利益和民族“自由”而彼此厮杀。固然昨天还在到处叫喊罗马尼亚反对加里西亚、加里西亚反对波兰、波兰反对德国的“卫国战争”。但是，同下令停止“内乱”的协约国的钱袋子比较起来，“祖国”还有什么意义呢！协约国下令组织反对苏维埃俄国的统一战线，他们这些帝国主义的佣仆能不“列队”听命吗？甚至被协约国污辱和践踏的德国政府也丧失了起码的自尊感，央求为了……这个协约国的利益而给予它参加讨伐社会主义的十字军的权利！协约国有一切根据得意洋洋，大谈“不干预”俄国事务，大谈同布尔什维克进行“和平”谈判，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既然有可能利用别人，利用“小”民族来组织用民族旗帜掩盖的而又“完全没有危险的”干涉，那又何必进行对帝国主义“有危险”而且还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公开干涉呢？而罗马尼亚、加里西亚、波兰、德国同俄国进行的战争呢？这本是争取“民族生存”、“保卫东部边界”、反对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的战争，是罗马尼亚人、加里西亚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自己”进行的战争，——这和协约国有什么相干呢？不错，是协约国供给他们金钱和武器，但是这本是“文明”世界的国际法奉为神圣的普通财政活动。协约国像鸽子一样纯洁，它“反对”干涉，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这样，帝国主义就不得不从拔刀要挟的政策，从公开的干涉政策，

转到伪装的干涉政策，即转到把不独立的大小民族拖入反社会主义斗争的政策。

由于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世界各国工人对苏维埃俄国的同情，公开的干涉政策遭到了失败。这种政策被革命的社会主义充分利用来揭露了帝国主义。

毫无疑问，诉诸最后的后备军即诉诸所谓“小”民族的政策，把这些“小”民族拖入反社会主义战争的政策，归根到底要遭到同样的失败。这不只是因为西方日益增长的革命正不顾一切地动摇帝国主义的基础，也不只是因为在这些“小”民族内部的革命运动正不断发展，而且还因为这些民族的“武装力量”和俄国的革命工人接触必然会“传染上”布尔什维主义的病菌。社会主义将利用一切可能使这些民族的工人和农民认清帝国主义的“父亲般的关怀”的掠夺性质。

“小”民族被卷入革命，社会主义的根据地扩大，——这就是帝国主义伪装的干涉政策的必然结果。

载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消息报”第五十八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171—173页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摘要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里所谈到的一切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俄国要不要建立一支有严格纪律的正规军。

半年前，我们有了一支新的军队，这是在沙皇的旧军队瓦解之后建立的一支志愿军，它组织得不好，实行集体指挥，并不总是服从命令。那正是协约国开始进攻的时期。军队的成员即使不完全是工人，至少主要是工人。由于这支志愿军中缺乏纪律，由于并不总是执行命令，由于军队指挥混乱，我们一再遭到失败，把喀山交给了敌人，而克拉斯诺夫则从南方顺利地展开了进攻……事实说明，志愿军是经不起考验的，如果我们不另外建立一支军队，一支充满纪律精神、有组织得很好的政治部、并且一接到命令就能够奋起杀敌的正规军，那我们就不能保卫我们的共和国。

我必须说，那些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工人分子——农民——是不会自愿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后方和前线的许多次骚动，前线的许多次捣乱，都说明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并不想自愿为共产主义而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以铁的纪律的精神去改造这些分子，不仅在后方，而且在前线都引导他们跟随无产阶级前进，使他们为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战斗，并在战争的进程中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唯一能够保卫国家的正规军。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或者我们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的工农正规军而保卫住共和国，或者我们不这样做而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毁灭。

……斯米尔诺夫提出的草案是不能采纳的，因为这个草案只能破坏军队的纪律和取消建立正规军的可能性。

第一次载于斯大林“论反对派”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论文和演说）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174—175页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作，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不仅不同，他们之间还横着一道鸿沟，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善于或不愿意实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活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的公式。他们的活动不是以经验，不是以考虑实际工作为基础，而是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他们不是从分析活的现实，而是从模拟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这就是这一派的主要毛病。因此，他们灰心失望，永远抱怨命运，命运也总是愚弄他们，使他们“上当”。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科(约吉赫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派，说他们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环境改变时就改变这些方法和手段，这一派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这一派不是从历史模拟和历史比拟中，而是从研究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们的活动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依据经验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教育自己并教导别人建设新生活。这其实也就说明在这一派的活动中为什么言行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这一派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以解释世

界为限，而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变世界。这一派的名字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弗·伊·列宁。

一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和西方工人政党组成时的条件不同。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环境中，在有资产阶级国会的情况下，在窃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面对面地和无产阶级对垒着的时候，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待发生的时候形成的。当时，一方面，党的组织中充斥了资产阶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分子，他们渴望利用，工人阶级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党的优秀工作者被沙皇宪兵抓出了党的队伍，而自发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又要求有一个坚固的、团结的、十分秘密的、能够引导运动去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家的战斗核心。

当时的任务是：分清良莠，和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在各地组织有经验的革命干部，给予他们明确的纲领和坚定的策略，以及把这些干部集合成统一的战斗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这个组织要十分秘密，足以阻住宪兵的袭击，但是同时又要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足以在必要时率领群众进行斗争。

孟什维克，就是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解决问题很简单：既然在西方工人政党是从那些为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而斗争的无党无派的工会中产生的，那末在俄国也应当尽可能这样做，就是说，暂时只限于各地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不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等以后……以后，如果到那时还没有工会出现，就

召集一个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并且把它宣布为党。

孟什维克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计划”在俄国条件下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却预定要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来贬低党性思想，消灭党的干部，使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使工人阶级听凭自由主义者去宰割，——这一点，孟什维克，而且恐怕还有许多布尔什维克，那时是未必料想到的。

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莫大功绩在于：还在孟什维克的组织“计划”刚刚萌芽，甚至这个“计划”的编造者自己都很难明显地想象出“计划”的轮廓的时候，他就揭穿了这个“计划”的全部危险性，并且在揭破它以后，就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弛现象展开猛烈进攻，把实际工作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是党的生存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创办全俄政治报，作为集结党的力量的中心；把各地坚定的党的干部组织起来，作为党的“正规部队”；通过报纸把这些干部联合在一起，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界限、明确纲领、坚定策略和统一意志的全俄的战斗的党，——这就是列宁在他的名著“做什么？”和“进一步，退两步”中所发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价值在于它完全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并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在为这个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大多数俄国实际工作者都坚决拥护列宁，不怕分裂。这个计划的胜利为世无伦比的、团结一致和千锤百炼的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同志(不仅孟什维克！)常常责难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责难列宁同调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等。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有过。可是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党不把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逐出党外，那它就不能除去内部的软弱和游移，它就不能获得它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和坚固性。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同自己内部和工人阶级中间的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和反党的分子进行

斗争才能发展并巩固起来。拉萨尔说得对：“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起来的。”

责难者通常以当时“统一”局面兴盛的德国党为例。可是，第一、并非任何统一都是强有力的标志；第二、现在只要看看过去的德国党已经分裂为三个党的事实，就足以了解谢德曼和诺斯克同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统一”是完全虚假的了。如果德国党内的革命分子及时地和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决裂，那对于德国无产阶级不会是更好吗……不，列宁领导党同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做得万分正确的。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组织政策，我们党才能建立内部的统一和惊人的团结，而得以丝毫不受损伤地摆脱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肩负起十月起义，安然地度过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组织了对协约国的胜利，并且获得了从来没有的随机应变的本领，我们党就是靠了这种本领，才能在任何时候改编自己的队伍，集中数十万党员去做任何巨大的工作而不会使自己的队伍混乱。

二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

然而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的一面。如果党的工作的政治内容，党的纲领和策略不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如果党的口号不能激起工人群众，不能把革命运动向前推进，那末党就不能这样迅速地成长壮大。现在我们来谈谈事情的这一面。

俄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〇五年)时同西方进行革命变革时所处的条件(例如法国和德国)是不同的。西方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阶级斗争还不发展的条件下爆发的。那时无产阶级很软弱，人数少，没有自己的能够提出本阶级要求的政党；而资产阶级很革命，足以使工人和农民相信它，并引导他们去同贵族进行斗争。在俄国却相反，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处于机器时期、阶级斗争已经

发展的条件下开始的(一九〇五年)。那时人数较多而且被资本主义团结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和资产阶级进行过多次战斗，已经有自己的、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团结的政党，已经有自己的阶级要求，而俄国资产阶级(何况是靠政府定货生存的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吓坏了，竟设法勾结政府和地主来反对工人和农民。俄国革命因俄国在满洲战场上遭受军事失败而爆发这一事实，只是加速了事变，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

当时的环境要求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把革命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同时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坚决斗争，以使国家完全民主化并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

可是，孟什维克，就是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却按照自己的观点解决问题：既然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领导的(参看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历史”)，那末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权应当让给俄国资产阶级(就是那个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农民也应当让资产阶级保护，而无产阶级则应该始终保持极左的反对派的地位。孟什维克竟把恶劣的自由主义者的这些庸俗老调当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定论捧出来！…… 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莫大功绩在于；他彻底揭穿了孟什维克的历史比拟的空虚无聊和孟什维克的把工人事业交给资产阶级宰割的“革命方案”的全部危险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抵制布里根杜马并举行武装起义，而不是参加杜马并在杜马里进行正常工作；在杜马终于召集起来时成立“左派联盟”并利用杜马讲台来配合杜马外面的斗争，而不是成立立宪民主党的内阁并反动地“保护”杜马；和立宪民主党这个反革命势力作斗争，而不是和它建立联盟，——这就是列宁在他的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中所发挥的策略计划。

这个计划的价值在于它直截了当地坚决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阶级要求，促进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并且含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萌芽。在为这个策略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大多数俄国实际工作者都是坚决不移地拥护列宁的。这个计划的胜利为我们党现在震撼世界帝国主义根基的革命策略奠定了基础。

事变的继续发展，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动荡，二月革命和有名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临时政府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策源地和彼得堡代表苏维埃成为萌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十月革命和立宪会议的解散，资产阶级国会制的废除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宣布成立，帝国主义战争的转变为国内战争，世界帝国主义同那些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那些被无产阶级抛入海中而被革命浪潮冲到资本主义岸边的死死抓住立宪会议的孟什维克可怜姿态，——这一切只是证明了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规定的革命策略原理的正确性。拥有这种遗产的党是能够不怕暗礁，大胆地向前游去的。

——————————————

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党的每一个口号和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事实检验的时候，无产阶级向自己的领袖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没有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整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

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的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要求领袖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

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见巴·阿克雪里罗得给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书所写的序言）“文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得先生现在会怎样评论列宁，这是不难猜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些深知列宁而又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人看来，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质量。列宁，也只有列宁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锻炼有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这一事实的原因之一正应当在这里来找。

载于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八十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4 卷第 218—224 页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听过前面几个人的讲话和回忆以后，我要说的就很少了。我想只指出还没有人谈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列宁同志的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

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关于抵制维特杜马的决定。当时存在着抵制维特杜马的问题。接近列宁同志的人，就是我们地方代表所十分崇敬的那七个人肯定地说，伊里奇反对抵制杜马，主张参加杜马选举。后来知道，的确是这样。于是展开了争论，地方抵制派即彼得堡代表、莫斯科代表、西伯利亚代表、高加索代表都进行攻击，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时我们非常惊讶，我们都被感动了。这给了我们一个电击般的印象。我们大家都向他欢呼致敬。

还有一件这样的事情。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那时民主会议召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新机关——预备国会，以便准备从苏维埃过渡到立宪会议，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在彼得格勒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不驱散民主会议并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起义并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伊里奇那时不在彼得格勒，处在秘密状态

中。他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信中说，必须立刻驱散这群混蛋(民主会议)并把他们逮捕起来。

我们觉得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民主会议的半数代表，至少三分之一的代表是从前线来的，逮捕和驱散他们只能把事情弄糟，把和前线的关系搞坏。我们觉得我们实际工作者对于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小沟、泥坑和坎坷要看得清楚些。但是伊里奇是伟大的，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坎坷或深沟，他不怕危险，他说："站起来，一直走向目标。"而我们实际工作者认为，当时这样做对我们是不利的，应当绕过这些障碍，然后对准要害，果敢地行动。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十月二十五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胜利举行起义。那时伊里奇已经到了彼得格勒。他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们说："是的，恐怕是你们对。"

这又使我们感动了。

列宁同志是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这种谦虚和勇敢精神特别使我们敬服。(鼓掌)

第一次载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列宁五十寿辰纪念文集"一九二〇年莫斯科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26—227页

关于波兰战线的情况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一日）

最近从西南战线地域回来的**斯大林**同志向本报记者发表了如下谈话。

一、五月—六月

最近两个月，五月和六月，前线上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

五月是波兰军队非常得势的一个月。在右翼，波兰人胜利地越过基辅—日麦林卡一线，威胁着敖德萨。在左翼，波兰人胜利地击退了我军向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面的进攻。在中路，波兰军队巩固了莫泽尔，占领了列契查，威胁着哥美里。

相反地，六月是迅速而彻底地消灭波兰军队的五月胜利的一个月。波兰人向乌克兰的推进已经被粉碎，因为波兰人不仅被赶出基辅，而且被击退到罗夫诺—普罗斯库罗夫—莫吉寥夫一线以西。波兰人向哥美里方面的推进也被粉碎了，因为波兰军队已经被击退到莫泽尔以西。至于波兰人的左翼(据波兰报刊评论，它是最稳固的)，那应该说，最近我军在这个地域举行的向莫洛杰奇诺方面的强大突击毫无疑问也是会把这个地域的波兰人打回去的。

七月在前线发生了有利于俄国的根本转变，优势显然在苏维埃军队方面。

二、日托米尔的突破

不容置疑，我们的骑兵在日托米尔地域的突破对前线情况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

很多人拿这次突破同马蒙托夫的突破和袭击相比，并认为两者是相同的。这是不对的。马蒙托夫的突破带有偶然性质，和邓尼金的进攻战役没有直接联系。布琼尼同志的突破则相反，它是我们进攻战役这根不可割断的链条中必要的一环，其目的不仅是摧毁敌人的后方，而且是直接执行一定的战略任务。

突破是在六月五日拂晓开始的。在这一天，我们的骑兵部队集结成一个拳头，粑辎重集中在拳心，突破了分布在波培尔尼亚—卡查廷地域的敌军，以袭击方式穿过别尔季切夫地域，六月七日占领日托米尔。由于波兰人拚命抵抗，我们的骑兵简直不得不给自己杀开一条血路，结果波兰人在当地留下的伤员、被击毙和砍死的战士，据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证明，不下八千名。

三、突破的结果

在日托米尔被突破以前，波兰人和邓尼金不同，他们在前线各重要据点布满了战壕和铁丝网，把运动战和堑壕战成功地配合起来。他们这样就大大地阻碍了我们向前推进。日托米尔的突破打翻了波兰人的如意算盘，使这一联合作战的价值减到最低限度。

这是突破的第一个好结果。

其次，这次突破使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和通信联络受到了直接威胁。其结果是：

(甲)波兰第三集团军(基辅地域)因为怕被围而开始急速退却，这种退却后来变成全军四散逃走；

(乙)受到骑兵集团军主要打击的波兰第二集团军(别尔季切夫地域)仓卒退却；

(丙)左翼失去依靠的波兰第六集团军(日麦林卡地域)开始有秩序地向西撤退；

(丁)我军展开了猛烈的全线进攻。

这是日托米尔突破的第二个好结果。

最后，这次突破挫折了波兰人的骄气，粉碎了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动摇了他们坚定的士气。在突破以前，波兰部队非常轻视我们的军队特别是我们的骑兵，他们拚命反抗，不肯投降。只是在突破以后，波兰人才开始整批整批投降和大批地逃跑——这是波兰部队的刚毅精神被摧毁的第一个标志。布琼尼同志向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样写道："波兰地主学会尊重我们的骑兵了。"

四、来自南方的危险

我们在反波兰战线上的胜利是无疑的。这些胜利将继续扩大也是无疑的。但是，如果认为波兰人基本上已经完结，我们今后只是"向华沙进军"，那就是不应有的骄矜了。

这种破坏我们工作人员的毅力并助长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情绪的骄矜所以不切实际，不仅是因为波兰国内有预备队，它无疑会把这些部队投入前线，也不仅是因为波兰不是单独作战，在它背后有完全支持它反对俄国的协约国，而且首先是因为在我军后方出现了波兰的新盟友——弗兰格尔，他要从后方来破坏我们对波兰人的胜利果实。

不应当拿弗兰格尔不会和波兰人呼应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弗兰格尔已经和波兰人呼应了，而且正在和他们协同行动。

弗兰格尔匪徒的鼓舞者——在塞瓦斯托坡里出版的叔尔根的报纸"大俄罗斯报"在六月间的一份报上写道：

"毫无疑问，我们是以自己的进攻支持波兰人，因为我们牵制住一部分预定调到波兰战线的布尔什维克兵力。同样毫无疑问，波兰人也以自己的战役有力地支持着我们。对波兰人既不必同情，也不必厌恶；我们只应当遵循冷静的政治打算。今天和波兰人联合起来反对共

同的敌人是对我们有利的，而明天……明天再说。”

显然，弗兰格尔战线是波兰战线的继续，而其区别只在于弗兰格尔是在正和波兰人作战的我军的后方活动，就是说，在对我们最危险的地方活动。

因此，在弗兰格尔的危险还没有消除以前，就说“向华沙进军”和一般地说我军的胜利是巩固的，那是可笑的。何况弗兰格尔的力量正在增强，而又看不到我们采取了什么特别的重大的措施来对付来自南方的日益增长的危险。

五、记住弗兰格尔

由于我们向波兰人展开了进攻战役，我军战线形成弧形，弧口向西，两端向前，其中南端在罗夫诺地域，北端在莫洛杰奇诺地域。这叫做对波兰军队的包围形势，即对波兰军队威胁最大的形势。

毫无疑问，协约国是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因此，它千方百计地要把罗马尼亚拖入对俄战争，狂热地给波兰寻找新盟友，用一切力量支持弗兰格尔并极力设法挽救波兰人。协约国给波兰找到新盟友是完全可能的。

俄国一定能在本身找到力量来反击新的敌人，这是没有理由怀疑的。但是有一点毕竟应当记住：只要弗兰格尔完整无损，只要弗兰格尔有可能威胁我们的后方，我们的战线就不会是牢靠的，我们在反波兰战线上的胜利就不能是巩固的。只有消灭弗兰格尔才能认为我们对波兰地主的胜利是有保障的。因此，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当前的新口号：“记住弗兰格尔！”“消灭弗兰格尔！”

载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一日
“真理报”第一五一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241—244页

论共和国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弗拉基高加索城举行的
顿河和高加索共产党组织边区会议上的报告）

同志们！十月革命以前，在西欧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中间有过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爆发并获得胜利，而且有一些人推测这样的国家将是英国，另外一些人推测是比利时等等。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在无产阶级人数不多而且组织得很差的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中，例如在俄国开始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这个观点，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开始的，也就是在俄国开始的。

其次，一部分十月革命参加者曾经确信：只有在俄国革命之后西方紧接着爆发更深刻和更严重的革命的情况下，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胜利，这个胜利才能巩固，因为西方的革命能够支持并推进俄国革命；并且人们预料一定会爆发这种革命。这个观点也被事变推翻了，因为社会主义俄国没有得到西方无产阶级直接的革命支持，而是处在敌对国家包围之中，但是它胜利地存在和发展已经三年了。

原来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会在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中开始，而且还能获得胜利，向前发展，给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做榜样。

因此，列入会议议程的关于俄国目前形势的问题应该是：俄国这个多少是孤立无援的国家，这个被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绿洲，今后能不能像它过去那样支持下去，击破并消灭自己的敌人？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现在保证而且今后还能保证苏

维埃俄国存在和胜利的那些条件。这些条件是两方面的：不变条件(不取决于我们)和可变条件(取决于人们)。

我们应该首先把如下情况列入第一种条件：俄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可以在它的领土上长久地支持，失利时可以退入腹地，以便聚集力量重新转入进攻。如果俄国是一个小国，像匈牙利那样，只要敌人来一个猛烈攻击就会很快决定国家命运，很难回旋，没有退却地域，如果俄国是这样的小国，它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未必能够支持这样久。

其次，还有第二个有利于社会主义俄国发展的不变条件。这就是：俄国是世界上富有各种燃料、原料和粮食的少数国家之一，就是说，是一个在燃料、粮食等等方面独立的国家，是一个在这方面能够不依靠外国的国家。毫无疑问，如果俄国是靠外国的粮食和燃料生活(例如意大利)，那末它在革命的第二天就会陷入危急境地，因为敌人只要把它一封锁，它就会没有粮食和燃料。然而协约国对俄国实行的封锁，不仅仅损害了俄国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协约国本身的利益，因为协约国失去了俄国的原料。

但是除了不变条件以外，还有对于苏维埃俄国的存在和发展与不变条件同样必要的可变条件。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就是保证俄国有后备军的条件。问题在于：在俄国和协约国之间进行激烈战争的情况下(这个战争延续了三年，并且可能再延续三年)，战斗后备军的问题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协约国的后备军是什么呢？

我们的后备军是什么呢？

协约国的后备军首先是弗兰格尔的军队和年轻的资产阶级国家(波兰、罗马尼亚、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等等)的暂时还没有染上“阶级矛盾毒素”的年轻的军队。协约国在这方面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自己的反革命军队。由于西方有革命运动，协约国不能把自己的即

英、法等国家的军队调到俄国来；因此它必须利用别人的军队，这些军队虽然是由它资助的，但是它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像支配自己的军队那样去支配它们。这些军队按照协约国的训令行动这一事实，决不能否定协约国和那些有军队被协约国使用的国家的民族利益之间存在着摩擦，这种摩擦现在存在着而且将来还会存在。尽管协约国暗中挑拨，但是对波和约仍然签订了，这再一次证实这种摩擦的存在。而这种情况不能不破坏协约国战斗后备军的内部实力。

其次，协约国的后备军是反革命势力，他们在我军后方进行活动，组织各种游击活动和其他活动。

最后，协约国还有一种后备军，他们在被协约国所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行活动，目的在于窒息这些国家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

至于协约国在欧洲本部的后备军——那些旨在窒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各式各样的蝎子直到第二国际，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俄国的后备军首先是红军，也就是由工农组成的军队。同协约国雇佣和收买的军队不同，红军为本国的自由和独立作战，它的利益同它为之流血的那个国家以及命令它作战的那个政府的利益是融合为一的。苏维埃俄国的主要后备军的无穷尽的内部实力就在这里。

其次，俄国的后备军是西方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正在发展并转为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如果西方没有这个革命运动，那末协约国就会组成自己的反革命军队，就会敢于冒险对俄国事务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

最后，俄国的后备军是东方和协约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正转变为东方国家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公开革命运动，使协约国有失去原料和燃料来源地的危险。应该记住，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最弱的一环，打击这一环就会使协约国陷入危急境地。毫无疑问，东方的革命运动一定会给协约国造成没有信心和瓦解的气氛。

这就是我们的后备军。

这些因素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呢？

在一九一八年，苏维埃俄国就是一个俄国内地，它同原料、粮食和燃料产地(乌克兰、高加索、西伯利亚、土尔克斯坦)的联系被割断了，它没有强大的军队，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支持。那时协约国能够谈得上对俄国事务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并且也这样做了。过了两年，俄国的景象完全不同了。西伯利亚、乌克兰、高加索和土尔克斯坦都已经解放。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都已经被击溃。一部分年轻的资产阶级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宣布了中立。邓尼金的残余军队（弗兰格尔的军队）处在被歼灭的前夕。西方各国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巩固着自己的战斗机关——第三国际，同时协约国已经不敢梦想对俄国事务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东方反对协约国的革命运动正在增长，产生了自己的核心——革命的土耳其，建立了自己的战斗机关——行动和宣传委员会。

简单地说：协约国的后备军在一天一天地瓦解着，苏维埃俄国的后备军在一天一天地扩充着。很明显，现在，在一九二〇年，俄国失败的可能性比两年前小了，小得无比了。很明显，既然俄国在两年前经得住协约国的攻击，那末现在，当俄国的后备军在各个斗争领域中日益壮大的时候，它就更能经得住协约国的攻击。

这是不是说，同协约国的战争即将结束，我们可以放下武器，解散军队，开始和平劳动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协约国虽然勉强认可了对波和约签订的事实，但是根据一切材料来看，协约国并不打算放下武器，看样子它打算把战场转移到南方即南高加索地域；而且完全有可能，格鲁吉亚这个协约国的外妾将根据义务给协约国效劳。

协约国和俄国在地球上一起生活看来是太挤了，要在地球上确立和平，其中有一方必须灭亡。如果问题是这样，如果协约国这样提出

问题(而它只能这样提出问题)，那末很明显，俄国不能放下武器。相反地，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来使全国所有力量都动起来，以便打退新的进攻。加强和巩固我国自由和独立的保卫者——红军，全力支持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尽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支持那些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反对协约国斗争的东方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当前任务，如果我们想胜利，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全力以赴地来完成这些任务。

只要我们忠诚地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就必定胜利。

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提到一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西方革命要获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我是说要为西方革命建立粮食储备。因为西方国家(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是完全依靠供给欧洲粮食的美国的。如果资产阶级美国拒绝供给这些国家粮食(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末当这些国家革命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会遭到粮食恐慌。俄国没有特别的粮食储备，但是它毕竟是能够储备一些的，由于上述的粮食方面的前景很可能发生，应该立即提出在俄国为我们西方的同志建立粮食储备的问题。有些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但是要知道这个问题对于西方革命的进程和结局是有极重要的意义的。

载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共产党人报”(弗拉基高加索)
第一七二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4卷第267—271页

我们的意见分歧

（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我们在工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不在对工会的原则性的估价方面。托洛茨基经常援引的我们党纲中关于工会作用的那些人所共知的条文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现在有效，将来仍然有效。工会和经济机关应当而且一定要融合起来（“结合”），这是没有人争论的。我国现今的经济恢复时期要求目前还只是口头上的产业工会逐渐变成能振兴我国各基本工业部门的真正的产业工会，这是没有人争论的。简单地说，我们的意见分歧并不是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我们的意见分歧也很少涉及在工会和整个工人阶级中建立劳动纪律的必要性问题。有人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放松了缰绳”，因而使群众受自发势力的玩弄，这是一种未加思考的说法。党员在工会中和工会在工人阶级中的领导作用始终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我们的意见分歧更少涉及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成员的质量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机构的成员远不够理想，工会已被一连串军事动员和其他动员弄得空虚不堪，应当把工会旧的工作人员交还工会并增添新的工作人员，必须供给它们设备等等。

不，我们的意见分歧不在这方面。

一　对待工人群众的两种方法

我们的意见分歧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加强工人阶级的劳动纪律的**方式**问题；对待被吸引来参加恢复工业事业的工人群众的**方法**问题；把目前薄弱的工会变成能够恢复我国工业的强有力的真正的产业工会

的**途径**问题。

有两种方法：**强迫**方法（军事方法）和**说服**方法（工会方法）。第一种方法决不排斥说服的因素，而说服的因素在这里服从于强迫方法的要求并且是它的辅助手段。第二种方法也不排斥强迫的因素，而强迫的因素在这里服从于说服方法的要求并且是它的辅助手段。把这两种方法混淆起来是不能容许的，正像不容许把军队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一样。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批党的工作人员醉心于军队中军事方法的成就，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把这种方法搬到工人中间来，搬到工会中来，以便在巩固工会和恢复工业方面获得同样的成就。可是这批人忘记了军队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对军队适用的方法对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就可能是不适用的和有害的。

军队并不是单一的整体，它是由两个基本社会集团即农民和工人组成的，而前者比后者多好几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论证军队中主要采用强迫方法的必要性时所持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军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而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由此就产生了像政委制度和政治部、革命法庭、纪律处分、全面委任制等等纯粹军事性的工作方法。

与军队相反，工人阶级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集团，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鼓动，自愿地组织工会，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和精华。因此，主要采用说服方法是我们产业工会的实际工作基础，这是毫不足怪的。由此就产生了像解释、群众性的宣传、发挥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和自动精神、选举制等等纯粹工会的工作方法。

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他低估了军队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把军事组织和工会混为一谈，企图（大概是由于惰性）把军事方法从军队中搬到工会中来，搬到工人阶级中来。

托洛茨基在一个文件中说道：“把军事方法（命令、惩罚）和工会方法（解释、宣传、自动精神）单纯地对立起来就是考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偏见……在工人国家中把劳动组织和军事组织对立起来就是可耻地向考茨基主义投降。”

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把“考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等废话撇开不谈，很明显，托洛茨基不了解工人组织和军事组织之间的差别，不了解**在消除了战争和恢复工业的时期**把军事方法同民主方法（工会方法）对立起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而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中来是错误的、有害的。

这种不了解就是不久前出版的托洛茨基关于工会的一些论战性小册子的基础。

这种不了解就是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根源。

二　自觉的民主和被迫的“民主”

有些人认为，谈论工会内的民主是放空炮，是党内生活的某些现象所引起的时髦风气，认为关于民主的“空谈”将被厌弃，而一切将“照旧”进行。

另外一些人认为，工会内的民主在实质上是一种让步，是对工人的要求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让步，认为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在严肃认真地办事，不如说是在耍外交手腕。

不用说，这些同志大错特错了。工会内的民主，即通常称为“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是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所固有的自觉的民主，这种民主是以**认识到**对组织在工会内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经常采用说服方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一点为前提的。不认识到这一点，民主就会变成空谈。

当战争正在进行和危险迫近的时候，我们组织发出的“支援前线”的号召得到了工人热烈的响应，因为灭亡的危险在当时很容易觉察，因为这种危险十分具体，大家一目了然，这就是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的军队在向前推进并在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当时发动群众是不困难的。但是现在，当军事危险已经消除，而群众对于新的危险即经济危险（经济破坏）还远不那么容易觉察的时候，单靠号召来发动广大群众就不行了。当然，粮食和布匹的缺乏是大家都感觉到的，但是，第一、人们总是想尽办法寻找粮食和布匹，因此粮食不足和商品缺乏的危险远没有像军事危险那样鞭打群众；第二、谁也不会断言群众一定认识到经济危险（缺乏机车、农业机器、纺织工厂和冶金工厂，缺乏电站的设备等等）和不久以前的军事危险同样现实。为了推动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同经济破坏作斗争，就必须发挥广大群众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自动精神，必须用具体事实来说服他们，使他们**确信**经济破坏也和昨天的军事危险一样是现实的致命的危险，必须通过按民主方式建立起来的工会吸引千百万工人参加恢复生产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机关同经济破坏的斗争变成整个工人阶级的切身事业。否则就不可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

简单地说，自觉的民主，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是产业工会唯一正确的方法。

被迫的“民主”同这种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读了托洛茨基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后，可能认为托洛茨基在实质上“也”赞成“民主”方法。某些同志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工会的工作方法问题不是我们的分歧点。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托洛茨基的“民主”是被迫的、不彻底的、无原则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只能补充对工会不适用的军事官僚主义方法。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中央做了决定，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共产党党团根据中央的决定通过了下面的决议：“必须最坚决最有计划地反对由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式蜕化为官僚主义、刚愎自用、官场习气和对工会的琐碎监督……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人中央委员会）来说，因特殊条件而实行特殊管理方法（为此成立了铁道总政治部）的时期也开始结束”，因此，代表会议的共产党党团“建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大力推行和广泛使用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责成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积极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并以与其他工会组织同等的资格加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见“真理报”第二五五号）。但是，托洛茨基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竟不顾这项决议，在整个十一月份内继续实行半官僚主义半军事的老路线，照旧依靠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企图“整刷”和破坏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捍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对其他工会组织的特权地位。此外，托洛茨基在十一月三十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又“突然”声明说：“水运总政治部……在最近两三个月内**无论如何**还不能解散。”结果怎样呢？在这封信发出六天以后（十二月七日），同一个托洛茨基又在中央委员会“突然”赞成“立即撤销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并且根据正常的民主原则将这两个机关的全部人员和资产移交给工会组织”。他是赞成这一点而反对七个中央委员的八个中央委员之一，当时有七个中央委员认为撤销这些机关还不够，他们要求更换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现有的成员。为了挽救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现有的成员，托洛茨基赞同撤销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总政治部。

这六天内有什么变化呢？也许铁路员工和水运员工在这六天内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了吧？或者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国内或国外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化了吧？当然不是。问题在于水运员工坚决要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撤销总政治部，更换运

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而托洛茨基集团怕自己垮台，希望至少能保住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旧有的成员，于是不得不退却，做了一些谁也不能满足的局部的让步。

事实就是这样。

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被迫的、不彻底的、无原则的“民主”同“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毫无共同之处，党中央还在十一月初就提出了“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它对振兴我们的产业工会是非常必要的。

* * *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讨论会上，托洛茨基在他的结束语中反对把政治因素加进关于工会的争论中去，断言这和政治毫不相干。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根本不对的。未必用得着证明，在工农国家里，没有一项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决议，特别是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决议，可以不在一定方面反映国家的政治状况而被通过。并且一般说来，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是可笑的不严肃的。正因为如此，对每一项这样的决议必须预先也从政治方面来评价。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现在可以认为已经证实，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已经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实践推翻了。托洛茨基领导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并通过它去影响其他工会，本想活跃和振兴工会，吸引工人参加恢复工业的工作。可是事实上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的是：同工会内部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冲突，大多数工会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实际上的分裂，组织到工会中的工人“下层”痛恨“专员”。换句话说，不但没有使工会振兴起来，而且连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本身也开始瓦解了。毫无疑问，如果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搬到其他工会里去，那末那里也会出现同样一幅冲突、分裂和瓦解的图画。结果工人阶级中就会产生涣散和

分裂。

工人阶级政党能不顾这些事实吗？能不能断定说，我国工人阶级团结在统一的工会中或者分裂成不同的互相敌对的集团，这对我国的政治情况来说都是一样呢？能不能说，在估计对待群众的方法问题上政治因素不应当起任何作用，说这同政治毫不相干呢？

显然不能。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它联盟的各共和国现在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要管理这样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得到工人阶级牢固的信任，因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并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领导这样的国家。但是要保持和巩固大多数工人的信任，就必须不断发挥工人阶级的自觉性、自动精神和主动性，必须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断教育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吸引他们参加共产主义经济建设事业。

用强迫和从上面“整刷”工会的方法来实现这个任务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这些方法会分裂工人阶级(请看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引起对苏维埃政权的不信任。此外，不难理解，采用强迫的方法一般说来既不能发挥群众的自觉性，也不能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

显然，只有用“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只有用说服的方法，才能完成团结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自动精神和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的任务，为了发动全国去同经济破坏作斗争，这种信任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

可见，政治也是赞成用说服方法的。

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载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真理报”第十二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5—11页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十六日）

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一九二一年莫斯科版

一　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三月十日）

在直接谈到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当前的具体任务以前，必须确定几个前提，没有这些前提，民族问题就不能解决。这些前提涉及民族的出现、民族压迫的产生、民族压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形式以及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解决方式等问题。

这样的时期有三个。

第一个时期是西方封建主义消灭和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人们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民族的。我指的是英国（爱尔兰除外）、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西方，即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部分地区，封建主义消灭和人们形成为民族的时期与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时期在时间上大体是一致的，因此那里的民族在其发展时就具有国家的形式。这些国家内部没有其他比较大的民族集团，因此那里也就没有民族压迫。

在东欧恰恰相反，民族形成和封建割据消灭的过程与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在时间上不是一致的。我指的是匈牙利、奥地利和俄国。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开始，也许刚刚开始，然而为了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东方人的侵犯，必须立即建立能够抵

御外侮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东欧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过程比民族形成的过程要快些，所以在那里就建立了混合的国家，这些国家是由尚未形成为民族但已结合在一个国家中的几族人民组成的。

这样，第一个时期的特征就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出现了民族，并且在西欧产生了没有民族压迫的纯粹的民族国家，在东欧则产生了多民族国家。在这些多民族国家里，有一个比较发达的民族居于统治地位，其余不大发达的民族则在政治上以至后来在经济上都受统治民族支配。东欧的这些多民族国家成了民族压迫的发源地，而民族压迫产生了民族冲突、民族运动、民族问题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方式。

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方式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西方帝国主义出现的时期。这时，资本主义为了寻求销售市场、原料、燃料和廉价劳动力，为了争取输出资本和获得铁路与海上的交通干线而跳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靠侵占远近各邻国来扩张自己的领土。在这第二个时期，西方的旧民族国家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已不再是民族国家了，就是说，它们因夺得了新的领土而变成了多民族的殖民国家，因而也就成了在东欧早已存在的那种民族压迫和殖民压迫的舞台。在东欧，这个时期的特征是从属民族（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觉醒和兴起了，这种情况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就造成了旧的资产阶级多民族国家的崩溃和在所谓的列强奴役下的新的民族国家的成立。

第三个时期是苏维埃时期，是资本主义消灭和民族压迫消除的时期，这时，统治民族和从属民族、殖民地和宗主国的问题都放到历史档案库里去了。这时，我们看到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上有许多民族站起来了，它们有着同等发展的权利，但是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落后，还保存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某些不平等。这种民族不平等的实质是：由于历史的发展，我们从过去继承了一种遗产，这就是一个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在政治上和工业上比其他民族发达些。因此就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一年之内就

能铲除的，但是，只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就一定能够把它铲除。

这就是历史上所经过的民族问题发展的三个时期。

前两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这两个时期内，有些民族受到压迫和奴役，因此民族斗争仍然存在，民族问题没有解决。然而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在第一个时期，民族问题并没有越出个别多民族国家的范围，只是涉及不多的几个民族，主要是欧洲的一些民族；而在第二个时期，民族问题就由国内的问题变成国际的问题，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彼此间为了控制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为了使欧洲境外的新的部族和部落隶属于自己而进行战争的问题了。

这样，过去仅仅对那些文明国家有意义的民族问题，在这个时期就失去了它的孤立性，而同整个殖民地问题融合起来了。

民族问题发展成整个殖民地问题，并不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这一发展首先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各交战国的帝国主义集团本身不得不求助于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得人力来建立军队。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即帝国主义者必然求助于殖民地各落后部族的过程，不能不唤醒这些部落和部族去谋求解放，进行斗争。其次第二个因素是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土耳其并且使它亡国的尝试，这一因素使民族问题扩大和发展成了整个殖民地问题，使它由解放运动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蔓延到全球各地。土耳其在国家制度方面是伊斯兰教民族中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它不堪忍受这种前途，于是就举起了斗争的旗帜，把东方各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来反对帝国主义。第三个因素是苏维埃俄国的出现。苏维埃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就自然而然地鼓舞了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唤醒了它们，发动它们去进行斗争，从而为建立一条从爱尔兰到印度的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战线提供了可能性。

民族压迫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的这一切因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资

产阶级社会不仅没有解决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奠定民族之间的和平，反而使民族斗争的星星之火燃烧成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燎原烈火。

很明显，唯一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唯一能够创造条件保证不同民族和部落和睦共处、兄弟合作的制度，是苏维埃政权的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

未必用得着证明，在资本统治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存在的情况下，民族权利平等是不可能得到保证的，只要资本政权还存在，只要争夺生产资料的斗争还在进行，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民族权利平等，也不可能有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合作。历史证明，消灭民族权利不平等的唯一方法，建立被压迫民族和非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兄弟合作的制度的唯一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苏维埃制度。

其次，历史表明，虽然某些民族已经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以及从“异族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就是说，虽然它们自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制度，但是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没有邻近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它们就不能单独存在和顺利地捍卫自己的单独存在。匈牙利的例子雄辩地证明：如果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联盟，如果它们没有团结成统一的军事经济力量，那末无论在军事战线上或经济战线上都不可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是国家联盟最适当的形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是这一形式活的体现。

同志们，这就是我首先要在这里谈到的一些前提，目的是为了在下面论证我们党在解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民族问题方面采取某些步骤的必要性。

虽然俄罗斯和同它联盟的各共和国在苏维埃制度下已经没有统治民族和无权民族、宗主国和殖民地、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了，但是民族问题在俄罗斯仍然存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民族问

题的实质就是要消灭过去遗留下来的某些民族的事实上的落后性（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使各落后民族有可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赶上俄国中部。

在旧制度下，沙皇政权不努力也不可能努力发展乌克兰、阿捷尔拜疆、土尔克斯坦和其他边疆地区的国家制度，它反对发展边疆地区国家制度，也反对发展它们的文化，力图用暴力同化当地的土著居民。

其次，旧的国家、地主和资本家留下了像柯尔克兹人、彻岑人、沃舍梯人这些被摧残的部族，它们的土地过去是俄罗斯哥萨克和富农分子的殖民对象。它们过去注定要遭到浩劫和灭亡。

其次，大俄罗斯民族过去是统治民族，它的这种地位甚至在俄罗斯共产党员中间也留下了一些影响，这些俄罗斯共产党员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去接近当地居民中的劳动群众，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摆脱落后和不文明。我指的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俄罗斯共产党员，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忽视边疆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特点，有时表现出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

再次，非俄罗斯民族受过民族压迫，它们的这种地位对当地居民中的共产党员也不无影响，这些共产党员有时不善于把本民族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同所谓“全民的”利益区别开来。我指的是有时在非俄罗斯共产党员中间可以看到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东方就表现为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

最后，必须把柯尔克兹人、巴什基里亚人和一些山民部落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剥夺富农殖民者以保证他们得到必要的土地。

构成我国民族问题实质的一些问题和任务就是这样。

在说明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些当前的任务之后，我想来谈谈一般的任务，即谈谈使我们共产党在边疆地区的政策适合于那些主要存在于东部的经济生活的特殊条件的任务。

问题在于：有许多部族，主要是突厥语系各部族（它们大约有二千五百万人），还没有经过或者还没有来得及经过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因此，它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它们必须越过工业资本主义，从原始经济形态转到苏维埃经济阶段。为了进行这项艰巨的但决不是不可能的工作，必须考虑到这些部族的经济状况，甚至要考虑到它们过去的历史、生活习惯和文化的一切特点。把那些在俄国中部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措施搬到这些部族里去，是不可思议的和危险的。显然，在实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在这些边疆地区所碰到的经济状况、阶级结构和过去历史方面的一切特点。更不用说有些荒唐的事情是必须消除的，例如柯尔克兹伊斯兰教居民从来不养猪，而粮食人民委员部却按摊派方式要他们交猪。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有些人是多么不愿意注意初到那里去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生活习惯的特点。

刚才有人递了一张条子给我，要我答复契切林同志的论文。同志们，契切林的论文我仔细地读过了，我认为他的论文除了舞文弄墨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这篇论文中有四点错误或者说四点误解。

首先，契切林同志有否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倾向，他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者的国际联合，而忽略了和过低估计了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之间的内部矛盾，可是这种矛盾存在着，并且正酝酿着战争。他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上层联合的因素，而过低估计了这个“托拉斯”内部的矛盾。可是这些矛盾存在着，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活动正是以这些矛盾为依据的。

其次，契切林同志犯了第二个错误。他过低估计了占统治地位的列强同不久前成立的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受这些列强支配的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芬兰等）之间的矛盾。契切林同志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尽管这些民族国家隶属于列强，或者确切些说，正是

由于这种隶属关系，列强同这些国家之间才存在着各种矛盾，例如在列强同波兰、爱沙尼亚等国的谈判中就显露出了这些矛盾。外交人民委员部存在的作用就在于估计这一切矛盾，以这些矛盾为依据，并在这些矛盾的范围内随机应变。契切林同志竟过低估计了这一点，令人大为吃惊。

契切林同志的第三个错误，就是他过多地谈论民族自决这个实际上已变成便于帝国主义者利用的空洞口号。奇怪的是契切林同志竟忘记了我们抛弃这个口号已经两年了。在我们党纲中已经不再有这个口号了。我们党纲中所说的已经不是民族自决这个十分含糊的口号，而是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这个更清楚更明确的口号。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奇怪的是契切林同志在他的论文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他对那个已经是含糊不清的口号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是无的放矢，因为不论在我的提纲中或者在党纲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自决”。那里谈到的只是关于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而现在，在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口号对我们来说是革命的口号。因为各苏维埃国家是根据自愿原则联合成联邦的，所以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意志没有使用分离权。因为我们所说的是那些受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压制的殖民地，是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土耳其、印度斯坦这类从属国家，即那些殖民地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各民族有分离权的口号就是革命的口号，抛弃这个口号就是为帝国主义者效劳。

第四个误解就是在契切林同志的论文中缺少实际的意见。写文章当然是容易的，但是，既然文章的标题是“反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那就应当提出一些重要的东西，至少应当提出几个实际的反建议。可是我在他的论文中并没有找到一个值得倾听的实际建议。

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尝试中使民族

问题扩大为殖民地问题了，并且造成了一条从爱尔兰到印度斯坦的反对自己的新战线。唯一能够提出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即苏维埃国家。在苏维埃联邦国家内，不再有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民族压迫已经消灭，但是，由于文化较发达的民族和文化不大发达的民族之间还存在着旧的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民族问题就具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要求规定一些措施来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使他们有可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无产阶级的俄国中部。由此就产生了一些实际建议，这些建议构成了我所提出的关于民族问题提纲中第三部分的内容。（鼓掌）

二　结　　论

（三月十日）

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的讨论方面最大的特征，就是我们已经从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宣言，经过重新划分俄国行政区域，进到在实践上提出问题了。在十月革命初期，我们只是宣布了民族分离权。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〇年，为了使各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接近俄罗斯无产阶级，我们按照民族特征重新划分了俄国的行政区域。而现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则把党对各自治区和同俄罗斯联盟的各独立共和国的劳动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应当采取的政策问题完全提到实践上来了。因此，查东斯基的关于提交大家的提纲带有抽象性质的说法使我感到惊奇。我手头有他自己的提纲，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提纲提交代表大会审查。在他的提纲中，我没有找到一个实际建议，除了提出用“东欧”一词代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用“俄罗斯”或“大俄罗斯”一词代替“俄国”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建议。我在这个提纲中没有找到其他实际建议。

现在来谈谈下面一个问题。

应当说，我本来对发言的代表抱的希望很大。俄国共有二十二个边疆地区，在这些边疆地区中，有的工业非常发达，在工业方面和俄国中部很少有差别，有的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同俄国中部有根本的差别，另一种则是完全闭塞的。要把边疆地区这一切不同的情况都非常具体地包括在提纲内是不可能的。决不能要求有全党意义的提纲仅仅带有土尔克斯坦的性质，仅仅带有阿捷尔拜疆或乌克兰的性质。必须撇开细节，抓住各个边疆地区的共同特点，把它们列入提纲。其他起草提纲的方法在天地间是没有的。

必须把非大俄罗斯民族划分为几类，这在提纲中已经做了。非俄罗斯民族大约有六千五百万人。所有这些非俄罗斯民族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在国家制度的发展方面都落后于俄国中部。我们的任务是尽一切力量帮助这些民族，帮助它们的无产阶级分子和劳动者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苏维埃国家机关。这种共同之点在提纲中，在提纲的实践部分中，都已经提到了。

其次，如果要使各边疆地区的特点更加具体化，就必须从大约六千五百万非俄罗斯民族的总人口中划出二千五百万左右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突厥语系民族人口。米高扬同志说阿捷尔拜疆的发展程度在某些方面比俄罗斯各省高，这是不对的。他显然是把巴库和阿捷尔拜疆混为一谈了。巴库不是从阿捷尔拜疆内部发展起来的，而是经过诺贝尔、路特希尔德、维沙乌等人的努力从上面建造起来的。至于阿捷尔拜疆本身，那它是一个最落后的父权制封建关系的国家。因此，我把整个阿捷尔拜疆列入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一类边疆地区，对于这类边疆地区，必须采用特殊的方法把它们纳入苏维埃经济的轨道。关于这一点提纲里也说到了。

其次，还有第三类，这一类的人口不超过六百万，主要是还保留着氏族生活方式的游牧部落，它们还没有进入农业经济。这主要是柯

尔克兹人、土尔克斯坦北部、巴什基里亚人、彻岑人、沃舍梯人、英谷什人。对于这一类民族，首先必须保证它们有土地。这里没有让柯尔克兹人和巴什基里亚人发言就停止了讨论。他们对于居于山地的巴什基里亚、柯尔克兹和山民因无土地而日渐死亡的痛苦，是能够谈得更多一些的。而萨发罗夫关于这一点所说的只能涉及六百万人口的这一类。因此，把萨发罗夫的实际建议运用到一切边疆地区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对其余的约有六千万人口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这些修正是毫无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我不反对把萨发罗夫对某些民族所提出的某几点意见加以具体化、补充和修正，但是必须说明，决不能到处运用这些修正。其次，我必须对萨发罗夫的一项修正提出批评。在他这项修正中有一句关于“民族文化自决”的话。

那里写道：“在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实行帝国主义的政策，俄国东部边疆地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无法通过实行本民族文化自决和用本族语言进行教育的方法来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成果”等等。

我必须说，我不能接受这项修正，因为它带有崩得主义的色彩。民族文化自决是崩得的公式。我们早就抛弃了那些含糊不清的自决口号，恢复它们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整句话不过是一些字的矫揉造作的堆砌。

其次，我接到一张条子，上面说我们共产党员似乎在人为地培植白俄罗斯民族。这是不对的，因为白俄罗斯民族存在着，它有和俄罗斯语言不同的语言，因此，只有使用白俄罗斯本族的语言，才能提高白俄罗斯人民的文化。大约五年前，关于乌克兰，关于乌克兰民族，也有人说过同样的话。就在不久以前还有人说，乌克兰共和国和乌克兰民族是德国人臆造出来的。可是很明显，乌克兰民族存在着，发展它的文化是共产党员的义务。违背历史是不行的。很明显，如果乌克兰的各个城市至今还是俄罗斯人占优势，那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城市必然会乌克兰化。大约四十年前，里加是一个德国人的城市，但是，由于城市是依靠农村发展的，而农村又是民族的保存者，因此里加现在就成了纯粹拉脱维亚人的城市了。大约五十年前，匈牙利所有的城市都带有德国性质，可是它们现在都马札尔化了。白俄罗斯将来也会这样，虽然现在在它的各个城市中非白俄罗斯人还占优势。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建议代表大会选举一个由各区域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便讨论提纲中我们所有边疆地区都感到兴趣的实际建议，使它们更加具体化。（鼓掌）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23—33页

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二一年三月）

列宁同志！

最近三天我有机会读完了“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汇编。疾病帮了我的忙（因祸得福！）。一本出色的、编得很好的书。一个不带引号的真正统一的和真正国家的经济计划的杰出草案。这是现代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尝试，要给经济落后的俄国的苏维埃上层建筑奠定在目前条件下真正现实而唯一可能的技术生产基础。

你还记得去年托洛茨基提出的在战前工业的废墟上依靠大量使用不熟练的工农群众（劳动军）的劳动使俄国“经济复兴”的“计划”（他的提纲）吧。这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比较起来，是多么贫乏、多么落后！真是一个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个自命为负有用古代传说“拯救”俄国的使命的易卜生剧作中的英雄…… 而常常出现在我们报刊上使我们感到羞耻的几十个“统一的计划”有什么价值呢，——简直是预备班学生说的孩子话…… 还有那仍然在“批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和满脑子保守思想的李可夫的庸俗“现实主义”（其实是马尼洛夫精神）……

我的意见是：

（一）不要再浪费一分钟去空谈计划；

（二）立即开始实际行动；

（三）我们在输送物力和人力、恢复企业、分配劳动力、供应食物、组织供应站和供应工作本身等等方面的工作，至少要有三分之一服从于这一行动的利益（三分之二应“当前”的需要）。

（四）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虽然具有一切优良的

品质，但仍然缺乏健康的求实精神（在一些文章中使人感到有教授式的软弱气息），因此必须给他们的计划委员会增添一些具有实际经验、能够按照“汇报执行情况”和“按期完成”等原则办事的人。

（五）责成“真理报”、“消息报”、特别是“经济生活报”广泛宣传“电气化计划”，既宣传计划的基本内容，也宣传同各个方面有关的具体内容，让人们记住：**只**存在**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即“电气化计划”，其余的一切“计划”不过是无谓而有害的空谈。

你的 **斯大林**

写于一九二一年三月
第一次载于“斯大林五十寿辰纪念文集”
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34—35页

论民族问题的提法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

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和第二国际及第二半国际的活动家、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等有本质的不同。

指出作为民族问题新提法的最显著的特征的四个要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们在对民族问题的新旧理解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

第一个要点是作为局部的民族问题和作为整体的殖民地解放的总问题融合起来了。在第二国际时代，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只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捷克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阿尔明尼亚人、犹太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社会主义者”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不文明的”黑人和“文明的”爱尔兰人、“落后的”印度人和“有教养的”波兰人相提并论。当时人们都默默地认为：如果也需要为欧洲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那末“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就完全不应当真正谈到为“保存”“文明”所“必需”的殖民地的解放。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甚至并不认为，如果亚洲和非洲殖民地人民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欧洲民族压迫的消灭是不能想像的，他们并不认为前者和后者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共产党人首先揭示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联系，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联系，并且把它作为自己革命实践的基础。因而，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帝国主义的“文明的”奴隶和“不文明的”奴隶之间的那堵墙就被推倒了。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

了把落后的殖民地的斗争和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配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

第二个要点是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国家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一明确的革命口号代替了含糊不清的民族自决权口号。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谈到自决权的时候，通常总是不提国家分离权，至多只把自决权解释为一般自治权。民族问题“专家”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欧洲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自治权，就是说，被压迫民族**在**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的**条件下**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自决权变成统治民族享有政治权力的特权，而关于国家分离的问题则撇开不谈。第二国际的思想首领考茨基基本上同意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对自决所做的这个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解释。帝国主义者抓住这个对他们有利的自决口号的特点并把它宣布为自己的口号，这是不足为奇的。大家知道，以奴役各族人民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在自决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含糊不清的自决口号就从民族解放、民族权利平等的工具变成驯服各民族的工具，变成使各民族顺从帝国主义的工具了。最近几年的世界事物的进程，欧洲革命的逻辑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增长，都要求抛弃这个已变成反动的口号，而代之以另一个革命的口号，即能够消除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劳动群众对统治民族无产者不信任的气氛的口号，能够为民族权利平等和这些民族劳动者的团结扫清道路的口号。共产党人提出的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国家分离权的口号就是这样的口号。

这个口号的优点就在于它能够——

（一）消灭某一民族劳动者怀疑另一民族劳动者有掠夺意图的任何根据，从而为相互信任和自愿联合打下基础；

（二）摘下帝国主义者一面虚伪地谈论自决，一面却力图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顺从自己并把它们强留在自己的帝国主义国

家范围内的假面具，从而加强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

未必用得着证明，如果俄罗斯工人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宣布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如果他们不用事实证明自己有实现各民族的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决心，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芬兰的“权利”（一九一七年），如果他们不从波斯北部撤出军队（一九一七年），如果他们不放弃对蒙古、中国某些领土的野心等等，那末他们就不会得到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同志对自己的同情。

同样不容置疑，用自决的旗帜巧妙地掩盖起来的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近来在东方仍然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政策在那里遇到了在以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的口号的精神进行鼓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日益发展的解放运动。这一点是那些因巴库“行动和宣传委员会”犯了一些不关紧要的过错而拚命辱骂它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所不了解的，但是任何一个愿意知道上述“委员会”成立一年以来的活动和近两三年来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人，都一定会了解的。

第三个要点是对民族殖民地问题同资本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的揭示。在第二国际时代，民族问题的范围被缩小到极点，通常被看做是孤立的、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联系的。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只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一些改良的办法，民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认为不根本解决民族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也能实现，相反地，不推翻资本政权，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民族问题也能解决。这种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对事物的看法像一根红线贯穿在石普林格尔和鲍威尔关于民族问题的人所共知的著作中。但是最近十年以来，对民族问题的这种理解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和十分腐朽的。帝国主义战争表明，近几年来的革命实践也再次证实——

（一）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是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的；

（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不能生存；

（三）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推翻资本政权就不能获得解放；

（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能巩固。

如果欧洲和美洲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进行主要战斗的前线和舞台，那末具有原料、燃料、粮食和大批人力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应当算做帝国主义的后方和后备军，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不仅要在前线打胜仗，而且要使敌人的后方、敌人的后备军革命化。因此，只有在无产阶级善于把自己的革命斗争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政权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认为有保证。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活动家忽略了这件“小事”，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同在西方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权问题分割开来了。

第四个要点是给民族问题加进了新的因素，即加进了使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只是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帮助和协助落后民族提高到走在它们前面的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这是建立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在第二国际时代，通常只限于宣布“民族权利平等”。至多也不过是要求实现这种权利平等。但是民族权利平等本身是很重要的政治成果，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和可能来行使这个极重要的权利，那它就有变成空谈的危险。毫无疑问，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没有力量像先进民族的劳动群众那样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他们的权利，因为某些民族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性（文化的、经济的）不是一两年内就能消灭的，人们还是能感觉得到的。这种情

况在俄国也可以感觉得到，这里有许多民族还没有来得及经过资本主义，而有些民族根本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这里民族权利平等虽然已经完全实现，但是，由于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落后，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还没有力量充分使用他们已经取得的权利。这种情况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后的“第二天”还将更强烈地使人感觉得到，因为那时处于各个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无数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必将登上舞台。正因为如此，胜利了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帮助，真正地和长期地帮助落后民族的劳动群众发展文化和经济，帮助他们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没有这种帮助，就不可能建立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十分必需的不同民族和部族的劳动者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不能只限于“民族权利平等”，必须从“民族权利平等”转到采取使各民族事实上平等的办法，转到制定并实行下列实际措施：

（一）研究落后民族和部族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文化；

（二）发展它们的文化；

（三）对它们进行政治教育；

（四）把它们逐步地无痛苦地引向高级的经济形式；

（五）建立落后民族劳动者和先进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合作。

说明俄国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的新提法的四个要点就是这样。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

载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
“真理报”第九十八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36—40页

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必须指出我们党的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这是我们党的**形成**、党的**建立**时期。它大致包括从创办“火星报”到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段时期（一九〇〇年底至一九〇五年初）。

在这个时期，党作为动力来说是软弱的。它所以软弱，不仅因为它年轻，而且还因为整个工人运动年轻，没有或者只有不大发展的革命环境和革命运动，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农民默不作声或者至多是背后发些怨言；工人只知道局部的经济罢工或全市性的政治罢工；运动的形式带有地下的或半公开的性质；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也主要是带有地下的性质）。

由于战略是以拥有后备力量和可能灵活运用后备力量为前提，因此党的战略必然是狭窄的，受限制的。党只限于制定运动的战略计划，即规定运动应当遵循的道路，由于党的软弱，党的后备力量——俄国国内外敌人阵营中的矛盾还没有被利用或者几乎没有被利用。

由于策略是以对种种运动形式和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利用、这些形式的配合和互相补充等等为前提来争取群众和保证战略胜利的，因此党的策略也必然是狭窄的，没有广大的活动范围的。

党在这个时期最注意和最关心的是党的本身，是党的生存和党的保存问题。这个时期党被看做是某种独立自在的力量。沙皇政府对党的疯狂进攻，以及孟什维克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党和用不定形的非党团体来代替党的干部（请回忆一下一九〇五年从阿克雪里罗得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小册子“人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出版后开始的孟什维克

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运动），都威胁着党本身的生存，因此，保存党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俄国共产主义在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是：把工人阶级中最积极最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组成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站稳脚跟。列宁同志是这样表述这个任务的：“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见“……幼稚病”）

第二个时期——这是**把广大工农群众争取到**党方面来，争取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方面来的时期。它大致包括一九〇五年十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这段时期。

这个时期比前一个时期的情况复杂得多，发生的事件也多得多。一是沙皇政府在中国东北战场上的失败和一九〇五年十月的革命，一是日俄战争的结束、反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成果的葬送，还有帝国主义战争、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和有名的“两个政权并存”，——这一切事件激动了俄国的各个阶级，把它们一个个地推上了政治舞台，巩固了共产党，唤醒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政治生活。

无产阶级运动增添了像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这样强有力的形式。

农民运动增添了对地主的抵制（把地主“赶出”庄园），这种抵制后来就变成了起义。

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的活动因争得了国会外的、合法的和公开的工作形式而活跃起来了。

工人阶级的组织不仅增添了像工会这样久经考验的和重要的形式，还增添了像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史无前例的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组织形式。

农民步工人阶级的后尘，也选出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党的后备力量也增多了。在斗争过程中表明农民能够而且一定会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同时也表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推翻资本政权事业中的领导作用。

党在这个时期已经远不像前一个时期那样软弱了；作为动力来说，党已经成了极重要的因素。现在它已不会再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力量了，它的生存和发展确实有了保证，现在它由独立自在的力量变成争取工农群众的工具，变成了领导群众进行推翻资本政权斗争的工具。

党的战略在这个时期有了广大的活动范围；它首先是用来保证和利用农民这种后备力量，而且这个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党的策略也有了广大的活动范围，因为群众运动、群众组织、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的活动增添了过去所没有的新形式。

党在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是：把千百万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方面来，争取到党方面来，以便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党最关心的已经不是党本身，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列宁同志是这样表述这个任务的：要在社会战线上“布置千百万群众”，以便保证“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获得胜利。（见列宁同志的上述小册子）

我们党的前两个发展时期的特征就是这样。

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之间的差别无疑是很大的。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共同之处。无论在第一个时期或在第二个时期，党十分之九是甚至完全是**一国的**力量，只对俄国或在俄国内部起作用（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队伍之一）。这是第一。第二、无论在第一个时期或在第二个时期，俄国共产党都是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和革命的党，因此在这两个时期内党的主要工作是批评和破坏旧制度。

我们现在所处的第三个时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第三个时期——这是**夺取和保持政权**的时期。其目的一方面是吸引俄国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和红军的**建设**，另一方面是用一切人力和物力**帮助**国际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的斗争。它包括一九一七年十月到目前这段时期。

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无论在国际方面或在俄国内部，都形成了一种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完全特殊的局面。

首先，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标志着世界社会战线的突破，并且在整个世界历史中造成了一个转变。请想一想从落后的殖民地到先进的美国这条广阔的社会战线，后来国际无产阶级的俄国部队强有力地突破了这条战线，这一突破威胁了帝国主义的生存，打乱了帝国主义鲨鱼的一切如意算盘，并且促进了，从根本上促进了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这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从那时起，我们党就从**一国的**力量变成了主要是**国际的**力量，而俄国无产阶级也就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落后部队变成了它的**先锋队**。从此以后，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扩大俄国这个缺口，帮助走在前面的先锋队，不让敌人包围这个勇敢的先锋队和使它离开基地。相反地，国际帝国主义的任务是要堵塞，一定要堵塞俄国这个缺口。正因为如此，我们党要想保持政权，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自己的。——斯大林注）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从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就从一国的力量变成了国际的力量，变成了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变革的党。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党在**国内**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前两个时期，党是破坏旧制度和推翻俄国资本的杠杆。而现在，在第三个时期则相反，它已由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建设的党，变成了创造新的经济形式的党。从前党吸收优秀工人是为了冲击旧制度，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做好粮食、运输和各基本工业部门的工作。从前党吸引农民中的革命分子是为了打倒地主，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改善农业，巩固劳动农民和执政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从前党吸收各落后民族中的优秀分子是为了同资本作斗争，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根据同俄罗斯无产阶级合作的原则来安排这些民族中劳动者的生活。从前党摧毁军队，摧毁旧的将军的军队，现在党必须建立为保卫革命成果免受外敌侵犯所必需的新的工农军队。

俄国共产党从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从事和平建设的党。正因为如此，党在无产阶级武库中取消了现在俄国已经不需要的罢工、起义等斗争形式。

从前，没有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行家也过得去，因为当时党的工作主要是批评性的，而批评是容易的……现在党不能没有各方面的行家了；党除了利用旧专家以外，还必须培养**自己的**行家，如编制工作人员、供应工作人员、作战参谋人员（军事方面的）、粮食工作人员、农业工作人员、铁路工作人员、合作社工作人员、工业和对外贸易的行家（经济方面的）。不这样做就不能进行建设。

从党的人力物力和党的后备力量大大扩大和增多的意义上来说，党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

党的后备力量是：

（一）俄国内部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

（二）周围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有时酿成军事冲突的矛盾和纠纷。

（三）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主义运动。

（四）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

（五）俄国的农民和红军。

（六）外交机关和对外贸易机关。

（七）国家政权的全部威力。

一般说来，就是这样一些力量和可能性，党的战略可以在这些力量和可能性的范围（这些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内灵活运用，党的策略也可以在这种基础上进行日常的动员力量的工作。

这一切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积极的方面。

但是，十月革命也有它的阴暗的方面。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国内外特殊的条件下取得政权的，这些条件给党在取得政权以后的全部工作打上了烙印。

第一、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第二、俄国至今还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如果苏维埃俄国邻近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者几个苏维埃国家，那就能很容易根据以原料换取机器和装备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形式和对外贸易——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不这样就很难指望在经济建设方面和在国家电气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将是缓慢而痛苦的，但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某些性情急躁的同志忍耐不住了，要求迅速取得成绩和采取有效措施，但是必然性依然是必然性。

从经济方面来说，目前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纠纷和军事冲突，正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样，它的根源是目前的生产力同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本国帝国主义的框子以及同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的框子和资本主义的形式窒息和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根据先进的（工业的）和落后的（燃料和原料的）国家之间建立经济合作的原则（而不是根据前者掠夺后者的原则）来组织世界经济。正因为如此，就需要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否则休想组织和正常地发展世界经济。但是要开始（至少是**开始**）建立合理的世界经济，无产阶级至少必须在几个先进国家获得胜利。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党就必须寻求同各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迂回道路。

正因为如此，在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举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以后，只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

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的党的政策还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党就认为实行“放纵”我国的小生产和小工业的政策，实行在国家政权控制下容许资本主义局部恢复和吸引租赁者和股东等等政策是适宜的。

这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所造成的一些积极的和阴暗的特殊条件，我们党在第三个时期就是在这些条件下活动和发展的。

我们党目前在俄国国内或国外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威力就是由这些条件决定的。党所面临的而且无论如何应当加以克服的那些意料不到的困难和危险，也是由这些条件决定的。

这个时期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由我们这个国际革命的党的地位决定的。这些任务就是：

（一）利用包围我国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和各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的一切矛盾和纠纷来瓦解帝国主义。

（二）不惜人力和物力帮助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

（三）采取一切办法加强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

（四）巩固红军。

这个时期党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任务是由我们这个从事和平建设工作的党在俄国内部的地位决定的。这些任务就是：

（一）巩固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其方法是：

（甲）吸引农民中最主动和最有办事能力的人参加国家建设工作；

（乙）在推广农业知识和修理机器等等方面帮助农民经济；

（丙）发展城乡间正常的物资交流；

（丁）使农业逐步电气化。

应当记住一个重要的情况。与西方的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不同，我国革命的一个可庆幸的特点和我们党的巨大的优点是：小资产阶级中最广大最有力的阶层——农民在俄国已经从资产阶级可能的后备力量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后备力量。这种情况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因而有利于俄国无产阶级。这主要是因为和西方的情况不

同，俄国农民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摆脱地主的奴役而获得解放的。在这个基础上也就形成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共产党员的责任是要珍视和巩固这个联盟。

（二）发展工业，其方法是：

（甲）集中最大限度的力量掌握各基本工业部门和改善这些部门的工人的供应工作；

（乙）发展对外贸易以输入机器和装备；

（丙）吸引股东和租赁者；

（丁）储存即使是最少数量的机动粮；

（戊）使运输业和大工业电气化。

一般说来，党在其目前发展时期的任务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一九〇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68—75页

前　途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国际局势在俄国生活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俄国也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一样同邻近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首先因为俄国是一个苏维埃国家，它对资产阶级世界是一个“威胁”，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它受到敌对的资产阶级国家阵营的包围。因此很明显，这个阵营的状况，这个阵营内部斗争力量的对比，对于俄国就不能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下面这一事实应该认为是表明国际局势特征的主要因素：公开战争时期已经被“和平”斗争时期代替了；作为资产阶级反革命首领的协约国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进部队的俄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相互承认对方的斗争力量，并已实行停战。斗争表明，我们（工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刻消灭帝国主义。但是斗争也表明，他们（资产者）**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扼杀苏维埃俄国。

由于这种情况，世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害怕”或“恐惧”（如他们在红军进攻华沙时所表现的）已经烟消云散。与此同时，欧洲的工人几乎每次得到苏维埃俄国的消息都要表现出的那种无限的热情，也在消失了。

冷静估计力量的时期到来了，为准备和积蓄力量迎接未来战斗而进行细致工作的时期到来了。

这并不是说，还在一九二一年初就已形成的某种力量均势仍然毫无变动。情形远不是这样。

世界资产阶级由于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遭到革命的打击，现在他们恢复过来、苏醒过来以后，就从防御转为向“他们自己的”工人进

攻，巧妙地利用工业危机，把工人抛到更坏的生活条件下（工资的降低，工作日的延长，大批群众的失业）。这种进攻所造成的后果在德国格外惨重，那里（除了其他一切原因）马克的大大贬值使工人的状况更加恶化。

因此，在工人阶级中间就产生了为建立工人的统一战线和争取成立工人政府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特别是在德国），这个运动要求工人阶级中一切或多或少带有革命性的派别（从“温和的”到“极端的”）达成协议和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没有理由怀疑，在争取成立工人政府的斗争中共产党员将站在最前列，因为这个斗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进一步瓦解，使现在的共产党变成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

但是，问题决不限于资产阶级向“他们自己的”工人进攻。资产阶级知道，不制服俄国，就不能击溃“自己的”工人。因此，资产阶级不断地加紧工作，准备向俄国发动比过去一切进攻更复杂更严重的新进攻。

当然，他们现在正同俄国而且将来还会同俄国签订贸易协定和其他协定，这对俄国来说是有极大意义的。但是不应当忘记，贸易的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代表团和团体源源来到俄国，一方面同俄国做生意并帮助俄国，另一方面也是世界资产阶级最好的情报员，因此，现在世界资产阶级对苏维埃俄国，对它的强弱方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知道得清楚，这种情况在一旦发生新的武装干涉时就有非常严重的危险。

当然，东方问题上的某些摩擦可以归结为一种“误会”。但是不应当忘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黄金和其他“财富”源源流入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远东，是为了在苏维埃俄国的周围建立一个经济的（不仅是经济的）包围圈。未必用得着证明，所谓华盛顿“和平”会议是不会答应给我们什么真正的和平的。

当然，我们和波兰、罗马尼亚及芬兰的关系是“最友善的”。但

是不应当忘记，这些国家，特别是波兰和罗马尼亚，正在依靠协约国加紧扩军备战（不是对付俄国又是对付谁呢？），它们现在和过去一样仍然是帝国主义最亲近的后备军，正是它们不久以前还派遣萨文柯夫分子和佩特留拉分子的白卫军到俄国境内来（是为了侦察吗？）。

非常明显，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动都是准备向俄国发动新进攻的全部工作中的个别环节。

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配合，内部冲击和外部冲击联合——这就是这次进攻最可能采取的形式。

我们能否使这次进攻不能发动，或者在进攻终于发动时把它变成对付世界资产阶级的致命武器，这取决于后方和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警惕性，取决于我们在经济领域内的工作成就和红军的坚强性。

一般说来，外部状况就是如此。

苏维埃俄国的内部状况同样是复杂的，也可以说是“独特的”。这种状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为巩固工农联盟以发展工业、农业和运输业而奋斗；也可以用另一句话来说明：在经济破坏的情况下为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目前在西方有这样一种理论：只有在工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是工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中，工人才能取得和保持政权。考茨基之流的先生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否定无产阶级占少数的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的。这种理论默默地以下面的假设为出发点：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农民，不会支持工人夺取政权的斗争，农民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这种假设的历史根据是：西方（法国、德国）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危急关头**通常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法国，一九一八年以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一）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无

产阶级只是革命的担负者），那里的农民可以说是从资产阶级手中获得土地，获得摆脱封建奴役的自由，因此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那时就已得到保障。

（二）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次尝试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农民中分化出了在农村中很有势力的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它已经成了连接农民和城市大资产阶级的桥梁，因而巩固了资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

上述理论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俄国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第一、和西方相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对资产阶级展开激战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激战过程中农民团结在自己的领袖无产阶级的周围。

第二、同样和西方相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了）不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半个世纪开始的，而是紧接着它经过短短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开始的。当然，在这期间农民就不可能分化出强大而有组织的农村资产阶级，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被推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了。

后一种情况更加巩固了工农联盟。

正因为如此，俄国工人虽然占俄国人口的少数，却做了国家的主人，争得了绝大多数人民首先是农民对自己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并且保持住了政权，而和一切理论截然相反，资产阶级却陷于孤立，失去了农民这个后备军。

由此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上面所说的无产阶级人数“必须占多数”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不正确的，或者至少是被考茨基之流的先生们解释得太简单太庸俗了。

（二）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在革命进程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和劳

动农民的实际联盟是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三）共产党员的责任就是要保持和巩固这个实际联盟。

目前的全部问题在于这个联盟的形式并不总是相同的。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主要是实行**军事政治**联盟，就是说把地主赶出俄国，把土地交给农民使用，而当地主为了夺回“自己的财产”而发动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对地主作战以捍卫革命成果，因此农民供给工人粮食，并且为军队提供人力。这是一种联盟形式。

现在，当战争已经结束，土地不会再有危险的时候，旧的联盟形式就不够了。需要有另一种联盟形式。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为农民保持土地，而是要保证农民有自由支配这块土地上的产品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就必然会使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减，使农业日趋衰落，使运输业和工业瘫痪（由于缺乏粮食），使军队瓦解（由于缺乏粮食），而这一切就必然导致工农实际联盟的破裂。未必用得着证明，国家掌握必要数量的粮食储备是复兴工业和保存苏维埃国家的动力之动力。喀琅施塔得叛乱（一九二一年春天）就是一次警告，这次叛乱表明旧的联盟形式已经过时，必须采取既能保证工人的经济利益又能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的新的**经济**联盟形式。

这就是理解新经济政策的钥匙。

废除余粮收集制和消除其他诸如此类的障碍是新道路上的第一个步骤，这一步骤解开了小生产者的手，有力地推动了粮食、原料和其他产品的生产。如果注意到俄国目前掀起的大规模发展生产力的热潮也和内战后的美国北部一样，那就不难理解这一步骤的巨大意义了。毫无疑问，这一步骤既然解除了对小生产者生产能力的束缚，并保证他们得到一定的利益，那就使他们处于不得不帮助苏维埃国家的境地，如果注意到运输业和工业已由国家控制的话。

但是提高粮食和原料的产量还不够。还必须收集和收购必要数量的为支持运输业、工业、军队等等所必需的粮食和原料。所以，如果

撇开单纯代替余粮收集制的粮食税不谈，那末第二个步骤就应当认为是把粮食和原料的收购工作交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办理。诚然，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地方机关不守纪律，不能适应商品市场迅速扩大的情况，商品交换的实物形式不适宜和商品交换的货币形式迅速发展以及缺乏货币资金等等，使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这个大量收购粮食和原料的主要产品的主要机关的作用将日益扩大，这是没有理由可以怀疑的。只是国家必须——

（甲）使它成为国内贸易业务（非国营的）拨款的中心；

（乙）使它在财政上控制其他各种对国家还怀有敌对情绪的合作社；

（丙）用某种形式为它开辟一条进行对外贸易的途径。

第三个步骤应当认为是开办国家银行这一调节国内货币流通的机关，商品市场的扩大和货币流通的加速一定会产生下面两个主要后果：

（一）使贸易业务（私营的和国营的）和生产业务（各种费率及其他）完全以卢布的涨落为转移；

（二）使俄国的国民经济从封锁时期的那种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变成同外界通商的即以卢布汇率的偶然涨落为转移的交换经济。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不整顿货币流通和提高卢布的汇率，我们国内外的经济业务就会陷于瘫痪。国家银行是货币流通的调节器，它不但能成为债权人，而且能成为汲取大量私人储蓄的抽水机，依靠这些储金不发行新币也可以周转，——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虽然这个国家银行有远大的前途，但在目前还是“未来的音乐”。

提高卢布汇率的第二个办法应该是扩大我们的输出和缩小我们的极大的贸易逆差。必须考虑到，吸引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来进行对外贸易只能对这方面的工作有帮助。

其次，我们需要借外债，因为这不仅是支付手段，而且是扩大俄国对外信贷的要素，也是提高我们卢布信用的要素。

再次，索柯里尼柯夫不久前在“真理报”上谈到的合营的贸易转运公司和其他公司无疑也能促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里应当指出，有一个时期在报刊上谈得很多的关于推广工业租让制和发展我国原料同外国机器和装备的正常交换的问题，虽然都是货币经济发展的要素，其本身却完全取决于预先提高我们卢布的汇率。

最后，第四个步骤应当认为是在我们企业中改行经济核算制，关闭和出租不盈利的小企业，挑选最富有生命力的大企业，大力精简我们过分臃肿的机关的人员，编制稳定的国家预算（物资的和货币的）。这一切做到以后就能铲除企业和机关中的依赖供给的思想，使工人和职员普遍振作起来，并改善和强化他们的劳动。

一般说来，这就是我们已经采取的和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把这些措施综合起来就是所谓新经济政策。

不用说，我们在实行这些措施时，正如预料的那样，犯了很多错误，歪曲了它们的实质。然而有一点可以认为已经证实，就是这些措施开辟了一条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就能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不怕外部的威胁和俄国内部的饥荒，推进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发展农业和工业，巩固无产者和劳动农民的经济联盟。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如耕地面积开始扩大，各企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情绪好转（制止了大规模的土匪骚动），都确凿地证实了这一结论。

载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八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79—85页

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

（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前几天，在这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收到了南高加索各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些决定，其中陈述了这些共和国有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的愿望和必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现在联合起来是适时的。由于这个决定，各共和国的联合问题便提到这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上来了。

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运动还在三四个月以前就开始了。首先发起的是阿捷尔拜疆共和国、阿尔明尼亚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后来乌克兰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也响应了。这个运动意味着，旧的条约关系，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协定关系，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经显得不够了。这个运动意味着，旧的条约关系必然要过渡到更紧密的联合关系，即过渡到以建立设有相当的联盟执行机关和联盟立法机关（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联盟人民委员会）的统一的联盟国家为前提的关系。简单地说：从前在协定关系范围内暂时解决了的东西，现在要在运动进程中使它成为一种固定的东西。

推动各共和国走上联合道路的原因是什么呢？确定必须联合起来的情况有哪些呢？

确定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的情况有三类。

第一类情况是有关我国内部经济状况的一些事实。

第一、由于进行了七年的战争，我们各共和国现有的经济资源极为贫乏，这就迫使我们把这些贫乏的资财集中起来，更合理地使用它们，用它们来发展各共和国苏维埃政权的脊椎骨——各主要经济部门。

第二、在我们联邦的各个不同地区和共和国之间，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分工，即经济的分工。例如，北方供给南方和东方布匹；南方和东方供给北方棉花、燃料等等。各区域之间所确立的这种分工是不能一笔勾销的，因为它是联邦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同时，在各共和国独立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分工使各个地区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它要求各共和国在经济上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三、全联邦的基本交通工具必须统一起来，因为交通工具是各种可能联合的神经和基础。不言而喻，交通工具决不能由各个共和国单独支配和只服从于各共和国的利益，因为这样会把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运输变成不能按计划使用的许多单独部分。这种情况也要求各共和国联合成一个国家。

最后是我们财力的拮据。同志们，应当坦率地说，在目前，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第六年，我们在财政方面大规模发展的可能性比在旧制度时小得多了。例如，旧制度每年有五亿卢布的烧酒税，而我们没有；旧制度能借到数亿卢布的外债，我们却不能。这一切说明，在我国财政发展的可能性如此小的情况下，如果各个共和国的力量不团结起来，各个共和国的财政力量不联合成一个整体，我们就不能解决我们各共和国在财政方面当前的基本任务。

推动我们各共和国走上联合道路的第一类情况就是如此。

确定各共和国联合起来的第二类情况就是同我国外部状况有关的一些事实。我指的是我们的军事状况。我指的是我们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外国资本发生的关系。最后，我指的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关系。同志们，应当记住，虽然我们各共和国都幸运地摆脱了内战状态，但是外敌入侵的危险还远没有消除。这种危险要求我们

的军事战线必须绝对统一，军队必须无条件地统一，特别是在现在，在我们已经走上真正在物质上裁减军备（当然不是在精神上解除武装）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把军队裁减到六十万，那就特别需要有一个能够保证各共和国外部安全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军事战线。

其次，除了军事性质的危险以外，还有使我们的联邦在经济上陷于孤立的危险。你们知道，在热那亚会议、海牙会议以及同乌尔卡尔特谈判〔47〕以后，对我们共和国实行经济抵制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满足我国经济需要的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形却看不到了。使我们各共和国在经济上陷于孤立的危险还是存在的。这种新的干涉形式的危险性并不亚于军事干涉，要消除这种危险，只有建立我们各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经济战线来对付资本主义包围。

最后是我们的外交状况。你们都亲眼看到，不久以前，在洛桑会议开幕前夕，协约国各国千方百计地力图孤立我们联邦。可是它们在外交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反对我们联邦的有组织的外交抵制已经被打破了。协约国不得不重视我们联邦，不得不后退，不得不稍作让步。但是没有理由指望在外交上孤立我们联邦的诸如此类的事实不会再发生。因此，在外交方面也必须有一条联合战线。

推动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走上联合道路的第二类情况就是如此。

无论第一类情况或第二类情况，直到现在，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的整个时期内，都是起作用的、有效的。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在经济上的需要以及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需要，在过去无疑也是起作用的。然而，只是到现在，在内战结束以后，当各共和国第一次有了着手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性，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经济资源极为贫乏，看到无论在内部经济方面或在对外方面都完全有联合的必要时，这些情况才具有特殊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在目前，在苏维

埃政权建立后的第六年，各独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最后，第三类事实也要求联合，这类事实是同苏维埃政权结构的性质和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本质相联系的。苏维埃政权按其本质来说是国际主义的，它用各种方法在群众中培植联合的思想，因此它本身就推动群众走联合的道路。如果说资本、私有制和剥削把人们分开，把人们分裂成互相敌对的阵营（在这方面，大不列颠、法国，甚至像波兰、南斯拉夫这样的多民族小国都可以做例子，这些国家的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腐蚀着它们的基础本身），如果说在那里，在资本主义民主占统治的以私有制为国家基础的西方，国家的基础本身就在制造民族纠纷、冲突和斗争，那末在这里，在政权不是建筑在资本上而是建筑在劳动上，不是建筑在私有制上而是建筑在集体所有制上，不是建筑在人剥削人上而是建筑在同这种剥削作斗争上的苏维埃世界里，则恰恰相反，政权的性质本身在促使劳动群众自然而然地力求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

在那里，在西方，在资产阶级民主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多民族国家的日渐衰落和瓦解成几个组成部分（如大不列颠，我不知道它将怎样处理印度、埃及、爱尔兰；又如波兰，我也不知道，它将怎样处理本国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而在这里，在我们这个联合了不少于三十个民族的联邦内，则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各独立共和国之间的国家联系日益加强，各独立民族日益紧密地结成一个独立国家。这种情况难道没有重大意义吗？这就是国家联合的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资本主义类型，是促使国家崩溃的类型，第二种是苏维埃类型，和第一种相反，它是使早先独立的民族逐渐而巩固地结成独立国家的类型。

推动各共和国走上联合道路的第三类事实就是如此。

各共和国联合的形式应当怎样呢？联合的原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

员会主席团收到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决议中已经扼要地规定出来了。

联合起来的有四个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完整的联邦单位）、南高加索共和国（也是一个完整的联邦单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花剌子模和布哈拉这两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人民苏维埃共和国，这两个共和国所以暂时还留在这个联合以外，只是而且完全是因为它们还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志们，我不怀疑，希望你们也不要怀疑，这两个共和国随着它们内部向社会主义方面的发展，也一定会加入现在成立的联盟国家。

有人以为，如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联邦单位加入共和国联盟，而是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属的各共和国分别加入共和国联盟，也许会更恰当些，显然，这就事先要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才行。我认为这条道路是不合理的，不恰当的，并且是运动进程本身所排斥的。第一、它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各共和国的联合过程以外，还会有使已建立的联邦分离的过程，就是说，还会有和各共和国已经开始的革命的联合过程完全相反的过程。第二、如果我们走这条不正确的道路，那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除了八个自治共和国以外，我们还必须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分出特殊的俄罗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人民委员会，这就会造成组织上的大变动，这种变动在目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和有害的；无论内部状况或外部状况都丝毫没有要求这样做。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联盟的主体应该是下面四个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起草联合条约的原则应当是这样的：对外贸易、陆海军、外交、交通、邮电各人民委员部只设立在联盟人民委员会内。财政、经济、粮

食、劳动、检查各人民委员部设立在各缔约共和国内，但必须按照联盟中央的相当的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办事。为了使各共和国的劳动群众在粮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或劳动方面的力量在联盟中央领导下联合起来，这样做是必要的。最后，内务、司法、教育、农业等其余一些人民委员部（总共有六个）因为同各共和国内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土地规划的特殊形式、法院组织的特殊形式以及语言和文化有直接关系，应当成为独立的人民委员部，受各缔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领导。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是保证各苏维埃共和国内的各族人民有民族发展自由的实际条件。

在我看来，这些原则都应当成为我们各共和国之间最近就要签订的条约的基础。

根据这一点，我提出一个已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的决议草案：

一、认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适时的。

二、联合建立在各共和国的自愿平等的原则上，每个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共和国联盟的权利。

三、委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会同乌克兰、南高加索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各国代表团起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草案，说明要求各共和国联合成联盟国家的种种情况。

四、委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起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共和国联盟的条件，责成该代表团在审查联盟条约时坚持下列各项原则：

（甲）成立相当的联盟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

（乙）陆海军、交通、外交、对外贸易、邮电各人民委员部必须

合并；

（丙）各缔约共和国的财政、粮食、国民经济、劳动和工农检查各人民委员部必须服从共和国联盟相当的人民委员部的指示；

（丁）充分保证各缔约共和国内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利益。

五、条约草案在提交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必须呈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

六、授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批准的联合条件，缔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乌克兰、南高加索和白俄罗斯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

七、条约必须提交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

这就是我提请你们审查的决议草案。

同志们！从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起，世界各国就分裂成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我们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纠纷、压迫、对殖民地的奴役和沙文主义。相反地，在苏维埃阵营里，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我们看到的是相互信任、民族权利平等、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几十年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力图把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利益同剥削制度结合在一起来解决民族矛盾。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到，将来也不会做到。相反地，民族矛盾的线团愈搞愈乱了，大有扼杀资本主义之势。只有在这里，在苏维埃世界里，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才根除了民族压迫，树立了各族人民间的相互信任和兄弟合作。也只有在苏维埃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们才有了可能建成我们的联邦和抵御国内外敌人的进攻。

五年以前，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的基础。现在，当我们在这里解决联合的愿望和必要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造一座新的大厦，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劳动人民的联盟国家来完成这一事业。不久以前，我们各共和国的各族人民

都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共和国联盟的决议，他们的这种意志肯定地表明，联合事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它是建筑在自愿和民族权利平等的伟大原则上的。同志们，我们希望我们联盟共和国的成立将竖立起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可靠支柱，希望新的联盟国家在把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到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去的道路上，将成为新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鼓掌多时，高唱“国际歌”。）

载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九五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101—108页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同志们！今天是苏维埃政权历史的转折点。它在已经过去的旧时期和已经开始的新时期之间竖立了一个路标。在旧时期，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是同时行动，但是是各自为政的，它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在新时期，各苏维埃共和国孤立存在的局面已经结束，它们正在联合成统一的联盟国家，以便顺利地同经济破坏作斗争，苏维埃政权所考虑的已经不只是生存问题了，而且还有如何发展成一支能够影响和改变国际局势以利于劳动者的严重的国际力量的问题。

五年前的苏维埃政权是怎样的政权呢？它是一个几乎不引人注目的渺小的政权，所有的敌人都讥笑它，很多朋友怜惜它。这是军事破坏时期，当时苏维埃政权与其说是依靠本身的力量，不如说是依靠敌人的软弱无力，因为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分裂成两个联盟，一个是奥德联盟，一个是英法联盟，它们彼此间忙于战争，没有可能掉转枪口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这是苏维埃政权历史上的军事破坏时期。但在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红军，胜利地摆脱了军事破坏时期。

以后就开始了苏维埃政权历史上的第二个时期，即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时期。这个时期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有了成就，因为在这个时期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去年国内发生的饥荒。在这个时期，农业大大发展了，轻工业也大大活跃了。我们已经有了优秀的工业领导干部，

他们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依靠。但是要战胜经济破坏，这一切还远远不够。要粉碎和消除经济破坏，还必须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集中起来，必须把各共和国的一切财政和经济力量投到恢复我们各基本工业部门方面去。因此，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今天就是我们各共和国为了集中力量恢复我们的经济而联合成一个国家的日子。

同军事破坏作斗争的时期使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基础之一——红军。后一个时期，即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时期，将赋予我们新的国家形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联盟无疑地会推进苏维埃经济的恢复事业。

现在的苏维埃政权是怎样的政权呢？它是一个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强国，敌人已经不再讥笑它，而是切齿痛恨它了。

苏维埃政权建立五年以来发展的总结就是如此。

但是，同志们，今天不只是做总结的日子，同时也是新俄国战胜旧俄国，战胜作为欧洲宪兵的俄国，战胜作为亚洲刽子手的俄国的日子。今天是新俄国高奏凯歌的日子，新俄国扭断了民族压迫的锁链，组织了对资本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唤醒了东方各族人民，鼓舞着西方工人，把红旗由党的旗帜变成国家的旗帜，并把各苏维埃共和国各族人民集合在这面旗帜周围，以便把他们联合成一个国家，联合成未来的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雏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有人常常骂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没有能力从事建设。让苏维埃政权建立五年以来的历史作为共产党人也善于从事建设的证据吧。今天开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使命是批准昨天全权代表团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让这次联盟代表大会向那一切还没有丧失理解力的人们表明：共产党人既善于破坏旧制度，也善于建设新制度。

同志们，下面是昨天全权代表团会议所通过的宣言，我现在来宣读一下。（见附录一[①]）

下面是在同一次会议所通过的条约原文。我也来宣读一下。（见附录二[①]）

同志们，我受苏维埃共和国全权代表团会议的委托，建议你们批准刚才宣读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的原文。

同志们，我建议大家用共产党员所特有的一致精神来通过它们，让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写下新的一章。（鼓掌）

载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真理报”第二九八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109—111页

———————————————

① 见新编《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61、263页。——本书编者注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本文是以我先后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俱乐部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共产党党团里所做的“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的演讲为基础写成的。我决定把它发表出来，这不仅是因为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满足勃列斯尼亚区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同志的愿望，而且还因为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身对于我们党的新一代的工作人员不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声明一下，这篇文章并没有打算要提供什么在实质上比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在党的俄文刊物上几次谈过的更新的东西。本文应该看做对列宁同志的几个基本观点所作的一个简要概括的叙述。

一　要预先确定的几个概念

一、工人运动的两个方面

政治战略也和策略一样，是同工人运动有关的。但工人运动本身又由两种因素构成：一种是客观的或自发的因素，另一种是主观的或自觉的因素。客观的即自发的因素，就是不以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和调节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过程。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旧政权的瓦解，无产阶级和它周围各阶级的自发运动，阶级之间的冲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不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的现象，这是运动的客观方面。战略对于这些过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为战略既不能取消它们，也不能改变它们，只能估计到它们并以它们为出发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纲领应当研究的范围。

但是运动还有它的主观的即自觉的方面。运动的主观方面，就是运动的自发过程在工人头脑中的反映，就是无产阶级走向一定目标的自觉的和有计划的运动。其实，运动的这一方面所以使我们感到兴趣，就是因为它不同于运动的客观方面，它完全是受战略和策略支配的。如果说战略不能改变运动客观过程中的任何东西，那末在这里，在运动的主观的自觉的方面则相反，战略的运用地盘是广阔的、多种多样的；因为它，即战略，可以加速或延缓运动，也可以把运动导入捷径或引向更艰苦的道路，这是以它本身的完善或欠缺为转移的。

加速或延缓运动，促进或阻碍运动，这就是政治战略和策略运用的领域和范围。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战略本身并不研究运动的客观过程。但是，如果它不愿意在领导运动时犯重大的致命的错误，就必须了解这些过程并正确地估计到这些过程。研究运动的客观过程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因此，战略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为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客观过程的发展和消亡时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必然崩溃，无产阶级必然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必然由社会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的战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这个基本结论作为自己的工作基础时，才能算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从理论原理出发，确定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并把这些目标科学地表述在纲领的条文中。纲领可以包括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时期，以推翻资本主义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为目的，也可以包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例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残余和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创立条件的阶段。因此，纲领可以由两个部分即最

高部分和最低部分组成。不言而喻，纲领最低部分的战略和纲领最高部分的战略不能不有所区别；并且，战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纲领中表述的运动目标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南时，才能算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

三、战　略

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工人阶级运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向，沿着这一方向最有利于无产阶级对敌人进行基本打击，以求达到纲领所提出的目标。战略计划是组织能够最迅速地获得最大效果的决定性打击的计划。

拿军事战略来对比，例如拿内战时期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军事战略来对比，政治战略的主要特点就可以很容易地描绘出来。大家都记得一九一九年底邓尼金逼近土拉时的情景。当时在军事家中间在究竟应当从何处给邓尼金军队以决定性打击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有趣的争论。有一些军事家建议选择察里津—诺沃罗西斯克一线作为基本打击方向。另一些军事家则相反，他们建议沿沃龙涅什—罗斯托夫一线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以便经过这一线把邓尼金军队切成两段，然后再各个击破。毫无疑问，前一计划就其预定要占领诺沃罗西斯克以切断邓尼金军队的退路这一点来说，是有它的长处的。但是，一方面，它是不利的，因为它主张我军沿着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地域（顿河区）推进，这就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它是危险的，因为它会给邓尼金军队开辟一条经土拉和谢尔普霍夫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后一个进行基本打击的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因为一方面，它主张我军主力部队沿着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地域（沃龙涅什省—顿巴斯）推进，这样不必付出特别的牺牲；另一方面，它可以扰乱向莫斯科推进的邓尼金军队的主力部队的行动。大多数军事家都赞同后一个计划，因而也就决定了对邓尼金

战争的命运。

换句话说，规定基本打击方向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时期各次战役的性质，因而也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战略的任务就在于此。

政治战略也是一样。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者们在二十世纪初期即在日俄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方向问题上发生过第一次严重的冲突。大家知道，当时我们党内一部分人（孟什维克）所持的观点是：在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时，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方向应该遵循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路线，而作为革命极重要因素的农民则被排斥或几乎被排斥于计划之外，让自由资产阶级担任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党内另一部分人（布尔什维克）则相反，他们认为应该遵循无产阶级同农民联盟的路线进行基本打击，无产阶级应当担任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自由资产阶级应当被中立起来。

如果把我国从二十世纪初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的整个革命运动当做工农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的战争来同我们对邓尼金的战争作对比，那末很明显，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命运主要是决定于采用哪一个（孟什维克的还是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计划，选择革命运动的哪一个基本方向。

如同在对邓尼金作战时军事战略规定了基本打击方向，从而十分之九决定了直到消灭邓尼金为止的所有各次战役的性质一样，在这里，在同沙皇制度作革命斗争时，我们的政治战略按照布尔什维克计划规定了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向，从而决定了我们党从日俄战争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同沙皇制度进行公开斗争的整个时期的工作性质。

政治战略的任务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出发，估计到世界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经验，正确地规定某个国家无产阶级运动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基本方向。

四、策　略

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它是服从于战略，服务于战略的。策略不是同整个战争有关，而是同战争中的个别事件，即同个别战斗和个别战役有关。如果说战略是力求取得战争的胜利，或者比方说，是力求把反沙皇制度的斗争进行到底，那末策略则相反，它是力求取得某些战役或某些战斗的胜利，力求胜利地进行某些多少适合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斗争情况的战局或发动。

策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最适合于某一时期具体情况的并能最有把握地准备战略胜利的斗争方法和手段，斗争形式和方式。因此，评价策略的作用和效果不应该从它的本身，从它的直接效果着眼，而应该从战略的任务和可能性着眼。

有时候，策略的胜利可以促进战略任务的执行。例如一九一九年底我军在邓尼金战线上解放奥勒尔和沃龙涅什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由于我们的骑兵在沃龙涅什附近和步兵在奥勒尔附近的胜利而造成了突击罗斯托夫的有利局势。一九一七年八月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由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的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而造成了有利于以后我党进行十月打击的新的政治局势。

也有这样的时候，策略胜利的直接效果十分辉煌，但是这种胜利和战略的可能性不相适应，因而造成了对整个战局有致命危险的“意外”局势。一九一九年底邓尼金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他为迅速地浩浩荡荡地向莫斯科进军的轻易胜利所陶醉，把自己的战线从伏尔加河伸展到德涅泊河，因而准备了自己军队的覆灭。一九二〇年我们同波兰军队作战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我们对波兰民族因素的力量估计不足，为浩浩荡荡进军的轻易胜利所陶醉，担负了经过华沙突入欧洲的力所不及的任务，激起了波兰绝大多数居民反对苏维埃军队，因而

造成了使苏维埃军队在明斯克和日托米尔附近的胜利化为乌有的局面，破坏了苏维埃政权在西方的威信。

最后，也有这样的时候，就是不得不放弃策略胜利，有意识地承受策略劣势和失败，以便保证以后取得战略优势。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交战的一方为了拯救自己军队的骨干，把他们从敌人优势兵力打击下转移出来，而开始实行有计划的退却，不经过战斗而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以便赢得时间和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进行新的决战。一九一八年俄国遭受德国进攻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党为了同渴望和平的农民保持联盟，取得喘息时机，建立新军队，从而保证以后获得战略优势，不得不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虽然这个和约从当时的直接政治效果来看是极其不利的。

换句话说，策略不能服从于目前的暂时的利益，不应该从直接的政治效果着眼，更不应该离开地面去建造空中楼阁，——策略应该和战略的任务和可能性相适应。

策略的任务首先是遵循战略的指示并估计到世界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经验，规定最适合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斗争情况的斗争形式和方式。

五、斗争形式

作战方式、战争形式，不是永远一样的。它们是随着发展的条件，首先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成吉思汗时代作战的方式不同于拿破仑第三时代；二十世纪作战的方式不同于十九世纪。

现今条件下的作战艺术在于掌握战争的一切形式和这方面的一切科学成就，机智地运用它们，善于把它们配合起来，或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及时地运用其中某一种形式。

政治方面的斗争形式也是一样。政治方面的斗争形式比作战形式

更为复杂。它们的改变取决于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取决于各阶级的情况、斗争力量的对比、政权的性质以及国际关系等等。在专制制度下的同工人局部罢工和游行示威相联系的秘密斗争形式；在有“合法机会”存在下的公开斗争形式和群众性的工人政治罢工；国会内的斗争形式（如在杜马时期）和有时转变成武装起义的国会外的群众发动；最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国家斗争形式（这时无产阶级有可能保证自己掌握一切国家手段和力量，以至军队），——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所提出的斗争形式就是这些。

党的任务就是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在战场上把它们机智地配合起来，并且善于运用最适于某一情况的斗争形式来加紧进行斗争。

六、组织形式

军队的组织形式，兵种和军种，通常是和作战形式和方式相适应的。前者随后者改变而改变。在运动战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大量的骑兵。在阵地战中则相反，骑兵或者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只起次要作用，因为一切决定于重炮和空军，毒气和坦克。

军事艺术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拥有一切兵种，使它们日臻完善，并且善于把它们的行动配合起来。

政治方面的组织形式也是一样。这里也同军事方面一样，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是相适应的。专制制度时代的职业革命家的秘密组织；杜马时期的文化教育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国会组织（杜马党团等）；群众发动和起义时期的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及联系所有这些组织形式的无产阶级大党；最后，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时期的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形式，——一般说来，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而且应当依靠的组织形式就是这些。

党的任务就是掌握这一切组织形式，使它们日臻完善，并且善于在某一特定时期把它们的工作配合起来。

七、口号。指示

表述得当、反映战争或个别战役目的并受部队欢迎的决定，有时在前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决定是鼓舞军队作战、维持士气等等的工具。对战争整个进程来说，适当的命令、口号或告部队书具有和头等重炮或头等快速坦克同样重要的意义。

口号在政治方面的意义更大，因为它是关系到具有各种不同要求和需要的千百万居民的。

口号是某一领导集团，例如无产阶级领导集团——无产阶级政党对最近的或遥远的斗争目标所作的简要明确的表述。斗争目标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包括整个历史时期，有的包括某一历史时期的个别阶段和事件，口号则随着斗争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劳动解放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提出的“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是**宣传**口号，因为它是要把个别的和成批的最坚定不移的战士吸引到党方面来。在日俄战争时期，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已经多少看清了专制制度的不稳固，于是这一口号就成了**鼓动**口号，因为它是要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吸引过来。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的时期，沙皇制度在群众心目中已彻底破产，于是“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就由鼓动口号变为**行动**口号，因为它是要发动千百万群众去冲击沙皇政府。二月革命时，这个口号已变成党的**指示**，即变成在一定期限内夺取沙皇政府的某某机关和某某据点的直接号召，因为当时已经是推翻沙皇政府、摧毁沙皇政府的问题了。指示是党在某时某地行动的直接号召，全体党员必须执行；这种号召只要是正确地恰当地表达了群众的要求，只要它真正成熟了，通常就能够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

把口号和指示，或者把鼓动口号和行动口号混淆起来，同举行过早或过迟的发动一样危险，有时甚至有致命的危险。一九一七年四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鼓动**口号。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堡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举行的人所共知的包围冬宫的游行示威，是一种想把这一口号变为**行动**口号的尝试，是一种过早的因而有致命危险的尝试。这是把鼓动口号和行动口号混淆起来的最危险的典型。党当时斥责了这一游行示威的发起人，党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党知道，把这个口号变为行动口号所必需的条件还没有具备，而无产阶级举行过早的发动就会使它的力量瓦解。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党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取消或改变已经采取的和成熟了的口号（或指示），以免自己队伍陷入敌人所布置的圈套，或是暂时把指示推迟到更有利的时机去执行。一九一七年六月在彼得格勒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当时经过周密准备并预定要在六月九日举行的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就因形势发生了变化，被我党中央“突然”取消了。

党的任务就是巧妙而及时地把鼓动口号变为行动口号，或者把行动口号变为一定的具体指示，或者是在情况需要时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和坚决性，及时地停止执行某些即使是受人欢迎的和业已成熟的口号。

二　战略计划

一、历史转变。战略计划

党的战略不是什么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随着历史的转变和历史的变动而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对每一个历史转变都制定出一个与其相适应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在从一个转变到另一个转变的整

个时期内都起作用。战略计划的内容就是规定革命力量的基本打击方向和制定在社会战线上相应地布置千百万群众的计划。自然，适用于一个有它本身特点的历史时期的战略计划，就不能适用于另一个有完全不同特点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历史转变都有它所必需的和适合于它的任务的战略计划。

军事方面也是这样。对高尔察克作战的战略计划不能适用于对邓尼金的战争，后者要求制定新的战略计划，而这个新的战略计划又不能适用于别的战争，例如一九二〇年对波兰军队的战争，因为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无论基本打击方向或基本战斗力量的布置计划，都不能不有所区别。

在俄国近代历史上，有过产生了我党历史上三个不同战略计划的三个主要历史转变。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它们简短地叙述一下，以便说明党的战略计划一般是如何随着新的历史变动而改变的。

二、第一个历史转变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针

这个转变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即日俄战争时期开始的。当时沙皇军队的失败和俄国工人大规模的政治罢工激动了居民中的一切阶级，并把它们推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这个转变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结束的。

这个时期我们党内有两个战略计划在彼此进行斗争：一个是孟什维克的（一九〇五年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的）计划，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九〇五年列宁同志的）计划。

孟什维克的战略主张遵循自由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联合的路线对沙皇政府进行基本打击。这个计划从认为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出发，让自由资产阶级担任运动的领导者（领袖），要无产阶级充当“极左的反对派”的角色，充当资产阶级的“推动者”的角色，

而作为革命主要力量之一的农民却被排斥或几乎被排斥于视野之外。不难理解，这个计划既然排斥了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的千百万农民，它就是极端的空想；它既然把革命的命运交给自由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它就是反动的，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完全胜利并不关心，它随时都准备勾结沙皇政府结束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见列宁同志的“两个策略”）主张遵循无产阶级同农民联合和中立自由资产阶级的路线对沙皇政府进行革命的基本打击。这个计划是从自由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不关心，它宁愿牺牲工人和农民来同沙皇政府勾结起来，不顾革命取得胜利这一点出发，让俄国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担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个计划所以高明，不仅因为它正确地估计了革命的动力，而且因为它本身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萌芽，它天才地预见到俄国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即更高的阶段，并且促进了向这一阶段的过渡。

以后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战略计划的正确性。

三、第二个历史转变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

第二个转变是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即推翻沙皇政府以后开始的。当时帝国主义战争割开了全世界资本主义的致命脓疮；当时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在实际上管理国家，不得不限于维持形式上的政权（临时政府）；当时工兵代表苏维埃虽握有实际政权，但是没有经验也没有意志来把它加以必要的运用；当时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工人农民都被战争和经济破坏的重担压得精疲力竭；当时“两个政权并存”和“联系委员会”的制度被内部矛盾弄得焦头烂额，既无力进行战争，也无力取得和平，不但没有找到“摆脱绝境的出路”，而且把局势弄

得更加混乱了。这个时期是以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结束的。

这个时期苏维埃内部有两个战略计划在彼此进行斗争：一个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计划，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计划。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战略最初是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的，直到民主会议召开时（一九一七年九月）才最后形成。这个战略所采取的路线是逐渐地然而不断地使苏维埃离开政权，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未来的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型“预备国会”手中。和平和战争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问题以及民族问题，都被推到立宪会议召开时解决，而立宪会议的召开又遥遥无期。“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规定自己的战略计划的。这是一个准备资产阶级专政的计划，固然这个专政是打扮和装璜过的，是“完全民主的”，但毕竟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见列宁同志一九一七年四月发表的“提纲”）主张遵循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联合力量来消灭资产阶级政权的路线，遵循组织苏维埃共和国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来进行基本打击。同帝国主义决裂并退出战争；解放旧俄帝国的各被压迫民族；剥夺地主和资本家；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准备条件，——这就是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战略计划的要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规定自己的战略计划的。这个计划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正确地估计了俄国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而且因为它促进并加速了发动西方革命运动的事业。

以后直到十月革命的事变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战略计划的正确性。

四、第三个历史转变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

第三个转变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当时西方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决死搏斗已经达到顶点；当时西方的革命危机已明显地增长了；当时俄国破产了的和矛盾重重的资产阶级政权已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打击下崩溃了；当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已同帝国主义决裂并退出了战争，因而使西方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成为它的死敌；当时新的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和平、没收地主土地、剥夺资本家和解放各被压迫民族的法令，因而博得了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对它的信任。这是国际范围内的转变，因为国际资本战线第一次被突破，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第一次被提到实践上来了。这样，十月革命便从一国的、俄国的力量变成了国际的力量，而俄国工人则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落后部队变成了以自己奋不顾身的斗争唤醒西方工人和东方被压迫国家的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个转变还没有达到发展的终点，因为它还没有在国际范围内发展起来，但是它的内容和总的方向已经十分明显地确定了。

当时在俄国各政治集团之间有两个战略计划在彼此进行斗争：一个是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的积极分子拉进自己组织里去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计划。

反革命分子、积极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制定计划的路线是，把一切不满分子即后方和前线的旧军官、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被革命剥夺了的资本家和地主、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的协约国走狗等等联合成一个阵营。他们所持的方针是通过暴动或外国武装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府并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布尔什维克则相反，他们制定计划的路线是，在俄国内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俄国的和欧洲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东方被压迫国家的力量团结起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以扩展无产阶级革命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范围。列宁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小册子中对这个战略计划所作的精确扼要的说明是非常出色的，这就是“**最**

大限度地实现一个（自己的。——斯大林注）**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战略计划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正确地估计了世界革命的动力，而且在于它预见到和促进了以后展开的使苏维埃俄国变为全世界革命运动注意中心、变为西方工人和东方殖民地的解放旗帜的过程。

以后全世界革命的发展以及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存在五年的事实，都完全证实了这个战略计划的正确性。曾经几次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都亡命国外了，而苏维埃政权和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则正在变为世界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政治工具，——这些事实很明显地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计划是正确的。

载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真理报”第五十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113—126页

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
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前一世纪就呈现出一种趋向：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国际化，民族闭关自守状态消灭，各民族在经济上接近，广大领土逐渐联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海上和铁路交通干线的敷设和资本的输出等等，更加强了这种趋向，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既然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既然它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那末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进步过程，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前提。

二、但是这种趋向是通过各种与其内在的历史意义完全不相适应的特殊形式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的相互依赖和各个地域的经济联合，不是通过作为平等单位的各民族合作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一些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比较发达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不大发达的民族建立起来的。对殖民地的掠夺和侵略，民族的压迫和不平等，帝国主义的专横暴虐，对殖民地的奴役和民族的毫无权利，以及“文明的”民族为了统治“不文明的”民族而进行的斗争，——这些就是各民族经济上接近的过程所通过的形式。因此，除了联合趋向以外，还产生了消灭这种强制联合形式的趋向，产生了被压迫的殖

民地和附属民族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既然这第二种趋向是表明被压迫群众对帝国主义的联合形式的愤怒，既然它要求各民族根据合作和自愿联合的原则联合起来，那末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进步趋向，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精神前提。

三、在多民族资产阶级国家近五十年来的历史中，充满了以资本主义固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两种基本趋向之间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这两种趋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各资产阶级殖民国家内部的软弱和固有的不稳定的基础。这些国家内部不可避免的冲突和这些国家间不可避免的战争；老殖民国家的崩溃和新殖民国家的形成；对殖民地的新的角逐和多民族国家的新的崩溃，这种崩溃所引起的对世界政治地图的重新绘制，——这就是这个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后果。一方面，旧俄、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瓦解，另一方面，大不列颠和旧德意志这些殖民国家的历史，以及帝国主义“大”战、殖民地民族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增长，——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清楚地说明多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是不稳定的，不巩固的。

因此，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联合过程和这种联合的帝国主义方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

四、我们党估计到了这种情况，它以民族自决权，以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作为自己的民族政策的基础。党在它一成立的时候，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八九八年）上，当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矛盾还没有十分明显地确定的时候，就承认各民族有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后来，直到十月革命，它在它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专门决议和决定中毫不更改地确认了自己的民族纲领。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同它相联系的声势浩大的殖民地革命运动，只不过再次确认了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的要点是：

（甲）坚决摈弃对各民族的种种强制形式；

（乙）承认各民族有安排自己命运的平等权利和主权；

（丙）承认只有根据合作和自愿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牢固联合这一原理；

（丁）宣布只有推翻资本政权才能实现这种联合的真理。

我们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倦地拿这个民族解放纲领同沙皇政府的公开压迫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不彻底的半帝国主义政策相对抗。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在沙皇政府和旧俄各民族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半帝国主义政策使这些民族的优秀分子离开了克伦斯基统治，而我们党的解放政策则取得了这些民族的广大群众在他们反对沙皇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同情和支持。毫无疑问，这种同情和支持是我们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五、十月革命给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做出了实践的总结。十月革命推翻了民族压迫的主要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从而一下子扭断了民族压迫的锁链，根本改变了各民族间的旧关系，消除了过去的民族仇视，为各民族的合作扫清了地盘，不仅取得了俄国其他民族兄弟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信任，而且取得了欧洲和亚洲各民族兄弟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信任。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这种信任，俄罗斯无产阶级就不能战胜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如果在俄国中部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各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获得解放。只要资本掌握着政权，只要充满民族主义偏见的过去“统治”民族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农民跟着资本家走，民族仇视和民族冲突就必不可免；相反地，如果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阶层跟着无产阶级走，也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有了保证，那就可以认为民族和平和民族自由有了保证。因此，苏维埃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能够藉以建立兄弟合作的基础。

六、但十月革命的成果不只限于消灭民族压迫和建立民族联合的基础。十月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还制定了这种联合的形式，规定了各民族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路线。在革命初期，各民族的劳动群众初次感到自己是独立的民族单位，而外国干涉的威胁还没有成为实际危险，这时各民族的合作还没有完全固定的严格确定的形式。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各民族共和国军事自卫的利益已提到首要地位，而经济建设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这时合作采取了军事联盟的形式。最后，在战后时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问题已提到首位，这时军事联盟就用经济联盟补充了。各民族共和国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合作形式发展的最终阶段，这一次已经具有各民族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了。

因此，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中找到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发现了根据民族权利平等和自愿的原则组织稳固的多民族国家的道路。

七、但是找到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还不能说是完全地彻底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还不能说这一解决已经完全具体而实际地实现了。要正确实现十月革命所提出的民族纲领，还必须克服过去民族压迫时期遗留给我们的那些障碍，这些障碍在短时期内是不能一下子割除掉的。

第一、这种遗产是大国沙文主义残余，大国沙文主义是大俄罗斯人过去的特权地位的反映。这种残余还存在于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头脑中，盘踞在我们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里，它们得到因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日益猖獗的“新”路标转换派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潮的支援。这种残余在实践中的表现是俄罗斯苏维埃官僚对各民族共和国的需要和要求采取傲慢轻视态度和冷酷无情的官僚主义态度。只有在我们国家机关的实际工作中毅然决然地消灭这种残余，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才能成为真正巩固的国家，各民族的合作才能成为真正

兄弟般的合作。因此，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作坚决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一项任务。

第二、这种遗产是共和国联盟各民族在事实上即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十月革命所获得的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是各民族的伟大胜利，但是这种平等本身不能解决整个民族问题。许多共和国和民族没有经过或者几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因而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能充分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它们的权利和可能，它们得不到外来的真正而长期的帮助，就不能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产生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些民族的历史，也在于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政策，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力图使边疆地区变成受工业发达的中部地区剥削的纯原料产地。在短时期内铲除这种不平等现象，在一两年内消灭这种遗产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就已指出：“消灭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求我们同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实行奴役的一切残余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铲除掉。而且只有通过俄罗斯无产阶级给予联盟各落后民族真正的长期的帮助，使它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繁荣起来，才能把它铲除掉。不这样，就没有理由指望在统一的联盟国家范围内建立各民族的正确的巩固的合作。因此，为消灭各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斗争，为提高各落后民族的文化和经济水平而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二项任务。

最后，这种遗产是许多民族中间的民族主义残余，这些民族曾经受过沉重的民族压迫，还没有摆脱过去的民族耻辱感。民族之间的某种疏远和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罗斯人采取的措施的不完全信任，就是这种残余的实际表现。但是，在某些有几个民族的共和国内，这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往往变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变成这些共和国内较强大的民族反对弱小民族的顽固的沙文主义。反对阿尔明尼亚人、沃舍

梯人、阿札里人和阿布哈兹人的格鲁吉亚沙文主义（在格鲁吉亚）；反对阿尔明尼亚人的阿捷尔拜疆沙文主义（在阿捷尔拜疆）；反对土尔克明人和柯尔克兹人的乌兹别克沙文主义（在布哈拉和花剌子模），——这种种形式的沙文主义是一种极大的祸害，它们因受新经济政策和竞争的条件的激励而日益猖獗，有使某些民族共和国变成争吵和纠纷的舞台的危险。不用说，所有这些现象都阻碍着各民族真正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联盟的事业。既然民族主义残余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防御形式，那末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坚决斗争就是铲除民族主义残余的最可靠的手段。既然这种残余在变成反对各个共和国的弱小民族集团的地方沙文主义，那末同这种残余作直接斗争就是党员的义务。因此，同民族主义残余首先是同这种残余的沙文主义形式作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三项任务。

八、中央和地方很大一部分苏维埃官僚不是把共和国联盟看做旨在保证各民族共和国自由发展的各平等国家单位的联盟，而是把它看做取消这些共和国的一个步骤，看做成立所谓“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的开端，这一事实应当认为是旧遗产的鲜明表现之一。代表大会斥责了这种看法，认为它是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同时号召党员密切注意，不要让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苏维埃官僚利用各共和国的联合和各人民委员部的合并来掩盖他们忽视各民族共和国经济和文化需要的企图。各人民委员部的合并是对苏维埃机关的考验：如果这一实验在实践中产生了大国主义倾向，那末党就不得不采取最坚决的办法来反对这种歪曲，甚至提出撤销某些人民委员部的合并问题，直到苏维埃机关经过适当的改造，能够用真正无产阶级和真正兄弟般的精神注意小民族和落后民族的需要和要求为止。

九、既然共和国联盟是各民族共处的新形式，是各民族在统一的联盟国家内合作的新形式，而在这个联盟国家内应当在各民族共同工作过程中铲除上述残余，那末联盟的最高机关就应当不仅要充分反映

联盟内各民族的共同需要和要求，而且要充分反映个别民族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因此，除了现存的代表整个联盟劳动群众的不分民族的联盟中央机关以外，还应当根据平等原则设立代表各民族的专门机关。这样组织联盟中央机关会使我们有充分可能倾听各民族的需要和要求，及时给它们必要的帮助，造成完全相互信任的环境，从而用最无痛苦的方法消灭上述遗产。

十、代表大会根据上述各点，建议党员采取下列实际措施：

（甲）在联盟最高机关系统内，根据平等原则设立一个代表所有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专门机关；

（乙）联盟各人民委员部应根据保证满足联盟各民族的需要和要求的原则来建立；

（丙）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的机关主要应当由熟悉各该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本地人组成。

二

一、在大多数民族共和国里，我们的党组织是在不十分有利于自己成长和巩固的条件下发展的。这些共和国在经济上落后，民族无产阶级人数很少，缺乏甚至没有本地的党的老干部，缺乏用本族语言出版的有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党的教育工作很差，还存在着激进民族主义传统（至今还没有消灭）的残余，——这一切在当地共产党员中间产生了过高估计民族特点、过低估计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一定倾向，即民族主义倾向。这种现象在有几个民族的共和国里表现得特别危险，在那里，这种现象往往具有较强民族的共产党员反对弱小民族（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布哈拉、花剌子模）的共产党员的沙文主义倾向的形式。民族主义倾向的害处在于：它阻碍民族无产阶级摆脱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过程，它给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成一个统一

的国际主义组织的事业带来困难。

二、另一方面，在党中央机关和各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中，俄罗斯民族的党的老干部人数很多，他们不熟悉这些共和国劳动群众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因此不能经常关心劳动群众的需求，这就使我们党产生了在党的工作中过低估计民族特点和民族语言的倾向，产生了对这种特点采取傲慢轻视的态度，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所以有害，不仅因为它阻碍了本地的通晓民族语言的共产党干部的形成，造成了使党脱离各民族共和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危险，而且首先因为它滋养和培植上面所说的民族主义倾向，增加了我们同这种倾向作斗争的困难。

三、代表大会斥责了这两种倾向，认为它们对共产主义事业都是有害的、危险的，并且提醒党员注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是特别有害和特别危险的，同时号召全党迅速消灭我们党的建设中的这些旧的残余。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实行下列各项实际措施：

（甲）成立由各民族共和国当地党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高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乙）增加用本族语言出版的有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丙）加强东方民族大学和它各地的分校；

（丁）在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设立由当地工作人员组成的指导组；

（戊）增加用本族语言出版的党的群众性书刊；

（己）加强各共和国的党的教育工作；

（庚）加强各共和国的青年工作。

载于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六十五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127—134页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节选）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二十五日）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

一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

（四月十七日）

同志们！我认为刊登在“中央通报”上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已经十分详尽了，所以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里就用不着再重复了。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应当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应当说明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联系，也就是应当说明环绕着党的和党籍以实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借以变成党的军队的那些联系和群众性的机关。

我认为报告的第二部分应当说明工人阶级联系农民的那些组织联系和群众性的机关。这就是国家机关。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国家机关实现对农民的领导。

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应当谈党的本身，党是一个本身具有特殊生活的机体，是一个提出口号并检查其实现情况的机关。

现在我来谈报告的第一部分。我把党比做先锋队，把工人阶级比做党的军队来谈。这样比较，有人可能认为这里的关系和军事方面一样，就是说，党发布命令，用电报传达口号，而军队即工人阶级执行

这些命令。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政治方面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在军事方面是指挥人员自己建立军队，自己编制军队。而在这里，在政治方面，党不是自己建立军队，而是找到自己的军队即工人阶级。第二个区别是：在军事方面，指挥人员不仅要建立军队，而且还要供给军队给养、被服和鞋袜。在政治方面就不是这样了。党不供给自己的军队即工人阶级给养、被服和鞋袜。正因为如此，政治方面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在政治方面不是阶级依靠党，而是党依靠阶级。正因为如此，在政治方面要实现阶级先锋队即党的领导，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建立广大的群众性的非党机关网，这些机关是党的触角，依靠它们党就能把自己的意志传达给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就能从分散的群众变成党的军队。

现在让我来分析一下连接党和阶级的这些机关，这些引带，看看它们是怎样的一些机关，看看一年来党在巩固这些机关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工会是党联系工人阶级的第一根主要引带，第一个主要传达机关。在一年以来的活动中，就加强这个使党联系阶级的主要引带方面的数字来说，党扩大并且巩固了自己在工会领导机关中的影响。我不谈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它的成分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也不谈工会中央委员会。我要谈的主要是省工会委员会。去年，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省工会委员会的主席中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占百分之二十七，而今年则占百分之三十七以上。这个成绩不算很大，但毕竟还是成绩。它说明，我们党十月革命前入党的领导人员已经掌握了工会的主要脉络，他们依靠这些脉络使党和工人阶级联系起来。

我不打算谈整个工人工会的成分问题。数字表明，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前，工会会员约有六百万。而今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却只有四百八十万。这似乎是后退了一步，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去年，——让我在这里说实话吧！——工会是虚肿的。当时提出的数字并没有确

切地反映实际情况。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所提出的数字，虽然比去年少，但这是比较真实、比较实际的。我认为这是前进了一步，尽管工会会员的人数减少了。因此，一方面是工会从虚假的和半官僚的工会变成和自己的领导机关过着共同生活的真正有生命的工会，另一方面是省级工会机关中的党的领导人员的百分数从百分之二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七，——这就是我们所确认的这一年来我们党在加强工会的活动中的成就。

但是决不能说在这方面一切都很顺利。在工会基层组织工厂委员会中，还不是处处都有我们的人。例如，哈尔科夫省的一百四十六个工厂委员会中，就有七十个工厂委员会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但这种现象是个别的。一般地应当承认，就巩固党在省级组织和下层组织中的影响来说，工会无疑是向前发展了。这条战线应当认为对党是有保证的。在工会方面我们没有强大的敌人。

合作社是党联系阶级的第二根引带，第二个群众性的传达机关。我指的首先是消费合作社，是其中的工人合作社，其次是农业合作社，因为农业合作社里有贫农。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中工人社员约有三百万。今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稍有增加，总共有三百三十万人。这个数目很小。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这毕竟还是前进了一步。如果每个工人的家庭以三口人计算，那就是说，约有九百万的工人居民被作为消费者组织在消费合作社里了，而党在其中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

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在消费合作社里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们没有材料说明，可能占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不会超过。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省级机关里，共产党员至少已经占百分之五十。这又前进了一步。

农业合作社的情况较差。这种合作社本身无疑是在发展着。去年，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至少有一百七十万。今

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不下四百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倾向于无产阶级的贫农。正因为如此，弄清党在农业合作社方面的影响怎样扩大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去年的数字我们没有。今年在农业合作社省级机关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共产党员（虽然我认为这个数字还值得怀疑）。如果这是事实，那就是一大进步。下层组织的情况较差，在那里我们至今还不能使初级合作社摆脱敌视我们的力量的影响。

共青团是连接阶级和党的第三根引带。未必用得着证明，共青团和青年对于我们党的发展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现有的数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的共青团里至少有团员四十万人。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年中，由于裁减人员，由于为青年工人保留位置的制度还没有普遍实行和共青团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团员人数降到二十万。现在，特别是从去年秋天起，共青团又大大发展了。目前至少有四十万团员。最令人高兴的是，共青团的发展首先是吸收青年工人。共青团有发展的首先是在我们工业有发展的地区。

你们知道，共青团在工人中间的活动主要是在工厂艺徒学校进行的。这方面的数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约有五百所工厂艺徒学校，共有学员四万四千名。到去年年底我们有七百多所工厂艺徒学校，共有学员五万名。而重要的是共青团中的工人成分增多了。和上述农业合作社的战线一样，青年战线应当认为是特别受威胁的战线，因为我们党的敌人对这方面的攻击特别顽强。正是在这里，在这两方面，党和党的各级组织必须竭尽全力来保证自己取得优势。

其次，我来谈谈女工代表大会。这可能没有引起我们各级组织的注意，但这是一个连接我们党和工人阶级中的妇女的极其重要的传动机构。我们现有的数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在五十七个省和三个区域里，妇女代表大约有一万六千人，其中女工占大

多数。今年，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在这些省和区域里，妇女代表至少有五万二千人，而其中女工有三万三千人。这是一大进步。应当注意到这是一条我们一直很少注意然而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线。既然事业在向前发展，既然有条件巩固和扩大这个机关，有条件用党的触角去破坏神甫在妇女所教养的青年中的影响，那末党的当前任务之一自然应当是在这条无疑是受威胁的战线上发挥最大的力量。

现在谈谈学校。我说的是政治学校、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共产主义大学。这也是一种机关，党依靠它们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让他们在工人居民中散播社会主义的种子，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从而把党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联系起来。数字表明，去年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的学员约有二万二千名。今年，如果把由政治教育总局经办的市立政治常识学校计算在内，至少有三万三千名。至于对共产主义教育有巨大意义的共产主义大学，学员就增加得很少了，过去约为六千名，现在是六千四百名。党的任务就是要在这条战线上加紧努力，加紧培养和训练共产主义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

现在谈谈报刊。报刊不是群众性的机关，也不是群众性的组织，然而它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力量来说无异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机关。有人说，报刊是第六个强国。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强国，但是，它有力量，作用很大，这是无可争辩的。报刊是党每日每时用自己所需要的语言向工人阶级讲话的最有力的武器。其他在党和阶级之间架设精神导线的方法，其他同样灵活的机关，在天地间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党应当特别注意这方面，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就拿报纸来说。根据发表的数字，去年我们有三百八十种报纸，今年至少有五百二十八种。去年的发行额是二百五十万份，但是，这个发行额一半是依靠公家补助的，没有生命力的。去年夏天，由于报刊的补助金减少了，必须自

力更生，发行额降到九十万份。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发行额约近二百万份。就是说，现在报刊依靠公家比较少，它已靠自己的资金维持，并且成了党手中的锐利武器，使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否则发行额是不能增加和保持的。

现在来谈下一个传达机关——军队。人们习惯把军队看做防御或进攻的机关。而我把军队看做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全部革命的历史表明，军队是来自不同省份的不相往来的工人和农民的唯一集合点，他们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他们的政治观点。大规模的动员和严重的战争总要引起某种社会冲突，某种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并不是偶然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各个遥远的角落里的农民和工人第一次在军队里见面。要知道，通常沃龙涅什的农夫是看不到彼得堡人的，普斯可夫人是看不到西伯利亚人的，在军队里他们却见面了。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学校，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从这个观点来看，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具有极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队是把党同工人、贫苦农民连接起来的最庞大的机关。军队是全俄全联邦的唯一集合点，在这里，来自不同省份和区域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学习并养成过政治生活的习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群众性的传达机关中发生了如下的变化：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前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点五，今年已达到百分之十点五。在这段期间，军队减少了，但是，质量改善了，党的影响扩大了；在这个主要的集合点里我们在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方面取得了胜利。

如果把排长以上的全体指挥人员都计算在内，去年共产党员在指挥人员中占百分之十，今年占百分之十三。如果不把排长计算在内，去年占百分之十六，今年占百分之二十四。这些就是环绕着我们党的引带，环绕着我们党的群众性机关，它们把党和工人阶级联系起来了，使党有可能变成先锋队，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变成军队。

这些就是党（和军事指挥人员不同）借以变成先锋队，工人阶级

借以从分散的群众变成真正的政治军队的联系网和传达网。

我们党所以能在这些领域在加强这些联系方面表现出成绩来，不仅因为党在这方面的经验丰富了，影响这些传达机关的方法改进了，而且因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帮助和促进了这一点。

去年我们发生过饥荒，承担了饥荒的后果，产生过工业萧条和工人阶级涣散的现象等等。今年则恰恰相反，我们丰收了，工业局部高涨了，无产阶级的集合过程开始了，工人的生活状况改善了。过去被迫分散到农村去的老工人现在又重新回到工厂，这一切就造成了一种在政治上有利的形势，使党能够展开广泛的工作来加强上述联系机关。

现在来谈报告的第二部分：党和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是主要的群众性机关，它通过工人阶级的政党把执政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连接起来，并使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其政党来领导农民。我把我的报告的这一部分和列宁同志的两篇著名的文章直接联系起来谈。

许多人以为列宁同志在这两篇文章中所发挥的思想完全是新的。据我看，这两篇文章中所发挥的思想去年就已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脑子里转了。你们大概还记得他去年所做的政治报告。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机关不协调，因此汽车不是向它应去的方向驶去，而是转了弯。我记得施略普尼柯夫曾经说这是司机不中用。这当然不对，完全不对。政策是正确的，司机很高明，汽车型式也是好的，是苏维埃型的，可是国家汽车的组成部分即国家机关中的某些工作人员不好，不是我们的人。因此汽车不协调，结果就完全歪曲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结果不是实现而是歪曲政治路线。我再说一遍，国家机关就其型式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它的组成部分还是异己的、官僚的、半沙皇半资产阶级的。我们想使国家机关成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工具，但是这个国家机关中的某些人想把它变成他们一项收入的来源。这就是整个机关不协调的原因。我们不去改进机关的工作，单靠正确的政治路线是走不远的，因为路线会被歪曲，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会破裂。结果是：虽然我们操纵着方向盘，但是，汽车不听指挥。最后一定会翻车。这些思想列宁同志在去年就已经发挥了，只是在今年他才运用这些思想制定了一套严整的制度来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其目的在于使改组后的监察机关变成改装汽车各个组成部分的杠杆，变成用新的部分代替无用的旧部分的杠杆，如果我们真想把汽车开往它应去的地方的话。

列宁同志的建议的实质就在这里。

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件事实，即对奥列哈沃—祖也沃托拉斯的检查，这个托拉斯是按苏维埃型式组织起来的，它的任务是生产大量工业品供应农民，可是这个按苏维埃型式组织起来的托拉斯却把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放进私人腰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于是汽车就不是开往它应去的地方了。

我还可以举出最近伏罗希洛夫同志告诉我的一件事实。我们有一个名叫工业局的机关。这个机关是在东南部。这个机关大约有两千个工作人员，负责领导东南部的工业。伏罗希洛夫同志很失望地对我说，领导这个机关可不容易，为了领导它，还得另外成立一个小机关来领导这个领导机关。我们找到了伏罗希洛夫、埃斯蒙特和米高扬这几个好人，他们把这个机关彻底地整顿了一下。原来，这个机关只要一百七十个人就可以代替两千人的工作。结果怎样呢？现在的工作比过去好得多。过去这个机关生产多少就吃掉多少。现在它正在为工业服务。这样的事实举不胜举，很多，比我的头发还要多。

所有这些事实只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的苏维埃机关就其型式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成员，它的习惯和传统，实际上往往会推翻正确的政治路线。因此，整个机器不协调，结果就造成政治上的巨大损失，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有破裂的危险。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我们改善经济机关，裁减它们的人员，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并且把思想上靠近我们党的人补充进去，那末

我们就会达到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说，工业将生产出大量工业品供应农村并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这样我们就能使农民经济和工业经济结合起来。或者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而遭到破产。

还可以这样说：或者精简国家机关，精简税务机关，把小偷和骗子驱逐出去，那末我们从农民那里拿到的就能比现在少，国民经济就能维持住。或者这个机关变成为自己服务的机关，像东南部所发生的那样，把从农民那里拿来的一切都花在本机关身上，那末就会遭到政治上的破产。

我深信，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这两篇文章的指导思想。

在列宁同志的建议中还有另一个方面。他不但力求改善机关和最大限度地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党既然建立了国家，就应当改善国家），而且显然还注意到道德方面。他想使国内没有一个大官僚，甚至也不要有一个因职位高而使普通人觉得对他没有办法的官员。道德方面是伊里奇的建议的第三方面，正是这个建议提出了不仅要从国家机关内，而且要从党内清除那些损害我们党的名誉的官场传统和官场习气的任务。

现在来谈谈关于挑选工作人员的问题，就是伊里奇早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谈过的那个问题。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国家机关在成员、习惯和传统方面很不好，有使工农之间的关系破裂的危险，那末很明显，党的领导作用就不仅应当表现在发指示上，还应当表现在把能够理解我们的指示并且能够忠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安置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无须证明，在中央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间决不能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

你们中间未必有人会说，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就够了，就万事大吉了。不，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

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因此，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登记分配局的工作仅限于登记和分配县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同志。登记分配局除此而外，说句俗话，就啥事不管了。现在，由于战争已经结束，群众性的一般动员已经用不着，并已失去任何意义（去年中央委员会负责动员一千人而遭到失败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工作已经深入，我们正在实行专业化的方针，并且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一般动员只能于事有害，对地方没有任何好处），登记分配局的工作已不能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了。

我可以列举一些数字。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至少动员一千名莫斯科的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估计动员一千五百名左右。由于被动员的人生病和其他种种原因，只动员了七百名；根据各地的反映，其中只有三百人比较合适。你们看，这件事实说明过去所实行的旧的一般动员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我们党的工作已经深入，党的工作已经随着不同的经济部门而专业化，如果随便调动人，第一、就会使这种人无所作为，第二、不能满足需要新的工作人员的各级组织本身的最低要求。

我想列举在登记分配局工作的索罗金所写的一本著名小册子中关于我国工业指挥人员的一些数字。但在谈这些数字以前，我应当谈谈中央委员会在登记工作人员的过程中在登记分配局内所实行的改革。我已经说过，从前登记分配局的工作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现在，由于工作已经深入，建设工作已经普遍展开，就不能仅限于县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了。必须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中央委员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决定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登记分配机关，使局长在经济方面和苏维埃方面都有副局长协助他工作，使正副局长在登记企业

和托拉斯的指挥人员、地方和中央的经济机关的指挥人员以及苏维埃和党内的指挥人员方面也有自己的助手协助工作。

这一改革的效果立刻就表现出来了。在很短的时期内就登记了将近一千三百个担任厂长职务的工业指挥人员。其中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九，非党员占百分立七十。有人会以为在主要企业中非党员占多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事实上，百分之二十九的党员领导着拥有三十多万工人的最大企业，而百分之七十的非党厂长领导着至多只有二十五万产业工人的企业。小企业是由非党员领导，大企业是由党员领导的。其次，在党员厂长中间，工人出身的比非工人出身的多两倍。这种情况说明，工业建设的下层即基层组织的情况和只有很少党员的上层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各部门不同，在下层党员的力量，首先是工人，已经开始掌握企业了。值得注意的是，从质量和称职与否来看，党员中适合做厂长的比非党员要多。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党分配党员到企业中去，不仅要以纯粹党的考虑、以加强党在企业中的影响为指导原则，还要以业务考虑为指导原则。这不仅对党本身有利，而且对整个经济建设有利，因为党员中适合做厂长的比非党员要多得多。

这就是登记我们工业指挥人员的初次试验，我已说过，这是一次新的试验，它远没有包括一切企业，因为在这本小册子里所登记的一千三百个厂长，只占所有还应当登记的企业的厂长的一半左右。但是试验表明，这里的范围无限广阔，登记分配局的工作应当大力展开，使党能够把党员补充到我们的主要企业的管理机关里去，从而实现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同志们一定知道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关于组织问题（党方面和苏维埃方面）的提案。至于我刚才在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里谈到的苏维埃方面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打算提交专门委员会进行详细审查，这个委员会应当研究这个问题的党的方面和苏维埃方面，然后把自己的意见提交代表大会审查。

现在来谈报告的第三部分：关于作为机体的党，作为机关的党。

首先应该谈谈我们党的数量问题。数字表明，去年，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员有四十几万。今年，由于党的进一步缩小，由于党在许多地区清除了非无产阶级分子，党员的数量减少了，减少到四十万不到一点。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因为党的社会成分改善了。在我们党的发展中，在改善党的社会成分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在党内发生过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增多、工人阶级分子减少的倾向在报告所涉及的年度内停止了，转变已经开始了，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分子的百分数增加、非无产阶级分子减少的一定倾向出现了。这正是我们在清党以前所努力争取而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我并不是说在这方面我们一切都做到了，还远不是一切都做到了。但是，我们已经有了转变，已经达到了某种是低限度的清一色，保证了党的工人成分，显然，今后还必须沿着这条继续减少党内非无产阶级分子和继续增多无产阶级分子的道路前进。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进一步改善我们党的成分的那些措施，在中央委员会的提案里已有说明，我不再重复了。显然，必须加紧阻止非无产阶级分子涌进党来，因为在目前，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党一定要受到新经济政策分子的有害影响，必须使我们党达到最大限度的清一色，至少达到工人成分对非工人成分的绝对优势。如果党想保持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当而且必须做到这一点。

我现在来谈谈省委员会的生活和活动问题。报刊上有些文章时常流露出对省委员会的讽刺口吻，时常嘲笑省委员会，过低估计省委员会的活动。同志们，我应当说，省委员会是我们党的主要支柱，没有它们，没有省委员会，没有它们对苏维埃和党的工作的领导，党就会失去基础。尽管省委员会有很多缺点，尽管缺点到现在仍然存在，尽管省委员会有所谓纠纷和争吵，但是总的说来，省委员会是我们党的主要支柱。

省委员会是怎样生活和发展的呢？大约十个月以前，我看到过省委员会的来信，当时我们的省委书记对经济工作还漫无头绪，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十个月以后，我又看到了它们的来信，这次我感到很满意很高兴，因为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省委员会已经成长起来了，它们已经熟悉业务，认真从事建设工作，编制地方预算，掌握地方的经济，并且真正能够领导本省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了。同志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无疑地，省委员会也有缺点，但是，我应当说，如果省委员会没有在党和经济方面取得这种经验，如果省委员会在领导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熟练程度方面没有这种巨大的提高，我们甚至不能梦想党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有人在谈论省委员会的纠纷和摩擦。我应当说，纠纷和摩擦有不好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产生纠纷和争吵的基本原因是省委员会力图在自己内部形成一个能够经常进行领导的紧密团结的核心。尽管为达到这个目的和满足这种愿望所采取的办法往往和目的不相适应，但是这种目的和愿望是完全健康的、合理的。这是因为我们党内成分不一，党内有老干部和新干部，有无产者和知识分子，有中部地区的人和边疆地区的人，有各种民族的人，而且省委员会里的这一切不同成分的分子带来了各种不同的习惯和传统，于是就在这种基础上产生了摩擦和纠纷。虽然纠纷和摩擦的形式是不能容许的，但是纠纷和摩擦十分之九是有健康愿望的，是要力求结成一个能够领导工作的核心。用不着证明，如果省委员会里没有这样的领导集团，如果“好人”和“坏人”参半，省里就没有任何领导了，我们就不能征收任何粮食税和进行任何运动了。这就是纠纷的健康方面，这个方面不应当被它有时具有畸形形式的事实所抹杀。这当然不是说，党不应当同纠纷作斗争，特别是因私人关系而产生的纠纷。省委员会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遗憾的是，在省委员会以下我们党的力量还没有想像的那样

大。我们党在机关方面的主要弱点就是我们县委员会的弱点，缺乏后备力量——县委书记。我认为，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联系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主要机关，即我在我的报告的第一部分里谈到的那些机关（我指的是下层组织、合作社、妇女代表大会、共青团等等），如果说省级机关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些机关，这正是因为我们县的力量太弱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我认为，我们党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在中央委员会下面开办一所学校，训练农民和工人出身的最忠诚最能干的同志来做县委书记。如果党在明年能够把一支二百或三百个县委书记的后备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并且能够用这支力量去帮助省委员会，使省委员会对各县工作的领导易于进行，那末党也就能保证对一切群众性的传达机关的领导。到那时，在每一个消费合作社，每一个农业合作社，每一个工厂委员会，每一个妇女代表大会，每一个共青团支部，每一个群众性的机关里，党都将取得优势。

现在谈谈区域机关。过去一年表明，党和中央委员会设立区域机关（部分是选举的，部分是委派的）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在讨论整个区域划分问题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在设立党的区域机关的工作中，必须逐步从委派的原则过渡到选举的原则，因为这种过渡无疑会在党的区域委员会的周围造成一种良好的道德气氛，使中央委员会易于领导党。

现在谈谈关于改善党的中央机关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关于明确划分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和政治局的职能的建议，想必你们都已经看过了。这个问题几乎用不着特别解释，因为它本身就很清楚。但是有一个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中央委员会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少中央委员的人数。我不谈他们的动机，

同志们自己发表意见吧。我简单地说一下应当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理由。

目前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二十七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十人到十五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某些中央委员，比如说，十五人的核心很有经验，很有才干，在拟定指示时十有九次不犯错误，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末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

其次，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培养党的领导人是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很多年，五年到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用布琼尼同志的骑兵去战胜某一个国家比从下层培养两三个将来能够真正领导国家的领导人要容易得多。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有能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书本是培养不出领导人的。书本可以帮助人们进步，但它本身培养不出领导人。领导工作人员只能在工作过程中成长起来。只有把新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让他们担负全部领导重担，我们才能培养出在目前情况下迫切需要的接班人。所以我认为，如果代表大会不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至少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四十人的建议，那就是极严重的错误了。

在结束报告之前，我应当指出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也许因为人人

都知道，所以不引人注目，但是应当指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这就是我们党的团结，就是使我们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样的转变时能够避免分裂的史无前例的团结。世界上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政党经受住这样急剧的转变而没有混乱，没有分裂，没有从党的大车上摔下某一个集团。大家知道，这样的转变通常总会使某个集团从大车上摔下来，党内即使不发生分裂，也会造成混乱。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转变，当时，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以后，我们习惯于进行革命斗争，不愿意转入日常的合法的工作，不想参加杜马，不想利用合法的机关，不想加强自己在合法机关中的阵地，总之是拒绝采用新方法。这个转变并没有实施新经济政策这样急剧，但是很明显，那时作为一个政党来说我们还很年轻，我们还没有随机应变的经验，结果整整两个集团从我们的车上摔下去了。

现在我们实行进攻政策以后转向新经济政策是一个急剧的转变。在作这样的转变时，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必须暂时放弃进攻而退回原来的阵地、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和农民断绝联系而必须转向农民的后方、无产阶级必须考虑加强和巩固自己在东方和西方的后备力量时，党不仅没有发生分裂，而且转变时还没有发生混乱。

这说明党是无比灵活的，是团结一致的。

这就是我们党必胜的保证。

去年和今年我们的敌人一直在向我们报丧，说我们党要瓦解。但是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却保全了自己的阵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党在继续前进，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而我们的敌人确实在瓦解和破产。同志们，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社会革命党人不久以前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的事情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决定请求我们的代表大会给他们打开我们党的大门。此外，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关于孟什维主义过去的堡垒格鲁吉亚的消息了，这个至少拥有一万个孟什维克党

党员的孟什维主义的堡垒已经倒塌了，约有两千个党员离开了孟什维克的队伍。这似乎说明不是我们党在瓦解，而是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在瓦解。最后，你们大概知道，孟什维主义的一个最忠实最能干的人马尔丁诺夫同志离开了孟什维克的队伍，中央委员会已经接收他入党了，并且提请代表大会批准。（一部分人鼓掌）同志们，所有这些事实不是说明我们党内的情况不好，而是说明他们，我们的敌人已经全线瓦解了，我们党依然是团结一致的，它经受住了最伟大的转变，正举着展开的大旗前进。（热烈鼓掌多时）

二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

（四月十九日）

同志们！结论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谈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因为发言的同志批评了这项工作；第二部分是谈中央委员会对组织工作的建议，发言的同志没有对此提出批评，看来代表大会也是赞同的。

我首先谈谈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批评。

关于卢托维诺夫。他不满意我们党的制度，说我们党内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合法性，没有民主。他当然知道，最近六年以来中央委员会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民主。他知道，在二月全会以后，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立即分赴我们联邦的各个角落，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卢托维诺夫应当知道，我们已经出了四期辩论专页，拉杂地（的确是拉杂地）分析和解释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但卢托维诺夫还嫌不够。他要“真正的”民主，他要求把一切问题，至少是最重要的问题都交给各个支部自下而上地进行讨论，他要求全党干预每一个问题，参加每一个问题的讨论。但是，同志们，现在我们执掌着政权，我们至少有四十万党员和两万个支部，我不知道实行这种制度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实行这种制度，我们党就会变成

一个空谈不休、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争论俱乐部。但是我们党首先应当是一个行动的党，因为我们执掌着政权。

此外，卢托维诺夫忘记了虽然我们在联邦内执掌政权并享有各种合法的优惠权，但是从国际方面来说我们还处于类似一九一二年所经历的那个时期，当时党是半合法的，正确些说是不合法的，它有一些合法的环节，例如杜马党团、合法的报纸和俱乐部，而且那时党为敌人所包围，所以党竭力设法积蓄自己的力量，以向前推进，扩大合法范围。目前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被敌人包围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包围我们的帝国主义豺狼并没有打瞌睡。我们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抓住任何一个可以钻进来危害我们的空隙。没有根据断言包围我们的敌人不在进行什么封锁或干涉方面的准备工作。情况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把一切有关战争和和平的问题都搬到大街上去呢？要知道，在两万个支部大会上讨论问题也就是等于把问题搬到大街上去。如果我们把我们对热那亚会议的全部准备工作都预先搬到大街上去，那会怎样呢？我们就会完全失败。应当记住，在我们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我方的突然袭击、出其不意的机动和神速的动作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我们不是在受党委托的一小部分人中间讨论我们在洛桑会议上的政策，而是把全部工作搬到大街上去，把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那会怎样呢？敌人就会估计到一切利弊得失，破坏我们的政策，我们就会带着耻辱离开洛桑。如果我们把有关战争和和平的问题，把一切重要问题中的最重要的问题预先搬到大街上去——因为，我再说一遍，把问题拿到两万个支部里去讨论也就等于把问题搬到大街上去——那会怎样呢？我们就会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显然，同志们，无论从组织上或者从政治上来看，卢托维诺夫的所谓民主是一种幻想，是一种民主的马尼洛夫精神。这种民主是虚伪而危险的。我们和卢托维诺夫走的不是一条路。

现在来谈奥新斯基。他抓住我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吸收能独立思

考的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是的，是的，索凌，是要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闹独立性的人。奥新斯基认为，我在这一点上和奥新斯基、民主集中派有某些一致的地方。我的确说过，必须把能独立思考的同志补充到中央委员会中去。至于独立思考什么，这一点我当时没有说，因为我知道，在一个主要的演说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完是没有好处的，应当给结论留些话。（笑声，鼓掌。）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需要有能独立思考的人，但并不需要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不，同志们，决不需要这样的人！我们需要摆脱个人影响，摆脱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习惯和传统而能独立思考的人，这种习惯和传统在我们这里已经形成，有时还引起中央内部的不安。你们记得列宁同志的那篇文章吧。那篇文章谈到我们有分裂的可能。列宁同志在那篇文章中谈到的这一点，可能使各级组织认为我们的分裂已在成熟，因此中央委员们一致决定消除可能引起的怀疑，说明中央内部没有任何分裂，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中央也说明分裂的可能并没有消除。这也是完全正确的。近六年来，在中央内部的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不能不形成）在中央内部进行斗争的某些习惯和传统，这种习惯和传统有时造成一种不十分和谐的气氛。在最近举行的几次中央全会中，有一次二月全会使我感觉到这种气氛，我看出地方上的人的干预往往决定一切。我们需要不受这些传统和这些个人影响的支配而能独立思考的人，以便在他们进入中央委员会时能给中央带来优良的工作经验和联系地方的经验，并成为一种水泥，把中央委员会凝结成一个领导我们党的统一而不可分的集体。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些摆脱中央内部所形成的旧传统而能独立思考的人，因为他们能把新生的新鲜的成分带进中央来，巩固中央并防止中央内部发生分裂的种种可能。我所说的独立思考的人就是这个意思。

同志们，我不能不理会奥新斯基对季诺维也夫的攻击。他称赞斯大林同志，称赞加米涅夫，但他侮辱季诺维也夫，他认为目前只要除

掉一个人就够了，以后再挨次除掉其他的人。他采取的方针是先瓦解那个经过多年工作而在中央内部形成的核心，然后再一步一步地逐渐瓦解一切。如果奥新斯基真想追求这样的目的，如果他真想这样来攻击我们中央委员会核心中的某个成员，那我必须警告他，他一定会碰壁的，而且我怕他会碰得头破血流。

最后，关于穆吉万。请允许我谈谈这个整个代表大会已经感到厌烦的问题。他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动摇不定，他说今天决定把南高加索三个共和国的经济活动联合起来，明天做出决议把这些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邦，后天又决定把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共和国联盟。他把这叫做中央委员会的动摇不定。这对不对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不是动摇不定，而是整套步骤。各独立共和国最初是在经济基础上接近。这个步骤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开始了。在各共和国接近的试验产生良好结果以后，就采取了下一个步骤——联合成联邦。特别是像南高加索这样的地方没有维护民族和平的专门机关是不行的。你们知道，南高加索在沙皇时代是鞑靼人和阿尔明尼亚人互相残杀的地方，在木沙瓦特党人、达什纳克党人和孟什维克时代是发生战争的地方。为了终止这种纷争，需要一个维护民族和平的机关即说话有力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建立这样的民族和平机关，没有格鲁吉亚民族的代表参加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在经济活动联合以后，过了几个月就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建立共和国联邦，过了一年又采取了另一个步骤，即各共和国联合道路上的最后阶段——建立共和国联盟。这哪里是动摇不定呢？这是我们民族政策的整套步骤。穆吉万根本没有抓住我们苏维埃政策的实质，虽然他自命为老布尔什维克。

他提出许多问题，暗示有关南高加索民族问题特别是格鲁吉亚民族问题方面的最重要的问题似乎既不是由中央决定的，也不是由个别人决定的。南高加索的基本问题是建立南高加索联邦的问题。让我读一个很短的文件，这个文件可以说明俄共中央制定成立南高加索联邦

的指示的经过。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列宁同志把他草拟的关于成立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提议草案寄给我。上面写道：

“（一）承认建立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在原则上是绝对正确的，也是绝对应该实行的，但是立刻实行还为时过早，就是说，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宣传，自下而上地推行；

（二）建议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中央委员会实现这项决议。”

我写信给列宁同志建议不要急于这样做，要等待一下，给地方工作人员一定的时间去推行联邦制。我在信里写道：

“列宁同志：我不反对你的决议案，如果你同意作如下的修改：把第一条里的‘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讨论’改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其他不变。问题在于在格鲁吉亚按‘苏维埃方式’在‘几个星期’内‘自下而上地’‘推行’联邦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格鲁吉亚刚刚开始建立苏维埃。它们还没有建成。一个月以前还完全没有苏维埃，而要在‘几个星期’内在那里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南高加索联邦如果没有格鲁吉亚参加就将是一个纸上的联邦。我认为要使联邦制的思想在格鲁吉亚广大群众中取得胜利，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斯大林。”

列宁同志回信说：“我同意这个修改。”

过了一天，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讨论通过了这个建议。季诺维也夫没有出席，莫洛托夫代替了他。可见，这个决定是在一九二一年底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从这时起，以穆吉万为首的一批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就开始进行反对中央关于成立联邦的这一指示的斗争。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事情并不像穆吉万在这里所描述的那样。我引用这个文件是为了反对穆吉万在这里所做的那些不体面的暗示。

第二个问题是：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要把以穆吉万为首的那批同志调回来，原因何在？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同时也是确凿有据的原因。这一点我必须加以说明，因为有人责备中央，其中也责备到我。

第一个原因是穆吉万集团在格鲁吉亚自己党内没有威信，它为格鲁吉亚共产党本身所摈弃。这个党曾经开过两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初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初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穆吉万集团和它的否定联邦制的思想受到自己党的坚决的反击。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好像他在一百二十二票中收罗了大约十八票左右；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在一百四十四票中收罗了二十票左右；他始终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他的观点不断遭到否决。第一次，在一九二二年初，我们中央委员会曾对格鲁吉亚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不顾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意志迫使它接受老同志（毫无疑问，穆吉万是老同志，马哈拉泽也是老同志），当时我们认为两个集团，即多数派和少数派是会协调地进行工作的。可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了许多次市代表会议和全格鲁吉亚代表会议，在每次会议上穆吉万集团都受到自己党的打击，最后，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穆吉万才在一百四十票中勉强收罗到十八票。

南高加索联邦是一个不仅关系到格鲁吉亚而且关系到整个南高加索的组织。通常在格鲁吉亚党代表大会闭幕后紧接着就召开全南高加索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最近一次全南高加索代表大会上，穆吉万好像在二百四十四票中勉强收罗到十票左右。事实就是如此。既然党，既然格鲁吉亚组织本身不能容忍穆吉万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又怎么办呢？我知道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偏见让步的政策。这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能不能无止境地压制穆吉万集团必须在其中工作的党的意志呢？我认为不能。相反地，必须尽可能使我们的行动同格鲁吉亚党的意志一致起来。中央就是这样做的，它把这个集团中的某些成员调回来了。

促使中央调回这个集团中的某些同志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屡次违反俄共中央的决议。制定联邦决议的经过我已经向你们谈过了；我说过，没有这个机关，民族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只有成立联邦，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才能确立民族和平。因此我们中央认为这个决议是绝对必须执行的。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穆吉万集团不服从这个决议，不仅如此，它还反对这个决议。这已为捷尔任斯基同志领导的委员会以及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领导的委员会所查明。甚至现在，在三月全会通过了关于格鲁吉亚的决定以后，穆吉万还在继续反对成立联邦。这不是玩忽中央的决定又是什么呢？

迫使党中央调回穆吉万的情况就是如此。

穆吉万把事情描绘成这样：虽然他被调回，但他仍然胜利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不过大家知道，当先哲唐·吉诃德被风车撞伤时他也自认为是胜利者的。我认为在一块叫做格鲁吉亚的苏维埃领土上工作的某些同志，看来，他们的脑子并不是完全正常的。

现在来谈马哈拉泽同志。他宣称他是列宁教养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老布尔什维克。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代表会议上我曾和列宁同志一起对马哈拉泽同志进行斗争。他当时反对民族自决，反对我们的纲领基础，反对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他当时持着这种观点反对党。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当然使他很体面），但是，他仍然不应当忘记这件事！他在民族问题方面不是老布尔什维克，而是相当年轻的布尔什维克。

马哈拉泽同志向我提出了国会式的质问：我是否承认，或者中央是否承认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组织是应当被信任的真正的组织，如果承认，那末中央是否同意这个组织有权提出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如果承认这一切，那末中央是否认为在格鲁吉亚建立的制度是不能容忍的？

我来回答这个国会式的质问。

当然，中央是信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否则又信任谁呢？！格鲁吉亚共产党是格鲁吉亚人民的精华，是格鲁吉亚人民的优秀分子，没有他们就无法管理格鲁吉亚。但是每一个组织都是由多数和少数组成的。我们没有一个组织里没有多数和少数。而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是由执行党的路线的多数和不经常执行这一路线的少数组成的。显然，这里所说的是信任多数所代表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是：各民族的中央委员会是否有创议即提出问题的权利，它们是否有提出建议的权利？

当然有，这是很明显的。只是不了解，为什么马哈拉泽同志不给我们提供事实，说明有人不让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问题、提出建议和讨论建议？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实。我想，如果马哈拉泽同志真的有这样的材料，他是会向中央提出的。

第三个问题是：能不能容许格鲁吉亚已经建立的那种制度？

可惜，问题提得不具体。是什么样的制度呢？如果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最近已把贵族以及孟什维克和反革命分子逐出他们的老窝，——如果指的是这种制度，那末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这是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如果指的是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造成了一种使格鲁吉亚共产党不能发展的条件，那我拿不出这样的事实。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以一百一十票对十八票的多数选出的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向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的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工作得非常融洽。如果有一个小集团、一个派别，一句话，如果有党员对党的制度不满，就必须向中央提供有关的材料。在那里，在格鲁吉亚，已经成立了两个受理这种申诉的委员会，一个是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委员会，一个是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领导的委员会。如有必要，还可以成立第三个。

关于一年来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的结论的第一部分我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来谈第二部分，即关于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对组织工作的建议。据我所知，发言的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批评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任何一个建议。我认为，这表明完全赞同我们提交你们审查的中央委员会的那些建议。虽然如此，我还是愿意帮忙提出一些意见。我将把这些意见提交中央认为必须成立的那个组即组织组，这个组的党方面的主要工作将由莫洛托夫同志负责，苏维埃方面的主要工作将由捷尔任斯基同志负责。

第一个意见是把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从五人至少增加到十五人。

第二个意见是应该特别注意巩固和扩大上下层的登记分配机关，因为这些机关目前具有巨大的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党掌握经济方面和苏维埃机关方面全部脉络的最实际的办法。

第三个意见是请代表大会批准在中央委员会下面开办一所训练县委书记的学校的建议，这样到年底省委员会就能有二百到三百个县委书记。

第四个意见是关于报刊方面的。我在这方面提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代表大会特别注意把报刊提到应有的高度。报刊正在前进而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程度。报刊的成长不应当是与日俱增，而应当是与时俱增，因为这是我们党最锐利最有力的武器。

最后，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再说几句。同志们！我必须说，我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团结一致的、受同一思想鼓舞的代表大会了。很遗憾，列宁同志没有在这里。如果他在这里，他一定会说：“我培养了党二十五年，现在已经把它培养成一个伟大有力的党了。”（鼓掌多时）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135—187页

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毫无疑问，中间阶层问题是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间阶层就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被压迫民族也应该算在里面，因为它们中间十分之九是中间阶层。可见，按经济地位来说，这是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这些阶层的重要性是由下面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这些阶层是现今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或者至少是数量很大的少数；第二、它们是资产阶级从中招募军队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重要后备力量。如果没有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住政权，在我们共和国联盟这样的国家内尤其是如此。如果没有使这些阶层至少保持中立，如果这些阶层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如果这些阶层的大多数还是资本的军队，那末无产阶级就休想夺取政权。由此就产生了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农民的斗争，这一斗争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我们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全部革命中，这一斗争还远没有结束，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得到法国农民的同情和响应。巴黎公社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它遇到了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抗拒。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

以考茨基为首的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欧洲历次革命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好像生来就是工人革命的敌人，因此必须采取比较长期的发展方针，使无产阶级成为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从而为工人革命的胜利创造实际条件。这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结论，警告无产阶级不要“过早”发动革命。他们根据这个结论，就从“原则上考虑”，把中间阶层完全交给资本

支配。他们根据这个结论，向我们预言俄国十月革命必遭失败；他们的论据是：无产阶级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俄国是个农民国家，因此工人革命在俄国不可能取得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对中间阶层首先是对农民的评价完全不是这样。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农民抛开，让他们在政治上完全受资本支配，并且大叫大嚷地夸耀自己“原则性很强”，可是马克思，这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原则性最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定不移地劝告共产党不要忽视农民，要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要保证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他们的支持。大家知道，在五十年代，在法国和德国的二月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并通过恩格斯转达德国共产党说：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决定于是否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这是对五十年代的德国这个农民国家所说的话，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极少，并且不如一九一七年俄国的无产阶级那样有组织，德国的农民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如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农民那样愿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是“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满结合，关于这种结合，马克思已经不顾一切“有原则性的”空谈家的反对而论述过了。十月革命证明，这种结合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十月革命证明，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使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脱离资产阶级，能够使这些阶层由资本的后备力量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它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是世界上一切革命中第一次把中间阶层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提到首要地位的革命，它不顾第二国际英雄们的一切“理论”和哭诉而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一个功绩，如果这里一般也称得上功绩的话。

但是：问题不限于此。十月革命还更进一步，它力求把各被压迫民族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上面已经说过，各被压迫民族中十分之九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说明“被压迫民族”这一概念。被压迫民族通常不仅作为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受压迫，而且作为民族，即作为属于一定的民族、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劳动者受压迫。双重压迫的压力不能不使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革命化，不能不推动他们去同压迫的基本力量作斗争，去同资本作斗争。这种情况就成了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结合，而且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同“民族战争”结合的基础。这一切不能不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范围大大地超出俄国国境以外，不能不使资本的最深远的后备力量受到打击。如果说争取统治民族内部的中间阶层的斗争是争取资本的最接近的后备力量的斗争，那末争取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就不能不成为争取资本的某些最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就不能不成为殖民地各族人民和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后面这一种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它甚至还没有取得第一批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由于十月革命，这个争取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并且它一定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随着我们共和国联盟的实力的增长、随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而一步步扩展开来。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真正使无产阶级从被压迫的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争取资本的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开始了，十月革命第一次举起了争取这些后备力量的斗争旗帜，——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二个功绩。

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把农民争取过来的。农民从无产阶级手中得到了土地，在无产阶级帮助下战胜了地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了政权，因此，他们不能不感觉到，不能不了解到他们的解放过程过去是而且将来还会是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在无产阶级的红旗下进

行。这种情况就不能不使从前农民所害怕的社会主义旗帜变成了吸引他们注意并促使他们摆脱愚昧、贫困和压迫的旗帜。

关于被压迫民族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争取民族解放的呼声，这个由解放芬兰、撤回驻波斯和中国的军队、成立共和国联盟以及给土耳其、中国、印度斯坦和埃及人民公开的道义上的援助等等事实证实了的呼声，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者口中第一次发出的。在被压迫民族的眼里，俄国从前是一面压迫的旗帜，而现在，在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就变成了一面解放的旗帜，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同志的名字，现在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受摧残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口中最爱戴的名字，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说从前，在极辽阔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被认为是受压迫受摧残的奴隶的救星，那末现在的情形是：在帝国主义的极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无庸置疑，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了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偏见作斗争的事业，并给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一条通向被压迫国家最遥远的角落的道路。从前社会主义者很难在被压迫国家或压迫国家的非无产阶级中间阶层中公开露面，现在他们却可以公开地在这些阶层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希望人们倾听他们的话，希望人们也许会听从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像十月革命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这也是十月革命的成果。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思想扫清了通向各民族和各部落内的中间的、非无产阶级的农民阶层的道路，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旗帜变成了这些阶层所欢迎的旗帜。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三个功绩。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三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225—228页

关 于 党 的 任 务

（在有小组长、争论俱乐部成员和支部委员会委员参加的
俄共（布）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同志们！首先我必须说明，在这里我不是代表党中央，而是以个人名义来做报告的。如果会议愿意听取这样的报告，我就来谈谈。（喊声：“请讲吧。”）这并不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央有什么分歧，——绝对没有。我以个人名义讲话，只是因为中央关于制定改善党内状况办法的委员会最近就要向中央呈报自己工作的结果；这个结果还没有呈报，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合法权利代表中央讲话，虽然我相信，我现在要对你们讲的基本上会把中央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表达出来。

争论是党坚强有力的标志

我想在这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报刊上和支部里正在进行的争论的意义问题。这次争论说明什么呢？它标志着什么呢？这是不是一场闯入党内平静生活的暴风雨？这次争论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党瓦解和崩溃的标志，或者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党蜕化的标志？

同志们，我认为都不是：既不是蜕化，也不是瓦解。事实上，党在最近时期壮大了，它清除了大量的废物，它更加无产阶级化了。你们知道，两年前我们至少有七十万党员，你们知道，当时有好几千党

员退出了党或者被驱逐出党。其次，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工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由于熟练的老工人从农村归来，由于在产业工人中掀起了文化高涨的新浪潮，党的成员改善了，党的质量提高了。

一句话，由于这一切条件，党壮大了，质量更高了，它的要求提高了，它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它想比以前更多地知道一些东西了，它希望比以前更多地解决一些问题了。

已经展开的争论不是党软弱的标志，更不是党瓦解或蜕化的标志，而是党有力的标志，党坚强的标志，党的成员质量改善的标志，党的积极性提高的标志。

争论的原因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恰恰在目前时期，恰恰在今年秋天，党内政策问题具有尖锐的性质。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原因在哪里呢？同志们，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今年八月我国某些地区因工资问题而掀起的不满和罢工浪潮。这次罢工浪潮暴露了我们一些组织的缺点，暴露了我们一些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过问企业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现象；这次罢工浪潮也暴露了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力求瓦解党的、实质上是反共的秘密组织。所有这些因罢工浪潮而暴露出来的缺点都以如此耀眼的闪光，如此令人清醒的光线映射到党的身上，使党感到必须改变党内状况。

党内政策问题恰恰在这个时期尖锐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员同志大批休假。休假当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休假的人很多就使得党内生活的节拍恰恰在工厂里产生不满情绪的时候大大地缓慢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积累下来的缺点恰恰在今年秋天这个时期暴露出来。

党内生活的缺点

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内生活的缺点是在今年秋天暴露出来的，这些缺点提出了改善党内生活的问题。这些党内生活的缺点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像有些同志所想像的那样是党的路线不正确？或者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离开了正确的道路，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的条件而被歪曲了？

我认为我们党内生活的主要缺点是：虽然体现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地方（当然不是任何地方，而是某些地区）上的实践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民主路线是正确的，但地方上在实践中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了这一路线。

这就是主要的缺点。历次代表大会（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所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我们的地方组织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的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是党内生活一切缺点的根源。

党的路线说，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问题（当然，那些急待解决的或者有关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的问题除外）一定要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党的路线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党的地方（当然不是任何地方）上的实践却认为：党内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实在没有多大必要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因为中央和其他领导组织自己会解决这些问题。

党的路线说，如果没有像党龄等等不可克服的障碍存在，我们党的负责人就一定要由选举产生。你们知道，按党章规定，省委书记必须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县委书记必须有三年党龄，支部书记必须有一年党龄。但是党的实践却往往认为，既然需要党龄，那就是说不需要真正的选举了。

党的路线认为，必须使党员群众了解经济机关、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党支部对企业中的缺点一定要向非党群众负道义上

的责任。然而党的实践却认为，既然有中央委员会向经济机关发布指示，既然经济机关受这些指示的约束，即使没有党员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指示也是会被执行的。

党的路线认为，各部门的负责工作人员，不论是党的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或军事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各有专业，但是他们相互之间还是要有联系，他们都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们都是为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工作，而这个事业是不能分裂成几部分的。党的实践却认为，既然有工作上的专业化，有党本身的工作、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等等的分工，党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不对经济工作人员负责，经济工作人员就可以不对党的工作人员负责，一般说来，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必然削弱甚至失掉。

同志们，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从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止）的一系列决议中所确定的党的路线和党的实践之间的那些矛盾，一般说来就是如此。

我决不因为党的路线被这样歪曲而责备地方组织，因为，如果分析一下，这里与其说是我们地方组织的过错，不如说是它们的不幸。这种不幸表现在哪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一点我在下面要讲到，但是，我想把这一事实肯定下来，以便解释这种矛盾，然后试图提出改进办法。我也决不认为我们中央没有过错。它同其他一切机关和组织一样也有一些小过错，——中央在这里也有一部分过错和一部分不幸，中央的这一部分过错，至少表现在它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及时揭露这些缺点，没有设法克服这些缺点。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现在问题是要弄清我刚才讲过的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这些缺点是怎样造成的呢？怎样才能把它们消灭呢？

造成缺点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党组织还没有铲除或者至今还没有铲除战争时期的某些残余，这个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头脑中留下了党内军事作风的残余。我认为这些残余表现在下面这种对党的看法上：党不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不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战斗组织，而是某种类似机关系统的东西，某种由低级职员和高级职员组成的、类似许多机关的综合体的东西。同志们，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它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看法是战争时期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残余，那时我们使党军事化，不得不把党员群众的自动性问题挪到次要地位，那时战斗命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不记得这种看法是什么时候以完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这种看法或者这种看法的因素仍然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同志们，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同这种看法作斗争，因为它是一种最现实的危险，它造成有利条件，使我们党的实质上是正确的路线在实践中受到歪曲。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有某种压力。一九一七年，当我们向上走的时候，向十月革命走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将要有公社，这种公社将是劳动者的联合；我们将消灭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如果不在最近时期内，那末经过两三个短短的时期，国家就能变成劳动者的联合。可是实践表明，这对我们说来还是一种遥远的理想，要使国家摆脱官僚主义分子，要把苏维埃社会变成劳动者的联合，人民必须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周围必须有完全有保障的和平环境，有了这种环境就没有必要保存大量的常备军，保存常备军是需要大量的开支和庞大的机构的，因此它的存在就会影响其他一切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而且在长时期内还会是这样的机关。

在这个机关里工作的有我们的党员同志，而这个机关的环境——据我看来是气氛——是这样的：它促使我们的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党组织官僚主义化。

同志们，造成缺点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些支部缺乏积极性，落后，有的甚至全部是文盲，边疆地区尤其是如此。这些地区的支部很不积极，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后。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也给歪曲党的路线造成了有利条件。

第四个原因是地方上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党员同志。不久以前，我在中央委员会听过一个乌克兰组织的代表的报告。做报告的同志极有才能，前途远大。他说，一百三十个支部中有八十个支部的书记是由省委会委派的。这位同志驳斥了认为这个组织这样做是不对的意见，他所持的理由是支部里没有识字的人、没有够党龄的人以及支部自己请求派书记给它们等等。我可以说，这位同志有百分之五十是说得过火的，事实上，这里的问题不但在于支部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而且在于省委会过于热心和沿袭旧传统。但是，如果省委会有百分之五十正确，那末，既然在乌克兰有这样的支部，在组织很年轻、党员干部和识字的人都比乌克兰少的边疆地区就更应该有这样的支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也是造成有利条件，使我们党的实质上是正确的路线在实践中受到歪曲的一个原因。

最后，第五个原因是通报工作做得很差。我们的通报工作，首先是中央的通报工作做得不好，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工作过于繁忙。地方上也很少向我们汇报。应该结束这种情况了。这也是我们党内的缺点积累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怎样消灭党内生活的缺点？

必须采取哪些办法来消灭这些缺点呢？

第一、必须用一切办法不倦地反对我们党内的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反对下面这种错误的看法：我们党似乎是一个机关系统，而不是积极思考、独立活动、充满活力、破坏旧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

第二、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党员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只要可以公开讨论，都让他们进行讨论，对于各级党机关所提出的一切建议，保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纪律成为真正自觉的真正铁的纪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员群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经验丰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党员群众准备必要的条件，逐步地从下层选拔出新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和新的领导者。

第三、如果没有像党龄不够等等不可克服的条件存在，那末一切党组织和负责人必须真正由选举产生。在提拔某些同志担任党的负责工作时，必须从实践中铲除忽视组织内大多数人的意志的现象，必须真正贯彻选举原则。

第四、在中央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下面必须有常设的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会议；必须定期召开会议，在会上提出会议认为必须提出的问题；必须使各种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不致中断，使所有这些工作人员感到自己是一个党的大家庭里的一员，是在为一个共同的、不可分割的事业即无产阶级的事业工作；必须在中央和地方组织周围造成一种环境，使党能够取得和检验我们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

第五、必须把我们生产部门的党支部吸引到与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进程有关的问题方面来。必须使支部了解我们企业和联合企业的管理机关的工作，使它们能够影响这一工作。你们是支部的代表，你们一定知道我们生产部门的支部在企业的工作进程方面向非党群众所负

的道义上的责任多么大。支部要能够在工厂里领导并带领非党群众，能够对企业的工作进程负责（对于企业中的缺点，支部无条件地要向非党群众负道义上的责任），就应该了解这些工作，就应该有可能这样或那样地去影响这些工作。因此，必须吸引支部讨论与企业有关的经济问题，必须经常举行有托拉斯内部各企业的支部代表参加的经济会议来讨论与托拉斯各项工作有关的问题。这是为丰富党员群众在经济方面的经验以及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所必需的可靠方法之一。

第六、必须提高我们党支部的质量。季诺维也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某些地方的党支部在质量上落后于周围的非党群众。

当然，这种说法不能概括和适用于所有的支部。确切些说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党支部弄得很空虚，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些支部里调人出来担任经济、行政、工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那末这些支部的文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在非党群众中也会享有更高的威信。如果近六年来我们从支部调走的所有工人同志、所有干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末这些支部就会比一切非党工人，即使是很进步的非党工人强好几倍，这难道还用证明吗？正因为党没有另外的干部来改善国家机关，正因为党今后仍然不得不利用这个源泉，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办法来改善我们支部的质量，那末它们的文化水平今后还是不能很快提高。首先必须在支部里尽量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此外，必须抛弃我们的地方组织往往在接收工人同志入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我认为不应当醉心于形式主义；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地方组织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党应当掌握这项工作并开展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使产业工人易于入党。

第七、必须加强非党工人工作。这也是一种能够改善党内状况、提高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办法。我必须指出，我们的组织对吸引非党工人参加我们苏维埃机关至今还很少注意。比如拿现在正在进行的莫斯

科苏维埃选举来说。我认为这次选举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非党人士当选太少。据说组织上决定至少要有一定数量的非党人士当选，要占一定的比例等等。但是，我看到实际上他们当选的人数要少得多。据说群众似乎拚命想选共产党员。同志们，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非党人士表示某种最低限度的信任，非党人士就会相应地对我们的组织表示很大的不信任。同志们，对非党人士的这种信任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促使共产党员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不要老是说只选共产党员，要鼓励非党人士，要吸收他们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一定能因此得到好处，我们的组织一定能因此得到非党人士的相应的信任。莫斯科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我们的组织是怎样不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去逐步地把非党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开始闭关自守起来。

第八、必须加强农民工作。我们有些地方的农村支部枯萎了，它们的成员有时跑掉了，它们没有得到农民很大的信任（这一点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向这些支部提出一些实际任务，例如提出下面两项任务：第一、解释和宣传同农民生活有关的苏维埃法律；第二、宣传和普及农艺基本知识，例如必须按时耕地，必须选种等等。同志们，你们是否知道，如果每个农民都有决心花一点工夫去选种，那末不经过任何土壤改良，不使用新的机器，每俄亩的产量就可以增加十普特左右？每俄亩的收成增加十普特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总产量每年增加十亿普特。这一切是不用花很大力量就可以得到的。我们的农村支部为什么不能做这些工作呢？难道这不比谈论克逊的政策重要吗？只有这样做，农民才能了解共产党员已经停止空谈，已经行动起来，只有这样做，我们的农村支部才能得到农民极大的信任。

关于在能够提供新干部的青年中、在红军中、在妇女代表中以及在一切非党人士中加强党的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对改善和活跃党的生活是多么必要，我就不讲了。

加强我在前面所谈到的通报工作即加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报工作对于我们是多么必要，我也不多讲了。

同志们，这就是中央早在今年九月规定的必须自下而上实行的改进办法，也就是党内民主的方针。

现在我想谈谈“真理报”上一些争论性的短文中所暴露出来的关于工人民主问题的两种极端的过分的看法。

第一种极端看法表现在选举问题上。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张“彻底”选举。既然要选举，那就尽量选举吧！党龄吗？为什么要它呢？选你愿意选举的人吧。同志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党是不能接受的。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战争，我们处在和平发展时期。但是，我们有新经济政策。同志们，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清党不是在战时而是在战后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战时，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失败的恐惧使党团结成一个整体，党内的一些腐化分子也不得不执行党的总路线。现在我们的头上已经没有这些箍了，因为已经没有战争了，现在我们有新经济政策，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资产阶级正在复活。诚然，这一切都使党纯洁，使党巩固，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种资产阶级出生和成长的新气氛笼罩着我们，资产阶级虽然还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已经能够在国内商业方面击败我们某些合作社和商业机关了。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才开始清党，把党员的人数减少了一半；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才决定：为了保护我们的组织，使它不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必须使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的条件更严格，必须规定党内负责人的党龄等等。党制定了这些限制“扩大的”民主的预防办法，是否做得对呢？我认为是做得对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民主是必需的，选举是必要的，但是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限制办法，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主要办法，也应当仍然是有效的。

第二种极端看法表现在争论的范围问题上。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

主张无限制的争论。他们认为讨论问题是党的工作的全部，而忘记了党的工作的另一方面，即要求**实现**党的决议的积极的方面。至少腊德津的短文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腊德津企图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来论证无限制争论的原则，说托洛茨基似乎讲过“党是思想一致者的自愿联盟”。我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过这句话，但是没有找到。托洛茨基未必会把这句话当做党的定义的完善公式说出来，即使他说过，也未必说到这里就完了。党不仅是思想一致者的联盟，而且是行动一致者的联盟，是在共同的思想基础（纲领、策略）上进行斗争的行动一致者的战斗联盟。我认为这样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是不对的，因为我知道托洛茨基是最爱强调党的工作的积极方面的中央委员之一。因此我认为腊德津的定义应该由他自己负责。这个定义会引起什么后果呢？会引起下面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或者是**党堕落成为宗派、哲学学派，因为只有在这种狭小的组织内才可能有完全的思想一致；**或者是**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永远讨论，永远议论，直到形成派别，直到分裂。这两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党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讨论问题是必要的，争论是必需的，但是，争论一定要有范围，以便防止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堕落成为争论俱乐部。

同志们，在我结束我的报告的时候，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走这两种极端。我想，如果我们摆脱了这两种极端看法，老老实实地坚决贯彻中央早在今年九月规定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改进我们党的工作。（鼓掌）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日
“真理报”第二七七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234—244页

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关于争论

几星期以前展开的关于党内状况的争论，如果就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情况看来，大概快要结束了。大家知道，彼得格勒拥护党的路线。莫斯科各个主要的区也拥护中央的路线。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莫斯科组织全市积极工作人员大会表示完全赞同党中央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没有理由怀疑，即将举行的莫斯科组织全党代表会议一定会走莫斯科各区所走的道路。反对派，即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土柯夫、皮达可夫等）同所谓民主集中派（拉法伊尔、萨普龙诺夫等）的联盟，已经溃不成军。

争论的过程和反对派在争论期间的那些变化都是值得注意的。

最初，反对派简直就要求重新审查近两年来即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反对派要求彻底执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同时坚决主张取消党的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限制办法（禁止派别活动、规定党龄等等）。可是反对派并不以此为限。它还硬说党实际上已经变成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军纪，因而要求自上而下整刷党机关

的全体成员，要求撤换主要工作人员等等。对中央的恶言和谩骂当然是够多的了。“真理报”载满了控诉中央犯有滔天罪行的文章。只是还没有把日本的地震归罪于中央罢了。

这个时期，整个中央都没有干预“真理报”上的争论，让党员完全自由地进行批评。中央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驳斥批评家们常常提出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责难，认为党员有充分的自觉来独立解决所讨论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争论的第一个时期。

后来，恶言使人生厌了，谩骂不起作用了，党员要求认真讨论问题了，于是争论就进入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公布后开始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央十月全会赞同党内民主方针的决定制定了一项有名的决议，规定了实行党内民主的条件。这样一来，争论的进程就发生了转变。现在已经不能局限于一般的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计划，要求反对派或者接受这个计创，或者提出另外一个实行党内民主的、平行的、同样具体的计划。可是反对派无力提出一个自己的能够满足各级党组织要求的计划来同中央的计划对抗。反对派开始退却了。取消近两年来党在党内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已经在反对派的武库中消失了。取消党的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的限制民主办法的要求已经黯然无色了。自上而下整刷机关的要求缓和下来了，放到后面去了。反对派已经认为有必要用必须“确切阐明派别组织问题”、“改选过去委派的一切党机关”、“废除委派制”等等提议来代替这一切要求了。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反对派的这些已经缓和了数倍的提议也被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和莫斯科河南岸区的组织否决了，这两个组织中绝大多数人拥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这可以说是争论的第二个时期。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反对派继续退却，可以说是狼狈退却。连那些已经褪了色的、缓和了数倍的要求也从他们的决议案中勾销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最近向莫斯科组织积极工作人员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提出的决议案（似乎已经是第三个）中写道：

“只有同心协力和真心诚意地迅速执行政治局的决议，特别是通过改选来革新党内机关，才能保证我们党没有震动和没有内部斗争地转到新的方向，才能加强党的队伍的真正团结和统一。”

就连反对派的这个完全没有害处的提议也被大会否决了，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关于“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决议，这也不是偶然的。

关于拉法伊尔

我认为拉法伊尔是目前反对派，或者确切些说，是目前反对派联盟最忠实最典型的代表。拉法伊尔在一次辩论会上说，我们党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军纪，因此必须自上而下整刷党的全部机关，整刷这个不中用的、违背真正的党性的机构。据我看来，在目前反对派分子的头脑中是存在着这种或与此类似的思想的，但是，他们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把这种思想暴露出来。应当承认，拉法伊尔在这方面要比他的反对派同伙勇敢。

不管怎样，拉法伊尔的这种说法是根本不对的。他的说法不仅在形式上不对，而且首先在实质上不对。因为我们党如果的确已经变成或者只是开始在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那末我们就不会有名副其实的党，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有革命，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什么是军队呢？

军队是从上面建立起来的一种独特的组织。军队的实质在于：领

导军队的是司令部，它由上面任命，按照强制原则编制军队。司令部不仅要编制军队，而且还要供给军队给养、被服、鞋袜等等。全军在物质上完全依赖司令部。军纪也建立在这上面，违犯军纪就要受到特殊的最严厉的处罚——枪决。也正因为如此，司令部仅仅根据自己的战略计划就能随时随地调动军队。

什么是党呢？

党是根据自愿原则从下面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也有自己的司令部，但它不是由上面任命，而是由全党自下选举的。不是司令部编制党，恰恰相反，是党编制自己的司令部。党本身是根据自愿原则编制起来的。在党的司令部和全党之间没有上面所说的军队中的那种物质上的依赖关系。党的司令部不供给党给养、食物和被服。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司令部不能随时随地任意调动党的队伍，党的司令部只能根据本阶级（党本身就是这个阶级的一小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来领导全党。因此，党纪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主要以说服方法为基础，而和主要以强制方法为基础的军纪不同。因此，党内最严厉的处罚（开除党籍）和军队中最严厉的处罚（枪决）有根本的差别。

只要把这两个定义比较一下，就能了解拉法伊尔的错误多么严重。

他说，党已经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但是，既然党在物质上不依赖自己的司令部，既然党是根据自愿原则自下建立起来的，既然党自己编制自己的司令部，那末党怎么能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呢？如果党变成了军队式的组织，那末工人源源不断地入党，党在非党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党在全世界劳动阶层中间享有威望，又怎样解释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党是极其消极的，被动的，——那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消极而被动的党怎么能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并且好几年来一直管理着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

或者党是积极的，自动的，——那就不能理解，这样一个积极而自动的党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废除党内的军事制度，假如党内真有这种制度的话。

我们党进行了三次革命，击溃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正摇撼着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这个党一星期也不能容忍拉法伊尔轻率地所说的那种军事制度和命令制度，它不等到拉法伊尔发出号召就会立刻废除这些制度并建立新的制度，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梦是可怕的，但上帝是仁慈的。事实是，第一、拉法伊尔把党和军队混为一谈了，因为他显然既没有真正了解党，也没有真正了解军队。第二、看来拉法伊尔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发现。他所以要说党内有命令制度这类“可怕的”话，是为了论证目前反对派的基本口号：（甲）要有派别活动的自由；（乙）从上到下撤换党的领导人。

看来，拉法伊尔感到不说这类“可怕的”话就不能偷运这些口号。

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党内生活有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不正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党在党内政策方面实行根本不正确的路线已有两年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是不正确的。

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党通过这项决议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是正确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规定了严格限制民主的办法（禁止派别活动）。党规定这种限制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这种限制会束缚党的独立思考。党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规定了限制民主的新办法（规定一定的党龄

等等）。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只是确认了这些限制。党规定这些限制来防止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侵袭，这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限制会束缚各级党组织的自动性。结论很明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取消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新经济政策情况下通过的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

但是，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同志直接领导下举行的。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关于统一的决议）是列宁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争取通过的。关于进一步限制民主（规定一定的党龄等等）的决议是列宁同志亲自参加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想到，他实际上就是提议取消同列宁主义有着有机联系的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路线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开始懂得，他提议取消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实质上就是重复那个要求修正列宁主义的臭名远扬的“匿名纲领”中的某些提议呢？

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可以了解党是不会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道路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议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提议不折不扣就是恢复“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样式的”党内生活。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党内生活的特点是什么呢？当时的特点是：我们党内存在着派别集团，公开进行派别斗争，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要求至少“局部地”恢复这种已被第十次代表大会废除的党内制度。党能不能走这条道路呢？不，不能。第一、因为恢复新经济政策施行前即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样式的党内生活，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党在新经济政策施行后即一九二三年条件下的要求。第二、因为恢复过去的派别斗争制度必然会破坏党的统一，特别是现在，在列宁同志不能视事的时候。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爱把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党内生活状况描绘成一种合乎愿望的理想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党内生活有许多黑暗面，引起了党的极大震动。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似乎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这样激烈。例如，大家知道，当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派别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竟狂妄到公然说要撤换当时的人民委员会，而代之以由新的人物、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内的人物组成的新的人民委员会。现在的一部分反对派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土柯夫等等）就是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的成员。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想在我们党内“恢复”这种“理想的”旧制度呢？

显然，党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种“恢复”的。

关于萨普龙诺夫的论文

萨普龙诺夫认为党内生活有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党的机关里存在着“党学究”和“女学监”，他们按照“学校方法”来“教育党员”，因而阻碍了党员在斗争过程中受到真正的教育。这样，萨普龙诺夫就把我们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说成了“女学监”，他却不想问一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党学究”怎么会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占优势。萨普龙诺夫把这种极其危险极能蛊惑人心的论点当做已经证实的东西提出时，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格言，他首先应当了解现象（如果自然界的确有这种现象），说明现象，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可是，萨普龙诺夫显然是不理会马克思主义的。他不管怎样都要辱骂党的机关，以为这样做，其他一切就好办了。照萨普龙诺夫看来，“党学究”的恶意就是造成我们党内生活缺点的原因。不用说，这是一个多么正确的解释。

不过有两点令人不能理解：

（一）这些“女学监”和“党学究”怎么能保持住对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

（二）受“女学监”教育的我们“党的学生”怎么能保持住对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的领导？

显然，空谈“党学究”无论如何要比了解和评价我们党机关的极大的优点容易得多。

萨普龙诺夫打算怎样医治我们党内生活的缺点呢？他用的药像他的诊断一样简单。“重新审查我们的军官”，撤换现在的工作人员，——这就是萨普龙诺夫所用的药。他认为这就是实行党内民主的基本保证。我决不否认，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改选对改进我们党内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这一点看做基本保证，那就是既不了解党内生活，也不了解党内生活的缺点。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晋哥里茨、皮达可夫、阿里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晋哥里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而是痛哭；阿里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萨普龙诺夫是否认为，由上面列举的那些“可敬的同志”来代替现在的“党学究”，民主就能在党内取得胜利？我对这一点有些怀疑。

显然，有两种民主：一种是党员群众的民主，这些党员群众极愿意发挥自动性并积极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另一种是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这些党内要人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用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党一定会赞成第一种民主，并且要坚决地实现这种民主。党一定会抛弃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因为它和真正的工人的党内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为了保证党内民主，首先必须铲除我们某些工作人员头脑中存在

的那些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使他们不再把党看做一个机关系统，而看做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可是这些残余在最短期间是铲除不了的。

其次，为了保证党内民主，必须消除我们拥有近百万职员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只有两三万工作人员的党机关所加的压力。但在最短期间是不能摆脱这部笨重机器的压力并使它服从自己的。

最后，为了保证党内民主，必须提高我们许多落后支部的文化水平，并且把积极的工作人员合理地分配到全联盟的各个地区。这一点也不是最短期间所能做到的。

由此可见，保证充分的民主，并不像萨普龙诺夫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当然，如果指的不是萨普龙诺夫的那种空洞的形式上的民主，而是真正的工人的民主的话。

显而易见，为了保证和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就必须自下而上集中全党的意志。

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十二月七日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托洛茨基是赞成这个决议的。因此可以预料，中央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定会一致号召党员同心协力地支持中央和中央的决议。可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前几天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给各地党的会议，这封信的用意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想削弱党员一致支持中央和支持中央立场的意志。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托洛茨基在讲到党机关的官僚主义、讲到老近卫军即我们党的基本核心列宁主义者有蜕化危险的时候写道：

“‘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国际的领袖和政党这个最新最显著的历史实例来说。我们知道，威廉·李

卜克内西、倍倍尔、津盖尔、维克多·阿德勒、考茨基、伯恩施坦、拉法格、盖得等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导出来的学生。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领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一些人是全部地——都蜕化了，都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我们，正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应当说，我们这一代在党内自然是起领导作用的，可是，假如我们容许党内继续坚持和推行机关官僚主义的方法来执行政策，使青年一代变成教育的消极对象，因而必然使机关同群众、老年人同青年人疏远，那末我们就丝毫不能独立自主地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会逐步地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青年必须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

第一、我必须消除一种可能引起的误解。从托洛茨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自命为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以此表示他有决心承担那些可能落到老近卫军头上的责难，如果老近卫军真正走上蜕化道路的话。应当承认，这种自我牺牲的决心无疑是一种可贵的优点。但是，我要保护托洛茨基，使他不致自己打自己，理由很简单：他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承担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骨干可能蜕化的责任。牺牲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老布尔什维克需要这种牺牲吗？我认为不需要这种牺牲。

第二、令人不解的是：怎么能把像伯恩施坦、阿德勒、考茨基、盖得等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同一直反对而且一定还会光荣地反对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混为一谈呢？这种混淆不清的糊涂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别有用心地抱着某种决不是以维护老近卫军为目的的想法，那末谁需要这种糊涂思想呢？关于在反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已经染上机会主义的那种暗示，又怎样理解呢？

第三、我决不认为老布尔什维克绝对不会有蜕化的危险，正像没有理由断言我们这里绝对不会发生地震一样。可以而且应当设想，这

种危险是**可能**发生的。但这是不是说，这种危险是**现实的**已经发生的危险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没有提出任何材料来说明蜕化的危险是现实的危险。可是我们党内有一些人会使我们党的某些队伍产生真正蜕化的危险。我指的是一部分孟什维克，他们加入我们党是**不得已的**，而且还没有根除机会主义的旧习气。下面就是列宁同志在清党时期关于这些孟什维克和这种危险所写的一段话：

“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善于适应环境……而孟什维克这班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派的，他们涂着保护色，正像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应该懂得并估计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点。所谓估计到这个特点，就是说在一九一八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起初可能而后无疑会获得胜利时混入俄国共产党的全部孟什维克，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九要清除出党。”（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十一页）

托洛茨基怎么会忽视这一类实际存在的危险，而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即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蜕化的危险提到首要地位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打算破坏中央大多数即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领导核心的威信，那末怎么能闭眼不看现实的危险，而把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可能发生的危险提到首要地位呢？这种“见解”只能有利于反对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四、托洛茨基怎么会把可能蜕化的“老头子”和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青年”对立起来，把可能官僚主义化的“老近卫军”和必须“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的“青年近卫军”对立起来呢？怎么会把他们对立起来呢？为什么要把他们对立起来呢？难道青年和老近卫军不是向来就团结一致地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吗？难道“老头子”和“年轻人”的团结不是我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吗？怎么会侮辱老近卫军并蛊惑性地阿谀青年，在我们党的这两支基本队伍中间制造并扩大裂缝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党的统一和党的团结出发，而不是想动摇党

的统一以迎合反对派的心意，那末谁需要这样做呢？

难道是这样来维护中央和中央一致通过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吗？

可是，当托洛茨基写信给各地党的会议的时候，他显然并没有给自己规定这种任务。显然，这里是别有用心的，那就是：在维护中央决议的幌子下用外交手腕支持反对派反对党中央。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的信中有两面性的痕迹。

托洛茨基和民主集中派及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结成了联盟，——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言论的政治意义。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真理报”第二八五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245—256页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十八日）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公报
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

一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一月十七日）

同志们！通常我们在争论会议上发言的同志总是先谈问题的经过：党内民主问题是怎样产生的，谁先谈了什么，谁后来又谈了什么等等。我认为这种方法对我们是不适用的，因为它只会带来无谓纠纷和相互责备的因素，而不会有丝毫的好处。我认为如果我们先谈党怎样对待后来为中央全会批准的政治局关于民主的决议的问题，那要好得多。

我必须指出，这项决议大概是我们党的全部历史中经过对民主问题的激烈争论后得到全党完全（我可以说，简直是一致）赞同的唯一的决议。即使是一向对党内多数和中央委员会怀有反对情绪的反对派的组织和支部，即使是这些竭力设法遇事就吹毛求疵的组织和支部，也没有找到吹毛求疵的藉口和理由。这些组织和支部通常在自己的决议中一面承认政治局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一面又力求和其他组织有所不同，给决议加上一些尾巴，比如说：是的，你们一切都很好，但是不要欺负托洛茨基；或者还这样说：你们一切都正确，但是晚了一点儿，这一切做得早一点就好了。这里我不提谁

欺负谁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好好地分析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关于齐特·齐梯奇[①]的著名的话对托洛茨基是十分合适的："齐特·齐梯奇，谁欺负你了？你自己在欺负一切人。"（笑声）我说过，我不来多谈这个问题。就算真的有什么人欺负托洛茨基。但是，难道问题在这里吗？在欺负的问题上究竟有什么原则性的东西呢？要知道，问题在于决议的原则方面，而不在于谁欺负了谁。我想以此说明，即使是激烈而粗暴的反对派的支部和组织，也不敢在什么原则上反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我肯定这一事实是为了再一次指出，在我们党的全部历史中很难找到另一个类似的事实，就是决议经过水火不相容的激烈争论后不仅得到了大多数的赞同，而且简直是得到了全党一致的赞同。

由此我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完全符合党在目前的需要和要求。第二个结论就是党通过这次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争论变得更巩固了，更团结了。这个结论可以说正击中了我们国外的敌对分子的要害，他们早就因为我们发生争论而得意洋洋，他们以为我们的党将会由于争论而削弱，政权将会瓦解。

我不来多谈党内民主的实质。党内民主的原则已经在决议中阐明，而决议是经全党详尽无遗地讨论过的，我何必还在这里重复呢？我只谈一点，就是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显然，党内民主将是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范围内的民主。这个范围是什么，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在这里重复了。我也不来多谈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是使党内民主成为我们党的血和肉的基本保证的问题。这一点在我们的决议中也十分详细地

——————————————

① 齐特·齐梯奇，是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代人受过"一剧中的主角。他是一个富商，一个自私自利、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资产阶级典型人物。——译者注

谈到了。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某些同志和某些组织把民主问题偶像化，把民主看做某种绝对的、超出时间和空间以外的东西的问题。我想以此说明，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为了使这种党内民主成为可能，就需要有两个条件或者两类条件，即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没有这两类条件是谈不上什么民主的。

第一、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恶化，使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增长起来，使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在质量上也增长起来。必须使党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也在质量上，而且首先是靠吸收国内无产阶级分子增长起来。为了能够提出真正实行党内民主而不是在纸上实行党内民主这个问题，这些内部性质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单靠这些条件是不够的。我已经说过还有第二类条件，即外部性质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党内民主是不可能的。我指的是某些多少能够保证和平，保证和平发展的国际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党内民主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侵犯我们，而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求保卫国家，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因为那时必须把民主收起来。党要动员起来，我们大概要使它军事化，关于党内民主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应该以条件为转移来看民主，不应该把党内民主问题偶像化，因为你们知道，实行党内民主是以每一个时期的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条件为转移的。

为了不会再有过多的迷恋和毫无根据的责备，我还必须提醒你们注意党在实行民主方面所面临的那些障碍。即使在上述两个主要的有利条件即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这些障碍也妨碍民主的实行。同志们，这些障碍是存在的，它们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党的工

作，因此，我没有权利不谈它们。这些障碍是什么呢？

同志们，第一、这些障碍就是我们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头脑中还存在着过去战争时期的残余，即我们党实行军事化时期的残余，这些残余产生了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党似乎不是一个有独立的思想生活和实际生活的独立的有机体，而是一种类似由下级、中级和上级机关组成的机关系统的东西。固然，这种绝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形成，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以完备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观点的因素却在我们一部分担任党的职务的工作人员头脑中存在着，这些因素妨碍他们彻底实行党内民主。正因为如此，同这种观点作斗争，同中央和地方的战争时期的残余作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在实行党内民主道路上的第二个障碍就是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党的机关、对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的压力。这种庞大的机关对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的压力不总是明显的，不总是惹人注目的，但这种压力是一秒钟也不停止的。庞大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关的这种压力归根到底表现在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工作人员往往不由自主地完全不自觉地离开了党内民主，离开了他们相信它是正确的可是往往不能贯彻的那条路线。请你们想一想，官僚主义国家机关拥有不下一百万职员，其中大部分是党的异己分子，而我们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过两三万人，他们却负有使国家机关服从党，使国家机关社会主义化的使命。没有党的支持，我们的国家机关有什么价值呢？没有我们党的机关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国家机关可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此，每当我们党的机关把自己的触角伸进国家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时，它往往不得不使这些机构中的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路线相适应。具体地说：党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同时也要征收粮食税，进行某种运动，因为没有运动，没有党的帮助，国家机关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是处于两条火线中间：

一方面必须纠正按旧方式活动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路线，另一方面必须保持同工人的联系。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往往自己也官僚主义化了。

这就是第二个障碍，克服这个障碍是有困难的，但是为了便于实行党内民主，无论如何必须克服这个障碍。

最后，在实现民主的道路上还有第三个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组织和支部，特别是边疆地区（决没有侮辱它们的意思）的组织和支部的文化水平很低，妨碍了我们的党组织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你们知道，实行民主要求支部的成员和整个组织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要求具有可以选举出来放到工作岗位上去的某种最低数量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如果组织内没有这种最低数量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如果组织本身的文化水平很低，那该怎么办呢？这里自然就不得不放弃民主而采取委派负责人员等等的办法。

这就是过去摆在我们面前、将来还会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为了诚实而彻底地实行党内民主，我们必须克服这些障碍。

我所以提醒你们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障碍和那些外部的和内部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民主就会变成空洞的煽动性的词句），是因为有些同志把民主问题偶像化和绝对化了，他们以为民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可能的，似乎只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恶”意妨碍着民主的实行。同志们，我提醒你们注意实行民主的条件和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就是要反对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反对这种不是我们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列宁主义的观点。

同志们，我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我的报告，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对争论做出总结，并从这些总结中得出某些对我们会有重大意义的结论。我想可以把我们在争论方面即在民主问题上的整个斗争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反对派攻击中央委员会，责备中央委员会在最近两

年中，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内的整个路线似乎是不正确的。这是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公布以前的时期。这里我不谈谁对和谁不对的问题。这些攻击是猛烈的，而且你们知道，这些攻击不是常常有根据的。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反对派攻击中央委员会最激烈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从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公布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反对派有必要提出什么完整的和具体的东西来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但是当时反对派任何完整的和具体的东西都没有提出来。这是中央委员会和反对派最接近的时期。看来，只要反对派同中央的路线有某种调和，问题就会结束或者可以结束了。我记得很清楚，在莫斯科，在这个论战的中心，大概是十二月十二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圆柱大厅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由于某种原因被否决了，但这个决议案和中央的决议差别很少。这个决议案在原则上，甚至在某些次要的条文上，都和中央的决议完全没有分歧。当时我以为再没有什么可以争吵的了：有中央的决议，它使所有的人，至少使十分之九的人都感到满意，反对派本身显然也感到这一点，并赞成这个决议，因此，我们也许会就此消除意见分歧。这是第二个时期即调和时期。

但是接着就到了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以托洛茨基的发动，即发出告各地区书开始的。他的发动一下子就消除了调和的趋势，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在托洛茨基的这个发动以后，激烈的党内斗争时期开始了，——如果托洛茨基不在他赞成政治局决议后的第二天发表自己的那封信，斗争是不会发生的。你们知道，在托洛茨基的第一次发动以后随即就有第二次，在第二次以后又有第三次，斗争因而更加尖锐起来了。

同志们，我认为托洛茨基在这几次发动中至少犯了六个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造成了党内斗争的尖锐化。我现在来分析这些错误。

托洛茨基的第一个错误表现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公布后的第二天他发表文章这件事上，这篇文章只能看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的政纲。我再说一遍而且着重指出，这篇文章只能看做和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相对立的新政纲。同志们，只要想一想，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某日举行会议并提出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的问题，决议被一致通过，在这以后只过了一天托洛茨基就违背中央委员会，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越过中央委员会，把文章分发给各个地区，这篇文章是重新提出机关和党、干部和青年、派别组织和党的统一以及其他等等问题的新政纲，所有的反对派都抓住这个政纲，把它拿来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这只能看做把自己和中央委员会相对立。这是托洛茨基公开地尖锐地把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相对立。于是在党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还是再也没有了？有全体委员尊重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的中央委员会，还是只有不受法规约束，今天可以赞成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明天又可以公布和提出新的政纲来反对这个决议的、站在中央委员会上面的超人？同志们，如果有一个中央委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藐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一致通过的决议，那就不能要求工人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有两种纪律：一种是工人的纪律，另一种是要人的纪律。纪律应当只有一种。

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他把自己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并自命为站在中央委员会上面、站在它的法规上面、站在它的决议上面的超人，这样就给一部分党员造成藉口来进行破坏这个中央委员会的信用的活动。

某些同志对“真理报”和个别中央委员在某些文章中指出托洛茨基的这种反党行为表示不满。同志们，我必须回答这些同志说：任何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如果在一个中央委员企图站在整个中央委员会之上这种困难的时刻不显示出自己的能力来捍卫党的尊严，那末它是

不会得到这个党的尊重的。如果中央委员会放过托洛茨基的这种企图，那末它就是在精神上毁灭自己。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就在于他在整个争论时期都表现出暧昧的态度，粗暴地藐视希望知道他的真正立场的党的意志，外交式地逃避许多组织所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问题：托洛茨基到底拥护谁，拥护中央委员会还是拥护反对派？进行争论不是为了支吾搪塞，而是为了公开地真诚地在党的面前说出一切真话,像伊里奇所善于做的那样，像每个布尔什维克所应当做的那样。据说托洛茨基病得很厉害。就算他病得很厉害吧。但是他在生病的时候写了三篇文章，并给他今天出版的小册子写了另外的四章。托洛茨基完全有可能写两三行字来说明他拥护反对派还是反对反对派，以满足询问他的那些组织的要求，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无须证明，这种藐视许多组织的意志的态度不能不使党内斗争尖锐化。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三个错误就在于他在自己的发动中把党的机关和党对立起来，提出同“机关工作人员”作斗争的口号。布尔什维主义是不能同意把党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的。我们党的机关实际上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党的机关就是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它们是不是服从党呢？当然是服从的，因为它们百分之九十是由党选举出来的。有些人说，省委员会是委派的。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正确的。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的省委员会正如县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一样，是选举出来的。它们是服从党的。但是它们被选举出来以后就必须领导工作，问题就在这里。不这样，即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出来以后，省委员会由省的代表会议选举出来以后不领导工作，党的工作还能进行吗？要知道，不这样，我们党的工作就不能进行。要知道，这是一种否认党的工作的领导原则的轻率的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观点。我担心托洛茨基（我当然不想把他和孟什维克混为一谈）把党的机关和党这样对立起来会促使我们党的某些没有经验

的分子像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那样主张组织上的松懈和涣散。我担心托洛茨基的这个错误会使我们整个党的机关受到没有经验的党员的打击，而党是不可能没有机关的。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四个错误就在于他把青年和我们党的干部对立起来，他毫无根据地责备我们的干部正在蜕化。托洛茨基把我们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混为一谈，他援引马克思的某些学生即老社会民主党人的蜕化做例子，由此做出结论说我们党的干部也面临着这种蜕化的危险。一个中央委员昨天还同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携起手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而现在，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第七个年头，竟企图断定说（虽然是用推测的方式），在同孟什维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干部似乎面临着蜕化的境地，这本来是应当置之一笑的。我再重复一遍，这种企图本来是应当置之一笑的。但是既然这种论调不是在平时，而是在争论时说出来的，既然这里的问题是把那些可能蜕化的干部和据说没有这种危险或者几乎没有这种危险的青年对立起来，那末这种实质上是可笑的不严肃的推测就可能带有而且已经带有某种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应当谈谈这个问题。

有时候人们说，应当尊敬老年人，因为他们比青年人日子过得多些，知道得多些，并且能够给予较好的指示。同志们，我必须说，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不是任何老年人都应当受到尊敬的，也不是任何经验对我们都是重要的。要看是什么经验，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自己的很有经验的干部，如谢德曼、诺斯克、维尔斯和别的一些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干部，他们都富有斗争经验……但他们是同什么作斗争的呢？是同谁作斗争的呢？要看是什么经验，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在那里，有些干部是在同革命精神作斗争中、在不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是丰富的经验，但这种经验是不好的。同志们，青年有责任来粉碎

这种经验，消灭这种经验，驱逐这种老年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青年没有同革命精神作斗争的经验，青年要比老年干部接近革命精神或者接近马克思主义，因为老年干部拥有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作斗争的经验，拥有拥护机会主义反对革命主义的斗争经验。这样的干部应当受到痛击，而我们的全部同情应当给予那些青年，我再重复一遍，青年没有这种同革命精神作斗争的经验，因而更容易领会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新的斗争方式和新的斗争方法。在德国，这样提出问题我是理解的。如果托洛茨基讲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这个党的干部，那我双手拥护他的声明。但是要知道，我们这里讲的是另一个党，即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的干部是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中诞生的，是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中巩固起来的，是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中、是在同帝国主义的各色机会主义走狗作斗争中成长起来并取得政权的。这里有原则上的差别，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如果不是昧着良心而是凭良心说话，怎么能把我们的干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干部混为一谈呢？我们的干部是在维护革命精神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进行了维护革命精神的斗争，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取得了政权，他们震撼着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干部从前同威廉勾结在一起反对工人阶级，现在同谢克特勾结在一起，他们是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战斗中巩固和成长起来的。怎么能把这两种原则上不同的干部混为一谈，怎么能把他们混淆起来呢？在这两种干部之间存在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这难道很难了解吗？托洛茨基的这种粗暴的歪曲和这种粗暴的混淆是打算破坏我们的革命干部，即我们党的核心的威信，这难道很难了解吗？这种歪曲只会燃起怒火并使党内斗争尖锐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五个错误就在于他在自己的信中提出了向学生青年，向这个“我们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看齐的理由和口号。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他们对党

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锐。”为了使人不致怀疑他指的是哪种青年，托洛茨基在第二封信中补充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官僚主义的反应特别敏锐的是学生青年。”如果从这个绝对不正确的、理论上错误的和实践上有害的论点出发，那就应当更进一步提出下面的口号：“我们党内要有更多的学生青年，我们党的大门要为学生青年开得更大些。”

直到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指靠的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我们说，党的大门要为无产阶级分子开得更大些，并且我们党是靠吸收无产阶级成分发展起来的。现在托洛茨基却把这个公式完全颠倒过来了。

关于我们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新问题。这个问题还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到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时就已经提出来了。大家知道，马尔托夫当时要求为非无产阶级分子放宽入党的条件，反对要求坚决限制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的列宁同志。后来，在我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又更加尖锐地提出来了。我记得，列宁同志在大会上尖锐地提出了关于我们党内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当时列宁同志是这样说的：

“有人指出，领导分裂的通常总是知识分子。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不解决问题……我认为应当把问题看得广一些。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教育任务，而且是一个政治任务。工人具有阶级本能，工人只要有一点政治经验就能相当快地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很赞成我们委员会中有两个知识分子就有八个工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三七五页、第三七六页）

还在一九〇五年就这样提出问题了。从那时起，列宁同志的这个指示就成了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的领导思想。而现在托洛茨基竟向我们提出实质上是要我们离开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路线的建议。

最后，托洛茨基的第六个错误表现在他宣布集团的自由。是的，

是集团的自由！我记得，还在起草关于民主的决议草案的小组委员会上，我们曾经和托洛茨基争论关于集团和派别组织的问题。托洛茨基不反对禁止派别组织的存在，却坚决地主张容许党内有集团存在。反对派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看来这些人不懂得，容许集团的自由就是为米雅斯尼柯夫分子打开方便之门，使他们有可能欺骗党，有可能拿派别组织冒充集团。而集团和派别组织有什么差别呢？只有表面上的差别。下面就是列宁同志对派别活动的评定，他把派别活动归入集团一类：

“还在全党争论工会问题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征兆，即产生了几个具有特别政纲、力求在某种程度上搞小圈子和规定自己的集团纪律的集团。”（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三〇九页）

可见派别组织和集团实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既然在这里，在莫斯科，反对派建立了以谢烈布利雅柯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分派了自己的发言人，责成他们在某些大会上发言，提出某种反对意见；既然反对派分子在斗争进程中被迫退却并按照命令改变自己的决议，那末这当然就是集团，就是集团的纪律。有人说这不是派别组织，那末什么是派别组织呢？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解释吧。托洛茨基的发动，他的关于青年一代和派别组织问题的信和文章，都是要迫使党容许自己内部有集团存在。这是一种使派别组织，首先是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的企图。

托洛茨基硬说，集团的产生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没有官僚主义制度，也就不会有集团了。同志们，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们这里所以有集团出现而且将来还会有集团出现，是因为我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从社会主义的萌芽形式到中世纪的形式。这是第一。其次，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容许恢复私人资本和恢复相应的思想，这种思想渗

入党内来了。这是第二。第三、因为我们党内有三种成分，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子。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这就是某些分子离开党而组织集团的原因，这些集团我们有时应当用外科手术来割除，有时却应当通过争论从思想方面来消除。

这里问题不在于制度。如果我们有极端自由的制度，那末集团就会多得多。因此，罪过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我们生活的条件，在于我国现有的条件，在于党本身发展的条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还容许集团存在，我们就会断送党，就会把党从完整的团结一致的组织变成彼此缔结条约、建立临时联合和取得临时协议的集团和派别组织的联盟。这将不成其为党，这将是党的瓦解。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一分钟也没有把党看做别的东西，只把它看做由一块材料凿成的完整的组织，它有一个意志，它在工作中把思想上的各种差异汇集在一条实际活动的洪流中。

而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议是非常错误的，它违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会使党必然瓦解，会使党涣散，会使党软弱，会使统一的党变成集团的联盟。在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统一的党,不仅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党,而且是一个能够经得住无产阶级敌人的攻击、能够引导工人去进行决战的真正钢铁般的党。

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做出了明确具体的关于这次争论总结的决议，我们说，我们不能容忍集团和派别组织，党应当是统一的和完整的，不能把党和机关对立起来,不能胡说干部有蜕化的危险,因为这些干部是革命的；不能在这些革命干部和青年之间找空子，因为青年和这些干部现在步调一致地前进，将来还会步调一致地前进。

我们也看出某些肯定的结论。第一个和基本的结论是：党今后要坚决指靠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并向他们看齐，收紧并缩小非无产阶级分子进入我们党的入口，或者完全堵死这个入口，对于无产阶级分

子，门要开得大一些。

至于集团和派别组织，我认为已经到了我们应当公布关于统一的决议中的一项条文的时候了，这项条文根据列宁同志的提议，由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当时并没有公布。党员把这项条文忘记了。恐怕不是大家都记得这项条文的。直到现在还被保守秘密的这项条文应当公开了，它应当列入我们就要通过的关于争论总结问题的决议中。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就读一读。这项条文说：

“为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如遇违反纪律、恢复或容许派别活动的情事发生,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非常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凡是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时，应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内最高领导者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低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时，那末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

我认为我们应当把这项条文放到关于争论总结的决议中去，并把它公布。

最后，谈一谈反对派经常提出的但是不一定经常得到满意答复的一个问题。他们时常问道：我们反对派反映的是谁的情绪呢？我认为反对派反映的是我们党内非无产阶级成分的情绪。我认为反对派不由自主地做了我们党内非无产阶级分子情绪的不自觉的传播者，也许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反对派无限制地鼓吹他们常常加以绝对化和偶像化的民主，就是放纵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

你们知道像学生马尔丁诺夫、卡查尔杨等等这样一些同志的情绪吗？你们读过“真理报”上霍多罗夫斯基的小品文吗？他引了这些同志的演说中的一些话。例如马尔丁诺夫（原来他是个党员）的讲话：

“我们的工作是做决定，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执行，并且少进行一些讨论。”这里指的是交通人民委员部直属高等学校的支部。但是，同志们，我们党总共有不下五万个支部，如果每一个支部都这样对待中央委员会：支部的工作是做决定，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不是进行讨论，那末恐怕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决议。马尔丁诺夫分子的这种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情绪呢？而马尔丁诺夫分子是拥护反对派的，——请注意这一点。马尔丁诺夫和托洛茨基之间有没有差别呢？差别只在于托洛茨基向党的机关展开攻击，而马尔丁诺夫要消灭党的机关。

还有一位高等学校学生卡查尔杨，原来他也是个党员。他问道：“我们这里是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同志们，说这种话的不是孟什维克马尔托夫，而是“共产党员”卡查尔杨。托洛茨基和卡查尔杨之间的差别在于：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干部在蜕化；根据卡查尔杨的说法，必须把干部赶走，因为在他看来，干部骑在无产阶级的脖子上。

我要问一问：马尔丁诺夫和卡查尔杨反映的是谁的情绪呢？是无产阶级的吗？当然不是。那末究竟是谁的呢？是党内和国内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这些反映非无产阶级情绪的人拥护反对派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鼓掌）

二 结 论

（一月十八日）

我在报告中已经说过，我不想谈问题的经过，所以不想谈，是因为正像我说过的那样，这会带来无谓纠纷和相互责备的因素。但是既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愿意这样，既然他要求这样，那我就准备让步，简单地谈谈党内民主问题的经过。

在中央委员会里，关于党内民主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第一次是在中央九月全会上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各企业中爆发了冲突，是由于某些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有当时我们已经揭露的脱离群众的现象。当时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缺点在党内积累起来了，必须成立一个有威信的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研究这些事实，提出关于改善党内状况的具体建议。关于销售危机，关于“剪刀差”问题也必须这样说。无论是提出问题，无论是选举党内状况委员会和“剪刀差”委员会，都没有反对派参与其事。当时反对派在哪里呢？如果我没有弄错，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克里木，萨普龙诺夫在基斯洛沃得斯克，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得斯克写完了他的论艺术的文章，准备来莫斯科。在他们还没有来到以前，中央委员会就已经在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们来到时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他们既没有参与一句话，也没有对中央委员会的计划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关于党内状况的问题，捷尔任斯基同志在九月省委书记会议上做过报告。我肯定地说，无论在九月全会上，无论在书记会议上，现在的反对派分子对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党内危机”和“民主”连一句话都没有讲过。

由此可见，关于民主和“剪刀差”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自己提出来的，主动权完全操在中央委员会手里，而反对派分子没有讲过什么话，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场。

这可以说是第一幕，问题经过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幕是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开始的。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看到党内存在着缺点，中央委员会已经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成立了委员会，——如果主动权仍旧操在中央委员会手里，那就糟了，——于是他们就抱定决心，企图把主动权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夺取过去，并企图玩弄民主这个法宝，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法宝很灵，可以试用它来欺骗中央委员会。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普

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详细谈到的那些文件，即四十六人的文件和托洛茨基的一封信。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九月，即在他进行派别发动的前几天，在全会上还默不作声，至少并没有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过了两个星期却突然宣称，国家和党就要毁灭，而他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

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因为如果反对派真的愿意解决问题，真的愿意实事求是地同志般地对待问题，他们就应当首先向九月全会各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声明，大致可以这样说：“我们认为你们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要求你们向政治局报告你们工作的结果，我们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我们要向全会提出我们新的建议”等等。如果委员会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政治局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忽视反对派的意见或者拒绝召开全会来审查托洛茨基和整个反对派的建议，那末在那个时候，并且只有在那个时候，反对派才有充分权利越过中央委员会而公开地发表告党员书，并且向党说：“国家濒于灭亡，经济危机日益扩大，党就要毁灭，我们建议中去委员会各委员会审查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拒绝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曾试向政治局提出意见，但是毫无结果，我们现在不得不向党控诉，要求党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我相信党会回答说：“是的，这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把问题的本质看得高于形式。”

但是，难道反对派这样做了吗？难道他们，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打算向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吗？难道他们曾经想过、曾经打算在中央委员会或在它的机关范围内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吗？不，反对派没有做过这样的打算。很明显，反对派不是想改善党内状况，帮助党改善经济状况，而是想抢先走在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会和中央全会的工作的前面，夺取中央委员会的主动权，玩弄民主这个法宝，趁时间还不晚，就吵吵嚷嚷，企图破坏中央委员会的信用。看来，反对派急急忙忙地制造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即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的声明，就是为了能够把它们分发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和各个地区，说他们反对派是拥护民主、主张改善经济的，而中央委员会却从中作梗，说他们需要大家的帮助来反对中央委员会等等。

事实就是如此。

我要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我这些话。我要求他至少在报刊上反驳我这些话。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这一事实，即各委员会在没有反对派参与的情况下，在反对派进行发动以前，就由中央九月全会成立了。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这一事实，即无论托洛茨基，无论其他的反对派分子都没有打算向这些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这一事实，即反对派知道有这些委员会存在，但他们藐视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没有打算在中央委员会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正因为如此，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在十月全会上声称他们想通过民主来挽救党，而中央委员会却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就嘲笑他们说：不，同志们，我们中央委员会完全拥护民主，但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民主，因为我们认为你们的“民主”是被你们的派别活动利用来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战略步骤。

当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党内民主究竟做出

了什么决定呢？决定是这样的：

“全会完全赞同政治局及时制定的党内民主的方针，并完全赞同政治局提出的加强同浪费现象和新经济政策对个别党员的腐蚀影响作斗争的建议。

全会委托政治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加速政治局和九月全会所任命的下列各委员会的工作：（一）‘剪刀差’委员会，（二）工资委员会，（三）党内状况委员会。

政治局对这些问题制定必要措施后应立即付诸实施，并在下届中央全会上做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托洛茨基在他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写道，十月全会是“机关官僚主义路线的最高表现”。托洛茨基的这个声明是对中央委员会的诬蔑，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失掉理智和被派别活动弄得头晕目眩的人才会在文件公布以后说十月全会是官僚主义的最高表现。

当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的“民主的”手腕做出了什么决定呢？决定是这样的：

“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尤其是因为托洛茨基对政治局的攻击在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全会遗憾地认为，托洛茨基为了提出他所涉及的问题，选择了发表告各个党员书的办法，而不选择唯一可行的办法，即先把这些问题提交托洛茨基也担任委员的委员会讨论。

托洛茨基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四十六人的声明）。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以及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坚决斥责四十六人的声明，认为它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的性质的。这

个声明有使党在最近几个月来的全部生活处在党内斗争标志下的危险，从而在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最严重的关头削弱党。”

同志们，可见上述事实完全驳倒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所描述的那种情况。

第三幕或者问题经过的第三个阶段是十月全会以后的时期。十月全会决定建议政治局采取一切办法来保证大家同心协力地工作。同志们，我应当声明，在十月全会以后的时期内，我们采取了一切办法要和托洛茨基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虽然必须说明，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曾经和托洛茨基举行过两次非正式会议，谈到了经济方面和党方面的一切问题，并且取得了某些没有引起任何分歧的意见。这些非正式会议和这些想使政治局内部同心协力工作的尝试的下一步骤，我昨天已经报告过，就是成立三人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还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后来成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民主的决议。

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以为既然决议已经一致通过，就再没有理由进行争论，没有理由进行党内斗争了。事实上，在托洛茨基进行新的发动即发表他的告各地区书以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公布后的第二天违背中央委员会并越过中央委员会而进行的发动，却把一切事情都搅乱了，使情况根本改变了，它把党拉向后退去进行新的争论，去进行比过去更为尖锐的新的斗争。有人说，中央委员会应当禁止登载托洛茨基的文章。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对中央委员会非常危险的步骤。请你们试试禁止已经在莫斯科各区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吧！中央委员会是不能采取这种轻率的步骤的。

问题的经过就是如此。

从上面所讲的应该得出结论：反对派的问题与其说是拥护民主，不如说是利用民主的思想来损害中央委员会，我们的反对派不是一些

愿意帮助党的人，而是一个对中央委员会心怀叵测的派别组织，他们暗自忖度：“也许中央委员会会犯错误，会有失策的地方，那我们就揍它一顿。”有一批党员，他们埋伏在胡同口等候党的中央机关，利用秋收或者切尔文贬值的机会，或者党的其他困难，以便暗地里从埋伏的地方跳出来揍党的脑袋，这就是派别组织。是的，中央委员会在十月里是正确的，当时它告诉过你们，反对派分子同志们，民主是一回事，而陷害党是另一回事；民主是一回事，而利用民主的叫嚣来反对党的多数是另一回事。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问题的经过就是这样。我本来不想在这里谈问题的经过，但是我终究对你的顽强的愿望做了让步，不得不讲到了这个问题。

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当然，我们这些列宁同志的学生不会不了解列宁同志是天才中最有天才的人，这样的人物经过几百年才产生一个。但是请问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什么你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和这个最有天才的人发生了分歧呢？为什么你在困难的时刻离开了这个最有天才的人，不听他的话呢？你当时是待在哪里，待在哪一个阵营里呢？

萨普龙诺夫现在虚伪地伪善地赞扬列宁同志，而正是这位萨普龙诺夫曾经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无耻地骂列宁同志是“不学无术的人”，是“寡头政治家”！如果他真的认为列宁同志是天才中的天才，那末为什么，比如说，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不支持天才的列宁，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刻始终站在对立的阵营里呢？列宁同志向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统一的决议，要求把派别分子开除出党，其中就有萨普龙诺夫，这一点萨普龙诺夫是否知道呢？

还有，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仅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而且后来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也站在和最有天才的列宁相敌对的阵营里呢？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这里就没有某种规律性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我打算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想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这很可嘉许。但是请看结果怎样呢？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你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结果失败了，后来在工会问题争论中，你又打算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结果又失败了；现在我不知道你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还是根据别人的见解工作，但是要知道，你似乎又失败了。（笑声）我始终认为，如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现在多根据自己的见解而少根据托洛茨基在十月八日的信上所表明的那种见解来工作，那末他对我们会比对托洛茨基接近些。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责备中央委员会，他说，当伊里奇领导我们的时候，问题的解决是及时的，不耽误的，因为伊里奇善于掌握还在萌芽状态的新事变，并善于提出预告事变的口号。而现在，他说，在伊里奇不能视事以后，中央委员会就开始落在事变的后面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想以此说明什么呢？想说明伊里奇比他的学生们高明吗？但是难道有谁怀疑这一点吗？难道有谁怀疑，伊里奇和他的学生们相比显然是歌利亚[①]吗？如果指的是党的领袖，不是指接到一大堆贺电的报刊上的领袖，而是指真正的领袖，那末我们的领袖只有一个，就是列宁同志。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在目前列宁同志暂时不能视事的情况下，需要采取委员会制的方针。至于说到列宁同志的学生，可以举出同克逊的最后通牒有关的事变做例子，这些事变对列宁同志的学生是一种典型的锻炼和考验。当时我们摆脱了困难而没有使事业受到损失，这件事实毫无疑问地说明列宁同志的学生已经从自

——————————————

① 据旧约记载，歌利亚是一个巨人。——译者注

己的导师那里学会了一些东西。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硬说我们党在过去的年代里没有落在事变的后面，这是不正确的。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这种说法在实际上是不真实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可以引证许多例子。就拿布列斯特和约来说吧。难道我们的布列斯特和约不是签订得迟了吗？难道我们不是由于德国人的进攻和我们士兵的普遍逃跑这些事实才最后了解到和约的必要吗？战线的崩溃，霍夫曼的进攻，他向彼得堡的进军，农民对我们的压力，——难道我们不是由于这一切事实才了解到国际革命的速度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我们的军队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巩固，农民并不像我们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能忍耐，农民希望和平，他们要用强力取得和平吗？或者就拿废除余粮收集制来说吧。难道我们的余粮收集制不是废除得迟了吗？难道我们不是由于喀琅施塔得和唐波夫这些事实才了解到不能再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下过日子了吗？难道伊里奇自己不是承认，我们在这条战线上所遭到的失败要比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作战的战线上的任何一次失败都更严重吗？

党在这一切情况下都落在事变的后面，都稍微迟了一点，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这是合乎规律的。很明显，既然这里的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上的预见，而是直接的实际领导，那末掌握政权而被卷进日常事变的执政党不可能立刻看出和掌握住生活深处所发生的过程，需要有外界的推动力和新过程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使党看出这些过程并依据它们来确定方针。正因为如此，我们党过去稍微落在事变的后面，将来还会落在事变的后面。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落后与否，而在于了解事变的意义，了解新过程的意义，然后按照总的发展趋向来巧妙地掌握这些事变和过程。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而不是用到处找罪魁的派别分子的眼光来看事物，那末问题正是这样。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因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讲到托洛茨基的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而表示愤怒。他表示愤怒，但是实质上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并且根本不打算为自己的愤怒提出根据，他忘记了愤怒并不就是论据。是的，托洛茨基在组织问题上确实离开了列宁主义。我们过去这样断定而且现在还是这样断定。布哈林所写的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题为“打倒派别活动”的著名文章，完全是论述托洛茨基的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问题的。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从实质上提出意见来反对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呢？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打算提出论据或者类似论据的东西来论证自己的愤怒呢？昨天我已经说过，今天还要重复一遍：把自己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忽视许多组织要求托洛茨基明确回答问题的意志，把党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青年和党的干部对立起来，要党指靠学生青年和宣布集团自由，——托洛茨基的这些行为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不相容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究竟为什么不打算反驳我这种说法呢？

有人说托洛茨基受到了攻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都谈到这一点。同志们，我必须声明，这些同志关于攻击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为了使你们有可能判断，我提醒你们注意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中央九月全会上发生的事件，当时托洛茨基听到中央委员柯马罗夫关于中央委员不能拒绝执行中央委员会决议的话，站起来就退出了全会会议。你们记得，中央全会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托洛茨基那里去，**请求**他回到全会会议上来。你们记得，托洛茨基拒绝接受全会的请求，这就表现出他对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毫不尊重。

或者再拿另一个事实的经过来说。虽然中央委员会曾经两次通过决议，要托洛茨基一定担任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但是托洛茨基坚决拒绝在苏维埃中央机关，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你们知道，托洛茨基根本不打算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究竟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想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呢？为什么喜欢大谈计划

的托洛茨基对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屑一顾呢？一个中央委员蔑视中央的决议，这种情况能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呢？这一切事实不是说明了关于攻击的说法是无中生有的谣言，说明了如果要责备什么人，那就应该责备托洛茨基自己（因为他的行为只能看做是对中央委员会的侮辱）吗？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民主的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提出问题：或者我们有集团，那就有民主；或者你们禁止集团，那就没有民主。他的集团自由和民主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我们不是这样理解民主的。我们所理解的民主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经常吸引党员群众不仅参加讨论问题,而且参加领导工作。集团的自由，即派别组织的自由（两者是一回事）是一种祸害，它使党有遭到分裂和变成争论的俱乐部的危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揭露了自己，因为你坚持派别组织的自由。党员群众所理解的民主是创造条件保证党员积极参加我们国家的领导事业，而两三个反对派知识分子却把民主理解为给反对派建立派别组织的机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揭露了自己。

为什么你们这样害怕关于党的统一的第七条呢？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呢？第七条说：“为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难道你们反对“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吗？反对派同志们，难道你们反对这一点吗？同志们，我可不知道你们是反对这一点的。萨普龙诺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难道你们反对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和“取缔派别活动”吗？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也许我们会做小小的修正。（笑声）

再往下看：“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如遇违反党的纪律或恢复派别活动的情事发生，可以采取党内处分的办法……”难道你们也害怕这一点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萨普龙诺夫，难道你们

想违反党的纪律，恢复派别活动吗？要是你们不想这样做，那末究竟害怕什么呢？同志们，你们身上的惊惶情绪揭露了你们自己。很明显，既然你们害怕关于统一的决议的第七条，你们就是拥护派别活动，拥护违反纪律，反对统一。如果你们不反对这一切，那末你们究竟为什么惊惶不安呢？如果你们心地纯正，如果你们拥护统一，反对派别活动和反对违反纪律，那末党的惩罚的手是不会碰到你们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你们究竟害怕什么呢？（有人喊道："既然没有什么可怕，你为什么提出来呢？"）我们是**提醒**你们。（笑声，鼓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在吓唬党。"）我们是吓唬派别分子，不是吓唬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难道你认为党和派别分子是一回事吗？大概是做贼心虚。（笑声）

再往下看："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非常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凡是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时，应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你们不是派别分子，如果你们反对集团的自由，如果你们拥护统一，那末，反对派同志们，你们应当赞成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第七条，因为它是专门对付派别分子，专门对付破坏党的统一、党的威力、党的纪律的人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现在来谈谈拉狄克。有一种人，他们长了舌头是为了控制它和支配它的。这是平常人。还有一种人，他们自己服从自己的舌头并且受舌头的支配。这是特殊的人。拉狄克就属于这种特殊的人。一个人如果长了舌头不是为了支配它，而是为了让自己服从自己的舌头，那他就不能知道，舌头会在什么时候顺口说出什么话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听过拉狄克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你们对他今天的演说就会感到惊奇。拉狄克在一次争论会议上肯定地说，党内民主问题是不值得一谈的问题，他拉狄克，老实说是反对民主的，现在的问题实质上不是关于民主的问题，而是中央委员会考虑怎样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就是这个

拉狄克在另一次争论会议上又声明说，党内民主问题并不重要，中央委员会内的民主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中央委员会里已经成立了一个执政内阁。还是这个拉狄克今天却又公开声明说，党内需要民主正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因为照他说来，没有民主就不能管理党。在这三个拉狄克中，叫我们相信哪一个呢？相信第一个，相信第二个，还是相信第三个呢？有什么可以保证拉狄克或者他的舌头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做出新的意外的声明来反驳他以前的一切声明呢？能不能信赖拉狄克这样的人呢？既然如此，拉狄克的关于撤销鲍古斯拉夫斯基和安东诺夫的某些职务是由于“派别性的考虑”的声明还能有什么价值呢？

同志们，关于鲍古斯拉夫斯基我已经谈过了……至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让我告诉你们以下的事实。根据中央全会所批准的中央组织局的决议，撤销了安东诺夫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职务。他所以被撤职，首先是因为他没有通知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就分发了附有国际形势、党的建设等等议程的关于召开高等军事学校支部和空军支部代表会议的通知，虽然安东诺夫知道，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是以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的权限进行工作的。此外，所以撤销他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职务,是因为他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不顾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运用党内民主的方式的指示必须和中央委员会的计划相符合的警告，把这个指示分发给所有的军队支部了。最后，他所以被撤职，是因为他送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封口气十分不礼貌而内容绝对不可容忍的信，威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它们使“肆意妄为的领袖们”守规矩。

同志们！可以而且应该容许反对派分子担任职务。可以而且应该容许中央委员会各部部长批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不能容许以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的权限进行工作的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部长经常拒绝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事务上的联系，不能容许负责工作人员藐

视起码的礼节。不能把教育红军的工作托付给这样的同志。关于安东诺夫的问题就是如此。

最后，我必须简单地谈一谈反对派同志们在他们的演说中反映的究竟是谁的情绪的问题。我必须回到交通人民委员部训练班的卡查尔杨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事件”上来。这个“事件”说明一部分高等学校学生的情况并不是一切都很好，他们身上的党性已经腐朽，他们内心里已经和党断绝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们乐意拥护反对派。但是，同志们，请原谅我这样说，在赞成中央委员会决议的人中间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种在党性方面腐朽透顶的人的。同志们，我们这里是没有这种人的。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人会说：“我们这里是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话。这是社会革命党人“日报”的话。反对派同志们，如果在你们那里，在你们的队伍中有这样的拥护者，你们的立场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或者拿另一个同志即马尔丁诺夫同志来说吧。他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该默不作声，而由支部来做决定。他说，你们中央委员会可以执行我们支部的决定。但是我们有五万个支部。如果由它们来做决定，例如做关于克逊最后通牒问题的决定，那末我们花两年的时间也不能做出这个问题的决定。要知道，这是十足的无政府孟什维主义。如果这些失掉理智和在党性方面腐朽透顶的人待在你们的派别组织里，你们的派别组织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喊声：“他们是党员吗？”）

是的，很遗憾，他们是党员，但是我决心采取一切办法使这种人不再做我们党的党员。（鼓掌）我说过，反对派所反映的是党内外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和意图。反对派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放纵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帮助了我们党的敌人，帮助了那些想削弱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这一点我昨天已经说过，今天再把它肯定下来。

但是也许你们想听听其他新证人的话吧？好吧，我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举出你们大家知道的斯伊万诺维奇所说的话做例子。这个斯伊万诺维奇是什么人呢？他是孟什维克，当我们和孟什维克同在一个党内的时候他是党员。后来他脱离了孟什维克中央，成了右派孟什维克。右派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武装干涉主义者的集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即使要靠外国武力的帮助。他们的机关刊物是“曙光”杂志。这个机关刊物的编辑就是斯伊万诺维奇。这个右派孟什维克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反对派的呢？他是怎样褒奖反对派的呢？请听吧：

“我们要感谢反对派，因为它把俄国共产党这个可怕的道德上的罪恶渊薮的情景如此逼真地描绘出来了。我们要感谢它，因为它给了俄国共产党以精神上和组织上的严重打击。我们要感谢它，因为它的工作帮助了所有那些认为推翻苏维埃政权是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的人。”

反对派同志们，这就是给你们的褒奖。

我在结束演说的时候，还是要对反对派的同志们表示一个希望，希望斯伊万诺维奇的这个吻不致在他们脸上贴得太紧。（鼓掌多时）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5—33页

悼 列 宁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全苏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的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工人阶级的儿女，在贫困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儿女，在千辛万苦和英勇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儿女，——首先就是这些人应当成为这个党的党员。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者的党，共产主义者的党，同时也叫做工人阶级的党。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二十五年来列宁同志培养了我们党，把我们党培养成为世界上最坚固最有锻炼的工人党。沙皇政府及其走狗的打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疯狂暴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武装袭击，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涉，一切资产阶级报刊异口同声的造谣和诬蔑，——二十五年来所有这一切恶毒的攻击都落在我们党的头上。可是，我们党像一座石山一样屹立着，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攻击，引导工人阶级向胜利前进。我们党在残酷的战斗中锻炼了自己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它依靠统一和团结战胜了工人阶级的敌人。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工人阶级的命运痛苦不堪。劳动者备受折磨和苦难。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自古以来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而且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是这样的。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奴隶制的枷锁依然如故，或者旧枷锁只是被一些同样沉重同样侮辱人的新枷锁所代替。只有在我们国家里，被压迫被践踏的劳动群众才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建立了工人和农民的统治。同志们，你们知道，而且现在全世界都承认，这个伟大的斗争是由列宁同志和他的党领导的。列宁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事实上向全世界被压迫群众表明了：得救的希望并没有丧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劳动王国是**可以**靠劳动者自身的努力来建立的；劳动王国是应该建立在地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天上的。这样，他就激发了全世界工农争取解放的热望。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的名字成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最爱慕的名字。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个和根本的基石。工人和农民不结成这样的联盟就不能战胜资本家和地主。工人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不能打倒资本家。农民没有工人的领导就不能打倒地主。我国国内战争的全部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巩固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它只是采取了一种新的

形式。从前工农联盟具有军事联盟的形式，因为它是以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为目标的。现在工农联盟应当采取城市和乡村间、工人和农民间经济合作的形式，因为它是以反对商人和富农为目标的，因为它是以工人和农民互相供给一切必需品为目标的。你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像列宁同志那样坚决地执行过这个任务。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国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基石。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巴什基里亚人和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阿捷尔拜疆人，阿尔明尼亚人和达格斯坦人，鞑靼人和柯尔克兹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尔克明人，——他们都同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休戚相关。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民族摆脱枷锁和压迫，而且这些民族也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无限忠诚，以他们为苏维埃共和国牺牲的决心来使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免遭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暗算和袭击。正因为如此，列宁同志始终不倦地对我们说明我国各族人民自愿联盟的必要性，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和国联盟内实行兄弟合作的必要性。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们的红军，我们的红海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基石。列宁曾屡次对我们说过，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争得的喘息时机可能是很短的。列宁曾屡次向我们指出，巩固红军和改善红军状况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和克逊最后通牒以及和德国危机有关的事变再一次证实了列宁向来是正确的。同志们，我们来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地来巩固我们的红军，巩固我们的红海军！

处在资产阶级国家汪洋大海包围中的我国，像一座巨大的石山一样屹立着。波浪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它冲击，声势汹汹地要把它淹没，把它冲毁。但是这座石山仍然屹立不动。我国为什么这样有力量呢？

这不仅因为我国建立在工农联盟上，它体现着各自由民族的联盟，它受到红军和红海军的强有力的保护。我国所以有力量，所以坚强巩固，还因为它得到全世界工人和农民深刻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持。全世界工人和农民都想保全苏维埃共和国，认为这是列宁同志用他百发百中的妙手射入敌人阵营的一枝箭，是他们希望摆脱压迫和剥削的靠山，是给他们指出解放道路的可以信赖的灯塔。他们想保全苏维埃共和国，不让地主和资本家破坏它。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软弱也在这里。

列宁从来没有把苏维埃共和国看做最终目的。他始终把它看做加强西方和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环节，看做促进全世界劳动者战胜资本的必要环节。列宁知道，不仅从国际的观点来看，而且从保全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观点来看，只有这样的见解才是正确的。列宁知道，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鼓舞全世界劳动者去进行争取解放的坚决战斗。正因为如此，列宁这位无产阶级英明的领袖中最英明的领袖，还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的第二天，就奠定了工人国际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列宁始终不倦地扩大并巩固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这几天你们已经看见有几万几十万劳动者来拜谒列宁同志的灵柩。过一些时候你们会看见有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来拜谒列宁同志的陵墓。用不着怀疑，在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后面，一定会有全世界各地几千万、几万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接踵而至，以证实列宁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不仅是欧洲工人的领袖，不仅是殖民地东方的领袖，而且是全球整个劳动世界的领袖。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载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二十三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5卷第34—37页

论 列 宁

（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同志们！我接到通知，说你们这里要举行回忆列宁的晚会，并邀请我也来做一个报告。我认为没有必要做一个关于列宁的生平事业的连贯性的报告。我想，倒不如只把一些表明列宁的为人和他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某些特点的事实告诉大家。这些事实相互间也许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到一个关于列宁的总的概念。不管怎样，我这一次向你们讲的不可能比我刚才所答应的更多。

山　鹰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一九〇三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当我知道列宁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从一九〇一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创造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的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

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这个印象竟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必须写封信给一位侨居国外的好友，把这个印象告诉他，要他评论一下。过了不久，当我已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这是一九〇三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热情的答复，以及列宁的一封简单而内容丰富的信，原来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给列宁看过了。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秘密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

从那时起，我就和列宁认识了。

谦　逊

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塔墨尔福斯（在芬兰）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是伟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伟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像中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简直是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伟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使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他出现的；而且在“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警告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

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逻辑力量

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两个精彩的演说：论目前形势和论土地问题。可惜这两篇演说词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两个使人兴奋的、使代表会议全场欢欣鼓舞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

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

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不 灰 心

我第二次会见列宁是在一九〇六年我们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大家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少数，遭到失败。

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丝毫不像那些失败后就灰心丧气的领袖。恰恰相反，失败使列宁更加精神百倍，鼓舞自己的拥护者去作新的战斗，争取未来的胜利。我现在说的是列宁的失败。但这究竟是怎样的失败呢？必须看一看列宁的反对者，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胜利者——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等人：他们很少像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列宁用他对于孟什维主义的无情的批判把他们打得体无完肤了。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代表都聚集在一起，望着列宁，问他的意见。在某些代表的言论中流露出疲倦和气馁的情绪。我记得列宁对于这种言论用讽刺的蔑视的口气回答说："同志们，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胜利，——这就是列宁当时告诉我们的。当时令人感到布尔什维克的失败是暂时的，布尔什维克在最近的将来一定会胜利。

"不因失败而灰心"，——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把一支忠实到底和相信自己力量的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

不 骄 傲

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在一九〇七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成了胜利者。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胜利者的地位。通常胜利总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自大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往往就夸耀胜利，高枕而卧。但是列宁丝毫不像这种领袖。恰恰相反，正是在胜利以后，列宁特别警惕和戒备起来。我记得当时列宁十分坚决地教导代表们说："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他狠狠地嘲笑那些轻率地断言"孟什维克从此完蛋了"的代表。他毫不困难地证明：

孟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还有基础，我们还必须善于和他们作斗争，竭力避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尤其要避免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

“不因胜利而骄傲”，——这就是列宁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保证党不遭可能发生的意外。

原 则 性

党的领袖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多数，这是领袖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列宁对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党内其他任何领导者。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下面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事实。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的时期，党被反革命努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这是人们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识分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纷纷退党的时期；这是人们否定地下活动的时期，这是取消主义的时期，瓦解的时期。当时不仅在孟什维克中，而且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许多派别组织和派别思想，而且大部分都是脱离工人运动的。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要完全取消秘密组织而把工人组织成为合法的自由主义的斯托雷平党的思想。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党性而进行的争论中，后来列宁成了胜利者。

第二个事实。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帝国主义战争炽烈的时期，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染上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狂热，替本国的帝国主义尽忠效劳。这是第二国际在资本面前放下自己的旗帜，连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盖得等等一类人物都抵挡不住沙文主义浪潮的时期。

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或几乎只有列宁一人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坚决斗争，揭露盖得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的变节行为，痛斥骑墙派“革命家”的不彻底性。列宁明知跟随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数，但是他认为这没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知道，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的政策，因为他知道，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新国际而进行的争论中，列宁成了胜利者。

“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列宁用这个公式攻占了许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阵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相信群众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列宁和这种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像列宁这样

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善于像列宁这样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革命天才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我完全不是想以此说明，列宁对任何革命动荡都同样嘉许，或者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主张革命爆发。完全不是。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列宁的英明远见在任何时候都不像在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充分和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像鱼在水里一样。”

因此，列宁的策略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宁的革命计划是“出奇的”**大胆**。

我记得有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列宁的这个特点。

第一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为后方和前线的危机所激

动的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士兵要求和平和自由；将军和资产阶级准备军事专政，以求“作战到底”；整个所谓“舆论界”，一切所谓“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反对布尔什维克，诬蔑他们是“德国间谍”；克伦斯基企图把布尔什维克党驱入（而且已经把一部分驱入）地下；还很强大的有纪律的德奥联军同我国疲惫的处于瓦解状态的军队对峙着，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安然和本国政府结成联盟，以求“作战到完全胜利”……

在这样的关头举行起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就是孤注一掷。但是列宁不怕冒险，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起义必不可免，起义一定会胜利，俄国的起义一定会准备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俄国的起义一定会鼓舞西方受尽苦难的群众，俄国的起义一定会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起义的结果一定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垒。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空前准确地实现了。

第二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人民委员会打算使叛乱的将军杜鹤宁总司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同德军进行停战谈判。我记得当时列宁、克雷连柯（后来的总司令）和我前往彼得堡总参谋部去用电报同杜鹤宁直接谈判。时机十分危急。杜鹤宁和大本营坚决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当时军队的指挥人员完全掌握在大本营手里。至于士兵，谁也不知道这一千四百万隶属于蓄意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各集团军组织的军队会表示什么态度。大家知道，当时在彼得堡正酝酿着士官生的暴动。此外，克伦斯基正向彼得堡进军。我记得列宁在电报机旁沉默了一会，忽然容光焕发。他显然是打定主意了。他说：“我们到无线电台去吧，无线电台会帮助我们：我们下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将军撤职，委任克雷连柯同志做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包围将军，停止军事行动，同德奥士兵联欢，把和平事业拿到

自己手里。”

这真是“冒险的一跃”。但是列宁不怕这“一跃”，反而乐于进行这“一跃”，因为他知道军队希望和平，军队将扫除和平道路上所有一切障碍而争得和平，因为他知道用这种方法来奠定和平对德奥士兵不会没有影响，用这种方法一定会毫无例外地使所有战线上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起来。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也完全准确地实现了。

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

载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二日
“真理报”第三十四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5 卷第 39—47 页

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矛盾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
关于青年工作问题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四月三日）

首先，我必须稍微谈一谈共青团中央对党内争论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在各地方组织已经表明了态度以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仍然顽固地保持沉默，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拿保守中立来解释共青团中央的沉默，那是不正确的。这简直是过于谨慎了。

现在稍微谈谈你们讨论的问题。我认为你们中间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我研究了你们的提纲和文章，始终没有发现原则上的分歧。但是有一些糊涂思想和一大堆臆造出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就是把作为党的“后备军”的共青团和作为党的“工具”的共青团对立起来了。共青团是什么，是后备军还是工具？它既是后备军又是工具。这是很清楚的，并且在同志们自己的演说中也讲到了这一点。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后备军，是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的后备军，党就是用它来补充自己的队伍的。但它同时又是工具，是党用来影响青年群众的工具。可以更具体地说，团是党的工具，是党的辅助工具，这就是说，共青团的积极分子是党用来影响团外青年的工具。这两个概念彼此并不矛盾，决不能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

第二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某些同志认为“团的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成分，而是决定于领导人的坚定性”。他们把坚定性和成分对立起来了。这个矛盾也是臆造出来的，因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阶级政策既决定于前者，也决定于后者，既决定于成分，也决定于领导人的坚定性。如果坚定的人受到团内异己成分的影响（因为团员是

享有同等权利的），那末这种成分的存在对团的工作和政策就不会不发生影响。为什么党要调整自己的成分呢？因为党知道成分会影响它的工作。

最后，还有一个也是臆造出来的关于团的作用和团的农民工作问题的矛盾。有些人这样提出问题，说团的任务似乎是“巩固”它在农民中的影响,却不是扩大这种影响，而另一些人似乎想“扩大影响”，但是不同意巩固这种影响。他们想根据这种提法做出争论的纲领。很明显，这两个任务的对立是人为的，因为大家都很了解，团必须同时巩固和扩大它在农村中的影响。固然，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提纲中有一个地方关于农民工作有一句不妥当的话。但是无论塔尔哈诺夫，无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多数的其他代表都没有坚持这句不妥当的话，并且同意修改。既然如此，何必为小事争论呢？

但是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生活和活动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一个实际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矛盾，关于这个矛盾我想说几句话。我指的是团内存在着两种倾向：工人倾向和农民倾向。我指的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可以感觉到的，是不容忽视的。关于这个矛盾的问题在各个发言人的讲话中是一个最薄弱的地方。大家都说，必须广泛吸收工人入团，但是谈到农民，谈到吸收农民的问题时，大家就吞吞吐吐起来了。连那些不故作聪明和不耍手腕的发言人也对这个问题吞吞吐吐起来了。

很明显，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很明显，既然共青团是工人和农民的团，那末团内的这两种倾向，团内的这种矛盾今后仍然会存在。有些人会说，应该吸收工人，对农民却只字不提；另一些人会说，应该吸收农民，对团内的领导成分即无产阶级成分的作用却估计不足。团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内部矛盾也就使得发言人吞吞吐吐起来了。人们在讲话中拿共青团和党相比拟。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比拟实际上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的党是工

人的党，不是工人和农民的党，而共青团却是工人和农民的团。正因为如此，共青团不可能只是工人的团，它应当既是工人又是农民的团。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在目前这种团的结构下，团的内部矛盾和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说应该吸收中农青年入党，这是对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不能站在工农党的立场上。可是甚至某些负责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转到这种立场上去的。许多人大声喊道：“你们吸收工人入党，为什么不在同样的程度上吸收农民入党呢？让我们吸收十万或二十万农民入党吧。”中央反对这种意见，因为我们的党必须是工人的党。工人占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非工人占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这就是党内成分应有的大概比例数。共青团的情况和党却有些不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工农青年中的革命分子的自愿和自由参加的组织。没有农民，没有农民青年群众参加，共青团就不成其为工人和农民的团了。但是同时应当这样提出问题：领导作用要属于无产阶级成分。

第一次载于约·斯大林
“论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书
一九二六年莫斯科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6卷第48—50页

论 列 宁 主 义 基 础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一九二四年四月）

献给

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

约·斯大林

列宁主义的基础是个很大的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题目就得写一整本书，甚至要写好几本书。因此，我的讲演自然就不能详尽地说明列宁主义，至多也只能简要地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虽然如此，我认为做这样一个叙述来指出几个为顺利研究列宁主义所必需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有益处的。

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并不是叙述列宁的世界观的基础。列宁的世界观和列宁主义的基础按范围来说并不是一回事。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叙述列宁主义应当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开始。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我在我的讲演中只想从这个意义上来叙述列宁主义的基础。

那末，列宁主义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远没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宁确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实际情况中，而且应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宁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特殊环境中的应用，那末

列宁主义就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纯粹是俄国的而且仅仅是俄国的现象了。可是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带有片面性。

另一些人说，列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而和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据说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温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开这种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革命部分和温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见解不说，那就必须承认，即使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帝国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期，准备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的时期。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帝国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通常都指出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主义所以具有这个特性，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它不能不具有

无产阶级革命的特色；第二、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而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斗争，向来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不要忘记，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和这个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不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准备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长和形成的。

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

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财政寡头拥有莫大的势力。和这种莫大的势力作斗争，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或者向资本屈服，依旧过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帝国主义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

第二个矛盾是各财政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财政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财政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

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而这个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加速到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

第三个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无耻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可是，帝国主义在剥削这些国家时不得不在那里敷设铁路，设立工厂，建立工商业中心。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就是这个“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有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都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情况对于无产阶级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根本破坏资本主义的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使旧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大体上就是这样。

十年前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把所有这些矛盾集合在一起投入天平盘里，因而加速和便利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

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

这就是产生列宁主义的国际环境。

有人会向我们说：这一切都不错，但是这和当时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俄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和首先是在俄国而且为俄国工作的列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正好是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诞生地呢？

因为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因为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

俄国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万能和沙皇制度的暴虐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其次，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这不仅是说它任凭外国资本自由进口活动，让外国资本操纵俄国国民经济中像燃料和冶金业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部门，而且是说它能拿出千百万士兵去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请回想一下一千四百万俄国军队为了保证英法资本家极高的利润而在帝国主义战线上流血牺牲的事实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仅是帝国主义在东欧的看门狗，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从巴黎和伦敦、柏林和布鲁塞尔得到借款，而从人民身上榨取几亿卢布来缴付利息。

最后，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等等勾当中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谁不知道，帝国主义大战是沙皇政府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的呢？谁不知道，俄国是这次战争的重要角色呢？

正因为如此，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终于融合为统一的帝国主义的利益。

西方帝国主义会不会不竭尽全力拚命反对俄国革命以维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甘心丧失像旧时沙皇资产阶级俄国这样一个东方强大的支柱，这样一个富有人力物力的来源呢？当然不会！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谁想打击沙皇制度，谁也就必然要动手打击帝国主义；谁起义反对沙皇制度，谁也就必须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谁要是真想不仅打破沙皇制度，而且彻底铲除沙皇制度，那末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这样，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起来，并且一定要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而且当时在俄国又掀起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俄国的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这样的革命决不会半途而废，它一胜利就一定要举起反帝国主义的起义旗帜，继续前进，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正因为如此，俄国当时一定要成为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不仅因为这些矛盾正是在俄国带有特别丑恶和特别不堪的性质而最容易暴露出来，也不仅因为俄国当时是把西方财政资本和东方殖民地联结起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柱，而且因为当时仅仅在俄国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俄国革命不能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它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质，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俄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狭隘民族范围内呢？当然不能！恰恰相反，当时整个环境，无论是国内环境（深刻的革命危机）或国外环境（战争），都推动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超出这个范围，把斗争搬到国际舞台上去，割开帝国主义的脓疮，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破产，粉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并推翻本国资本主义，替无产阶级锻炼出新的斗争武器，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以促进世界各国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俄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这样行动，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国际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使俄国能够避免资产阶级制度的复辟。

正因为如此，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策源地，俄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俄国和列宁的“遭遇”差不多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遭遇”一样。德国当时孕育着资产阶级革命，正像俄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一样。当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共产党人现在的视线主要是萦注于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德国将在一般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七世纪英国和十八世纪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革命。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换句话说，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移到德国了。

几乎用不着怀疑，马克思在上述这段话中所指出的情况，大概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的原因。

关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也必须这样说，而且更必须这样说。这个时期的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它应当在欧洲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英法更不用说）更发展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革命；并且一切事实都表明这个革命一定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酵母和序幕。

不能认为下面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就是早在一九〇二年，当俄国革命刚刚萌芽的时候，列宁就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写了以下的预言：

“历史向我们（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注）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国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

“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

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五页）

换句话说，革命运动的中心一定要移到俄国来。

大家知道，俄国革命的进程足以证实列宁的这个预言而绰绰有余。

既然如此，那末进行过这样的革命和具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诞生地，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同时也成了这个理论和策略的创造者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二 方 法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占统治的整个时代。为了说得确切起见，我应当补充一下：这里所指的不是机会主义在形式上的统治，而只是机会主义在事实上的统治。在形式上，当时领导第二国际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统派”，即考茨基等人。可是在事实上，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是按照机会主义的路线进行的。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那种惯于迁就的小资产阶级天性而迁就了资产阶级，而“正统派”又为了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为了维持“党内和平”而迁就了机会主义者。结果就造成了机会主义占统治的局面，因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正统派”的政策已经完全结合起来了。

这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即所谓战前的时期。当时帝国主义的那些毁灭性的矛盾还没有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当时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工会还比较“正常地”发展着；当时用选举斗争和议会党团还能收到“冲昏头脑的”成效；当时人们把合法斗争形式捧到天上，并想用合法手段来“打死”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当时第二国际各党养得肥肥胖胖，不愿意认真地想到革命，想到无产阶级专政，想

到群众的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论，而是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了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论片断。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记起马克思的理论，但目的是要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见解和小气的政客手腕，议会的外交手腕和议会的拉拢行为。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通过一些“革命的”决议和口号，但目的是要把这些决议和口号搁置起来。

不是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接受教育和学习正确的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的问题，掩饰和抹杀这些问题。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不反对谈谈迫切而困难的问题，但目的是要用一种“橡皮性的”决议来敷衍了事。

第二国际的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库，就是这样。

然而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搏斗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在财政资本的莫大势力面前，旧的斗争方法显然已经不够而无能为力了。

当时必须重新审查第二国际的全部工作及其整个工作方法，必须驱除庸俗见解、狭隘观点、政客手腕、叛徒行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预备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预备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战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

对第二国际的肮脏的马厩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

列宁主义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锻炼出来的。

这个方法的要求是什么呢？

第一、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生动的实践的烈火中**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就是说，要恢复那个被破坏了的理论和

实践的一致，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党。

第二、要根据第二国际各党的实际行为，根据它们的行动，而不根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它们的口号和决议是不可相信的），来**检查**第二国际各党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而且值得受到这种信任。

第三、要按新的革命的风格，根据教育群众和准备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去**改造**全部党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备群众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要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批评**，要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身的错误来学习和接受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党的真正干部和真正领袖。

列宁主义的方法的基础和实质就是这样。

这个方法是如何实际应用的呢？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有一些理论教条，他们总是反复地搬弄这些教条。现在就拿其中的几个教条来看吧。

第一个教条：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机会主义者硬说：无产阶级本身如果在全国人口中不占多数，就不能而且不应当夺取政权。一点证据也没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可能为这个荒谬的论点辩护。列宁回答第二国际的先生们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既然形成了这样的历史环境（战争、农业危机等等），使虽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那末，为什么它不应当夺取政权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应当利用顺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来突破资本战线，加速总爆发呢？难道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说过，如果当时在德国可以用“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那末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会“很好”了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当时德国无产者，比如说，和一

九一七年俄国无产者比较起来是相对地少些吗？难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没有表明，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喜爱的这个教条对于无产阶级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打击和打破了这个陈腐的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二个教条：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就不能保持政权，因此首先必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就这种干部，然后才夺取政权。列宁回答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来提高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来造就很多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干部呢？难道俄国的实践没有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增长要比在资本政权下迅速百倍和牢靠百倍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也无情地打破了机会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三个教条：**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不能采用的，因为这种方法既然在理论上没有根据（见恩格斯的批评），在实践上有危险（会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常态，会耗尽工会的基金），它就不能代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即议会斗争形式。列宁主义者回答说：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为**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么人和在什么地方证明了议会斗争形式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革命运动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吗？难道不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吗？第三、关于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来代替议会斗争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主张政治总罢工的人

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打算用议会外斗争形式来代替议会斗争形式呢？第四、难道俄国革命没有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吗？——这和那些因为怕破坏经济生活的常态、怕耗尽工会的基金而发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斗争的实践也粉碎了机会主义者的这个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此等等。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革命理论不是教条”，它“只有和真正群众的、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幼稚病”），因为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因为“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人民之友”），因为理论应当由实践材料来检验。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决议，只要回忆一下“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一口号的历史，就足以了解这些以堂皇的革命口号和决议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勾当的党的政治实践是如何虚伪和腐败。大家都还记得第二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举行的堂皇的示威，当时第二国际恐吓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发动战争，那就要遇到可怕的起义；他们提出了“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吓人口号。可是过了不久，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却把巴塞尔决议束之高阁，而向工人提出了新的口号，即为了资本主义祖国的光荣而自相残杀的口号，这一点有谁不记得呢？革命的口号和决议如果不加以实现，是一个钱都不值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要把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和第二国际在战争时期的叛卖政策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机会主义的政客是如何卑鄙，而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如何伟大。

这里我不能不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在这本书中无情地痛斥了第二国际首领卡·考茨基企图不按实际行动去判断党，而按纸上口号和文件去判断党的机会主义态

度：“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情…… 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史打破了这个幻想。为了欺骗人民，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提出种种‘口号’。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做个比较，不要听唯心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找到**阶级的现实**。”（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〇页）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害怕自我批评的态度，它们那种竭力掩饰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而困难的问题、用一些只能把生动的思想消磨尽净而使党难于根据本身的错误去接受革命教育的粉饰太平的虚伪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缺点的态度，那就更不用说了。它们的这种态度已经受到列宁的讥笑和痛斥。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批评问题时写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持的态度，是检验这个党是否严肃、是否**真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的义务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严肃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对**阶级**以至对**群众**的教育和训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九页）

有些人说：揭露本身的错误和进行自我批评，这对于党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会被敌人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列宁认为这种反驳是不严肃的，是完全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列宁还在一九〇四年，当我们党还幼弱的时候，就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说过：

“他们（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斯大林注）看见我们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着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书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些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

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被工人运动的发展克服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九〇页）

列宁主义方法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列宁的方法的原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基本上已经有了。这个学说，照马克思的话说来，“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的方法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的。可是，如果以为列宁的方法仅仅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恢复，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的方法不仅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恢复，不仅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恢复，而且是这个方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

三 理 论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问题：

（甲）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

（乙）对自发“论”的批判；

（丙）无产阶级革命论。

（一）**理论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一页）

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列宁还在一九〇二年预察到我们党的这种特殊作用时，就认为必须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同上，第三四二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现在当列宁的关于我们党的作用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列宁的这个原理具有特别巨大的力量和特别重大的意义。

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异常重视理论的最明显的表现。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应当随同每一个新的伟大发现而采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主义”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喜欢嘲笑列宁“不关心”哲学的普列汉诺夫竟不敢认真着手执行这个任务。

（二）**对自发“论”的批判，或关于先锋队在运动中的作用**。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觉悟成分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觉悟成分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登台，而在实际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谓“经济派”否认俄国有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鼓吹运动中的工联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

旧“火星报”的斗争和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对“尾巴主义”理论的精彩批判不仅粉碎了所谓“经济主义”，而且还建立了俄国工人阶级真正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斗争，就休想在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就休想使这个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可是，崇拜自发性的理论不仅是俄国的现象。它在第二国际所有的党内都是流行得最广泛的，虽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国

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个理论为一切事物辩护，使所有的人都调和起来，当某些事实已经被大家听厌以后，才指出这些事实并加以解释，而指出以后，就万事大吉。马克思说：唯物主义的理论不能只限于解释世界，它还应当改变世界。可是，考茨基及其同伙却不管这一点，他们宁愿停留在马克思的公式的前半段上。

请看应用这个“理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有人说，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第二国际各党曾经发表恐吓言论，说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它们就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有人说，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这些党却把“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个口号束之高阁，而实行了一个相反的口号——“为帝国主义祖国而战”。有人说，这样变更口号的结果，几百万工人牺牲了生命。可是，如果以为这里应该归咎于什么人，这里有什么人叛变了或出卖了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这样发生的。第一、因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第二、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应该归咎于”“生产力”。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正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而谁要是不相信这个“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的作用呢？党在运动中的意义呢？可是，党对于像“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假冒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来。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个以掩盖机会主义的真面目为使命的冒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就受到列宁攻击的那个“尾巴主义”理论在欧洲的变形罢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打破这种理论上的假冒，是在西方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先决条件。

（三）**无产阶级革命论**。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是从三个基

本原理出发的。

第一个原理：财政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内占统治地位；发行有价证券是财政资本的一种主要业务；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一；财政寡头的莫大势力是财政资本统治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揭露出垄断资本主义的粗暴的寄生性，使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压迫百倍沉重起来，使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愤怒更加增长，把群众引上无产阶级革命这条唯一的生路。（见列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

第二个原理：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财政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所有这些，一方面使各个民族的经济和领土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殖民地国家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外部的殖民地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因素日益增长。

第三个原理：独占“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那些已经抢得领土的国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额”的国家为重分世界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均势”的唯一手段，——所有这些都使第三条战线即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线紧张起来，因而使帝国主义削弱，并使头两条反帝国主义战线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战线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战线易于联合起来。（同上）

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在帝国主义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列宁把上面一切结论综合为一个总的结论说：“**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五页）

因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性质、范围和深度问题的看法，以及这个革命的一般方案，也就随着改变了。

从前，通常都是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根据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的经济状况，根据世界经济状况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经济已经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因为旧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财政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

从前，通常都是说，在个别国家内，或者确切些说，在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是否已经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整体的整个体系中已经具有革命的客观条件，而且，如果整个体系，或者确切些说，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发生革命的程度，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并不能成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从前，通常都是说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是个别的独立自在的现象，而以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为敌方。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经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必须拿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从前，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

革命将在哪里开始呢？资本战线首先会在哪里，会在哪个国家内被突破呢？

从前，通常都这样回答：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反驳说：不，**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在一九一七年，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薄弱些。这个链条就在这里被突破，而使无产阶级革命得以爆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俄国展开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千百万被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当时在俄国和革命对立的是沙皇制度这样一个极丑恶的帝国主义代表，它没有丝毫威信，为全体人民所痛恨。虽然当时俄国资本主义不如法国或德国、英国或美国发达，但是帝国主义的链条在俄国却比较薄弱。

在最近的将来，这个链条将在什么地方被突破呢？还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链条可能在印度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有年轻的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一个无疑是伟大的和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在印度和革命对立的

是外国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敌人，它没有丝毫威信，为印度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所痛恨。

这个链条也很可能在德国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在印度发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国也开始发生作用；同时，印度和德国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别，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德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七页）

简单地说：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几、农民占百分之几等等的地方被突破。

正因为如此，个别国家内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数的统计数字，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已经失去了第二国际的那些不了解帝国主义的、像害怕瘟疫那样害怕革命的书呆子们所喜欢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其次，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曾经断定说（现在仍然断定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或者至少是一座万里长城，使这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个相当长的间断时期，在这个间断时期中，已经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则积聚力量，准备反对资本主义的“决斗”。这个间断时期通常是以好几十年来计算的，甚至更长些。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

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孕育着冲突和战争的帝国主义环境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环境中，当“繁荣的”资本主义已经变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而革命运动正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同包括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内的所有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因而使一切革命势力，从西方的无产阶级运动到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当不和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时候，——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在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历史显然证明了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无怪乎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就在他的“两个策略”一书中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看做俄国革命规模的一幅完整的图画：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其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我且不说列宁的其他较晚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这一点比在“两个策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些同志却以为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才产生这种思想，以为列宁在一九一六年以前还认为俄国革命将停滞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于是政权也将从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机关手里转到资产阶级手里，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据说这种论断竟流传到我们共产党的报刊上来了。我必须指出，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

确的，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我可以引证列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〇五年）上的著名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不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即民主革命的胜利称为“‘秩序’组织”，而是称为“战争组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三五三页）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论临时政府”（一九〇五年）的几篇著名论文，他在这几篇论文里描述俄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向党提出的任务是“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不仅得到执政当局的微小让步，而且要完全推翻这个执政当局”；他在这几篇论文里进一步阐明这个前途并把这个前途和欧洲的革命联系起来时继续写道：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那时革命的火焰将延烧到欧洲；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二五九页）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发表的著名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为吸引‘**非**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即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奋斗，将来也要不屈不挠地为此目的而奋斗。无产阶级将**立刻**[①]利用资产阶级俄国由沙皇制度及地主的土地占有权之下所获得的这种解放，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帮助富裕农民来反对农业工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页至第三八三页）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最后，我还可以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著名言论，他在这里援引了我们刚才从“两个策略”中引证过的那段关于俄国革命规模的话[①]，而得出如下的结论：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的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道，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农一道，同半无产阶级一道，同一切被剥削者一道，**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于是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以外**，企图用其他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企图在它们中间建筑一道万里长城，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六页至第二七七页）

看来已经够了。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像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

———————————————

① 见新编《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2页。——本书编者注

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用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间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间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能看做是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〇年）中提出的。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间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间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请看马克思在他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列举了他号召共产主义者应当争取的许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后，关于不间断（不断）革命的问题是怎样说的：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希望至多只实行上述要求就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换句话说：

（甲）马克思根本没有主张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开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革命事业，这和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的计划是**相反**的；

（乙）马克思只是主张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完成**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派别从政权的高峰上逐个推下去，以便在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后再把革命火焰燃遍世界各国，这和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以及他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所实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由此可见，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不仅过低估计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意义，而且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

正因为如此，列宁嘲笑了我国“不断论者”的理论，称之为“奇特的”“漂亮的”理论，责备他们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什么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这个漂亮的理论”。（列宁的这篇论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即在俄国“不断论者”的理论出现后过了十年写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这个理论是半孟什维主义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从布尔什维克这里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并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从孟什维克那里摄取了‘否认’农民作用的思想”（见列宁“论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一文，“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关于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来“立刻”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是这样。

其次，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跃进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国革命

的历史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里必须记住：只有具备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条件，才能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没有这些条件，就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请看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关于这些条件是怎样说的：

“一切革命，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三次俄国革命所证实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为着革命，仅仅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并要求改变是不够的；为着革命，还需要剥削者已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而‘上层’也**不能照旧**时，只有在这种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换句话说，这个真理就是：**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危机（既触及被剥削者，又触及剥削者的危机），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①]。这就是说，为着革命，第一、必须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完全了解革命的必要性，并抱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使甚至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运动……使政府软弱无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五页至第六十六页）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宁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意思，他说，获得胜利的革命的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九页）。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四　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基本问题：

（甲）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乙）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丙）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也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特设机关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末它就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能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政权问题是任何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这是不是说，事情只限于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取得政权

——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许多原因，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些什么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完成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摆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三个主要任务：

（甲）打破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

（乙）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并按照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

（丙）把革命武装起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和国外敌人作斗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执行这些任务，完成这些任务。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动摇，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难而张皇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心慌意乱，焦躁不安，东奔西跑，痛哭流涕，从这个营垒跑进那个营垒。”（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三页）

而资产阶级是有根据来企图复辟的，因为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

列宁说：“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现象，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就**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同上，第二三二页）

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哪里呢？

第一、“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

第二、在于“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事实上保有很大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有熟悉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机会）的知识，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等技术人员（过资产阶级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员）有密切关系，有大得不可计量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二页）。

第三、“在于**习惯的力量**，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小生产在世界上可惜还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并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为“消灭阶级不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一点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还是**消灭小商品生产者**，但这种人是不能驱逐、不能镇压的，必须和他们和睦共处，只有用很长时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而且应当）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至第八页和第二十六页至第二十七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奋勇的和最无情的战争，而资产阶级因为它被推翻而**十倍加强**它的反抗。”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

行政的斗争。”（同上，第七页和第二十七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些任务，要在几年内实现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层。

马克思向工人说过：“你们必须熬过十五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的国内战争和国际斗争，以便不仅改变现存的关系，而且改变自己，使自己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八卷第五〇六页）

列宁继续并发展马克思这个思想时写道：

“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大家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同样，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在长期的斗争中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因为无产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的，这些偏见不是用神术，不是依圣母的意旨，不是依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所能摆脱的，而是只有在和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群众斗争中才能摆脱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九十五页至第九十六页和第九十四页）。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内阁”的更换等等。各孟

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害怕专政像害怕火一样，竟用所谓“夺取政权”的概念来顶替专政的概念。他们通常都把“夺取政权”归结为更换“内阁”，归结为由谢德曼和诺斯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这一类人来组织新内阁，上台执政。几乎用不着解释，诸如此类的内阁更换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权毫无共同之点的。麦克唐纳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在保留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条件下掌握政权，他们的所谓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御用的服务机关，只能是帝国主义脓疮的掩蔽物，只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当资本没有屏风就不便于、不利于、难于剥削和压迫群众的时候，它需要这些政府来做屏风。当然，这种政府的出现是“在他们那里”（就是说，在资本家那里），“在施普卡”[①]并非平静无事的征兆；虽然如此，这种政府仍然不免是稍加粉饰的资本政府。麦克唐纳政府或谢德曼政府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隔天壤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藉的革命政权。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

———————————————

① 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俄军曾冒严寒扼守巴尔干的施普卡山隘，大批士兵冻死冻伤，俄军司令部战报却多次说：“在施普卡平安无事。”——译者注

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和革命”）。

由此应当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对**[①]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对**[②]资产阶级是专政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四页）。考茨基及其同伙关于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废话是资产阶级对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的掩饰。“纯粹的”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群众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之流和司丁尼斯之流、洛克菲勒之流和摩尔根之流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

————————————————

①、②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第二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僚机关、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的这句以大陆为限的话竟被各国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作为藉口来叫喊：可见马克思曾经假定资产阶级民主有和平发展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可能，至少欧洲大陆以外的几个国家（英国和美国）是有这种可能的。马克思的确曾经假定有这种可能，并且有根据来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美两国做这种假定，因为当时还没有垄断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帝国主义，当时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特殊的发展条件，还没有发达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可是经过三四十年以后，当这些国家中的情形已经根本改变，当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并普及于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当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也已经在英美出现，当英美和平发展的特殊条件已经消失的时候，关于这些国家不在此限的说法自然就应当失去时效了。

列宁说：“现在，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代，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失去时效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就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

度这个意义上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粉碎并毁坏‘现成的’（那里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页）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末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

因此，列宁说得对：

“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七页）

（三）**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依靠什么组织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呢？无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那末，无产阶级的什么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掘墓人的作用，不仅能够摧毁这个机器，不仅能够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

的民主，而且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呢？

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的组织形式就是苏维埃。

苏维埃优越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因为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在于苏维埃是能够团结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的**群众组织，因此在这个组织中，群众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政治领导就能够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革命斗争、群众政治发动和群众武装起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是能够摧毁财政资本及其政治附属物的莫大势力的机关。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能尽量发挥群众在毁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设无产阶级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创造能力。

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统一成为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就在于：正是从前受资本家和地主压迫的那些阶级的最群众化和最革命的组织现在成了“全部国家权力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三页）。

————————————

① 着重号（黑体）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和议会制的国家组织形式有原则上的差别，它是**新的**国家**类型**，不适合于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任务，而适合于使他们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列宁说得对：自从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时代就结束了，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开始了”。

苏维埃政权的特征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存在着阶级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国家组织中最群众化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因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结合和合作的场所，并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这个结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的政权，是这个多数的国家，是这个多数的专政的表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阶级社会一切国家组织中最有国际性的组织，因为它既然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依靠各族劳动群众的合作，它就使这些群众易于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联合起来。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按本身结构来说，使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这个在苏维埃中最团结和最觉悟的核心易于领导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群众。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四页）而苏维埃政权的结构使这个经验的指示易于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既然在统一的国家组织内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单位，用工厂来代替地域选举区，就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导他们管理国家。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长官的支配，把

军队由资产阶级制度下压迫人民的工具变为使人民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粉碎和彻底摧毁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法官的机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四页）。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群众组织无条件地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那个找了很久而终于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范围内必须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而且是**唯一**[①]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三四〇页）

五 农民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四个问题：

（甲）问题的提法；

（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

（丙）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

（丁）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

————————————

① 着重号（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问题的提法**。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可是，这个情况丝毫不会使农民问题失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且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不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做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

问题是这样：由于农民的某些生活条件而潜藏在农民内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就是要援助劳动农民群众的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援助**任何一种**农民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间接地便利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样或那样地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农民变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和同盟者的那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包括俄国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和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农民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历史。杜马时期决定了这个斗争的命运，因为前后四届杜马时期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教训，这个教训明明白白地向农民指出：他们从立宪民主党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拥护地主，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沙皇；农民所能指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只是证实了杜马时期的教训，使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使自由资产阶级是终陷于孤立，因为战争年份表明：希望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里得到和平完全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如果没有杜马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

共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个领导权就引导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奥）资产阶级革命是循着另一条道路进行的。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当时由于本身幼弱而没有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旧制度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了农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无产阶级提到了首位，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俄国革命为什么有这个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独特现象呢？这个独特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必须注意下面几个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

（甲）俄国工业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积聚程度。例如大家知道，

当时俄国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几乎用不着证明，单是这一个情况，在具备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就已经使俄国工人阶级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乙）企业中丑恶的剥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残酷的警察压制，——这个情况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罢工都变成巨大的政治行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彻底革命的力量。

（丙）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已经变成对于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开的反革命性，这不仅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俄国资产阶级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而且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直接依赖政府的定货。

（丁）农村中最丑恶最难堪的农奴制残余，加上地主的专权，——这个情况使农民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戊）沙皇制度压制一切有生机的东西，并以自己的专横来加重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这个情况使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条革命洪流。

（己）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切矛盾融合为深刻的革命危机，并使革命具有莫大的冲击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应当向哪里走呢？农民应当向谁寻求援助来反对地主专权、反对沙皇专横、反对使农民经济破产的毁灭性战争呢？向自由资产阶级吗？然而它是敌人，——这是前后四届杜马的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向社会革命党人吗？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比立宪民主党人“好些”，他们的政纲也是“合适的”、几乎是农民的政纲。可是：既然社会革命党人想单单依靠农民，既然他们在成为敌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软弱无力，那末，他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情呢？什么地方有一个新的力量，它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都能一往直前，勇

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帮助农民摆脱奴役，摆脱没有土地的情况，摆脱压迫，摆脱战争呢？一般说来，当时在俄国是否有这样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斗争到底的本领、自己的勇气、自己的革命性。

无论如何，除了这个力量以外，别的力量是没有的，而且是无从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在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接近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就觉悟到必须服从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勇敢的革命领袖的领导。

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就是这样。

（三）**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从二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到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为止。这个时期比较短，总共只有八个月；但是从群众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来看，可以大胆地说，这八个月等于平常宪制发展时期的好几十年，因为这八个月是**革命**的八个月。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农民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他们**离开**社会革命党人，他们重新**转向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定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向和平的彻底革命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农民、争取掌握多数农民的历史。决定这个斗争的命运的，是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暴动。

如果说从前，在前一时期，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权，那末现在，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当沙皇已经被推翻，而绵延不绝的战争已经使国家经济完全破坏，使农民完全破产的时候，消灭战争的问题就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了。重心显然已经从纯粹国内性质的问题移到基本问题，即战争问题上了。“结束战争”，“摆脱战

争”，——这就是疲惫不堪的全国人民首先是农民的共同呼声。

可是当时要摆脱战争，就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推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因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要把战争拖延到“胜利为止”。当时除了推翻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战争。

这是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它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派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极左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抛出政权以外，以便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以便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党，主张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争取民主和平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大多数农民支持了工人为争取和平、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当时在农民面前没有别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这样，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给了劳动农民群众一个最大的实际教训，因为它明明白白地指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下，国家是不能摆脱战争的：农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有甜蜜的演说和虚伪的诺言，而事实上他们所执行的还是那个帝国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上大道的政权。战争的继续拖延只是证实了这个教训的正确，督促革命前进，推动千百万农民和士兵群众**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周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孤立已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如果没有联合政府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促使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形成的。

（四）**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如果说从前，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主要问题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后来，在二月革命以后，首要问题是推翻资产阶级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那末现在，在国内战争结束

以后，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经济建设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加强和发展国有化工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通过国家所调节的商业把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便后来逐渐减少粮食税额，做到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振兴商业并发展合作社，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合作社，——这就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拟定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

有人说，这个任务也许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所不能胜任的。有些爱怀疑的人甚至说，这个任务简直是空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农民总是农民，——农民是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不能利用他们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

但是，爱怀疑的人错了，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其中主要的情况。

第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教训，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苏联农民既惯于重视他们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因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而获得了自由，就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恩格斯曾经说：“社会党夺取政权已经是最近将来的事情”，“为了夺取政权，党首先应当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有力量的党”（见恩格斯“农民问题”一九二二年版）。他的这一段话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他当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俄国共产党人在三次革命中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经在农村中给自己造成了我们的西方同志所不敢梦想的影响和支柱，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这个情况

不能不根本促进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实行经济合作的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爱怀疑的人硬说小农是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请听一听恩格斯关于西方小农所说的话吧：

“我们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生活得好些，使他们易于转到协作社，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做的话，如果他们还不能决定这样做，那我们就设法给他们尽量多的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小农可能转到我们方面来，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拯救而没有下降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极限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费金钱，然而这正是善于利用资本，因为这种物质牺牲会使以后实行整个社会改造时节省大批经费，也许节省十分之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见恩格斯“农民问题”一九二二年版）

恩格斯说这些话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可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话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样容易和那样充分地实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才能立刻实行并完全实行使“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小农转到我们方面来”，实行为此所必需的“物质牺牲”，实行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对待农民”，而且有利于农民的诸如此类的措施已经在俄国实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个情况也一定会便利并推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第二、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个极端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个极端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在这方面，由于农业合作社工作而在农村中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农业合作总社内产生了各个农业部门（亚麻、马铃薯、油类等部门）的新的巨大组织，这些组织是有广大前途的。例如其中的亚麻合作总社包括许多麻农生产协作社。亚麻合作总社以种子和生产工具供给农民，然后向这些农民购买全部亚麻产品，在市场上大批销售；保证农民也得到利润，从而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怎样称呼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呢？在我看来，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大生产中的家庭农业体系。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家庭农业体系，是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体系，例如纺织业生产中的家庭工业体系相比拟而说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体系中，家庭手工业者从资本家那里领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产品交给资本家，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家里做工的半雇佣工人。这不过是指明我国农业应当循着哪一条道路发展的许多标志之一。其他农业部门中的其他类似的标志，我就不谈了。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请看列宁关于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所说的话吧：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列宁往下讲到必须给予合作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和新的“社会制度”以财政援助和其他援助时继续说：

“每个社会制度的产生都需要有一定阶级的财政援助。不用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是以好多亿卢布为代价的。目前我们应该特别援助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具体加以执行。可是必须名副其实地进行援助，就是说，不应该把这种援助仅仅理解为对随便一种合作社周转的援助，而应该把这种援助理解为对确实有真正的民众参加的合作社周转的援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九页）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

说明爱怀疑的人是不对的。

说明列宁主义是对的，因为列宁主义把劳动农民群众看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说明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而且应当运用这个后备军，以便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绝对必需的基础。

六　民族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两个主要问题：

（甲）问题的提法；

（乙）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一）**问题的提法**。最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变化。第二国际时期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远不是一回事。不仅按范围来说，而且按内在性质来说，它们都是大不相同的。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藉以自夸的一切。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彻底性可以说已经被消灭了。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自决原则加以曲解，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第二国际的某些首领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就是说，

被压迫民族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结果就使民族自决的思想有从反对吞并政策的工具变成替吞并政策辩护的工具的危险。现在，这种糊涂观念可以说已经被克服了。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吞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从前，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权的问题。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权利”，发表无数关于“民族平等”的宣言，——这就是第二国际各党所心满意足的事情。它们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某一些民族（少数）靠剥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时候，所谓“民族平等”不过是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嘲弄。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法权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援助，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从前，通常都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把它看做一个单独的孤立的问题，看做和资本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成联盟也能取得胜利；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以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可以不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决。现在，这种反革命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

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样：被压迫国家革命解放运动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可见，“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动民族”，是欧洲的“俄国前哨”，是专制制度的前哨，而当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为当时援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就是间接援助欧洲革命运动的最危

险的敌人沙皇制度。

列宁说：“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运动中的**一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页）

关于个别的民族运动问题，关于这些运动可能具有的反动性问题（当然，如果不是从形式上，不是从抽象的法权观点，而是从革命运动的利益的观点来具体地估量这些运动）就是这样。

关于一般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也应该这样说。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所无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个别的民族运动所可能具有的反动性一样，是相对的和独特的。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可是像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切尔诺夫和唐恩、韩德逊和克莱因斯这些“激烈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和共和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却是**反动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的结果是粉饰并巩固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取得胜利。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份，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份，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这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

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不要孤立地看，而要以世界范围为标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二六页）

（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是从下列原理出发的：

（甲）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财政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组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

（乙）被财政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帝国主义最巨大的后备力量和最重要的实力来源；

（丙）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丁）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戊）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

（己）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末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庚）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那末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战线，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恩格斯）；

（辛）这种援助就是坚持、维护和实行下列口号：民族有分离权，

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壬）不实行这个口号，就不能保证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和合作，而这种统一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基础；

（癸）这种联合只能是自愿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基础上产生的。

由此就产生了民族问题上的两个方面，即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个趋向是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彼此接近。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见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就是民族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趋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而快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十一页）

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吞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

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

才能达到。

因此，必须顽强地、不断地、坚决地反对各统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的“社会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不愿意援助“他们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摆脱压迫、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接近附属国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精神、以真正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的工人阶级。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旧俄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也就不会被击溃。但是要取得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当时首先必须打断俄国帝国主义的锁链，使这些民族摆脱民族压迫。不这样做，就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树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各民族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联合的实际榜样。

因此，必须反对各被压迫国家社会党人的民族闭关主义、狭隘观点和单干思想，这些社会党人不愿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狭隘眼界，不了解本国解放运动和统治国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联系。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统治国无产阶级在推翻共同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阶级团结。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国际主义。

这就是以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道路。

请看列宁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这个两方面的工作是怎样说的：

“这种教育工作……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吞并的民族中和被吞并的民族中，**具体地说**能够**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有完全的平等权利、能密切接近和进而**融合为一**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例如要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另一端向右走。如果压迫的、吞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吞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第二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第二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末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教条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就是要宣传并坚持被压迫国家的分离自由。否则就**不会有**国际主义。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进行这种宣传，那末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把他鄙视为帝国主义者，鄙视为恶棍。这是一个无条件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重心。他可以**既**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而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主义和单干思想，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主张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对问题未加思索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实行**这个**原理**以外**，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道路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三〇页至第三三二页）

七　战略和策略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六个问题：

（甲）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

（乙）革命的阶段和战略；

（丙）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

（丁）战略指导；

（戊）策略指导；

（己）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

（一）**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政治军队的时期。这是把议会制度当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当时关于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的问题、关于准备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搏斗的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问题似乎都不是迫切的问题。当时的任务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发展道路来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利用议会制度以适应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地位并且似乎应当始终处于在野党地位的那种条件。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和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任务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战略，也不可能有周密的策略。当时只有关于策略和战略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观念，但是没有策略和战略。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做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列宁的“做什么？”、“两个策略”、“帝国主义”、“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幼稚病”等书无疑是加进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武库的最宝贵的贡献。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

（二） 革命的阶段和战略。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

我们的革命已经过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略也有过变更。

第一个阶段。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纪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

卷第八十一页）

第二个阶段。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贫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级是可能的后备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三）**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

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内（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战略计划始终没有变更，策略却变更过几次。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转入秘密状态，而群众的革命组织也就由文化教育组织、合作社组织、保险组织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代替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该这样说，在这两个阶段中，策略变更过几十次，战略计划却始终没有变更。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关的，是同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四）**战略指导**。革命的后备军有两种：

直接的：（甲）本国的农民和一般过渡阶层，（乙）邻国的无产阶级，（丙）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丁）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品和成果，而无产阶级为了收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优势的条件下暂时放弃一部分胜利品和成果；

间接的：（甲）本国各个非无产者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并加强自己的后备军的，（乙）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在进攻时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机行事时可以利用的。

关于第一种后备军用不着多说，因为它们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二种后备军，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所以必须指出，它们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例如第一次革命时期和第一次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的巨大意义是未必可以否认的，因为这种冲突在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这件事情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十月革命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者集团之间进行决死的战争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更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者忙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没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反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切实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准备扑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当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当它们彼此之间的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后备军对于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愈益重大的意义。

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来达到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后备军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当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当进攻在以全力进行，当起义已经

迫在眉睫，当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条件的时候，在这个决定关头，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说是这样运用后备军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战争。毫无疑问，党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把广大民众集合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游行示威来训练先锋队去进行街头的发动，同时通过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士兵委员会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革命的结局表明，当时后备军是运用得正确的。

列宁在谈到革命力量的战略运用这个条件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原理变动了一下说：

“（一）无论何时**不要**把起义**当做儿戏**，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把它**进行到底**。

（二）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三）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转入**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四）必须抓住时机，趁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五）**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一小时）都必须力求获得胜利，即使是小小的胜利也好，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五二页）

第二、要选择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先锋队已经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后备军已经具有援助先锋队的决心、敌人内部已经极端慌乱的时机作为施行致命打击的时机，开始起义的时机。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一）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十分混乱，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已十分厉害，他们已因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而十分疲惫”；**如果**“（二）一切犹豫动摇而

不稳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有区别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露自己，已因实践方面的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三）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最坚决最奋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情绪已开始高涨并猛烈高涨起来。那时，革命时机就成熟了；那时，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述一切……条件，并正确地选择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四页）。

举行十月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

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危险的错误，即所谓“失其速度”，就是说，党就会落在运动进程的后面，或者向前跑得太远，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因为当时在苏维埃内部还表现动摇情绪，前线还犹豫不决，后备军还没有跟上先锋队。

第三、要一往直前地实行既定的方针，不顾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阻难和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使先锋队不致失去斗争的基本目的，使群众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这个目的前进并努力团结在先锋队的周围。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莫大的错误，即海员们所熟悉的所谓“失其方向”。我们党在紧接民主会议以后所采取的决定参加预备国会这一错误的步骤，可以说是这种“失其方向”的例子。当时党似乎忘记了预备国会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国家从苏维埃道路转移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党参加这种机关就会打乱全部计划，就会使那些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农迷失道路。这个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国会而被纠正了。

第四、当敌人力量强大，当退却不可避免，当接受敌人的挑战显然对自己不利，当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退却是使先锋队免受打击并保存其后备军的唯一手段的时候，要机动调度后备军来实行正确的退却。

列宁说：“革命政党应当补习。它们已经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十一页至第十二页）

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进攻。

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这个和约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冲突，瓦解敌人的力量，为自己保留农民，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

当时列宁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从彼此敌对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下摆脱出来，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并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〇七页）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页）

保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五）**策略指导**。策略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战略指导的任务和要求的。策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这种形式

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把群众布置在革命战线上。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队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如果党在当时没有决定参加杜马，如果它没有决定集中力量去进行杜马内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去开展斗争，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杜马的无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诺言的虚伪、和沙皇制度妥协的不可能、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必不可免，那末先锋队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和群众的联系。如果没有群众在杜马时期的经验，就不可能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召回主义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先锋队脱离自己的千百万人的后备军。

如果无产阶级当时跟着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号召举行起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走，那末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在广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揭露自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论的虚伪。如果没有群众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的经验，就不会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耐心说明”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并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公开斗争的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左派”共产主义者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变成一小撮徒托空言而没有基础的阴谋家。

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上，或者没有站在至少对先锋队严守善意的中立……的立场上的时候，单把先锋队投入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而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被资本压迫的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这些群众亲身的政治经验。这是所有的大革命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现在不仅被俄国而且被德国十分有力地和明显地证实了。不仅文化水平低的和多半是不识字的俄国的群众，就连文化程度高的和个个识字的德国的群众，也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真是软弱无力、毫无气节、束手无策、向资产阶级献媚、卑鄙龌龊，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不可免地是极端反动派（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②及其同伙）的专政，然后才会坚决地转向共产主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三页）

第二、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们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

——————————————

② 卡普（一八六八——一九二二年）是德国一九二〇年反革命政变——“卡普盲动’的主要领导者，政变后成为政府首领，他的政府仅存在数日即被德国工人的总罢工推翻。——译者注

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链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联结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统一和策略统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由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的毒手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工业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许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结合；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致工业于死命；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

列宁说：“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目前……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商业正是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八十八页、第八十九页）

保证有正确的策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六）**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什

么区别呢？

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宁说：“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的普通战争中最顽强的战争困难百倍，持久百倍，复杂百倍，要进行这样的战争而在事前拒绝采用机动手段，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与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艰难险阻、未经勘察、未通人迹的高山，却在事前拒绝迂回前进，拒绝走回头路，拒绝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尝试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向吗？”（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一页）

问题显然不在于改良或通融和妥协，而在于怎样运用改良和妥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藉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准备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相反地，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准备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改良和妥协的问题就是这样。

可是在帝国主义被推翻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就有些改变了。在某种条件下，在某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政权也许不得不暂时离开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渐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走上列宁在“论金子的作用”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那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上迂回行进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无产者阶级让步的道路，以便瓦解这些阶级，给革命以喘息时机，养精蓄锐，准备举行新进攻的条件。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只是应当记住，这里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改良是来自无产阶级政权方面的改良，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它给无产阶级政权以必要的喘息时机，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者阶级。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

无产阶级政权所以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前一时期的革命规模已十分广大，因而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场所，因而可以实行退却，用暂时退却的策略，用迂回行进的策略来代替进攻的策略。

这样看来，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品，即由这些胜利品构成的、积累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后备力量。

列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确切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和革命的关系，但是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稍微稳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做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

争的副产品…… 当无产阶级即使只是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和革命的关系方面就出现了一种新东西。在原则上仍然和以前一样，但是在形式上已经发生一种马克思本人所不能预见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观点才能了解…… 在胜利以后，当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显然没有充分的力量来用革命手段实行这种或那种过渡的时候，它们（即改良。——斯大林注）（在国际范围内仍旧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和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使我们即使在被迫退却时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九十一页至第九十二页）

八 党

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准备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

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规范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准备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

这个新的党有什么特点呢？

（一）**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无产阶级的一时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末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

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工人阶级斗争的困难，说到斗争环境的复杂，说到战略和策略，说到后备军和机动性，说到进攻和退却。这些条件的复杂程度，和战争条件比较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谁能认清这些条件呢？谁能给千百万无产者群众以正确的方针呢？无论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愿意遭到失败，就非有经验丰富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让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可是这个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党，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

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可是，党不能仅仅是**先进**部队。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部队，即本阶级的一部分，党应当和本阶级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阶级还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可是，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末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党就不能领导阶级。

不久以前，我们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与其说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说是被其余

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这些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而且接收新党员都是经过他们赞同的。这件事实说明：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把我们党看做他们**自己的**党，看做**亲近的亲切的**党，他们深切关心党的发展和巩固，他们自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党的领导。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线索把党和非党群众联系起来，党是不能成为本阶级的决定力量的。

党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列宁说：“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时代，甚至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密切地接近我们党；可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整个阶级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比较接近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一切群众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就只是欺骗自己，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二四〇页）

（二）**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党想真正领导本阶级的斗争，那末它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党的任务是非常巨大而繁杂的。党应当在国内外发展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应当在环境要求进攻时引导无产阶级去进攻；党应当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带领无产阶级避开强大的敌人的打击；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

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

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在列宁所提出的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定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做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做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孟什维克还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这个奇特的“制度”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的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不用说，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制度”下，我们党是不能够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的作用的。

列宁说：“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固定的，因为‘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为党员’。界限不清有什么益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在于能够造成一种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的**使组织涣散的**思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二四六页）

可是，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

列宁说：“**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

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党，这也就是说，形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同上，第三三八页至第三三九页）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的工作由中央来领导的原则，往往引起那些不坚定的分子的攻击，他们斥责这种原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不实行这些原则，那末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有计划的工作和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就会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在组织问题上是始终一贯地实行这些原则的。列宁把反对这些原则的行为叫做“俄国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讥笑和痛斥。

列宁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对于这些不坚定的分子是这样说的：

“这个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的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之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做出瞧不起人的嘴脸，发表鄙视的……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

“看来很明显，高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要掩盖对中央机关人员的不满，不过是要掩盖……丑恶行为。你是官僚主义者，因为你是代表大会不按照我的意见而违反我的意见委派的；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依据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依据我的同意；你做事极端机械，因为你凭藉党的代表大会的‘机械的’多数，而不顾到我想补选进去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柄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三六一页和第三三五页）

——————————————

① 这里所说的“伙伴”指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他们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责备列宁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斯大林

（三）**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共青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极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样多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导呢？怎样才能保证领导上不会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它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有必要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

党具备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它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

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跟本阶级联结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不是说，非党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等，应该正式服从党的领导。这只是说，参加这些组织的党员，这些无疑是有威信的人，应该采取一切说服办法，使这些非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跟无产阶级政党接近，并自愿接受这个党的政治领导。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领导应当普及到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中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页）

正因为如此，主张非党组织“独立”和“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繁殖出**独立**的议员和**脱离**党的出版家、**狭隘的**工会活动家和**市侩化**的合作社运动者的机会主义理论，是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者阶级内部和无产者阶级各个组织中的主要的领导基础。可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把党看做目的本身，看做至高无上的力量。党不仅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无产阶级手中**用来**争得专政（当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专政时）、**用来**巩固并扩大专政（当无产阶级已经争得专政时）的**工具**。如果政权问题没有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如果帝国主义的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危机的存在没有要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集中到一点，把革命运动的一切线索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推翻资产阶级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党的作用就不能提得这样高，党就不能超过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

的党，那末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列宁说：“大概现在几乎任何人都已看得见，如果我们党内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一般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即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有思想、诚实、奋不顾身、有威信、能引导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最完全最忠诚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就不仅不能把政权保持两年半，甚至不能保持两月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

可是，“保持”和“扩大”专政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向千百万无产者群众灌注纪律性和组织性；这就是说，要在无产者群众中间造成能够防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腐蚀影响的屏障和堡垒；这就是说，要加强无产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层方面的组织工作；这就是说，要帮助无产者群众把自己教育成为能够消灭阶级并准备条件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力量。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纪律性而强有力的党，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受到本阶级全体忠诚分子信任的党，没有善于注意群众情绪并善于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党也一定会消亡。

（五）**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当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保证党内统一和党内铁的纪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

列宁说：“在目前紧张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最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只有有近乎军事纪律的铁的纪律，只有使党的中央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机关，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五页）

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以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

列宁说：“谁只要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同上，第二十七页）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是可以容许派别组

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因此，列宁“从保持党内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来说明“派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说明已经载入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中。

因此，列宁要求“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并“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否则就给以“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的处分。（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六）**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所豢养的工会领袖和议员。列宁说：“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贵族’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间的代理人……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八二页）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用种种方法钻进党内，把动摇和机会主义的情绪，把腐化和犹疑的情绪带到党内来。他们是派别活动和瓦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涣散党和从内部破坏党的现象的主要来源。后方有这样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国主义者作战，就会受到两面夹攻，陷

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对这种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是顺利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

主张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主张在一个党的范围内来“消除”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是一种腐朽而危险的理论，它有使党麻痹和害慢性病的危险，有使党被机会主义宰割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政党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丧失主要武器的危险。如果我们党在自己的队伍里有马尔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那末我们党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权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有过**很多次**困难情况，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末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就要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时机，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主义者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要去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出色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在革命的前夜和在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

的斗争的时候，党内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攻击还非常猛烈。如果动摇的领袖在这个时候滚开，那末这不会削弱而会加强党，加强工人运动，加强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五七页、第三五八页、第三五九页）

九　工作作风

这里所指的不是文学作风。我指的是工作作风，是列宁主义实践中能够造就特种类型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那种很特殊的要素。列宁主义是理论的和实践的学校，它能培养特种类型的党的工作者和国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这种作风的特征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怎样的呢？

它的特点有两个：

（甲）俄国人的革命胆略；

（乙）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老旧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唤起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可是，如果不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末它在实践中就很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这种堕落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谁不知道“革命的”臆造主义和“革命的”设计主义的病症的根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排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国作家伊·爱伦堡在他的“共产主义的完人”（完善的共产主义的人）这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些患有这种病症的“布

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立意拟定一个理想的完人的标准……结果竟在这个“工作”中“淹死了”。这篇小说虽然有过于夸大的地方，它正确地抓住了这种病症却是毫无疑义的。可是，谁都没有像列宁那样苛刻无情地讥笑过患有这种病症的人。他把这种迷信臆造主义和发号施令主义的病症鄙视为“共产党员的骄夸”。

列宁说：“共产党员的骄夸，就是说，参加了共产党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妄想用共产党员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自己的一切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五十四页）

列宁通常总是用日常平凡的事情来和这种“革命的”高调相对立，以此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主义是和真正列宁主义的精神与字句绝对相反的。

列宁说：“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九五页和第三八六页）

相反地，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和虚幻的臆造主义的药剂。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

可是，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末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谁不知道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而脱离革命事业呢？勃·皮尔尼亚克的“荒凉年份”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谁都没有像

列宁那样辛辣地讥笑过这种事务主义的病症。列宁把这种病症鄙视为“狭隘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他通常总是用生动的革命事业和我们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前途来和这种病症相对立，从而着重指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也同“革命的”臆造主义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载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
五月九日、十一日、十四日、十五日和
十八日“真理报”第九十六、第九十七、
第一〇三、第一〇五、第一〇七、
第一〇八和第一一一各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6卷第51—135页

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在俄共（布）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

同志们！我不准备详细分析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的决议很多，可以编成一本小册子，现在未必有可能来详细分析它们，况且我和你们现在都没有时间这样做。因此，我认为比较合适的是在报告中指出一些基本出发点并加以解释，使你们回去以后容易自己研究这些决议。

如果把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拿来详细研究，那末决议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可以归结为四个基本问题，这四个问题像一条红线似地贯穿着全部决议。

这是一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基本问题或者说第一类问题是有关我们共和国的外部状况的问题，即关于巩固我们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的问题。

第二个基本问题或者说第二类问题是有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问题，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问题。

第三类问题包括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和改造劳动群众的问题。属于这一类问题的有国家机关、农民工作、劳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这样一些问题。

最后，第四类问题是有关党本身、党内生活、党的存在、党的发展的一些问题。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我将要特别谈一下因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产生的县级工作人员的任务。

外 部 状 况

过去一年在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地位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呢？从旧的一年转到新的一年的时候，必须估计到的而且是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不能不估计到的国际间的新的基本变化是什么呢？

第一、这个新的变化是：在过去一年，我们有机会看到想使西欧在国内政策方面公开法西斯化的一些企图，这些企图原来是没有根据的，它们都失败了。如果撇开法西斯主义正在解体的意大利不谈，在欧洲的主要国家里，即在法国和英国，使欧洲政治法西斯化的企图已经失败了，而这些企图的制造者彭加勒和克逊，干脆说，是已经被轰下台去了。这是过去一年所发生的第一个新的变化。

过去一年所发生的第二个变化是：好战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几次企图孤立我国，这些企图都失败了。几乎用不着怀疑，彭加勒的无数次反苏阴谋和大家知道的克逊的最后通牒，目的都是孤立我国。结果怎样呢？结果不是苏联被孤立了，而是它在事实上被承认了。不仅如此，结果不是苏联被孤立了，而是孤立别人的人孤立了，是彭加勒和克逊辞职了。我国的威信比某些帝国主义老政客所能想像的要高得多了。

这是过去一年对外政策方面的第二个新的变化。

怎样来解释这一切呢？

有些人爱用我们政策的英明来解释。我并不否认，我们的政策即使不英明，至少也是正确的，这是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肯定了的。但是仅仅用我们政策的英明或正确来解释是不行的。这里的问题与其说在于我们的政策正确，不如说在于近来欧洲形成了一种形势，这种形势决定了我们政策的成功。这里必须指出三个情况。

第一、帝国主义列强无力处理自己的军事胜利的果实，无力在欧

洲确立像样一点的和平，它们不掠夺战败国和殖民地、不为分赃而互相倾轧就不能继续发展。因此又在扩充军备。因此产生了新战争的危险。但是，人民群众不要战争，因为他们还没有忘记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遭受的牺牲。因此，各国人民愈来愈不满意好战的帝国主义的政策。

这就是帝国主义内部虚弱的原因。为什么克逊和彭加勒被赶下台去呢？因为舆论认为他们是新战争的挑拨者。因为他们用公开好战的政策激起了群众对整个帝国主义的不满，从而造成了对帝国主义的危险。

第二、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巩固了。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等待我国苏维埃政权垮台的方针。唱赞美诗的人说，上帝有时候通过小孩的嘴说实话。如果把西方帝国主义看做上帝，那末它自己没有一个小孩自然是不行的。于是它就找到了并非无名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贝奈斯作为自己的小孩，通过贝奈斯的嘴宣称：由于苏维埃政权不稳固，不应该急于承认共和国联盟；因为苏维埃政权很快就会被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所代替，最好暂时“抑制一下”，不要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这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但是，帝国主义通过它的小孩的嘴说出来的“实话”只不过维持了几个月，因为大家知道，许多国家很快就以“承认”政策代替了“抑制”政策。为什么呢？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而事实是苏维埃政权坚如磐石。首先，即使是一个庸人，不管他在政治上多么幼稚，也不能不看到苏维埃政权大概是比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巩固，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七年中，资产阶级政府上台下台，而苏维埃政权依旧存在。其次，这个庸人也不能不看到，我国的经济正在发展，例如我国的出口就在步步增加。这些情况都对苏联有利无害，这还用得着证明吗？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在西欧进行反资本主义的宣传。我必须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宣传，我们用不着进行这种宣传。在欧洲工人中间，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它的成长、它的

物质繁荣、它的无可置疑的巩固就是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最好的宣传。任何一个工人来到苏维埃国家，看一看我们的无产阶级制度，就会看到什么是苏维埃政权，看到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能够做出什么来。这才是真正的宣传，然而这是用事实宣传，这种宣传对工人的影响比用语言或报刊来宣传要大得多。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在东方进行宣传。这也是胡说。我们用不着在东方进行宣传。附属国或殖民地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来到苏维埃国家看一看我国人民怎样管理国家，只要看一看黑人和白人，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不同肤色和各个民族的人们怎样同心协力地共同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他就会深信这个国家是唯一的民族友爱不是空话而是事实的国家。既然我们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事实作宣传，我们也就不需要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宣传。

第三、苏维埃政权的威信提高了，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中间的声望增高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执行并且真正执行和平政策的国家，它不是虚伪地而是真诚公开地、坚决彻底地执行和平政策。现在，不论敌人或朋友，全都承认我们的国家是唯一的配称全世界和平政策的堡垒和旗手的国家。这种情况不能不加深欧洲人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和好感，这还用得着证明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欧洲某些当权者竭力把自己的官运建立在同苏联的“友好”上，他们中间连墨索里尼这样的人有时也不反对靠这种“友好”来“捞一把”呢？这正是表明苏维埃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中是真正有声望的。但是，苏维埃政权所以有声望，主要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困难条件下真诚而勇敢地执行了和平政策。

过去一年决定我们的对外政策获得成功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政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代表大会责成党今后继续执行和平政策，执行坚决反对新战争的政策，执行无情地揭露各种各样拥护

或纵容新的军备扩充和新的冲突的分子的政策。

结 合 问 题

什么是结合呢？结合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的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我们的工业品和农民经济的粮食与原料之间的经常联系，经常交换。农民经济不把粮食和原料拿到城市市场上去出卖，不藉此从城市得到必需的工业品和劳动工具，就不能生存，不能存在。同样，国营工业不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农民市场上去出卖，不从农村取得粮食和原料的供应，也就不能发展。可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所赖以生存的是国内市场，首先是农民市场，即农民经济。因此，结合问题是我国工业的生存问题，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生存问题，是我们共和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问题。

我们还没有做到通过工业品和农产品的直接交换来实现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这种结合，这种经常联系。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我们的工业不够发达，我们还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供应机关，而整个国民经济在战后又处于破坏状态。因此，我们不得不实施所谓新经济政策，就是说，不得不宣布贸易自由，商品流转自由，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动员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的力量，在国内建立商品流转的巨流，发展商业，然后占领商业方面的主要阵地，通过商业来建立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结合。这就是用迂回的方法，如列宁所说的，不是直接地，不是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直接交换，而是通过商业来建立这种结合。

任务就在于利用千百万小业主的力量，掌握商业，把乡村和城市的主要供应网掌握到国家和合作社的手写，从而在工业和农民经济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分割的结合。

不能说这种任务是我们力不胜任的。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掌

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具有通过商业用迂回的方法来实现这种结合的一切主要手段。第一、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第二、它有工业。第三、它握有信贷，而信贷是国家手中极大的力量。第四、它有自己的商业机构，不管这种机构是好是坏，它毕竟是在日益发展，日益巩固。最后，它握有一定的商品，随时可以抛到市场上去，以平服或稳定市场的波动，影响物价等等。工人国家拥有这一切手段，所以不能说通过商业来实现结合是我们力不胜任的任务。

建立城乡结合的问题和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就是这样。

那末，从建立城乡结合来看，过去一年有什么新的重要变化呢？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解决结合问题的时候根据什么新的材料呢？

一年来在这方面的新变化是：过去一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第一次碰到一个广泛的斗争，即我国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同私人资本主义成分间的大规模的斗争，我们碰到这个斗争以后才第一次把结合问题极为具体地提到实践上来了。结合和商业问题在我们面前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迫切地要求立即解决的直接实践的问题了。

你们可记得列宁还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说过，用国家和合作社的力量来控制市场，掌握主要的贸易网，将不是通过和平的工作，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成分同私人资本主义成分间的斗争，这种工作将通过我国国民经济中这两种对立成分间拚命竞争的方式来进行。后来这个斗争激烈起来了。它主要是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城乡间的贸易，另一方面是信贷，主要是农村中的信贷。

这个斗争的结果究竟怎样呢？

第一、事实上私人资本并没有投入冒险性比较大而资金周转比较慢的生产，而是投入了商业，投入了列宁所说的构成我国过渡时期发展过程链条的基本环节的那个商业。并且，私人资本投入商业以后，就在那里巩固下来，竟掌握了全国约百分之八十的零售商业，约百分之五十的批发零售商业。这是由于我们的商业机构和合作社机构还年

轻，还没有安排好；我们的辛迪加实行了不正确的政策，滥用自己的专营权，抬高物价，我们的负责从国家的角度来调节商业的国内商业委员会软弱无能；我们当时的苏维埃货币不稳定，主要打击了农民，因而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

第二、事实上农村中的信贷完全落在富农和高利贷者的手中，没有农具的力量单薄的农民不得不去受高利贷者的盘剥，不得不付出极高的利息，忍气吞声地受高利贷者的支配。这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基层的农业信贷网，不能够供给农民低息贷款，把高利贷者排挤到后面去，结果高利贷者就占据了全部阵地。

这样，在国家和农民经济之间钻进了商人和高利贷者，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结合因而困难和混乱起来了。去年夏季的销售危机就是这种困难和混乱的表现。

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党就采取措施来消除销售危机和奠定农业信贷的基础。发行了新的稳定的货币，这使情况有了好转。为了降低物价，把大批商品抛到市场上去，这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根据保证胜利地同私人资本作斗争的原则改组了国内商业委员会。提出了从结合的角度来改造商业机构和合作社机构的工作问题。销售危机基本上消除了。

但是，党不能只限于采取这些措施。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在于把结合问题重新全部提出来，并制定在销售危机消除后的新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路线。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究竟给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代表大会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工业首先扩大轻工业和金属工业的口号。因为很明显，以我们现有的工业品储备，我们是不能满足农民对商品的渴求的。更不用说，失业现象的增长迫切地要求扩大工业。因此，进一步扩大工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见代表大会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第二、代表大会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农民经济的口号，帮助农民经济进一步扩大耕地的口号。这也是建立结合所必需的措施，因为很明显，农民所关心的不仅是满足我们工业的需要（当然是为了换取工业品），而且是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当然是为了换取机器）。因此，进一步扩大农民经济是党的政策的当前任务。（见“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

第三、代表大会批准成立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并向我们的一切商业机构和合作社机构提出了同私人资本作斗争的主要任务，掌握市场的任务，用经济性质的措施，即用降低物价和改进商品质量的办法，用调拨大批商品、实行优惠贷款等等办法，把私人资本排挤出商业领域的任务。（见“关于国内贸易”和“关于合作社”的决议）

第四、代表大会提出并解决了最重要的农业贷款问题。这里指的不仅是中央农业银行，甚至不仅是各省农业贷款委员会。这里指的主要是在县和乡建立基层信用合作社网；这里指的是使信贷工作民主化，使农民可以得到农业贷款，以国家的低息贷款来代替高利贷者的盘剥性的贷款，而把高利贷者逐出农村。这是我国整个经济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间就不能有比较巩固的结合。正因为如此，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见“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中央委员会曾经拨出四千万卢布作为农业银行的基金，以便在同国家银行保持一定的配合下把这四千万卢布增加到八千万卢布。我想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可以使这笔款项达到一亿卢布。当然，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算大的，但是这毕竟能使农民易于改善自己的经济并打破高利贷者的盘剥。我在上面说到了基层农民信用合作社对于力量单薄的农民的意义，对于农民和工人国家结合的意义。但是基层信用合作社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够成为不仅国家帮助农民而且农民帮助国家的极大泉源。的确，如果我们在各地，在各县各乡撒开一个广大的农业信贷

网，而且这些信用机关在农民群众中享有威信，那末农民将不但向国家借钱，而且还会把钱存入信用机关，就是说，这些机关将不但有资产业务，而且还有负债业务。不难设想，在基层信用机关的业务顺利发展的情况下，负债业务能够成为国家从千百万农民得到可靠援助的来源，这是任何外债都比不上的。由此可见，代表大会特别注意在农村中组织低息贷款是不错的。

第五、代表大会再次宣布对外贸易垄断制是不可动摇的。我想，没有必要解释这种制度对于工业和农业以及对于工农业结合的意义。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根本意义是无须再加证明的。（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第六、代表大会认定必须增加一般出口，首先是粮食的出口。我想，这个决定也是无须加以解释的。（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第七、代表大会决定采取一切办法，使币制改革彻底实行，因为它能促进商品流转，便于建立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巩固的联系；使中央和地方都尽力实现币制改革的一切必要条件。（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这就是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结合问题上的口号，这些口号的目的在于掌握商业，建立我国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牢固的结合，从而为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准备条件。

劳动群众的教育和改造问题

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的工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些传统和习气控制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们有时笼罩着无产阶级各阶层，

有时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造成极大的危险。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国家机关的改善工作、农村工作、劳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这就是党在实现这些任务时的主要活动范围。

（甲）**为改善国家机关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国家机关问题上花的时间很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同国家机关的缺点作斗争的报告没有讨论就批准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也没有讨论就通过了。在我看来，这是由于时间不够，提交代表大会的问题又很多。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党不把国家机关问题看做极重要的问题，那就完全不对了。恰恰相反，国家机关问题是我国整个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国家机关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受贿；是实行节约，还是浪费人民财产；是在工作中弄虚作假，还是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是劳动者的累赘，还是帮助劳动者的机关；是培植无产阶级的法制思想，还是以否定这个思想的精神腐化人民的意识，是在向过渡到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方向前进，还是向普通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腐朽官僚制度倒退，——正确地解决这一切问题，对于党和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决定意义。我们的国家机关有很多缺点，机构臃肿，开支浩大，十分之九已经官僚主义化，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又在对党和党的组织施加压力，妨碍我们为改善国家机关而斗争，——这些情况是未必可以怀疑的。同时很明显，只要我们的国家机关摆脱了某些主要的缺点，它就会成为无产阶级手中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和改造广大人民阶层的极强大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列宁特别注意改善国家机关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党成立了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专门组织（改组过的工农检查院和扩大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来和我们国家机关的缺点作

斗争。

任务在于帮助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业检查院进行自上而下地改善、精简和在精神上健全国家机关的艰巨工作。（见代表大会“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

（乙）**关于农村工作**。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实践中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我们农村工作的基本路线的出色决议。只要拿这个决议同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解党在这方面前进多少了。但是，如果以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今年已经全部解决或者能够全部解决最复杂的农村问题，那就错了。这些问题，如集体农庄的组织形式，国营农场的改造，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土地规划工作的调整，同农业合作社工作相关联的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对我国各种不同地区的特点的掌握和在工作中对这些特点的照顾，——所有这些问题，由于很明显的原因，都不能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全部解决。代表大会决议重要的地方在于它制定了基本的工作路线，便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你们大概知道，中央全会已经成立了一个农村工作常务委员会来详细研究这些问题。

决议的中心是农民群众合作化的口号。合作化应当从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三方面来进行。这是在农民中，在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和中农阶层中培植集体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见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

（丙）**关于劳动妇女工作**。我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已经说过，这方面的工作在我们这里是被轻视的，但这个工作对党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场合下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一代的工作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面。现在当然不必把已经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话重复一遍。我只想请你们注意，代表大会可惜没有能专门讨论劳动妇女工作问题，但还是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这个决议说：“代表大会提请全党特别注意，

必须加强女工和农妇工作，并把她们提拔到选举出来的党和苏维埃的机关里去。”（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我认为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必须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中央全会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在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决定委托我们的中央组织局采取特别措施，把劳动妇女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

（丁）**关于青年工作**。代表大会对青年工作特别注意。在我看来，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代表大会所有的决议中最完善最详尽的决议。因此，这个决议对于党和青年都是很宝贵的。

青年（我说的是工农青年）的作用在于他们是建设未来的极良好的基础，他们是我国的未来，他们是我国的未来的体现者。如果说，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农民工作、劳动妇女工作在克服旧习气和旧传统方面，在**改造**劳动群众的老一代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那末在多少是不受这些传统和习气拘束的青年中进行工作，对于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劳动者的新干部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这里的基础不言而喻是十分良好的。

因此，共青团和少先队就有了极重大的作用。

共青团是工农青年的自愿组织。它的中心、它的核心是青年工人。它的支柱是青年农民。工农青年的团就是青年组织的基础。把一切忠实的革命的青年农民聚集在无产阶级核心的周围；吸引自己的团员参加经济、文化、军事、行政各方面的工作；把他们培养成为我们国家的战士和建设者、劳动者和领导者，——这就是共青团的任务。（见“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

党

这里有四个问题：关于反对派，关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关于党的领导的民主化，关于一般理论特别是关于列宁主义的宣传。

（甲）**关于反对派**。现在，当反对派问题已经由代表大会解决，事件因而业已平息的时候，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反对派是什么？争论时期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斗争？同志们，我认为这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反对派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某个同志或某个反对派集团抱着什么目的。问题在于这个集团的行动必然要产生的客观结果。要知道，向党的机关宣战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破坏党。唆使青年反对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瓦解党。为集团自由而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粉碎党，粉碎党的统一。用蜕化的胡说来诬蔑党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它的脊椎骨。是的，同志们，这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场争论。我们争论得那样热烈，原因就在这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了这次代表大会**一致**斥责反对派的纲领这个空前未有的事实，原因也在这里。极严重的危险使党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从历史上考察一下反对派是有意义的。就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说起吧。这是苏维埃政权出现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一八年初）。在那次代表大会上领导反对派的就是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领导反对派的那些人物。当时所争论的是战争与和平，是布列斯特和约。当时拥护反对派的人占代表大会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总算不少了。难怪当时人们说到分裂。

两年以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以同样一些人物为首的反对派在工会问题上又掀起了党内斗争。那时拥护反对派的人占代表大会人数的八分之一。这当然比四分之一少了。

此后又过了两年，在闭幕不久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又爆发了新的斗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有反对派，但是他们在代表大会上连一票也没有了。可见这对反对派已经十分不利了。

总之，反对派曾经三次企图同党的主要干部作战。第一次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第二次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第三次是在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上。可是，反对派总是遭到失败，每次都失去一些人，一步步缩小自己的队伍。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第一、说明最近六年来我们党的历史是我们党的多数党员日益团结在党的主要干部周围的历史。第二、说明一批又一批的人逐步离开了反对派，而加入党的基本核心，补充这一核心。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和以往的情形一样，若干同志有可能脱离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没有代表（我们这里没有比例选举制）但在党内无疑还有自己的拥护者的反对派，而加入党的基本核心。

我们对这些反对派分子，或者确切些说，对这些过去的反对派分子的政策应当怎样呢？应当完全以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促使这些同志转向党的基本核心，和这个核心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

（乙）**关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即把二十五万工人接收为我们党的新党员这个事实说明了我们党具有深刻的民主性，说明了我们党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选举出来的机关，这一点我不打算多谈。在这方面，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一点。我要请你们注意的是最近我们党内由于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而出现的那种危险的迷恋。有些人说，必须再进一步，使党员人数达到一百万。另外一些人想前进得更远些，硬说达到两百万才好。我相信还会有第三种人，他们想前进得更远。同志们，这是危险的迷恋。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所以覆灭，往往是由于过分迷恋，过多地占有，后来不能消化所占有的东西而土崩瓦解。最大的党如果迷恋起来，过多地占有，后来不能包容和消化所占有的东西，也是会灭亡的。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党内政治文盲达到百分之六十。有百分之六十的政治文盲，这是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以前的情况，在这以后恐怕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了。同志们，不是该停止的时候了吗？不是该以八十万党员为限，尖锐而肯定地提出改善党员

质量，以列宁主义基础教育那些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使他们成为觉悟的列宁主义者等等问题的时候了吗？我认为是时候了。

（丙）**关于党的领导的民主化**。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这件事说明了我们党的深刻的民主性，说明了党的基本支部的无产阶级成分，说明了千百万非党群众对我们党的无可置疑的信任。但是，我们党的民主性不限于此。这仅仅是民主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党的领导本身正在逐步民主化。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表明，党的领导的重心日益由狭小的上层和各个局向广大的组织，向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的全体会议转移，同时这些全体会议本身在扩大，它们的成分在改善。你们大概知道，我们领导组织的发展中的这种趋向，代表大会是完全赞同的。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领导组织已经开始把自己所有的根伸展到无产阶级群众的深处去。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的数量和社会成分方面来考察一下我们党中央最近六年来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在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期（一九一八年），我们中央由十五个委员组成，其中工人只有一个（占百分之七），而知识分子有十四个（占百分之九十三）。这是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形。而现在，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已经由五十四个委员组成，其中有二十九个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三）和二十五个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七）。这是党的基本领导民主化的鲜明标志。

（丁）**关于一般理论特别是关于列宁主义的宣传**。我们党的危险的缺点之一，就是党员的理论水平低落。原因是实际工作过于繁忙，打消了理论学习的热望，滋长了某种至少是不关心理论问题的危险的态度。举几个例子来谈。

不久以前，我在报上读到了一位同志关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大概是加米涅夫），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们党的当前口号是变“耐普曼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而且更坏的是把这个奇怪的口号硬加在列宁身上而不是硬加在别人身上。正是这样！可是大家知

道，列宁没有说过而且也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大家知道，“耐普曼的”俄国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固然，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但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即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是一回事，而“耐普曼的”俄国（即耐普曼统治的俄国）完全是另一回事。加米涅夫是否懂得这个原则上的差别呢？当然是懂得的。那末，为什么他当时脱口说出这个奇怪的口号呢？因为平常不关心理论问题，不关心确切的理论定义。但是，如果错误不加纠正，这个奇怪的口号就很可能在党内产生一大堆误解。

再举一个例子。常常有人说，在我国是“党的专政”。有人说我赞成党的专政，我记得在我们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似乎是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用过这样的语句，这当然是由于疏忽。看来同志们中间有人认为我国是党的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专政。但是，同志们，这是胡说。如果这是对的，那末列宁当时教导我们说苏维埃**实现**专政而党**领导**苏维埃，就是错的了。列宁当时说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党的专政，也是错的了。如果这是对的，那末当时就不需要苏维埃了，当时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用不着说必须“**划清**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界限**”了。可是，这种胡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怎样渗入党内的呢？这是由于对“党性”的迷恋，而这种迷恋正是对不带引号的党性为害最大；这是由于不关心理论问题；这是由于在提出口号以前缺乏思考的习惯，因为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用党的专政来顶替阶级专政是十分荒谬的。这种荒谬的做法会在党内产生混乱思想和糊涂观念，这还用得着证明吗？

还有，大家知道，在争论期间，我们党内一部分人上了反对派分子反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反党宣传的当。任何一个进过最短期的列宁主义理论学校的布尔什维克都会一下子看出，反对派的说教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大家知道，党内一部分人未能一下子看清反对派的真面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仍然是因为不关心理论，因为

我们党员的理论水平低。

争论已经把研究列宁主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列宁的逝世使这个问题更感到迫切，加强了党员对理论的兴趣。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若干决议中肯定了研究和宣传列宁主义的必要性，不过是反映了这种情绪。党的任务在于利用对理论问题的日益增长的兴趣，采取一切办法把党的理论水平终于提到应有的高度。不应当忘记列宁的话：没有明白而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

关于县级工作人员的任务

同志们！我特地来给你们做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不是偶然的。我来给你们做报告，不仅是因为你们希望这样，而且还因为在发展的现阶段，县特别是县级工作人员是党和农民间、城市和乡村间的联系的基本环节。而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建立城乡间的结合是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实践的基本问题。

我在上面说过，建立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结合必须从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基层信用合作社这三个主要方面做起。我说过，这三条孔道是建立结合的基本孔道。但是，如果以为现在就可以越过县而直接通过乡来把工业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那就是幻想。用不着证明，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本领和财力来这样做。因此，目前城乡结合的枢纽还是县和专区。为了在商业方面巩固起来，完全不需要把最后一个店主从最后一个乡挤出去，只需要把县变为苏维埃商业的基地，使所有的店主都不得不围绕县的合作社和苏维埃商店转，就像行星围绕太阳转一样。为了掌握信贷，现在也完全不需要把信用合作社网撒满乡和村，只要在县里建立基地，就足以使农民立即开始脱离富农和高利贷者。如此等等。

简单地说，在最近期间，县（专区）应当变为建立城市和乡村间、

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结合的主要基地。

这种转变的快慢取决于你们县级工作人员同志们。现在你们有三百人。这是一支大军。只有依靠你们和你们在全国各县的同志，才能在最近期间使县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建立工业和农民经济间的结合方面的工作枢纽。我相信县级工作人员一定能履行自己对党和国家的义务。

载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和二十日
“真理报”第一三六号和第一三七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6卷第166—183页

关 于 波 兰 共 产 党

（在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

同志们！我没有足够的材料能像某些发言人那样肯定地谈。虽然如此，根据我终于得到的材料和这里的讨论，我有了一定的看法，我想把我的看法和你们谈谈。

毫无疑问，波兰共产党正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波兰党的内部存在着危机，这是事实。瓦列茨基承认这一点，你们大家也承认这一点，并且这一点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因为这里已经确认在波兰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在担任实际工作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者之间不协调。不仅如此，波兰党中央委员会本身在去年十二月全会和今年三月全会的决议中也承认了自己一系列行动的机会主义性，并直截了当地斥责了这些行动。看来已经尽够了。我再重复一遍，这一切都说明波兰共产党内确实存在着危机。

产生这个危机的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于波兰共产党的正式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有某些机会主义错误。

请允许我举出几个例子来证实这种说法。

“俄国”问题。有些波兰同志说，这个问题是对外政策问题，对波兰党没有重大意义。这是不对的。“俄国”问题对西方和东方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有决定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堡垒和保护者。如果在这个根据地，即在俄国，党和政权开始动摇，那就是说，全世界的整个革命运动必然会遭到极严重的损害。

在我们俄国共产党（布）内发生争论的期间，党内开始动摇了。具有机会主义本质的反对派以其反党的斗争来动摇党，削弱党，从而削弱苏维埃政权，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它是国家政权的基本领导力量。俄国共产党（布）内的动摇自然会进而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动摇和削弱。而苏维埃政权的动摇就是对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损害。正因为如此，俄国共产党（布）内的意见分歧和俄国共产党（布）的整个命运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命运不能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俄国”问题虽然对波兰来说是一个外部问题，但对各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波兰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那末，波兰党的领袖们是怎样对待“俄国”问题的呢？他们支持了谁，支持了机会主义的反对派还是支持了俄国共产党（布）内的革命的多数呢？我很清楚，在俄共（布）党内斗争的初期，即同机会主义的反对派作斗争的初期，波兰党的领袖们毫不含糊地支持了反对派。我不来详细分析瓦尔斯基或瓦列茨基，因为瓦尔斯基在他起草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持俄国共产党（布）内的反对派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决议时所想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的首先不是个人的意愿，而是这个决议的客观效果。这个决议的客观效果归结起来就是助长了反对派的声势。这个决议是对俄国共产党（布）内的机会主义派的支持。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在波兰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并把它送交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时期，波兰党中央委员会就成了俄国共产党（布）内的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波兰支部。如果把俄国共产党（布）内的反对派看做必须在各国设有分公司的某个公司，那末波兰共产党当时就是这个公司的波兰分公司。波兰党的领导者们在“俄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罪行的实质就在这里。这是令人痛心的，但可惜这是事实。

德国问题。德国问题是继“俄国”问题之后的一个具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第一、因为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德国孕育着革命的程度

最大，第二、因为德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整个欧洲的胜利。如果欧洲的革命动荡要从某一端开始，那就是从德国开始。只有德国能够在这方面首先发动，德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国际革命胜利的保证。

你们知道，去年在德国共产党内，革命的多数和机会主义的少数之间的斗争激烈起来了。你们知道，德国共产党的左翼或右翼的胜利对整个国际革命进程会有多大的意义。结果怎样呢？在这场斗争中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者们支持了谁呢？他们支持了布兰德勒集团，反对德国共产党的革命的多数。现在所有的人，不论是朋友或敌人都承认这一点。结果也同“俄国”问题上的情况一样。假定说，在德国存在着一个共产党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公司，那末波兰的领导者就是这个公司的波兰分公司。这也是令人痛心的，但事实是不能违拗的：事实是必须承认的。

关于同机会主义反对派斗争的方法。柯斯特尔热瓦说，他们，即波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者们，实际上支持俄国中央委员会，大概也支持由现在的成员组成的德国中央委员会，但是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方法问题上和这两个机关有分歧。你们看到没有，他们要求对反对派采取温和的斗争方法。他们赞成同反对派作战，但是他们赞成的是不会招致牺牲的战争。瓦列茨基竟叫喊说：请原谅，我们支持“三人小组”！我必须说明，谁也没有要求瓦列茨基在一切问题上都附和俄国中央委员会。并且，我不知道瓦列茨基如此卖力讨好的“三人小组”是什么。他忘记了，谁也不一定要在一切问题上都附和俄国中央委员会。（瓦列茨基在座位上说：“不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可以这样做。”）当然，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也应当懂得，这样做既使瓦列茨基也使俄国中央委员会处于难堪的境地。问题完全不在于附和与否，而在于俄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产生了新资产阶级，他们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公开活动，于是就在俄国共产党（布）的领导者中间寻找自己的英雄，竭力从内部来突破共产主义战线。而这种情况就使俄国共产党（布）

内部产生了反对派的情绪，给机会主义倾向建立了基础。因此，问题在于我们的兄弟党要确定自己对这种情况的态度，采取明确的立场。我再重复一遍，问题在这里，而不在于附和俄国中央委员会与否。

至于柯斯特尔热瓦的温和的方法，那末应当说，它是经不起一驳的。柯斯特尔热瓦赞成同机会主义反对派作斗争，但是他赞成的是不会破坏反对派首领的威信的斗争。然而，第一、历史上未曾有过这种不会招致某些牺牲的斗争；第二、要战胜反对派，就不能不估计到胜利会破坏反对派首领的威信，否则就只好不同反对派作任何斗争；第三、彻底战胜反对派是避免分裂的**唯一**保障。党的实践不知道有其他的保障。俄国共产党（布）的全部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还在战前，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正统派的时候，它就是用柯斯特尔热瓦在这里所说的那种温和的方法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但是它这样做的结果，机会主义成了胜利者，而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俄国共产党（布）是用坚决孤立机会主义首领这个久经考验的方法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结果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我认为俄国共产党（布）的教训对我们应该是大有教益的。柯斯特尔热瓦推荐的斗争方法是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复活。它孕育着党内分裂的危险。

最后，关于党的领导问题。目前西方共产党发展中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党面临着按照新的革命的轨范改变党的实践的问题。这里不是指通过共产主义纲领和宣布革命口号。这里指的是把党的日常工作、党的实践加以改变，使党的每一个步骤和党的每一个行动自然而然导向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导向准备革命。现在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而不在于通过革命的指示。

普鲁赫尼亚克昨天在这里宣读了波兰中央委员会领导者们通过的一大串革命决议。他以胜利的神情宣读了这些决议，认为党的领导就

在于制定决议。他并没有想到制定决议只是党的领导的第一步，党的领导的开始。他不懂得领导的基础不在于制定决议，而在于执行决议，在于实现决议。因此，他在冗长的演说中竟忘记告诉我们这些决议的命运，他不认为有必要谈谈波兰共产党是不是执行了这些决议，执行的程度如何。但是，党的领导的实质正是在于执行决议和指示。看着他，我就想起了在检查委员会面前“答辩”的常见的苏维埃官僚。检查委员会问：“某个指示执行了吗？”官僚回答说：“采取了措施。”检查委员会问：“采取了什么措施？”官僚回答说：“下了命令。”检查委员会要文件。官僚以胜利的神情拿出了命令的副本。检查委员会问：“命令的命运怎样，它是不是执行了，什么时候执行的？”这位官僚瞪大了眼睛说：“还没有消息。”当然，检查委员会给了这样的官僚以处分。当普鲁赫尼亚克在这里以胜利的神情宣读执行情况还“没有消息”的革命决议的时候，他使我想起的就是这位苏维埃官僚。这不是党的领导，而是对一切领导的嘲笑。

结论究竟是什么呢？结论归结如下：

第一、我坚决反对在波兰即将举行的党的争论中，在过去的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之间筑起一道分水岭。这对党是危险的。过去的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早就融合为统一的党了，它们在共同进行反对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如果追溯以往而把它们分成两个部分，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斗争不应该按照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旧路线进行，而应该按照孤立波兰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的新路线进行。彻底战胜机会主义派就是避免分裂的保障，就是党的团结的保证。

第二、我坚决反对所谓割除的办法；即反对取消某些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资格。我根本反对从上面来改组中央委员会。完全应该考虑到，没有特别需要而施行外科手术会在党内留下不好的后果。让波兰共产党自己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改组自己的中央委员

会。日益发展的党不会不选拔出新的领袖。

第三、我认为温什里赫提出的实际建议是完全正确的。推选出由现在的波兰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上和实践上统一领导的中央来代替彼此分离的组织局和政治局，是完全合理的。

这里有人对波兰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新领导者的理论知识和党的经验表示怀疑。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有决定意义。在俄国共产党（布）的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理论知识和政治知识不足的工人成了一些最大的区域组织的领导者。可是这些工人和许多缺乏必要的革命嗅觉的知识分子相比，却是优秀的领导者。在最初一个时候，新领导者的工作进行得不十分顺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跌一两次交，就能学会领导革命运动。成熟的领导者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斗争进程中成长起来的。

载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一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6 卷第 186—191 页

给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的信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亲爱的杰米杨！

给你的信写得太迟了。你有权利骂我。可是你一定知道，说到写信，我是一个少有的懒汉。

我逐点来谈。

一、你有“愉快的情绪”，这很好。“厌世”哲学不是我们的哲学。让衰亡的人和垂死的人去悲哀吧。美国人惠特曼十分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哲学：“我们活着！未用尽的力量的火焰使我们的鲜血沸腾。”正是这样，杰米杨。

二、你写道：“又怕得罪人，又得去治病。”我的意见是：得罪几个来访的人比不去好好地治病要好些。治病，治病，一定要治病。不得罪来访的人，这是片刻的利益。稍微得罪他们一下，去认真治病，这却是比较长远的利益。本来，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相反的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把第一种利益置于第二种利益之上。不用说，你是不会学机会主义者的样子的。

三、你写道：“你给县委书记们做的报告里的宽恕的口气不是没有权变的成分的。”确切些说，其中是有**政策**的，一般说来，政策总不免带有某种权变的成分。我认为**既然**把反对派首领们打得落花流水了，我们，就是说党，对普通的和中等的反对派分子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好促使他们离开反对派首领们。让将军没有军队——主要目的就在这里。现在反对派在党内有四五万人，其中大多数想丢开自己的首领们，但是，他们的自尊心或者某些拥护中央的人的粗暴和

骄矜妨碍他们这样做。某些拥护中央的人的冷嘲热讽触怒了普通的反对派分子，因而妨碍了他们转到我们这方面来。我的报告的“语气”就是针对这些拥护中央的人的。既然反对派首领们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这样做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击溃反对派。

四、你问：“收成会不会使我们困难。”收成已经使我们有些困难了。去年我们收获了（总收获量）二十七亿多普特，今年预料要少收两亿普特。这对出口当然是一个打击。歉收的农户现在确实比一九二一年少了五分之四，因此，我们不用特别费力就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对付这个不幸。这一点你不必怀疑。但是打击仍然是打击。然而人们常常会因祸得福。我们决定利用农民的坚定的决心尽一切可能来预防**将来**意外的旱灾，我们将竭力设法利用这种决心来实行（同农民一起）改良土壤、改进农业技术等等果断的措施。我们打算**首先**在萨马拉—萨拉托夫—察里津—阿斯特拉罕—斯塔夫罗坡里地区建立一个最低限度必要的土壤改良区。我们为这个事业准备了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卢布。明年我们要转向南方各省。这将是我国农业革命的开端。地方上的人说，农民是会大力支持的。天不打雷，农民是不会划十字的。为了把农业提到最高程度，为了使我国能够时时刻刻预防意外的天气，让旱灾鞭挞我们一下看来是必要的。高尔察克教会了我们建立步兵，邓尼金教会了我们建立骑兵，旱灾正在教我们建设农业。这就是历史的道路。这里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东西。

五、你写道：“请来吧。”可惜我不能来，因为没有时间。我劝你安排“到巴库去玩一趟”，——这是必要的。梯弗里斯并不怎么有意思，虽然它在外表上比巴库诱人。如果你还没有看见过林立的石油井架，那末你就是“什么也没有看到过”。我相信巴库能提供你极丰富的材料来创作像“牵引力”这样的杰作。

在我们莫斯科，一连串代表大会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讨论当然是好的，但是老实说，这不过是装

饰品。我们大家在这里同西方的代表（以及东方的代表）进行的亲切谈话要有意思得多。我同德国的、法国的、波兰的工人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极好的革命“材料”！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在西方，真正的革命仇恨，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仇恨，正在日益加深。我很高兴听到他们希望在本国“按照俄国方式实行革命”的纯朴而有力的话。这是一些新型的工人。这样的工人在我们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还不曾有过。当然，距离实行革命还不怎么近，但是正在走向革命，——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这些工人还有一个特点使我感动：他们对我们国家怀着热诚而强烈的几乎是母性的爱，对于我们党的正确、能力和威力无限信任。不久以前的怀疑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革命日益发展的标志。

正是这样，杰米杨。

好吧，谈得够了，再见。紧握你的手。

你的 **约·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次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92—194页

论 国 际 形 势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我认为，为了说明目前的国际形势，丝毫没有必要把所有稍微重大的事情和现今国际事务中的一切特点都加以估计。为了说明目前的国际形势，只需要估计一下目前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依我看来，现在这样的问题有三个：

（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时代”的到来；

（乙）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和协约国的伦敦赔款协定；

（丙）欧洲工人运动中左的因素的加强和苏联国际威信的提高。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基本问题。

一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时代

协约国已经显得无力处理自己的军事胜利的果实。击溃德国和包围苏联，它完全做到了。制定掠夺欧洲的计划，它也做到了。协约国各国无数的会议和条约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要执行掠夺计划，它就显得无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协约国各国之间的矛盾太大了。因为它们在分赃问题上过去没有谈好，今后也不能谈好。因为被掠夺的国家的反抗越来越厉害。因为掠夺计划的实现包含着军事冲突，而群众是不愿意打仗的。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为了消灭德国而进行的对鲁尔的帝国主义正面攻击，对帝国主义本身也是危险的。同样很清楚，为了孤立苏联而实行的露骨的帝国主义最后通牒政策，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已经形成了这种局面：彭加勒和克逊虽然忠心耿耿地为帝国主义效劳，但是他们的“工作”加剧了欧洲日益增长的危机，激起了

群众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推动了群众去进行革命。因此，资产阶级必然会从正面攻击的政策转到妥协政策，从露骨的帝国主义转到隐蔽的帝国主义，从彭加勒和克逊转到麦克唐纳和赫里欧。明目张胆地掠夺世界已经不无危险了。英国的工党和法国的左派联盟必须掩饰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这就是“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来源。

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奉行“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不是由于必要，而是出于自愿，出于所谓自由的选择。并且推想，资产阶级在决定性的战斗中（意大利和德国）击溃了工人阶级以后感到自己是胜利者，因而现在能够奉行“民主主义”。换句话说，当决定性的战斗进行的时候，资产阶级需要战斗的组织，即需要法西斯主义，而现在当无产阶级已被击溃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不再需要法西斯主义，它可以用“民主主义”这一巩固自己胜利的更好的方法来代替法西斯主义。由此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产阶级的政权巩固了，“和平主义的时代”应该认为是长期的，而欧洲的革命则将无限期地搁置下来。

这种推想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一、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是不对的。法西斯主义不只是一种军事技术范畴。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没有根据推想，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支持，而能在战斗中或者在管理国家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样也很少有根据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资产阶级战斗组织的积极支持，而能在战斗中或者在管理国家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些组织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法西斯主义是这两个主要组织的无形的政治联盟，它是在战后帝国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目的在于同无产阶级革命作斗争。资产阶级没有这种联盟就不能保住政权。因此，如果认为“和平主义”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消灭，那就错了。在目前情况下，“和平主义”意味着法西斯主义随

着它的温和派社会民主党的显露头角而巩固起来。

第二、认为决定性的战斗已经发生过了，无产阶级在这些战斗中已被击溃，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巩固了，这是不对的。决定性的战斗还没有发生过，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群众性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党。没有这样的党，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争取专政的决定性战斗是不可能的。西方的决定性战斗还是将来的事情。发生过的仅仅是被资产阶级击退了的最初几次严重攻击，仅仅是对力量的最初一次严重检验，这次检验表明，无产阶级**还**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也已经不能忽视无产阶级了。正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使工人阶级屈服，它就不得不放弃正面攻击而采取迂回的方法，实行妥协，奉行“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

最后，认为“和平主义”是资产阶级强大的标志而不是它软弱的标志，认为实行“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而使革命无限期地延迟，这也是不对的。目前的和平主义意味着第二国际各党直接或间接地执掌政权。但是，第二国际各党执掌政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它们必然会揭露自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因为这些政党的执政活动只会产生一个结果：使它们在政治上破产，使它们的内部矛盾加剧，使它们土崩瓦解。而这些政党的瓦解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政权的瓦解，因为第二国际各党是帝国主义的支柱。没有特别的必要，资产阶级会不会出于自愿地来进行这种冒险的奉行和平主义的试验呢？当然不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时期内，资产阶级进行过两次奉行和平主义的试验：第一次是在战争刚刚结束以后，当革命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第二次是现在，在彭加勒和克逊的冒险试验以后。资产阶级这样从和平主义投向狂妄的帝国主义和从狂妄的帝国主义投向和平主义，对帝国主义不会没有影响，它把千百万工人群众推出他们习惯的平常的轨道，它把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卷入政治，它促使他们革命化，这些有谁敢否认呢？当然，“民主主

义的和平主义”还不是克伦斯基统治，因为克伦斯基统治是以两个政权的并存为前提，即以资产阶级政权的瓦解和无产阶级政权基础的产生为前提的。但是，和平主义意味着人民群众的高度觉醒，他们被卷入政治；和平主义动摇着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为革命动荡准备条件，——这一点是未必可以怀疑的。正因为如此，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政权削弱，而不会使它巩固；一定会加速革命的到来，而不会使它无限期地延迟下去。

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和平主义对革命不是严重的危险。和平主义会破坏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它为革命准备有利条件。但是，只有**违反**“和平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本身的意志，只有**在**共产党对赫里欧—麦克唐纳的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政权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本质进行有力的揭露工作的**条件**下，和平主义才能产生这种结果。至于和平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本身的意志，至于帝国主义分子本身的政策，那末他们奉行和平主义只是追求一个目的：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用和平这种响亮的词句来欺骗群众；为了确立资产阶级的专政而用“民主主义”的光辉来眩惑群众；为了更有效地准备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在阿富汗和苏丹进行屠杀，瓜分波斯，而用关于民族和国家的“主”权的高调来麻醉群众；为了同那些被驱逐出俄国的反革命阴谋家更紧密地勾结起来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进行土匪式的骚扰，而用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同苏维埃政权缔结某些“条约”这种冠冕堂皇的废话来愚弄群众。资产阶级需要和平主义是为了打掩护。和平主义的主要危险就在于这种掩护作用。资产阶级能不能达到欺骗人民的目的，这取决于西方和东方的共产党进行揭露工作的能力，取决于西方和东方的共产党摘下穿着和平主义法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假面具的本领。毫无疑问，事变和实践在这方面将有利于共产党员，因为它们将暴露出资本的民主主义奴仆的和平主义**言论**和他们的帝国主义**行动**是不符合的。共产党员的任务就是不落后于事变，无情地揭

露第二国际各党为帝国主义效劳和背叛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行动。

二 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和协约国的伦敦赔款协定

协约国伦敦会议非常充分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的欺骗和虚伪。如果说麦克唐纳和赫里欧的上台执政和关于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的喧嚷是掩饰和隐蔽欧洲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国家对苏联的势不两立的敌意，那末协约国的伦敦协定就是掩饰和隐蔽英国和法国夺取欧洲领导权的殊死斗争、英国和美国在争夺世界市场的霸权中日益增长的矛盾以及德国人民反对协约国压迫的非凡斗争。麦克唐纳之流和列诺得尔之流叫喊说：阶级之间再也没有战争了，革命结束了，现在事情可以用阶级合作来了结了。伦敦协定的朋友们和背叛工人阶级事业的弟兄们，即和平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英雄们随声附和说：法国和英国之间、美国和英国之间、德国和协约国之间再也没有斗争了，战争结束了，现在事情可以用美国领导下的普遍和平来了结了。

但是在协约国伦敦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伦敦会议以前，赔款问题是由法国单独决定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取决于“盟国”的，因为法国在赔款委员会中占有可靠的多数。占领鲁尔是在经济上瓦解德国的手段，是法国从德国取得赔款，取得法国冶金工业用的煤炭和焦炭、法国化学工业用的化学半成品和颜料的保证，是亚尔萨斯的纺织品免税输入德国的保证。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领导权建立物质基础。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占领的方法只是产生了相反的结果。法国连稍微令人满意的数量的赔款或实物赔偿都没有得到。最后，占领的发起人彭加勒本人也由于他的孕育着新战争和革命的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而

被轰下台了。至于法国在欧洲的领导权所以没有实现，那末这不仅由于占领和公开掠夺的方法取消了法国工业同德国工业之间的经济结合的可能性，而且由于英国坚决反对这种结合，因为英国不会不知道，德国煤炭同法国金属的结合不会不破坏英国的冶金工业。

协约国伦敦会议提出了什么方法来代替这一切呢？

第一、会议摈弃了法国单独决定赔款问题的方法，认为争执的问题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的协约国代表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最后解决。

第二、会议反对占领鲁尔，认为必须进行经济撤退（立即）和军事撤退（一年后或一年内）。理由是：在现阶段占领鲁尔，从欧洲的政治情况来看是危险的，从有组织有步骤地掠夺德国来看是不合适的。而协约国是准备彻底地有步骤地掠夺德国的，——这一点是不必有任何怀疑的。

第三、会议摈弃了军事干涉，完全赞同进行财政经济的干涉，认为：

（甲）必须在德国设立由外国专员监督的发行银行；

（乙）把在外国专员监督下经营的国家铁路移交私人；

（丙）设立由协约国代表组成的所谓“移交委员会”，该委员会集中以德国货币支付的全部偿付金，分拨德国赔款总额中的实物赔偿部分，可以把某些偿付金（在这些钱交给法国不合适的情况下）投资到德国工业中去，从而获得掌握德国金融市场的充分机会。

未必用得着证明，这就是把德国变为协约国的殖民地。

第四、会议承认法国在一定期间有向德国强制取得煤炭和化学制品的权利，但是会议又附带说明，德国有向仲裁委员会要求减少甚至停止这种强制的实物赔偿的权利。这样就把法国的权利化为乌有，或者几乎化为乌有了。

如果再加上英国银行家和主要是美国银行家贷给德国的八亿马克借款，如果再注意到在会议上发号施令的是银行家，首先是美国银行

家，那末就会看到一个完整的情景：法国的领导权已经消失殆尽，法国的领导权为美国的领导权所代替了。

协约国伦敦会议的总结就是这样。

有些人根据这一点认为：今后欧洲内部的利害矛盾在美国领导权面前一定会减弱；关心向欧洲输出资本的美国为了使本国银行家大发其财，能够使欧洲各国仰其配给，并迫使它们唯命是听；因此，欧洲的和平，固然是强制的和平，可以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是比较有保障的。这种推想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一、会议是在主人即德国人民不在场的情况下解决德国问题的。当然可以“计划”把德国变成永久的殖民地。但是现在，连落后的殖民地都很难使之顺从的时候，企图把德国这样的国家变成真正的殖民地，那就是在欧洲埋下地雷。

第二、会议把推进太远的法国往后拉了一些，因此，英国自然而然在欧洲占了实际上的优势。但是认为法国能够容忍英国占优势，那就是不顾事实，不顾事物的逻辑，而事物的逻辑通常比任何别的逻辑都显得更有力量。

第三、会议承认了美国的领导权。但是美国资本所关心的是以资金供给法德工业，是最合理地利用法德工业，例如把法国的冶金工业和德国的煤矿工业联合起来。未必可以怀疑，美国资本正是在这个对它最有利的方面利用它的优越地位。但是认为英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不了解英国，不了解英国如何重视自己的冶金工业的利益。

最后，欧洲不是孤立的地区，它和自己的殖民地联系着，它靠榨取这些殖民地的脂膏活命。认为会议能使欧洲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好”转，会议能制止或延缓它们之间的矛盾的发展，那就是相信奇迹。

由此究竟得出什么结论呢？

结论只有一个：伦敦会议没有解决欧洲任何一个旧矛盾，反而给

旧矛盾添加了一些新矛盾，即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英国将用老办法来加深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对抗，以保证自己在大陆上的政治优势。毫无疑问，美国也将加深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对抗，以保证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领导权。至于德国和协约国之间极深刻的对抗，我就不谈了。

世界的事变将由这些对抗来决定，而不由该处绞刑的尤兹和爱吹牛的赫里欧的“和平主义”言论来决定。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规律，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效。伦敦会议只是掩饰这些对抗，为它们空前未有的尖锐化造成新的前提。

三　欧洲工人运动中革命因素的加强。苏联国际威信的提高

“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不稳固的一个最可靠的标志，这个“制度”本身是漂浮在工人阶级内部极深刻的革命过程上面的泡沫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应当认为是德国、法国和俄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的决定性胜利，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的积极性的提高，以及苏联在西方和东方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提高。

西方的共产党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第一、它们的成员是复杂的，因为它们是由受过旧的训练的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还没有受过足够的革命锻炼的年轻党员组成的。第二、那里的干部不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因为担任负责工作的是一些脱离其他党派的人，他们还没有彻底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断绝关系。第三、在它们面前有像阅历很深的社会民主党这样老练的敌人，这个敌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还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力量。最后，和它们对峙的有像欧洲资产阶级这样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拥有可靠的国家机关和万能的报刊。

如果认为这样的共产党“一夜工夫”就能够推翻欧洲的资产阶级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当前的任务是：使西方的共产党成员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些党内培养出能够以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精神、以准备革命的精神来改变整个党的实践的真正的革命干部。

还在不久以前，西方共产党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最近半年来情况开始好转了。最近半年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就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来说，就党的干部布尔什维克化来说，就孤立机会主义分子来说，在西方共产党的生活中起了根本变化。

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残余对革命会有什么危险，这在萨克森工人政府的惨痛经验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时机会主义首领们企图把统一战线思想这个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手段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议会活动的方法。这是唤醒党员群众并激起他们反对机会主义首领们的转折点。

破坏右派首领的威信而提拔新的革命的领袖的第二个问题应当认为是所谓“俄国”问题，即俄共（布）内的争论。大家知道，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和法国的苏瓦林集团坚决支持俄共（布）的机会主义反对派反对俄共（布）的主要干部，反对俄共（布）的革命的多数。这是对显然同情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者——俄共（布）的西方革命工人群众的挑战。这是对西方共产党的党员群众和革命派的挑战。无怪乎这种挑战的结果是布兰德勒集团和苏瓦林集团的彻底粉碎。无怪乎这个问题在西方其他一切共产党内得到了反应。如果再加上俄共（布）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完全孤立的事实，那末情况就全面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只是确认了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的革命派的胜利。

毫无疑问，机会主义首领们的错误在加速西方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最近几年来资本的顺利进攻，工人阶级生活条件

的恶化，失业大军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普遍的经济不稳定，广大工人群众中革命义愤的增长。工人正在走向革命，他们希望有革命的领袖。

总结：欧洲未来革命的支柱——西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最终**形成过程**开始**了。这就是最近半年的总结。

——————————————

西方工会的发展条件更艰难更特殊。

第一、它们局限于自己的“试验过的”行会实践并敌视社会主义，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建立以前产生的，是在没有社会主义政党帮助之下发展起来的，它们惯于以自己的“独立性”自傲，把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除了“在一个卢布上加几个戈比”以外什么也不愿意承认。

第二、它们在精神上保守并敌视一切革命创举，因为领导它们的是旧的、卖身求荣的、受资产阶级豢养的工会官僚，这些人随时准备使工会为帝国主义效劳。

最后，这些工会团结在阿姆斯特丹改良主义者的周围，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依恃的一支千百万人的改良主义军队。

当然，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反动工会，还有靠近工会国际的革命工会。但是，第一、相当一部分革命工会不愿造成工会运动的分裂，仍旧留在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第二、在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中，阿姆斯特丹分子仍然代表着工人的多数。不应当忘记，阿姆斯特丹团结着不下一千四百万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工人。如果认为可以**违反**这千百万工人的意志而在欧洲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离开了列宁主义的基础，使自己必然遭到失败。因此，任务在于把这千百万群众争取到革命和共产主义方面来，使他们摆脱反动的工会官僚的影响，或者至少做到使他们对共产主义采取善意的中立立场。

最近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最近几年来情况开始好转了。曾

经在世界市场上掌握工业资本主义领导权的英国是闭关自守的反动工会的故乡。这种垄断权的失落是同财政资本的发展相关联的，因为财政资本的特征是许多大国争夺殖民地垄断权。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为狭隘的反动工会扩大了**地区**，但是却缩小了反动工会的物质基础，因为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是许多国家争夺的对象，而殖民地却越来越不甘心继续处于殖民地的地位。也不应当忘记，战争大大地破坏了欧洲的生产。大家知道，现在欧洲的生产总额不超过战前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因此，生产缩减，资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取得胜利。因此，工资减少，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被取消，再一次表明工会官僚背叛工人阶级的许多次防御性的罢工遭到失败。因此，大批工人失业，工人对反动工会的不满日益加剧。因此，产生了工人阶级在经济斗争方面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把两个工会国际联合成一个能够对资本组织反击的工会国际的计划。改良主义者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六月）上关于同“俄国”工会进行谈判的讲话和英国工会在工联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九月初）上关于工会统一的号召，只是反映了群众对反动的工会官僚的压力日益加强。在这一切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应该认为是下面的事实：正是英国工会这个保守主义的巢穴和阿姆斯特丹的基本核心倡议把反动的工会和革命的工会联合起来。英国工人运动中左的因素的出现是说明“在他们那里”，即在阿姆斯特丹并不是诸事如意的最可靠的标志。

有些人认为联合工会的运动正是目前所必需的，因为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绝对**需要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予以支持的左的因素。这是不对的，或者确切些说，这只有一部分是对的。问题在于西方的共产党正在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它们正在变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它们正在随着广大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的增长而发展起来并准备夺取政权，因而形势正在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但是不使资产阶级失去反动的阿姆斯特丹这个支柱，要推翻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不把阿姆斯特丹这

个资产阶级的堡垒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要取得专政是不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外面的工作是不行的。在目前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在保证工会运动的统一方面进行里外配合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关于工会的联合和加入各国际生产联合组织的问题就成为迫切的问题了。支持和推动左派前进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只有不把革命工会的旗帜卷起来，只有斥责反动的阿姆斯特丹首领们的背叛和分裂行为，只有批评左派首领们在对反动首领的斗争中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决性，才能有对左派的真正支持。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够准备工会的真正联合。否则就会发生和去年十月在德国发生过的同样情况，当时列维左派集团被反动的右派社会民主党巧妙地利用来包围德国的革命工人。

——————————————

最后，谈谈苏联在资产阶级国家人民中的声望的提高。也许“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不稳固的最可靠的标志应当认为是下述明显的事实：苏联在西方和东方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逐年逐月地提高。问题不在于苏联得到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承认”。这种“承认”本身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第一、它是由力图在苏联市场上占得“自己的地盘”的各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主义竞争的需要促成的，第二、它是由要求和苏维埃国家建立“正常关系”，至少和苏联签订某种“条约”的和平主义的“纲领”促成的。问题在于现在的“民主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由于有“承认”苏联的政纲而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了资产阶级竞选者，麦克唐纳之流和赫里欧之流由于（除其他原因外）常把“和俄国友好”挂在嘴边而掌握了政权并能继续执政，这些“民主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威信是苏维埃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连墨索里尼这样有名的“民主主义者”也认为必须经常在工人面前拿和苏维埃政权“友好”来炫耀自己。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像现在的日本当

权者这样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掠夺别人财物的人也不愿意不和苏联“友好”了。至于苏维埃政权在土耳其、波斯、中国和印度人民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那就更不用说了。

像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个“专政的”和革命的政权，为什么在别国人民群众中有这种空前的威信和这种非常的声望呢？

第一、因为工人阶级厌恶资本主义，他们渴望摆脱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同情苏维埃政权，这首先因为它是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政权。英国铁路员工的代表，并非无名的布朗雷不久以前在工联代表大会上说：

“资本家们知道，全世界工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俄国，既然俄国革命会胜利，那末其他国家觉悟的工人就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地消灭资本主义呢？”

布朗雷当然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他所说的话却表达了欧洲工人的期望和想法。的确，既然“俄国人”没有资本家也已经过了六年多，而且过得很好，那末，为什么不能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在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中有极大声望的根源。因此，苏联国际声望的提高意味着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厌恶的加深。

第二、因为人民群众厌恶战争，他们渴望粉碎资产阶级的战争计划。人民群众知道，苏维埃政权首先向帝国主义战争展开了攻击，因而加速了战争的结束。人民群众看到，苏联是进行反对者战争的斗争的唯一国家。他们同情苏维埃政权，因为它是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旗手，是反对战争的可靠支柱。因此，苏维埃政权国际声望的提高说明了全世界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其组织者的厌恶的加深。

第三、因为附属国和殖民地的被压迫群众厌恶帝国主义的枷锁，他们渴望粉碎这个枷锁。苏维埃政权是粉碎“本国”帝国主义锁链的唯一政权。苏联是根据各民族平等合作的原则建设自己生活的唯一国家。苏联政府是世界上坚决捍卫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国以及全

世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一和独立、自由和主权的唯一政府。被压迫群众同情苏联，因为他们认定苏联是他们在摆脱帝国主义的事业中的同盟者。因此，苏维埃政权国际声望的提高意味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厌恶的加深。

事实就是这样。

未必可以怀疑，这**三种厌恶**是不会巩固现代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的。

前几天，美国外交部长、“和平主义者”、高尔察克的支持者尤兹发表了一篇反苏的黑帮宣言。毫无疑问，彭加勒的桂冠使尤兹睡不着觉了。但是未必可以怀疑，尤兹的黑帮和平主义的宣言只会进一步加强苏联在全世界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

说明目前国际形势的主要问题就是这样。

载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一期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6卷第198—211页

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

（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因为前面几位同志已经很详细地谈到了农村工作，所以我只就目前形势的特点发表几点意见。

从农民的状况来看，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是：我们在把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旧资本，即精神资本，已经开始枯竭。有些同志说：“为什么叫嚷起农民工作来呢？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农民，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农民，——这种关于农民的叫嚷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来这些同志不了解我们党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废除余粮收集制时期所积蓄起来的旧的精神资本已经快要用光了。他们不了解现在我们需要新资本。我们必须在新的斗争条件下为党创造一笔新资本。我们必须重新争取农民。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帮助农夫打倒了地主并得到了土地，我们结束了战争，沙皇已经没有了，沙皇的爪牙也同沙皇一起被打倒了，——关于这一切，农民已经忘掉了。现在靠这一笔旧资本，已经不能维持多久了。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了解新环境中，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何事物。我们要重新争取农民，——这就是我国内部状况的第一个特点。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重新谈到农民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谈得有点迟了。

第二个特点是：在这个时期内，我国的主要阶级——工人和农民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成了另一种样子了。从前无产阶级是丧失阶级性的，散漫的，而农民则殷切希望保持住从地主那里剥夺来的土地并

赢得对地主战争的胜利。从前的情况是这样，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战争再也没有了。工业在增长。农业在发展。现在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丧失阶级性的工人阶级，而是文化和需求日益提高的健壮的无产阶级了。至于农民，它已经不是深恐丧失土地而甘愿牺牲一切来摆脱地主压迫的受折磨的旧农民了。它已经是一个自由的积极的新阶级，它已经忘掉了地主，它现在关心的是获得廉价的商品和以高价出卖自己的粮食。它的特征是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现在已经不可以说：“党会料理好一切”，“党会给大家安排好一切”。这样的话现在农民不懂，工人更不懂。现在必须更加深入群众，必须比过去更多地进行说明、解释和说服。现在必须重新争取千百万非党员的信任，必须从组织上，首先通过苏维埃来巩固这种信任。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积极性要求这样做。

但是不仅阶级发生了变化，斗争场所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斗争场所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从前引起斗争的是什么问题呢？是需要余粮收集制还是不需要？更早以前是需要地主还是不需要？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地主和余粮收集制再也没有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地主和余粮收集制，而是粮食价格了。这是一个广阔而又非常复杂的崭新的斗争场所，需要认真研究和认真斗争。现在的问题甚至不在于税收，因为只要粮食价格有“足够的提高”，布匹和其他工业品的价格有“足够的”降低，农民是会纳税的。现在的基本问题是市场以及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问题。

请看哥美里省省委书记给中央的报告：

“有三个乡发生群众拒绝接受税单的事件。纳税速度比应有的速度慢了三分之二。召开过的非党的乡代表会议开得都很激烈，以致有的不得不中途闭会，有的提出了修正案：请求中央减税和提高粮价。我不知道其他省份的情况怎样，但是我们省的情况和你（即我）在最近那封不公开的信中所做的那些结论是不相符的。我们的地方工作人

员的情绪不大好。农村好像受了惊动的蜂房，纷纷谈论税收和粮价。”

西伯利亚、东南区、库尔斯克省、土拉省、下新城省、乌里杨诺夫斯克省和其他省份也送给中央同样的报告。

所有这些报告的意义是：我们的价格政策使农民感到困难，他们想削弱甚至抛掉实行这个价格政策的杠杆，可是没有这种杠杆，我们的工业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农民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们惟恐把工业品的价格降低到极点，你们害怕外国商品充斥，因此，你们筑起重重的关税壁垒来保护我国年轻的工业不受竞争的侵袭，但是你们的工业和我毫不相干，我需要的是廉价的商品，不管这些商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还说：“你们害怕提高粮价，惟恐破坏工资制度，因此，你们发明了各种收购机关，建立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等等，但是你们的壁垒与杠杆和我毫不相干，我需要的是提高粮价。”

这就是价格政策方面的斗争的意义。

最近的格鲁吉亚暴动特别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暴动当然是虚假的，但是在某些县，特别是在古里亚县，这种暴动无疑是具有群众性的。古里亚农民争取的是什么呢？是廉价的商品和提高玉蜀黍的价格。古里亚和西方国家接壤，当地的人看到外国商品比我们苏维埃商品便宜，于是希望我们商品的价格至少减低到和外国商品的价格一样，或者是玉蜀黍的价格提高到保证购买苏维埃商品不吃亏的程度。格鲁吉亚古里亚县暴动的经济基础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这个暴动证明整个苏维埃国家正处在新的斗争条件下。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格鲁吉亚的暴动和唐波夫的暴动混为一谈，因为后者涉及的不是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问题，而是取消余粮收集制的问题。

在市场上和在农村中煽动对苏维埃价格政策进行这个新斗争的是富农、投机分子和其他反苏维埃分子。这些人竭力使千百万农民群众脱离工人阶级，藉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因此，我们的任务是

孤立富农和投机分子，使劳动农民脱离他们并吸引劳动农民参加苏维埃建设，从而给劳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开辟一条出路。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已经在这样做，因为劳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农愿意同工人建立联盟，愿意保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愿意保存专政所赖以支持的那些经济杠杆。

为此必须做些什么呢？首先必须关心到在农村党的周围培养大批能够把我们党同千百万农民连接起来的非党农民干部。否则就谈不上使农民脱离富农和投机分子，就谈不上争取千百万农民并把他们巩固在党的周围。这当然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困难不能成为我们不可克服的障碍。必须把数百个也许数千个（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能够发动和培养非党农民积极分子的、熟悉农村的、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派到农村去帮助我们的支部。同时应当考虑到农民对城里人的那种自然的不信任的心理，这种不信任的心理还在农村中存在，而且大概不是很快就会消失的。你们知道，农民对待城里来的人，特别是对待很年轻的人总是这样：“从城里又来了一个二流子，他是要骗我们的。”这是因为农民最相信的是那些自己经营农业并且多少懂得农业的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农村工作的中心应当是培养党可以从中汲取新力量的农民积极分子。

但是怎样进行这个工作呢？据我看来，为此首先必须使苏维埃活跃起来。必须吸引所有生气勃勃的、诚实的、觉悟的、有首创精神的人，特别是过去的红军战士（他们是农民中最觉悟最有首创精神的人）参加苏维埃工作。为什么正是参加苏维埃工作呢？第一、因为苏维埃是政权机关，而吸收劳动农民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是党的当前任务。第二、因为苏维埃是工农结合的机关，是工人领导农民的机关，而工人领导农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第三、因为地方预算是在苏维埃中编制的，而预算是农民的切身问题。最后，因为苏维埃是农民情绪的最可靠的晴雨表，而倾听农民的呼声是绝对必要的。农村

中也有其他极为重要的非党组织，例如农民互助委员会、合作社、共青团组织等。然而危险的是：这些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可能脱离工人的纯农民联合会。为了使这种情况不致发生，必须把这些组织的工作统一在苏维埃中，因为苏维埃的结构本身保证了工人对农民的领导。因此，现在当农民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的时候，使苏维埃活跃起来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不久以前，我在农村支部会议上号召同志们无情地批评我们党的农村工作的缺点。这引起了某种不满。原来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害怕批评，不愿意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同志们，这是危险的。说得重一些：害怕自我批评或非党员的批评是现在最危险的病症。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自己批评自己，并让非党员严厉地批评我们的工作，那末就可以指望把我们的农村工作向前推进；或者我们不允许有这样的批评，那末就会有喀琅施塔得、唐波夫、格鲁吉亚的暴动这类事件来批评我们。我认为我们宁愿采取第一种批评而不采取第二种批评。因此，我们不应当害怕党员的批评，更不应当害怕非党员的批评。

第一次载于约·斯大林
“农民问题”一书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6卷第220—224页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同志们！在加米涅夫做了详细的报告以后，我要讲的话就不多了。因此，我只来揭露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所散布的关于十月起义、关于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作用、关于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等等的某些奇谈。在这里我也想谈谈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特殊思想体系和因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而产生的党的任务。

一　关于十月起义的一些事实

首先来谈谈十月起义。有人在党员中间加紧散布谣言，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曾经反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举行起义。他们老是说，十月十日，当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的时候，大多数中央委员最初反对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工人闯进中央委员会的会场说：“你们决定反对起义，但是我告诉你们，不管怎么样，起义终究是要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受到这样的威胁以后似乎害怕了，于是重新提出了起义问题，通过了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

同志们，这不单是谣言。有名的约翰·里德在他的“十日”一书中就写到这件事。约翰·里德离我们党很远，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十月十日秘密会议的经过，因而就上了苏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编造的谣言的当。这个故事后来在托洛茨基分子所写的许多小册子中传述和重复着，最近出版的塞尔金所写的论述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便是其中的一本。

这些谣言在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未必用得着证明，诸如此类的阿拉伯故事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些荒谬的谣言置之不理。

一般说来，在反对派分子或者离党很远的人的办公室里所编造的谣言还少吗？我们以前确实没有注意到像约翰·里德那样的错误，也没有设法纠正这些错误。但是在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发表以后，对这些奇谈已经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因为现在有人正力图用这些奇谈来教育青年，并且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效果。因此，我必须拿真正的事实来驳斥这些荒谬的奇谈。

现在拿我们党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二十三日）的会议记录来看。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科隆泰、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洛莫夫。讨论关于目前形势和起义的问题。讨论以后，表决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决议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看来很清楚：中央委员会是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决定立即转入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的。就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

事实就是这样。

这些记录一下子就揭破了某些奇谈。这些记录揭破了说大多数中央委员似乎反对起义的那种奇谈。这些记录也揭破了说中央委员会在起义问题上似乎面临分裂的那种奇谈。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赞成起义的同志一样参加了起义的政治领导机关。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分裂。

托洛茨基肯定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我们党内的右翼，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

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我们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既然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怎么还是被党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还是被选进了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等等？列宁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无情在党内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党知道，列宁一分钟也不会同意把有社会民主主义情绪的同志留在党内，何况是把他们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党没有发生分裂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尽管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还都是站在布尔什维主义共同基础上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个共同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在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农民的作用、党的领导原则等等基本问题上的观点的一致。没有这种共同的基础，分裂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分裂所以没有发生，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

现在来谈谈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奇谈。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紧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是十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领导者。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特别卖力地散布这些谣言。托洛茨基自己经常不提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抹杀这些组织在起义中的领导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义的中心人物，有意无意地帮助散布关于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谣言。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苏汉诺夫一类的庸人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事实，真正的事实却完全证实了我的说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央紧接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二十九日）举行的会议的记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加上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军事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和铁路员工的代表。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外，还有克雷连柯、绍特曼、加里宁、沃洛达尔斯基、

施略普尼柯夫、拉齐斯等等，共二十五人。讨论起义的纯粹属于实际组织方面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以二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三票弃权。选出了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哪些人呢？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五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实践总部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由此可见，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可惊的”事情，即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能符合呢？无论苏汉诺夫怎么说，无论托洛茨基分子怎么说，这一切都有些“奇怪”，这难道不对吗？但是，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在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负责工作人员一样，只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的意志的执行者。谁熟悉布尔什维克的党的领导实质，谁就不难了解事情只能是这样：只要托洛茨基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他就会失掉对事物进程的影响。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说法是喜欢效劳的“党的”长舌妇所散布的奇谈。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起义没有鼓舞者。不，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就是这个列宁，他提出的决议案在中央委员会决定起义问题时被通过了，就是这个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武断相反，地下状态并没有阻碍他成为起义的真正鼓舞者。现在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领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

事实就是这样。

有人对我们说：就算是这样，但是总不能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吧。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

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总之，我应当说，在敌人陷于孤立而起义趋于高涨的胜利的起义时期，会打仗并不难。在这种时候连落后的人也会成为英雄。

但是，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不间断的进攻，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无产阶级斗争也有困难和失败。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些在胜利起义时期表现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胜利进攻时很会打仗，在革命退却时期，在无产阶级失败时期也能够表现勇敢的人，是那些在革命失利时，在敌人胜利时不失去理智、不畏缩后退的人，是那些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张皇失措、不悲观失望的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时期支持布尔什维克，打得也不坏。但是谁不知道，这些“英勇的”战士在布列斯特时期就张皇失措了，当时德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他们悲观失望，歇斯底里了。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革命暂时失利时期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在这个困难关头表现出充分的坚定而不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后尘，这是非常可悲的，但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无可争辩，这是个困难关头，需要表现出特别的勇敢和高度的冷静，才不致张皇失措，才能及时退却，及时接受和约，把无产阶级的军队从德帝国主义的打击下撤出来，保存农民的后备力量，从而取得喘息时机，然后再以新的力量去打击敌人。但是，很遗憾，托洛茨基在这个困难关头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敢和这种革命的坚定性。

照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教训是：在十月革命时要“不畏缩后退”。这不对，因为托洛茨基的这种说法只包含革命教训的**一小部分**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教训的**全部**真理是：不仅在革命进攻的日子里要“不畏缩后退”，而且在革命退却的日子里，当敌人占上风而革命失利的时候，也要“不畏缩后退”。革命不以十月革命为限。十月革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如果在起义日趋高涨的时候畏缩

后退，那是不好的。如果在取得政权以后，革命遭到严重困难的时候畏缩后退，那就更坏了。在革命的第二天保住政权，和夺取政权同样重要。既然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我国革命遭到严重困难的时期，情势发展到几乎要“交出”政权的时候，托洛茨基表现畏缩后退，那末他自己就应当明白，这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十月错误是毫不相干的。

关于十月起义的奇谈问题就是这样。

二 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

现在来谈谈十月革命的准备问题。

听了托洛茨基的话，会使人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在三月到十月的整个准备时期只是踌躇不决，被内部的矛盾所腐蚀，百般阻挠列宁，如果不是托洛茨基，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会有怎样的结局。听了托洛茨基关于党的这些奇怪言论，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为托洛茨基在文集第三卷的同一“序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党”，“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既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不中用，而“绕过党”看来又决不可能取得胜利，那末老天爷自己也不了解我们的革命如何能够取得胜利了。但是，托洛茨基以奇谈妙论款待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应当认为，关于我们党的那些可笑言论是属于托洛茨基通常发表的奇谈妙论一类的。

现在我们按时期来简单地看一看十月革命准备的历史。

（一）**党的新方针时期（三月至四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

（甲）沙皇制度被推翻；

（乙）临时政府成立（资产阶级专政）；

（丙）工兵代表苏维埃出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丁）两个政权并存；

（戊）四月游行示威；

（己）政权的第一次危机。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同时并存，而且后者对前者抱着信任态度，相信前者的和平意图，自愿地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因而使自己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两个专政之间还没有严重的冲突。相反地，却有“联系委员会”存在。

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转变，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空前的变化。直接推翻政府，这个革命以前的旧政纲是很明确的，但是它已经不适合新的斗争条件了。现在已经不能直接去推翻政府，因为它和处于护国派影响下的苏维埃联系着；现在如果直接去推翻政府，党就不得不进行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苏维埃的力不胜任的战争。但是也不能实行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因为它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党必须有新方针。党（党的多数）就探寻这个新方针。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个不彻底的政策是指望使苏维埃在和约的具体问题上认清临时政府的真正帝国主义本质，从而使苏维埃离开临时政府。然而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需要有新方针。列宁在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纲中向党提出了这个新方针。我不来多谈这个提纲，因为这个提纲是尽人皆知的。当时党和列宁之间是不是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这些意见分歧延续了多久呢？不到两个星期。通过列宁提纲的彼得格勒组织的市代表会议（四月下半月）是我们党的发展中的转折点。全俄四月代表会议（四月底）只是在全俄范围内完成了彼得格勒代表会议的事业，把十分之九的党员团结在

党的统一的立场的周围。

在七年后的今天，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把这些意见分歧描绘成几乎是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两个党的斗争。但是，第一、托洛茨基在这里无耻地把事情夸大了，因为这些意见分歧丝毫没有引起布尔什维克党的震动。第二、如果我们党不容许在自己成员中间有不同的意见，那末我们党就是帮会，而不是革命政党了，而且大家知道，在过去，例如在第三届杜马时期，我们也曾有过意见分歧，但是那并没有妨碍我们党的团结。第三、不妨问一下，**现在**得意洋洋地对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的托洛茨基自己**当时**采取了什么立场呢？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硬说，托洛茨基的美国来信（三月）“完全先知”列宁的成为他的四月提纲基础的“远方来信”（三月）。居然这样说：“完全先知。”这种比拟托洛茨基并没有反对，大概是很感激地接受了。但是，第一、托洛茨基的信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结论上“完全不像”列宁的信，因为托洛茨基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只要看一看这两类信，就会相信这一点。第二、列宁在他从国外回来后的第二天就认为必须同托洛茨基划清界限，这该怎样解释呢？列宁不止一次地声明，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企图“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这个口号就是“以工人政府夺取政权为儿戏”[①]，这有谁不知道呢？

在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提纲和托洛茨基的“以夺取政权为儿戏”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方案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人们这样把小茅舍

——————————————

①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八页和第二十九页，并见在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一七年四月中旬和四月底）。——著者注

同勃朗峰相比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连茨涅尔要这样冒险地给关于我国革命的一堆旧的奇谈再加上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美国来信“先知”列宁有名的“远方来信”的奇谈[①]呢？

——————————————

① 应当列入这一类奇谈的还有一种散布很广的说法，说托洛茨基似乎是国内战争各个战线上胜利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组织者”。同志们，为了揭示真相，我应当声明，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十分坚决地声明，我们胜利的组织者的崇高荣誉不属于个别人物，而属于我国先进工人的伟大集体——俄国共产党。举几个例子也许不是多余的。你们知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认为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敌人。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只有在战胜这些敌人以后才能自由呼吸。而历史证明，我们军队击溃这两个敌人，即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违反**托洛茨基的计划的。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一）**关于高尔察克**。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夏天。我们的军队向高尔察克进攻，并在乌发附近作战。中央委员会开会。托洛茨基建议停止沿白河线（乌发附近）进攻，让乌拉尔留在高尔察克手里，把一部分军队从东方战线撤出来调到南方战线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央委员会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认为不能让乌拉尔和它的工厂以及铁路网留在高尔察克手里，因为他在那里容易重整旗鼓，纠集兵力并重新出现在伏尔加河；必须先把高尔察克驱逐出乌拉尔山脉，赶到西伯利亚草原去，只有这样做以后才能把力量调往南方。中央委员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计划。托洛茨基提出辞职。中央委员会不接受辞职。拥护托洛茨基计划的总司令瓦采齐斯辞职了。他的职位由新的总司令加米涅夫接替。从这个时候起，托洛茨基不再直接参予东方战线的事务。

（二）**关于邓尼金**。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向邓尼金的进攻没有成功。包围马蒙托夫（马蒙托夫的袭击）的“钢圈”显然被突破了。邓尼金拿下库尔斯克。邓尼金逼近奥勒尔。托洛茨基从南方战线上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央委员会认为情况危急，决定召回托洛茨基，派新的军事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去。新的军事工作人员要求托洛茨基“不干预”南方战线的事务。于是托洛茨基不再直接参预南方战线的事务。南方战线的各个战役，直到我们拿下顿河岸罗斯托夫和敖德萨，都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

让他们来试试推翻这些事实吧。——著者注

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①]。

（二）**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时期（五月至八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

（甲）彼得格勒的四月游行示威，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联合政府成立；

（乙）俄国各主要中心的以“民主的和平”为口号的五一游行示威；

（丙）彼得格勒的以“打倒资本家部长！”为基本口号的六月游行示威；

（丁）前线的六月进攻和俄国军队的失利；

（戊）彼得格勒的七月武装游行示威，立宪民主党人部长退出政府；

（己）反革命军队从前线调回，“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反革命同苏维埃进行斗争，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联合政府成立；

（庚）我们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准备武装起义的口号；

（辛）反革命的国务会议和莫斯科的总罢工；

（壬）科尔尼洛夫进攻彼得格勒失败，苏维埃活跃，立宪民主党人辞职，“执政内阁”成立。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尖锐化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的那种不稳固的均势打破了。这种均势，不论是好是坏，在前一时期是存在的。两个政权并存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了。“联系委员会”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已面临末日。“政权危机”和“更换阁员的把戏”已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话。前线的危机和后方的破坏加强了两端的侧翼，从两方面对护国派妥协分子施加压力。革命动员起来了，因而

——————————————

① 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描写熊为隐士效劳，用大石头驱除隐士头上的苍蝇，结果反把他打死。——译者注

引起了反革命的动员。反革命又转过来激发革命，引起革命来潮的新浪潮。政权转归新的阶级的问题成了当时的迫切问题。

当时在我们党内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但是同企图发现党内“右”翼和“左”翼的托洛茨基的说法相反，这种意见分歧仅仅是实际问题上的分歧。就是说，这是这样一种意见分歧，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活跃的党的生活和真正的党的工作。

托洛茨基硬说彼得格勒的四月游行示威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这是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它谴责了一些同志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和军队中还占少数的时候要逮捕临时政府的企图。如果托洛茨基不是根据苏汉诺夫的看法，而是根据真实的文件来写十月革命的“历史”，他就不难相信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

托洛茨基断言“根据列宁的倡议”准备在六月十日举行游行示威的意图被中央委员会的“右派”委员责备为“冒险主义”，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不是根据苏汉诺夫的看法来写，他就一定知道，六月十日游行示威是在列宁完全同意下延期的，而且列宁在大家知道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长篇演说（见彼得格勒委员会记录）中是认为必须延期的。

托洛茨基说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悲剧性”意见分歧是由七月武装游行示威引起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某些成员“想必把七月事件看做有害的冒险行为”，这简直是捏造。托洛茨基当时还没有参加我们中央委员会，他当时只是我们的苏维埃委员，当然不一定知道中央委员会只是把七月游行示威看做试探敌人力量的方法，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不愿意也不打算在首都的苏维埃还拥护护国派分子的时候把游行示威变为起义。个别布尔什维克确实由于七月的失败而灰心，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就知道当时被捕的布尔什维克之中有人竟准备离开我们的队伍。但是由此做出

不利于某些似乎是“右派”，似乎是中央委员的人的结论，这就是无耻地歪曲历史。

托洛茨基声言，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在党的一部分上层分子中暴露出同护国派联盟的趋向，支持临时政府的趋向，这是不正确的。这里指的当然是使托洛茨基睡不着觉的那些似乎是“右派”的人。托洛茨基是不正确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像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这样的文件可以驳倒托洛茨基的说法。托洛茨基援引了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警告不要支持克伦斯基的信。但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列宁的信，不了解这些信的意义和使命。列宁在他的信中有时候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错误提到首位，预先批评这些错误，目的是警告党，防止党犯错误；他有时候夸大“小事情”，“把苍蝇说成大象”，这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党的领袖，特别是当他处在地下状态的时候，只能这样做，因为他应当比自己的战友看得远一些，他必须对每一个可能犯的错误，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敲起警钟。但是从列宁的这样一些信（他有不少这样的信）中做出关于“悲剧性”意见分歧的结论，并且对这一点大加宣扬，这就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懂得列宁。托洛茨基有时候犯了很大的错误，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中央委员会内部根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

七月失败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之间在苏维埃的命运问题上确实发生过意见分歧。大家知道，列宁希望把党的注意力集中到在苏维埃外面准备起义，警告不要迷恋苏维埃，他认为被护国派玷污了的苏维埃已经变成空架子了。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采取了更谨慎的路线，做出决定说，没有根据认为使苏维埃活跃起来是不可能的。科尔尼洛夫的发动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意见分歧对党没有重大影响。列宁后来承认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没有抓住这个意见分歧，也没有把它夸大到“惊人的”程度。

团结一致的党成了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景。

（三）**组织冲击的时期（九月至十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

（甲）民主会议的召开，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思想的破产；

（乙）莫斯科苏维埃和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

（丙）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反对军队撤出的决定；

（丁）党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关于武装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委员制度的建立；

（己）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发动和临时政府阁员的被捕；

（庚）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夺取政权，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人民委员会。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迅速加剧，执政集团张皇失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动摇分子大批投向布尔什维克。应该指出这个时期革命策略的一个奇异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革命进攻的每一个步骤，或者几乎每一个步骤，都竭力在防御的形式下进行。毫无疑问，拒绝从彼得格勒撤出军队是革命进攻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这个进攻是在保卫彼得格勒以防外敌可能的进攻的口号下进行的。毫无疑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对临时政府进攻的一个更重要的步骤，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在建立苏维埃对军区司令部的行动的监督的口号下实现的。毫无疑问，卫戍部队公开转向军事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治委员网的建立标志着起义的开始，但是这些步骤都是在保卫彼得格勒苏维埃以防反革命可能的发动的口号下进行的。革命似乎用防御的外貌来掩盖自己的进攻行动，以便更容易地把不坚定的动摇的分子拉到自己方面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时期的演说、

文章和口号在外表上都带有防御性质，而在内容上却具有深刻的进攻性质。

这个时期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并且是相当重大的。起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我已经谈过了。这些意见分歧在中央委员会十月十日和十六日的会议记录中完全反映出来了。因此，我不再重复过去已经讲过的话。现在必须谈谈下面三个问题：关于参加预备国会，关于苏维埃在起义中的作用和关于起义的日期。因为托洛茨基只想显露头角而“无意中”歪曲了列宁对后面两个问题的立场，所以就更需要谈谈这三个问题。

毫无疑问，预备国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具有严重性质的。所谓预备国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帮助资产阶级把苏维埃排挤到后面去，奠定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基础。预备国会在革命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变证明这个目的是实现不了的，而预备国会本身则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流产儿。但是很明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预备国会正是追求这个目的。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参加预备国会会有什么意义呢？只会使无产阶级群众看不清预备国会的真面目。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列宁在他的信中激烈地抨击主张参加预备国会的人。参加预备国会无疑是严重的错误。

但是，如果像托洛茨基那样认为主张参加预备国会的人是为了进行正常的工作，是为了“把工人运动引导”“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而参加预备国会的，那就错了。这完全不是事实。这是谎话。如果这是事实，党就不能用退出预备国会这种表示抗议的方法来“一下子”消除这个错误。我们党瞬息之间就纠正了这个错误，这是我们党的生命力和革命威力的一种表现。

其次，让我来纠正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在关于解决预备国会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的叙述中夹杂的一个小小的不确

切的地方。连茨涅尔说，这个会议上的报告人有两个——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报告人有四个：两个主张抵制预备国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主张参加预备国会（加米涅夫和诺根）。

当托洛茨基提到列宁在起义形式问题上的态度时，他的说法更糟。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列宁认为党在十月起义时应当“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来夺取政权。托洛茨基然后又来批评这个硬加在列宁身上的胡说，他“手舞足蹈”，最后还说了一句宽容的话：“这或许是一个错误吧。”托洛茨基在这里造列宁的谣，他在歪曲列宁对苏维埃在起义中的作用的看法。可以引证一大堆文件来证明列宁曾经建议要**通过**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或莫斯科苏维埃）而不要**背着**苏维埃来夺取政权。托洛茨基为什么要编造这种非常奇怪的关于列宁的奇谈呢？

当托洛茨基“分析”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在起义日期问题上的态度时，他的说法并不好些。托洛茨基在叙述中央委员会十月十日的有名会议时，肯定说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起义不得迟于十月十五日举行的决议”。这样说来，中央委员会规定了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十五日，后来自己又破坏了这个决定，把起义日期拖延到十月二十五日了。这是不是事实呢？不，不是事实。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时期内只通过了两个关于起义的决议——十月十日的决议和十月十六日的决议。现在我们来读一下这两个决议。

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增长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窒息俄国革命而媾和[①]的威胁）和军事状况（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

———————————————

① 显然，这可能是“单独媾和”。——斯大林

斯基及其同伙已经明确地决定把彼得堡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堡、哥萨克调入彼得堡、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指示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个观点出发去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等）。”

十月十六日有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

“会议十分拥护并完全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号召全体工人和士兵全面地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表示完全相信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

你们看，托洛茨基竟把起义的日期和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决议忘记了。

托洛茨基断言，列宁对苏维埃的合法性估计不足，列宁不了解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十月二十五日夺取政权的重大意义，似乎正因为如此，列宁曾坚持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夺取政权，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不是事实。列宁是根据两个原因建议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夺取政权的。第一、因为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让出彼得格勒，这就会使高涨的起义受到挫折，因此每一天都是宝贵的。第二、因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公开**规定并公布起义日期（十月二十五日）的错误，只能用在这个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来纠正。因为列宁把起义看做艺术，他不会不知道，敌人晓得了起义日期（由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不谨慎），一定要竭力准备对付这一天，所以必须抢在敌人前面，就是说，一定要在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列宁在他的

信中痛斥了日期（十月二十五日）拜物教徒。事变证明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起义是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前开始的。大家知道，政权实际上是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夺取的，而且夺取政权的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只是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把政权**接受过来**。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合法性的意义的长篇大论完全是多余的。

生气勃勃而强有力的党领导着革命群众去冲击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就是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状况。

关于十月革命准备的奇谈问题就是这样。

三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所散布的有关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准备的许多反党的和关于列宁的奇谈。我们揭穿了和驳斥了这些奇谈。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托洛茨基为什么要编造所有这些关于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准备、关于列宁和列宁的党的奇谈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需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

托洛茨基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研究”十月革命所必需的。但是，难道不再一次侮辱党和党的领袖列宁就不能研究十月革命了吗？这部十月革命的“历史”从头至尾都在破坏十月起义的主要活动家的威信，破坏组织和举行这次起义的党的威信，这算什么十月革命的“历史”呢？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研究十月革命。不是这样来研究

十月革命的。也不是**这样**来写十月革命的历史的。显然，这里是别有“用心”的。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的”（不要笑！）思想体系。为了使偷运的程序“极为平安地”进行，所有这一切当然（呵，当然！）都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

托洛茨基最近发表的著作的实质就在这里。

因此，托洛茨基的这些著作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托洛茨基主义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和列宁主义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断”（不间断）革命论。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不断革命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不把力量单薄的农民估计为革命力量的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因为它会使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即力量单薄的农民离开俄国无产阶级。这也就说明列宁主义为什么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了。

从这个斗争的角度来说，托洛茨基是如何评价列宁主义的呢？他把列宁主义看做含有“反革命特征”的理论。对列宁主义的这种气愤的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列宁主义当时捍卫了并且捍卫住了

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

但是，托洛茨基还不限于这种气愤的批评，他还更进一步断定说：“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腐蚀自己的毒素。”（见一九一三年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对立的路线。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一致和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敌意。托洛茨基主义在组织方面是主张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在一个党内共处并组织各种大小集团的理论。你们想必知道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的历史。在这个联盟中，马尔托夫派、召回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安然合作，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真正的”党。大家知道，这个七拼八凑的“党”追求的目的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列宁主义认为消灭八月联盟是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保证，而托洛茨基主义则把这个联盟看做建立“真正的”党的基础。可见又是两条对立的路线。

第三、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它企图损害他们的声誉，破坏他们的威信。我不知道党内还有哪一个派别，在损害列宁主义的领袖或党的中央机关的声誉方面能够同托洛茨基主义相比。例如：托洛茨基把列宁评定为“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见一九一三年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的这种“客气的”批评有什么价值呢？要知道，在托洛茨基所有的“客气的”批评中，这还远不是最“客气的”批评。

在十月运动期间，背着这种讨厌货色的托洛茨基怎么还能留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呢？这是因为当时托洛茨基抛弃了（真正抛弃了）自己的货色，把它藏到柜子里去了。没有这个“行动”，同托洛茨基真正合作是不可能的。八月联盟的理论，即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理论已经被革命粉碎和抛掉了，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展开

武装斗争的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保持统一呢？托洛茨基只好承认这个理论没有用处。

不断革命论也“碰到了”同样不幸的事情，因为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谁也没有打算在二月革命后的第二天立刻夺取政权，而且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不容许他——用列宁的话来说——“以夺取政权为儿戏”的。托洛茨基只好承认布尔什维克的争取在苏维埃中扩大影响和努力争取农民的政策。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三个特点（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由于头两个特点显然已经破产，它当然也退到后面去了。

托洛茨基已经没有像样一点的集团而作为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治上的孤立者走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不把自己的货色藏到柜子里去，能够不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吗？当然不能！

由此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只有一个：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长期合作，只有在后者完全抛弃旧的货色，完全赞成列宁主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托洛茨基写十月革命的教训，但是他忘记了除其他一切教训以外，十月革命还有一个教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并且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具有头等意义的教训。托洛茨基主义不妨也考虑一下十月革命的这个教训。

但是这个教训看来对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什么益处。原来，在十月运动的日子里被藏进柜子里去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旧货色现在又重新搬出来想找销路——恰好我们这里的市场正在扩大。毫无疑问，托洛茨基的新著作企图恢复托洛茨基主义，“战胜”列宁主义，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旧托洛茨基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它十分自惭形秽和狼狈不堪，它比旧托洛茨基主义在精神上柔和得多，在形式上温和得多，但是它在实质上无疑保存着旧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敢作为好战力量来反对列宁主义，它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

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这是因为新托洛茨基主义是软弱无力的。新托洛茨基主义恰好在列宁逝世的时候出现，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列宁在世时，它是不敢采取这个冒险步骤的。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关于“不断”革命问题**。新托洛茨基主义不认为有必要来公开捍卫“不断”革命论。它“只是”断定，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它由此做出下面的结论：列宁主义在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东西是重要的和可以接受的；相反地，列宁主义在战前，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东西是不正确的，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就产生了托洛茨基派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论：一部分是战前的列宁主义，“不中用的”“旧”列宁主义，它持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另一部分是战后的、十月革命时期的新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想使它适合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要求。托洛茨基主义需要这个分割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第一个比较“可行的”必要步骤，以便于采取下几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步骤。

但是，列宁主义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来的可以分割的折衷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它产生于一九〇三年，经历了三次革命的考验，现在正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而向前行进。

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潮和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一九〇三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内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布尔什维主义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八页）

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实质上是一样的。这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称。因此，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论是破坏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的理论。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理论的。

（二）**关于党性问题**。旧托洛茨基主义用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来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但是这个理论已经丢丑到这种地步，现在竟没有人愿意回忆它了。为了破坏党性，现今的托洛茨基主义想出了一套新的、不大丢丑的、几乎是“民主的”理论，即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的理论。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我们党的统一的完整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把我们党的历史分成两个不同价值的部分，即分成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和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我们党的十月革命以前部分的历史其实不是历史，而是“史前史”，是我们党的不重要的或者至少是不很重要的准备时期。而我们党的十月革命以后部分的历史则是实在的真正的历史。属于前一个时期的是我们党的“史前史的”、不重要的“老”干部；属于后一个时期的是新的、真正的、“有历史的”党。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划分党史的奇特方法是破坏我们党的新老干部之间团结的方法，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党性的方法。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方法的。

（三）**关于布尔什维主义领袖问题**。旧托洛茨基主义竭力用某种公开的方式破坏列宁的威信，不怕后果如何。新托洛茨基主义做得比较谨慎。它竭力以赞扬列宁、称颂列宁的姿态来干旧托洛茨基主义的勾当。我认为有必要举几个例子。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谨慎的，他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地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内。托洛茨基在他的“论列宁”一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从他的评述看来，列宁的全部活动只是“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于是使人得到一个印象：列宁是所有残暴的布尔什维克中最残暴的一个。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说出这种不必要的和没有根据的荒谬言论呢？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团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地决定问题。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书中看到的不是列宁，而是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极重要问题的中国官吏。

你们想知道我们党是怎样决定解散立宪会议问题的吗？

请听托洛茨基的话吧：

“列宁说：‘当然应该解散立宪会议，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怎样呢？’

然而，纳坦松老人很使我们感到安慰。他来找我们‘商量’，开口就说：

‘要知道，也许不得不用武力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喊道：‘好极了！说得真对！你们的人都赞成吗？’

纳坦松回答说：‘我们有些人正在动摇，但是我想他们终究是会同意的。’”

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你们想知道党是怎样决定最高军事委员会问题的吗？请听托洛茨基的话吧：

“每一次到参谋部去以后，我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没有真正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我们就不能脱出这种混乱状态。’

‘这想必是对的。他们千万可别叛变……’

‘给他们每个人派一个政治委员。’

列宁喊道：‘派两个更好一些，并且要精明强干的。我们决不会没有精明强干的共产党员。’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就是这样产生的。”

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破坏列宁声名的阿拉伯故事呢？难道是为了颂扬党的领袖弗·伊·列宁吗？不大像。

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深湛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评述中看到的不是巨人列宁，而是一个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建议党“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夺取政权”的渺小的布朗基主义者。但是我已经讲过，这种评述是一点也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做这种令人愤怒的……不确切的评述呢？这里没有“稍微”破坏列宁的威信的企图吗？

这就是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托洛茨基主义按其全部内容来说，有一切可能成为力图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中心和集合点。

你们要问：今后怎么办呢？由于托洛茨基发表了新著作，党的当前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动是为了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摧毁它的基础。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

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展开思想斗争来反对正在复活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们不愿意也不力求进行这种论战。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用它的反列宁主义的发动来强迫我们进行这种论战。好吧，同志们，我们准备着！

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二六九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6卷第229—252页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序言）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　十月革命的内外环境

有三个外部情况使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比较容易地打断了帝国主义链条，从而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

第一个情况：十月革命是在两个主要帝国主义集团，即英法集团和德奥集团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开始的，当时这两个集团忙于决死斗争，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物力来认真注意扑灭十月革命。这个情况对于十月革命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十月革命能够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冲突来巩固和组织自己的力量。

第二个情况：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中开始的，当时苦于战争而渴望和平的劳动群众被事物的逻辑引到无产阶级革命这条摆脱战争的唯一出路。这个情况对于十月革命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十月革命掌握了强有力的和平工具，使十月革命易于把苏维埃革命和结束可恨的战争联结起来，因而使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中间获得广大的同情。

第三个情况：在欧洲有雄伟的工人运动，在西方和东方有长期的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机。这个情况对于俄国革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它保证了俄国革命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可靠的国外同盟者。

可是，除了外部情况，十月革命还有许多使它易于获得胜利的内部有利条件。

其中主要的条件如下：

第一、十月革命受到俄国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最积极的拥护。

第二、它受到渴望和平与土地的贫农和大多数士兵的最可靠的拥护。

第三、它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政党为统帅，为领导力量，而这个政党所以有力量，不仅因为它有经验和多年来形成的纪律，而且因为它和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第四、十月革命遇到的是这样一些比较容易战胜的敌人，如较为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被农民“骚动”弄得颓丧不堪的地主阶级、在战争进程中完全破产的妥协政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

第五、它拥有新国家的广大地域，它在这个地域内能够自由回旋，能够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实行退却，能够暂时休息，能够集结力量等等。

第六、十月革命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能够指望得到国内充足的粮食、燃料和原料。

这些内外情况配合起来，就造成一种特殊环境，使十月革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革命在内外环境方面没有不利的条件。例如十月革命处于相当孤独的地位，它旁边和邻近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苏维埃国家，这个不利条件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呢？毫无疑问，例如德国未来的革命在这方面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状况，因为它邻近有我们苏联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至于无产阶级在国内不占多数，这个对十月革命不利的条件我就不谈了。

可是，这些不利条件只是使十月革命上述内外特殊条件的巨大意义更加明显了。

一分钟也不可以忘记这些特殊条件。在分析一九二三年秋季的德国事变时，特别应当记住这些特殊条件。托洛茨基首先应当记住这些特殊条件，因为他竟笼统地把十月革命跟德国革命类比，并放肆地痛

斥德国共产党的真正的和虚构的错误。

列宁说：“俄国在一九一七年那种非常独特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这个革命**继续下去**并贯彻到底，就比西欧各国困难了。我还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经指出这一点，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一）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和通过这个革命来结束使工农痛苦万分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件事联系起来；（二）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世界上两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间的决死斗争，这两个集团当时不能联合起来反对它们的苏维埃敌人；（三）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这多少是因为我国幅员广阔和交通不便；（四）当时在农民中有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接受农民政党（社会革命党，其大多数是极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通过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而立即加以实现；——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的重新出现是不很容易的。正因为如此——除其他许多原因以外——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要比我们困难。”（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五页至第四十六页）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可以忘记的。

二　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或
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十月革命有两个特点。要了解十月革命的内容和历史意义，首先必须认清这两个特点。

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在我国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权。第二、在我国确立

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的结果，而在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仍然保存着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十月革命没有其他特点。可是，现在对于我们重要的正是这两个特点，这不仅因为它们清楚地表现出十月革命的实质，而且因为它们十分明显地揭露了“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本性。

我们来简略地研究一下这两个特点。

关于城乡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问题，关于把这些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极重要的问题。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城乡劳动人民支持谁，支持资产阶级还是支持无产阶级，城乡劳动人民成为谁的后备军，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是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革命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固性要由这一点来决定。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命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所以胜利，是因为它从资产阶级那里夺下了农民后备军，它把这个后备军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成了城乡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唯一领导力量。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永远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对内政策的特点。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老练的战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选出来”并“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阶层的普通政府的上层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条件下，为推翻资本和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结成的阶级联盟。

所以，这里所说的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稍微”估计不足或“稍微”估计过高，像某些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现在爱说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这里所说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基础。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

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页至第三五一页）

其次：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同上，第三八七页）

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个革命是实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典范。

有些同志以为这个理论只是和俄罗斯实际情形有关的纯粹“俄国的”理论。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说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时，指的不仅是俄罗斯农民，而且是苏联境内那些不久以前还是俄国殖民地的边疆地区的劳动分子。列宁始终不倦地一再说，俄国无产阶级不和这些异民族群众结成联盟就不能获得胜利。列宁在他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中以及在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再三说过，没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奴役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间的革命联盟，革命同盟，世界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而殖民地岂不就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首先就是劳动农民群众吗？谁不知道，殖民地解放问题**实质上**就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摆脱财政资本的压迫

和剥削的问题呢？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不是纯粹“俄国的”理论，而是世界各国必须采用的理论。布尔什维主义不只是俄国的现象。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〇页）。

十月革命第一个特点的特征就是这样。

从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场，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现在，甚至拉狄克这位爱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不断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是离开现实而“向空一跃”。现在，看来大家都认为不值得再理会这个“向空一跃”了。

我们也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在大战时期的立场，例如在一九一五年的立场，当时他在他的“为政权而斗争”一文中，根据“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农民的革命作用一定会减少，没收土地的口号已经没有它从前所有的那种意义。大家知道，列宁在评论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时，责备托洛茨基“否认”“农民的作用”，说“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俄国那些把‘否认’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页）

我们最好来看看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较晚的著作，看看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立，他已经有可能根据事实来检查他的“不断革命”论并改正他的错误的时期内所发表的著作。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来看吧。托洛茨基在这

篇“序言”中关于“不断革命”是这样说的：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①

托洛茨基关于他的“不断革命”就是这样说的。

只要把这段引文和上面从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出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鸿沟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这个“不断革命”论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维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的特征怎样呢？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时，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跃进式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的含义说来，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是按照既定的次序，不是一个托拉斯、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国家始终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国家依次跟在后面，而是跃进式的，在一些国家的发展中发生停顿，在另一些国家的发展中

却发生跃进。同时，落伍的国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力图保持旧阵地，而跃进的国家也同样“合乎情理地”力图夺取新阵地，结果就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情。例如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在半世纪以前，德国同英法比较起来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日本当时同俄国比较起来也是这样。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已经跃进很远，德国超过了法国，并开始在世界市场上排挤英国，日本超过了俄国。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

这个规律的出发点是：

（一）“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财政扼制的世界体系。”（见列宁“帝国主义”法文版序言，“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九页）

（二）“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世界上两三个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它们把全世界卷入**它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同上）

（三）财政压迫的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的增长和军事冲突的必然性使帝国主义世界战线容易被革命攻破，使这条战线很可能被个别国家突破。

（四）这种突破最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和国家，即在帝国主义防卫最差而革命最容易展开的地方和国家。

（五）因此，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简单说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何在呢？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在于这个革命是实际运用列宁的无产阶级

革命理论的模范。

谁不了解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谁就永远不了解这个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革命的雄伟的国际力量，这个革命的独特的对外政策。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各国机会主义者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开始（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论说来，无产阶级革命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开始的话）；这些国家的工业愈发达，社会主义胜利的机会就愈多。在他们看来，在一个国家内，何况是在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还在战争期间，列宁就依据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驳斥机会主义者。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正确的。

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来看吧。

托洛茨基写道：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

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

这一段话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就是说，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理论”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很明显，这里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假定说，因为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当时还难于确定我们的革命的性质，所以其中含有一些无意的错误，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较晚时期的观点。那末我们就拿托洛茨基的另一本小册子，他的“和平纲领”来看吧。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的，现在（一九二四年）编入“一九一七年”一书再版了。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批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拿欧洲联邦口号来和它对立。他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胜利只能是欧洲几个联合为欧洲联邦的主要国家（英、俄、德）的胜利，否则社会主义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有胜利的革命，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托洛茨基说：“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斯大林注）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

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可见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个社会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理论，这个理论通常是排斥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论的。

不用说，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不用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就抵挡不住总进攻；同样，没有俄国革命对西方革命运动的援助，西方革命运动就不能像它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那样迅速地发展。不用说，我们是需要援助的。但什么是西欧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呢？欧洲工人对我国革命的同情，他们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计划的决心，——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帮助呢？当然是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到现在为止，这种同情和这种帮助，再加上我们红军的实力和俄国工农挺身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这一切是不是足够击退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取得必要的环境来进行真正的建设工作呢？是足够的。这种同情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呢？无疑是在增强。这样，我们有没有有利条件来不仅推进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并且援助西欧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呢？是有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七

年的历史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能不能否认我国已经开始了雄伟的劳动高潮呢？不，不能否认。

既然如此，托洛茨基的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能有什么意义呢？

只能有一个意义：第一、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第二、托洛茨基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三、托洛茨基没有觉察到现在腐蚀着帝国主义的那种内部虚弱症。

托洛茨基因为热中于批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便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的小册子“和平纲领”中不知不觉地彻底粉碎了自己的论据。

也许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也陈旧了，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再符合他现在的观点了吧？那末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即在俄国胜利以后所写的最近的著作来看吧。例如，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给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新版所写的“跋”来看吧。他在这篇“跋”中写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

得胜利以后[①]，才会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这样说，显然是违背实际情况，顽固地想把“不断革命”论从完全破产中挽救出来。

原来，不管怎样辩解，也是不仅“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原来有人曾希望“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原来也不会有丝毫结果，因为不管怎样辩解，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是不会有的。

那末，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

无怪乎托洛茨基说我们党“蜕化”已经说了两年。

无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预言我们国家定会“灭亡”。

这个奇怪的“理论”怎能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相容呢？

这个奇怪的“前途”怎能和列宁所说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前途相容呢？

这种“不断”绝望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像的问题了。我们对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〇五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托洛茨基的这种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反过来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近来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了一些腐败的外交家，他们力图偷运“不断革命”论，说它是和列宁主义相容的东西。他们说，这个理论在一九〇五年当然是不适用的。可是，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当时跑

得太远，企图在一九〇五年的环境里运用当时不能运用的理论。他们说，可是后来，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当革命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托洛茨基的理论就完全适用了。不难猜到，这些外交家中最主要的是拉狄克。不妨听听他的话：

“战争在渴望争得土地与和平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掘了一道深沟，战争把农民交给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来反对列宁的那个主张（即“不断革命”。——斯大林注），事实上成了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这里每字每句都是颠倒是非。

在战争时期“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这话不对。实际上，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所实现的是按特殊方式同资产阶级专政交织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拉狄克不好意思提到的“不断革命”论是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这话不对。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现在，过了十个月，拉狄克来自行更正，认为应当骂帕尔乌斯不该提出“不断革命”论。可是要做到公道，拉狄克应当也把帕尔乌斯的同伴托洛茨基骂一顿。

被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摈弃了的“不断革命”论在“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这话不对。十月革命的全部进程，十月革命的整个发展，表明并证明“不断革命”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主义基础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的话和腐败的外交手腕是掩盖不了“不断革命”论和列宁主义之间的鸿沟的。

三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几个特点

要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至少必须弄清楚这个策略的几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所以必须这样，尤其是因为在许多论述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小册子中往往正是把这些特点忽略了。

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听了托洛茨基的话，会以为在十月革命准备史中只有两个时期，即侦察时期和起义时期，此外的都是由于误信邪说。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游行示威是什么呢？“比预定‘更左的’四月游行示威，是检验群众的情绪和群众与苏维埃内大多数人的相互关系的一次侦察性攻击。”而一九一七年的七月游行示威是什么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实质上这一次游行示威也不过是在运动的新的更高阶段上的一次新的规模更大的侦察”。不用说，依照我们党的要求举行的一九一七年的六月游行示威，在托洛茨基看来，更应当称为“侦察”了。

这样说来，布尔什维克还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就有了由工农组成的现成的政治军队，布尔什维克在四月、六月、七月都没有调用这支军队举行起义，而只进行了“侦察”，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当时的“侦察情报”没有提供有利的“材料”。

不用说，这种对我们党的政治策略的简单化的看法无非是把通常的军事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混为一谈罢了。

实际上，所有这些游行示威首先是群众自发施加压力的结果，是群众激于反战义愤而涌现街头的结果。

实际上，当时党的作用在于给予自发产生的群众发动以一定形式并加以领导，使之按照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进行。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现成的政治军队。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间的斗争和阶级冲突进程中才建立这支军队（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终于建立了这支军队），它是通过四月游行示威、通过六月游行示威和七月游行示威、通过区杜马和市杜马的选举、通过反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通过对苏维埃的争夺来建立这支军队的。政治军队不是军事军队。军事指挥部在开始作战时就已经拥有现成的军队，而党却要在斗争进程中，在阶级冲突进程中，在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相信党的口号正确，相信党的政策正确的时候建立自己的军队。

当然，每一次这样的游行示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眼睛看不见的力量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起侦察作用，但是侦察在这里不是游行示威的动机，而是游行示威的自然结果。

列宁分析十月起义前的事变并拿这些事变和四月至七月间的事变比较时说道：

“这时的情形恰巧跟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前夜、六月九日前夜、七月三日前夜的情形不同，因为当时所发生的是**自发激动**，而这种激动是我们党没有察觉到的（如四月二十日），或者是加以制止而使它形成为和平游行示威的（如六月九日和七月三日）。因为当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苏维埃**还**不是我们的，农民**还**相信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的道路，而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起义），所以大多数人民还不能跟着我们走，所以起义还为时过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九页）

很明显，单靠“侦察”是做不出大事的。

问题显然不在于“侦察”，而在于：

（一）党在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的斗争中始终依靠群众革命运动的自发高涨；

（二）党依靠自发高涨，同时保持了自己对运动的独掌领导；

（三）对运动的这种领导使党易于编制群众政治军队去举行十月起义；

（四）这样的政策不能不使十月革命的全部准备工作在**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

（五）十月革命的这种准备工作又使政权在十月起义胜利后落到**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手里。

总之，**一个**党即共产党的独掌领导是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基本要素，——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特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一个特点。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无产阶级专政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胜利就会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十月革命优异于法国一八七一年革命的地方。法国一八七一年革命的领导由两个党分担，而其中哪一个党也不能称为共产党。

第二个特点。这样，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是在一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可是，党是怎样进行这种领导的，这种领导是循着什么路线进行的呢？这种领导是循着使**妥协**政党——在革命总爆发时期内最危险的集团陷于孤立的路线，即循着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的路线进行的。

列宁主义的基本战略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原则是承认：

（一）在革命即将爆发的时期，**妥协**政党是革命敌人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

（二）不使这些党陷于孤立，就不能推翻敌人（沙皇制度或资产阶级）；

（三）因此，革命准备时期的主要锋芒应当指向使这些党陷于孤立，使广大劳动群众离开它们。

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时期，在准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一九

〇五——一九一六年），自由保皇党即立宪民主党是沙皇制度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为什么呢？因为立宪民主党是妥协政党，是主张大多数人民即全体农民和沙皇制度**妥协**的党。自然，党在当时把主要打击指向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不使立宪民主党人陷于孤立，就不能指望农民和沙皇制度**决裂**，而不保证有这种决裂，就不能指望革命胜利。许多人当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战略的这一特点，而责备布尔什维克过分“仇恨立宪民主党人”，断言布尔什维克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遮掩了”反对主要敌人即沙皇制度的斗争。可是，这些毫无根据的责备暴露出他们根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不了解这个战略要求使妥协政党陷于孤立，是**为了**促进并加速对主要敌人的胜利。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这样的战略，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会是不可能的。

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各种斗争势力的重心移到新的方面来了。沙皇不存在了。立宪民主党由妥协势力变成当权势力，变成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了。斗争已经不是在沙皇制度和人民之间进行，而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在这个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是帝国主义的最危险的社会支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党在当时是妥协政党，是主张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妥协**的党。自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打击当时指向了这些党，因为不使这些党陷于孤立，就不能指望劳动群众和帝国主义**决裂**，而不保证有这种决裂，就不能指望苏维埃革命胜利。许多人当时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一特点，而责备布尔什维克“过分憎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责备布尔什维克“忘记了”主要目标。可是，十月革命整个准备时期雄辩地说明，布尔什维克只有采用这样的策略，才得以保证十月革命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劳动农民群众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望，他们离开这些党，他们转而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

这一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彻底的革命力量的周围。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争夺劳动农民群众，争取掌握这些群众的历史。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暴动，——这些事实决定了这场斗争的命运。而这些事实是以证实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正确来决定这个命运的。因为当时不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不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摆脱战争。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的政策原来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总之，使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陷于孤立是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基本领导路线，——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第二个特点。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就会悬在空中。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十月革命的教训”中一点也没有说到，或者几乎一点也没有说到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这样，党对十月革命准备工作的领导是循着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陷于孤立的路线，循着使广大工农群众离开这些党的路线进行的。可是，党是怎样具体实现了这种孤立，以什么形式，在什么口号下实现了这种孤立的呢？这种孤立是以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形式，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通过把苏维埃由动员群众的机关变为起义的机关、变为政权机关、变为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斗争来实现的。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正是抓住苏维埃作为能够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能够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并负有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使命的基本组织杠杆呢？

苏维埃是什么呢？

列宁还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就说过：“苏维埃是新式国家机关，第

一、它保证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像过去的常备军那样和人民隔离，而是和人民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不可比拟；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关保证和群众，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关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关的成员是不经过官僚手续而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所以它比从前的机关要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证和各种各样的职业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良易于实行。第五、它保证有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有力、最先进的部分的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关，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以外，处在历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权**和法律执行权**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假如革命阶级的民众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关保持政权，而新的机关要一下子建立起来是不行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七十九页至第八十页）

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就抓住苏维埃作为便于组织十月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新式强大机关的基本组织环节。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从它的内部发展方面来看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布尔什维克的七月失败以前，在两个政权并存时期）和第二个阶段（在科尔尼洛夫暴动失败以后）。

在第一个阶段，这个口号意味着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破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苏维埃政府（因为当时苏维埃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使在野党（即布

尔什维克）有自由鼓动权，使各政党在苏维埃内可以自由斗争，预期布尔什维克能够按革命和平发展的方式通过这种斗争来夺取苏维埃并改变苏维埃政府的成分。这个计划当然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无疑有助于准备保证专政所必需的条件，因为它既然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掌政权，迫使他们实施他们的反革命政纲，就更快地揭露了这些党的真正本质，使它们更快地陷于孤立，使它们更快地脱离群众。可是，布尔什维克的七月失败中断了这个发展过程，使反革命势力（将军和立宪民主党）占了优势，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抛入反革命势力的怀抱。这个情况使党不得不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等到革命再度高涨时再把它提出来。

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失败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现在这个口号已经跟第一个阶段不同了。它的内容根本改变了。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并使政权转归布尔什维克，因为大多数苏维埃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了。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革命经过起义直接进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并使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国家形式。

把苏维埃变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一策略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于它使千百万劳动群众摆脱帝国主义，揭露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直接引向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把苏维埃变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一政策是使妥协政党陷于孤立而使无产阶级专政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如果我们不说明布尔什维克怎样和为什么能把自己的党的口号变成了千百万群众的推进革命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怎样和为什么不仅能使先锋队和大多数工人确信党的政策正确，而且能使大多数人民确信党的政策正确，那末情况就不全面了。

问题在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果这个革命是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单只党的口号正确是不够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使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确信这些口号的正确。只有这样，党的口号才会成为群众自己的口号。只有这样，革命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能够正确地确定道路和转折点，这样就自然而然把群众引到党的口号下，可以说是引到革命的门口，从而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经验感到、察知并认清这些口号的正确。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把对党的领导和对群众的领导混为一谈，它清楚地看见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之间的差别，因而它不仅是领导党的科学，而且是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科学。

召开和解散立宪会议的经验是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的明显例子。

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还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口号。大家知道，立宪会议是根本和苏维埃共和国基础相矛盾的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向着苏维埃共和国前进，同时又要求临时政府立刻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布尔什维克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自己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在举行起义前一个月，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布尔什维克竟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可以和立宪会议暂时配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所以“会有”这种事情，是因为：

（一）立宪会议思想是当时在广大民众中间最得人心的思想之一；

（二）立刻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易于揭露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本性；

（三）要使立宪会议思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威信扫地，就必须引导这些群众带着他们对土地、和平和苏维埃政权的要求走到立宪会议门前，使他们和实际存在的立宪会议接触；

（四）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经验确信立宪会议的反

革命性和把它解散的必要性；

（五）这一切自然就预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和立宪会议暂时配合是可以容许的，因为这是消除立宪会议的手段之一；

（六）这种配合如果是**在**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实现的，那就只能使立宪会议服从苏维埃，使立宪会议变为苏维埃的附属品，使立宪会议无能为害地消亡。

未必用得着证明，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政策，立宪会议的解散就不会进行得那样顺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后来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这个口号下的发动就不会遭到那样可耻的破产。

列宁说：“我们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不是比西方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度在俄国是政治上过了时的吗？当然，我们更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是否早已存在，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什么程度。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由于一系列特殊的条件，已有了极好的准备来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这是完全不容争辩、完全确定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选举。”（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一页）

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没有抵制立宪会议呢？列宁说，这是因为：

“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无害，反而会使革命无产阶级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议会为什么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成为‘政治上过时的东西’。”（同

上，第四十二页）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配合的“理论”看做希法亭主义而嗤之以鼻。

他不了解，在举行起义的口号下，在苏维埃可能胜利的条件下，容许这种配合而召开立宪会议是唯一革命的策略，和把苏维埃变成立宪会议附属品的希法亭主义策略毫无共同之点；某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不能使他有理由指责列宁和党主张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配合国体”的那个完全正确的立场。（参看“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〇页）

他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对立宪会议采取这种特殊政策，就不能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就不能把十月起义变为深入的人民革命。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中出现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认为使用这些字眼是有伤马克思主义者的体面的。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即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前一个月就写道：“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掌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页）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引证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谈到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关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的有名的信（写于一八七一年四月）时，清清楚楚地写过下面一段话：

“马克思所说的毁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意见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奇怪的，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想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司徒卢威的信徒，也

许会说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曲解成非常鄙陋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于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极端僵硬的……一八七一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的革命只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参加进来，才能成为把真正人民的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和无产者的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制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八页）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可以忘记的。

总之，善于用引导群众走上革命立场的方法使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确信党的口号的正确，这是把千百万劳动者争取到党的方面来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四个特点。

我认为上面所说的完全足以使人认清这个策略的特征了。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毫无疑问，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万能理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是编造的没有生命力的理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七年的历史不是证实了这个理论，而是推翻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不可采用来作为世界革命发展的方案，因为它和有目共睹的事实抵触。它尤其不可采用来作为口号，因为它不是发挥而是限制那些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有可能独立突破资本战线的个别国家的

主动性；因为它不是推动个别国家积极进攻资本，而是推动个别国家消极等待“总爆发”的时机；因为它不是在个别国家的无产者中间培养坚决革命的精神，而是培养哈姆雷特式的担心“万一别人不来援助”的犹疑心理。列宁说得十分正确，无产阶级在一国内胜利是“典型现象”，“几国同时发生革命”只能是“罕有的例外”（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二页）。

可是，大家知道，列宁的革命论并不仅仅限于这一方面。它同时还是世界革命发展论[①]。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不是独立自在的任务。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因为革命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不仅是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和日益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

毫无疑问，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已不像从前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以前，发达的帝国主义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出现以前所能想像的那样简单了。因为出现了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条件下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样一个新因素，这个规律说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世界资本战线全线削弱，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因为出现了处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处在世界财政剥削中心和殖民地压迫舞台之间的强大的苏维埃国家这样一个新因素，单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就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所有这些都是在研究世界革命道路时不能不估计到的因素（其他次要的因素我就不谈了）。

从前人们通常认为革命将经过社会主义成分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先进”国家内平衡“成熟”的道路发展起来。现在这个见解要大加改变了。

列宁说：“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

---

① 参看上面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

各战胜国的奴役，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其次，西欧的一些国家，而且是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做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终究能把这些国家里的革命运动推延下去，造成某种‘社会和平’的局面。”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一般欧洲式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了一般欧洲式的波动。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了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漩涡。”

因此，“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的。它们这一种发展的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六页至第四五七页）

除此以外，不仅战败国和殖民地受战胜国的剥削，而且一部分战胜国也落入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强大的战胜国的财政剥削的罗网中；所有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世界帝国主义解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除这些矛盾以外，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内部还有一些极深刻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正在发展；所有这些矛盾又由于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同这些国家并存而日益加深和尖锐化，——如果注意到这一切，那就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国际形势的特点了。

最可能的是，世界革命将经过许多新国家的无产者在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下用革命手段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国家体系的道路发展起来。我们看见，第一个脱离出来的国家，第一个获得了胜

利的国家，已经取得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援助。没有这种援助，它就不能支持住。毫无疑问，这种援助将会增强和发展起来。同样毫无疑问：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许多新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过程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

没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这个论点是对的；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这个论点也是对的。

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获得胜利的国家“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九页）。

第二、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以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

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

列宁说：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

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同上)。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国家在冲破帝国主义体系这一事业中的伟大创始，它是帝国主义国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策源地，而且还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

因此，不仅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说革命在一国内胜利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的人是不对的，而且那些虽然记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但是竟把这个革命看做一种只应接受外援的被动现象的人也是不对的。实际上，不仅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国家革命的援助，而且其他国家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援助，以便加速和推进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事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约·斯大林
“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国家出版局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6卷第253—283页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五月制作

斯大林选集

第二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选集

第二卷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

二〇一七年·中国

И. Сталин.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 1

《斯大林选集》第二卷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

女工和农妇们，要记住并实现伊里奇的遗训！
（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 3
致教师代表大会
（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 4
论“红色青年”杂志的任务
（一九二五年一月）…… 5
有关与托洛茨基争论的一些问题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6
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9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和德国共产党党员海尔佐克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 15
庆祝国际妇女节
（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 …… 20
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 22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 26
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 31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
——向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 …… 34
一 国际形势 …… 34
二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 41
三 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 …… 44
四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 …… 46
五 党在农村中的政策 …… 55
六 关于金属工业 …… 60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 64
一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
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所担负的任务 …… 65
二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
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担负的任务 …… 71
问题和答复——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 …… 76
关于东方革命运动——和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布施先生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 113
论共青团的任务——答“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117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节选）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三十一日）…… 123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十二月十八日）…… 123

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两次演说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185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192
一　列宁主义的定义 …… 192
二　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 …… 194
三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 …… 196
四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 198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党和工人阶级 …… 206
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 228
七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 …… 240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
——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
关于联共（布）中央全会工作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251
一　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 …… 251
二　工业化方针 …… 253
三　社会主义积累问题 …… 254
四　积累的正当利用。节约制度 …… 259
五　要造就工业建设干部 …… 264
六　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 …… 265
七　要巩固工农联盟 …… 266
八　要实行党内民主 …… 268
九　要保护党的统一 …… 269
十　结论 …… 270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 272
一　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 272
二　加米涅夫在为托洛茨基打扫道路 …… 286

三 不可思议的糊涂想法或
季诺维也夫论革命性和国际主义 …… 293
四 托洛茨基伪造列宁主义 …… 298
五 反对派的实践纲领。党的要求 …… 311
六 总结 …… 314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316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 …… 316
二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 317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 319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 320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 322
六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 325
七 中国的青年问题 …… 325
八 几个结论 …… 3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节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六日）…… 328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十二月七日报告）…… 328
一 几点预先的说明 …… 328
二 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 335
三 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 340
四 在工作中的反对派 …… 360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 363
六 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 367
七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 369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答杨—斯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371
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383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 383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 384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 386
四　反对派的错误 …… 387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390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 410
一　几个小问题 …… 410
二　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 412
三　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
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 418
四　论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 …… 420
五　两条路线 …… 427
时事问题简评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431
一　论战争的威胁 …… 431
二　关于中国 …… 437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节选）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 459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八月一日的演说）…… 459
一　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 …… 459
二　关于中国 …… 464
三　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 …… 483
四　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 …… 486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节选）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500
一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 500

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528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七日）…… 548
党和反对派——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556
一 争论的简短总结 …… 556
二 工人阶级和农民 …… 558
三 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 561
四 我国革命的前途 …… 564
五 今后怎样？…… 566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节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十九日）…… 568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十二月三日）…… 568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568
二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内部状况 …… 582
三 党和反对派 …… 606
四 总结 …… 625
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
——给联共（布）各级组织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628
论红军的三个特点
——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635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 639
一 关于自我批评 …… 639
二 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 646
三 沙赫特事件 …… 655

四　总结 …… 662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664
一　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 …… 664
二　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 …… 667
三　青年必须掌握科学 …… 669
在粮食战线上——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谈话节录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673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684
联共（布）中央全会（节选）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十二日）…… 692
论共产国际纲领（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 692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
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 703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715
一　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 …… 715
二　谷物问题 …… 723
三　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
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 …… 730

本 卷 说 明

新编《斯大林选集》共分四卷，是根据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和档案附卷十卷编辑的。各卷内容的起讫时间为：第一卷，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第二卷，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第三卷，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第四卷，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三年。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原《斯大林选集》，仅为两卷，按照当时的政治、理论需要，剔除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工人运动、暴力革命、论反对派、卫国战争，以及中国革命等方面的大量文献。现新编《斯大林选集》已尽可能予以增补、充实，以力求全面地反映这位历史伟人和革命导师的思想、理论和**非凡经历**。

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中，有众多关于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新编《斯大林选集》亦撮要单独编辑成“斯大林历史档案选”，作为附卷附于第四卷之后，供读者参考。第四卷之后还附有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总目录和档案附卷十卷总目录的下载地址。

本选集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

本选集中的注释，一为原书著者（斯大林）注，二为译者注，三为编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置于当页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选集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选集中的部分篇目标题，是我们拟加的。

本选集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书编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新编《斯大林选集》

第二卷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

女工和农妇们，
要记住并实现伊里奇的遗训！

（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

一年前，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我们的列宁，在和我们永别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遗训，指出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最后胜利所应遵循的道路。女工和农妇们，你们要实现伊里奇的这些遗训！你们要用这些遗训的精神去教育你们的孩子！

列宁同志临终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女工和农妇们，你们要巩固这个联盟！

列宁同志教导劳动人民要支持工人阶级去反对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女工和农妇们，你们要记住这个遗训，你们要支持正在建设新生活的工人阶级的政权！

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要高举起一切被压迫者的领袖——共产党的旗帜。女工和农妇们，你们要团结在这个党的周围，——它是你们的党！

值此伊里奇逝世一周年纪念之际，党号召：要为女工和农妇们，为正在和党一起建设新生活的女工和农妇们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约·斯大林

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一月
“女工”杂志第一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7卷第3页

致 教 师 代 表 大 会

（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

人民教师的队伍是我国正在按社会主义原则建设新生活的劳动大军中的一个最必需的部分。

只有千百万劳动农民群众紧随着工人阶级前进，工人阶级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是一条胜利的道路。

乡村教师应当知道，没有这样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没有这样的专政，我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

要成为一个连接农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环节，——这就是乡村教师的主要任务，如果他们真正愿意为本国人民的事业、为人民的自由独立的事业服务的话。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
“教师报”第二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7卷第4页

论“红色青年”杂志的任务

（一九二五年一月）

斯大林同志和编辑部委员们谈话，在谈到杂志的任务时，他说：

杂志应当把吸引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大学生参加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只有杂志在实际上成为真正苏维埃大学生的杂志时，才能做到这一点。高等学校、教育人民委员部各个机关以及其他机关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缺点。大学生对这些缺点比其他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他们应当经常地揭露、批评这些缺点，指出这些缺点，使我们能够依靠共同的力量来改进我们的工作。因此，必须广泛地吸引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大学生中的优秀人物来为杂志写稿。大学生应当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杂志，这个杂志能够帮助他们工作，帮助他们进步。

在谈到杂志的某些栏的任务时，斯大林同志指出：

杂志的政治栏只须阐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的基本问题。这里不必重复别种杂志已经说过的话。我们联盟内的每一种刊物在整个工作中都应当有它的一定地位。“大学生生活”、“文学”、“科学和技术”等栏必须大大扩充。这些栏正是大学生能够积极投稿和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高等学校的改革”栏内的一些问题，除了吸收教员和教授以外，还要吸收大学生来研究。

只有实现“接近大学生”这个口号，杂志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才能真正成为苏维埃大学生自己的刊物。

载于一九二五年一月
“红色青年”杂志第一期
（总第五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7卷第5页

有关与托洛茨基争论的一些问题

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同志们，我受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委托，就有关争论的一些问题以及和争论有关的各项决议做一些必要的传达。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托洛茨基参加的情况下来讨论他的言论问题，因为今天接到通知，说他因病不能出席全会。

同志们，你们知道，争论是由托洛茨基的言论，由他的“十月革命的教训”引起的。

挑起争论的是托洛茨基。党是被迫进行争论的。

党对托洛茨基的言论提出了两点主要的责备。第一点是责备托洛茨基企图修正列宁主义；第二点是责备托洛茨基企图彻底更换党的领导。

对于党的这两点责备，托洛茨基丝毫没有替自己辩护。

他为什么丝毫不替自己辩护，——这很难说。通常的解释是：他生病了，不可能说些什么来替自己辩护。这当然不是党的过错。既然托洛茨基每次向党攻击以后都开始发高烧，这就不是党的过错了。

现在中央委员会已经收到托洛茨基的声明（一月十五日提交中央的声明），其中写道，他所以不发言和丝毫不替自己辩护，是因为不愿意使论战激烈起来，不愿意使问题尖锐化。当然，相信或不相信这个解释的确凿性都可以。我个人是不相信的。第一、托洛茨基是不是早就了解到他的反党言论会使关系尖锐化呢？托洛茨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了解这个真理的？要知道托洛茨基并不是第一次反对党，也不是第一次对他自己的言论引起关系尖锐化这一点感到惊奇或表示遗憾。

第二、如果他真正关心党内的关系，不愿意使关系恶化，那末他为什么发表“十月革命的教训”来反对党的领导核心，蓄意使关系恶化和尖锐化呢？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个解释是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的。

现在简单地谈一谈托洛茨基一月十五日提交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这篇声明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并且已经分发给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声明，首先必须指出和必须加以注意的是：他说他愿意按照党的指示担任任何职务，愿意接受对他今后的言论的任何监督，而且他认为为了事业的利益，尽速解除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是绝对必要的。

这一切当然必须予以注意。

至于谈到问题的实质，应当指出下面两点：关于“不断革命”和关于更换党的领导。托洛茨基说，他在十月革命后因为个别原因而又一般地引用了“不断革命”的公式，这只是和党史委员会有关，这只是追忆过去，而不是用来说明当前的政治任务。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我认为，既不能把托洛茨基的这篇声明称做解释，也不能把这篇声明称做辩护。这里连承认自己错误的影子也没有。这是回避问题。说“不断革命”论是一种和党史委员会有关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怎样了解这一点呢？党史委员会不但是党内文件的储藏所，而且是党内文件的解释者。那里有些文件在一定的时期是有用的，但是后来失去了效用。那里也有些文件无论过去或现在对党都有指导意义。那里还有些文件具有非常坏的性质，起非常坏的作用，党对这些文件是不能容忍的。托洛茨基把自己的“不断革命”论列入哪一类文件呢？列入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呢？托洛茨基在声明中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他逃避问题。他对问题避而不谈。因此对他修正列宁主义这一点的责备仍然有效。

其次，托洛茨基说，他从来没有在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更没有在国家面前提出过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所解决的问

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任何建议。这种说法不对。托洛茨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说过什么呢？他说过干部不中用，必须彻底更换党的领导。他现在在“十月革命的教训”中说些什么呢？他说党的基本核心不中用，必须更换。这就是“十月革命的教训”的结论。出版“十月革命的教训”就是为了论证这个结论。“十月革命的教训”的目的就在这里。因此对他企图彻底更换党的领导这一点的责备仍然有效。

所以，托洛茨基的整篇声明不是真意的解释，而是外交辞令的汇集，是已经被党解决了的旧争论的死灰复燃。

党要求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是这样的文件。

托洛茨基显然不了解，而且我怀疑他是否有朝一日会了解，党对自己过去的或现在的首领要求的并不是使用外交辞令，而是真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托洛茨基似乎缺乏公开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他不了解党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已经加强了，党已经感到自己是主人，党要求我们在环境需要的时候能向它低头。托洛茨基不了解这一点。

我们的各级组织对托洛茨基的言论有什么反应呢？你们知道，各地方组织对这个问题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都发表在“真理报”上。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类。一类决议要求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一类决议要求解除托洛茨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的职务，并且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第三类决议（莫斯科、列宁格勒、乌拉尔、乌克兰等地的同志今天送交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个决议草案也包括在内）要求解除托洛茨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的职务，有条件地把他留在政治局内。

这就是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问题的主要的三类决议。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在这些决议中进行选择。

这就是我要向你们传达的有关争论的一些问题。

载于约·斯大林“论托洛茨基主义”
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7卷第6—8页

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我想简单地谈一谈现在党对农民的政策的基础。目前农民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不容置疑的。许多人甚至津津有味地说，新的时代——农民的时代到来了。另一些人把“面向农村”的口号了解为应该背向城市。还有一些人甚至谈到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这当然是胡说。这一切当然都是极端的看法。但是撇开这些看法，剩下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目前，正是现在，农民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呢？

这有两个原因。我说的是基本原因。

农民问题目前在我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第一个原因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同盟者中间，在无产阶级现有的一切基本同盟者（在我看来，这样的同盟者有四个）中间，农民是**立刻**可以给我们革命直接援助的唯一同盟者。这里指的正是现在的、目前的直接援助。其余一切同盟者虽然都有远大的未来，虽然都是我国革命的极巨大的后备力量，但是很遗憾，他们现在还不能给我们的政权，给我们的国家直接的援助。

这是些什么同盟者呢？

第一个同盟者，即我们的基本同盟者，是各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先进的无产阶级，即西方的无产阶级，是一支极巨大的力量，是我国革命和我们政权的最可靠和最重要的同盟者。但是很遗憾，目前的情况，当前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革命运动的状况是这样的：西方无

产阶级现在还不能给我们直接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援助。现在我们得到的是他们间接的道义上的援助，这种援助很重要，甚至无法说明它的价值，它是难以估价的。但是，这终究不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那种直接的援助。

第二个同盟者是殖民地，是受比较发达的国家压迫的那些不大发达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同志们，这是我国革命的一支极巨大的后备力量。但是，他们行动得太慢了。他们是来直接援助我们的，但是，看来他们不会很快就来。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立刻给我们直接援助。

我们有第三个同盟者，一个不可捉摸的无形的然而极其重要的同盟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无形的，但是对我们政权和我国革命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援助。同志们，这似乎很奇怪，但这是事实。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主要联盟在一九一七年帝国主义大战中不互相进行殊死的斗争，如果它们不互相扼住咽喉，如果它们不是自顾不暇，没有工夫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当时就未必站得住脚。重复一遍，我们敌人之间的斗争、冲突和战争是我们极大的同盟者。现在这个同盟者的情况怎样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世界资本在战后经受了几次危机以后，已经逐渐恢复元气。这一点是应当承认的。主要的战胜国——英国和美国现在所拥有的力量，在物质上不仅能在本国相当不错地安排资本，而且还能输血给法国、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方面。这方面的情况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暂时不像战争刚一结束时那样快地发展。这对资本家有利，对我们不利。但是这个过程还有另一方面，即相反的方面。相反的方面就是：在资本暂时能造成全面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相互关系另一端的矛盾，剥削的先进国家同被剥削的落后国家即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日益尖锐和日益加深，从新的“意外的”一端造成破坏资本“工作”的威胁。埃及和苏丹发生了危机，——这你

们大概已经在报上看到了。其次，在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焦点，这些焦点会使目前的“同盟者”发生争吵，会破坏资本的威力。在北非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焦点，在那里西班牙将失掉摩洛哥，法国的手正向那里伸去，但是法国不可能把它拿到手，因为英国不会允许法国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所有这些事实在许多方面都和战前时期相似，它们不能不威胁国际资本的“建设工作”。

这就是矛盾发展总平衡表上的正数和负数。因为在这方面资本的正数暂时还大于负数，在最近期间还不能盼望资本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很明显，我们第三个同盟者的情况还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剩下的第四个同盟者就是农民。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建设着新生活，好也罢，坏也罢，总是和他们在一起。你们都知道，这个同盟者不十分坚强，农民这个同盟者不像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那样可靠。但是，他们毕竟是同盟者，而且在现有的一切同盟者中间，他们是一直给我们直接援助并且立刻可以给我们直接援助的唯一同盟者，因而他们也换得我们的援助。

正因为如此，农民问题在目前，即在革命危机和其他一切危机的发展进程有些缓慢的时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农民问题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第一个原因。

目前我们把农民问题放在我们政策的首要地位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社会主义基础和我们政权基础的我国工业，要依靠国内市场即农民市场。到我国工业十分发达的时候，到我们能应付国内市场的时候，到争取国外市场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情形将会怎样，这我不知道。可是这个问题将来一定会摆在我们面前，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我们将来未必能指望从比我们更有经验的资本家手中夺取西方的国外市场。但是谈到东方市场，由于我们和东方的关系不能算坏，而且这

种关系还会改善，在这方面我们将具备最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在我们同资本家竞争时，纺织品、国防用品、机器等等将成为我们供给东方的主要产品。但是，这是谈到我国工业的未来。至于现在，那我们甚至还没有能满足我国农民市场的三分之一，因此现在，在目前，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国内市场问题，而首先是农民市场问题。正因为目前农民市场是我国工业的主要基地，所以我们作为当权者，作为无产阶级，所关心的是竭力改善农民经济的状况，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改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调整列宁说过的而我们还没有很好调整的那种结合。

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应当在目前把农民问题提到首位，应当特别注意和特别关心农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我们党对农民问题的政策的前提就是这样。

同志们，糟糕的是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重要性。

常常有人说，在莫斯科，我们的领袖们时兴谈论农民问题；这大概不是认真的谈论，这是外交手腕。莫斯科是需要对外说这些话的，但是我们可以继续执行旧政策。有些人这样说。另一些人说：关于农民的谈论只是闲谈罢了；如果莫斯科人不坐在办公室里，到地方上来走走，他们就会看到农民是个什么样子和税款是怎样征收的。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听到。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不了解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我们当前一切危险中最严重的危险。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了解农民问题的全部严重性，那他们就会真正动手吸引农民参加我们的建设工作，动手改善农民经济和巩固结合；或者是同志们不了解这一点，那结果就会是苏维埃政权垮台。

同志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吓唬谁。不是的，同志们，吓唬人没有必

要也没有意义。问题太严重了，必须像认真办事的人那样来对待这个问题。

有些同志来到莫斯科以后常常竭力拿“商品的外表”给人看，说在他们的农村中一切都很顺利。这样官僚主义地谈顺利有时简直令人作呕。其实很明显，没有而且也不会有顺利。显然，缺点是有的，但是不要害怕批评，应当揭露这些缺点，然后加以消除。要知道，现在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我们全党让非党的农民和工人来批评我们；或者是他们用暴动的方式来批评我们。格鲁吉亚暴动是批评。唐波夫暴动也是批评。喀琅施塔得暴动为什么不是批评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不官僚主义地谈顺利，处理问题不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不害怕批评并且让非党的工人和农民（要知道，他们亲身体验着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来批评我们；或者是我们不这样做，让不满情绪逐渐积累逐渐增长起来，到那时批评就会采取暴动的形式。

现在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目前情况的这一特点。

这个问题即农民问题是不是和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和你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有某种关系呢？无疑是有的。

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呢？

托洛茨基主义就是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结合。现在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用伊里奇的话来说，就是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不实行结合，能不能实现这个任务呢？不，不能。不粉碎这种不相信工农联盟的理论即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能不能实行结合、建立工农联盟呢？不，不能。结论很清楚：谁要在新经济政策中取得胜利，谁就必须埋葬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思想流派。

伊里奇在十月革命前常常说，在所有的思想敌人中，孟什维克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竭力设法使人不相信十月革命会取得胜利。

因此，——他说，——不粉碎孟什维主义，就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我认为当时的即十月革命时期的孟什维主义和目前的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有某种类似的地方。我认为在目前，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现今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共产主义的所有思想流派中，托洛茨基主义要算是最危险的思想流派了，因为它竭力设法使人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因此，不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就不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取得胜利，就不能把目前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党对农民的政策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载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真理报”第二十四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7 卷第 19—24 页

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和德国共产党党员海尔佐克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第一个问题（海尔佐克）：你是否认为德意志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必然促使工人阶级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答（斯大林）：如果讲的是期限而不是趋向，那末要极其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用不着证明，不论从国际条件或从国内条件来看，目前的局势和一九二三年的局势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可是，这并不是说，在最近时期内局势不会因外部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而产生有利于革命的急剧转变。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就是这种设想很可能成为事实的保证。

第二个问题：从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准备时期来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列宁曾向各国共产党提出过这个要求，他认为这是夺取政权前极重要的任务）？

答：既然讲的是经济状况，那我只能根据我所掌握的一般材料来估计问题。我认为道威斯计划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它已经使局势趋于相对稳定。美国资本的投入德国工业，通货的稳定，德国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改善（以上三点决不意味着德国经济的根本好转），以及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状况的某些改善，——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德国资产阶级的阵地得到一定的巩固。这可以说是道威斯计划的“好的”一面。

但是道威斯计划还有“坏的”一面，这一面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的时期表现出来，而且一定会破坏这个计划的“好的”效果。毫无疑问，道威斯计划使德国无产阶级受到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双重压榨。

德国工业的扩大和它的国外市场范围的缩小之间的矛盾，协约国的过分要求和德国国民经济满足这些要求的最大可能之间的不相适应，——这一切必然使无产阶级、小农、职员和知识分子的境遇恶化，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革命爆发，促使无产阶级直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但是，不能把这种情况看成德国革命的唯一有利条件。为了使这个革命取得胜利，还必须使共产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大多数，使它成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决定性力量。必须揭露和粉碎社会民主党，使它降到只占工人阶级的极少数的地位。不然就休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使工人能够获得胜利，必须用统一的意志去鼓舞他们，必须由一个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真正信任的党去领导他们。如果工人阶级内部有两个力量相等而彼此竞争的党，那末，即使外部存在着有利条件，也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列宁是十月革命以前第一个特别强调这一点的人，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最必需的条件。

可以认为对革命最有利的形势是下面这种形势：一方面德国内部发生危机和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地增长，另一方面在德国外敌的阵营中发生严重的纠纷。

我认为，一九二三年的革命时期因为不具备上述形势的第二方面，所以情况极其不利。

第三个问题：你说德国共产党必须使大多数工人跟自己走。至今大家还很少注意这个目标。在你看来，怎样才能使德国共产党成为这种力量不断增长的强有力的党呢？

答：有些同志认为巩固党和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就是把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人驱逐出党。这当然是不对的。只有在为工人阶级的具体需要进行日常斗争的进程中，才能揭穿社会民主党，使它降到只占工人阶级极少数的地位。揭露社会民主党的罪恶，不应当依靠世界性的大问题[①]，

——————————————

① 原译文为“依靠行星问题”，此处按《斯大林选集》1979 年版改译。——本书编者注

而应当依靠工人阶级为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提高政治地位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同时工资问题、工作日问题、居住条件问题、保险问题、税收问题、失业问题以及生活费用高昂问题等等即使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应该起极重大的作用。每天都要在这些问题上打击社会民主党人，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任务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不把日常的实际问题和关于德国的国内外状况的一些根本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不从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观点出发来阐明这一切日常工作，那就不能完全实现这个任务。

而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只有经验丰富和理论修养很高的干部所领导的党才有可能，因为这些干部的经验足以使他们利用社会民主党的种种失算来加强自己的党，同时他们的理论修养足以使他们不致因个别胜利而看不见革命的发展前途。

这主要也就说明了所有共产党（其中包括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问题是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根本问题之一。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覆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三）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四）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

的正确性。

（五）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六）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七）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八）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九）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十）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十一）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十二）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

没有诸如此类的条件，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空谈。

第四个问题：你说，除了道威斯计划的坏的一面以外，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第二个条件是社会民主党在群众面前的被彻底揭露，是它不是工人阶级中比较重要的力量。从实际情况来看，要达到这一点还有很远的路程。这里明显地反映出党目前的工作方法上有缺点和弱点。怎样才能消除这些缺点和弱点呢？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完全是一个腐化堕落的党——不但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获得了将近两百万张选票，你对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估计？

答：这里问题不在于德国共产党工作上有缺点。这里问题首先在于：美国的借款，美国资本的输入加上通货的稳定使得状况有些好转，因而就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和德国状况有关的国内外矛盾似乎有可能根本消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借着这种错觉，像骑在白马上那样进入了现今的德国国会。现在维尔斯正炫耀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但是，他大概不了解他占有了别人的胜利。胜利的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而是摩根集团。维尔斯过去和现在都只是摩根的一个代理人。

载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真理报”第二十七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7 卷第 25—29 页

庆 祝 国 际 妇 女 节

（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

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劳动妇女，一切被压迫者中最受压迫的劳动妇女，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站在解放运动大道的旁边。大家知道，在奴隶解放运动中涌现出了成千上万个伟大的女烈士和女英雄。在争取农奴解放的战士行列中有过千千万万的劳动妇女。无怪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群众的一切解放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把千百万劳动妇女吸引到了自己的旗帜下面。

国际妇女节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不可战胜的标志和伟大的未来的先声。

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是工人阶级最大的一支后备力量。这支后备力量足足占全体居民的半数。妇女这支后备力量是拥护工人阶级还是反对工人阶级，——决定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败，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胜败。因此，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共产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把妇女——女工和农妇——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在无产阶级旗帜下对女工和农妇进行政治教育和把她们组织起来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国际妇女节是把劳动妇女这支后备力量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一种手段。

但是，劳动妇女不只是一支后备力量。只要工人阶级的政策正确，她们还能够而且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一支真正军队。从劳动妇女这支后备力量中训练出一支能够同无产阶级大军并肩作战的女工和农妇的军队，——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第二项有决定意义的任务。

国际妇女节应当成为一种把女工和农妇从工人阶级的后备力量变成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作战军队的手段。

国际妇女节万岁！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
“真理报”第五十六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7卷第34—35页

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在国际形势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许多现象中，应当指出下面的主要事实：

一、毫无疑问，资本已经爬出了战后危机的泥潭。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货的稳定，世界贸易的增长和个别国家生产的扩大，资本，特别是英美资本向欧洲和亚洲国家的输出和投入，——这一切都表明资本的“建设工作”的成就。大家知道，这个“工作”是在英美集团领导下进行的。应当认为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使德国所谓“道威斯化”，即由军事干涉的方法转为财政干涉的方法，转为在财政上奴役德国的方法。

二、同样毫无疑问，革命的高涨时期已经在欧洲的中心，即在德国结束了。在革命的高涨时期，运动势如奔腾的洪流，汹涌澎湃，四处泛滥，而党的口号却落后于运动；群众打破了法制的范围，冲击旧制度，自动创立了新法制，——这个时期在德国已经过去了。德国的工人运动已经由冲击时期进入了积蓄力量的时期，进入了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的时期。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情况不会没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必须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情况，以便迅速地熟悉新的环境，并且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做革命的准备工作。这些就是对资产阶级有**积极**意义的事实，因为它们表明了目前资本的力量和成就。

但是除了这些事实以外，还存在着许多对资本主义有**消极**意义的事实。

一、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加强的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多了，削弱和瓦解资本主义的力量增长了。英美之间由于石油，

由于加拿大，由于销售市场等等而引起的斗争；英美集团和日本之间由于东方市场而引起的斗争；英法之间由于争夺欧洲的势力而引起的斗争；以及被奴役的德国和占统治地位的协约国之间的斗争，——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表明，资本的成就是不巩固的，资本主义“恢复健康”的过程里隐藏着它内部衰朽和瓦解的前提。

二、印度、中国、埃及、印度尼西亚、北非及其他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加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后方。既然帝国主义的“恢复健康”要求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扩大势力范围，而这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无疑地在日益加强，那末很明显，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决不会稳固的。

三、争取欧洲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和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危机。英国工会展开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苏联工会对这个斗争的支持，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变成反对实行分裂工会路线的阿姆斯特丹的反革命上层（乌捷格斯特、查辛巴赫、茹奥等等）的斗争，——这一切事实表明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而阿姆斯特丹的危机是什么呢？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不稳固，因为阿姆斯特丹工会的官僚是这个政权的一分子，是它的支柱。

四、苏联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资产阶级论客所说苏维埃没有能力管理工业的谰言已经遭到彻底的破产。毫无疑问，在武装干涉和封锁消除后的最近两年来，苏联的工业恢复了并且巩固了。毫无疑问，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状况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大大地提高了。毫无疑问，这种状况的改善今后还会继续下去。所有这些情况现在都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革命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认为，西方工人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过俄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到了关于这个名叫苏维埃联盟的工人国家的苏维埃工人的**新生活**的传说，并且他们想查对一下这些传说的真实性。数十数百不同派别的工人从欧洲来到俄国，在各处进行考察，这一事实明显地说明了西方工人对俄国的关心将逐月增长。毫无疑问，对俄国的这种访问活动将日益频繁。

只要他们深信俄国工业发展的每一步骤同时就是改善工人状况的步骤，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发生的那种使工人状况恶化的步骤，他们就会理解到，他们西方工人在自己家里建立工人国家的时候也已经到了。正因为如此，单是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对帝国主义来说就已经是致命的危险了。正因为如此，只要苏维埃国家存在于世界上并且日益发展，帝国主义的任何成就都不会巩固。

这些就是对资产阶级有**消极**意义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表明了最近的将来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它可能得到的成就。

这两种对立的趋向，即消极的和积极的趋向的斗争，构成了目前国际形势的基础和内容。

在这个对立性的斗争中，所谓和平主义兴起了，并且在它还没有来得及繁荣，也没有使自己形成一个“纪元”、“时代”或者“时期”的时候就没落了。它既没有满足妥协分子的希望，也没有证实反革命分子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彭加勒、尤兹、麦克唐纳和赫里欧的“煊赫的”名字就在这个斗争中毁灭了。

这两种趋向中哪一种会占上风呢，是积极的趋向还是消极的趋向？毫无疑问，对资本主义有消极意义而对革命有利的趋向**将来**一定会胜利，因为帝国主义不能解决腐蚀它的那些矛盾，只能暂时缓和这些矛盾，这些矛盾以后又会暴露出来，并且以更大的破坏力发展起来。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目前**占上风的是对资本主义有积极意义的和有利的趋向。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就在于此。

结果在欧洲和美洲出现了受到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破坏”的和因苏联的存在、发展和强大而“黯淡无光”的一种平静时期。

对资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喘息时机**，意味着加紧输出资本，日益发财致富，加紧对殖民地压迫和剥削，加强对苏联的压力，把一切反革命力量纠集在英美资本的周围。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积蓄力量的时期已经

来到，意味着在掺杂“自由”制度的迫害制度的条件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的时期已经来到。

对殖民地来说，这意味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加强，意味着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的斗争的加强。

对苏联来说，这意味着集中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发展工业，来加强国防力量和集合世界各国的革命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

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就是：

一、尽量利用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一切矛盾来瓦解和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阵地。

二、制定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接近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具体形式和方法，来尽力支援这一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三、推进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事业，并且把它进行到底，同时要记住，这个事业是掌握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最可靠的手段。因为不掌握住工会，就不能掌握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而不在工会中工作，不在那里逐年逐月地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任，就不能掌握住工会。不这样，就休想争取无产阶级专政。

四、制定工人阶级接近那些受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主义机器摧残和受全能的托拉斯的掠夺价格压榨的小农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同时要记住，争取小农的斗争是党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当前任务。

五、支持苏维埃政权和粉碎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阴谋，同时要记住，苏联是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支柱，维护和加强苏联意味着加速工人阶级对世界资产阶级的胜利。

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六十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7 卷第 37—40 页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同志们！我认为谢米奇没有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提法的实质。无论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把民族问题和革命总问题分开。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的实质，就是始终把民族问题和革命前途密切联系起来。

谢米奇引证了列宁的话，说列宁曾经主张把解决民族问题的某种办法规定在宪法中。显然，谢米奇想以此来说明列宁似乎曾经认为民族问题是立宪问题，即不是革命问题而是改良问题。这完全不对。列宁从来没有陷入而且也不可能陷入立宪的幻想。只要看一看他的著作，就会深信这一点。列宁谈到过宪法，但他所指的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立宪道路，而是革命道路，也就是说，他把宪法看做革命胜利的成果。在我们苏联也有宪法，并且它反映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某种办法。可是这个宪法的问世不是和资产阶级妥协的结果，而是革命胜利的结果。

其次，谢米奇援引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所写的那本大家都知道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小册子，竭力想从那里找到哪怕只能间接证实他正确的一些话。但是，这种引证是枉费心机的，因为不仅这些话，就连稍微能证实他对民族问题的“立宪”观点正确的间接暗示，他也没有找到，而且不可能找到。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可以提醒谢米奇注意斯大林那本小册子中的一段话，那里是把奥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立宪的）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办法（革命的）对照起来谈的。

这段话就是：

“奥国人是想用微小的改良、缓慢的步骤来实现‘民族自由’的。他们提出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实际办法时，完全没有指望根本的改变，没有指望他们远景中所没有的民主解放运动。然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自由’的问题和可能的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和民主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理由指望改良。这就使俄国各民族可能的命运问题发生根本的变化。”

看来是很明白了。

这并不是斯大林个人的观点，而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观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把民族问题和革命总问题密切联系起来看。

可以毫不勉强地说，民族问题的提法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十月革命以前的阶段，第二是十月革命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族问题被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在第二个阶段，民族问题已经扩大和转变为殖民地问题，民族问题已经从国内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因而民族问题已经被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可见，不论第一个阶段或第二个阶段的看法都是极其革命的。

我认为谢米奇还没有把这一切完全弄清楚。因此，他企图把民族问题贬低为立宪问题，即把民族问题看成改良问题。

这个错误使他产生了另一个错误，就是他不愿意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把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民族问题除了包含农民问题以外，还包含民族文化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等等。但是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

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我认为谢米奇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是由于他过低估计了民族气动的内部威力，不了解民族运动的深刻的人民性和深刻的革命性。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过低估计蕴藏在运动中，比如蕴藏在克罗地亚人争取民族自由的运动中的潜在力量，会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全党发生严重纠纷。

这就是谢米奇的第二个错误。

谢米奇企图脱离国际形势和欧洲可能的前途来谈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这无疑也应该认为是错误的。谢米奇根据目前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中没有强大的争取独立的人民运动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民族分离权问题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而决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这当然是不对的。就算这个问题在目前不是现实问题，可是**一旦战争爆发**（或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一旦欧洲革命爆发**（或在欧洲革命爆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从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发展来看，战争一定会爆发，**他们**一定会在那里打起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一九一二年，当我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拟定第一个民族纲领草案的时候，在俄罗斯帝国的任何一个边疆地区都还没有强大的争取独立的运动。然而当时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民族自决权即每个民族都有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一条列入我们的纲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但以当时已经有的情况为出发点，而且以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中不断发展和日益迫近的情况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那时不但估计到当前的情况，而且估计到将来的情况。我们知道，如果某一个民族要求分离，那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要为保证这个民族获得分离权而斗争。谢米奇在演说中不止一次地引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小册子中的话。斯大林在这本小册子中关于自决和独立是这样说的：

“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增长不是偶然的。资本在欧洲已感到地盘狭小，于是冲入异国去寻找新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新的投资场所。

但是这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战争……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这段话还是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你们知道，这个论点后来在战时和战后，特别是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以后完全被证实了。

特别是现在，在被压迫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和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应当更有理由估计到整个欧洲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这种可能性。同时应当注意下面这种情况：南斯拉夫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它和某些帝国主义集团有联系，因而它无法退出南斯拉夫外部所进行的激烈的角斗。如果你们要为南斯拉夫党起草民族纲领，——现在要谈的正是这个问题，——那末必须记住，这个纲领不但应该以当前的情况为出发点，而且应该以日益发展的和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的情况为出发点。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必须把民族自决权问题看成是一个现实的迫切的问题。

现在来谈谈民族纲领。民族纲领的出发点应当是南斯拉夫苏维埃革命的原理：不推翻资产阶级，不取得革命胜利，民族问题便不可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当然也可能有例外。比如战前挪威脱离瑞典就是一个例外，列宁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不过这是在战前，在各种顺利情况偶然凑合的条件下发生的。战后，特别是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以后，就未必能发生这种事情。至少产生这种可能性的机会现在已经少到可以说是等于零了。既然如此，那末很明显，我们不能制定等于零的纲领。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原理应当是民族纲领的出发点。

其次，一定要把关于直到国家分离的民族自决权这一专门条文列入民族纲领。为什么在目前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非有这一条不可，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讲过了。

最后，在纲领中还应当包括一项允许那些认为不必同南斯拉夫分

离的南斯拉夫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条文。有些人认为必须排斥这种结合，这是不正确的，不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南斯拉夫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很可能会有某些民族不愿意分离，像在我们俄国所发生的那样。显然，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纲领中就必须有自治这一条，以便把南斯拉夫国家改变成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的各民族自治国家的联邦。

总之，给那些愿意分离的民族以分离权，给那些愿意留在南斯拉夫国家范围内的民族以自治权。

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必须说明，不应当把分离的**权利**理解为分离的**义务**，分离的责任。每个民族都可以行使这种分离权，但是也可以不行使这个权利，如果它不愿意行使这个权利，那是它自己的事情，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有些同志把分离的权利理解为分离的义务，比如说，要求克罗地亚人**无论如何**要分离。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必须抛弃。决不能把权利和义务混为一谈。

载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7 卷第 48—52 页

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同志们！你们的代表要我谈谈在无产阶级大学生中间党的任务和党的工作的任务。

让我同你们简单地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为自己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环境。如果认为在一个战胜了并且驱逐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国家里不能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不正确的。在一个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受到全世界无产者支持的国家里，是能够而且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说得对：我国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现时的特点，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已经把社会主义由神像变成日常实际工作的实际目标了。

无产阶级大学生在这个建设工作中的作用应当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头等重要的。高等学校，共产主义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这都是培养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挥人员的学校。医学家和经济学家，合作社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采矿工程师和统计学家，技师和化学家，农业工作者和铁道工程师，兽医和林业工作者，电工技术员和机械师，——这都是建设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未来的指挥人员。没有新的指挥人员就不能建设新社会，正像没有新的指挥人员就不能建立新的军队一样。新的指挥人员的特色，就在于他们进行建设的使

命不是为了剥削劳动者以满足一小撮富人的私利，而是为了解放劳动者，反对一小撮剥削者。全部问题在于，要使高等学校学生——工人大学生和农民大学生，党员大学生和非党员大学生——了解自己的这个光荣的作用，并且自觉地忠实地起自己的作用。

因此，要竭力使无产阶级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的建设者，——这就是党的第一个任务。

但是，如果没有劳动群众的直接支持，单靠指挥人员的力量是不能建设新社会的。新的指挥人员所具有的知识还不足以建成社会主义。为此还必须有劳动群众对这些指挥人员的信任和支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建设的旧的指挥人员的特点，就是他们脱离工人和农民，他们把自己置于劳动群众之上，既不重视劳动群众的信任，也不重视劳动群众的支持，因而也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支持。这种方法对我们国家是完全不合适的。建设新经济和新文化的新的指挥人员之所以叫做新的，正是因为他们应当断然地坚决地和旧的发号施令的方法断绝关系。不脱离群众，而最紧密地联系群众，不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而走在群众前面，引导群众前进；不远离群众，而和群众打成一片，争取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这就是新的指挥人员管理业务的新方法。不采取这些方法，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能想像的。

因此，要竭力使无产阶级大学生把自己看做劳动群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竭力使大学生感觉到自己是社会活动家，并且在行动上表现出自己是真正的社会活动家，——这就是党的第二个任务。

最后，专门谈一谈共产党员大学生的问题。据说共产党员大学生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不大。据说他们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非党员。据说共产党员大学生宁愿研究“高深的政治”，花费三分之二的时间去漫无止境地讨论“世界问题”。这一切是不是事实呢？我想是事实。既然是事实，那末至少应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共产党员大学生有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拙劣领导者的危险，因为不掌握科学是不能领导社

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的。第二、培养新的指挥人员的事业有被那些需要由新的人材来替换的旧教授所垄断的危险，因为在不愿意或不善于掌握科学的人们中间，是培养不出新的换班人和新的科学工作者的。不用说，这一切不能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事业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情况能不能容忍呢？显然不能。因此，共产党员大学生和全体苏维埃大学生应当明确而肯定地给自己提出如下的当前任务：掌握科学，从新的苏维埃人中间造就新的换班人来接替旧教授。我决不是说大学生不应当研究政治。决不是这样。我只是说共产党员大学生应当善于把政治工作和掌握科学的事业结合起来。有人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有困难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共产党员什么时候害怕过困难呢？困难之所以在我们的建设道路上存在，正是为了要我们去同它作斗争并且克服它。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一种情况。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国家的革命习惯、传统，以及反对因循习惯和思想停滞的斗争，给繁荣科学创造了最有利的环境。未必用得着怀疑，资本主义学校旧教授所特有的小市民的狭隘性和守旧思想，是科学的绊脚石。未必用得着怀疑，只有不沾染这些缺点的新人，才能从事充分而自由的科学创造。在这方面，我们的国家有远大的前途，可以成为不受束缚的科学的堡垒和苗圃。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走上这条道路。但是，如果共产党员大学生依旧站在发展科学的大道旁边，那是可悲的，并且是不体面的。正因为如此，掌握科学的口号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此，要竭力使无产阶级大学生，首先是共产党员大学生懂得掌握科学的必要性并且去掌握科学，——这就是党的第三个任务。致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真理报”第八十七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7卷第58—60页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

（向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

同志们！我认为在这里详细地分析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没有意义的。重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我认为只要指出基本路线就够了，因为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这些决议中。这样做我们就能够着重指出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基本结论。这样做也便于今后研究这些决议。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决议，决议中所谈到的各种问题可以归纳为六类主要的问题。第一类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第二类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当前任务问题。第三类问题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问题。第四类问题是在目前国际形势下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命运问题。第五类问题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和党在新条件下的领导任务问题。最后，第六类问题是我国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即金属工业问题。

一　国际形势

在国际形势中基本上决定目前时局性质的新的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

在最近时期出现的对国际形势有影响的新情况，就是欧洲开始了革命的退潮，开始出现了某种平静现象，即在苏联经济发展和政治威力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

什么是革命的退潮，什么是平静现象呢？这是不是世界革命末日的开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的开始呢？列宁说过，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世界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战争、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时代，这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走向胜利的时代。既然欧洲革命的退潮已经开始，那末这是不是说，列宁关于新时代即世界革命时代的论点因而也就失效了呢？这是不是说，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因而也就取消了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世界革命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阶段，是包括好多年也许包括几十年的整整一个战略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可能有而且应当有革命的退潮和寒潮。

我国革命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两个战略时期，而在十月革命以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第三个战略时期。第一个阶段（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七年）延续了十五年以上。这个阶段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这段时期内我们经历了许多次革命的退潮和来潮。我们经历了一九〇五年的来潮。这次来潮是以革命暂时失败而结束的。之后，我们经历了延续好几年（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的退潮。接着我们经历了因连纳事件（一九一二年）而掀起的新的来潮，这次来潮后来被大战时期的新的退潮所代替。一九一七年（二月）开始了新的来潮，这次来潮是以人民战胜沙皇制度，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而结束的。在每次退潮以后，取消派都硬说革命完蛋了。但是，革命在经过了许多次退潮和来潮以后终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取得了胜利。

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开始的。这个阶段的目的是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推翻资产阶级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这个阶段或者说这个战略时期一共延续了八个月。但这是革命危机极度加深的八个月，当时战争和经济破坏鞭策了革命，使革命的步伐极度

加快。正因为如此，这八个月的革命危机至少可以而且应当等于八年的通常的立宪发展。这个战略时期也像前一个战略时期一样，它的特征就是：革命并不是像革命的庸人通常所想像的那样一味直线上升，而是包含着退潮和来潮。在这个时期，在七月游行示威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革命运动的汹涌澎湃的来潮。接着，在布尔什维克七月失败以后，我们经历了革命的退潮。这次退潮紧接着被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的新的来潮所代替，而这次来潮是以十月革命胜利而结束的。这个时期的取消派瞎说什么在七月失败以后革命已被全部扑灭。但是大家知道，革命在经历了多次考验和退潮以后，终于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进入了第三个战略时期即革命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这个时期会持续多久，——很难说。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无论如何是很长的，同样毫无疑问，这个时期也会包含着来潮和退潮。世界革命运动目前已经进入革命退潮时期，但是这次退潮由于许多原因（关于这些原因我在下面还要谈），一定会被来潮代替。来潮可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来结束，也可能不以胜利来结束，而被新的退潮代替，但是新的退潮也一定会被革命的新的来潮代替。现今时期的取消派说，已经出现的平静现象是世界革命的末日。但是，他们弄错了，正像他们过去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弄错了一样，那时他们把革命运动的每一次退潮都看成革命的毁灭。这就是在革命的每个阶段内即每个战略时期内的起伏情形。

这些起伏说明什么呢？它们是不是说明，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新时代的论点已经失去意义或者可能会失去意义呢？当然不是！它们只是说明，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继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经过进攻和退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的。在发展进程中来潮和退潮锻炼了革命力量并且准备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就是已经到来的革命退潮时期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平静时期的历史意义。

但是退潮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除了欧洲革命的退潮以外，还有苏联经济的蓬勃发展和苏联政治威力的日益增长。换句话说，现在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稳定，同时还有苏维埃制度的稳定。可见现在有两种稳定：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这两种稳定之间达到了某种暂时的平衡——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的特点。

但什么是稳定呢？这是不是停滞呢？如果稳定就是停滞，那末能不能把它应用到苏维埃制度上来呢？不，稳定不是停滞。稳定是目前局势的巩固，是进一步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不只是在目前局势下得到巩固。它还在前进和向前发展，还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增殖自己的财富。如果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如果认为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腐朽的理论似乎是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是不对的。列宁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一书中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逐渐腐朽，而是预定和准备资本主义的逐渐腐朽。

可见，现在有两种稳定。一端是资本主义达到稳定，它在巩固它现有的地位并且在继续发展。另一端是苏维埃制度达到稳定，它在巩固它所夺得的阵地并且在继续走向胜利。

谁战胜谁，——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为什么一种稳定和另一种稳定同时并存呢？怎么会产生这两种的呢？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单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了。因为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以英、美资产阶级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国际形势将愈来愈取决于这两个阵营间的力量对比。

可见，目前时局的特征不仅是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已经稳定，

而且是这两个阵营的力量已经达到某种暂时的平衡；这对资本稍为有利，而对革命运动稍为不利，因为已经出现的平静现象和革命高潮比较起来，对社会主义无疑是不利的，虽然是暂时的不利。

这两种稳定之间有什么差别呢？这两种稳定各向哪一方面发展呢？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稳定使资本的力量暂时增强，同时也必然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甲）各国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乙）每个国家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丙）帝国主义和世界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矛盾。

苏维埃制度下的稳定则使社会主义的力量增强，同时也必然使矛盾缓和，使相互关系改善。这里的矛盾和相互关系就是：（甲）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乙）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丙）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各国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

问题在于：不加紧剥削工人阶级，不使大多数劳动者过半饥半饱的生活，不加紧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世界资产阶级各帝国主义集团间不发生冲突和纠纷，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展：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苏维埃国家全体劳动者的状况，世界各国工人日益接近和联合，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人民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周围。

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在收买和豢养劳动者中间的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同时，使绝大多数劳动者陷于贫困和过半饥半饱的生活的道路。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道路，却是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不产生使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就无力解决这些矛盾。

当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个规律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因争夺殖民地而发生冲突和战争），如果资本主义不向落后国家，不向拥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国家输出资本也能发展，如果“宗主国”的过剩的资本不是用于输出而是用来大力发展农业和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最后，如果这些过剩的资本是用于提高全体工人阶级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这样，那就无所谓对工人阶级加紧剥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农民贫困化，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加紧压迫，以及资本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了。

如果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全部问题在于：不使所有这些矛盾尖锐化，不积累那些归根到底促使资本主义垮台的条件，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

全部问题在于：与此相反，不创造那些使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极度高涨的条件，不为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准备条件，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继续发展。

这就是两种稳定之间的差别。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稳定既不能持久又不能巩固。

现在我们来具体地研究一下资本主义的稳定问题。

资本主义的稳定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表现在美、英、法三国暂时在对德国进行掠夺的方法和范围方面达成了协议。换句话说，它们已经达成了它们称做德国道威斯化的协议。能不能说这个协议是比较牢靠的呢？不，不能。第一、因为它是在没有主人即没有德国人民参加的情况下达成的；第二、因为这个协议会使德国人民受到双重压迫即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如果以为像德国这样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像德国无产阶级这样一个有文化的无产阶级，会甘受双重束缚而不企图进行一系列重大的革命爆发，那就是相信奇迹。甚至像兴登堡当选总统这样一件实质上是反动的事情，也毫无疑义地说明协约国暂时达成的对付德

国的协议是不牢靠的，而且不牢靠得令人可笑。

第二、资本主义的稳定表现在英、美、日三国的资产阶级暂时在确定他们在中国这个能大量容纳国际资本的市场上的势力范围方面，在对中国进行掠夺的方法方面，达成了协议。能不能认为这个协议是比较牢靠的呢？还是不能。第一、因为在协议者中间由于分赃而发生过并且还会发生殊死的搏斗；第二、因为这个协议是背着中国人民达成的，中国人民是不愿意而且也不会服从外国强盗的法律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增长难道不是说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诡计注定要破产吗？

第三、资本主义的稳定表现在各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暂时在互不干涉对方对“自己的”殖民地的掠夺和压迫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能不能认为这个协议或者说达成协议的这种尝试是比较牢靠的呢？不，不能。第一、因为每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在拚命夺取并且还会拚命夺取别人的一小块殖民地；第二、因为帝国主义集团对殖民地的压榨和对它们所实行的压迫政策只能使这些殖民地受到锻炼，并且使它们革命化，从而加深革命危机。帝国主义者企图“平定”印度，控制埃及，驯服摩洛哥，束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手脚，因而施展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会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几乎用不着怀疑，这些阴谋不会也不可能长久施展下去。

第四、资本主义的稳定可能表现在各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在建立反苏统一战线问题上达成协议。就算能够达成这个协议，就算它们能够靠施展各种各样的诡计直到在索非亚爆炸事件上进行无耻的捏造等等而建立起某种类似统一战线的东西，有没有根据认为这种反对我国的协议或者说这方面的稳定能够比较牢靠、比较成功呢？我想这样的根据是没有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资本家建立统一战线和举行联合进攻这种威胁会造成一个大圆箍，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地把我们全国束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使我国变成一座比“十四国”侵犯时更坚不可摧的堡垒。请回忆一下声名狼藉的邱吉尔所说的关于十四

国侵犯的威吓话。你们知道，光是这种威吓话，就足以使全国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来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第二、因为向苏维埃国家进攻，就一定会解开敌人后方的许多个革命纽结，使帝国主义的队伍瓦解和涣散。近来已经积下了无数个这样的纽结，它们不会是帝国主义有好结果的预兆，——这几乎是用不着怀疑的。第三、因为我国已经不再是孤独的了，它已经有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被压迫人民做同盟者。几乎用不着怀疑，对苏联的战争将成为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和自己的殖民地的战争。用不着证明，如果他们一旦进攻我国，那我们是不会坐着等死的，我们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来驾御全世界的革命的狮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不会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一些经验的。

以上这些事实和理由都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可能巩固的，这种稳定产生着使资本主义失败的条件，相反，苏维埃制度的稳定则不断积累着使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使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高涨和使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两种稳定即资本主义的稳定和苏维埃的稳定之间的这种原则性的对立，是两种经济制度之间和两种管理制度之间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的表现。

谁不了解这种对立，谁就永远不会了解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实质。

目前国际形势的一般情况就是这样。

二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现在来谈第二类问题。

目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所面临的新的特殊的情况，就是革命的来潮时期被革命的退潮时期即平静时期代替了。任务就是要利用目前所处的平静时期来巩固各国的共产党，使它们布尔什维克化，使

它们成为依靠工会的真正群众性的政党，把非无产阶级的劳动分子首先是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并且用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去训练无产者。

我不打算一一列举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你们读一读各项有关的决议，特别是共产国际扩大全会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就不难了解这些任务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了。

我只想谈一谈西方各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因为阐明了这项任务以后，其余各项当前任务就容易解决了。

这项任务是什么呢？

这项任务就是把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会结合起来。这项任务就是：进一步开展统一工会的运动并且把它进行到底；让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绝对无条件地加入工会，在那里有系统地进行工作，把工人联结成一条反资本的统一战线，从而创造各国共产党能够依靠工会的条件。

不执行这项任务，就既不能使各国共产党变成真正群众性的政党，也不能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准备必要的条件。

西方的工会和党并不像我们俄国的工会和党。在西方工会和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在我们俄国所形成的那种相互关系大不相同。我国的工会是在党建立以后，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周围形成起来的。当我国还没有工会的时候，党及其组织就已经不仅领导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且还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直到小规模的和极小规模的罢工。这主要是因为：二月革命以前我们党在工人中间所享有的威信，比当时在我国各地存在的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会所享有的威信要高得多。我国真正的工会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才出现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了成形的工会组织，这些组织在工人中间享有极高的威信。列宁还在那时就说过，没有像工会这样的支柱，就既不能争得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保持住无产阶级专政。在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我们的工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毫无疑问，现

在我们的强大的工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之一。我国工会发展史的主要特征就是：我国工会是在党建立以后，在党的周围并且在和党友好的情况下产生、发展和巩固起来的。

西欧的工会完全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第一、它们在工人阶级政党出现以前很久就在那里产生并巩固起来了。第二、在那里，工会不是在工人阶级政党周围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工人阶级政党本身却是从工会当中分离出来的。第三、由于对工人阶级有极密切关系的经济斗争领域可以说已经被工会占领，因此党就不得不主要进行国会中的政治斗争，这就不能不影响党的工作性质和党在工人阶级心目中的重要性。正因为在那里党是在工会成立以后产生的，正因为工会在党建立以前很久就产生了，并且工会确实是无产阶级反资本斗争中的主要堡垒，——正因为如此，党就成了一支不依靠工会的独立力量，就退到了次要地位。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如果共产党想成为一支能够把革命向前推进的真正群众性的力量，它就应当和工会结合起来并且依靠工会。

不估计到西方情况的这个特点，就一定会葬送共产主义运动事业。

在那里，在西方，现在仍然有个别“共产党员”不愿意了解这个特点，还继续沉醉于“退出工会”这一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口号。必须说，诸如此类的“共产党员”对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些人把工会看成敌对的营垒，企图从外面来“攻击”工会。他们不了解，实行这样的政策，工人就会把他们看成敌人。他们不了解，不管工会好不好，工人群众总是把工会看成帮助自己保持工资、工作日等等的堡垒。他们不了解，这样的政策不会促进而会破坏共产党员深入到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中去的工作。

一个普通工人群众会向这样的“共产党员”说：“你们攻击我的堡垒，你们想要破坏我几十年来创造的事业，想向我证明共产主义比工联主义好。也许你们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正确的（像我这样一个普通

的工人怎么能了解你们的理论呢），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我有我的工会堡垒，它领导我进行斗争，它保护我（不管保护得好不好），使我免受资本家的攻击，谁想破坏这个堡垒，谁就是破坏我的事业即工人的事业。别再攻击我的堡垒了，加入工会吧，在那里工作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帮助我们改善和巩固工会，到那时候我再来看看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们真正够朋友，那我当然不会拒绝支持你们的”等等。

目前西方的普通工人群众就是这样或者大致是这样对待反工会主义者的。

谁不了解欧洲普通工人心理上的这个特点，谁就根本不会了解目前我们各国共产党的状况。

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哪里呢？

在于它依靠工会。

我们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弱点在哪里呢？

在于它们还没有和工会结合起来，而且这些共产党内的某些分子不愿意和工会结合。

因此，目前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进一步开展统一工会的运动并且把它进行到底；让所有的共产党员个个都加入工会，在那里有系统地耐心地进行工作，团结工人阶级去反对资本，从而使共产党能够依靠工会。这就是共产国际扩大全会关于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的意义。

三　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

现在来谈第三类问题。

这方面的新情况如下：

（甲）由于各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的资本增多（这是资本主

义的稳定所促成的），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国家中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还会迅速地发展，它正在摧毁旧的社会政治条件，培植新的社会政治条件；

（乙）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正在迅速地成长并且还会迅速地成长；

（丙）殖民地内的工人革命运动和革命危机正在增长并且还会继续增长；

（丁）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最富裕和最有力量的阶层也在成长并且还会继续成长，他们害怕本国的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还要厉害，因此宁愿和帝国主义勾结而不愿为本国摆脱帝国主义的解放事业奋斗，从而也就出卖他们的祖国（印度、埃及等国）；

（戊）由于这一切，只有和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些国家才能摆脱帝国主义而得到解放；

（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工业发达的和工业正在发展的殖民地内，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应当成为迫切的问题，就像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问题成为迫切的问题一样。

过去的情形是这样的：人们通常总是说东方是一个同一式样的整体。现在大家都明白，单一的、同一式样的东方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殖民地，也有落后的和正在后退的殖民地，对于这些殖民地已经不能用任何同样的尺度去衡量了。

过去，人们总是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内一切民族力量即从最反动的资产者起到最革命的无产者止的一条全面性的战线。现在，在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为革命的一翼和反革命的一翼以后，民族运动的面貌就有了一些改变。除了民族运动的革命分子以外，从资产阶级当中还产生出妥协分子和反动分子，这些人宁愿和帝国主义勾结而不愿为本国的解放事业奋斗。

因此，殖民地国家内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和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而首先是和农民结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中的妥协分子结成的联盟，以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

结论只有一个：许多殖民地国家目前日益接近自己的一九〇五年。

任务就是：把殖民地国家内的先进工人团结到能够领导日益增长的革命的统一的共产党里来。下面就是列宁早在一九二二年关于殖民地国家内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所说的话：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屠杀的‘胜利者’，现在连小得可怜的爱尔兰都不能战胜，连它们彼此之间在财政问题和外汇问题上的混乱都不能克服。而印度和中国在咆哮着。这就有七亿多人。如果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里，一九〇五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地迫近着。而这个一九〇五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极大的不同之处：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的革命还能够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说，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却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一二页）

殖民地国家正面临着自己的一九〇五年，——结论就是如此。

共产国际扩大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意义也就是如此。

四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

现在来谈第四类问题。

前面我谈的是我们党的代表会议就与共产国际直接有关的一些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现在我们来谈谈那些与共产国际、与俄共（布）直

接有关的，因而也是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的联结环节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会怎样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呢？这种稳定是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末日或是末日的开始呢？

在其他国家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我们这个技术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一般说来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呢？

在资本主义包围而且是目前还稳定的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能不能完全保证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也就是说完全保证免除旧制度在我国复辟的危险呢？

由于国际关系方面的新情况，所有这些问题就必然要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给予准确而肯定的回答是不行的。

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现在来分别考察这两种矛盾。

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这一点当然不能否认。只要回忆一下我国过去和现在由于农产品的价格政策，由于限价，由于降低工业品价格的运动等等而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了解这些矛盾的全部现实性。我们面前有两个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私有者阶级即农民阶级。他们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所存在的这些矛盾。人们说：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那就是想说：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否可以克服？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去建设。

这样回答的根据或理由是什么呢？

这样回答的理由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除了有矛盾以外，在

发展的根本问题上还有共同的利益，这些共同利益遮盖着这些矛盾，并且无论如何会超过这些矛盾。这些共同利益就是工农联盟的基础。

这些共同利益是什么呢？

事实上农业有两条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使大多数农民陷于贫困而让城乡资产阶级上层发财致富的道路。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则是使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道路。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是农民，是乐意走第二条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因为这条道路是农民摆脱贫困和半饥半饱的生活的唯一生路。不用说，掌握经济命脉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第二条道路即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胜利。

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农民是极乐意走这第二条发展道路的。

可见，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共同利益遮盖着他们之间的矛盾。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和农民一起并且依靠工农联盟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根据无产者和农民之间有共同利益这一点，说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同意列宁主义的看法。例如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问题就这样说：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①]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见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和解决我国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因为只有通过世界革命，只有依靠世界革命，我们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并且最后建成社会主义。

不用说，这个论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同一个托洛茨基还继续说：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见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第二七八页）

换句话说，在西方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和给我们以国家援助以前，我们连梦想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政权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

“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见“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

换句话说，我们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甚至在短时期内也无法“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住脚，尽管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仅支持住了，而且还打退了保守的欧洲向我国发动的多次疯狂进攻。

最后：

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①]，才会是可能的。”（同上，第九十三页）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同志们，我引用这些话，是为了把这些话和列宁著作中的一些话对照一下，使你们能够领会关于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问题的本质。

现在来谈谈列宁著作中的一些话。

列宁早在一九一五年帝国主义大战时就写道：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换句话说，被资本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但能够用自身的力量解决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能够、还必须建成社会主义，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便帮助周围各国的无产者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我国电气化问题时说过同样的话（虽然在形式上有些不同）。

“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否则国家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是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的。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一定会使经济基础从小农经济转到大工业经济。只有国家实现了电气化，只有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①]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四页）

换句话说，列宁完全意识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是他丝毫没有从这里得出下面这个荒谬的结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他却认为我们能够用自身的力量克服这些困难，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请听列宁在一年以后即在一九二一年所说的话：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①]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一九二一年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页至第三〇三页）

换句话说，列宁完全意识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存在的政治上的困难，但是他丝毫没有从这里得出下面这个不正确的结论：“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他却认为只要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政策，我们完全能够取得“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但是，对农民的正确政策是什么呢？对农民的正确政策是一件完全由而且仅仅由我们这个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确定的东西。

列宁于一九二二年在他的论合作制这篇札记中更肯定地说过同样的话：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①]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②]。”（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三页）

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必要条件，因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有人反对说，我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因此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反击并且驳倒了这种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

列宁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二页至第四三三页）

要不然，就用不着在十月夺取政权，用不着举行十月革命了。因为，如果根据某些理由而认为没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和必要，那末十月革命也就失掉意义了。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反过来说，谁不相信十月革命，谁就决不会承认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不相信十月革命和不承认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二者之间有紧密而直接的联系。

列宁说：“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世界各国的革命爆发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并不怀疑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等待劳动阶级完成世界规模的革命，——这就是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页）

关于第一种矛盾，关于内部的矛盾，也就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二种矛盾即外部的矛盾，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表现在哪里呢？

这种矛盾表现在：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

能不能认为这种矛盾是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为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即使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因此，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通过若干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或者更好是在几个国家的无产者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够有免除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也就是说，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是有免除武装干涉企图、因而就是有免除复辟企图的完全保障，因为稍微严重的复辟企图，只有在外来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各国工人对我国革命的支援，尤其是这些工人的胜利，即使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障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的必要条件，是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

列宁说：“当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孤立边区的时候，就以为……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那是非常可笑的妄想和空想。当然，只这些根本的对立性存在，危险也就存在，你也就无法躲避这些危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六二页）

其次：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见“列宁全集”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八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后地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页）

关于第二种矛盾就是如此。

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今年一月有位同志寄给我一封信，谈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这封信可以作为这种糊涂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困惑地写道：

“你说，列宁主义理论……就是**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很遗憾，我在列宁著作中有关的地方没有找到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指示。”

当然，糟糕的不是这位同志（我认为他是我们青年学生中一位优秀的同志）“在列宁著作中有关的地方没有找到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指示”。他总有一天会找到和读到这种指示的。糟糕的是他把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混为一谈，结果就纠缠在这种糊涂思想里。我不妨把我对这位同志的来信的答复告诉你们。我的答复如下：

“那里指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说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要得到免除复辟的完全保障，就只有通过‘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如果确信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的无产者公开的同情之下，在没有几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那末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就是愚蠢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最普通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随便叫什么都可以。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末伊里奇的下面这个论

点便是不对的：我们一定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我们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①]（见“论合作制”）……

我们政治实践中最危险的就是：企图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看做一种被动的东西，以为它在没有得到其他国家胜利了的无产者的援助时只能在原地踏步。假定在俄国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五年到十年内西方还没有爆发革命，假定我们共和国在这个时期内仍然作为一个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那末你是否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五年到十年内只去干些捣水勾当，而不去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解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可能胜利的理论的全部危险性。

这是不是说，这个胜利是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就随时有受军事干涉的危险。”（一九二五年一月）

从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有名决议看来，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命运问题就是这样。

五　党在农村中的政策

现在来谈第五类问题。

在谈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党在农村中的政策的决议以前，我想简单地谈一谈资产阶级报刊因我们党批评我们自己在农村中的缺点而发出的叫嚣。资产阶级报刊吵吵嚷嚷，要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公开批评自己的缺点是苏维埃政权软弱的标志，是苏维埃政权分崩离析的标志。不用说，所有这些叫嚣完全是捏造和欺骗。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强的标志，而不是我们党软弱的标志。只有深入生活的和走向胜利的强有力的政党才敢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对自身的缺点进行无情的批评，过去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对人民掩盖真相的政党，害怕阳光和批评的政党，并不是政党，而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骗子集团。资产者老爷们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他们害怕阳光并且竭力对人民隐瞒真相，用粉饰太平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缺点。因此，他们以为我们共产党人也一定会对人民隐瞒真相。他们所以害怕阳光，是因为只要他们进行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只要他们对自身的缺点进行比较自由的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彻底崩溃。因此，他们以为只要我们共产党人进行自我批评，那就是我们被围困和无立足之地的标志。他们这些可敬的资产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正是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只有后退的和注定灭亡的政党才会害怕阳光和批评。我们既不害怕这个，也不害怕那个，我们所以不害怕，是因为我们是上升的政党，是走向胜利的政党。正因为如此，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极度坚强的标志，而不是我们党软弱的标志；它是巩固我们党的手段，而不是瓦解我们党的手段。

现在来谈谈党在农村中的政策问题。

在国内和国际的新形势下，在农村中可以指出哪些新的因素呢？

我认为可以指出四件主要的事实：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革命速度的缓慢要求选择一条痛苦最少的、哪怕是漫长的道路，来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和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

（二）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分化过程要求肃清农村中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

（三）农民的政治积极性要求改变农村中旧的领导方法和行政管理方法；

（四）苏维埃的改选暴露出一件无可置疑的事实，就是在我国许

多地区内**中农站在富农方面反对贫农**。

根据这些新的事实，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有些同志根据农村分化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党的基本任务就是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无谓的空谈。这不是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这是重弹孟什维克旧百科全书中的孟什维克老调。

现在主要的问题完全不是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使中农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重新把他们争取过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和这些基本群众一道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主要的问题是：和农民一道，一定要和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一定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因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使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基本保障。

这就是党现在的基本任务。

不妨回忆一下伊里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关于这一点所说的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的几句话：

“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八九页）

其次：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前进，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那末到时候，我们的前进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三八页）

因此我们在农村中有两项基本任务。

第一、必须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经济发展的总体系。从前我们

有两个平行的过程：城市走城市的路；农村走农村的路。资本家竭力把农民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但这是通过农民群众贫困和农民中的上层发财致富而实现的。大家知道，这条道路孕育着革命。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经济发展的总体系，是为了创造条件以便能够在逐步地而又是不断地提高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福利的基础上，就是说在跟革命前资本家引导和邀请农民所走的道路相反的道路上把国民经济向前推进。

但是，怎样把农民经济纳入经济建设体系呢？通过合作社。通过信用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

通过这些道路，农民经济一定会缓慢地然而彻底地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

第二项任务是：逐步地而又不断地实现消灭农村中旧的行政管理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路线，实现活跃苏维埃的路线、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选举机关的路线以及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原则的路线。伊里奇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劳动者的民主制的最高形式。伊里希说过，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只有在我们有可能巩固这个政权以后，民主制的这种最高形式才能实现。可见，这个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时期已经开始。我们应当谨慎小心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不要性急，我们应当在工作的进程中，在党的周围培养出大批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

如果第一项任务，即把农民经济纳入经济建设总体系的任务，使我们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把农民和无产阶级套在一辆马车上，那末第二项任务，即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和活跃苏维埃的任务，就一定会使我们有可能改建我们的国家机关，使它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使它成为健全的、真实的、朴素的和节约的机关，以便创造易于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

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就我们党在农村中的政策问题所通过

的决议的基本路线就是如此。

因此，党在农村中的领导方法也就应当有所改变。

我们党内有人断言，既然有新经济政策，既然资本主义开始暂时稳定，那末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压制政策，把周围的一切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必须说，这种政策是不正确的和有致命危险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最大限度的压制，而是在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的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即在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方面的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然，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掌不住舵。我们所以需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是为了使党能掌住舵，保证党实现全面的领导。

其次，必须使农村中的共产党员放弃畸形的行政管理方式。决不能只对农民发号施令。应当学会耐心地向农民解释他们所不了解的问题，应当学会说服农民，在这方面不要吝惜时间和精力。像我们某些乡执行委员会主席那样常常只是发号施令，这当然要容易得多，简单得多。但是简单的容易做的事情不一定都是好事情。不久以前有一位乡支部书记在回答省委员会代表所提出的关于该乡没有报纸的问题时说：“我们干吗要报纸呢？没有报纸倒安静些，好些，不然，农夫们一读报就会提出种种问题，那简直麻烦透了。”这位书记也算共产党员！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一种不幸。问题在于：现在要进行领导，没有“麻烦”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不必说没有报纸了。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必须了解和领会，如果我们愿意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住农村中的领导的话。

其次，现在要进行领导，就必须善于经营管理，必须懂得和理解经济。现在只是高谈“世界政治”，高谈张伯伦和麦克唐纳，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我们已经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因此，只有通晓经济的人，只有善于在经济发展方面向农夫提出有益意见的人，只有善于帮助农夫进行经济建设的人，才能做领导工作。研究经济，和经济结合，

深入到经济建设中的各项细节中去，——这就是农村中共产党员现在的任务。不这样做，连梦想领导也不可能。

现在不能按照旧方式进行领导了，因为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已经提高；必须使这种积极性以苏维埃的形式表现出来，使这种积极性通过苏维埃，而不是绕过苏维埃。谁能在农村中活跃苏维埃和在党的周围培养农民积极分子，谁就能做领导工作。

现在不能按照旧方式进行领导了，因为农村中的经营积极性已经提高；必须使这种积极性以合作社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这种积极性通过合作社，而不是绕过合作社。谁能在农村中开展合作社运动，谁就能做领导工作。

农村中党的领导的具体任务大体上就是这些。

六　关于金属工业

现在来谈最后一类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已经讨论过了。

我们经济领导方面的新的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

新的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经济计划已经开始落后于我们经济的实际发展，我们的经济计划订得太低，因此它们常常赶不上经济的实际发展。

我们的国家预算就是这件事实的一个明显表现。你们知道，由于我们的预算草案没有估计到我们预算的收入项目的迅速增多，我们曾不得不在半年内三次更改我们的国家预算。换句话说，我们的预算草案和我们的预算计划赶不上国家收入的增多，因此国库中有了剩余。这就是说，我国经济生活的洪流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向前奔腾，把我们财政专家的一切科学计划都冲垮了。这就是说，我们正处于经济和劳动热情的蓬勃高涨中，这种情况和内战后的美国比起来，实有过之

而无不及。

我国金属工业的发展可以认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这种新情况的最明显表现。去年金属的产值为一亿九千一百万战前卢布。去年十一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年度计划的预计产值为二亿七千三百万战前卢布。今年一月，由于这个计划和金属工业的实际发展速度不相适应，因而修改了一下，把产值提高到三亿一千七百万卢布。今年四月，这个扩大的计划又不切实际了，因此不得不把预计产值提高到三亿五千万卢布。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连这个计划也低了，因为还必须进一步扩大这个计划，使预计产值达到三亿六千万至三亿七千万卢布。

换句话说，今年金属工业的产值比去年的产值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更不用说我们轻工业的巨大发展以及运输业和燃料工业等等的发展了。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建立作为社会主义主要基础的工业方面，我们已经走上了广阔的发展道路。至于说到作为全部工业的基本动力的金属工业，那末停滞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金属工业是有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一切条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说得对，我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金属国家。

几乎用不着再证明，这个事实无论对我国内部的发展或对国际革命，都有巨大的意义。

毫无疑问，从内部发展方面来看，我国金属工业的发展及其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它意味着我国全部工业的发展，意味着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金属工业是全部工业的主要基础，因为如果没有金属工业的蓬勃发展，轻工业、运输业、燃料工业、电气化或是农业就都不能立足。金属工业的发展是全部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请听列宁关于“重工业”（列宁主要是指金属工业）所说的话吧：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

品的轻工业的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而要使重工业情况良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努力。”

还有：

“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五页）

至于我国金属工业发展的国际意义，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金属工业的蓬勃发展，如果不是直接证明无产阶级不但能够破坏旧东西而且能够建设新东西，不是直接证明无产阶级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建成新工业和建成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那又是表明什么呢？用事实而不是用书本上的东西来证明这一点，这就等于有把握地彻底地把国际革命事业向前推进。西欧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并不是偶然的。这对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有极伟大的鼓动意义和实践意义。工人们到我国来，考察我们工厂的每个角落，——这种情况说明，他们不相信书本，而想用亲身的体验证实无产阶级有建设新工业和创造新社会的本领。你们可以深信，一旦他们证实这一点，国际革命事业就会一日千里地向前推进。

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都注视着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世界规模的斗争已转到这个战场上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一定会最终地**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以缓慢的、逐步的——求速是不行的——而又是不断的上升和前进去取得胜利。”[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页）

————————————

① 着重号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我们全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金属工业的发展的国际意义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大约有四百万工业无产者。这个数目当然很小，但毕竟还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建立起我国的国防，使无产阶级的敌人发抖。然而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停留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工业无产者，我们要使我国各主要地区电气化，我们要有合作化的农业和高度发达的金属工业。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任何危险了。到那时我们就一定会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

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历史意义正是在于：它明确地指出了走向这个伟大目标的道路。

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列宁的道路，是使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道路。

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大体上就是这样。

载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和十三日
“真理报”第一〇六号和第一〇七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7卷第62—91页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同志们！首先让我向你们祝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建校四周年纪念。不用说，我祝你们的大学在为东方培养共产主义干部的艰难的道路上获得各种成就。

现在我们来谈谈本题。

如果分析一下东方劳动者大学的成分，那就不能不发觉这个成分的某种两重性。这个大学里有不下五十个东方民族和民族集团的代表。这个大学的学生都是东方的儿女。但是这个定义还没有提供任何明确而完整的概念。因为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由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条件的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人是从**苏维埃**东方，从不再有资产阶级政权、已经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并且已经由工人执政的那些国家来的。第二部分学生是从**殖民地**和**附属国**来的，也就是从资本主义仍在统治、帝国主义压迫尚完全保存、还必须赶走帝国主义者以争取独立的那些国家来的。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两个过着不同生活并且在不同条件下发展着的东方。

不用说，学生成分的这种两重性不能不影响东方劳动者大学的工作。这恰恰说明这个大学的一只脚是踏在苏维埃的土地上，另一只脚是踏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土地上。

因此，这个大学有两个工作方针：一个方针就是造就能为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需要服务的干部；另一个方针就是造就能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劳动群众的革命要求服务的干部。

因此在东方劳动者大学面前也就产生了两类任务。

现在让我们来分别地考察一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这两类任务。

一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所担负的任务

这些国家，这些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不同于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这些共和国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

第二、它们是作为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而受苏维埃政权保护的民族在发展着和巩固着。这是史无前例的事实，但这毕竟是事实。

第三、它们的工业不大发达，但是它们在自己的发展中完全可以依靠苏联工业无产阶级的援助。

第四、这些共和国已经摆脱了殖民压迫，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并且成为苏维埃联盟的成员，因此它们可以而且应当参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基本任务就是：促进这些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参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些共和国存在的特殊条件，创造和发展能够推进并且加速这一工作的前提。

因此，苏维埃东方的积极工作者的当前任务就是：

（一）在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内建立工业基地，以作为把农民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的基础。你们知道，这项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并且将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而向前推进。这些共和国拥有各种原料，这是这项工作将来可以进行到底的保证。

（二）发展农业，首先是兴修水利。你们知道，这项工作也有进展，至少在南高加索和土尔克斯坦是如此。

（三）开展和推进农民和手工业者广大群众的合作化工作，这是把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纳入苏维埃经济建设总体系的最可靠的方法。

（四）使苏维埃接近群众，使苏维埃的成分民族化，从而建立接近劳动群众并为他们所理解的本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

（五）发展民族文化，广泛地建立使用本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的和职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以便从本地人中间培养苏维埃干部、党的干部和有专长的经济干部。

完成这些任务，也就是促进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有人在谈论苏维埃东方的模范共和国。什么是模范共和国呢？模范共和国就是能真心诚意地完成这几项任务，从而使邻近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人农民热中于解放运动的共和国。

上面我已经谈过使苏维埃接近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问题即苏维埃民族化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接近怎样在实践中表现出来呢？我认为，不久前在土尔克斯坦完成的民族疆界的划分，可以说是这种接近群众的范例。资产阶级报刊认为这种疆界划分是“布尔什维克的诡计”。其实很明显，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诡计”，而是土尔克明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他们要求有接近他们并为他们所理解的自己的政权机关。在革命以前的时代，这两个国家被分裂成许多小块，建立了好多个不同的大小国家，成为“当权者”实行剥削诡计的方便场所。现在时机到了，现在已经有可能把这些被分裂的小块**重新联合**成独立的国家，使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尔克明斯坦的劳动群众和政权机关接近并且打成一片。土尔克斯坦的疆界划分首先表明这两个国家的分裂部分**重新联合**成独立的国家。既然这些国家后来愿意加入苏维埃联盟而作为它的平等的一员，那末这只是说明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把能满足东方人民群众强烈愿望的钥匙，说明苏维埃联盟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同民族劳动群众的自愿联合。资产阶级为了使

波兰重新统一，进行了许多次战争。而共产党人为了使土尔克明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重新联合，却只进行了几个月解释性的宣传工作。

这就说明应当怎样使管理机关（这里指的是苏维埃）和不同民族的广大劳动群众接近。

这就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其次，我讲过关于提高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民族文化的问题。什么是民族文化呢？怎样把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呢？难道列宁不是在战争以前就说过我们这里有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且说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力图用民族主义毒素来毒化劳动者意识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吗？怎样把民族文化的建设，把增设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和训练班的工作以及从本地人中间培养干部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呢？这里有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呢？当然没有！我们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当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无产阶级执政的时候，当各民族在苏维埃政权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口号。谁不了解这两种不同情况的原则性的差别，谁就永远不会了解列宁主义，也永远不会了解民族问题的实质。

人们（例如考茨基）谈论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一切语言的消亡而形成的统一的全人类的语言。我不大相信这个无所不包的统一语言的

理论。无论如何，经验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这种理论。直到现在，情形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语言的数目，因为它震动了人类的最下层，把他们推上政治舞台，唤起早先大家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许多新的民族去追求新的生活。谁能想到过去的沙皇俄国是一个至少有五十个民族和民族集团的国家呢？可是十月革命打断了旧的锁链，把许多被遗忘了的民族和部族推上舞台，给了他们新的生活和新的发展。现在大家都说印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几乎用不着怀疑，一旦在印度发生革命震动，就一定会有几十个早先大家不知道的、有自己的独特语言和独特文化的民族出现在舞台上。如果谈到各民族参加发展无产阶级文化，那末这种参加一定会采取符合这些民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形式，这一点也几乎用不着怀疑。

不久以前我接到几位布里亚特同志的来信，他们要求我说明一下全人类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而困难的问题。这封信写道：

“我们恳切地请你说明下面几个我们感到非常重大和困难的问题。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创立统一的全人类文化。怎样设想通过在我们各个自治共和国领域内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向统一的全人类文化过渡呢？各个民族的文化（语言等等）的特点怎样才能同化呢？”

我认为以上所说的可以作为对布里亚特同志所渴望解决的问题的答复。

布里亚特同志提出在创立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过程中个别民族的同化问题。毫无疑问，有些民族可能会经受到、恐怕一定要经受到同化过程。这样的过程从前是有过的。但是问题在于，一些民族的同化过程并不排斥许多有生气的和正在发展的民族的强盛和发展这一相反的过程，而是以这一过程为前提，因为个别民族的局部同化过程是各民族一般发展过程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某些民族可能发生的同化就不会削弱而会证实下面这个完全正确的论点：全人类的无产阶级

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一样。

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积极工作者的当前任务大体上就是这样。

这些任务的性质和内容就是这样。

必须利用已经到来的加紧进行经济建设和对农民实行新的让步的时期，来加速完成这些任务，从而促进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这些共和国多半是农民国家）参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有人说，党对农民的新政策既然实行了许多新的让步（短期租佃、容许雇佣劳动），那末它就含有若干退却的因素。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对。但是，这是我们**在**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巨大的优势的**条件下**所容许的一些退却因素。稳定的通货、日益发展的工业、日益发展的运输业、日益巩固的信贷系统（依靠信贷系统，通过优惠信贷，可以使任何居民阶层破产或提到较高的阶段而不发生丝毫震动），——这一切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手中的后备力量，有了这些后备力量，战线上某一地段的若干退却因素就只能促进全线的进攻准备。正因为如此，党对农民实行的一些新的让步在目前一定不会阻碍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反而会促进这一事业。

这种情况对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的意义，就是它给这些共和国的积极工作者一种新的武器，这种武器能促进和加速这些国家同苏维埃经济发展总体系的结合。

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和苏维埃东方积极工作者当前民族任务之间的联系就是这样。

因此，东方民族大学对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所担负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共和国培养干部，以保证上述各项当前任务的完成。

东方民族大学不能脱离生活。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生活的机关。它应当使自己和实际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它不能撇开东方各

苏维埃共和国的当前任务。正因为如此，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就是：在为这些共和国培养适当的干部的时候要考虑到它们的当前任务。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苏维埃东方积极工作者的实践中所存在的两种倾向。为了给苏维埃东方培养真正的干部和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在这个大学内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

第一种倾向就是简单化，就是把我在上面所说的那些任务简单化，企图机械地搬用在苏联中央地区完全可以理解而且适用、但是完全不适合所谓边疆地区的发展条件的一套经济建设办法。有这种倾向的同志不懂得两个道理。他们不懂得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且是相差很远的。此外，他们还不懂得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不相同，其中如格鲁吉亚和阿尔明尼亚处于民族形成的高级阶段，彻岑和卡巴尔达处于民族形成的低级阶段，而柯尔克兹则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这些同志不懂得，如果不适应当地的条件，不周密地考虑每个国家的各种特点，就办不成任何重大的事情。这种倾向的后果就是脱离群众，蜕化成左派清谈家。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就是：用和这种简单化作不调和的斗争的精神来教育干部。

第二种倾向恰恰相反，是夸大地方的特点，忘记了把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同苏联工业区联系起来的那些共同的和主要的东西，漠视社会主义的任务，迁就狭隘的有局限性的民族主义的任务。有这种倾向的同志很少关心自己国内的建设，而宁可听其自然发展。在他们看来，主要的不是国内建设，而是“对外”政策，是扩大自己共和国的疆界，同周围的各共和国争执，希图夺取邻国一小块土地以取悦于本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种倾向的后果就是脱离社会主义，蜕化成普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就是：用和这种隐蔽的民族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的精神来教育干部。

这就是东方民族大学对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所担负的任务。

二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担负的任务

现在来谈第二个问题，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担负的任务问题。

这些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不同于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这些国家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生存着和发展着。

第二、双重压迫即内部压迫（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外部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迫）的存在使这些国家的革命危机尖锐化和深刻化。

第三、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国家，如印度，资本主义在迅速地发展着，因而产生和形成了人数相当多的本国无产阶级。

第四、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分裂成两部分即革命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妥协部分（大资产阶级），前者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后者则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

第五、除帝国主义联盟外，在这些国家中还形成了另一种联盟，即工人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以摆脱帝国主义而谋求彻底解放为目的的反帝国主义的联盟。

第六、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以及使人民群众摆脱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问题，愈来愈带有迫切的性质。

第七、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同西方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一）不取得革命的胜利，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而获得解放，因为独立是不会无代价地得到的。

（二）不孤立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使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摆脱这个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策，不把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织成独立的共产党，革命就不可能向前推进，资本主义发达的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就不可能争得完全的独立。

（三）没有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和西方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结合，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就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

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根据这些结论来进行革命工作。

在这些情况下，各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的当前任务是什么呢？

目前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特点就是：天地间不再有统一的和无所不包的殖民地东方了。从前人们把殖民地东方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和同一式样的整体。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现在至少有三类殖民地和附属国。第一类是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工业完全不发达。第二类是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第三类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内有人数较多的无产阶级。

很明显，决不能把所有这些国家混为一谈。

在摩洛哥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还不具备分裂为革命派和妥协派的基础。对于这类国家，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采取一切办法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类国家中，共产主义者只有在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对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以后，才能结成统一的政党。

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

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如果这种两重成分的政党不束缚共产党的手脚，不限制共产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自由，不妨碍把无产者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并且能使共产党便于对革命运动进行实际领导，那它就是需要的和适当的。如果这种两重成分的政党不符合这一切条件，那它就是不需要的和不适当的，因为它只会使共产主义者融化在资产阶级中间，使共产党失去无产阶级大军。

像印度这类国家的情况就有些不同。象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基本的和新的情况不但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而且首先在于这个阶级的妥协部分基本上已经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这部分资产阶级最富裕，最有势力，他们害怕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更厉害，关心自己的钱袋比关心自己祖国的利益更多，因此他们的两只脚都站在革命的死敌的阵营中，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不摧毁这个联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要摧毁这个联盟，就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揭穿他们的背叛行为，使劳动群众摆脱他们的影响，并且要不断地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准备必要的条件。换句话说，问题是要在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培养无产阶级去担当解放运动的领袖，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言人从这个光荣的岗位上挤下去。任务就是建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并且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这个联盟可以采取表面上由统一的纲领联系起来的统一的工农政党的形式，但不是永远必须采取这种形式。在这类国家中，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应当是先进的共产主义者的基本口号，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领导权准备条件并实现这一领导权。但是共产党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翼建立公开的联盟，以便孤立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城乡千

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因此，资本主义发达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的当前任务是：

（一）把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并且建立独立的共产党。

（二）建立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联盟以反对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盟。

（三）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

（四）为使城乡小资产阶级摆脱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斗争。

（五）保证解放运动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

这就是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积极工作者的三类当前任务。

如果就目前国际形势来考察这些任务，那末它们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和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国际形势的特征是：革命运动已经进入了暂时的平静时期。什么是平静呢？目前它能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对西方工人、对东方殖民地、而首先是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旗手苏联的压力的加强。几乎用不着怀疑，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开始了。因爱沙尼亚的起义而进行诬蔑性的宣传，因索非亚爆炸事件而无耻地攻击苏联，资产阶级报刊的一致攻击我国，——这一切都是进攻的准备阶段。这是舆论上的炮火准备，其目的是训练庸人来攻击苏联并且替武装干涉创造道义上的前提。这种造谣诬蔑性的宣传的效果如何，帝国主义者会不会冒险实行大规模的进攻，——这我们还要看一看。但是这些攻击注定对于殖民地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一点恐怕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因此，准备革命的联合力量去反击可能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打击，这是当前必然产生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坚决完成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当前任务，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这种种情况下，东方民族大学对殖民地和附属国所负的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就是：考虑这些国家革命发展的一切特点，培养来自这些国家的干部，以便保证上述各项当前任务的完成。

东方民族大学的学生大约分为十个不同的班，他们来自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大家知道，这些同志渴望光明和知识。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同志造就成真正的革命者，造就成由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具有列宁主义的实际经验的、能够真心诚意地完成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当前任务的革命者。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殖民地东方的积极工作者的实践中所存在的两种倾向。为了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必须同这两种倾向作斗争。

第一种倾向就是过低估计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过高估计在这些国家建立无所不包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而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状况和发展程度。这是一种右的倾向，它包藏着降低革命运动的作用，使共产主义者的歌声融和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大合唱里的危险。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是东方民族大学的直接义务。

第二种倾向就是过高估计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和过低估计工人阶级和革命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工作。爪哇的共产党人似乎有这种倾向，他们在不久以前错误地提出了在本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是一种左的倾向，它包藏着脱离群众，使共产党变成宗派的危险。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是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培养真正的革命干部的必要条件。

东方民族大学对苏维埃东方和殖民地东方的各族人民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大体上就是这样。

我们希望东方民族大学能够光荣地完成这些任务。

载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一一五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7卷第92—103页

问 题 和 答 复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

同志们！我来回答你们书面提出的问题。我将按照你们问题单上的排列次序来回答问题。你们知道，这些问题一共有十个。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一

如果苏联在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内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支持，那末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和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包括了你们书面提出的其余一切问题。所以我的回答将是一般性的，因而远不是详尽的。否则在回答其余问题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认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这些决议指出，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就是巩固结合的基本保证。

什么是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呢？

只有经济、行政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保证巩固结合的若干措施才能组成这种政策。

我们先从经济方面谈起。

首先，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其次，必须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以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增长，

并且消灭“剪刀差”。此外，必须缩减农业税的总额，并且逐渐使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上。必须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合作化，首先是使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因为合作化是把农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的手段。必须最大限度地供给农村拖拉机，因为这是使农业进行技术革命的手段，也是在农村中创立文化技术基地的方法。最后，必须实行电气化计划，因为这是使农村接近城市和消灭城乡对立的手段。

这就是党在经济方面保证城市和农村的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

我希望你们注意农业税由国家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的问题。这也许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但是农业税现在具有并且将来也一直具有地方税的性质，这是事实。例如，大家知道，以前，大约两年以前，农业税是我们国家预算中的一项主要的或者几乎是主要的收入。而现在呢？现在它在国家预算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了。国家预算现在是二十五亿卢布，而农业税在今年将要提供的和能够提供的至多不过二亿五千万到二亿六千万卢布，比去年的总数要少一亿卢布。可见，这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国家预算愈增多，农业税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就愈缩小。其次，在这二亿六千万农业税中有一亿卢布正在转入地方预算。这占全部农业税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现有的一切税收中，农业税最接近地方条件，最适于用做地方需要。不用怀疑，整个地方预算将日益增加。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地方预算的增加，首先是依靠那些要求最大限度地适合地方条件的农业税。国家收入的重心已经转到并且将要整个转到他种收入，即国营企业收入和间接税等等方面去，这是更可以肯定的。

正因为如此，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将来会成为可能的，从巩固结合的观点来看是完全适当的。

现在来谈谈在行政政治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

为了精简国家机关并且使它们在精神上健全起来，为了驱逐国家

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为了使国家机关彻底接近千百万群众，就应当在城市和农村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并且活跃苏维埃，——这就是党在行政政治建设方面巩固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本身。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过渡，就必须按照能够真正保证专政的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和方法，来准备改造国家机关。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在城市和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吸收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直接管理国家的口号，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改善国家机关，认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使国家机关成为同广大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群众本身对国家机关的经常和积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到管理机关中来，不建立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最“下层”的直接联系，要得到群众积极的和不断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首先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因此它和人民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按它的本质来说，是和人民群众背道而驰的。而苏维埃国家机关却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因为如果它想把自己保持为苏维埃国家机关，它就不能而且不应当站在群众之上，因为如果它真正想团结千百万劳动群众，它就不能同这些群众背道而驰。这就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原则性的区别之一。

列宁在他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小册子中曾经说过：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无疑是能够管理国家来为穷人谋福利而反对富人的，因为他们决不会比过去管理国家来为富人谋福利而反对穷人的十三万地主差。有些共产党员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国家机关只要有几十万党员就够了，认为这就足以管理巨大的国家了。因

此，他们有时并不反对把党和国家看做一个东西。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曲解列宁的思想。列宁说到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时，决不是想说苏维埃国家机关的人数和总的规模就以此为限，或者可以以此为限。恰恰相反，列宁除了把党员列为国家机关的人员外，还把在当时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一百万人也包括在内，他说，我们有方法一下子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就是说，用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的方法，至少能使国家机关达到一千万人。

列宁说：“这二十四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一百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正是党员数目同党所拥有的选票数目的这种比例关系，已经由欧洲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譬如说，至少已经由彼得堡杜马的八月选举确定了。因此我们的‘国家机关’已经有了**一百万**人，他们在思想上忠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月二十日领取一大笔钱。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的‘绝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并且也不可能有的。这个绝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农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十七页）

但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农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这件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

这件事情是通过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厂委员会、文化机关、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各种合作组织以及其他等等的周围所组成的那些群众发起的组织、各种委员会、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来进行的。我们的同志有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基层党组织、苏维埃机关、文化机关、工会组织、教育机关、共青团组织、军队组织、妇女部和其他一切组织的周围，有大批的拥有千百万非党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委员会和会议在活动着，它们在自己日常的细小烦琐的和无声无臭的工作中建立着苏维埃的基础和生活，创造着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泉源。没有

这些环绕着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拥有千百万群众的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对巨大国家的领导和管理都是决不可能的。苏维埃国家机关不仅仅是由苏维埃组成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就这个词的深刻意义来说，是由苏维埃加上拥有千百万群众的各种各样非党的和党的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把苏维埃同最“下层”结合起来，使国家机关同千百万群众**打成一片**，并且在逐步消除着国家机关同人民之间的任何类似壁垒的东西。

因此，我们应当竭力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使它成为同千百万劳动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把官僚主义的残余从国家机关中铲除出去，使国家机关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准备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活跃苏维埃和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

这就是在党的行政政治工作方面巩固结合所必需的基本措施。

至于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那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些措施都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解释了。我只想指出最近时期这方面工作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就是要为在全国即在全苏联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准备必要的条件。同志们，这是极重大的改革。实行这种改革，将不仅是文化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而且也会是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这种改革必定成为国家巨大发展的基础。但是，实行这种改革要花费几亿卢布。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要实行这种改革，需要一支差不多有五十万名男女教师的大军。不管怎样，如果我们真想使国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最近时期实行这种改革。同志们，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用怀疑的。

这就是对你们第一个问题的答复。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

二

如果资本主义的稳定长久保持下去，那么这种稳定会产生哪些使我们党蜕化的危险呢？

一般说来，我们这里有没有这些危险呢？

这些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我们这里存在的危险是同稳定无关的。稳定仅仅使这些危险更加明显。

这些危险中主要的我认为有三种：

（甲）我国的建设事业失去社会主义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取消主义；

（乙）失去国际革命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主义；

（丙）降低党的领导的危险，以及由此可能使党变成国家机关的附属品。

我们先从第一种危险谈起。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不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胜利。

这是取消主义和蜕化的道路，因为它会取消十月革命的基础和目的，会使无产阶级国家蜕化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

这种“思想”的来源和它在党内产生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国民经济内部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展开殊死斗争的条件下对党的影响的加强。资本主义分子不仅在经济方面进行斗争。他们还竭力把斗争转到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方面，企图把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疑我们建设工作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思想传染给党内最不稳定的队伍，而且不能说，他们的这种努力是绝

无成效的。

一些受到传染的“共产党员”说：“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哪里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生产力的状况不允许我们提出这种空想的目的，只要能马马虎虎支持下去就行，我们哪能建成社会主义呢，反正就是建设吧，将来自见分晓……”

另外一些人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使命，实现了十月革命，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国际革命，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严格地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经无事可做了”……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三年，在德国革命爆发的前夕，我国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准备抛掉书本到德国去，他们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经无事可做，应当抛掉书本到德国去干革命。”

可见，这两类“共产党员”，无论第一类或者第二类都是站在否认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立场上，站在取消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类用“科学的”“生产力论”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无怪乎前几天米留可夫赞扬他们，在“最近新闻报”上称他们为“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类则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

事实上，就假定说，革命者在俄国无事可做；假定说，社会主义没有在其他国家获得胜利以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不能想象和不可能的；假定说，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的胜利还要延迟十年到二十年，那在这些条件下，能不能设想我们经济中那些在资本主义包围我国的情况下活动着的资本主义成分，会同意停止同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作殊死的斗争，并且会袖手等待世界革命的胜利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了解这种假定是多么荒谬了。既然这种假定不能成立，那末我们这些“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常革命的革命家”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显然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干，就是开开空车，听从自发势力的支配，并且逐渐蜕化成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国家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我们拥有像列宁所说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那末我们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这样的社会，来完全战胜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或者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革命的基地，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我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当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延缓的时候，就应当容许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占上风，容许苏维埃政权瓦解，容许党蜕化。

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

所以，不相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取消主义和蜕化。

所以，特别在现在，特别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情况下，同取消主义的危险作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我们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就不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后的胜利，因为只要革命还没有在若干国家里获得胜利，它就不可能保证不遭受武装干涉；不了解国际主义的基本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

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如果说，第一种危险即取消主义危险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即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那末这第二种危险即民族主义危险的根源，应当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即在资产阶级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

从另一方面来看，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

所以，失去国际革命的前途，就会产生民族主义和蜕化的危险。

所以，同对外政策方面的民族主义危险作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最后谈谈第三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党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党的领导；国家机关力图削弱党的领导，摆脱党的领导；不了解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危险是从三方面来的。

第一、需要领导的各个阶级已经发生变化。现在的工人和农民已

经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工人和农民。在以前，工人阶级是丧失阶级性的，是散漫的，而农民则是充满恐惧的，他们唯恐国内战争一旦失败，地主又要回来，而且党在这个时期是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的唯一集中的力量。现在我们这里是另一种情况。战争已经没有了，因而使劳动群众集合在党的周围的军事危险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无论在文化方面或者在物质方面都已经复原并且提高了。农民也同样地提高和发展了。这两个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正在增长并且会继续增长。现在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已经不行了。第一、在领导中必须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第二、对工人和农民的要求和需要必须有特殊的敏感。第三、必需善于把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增长而涌现出来的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优秀人物吸收到党内来。但是大家知道，这些条件和品质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因此在向党提出的要求和目前党所具备的可能性之间产生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因此也就产生了削弱党的领导的危险和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

第二、在最近时期，即经济发展时期，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各个机关已经大大发展和巩固了，托拉斯、辛迪加、贸易机关、信贷机关、行政政治机关、文化教育机关以及各种合作社等，都吸收了几十万新的人员，主要是非党人员，因而大大发展和扩大了。这些机关不仅自己的成员增多了，而且它们的力量和比重也增大了。而它们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因此，在这些机关内部必须根据能够保证党在新环境中的领导这一点来重新配置力量和配备领导人员。但是大家知道，要一下子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此就产生了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

第三、工作本身复杂化和多样化了。我指的是现在的建设工作。无论是农村的或是城市的许多工作部门和分部门都复杂化和发展了。因此，领导就更为具体了。从前通常都讲“一般的”领导。现在“一

般的”领导就是句空话，因为这句空话里并不包含什么领导内容。现在需要的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过去一个时期培养了一种自以为知识广博、准备解答一切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工作人员。现在这种旧型的自以为知识广博的工作人员，应当让位给竭力要成为某一工作部门行家的新型工作人员了。要真正地实行领导，就应当懂得业务，就应当认真地、耐心地和顽强地钻研业务。不懂得农业，不懂得合作社，不熟悉价格政策，不研究同农村有直接关系的法律，就不能在农村中进行领导。不懂得工业，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倾听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会和俱乐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进行领导。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切呢？很遗憾，不能。要把党的领导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水平。现在应当把工作人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质量，并不那么容易。遗憾的是，那种不去熟悉业务而急于求成发号施令的旧习惯，依然存在于党的组织中。正因为如此，所谓党的领导有时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谁也不需要的命令，退化成不触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头上的“领导”。这就是削弱和降低党的领导的最严重危险之一。

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所以会引起党的瓦解和蜕化的理由，一般说来就是如此。

所以，同这种危险作坚决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这就是对你们第二个问题的答复。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

三

怎样同富农进行斗争而又不挑起阶级斗争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含糊，所以是提得不正确的。这里指的是哪一

种阶级斗争呢？如果指的是农村中一般的阶级斗争，那末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反对富农的。而无产阶级和全体农民之间的矛盾，——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虽然这种阶级斗争具有很特殊的形式）吗？无产阶级和农民现在是我们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固然，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并且终究是可以克服的，但这毕竟是引起这两个阶级之间斗争的矛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认为，如果指的是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则我国的阶级斗争有三条主要的战线：

（甲）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农民之间在规定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最高价格，在使税收工作正常化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

（乙）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富农之间在消灭农产品的投机价格，在把税收负担的主要重心转到富农身上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

（丙）贫农，首先是雇农同富农之间的斗争战线。

你们可以看出，这几条战线无论在它们的比重上，或者在它们那里所发生的斗争的性质上，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对待这几条战线上的几种阶级斗争的态度，也应当是有区别的、不一样的。

让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

第一条战线。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考虑到我国工业薄弱和不可能为我国工业获得借款，规定了许多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可以使我国工业免受外国工业竞争的侵袭，并且能够为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而加快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就是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关于农业税、关于国家收购农产品的形式、关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贯彻计划原则的措施。这一切都是以工业的主要部门、运输业和信贷业的国有化为基础的。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已经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就是说既制止了工业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又制止了农产品价

格的急剧上涨。从另一方面来说，很明显，因为全体农民要购买工业品，要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所以他们总想用尽量低的价格获得工业品，用尽量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同时农民还希望完全没有农业税，或者至少把农业税降到最低限度。

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发生斗争的基础。

国家能不能不采取上述各项主要措施呢？不，不能。因为在目前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会使我国工业遭到破坏，使无产阶级趋于毁灭，使我国变成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殖民地，使我们的整个革命遭到失败。

全体农民是不是愿意取消我们国家的这些主要措施呢？不，不愿意。因为在目前取消这些措施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胜利，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为了一小撮富人即一小撮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使大多数农民贫困的发展道路。谁敢断言，农民愿意自己贫困，愿意把我国变成殖民地，根本不愿意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呢？

这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结成联盟的基础。

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工业机关依靠垄断制就可以抬高工业品价格，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工业本身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首先会损害工业本身，使我国工业不可能从昨天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娇弱植物变成明天应有的坚固强大的工业。由此就产生了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你们知道，这个运动获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

此外，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收购机关依靠垄断制，就可以随意降低农产品的价格，而使农民破产，损害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首先会危害工业，因为，第一、它会使对工人的农产品供应发生困难，第二、它会完全瓦解和扰乱我们工业的国内市场。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所谓“剪刀差”的运动。你们知道，

这个运动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地方机关或者中央机关，依靠农业税的法律和利用自己征税的权力，就可以把这种法律看做某种绝对的东西，就可以在自己实际工作中捣毁那些力量单薄的纳税者的谷仓，拆掉他们的屋顶，像在唐波夫省某些地区发生过的那样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会破坏农民对无产阶级、对国家的一切信任。由此就产生了党在最近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减少农业税，使这种税收多少具有地方性，整顿我国的整个税收工作，消除那种由于征税而在某些地方表现出来的粗暴行为。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因此，第一、在根本问题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愿意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二、在当前问题上，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产生了这个联盟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其比重来说，是被利益的一致性掩盖着的，这种斗争在将来工人和农民不再是阶级的时候，即当他们都变成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是必然会消失的。第三、我们拥有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们是在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范围内根据两个同盟者的利益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我们不仅拥有这些方法和手段，而且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复杂情况下，已经卓有成效地使用了这些方法和手段。

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在这条战线上挑起阶级斗争呢？不，不能。恰恰相反！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竭力设法减弱这条战线上的斗争，用协商和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调节这一斗争，并且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导向尖锐化的形式，导向冲突。我们现在正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这样做的一切可能性。因为在这里利益的一致性比利益的矛盾更有力和更深刻。

可见，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不适合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

第二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无产阶级（以苏维埃国家为代表）和富农。这里的阶级斗争也具有独特的形式，正像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中阶级斗争具有独特的形式一样。

国家希望使农业税具有极为明显的所得税性质，把这种税收的主要负担转到富农肩上。而富农对这一点却“千方百计地”竭力摆脱，他们利用自己在农村中的一切力量和一切影响来把税收的负担转到中农和贫农的肩上去。

国家在制止生活费用上涨和竭力保持工资稳定的同时，竭力采取经济性的措施，规定出完全符合农民经济利益的最高的公平的农产品价格。而富农却去收买贫农和中农的农产品，收集了大批存粮，把它们囤积在自己的谷仓里，而不拿到市场上去，以便人为地抬高农产品的价格，把农产品价格抬高到投机价格，然后才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榨取投机的暴利。你们也许知道，今年在我国某些省份，富农已经把粮价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因此，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具有独特的和比较隐蔽的形式。

可能有人认为，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适用于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同样不愿意挑起阶级斗争。因为在这里我们完全能够并且应当避免挑起斗争，避免同斗争有关的各种纠纷。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活跃苏维埃，在苏维埃内部争取中农和组织贫农，以便减轻基本农民群众的纳税负担，而将税收的主要负担真正转到富农的肩上。你们知道，在这方面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的，这些措施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使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储备，为了对粮食市场施加压力，必要时加以干涉，为了保持劳动群众所能接受的价格，从而粉碎富农的投机阴谋，这种粮食储备是必要的。你们知道，我们今

年在这方面已经用去几千万普特的粮食了。你们应当知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已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不仅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顿巴斯、依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等地区保持住了低廉的粮价，而且还迫使许多地区的富农投降，强迫他们把过去的存粮按不高的价格抛到市场上去。

当然，在这里问题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富农自己会挑起阶级斗争的，他们企图使阶级斗争达到沸点，企图使这种斗争采取匪徒骚扰或暴动的形式，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那时挑起斗争的口号就已经不是我们的口号，而是富农的口号，也就是反革命的口号了。此外，毫无疑问，到那时，富农一定会亲身体验到这一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口号的一切不利之处了。

可见，在这第二条战线上挑起斗争的口号，并不是我们的口号。

第三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贫农，而首先是雇农；另一方面是富农。这里，国家在形式上是站在旁边的。可见，这一条战线并不像前两条战线那样广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明显的和公开的，而前两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是被掩盖的和比较隐蔽的。

这里的问题是富农—企业主直接剥削雇佣工人或半雇佣工人。因此党在这里不能采取缓和斗争、减弱斗争的政策。**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组织贫农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并且领导这一斗争**。

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要挑起阶级斗争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挑起斗争不仅意味着组织和领导斗争。它同时意味着人为地激起和故意煽动阶级斗争。现在，当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我们这里行动完全自由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这种人为的办法呢？当然不需要。

因此，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也是不适合于这第三条战线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此。

可见，关于农村中阶级斗争的问题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简单。

现在我们来谈第四个问题。

四

工农政府是实际存在着，还是一个鼓动的口号？

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有些荒谬的。

工农政府是实际存在着，还是一个鼓动的口号，这种提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仅仅为了达到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称做“鼓动”的某种狡猾手腕的目的，党可以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这就是说，党可以提出一些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科学根据的口号。这是不是确实的呢？当然不确实。这样的党只能存在一个短时期，然后就会像肥皂泡一样消失掉。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党就不会是执行科学政策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漂浮在政治事变表面上的泡沫。

我们的政府，按它的性质、纲领和策略来说，是工人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府。对这一点不应当有任何误解和怀疑。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纲领：一个是无产阶级的纲领，另一个是别的什么纲领。它的纲领和它的实际工作都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政府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府。

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政府就不同时是工农政府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政府虽然按它的纲领和工作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政府，但同时又是工农政府。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基本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因为由于这个缘故，农民的利益就在无产阶级的纲领中，即苏维埃政府的纲领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因为苏维埃政府所依靠的是工农联盟，是在工农这两个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上建立起来的联盟。

最后，因为在政府机关的成员中，在苏维埃的成员中，除了工人以外，还有在工人领导下和工人一起反对共同敌人、一起建设新生活的农民。

所以“工农政府”的口号就不是一个空洞的“鼓动”口号，而是在共产主义纲领中具有科学根据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

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问题。

五

某些同志把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解释成对农民扩大民主和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呢？

事实上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在扩大民主呢？

是的，是在扩大。

这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

当然是的。

这种让步是不是很大，是不是限于我国宪法范围以内？

我认为这里的让步并不很大，它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宪法。

既然如此，我们改变的究竟是什么，让步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改变的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农村工作方法。我们改变的是农村中阻碍结合工作和妨碍党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那些已经建立的秩序。

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都是由一小群人在管理农村，这些人同县和省的联系多于同农村居民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使得农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县里看，而很少朝下看，朝农村居民

看，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农村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县和省负责，他们显然不懂得“上层”和“下层”在这里是一根链条，如果链条在下面裂开了，那末整根链条就必然散开。结果，一方面是管理者的无人监督、独断独行和任意横行，另一方面是农村中的不满和抱怨。现在正在坚决而彻底地消除农村中的这种秩序。

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农村苏维埃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而是一小群害怕丧失权力的管理者用许多诡计和压力来私拉“代表”的一种空洞的公文往返的手续。结果，就会有使苏维埃从一个同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变成一个同群众背道而驰的机关的危险，而工人对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基础和堡垒，则有悬在半空中的危险。你们知道，党因此不得不设法改选了苏维埃，而改选证明：许多地区的旧的选举方法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应当消灭这种有害的腐朽透顶的旧方法。现在正在消灭农村中的这种选举方法。

这就是让步的基础，在农村中扩大民主的基础。

这种让步不仅是农民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需要的，因为这种让步加强了无产阶级，提高了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威信，巩固了农民对无产阶级的信任。大家知道，让步和妥协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

目前这些让步的界限怎样呢？

这些让步的界限已经由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规定。你们知道，这些界限并不很宽，而且只限于我刚才讲过的那些范围。但这还不是说这些界限永久不能改变。恰恰相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巩固，随着西方和东方革命运动的发展，随着苏维埃国家国际地位的加强，这些界限无疑是会扩大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曾经说过，必须“**随着**剥削者反抗的停止，把苏维埃宪法推广到**全体**居民”（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一三〇页）。可见，这里所说的把

宪法推广到**全体**居民，其中也包括资产阶级。这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说的话。从那时起到列宁逝世有五年多的时间。可是，列宁在这段时期内一次也没提到实行这个原理是适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扩大界限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在苏维埃国家国内和国际的地位完全巩固以后，这种时候总会到来的，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预见到将来要进一步扩大民主，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在民主方面的让步必须限制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范围内。

这些让步会不会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呢？

不，不会改变。

这些让步会不会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即会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呢？

绝对不会，一点也不会。

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被削弱，它只是由于活跃苏维埃和吸收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参加工作而日益巩固了。由于扩大民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不仅保持着，而且还获得新的力量，在无产阶级周围造成信任的气氛。要知道，如果就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来说，这就是专政中主要的东西。

有些同志断定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只限于暴力的概念，这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实行**领导**，是**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除去专政的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党在苏维埃民主方面的新方针，会不会引起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

某种恶化呢？

不，不会引起的。恰恰相反！新方针只会改善工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暴力**因素，而红军是暴力的表现，那末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只会改善红军的状况，把红军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因为我们的军队主要是农民。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领导**因素，那几乎用不着怀疑，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只会使无产阶级便于实行这种领导，加强农民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建设**因素，那也几乎用不着证明，党的新方针只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因为它的实施是为了巩固结合，而没有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结论只有一个：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的让步只会加强无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丝毫不会改变我国政权的性质。

第五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六个问题。

六

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我们党是不是已经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如果是这样，这真是必需的策略手段吗？

显然，这里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指的是联合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的集团去反对该党的右派分子这件事。

我认为我们党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并没有实行任何让步。恰恰相反，整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是在孤立共产国际中的右派分子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读一读共产国际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决议，读一读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你们就不难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分子是共产国际所反对的主要目标。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说我们党已经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

严格地说，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并不是右派。他们并不赞同右派的政纲，即勃留恩派的政纲。确切些说，他们是动摇于列宁主义者和右派之间，带有动摇到右派方面去的倾向。他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表现的特点，就是他们一方面受到我们批评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右派所造成的分裂前途的威胁，他们在这一次动摇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动摇到列宁主义者方面来了，他们誓与列宁主义者结成反对右派的联盟了。他们这样做是好的。但是，同志们是否认为在动摇分子已经动摇到列宁主义者方面来的时候，在他们已经向列宁主义者让步而反对右派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欢迎他们呢？如果我们中间竟有人不能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起码道理，那是令人奇怪的，并且是可悲的。难道实践不是已经证明共产国际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吗？难道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没有同列宁主义者站在一个队伍里继续进行反对右派的斗争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勃留恩派不是已经孤立了吗？

也许有人问：这种情况会不会长久呢？我当然不知道会不会长久，我不做预言。无论如何，很明显，只要什麦拉里派同右派作斗争，就要同什麦拉里派联合起来，而一旦什麦拉里派改变了现在的立场，那末同他们的联合就必然会失去效力。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反对右派的联合**加强了**列宁主义者，使他们有领导动摇分子的**新的可能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而不在于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还会发生什么动摇。

有人以为列宁主义者对每个左派空谈家和神经衰弱者都一定会支持，以为列宁主义者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共产主义者中间固定不变的左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同工人阶级的非共产主义政党比较起来是左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已经死去的帕尔乌斯曾一度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比一切人都左些”，而他当时因为这一点是受到过列宁的严厉斥责的。在共产主义者中间，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我们就是列宁主义者。列宁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即在既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又反对右倾时，他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无怪乎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题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

我认为，如果同志们及时地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就不会向我提出这第六个问题了。

第六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七个问题。

七

由于农村党组织的薄弱，在农村中有没有因采取新方针而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呢？

有，这种危险是有的。未必用得着怀疑，在活跃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苏维埃选举，就意味着地方上有选举鼓动的自由。不用说，反苏维埃分子为了乘隙再次破坏苏维埃政权，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的。因此在农村中就有加剧和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库班、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等地改选前后的种种事实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许多地区的农村组织的薄弱加剧了这种危险。同样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的癖性也促使这一危险加剧起来。

这种危险因何产生，它的根源何在呢？

它的根源至少有两个。

第一、反苏维埃分子觉察到最近在农村中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富农的变动，觉察到许多地区的中农转到富农方面去了。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本来就可以猜测到。在改选以后，这种猜测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就是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一个根源，也就是主要的根源。

第二、在许多地区，有人把我们对农民的让步看做我们软弱的标志。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是可疑的。在改选以后就不容怀疑了。因此农村中的白卫分子发出了“继续施加压力！”的叫嚣。这就是农村中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二个根源，虽然不是那样重要的根源。

首先，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在农村中，目前时期是为争取中农而斗争的时期，把中农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是党在农村中最重要的任务**，不完成这个任务，反苏维埃鼓动形成的危险就会加剧起来，而党的新方针就只会对于白卫分子有利。

其次，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目前只有依据党在苏维埃、合作社、信贷、农业税、地方预算以及其他方面的新政策才能把中农争取过来，使用行政压力只会损害工作，把事情弄糟，应当通过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来说服中农，使他们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性，只有用实例，用示范的方法才能“争取”他们。

此外，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实行新方针不是为了活跃反苏维埃分子，而是为了活跃苏维埃和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新方针不是取消同反苏维埃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预定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反苏维埃分子说：“继续施加压力”，如果他们把对农民的让步看做我们软弱的标志，并且利用这些让步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那末我们就一定要向他们指出，苏维埃政权是牢不可破的，并且提醒他们说，监狱早就在等待他们了。

我认为，我们的这些任务如果能够被领会并且付诸实现，那末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和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就一定会彻底铲除。

第七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八个问题。

八

由于非党分子影响的加强，在苏维埃里有没有形成非党派别组织的危险呢？

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才有这种危险。如果比较有组织的非党分子的影响是在共产党员的影响还没有进入的地方增长起来，那就没有什么危险。例如，城市中的工会和农村中的近乎苏维埃的非党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是当非党的组织开始想以自己来代替党的时候，这种危险才开始产生。

这种危险是从哪里来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看不到或者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危险。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党的周围，在工人阶级中间，我们有大批非党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对党充满信任，并且把党同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连结在一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危险在农民中间特别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党在农民中间很薄弱，党还没有大批的能够把党同数千万农民连结在一起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然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农民中间那样迫切需要非党积极分子。

结论只有一个：要消除非党农民群众脱离党和疏远党的危险，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培养大批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

但是要一下子或者在几个月内就培养出这种积极分子是不可能的。只有逐渐在工作过程中，在活跃苏维埃的过程中，在发展合作社组织的过程中，才能从农民群众中间培养出和选拔出这种积极分子。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改变共产党员对待非党员的态度。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学会以兄弟般的信任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如果非党员所得到的是不信任，那末要求他们的信任是不可能的。列宁说过，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信任”的关系。列宁的这句话是不能忘记的。造成党员和非党员间相互信任的环境——这是为了给党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准备条件首先必须做到的。

但是这种相互信任怎样建立起来呢？当然不是一下子也不是通过命令就能建立起来的。如列宁所说的，这种相互信任只有通过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检查”，通过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相互检查才能建立起来。在第一次清党时期，曾经通过非党员检查党员，这使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党的周围造成了非常信任的气氛。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当时就已经说过，应当把第一次清党时在党员同非党员相互检查方面的教训推广到一切工作部门中去。我认为，现在应该记起列宁的这个意见并且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个意见了。

因此，党员和非党员在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所进行的相互批评和相互检查，是造成他们相互信任的气氛的手段，——如果党要想消除千百万非党分子同党疏远的危险，如果党要想在自己的农村组织的周围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这就是它所应当遵循的道路。

第八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九个问题。

九

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

或者这里指的是苏维埃国家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立即得到贷款援助，以此作为发展苏维埃工业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末，就可以作出一种符合于这一问题提法的回答。

或者指的是苏维埃国家在将来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从他们那里得到援助，以此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末，就得作出另一种回答。

为了使谁也不受委屈，我尽量对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的解释都作回答。

我们先从第一种解释谈起。

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贷款是否有可能发展苏维埃的大工业呢？

是的，有可能。这件事情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时还必须经历严重的考验，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外来的贷款还是能够实行我国的工业化的。

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强大工业国的形成和发展有过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侵占和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英国在世界各洲夺取了殖民地，它在两个世纪当中为加强本国工业而从殖民地榨取“追加资本”，最后变成“世界工场”。你们知道，我们是不能走这条发展道路的，因为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夺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不相容的。

第二条道路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道路。例如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德国在普法战争时期击败了法国，从法国榨取了五十亿的赔款，然后把这笔款项投入自己的工业。你们知道，这条发展道路也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不相容的，因为它在实质上同第一条道路毫无区别。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给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并且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向这些国家借款的道路。例如沙皇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沙皇俄国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出去，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取得西方强国的借款，因而就受到半殖民地生活的束缚，虽然它后来终于能够爬上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当然这免不了要靠几次比较“成功的”战争，也免不了要靠对邻国的掠夺。几乎无须证明，苏维埃国家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同各国帝国主义者血战三年，并不是为了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又心甘情愿地去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在这几条发展道路中，如果以为每一条道路在实际生活中都必定

是单纯地和其他道路截然分开地实现的，那就不对了。事实上，在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这几条道路往往是互相交错、互为补充的，并且有过交织在一起的范例。例如美国的发展历史就是这种几条道路交织在一起的例子。这种情况说明，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它们彼此有所区别，但是具有某些使它们相互接近，使它们能够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导致**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形成；第二、它们都是以采取某种方法从外面流入“追加资本”为前提的，**这是**建立这些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把它们搅在一起，混为一谈，不了解这三条发展道路毕竟是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三种不同方法，不了解这几条道路中的每一条道路都在这些国家的面貌上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那就更加不对了。

既然苏维埃国家不能走旧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要在不受奴役的条件下流入新的资本又不可能，那末苏维埃国家究竟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剩下来的只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别的国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道路，不靠外来的贷款而发展大工业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国的资本来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道路。

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继续说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

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四页至第四五五页）

这就是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大工业和使自己发展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业国而已经走上的和应当通过的道路。

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条道路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但是，这决不是说，这条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国有化的土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运输业和信贷业、垄断化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追加资本”的新泉源，这些新泉源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都不曾有过。你们知道，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利用这些以及和这些相类似的新泉源在发展我们的工业了。你们知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成就。

正因为如此，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发展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要遇到种种困难和考验。

此外，应当指出，目前这种缺少非奴役性外资流入的情况，不可能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你们知道，已经有一些外资开始流入我国了。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种流入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而日益增多。

关于问题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问题的第二种解释。

没有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欧洲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我在这次讲话的开头就已经作了回答——我想消除一种同这个问题有关的非常普遍的误解。这种误解就是：某些同志爱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能不能同意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按范围来说，第一个问题要比第二个问题狭窄些。因为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只包括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即工业，而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则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是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的问题，而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严格说来，甚至不涉及这个问题。就假定工业的固定资本已经更新和扩大，但是，这还完全不是说，这样就已经解决了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业和农业工作人员的生产消费组合。如果在这个组合中，工业与供给原料、食物并且消耗工业品的农业不协调，如果工业与农业因此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的整体，那就根本不会有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

那末，没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们在活跃苏维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人民群

众打成一片，我们在建设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在这条道路上是困难重重的，我们还必须经受许多考验。毫无疑问，如果有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及时援助，事情就根本好办了。但是，第一、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来临”并不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快，第二、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且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在克服它们了。

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己讲话的开头谈过了。在此以前，我在给莫斯科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①]中也谈过这一点。而再早一些，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的“序言”中也谈过这一点。我曾经说过，否认我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使党蜕化的取消主义。现在未必值得再来重复从前一再讲过的话了。因此我介绍你们去读读列宁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你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足够数量的材料和原理。

我只想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历史和这个问题在目前对党的意义。

如果不把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间的争论计算在内，那末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一九一五年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初次在党内提出的。大家知道，当时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关于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大家知道，当时托洛茨基曾经反驳列宁的这个论点，他说：“……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见“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

在一九二一年，即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以后，当建设问题已提到日程上的时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又重新在党内提出来了。这个时期，某些同志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离开社会主义的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七十五页至第一一二页[旧版页次]。——编者注

任务，是离开社会主义的建设。大家知道，当时列宁在他的“论粮食税”小册子中断定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里的事情。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在他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论点，他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此后经过了一年（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所作的声明同托洛茨基在“和平纲领”的跋中所作的声明又互相对立起来了，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最后，又经过了一年，列宁在他逝世前不久，在“论合作制”（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文中又重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苏联具有“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

问题的简短历史就是如此。

从这个历史的考证中已经可以看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列宁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就不会再三重复这个问题了。

后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只是加强和加深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意义。

从党的实践观点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涉及我国建设的前途问题，涉及这个建设的任务和目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

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关于前途的问题，是惯于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目标的我们党的最重要问题。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期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进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地盲目地进行建设，——这就是现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不对这个很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就不能真正地工作和建设。成百成千个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军事工作人员和共青团员来找我们，询问我们，询问我们党：我们把事业向哪一方面引导，我们为什么建设？不幸的是有些领导者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们支吾搪塞，把人们推东推西，使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淹没在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中。

列宁主义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认为建设是碰运气，是盲目的，它不认为建设是没有前途的，它对我们工作的前途问题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它说，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外的敌人和朋友的强弱。如果让我们建设，如果我们能延长“喘息”时期，如果不发生严重的武装干涉，如果武装干涉不能得逞，如果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实力同我们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实力都强大得足以使重大的武装干涉企图不能实现，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相反地，如果武装干涉得逞而我们被击败，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第九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最后一个问题。

十

请指出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缓而面临的最大的困难，特别是在党和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这些困难，如果就其中主要的来说，我认为有五个。资本主义稳定的作用，在于它稍微加剧了这些困难。

第一个困难。这是同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困难。这并不是说，我们面临着武装干涉的直接危险，帝国主义者已经做好准备并且完全能够立即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要做到这一点，帝国主义起码应当像大战以前那样强大，但是大家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目前摩洛哥的战争和对中国的武装干涉，这些未来的战争和武装干涉的演习，显著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的脊背开始发软了。可见，这里不是指直接的武装干涉，而是指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一般地就会有武装干涉的危险，而只要武装干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就不得不为巩固国防而每年花费数亿卢布来供养陆军和海军。每年在陆军和海军上花费数亿卢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相应地缩减了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费。不用说，要是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我们就可以把这笔款项，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强工业，改进农业，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由此就产生了同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建设工作方面的困难。

同其他一切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克服这个困难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个困难只有靠我国和所有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共同努力才能消除。

第二个困难。这是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农村阶级斗争问题时已经谈过这些矛盾了。重复已经谈过的话

是毫无必要的。这些矛盾发生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政策方面，发生在农业税和对农村的管理等等方面。这里的危险在于工农结合工作的混乱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这一思想的破坏。由此就产生了同这一危险有关的困难。

同前一个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是可以用我们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农村中的新方针就是克服这一困难所必需的方法。

第三个困难。这是同我们联盟内部的民族矛盾、同“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这些矛盾是由于“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条件不同，是由于后者落后于前者而发展起来的。这方面的政治上的矛盾可以认为是已经消除了，但是文化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矛盾还刚刚形成和固定起来，因此还需要把它们消除。这里的危险是双重的：一种危险是联盟中央机关表现出大国主义的傲慢和官僚式的专横，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对各民族共和国的要求表现出必要的敏感，另一种危险是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对“中央地区”的民族不信任和民族闭关自守。同这些危险作斗争，特别是同第一种危险作斗争，就是克服民族问题方面的困难的方法。

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像第二个困难一样，是可以用联盟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

第四个困难。这是同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同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的危险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党的蜕化危险的问题时已经谈过这种危险了。重复已经谈过的话未必是必要的。这种危险是由于国家机关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分子而滋长起来的。这种危险随着国家机关的发展及其比重的增大而加剧和严重起来了。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精简国家机关，陆续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把党的领导力量分配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枢纽点上去，从而保证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像第三个困难一样，是可以用我们本

身的力量来克服的。

第五个困难。这就是部分党组织和工会脱离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脱离这些群众的需要和要求的危险。这种危险所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是因为在许多党机关和工会组织，其中包括各支部和各工厂委员会里，存在着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势力。这种危险最近因“面向农村”的口号而加剧起来了，这个口号把我们组织的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从无产阶级转向农民，而许多同志不懂得在面向农村的同时，决不能背向无产阶级，不懂得“面向农村”的口号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懂得对工人阶级的要求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只能加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工人群众的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失去敏感和不够关心；第二、不了解工人的自尊心和他们的统治阶级感觉已经提高了，他们是不能领受和容忍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态度的；第三、不懂得用考虑不周的命令去麻烦工人是不行的，现在的重心不是在这些“措施”上，而是在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第四、不懂得如果不在工人中进行准备活动，如果不举行广泛性的生产会议，就不能实行稍微广泛些的涉及工人群众的措施（例如，在纺织区改行看管三台织布机制）。

这一切使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使企业中发生冲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在纺织区爆发的冲突，揭露出我们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是存在着这一切毛病的。

这就是我们建设道路上第五个困难的特点。

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从这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的手中解放出来，着手改善工厂委员会的成分，一定要使生产会议活跃起来，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的生产单位的支部方面去，并且给这些支部配备优秀的党的工作人员。

更多地注意和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和需要，尽量减少我们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多地关心和同情工人阶级的阶级自尊心，——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第十个问题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真理报”第一三九、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和第一四五各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07—143页

关 于 东 方 革 命 运 动

（和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布施先生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

布施先生的问题和约·维·斯大林的答复

第一个问题：日本人民是东方各国人民中最先进的人民，他们最关心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日本人民愿意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在这个把东方被奴役的民族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事业中成为苏联的同盟者。但是，日本同时又是资本主义国家，它有时不得不和西方列强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反对这个运动。（例如由于英日同盟，日本曾经在英国镇压印度的起义者时帮助过英国；又如在最近发生的上海事件中，日本同英国、美国、法国一起反对中国的工人。）

在你看来，要摆脱日本人民的民族意向与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种困难局面，能有什么出路呢？

答：日本人民是东方各国人民中最先进的人民，他们关心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这是事实。如果日本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结成同盟，这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事业中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样的同盟将标志着庞大的殖民帝国灭亡的开始，标志着世界帝国主义灭亡的开始。这种同盟将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驱使日本人民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使日本人民不是成为解放东方民族的工具，而是成为奴役东方民族的工具，这也是事实。

你问：怎样才能从日本人民的利益与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中摆脱出来？

出路只有一条：按照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改变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俄国曾经有一个时候是东方民族的恶魔，是一切解放运动的宪兵。俄国由解放运动的宪兵变成这个运动的朋友和旗手的原因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俄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有了改变。

第二个问题：*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东方部族，由于沙皇统治的专制制度而落后了许多世纪，他们只是在革命以后才获得独立发展工业、农业、文化等等的权利。*

在你看来，苏联这些东方部族大约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与苏联其他部族相同的文化水平？

答：你问：苏联各东方民族大约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与苏联其他民族相同的文化水平？

这很难说。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速度要取决于许多内部的和外部的条件。我应当说，一般说来，预测的发展速度向来是不精确的，特别是讲到年数。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基本有利条件，就是像沙皇制度、俄国帝国主义、中央地区对边疆地区的剥削制度之类的主要发展障碍都已经扫除了。这种情况大大推动了苏联各东方民族的文化发展。但是这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将被利用到什么程度，这就要取决于各东方民族本身，并且首先取决于各东方民族在苏维埃革命完成时所处的那个文化发展阶段。

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苏联各东方民族在目前的发展条件下所具有的迅速而全面发展民族文化的可能性，要比他们在最“自由的”和最“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有的可能性大得多。

第三个问题：*你说，东方被奴役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同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将保证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我们日本人民有个口号——“亚洲是亚洲人的”。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意向和你们对待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策略之间具有共同性？*

答：你问：“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和布尔什维克对待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策略之间有没有共同性？

既然“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是号召同西方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那末在这一点上（仅仅是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有共同性的。

但是“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不仅包括问题的这一方面。它还包含着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完全不相容的两个组成部分。第一、这个口号避开东方帝国主义的问题，似乎认为东方帝国主义要比西方帝国主义好些，因而可以不同东方帝国主义作斗争。第二、这个口号使亚洲工人产生不信任欧洲工人的感情，使前者疏远后者，割断两者之间的国际联系，从而破坏解放运动的基础。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不仅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且是反对包括东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这个策略不是要削弱亚洲工人和欧美各国工人的国际联系，而是要扩大和加强这种联系。

因此，在“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和布尔什维克在东方的策略之间除了共同性以外，还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第四个问题：一九二〇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谈话时，对我提出的“共产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在哪里比较大，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这一问题回答说：“真正的共产主义暂时只能在西方取得胜利。但是要知道，西方是靠东方活命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主要靠东方殖民地发财致富，但是他们同时也在武装自己的殖民地，并且教给它们如何进行斗争，这样，西方就亲自在东方为自己挖掘了坟墓。”你是不是认为，在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中日益频繁地发生的事件，是西方列强葬身于他们亲自在东方挖掘的坟墓里的时候就要到来的一种预兆？

答：你问：我是不是认为，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加强，是西方列强葬身于他们亲自在东方挖掘的坟墓里的时候就要到来的一种预兆？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

载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
“真理报”第一五〇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7卷第156—159页

论 共 青 团 的 任 务

（答“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

苏联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它的内部状况使共青团应该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问题提得太一般化了，因此答复也只能是一般性的。苏联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它的内部状况使共青团应该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共青团要在言论上和行动上支持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苏联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无产阶级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说，共青团只有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遵照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指示，才能完成自己的这个总任务。

二

由于取消主义（丧失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民族主义（丧失国际革命的前途）和缩小党的领导等等的危险的存在，即由于“问题和答复”小册子中所指出的那些危险的存在，摆在共青团面前的任务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共青团在这方面的任务就是要用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我们的工农青年。而用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这就是说，使青年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第二、这就是说，使青年确信我们的工人国家是国际无产阶级

的产儿，确信它是发展世界各国革命的基地，确信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第三、这就是说，教育青年信任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在共青团内培养出一些正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对青年进行教育的干部和积极分子。

共青团员在一切建设部门中，即在工业、农业、合作社、苏维埃、文化教育机关等等部门中进行着工作。必须使每个共青团员积极分子都把自己在各个建设部门中的日常工作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结合起来。必须使他们善于根据实现这一前途的精神和方向来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

共青团员在各种不同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着工作。共青团本身好像是一个独特的国际。同时，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是共青团的民族成分，而且是共青团直接靠近全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队俄共（布）这一事实。国际主义是贯穿在共青团工作中的基本思想。共青团的力量就在这里。共青团的威力就在这里。必须使共青团永远充满着国际主义的精神。必须使共青团员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成败是同国际革命运动的成败相关联的，必须使共青团员学会把我国的革命不是看做目的本身，而是看做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手段和助力。

共青团在形式上是一个非党组织。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这就是说，共青团在形式上是工人和农民的非党组织，但它同时又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任务就是要保证青年对我们党的信任，保证我们党在共青团中的领导。共青团员应当记住，保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一点。共青团员应当记住，没有这种领导，共青团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即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工农青年的任务。

三

现在应当怎样提出发展共青团的问题：应当在基本上继续贯彻吸收全部工人青年、雇农青年、贫农青年以及中农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入团的方针，还是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加强和教育已经入团的青年群众上呢？

不能说是这样还是那样。必须在这两方面都进行工作。必须尽可能把全部工人青年以及贫农和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青团里来。但同时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共青团积极分子教育新团员上。加强无产阶级核心是共青团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共青团走正确的道路。但是共青团不仅仅是工人青年的组织。共青团是工农青年的组织。因此，在加强无产阶级核心的同时，应当进行吸收农民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入团的工作，应当进行保证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同农民青年结成巩固联盟的工作。不这样，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就不可能领导农民青年。

四

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某些省委员会援引妇女代表会议做例子，着手组织有固定成员的非党农民青年代表会议。这种会议的作用就是在共青团的领导下团结农民青年积极分子，主要是中农青年积极分子。这种立场是不是正确，这里是不是包含着使这种代表会议蜕化成一种可能同我们的青年团对立的非党农民青年团的危险呢？

在我看来，这种立场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原因如下：第一、这里包含着某种害怕中农的心理，包含着使中农青年和我们疏远的意

向，包含着避开中农青年的企图。这种意向是不是正确呢？当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当使中农青年和我们疏远，而应当使他们接近我们，接近共青团。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中农青年对工人的信任，对共青团的无产阶级核心的信任，对我们党的信任。

第二、毫无疑问，在目前一切农民集团都活跃起来的条件下，共青团内特殊的中农青年代表会议必然会变成特殊的中农青年团。同时，这个特殊的青年团不可避免地必然会把自己同现在的青年团及其领导者俄共（布）对立起来，会把共青团中的农民青年吸引到自己方面去，使共青团有分裂为两个青年团即工人青年团和农民青年团的危险。我们能不能不估计到这种危险呢？当然不能不估计到这种危险。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发展的条件下，我们是不是需要这种分裂呢？当然不需要。恰恰相反，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使共青团内的农民青年和无产阶级核心疏远，而是使他们接近这个核心，不是使他们发生纠纷，而是使他们结成巩固的联盟。

第三、决不能用女工和农妇代表会议的存在做藉口，来为成立中农青年代表会议辩护。决不能把有自己的特殊组织即共青团的工农青年同没有自己的特殊组织的女工和农妇相提并论，就如同不能把**农民**中的中农青年同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的女工混为一谈一样。中农青年代表会议的存在会给青年团造成危险，而女工和农妇代表会议的存在则不会使任何人受到任何危险的威胁，因为目前女工和农妇并没有自己的类似青年团的特殊的固定组织。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共青团内成立特别的中农青年代表会议是多余的。

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只建议在农村共青团的周围建立像自学小组、农业研究小组等等辅助组织，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五

在我们的条件下，共青团积极分子有没有可能把实际工作同钻研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共青团组织和各个共青团员在这方面应当做些什么呢？

第一、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种提法稍微发表一点意见。这样提问题，会使人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而列宁主义又是一回事；以为一个人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可以是列宁主义者。但是这种概念决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列宁主义并不是列宁的学说**减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列宁主义包括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学说，加上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加进去的和必然从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党、关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根源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倾向问题等等）中产生出来的新东西。因此，最好在提问题时说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基本上是一个东西），而不说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第二、毫无疑问，如果共青团积极分子不把实际工作同他们的理论学习（“研究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共青团内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带些自觉性的共产主义工作。列宁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这个经验是一盏指路明灯，它照耀着实际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道路，给他们指出方向。如果实际工作者甚至没有最低限度地掌握住这个经验，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不会有信心，就不会认识到这个工作的正确性。如果实际工作者不研究列宁主义，不努力掌握列宁主义，不愿意把自己的实际工作同必要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们的遭遇就会是这样：摸索着工作，在黑暗中工作。因此，研究列宁主义和学习列宁主义，就是使现在的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能够用无产阶级专

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千百万共青团员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积极分子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是，在目前共青团积极分子负担过重的条件下，是不是有可能把理论和实践这样结合起来呢？是的，是有可能的。不用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既然这件事情是如此需要，既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在共青团内培养真正的列宁主义积极分子，那末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能和那些逃避困难、只找轻松工作做的懦夫一样。困难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要去同它们作斗争和克服它们。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学会克服困难，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就一定灭亡了。如果共青团害怕困难，它就不成其为共青团了。共青团积极分子担负着伟大的任务。因此，他们必须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耐心地和顽强地学习列宁主义，——这就是共青团积极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如果他们真想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教育千百万青年群众的话。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共青团真理报”第一三三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7 卷第 166—171 页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节选）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三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真理报”第二九一、第二九二和第二九六各号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十二月十八日）

同志们！最近两星期以来，你们已经听过好几位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关于中央委员会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报告；报告都是很长的，基本上无疑都是正确的。我认为重复这些报告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我想这种情况减轻了我在这里的任务，因此我认为只谈谈有关我党中央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好的。

中央的工作报告通常总是先从外部状况谈起。我不违反这个惯例。我也先从外部状况谈起。

一　国际形势

这个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主要的和新的现象，有决定意义的和贯穿一切事变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这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间已经确立了某种暂时的均势，这种均势决定了当

前苏维埃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共处”阶段。有一个时期被我们认为是战后的一个短促的喘息时机，现在已经变成整整的一个喘息时期了。由此就产生了资产阶级世界和无产阶级世界间的某种均势和一个“和平共处”时期。

产生这一切情况的根源，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内部的软弱，世界资本主义的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是工人革命运动的普遍增长，特别是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力量的增长。

产生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软弱的根源是什么呢？

产生这种软弱的根源，就是那些为资本主义所无法克服而决定整个国际形势的矛盾，就是那些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克服而只能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进程中被克服的矛盾。

这是一些什么矛盾呢？这些矛盾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矛盾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第二类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及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

第三类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大战中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正在发展而且不能不发展的矛盾。

第四类矛盾就是各战胜国之间正在发展而且不能不发展的矛盾。

最后，第五类矛盾就是苏维埃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正在发展的矛盾。

这就是决定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发展的五类基本矛盾。

同志们，如果我们不简略地研究一下这些矛盾的本质和它们的增长情形，我们就无法了解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所以，对这些矛盾的简单的论述就必然成为我的报告的一部分。

一、资本主义的稳定

这样，我们就先来谈第一类矛盾即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方面的主要事实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资本主义正在摆脱或者说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贸易以及财政方面的混乱状态。党把这种情况叫做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或暂时稳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危机时期（我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曾一度一落千丈的生产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暂时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混乱状态。

下面就是欧洲方面的一些数字。

欧洲一切先进国家的生产同一九一九年比较起来，有的已经在向前发展，向上增长，某些地方已经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有的处在原来水准上。只有英国还有某些生产部门没有恢复。从整个欧洲来说，生产和贸易基本上在向前发展，不过目前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准。拿粮食生产来说，英国只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法国达到百分之八十三，德国达到百分之六十八。德国的粮食生产提高得很慢，法国没有提高，英国则下降。这些国家都要靠从美国输入粮食来弥补。一九二五年，英国在煤的产量方面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法国等于百分之一百零七，德国等于百分之九十三。在钢的产量方面，英国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八，法国等于百分之一百零二，德国等于百分之七十八。在棉花消费量方面，英国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八十二，法国等于百分之八十三，德国等于百分之八十一。在对外贸易方面，英国是入超，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四；德国较一九一九年稍有提高，也是入超；法国目前已经超过战前水准，等

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二。整个欧洲的贸易水准，拿一九二一年来说，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六十三，而现在，即在一九二五年，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二。这些国家的预算不管怎样是保持平衡的，但这种平衡是靠拚命增加居民的捐税负担来维持的。在个别国家里有通货不稳定的现象，但是一般说来，从前的那种混乱状态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总的情况是：欧洲的战后经济危机正在消失，生产和贸易正逐渐达到战前水准。欧洲的一个国家法国在贸易和生产方面已经超过战前水准，欧洲的另一个国家——我说的是英国——则还停留在或几乎停留在原来水准上，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准。

第二、现在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不是战后危机年代曾经看到的革命来潮时期，而是革命退潮时期。这就是说，夺取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在最近夺取政权的问题，现今在欧洲还没有列入日程。革命浪潮高涨时期，即运动突飞猛进、向上升涨而党提出的口号却跟不上运动的发展的时期，像我国一九〇五年或一九一七年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这样的高涨时期还在前面。这样的时期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所处的是暂时退潮时期，是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时期。这个时期，就确定运动的新的形式方面，就在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旗帜下的群众性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方面，就建立和巩固西方的工人运动和苏联的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方面，就工人运动（比如英国工人运动）左倾方面，就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瓦解及其内部产生深刻裂痕等等方面来说，都能产生重大的结果。我重复一遍，现在我们是处在积蓄力量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未来的革命发动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工会以及其他组织）和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撤职”，像我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期间的情形一样。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财政势力的中心，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

心，已经从欧洲移到美国。过去通常总是把法德英三国说成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现在已经绝对不能这样说了。现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主要是北美合众国。这个国家在各方面，无论在生产和贸易方面或在资本积累方面，都在发展。让我举一些数字来说明。美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准，现在已经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煤的产量虽然只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但是这方面的差额有石油方面的大量增产额来弥补。而且必须指出，美国的石油产量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钢的产量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四十七。国民收入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三十。对外贸易方面靠向欧洲各国输出而造成巨额出超，已经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全世界价值九十亿的黄金储备中大约有五十亿是在美国。北美合众国的通货是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至于资本输出，美国现在差不多是资本输出率不断增长的唯一国家。法德两国输出得极少，英国也大大地减少了自己的资本输出。

第四、我在上面讲到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主要是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达到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举出欧洲各国积欠美国的国家债款的数字就够了。这个数字至少达二百六十亿卢布。我还不说积欠美国的私人债款，即美国投入欧洲各国企业的资本，这种投资额在欧洲总共达数十亿。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欧洲各国靠美国资本的流入（部分地靠英国资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站稳脚跟。这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呢？这是以欧洲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

第五、因此，欧洲各国为了有可能偿还利息和债款，就不得不加重居民的捐税负担，就不得不使工人的境遇恶化。现在欧洲各国的情形正是这样。虽然偿还债款和利息的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始进行，可是现在例如英国的税收在全部国民收入中已经从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

十一增长到一九二四年的百分之二十三，法国已经从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增长到百分之二十一，意大利已经从百分之十三增长到百分之十九。不用说，在最近的将来捐税负担一定还会进一步加重。因此，欧洲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必然会恶化下去，而工人阶级也一定会革命化。这种革命化的征兆无论在英国或在欧洲其他国家都已经出现了。我指的是欧洲工人阶级显然在左倾这一事实。

以上这些主要事实都说明：欧洲各国所达到的资本主义暂时稳定是在腐烂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腐朽的稳定。

很可能——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欧洲各国的生产和贸易也会达到战前水准。但这还不是说，资本主义因此就一定会达到它在战前所达到的那种稳定程度。那种稳定程度它永远达不到了。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欧洲是以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换得它的暂时稳定的，这就使人民的捐税负担大大加重，使工人的境遇必然恶化，使欧洲各国革命化；第二、因为还有其他许多使目前的稳定成为不持久不巩固的稳定的原因，这些原因，我在下面就要谈到。

把我刚才在分析第一种矛盾时所讲的一切情况总结一下，总的结论就是：剥削世界的主要国家的圈子与战前时期相比，已经缩小到极点了。从前，主要的剥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现在这个圈子已经缩小到极点了。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财政剥削者，也就是世界上的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

这还不是说，欧洲已经陷入殖民地的地位。欧洲各国继续剥削着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它们自己在财政上也受美国的支配，因此它们自己现在也受美国剥削而且将来还会受美国剥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世界进行财政剥削的主要国家的圈子已经缩小到最低限度，而被剥削国家的圈子扩大了。这就是目前资本主义的稳定不巩固和内部虚弱的原因之一。

二、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现在来谈第二类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方面的主要事实是：各殖民地的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增长，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和战争以后；这些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其中包括本国知识分子的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以及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总危机；印度和埃及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中国反对英日美帝国主义等等的解放斗争；印度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增长以及这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的增长。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稳定在这方面是不巩固的，因为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逐步增长，有些地方（摩洛哥、叙利亚、中国）已经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显然是担负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务的。有些人——特别是资产阶级作家——说殖民地危机的增长应归咎于布尔什维克。我应当说，人家把这一点归咎于我们，未免太看得起我们了。遗憾得很，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直接帮助各殖民地国家争取解放。必须深入一层地去寻找原因。除了其他一切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各国必须向美国缴付利息，因此它们不得不加紧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样就不能不使这些国家的危机和革命运动增长起来。

这一切都说明世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坏透了。如果说在那方面，在第一类矛盾方面，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局部稳定，无产阶级在最近期间夺取政权的问题暂时还没有列入日程，那末殖民地危机却已经达到顶点，从许多殖民地中逐走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已经列入日程了。

三、战胜国和战败国

现在来谈第三类矛盾即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

这方面的主要事实有以下几点：第一、欧洲在凡尔赛和约缔结以后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战败国阵营（德国、奥国及其他国家）和战胜国阵营（协约国加上美国）。第二、必须指出一种情况，就是各战胜国从前企图用军事占领手段来扼杀各战败国（请你们回忆一下鲁尔问题），现在它们已经放弃这种手段而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即先对德国后对奥国进行财政剥削的方法。道威斯计划就是这种新方法的表现，而这个计划的恶果只是到了现在才表现出来。第三、罗迦诺会议表面上仿佛消除了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一切矛盾，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消除任何矛盾（不管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喧嚷），而只是使这些矛盾尖锐化。

道威斯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德国不折不扣地向协约国分期偿付约一千三百亿金马克。道威斯计划的后果已经表现出来，这就是德国的经济状况恶化，整批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增多等等。这个由美国制定的道威斯计划的内容，就是要欧洲各国利用德国所应偿付欧洲各国的赔款去偿还积欠美国的债款，但是德国无法凭空找到这一大笔款项，所以德国就应当获得许多还没有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据的空闲市场，以便能够从那里汲取新的力量和新的血液来偿付赔款。美国在这里所指的市场，除了一些小市场以外，就是我们俄国市场。按照道威斯计划，这些市场应该让给德国，使它能够榨取一些东西来向欧洲各国偿付赔款，而欧洲各国则应当向美国偿还国家债款。这个计划整个是编得很好的，但它是在没有主人参加的情况下编制成的，因为它对德国人民说来是双重压榨，即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压榨和外国资本对德国全体人民的压榨。如果以为德国人民会白白忍受这种双重

压榨，那就错了。所以，我认为道威斯计划在这方面必定会导致德国革命。道威斯计划本来是为绥靖德国而制定的，但是这个计划必定会引起德国革命。这个计划的第二部分规定德国应当靠剥削俄国市场来为欧洲榨取金钱，这也是在没有主人参加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决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决不愿意变成受其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德国）支配的农业国。我们自己要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所以，指望我们会同意把我们的祖国变成受德国支配的农业国，那就是指望在没有主人参加的情况下处理问题。在这方面，道威斯计划是毫无根基的。

至于罗迦诺公约，它不过是凡尔赛和约的继续，它的目的只能是像人们在办外交时所说的那样保持“现状”，即维持德国是战败国而协约国是战胜国这样的现状。罗迦诺会议在法律上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也就是说规定把德国的新国界保持下来而使波兰和法国得到利益，德国丧失它的殖民地，这个被绑在普罗克拉斯提斯床上的德国同时还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榨取一千三百万亿金马克。如果认为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如果从前，在普法战争以后，当时的矛盾焦点之一亚尔萨斯—洛林问题成了帝国主义大战爆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那末，试问有什么办法保障这个在法律上确认德国丧失西里西亚、但泽走廊和但泽，乌克兰丧失加里西亚和沃伦省西部，白俄罗斯丧失它的西部领土，立陶宛丧失维里诺等等的凡尔赛和约和它的继续罗迦诺公约，保障这个割裂了许多国家的领土和造成了一连串矛盾焦点的条约，不会遭到与普法战争后从法国割去亚尔萨斯—洛林的那个旧普法条约同样的命运呢？

这样的保障是没有的，而且是不可能有的。

如果说道威斯计划孕育着德国的革命，那末罗迦诺公约却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

英国保守党人既想用保持“现状”的办法来对付德国，又想利用

德国来对付苏联。他们不是太贪得无厌了吗？

人们在谈论和平主义，在谈论欧洲各国间的和平。布利安和张伯伦拥抱接吻，斯特莱斯曼满口恭维英国。这一切都不足介意。我们从欧洲的历史中知道，每当缔结关于为新战争配置力量的条约的时候，总是把这种条约称为和平条约。在缔结包含有未来战争的因素的条约的时候，总是听到关于和平的叫嚷。在这样的时候，总是有伪善的和平歌手出现。我想起普法战争后的几件历史事实，当时德国是战胜国，法国是战败国，当时俾斯麦千方百计想保持“现状”，即保持在德国打败法国后所确立的秩序。当时俾斯麦主张和平，因为这种和平使他对法国享有许多特权。法国也主张和平，至少在初期即当它还没有从战争失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时期，即当大家谈论和平，伪善的歌手歌颂俾斯麦的和平愿望的时候，德国和奥国签订了一个完全和平性的和完全和平主义的协定，这个协定后来就成了未来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之一。我指的是奥国和德国在一八七九年签订的协定。这个协定是对付谁的呢？是对付俄国和法国的。这个协定的内容是什么呢？请听吧：

“鉴于德奥两国的密切合作并不威胁任何国家，而且合作的目的是要按照柏林条约所确立的原则来巩固欧洲和平，因此两国国王陛下决定缔结同盟和约和互助协定。”

你们听见了吧：德奥两国是**为了欧洲的和平**而实行密切合作的。这个协定曾经被解释为“和平同盟”，但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这个协定是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大战的直接准备。由于签订了这个表面上是维护欧洲和平而实际上是准备欧洲战争的协定，就产生了另一个协定，即俄国和法国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三年间签订的协定，——当然也是为了维护和平，而不是为了别的！这个协定里讲的是些什么呢？讲的是：

“法俄两国被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所激励而达成如下协议。”

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这点当时根本没有**公开**说明。但是在协定的秘密条文中规定：一旦战争爆发，俄国应当派遣七十万军队对抗德国，而法国应当派遣（似乎是）一百三十万军队对抗德国。

这两个协定都被正式称为维持全欧的和平、友谊和安宁的协定。

最后，经过六年以后即在一八九九年召开了海牙和平会议，提出了裁军问题。正是在那个时候，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根据法俄协定到俄国来拟定战争爆发时调动军队的计划，而俄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则到法国去协同法国将军编制将来对德作战的计划。正是在那个时候，德奥两国的总参谋部共同拟制双方应当共同向它们的西方和东方的邻国进攻的计划和条件。正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背后偷偷摸摸地进行的），一八九九年的海牙会议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和平，发出了关于裁军的虚伪的喧嚷声。

你们看，这就是极端虚伪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外交，他们竭力用关于和平的叫嚷和歌唱来掩盖准备新战争的活动。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没有理由相信关于国际联盟和罗迦诺公约的歌唱呢？当然没有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们既不能相信张伯伦和布利安互相拥抱接吻的玩意，也不能相信斯特莱斯曼的那套恭维话。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罗迦诺公约是为新战争配置力量的计划，而不是为和平配置力量的计划。

第二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要知道第二国际领袖们比任何人都卖力，他们硬要工人们相信罗迦诺公约是和平工具而国际联盟是和平救星，布尔什维克不愿加入国际联盟是因为他们反对和平等等。根据上述情况看来，特别是根据我所举的说明在普法战争以后缔结的许多表面上称为和平协定而实际上是战争协定的那些历史考证看来，第二国际的这种种叫嚣究竟说明什么呢？第二国际目前对罗迦诺公约所采取的态度究竟说明什么呢？它说明第二国际不但是资产阶级腐化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且是在道义上为凡尔赛和约的一

切不公正规定作辩护的组织。它说明第二国际是一个辅助协约国的组织，它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拥护罗迦诺公约和国际联盟的叫嚣来在道义上为凡尔赛和约—罗迦诺公约所造成的一切不公正情形和整个压迫制度辩护。

四、战胜国间的矛盾

现在来谈第四类矛盾即战胜国之间的矛盾。这方面的主要事实是：虽然美英两国成立了某种联盟，虽然它们两国成立了以反对废除盟国债务的美英协定为基础的联盟，但是我认为英美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现在世界列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石油问题。比如拿美国来说，它的石油产量约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同时它的石油消费量也占全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正是在这方面，在世界列强全部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的神经中枢方面，美国随时随地都遇到英国的抵抗。拿全世界两大石油公司——代表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和代表英国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公司在全世界一切出产石油的地方都在进行斗争。这是美英两国之间的斗争。因为石油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因为谁拥有更多的石油，谁就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指挥地位。谁拥有更多的石油，谁就能指挥世界的工业和商业。自从各先进国家的船只改用马达来发动以后，石油就成了世界列强在平时和战时争夺优越地位的命脉了。正是在这方面，英国的石油公司和美国的石油公司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但是它始终存在着并且微微地燃烧着，这可以从英美间谈判的历史中以及英美间因这个问题而引起的冲突的历史中看出来。只要提起尤兹在他任美国外交部长期间关于石油问题向英国提出的多次照会就够了。在南美洲，在波斯，在欧洲，在罗马尼亚和加里西亚那些出产石油的地区，

在世界各地都进行着这种明争暗斗。更不必说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样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实了。你们想必知道，这里进行的是暗斗，并且由于美国干得比较灵活，由于美国不采用英国贵族尚未抛弃的那些粗暴的殖民主义的方法，因此它往往能使英国在中国处于窘境，从而把英国排挤出去，为自己开辟一条打入中国的道路。当然，英国是不会漠视这一点的。

我也不多谈法英两国间因争夺欧洲大陆统治权而引起的利害冲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同样明显的是：英法两国不仅在欧洲大陆霸权问题上发生利害冲突，在殖民地霸权问题上也发生利害冲突。报刊上已透露这样的消息：叙利亚和摩洛哥进行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战争不是没有英国参加的。虽然我手头没有文件，但是我以为这种消息不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我也不想谈美日两国间的利害冲突，因为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只要回忆一下不久前美国舰队在太平洋举行的演习以及日本舰队举行的演习，就会明白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了。

最后，我必须指出一件必定会使大家感到惊奇的事实，这就是各战胜国在大量扩充军备。我说的是战胜国，是战胜国间的矛盾。这些战胜国都称为盟国。诚然，美国并没有加入协约国，但是它曾经同协约国结成联盟打过德国。现在正是这些盟国在拚命扩充军备。它们扩充军备是要对付谁呢？从前，当协约国扩充军备的时候，通常总是以德国为藉口，说它武装到了牙齿，说它威胁着世界和平，因此必须扩充军备来保卫自己。而现在的情形怎样呢？现在德国已经不是一支武装力量，因为它已经被解除武装。但是现在各战胜国扩充军备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加紧。比如说，应当怎样解释法国空军惊人扩充这一事实呢？应当怎样解释英国军备特别是英国海军惊人扩充这一事实呢？应当怎样解释美日两国海军惊人扩充这一事实呢？这些共同战胜了德国并且共同解除了德国武装的“盟友”先生害怕的是什么，害怕的是谁

呢？他们害怕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扩充军备呢？第二国际的和平主义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第二国际高喊和平却看不见——仿佛看不见——那些曾经正式自称为朋友的“盟国”正在疯狂扩充军备来对付“不存在的”敌人呢？国际联盟和第二国际采取了什么办法来制止疯狂扩充军备的行为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在扩充军备的情况下“枪炮会不开自响”吗？不要期待国际联盟和第二国际的答复吧。这里的问题在于各战胜国彼此间因争夺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在日益增长和加深，它们之间的冲突日益成为不可避免，而它们既预察到新的战争，于是就用尽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来扩充军备。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各战胜国间现在并没有友好的和平，而只有武装的和平，只有酝酿着战争的武装和平状态，那并没有夸大。现在各战胜国间的情况很像一九一四年大战前的情况——武装和平状态。

欧洲各国的执政者现在力图用关于和平主义的叫嚣来掩盖这一事实。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和平主义有多大价值以及它应当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布尔什维克从热那亚会议召开时起就要求裁减军备。为什么第二国际和其他和平主义的空谈家们不来支持我们的提议呢？

这种情况再次说明，欧洲各国用受人奴役的代价换来的那种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是不巩固的，因为各战胜国间的矛盾在日益增长和加深，更不必说战胜国和战败国间的矛盾了。

五、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

现在来谈第五类矛盾即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

这方面主要的一点，就是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存在了。自从苏维埃国家出现以后，自从旧俄国变成苏联以后，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就不再存在了。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必须指出的第一点。

这方面必须指出的第二点，就是现在领导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是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美国即英美联盟。领导对帝国主义不满的国家和同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的国家的是我国——苏联。

第三点，就是现在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然而是互相对立的吸引中心，并且与此相适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倾向于这两个吸引中心的两种趋向：各资产阶级政府倾向于英美，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革命者倾向于苏联。英美两国是用它们的财富来吸引人的，从它们那里可以得到借款。苏联是用它的革命经验，用它为工人摆脱资本主义、为被压迫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经验来吸引人的。我说的是欧洲的工人和东方的革命者向往于我国的趋向。你们知道，到我国来访问对于欧洲的工人或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他们怎样纷纷来我国访问，全世界的一切忠诚的革命者怎样向往我国。

两个阵营，两个吸引中心。

第四点，就是在这个阵营里，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没有一致的利益和团结；那里充满着利害冲突、分崩离析的现象、战胜国和战败国间的斗争、各战胜国本身间的斗争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因争夺殖民地和利润而引起的斗争。由于这一切，这个阵营的稳定是不可能巩固的，而在我们国家里则有一个健康的日益巩固的稳定；我国的经济在日益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向前推进，在我们整个阵营里，西方和东方的一切不满分子和阶层逐渐地和不断地团结到我国无产阶级周围，团结到苏联周围来。

在资本主义阵营那里呈现着不和与瓦解的现象。在社会主义阵营这里大家在反对共同敌人即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和利益愈来愈趋于一致。

这就是我想在第五类矛盾即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世界之间的矛盾方面指出的几件主要事实。

我想特别谈一件事实，这件事实就是我说的全世界革命者和社会

主义者向往于我国无产阶级的那种趋向。我指的是各国工人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这一事实，他们仔细地观察我国建设中的每个角落，以便深信我们不但能够破坏旧东西，而且能够建设新东西。反映目前西方工人运动发展中整整一个阶段的工人代表团纷纷来我国访问这一事实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已经听到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是怎样接待英国工人代表团和德国工人代表团的。你们是不是注意到我们各个管理机关的领导同志不只是向工人代表团的代表们介绍情况而简直是向他们汇报工作？当时我不在莫斯科，我因事在外，但是我读到报纸，知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同志不是简单地向德国工人代表团介绍情况，而是向他们汇报工作。这是我国生活中一种新的、特殊的现象，我们必须予以特别注意。我从报上知道，我国石油工业的领导人——柯秀尔在格罗兹内和谢列勃罗夫斯基在巴库——不是像对一般参观者那样简单地向工人代表们介绍情况，而是像对最高监督机关那样向工人代表团汇报工作。我从报上知道，我们的一切最高机关（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到地方的执行委员会都准备向工人代表团汇报工作，认为他们是西方工人阶级派来对我国建设、对我们这个工人国家实行兄弟般的友好的监督的代表。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两件事情。第一、说明欧洲工人阶级——至少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的革命部分——认为我国是他们的产儿，说明工人阶级派代表团到我国来不是因为好奇，而是为了看一看我们这里的情况怎样以及我们在做什么，他们显然认为自己对于我们在这里所建设的一切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第二、说明欧洲无产阶级中的革命部分把我国认做自己的子女，把我国看做自己的产儿，决心来捍卫它，并且在必要时甘愿为它战斗。你们试指出还有哪一个国家——哪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敢于把自己置于其他国家的工人代表团的兄弟般的监督之下！你们指不出这样的国家，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家。只有我们的国家，即工农国家，才能够这样做。我

国既然对各国工人代表团表示最大限度的信任，那末也就能取得欧洲工人阶级方面的最大限度的信任。对我们的这种信任在我们看来比任何借款都要宝贵，因为工人对我们国家的这种信任是抵抗帝国主义及其武装干涉阴谋的主要药剂。

这就是我们国家和西方无产阶级相互关系上由于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而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那种变化的根源。这就是许多人所没有觉察到而在现在却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既然我们被认定是欧洲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认定是欧洲工人阶级的产儿，既然欧洲工人阶级根据这一点而对我国担负道义上的责任，比如说，在我国一旦受到武装干涉时担负保卫我国免遭资本主义侵犯的任务，担负保卫我国利益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那末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力量正在增长，并且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的。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软弱程度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的。因为在今天没有工人参加就不能作战。既然工人不愿意对我们共和国作战，既然他们认为我们共和国是他们的产儿，而这个产儿的命运又同他们紧密地联系着，那末要对我国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工人代表团纷纷来我国访问的秘密、根源和意义，这种访问已经进行并且还会进行，这种访问我们应当竭力鼓励，因为这是我国工人和西方各国工人互相团结的保证，是巩固我国工人和西方各国工人间的亲密友谊的保证。

这里不妨简略地谈一谈来我国访问的代表团的数量。不久以前，我听说在莫斯科党代表会议上有位同志向李可夫提出一个问题：“这些代表团岂不是使我们耗费太大了吗？”同志们，决不能说这样的话。对于前来我国访问的工人代表团决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样说是可耻的。为了帮助西方工人阶级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访问，帮助他们确信工人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不但能够破坏资本主义，而且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害怕任何耗费和任何牺牲。西方的工人，至少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至今还深信工人阶级非靠资产阶级不可。这种

偏见是西方工人阶级的主要病症，是社会民主党人传染给他们的。为了使西方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代表确信工人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不但能够破坏旧东西，而且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怕任何牺牲。为了使西方工人阶级有可能确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人国家，他们在西方值得为它战斗，他们值得保卫它而去反对本国资本主义，我们不怕任何牺牲。（鼓掌）

我们这里已经来过三种代表团：知识分子代表团即教师等等的代表团；成年工人代表团，这种代表团粗略地计算一下大约有十个；青年工人代表团。总共有五百五十位代表和参观者到我国来过。曾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登记过的还有十六个代表团，它们不久也要来访问。今后我们还要推动这件事情，以便巩固我国工人阶级和西方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从而造成一座屏障以防止任何武装干涉的可能性。

以上就是腐蚀资本主义的那些基本矛盾的特征。

从这一切矛盾中究竟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它们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资本主义世界正被许多内部矛盾腐蚀着，这些矛盾使资本主义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却愈来愈联合，愈来愈团结；因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暂时的均势，这种均势结束了侵犯我国的战争，并且开辟了苏维埃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阶段。

我还要提到两件事实，这两件事实对我们由战争时期进入“和平共处”阶段这一转变也有影响。

第一件事实就是目前美国不希望欧洲爆发战争。它仿佛对欧洲这样说：我借给了你几十亿，如果你今后还想借钱，如果你不愿意你的通货大大贬值，那你就不要胡作非为，就应该安心工作，赚些钱来偿付债款的利息。未必用得着证明，美国所贡献的这种意见，即使对欧洲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发生影响。

第二件事实就是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时起，拥有庞大销售市

场和庞大原料产地的整整一个庞大国家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当然不能不影响欧洲的经济状况。失去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失去我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这对资本主义的欧洲来说，意味着使它的生产缩小，根本动摇它的生产。因此，要消除欧洲资本和我国隔绝的状态，要消除欧洲资本和我国市场以及原料产地隔绝的状态，就必须和我们“和平共处”一个阶段，以便挤到我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里来，——不然，欧洲的经济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程度的稳定。

六、苏联的外部状况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因素，决定了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某种均势，使喘息时期代替战争时期，使短促的喘息时机变成整整的一个喘息时期，使我们有可能像伊里奇所说的那样去和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某种“合作”。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承认”苏联的时期，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而且还要延续下去。

我不想列举有哪些国家“已经承认”我国。大国中还没有承认我国的仿佛只有美国了。我也不想多谈我们在被“承认”后比如说已经和德国及意大利签订了通商条约。我不想详细地谈我国的对外贸易额已经大大增加，对这种贸易特别感到兴趣的有向我国输出棉花的美国，有输入我国粮食和农产品的英国和德国。可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自从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共处”的阶段确立以来，我们今年才开始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和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纷繁而广泛的贸易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消灭了一切所谓隐讳的事，已经消灭了我国与西方各国间曾经有过而且现在还有的一切所谓要求和反要求。我们知道有人要求我们偿还债款。这点欧洲还没有忘记，大概也不会忘记，至少不是很快就会忘记的。他们对我们说，我国战前积欠欧洲

各国的债款等于六十亿卢布，军事债款估计为七十多亿卢布，这样总数就达一百三十亿卢布。如果估计到通货贬值并且从这个数目中除去边陲国家所应承担的部分，那末我们还欠西欧各国七十多亿卢布。大家知道，我国因在国内战争时期受英法美三国武装干涉而向它们提出的反要求，据拉林计算仿佛是五百亿卢布。这就是说，它们欠我们的债款比我们欠它们的要多四倍。（拉林喊道：“我们一定会取得这笔款子的。”）拉林同志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取得这笔款子的。（笑声）如果我们像财政人民委员部那样更精确地来计算一下，那末至少也能得到二百亿卢布。我们结果还是赢了钱的。（笑声）但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容忍这一点，因此我们至今还是被他们列在债务人名单上。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跟资本家谈判时总是遇到各种困难和阻碍。过去跟英国谈判时是如此，将来跟法国谈判时想必也是如此。

我们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中央的立场还是像同麦克唐纳签订条约时所采取的立场一样。

我们不能撤销我国在一九一八年颁布的关于取消沙皇政府所欠债务的著名法令。我们还要实行这项法令。我们不能撤销那些已经宣布的使剥夺剥夺者在我国合法化的法令。我们现在实行并且将来还要实行这些法令。然而我们并不反对在过去沙皇政府的债务方面用切合实际的谈判方式对英法两国作某些例外的让步，以便付出少量的钱而换回某些东西。我们并不反对把企业经营权出让给从前的私有者，但是仍然要使这种出让的条件不能是奴役性的。我们是在这种基础上和麦克唐纳达成协议的。事实上取消军事债款的思想是这次谈判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这个条约也就被人撕破了。是谁撕破的呢？无疑是美国。虽然美国并没有参加拉柯夫斯基和麦克唐纳的谈判，虽然麦克唐纳和拉柯夫斯基共同商定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协定草案，虽然这个协定草案使双方都能有出路，使双方的利益多多少少都能得到满足，但是因为

这个草案是以取消军事债款的思想为出发点的，而美国又不愿意破这个例，怕那样做会丧失欧洲欠它的几十亿钱，所以美国便“提出忠告”，结果条约就被撕破了。

虽然如此，我们现在还是以上述草案为立足点的。

从我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中，从报告涉及的时期内发生的问题中，从牵涉到我国政府和西欧各国政府相互关系的那些特别棘手和特别迫切的问题中，我想提出下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英国保守党人不止一次地提出而且还会继续提出的问题即关于宣传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共产国际的问题。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不论在欧洲或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都进行着特种宣传来反对帝国主义。英国保守党人硬说，俄国共产党人是一些负有摧毁不列颠帝国威力的使命的人。我想在这里声明，这一切完全是胡说。我们不需要在西方或东方进行任何特种宣传，因为各国工人代表团亲自到我们这里来认识我国制度并且把关于我国制度的消息传到西方各国去。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宣传。这是拥护苏维埃制度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和最有效的宣传。（鼓掌）

有人说我们在东方进行宣传。我肯定说，这也完全是胡说。我们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特种宣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整个国家制度是建立在我国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和兄弟般合作的基础上的。到我国来住过半年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埃及人，每一个印度人，都有可能深信，我国是唯一了解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心意的国家，是唯一能使从前统治民族中的无产者和从前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者彼此合作的国家。我们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其他宣传，也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其他鼓动，只要那些来自中国、印度和埃及的代表团在我们这里进行研究和考察以后把关于我国制度的消息传到全世界去就行了。这是最好的一种宣传，是各种各样宣传中最有效的一种宣传。

然而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而且一定会摧毁不列颠帝国。这就是英

国保守党人。这是一种必定会把不列颠帝国引向灭亡的力量。只要回忆一下保守党人上台执政时所施行的政策就够了。他们是从哪方面开始的呢？是从制服埃及、加紧压迫印度、干涉中国等等开始的。这就是保守党人的政策。既然英国贵族没有本领施行别的政策，那末又能怪谁呢？又能责备谁呢？既然保守党人走上这条道路，那末他们必定会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把不列颠帝国引向灭亡，这难道还难懂吗？

关于共产国际，现在我来讲几句话。在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和伪造信件的人散布谣言，说共产国际是阴谋家和恐怖分子的组织，说共产党人到西方各国去制造阴谋反对欧洲各国的执政者。比如他们说保加利亚的索非亚爆炸事件和共产党人有联系。我必须声明，每一个有文化的人，只要不是一窍不通或是被人收买，都一定会知道，共产党人无论过去或现在与个人恐怖的理论和实践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共产党人无论过去或现在与阴谋陷害个别人物的理论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是在于组织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去反对资本主义。这是对的。这是共产党人的任务。只有愚人和白痴才会把阴谋和个人恐怖手段与共产国际对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所采取的政策混为一谈。

关于日本，现在我来讲几句话。在西方，我们的某些敌人洋洋得意地说：看呀，中国境内已经开始了革命运动，这当然是布尔什维克收买了中国人民，不是他们又有谁会收买四万万中国人民呢？而这就一定会使“俄国人”和日本人打起来。同志们，这一切都是胡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它在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执政者看不见这种力量，不充分估计这种力量，他们一定要吃亏。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能不估计到这一力量。我们认为目前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前美国在统一为一个国家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就是从前德国在形成为一个国家和

实现统一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也就是从前意大利在实现统一和逐走外敌时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这里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革命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情并且将来还会同情中国革命，同情它为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者的枷锁并把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谁在现在和将来不估计到这一力量，谁就一定要失败。我想日本一定会了解，中国民族运动这一日益壮大的力量，这一不断前进并在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力量，是日本也应该估计到的。张作霖之所以必定灭亡，正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一点。但是他的必定灭亡，还由于他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建筑在使苏日两国发生纠纷和关系恶化这个基础上。满洲的任何一个将军，任何一个执政者，要是他把自己的政策建筑在使我国和日本发生纠纷，使我国和日本的关系恶化这个基础上，他就一定会遭到灭亡。他们中间只有把自己的政策建筑在使我国和日本的关系好转，使我国和日本接近这个基础上的人，才能站住脚跟，只有这样的将军和执政者才能在满洲坐稳，因为使我国同日本关系尖锐化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我国只有同日本接近才有好处。

七、党的任务

现在来谈谈我们党因外部状况而产生的任务问题。

就党的工作的内容来说，我认为党在这里的任务应该分为两方面，即**国际**革命运动方面和苏联**对外政策**方面。

在**国际**革命运动方面有哪些任务呢？

第一项任务就是：巩固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使这些共产党争得工人群众的大多数。第二项任务就是：加强西方各国工人为工会的统一，为巩固我们联盟的无产阶级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间的友谊而进行的斗争。这里也包括外国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的活动，关于这种活动和它的意义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三项任务就是：巩固我国无

产阶级和各被压迫国家解放运动间的结合，因为各被压迫国家是我们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同盟者。第四项任务就是：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成分，使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这种胜利对于世界各国工人革命化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同志们在谈到我们党在国际革命运动方面的任务时，通常总是局限于前三项任务而忘记第四项任务，殊不知我们在国内所进行的斗争，为使我国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而进行的斗争，在建设方面所进行的斗争，就其意义来说，也是国际性的斗争即国际主义的斗争，因为我国是国际革命的根据地，因为我国是使国际革命运动扩展的主要杠杆，如果我们这里的建设工作按照应有的速度进行，那就是表明我们在国际革命运动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正是像党所要求于我们的那样进行的。

这就是党在国际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些任务。

现在来谈党在我们联盟的**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

第一项任务就是：反对新战争，维护和平并保持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正常关系。我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以和平思想为基础的。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揭穿为准备新战争而采取的一切步骤，揭穿用和平主义幌子来掩盖事实上准备战争的那些步骤，——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愿意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掩盖战争准备工作的组织，要加入国际联盟，正像李维诺夫同志所正确说过的，就必须在铁锤和铁砧之间作一选择。然而我们既不愿意成为敲打弱小民族的铁锤，也不愿意成为受强大民族敲打的铁砧。我们既不想当这个，也不想当那个。我们主张和平，我们主张揭穿一切准备战争的步骤，不管这些步骤是用哪种和平主义幌子掩盖起来的。无论是国际联盟或是罗迦诺公约——反正都一样，用幌子是欺骗不了我们的，用叫嚣是吓唬不了我们的。

第二项任务就是：在对外贸易垄断的基础上扩大我国和外界的贸易。

第三项任务就是：和那些在帝国主义大战中遭到失败的国家接近，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最受委屈和分赃最少因而对占统治地位的强国联盟抱反对态度的国家接近。

第四项任务就是：联合附属国及殖民地国家。

以上就是目前党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任务。

二　苏联的内部状况

现在我来谈谈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所涉及的是我国的内部状况和中央委员会在同内部状况有关的问题上的政策。我要举出一些数字。虽然近来在报刊上已经公布了不少数字，但是很遗憾，不举出一些数字是不行的。

一、整个国民经济

在没有列举数字之前，让我谈谈决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工作的几个一般原理（我想从经济方面谈起）。

第一个原理。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工作和建设的。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和我国的建设将在我国经济体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和冲突中发展起来。这种矛盾我们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一种范围，在这种范围内，两个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必定进行着斗争。此外，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仅要在它同外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并且要在我国内部各种不同的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即在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这样来建设我国的经济：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使我国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

的总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使我国经济不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辅助企业发展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依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民经济的结合。

有两条总路线，一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国还应该在长期内保留为一个农业国，应该输出农产品而输入设备，并且应该坚持这条道路，今后也应当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这条路线实际上是要求收缩我国的工业。这条路线不久前在沙宁所写的提纲（也许有人已经在“经济生活报”上读过这个提纲了）中得到了反映。这条路线将使我国永远或者差不多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将使我国客观上必然由依靠国内市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品。这条路线就是要离开我国建设方面的各种任务。

这不是我们的路线。

还有另一条总路线，它的出发点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这条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展我国工业，但是这种扩展要估计到并且要适应我国拥有的资源。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这条路线就是必需的。

如果革命在德国或者法国取得胜利，或者在这两个国家内同时取得胜利，如果那里开始在更高的技术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又是一回事了。那时，我们就会从把我国变成独立的经济单位的政策，转到把我国纳入社会主义发展总轨道的政策。但是当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绝对必须使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最低限度的独立性，

否则就不能保护我国，使我国在经济上不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

这就是第一个原理。

第二个原理。我们在建设中应该像对第一个原理一样奉为指针的第二个原理，就是随时都要估计到我们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的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是私人资本占统治地位，那里各个资本主义托拉斯、辛迪加和各个资本家集团所犯的错误，是由市场上的自发势力来纠正的。如果生产得太多了，就会发生危机，但是在危机过去之后，经济又会转入常态。如果输入过多而造成贸易逆差，票据行市就会波动，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入口缩减，出口增加。这一切都是危机发生时的通常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任何一种较为重大的错误，任何一次较为严重的生产过剩或生产和需求总量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都不可避免地要由某种危机来纠正。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是这样生活着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这样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因此，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应当特别谨慎小心，应当具有远见。因此，我们在按计划领导经济方面，必须做到使失算的情况减少，使我们领导经济的工作极为明智，极为谨慎小心，极其正确无误。但是，同志们，很遗憾，既然我们不特别明智，也不特别谨慎小心，又不特别善于正确地领导经济，既然我们不过是在学习建设，那末我们就会有错误，并且将来还会犯错误。因此，我们在建设时应当拥有后备，我们需要有能够弥补我们的各种缺陷的后备。我们最近两年来的全部工作表明，我们既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在农业方面，有很

多事情不只是取决于我们的经营管理，而且取决于自然界的力量（如歉收等等）。在工业方面，有很多事情不只是取决于我们的经营管理，而且还取决于我们还没有掌握住的国内市场。在对外贸易方面，有很多事情不只是取决于我们，而且取决于西欧资本家的行为，而我国的出口和进口愈发展，我们也就愈依赖于资本主义西方，愈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为了保证自己不受这一切意外事件和不可避免的错误的影响，我们应该懂得必须积累后备的思想。

我们在农业方面不能保证不发生歉收。因此就需要有后备。我们在我国工业发展方面不能保证国内市场不发生意外事件。更不用说我们既然是靠自己积累的资金过活，我们在花费所积累的资金方面就应该特别节省和审慎，尽力做到使每个戈比都用得合理，把每个戈比用到某一时期所绝对必需发展的事业上去。因此就需要有供工业使用的后备。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事件（隐蔽形式的抵制，隐蔽形式的封锁等等）。因此就需要有后备。

本来可以把农贷发放的数目增加一倍，但是这样做就会缺乏必要的后备来资助工业，工业发展就会远远落后于农业，工业品的产量就会缩减，结果就会发生工业品价格高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本来可以把用做扩展工业的拨款增加一倍，但是这就会使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我们会因大大缺少闲置资金而不能保持这种发展速度，因此我们就一定会遭到挫折，更不用说缺乏充分的后备来发放农贷了。

本来可以把我国的进口额，主要是设备的进口额比现有的进口额增加一倍，以便迅速地推进工业发展，但是这会引起输入超过输出，造成贸易逆差，使我国金融受到破坏，就是说，使工业能够借以实行计划和发展的唯一基础受到破坏。

本来可以不管国内市场状况如何，不顾一切地拚命扩大出口额，但是这一定会在城市中引起严重后果，使农产品的价格迅速上涨，因

而使工资遭到破坏，发生某种人为的饥荒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本来可以尽量提高工人工资，不仅可以把它提高到战前水平，并且可以把它提得更高些，但是这种情况会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因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缺少外债、缺少贷款等等的情况下，扩展工业只能依靠积累某些为资助和滋养工业所必需的利润，但是如果我们过快地提高工资，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说不能有比较大量的积累。

如此等等。

这就是我们在我国的建设工作中应该奉为指南，应该当做灯塔的两个基本指导原理。

现在让我来谈谈数字。

不过，我还要离开主题讲一点。我国经济体系中情况有些复杂，整整有五种经济成分。第一种经济成分差不多是自然经济的成分，这就是商品产量极少的农民经济。第二种经济成分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成分，在这种成分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经济中的商品生产。第三种经济成分是私人资本主义，它还没有消灭掉，还在活跃，并且只要我们还实行新经济政策，它还会在一定范围内活跃着。第四种经济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我们容许它存在并且有可能按照无产阶级国家的要求来加以监督和限制的那种资本主义。最后，第五种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工业，即我们的国营工业，在这种成分的生产中没有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只有一个阶级——无产阶级。

我想简单地谈谈这五种经济成分，因为不这样简单地说明一下，便很难了解我将要宣布的那些数字，很难了解我国工业发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况且关于我国制度中的这五种经济成分，列宁曾十分详细地谈到过，他教导我们要善于在我们的建设工作中估计到这几种经济成分间的斗争。

我想简单地谈谈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类型的国营工业，以便消除党内对这个问题所产生的误解和糊涂观念。

能不能把我们的国营工业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呢？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生产组织：一个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另一个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不管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何种特殊形式，但是按实质来说它终究应当是资本主义的。伊里奇在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时所指的首先是租让企业。就拿租让企业来说，那里是不是存在着两个阶级呢？是的，是存在着两个阶级的。一个是资产阶级，即从事剥削和暂时占有生产资料的承租企业家，另一个是受承租企业家剥削的无产阶级。这里是没有社会主义成分的，这一点只要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谁都不敢跑到租让企业中去进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因为大家知道，租让企业是非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干的企业。

再拿另一种类型的企业即国营企业来看。这种企业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呢？不，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企业中不存在两个阶级，只存在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它通过自己的国家来掌握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它不受剥削，因为企业中生产出来的一切除了支付工资以外，最大部分是用来继续扩大工业，即用来改善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有人会说，如果估计到我国企业管理机关中还存在官僚主义残余，那末这终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同国营工业按类型来说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这一点并不矛盾。有两种类型的生产：一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其中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那里存在着两个阶级，那里在为资本家的利润进行生产；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类型的生产，那里没有剥削，那里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那里企业不是为异己阶级的利润进行生产，而是为全体工人扩大工业进行生产。列宁正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国营企业按类型来说是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

这里可以拿我们的国家来比拟一下。我们的国家也叫做非资产阶

级的国家，因为它按列宁的说法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国家机关并不像所有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那样为了压迫工人阶级而工作，而是为了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而工作。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国家按类型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虽然在这个国家的机关中还能找到许多坏分子和旧时代的残余。列宁宣布了我国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地谴责了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官僚主义残余。虽然如此，他始终肯定说我们的国家是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应该把国家的类型同国家系统和国家机关中保留下来的那种遗毒和残余区别开来。同样也必须把国营企业中的官僚主义残余同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类型的那种工业组织区别开来。决不能因为经济机关或托拉斯中还存在着错误和官僚主义等等，就说我们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决不能这样说。如果这样说，那末我们这个按类型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不能称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了。我可以举出许多资产阶级机关，它们比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工作得更好更节约。但这还不是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机关按类型来说就不高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机关虽然工作得好些，但它是在为资本家工作，而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即使它有时不免摇摆不定，但它毕竟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而为无产阶级工作的。

这种原则上的差别是不能忘记的。

关于国营工业也应当这样说。决不能因为我们国营企业管理机关中现在存在着并且将来还会有不协调现象和官僚主义残余，决不能因为这些残余和这些缺点存在，而忘记我们的企业按实质来说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比如说，在福特的那些工作得不错的企业中，也许偷窃现象要少些，但这些企业终究是在为福特，在为资本家工作，而我们的企业，虽然有时发生偷窃现象，事情不总是很顺利的，但它们终究是在为无产阶级工作。

这种原则上的差别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来谈谈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数字。

农业。如果拿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水平和战前即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相比，则我国农业总产值已达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一。换句话说，在一九一三年出产了一百二十余亿卢布（按战前价格计算）的产品，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出产了九十余亿卢布的产品。到下年度，即到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根据我们各个计划机关的材料来看，产值将进一步提高到一百一十亿卢布，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农业在日益发展，——这是自然要得出的结论。

工业。如果拿我国全部工业，国营工业、租让工业和私营工业来说，全部工业在一九一三年的总产值为七十亿卢布，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为五十亿卢布。这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七十一。我们各计划机关预定，下年度的产值将要达到六十五亿卢布，即约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三。工业在日益发展。它在本年度内比农业发展得更快。

特别有必要指出电气化问题。按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在一九二一年的计划规定，在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内应该建成三十个电站，其发电能力总共为一百五十万瓩，费用为八亿金卢布。十月革命以前各电站的发电能力总共为四十万零二千瓩。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发电能力总共为十五万二千三百五十瓩的电站，预定在一九二六年将有发电能力达三十二万六千瓩的发电站发电。如果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那末在十年内，即大约到一九三二年（最低限度的预定期限），苏联的电气化计划就可以实现。电力工业随着电站建设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它的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的生产计划预定要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五至一百七十。但是，必须指出，建筑巨大水电站的费用竟大大超过了原定的计划。例如，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费最初预算“暂定”为二千四百三十万卢布，而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却增加到九

千五百二十万切尔文卢布，即等于建造头批电站所花费的资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九，而沃尔霍夫水电站的发电能力只等于这批电站总发电能力的百分之三十。捷莫—阿夫恰里水电站的建筑费最初的预算为二百六十万金卢布，但是最近要求的费用约达一千六百万切尔文卢布，并且其中约有一千二百万切尔文卢布已经花掉了。

如果我们拿这样或那样联合起来的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的生产同私营工业的生产来比较一下，那就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况：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占全年工业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三，而私营工业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七十九点三，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已经不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七，而是百分之二十点七了。

在这个时期内，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下降了。明年度预定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约达百分之八十，而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将减到百分之二十。在绝对数量方面，私营工业是有增长的，但是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增长得更快，所以私营工业所占比重也就逐渐下降了。

这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实，它说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对私营工业的优势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如果拿集中在国家手里的财产和私有主所掌握的财产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我指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也是无产阶级国家占优势，因为国家拥有的基金总额至少等于一百一十七亿切尔文卢布，而私有主，主要是农户，所拥有的基金总额最多只达七十五亿切尔文卢布。

这一事实说明了，公营经济的基金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这种比重和非公营部分的财产所占的比重相比较，是在日益增长。

而我们整个制度终究是既不能称为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称为社

会主义制度。我们整个制度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在这里，就总产值来说，私有主农民的生产还是占优势，但是这里社会主义工业所占的比重却在不断地增长。社会主义工业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地增长：它利用本身的集中性，利用本身的组织性，利用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利用运输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以及信贷系统和银行都归我们掌握的事实，利用这一切，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不断向前迈进，开始使私营工业服从它，使其余一切经济成分都适应它并且跟着它走。农村的命运也是这样的：它应该跟着城市走，跟着大工业走。

这就是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提到我国制度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在这个制度中所占比重问题，私营资本主义工业所占比重问题，以及小商品生产，主要是农民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问题时，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

现在简单地谈一下国家预算。你们大概知道，我国的预算已经增加到四十亿卢布。如果拿战前卢布来计算，那末我们现在的国家预算至少等于战前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一。其次，如果全国预算总额加上可能计算的地方预算额，那末我们现在的国家预算至少等于一九一三年预算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国家预算结构中的非税收部分的比重大大超过税收部分的比重。这一切也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在日益发展和向前迈进。

关于我们去年从我国国营企业和合作社营企业方面所获得的利润问题，是有极重要意义的，因为我国是资金不足的国家，是得不到大批外债的国家。我们应该仔细地考察一下我国的工商企业、银行和合作社，以便知道我们能够用多少资金来进一步扩展我国工业。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有全国意义的国营工业和金属工业总局似乎提供了约一亿四千二百万切尔文卢布的利润，其中有七千一百万缴入了国库。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我们已经获得三亿一千五百万卢

布的利润，按计划规定，其中有一亿七千三百万缴入国库。

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有全国意义的国营商业提供了约三千七百万卢布的利润，其中有一千四百万缴入了国库。在一九二五年度，由于实行了降低价格的政策，我们所获得的利润较少，即获得了二千二百万卢布，其中约有一千万将缴入国库。

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获得了二千六百多万卢布的利润，其中约有一千七百万缴入了国库。在一九二五年度，对外贸易将要提供，正确些说是已经提供了四千四百万卢布，其中有二千九百万缴入国库。

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计算，各银行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提供了四千六百万卢布的利润，其中有一千八百万缴入了国库，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提供了九千七百多万卢布的利润，其中有五千一百万缴入了国库。

消费合作社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提供了五千七百万卢布的利润。农业合作社提供了四百万卢布的利润。

我刚才举出的这些数字，是多少估计低了些的。原因你们是知道的。你们知道，我们各个经济机关在计算时，总是考虑给自己多留一点来扩展业务。如果你们觉得这些数字小（这些数字确实是小），那你们就要估计到，它们是稍微估计低了些的。

现在简单谈谈我国的对外贸易额。

如果以我国一九一三年度的全部贸易额为一百，那末我国对外贸易额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一，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达到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的出口额为五亿二千二百万卢布，进口额为四亿三千九百万卢布，进出口总额为九亿六千一百万卢布，出超八千三百万卢布。我国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发生贸易顺差。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出口额为五亿六千四百万卢布，进口额为七亿零八百万

卢布，进出口总额为十二亿七千二百万卢布，入超一亿四千四百万卢布。本年度我国对外贸易逆差是一亿四千四百万卢布。

关于这一点，让我稍微说明一下。

有些人讲到本经济年度的这种入超的时候，往往爱说是由于我国在这一年遭到歉收而输入了许多粮食的缘故。但是我们只输入八千三百万卢布的粮食，而入超却是一亿四千四百万卢布。这种入超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买得多卖得少，输入多输出少，因而我们的收支情况发生了问题，我们的金融也发生了问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指示说，党无论如何要做到贸易顺差。我应当承认，我们大家，无论苏维埃机关或是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都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没有执行党给我们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抓紧点，至少还是可以得到某些出超的。我们既然犯了这个严重错误，代表大会就应该加以纠正。顺便说一句，中央委员会本身在今年十一月的专门会议上已经竭力设法纠正了这个错误，当时中央委员会在审查了我国进出口的数字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我们在下年度——在会议上我们已经草拟了我国下年度对外贸易中的基本项目——对外贸易至少要有一亿卢布的出超。这是必要的。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的资本很少，又没有从国外输入的资本，就是有，为数也极少，我国的收支要依靠贸易差额来维持平衡，才能使我国切尔文货币不致有涨落，才能使我们的金融稳定，从而也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展我国工业和农业。你们大家都曾尝过金融不稳定的滋味。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倒霉的事情重新出现，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来根除一切在今后可能使我国金融陷于不稳定的因素。

关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关于工业和农业这两个部门，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对其他各种经济所占的比重，以及关于我讲过的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思想等等方面的数字和意见就是这样。

二、工业和农业

如果再拿直接关系到工业和农业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的相互关系的各个问题考察一下，那末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下面几点。

第一、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产值超过工业产值。工业的基本状况是：它已经接近战前的水准，工业继续前进的步骤就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扩展工业，利用新设备和建设新工厂。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要跨过这道门槛，即从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工业中原有的一切的政策，过渡到在新技术基础上和在建设新工厂的基础上建设新工业的政策，是需要大量资本的。但是我国资本很不足，所以将来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大概不会像迄今以前那样快。

农业方面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决不能说，农业在它现今的技术基础上所蕴藏着的一切潜力都已经挖掘尽了。农业不同于工业，它在现今的技术基础上也能迅速发展一个相当时期。单是把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一下，单是实行净种这样的办法，就能把农业的总产值提高百分之十至十五。你们计算一下，这对全国有多大意义。可见，农业中还蕴藏着很大的潜力。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暂时还没有遇到像我国工业所遇到的那种技术方面的困难。因此，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在今后几年内还会继续加剧，因为农业中还蕴藏着许多潜力，这些潜力还远没有利用，在最近几年内应该加以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无论如何要发展我们的国营大工业，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其次，就是要发展苏维埃**地方**工业。同志们，我们决不能只集中力量发展全国性的工业，因为全国性的工业，我们的集中化的托拉斯和辛迪加，不可能满足一亿四千万人民各种不同的口味和需求。

为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必须使每个区、每个专区、每个省、每个区域、每个民族共和国的生活，即工业生活沸腾起来。如果不发挥各个地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潜力，不尽量帮助区和专区以上的地方工业，不发挥所有这些力量，我们就不能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达到像列宁所说的普遍高涨。不这样做，不把中央的利益同各个地方的利益结合起来，我们就不能解决发挥建设的主动性的问题，就不能解决我国经济普遍高涨的问题，不能解决尽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第二、从前在燃料方面的问题是它的生产过剩。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却是燃料的危机，因为我国工业比燃料增长得更快。我们将接近我国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的那种水平，当时我们由于燃料不够而不得不输入燃料。换句话说，就是燃料的产量和工业的需求量不相适应。因此，任务就是加紧发展我国的燃料业，改进燃料的开采技术，以便使燃料业的发展赶上或者说使它能够赶上工业的发展。

第三、金属的产量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需求量也有些不相适应。如果计算一下最低限度的金属需求量和最高限度的金属出产能力，那就可以看出我们还缺少价值数千万卢布的金属。我国的经济，特别是我国工业，决不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应当予以特别注意。金属是我国工业基础的基础，所以金属产量必须同工业和运输业的需求量相适应。

第四、我国熟练工人的数量和我国工业的需求量是不相适应的。报刊上已经公布过许多数字，因此我不想再列举这些数字，我只指出一点：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全部工业需要补充的熟练工人是四十三万三千人，而我们却只能提供这个需求额的四分之一。

第五、我还要指出一个缺点和一个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就是各铁路上的车辆的使用率已经超过了一切限度。对于车辆的要求是很高的，明年机车和车厢的利用率不能只是百分之一百，而是必须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这样，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固定资本就会损耗过

度，我们如果不采取坚决的措施，那在最近的将来灾祸就会临头。

以上就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内部，特别是工业内部所存在的必须加以克服的缺点和不相适应的情况。

三、商业问题

现在让我来谈谈商业问题。数字表明，这方面也和工业方面一样，国营部分和私人资本主义部分相比较，它的比重是向上增长的。如果认定战前的国内商业流转总额按商品卢布计算是二百亿卢布，那末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这项流转总额就是一百亿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是一百四十亿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七十。国内商业流转额的总的增长是不用怀疑的。如果讲到国营部分在全部国内商品流转中所占的比重，那末它的比重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为百分之四十五，合作社部分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九，私人资本部分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五。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国营部分的比重则为百分之五十，合作社部分的比重已经不是百分之十九，而是百分之二十四点七，私人资本部分的比重已经不是百分之三十五，而是百分之二十四点九了。私人资本部分在全部流转中所占的比重日趋下降，国营部分和合作社部分的比重则日益增长。如果把流转分成两个部分，即分为批发和零售，那末这里也有同样的趋势。在批发方面，国营商业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的全部流转中所占的比重为百分之六十二强，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为百分之六十八点九。比重的增加是很明显的。合作社部分已经由百分之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十九。私营商业在上年度占百分之二十一，现在只占百分之十一。在零售方面，国营部分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的比重为百分之十六，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几乎达到百分之二十三。合作社部分上年度在零售方面的比重为百分

之二十五点九，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则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九。比重的增加是毫无疑问的。私人资本部分在零售方面的比重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为百分之五十七，现在则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三。在零售方面我们显然已经跨过门槛。上年度在零售方面是私人资本占优势，本年度则已经是国营部分和合作社部分占优势了。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在原料和粮食收购方面的比重增长情况如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在油子方面占百分之六十五，在亚麻方面占百分之九十四，在棉花方面几乎占百分之百，在粮食方面，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占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占百分之七十。这方面我们有了某些下降。整个来说，在国内商业中，国营部分和合作社部分无论在批发方面或零售方面显然都有增长。

虽然国营商业在粮食收购方面的比重占了优势，但终究还是比去年少些，这个事实说明了在粮食收购中犯了错误。问题在于，收购工作的过错不仅是苏维埃机关的过错，而且也是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因为中央委员会应该监督苏维埃机关，它对苏维埃机关所做的一切都要负责。这个过错就在于我们在做计划时没有估计到今年的市场情况和收购条件已有新的变化，同去年和前年有所不同。今年是我们在粮食市场上不采用行政压制手段的头一年，是我们把赋税的重担和赋税的压制缩减到最低限度的头一年，是农民和政府的收购机关以平等的身分在市场上直接接触的头一年。我们的计划机关竟没有估计到这些情况，而想在一九二五年年底就能收购全年应当收购的全部粮食的百分之七十。我们没有估计到，农民也会耍手腕，他们会把自己值钱的货物即小麦留下，等待价格继续提高，而宁愿暂时把其他不很值钱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一点我们没有估计到。因此只好修改收购计划和缩减粮食的输出计划，同时也相应地缩减输入计划。现在正在重新审订进出口计划，计划中应该规定最低限度要有一亿卢布的出超，但是这个计划还没有最后制定好。

四、各个阶级，它们的积极性和相互关系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得到了改善。工人阶级丧失阶级性的状况早已成为过去了。工人阶级在迅速地恢复和增长。请看下面这些数字：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截至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如果把包括小工业在内的各种工业中的全部工人，连同季节工人和农业工人合在一起计算，则为五百五十万人，其中有一百万雇农、七十六万失业者。截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工人总数已达七百多万，其中有一百二十万雇农和七十一万五千失业者。工人阶级的增长是毫无疑问的。

在全部工业中，每个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按切尔文卢布计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是三十五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二。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是五十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五。个别部门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每个工人每日的平均实际工资（按商品卢布计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是零点八八卢布，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是一卢布二十一戈比。在全部工业中，每人每日的平均产值（按战前卢布计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为四点一八卢布，而在一九二五年则为六点一四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八十五。如果拿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逐月的对比关系来看，那末可以看到它们是在并列前进：工资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但是在六月和七月，工资在增加，而劳动生产率却比工资增加得少些。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假期，并且工厂里来了新的工人阶层即半农民。

现在来谈**工资**基金问题。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来看，工资基金（我指的是工业，而不涉及其他部门），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为八亿零八百万卢布，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十二亿多卢布，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十七亿卢布。

同志们，我不想谈**社会保险**基金的用途，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让我举出一个总的数字，以便使大家能够了解无产阶级国家究竟在工人保险事业上花费了多少钱。受保险的工人总数，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六百七十万人，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七百万人。从企业工资基金中拨充保险费的平均数额，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占百分之十四点六，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百分之十三点八四。拿经费的总数来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四亿二千二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五亿八千八百万卢布。再说明一点也许不是多余的，就是在去年所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中还有七千一百万卢布存放在社会保险基金会里。

在农民方面，农产品的增加，自然不能不使农民物质状况得到改善。从我们计划机关的材料可以看出，农民个人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数高于城市居民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数。农民已经吃得好些了，他们为进行生产和个人消费而留下的农产品的比重比去年大得多。

无产阶级国家对贫苦农户的帮助，对遭受歉收灾害的农户的帮助，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初步的不完全确切的统计，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对贫农财政上的帮助是一亿至一亿零五百万卢布，其中减免的税款和保险费约六千万卢布，歉收灾害救济金二千四百万卢布，贷款一千二百万卢布。在一九二四年，对遭受歉收灾害的农户的救济包括了计有七百余万人口的地区。在这方面总共花了一亿零八百万至一亿一千万卢布，其中从国家预算中拨出的有七千一百万卢布，由社会组织筹集和银行机关发放的有三千八百万卢布。此外，筹集了七千七百万卢布的防旱基金。无产阶级国家对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的帮助就表现在这些地方。当然，这种帮助还是不够的，但这种帮助终究是值得我们简单地谈一下的。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物质状况的改善，是我国建设事业得以向前进展的必不可少的主要前提。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这些前提。

现在简单地谈谈群众积极性的提高。我国内部状况中引人注目而无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就是工人农民的政治积极性由于他们的物质状况的改善而提高了，他们开始更多地批评我们的缺点，更大声地说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各种缺点了。我们已经进入各个阶级和各个社会集团活跃的时期。工人阶级活跃起来了，农民和他们的各个集团都活跃起来了，新资产阶级、它在农村中的代理人（富农）和它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也活跃起来了。这一事实成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所反映的我们政策上的转变的基础。活跃苏维埃的政策，活跃合作社和工会的政策，在确定租佃问题和雇佣劳动问题上对农民让步，物质上帮助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消灭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这就是党在农村中的新方针的主要表现。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农村中的情况，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当时，在农民中间普遍的不满情绪增长起来了，某些地方甚至企图举行暴动。正是这些情况决定了党在农村中的新方针。

这就是党在群众积极性已经提高和他们各个组织已经活跃的时期对农民所采取的政策的基础，采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调整农村中的关系，提高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并保证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

你们知道，这个政策已经完全证明是正确的。

五、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口号

我们采取联合中农的方针是否做得正确呢？这个新方针的原则方面的情况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列宁对于这个问题的某种指示呢？

人们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在夺取政权的时期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只有贫农，而中农只能使他们中立。这对不对呢？对。列宁起草这个决议

时指的是夺取政权的党。而我们的党已经是执政的党了。差别就在这里。在农民问题上，在工人同农民或者同个别农民阶层结成联盟的问题上，列宁主义提出了适合于革命三个时期的三个基本口号。全部问题在于，要正确地掌握住由第一个口号过渡到第二个口号，由第二个口号过渡到第三个口号的时机。

以前，当我们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最初拟定自己对农民的策略的时候，列宁说过：联合**全体**农民去反对沙皇和地主，中立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我们当时是以这个口号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我们胜利了。这是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后来，当我们进入第二阶段，即进入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就提出了适合新情况的新口号：无产阶级联合**贫农**去反对全体资产者，**中立**中农。这是进行夺取政权的各国共产党所必须采取的口号。甚至在它们已夺得了政权但是还没有使政权巩固的时候，它们也还不能指望同中农结成联盟。中农是一种采取观望态度的人。他们在观望谁会获得胜利，他们在等待，只有在你赶走了地主和资产者而获得胜利的时候，他们才会同你结成联盟。这就是中农的本色。因此，在我国革命第二阶段，我们采取的已经不是工人**同全体**农民结成联盟的口号，而是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口号了。

以后又是怎样呢？以后，当我们击退了帝国主义者的进攻而使政权十分巩固，并且已经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列宁就提出了第三个口号——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这个口号是适合我国革命新时期即大规模建设时期的唯一正确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不只是因为现在可以指靠这个联盟，而且是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应该在农村中利用的不只是数百万人，而是数千万人。否则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包括城市。社会主义是根据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公有化的原则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不把这两个经济部门结合起来，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关于同农民联盟的几个口号就是如此。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话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你在夺取政权或者还没有把已经夺得的政权巩固起来的时候，你就只能指望同贫农结成联盟而中立中农。但是，当你自己已经巩固了，已经夺得了政权，已经开始建设，并且已经应当利用数千万人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联盟就成为唯一正确的口号了。

这个从“无产阶级联合贫农”的旧口号，从中立中农的旧口号过渡到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口号，早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了。让我从伊里奇在那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援引一段话。下面就是这段话：

“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中立**农民，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懂得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所考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我们应当以这种规则和指示为准绳而**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①]。

这就是党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同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政策所持的理论基础。谁想拿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推翻列宁所说的这段话，那就直截了当地说吧。

问题的理论方面就是如此。我们不要抓住个别部分，而要全面地领会列宁的学说。列宁对农民问题提出过三个口号：一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另一个是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口号，第三个是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的口号。谁想用某一个总的口号来代替这三个口号，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谁就要犯极严重的错误。

问题的理论方面就是如此。而问题的实践方面却是这样：在我们实现了十月革命，赶走了地主并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很明显，我们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已经使俄国多少中农化了，现在中农在农村中占了多数，虽然那里存在着分化过程。

分化过程当然是存在着。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现阶段上，情况不能不是这样。但是分化过程是缓慢的。不久以前，我读过两本手册，一本似乎是由中央宣传鼓动部出版的，另一本如果我没有弄错，是由列宁格勒组织的宣传鼓动部出版的。如果相信了这两本手册，那就会得出如下的情况：在沙皇时代，我国的贫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而现在则占百分之七十五；在沙皇时代，富农约占百分之五，而现在则占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在沙皇时代，有若干中农，而现在则少了一些。我不愿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我必须说，这些数字比反革命还要坏。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虑问题的人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并且还把它刊印出来，还刊印在手册上呢？我既然是一个中央委员，当然也要对这种前所未闻的谬误负责。既然在沙皇时代实行了培植富农的政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存在着土地集中（它特别加剧了分化过程），既然当时的政府是竭力促进分化过程的政府，而贫农终究不过是百分之六十，那末，在我们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时代，土地私有制已经不存在，就是说土地已经禁止买卖，因而存在着阻止分化的障碍，而且我们实行过一两年剥夺富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弃剥夺富农的一切方法，我们实行着一种阻碍分化过程的特殊的信贷和合作化政策，——试问，在有这种种障碍的条件下，我们这里的分化过程怎么还会比沙皇时代更加剧烈？富农和贫农怎么还会比以前更多呢？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呢？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笑声）

关于中央统计局在六月公布的那个倒霉的谷物饲料平衡表，也可

以这样说。根据这个平衡表来看，富裕农民的商品余粮似乎占百分之六十一，贫农一点也没有，而中农则占有其余的百分数。可笑的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中央统计局又公布了另一种数字：不是百分之六十一，而是百分之五十二。在不久以前，中央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已经不是百分之五十二，而是百分之四十二了。难道可以这样计算吗？我们相信中央统计局是科学的堡垒。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中央统计局的数字，任何一个管理机关都不能进行计算和计划工作。我们认为中央统计局应该提供不受任何偏见影响的客观材料，因为使数字适合于某种偏见的企图是一种带有刑事性质的犯罪行为。既然如此，如果中央统计局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数字，那末人家又怎能相信它的数字呢？

简单地说，既然我们由于实现土地革命而已经使农村中农化，既然尽管有分化过程发生而中农在农村中仍占多数，而我们的建设工作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都要求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这个事业，那末同中农结成联盟的政策就是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唯一正确的政策了。

这就是问题的实践方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是怎样规定我们的任务的。我手头有列宁写的“论粮食税”一书的大纲，他在这个大纲中明确地提出了基本的领导路线。“现在增加农产品成为（已经成了）**关键**和**枢纽**……因此，在农业方面要‘指望’中农。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高涨的‘中心人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页）

因此，在农业方面要指望中农，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高涨的中心人物。列宁同志在一九二一年就是这样写的。

同志们，在我们党的第十四次（四月）代表会议上通过的那些决议和那些对农民让步的办法，就是以这个思想为依据的。

党的第十四次（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和中央在十月一致通过（正如它一致通过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一样）的关于贫农工作的

决议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摆在我们中央十月全会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防止我们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所制定的那个政策即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遭到破坏，所以要防止这个政策遭到破坏，是因为当时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一种情绪，认为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能接受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情绪，认为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似乎是忘记了贫农，似乎有谁在力图越过贫农来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同志们，这是愚蠢的，但这是事实，因为这样的情绪是有过的。当我们参加十月全会的时候，贫农问题对于我们是不是什么新东西呢？当然不是。只要贫农还存在，我们就应当同贫农结成联盟。这一点我们从一九〇三年列宁的小册子“告贫农书”最初出版时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既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既然是共产党人，我们在农村中就应当依靠贫农。难道还有谁可以依靠吗？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它无论在四月或十月，无论在代表会议上或在中央全会上，对我们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并且也不可能是什么新东西。如果贫农问题终究提了出来，那是由于我们在改选苏维埃时积累了一些经验的缘故。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当时苏维埃活跃起来了，苏维埃民主开始建立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苏维埃民主——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领导。要知道，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领导，任何苏维埃民主都不能称为真正苏维埃的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苏维埃民主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农村中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应该由谁来担任呢？应该由贫农的代表来担任。而在我们使苏维埃活跃起来的时候，贫农是处在什么情况下呢？他们当时是处在极端涣散的状况下。当时不仅某些贫农分子，而且某些共产党员也认为我们摒弃剥夺富农的政策和行政压制手段就是摒弃贫农，就是忘记贫农的利益。他们不去同富农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却很不体面地诉起苦来了。

要克服这种情绪应该怎样做呢？第一、应该完成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向党提出的任务，就是说，应该规定以物质援助贫农的条件、方式和方法。第二、需要提出成立专门的贫农组或贫农团的口号，以便在选举苏维埃和选举合作社时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来争取中农和孤立富农，如此等等。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所写的关于贫农工作的提纲中正是这样做的，这个提纲是他在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进行了三个月的工作以后写成的，并且已经由中央十月全会一致批准了。

由此可见，中央十月全会的决议是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直接继续。

在当时，第一、应当具体提出物质援助问题，以便改善贫农的物质状况，第二、应当提出组织贫农的口号。这种新东西完全是属于莫洛托夫同志的，成立贫农团的口号就是他的思想。

为什么需要提出成立贫农团的口号呢？其所以需要，是为了消除贫农的涣散状态，并使他们有可能在共产党员帮助下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进行反对富农和争取中农的斗争的有组织的支柱。贫农还有依赖心理，他们指靠国家政治保术局，指靠领导，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靠自己的力量。这种消极情绪和依赖心理应该从贫农意识中清除出去。应当对贫农提出口号，以便使他们终于自立起来，使他们在共产党和国家的帮助下组织成一个集团，使他们在苏维埃舞台上，在合作社舞台上，在农民委员会舞台上以及在所有一切农村社会团体舞台上学习同富农作斗争，但不是用请求国家政治保术局帮助的方法进行斗争，而是用政治斗争的方法，用有组织的斗争方法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可以锻炼贫农，只有这样才可以组织贫农，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把贫农由一个依赖他人的集团变成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

这就是我们在十月提出贫农问题的原因。

六、农民问题上的两种危险和两种倾向

我们党内关于农民问题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轻视富农危险的倾向，另一种是夸大这种危险的倾向，即轻视或低估中农作用的倾向。我并不认为这两种倾向对于我们有什么致命的危险。倾向总是倾向，倾向是某种尚未成形的东西。倾向是错误的开始。或者我们让这种错误发展下去，那末事情就会不妙；或者我们把这种错误根除，那末危险就会消灭。倾向是某种错误的东西，如果不及时制止它，那它以后就会带来恶果。

现在简单地谈谈关于低估富农危险的问题。人们在谈论富农倾向。这当然是愚蠢的。在党内决不能有富农倾向。问题不是富农倾向，而是低估富农危险的倾向。即使还没有人成为这种倾向的牺牲品，还没有人站在这种倾向的立场上，但这种人反正是会出现的，因为我们这里的发展是向着容许资本主义某些活跃的方面进行的，而资本主义的活跃不能不在党的周围引起混乱。另一方面，我们这里发展着社会主义工业，在社会主义工业同私人资本之间进行着斗争。谁超过谁呢？现在的优势是在社会主义成分方面。我们将使富农和城市私人资本家都受我们的支配。但是目前的事实还是这样：富农在发展着，我们在经济上还远没有把他们打垮。富农无疑是在聚集力量，谁不注意到这一点，说这是小事，说富农是个吓人字眼，谁就是使党在危险的面前失去警惕性，使党在同富农作斗争中，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中陷于被解除武装的地位，因为富农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代理人。

有人讲到鲍古舍夫斯基。他当然没有富农倾向。他有低估富农危险的倾向。如果他有富农倾向，那就应该把他开除出党了。但是据我所知，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要求把他开除出党。他这种倾向是低估农村中的富农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党不能保持在经常的战斗

准备状态中，并且在党同资本主义分子斗争时解除党的武装。大家知道，这种倾向受到了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斥责。

但是还有另一种倾向，就是夸大富农危险的倾向，即在富农危险面前张皇失措，慌慌张张地喊叫“富农来了，救命！”。真是咄咄怪事！人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就知道新经济政策会使资本主义活跃起来，会使富农活跃起来，知道富农一定会抬起头来。可是当富农一出现时，他们就开始大叫“救命”而张皇失措了。他们竟慌张到把中农都忘记了。但是现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却是争取中农，使中农脱离富农，用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的办法来孤立富农。而那些在富农危险面前张皇失措的同志却把这点忘记了。

我认为如果要追究这两种倾向的根源，那末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以下几个出发点。

第一种倾向就是轻视富农和农村中所有资本主义分子的作用，抹杀富农的危险。这种倾向的出发点就是不正确地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发展不会使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活跃起来，认为我国富农和所有资本主义分子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了历史上的陈迹了，认为在农村中不会发生分化过程，认为富农是过去的回声，是吓人的字眼，如此而已。

这种倾向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事实上，这种倾向会引导到否认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第二种倾向就是夸大富农和农村中所有资本主义分子的作用，在这些分子面前张皇失措，否认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联盟是可能的和适当的。

这种倾向的出发点，就是认为现在我们农村中似乎在单纯地恢复资本主义，认为这种恢复资本主义的过程是把我国合作社也全部或绝大部分包括在内的一个包罗万象的过程，认为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使大批农民的分化过程不断加剧，认为两个极端集团即富农和贫农一定

会逐年加强和增长起来，认为中间集团即中农也一定会逐年减弱和被冲刷。

事实上这种倾向是要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要恢复贫农委员会的剥夺富农的政策，因而就是要在我国宣布国内战争，这样也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全部建设工作，也就是要否认列宁的那个主张吸引千百万农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的合作化计划。

你们要问：哪一种倾向坏些？不能这样提问题。这两种倾向，无论第一种倾向或第二种倾向都坏。如果这两种倾向发展下去，它们就会瓦解和断送党。幸而我们党内有能够消灭第一种倾向和第二种倾向的力量。（鼓掌）虽然这两种倾向都坏，虽然提出它们中间哪一种倾向更危险些的问题是愚蠢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应该用来对待这两种倾向的观点。党同哪一种倾向作斗争最有准备，是同第一种倾向还是同第二种倾向呢？这是实际上需要提出的问题。这两种倾向都是危险的，都是坏的，决不能说它们中间哪一种要危险些，但是说党同哪一种倾向作斗争最有准备，则是可以的并且是应该的。如果有人向共产党员提出问题说，究竟党更有准备的是剥夺富农，还是不这样做而去同中农结成联盟呢，我以为，在一百个共产党员中就有九十九个人会说，党最有准备的是这样的口号：打击富农。只要让他们干，那他们一下子就会把富农剥夺干净。至于不要剥夺富农，而要实行较为复杂的经过同中农联盟来孤立富农的政策，那他们就不那么容易领会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党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还是应该集中火力反对第二种倾向。（鼓掌）任何马克思主义，任何列宁主义，都不能掩盖富农是有危险的这一原理。富农总是富农。无论鲍古舍夫斯基怎样硬说富农只是吓人的字眼，但富农总是有危险的。这一点无论你用什么引证也不能把它从共产党员的意识中消除掉。至于必须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原理，那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些关于列宁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加以抹杀和遮盖的，因为伊里奇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

中写的是中立中农。在这里，有着可以运用引证的广大地盘，在这里，每一个想搅乱我们党的人，每一个想对党隐瞒真相的人，即想隐瞒列宁对农民问题不止提出一个口号而是提出过三个口号这一真相的人，都有广大的活动地盘。在这里，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作种种篡改。正因为如此，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第二种倾向。

关于苏联的内部状况，即关于苏联的经济，关于工业和农业，关于各个阶级，关于各个阶级的积极性，关于活跃苏维埃，关于农民问题等等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不来谈某些有关国家机关的问题了，国家机关在不断增长并力图脱离党的领导，当然这是办不到的。

我也不来谈我们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我所以不谈，是因为我的报告拖得太长了。我所以不谈这一点，是因为这个问题对党说来并不是什么新问题。

七、党的任务

现在我来谈谈党在对内政策方面的任务。

我们在**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方面应该进行的工作是：

（甲）进一步增加国民经济的产值；

（乙）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丙）在国民经济中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决定性优势；

（丁）保证苏联国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具有必要的独立性；

（戊）增加非税收部分在国家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应该进行的工作是：

（甲）在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和加速资金

周转的基础上扩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

（乙）使燃料和金属的产量以及铁路运输的固定资本的数额适应于我国日益增长的需要；

（丙）加紧发展苏维埃地方工业；

（丁）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发展技术作物，实行农业工业化；

（戊）通过普遍合作化和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办法，吸引分散的农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在**商业**方面应该进行的工作是：

（甲）进一步扩大和在质量上改进商品运销网（各种合作社和国营商店）；

（乙）最大限度地加速商品流转；

（丙）降低零售价格并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私营商业的优势；

（丁）在一切收购机关中建立统一战线并规定严格的收购工作纪律；

（戊）加强对外贸易，保证贸易顺差，也就是说，保证收支顺差，因为这是保持通货稳定的最必要条件和避免通货膨胀的必要保证。

在**计划**方面应当按照必须保证必要后备的方向进行工作。

顺便简单地谈一下后备泉源之一的烧酒问题。有人认为可以带着白手套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志们，这是极严重的错误。既然我们得不到借款，既然我们缺少资本，除此以外，我们又不能受西欧资本家的奴役，不能接受他们向我们提出的而被我们拒绝了的奴役条件，我们就只有一条出路：在其他方面寻找泉源。这样做总比受奴役好些。这里正是应该在奴役和烧酒之间进行抉择，而那些认为可以带着白手套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是犯了极大的错误的。

在**阶级关系**方面应该进行的工作是：

（甲）保证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联盟；

（乙）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

（丙）在政治上孤立和在经济上排挤富农和城市资本家。

在**苏维埃建设**方面应该进行的工作是坚决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吸引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来参加这一斗争。

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新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家路标转换派分子。路标转换派，这是日益成长并逐渐同富农和旧知识分子勾结起来的新资产阶级的思想。新资产阶级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即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其内容就是认为共产党必定蜕化，而新资产阶级则必定团结起来，同时我们布尔什维克必定会不知不觉地走近民主共和国的门槛，之后又必定跨过这道门槛，并在某一个不知是从军人中间还是从文官中间推举出来的“凯撒”帮助下，我们必定陷于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状态中。

这个新思想就是这样，这种思想力图迷惑我国旧知识分子，并且不仅迷惑他们，甚至也力图迷惑某些接近我们的人。我不来驳斥关于我们党蜕化的说法。这种蠢话不值一驳。我们党没有蜕化，并且一定不会蜕化。它不是由那种会使它蜕化的材料组成的，也不是由那种会使它蜕化的人锻炼成的。（鼓掌）我们的干部，无论是年轻干部或者老干部，在思想方面都成长起来了。我们幸运的就是，列宁的一些著作我们已经出过好多版了。现在人们都在阅读，都在学习并开始了解问题了。不仅党的领导者，而且普通党员都开始了解问题了，他们已经不再受人愚弄了。现在蜕化的叫嚣已经吓不倒任何人了。人们自己能够判别问题。不管有人怎样叫嚣，不管有人怎样用引证来吓唬人，但是普通党员听了以后是能够判别的，因为现在他们手里都有列宁的著作。（鼓掌）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党不会离开列宁主义道路的一个基本保证。（热烈鼓掌）

我所以终于讲到了路标转换派分子，是为了简单地回答所有那些

指望我们党和我们中央委员会蜕化的人。乌斯特里雅洛夫是这种思想的创始人。他在我们的运输部门中工作。据说他工作得很好。我认为，既然他工作得很好，那末就让他去幻想我们党蜕化吧。幻想我们是不禁止的。让他尽情地去幻想吧。但是，让他知道，他在幻想蜕化时，应该为我们布尔什维克效力。否则他是会倒霉的。（鼓掌）

三 党

现在来谈党的问题。我把党放在我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来谈，并不是因为党是我国发展的一切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不，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党领导的。

我已经讲过无产阶级专政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即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对外随机应变方面以及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我们党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如果党没有得到发展和巩固，这些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在这方面，作为领导力量的党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自流地实行的，它首先是依靠党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的。在现今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要是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只要把党动摇一下，把党削弱一下，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会动摇和削弱。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所有的资产者都在疯狂地谈论我们的党。

我这样讲决不是想说我们党和国家是一个东西。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党是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力量。如果根据这一点说政治局是国家的最高机关，像某些同志所说的那样，那是愚蠢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糊涂思想，它对我们的敌人有利。政治局不是国家的最高机关，是党的最高机关，而党又是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是党的机关。我并不想把国家机关和党看成一个东西。我只是想说，在我们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切基本问题上起领导

作用的是党。也只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我们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取得了成就。因此，关于党的成分，关于党的思想水平，关于党的干部，关于党在提出经济建设和苏维埃建设问题方面的领导能力，关于党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关于党的内部一般状况等问题，都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

首先来谈党的成分问题。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以前党员和预备党员总共有四十四万六千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不包括在内）。其中工人十九万六千人，占百分之四十四；农民十二万八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职员及其他成分十二万一千人，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以前，党员和预备党员已经不止四十四万六千人，而是九十一万一千人了，其中工人五十三万四千人，占百分之五十八点六；农民二十一万六千人，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八；职员及其他成分十六万人，占百分之十七点六。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以前我们已经有一百零二万五千名共产党员。

工人阶级（如果拿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有百分之几已经加入了我们党呢？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组织报告中说过，我们国内总共有四百一十万工人（其中包括农业工人）。我当时没有统计小工业中的工人，因为他们是无法统计的，当时社会保险还不普遍，而统计机关又没有从事这项工作。我当时所举的是一九二四年一月的数字。后来到了已经有可能统计小工业中工人的人数时，我们才知道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以前我国的工人总数为五百五十万人（其中包括农业工人）。其中入党的工人有三十九万人，占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七。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以前工人总数已经是六百五十万人，其中入党的有五十三万四千人，占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八。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以前我国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小工业和大工业内的产业工人统统包括在内）的总人数为七百万人。其中入党的有五十七万人，占百分之八。

我所以讲这一切，是为了指明那种关于要在一两年内使我国工人阶级全体成员中入党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的说法是多么无知。

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共（布）党内工人党员在标准工业工人中所占的比重。大工业即标准工业（国营工业和非国营工业，还包括军事工业、主要铁路修理厂和主要机车修理厂）中的固定工人（不是季节工人）的人数，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以前为一百六十万零五千人。当时我们有十九万六千工人党员。这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二。如果拿产业工人党员来说，并且确定一下他们在大工业工人阶级总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那末我们可以看到，一月一日以前有八万三千产业工人党员，他们占大工业中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五。这都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以前的情形。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以前大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一百七十八万人；当时有三十八万九千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当时有二十六万七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以前大工业即标准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一百八十四万五千人；当时我们工人党员的总数（包括产业工人党员和非产业工人党员）为四十二万九千人，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当时有三十万零二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以前大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二百零九万四千人；当时有五十三万四千工人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当时有三十八万三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二。

你们可以看到，在那里，在整个工人阶级方面，入党工人数目的增长比工人阶级本身的增长要慢些；在这里，在大工业方面，情形就恰恰相反，工人党员的百分比的增长比大工业工人数目的增长要快些。这一点必须指出来，以便我们在谈到党内的工人成分时能知道我们党的面貌究竟怎样。党内的工人成分主要是大工业中的工人。

既然如此，现在我们能不能说要在一年内把产业工人党员的人数增加到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呢？不，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不愿意陷入空想。因为：既然我们有三十八万产业工人党员，那末为了使其余的——约七十万非产业工人党员——组成百分之十，就必须使党员的人数在一年内增加到七百万人。可见，某些同志根本就没有去计算一下，只是随便提出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而使自己出丑。

党在工人阶级中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在增长呢？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未必还用得着证明。你们知道，我们的党实质上是由工人阶级中所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过的。单是这一事实就已经说明，我们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我们党在工人阶级内部占独占地位。

至于我们党在农村中所占的比重，那末这方面的情况是很不好的。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我国十八岁到六十岁的农村居民共有五千三百万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有五千四百余万人。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农村支部中的共产党员有十三万六千人，占农村成年居民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二六，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我们有二十万零二千农民党员，占百分之零点三七。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我并不想说党在那里必须一日千里地发展，但是我们农民党员的百分比终究还是很低的。我们党是工人的政党。这个党内总是要工人占多数的。这是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但是下面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同农民联盟，那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党的成分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优秀农民，作为党在农村中的支柱。从这方面来看，情形暂时还是不大好的。

其次，我必须指出我们党的思想水平普遍提高这一事实。关于组织方面，莫洛托夫同志将向你们做报告，我不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不说明一点：根据一切材料看来，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年轻的和年老的）的思想水平都已经大大提高了。可以拿去年我们同托洛茨基

主义进行的争论来做例子。你们知道，当时所涉及的是关于修正列宁主义的问题，是关于所谓随时更换党的领导的问题。当时党如何一致地对付了这次反党浪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党已经成长起来了。党的干部已经坚强了，党已经不怕争论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的争论时期。我深信党一定也能在这次争论中很快地取得胜利，决不会发生什么特别事故。（喊声：“对！”鼓掌。）为了不预决事变的进程和不刺激人，现在我不来谈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的行动的实质以及莫斯科的同志们对这种行动的反应的实质。我想大会代表自己会谈到这一点，而我只要在结论中做个总结就行了。

我就要结束我的报告了。

我已经讲过我国的对外政策，已经讲过腐蚀资本主义世界的那些矛盾。我已经讲过只有西方的工人革命才能克服这些矛盾。

其次，我讲过决定我们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的那些矛盾。我讲过，这些国家将力图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它们将力图对我们进行武装干涉，我们则将予以还击，而且我们指望获得西方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援，特别是在西方工人常到我们这里来并且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以后。同时，我们预计到这种友好关系是不能为资本家所容许的。这些矛盾也正在被我们克服。但是归根到底我国外部的矛盾即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间的矛盾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克服不了的，为此就需要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这一援助。

其次，我讲过我国内部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间的矛盾。我讲过，我们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克服这些矛盾。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是取消主义者，谁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并且我们已经在克服这些矛盾。当然，西方的援助来得愈快，情形也就愈好，我们也就能更快地克服这些矛盾，以便彻底消

灭私人资本，并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如果没有外援，我们也不会垂头丧气，不会喊救命，不会抛弃自己的工作，（鼓掌）也不会惧怕困难。谁疲倦了，谁被困难吓倒了，谁失掉了理智，那就请他让路给那些能保持勇气和坚定性的人。（鼓掌）我们不是怕困难的人。我们既然是布尔什维克，我们既然受过列宁主义的锻炼，也就不会逃避困难，而会面向困难并去克服困难。（喊声：“对！”鼓掌。）

其次，同志们，我讲过我们党的成就和错误。我们犯过不少错误。不论在对外贸易方面，在收购工作方面或在其他一些工作方面，我们都犯过不少错误。伊里奇教导我们不要骄傲自大。我们决不会骄傲自大。虽然我们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成就还是有的。无论如何我们有一点是已经达到了，这是谁也不能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用大规模的建设工作，用在经济战线上实行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用我们在这方面所获得的种种成就向全世界表明，工人在夺得政权以后不仅能打败资本主义，能破坏旧东西，而且能建设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使这个真理明显化了，这一成就是谁也不能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是我们至今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中最大的和最难获得的成就。我们已经向西方工人阶级和东方被压迫人民表明，历来只会替老爷们做工和听从老爷们指挥的工人在夺得政权以后是能够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能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西方无产者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呢？首先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要认识到工人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能过活，要认识到工人阶级不但有能力破坏旧东西，而且有能力建成新东西，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使工人产生怀疑主义思想，使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使他们不相信有可能用强力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全部工作的意义，我们全部建设的意义在于：这种工作和这种建设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信，工人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能过活，靠自身力量也能建设新社会。

各国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各国工人代表团来到我国考察我国建设中的每个角落并力求了解我国建设中的成就，——这一切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旨而开始相信自身的力量，相信工人阶级有能力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新社会。

我并不想说我们在报告涉及的时期内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有一点终究必须承认，那就是我们已经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表明和证明，工人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和夺得政权以后能够按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这是任何人绝对不能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一成就是无法估价的。因为取得这一成就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胜利。这就是交给他们一种新的武器去反对资产阶级。至于他们正在拿起这种武器并准备使用这种武器，这只要从工人纷纷来我国访问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活跃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而当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的时候，那就可以确信这将是资本主义死亡的开端，这将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最可靠的征象。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工作不是徒劳无益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一定会获得国际范围的胜利。（热烈鼓掌多时。全场欢呼。）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7 卷第 178—239 页

关于反对右倾和“极左”倾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会议上的两次演说）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

我认为汉逊和路特·费舍所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们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随时随地都要所谓公平地用同等的打击力量去反对右派和“极左派”。这种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公平地和均等地打击右派和“极左派”的观点是幼稚的观点。政治家是不能这样提问题的。对于跟右派和“极左派”作斗争的问题，我们不应当从公平的观点来考察，而应当从政治情况的要求、从每个时候党的政治要求的观点来考察。为什么目前法国共产党**迫切的**突击任务是和右派作斗争，德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却是和“极左派”作斗争呢？因为法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目前这两个党的政治要求不同。

德国不久以前才度过了严重的革命危机，当时党是以正面攻击的方法进行斗争的。目前德国共产党正处在积聚力量和组织群众去迎接未来决战的时期。为了在新的环境中达到旧的目的，正面攻击的方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了。现在要求德国共产党改用迂回的方法，以便掌握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出现一个“极左派”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派别像小学生一样重复着旧的口号，它没有能够适应或不想适应那种需要新的工作方法的新的斗争条件。于是“极左派”的政策就阻碍了党去适应新的斗争条件，妨碍了党为自己开辟走

向德国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道路。德国共产党如果粉碎“极左派”的反抗，那末它就会走上广阔的大道，争得工人阶级的多数；德国共产党如果不这样做，那末它就会把目前的危机变成慢性的置党于死地的危机。因此，德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就是和党内的“极左派”作斗争。

在法国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那里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革命危机。那里的斗争是在合法的范围内用完全合法或者几乎完全合法的斗争方法进行的。但是法国现在已经显露出危机，我指的是摩洛哥战争、叙利亚战争和法国财政困难。这个危机究竟严重到怎样的程度还很难说，但它毕竟是一个危机，它要求党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斗争条件结合起来，要求党最高度的布尔什维克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党内出现一个集团（我指的是右派）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集团没有能够适应或不想适应新的斗争条件，它仍然坚持旧的斗争方法，把旧的斗争方法当做唯一正确的方法。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不阻碍法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因此，法国共产党**当前的**危险是右倾的危险。因此，法国共产党的突击任务就是和右倾危险作斗争。

从联共（布）历史中举几个例子来说吧。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我们党内也曾形成一个叫做“召回派”的“极左派”，它没有能够适应或不想适应新的斗争条件，它不赞成利用合法机会（例如杜马、工人俱乐部、保险基金会等等）的方法。大家知道，列宁对这个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党是在战胜了这个集团以后才走上正确的道路的。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我们这里又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当时“极左派”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大家知道，这个集团也被以列宁为首的我们党打垮了。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跟右派和“极左派”作斗争的问题不应当抽象地而应当具体地根据政治情况来提出。

法国同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关于反对自己党内右派分子的决议，而德国同志提出关于反对“极左派”的决议，这是偶

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的。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什么病。

因此，公平地和同等地打击右派和“极左派”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正因为如此，我建议从关于德国“极左派”的决议草案中把那句说到在德国共产党内必须同样强调对右派和“极左派”作斗争的话删去。我建议删去这句话的理由，和从关于法国共产党内右派的决议中把那句强调反对“极左派”的话删去的理由是一样的。至于随时随地都应当同右派和“极左派”作斗争，那是绝对正确的。可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目前在法国应当强调什么问题，在德国又应当强调什么问题。我认为在法国共产党内应当强调和右派作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当前政治情况所要求的；在德国共产党内却应当强调和“极左派”作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德国共产党当前政治情况所要求的。

假使用刚才讲过的观点来考察，那末，德国共产党内的中间集团即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的现状是怎样的呢？依我看来，这个集团是在用外交手腕替萧列姆的“极左派”打掩护。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同情萧列姆集团，却竭尽全力去削弱党对萧列姆集团的打击。这样，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就阻碍着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克服并消除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的偏见。因此，德国共产党必须和这个集团即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作坚决的斗争。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如果被打垮，那末党就有可能在和萧列姆集团的斗争中克服目前的危机；德国共产党如果上了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的外交手腕的当，那末斗争的胜利就将属于萧列姆。

二

我觉得汉逊在党内思想斗争的问题上是在宣扬某种完全不适合于

共产党的僧侣道德。看来他并不反对思想斗争，但是他想以丝毫不降低反对派领袖威信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斗争。我必须说，天下没有这样的斗争。我必须说，谁认为只有在丝毫不损害领袖威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斗争，谁就是实际上否认党内可以进行任何思想斗争。我们是否必须揭露党的某些领导者的错误呢？我们是否必须把这些错误公开出来，以便能够用领导者的错误来教育党员群众呢？我以为是必须的。我以为别的纠正错误的方法是没有的。我以为掩饰错误的方法不是我们的方法。由此可见，党内的斗争和纠正错误不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某些领袖的威信是不成的。这也许是可惜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反对必然性。

汉逊问：我们是否必须一般地既反对“极左派”又反对右派呢？自然是必须的。这个问题我们老早就解决了。争论的并不是这一点。争论的是：在目前处在不同状况下的两个不同的党内，即法国党和德国党内，我们现在必须强调对哪一种危险作斗争的问题。法国同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关于反对右派的决议，德国同志却提出关于反对“极左派”的决议，这是偶然的吗？也许法国同志强调和右派作斗争的问题是错了吧？那末，为什么汉逊不打算向主席团提出关于和法国“极左派”作斗争的对案呢？也许德国同志强调和“极左派”作斗争的问题是错了吧？那末，为什么汉逊和路特·费舍不打算向主席团提出关于强调和右派作斗争的问题的对案呢？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般地同右派和“极左派”作斗争的抽象问题，而是目前德国党的迫切任务的具体问题。德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是克服“极左”倾的危险，正像法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是克服右倾的危险一样。

例如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在本国工会运动中已经有了真正据点，已经为自己开辟了走向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道路，并且已经开始取得工人阶级群众的信任，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是相当多的

工人阶级群众的信任，可是德国在这方面还很弱，这种众所周知的情况是由于什么呢？这种情况首先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内的“极左派”还很强，他们对工会、对统一战线的口号，对掌握工会的口号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大家知道，不久以前“极左派”还坚持“退出工会”的口号。大家知道，这个反无产阶级口号的余毒，直到今天在“极左派”中间还没有完全消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德国共产党能够迅速而坚决地扫除“极左派”在群众工作方法问题上的偏见，彻底粉碎萧列姆集团，从思想上粉碎它；或者是德国共产党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末党内危机就会朝着极危险的方向发展。

有人说，在“极左派”那里有诚实的革命工人，不能也不应当把他们推开。这是完全对的。我们并没有提出要把他们推开。因此，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并没有提出关于把任何一个“极左派”分子，尤其是工人，推开或开除出党的任何建议。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些工人提高到列宁党的觉悟水平呢？怎样才能使这些受了“极左派”领袖的错误和偏见影响的工人走出迷途呢？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政治上否认“极左派”的领袖，揭露“极左派”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把诚实的革命工人弄得糊里糊涂并阻碍他们走上广阔的大道。在党内思想斗争和群众政治教育的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容许玩弄陈腐的外交手腕和掩饰错误呢？不，不能容许。要是容许，就是欺骗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只有一条：揭露“极左派”领袖的错误，从而帮助诚实的革命工人走上正确的道路。

有人说，打击“极左派”会引起别人的责难，说德国共产党向右转了。同志们，这都是无谓的话。一九〇八年，列宁在党的全俄代表会议上对俄国的“极左派”作了斗争并彻底打垮了他们，当时我们这里也有人责难列宁，说他右倾，说他向右转。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列宁当时是正确的，他的观点是唯一革命的观点，而当时以“革命”词藻自炫的俄国“极左派”实际上却是机会主义者。

不应当忘记，右派和“极左派”实际上是双生子，所以他们都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不同的只是右派并不经常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左派却经常用“革命”的词藻掩盖他们的机会主义。我们不能根据某些造谣分子或庸人可能说我们些什么话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我们应当坚定地满怀信心地走自己的道路，不管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还会造我们什么样的谣言。俄罗斯人有一句很好的谚语：“狗叫狗的，商队走商队的。”我们必须记住这句谚语，因为我们还会常常用得着它。

路特·费舍说，今后德国共产党内会出现右倾的危险，它将成为党的迫切问题。这完全可能，甚至一定会如此。但是，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路特·费舍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对目前**已经**成为实际危险的德国“极左派”的打击应当减轻，而对**将来可能**造成严重危险的右派的打击现在就应当加重。不难了解，这样提问题是有些可笑的，而且是根本不对的。只有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这样目光短浅、玩弄外交手腕的集团才会落到如此可笑的地步；这个集团力图削弱党对“极左派”的斗争，从而搭救萧列姆集团使它免受打击。路特·费舍的建议的唯一意义就在这里。我想，在法国也一定有这种玩弄外交手腕的、力图以花言巧语来掩饰法国共产党内右派分子的中间集团。因此，不论在德国党内还是在法国党内，和这些玩弄外交手腕的中间集团作斗争都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路特·费舍硬说通过反对德国“极左派”的决议只会使党内情况更加紧张。我认为路特·费舍是要使德国共产党内的危机延续下去，使它成为长期的危机，使它变成慢性的危机。因此，不管路特·费舍怎样玩弄外交手腕，不管她怎样用花言巧语来谈论党内和平，我们是不能走她那条道路的。

同志们，我以为德国共产党内已经锻炼出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以为目前德国共产党的工人核心正是德国共产党所必需的马克

思主义核心。支持这个核心并帮助它和各种倾向首先和“极左”倾向作斗争，——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任务。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反对德国“极左派”的决议。

载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四十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8 卷第 3—9 页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献给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

约·斯大林

一　列宁主义的定义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所下的众所周知的列宁主义定义，看来已经得到公认了。这个定义就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

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

所有这些似乎都不需要特别解释了。

然而我们党内竟有人认为必须给列宁主义下一个与此稍稍不同的

定义。例如季诺维也夫认为：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季诺维也夫所强调的几个字有什么意义呢？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

这就是为鲍威尔和考茨基效劳，因为鲍威尔和考茨基否认列宁主义能适用于其他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

不用说，农民问题对于俄国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但是这个事实对于确定列宁主义基础能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列宁主义仅仅是根据俄国的条件、专为俄国制定的，而不是根据帝国主义的条件、为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制定的吗？难道列宁的著作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只是对于俄国有意义，而不是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都有意义的吗？难道列宁主义不是**各**国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吗？难道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不是对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适用和必要的吗？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〇页），难道不对吗？列宁说“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意义**”[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页），难道不对吗？

又如下面一段列宁的话难道说得不对吗：

“由于俄国很落后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必然有一些特点。但俄国的基本力量以及社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之点**。”[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八十八页）

如果这一切都对，难道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吗？

这种局限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列宁主义定义怎能和国际主义相容呢？

二　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说：

“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

我以为是正确的。这个论点完全是从列宁主义定义中得出来的。的确，既然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又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就是阐明这个问题，就是论证这个问题并把它具体化。

可是，看来季诺维也夫是不同意这个论点的。他在“纪念列宁”一文里说：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我已经说过，农民的作用问题是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①

可见季诺维也夫的这个论点完全是从他给列宁主义所下的不正确的定义中得出来的。因此，这个论点也和他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一样，是不正确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一页），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是正确的。那末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帝国主义问题，帝国主义发展的跃进性问题，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无产阶级国家问题，这个国家的苏维埃形式问题，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列宁都给阐明了的，这难道不对吗？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和根基，这难道不对吗？不阐明这些基本问题，就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上去阐明农民问题，这难道不对吗？

不用说，列宁是个精通农民问题的人。不用说，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有极重要的意义，并且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问题的组成部分。可是，如果在列宁主义面前不摆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问题，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派生问题，即农民问题，这难道不明白吗？如果在列宁主义面前不摆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实践问题，就不会有和农民联盟的问题，这难道不明白吗？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如果列宁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为基础，并且不顾这个基础而站在这个基础以外来阐明农民问题，那他就不会是一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像他确实是的那样，而只会是一个平凡的“农民哲学家”，像国外那些庸俗文人时常把他描绘的那样。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那末，列宁主义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于那些非农民的国家，就是不适用的，就是不必要的；

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那末，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

这里必须加以选择。

三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认为“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作用估计过低的“理论”。那里面说：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间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间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力量的作用。”

对俄国“不断论者”的这个评语直到最近都是大家所公认的。然而这个评语一般说来虽然正确，但还不能认为是详尽无遗的。一方面是一九二四年的争论，另一方面是对于列宁著作的仔细分析，都已表明俄国“不断论者”的错误不仅在于他们过低估计农民的作用，而且在于他们过低估计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在于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因此，我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那本小册子里已扩充了这个评语，并且代之以另一个比较完全的评语。在那本小册子里是这样说的：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这当然不是说列宁主义过去反对或者现在反对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所提出的那个没有带引号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恰恰相反，列宁是唯一正确了解了并发展了不断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不断论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不断论者”曲解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把它变成了毫无生气的书本上的玄谈，列宁则接受了原来的不断革命思想并把它变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基础之一。必须记着，列宁远在一九〇五年就已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请看列宁远在一九〇五年关于这一点所写的一段话：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主张不间断的革命**[①]。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我们决不陷于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的而且要说的**只有一点**：我们将用全力帮助全体农民去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二一三页至第二一四页）

再看，经过了十六年，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列宁对于这一问题是怎样写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考茨基之流、希法亭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希尔奎特之流、龙格之流、麦克唐纳之流、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国际’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英雄们，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间的……关系。**前一革命转变为后一革命**[①]。后一革命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而且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十二页）

请特别注意前一段话，这一段话是从列宁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引来的。我着重指出这一点是要一些人注意，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硬说列宁只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有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一段话毫无疑义地说明这些人是大错而特错了。

四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和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不同呢？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下列主要的五点：

（一）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

（二）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三）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四）资产阶级革命只限于以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去执掌政权，所以它无须摧毁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却要把一切剥削集团都从政权上推下去，并使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领袖即无产阶级去执掌政权，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

（五）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把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稍微长期地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无产阶级革命要完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基本任务，却能够而且必须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跟无产阶级结成长期的联盟，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基本原理吧：

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摈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六十七页）

列宁继续说：“如果那种经历了一九〇五年伟大试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末苏维埃在十月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的成功全靠那包括

千百万群众的运动已经有了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因此，我们在政治方面就能预期我们后来所经历的那些辉煌成就和不断的胜利进军，因为新政权形式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几道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所奠定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行。”（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六十七页至第六十八页）

列宁说：“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同上，第六十八页）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统计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放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容许像我们从前解决国内战争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六十八页）

“……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国际问题。如果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如果我们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如果我们毫不费力地实施了土地社会化和工人监督制的法令，——如果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拥有组织得极其完备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

和国和平共处，——其所以不能，在于贸易关系，在于国际财政关系。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同上，第六十九页至第七十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性质和基本意义就是如此。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呢？

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必须特别着重特别坚决指出这个原理，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暂时还只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被那些仇视它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而且国际资本又不会不帮助这个国家里的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有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可**。”（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六〇页）

“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①]：‘首先要使大多数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情形下，即在保存资本权力和资本压迫的情形下，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并且应当夺取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二四九页）

“我们说[②]：‘首先要使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本压迫，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那时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才能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需要，才能迅速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博得这些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同上）

列宁继续说：“无产阶级为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粉碎旧的国家机关，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破坏其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二四二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就是如此。

因此，既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那末，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特点又是什么呢？

请看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最概括的定义吧：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获得了胜利、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反对那虽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还没有绝迹、还没有停止反抗的资产阶级，反对那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页）

列宁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全民的”“普选的”政权、和“非阶级的”政权混为一谈。他说：

“那个夺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是意识到它是**独自**[①]夺取政治统治时夺得了这个统治的。这一点是包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之内的。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夺取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全民视为神圣的’政权的空话来自欺欺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五〇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阶级的政权，即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阶级分掌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权，竟不需要其他阶级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帮助，竟不需要和这些群众结成联盟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恰恰相反，这个政权，一个阶级的政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和农民劳动群众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才能确立并贯彻到底。

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联盟，一般说来，是否和一个阶级专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可见这里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外表上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与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与大多数劳动者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完全推翻资本、完全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打破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其动摇的同盟者的联盟，有时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中立者’的联盟（那时，联盟就由斗争协定变为中立协定），**这是那些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精神上各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页至第三五一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加米涅夫在他的一个指示性的报告中反对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专政**并不是**[①]一个阶级和其他阶级的联盟。”

我想，加米涅夫在这里首先是针对我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那本小册子里的一段话而说的。这段话如下：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老练的战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选出来’并‘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阶层的普通政府的上层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条件下，为推翻资本和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结成的阶级联盟。”

我完全坚持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因为我认为它和刚才所引证的列宁的定义完全相符。

我断定：加米涅夫的“专政**并不是**一个阶级和其他阶级的联盟”这种武断说法是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毫无共同之点的。

我断定：只有不懂工农结合的思想、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的思想的意义的人才会这样说。

只有不懂列宁的下面这个论点的人才会这样说。这个论点就是：

“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联合农民**[②]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二页）

只有不懂列宁的下面这个原理的人才会这样说。这个原理就是：

“**专政的最高原则**[③]就是维护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同上，第四六六页）

列宁指出专政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镇压剥削者。他说：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程拘束而直接凭藉暴力的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二六页）

———————————

① ② 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永远记着）不受限制的、凭藉暴力而不是凭藉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了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专政。”（同上，第三二〇页）

固然没有暴力就不会有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不只限于暴力。

列宁说：“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前的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三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富有生命力和获得胜利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形式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的泉源和必然会完全胜利的保证就在这里。”（同上，第三八六页）

“它（即专政。——斯大林注）的主要实质就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其先锋队，其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使社会所有成员都成为劳动者，铲除任何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而是需要一个相当长久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惯于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那种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同上，第三五八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征就是如此。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有三个主要方面：

（一）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

（二）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

（三）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所有这三方面的结合。其中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提出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特征，反之，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特征，就足以使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成其为专政。因此，无论除去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无产阶级专政有其各个时期、各种特别形式和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国内战争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暴力方面。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不进行任何建设工作。不进行建设工作就无法进行国内战争。反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明显的是专政的和平工作、组织工作、文化工作、革命法制等等。可是同样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建设时期专政的暴力方面已经消失或可能消失。现在，在建设时期中，也像在国内战争时期一样，镇压机关、军队和其他组织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机关，专政就不可能稍微有保证地进行建设工作。不应忘记，革命暂时还只是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应忘记，既然还有资本主义包围，也就有武装干涉的危险和由这危险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党和工人阶级

上面我已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从其阶级内容的观点，从其国家性质的观点，最后从其在整个历史时期内即由资本主

义到社会主义的所谓过渡时期内所执行的破坏任务和创造任务的观点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们需要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的观点，从其“机构”的观点，从“引带”、“杠杆”和“指导力量”的作用和意义的观点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引带”、“杠杆”和“指导力量”综合起来就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列宁），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日常工作就是依靠这些东西来实现的。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这种“引带”或“杠杆”是什么呢？这种“指导力量”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

杠杆或引带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不依靠这些组织就无法实现专政。

指导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领导力量。

这些引带、这些杠杆和这种指导力量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无产阶级在其争取胜利的斗争中，在有组织有武装的资本面前，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军队。这些组织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因为没有这些组织，无产阶级在其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其巩固自己政权的斗争中，在其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必然要遭到失败。这些组织的经常帮助和先锋队的指导力量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组织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工会**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支脉，即许许多多生产的、文化的、教育的和其他的组织。它们把各行各业的工人都联合起来。这是非党的组织。工会可以称为我国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全体成员的组织。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从自己队伍中选拔出优秀分子来担任一切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工会把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联系起来。工会把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先锋队连接起来。

第二、就是**苏维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许许多多的支脉，即行政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和其他的国家组织，再加上无数自动组织起来的、环绕着这些组织并把这些组织和居民连接起来的劳动者的群众团体。苏维埃是全体城乡劳动者的群众组织。这是非党的组织。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表现。所有一切巩固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措施都通过苏维埃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国家领导是通过苏维埃来实现的。苏维埃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和无产阶级先锋队连接起来。

第三、就是各种**合作社**及其所有支脉。这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是非党的组织。合作社首先把劳动者作为消费者联合起来，然后把他们作为生产者联合起来（农业合作社）。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以后，在广泛的建设时期，合作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合作社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便于和农民群众联系，并有可能把农民群众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第四、就是**青年团**。这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是非党的组织，但它是很靠近党的。它的任务是帮助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年轻的一代。它以青年后备军供给一切管理部门中的所有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以后，在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文化教育工作时期，青年团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最后，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力量在于它从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中把无产阶级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把它们统一起来并引向一个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统一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不这样就无法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去为政权而斗争，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可是能够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作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

作用。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它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跟本阶级连接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见“论列宁主义基础”）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列宁）

总之，**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新的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

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用列宁的话来说：“整个来看，结果就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比较广泛的、很有力量的无产阶级的机关，党就是通过这个机关和**本阶级**以及**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个机关来实现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

卷第三十页）

这一点当然不能了解为党能够或应当代替工会、苏维埃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并不是直接实现这种专政，而是藉助于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这个专政的。没有这些“引带”就不能有稍微巩固的专政。

列宁说：“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接起来的‘引带’，就不能实现专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页）

“可以说党是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的，而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要实现这些职能，就必须**通过**[①]一系列的也是新式的特别机关，即**通过**[②]苏维埃机关。”（同上，第二页）

例如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如何说明这一点：

“坦纳说他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不过他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完全和我们所了解的一样。他说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了解为**实质上**[①]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的、觉悟的少数的专政。

的确，在资本主义时代，即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其人类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们所能包括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像在任何资本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都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这些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并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是个反对政党的人，但同时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出道路，那末我要说，我们之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歧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〇页）

然而这一点决不应了解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可以划**一个等号**，可以把前后二者**看做一个东西**，可以用后者**代替**前者。例如索凌就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这个论点显然是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如果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是不是可以认为这种混同的看法是正确的呢？不，不可以。原因就是：

第一、上面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中引来的那一段话里，列宁根本没有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他只是说，“只有觉悟的少数（即党。——斯大林注）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并引导他们前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了解为**实质上**[①]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的、觉悟的少数的专政”。

说“实质上”，这还不等于说“完全”。我们往往说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等于说：农民问题可以代替民族问题，农民问题按内容来说和民族问题相等，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是一个东西。无须证明，民族问题按内容来说比农民问题更广泛，更丰富。同样，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党“专政”，那末这还不等于说：“党专政”（领导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东西**，前者按内容来说和后者**相等**。无须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按内容来说比党的领导作用更广泛，更丰富。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别的什么专政。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是以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非有党的指示不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是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党的指示呢？这是不是说因此就可以把党的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呢？当然不是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由此可见，这里有一系列的过渡和中间阶段，这些过渡和中间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很重要的因素。可见在党的指示和这些指示的实施之间有被领导者的意志和行动，本阶级的意志和行动，本阶级决心（或不愿意）拥护这些指示，本阶级善于（或不善于）实行这些指示，本阶级善于（或不善于）完全依照环境的要求来实行这些指示等等情况。未必用得着证明：负有领导责任的党决不能不顾及被领导者的意志、情绪和觉悟程度，决不能忽视本阶级的意志、情绪和觉悟程度。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是以党的指示代替本阶级的意志和行动。

第三、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获得了胜利、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页）这种**阶级**斗争会怎样表现呢？它会表现为无产阶级以一系列的武装行动去反对那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袭击或外国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在无产阶级政权尚未巩固时，它会表现为国内战争。在政权已经巩固后，它会表现为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组织工作和建设工作，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工作。在所有这些场合下，活动者都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党，仅仅一个党，没有本阶级支持而单靠自身的力量来进

行所有这些活动，是从来没有的。党通常只是领导这些活动，它所以能领导这些活动，在于它有本阶级的支持。因为党不能包括本阶级，不能代替本阶级。因为无论党有怎样重要的领导作用，它毕竟是本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是以党代替本阶级。

第四、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列宁）。在这个意义上党**掌握**政权，党**管理国家**。然而决不能把这一点了解为党是越过国家政权，无须国家政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了解为党是越过苏维埃，不通过苏维埃而管理国家的。这还不是说，可以把党和苏维埃，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个东西。

列宁说：“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上层’和党‘上层’融成一体，——它们现时在我国是融成一体的，而且将来也会如此。”（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五三页）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列宁决不是想藉此说我们所有一切苏维埃机关，例如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运输机关，我们的经济机关等等，都是我们党的机关，说党能代替苏维埃及其支脉，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列宁屡次说“苏维埃体系是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四五页和第四四三页）；但他从来没有说党是国家政权，党和苏维埃是一个东西。拥有数十万党员的党，领导着包括千百万人——党员和非党员——的苏维埃及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支脉，但党不能够而且不应当以自己代替它们。因此，列宁说：“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并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党的全部工作都是**通过**[①]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见“列宁全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九页和第三十一页），专政是“必须……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页）。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者做一个东西，谁就是以党代替苏维埃即代替国家政权。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个国家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一定包含暴力概念。如果按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来了解，那末没有暴力就不会有专政。列宁所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就是“直接凭藉**暴力**的政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八十四页）。因此，说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并把这种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那就等于说党不仅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并且应当是对本阶级使用暴力的一种专政者，这种说法当然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谁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默认可以把党的威信建筑在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基础上，而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是和列宁主义完全不相容的。党的威信是由工人阶级的信任来维持的。工人阶级的信任却不是用暴力所能取得的（用暴力只能丧失工人阶级的信任），而是要靠党的正确理论，要靠党的正确政策，要靠党对工人阶级的忠诚，要靠党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要靠党有决心和本领**说服**群众相信它的口号的正确，才可以取得的。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

（一）列宁使用党**专政**这个词并不是指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凭藉暴力的政权”）而言，而是指其转义而言，即指党独掌领导而言；

（二）谁把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谁就是曲解列宁的意思，就是错误地给党加上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

（三）谁给党加上这种党本来所没有的对整个工人阶级使用暴力的职能，谁就是违背了先锋队和本阶级间、党和无产阶级间正确的相

互关系的起码要求。

这样，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党和本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工人阶级中的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关系问题了。

按列宁所下的定义，这种相互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的**相互信任**”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八九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说，党应当倾听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群众的革命本能，应当研究群众的斗争实践，并根据这些来检查自己政策的正确性，所以它不仅应当教导群众，而且应当向群众学习。

第二、这就是说，党应当每天每天取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应当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博得群众的拥护，党不应当命令群众，而首先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易于根据本身经验来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所以它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

违背这些条件就是破坏先锋队和本阶级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就是损害“相互信任”，就是既破坏阶级纪律，又破坏党的纪律。

列宁说：“大概现在几乎任何人都已看得见，如果我们党内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一般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②即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有思想、诚实、奋不顾身、有威信、能引导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最完全最忠诚的拥护**③，那末，布尔什维克就不仅不能把政权保持两年半，甚至不能保持两月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

列宁继续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力量是最可怕的力量。没

———————————————

① ② 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有那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那**受到本阶级全体忠诚分子信任的**[①]党，没有那善于注意群众情绪并善于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同上，第二十七页）

可是，党是怎样取得本阶级的这种信任和拥护的呢？无产阶级专政所需要的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它是在什么基础上成长的呢？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明这一点的：

“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呢？是靠什么来检查的呢？是靠什么来加强的呢？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毅、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②]，首先是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同样也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打成一片**[③]。第三、是靠这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的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的正确，同时须使最广大的群众都能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的政党，真正能成为以推翻资产阶级而改造全社会为己任的先进阶级的政党，就不能实现其内部的纪律。没有这些条件，所有要建立纪律的企图必然变为空谈，变为废话，变为装腔作势。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是一下子能产生的。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艰苦的试验，这些条件才能造成；只有用正确的革命理论，这些条件才容易造成，但革命理论又不是教条，它只有和真正群众的、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八页至第九页）

其次：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就要求领导的政党（共产党）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同群众（即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保持正确的相互

———————————————

① ② 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关系。只有共产党，如果它真是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它包括革命阶级中的一切优秀分子，如果它是由完全觉悟、忠心耿耿、受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经验教育和锻炼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如果它能把自己和本阶级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而通过这个阶级又和全体被剥削群众联系起来，并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完全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去对一切资本主义势力作最无情的、坚决的、最后的斗争。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它的革命进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那些被资本主义腐蚀了的极少数的工人贵族和工联的、合作社的旧领袖等等方面必不可免的冷淡以至于反抗化为乌有，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它那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本身所致而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部分大得无比的全部力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六三页至第一六四页）

从这些引文就应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党的威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并不是建筑在群众对党的恐惧上，也不是建筑在党的“无限”权力上，而是建筑在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工人阶级对党的拥护上；

（二）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不是一下子取得的，不是靠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来取得的，而是靠党在群众中的长期工作，靠党的正确政策，靠党善于使群众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靠党善于保证自己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并善于引导工人阶级群众来取得的；

（三）没有以群众斗争经验为基础的党的正确政策，没有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没有而且不能有党的真正领导；

（四）如果党享有本阶级的信任，如果党的领导是真正的领导，就不能把党及其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因为没有那深为工人阶级所信任的党的领导（党“专政”），就不可能有稍微巩固的无产

阶级专政。

没有这些条件，党的威信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不是空话就是夸大和侥幸。

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专政”）对立起来。其所以不能，在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主要东西，如果这里指的是稍微巩固的完全的专政，而不是像巴黎公社那样不完全不巩固的专政。其所以不能，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可以说是站在一条工作路线上按照一个方向行动的。

列宁说：“单从提出‘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这一问题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人们的思想糊涂到了难以置信的不可救药的地步……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大多数情形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较为固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如果一般地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对立起来，那就荒谬愚蠢到令人发笑的地步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四页和第二十五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个正确的原理所根据的前提是：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党和本阶级间有着正确的相互关系。它所根据的假设是：先锋队和本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是正常的，是保持在“相互信任”的范围内的。

可是，如果先锋队和本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被破坏了，如果党和本阶级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被破坏了，那又怎么办呢？

如果党这样或那样使自己和本阶级对立起来，破坏了自己和本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基础，破坏了“相互信任”的基础，那又怎么办呢？

这种情形一般说来是否可能呢？

是的，是可能的。

这种情形在以下的场合是可能的：

（一）**如果**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建筑在它的工作和群众的信任上，而是建筑在它的“无限”权力上；

（二）**如果**党的政策显然不正确，而党又不愿意重新审查并纠正自己的错误；

（三）**如果**党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但群众还领会不了它的政策，而党又不愿意或不善于等待一下，让群众有机会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却企图强迫群众接受它的政策。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各种集团和派别所以土崩瓦解和烟消云散，就在于它们犯了这三条中的一条，有时甚至这三条全犯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只要在以下的场合，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领导）对立起来看，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一）**如果**不把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解为这个名词的本义的专政（“凭藉暴力的政权”），而了解为党的领导，正如列宁所了解的那样，了解为决不容许对整个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大多数使用暴力的那种领导；

（二）**如果**党有根据做本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就是说，如果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这个政策是符合本阶级利益的；

（三）**如果**本阶级，如果本阶级的多数都接受这种政策，领会这种政策，并由于党的工作而确信这种政策的正确，信任党和拥护党。

违背这三条就一定会引起党和本阶级的冲突，引起它们之间的分裂，引起它们彼此间的对立。

可以不可以用暴力强迫本阶级接受党的领导呢？不，不可以。无论如何，**这样的**领导是不会维持长久的。党如果想始终做无产阶级的党，它就应当知道，它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

导师。我们不能忘记列宁在“国家和革命”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的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七六页）

如果党的政策不正确，如果党的政策和本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可以认为党是本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在这种情形下，党如果想始终做领导者，它就应当重新审查自己的政策，应当改正自己的政策，应当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纠正这种错误。只要从我们党的历史中援引一件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例如在废除余粮收集制时期前，工会群众显然不满意我们的政策，当时党就公开而诚恳地重新审查这个政策。请看列宁当时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于废除余粮收集制而施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说了些什么：

“我们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爽直地说：农民不满意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关系，他们不要这种关系，并且不会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志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这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意志。我们应当顾及这一点，而且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所以能够爽直地说：**让我们重新审查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二页至第一九三页）

如果党的政策，比方说，由于本阶级政治上的落后而还没有得到本阶级的信任和拥护，**如果**党，比方说，由于事件还没有成熟而不能使本阶级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可以不可以认为党只要以自己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为理由，就应当负责发起并负责领导组织群众进行决战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呢？不，不可以。在这种情形下，党如果想做真正的领导者，就应当善于等待，应当使群众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应当帮助群众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这个政策的正确。

列宁说：“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说不上什么起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〇七页）

“如果工人阶级多数的观点没有转变，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转变又是由群众的政治经验造成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五页）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被我们争取过来。这是主要的。如果没有这一点，那就连向胜利走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从这一点到胜利还距离得很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上，或者至少没有站在对先锋队严守善意的中立而对其敌人完全不予支持的立场上的时候，单把先锋队投入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而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真正广大的被资本压迫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这些群众亲身的政治经验。”（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三页）

大家知道，我们党在一九一七年，从列宁提出“四月提纲”到十月起义的时期内，正是这样行动的。正因为党依照列宁的这些指示而行动，所以它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先锋队和本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条件大体上就是如此。

如果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先锋队和本阶级间的正确关系又没有破坏，那末什么是**领导**呢？

这种条件下的领导就是要善于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提出并实行能把群众引到党的立场上并使他们易于根据本身经

验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的一些口号，把群众提高到党的觉悟水平，这样来保证得到群众的拥护并使他们具有坚决斗争的决心。

因此，说服方法是党领导工人阶级的基本方法。

列宁说：“假如我们现时在俄国，在取得了对俄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的两年半的空前胜利以后，竟以‘承认专政’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就是做了蠢事，破坏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帮助了孟什维克。因为共产党人的整个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做工作，而不是凭空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来和他们**隔绝**。”（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六页）

这当然不应该理解成为：党应该说服所有工人，直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只有到那时才能着手行动，只有到那时才能开始行动。绝不是这样！这只是说，党在采取决定性的政治行动以前，应当进行长期的革命工作，以保证自己得到多数工人群众的拥护，至少取得本阶级多数的善意的中立。否则，争取工人阶级多数到党方面来是胜利的革命的必要条件这一列宁的原理就毫无意义了。

可是，如果少数不愿意，如果少数不肯自愿服从多数的意志，那对他们该怎么办呢？党既已得到多数的信任，它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应当强迫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志呢？是的，是可以而且应当的。领导是以说服群众的方法（党用以影响群众的基本方法）为保证的。可是，这并不排斥而是预计到要实行强迫，只要这种强迫有工人阶级多数对党的信任和拥护做基础，只要这种强迫是在说服了多数以后对少数使用的。

应当回想一下我们党内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关于这一点的争执。当时反对派的错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在于反对派当时认为可以实行强迫呢？不是的，不在这里。当时反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既不能使多数相信他们的立场的正确，既已丧失多数的信任，却还实行强迫，坚持“整刷”那些获得多数信任的人。

请看列宁当时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发言中的一段话：

“如果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犯了错误……那末为了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信任，就必须纠正这个错误。可是，当有人开始为这种错误辩护时，这就会成为政治危险的根源了。如果我们看到库图佐夫在这里所表现的那种情绪而不采取尽可能的民主办法，那我们就会陷于政治破产。**首先我们应当说服，然后强迫。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先说服，然后强迫**[①]。我们没有能够说服广大群众，于是破坏了先锋队和群众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八九页）

列宁在他的“论工会”这本小册子里也这样说：

“只有当我们善于先为强迫奠定说服的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实行强迫。”（同上，第十四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没有这些条件，任何领导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党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内行动的一致；就整个阶级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阶级行动的一致。否则，工人阶级的队伍就会分裂、涣散并解体。

党对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的原则大体上就是如此。

对于领导的任何其他见解都是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官僚主义，随便说它是什么都可以，但不可以说是布尔什维主义，不可以说是列宁主义。

如果在党和工人阶级间，在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存在着正确的相互关系，那就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专政”）对立起来。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尤其不能把党和工人阶级、把党的领导（“专政”）和工人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索凌**根据**不能把党“专政”和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一点**做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

可是列宁不仅说这种对立是不可容许的，而且说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对立起来也是不可容许的。那不是可以**根据这一点**就把领袖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吗？如果我们循着这条道路走去，我们就一定会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领袖专政**”。而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的政策，实在说，也就是要得出这种糊涂结论来的……

季诺维也夫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呢？

季诺维也夫实质上和索凌持着一样的观点，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不同的是索凌说得更直爽更明白，而季诺维也夫却在“兜圈子”。只要看看下面季诺维也夫所著“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相信这一点了。

季诺维也夫说：“苏联的现存制度按其阶级内容来看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苏联政权的直接动力是什么呢？谁在行使工人阶级的政权呢？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里**[①]**是党专政**。苏联政权的法律形式是什么呢？十月革命所创立的新式国家制度是什么呢？就是苏维埃制度。二者一点也不相矛盾。”

如果把党对整个工人阶级的专政了解为党的领导，那末说二者不相矛盾当然是对的。可是，怎么可以**根据这一点**就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间、在苏维埃制度和党“专政”间划一个等号呢？列宁曾把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他这种看法是对的，因为苏维埃，**我们的**苏维埃，是在党的领导下把劳动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组织。可是列宁究竟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著作中，曾在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间、在党“专政”和苏维埃制度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间划过等号，像现在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呢？不仅党的领导（“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不相矛盾，而且领袖的领导（“专政”）也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不相矛盾的。那不是可以**根据这一点**就宣布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是**党专政的国家，**也就是**领袖专政的国家吗？而季诺维也夫狡猾地胆小地推行的那个把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的“原则”也就是要得出这种糊涂结论来的。

在列宁的无数著作中稍许涉及党专政问题的，我只找到五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他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论战。他在那里说：

“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而提议——像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个党是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四九六页）

第二个地方就是“就战胜高尔察克事致工人和农民的信”。他在那里说：

“有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全体，甚至其中的“左派”）把‘一党专政’即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的党专政当做纸老虎来吓唬农民。

从高尔察克的实例中，农民学会不怕纸老虎了。

或者是地主资本家专政（即铁的政权），或者是工人阶级专政。”（同上，第五一七页）

第三个地方就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坦纳论战时的演说。这篇演说我在前面已经引证过了。①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三十六页至第三十七页[指旧版页次，下同]。——编者注。

第四个地方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的几行文字。这几行文字在前面已经引证过了。①

第五个地方就是载于“列宁文集”第三卷内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大纲的草稿，里面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一党专政”（见“列宁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页）。

必须指出，在这五个地方当中有两个地方，即最后一个和第二个地方，列宁给“一党专政”这几个字加上了引号，显然是着重指明这个公式含有不确切的转用的意思。

同样必须指出，列宁在所有这五个地方都把“党专政”了解为对“地主和资本家”的专政（“铁的政权”），而并不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这和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诬蔑论调恰恰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他解释或一般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的主要著作和次要著作中，**没有一个地方**暗示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们党专政”。恰恰相反，这些著作的每页每行都是坚决地反对这种公式的（见“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论政党的作用的提纲中**没有一个字**、简直**没有一个字**说到党专政。这个提纲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拟定的，列宁在他的演说中一再地引证过并认为它是正确地规定了党的作用和任务的典范。

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

（甲）列宁并没有认为“党专政”这个公式是无可指摘的、十分精确的公式，所以这个公式在列宁的著作中用得极少，有时还加上引号；

——————————————

① 见本卷第四十三页、第四十四页至第四十五页、第四十六页至第四十七页、第五十页至第五十一页、第五十一页至第五十二页。——编者注。

（乙）在很少的地方，当列宁和敌人论战而不得不说党专政时，他通常说“一党专政”，就是说我们党**独掌**政权，**不**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而且他总是解释说，必须把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解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作用；

（丙）凡是列宁认为需要科学地规定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时，他**只**说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种地方有几千个）；

（丁）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没有“想到”要把“党专政”这个公式写入论党的作用的基本决议中，——我是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戊）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那些把党“专政”因而也就是把“领袖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一个东西或企图看做一个东西的同志是不对的，并且在政治上是近视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就违反了先锋队和本阶级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条件。

至于没有上述附带条件的“党专政”这个公式会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造成许多危险和政治缺点，那就不用说了。单拿这个公式而不加附带条件似乎就是：

（甲）向**非党群众**示意：千万别辩驳呀，千万别议论呀，因为党是无所不能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

（乙）向**党员干部**示意：干得大胆些吧，压制得厉害些吧，不倾听非党群众的呼声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

（丙）向**党的上层**示意：大可以自满自足了，甚至可以骄傲自大了，因为我们这里是党专政，因而“也就是”领袖专政。

正是现在，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高涨的时期，提醒对这些危险的注意是很适宜的，因为现在党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对于我们是有特殊价值的，现在关心群众的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训条，现在党在政策方面必须特别谨慎特别灵活，现在骄傲自大的危险是党在正确领导群众方面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之一。

不可不回想一下列宁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至理名言：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共产党人。——斯大林注）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国家。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于是整个机器就要毁坏。”（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三页）

“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这正是保证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基本领导力量这一光荣作用的必要条件。

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九二四年五月初版）那本小册子里，关于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

“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跃进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见“论列宁主义基础”）

这个原理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须解释的。这是用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没有在其他各国内同时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要在一个国家内夺得政权，那就是空想。可是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还有第二种说法。那里说：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见“论列宁主义基础”初版）

这第二种说法是用来反对那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的武断的，是用来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因为他们宣称：当其他国家没有胜利时，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就这一点而论（但只是就这一点而论），这种说法在当时（一九二四年五月）是足够的，而且无疑地是有过一定好处的。

可是后来，当列宁主义在这方面所受的批评在党内已被克服时，当眼前已摆着一个新问题即没有外援而可能用我国的力量来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第二种说法显然就有缺点了，因而也就不正确了。

这种说法的缺点在哪里呢？

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且不谈这种说法会引起一种想法，以为用一个国家的力量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根据这一点，我就在我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那

本小册子（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里改变了并纠正了这种说法，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一个是**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另一个是**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是用以下两种方法达到的：第一、把“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解释为只是通过“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的“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第二、根据列宁的“论合作社”那本小册子宣布的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见“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①。

这个问题的新说法就成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这一著名决议的基础，这一决议联系着资本主义稳定的事实而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一九二五年四月），并认为用我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这个新说法也是我的小册子“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工作总结”的基础。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即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闭会后立即出版的。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这一问题的提法，在这本小册子里说：

“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里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而言。——斯大林注）。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里是指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言。——斯大林注）”……“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谁把这

——————————————

① 后来，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小册子以后各版中已用这个问题的新说法代替了旧说法。——编者注。

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工作总结”）

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说：“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必要条件，因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用自身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同上）

关于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则说：

“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是有免除武装干涉企图、因而就是有免除复辟企图的完全保障，因为稍微严重的复辟企图，只有在外来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各国工人对我国革命的支援，尤其是这些工人的胜利，即使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障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的必要条件，是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同上）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大家知道，在我的“问题和答复”（一九二五年六月）那本小册子里，以及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政治报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也是以这种精神来解释这个问题的。

事实就是如此。

这些事实，我想所有同志都是知道的，季诺维也夫也是知道的。

如果现在，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之后将近两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决议（一九二五年四月）之后，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做结论时，竟把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四月所写的小册子里一个很不全面的陈旧的公式拖出来，作为解决这个早已解决了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的基础，——那末，季诺维也夫的这种特殊的手法就只是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

完全弄糊涂了。在党已向前进展的时候又把它拉回去，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由中央全会批准以后又避开这项决议，这就是不可救药地陷入了矛盾，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是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就是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

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没有这种可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没有前途的建设，就是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的建设。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不相信我国技术落后并非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认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后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否认这一个不容置辩的原理，就是离开国际主义，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列宁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所组成的体系里**，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而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三页）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说：“我们面前有某种极不稳固但毕竟是毫无

疑义、不容置辩的均势。这是否会长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而且我以为这是无法知道的。因此，我们必须极端谨慎。我们政策中的第一个训条，从我们政府一年来的工作中所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着，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着，我们随时都有遭受各种侵袭的危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一二二页）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季诺维也夫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又是怎样的呢？

请听吧：

“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至少应当了解为（一）消灭阶级，因而也就是（二）取消一个阶级的专政，这里指的是取消无产阶级的专政”……　季诺维也夫往下又说：“为了更确切地弄清一九二五年我们苏联的问题是怎样的，必须分清两件事情：（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保证的**可能性**，——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也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二）最后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

所有这些能表明什么呢？

就是表明季诺维也夫并不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最后胜利了解为有免除武装干涉和免除复辟的保障，而了解为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季诺维也夫则把它了解为不能够而且不应当使社会主义建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碰碰运气，茫无前途的建设，在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季诺维也夫的立场。

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而去建设社会主义，**明知不能建设成功**而去建设，——请看，季诺维也夫荒唐到什么地步了。

但这是嘲弄问题，不是解决问题！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结论中还有一段话：

“你们看一看，例如雅柯夫列夫同志在最近一次俄共（布）库尔斯克省代表会议上竟胡说八道起来。他问道：‘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四面受着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国家内，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据上述一切，我们有理由说，我们不仅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虽然暂时还是单独的，我们虽然暂时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苏维埃国家，但我们一定能建成这个社会主义。’（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库尔斯克真理报”第二七九号）**这难道是列宁主义对问题的提法吗？难道这里没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吗？**”①

这样，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承认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采取民族狭隘性的观点，而否认这种可能却是采取国际主义的观点了。

可是，如果这是对的，那末，一般说来，还值得为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而进行斗争吗？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吗？

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投降，——这就是从季诺维也夫论据的内在逻辑中得出的结论。

季诺维也夫竟把这种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谬论当做“国际主义”，当做“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呈献给我们！

我肯定地说：季诺维也夫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离开列宁主义而滚到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观点上去了。

让我们请教列宁吧。列宁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即在一九一五年八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月论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时，就已说过：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①]，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列宁的这句加上着重号的话——“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获得了胜利的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能够**而且**应当**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未必用得着证明：列宁的这个明确的原理是无须再加解释的。否则，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对无产阶级发出的夺取政权的号召就会是不可理解的了。

可见列宁的这个明显的原理和季诺维也夫的所谓我们能够在**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那个反列宁主义的糊涂“原理”是有天壤之别的。

这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说的。可是也许有了夺取政权的经验以后，在一九一七年以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吧？我们来看看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写的小册子“论合作社”。

列宁说：“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经过合作社，仅仅经过合作社，经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①]？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拥有为建成这个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看来不容易说得更清楚了。

试把列宁这个经典性的原理和季诺维也夫用来反驳雅柯夫列夫的那个反列宁主义的论调比较一下，就会懂得雅柯夫列夫只是重复列宁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而季诺维也夫反对这个原理，斥责雅柯夫列夫，因而背离列宁，采取了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观点，采取了认为我国因技术落后而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

只是不明白，如果我们不打算建成社会主义，那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政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政权本来是不应当的，——这就是从季诺维也夫论据的内在逻辑中得出的结论。

其次，我肯定地说：季诺维也夫在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反对**我们党的明确决定，而这些决定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著名决议里规定了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决议吧。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在这个决议中是这样说的：

“两个直接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经常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种种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因此，几个国家内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复辟的唯一保**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障[①]……”“列宁主义教导说：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即**免除**资产阶级关系**复辟的完全保障**[②]，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能……”“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③]说，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如果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④]（见决议 ）

由此可见，决议是把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解释为免除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保障，这和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的解释是**完全相反**的。

由此可见，决议认为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没有技术上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也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和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做结论时用来反驳雅柯夫列夫的那个论调是**完全相反**的。

试问，这不是季诺维也夫**反对**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又是什么呢？

当然，党的决议有时也免不了有差错。有时候，党的决议也含有错误。一般地说，可以假定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也含有一些错误。可能季诺维也夫认为这决议是错误的，那末他就应当像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那样明白而公开地指出这一点。但不知为什么季诺维也夫没有这样做。他宁愿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对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绝口不谈，不作任何公开批评，却从背面袭击这个决议。季诺维也夫大概以为这条道路最容易达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改善”决议并“稍微”修改列宁的话。未必用得着证明，季诺维也夫打算错了。

季诺维也夫的错误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呢？这个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

———————————————

① ② ③ ④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据我看，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季诺维也夫深信我国技术的落后对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深信无产阶级因我国技术落后而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前的一次党中央会议上曾试图提出这个论据。但是他们受到了反驳，不得不实行退却，**表面上**服从和他们相反的观点，即中央多数的观点。季诺维也夫虽然表面上服从这个观点，却始终和这个观点作斗争。请看我们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在给俄共（布）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的“复信”中是怎样说明俄共（布）中央内的这次“事件”的吧：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坚持过一种观点，似乎国际革命不来拯救我们，我们就会因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落后而不能克服内部困难。而我们和中央多数一样却认为：虽然我国技术落后，但我们能够不管这种落后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建设，并且一定会把它建设成功。我们认为：这样进行建设，当然比在全世界革命胜利的条件下缓慢得多，然而我们还是在前进，而且要继续前进。我们同样认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表现出不相信我国工人阶级以及跟着我国工人阶级走的农民群众的内部力量。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立场的。”（见“复信”）

这个文件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最初几次会议时出现在报刊上的。季诺维也夫当然有可能就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这个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找到论据来反驳我们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所提出来反对他们的这一严厉谴责。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不是偶然的。这种谴责看来是命中要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以用缄默来“回答”这种谴责，正是因为他们无法“招架”。

“新反对派”抱怨人们谴责季诺维也夫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获胜利。可是，既然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已经讨论了

整整一年，既然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已被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五年四月）摈弃，既然党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定意见已经形成，并把这种意见载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一九二五年四月）的著名决议中，既然在这一切之后，季诺维也夫还敢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九二五年九月）一书中反对党的观点，既然他以后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重复这种言论，——那末这一切，这种坚持自己错误的顽强性和固执性，如果不是因为季诺维也夫中了毒，而且无可救药地中了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获胜利的毒，又是因为什么呢？

季诺维也夫可以随便把他这种不相信的态度解释为国际主义。但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竟把那种在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上背离列宁主义的行为解释为国际主义呢？

在这里，违反国际主义和国际革命的不是党，而是季诺维也夫，这样说不是更正确吗？我们这个“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又是什么呢？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能力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它能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真正根据地呢？如果它没有能力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没有能力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它能不能继续成为吸引世界各国工人的最大中心，像它现在无疑地是这样的中心一样呢？我认为是不能的。但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鼓吹这种不相信的思想，结果就会使我国丧失世界革命根据地的资格，而使我国丧失这种资格，结果就会削弱世界革命运动，——难道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吗？社会民主党人是用什么来恐吓工人使他们离开我们的呢？就是鼓吹说“俄国人是完全做不成的”。我们现在用什么来打击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代表团一批一批地吸引到我们这里来，因而巩固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阵地呢？就是用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绩。既然如此，那末谁鼓吹不相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绩，谁就是间接帮助社会民主党人，谁就是缩小国际革命运动的规模，谁就必然背离国际主义，——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由此可见，季诺维也夫的“国际主义”是和他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一样恶劣的。

因此，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把“新反对派”的观点确定为“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确定为“曲解列宁主义”，那是很正确的。

七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

我认为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是“新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在我看来，这个错误所以是基本错误，在于“新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都是从这个错误产生的。“新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合作社的作用、对富农斗争的方法、中农的作用和比重等等问题方面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反对派的基本错误、从不相信可能用我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产生的。

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就是不相信由于我国发展中的一定条件，基本农民群众**可以被吸引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二、这就是不相信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我国无产阶级**能够**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反对派关于我国发展道路的论断就是默然从这两个论点出发的，——他们是否有意识这样做，反正都是一样。

能不能吸引苏联基本农民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呢？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论点：

（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教训，跟无

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未必用得着证明：苏联农民既惯于重视他们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因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而获得了自由，就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二）“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个极端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个极端却是大众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社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这两个论点是否正确呢？

我认为这两个论点对于我们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整个建设时期都是正确而不容置辩的。

这两个论点只是表达下述的列宁的几个著名论题：关于无产阶级

和农民的结合，关于把农民经济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体系，关于无产阶级应当和基本农民群众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关于使千百万农民普遍合作化是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关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条件下，“在我国，单纯的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四页）。

那末，我国的农民经济可能而且应当循着什么道路发展呢？

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像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定要发生的情形这样。

为什么农民经济这样不稳固这样不独立呢？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散漫，无组织，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信贷系统，依赖国家政权性质，最后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原因，即无论在物质方面，在文化方面，农村都是跟着城市走，而且一定是跟着城市走的。

农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通过农民最深刻的分化去发展，——一个极端是巨大的大地产，另一个极端是大众贫困化。这样的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农村，农民经济，是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城市的集中信贷和依赖政权性质的，而在城市里统治一切的却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信贷系统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

在我们国家里，既然城市完全是另一种面貌，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运输业、信贷系统、国家政权等等都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土地国有化是全国通行的法律，那末，农民经济是不是一定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呢？当然不是一定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城市是农村的领导者，而在我国城市里统治一切的又是掌握着国民经济全部命脉的无

产阶级，所以农民经济就应当循着另外一条道路去发展，即循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去发展。

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

这就是用各种合作社的方式使千百万农户普遍合作化的道路，把散漫的农户团结在社会主义工业周围的道路，在农民中间，起初是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和农户所需要的城市产品**供应**方面，然后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应用集体制原则的道路。而且愈往前去，这条道路也就愈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不可避免的道路，因为销售方面的合作化、供应方面的合作化、以至于信贷和生产方面的合作化（共耕社）是增进农民福利的唯一道路，是使广大农民群众免于贫困和破产的唯一方法。

有人说，我国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因此，他们不能循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既然证明农村是跟着城市走的，而在城市里指挥一切的又是社会主义工业，那末这就不成其为反对农民经济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论据了。在十月革命时，农民按其地位来说也是非社会主义性的，而且他们根本不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他们当时所争取的主要是消灭地主政权，结束战争，奠定和平。可是他们当时还是跟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推翻资产阶级，由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当时是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方法，是奠定和平的唯一方法。因为当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因为当时我们党已摸索到、寻找到一种能把农民的特殊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和全国共同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服从后者的标准。这种标准对于农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有利的。因此，农民虽有其非社会主义的性质，当时还是跟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走了。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把农民引上这个建设的轨道也应当这样说。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

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除了和无产阶级结合，除了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除了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把农民经济引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轨道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为什么正是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呢？

因为普遍合作化就是“我们所找到的一种能把私人利益、私人商业利益和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结合起来的标准，能使这种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标准”（列宁），这种标准对于农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有利的，这种标准保证无产阶级有可能把基本农民群众吸引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因为农民通过合作社来销售自己的商品和使自己的农庄得到机器供应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农民应当循着而且一定会循着普遍合作化道路走去。

而在社会主义工业领导下实行农户普遍合作化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使小商品农民经济**离开**那条必然使农民大批破产的旧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过渡**到新的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当前任务就是为争取农民经济的新的发展道路而奋斗，为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因此，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得很正确，它决定：“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道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国家信贷机关和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其他经济命脉的经济领导作用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组织，并保证这种组织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同时利用、克服并排挤这种组织里的资本主义成分。”（见代表大会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新反对派”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相信农民这条新的发展道路，看不见或不懂得这条道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绝对不可免的道路。而他们不懂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不相信我国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跟着自己走向社会主义。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两重性，夸大新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把新经济政策解释为主要是退却。

因此，他们也就夸大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轻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杠杆（社会主义工业、信贷系统、合作社、无产阶级政权等等）的作用。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我们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怀疑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正确。

因此，他们也就夸大农村中的分化，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轻视中农的作用，企图破坏党关于保证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并一般地在党的农村政策问题上摇摆不定。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党为了吸引千百万工农群众来参加工业和农业建设，参加活跃合作社和苏维埃，参加国家管理，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参加为改善并改造我们国家机关的斗争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这种工作标志着新的发展阶段，没有这种工作，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他们也就在我国建设中的困难面前灰心失望，茫无所措，怀疑我国工业化的可能，悲观地胡说党在蜕化等等。

在他们那里，在资产者那里，一切事情或多或少是好的；在我们这里，在无产者这里，一切事情却或多或少是坏的；如果西方不能及时发生革命，我们的事业就要破产，——这就是“新反对派”的一般论调，而这种论调在我看来是取消派的论调，但不知为了什么（大概是为了安慰自己吧）反对派竟拿它来冒充“国际主义”。

反对派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说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不对的。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

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

可是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这种论点的意义是什么呢？这种论点是从什么出发的呢？

它是从一种不正确的假设出发的，以为现在我们这里发生的是单一的资本主义恢复过程，是单一的资本主义“回复”过程。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怀疑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那样急急忙忙地抓住那些关于农民分化的不正确的数字。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对于中农是我国农业中的中心人物这一点特别健忘。正因为作这样的假设，反对派才过低估计中农的比重，并怀疑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也只有用这种假设才可以“论证”“新反对派”那种不相信农村的新的发展道路，不相信能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观点。

其实，现在在我国发生的并不是单方面的资本主义恢复的过程，而是双方面的即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矛盾过程，是社会主义成分克服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这无论对于以国营工业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城市，或是对于以和社会主义工业相结合的群众性的合作社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据点的农村，同样是不容置辩的。

单一的资本主义恢复是不可能的，这至少因为我国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运输业和信贷事业由无产阶级国家支配着。

农村中的分化绝不能像先前那样厉害，中农仍旧是基本农民群众，而富农不能再有过去那样的势力，这至少因为我国土地已经国有化并禁止买卖，而我国的商业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合作社政策又是以限制富农的剥削企图、增进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福利、消除农村

中的两极对立为目标的。至于我们现在和富农的斗争，不仅是按照老的路线即按照组织贫农去反对富农的路线进行，而且是按照新的路线即按照巩固无产阶级同贫农和中农群众的联盟去反对富农的路线进行，这一点我就不说了。反对派不懂得按照第二条路线去和富农作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这件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反对派滚到农村发展的老路，滚到农村发展的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在这条老路上，富农和贫农是农村中的主要力量，中农却“被冲刷”。

反对派说合作社是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时援引列宁的“论粮食税”，因而他们不相信可能利用合作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据点。反对派在这里又犯了极大的错误。这样来解释合作社，在一九二一年，在“论粮食税”写就时，是足够的，令人满意的，当时我国还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当时列宁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设想为可能的我们经济工作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配合起来考察的。可是，这种解释现在已经不够了，已被历史所超过了，因为从那时起，情况改变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培植到所预期的那种程度，而现在拥有一千万以上社员的合作社却已经开始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

难道不就是这个缘故列宁才在“论粮食税”发表后两年即一九二三年用另一种看法考察了合作社，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吗？（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页）

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两年内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壮大，国家资本主义却没有培植到应有的程度，列宁才不把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配合起来考察，而把它和社会主义工业配合起来考察吗？

合作社的发展条件已经改变了。对合作社问题的看法也应当有所改变。

例如请看列宁的“论合作社”（一九二三年）那本小册子里说明

这个问题的一段精辟的话吧：

“**在国家资本主义下**[①]，合作社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社企业第一是私人企业，第二是集体企业。**在我们的现存制度下**[②]，合作社企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社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们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③]，如果它们是建筑在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上的。”（同上）

在这一小段引文中解决了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关于“我们的现存制度”并非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第二是关于同“我们的制度”配合起来的合作社企业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的问题。

我认为很难说得比这更明白了。

再看看列宁那本小册子里的另一段话吧：

“在我国，单纯的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都有了根本的改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四页）

显然，“论合作社”那本小册子对于合作社已经有了新的估价，而这种新的估价是“新反对派”所不愿意承认的，是“新反对派”违反事实、违反明显的真理、违反列宁主义而绝口不谈的。

和国家资本主义配合起来的合作社是一回事，和社会主义工业配合起来的合作社又是一回事。

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论粮食税”和“论合作社”这本小册子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例如，只要援引“论粮食税”中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立刻看出“论粮食税”和“论合作社”在对合作社的估价问题上是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的。请看这一段话吧：

————————————

① ② 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由租让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在成功时，却能包括更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①]，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强的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的更深固的根拔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二七页）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列宁远在写“论粮食税”时，即在我国还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时，就已经认为合作社**在成功时**能变为反对“社会主义以前的”关系因而也反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强有力的斗争工具。我认为正是这个思想后来成了他的“论合作社”这本小册子的出发点。

可是，从这一切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就应当得出结论：“新反对派”不是马克思主义地而是形而上学地看合作社问题的。“新反对派”不是把合作社看做和其他现象配合起来，比如说，和国家资本主义配合起来（一九二一年）或者和社会主义工业配合起来（一九二三年）的历史现象，而是把它看做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看做“自在之物”。

因此，反对派在合作社问题上犯了错误，因此，反对派不相信农村可能经过合作社而向社会主义发展，因此，反对派滚到了老路上去，滚到了农村发展的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新反对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实际问题上的观点大体上就是如此。

结论只有一个：反对派的路线（既然他们有路线），反对派的游移和动摇，反对派的不相信我们的事业和在困难面前张皇失措，这一切将导致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投降。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因为既然新经济政策主要是退却，既然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值得怀疑，既然富农几乎万能，合作社很少有希望，中农作用日益减少，农村发展的新道路很成问题，党几乎在蜕化，而西方革命还不怎么逼近，——既然如此，反对派的武库里究竟还剩下什么呢？他们打算靠什么去对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斗争呢？单靠一套“时代哲学”是不能作战的。

很明显，“新反对派”的武库，即使它一般可以称为武库，也是不值得羡慕的。这个武库不是为了进行斗争，更不是为了取得胜利的。

很明显，党如果靠这样一个武库去作战，它“一下子”就会断送自己，——它只好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投降。

因此，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得完全正确，它决定：“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而奋斗乃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条件之一就是“反对那种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反对那种把我们的‘彻底社会主义式的’（列宁）企业看做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企图”；“这种思潮使群众不能自觉地对待一般社会主义建设，具体说来，不能自觉地对待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所以只能阻碍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而帮助私人资本来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作斗争”；“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必须进行广泛的教育工作去克服这种曲解列宁主义的观点”（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联共（布）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彻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错误，斥责了“新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叫苦的行为，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按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69页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

（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
关于联共（布）中央全会工作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同志们！让我开始报告吧。

我党中央四月全会的议程有四项：

第一项——我国的经济状况和我党的经济政策。

第二项——根据精简方针改组我们的粮食收购机关。

第三项——从解决我国经济建设关键问题的角度来制定我们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一九二六年的工作计划。

第四项——另派什维尔尼克同志接替叶甫多基莫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如果除去最后一个关于更换书记的问题不算，那末成为中央全会主要讨论中心的其他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我国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问题。因此，我在这个报告中只要讲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我国经济状况的问题。

一　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

决定我们政策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进入直接工业化的时期。

自从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宣布新经济政策以来，已经有五年了。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摆在党面前的基本任务，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大规模的商品流转的条件下，建立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

础。这个战略任务现在还是作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自一九二一年起，就从首先发展农业的角度来对待这一基本任务。列宁同志说，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基础，必须有发达的工业，因为工业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开端和终结，而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要在我们当时所处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扩展工业，首先必须给工业创造某些市场的、原料的和粮食的前提。在空地上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内没有原料，如果没有粮食供给工人，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基本市场，要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发展工业，至少要有三个前提：第一、要有国内市场，而目前我们的国内市场主要是农民市场；第二、要在农业中有较为发达的原料生产（甜菜、亚麻、棉花等等）；第三、要使农村能分出必要数量的农产品来供给工业，供给工人。因此，列宁说，我们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建设工业，就应当从农业开始。

当时许多人不相信这一回事。当时特别反对这一点的是所谓“工人反对派”。他们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党叫做工人的党，而它发展经济却从农业开始。他们说，这怎样理解呢？其他的反对派当时也表示反对，他们不顾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在任何条件下，甚至在空地上也可以建设工业。可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党是正确的，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扩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

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状况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因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农业的，

我们必须从农业开始，那末现在要继续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要推进整个经济，所需要的正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现在，如果不及时供给农业机器，拖拉机和工业品等等，农业本身就不能进展。因此，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是依靠农业的，那末现在它却要依靠而且已经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了。

二　工业化方针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宣布而现在正在实现的国家工业化的口号和方针，其实质和基本意义就在这里。本年四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就是从这一基本口号出发的。所以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

正是现在，在目前，这一任务具有特别迫切的性质，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我国，由于经济的一定方向的发展，在城乡对工业品的需求和工业对这些产品的供给之间就形成某种不相适应的现象，对工业品的需求比工业本身增长得更快，我们现有的商品极其缺乏的现象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这种不相适应的现象的表现和结果。几乎无须证明，迅速发展我国的工业是消灭这种不相适应和商品极其缺乏的现象最可靠的手段。

有些同志认为工业化一般地就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甚至有这样的怪人，他们认为在很早以前创造过某种工业胚胎的伊凡·雷帝就已经是工业化主义者了。如果以此类推，彼得大帝就应该叫做第一个工业化主义者了。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

业。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出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

拿印度来说吧。谁都知道印度是一个殖民地。印度有没有工业呢？无疑是有的。印度的工业是不是在发展呢？是的，在发展。但是，那里发展的是不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工业。那里的生产工具是从英国输入的。因此（当然不仅这一个原因），那里的工业完全隶属于英国的工业。还是帝国主义的特殊方法——在殖民地发展工业，使它受制于宗主国，受制于帝国主义。

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化不能只了解为发展任何一种工业，比如说，发展轻工业，虽然轻工业及其发展是我们所绝对必需的。由此可见，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

三　社会主义积累问题

可是，同志们，要推进工业化，就必须革新我们工厂的旧设备并建立新工厂。我们现在所处的我国工业发展时期，其特点就是我们已经使沙皇时代资本家留给我们的旧工厂的设备能力充分利用了，而现在要继续前进，就应该改进技术，就应该重新装备旧工厂，建立新工厂。否则现在就无法前进。

同志们，要在新技术基础上革新我国工业，就需要大宗的、极大

宗的资本。可是我们的资本很少，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今年我们对工业基本建设这一主要事业大约只能投资八亿多卢布。这当然是很少的。但总算有了一些。这是我们对我国工业第一次较大的投资。我说这很少，因为我国工业随便就可以吞下比这大几倍的资本。我们必须推进我国工业。我们必须以尽快的速度扩大我国工业，把工人数量增加一两倍。我们必须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而且愈快愈好。但是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大宗的资本。

因此，积累资本以发展工业的问题，社会主义积累问题，现在对于我们就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专靠自己，不借外债，凭藉我国内部力量，究竟能不能保证我国工业拥有实行工业化方针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所必需的积累和后备呢？

这是一个应该特别注意的重大问题。

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工业化方法。

英国的工业化是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在那里收集“追加的”资本，把它们投入本国的工业并加快自己工业化的速度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工业化方法。

德国由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法战争的胜利而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当时德国向法国人索取了五十亿法郎的赔款，把这笔赔款投入自己的工业。这是第二种工业化方法。

这两种方法对我们都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是苏维埃国家，因为对殖民地的掠夺和以掠夺为目的的军事侵略都是和苏维埃政权性质不相容的。

俄国，旧的俄国，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出让经营权，在受奴役的条件下获得贷款，它竭力用这种方法逐步爬上工业化的道路。这是第三种方法。但这是被奴役的或半被奴役的道路，是使俄国变成半殖民地的道路。这条道路对我们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进行了三年的国内

战争，打退了所有的干涉者，并不是为了以后，在战胜干涉者以后，自愿地去受帝国主义者的奴役。

还有第四条工业化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列宁同志屡次指出这条道路是我国工业化唯一的道路。

那末，我国工业化是否可能靠社会主义积累来实现呢？

我国有没有这种足以保证工业化的积累的来源呢？

是的，是可能的。有的，我国有这样的来源。

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例如我国地主和资本家已因十月革命而被剥夺，土地、工厂等等已不属于私人，而变成全民的财产了。几乎无须证明，这个事实就是相当大的积累来源。

其次，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例如沙皇债务的废除从我国国民经济的肩上卸下了几十亿卢布的债务负担。不应忘记，如果这些债务还存留下来，单是利息一项，我们每年就得付出几亿卢布，因而使工业受到损害，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受到损害。不用说，这种情况给了我们的积累事业以极大的便利。

我可以指出我们国有化的工业，它已经恢复起来，正在发展，并且提供进一步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若干利润。这也是积累的来源。

我可以指出我们国有化的对外贸易，它提供若干利润，所以也是一种积累的来源。

可以举出比较有组织的我们国营的对内贸易，它也提供一定的利润，因而也是一种积累的来源。

可以指出我们国有化的银行系统这样的积累杠杆，它提供一定的利润，并尽力滋养我国的工业。

最后，我们有国家政权这样的武器，国家政权支配着国家预算，并为整个国民经济、尤其为我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聚若干资金。

我国内部积累的主要来源大体上就是如此。

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使我们有可能建立必要的后备，没有这种后备，我国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但是，同志们，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如果不善于办事，在积累的可能性和实际的积累之间就会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们不能以仅有可能性为满足。如果我们真想为我国工业建立必要的后备，我们就应当把社会主义积累的可能性变成实际的积累。

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必须怎样进行积累才能使工业得到好处呢？我们首先必须抓住经济生活中的哪些关键才能把积累的可能性变成实际的社会主义积累呢？

积累的道路很多，其中必须指出的主要道路至少有下列几条：

第一，为了把国内余资首先用在工业的需要上，必须不让它分散，而让它集合到我们合作社的和国营的信贷机关中，同时要采用发行国内公债的办法。自然，存户因此应得到一定的利息。决不能说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多少是令人满意的。改善我们的信贷网，提高信贷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发行国内公债等等，显然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加以解决。

第二、必须严密地堵塞一切使国内一部分余资流入私人资本的腰包因而损及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和漏洞。为此必须实行一种使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不太悬殊的价格政策，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降低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零售价格，使余资不再流入私商腰包，或至少使它减到最低限度。这是我们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从那里会产生一种既有害于我们积累的事业又有害于切尔文[①]的严重危险。

第三、为了企业折旧、扩大企业和进一步发展企业，必须在工业

——————————————

① 1922 年 10 月苏俄国家银行发行了切尔文银行券，即金卢布，每个切尔文含金量为 7.742 克，由 25%的黄金和 75%的商品保证，含金量与沙俄金卢布相同，在苏联用于外汇贸易结算。1947 年币制改革，废除切尔文银行券。——本书编者注

本身，在工业每个部门中，积存一定的储备。这件工作是必需的，是绝对需要的，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推进。

第四、国家手中必须积蓄为防备国家遭受任何意外（歉收），为滋养工业、扶助农业、发展文化等等所必需的一定后备。现在没有后备是不能生活和工作的。就连一个从事小经营的农民现在也非有一定的储备不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更非有后备不可。

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首先需要有后备。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出口和进口经营得使国家手中能保持一定的后备，保持一定的对外贸易出超。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防备国外市场上的意外事情，而且是维持我们切尔文的手段。我们的切尔文暂时是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达到对外贸易出超的话，它还可能波动。加强我们的输出，使我们的输入和输出的能力相适应，——任务就是如此。

我们不能像旧时那样地说：“自己吃不饱，也得要输出。”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工人和农民要像人样地吃饭，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支持他们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不损害人民消费的条件下采取一切办法使我国输出增加，使国家手中能保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我们一九二三年能由苏维埃纸币进到稳定的货币，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当时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出超而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如果我们想维持我们的切尔文，我们今后也应当把对外贸易事业经营得使我国手中能保有外汇储备，作为我们切尔文的基础之一。

其次，我们在国内贸易方面需要有一些后备。我所指的主要是国家手中要有粮食后备去干预粮食市场，以便跟那些肆意抬高农产品价格的富农和其他粮食投机者作斗争。即使为了防止各工业中心日用品的价格被人为地抬高和工人工资被破坏的危险，这也是必要的。

最后，我们需要这样的税收政策：把捐税负担转嫁到有产阶层的肩上，同时在国家预算方面使国家手中拥有一定的后备。我们四十亿卢布的国家预算执行的进程表明，我们能达到收入超过支出大约一亿

或者更多些。同志们当中有人觉得这个数字太大。可是这些同志的眼光大概太短了，否则，他们会看到一亿卢布的后备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只是沧海一粟。有些人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这种后备。好吧，如果我们今年遭到歉收或受到其他什么灾害，那怎么办呢？我们将靠谁的资金来周转呢？要知道别人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白白给我们帮助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点储备。如果今年一发生意外事情，我们就可以把这笔后备用于国民经济事业，首先是用于工业。放心吧，这些后备是不会没有用处的。

同志们，为了把我国工业化所必需的国内积累的可能性变为实际的社会主义积累，在我们经济生活中首先必须抓住的几个关键大体上就是如此。

四　积累的正当利用。节约制度

但是问题不只限于并且不能只限于积累，还要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积累起来的后备，使人民的财产一个钱也不白费，使积累主要用在满足我国工业化是迫切需要的方面。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所积累的资金就有被贪污的危险，就有被分散地使用在和发展工业、推进整个国民经济毫无关系的各种大小开支上去的危险。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资金，——这是极其重要的艺术，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决不能说，我们，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在这方面是特别高明的。恰恰相反，所有的材料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差得远。同志们，承认这一点是很痛心的，但这是事实，是用任何决议都掩盖不了的。有时我们的管理机关真像这样一个农民：积蓄了一点钱，但不用这点钱去修理犁头，去改进自己的经营，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结果……破产了。至于所积累的后备被直接贪污的事实，我们许多国家机关大肆挥霍的事实，偷窃的事实等等，我就不说了。

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的办法来保护我们的积累不被分散，不被贪污，不被挪用在不必要的用途上，不离开我国工业建设的基本路线。

第一、必须使我国工业计划不是按照官僚主义的臆想而是密切联系我国国民经济状况、联系对我国货源和后备的估计来制定的。不能在制定工业建设计划上落后于工业发展。但也不能向前跑得太远，脱离农业，不顾我国的积累速度。

我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和我国资源的规模——这就是我国工业扩展的基础。我国工业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就这方面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像美国，而不同于英国，因为美国工业是在国内市场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英国工业首先是以国外市场为基础的。英国许多工业部门的产品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是输往国外市场的。美国则相反，它一直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其产品输出国外市场的不过百分之十至十二。比起美国工业来，我国工业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国内市场，首先是依靠农民市场。这就是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基础。

关于我国积累的速度，关于我们握有的用以发展我国工业的后备，也应该这样说。我们有些人有时喜欢制定空想的工业计划，而不顾我们的资源。人们有时忘记了，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资金，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后备，就不能制定工业计划，也不能建设任何“规模宏大”和“包罗万象”的企业。他们忘记了这一点，向前跑得太远了。在制定工业计划上向前跑得太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不量力地建设。这就是高喊宏大计划，招收成千上万的工人到生产中来，大嚷大叫，到后来发现资金不够，就解散工人，发遣散费，于是遭受极大的损失，给建设事业带来失望，造成政治上丢脸的事情。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不，同志们，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既不需要落在工业发展进程的后面，也不需要向前跑得太远。我们需要和工业发展在同一水平上前进，我们需要推进工业而又使它不脱离自己的基础。

我国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因素，它带领着、它引导

着我国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前进。它依照自己的面貌和模样改组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它领导农业，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但是我国工业，只有在不脱离农业，只有在不撇开我国积累的速度，不撇开我们所握有的资源和后备的情况下，才能光荣地完成这个领导和改造的使命。军队中的指挥人员如果脱离自己的军队并失去跟它的联系，就不再成其为指挥人员了。同样，工业如果脱离整个国民经济并失去同它的联系，也就不再成其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因素了。

正确而合理地制定工业计划是适当利用积累的必要条件之一，其理由就在这里。

第二、必须自下而上地精简并健全我们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我们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和经济核算机关。我们管理机关的编制庞大和挥霍无度已成为大家谈话的资料。难怪列宁曾几十次几百次重复说，工人和农民忍受不了我们国家机关的机构臃肿和开支浩繁，无论如何要用一切办法和一切手段来加以精简。最后，应该以认真的态度，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从事这种工作，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制度。（鼓掌）最后，如果我们今后不愿使我国的积累分散从而损害工业，就应该担当起这项工作来。

这里给你们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人说我们的粮食输出是无利的，不合算的。为什么这是无利的呢？因为收购机关在收购粮食上花费了过多的钱。我们一切计划机关查明，收购一普特粮食只需八个戈比。实际上呢，收购一普特所花的不是八个戈比而是十三个戈比，多花了五个戈比。怎么会弄成这样呢？因为每个比较独立的收购人员，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一样，在着手收购粮食以前，都认为必须扩充自己的工作人员名额，添用大批速记员和打字员，一定要置备一辆汽车，造成一大笔非生产的开支，等到后来结账时，才发现我们的输出是不合算的。假如我们收购了几亿普特粮食，每一普特多花五个戈比，那末浪费的钱就达几千万卢布了。如果我们不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对

待我们国家机关的大肆挥霍的现象，我们积累起来的资金就会这样花掉，而且将来还会这样花掉。

我在这里只举了一个例子。但是谁不知道这样的例子我们有几百个几千个呢？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精简我们的收购机关。全会通过的与此有关的决议，你们大概已经看过。这个决议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我们将十分严格地执行这个决议。但是，同志们，这还是不够的。这只是我们国家机关的混乱状况和缺陷的极小部分。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应当采取办法来自下而上地精简整个国家机关，各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和经济核算机关，所有的合作社机关和整个商品流转网。

第三、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我们管理机关中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铺张现象，反对我们这里最近可以看到的对人民财产和国家后备所采取的犯罪的态度。我们这里现在盛行着一种放荡风气，就是毫无节制地庆祝各种节日，举行各种庆祝大会、纪念典礼、纪念碑揭幕式等等。几万几十万卢布白白糟蹋在这些“事业”上。各色各样被纪念的对象和盛大仪式的爱好者在我们这里如此之多，纪念半周年、周年、二周年等等典礼的心愿如此之大，要满足这种需要，真得有几千万卢布才行。同志们，应该结束这种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放荡行为了。最后，应该明白，我们背后既有我国工业方面的需要，面前又有大批失业和儿童流离失所的事实，自然就不能容许而且没有权利容许这种放荡行为和这种毫无节制的浪费行为。

最值得注意的是非党群众有时还比党员更爱惜我们国家的资财。共产党员在这种场合的行动是更勇敢更坚决的。他毫不在乎地发给许多职员补助金，称之为分红，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红利气味。他毫不在乎地逾越法律，回避法律，违犯法律。非党群众在这方面倒是较为小心较为审慎的。这大概是共产党员有时认为法律、国家等等东西都

是家里事情的缘故。（笑声）正因为如此，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就不费什么气力，像猪一样地（同志们，请原谅我这样说）跨进国家菜园，在那里饱吃一顿，或者是拿国家资财来表示自己的慷慨。（笑声）同志们，应该消灭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了。如果我们想真正保存我们的积累以应我国工业的需要，那就应该展开坚决的斗争来反对我们管理机关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放荡行为和铺张浪费。

第四、我们必须和盗窃行为，和我们国家机关、合作社、工会以及其他机关里所谓“快乐的”盗窃行为进行不断的斗争。像报刊上所说的，有羞怯的隐蔽的盗窃行为，也有勇敢的“快乐的”盗窃行为。不久以前我在“青年团真理报”上读了奥库涅夫关于“快乐的”盗窃行为的短文。原来有这样一个潇洒放肆的家伙，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在我们的一个机关里快乐地进行盗窃，他经常地、不停手地进行盗窃，并且总是盗窃到手。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盗贼本人，而是这样的事实：周围的公众明明知道他是盗贼，可是不仅不和他斗争，反而觉得可以拍拍他的肩膀，称赞称赞他的手法高明，因而盗贼在公众眼里成了一种英雄。同志们，这是值得注意的，这是最危险的。当捉到一个奸细或叛徒的时候，公众有无限的愤怒，都要求枪决他。可是当盗贼公然横行，盗窃国家财产的时候，周围的公众却只是和善地笑笑，拍拍他的肩膀。其实很明显，盗贼既然盗窃人民的财产，损害国民经济的利益，也就是奸细和叛徒，甚至比奸细和叛徒还坏。当然，这个留着小胡子的潇洒放肆的家伙终于被逮捕了。但是逮捕一个“快乐的”盗贼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盗贼在我们这里何止千百。单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不能把他们全部除尽的。这里必须采取另外的办法，采取更有效更认真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这些小偷周围造成公众普遍的道德抵制和憎恨的气氛。这种办法就是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掀起一个运动，造成一种道德气氛，使盗窃行为绝无发生的可能，使盗窃和贪污人民财产的分子，不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都不能

生活并存在下去。和盗窃行为作斗争是保护我们的积累不被贪污的手段之一，——任务就是如此。

最后，我们必须进行一个运动来消灭工厂里的旷工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我们企业中的劳动纪律。旷工现象使工业丧失几万以至几十万个工作日。因此，白白地丢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卢布而使我国工业受到损害。如果旷工现象不停止，如果劳动生产率停留在一点上，我们就不能推进我国的工业，我们就不能提高工资。应该向工人们特别是向才进工厂不久的工人们说明，要是听凭旷工现象存在而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实际上就是损害共同事业，损害整个工人阶级，损害我国工业。为了我国工业的利益，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对旷工现象作斗争，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任务就是如此。

为了保护我们的积累和我们的后备不被分散，不被贪污，为了使这些积累和这些后备用在我国工业化方面，其必需的办法和手段就是如此。

五 要造就工业建设干部

我已经讲过工业化的方针，讲过积累后备来开展工业化的道路，最后，讲过合理地使用积累来满足工业的需要的办法。但是，同志们，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要实现党关于我国工业化的指示，除了这一切以外，还必须造就新的干部，新的工业建设干部。

任何一种任务，特别是像我国工业化这样的巨大任务，如果没有活的人，没有新的人材，没有新的建设干部，那就不可能实现。从前，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建军和作战的指挥干部，需要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些出身下层和因为有才干而提升起来的新的指挥干部，我们就不能建立军队，我们就不能战胜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敌人。是他们这些新的指挥干部当时挽救了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国

家，——当然这是在工人和农民共同支持之下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处在工业建设时期。现在，我们已从国内战争的战线转到工业战线了。与此相适应，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工业指挥干部，需要优秀的工厂经理，优秀的托拉斯领导干部，能干的贸易工作人员，聪明的工业建设计划人员。现在我们需要锻炼出经济方面和工业方面新的团长和旅长、师长和军长。没有这样的人材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因此，任务就在于从工人和苏维埃知识分子——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且跟我们一道建设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苏维埃知识分子—— 队伍中，造就大批的工业建设干部

任务就在于造就这样的干部并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给他们一切帮助。

近来我们老是爱斥责经济工作人员，说他们腐化堕落，而且爱把个别不好的现象推广到一切经济工作干部身上。无论是谁，只要他高兴，往往就会认为必须把经济工作人员痛骂一顿，斥责他们犯了万恶不赦的罪过。同志们，应该把这种恶劣习惯永远抛掉。要知道，丑事家家有。要知道，我国工业化和提拔新的工业建设干部的任务，不是要求责骂经济工作人员，恰恰相反，而是要求在我国工业建设方面给他们一切帮助。使经济工作人员处在信任和支持的气氛中，在造就新的工业建设人材方面帮助他们，使工业建设者的岗位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岗位，——这就是我们党组织的工作现在应有的方向。

六　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

由于我国采取了工业化方针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近任务就是如此。

没有工人阶级的直接帮助、直接支持，能不能实现这些任务呢？不，不能。推进我国工业，提高工业生产率，造就新的工业建设干部，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积累，合理地使用积累来满足工业的需要，建立

极严格的节约制度，整顿国家机关，使它精简廉洁，清除国家机关在我国建设时期所沾染的恶习和污秽，经常对贪污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人作斗争，——所有这些任务，如果没有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直接的和经常的支持，任何政党都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任务就在于吸引千百万非党工人群众来参加我国的全部建设工作。需要使每个工人和每个诚实的农民都帮助党和政府实行节约制度，对贪污和分散国家后备的现象作斗争，驱逐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盗贼和骗子，健全并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生产会议会给予不可估价的帮助。有一个时候，生产会议在我国非常盛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却不听说了。同志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无论如何要使生产会议活跃起来。在生产会议上需要提出的不仅是小问题，比方说，卫生问题。必须使生产会议讨论的内容更广泛些，更丰富些。应该在生产会议上提出工业建设的基本问题。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提高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工业建设的参加者。

七 要巩固工农联盟

但是在谈到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时，也不可把农民忘掉。列宁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发展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积累，实行节约制度，——所有这些任务，如果不加以解决，我们就不能战胜私人资本并消灭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存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任务就一个也不能解决。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因此，如果我们破坏或削弱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我们的一切任务就会悬在空中。

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把劳动农民群众看成异类，看成工业的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的殖民地之类的东西。同志们，这些人是危险的人。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农民既不能是剥削对象，也不能是殖民地。农民经济是工业的市场，正像工业是农民经济的市场一样。但农民对于我们不仅是市场，而且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正因为如此，农民经济的提高，农民的普遍合作化，农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保证我国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反过来说，发展工业，生产农业机器和拖拉机，以大量工业品供给农民，又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推进农业。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极重要的基础之一。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时常要求用过多增加税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等办法来加紧压榨农民。我们不能同意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不自觉地破坏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所要做的是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不是破坏这种联盟。

但是我们所捍卫的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任何一种联盟。我们所主张的是领导作用属于工人阶级的这种联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体系中的领导作用，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就不可能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知道有些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他们说，联盟是好事情，但是，为什么还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呢？这些同志大错特错了。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不懂得只有久经考验和最革命的阶级即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胜利。

为什么普加乔夫或拉辛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了呢？为什么当时农民没有能够把地主赶走呢？因为他们没有而且当时也不可能有像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为什么法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胜利和早先被赶走的地主的返回而结束呢？因为当时法国农民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像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当时领导农民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工农联盟战胜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唯一国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过去领导并且现在继续领导我国革命运动的是在战斗中久经考验的工人阶级。只要破坏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权这一

思想，工农联盟就会完全垮台，资本家和地主就会重回自己的老巢。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保持并巩固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保持并巩固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体系中的领导。

八　要实行党内民主

我已经讲过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的问题，讲过吸引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来参加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参加工业建设事业的问题。可是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是一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要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首先必须使党本身积极起来，必须使党本身毅然决然走上党内民主的道路，必须使我们的各级组织吸引那些决定我们党的命运的广大党员群众来参加我国建设问题的讨论。否则就谈不到工人阶级的积极化。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列宁格勒组织不久以前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当时某些领导者不愿谈党内民主，不然就是带着嘲笑的口吻来谈它。我所指的是党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时、代表大会期间以及代表大会刚开完之后的那个时期，当时在列宁格勒不许党组织集会，当时党组织的某些领导者对于党组织俨然一个小警长（请原谅我的直率），禁止党组织开会。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所谓“新反对派”就是在这一点上碰了钉子的。

如果说，我们中央委员们在列宁格勒积极分子帮助下，两周内就能把你们这里那个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反对派挤到一边并使它孤立，那末，这是由于代表大会决议的解释运动符合民主趋向，这种趋向在列宁格勒组织内曾经有过，它竭力要表现出来，而且终于表现出来了。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接受不久以前的这个教训。我希望你们接受这个教训，忠实而坚决地实行党内民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

性，吸引他们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并说服他们相信我们党中央四月全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正确性。我所希望的就是你们要说服党员群众，因为说服的方法是我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

九　要保护党的统一

有些同志认为党内民主就是各派别集团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同志们，那可要请原谅了！我们不是这样理解党内民主的。党内民主和派别集团的自由之间没有而且不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党内民主是什么呢？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

派别集团的自由是什么呢？派别集团的自由就是瓦解党的队伍，把党分裂为各个中心，削弱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里，它们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我们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在睡眠中也梦见全党展开了争论。我们这里有一些人，他们不能想像党会没有争论，他们满想得到职业争论家的头衔。让这些职业争论家离开我们远些吧！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臆造出来的争论，不是把我们党变成争论的俱乐部，而是加紧我们的整个建设工作，特别是加紧工业建设，把坚定而满怀信心地领导我国建设工作的党，战斗的团结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党巩固起来。谁力图进行永无止境的争论，谁力图争取派别集团的自由，谁就是破坏党的统一，谁就是损害我们党的实力。

我们过去的强大是靠什么，我们现在的强大又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正确的政策和我们队伍的统一。正确的政策已由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给我们制定出来了。现在任务就在于保证我们队伍的统一，保证我们党的统一。我们党决心不顾一切来实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党中央全会的决议的意义基本上就是如此。

十 结 论

现在让我来做结论吧。

第一、我们应当推进我国工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前进的领导力量。

第二、我们应当造就新的工业建设干部，因为他们是工业化方针的直接执行者。

第三、我们应当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应当积累后备以应我国工业的需要。

第四、必须正确使用积累起来的后备，并建立最严格的节约制度。

第五、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并吸引千百万工人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六、必须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

第七、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实行党内民主。

第八、我们应当保护并巩固我们党的统一、我们队伍的团结。

我们是否能完成这些任务呢？是的，能完成，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做。而我们是愿意这样做的，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出来。是的，能完成，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因为我们不怕困难，因为困难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跟它作斗争并克服它。是的，能完成，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往哪里走。我们坚定地满怀信心地向着目标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前进。

同志们！九年以前，一九一七年二月，我们在列宁格勒是一个小小的集团，年老的党员都记得，我们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列宁格勒苏维埃中占极小的少数。年老的布尔什维克应当记得，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许许多多敌人都讥笑我们。但是我们前进了，夺取了一个阵地又一

个阵地，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是以团结的队伍来进行斗争的。后来这个小小的力量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力量。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并推翻了克伦斯基。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我们从我国境内赶走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强暴者。我们克服了经济破坏状态。最后，我们恢复了我国的工业和我国的农业。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新任务——我国工业化的任务。最严重的困难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可以怀疑我们能完成我国工业化这个新任务呢？当然不可以。相反地，我们现在有一切条件来克服困难并实现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提出的新任务。

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在新的工业战线上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热烈鼓掌）

载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列宁格勒真理报”第八十九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8 卷第 89—109 页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

一　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同志们！我在我的报告中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著名公式，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却有缺点了。我说因此应该用列宁的公式来代替它。列宁的公式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在讨论的时候，有人反对我的意见。在这方面特别卖力的是季诺维也夫。因此，我不能不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作较详细的说明。

我认为季诺维也夫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即使读过，也没有读懂，否则，他就不会反对我，否则，他就会考虑到社会民主党现在正拚命抓住恩格斯的旧公式来反对列宁主义这个事实，否则，季诺维也夫就会懂得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足迹是会遭到一些“蜕化”的危险的。

请看看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讲了些什么。他是用问答的方式来阐述个别原理的。

“问：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资料增加到为建

立社会生产所必需的数量一样。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将来很可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①]，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为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已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问：这个革命的进程将是怎样的呢？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显然，这里讲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并争得无产阶级专政。同志们，你们知道，这一条在我们这里已经实现了，并且充分而有余地实现了。（喊声：“不错！”“对！”）

往下看：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一）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遗产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在我们这里已经实行，并且正在充分而有余地实行。

再往下看：

“（二）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收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私有者、工厂主和铁路及海船所有者的财产。”

你们知道，这些措施还在我国革命的最初几年也在我们这里实行了。

再往下看：“（三）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举行暴动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叛乱分子的财产。”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你们知道，我们已经没收了，并且没收得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笑声）

再往下看：

“（四）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园、工厂、作坊中工作，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并迫使残存的工厂主付出的工资跟国家所付出的一样高。”

大家知道，我们走的正是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正获得许多胜利，基本上这一条已在顺利地实现着。

再往下看：

“（五）在私有制完全废除以前，对社会的一切成员一律实行强制劳动。特别是为农业组织工业大军。”

你们知道，我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用组织劳动大军的形式试走过这条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上并没有得到重大的成就。后来我们采取迂回的道路走向这个目的，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能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往下看：

“（六）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银钱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封闭一切私人银行和钱庄。”

同志们，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基本上也已经实现了。

往下看：

“（七）随着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和工人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国营工厂、作坊、铁路、海船的数目，开垦一切荒地，改进已垦土地的耕作。”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也正在实行，并且日有进展；土地的国有化和主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对这一点有极大的帮助。

再往下看：

“（八）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

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正在实行，但是还远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战争和武装干涉使我们遭到破坏，我们还不能对全国的儿童都实行国家公费教育。

再往下看：

“（九）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

显然，这里讲的是大规模建筑住宅的问题。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正在推进，可是基本上还没有实现，恐怕也不会很快实现，因为我们承受的遗产是破产了的工业，我们还来不及并且也不可能来得及积累充足的资金来进行大规模的住宅建筑。

再往下看：

“（十）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

这一条是前一条的组成部分，因此，关于前一条所讲的也应当适用于这一条。

再往下看：

“（十一）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可以说是进行得令人满意的。

还有最后一条：

“（十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已经完全实现了。

同志们，这就是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

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我国革命**已经**实现了这个纲领的十分之九。

再往下看：

“问：这种革命（即上面所说的革命。——斯大林注）**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了。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①]（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

恩格斯说：具有上述纲领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发生的。而事实说明，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即在我们的国家内，基本上**进行了**这样的革命，实现了这个革命的纲领的十分之九。

季诺维也夫可能说，我们实现了这个纲领，实现了这些条文，是犯了错误。（笑声）很可能，我们实现这些条文是犯了一点“民族狭隘性”的错误。（笑声）这是很可能的。但有一点终究是很明显的：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恩格斯认为在一个国家内无法实现的和不可能的事情，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在我国已经变成能够实现的和可能的事情了。

假如恩格斯还活着的话，当然，他决不会墨守旧公式，相反地，他会尽情地祝贺我们的革命说：“让一切旧公式见鬼去吧，苏联胜利的革命万岁！”（鼓掌）

但是社会民主党人阵营里的先生们却不这样想。他们死抓住恩格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斯的旧公式做掩护，以便于他们进行反对我国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当然，这是他们的事情。不过季诺维也夫竭力模仿这些先生，在这一问题上走上社会民主党人的道路，那就不好了。

我所以引用恩格斯的公式并加以详细阐述，有三点理由：

第一、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公式和恩格斯的极完备地极明确地代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公式对照一下，使问题极端地明确起来；

第二、揭露那些竭力引用恩格斯的旧公式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和反革命本质；

第三、指明列宁是解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的**第一个人**。

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不能够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恩格斯或马克思高出一筹。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件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多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列宁所以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没有做字句的奴隶，

他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列宁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这样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像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天字第一号’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最大罪过，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关头应用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二页）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道路，也是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如果我们愿意成为彻底的革命者，今后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列宁主义所以能够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屹然不动，因为它过去走的和现在还继续走的正是这条道路。离开这条道路就等于跌进机会主义的泥潭。滑出这条道路就等于做社会民主党的尾巴，季诺维也夫目前的情形正是这样。

季诺维也夫在这里说，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恩格斯旧公式的口气改得缓和些，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也可能在个别国家内**开始**。他援引了恩格斯的一句话：“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这都是对的。这是现在每一个苏联党校的学生都知道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所讲的并不是这件事情。说你开始革命吧，其他国家胜利的革命在最近期间就会来支持你的，而且在其他国家取得这种胜利的时候，你是可以指望胜利的，——这是一回事情。说你开始革命并推进革命吧，要知道，即使其他国家的革命胜利在最近期间不能及时到来，在现在，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斗争的条件使你仍然能够取得胜利，然后燃起其他国家的革命，——这又是一回事情。

我引用恩格斯的旧公式，并不是为了避开后来恩格斯和马克思曾经把这个极明确的极完备的公式的口气改得缓和些的事实，而是为了：

（甲）把两个相反的公式加以对比，使问题明确起来；

（乙）揭露那些竭力用恩格斯的旧公式做掩护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

（丙）指明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出，我下面的话是对的：季诺维也夫没有读过“共产主义原理”，即使读过也没有读懂，他以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恩格斯的旧公式，因而滚到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几点意见

其次，我在我的报告中说过，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也多少有些相似的情形。我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机构的专政）的问题上，马克思那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把英国，大概也把美国，看做例外，因为当时英美两国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当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也许有可能用其他方法即“和平的”方法获得政治统治。我说过，按照列宁的意见，马克思的英美例外的说法或有限制的说法在当时是正确的，在现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条件下，当英国和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像其他国家一样盛行的时候，已是不正确的和多余的了。

同志们，让我来引证马克思的一段话吧。一八七一年四月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试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①]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引自列宁“国家和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六页至第三八七页）

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是这样写的。

大家知道，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考茨基，都死抓住这段话，并且武断地说，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定不移的方法，也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了解为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机构，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无产阶级所应该争取的道路。

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怎样反应呢？他在他的“国家和革命”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

“在以上所引的马克思的那段议论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来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一八七一年是很明白的，那时英国还是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但还没有军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官僚制度。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因为当时在英国，**没有**一个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先决条件，革命，甚至于人民革命，人们也认为是可能的，并且确实是可能的。

现在[①]，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代，**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失去时效了**[②]。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就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上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号令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粉碎**并**毁坏**‘现成的’（那里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页）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你们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和我关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胜利旧公式所谈的是多少有点相似的。

当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发展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时候，马克思的有限制的说法或英美例外的说法是有其根据的。照列宁的看法，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条件下，当英国和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已经发展到即使不甚于也决不亚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时候，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就失去时效了。

因此，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绝无例外）帝国主义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

因此，各国机会主义者死抓住马克思在一定条件下所假定的有限制的说法，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维护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勾当。

列宁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教条而是看做行动的指南。

如果要求马克思预见到几十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那就荒唐了。如果对列宁在这些可能性已经出现并且极为充分地展开的时候发现了并概括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这些可能性觉得诧异，那就更荒唐了。

曾经有人，大概是梁赞诺夫吧，从座中提出意见，他说马克思把英国和美国看做例外，不仅在现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是不正确的，就是在马克思假定这个例外时的条件下也是不正确的。我不同意梁赞诺夫的意见。我认为梁赞诺夫错了。无论如何，列宁的看法不是这样，列宁完全肯定地说，马克思给七十年代的英国和美国所作的这个假定是正确的。

列宁同志在他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中关于这个问题写道：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争论时，他曾顺便提出一个

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从这个匪帮手里赎买过来’（即从资本家匪帮，也就是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请仔细想想马克思的意思。他所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就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而言，是当时‘和平地’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最有可能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对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但在苏维埃俄国，自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自从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某些**条件已经按照半世纪前本可在英国（假如英国当时已开始和平地转到社会主义）形成的那些条件的样式而形成了，这难道不明显吗？那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使资本家屈服于工人：（一）由于农民很少（在七十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了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就），工人即无产者在全国人口中完全占优势；（二）无产阶级在工会里具有高度组织性（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三）在政治自由长期发展中受到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四）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第一位已经转给德国了）——长期间惯于用妥协的方法去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英国资本家**可能和平地屈服于**[①]英国工人的思想…… 马克思的话是极其正确的，他曾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便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极大的生产组织是很重要

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例外）环境会**迫使**[②]资本家和平屈服，并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一五页至第三一七页）

很明显，这里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梁赞诺夫。

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

我在我的报告中说过，列宁发现了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列宁根据这个规律，根据不平衡的发展和尖锐化这一事实，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这个原理。托洛茨基说，列宁的这个原理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季诺维也夫也和托洛茨基一同说，从前，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比现在、比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厉害，把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联系起来是不可以的。

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关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著名原理，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规律推翻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此外，托洛茨基在这里显然转到庸俗的观点上去了。他在这里把各别国家从前在**经济上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并不总是引起也不总是能够引起这些国家跃进式的发展）**跟**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混淆起来了。在帝国主义时期，各国间经济上的不均等比从前小，但是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却比从前厉害得不可比拟，比从前尖锐，而且这种不平衡一定和必不可免地引起跃进式的发展，使原来工业落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后的国家在相当短促的时间内赶过先进的国家，这就不能不造成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前提。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样把两个绝不相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并不说明也不能说明托洛茨基的“理论”水平很高。

但是我不能了解季诺维也夫，他本来是个布尔什维克，并且受过一点布尔什维主义的薰陶，怎能不怕跌入超帝国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泥潭，竟断言发展的不平衡从前比现在、比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还要厉害呢？怎能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没有关系呢？难道不知道列宁正是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这个思想吗？例如下面所引的列宁的话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①]：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呢？

它是根据：

（一）旧的、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化并发展为垄断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了；

（二）世界已经被瓜分成各帝国主义集团和列强的势力范围；

（三）世界经济是在各帝国主义集团为争夺市场、争夺原料、扩大原来的势力范围而进行剧烈的决死斗争的情况下发展的；

（四）这种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跃进的，它的方式是把原来跑在前面的国家挤出市场而把新兴的国家推到前面；

（五）这种发展方式所以产生，是由于某些帝国主义集团有可能最迅速地发展技术、减低商品价格并从另一些帝国主义集团手里夺取市场；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六）这样，周期性地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就成为绝对必要了；

（七）这样，这种重新瓜分就只能用暴力的方法即用武力检查各个帝国主义集团实力的方式来进行了；

（八）这种情形就不能不引起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激烈的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

（九）这种情形必然使帝国主义者相互削弱而造成在个别国家内突破帝国主义战线的可能性；

（十）在个别国家内突破帝国主义战线的可能性，不能不给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造成有利的条件。

是什么情况使帝国主义条件下的不平衡尖锐化、不平衡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呢？

是两种主要的情况：

第一、帝国主义集团已把世界瓜分完毕，地球上再没有“自由的”土地了，因而通过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以求得经济“均势”就成为绝对必要了；

第二、技术（就广义而言）的空前巨大的发展，使一些帝国主义集团在争夺市场、争夺原料产地等斗争中易于越过和超过另一些帝国主义集团。

但是，这两种情况仅仅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才有了发展并达到了顶点。事情也只能如此，因为只有在帝国主义时期才能把世界瓜分完毕，而巨大的技术上的可能性也只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才出现。

这一点也应该用来解释下面的事实：从前英国在工业方面能够走在各国前面，一百多年来把各国丢在后面，可是后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德国只须二十年就开始超过英国，而美国用更短的时间就越过了欧洲各国。

既然如此，怎么能够武断说发展的不平衡从前比现在更厉害，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和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没有关系呢？

只有理论上的庸人才会把过去各工业国经济上的不均等和只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特别强烈、特别尖锐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混淆起来，这难道不明显吗？

只有对列宁主义的完全无知才会使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朋友们极其荒谬地反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著名原理，这难道不明显吗？

二　加米涅夫在为托洛茨基打扫道路

加米涅夫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用意在哪里呢？如果撇开加米涅夫所讲的一些琐碎问题和他惯用的外交辞令，那末他的发言的用意在于使托洛茨基便于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使托洛茨基在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这一基本问题上便于反对列宁主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加米涅夫担当一种“工作”，就是要证明列宁的一篇论述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重要文章（一九一五年）似乎与俄国无关，证明列宁在讲到这种可能的时候，指的并不是俄国而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可见加米涅夫担当起这种可疑的“工作”就是为了给托洛茨基打扫道路，因为托洛茨基的“公式”已经被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论文驳倒，而且不会不被驳倒。

说得粗一点，加米涅夫是给托洛茨基当打扫道路的清道夫的角色。（笑声）当然，看到列宁研究院院长给托洛茨基当清道夫角色是可悲的，这倒不是因为清道夫的工作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加米涅夫无疑是一个高明的人，我以为他可以从事其他更高明一点的工作。（笑声）但是，他甘愿担任这个角色，当然，他完全有权这样做，这是没

有办法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加米涅夫当好了这个非常奇怪的角色没有。

加米涅夫在他的演说中说列宁在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提出的基本原理，即规定我国革命和我国建设的整个路线的原理，说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原理，和俄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什么关系，说列宁讲到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时所指的不是俄国而只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真是不可思议并且骇人听闻，这简直像是对列宁同志的公开诽谤，但加米涅夫大概顾不到党对他伪造列宁学说会有怎样的看法。他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情：不惜任何代价去给托洛茨基打扫道路。

他企图怎样论证这种奇怪的武断呢？

他说，列宁同志在写了上述那篇文章以后两个星期，又发表了一篇论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的著名提纲，列宁在提纲中说，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仅限于取得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列宁说这些话的出发点，似乎是俄国革命应该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而不应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既然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文章所论述的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那末很明显，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指的也就不会是俄国了。

这样，在加米涅夫看来，列宁对俄国革命规模的了解竟和左派资产阶级革命者或社会民主党人一类的改良主义者一样了。照这些人的看法，资产阶级革命不应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照这些人的看法，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应该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停顿时期，很长的中断时期，至少是几十年的间歇时期，在这一段时期中，资本主义将繁荣发展，而无产阶级则苟且偷安。

这样说来，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这篇文章时，没有想，没有要，也没有力求由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立刻**转入社会主义革命了。

你们会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并且骇人听闻。是的，加米涅夫这个

论断确实不可思议并且骇人听闻。但这是不会使加米涅夫难为情的。

让我引证几个文件来说明加米涅夫在这个问题上是粗暴地伪造列宁同志的意见。

请看，早在一九〇五年，当俄国革命的规模还没有像而且不可能像后来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前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才形成的那样巨大的时候，列宁同志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是怎样写的：

“我们将**立刻**[①]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二一三页）

这段话引自列宁一九〇五年九月发表的一篇文章。

加米涅夫知道不知道有这篇文章呢？我想，列宁研究院院长是应该知道有这篇文章的。

可见列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不是看做无产阶级斗争和整个革命的终结，而是看做第一阶段和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

但是，也许列宁后来改变了他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规模的看法吧？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文件。我指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即列宁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那篇重要文章发表以后三个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请看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是怎样说的：

“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也就是说**，为吸引农民，为**尽量吸取**农民的革命力量，为吸引‘**非**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即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奋斗，将来也要不屈不挠地为此目的而奋斗。无产阶级将**立刻**[②]利用资产阶级俄国由沙皇制度及地主的土地占有权之下所获得的这种解放，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③]，而不是帮助富裕农民来反对农业工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

————————————————

① ② 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页至第三八三页）

你们可以看出，无论在这一段或上一段引文里，无论在一九〇五年或一九一五年，列宁的出发点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应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的胜利是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为了**立刻**转入它的第二阶段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第一阶段。

那末，应该怎样理解加米涅夫在其演说中所引的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的讲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提纲呢？这个提纲是不是和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矛盾呢？当然不矛盾。相反地，这个提纲的基础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俄国革命由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思想。第一、列宁在这个提纲中根本没有说过俄国革命的规模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仅限于**推翻沙皇和地主，**仅限于**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列宁所以在这个提纲中仅仅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他认为这个革命是**第一**阶段，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近**任务。第三、列宁认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执行自己的任务不应从第二阶段（像托洛茨基通过“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公式所提的那样）而应从第一阶段**开始**，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开始**。

这和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有没有一点矛盾，哪怕是矛盾的影子呢？显然没有。

可见加米涅夫公然伪造了列宁的观点。

但是，我们用来反驳加米涅夫的证据不仅有出自列宁手笔的文件，而且有活的人，例如像托洛茨基，像我党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就是，甚至说来真奇怪，连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本人也都是。

大家知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文章是在一九一五年发表的。大家知道，当时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

问题上曾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托洛茨基就在一九一五年那年也专门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来回答列宁的这篇文章。当时，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批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呢？他对列宁同志的文章怎样评价呢？他对这篇文章是怎样理解呢？是理解为列宁讲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时指的不是俄国，还是另一种理解，例如，像现在我们大家所理解的那样呢？请看托洛茨基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列宁的上述论文就是在该报上发表的。——斯大林注）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①]，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页至第九十页）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当时对列宁的文章的理解并不像加米涅夫现在竭力要“理解”的那样，而是和列宁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和党对它的理解，和我们大家对它的理解是一样的，否则，托洛茨基在和列宁的争论中就不会**拿俄国**做论据来支持自己了。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在这段引文中是反对他现在的盟友即反对加米涅夫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在这次会议上不起来反对加米涅夫呢？为什么托洛茨基不在这里开诚布公地声明加米涅夫公然歪曲列宁呢？托洛茨基是不是以为他在这件事情上默不作声就可以被认为是诚实的论战的榜样呢？托洛茨基不在这里起来反对加米涅夫，大概是因为他不愿意被牵连到这个公然诬蔑列宁的可疑的“事件”里去，——他把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让给加米涅夫去干了。

可是党，例如代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怎样呢？关于这个问题，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决议中这样说：

“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中，列宁同志正确地总结出了两点：（甲）可能‘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乙）可能这少数或者甚至一个国家不一定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参看评苏汉诺夫的札记）。**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①]，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若干有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第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无产阶级一定的支持下长期坚持下去，巩固起来，甚至在这种支持不是以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式出现时也能如此。”（摘自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

由此可见，以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为代表的整个党是反对加米涅夫的，是反对他硬说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文章中似乎指的不是俄国的，否则代表会议就不会说“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著名文章是正确的了。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由此可见，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对列宁同志的文章的理解和列宁对它的理解、和托洛茨基对它的理解、和我们大家对它的理解是一样的。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这一决议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决议草案是由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的委员会起草并**一致**通过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加米涅夫曾是**一致**通过上述决议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主席，而季诺维也夫则是这个决议的报告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怎么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赞成这个决议的各项条文呢？加米涅夫当时对列宁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直接被引用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里）的理解和他现在竭力要“理解”的不同，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应该相信哪一个加米涅夫呢：相信那个担任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主席的、投票赞成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的加米涅夫呢，还是相信那个现在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充当托洛茨基的清道夫的角色的加米涅夫？

由此可见，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时期的加米涅夫是反对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时期的加米涅夫的。

为什么季诺维也夫一声不响，也不打算纠正公然伪造一九一五年列宁的文章和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的加米涅夫呢？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维护过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决议的是季诺维也夫而不是什么别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由此可见，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并不完全干净。（喊声：“不干净透啦！”）这算什么诚实的论战呢？

由此可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现在顾不到诚实的论战了。

那末，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加米涅夫没有当好托洛茨基的清道夫的角色。他辜负了托洛茨基的厚望。

三　不可思议的糊涂想法
或季诺维也夫论革命性和国际主义

现在我来谈谈季诺维也夫。如果说加米涅夫的整个发言是竭力为托洛茨基打扫道路，那末，季诺维也夫承担的任务就是说明反对派的首领们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革命家和绝无仅有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来研究一下他的“理由”。

他引用了布哈林的一段话：在观察国内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照方法论应该撇开国外问题，接着他就把布哈林的这个论点和关于反对派联盟的提纲（里面谈到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对照了一下，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说布哈林和基本上批准了这个提纲的中央委员会似乎都因此而忘记了我国革命的国际任务，忘记了国际革命的利益。

这些话对不对呢？同志们，这些话是毫无意义的。其中秘密在于季诺维也夫在方法论问题上很差，碰到三棵松树就糊涂得迷了路，并把自己的糊涂想法当做实际情况了。布哈林是说，不可以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建立使我国不受武装干涉的保障的问题即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混为一谈。布哈林绝不是说，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即国际问题没有联系。他只是说，不能把第一类问题和第二类问题混淆起来。这是方法论的基本的和起码的要求。如果季诺维也夫连方法论中起码的问题都不懂，那又能怨谁呢？

我们认为我国有两种矛盾：国内矛盾和国外矛盾。国内矛盾首先在于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我们说，这种矛盾我们是能够靠本身的力量来克服的，我们能够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能够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国外矛盾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斗争。我们说，这

种矛盾我们只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解决的，要解决这种矛盾，必须社会主义至少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助力、手段和工具。

这些话对不对呢？让季诺维也夫去证明这是不对的吧。

季诺维也夫糟糕的是他看不出这两种矛盾的区别，荒谬绝伦地混淆这两种矛盾，把自己的糊涂想法当做“真正的”国际主义，而认为谁在观察国内问题时照方法论撇开国外问题，谁就是忘记了国际革命的利益。

这话很可笑，但是要知道，它没有说服力。

至于所谓提纲中忽略了我国革命的国际因素，那只要读一读这个提纲，就会知道季诺维也夫又弄糊涂了。请看提纲中是怎样讲的吧：

“党的出发点是：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不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而且第一、它是进一步展开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第二、它在苏联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如果对农民实行正确的政策，无产阶级就能够顺利地而且一定顺利地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这还需要一方面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另一方面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都强大得足以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才行**。”①

你们可以看出在提纲中国际因素是完全而充分地被考虑到的。

其次，季诺维也夫和跟他一起的托洛茨基都从列宁的著作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于是就荒唐地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是我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胜任的事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情。可是，同志们，这是糊涂想法！难道党什么时候说过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是可能的，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胜任的吗？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请给我们指出来。难道党现在没有说，过去也一向没有和列宁一起说过，只有当社会主义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时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才有可能吗？难道党没有解释过几十次几百次，不可以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混淆起来吗？

党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就是在这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且这个任务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的，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则是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保障，并且这个任务只有在革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条件下才能解决。既然如此，怎么还能荒谬绝伦地把一个任务和另一个任务混淆起来呢？季诺维也夫和跟他一起的托洛茨基都荒谬绝伦地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混淆起来，这又能怨谁呢？他们只要看看众所周知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就会明白，决议对这个问题已经解释得很明白，甚至连苏联党校的学生也会感到满意。

季诺维也夫和跟他一起的托洛茨基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好几段话，其中说到外来的敌人可能摧毁我国的革命。但是，这些话和我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无关，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列宁同志说，我们还没有免除可能的武装干涉的保障，而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难道党什么时候说过，我们只凭本身的力量就能够保障我国免于武装干涉的危险吗？难道党过去和现在不是一直肯定地说，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才能保障我们免于武装干涉吗？怎么能**根据这一点**就武断说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是我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胜任的呢？现在应该停止这种对国外问题即同世界资产阶级直接斗争问题和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即战胜我国内部资本主

义成分问题有意的混淆了。

其次，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党宣言”中引出一句话：“共同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乃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个首要条件”，他把这句话和列宁同志一篇手稿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需要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那句话对照了一下，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党似乎违背了这些公认的、绝对的原理，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国际条件。同志们，这岂不可笑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们党曾经低估过国际工人阶级的努力和我国革命获得胜利的国际条件的决定意义呢？共产国际如果不是这种把无产者（不仅是各先进国家的，而且是世界各国的无产者）的努力联合起来以促进世界革命并发展我国革命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发起组织共产国际并成为共产国际的先进部队的，不是我们党又是谁呢？工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是既联合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努力，又联合所有一切国家的工人的努力又是什么呢？谁能否认我们党在执行全世界工会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所起的头等重要的作用呢？我国革命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支持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世界各国的工人过去和现在都以他们对我国革命的同情和反对武装干涉企图的斗争来支持我国革命，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不是把世界各国工人的努力联合起来使我国革命获得胜利又是什么呢？英国工人反对克逊臭名远扬的照会的斗争又是什么呢？苏联工人对英国煤矿工人的支持又是什么呢？同志们，如果有必要，我还可以引证许多这一类尽人皆知的事实。

这哪里是忘记了我们革命的国际任务呢？

秘密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秘密在于：季诺维也夫企图用世界各国无产者共同努力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来代替我国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来代替在现今的国际条件下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

脚这个根本问题。

季诺维也夫现在的老师托洛茨基说：

“……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

季诺维也夫现在的老师托洛茨基说：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我们的革命”第二七八页）

可见季诺维也夫是用欧洲和俄国的工人共同努力的问题来代替在欧洲无产阶级胜利（“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的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问题。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争论的也就是这一点。

季诺维也夫引证列宁的著作和“共产党宣言”，企图用一个问题来代替另一个问题。

季诺维也夫所耍的关于我们党“忘记了”我国革命的国际任务的把戏，其秘密就在这里。

季诺维也夫的戏法、糊涂想法和思想混乱的秘密就在这里。

季诺维也夫居然“谦逊地”把自己头脑中这种不可思议的糊涂想法，这种一团糟和思想混乱拿出来当做反对派联盟的“真正的”革命性和“真正的”国际主义。

同志们，这一切不是很可笑的吗？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真想做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者，就要用一切方法来巩固并竭尽全力来支持我们这个同时是共产国际先进部队的党。可是反对派分子在破坏并诽谤我们的党。

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做一个国际主义者，就要用一切方法来巩固并竭尽全力来支持共产国际。可是反对派分子在瓦解并破坏共产国际，在支持并指导各种各样的马斯洛夫分子和苏瓦林分子。

现在总该懂得了，同我们党，同这个共产国际的先进部队处于战争状态，是不能成为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鼓掌）

现在总该懂得了，他们既对共产国际开战，也就不再是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了。（鼓掌）

现在总该懂得了，反对派分子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国际主义者，而是空谈革命、空谈国际主义的家伙。（鼓掌）

现在总该懂得了，他们不是实际的革命者，而是空叫空喊的革命者，影片上的革命者。（笑声，鼓掌。）

现在总该懂得了，他们不是实际的革命者，而是银幕上的革命者。（笑声，鼓掌。）

四　托洛茨基伪造列宁主义

一、托洛茨基的戏法或“不断革命”的问题

我现在来谈谈托洛茨基的发言。

托洛茨基声明：不断革命论跟我们所讨论的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毫无关系。

这是很奇怪的，如果不讲得更重些。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不断革命论不是关于革命动力的理论吗？不断革命论首先论述我国革命的动力，这难道不对吗？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如果不是我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又是什么呢？怎么可以说不断革命论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耍花招，变戏法。这是企图藏起狐狸尾巴。这是企图隐藏自己的原形。白费气力！别想隐藏吧，反正是隐藏不了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说的另一个地方竭力“暗示说”，他早就不再认为不断革命论有重大意义了。而加米涅夫在他的演说中则“示意

说”，托洛茨基现在恐怕不反对抛弃不断革命论了，也许他已经把它抛弃了。

怪事，真是怪事！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说不断革命论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没有关系，这话对不对呢？如果不对，那末，加米涅夫说托洛茨基现在已不再重视不断革命论并且差不多已把它抛弃了，这话能不能相信呢？

我们来看看文件吧。我所指的首先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给奥里明斯基同志的信。这封信曾于一九二五年在报上发表过。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打算抛弃这封信上的观点，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抛弃它，因此，这封信现在还是完全有效的。这封信关于不断革命论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请听吧：

“我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全是我不对。在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计方面是我不对，而且是根本不对，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计高了，希望能够孤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但是，这个根本错误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而在那个时期无论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都是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观点的。当时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原则上并不怎么厉害，我并且希望（我在信件和报告里曾屡次表示过这种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不断革命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立场上，而且这在一九〇五年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列宁同志为考茨基的论俄国革命动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的整个路线）

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而我根据这个估计对两派所做的结论则是绝对不正确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由于自己的不调和的路线，才把旧知识界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中的真正革命分子集

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只有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才可能那么迅速地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变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

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论战的文章分做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分析革命的内部力量和关于革命的前途（见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的文章，另一面是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的斗争等等的文章。第一类文章，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来，因为这些文章从一九一七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第二类文章显然是错误的，不值得再版了。”（“列宁论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版，附有奥里明斯基同志的序言）

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托洛茨基在组织问题上错了，而在对我国革命的估计问题上，在不断革命问题上，他过去和现在都是对的。

固然，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是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但是这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

其次，这就是说，这两派，无论是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都应该接受不断革命论，但是事实上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有工人和旧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而且他们也不是一下子就接受，而是“从一九一七年起”才开始接受的。

最后，这就是说，不断革命论“从一九一七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

现在，请你们自己判断吧，这像不像托洛茨基已经不很重视不断革命论了呢？不，不像。相反地，假如不断革命论“从一九一七年起”真的符合党的立场，那末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托洛茨基过去认为、现在还继续认为这个理论对我们全党具有决定的意义。

但是，“符合”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证明了以列宁为代表的我们

党一直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那末，这个理论怎么能够符合我们党的立场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党不曾有过自己的理论，后来为事势的发展所迫，不得不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或者是我们党本来有自己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从一九一七年起”就不知不觉地被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排挤掉了。

这个“疑团”，托洛茨基后来在他一九二二年给“一九〇五年”一书写的“序言”里给我们做了解释。托洛茨基说明了不断革命论的实质，并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来分析对我国革命的估计，而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虽然事隔十二年，但这个估计还是全部证实了。”（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序言”）

换句话说，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所构成的”不断革命论，经过了十二年，在一九一七年就“全部证实了”。

但是，这个理论怎么能证实了呢？而布尔什维克呢，他们藏到哪里去了？难道他们没有任何自己的理论就干起革命来了吗？难道他们的本领就只是会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工人吗？还有：他们是在什么基础上、根据什么原则来团结工人的呢？布尔什维克不是有过理论，有过对革命的估计、对革命动力的估计吗？难道除了不断革命论，我们党就不曾有过任何别的理论吗？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布尔什维克过去是在没有前途、没有革命理论的情况下生存并发展的；我们从一九〇三年起就这样混到了一九一七年；后来，“从一九一七年起”，不知不觉地吞下了不断革命论，这才站住了脚。不容争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童话。但是，这件事怎么能在党内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地、没有波动地就过去了呢？这件事怎么能够这样简单地、无缘无故地就发生了呢？大家都知道，列宁和他的党是从不断革命论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和这个理论进行了斗

争的。

然而这个“疑团”，托洛茨基在另一个文件里给我们做了解释。我指的是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给“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所写的“说明”。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那篇“说明”里有关的一段话：

“孟什维克由‘**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个抽象的概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应该迁就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直到由自由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布尔什维克也由‘**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种空洞抽象的概念出发，认为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要自愿地去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限制。不错，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方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具有极大的危险。”（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五页）

这样说来，不仅孟什维主义有它的反革命方面，而且连布尔什维主义也没有摆脱“反革命特性”，而这种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具有极大的危险”。

布尔什维克后来是不是摆脱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呢？如果是摆脱了，那末是怎样摆脱的呢？

这个“疑团”，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的“说明”里给我们做了解释。

请听吧：

“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不是没有经过内部斗争的）思想上的改造。”（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五页）

总之，“从一九一七年起”，根据不断革命论，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改造”，因此，布尔什维克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中

解救出来，不断革命论就这样终于“全部”“证实了”，——这就是托洛茨基的结论。

但是，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布尔什维克对我国革命及其动力的估计等等都藏到哪里去了呢？这些理论和估计或者没有“全部证实”，或者完全没有“证实”，或者为了党的“改造”而让位给不断革命论，自己却销声匿迹了。

总之，从前世界上有过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从一九〇三年“起”勉勉强强“拼凑了”一个党，但是没有革命的理论，他们从一九〇三年“起”摸索来摸索去，勉勉强强混到一九一七年，后来发觉托洛茨基手里捧着不断革命论，于是决定进行“改造”，而在“改造”之后，就把列宁主义即列宁的革命理论丢得干干净净，这样就使不断革命论“完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了。

同志们，这是很有趣的童话。不妨说，这是在马戏团里可以看到的精彩的戏法之一。但是，要知道我们这里不是马戏团而是我们党的代表会议。要知道我们也没有依托洛茨基来当马戏演员。变这种戏法有什么用呢？

列宁同志怎样评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呢？列宁在他一篇文章里谈到这个理论，嘲笑它是“奇特的”、“漂亮的”理论。他写道：

“阐明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是革命政党的首要任务……　这个任务，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里解决得不正确，他重复着他的一九〇五年的‘奇特的’理论，而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什么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这个漂亮的理论。

托洛茨基的奇特的理论从布尔什维克这里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并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从孟什维克那里摄取了‘否认’农民作用的思想”……　这样“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俄国那些把‘否认’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

工人政治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可见在列宁看来，不断革命论是忽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革命作用的半孟什维主义理论。

只是不明白这种半孟什维主义理论怎么能够——即使是“从一九一七年起”——“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

我们党怎样评价不断革命论呢？请看众所周知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这个理论是怎样写的：

“‘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这一论断，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论断是要使苏联无产阶级在目前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列宁同志反驳这一类的‘理论’说：‘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评苏汉诺夫的札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

可见不断革命论就是列宁同志在他的“论我国革命”的札记中痛斥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那个苏汉诺夫主义。

只是不明白这种理论怎么能够“改造”我们布尔什维克党。

加米涅夫在他的演说中“示意说”，托洛茨基放弃了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他从托洛茨基写给反对派分子的最近一封信（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引了下面一段极其含糊的话来证实这一点：

“我们认为经验已经不可辩驳地证明了，在一切多少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无论我们中间有谁和列宁发生分歧，真理一定在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方面。”

然而，加米涅夫对于托洛茨基随即在同一封信里所作的推翻上述

声明的声明却只字不提。这个声明是：

“列宁格勒的反对派坚决反对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它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九月的信，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和十一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的附件）

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声明既然把第一个声明推翻了，那末，他那语意含糊、毫不负责的第一个声明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断革命论是什么呢？就是列宁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否定。

列宁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加米涅夫从托洛茨基的信里摘引了第一段话，而对第二段话却只字不提，他是想迷惑并欺骗我们党，这还不明显吗？

但是，欺骗我们党可不那么容易。

二、玩弄引文或托洛茨基伪造列宁主义

同志们，你们是否注意到托洛茨基的整篇演说里堆满了摘自列宁著作的各种各样的引文？读了这些从列宁的不同文章中割裂出来的引文，还是不明白托洛茨基的主要意图是什么，是想靠引文来巩固自己的立场呢，还是想“抓住”列宁同志的“矛盾”？他从列宁的著作中摘录了一大堆论述武装干涉的危险只有在几个国家革命获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克服的引文，看来是想藉此“揭穿”党的立场的。但是他不懂得，或者是不愿意懂得，这些引文并不是反对党的立场而是拥护党的立场、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的，因为党对外来危险比重的估计和列宁的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他又摘录了论述没有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不可能获得**完全胜利**的另一大堆引文，力图加以玩弄。但是他

不懂得，或者是不愿意懂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有免除武装干涉的保障）和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不懂得，或者是不想懂得，他摘自列宁著作的这些引文，并不是反对党而是拥护党、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的。

托洛茨基摘录了一大堆与问题无关的各种引文，但不愿意谈到列宁那篇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主要文章（一九一五年），他大概以为加米涅夫已经用自己的发言使他平安地从这篇批判他的文章里脱身出来了。但是，现在可以认为已经完全证实加米涅夫并没有演好他自己的角色，列宁同志的文章依然非常有力。

其次，托洛茨基又从列宁同志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引了一段话，说他们对于当前政策中的农民问题没有分歧意见。但是，他忘记说，列宁这篇文章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提到托洛茨基和列宁**由于我国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在农民问题上发生分歧的问题。

其实这说明托洛茨基摘录引文变成了毫无意思地玩弄引文。

托洛茨基企图证明，在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我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是和列宁的立场“符合”的。但是，怎么能够证明那无法证明的事情呢？

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点，和托洛茨基的“……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论点怎能相容呢？

其次，列宁的“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斯大林注）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个论点，和托洛茨基的“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①]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的论点怎能相容呢？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最后，列宁的“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联合农民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论点，和托洛茨基的“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的论点怎能相容呢？

再看，在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立场和孟什维克奥·鲍威尔的立场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奥·鲍威尔认为：“在无产阶级仅占人口极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只要全国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无产阶级就必然会重新丧失自己的统治”，“只有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才能保障工业社会主义”在俄国的“长期统治”。

托洛茨基对鲍威尔比对列宁要接近得多，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托洛茨基的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立场，托洛茨基实际上否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难道不对吗？

托洛茨基说现在的欧洲已不是保守的而多少是自由的，假如欧洲还真是保守的，那末我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了。他企图用这样的议论来论证他的在保守的欧洲面前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论点。但是，托洛茨基在这里糊涂到了极点，这难道很难了解吗？把现在的，比如意大利，或者英国，或者法国究竟算做保守的还是自由的呢？现在的美国究竟是保守的还是自由的国家呢？这样“精细地”和可笑地强调保守的欧洲和“自由的”欧洲的区别，对于我们共和国的完整能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共和制的法国和民主制的美国，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时期，没有像君主制的和保守的英国一样来干涉我们国家吗？

托洛茨基关于中农问题讲得特别多。他从列宁在一九〇六年时期的著作中引了一段话。列宁在这段话里预言**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一部分中农可能跑到反革命方面去。看来，托洛茨基力图藉此证明这

段引文是和他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农民问题的观点“符合”的。不难了解，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把不能比较的东西拿来比较。托洛茨基惯于把中农看做“自在之物”，看做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但是，布尔什维克对中农从来没有这样的看法。

托洛茨基大概忘记了布尔什维克对基本农民群众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用的，第二个方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用的，第三个方案是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用的。

在第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说：和全体农民一道，中立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和地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第二个时期，布尔什维克说：和贫苦农民一道，中立中农，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中立中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把中农放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监视之下，不信任他们，并采用一切办法使他们不能脱出我们的手。

在第三个时期，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布尔什维克说：和贫农一道，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反对我国城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

谁混淆这三个方案，混淆这反映我国革命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种不同路线，谁就丝毫也不懂得布尔什维主义。

列宁说，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有一部分中农会投到反革命方面去，这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在“乌发政府”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当时在伏尔加河流域有一部分中农投到反革命方面，投到富农方面去了，而大部分中农则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并且也不会不这样。中农之为中农，正因为他们观望等待，犹豫动摇：“谁知道哪一方面会胜利呢，还是等一等好。”只是在对国内反革命取得最初几次重大胜利以后，特别是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中农才开始确定地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显然，他们已经确信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强大的，和这个政权合作是唯一的出路。正是在这

个时期，列宁同志说了有先见之明的话：“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所考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我们应当以这种规则和指示为准绳而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四页至第一二五页）

中农问题就是这样。

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形而上学地对待中农问题，把中农看做“自在之物”，因而使问题混乱不清，歪曲并伪造了列宁主义。

最后，问题决不在于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还可能同一部分中农发生矛盾和冲突。党和反对派的意见分歧决不在这上面。意见分歧在于：党认为这些矛盾和可能发生的冲突用我国革命本身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则认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够克服。

托洛茨基玩弄引文，企图把这些意见分歧藏到什么角落里去。但是我已经说过，要欺骗我们党是办不到的。

那末，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要做一个辩证论者而不要做一个魔术家。可敬的反对派分子，你们向列宁同志学学辩证法，读读他的著作是会有用处的。（*鼓掌，笑声。*）

三、“小事”和笑话

因为在提纲里说革命“本身”是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就责备我这个提纲起草人。托洛茨基认为这样看待革命是形而上学的。我绝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为什么在提纲里说革命“本身”是社会主义革命呢？因为这样就可以着重指出在对我国革命的估计上我们党和反对派的观点之间的全部差别。

这种差别在哪里呢？在于党把我国革命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种具有能够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斗争的独立力量的革命，而反对派却把我国革命看做未来的、尚未胜利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赠品，看做未来的西方革命的“附属品”，看做一种没有任何独立力量的东西。只要把列宁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估计和反对派联盟的估计比较一下，就会了解这两种估计之间的全部差别。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最有主动性的力量，它组织了社会主义经济之后，接着必然去直接援助世界无产阶级，去和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相反地，反对派却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消极的力量，认为这一消极力量正提心吊胆地生活着，担心“在保守的欧洲面前”将立即丧失政权。

使用“形而上学”这个字眼是为了用它来遮掩反对派对我国革命所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估计的真面目，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其次，托洛茨基说我用另一个比较确切和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的公式代替了一九二四年我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所提的不确切和不正确的公式。托洛茨基似乎不满意我这样做。为什么，根据什么，——他却始终没有说。我修正了不确切的公式而代之以确切的公式，这有什么不好呢？我绝不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如果某个同志犯了错误，后来自己承认错误并改正了错误，我想，这对党只会有好处。托洛茨基着重指出这个事实，他究竟想说明什么呢？也许他想学习好榜样，终于想改正自己的许许多多错误吧？（鼓掌，笑声。）好吧，在这件事情上如果需要我帮忙，我愿意帮他的忙，愿意推动他并且帮他的忙。（鼓掌，笑声。）可是看来托洛茨基是在追求另外一个什么目的。如果这话是对的，那末我必须说，他的企图是手段拙劣的企图。

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说里要人相信，他并不是一个像党的多数的代表所描绘的那样坏的共产党员。他从自己的文章里引了许多段话，证明他托洛茨基过去和现在都承认我们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并

不否认我们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此等等。嘿，这算什么新闻！托洛茨基要是否认我们工作、我们国营工业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那就太不像话了。这些事实现在大家都承认，连纽约的交易所，连我国的耐普曼都承认，更不用说奥·鲍威尔了。现在无论敌人或朋友，大家都看到我们并不像资本家那样建设工业，我们在我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发展中放进了某些和资本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新因素。

不，可敬的反对派分子，现在问题不在这里。

现在的问题比反对派联盟所能设想的要严重得多。

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在于尽管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尽管有期待无产阶级专政毁灭的内外敌人，我们仍旧要建成整个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于使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内获得完全胜利。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小事和笑话。现在对党用些小事和笑话是搪塞不了的。现在党所要求于反对派的要大一些。

或者你们勇敢些，能够公开地老实地放弃自己的原则错误；或者你们不这样做，那就要接受党对你们的立场所做的正确的评价：你们的立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立场。

二者必居其一。

怎样选择，让反对派分子自己决定。（喊声：“对！”鼓掌。）

五　反对派的实践纲领。党的要求

反对派首领们试图从玩弄引文转到谈论带实践性质的分歧上去。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像季诺维也夫一样，企图把这些分歧归结成几条，同时断言重要的不是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实践上的分歧。然而我应当说，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反对派把我们的分歧所归结成的几条中没有一条

是客观的，是完全的。

你们想知道我们在实践上的分歧是什么吗？你们想知道党所要求你们的是什么吗？

请听吧：

（一）党不能再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每当占少数时，就跑到大街上，宣布党内发生危机，攻击党。对于这种行动，党再不会容忍了。（喊声：“对！”鼓掌。）

（二）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失去在我们党内获得多数的希望时，就搜罗和聚集各色各样的不满分子作为组织新党的材料。对于这种行动，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了。（鼓掌）

（三）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诬蔑党的领导机关，破坏党内制度，破坏党的铁的纪律，在派别自由的旗帜下，联合各种各样为党所斥责的派别组成新党。党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鼓掌）

（四）我们知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很多困难。我们看到这些困难，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反对派在克服这些困难方面的任何帮助我们都会欢迎的。但是，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你们企图利用这些困难来使我国的情况恶化，来进攻党，来袭击党。（鼓掌）

（五）党比所有的反对派加在一起都更了解，只有在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工业化的进展和社会主义的建成才是可能的。党现在和将来都要采取一切办法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是，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跑到大街上作煽动性的声言，说要马上提高工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反对派明明知道把工资提得这样高，目前工业还负担不起，明明知道这种煽动的目的不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而在于助长劳动者的落后阶层中的不满情绪，造成反党即反对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不满情绪。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喊声：“对！”鼓掌。）

（六）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今后继续破坏工农结合的基础即工农联盟的基础，宣传提高出厂价格并加重农民纳税负担的思想，企图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构成”无产阶级国家**剥削**农民的关系而不是经济**合作**的关系。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鼓掌）

（七）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反对派分子今后继续在党内制造思想混乱，夸大我们的困难，助长失败情绪，鼓吹我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破坏列宁主义的基础。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喊声：“对！”鼓掌。）

（八）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虽然这不单是党的事情而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事情）你们今后继续和共产国际捣乱，瓦解它的支部，破坏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党不能容忍也不会容忍这种行动了。（鼓掌）

这就是我们在实践上的分歧。

这就是反对派联盟的政治纲领和实践纲领的本质，也就是我们党现在所竭力反对的东西。

托洛茨基在他的演说里叙述了这个纲领的某几条，又竭力掩藏了其他几条，然后问道：这里面哪一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呢？好一个奇怪的问题！可是我倒要问：这里面，在反对派联盟的这个纲领里面，哪一点是共产主义的呢？这里面哪一点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呢？反对派联盟的实践纲领是离开列宁主义而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这难道不明显吗？

可敬的反对派分子，你们曾经想知道党要求你们什么，现在你们已经知道党要求你们什么了。

或者你们履行这些条件，这些同时就是我们党完全统一的条件；或者你们不这样做，那末，党昨天打败了你们，明天就要开始彻底粉碎你们。（鼓掌）

六 总 结

我们党内斗争的总结即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手头有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九月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对于我们党内斗争的总结有某种揣测的企图，它对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前途有某种预测和某种描绘。这个文件说：

“联合起来的反对派，在四月和七月曾经表明，而且在十月还要表明，在粗暴而恶意的攻击之下，他们的观点的一致只会巩固起来，党也会明白，只有依据联合起来的反对派的观点才能摆脱目前严重的危机。”（一九二六年九月托洛茨基给反对派分子的信，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和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的附件）

你们可以看出这差不多是预言。（喊声：“正是差不多。”）这差不多是纯粹马克思主义式的诚语，是整整两个月以后的事情的预见。（笑声）

当然，这个文件有点夸大。（笑声）例如这个文件说我们党目前有严重的危机。但是，谢天谢地，我们还活着而且很健康，甚至还没有觉察到什么危机。当然，某种危机是有的，但不是党的危机而是某个派别的危机，就是那个叫做反对派联盟的派别的危机。可是，绝不能把一个小派别的危机说成拥有百万党员的党的危机。

其次，托洛茨基的文件里说，反对派联盟正在巩固而且将来要更加巩固。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些夸大。（笑声）决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反对派联盟正在瓦解，反对派中的优秀分子正在脱离它，它被内部矛盾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例如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正在脱离反对派联盟，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热烈鼓掌）这是偶然的吗？

最后，托洛茨基的文件里说，只有依据联合起来的反对派的观点才能摆脱目前的危机。我认为托洛茨基在这里也有一些夸大。（笑声）

反对派分子不会不知道，党不是在反对派联盟的观点的基础上，而是在同这些观点的斗争中，在反对这些观点的斗争中，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和团结一致的。托洛茨基文件中的夸大是明显的。

但是，同志们，如果撇开托洛茨基在他的文件里所做的这一切夸大，那末，实在说，他的预测就似乎什么也没有了。（全场大笑）

由此可见，结果是和托洛茨基在他的预测中给我们描绘的那个总结相反的。

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

季诺维也夫有一个时候夸口说，他会把耳朵贴在地上，（笑声）当他把耳朵贴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听到历史的脚步声。很可能事实上真是这样。但有一点还是应当承认的，会把耳朵贴在地上并听到历史的脚步声的季诺维也夫，有时却听不到某些“小事”。也许反对派确实会把耳朵贴在地上并听到像历史的脚步声那样了不起的东西。但是不能不承认，反对派会听到了不起的东西，却听不到这件“小事”：党早已不理睬反对派了，反对派已一筹莫展了。这一点他们却没有听到。（喊声：“对！”）

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反对派的耳朵大概有毛病。（笑声）

因此，我要奉劝可敬的反对派分子，治一治你们的耳朵吧！（热烈鼓掌多时。全体起立欢送斯大林同志。）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真理报”第二六二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8卷第216—259页

论 中 国 革 命 的 前 途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同志们！在谈到本题以前，我认为必须声明，关于中国问题，我手头缺乏展示中国革命全貌所必需的详尽材料。因此，我不得不只谈几点带原则性的和中国革命基本方向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般意见。

关于中国问题，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我认为所有这些文件虽然各有长处，可是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们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我认为首先必须注意这些缺点。因此，我的意见将同时带有批判性质。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

列宁说过，中国人在最近期间将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某些同志把这句话了解为在中国人那里一定会一模一样地重演我们俄国一九〇五年所发生过的事情。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列宁根本不是说中国革命将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翻版。列宁只是说中国人将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这就是说，除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一般特点外，中国革命将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一定会给中国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别标记。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

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这就是它首先和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不同的地方。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的军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的命脉即铁路、工厂、矿山、银行等都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配或控制之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作斗争的问题不能不在中国革命中发生重大作用。这就使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无产者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直接连接起来。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它比一九〇五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软弱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业的命脉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里，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不软弱和落后。在这一方面，米夫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中国革命特有的事实之一，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

同时不应该忘记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帮助必然使中国无产阶级易于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

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就是如此。

二　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

上述提纲的第一个缺点是它们都忽略了或低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问题。要是细读这些提纲，就可能认为目前中国其实并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只有北军对南军的战争，或一派军阀对另一派军阀的战争。并且有些人惯于把干涉了解为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外国军队开入中国境内的事实；如果没有这种事实，那就不是干涉。

同志们，这是极严重的错误。干涉决不限于军队入境，而军队入

境也决不是干涉的主要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现今革命运动的条件下，在外国军队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许多抗议和冲突的时候，干涉已带有比较圆滑的性质和比较隐蔽的形式。帝国主义在现今的条件下进行干涉，偏重于采取在附属国内组织内战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帝国主义者喜欢把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弗兰格里反对俄国革命的斗争描绘为纯粹的国内斗争。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不仅我们，连全世界都知道，站在这些反革命的俄国将军背后的是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假使没有他们的支持，俄国根本不会有严重的内战。关于中国也必须这样说。假使各国帝国主义者不鼓励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假使各国帝国主义者不供给他们款项、军械、教官、“顾问”等等，这些反革命军阀反对中国革命的斗争简直是不可能的。

广东军队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们有思想，有热情，这鼓舞着他们为解除帝国主义的羁绊而斗争，在于他们给中国带来解放。中国反革命军阀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们背后站着各国帝国主义者，站着中国所有一切铁路、租界、工厂、银行和洋行的老板。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或者甚至并不在于外国军队的入境，而在于各国帝国主义者给予中国反革命的援助。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主要特点。

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中国革命也正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这一事实。

因此，谁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事实，谁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国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

据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广东派和整个中国革命有表示“好感”的某些迹象。据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同志们，这是自己骗自己。必须善于区别帝国主义者（包括日、美帝

国主义者）的政策的本质和它的伪装。列宁常说：革命者很难被棍棒和拳头制服，可是，他们有时却很容易被亲善制服。同志们，永远不要忘记列宁说的这个真理。不管怎样，显然日、美帝国主义者倒很好地领会了这个真理的意义。因此，必须把帝国主义者对广东派的亲善和恭维跟下述事实严格地区分开来：殷殷地表示亲善的帝国主义者紧紧地抓住“自己”在中国的租界和铁路，无论如何不肯放弃。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对于上述提纲的第二个意见是关于中国革命军队的问题。因为军队问题在这些提纲中都被忽略或低估了。（有人喊道：“对！”）提纲的第二个缺点就在这里。通常不是把广东军队的北进看做中国革命的展开，而是看做广东军阀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战争，看做一些军阀和另一些军阀争雄称霸的战争。同志们，这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在今年五月或六月以前，有人估计冯玉祥军队失败后中国的局势是反动势力得势，可是后来，在今年夏天，当广东派常胜军向北推进而占领湖北时，局面就根本改观而有利于革命了，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点和极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从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差的人民举行起义，他们和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竭力瓦解这种军队，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军队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一九〇五年我们俄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

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

这就是为什么对革命军队的过低估计是上述提纲的不可容许的缺点。

由此应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因为和国民党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各种各样的军阀现在都依附广东派，依附这个正在摧毁中国人民公敌的力量，而他们在依附广东派时，也把腐化作风带进了军队。要使这种“同盟者”不发生坏影响，或者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国民党人，只有加强政治工作并建立对他们的革命监督才能办到。不这样做，军队就会陷于极困难的境地。

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要使中国革命军队循着正确道路迳向目的前进，其保证就在这里。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第三个意见是提纲中对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性质的问题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不足。米夫在他的提纲中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他的贡献。但是他在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怕什么，不敢把问题彻底阐明。米夫认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

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期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革命的政党。这是不是说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政权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政权，而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里有根本的差别。

麦克唐纳政府甚至是“工人的”政权，但它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因为它是以保存英国的帝国主义政权例如在印度和埃及的政权为基础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优于麦克唐纳政府的地方就是它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

问题不仅在于广东政权（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首先在于这个政权是并且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

列宁说得对，既然从前，在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前，民族解放运动是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那末现在，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个特点米夫没有估计到。

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一九〇五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有一个差别，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

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

这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的方向。

下面三种情况有利于这条革命的发展道路：

第一、中国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它将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第二、中国的大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比一九〇五年时期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更软弱，这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政党对中国农民的领导易于实现；

第三、中国革命将在可能利用苏联胜利了的革命的经验和帮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

这条道路是否一定胜利并且绝对胜利，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正是为中国革命的这条发展道路而斗争。

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怎样对待国民党和中国未来革命政权这个问题上的任务。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呢？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参加。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

真正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证之一就在这里。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第四个意见是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米夫认为必须立即提出成立苏维埃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口号。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米夫往前跑得太远了。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而且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的问题现在还不是迫切的问题。此外，必须注意：不能脱离环境来看苏维埃。苏维埃，这里说的是农民苏维埃，只有在中国已处于摧毁旧事物并创造新政权的农民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并且估计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

的阶段，才组织得成。可以不可以说中国农民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呢？不，不可以。因此，现在谈苏维埃就是往前跑得太远了。因此，现在应该提出的不是苏维埃的问题，而是成立农民委员会的问题。我是指由农民中选举出来的农民委员会，这种农民委员会能够规定农民的基本要求，并将采取一切办法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这种农民委员会应当成为一种枢轴，使农村中的革命在其周围展开。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提纲起草人，特别是谭平山和拉费斯说得完全正确，他们断言立即满足农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我认为现在应该打破某些国民党分子行动中所表现的对农民的冷淡和“中立”了。我认为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也就是广东政权）都应当立即从言论转到行动，提出立刻就满足农民最切身要求的问题。

在这方面前途会怎样，可以而且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这要看革命的进程而定。我以为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誓死拒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

为了唤起中国千百万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者应当走哪些道路呢？

我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可以谈到的只有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成立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者加入这种委员会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有人喊道：“可是农民协会呢？”）我认为农民协会将聚集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或者把农民协会变成农民委员会，使它具有为实现农民的要求所必需的某种权力。关于这条道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只有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如果以为中国有足够

的革命者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可笑了。中国约有四亿人口。其中约三亿五千万是汉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如果以为几万个中国革命者就能汲干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那就弄错了。这就是说，还需要其他道路。

第二条道路就是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关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无疑地，在新解放的省份里将成立广东政权这种类型的新政权。无疑地，这种政权和这种政权的机关，如果要真正推进革命，就应当设法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和一般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加入新政权机关，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并通过这个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

第三条道路就是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我已经讲过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极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军队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它第一个打进新的省份，它第一个深入农民群众，农民首先凭它来判断新政权，判断新政权质量的好坏。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态度，首先是看革命军队的行为，看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看它帮助农民的决心而定的。如果注意到有不少可疑分子混进了中国革命军队，这些分子可能使军队的面貌变坏，那就可以明白军队的政治面貌以及它的农民政策在农民心目中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一般中国革命者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军队中反农民的分子不发生坏影响，保持军队的革命精神，并做到使军队帮助农民，唤起农民参加革命。

据说在中国，人们都热烈欢迎革命军队，但是后来，在军队驻扎下来以后，就有些失望了。我们苏联在国内战争时期也有过同样的情形。这是由于军队解放了新的省份而在那里驻扎下来的时候，不得不这样或那样地靠周围的居民来养活。我们苏联革命者通常用如下的方法能够弥补这些缺点：我们竭力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必须

使中国革命者也学会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来弥补这些缺点。

六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第五个意见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问题。我认为在提纲中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得不够。拉费斯问道：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面向谁——面向国民党的左派还是中间派？奇怪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当面向无产阶级，并使中国解放运动的活动者都面向革命。只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正确。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而举行罢工是不应该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喊声：“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纲中应当指出这一极端不好的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势，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如果这样，中国还要革命做什么呢？在罢工时期，无产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无论如何必须消灭这种中世纪的祸害，使中国无产者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使他们能够领导革命运动。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为了认真改善他们的地位而提出的经济和法权的要求，应当在提纲中占有适当地位。（米夫说：“在提纲中已经说到这一点。”）是的，在提纲中已经说到这一点，但是可惜这些要求提得不够突出。

七　中国的青年问题

第六个意见是关于中国的青年问题。真奇怪，提纲中竟没有考虑

到这个问题。然而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谭平山的报告中讲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可惜讲得不够突出。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使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话，都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量[①]。必须注意，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就尽力加强青年工作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应当尽量估计到这种情况。在中国问题的提纲中，青年应当占有自己的地位。

八　几个结论

我想就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农民问题方面指出几个结论。

无疑地，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能只限于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了。现在甚至连张学良这样的反革命者也赞成这个要求了。显然，中国共产党应当更进一步。

其次，必须在自己面前提出铁路国有的问题作为远景。这是必要的，而且应该向这一方面做去。

再其次，必须注意到把最重要的工厂收归国有的远景。在这方面首先摆着的问题是把那些对中国人民特别仇视和特别富于侵略性的业主的企业收归国有。接着必须把农民问题向前推进，使它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我认为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

——————————————

① 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人和或多或少左倾的国民党人的联盟，执行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政策。后来这种政策由于不再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而被取消了，因为国民党已经离开了革命并且后来变为反对革命的中心，而共产党人则与国民党决裂，退出了国民党。——著者原注

其余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同志们，我想提出的意见就是这些。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共产国际”杂志第十三期
（总第七十一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8卷第260—271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节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六日）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十日、
十九日、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二八五、第二八六、
第二九四、第二九五和第二九六各号

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月七日报告）

一　几点预先的说明

同志们！在讲到问题的实质以前，让我先作几点说明。

一、党内发展的矛盾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内斗争的问题，这个斗争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停止。

如果考察我们党自诞生以来，自一九〇三年布尔什维克派形成以来的历史，并探讨我们党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的各个阶段，那末，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克服这些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巩固我们党的历史。也许

有人以为俄国人太好吵架，喜欢争辩，爱闹意见，所以他们的党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发展的。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里问题不在于好吵架。这里问题在于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是在党的发展的进程中，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发生的。这里问题在于：只有为一定的原则、为一定的斗争目标、为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而斗争，才能克服矛盾。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不同想法的人作各种妥协。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有关，则任何妥协、任何“中间”路线都无济于事。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不能有“中间”路线。应当成为党的工作基础的不是这些原则，便是另一些原则。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

西方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怎样生活和发展的呢？它们有没有党内矛盾，有没有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呢？当然有。它们有没有在党员群众面前诚恳坦白地揭露这些矛盾并竭力克服这些矛盾呢？没有，当然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是要把这些矛盾和分歧掩盖起来，隐藏起来。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是要把自己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变成空洞的粉饰太平的集会，竭力隐藏和掩饰内部的意见分歧。但是，这除了引起思想混乱并使党在思想上贫困化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这就是过去是革命的而现在是改良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堕落的原因之一。

但是，同志们，我们是不能这样生活和发展的。原则上的“中间”路线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原则上的“中间”路线政策是衰颓的和蜕化的党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不能不使党变成空忙一阵和脱离工人群众的空洞的官僚主义机构。这条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我们党过去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个原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克服党内矛盾并在克服

这些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我们党的队伍的历史。

拿第一个时期，即“火星报”时期，亦即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来看，当时在我们党内第一次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党的上层终于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一部分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坡特列索夫）。列宁当时是孤立的。你们要知道，当时对于那些离开了列宁的“了不起的人物”曾发出多少叫喊和呼号！然而斗争的实践和党的历史表明，这种意见分歧是有其原则基础的，这种分歧是真正革命的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诞生和发展所必经的阶段。斗争的实践当时表明：第一、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质；第二、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统一，而在于统一要有原则基础。历史表明列宁是对的，而那些“了不起的人物”是不对的。历史表明，如果不克服列宁和“了不起的人物”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不会有真正革命的党。

拿下一个时期即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的时期来看，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作为两个政纲完全不同的营垒，仍然在一个党内处于互相反对的状态，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处于党的正式分裂的前夜，他们为了坚持我们革命的路线，不得不召开自己的单独的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党的布尔什维克部分当时何以占了上风，何以博得了党内多数的同情呢？这是因为它没有掩饰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并且用孤立孟什维克的办法来为克服这些分歧而斗争。

其次，我还可以举出我们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的时期，亦即一九〇七年的时期，当时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即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所谓“召回派”，背弃了布尔什维主义。这是我们党生活中的一个危急时期。这个时期有许多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离开了列宁和列宁的党。孟什维克当时大叫布尔什维克要灭亡。然而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灭亡，短短一年半的斗争实践表明，列宁和

列宁的党为克服布尔什维主义队伍中的矛盾而斗争，是正确的。这些矛盾之被克服，并不是由于掩饰了它们，而是由于揭露了它们，由于进行了有利于我党的斗争。

其次，我还可以举出我党历史的第四个时期，即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时期，当时布尔什维克已恢复了几乎被沙皇反动势力击溃的党并驱逐了取消派。这时，也像以往各个时期一样，布尔什维克之恢复并巩固了党，并不是由于掩饰了和取消派之间的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而是由于揭露了并克服了这些分歧。

再其次，我还可以指出我党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当时以布尔什维克党几个著名领袖为首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动摇了，不想举行十月起义，认为这是一种冒险。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之克服这个矛盾，也不是由于掩饰了意见分歧，而是由于为十月革命进行了公开的斗争。斗争的实践表明，如果不克服这些分歧，我们就会使十月革命陷于危急的境地。

最后，我还可以指出此后我们党内斗争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一九二一年（工会问题的争论）时期以及其他各个时期，这些时期你们都已知道，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知道，在所有这些时期中，也像过去一样，我们党是通过克服内部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结论就是：以斗争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联共（布）的规律，而不是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规律。这是不对的。这个规律是一切较大政党的发展规律，无论苏联无产阶级政党或西方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一样。如果在小国中的小党内可以用某种方法掩饰意见分歧，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威信把意见分歧掩盖起来，那末在大国中的大党内，通过克服矛盾而发展，就是

党成长和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我想在这里引证和马克思一起领导西方无产阶级政党达数十年的恩格斯的一段有权威的话。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当时德国施行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侨居伦敦，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外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实际上指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伯恩施坦当时是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没有变成改良主义者），恩格斯常常和他通信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中最迫切的问题。下面就是他当时（一八八二年）写给伯恩施坦的一段话：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只有在完全符合于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起来。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①]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坏蛋没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我们的人去谋取团结也是过于匆忙了。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库”第一册第三二四页至第三二五页）

————————————

①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政党。爱森纳赫派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在一八六九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拉萨尔派是拉萨尔思想的信徒。他们认为可用和平手段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马克思曾严厉批评过拉萨尔派。这两个政党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后来于一八七五年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成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拉萨尔派则为党内机会主义派。——译者注。

在另一个地方（一八八五年）恩格斯说道：

“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是以斗争来解决的。”（同上，第三七一页）

首先必须这样来解释我们党内矛盾的存在并说明我们党是以斗争的方法克服这些矛盾而发展起来的。

二、党内矛盾的根源

可是，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从何而来，其根源何在呢？

我想，无产阶级党内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用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离而站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我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这一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

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半无政府主义派和“极左派”的最好的土壤。

最后，第三个阶层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力求和资产阶级妥协，极爱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喜欢“出人头地”。这个阶层是滋长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最好的土壤。

工人阶级的这后两个阶层虽然在外表上有所不同，却或多或少是培养一般机会主义的共同园地，在工人贵族的情绪占上风时，养成公开的机会主义，而在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的工人阶级半小市民阶层的情绪占上风时，则养成以“左的”词句掩盖着的机会主义。“极左的”情绪和公开的机会主义的情绪往往是一致的，——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奇怪。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什维克的、露骨的机会主义的反对派的另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极左派”主张革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盼望革命**在明天**就胜利，那末很明显，如果革命一旦受到阻碍，如果革命在明天不能胜利，他们一定会悲观失望，对革命丧失信心。

自然，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

这就是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根源。

能不能避开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呢？不，不能。以为能避开这些矛盾，就是欺骗自己。恩格斯说得对：长期掩饰党内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这并不是说，党应当变成一个争论的俱乐部。相反地，无产阶级

政党是而且应当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仅仅想说，对党内的意见分歧，如果这些分歧是原则性的，不能把手一挥，把眼一闭，置之不理。我仅仅想说，只有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路线而斗争，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摆脱资产阶级的压力和影响。我仅仅想说，只有克服党内矛盾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起来。

二　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现在让我从几点预先的说明进而谈到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我们党内反对派的几个特点。我指的是它表面上的显而易见的特点，而暂不涉及意见分歧的实质。我想这些特点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是**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而不是什么“简单的”反对派。第二、反对派竭力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口号炫耀自己。第三、反对派由于自己没有一定的原则，往往抱怨别人不了解他们，反对派的首领们实质上代表着“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笑声）

先从第一个特点谈起。反对派在我们这里是作为**联合起来的**反对派，作为过去受过党的谴责的种种派别的联盟而出现的，并且它不是怎样“简单地”出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出现的，——这一事实用什么来说明呢？

这要用下面的情况来说明：

第一、结成联盟的一切派别，不论是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残余或是“工人反对派”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机会主义的派别，它们不是从产生时起就和列宁主义作斗争，便是近来才开始和列宁主义作斗争。不用说，这个**共同**特点一定促使它们结成联盟来进行反党斗争。

第二、目前这一时期是个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重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一切派别在某些革命问题上是和我们党有过意见分歧而且继续有意见分歧的，所以很自然，在目前这个时期所具有的总结性质，要清算我们的一切意见分歧，一定会推动这一切派别结成一个联盟，结成一个反对我党基本路线的联盟。不用说，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各色各样的反对派别联合成一个共同的营垒。

第三、一方面是我们党的强大有力和团结一致，一方面是一切的反对派别的软弱无力和脱离群众，这就不能不使这些派别的分散的反党斗争成为显然无望的事情，因此，各反对派别必然要走上把力量**联合起来**的道路，以便以各个集团的结合补救它们的弱点，这样，至少从表面上可以增加反对派成功的机会。

为什么领导反对派联盟的正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第一、因为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现有一切反对派别中最完整的机会主义派别（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是对的）。

第二、因为在我们党内没有一个反对派别能像托洛茨基主义那样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笑声）

在我党历史上，托洛茨基主义领导各种反对派别来反对我们党，这并不是第一次。我想举出我党历史上一个人所共知的前例，这是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发生的，当时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各种反党的反对派别的联盟，即所谓八月联盟。我所以要举出这个前例，是因为它是目前反对派联盟的某种原型。当时托洛茨基把取消派（坡特列索夫、马尔托夫等人）、召回派（“前进报派”）和他自己的集团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党。而现在他又企图把“工人反对派”、“新反对派”和他自己的集团联合成一个反对派联盟了。

大家知道，列宁当时反对八月联盟历时三年之久。在八月联盟形成的前夜，列宁就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破坏**党的**合法性**，走上**冒险**和**分裂**的道路……　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理所以默不作声，是由于真理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是不相容的。可是实际目的愈来愈明白，甚至连最没有远见的党员都看得很清楚了。这种实际目的就是**坡特列索夫分子和前进报派的反党联盟**，这个联盟正由托洛茨基支持和组织起来…… 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所召集的反党的代表会议，因为坡特列索夫先生们和前进报派先生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自己派别组织的自由，使派别组织神圣化，掩盖它们的活动，在工人面前为这种活动辩护。

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联盟是千真万确的**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不敢**说他把坡特列索夫和召回派看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做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性的真正维护者。冒险家立场的实质也就在于他不得不经常躲躲闪闪…… 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托洛茨基和坡特列索夫及前进报派的联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党的政治**任务上来看，这样说也是对的…… 中央全会以后一年来的经验在事实上说明：**体现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影响的，正是坡特列索夫集团，正是前进报派的派别组织…… 最后，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冒险行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破坏了党的合法性，而且代表一个国外集团（或代表呼声报派和前进报派这**两个**反党的派别组织的联盟）召开代表会议，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七卷第十三、十五、十七、十八各页）

这就是列宁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第一个反党派别联盟的批判。

对目前还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党派别联盟，基本上也必须给以

相同的但更加严厉的批判。

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目前作为一个联合起来的反对派出现，并且不是“简单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出现的原因。

反对派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此。

现在谈谈第二个特点。

我已经说过，反对派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力图以“左的”、“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行为。我认为在这里不必多举事实去证明在我们反对派的实践中经常是“革命的”词句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不一致。只要看看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论反对派的提纲，就足以明了这套把戏的秘诀。我只想从我们党的历史上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党内的一切反对派别，在取得政权以后的时期中，竭力以“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非革命的行为，不断“从左面”批评党和党的政策。

例如拿“左派”共产主义者来看，他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一九一八年）是反对党的。大家知道，他们“从左面”批评党，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并认为党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对帝国主义者妥协的政策。事实上却是这样：“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反对布列斯特和约时，妨碍了党获得“喘息”以组织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帮助了当时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使帝国主义易于在苏维埃政权萌芽时就把苏维埃政权消灭。

拿“工人反对派”（一九二一年）来看。大家知道，“工人反对派”也“从左面”批评党，百般“攻击”新经济政策，把列宁的要恢复工业必先发展供给工业以原料和粮食的农业这一论点“痛骂”得“体无完肤”，“痛骂”列宁这一论点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种农民的倾向。事实上却是这样：如果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如果不发展供给工业以原料和粮食的农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工业，而无产阶级就会丧失阶级性。此外，“工人反对派”此后向哪方面发展，

向右还是向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后，拿托洛茨基主义来看，它“从左面”批评我们党已有好几年了，而且如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正确指出的，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在小资产阶级倾向和真正的革命性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点呢？“革命的”词句在这里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掩盖物，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至于用“左的”叫喊来掩盖自己做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俘虏的“新反对派”，我就不谈了。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

它们说明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内部留下来的伟大的革命传统。这是由于苏联工人根本仇视反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这是由于我国工人不会轻信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对派用来至少在表面上吸引工人注意并使工人信任他们的钓饵。例如我国工人不能了解为什么英国工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想到把汤姆斯这样的叛徒溺死，把他们扔到井里去。（笑声）凡是知道我国工人的人都容易了解，像汤姆斯那样的人和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在苏联工人中间简直是无容身之处的。然而大家知道，英国工人不仅不打算把汤姆斯这帮先生们溺死，而且一再把他们选入总委员会，同时不是平平淡淡地选举他们，而是在选举时还举行游行示威。显然，对于这样的工人是用不着以革命的假面具掩盖机会主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反对把机会主义者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去。

这是由于什么呢？这是由于英国工人缺乏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的传统目前正在产生。它们正在产生和发展，而且没有理由怀疑英国工人正在革命战斗中受到锻炼。但是当这一点还不具备时，英国工人和苏联工人间的差别是依然会存在的。这也就说明了这一事实：我们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如不戴上某种“革命的”假面具便去接近苏联工人，那是很冒险的。

反对派联盟使用“革命的”假面具的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谈谈反对派的第三个特点。我已经说过，这个特点就是反对派联盟没有一定的原则，它没有原则性，它像变形虫一样地善变，因此，反对派首领们经常抱怨“人们不了解”他们，“曲解了”他们，把他们“没有说过”的话硬加在他们身上等等。这的的确确是“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特点（“人们不了解！”）是一般机会主义最平常和最普遍的特点。同志们，你们应当知道，在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著名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人的“遭遇”完全与此相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这些顽固不化的机会主义者曾经在好几年内抱怨“人们不了解”他们，“曲解了”他们。大家知道，当时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曾骂伯恩施坦的派别组织是“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因此，人们把反对派联盟列入“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一类，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反对派联盟的几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如此。

三　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现在谈谈意见分歧的实质。

我想，我们的分歧可以归结为几个基本问题。我不打算详细讲这些问题，因为时间很少，而报告又已拉得很长了。况且你们有了关于联共（布）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在翻译上虽然有些错误，但对我们党内意见分歧基本上仍能提供一种正确的观念。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问题，关于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彻尔诺戈里亚，也不是保加利亚，而是我们的国家，是苏联。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有过而且发展过帝国主义，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大工业，那里有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那里有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样，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否可能呢？靠我国内部力量，靠苏联无产阶级所拥有的条件，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呢？

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语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因此，当人们说在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说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课题时，问题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

假如这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说，虽然我国在技术上比较落后，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党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能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建设社会主义，并终于把它建成，那末党就应该继续掌握政权，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

以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或者是我们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那末，鉴于不能立即得到外援，即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支援，我们就应当老实地和公开地放弃政权，而采取在苏联组织未来的新革命的方针。

党能不能欺骗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是要被肢解的。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我们争得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建立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我们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的经济基础呢？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和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是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都心满意足呢？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质的庸俗的、市侩的见解。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

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在我国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建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问题整个摆在党的面前的时候，曾这样说：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代替的根本意义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正常的**社会主义基础。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〇页）

列宁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

但是，为了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有巨大的产品分配机关网，巨大的合作社机关网，即消费合作社和农业生

产合作社机关网。列宁在他的小册子“论合作制”中说到下面一点时，正是从这个原理出发的：

“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页）

那末，在我国被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只要看看他的小册子“论合作制”就可知道）。我国建设的全部实践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比重，无论在生产方面或流通方面，都由于私人资本比重的减少而逐年增加，同时我国经济中的私人资本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比较起来却在逐年降低。

可是反对派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们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

可见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可以认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

这是不是说可以把这种胜利称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最后胜利，这种胜利能保证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免除任何外来的危险，免除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以及与之相联的复辟的危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问题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问题。党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党告诉我们，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最后胜利，就必须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或至少使之中立。党告诉我们，这样的任务只有靠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在某一个国家内的最后胜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

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没有引起特别的意见分歧，因此，我就不多

讲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可以参看前几天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各个委员的我党中央的材料。

二、“喘息”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联目前所处的国际地位的条件问题，关于我国开始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这一“喘息”时期的条件问题。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生存。必须有一个摆脱战争的“喘息时机”，必须没有武装干涉企图，必须争取到为生存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某些起码的国际条件。

试问，如果已经证明武装干涉的危险存在着而且将来还会存在，证明这个危险只有在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才能消灭，那末，目前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而言的我国目前这种“和平”发展时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已经争得的、使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可能立即进行严重的武装干涉的、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必要的外部条件的这个“喘息”或“喘息”时期，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

目前的“喘息”时期至少是以下面四个基本事实为根据的。

第一、帝国主义者阵营内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减弱，这些矛盾使他们难以勾结起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还无力直接进行革命以反对本国资本家来支援苏联的无产者。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已经**无力推动“自己的”工人来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了，因为全世界

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正在增长而且不能不日益增长起来。而现在没有工人是不能进行战争的。

第四、苏联无产阶级的强大有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苏联红军的组织力量。

诸如此类的条件结合起来，便造成一个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目前国际地位的特点的“喘息”时期。

三、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某一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问题。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

假使世界各国无产者不同情和不支持苏维埃共和国，那会怎样呢？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受到武装干涉，就会被摧毁。

假使资本得以摧毁苏维埃共和国，那会怎样呢？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内最黑暗的反动时代就会到来，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就会受到摧残，国际共产主义的阵地就会被摧毁。

如果各国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和支持加强和增长起来，那将怎样呢？那将根本有助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不断扩大，那将怎样呢？那将根本改善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资本作斗争的革命阵地，将摧毁国际资本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阵地，将使世界无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取得胜利。

因此，应得出结论说，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是同各国革命

运动的利益和任务交织在一起并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反过来说，各国革命无产者的任务是同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任务和胜利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因此，把某个国家无产者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对立起来，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

因此，把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那种勤奋和热忱说成“民族闭关自守”和“民族狭隘性”的表现，像我们的反对派有时所做的那样，这不是失去了理智，就是害了幼稚病。

因此，把一个国家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跟各国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确立起来，乃是各国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手段和助力。

因此，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从事各国无产者的共同事业，就是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逐步造成对资本的胜利，因为苏联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及其发展的基础。

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历史

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所讨论的问题的历史。反对派硬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一九二五年才在我们党内第一次提出的。至少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曾直截了当地声明：“为什么要求在理论上承认一个国家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这个前途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

这样说来，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这个问题没有在我们党内提出过。

这样说来，只有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党内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是在一九二五年才提出的。

这对不对呢？不，不对。

我肯定地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还在一九一五年就由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我肯定地说，当时反驳列宁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我肯定地说，从那时起，也就是从一九一五年起，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在我们报刊上和我们党内就曾多次地论述过。

我们看看事实。

（甲）一九一五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列宁的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道：

“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①]，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而托洛茨基于同年（一九一五年）在他所领导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上反驳道：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九一五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列宁的上述论文就是在该报上发表的。——斯大林注）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①（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页至第九十页）

可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问题，早在一九一五年，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摆在日程上的时候，就由列宁提出来了。

可见当时反对列宁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显然知道列宁论文所指的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在一个国家内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

可见关于“民族狭隘性”的责难，早在一九一五年就由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来了，而且这个责难不是用来反对斯大林或布哈林，而是用来反对列宁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现在季诺维也夫也常常发出关于“民族狭隘性”的可笑的责难。但他大概不了解他是在重复并从而恢复托洛茨基旨在反对列宁和列宁的党的论点。

（乙）一九一九年。列宁的论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不管各国的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暗藏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怎样诬蔑，怎样造谣，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我国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全世界资产阶级所以猖狂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和阴谋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由于它完全懂得**要是不用武力压倒我们，我们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就必然获得胜利。可是资产阶级要这样来压倒我们是办不到的**。”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九十页）

可见列宁这篇论文中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是为了“共产主义胜利”而“改造社会经济”的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改造社会经济”呢？这无非是在一个国家即我们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

（丙）一九二一年。列宁的小册子“论粮食税”。关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这一著名的论点（见“论粮食税”）。

（丁）一九二二年。列宁同志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道：“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〇五页）。

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在其“和平纲领”的“跋”中加以反驳，而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没有直接指出他在和列宁进行论战。托洛茨基在这篇“跋”中说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的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引起了生产力的异常低落；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商务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等等，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显明的证据……**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①]（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二页至第九十三页）

托洛茨基在这里讲的“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反驳谁呢？当然不是反驳斯大林或布哈林。托洛茨基在这里是反驳列宁同志，并且他所反驳的不是别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

（戊）一九二三年。成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小册子“论合作制”。列宁在这本小册子中说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经过合作社，仅仅经过合作社，经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看来不能说得更明白了。

在托洛茨基看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列宁则肯定说，我们苏联无产阶级，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这两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事实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在一九一五年就已经在我们党内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是列宁亲自提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和列宁争论过并以“民族狭隘性”责难列宁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

可见从那时起直到列宁同志逝世为止，这个问题并未从我们党的工作日程上取消。

可见这个问题曾几次被托洛茨基以某种形式，即以掩蔽的但分明是和列宁同志争辩的形式挑起来，而且托洛茨基每次都不是本着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精神，而是以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精神来解释这个问题的。

可见托洛茨基硬说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谁也没有提出过，这是**公开的撒谎**。

五、目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现实性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惟有在目前，惟有在近来具有特别现实的性质呢？为什么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是偶然在个别的文章中讨论过，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这个问题却在我们党的实践中占了特别突出的地位呢？其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近几年来，其他国家的革命速度缓慢下来了，所谓“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到来了。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是否会削弱或甚至消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呢？由此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问题的注意就增加了。

第二、我们施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并实行了某种退却，以便重新部署力量，再行进攻。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否会削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呢？由此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就更加注意了。

第三、我们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赶走了武装干涉者，争得了摆脱战争的“喘息时机”，保证了和平，保证了为消灭经济破坏状态、恢复国内生产力和从事我国新经济建设提供有利条件的和平时期。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应该把经济建设导向哪一方面，导向社会主义方面还是导向别的方面呢？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把经济建设导向社会主义方面，是否有根据指望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条件下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呢？由此便引起了全党和整个工人阶级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问题的莫大注意。由此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便从增加工业、商业和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这一观点上每年对各种统计材料加以总结。

这就是说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于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以及对

于共产国际都是最迫切的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

反对派以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有理论上的意义。这是不对的。这是极糊涂的。这样论述问题只能说明反对派完全脱离了我们党的实践，脱离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脱离了我国的合作社建设。现在，当我们消灭了经济破坏状态，恢复了工业，并进入了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便具有莫大的实践意义。经济建设时期的事业应导向哪里，朝哪个方向建设，建设些什么，我们建设的前途应当怎样，这些问题如不解决，诚实的和细心钻研的经济工作人员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假使他们愿意真正自觉地和细心地来对待建设事业的话。我们从事建设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还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现在我们建设工作的根本问题。现时，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条件下，我们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这就是现在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看看小册子“论合作制”就可知道）。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而反对派呢？我已经说过，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已经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而现在不得不在这里重复一遍：反对派联盟的首领托洛茨基，还在不久以前，即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曾在其人所共知的告反对派书中声称：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见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把托洛茨基的这段话（一九二六年）和他在一九一五年所写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就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和列宁进行论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列宁同志和列宁主义者的“民族狭隘性”问题）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托洛茨基对于在一个国家内

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依然是站在自己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否定的立场上的。

正因为如此，党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六、关于革命的前途

第六个问题。第六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问题。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说道：“列宁认为在二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农民国家的落后性就是三十年也不能建成。最低限度也要三十年至五十年。”

同志们，我应当在这里声明，托洛茨基所臆造的这个前途和列宁同志指出的苏联革命的前途毫无共同之处。几分钟以后，托洛茨基本人就开始在他的演说中和这种前途作斗争。不过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应当声明，不论是列宁或党都不能对托洛茨基所臆造出来的这种前途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负责。托洛茨基捏造了这种前途，然后开始在自己的演说中和他自己的捏造作斗争，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托洛茨基糊涂已极并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

列宁根本没有说过在三十年或五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其实列宁说的是：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年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难。”（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页至第三〇三页）

能不能从列宁这一论点得出我们“在二十年至三十年或五十年内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呢？不，不能。从这一论点只能得出下列的结论：

（甲）在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保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取得胜利（即社会主义的胜利）；

（乙）这个胜利将不仅是苏联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丙）如果我们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取得胜利，这就说明我们被击溃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被白匪恐怖制度代替了，白匪恐怖制度可能延长二十年至四十年之久。

当然，对列宁这个论点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可同意可不同意的。但像托洛茨基那样地歪曲它是不行的。

“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这样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意义相同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是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严格地区别开来的。列宁谈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他的意思是说：我国社会主义的成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具有如此巨大的国际意义，它（胜利）不能局限于我国范围内，它定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它在时间上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能一致，那末，它无论如何也将掀起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导向世界革命胜利的强大运动。

如果指的是革命胜利的前途，则列宁所说的革命前途就是如此，其实我们党内所谈的也是如此。

将这个前途和托洛茨基的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混淆起来就是诬蔑列宁。

七、实际上问题是怎样的

第七个问题。反对派对我们说：好吧，但究竟和谁联盟好些，和世界的无产阶级还是和我国的农民呢？选择谁做同盟者最好呢，是世

界的无产阶级还是苏联的农民呢？于是事情被描绘成这样：好像在苏联无产阶级面前有两个同盟者，一个是世界无产阶级，它准备立即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但等着我们对此欣然同意；另一个是我国的农民，他们准备帮助苏联无产阶级，但不完全相信苏联无产阶级会接受这种帮助。同志们，这是问题的幼稚的提法。问题的这种提法，无论与我国革命的进程或与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力量对比，都毫无共同之处。请原谅我这样说，这样提问题的只能是贵族女学生，可惜事情并不像一些反对派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而且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我们会乐意接受两方面的帮助，假使这仅仅取决于我们的话。不，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问题是这样的：**既然**世界革命运动的速度缓慢下来，在西方还没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苏联无产阶级已掌握政权，一年年地巩固这个政权，把基本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并且顺利地巩固着自己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友好联系，那末，是否有理由否认虽然资本主义包围存在，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在我们国内继续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呢？

当然，如果不像反对派联盟那样从幻想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实际力量对比出发，那末现在问题就是这样。

党回答这个问题说，苏联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并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反对派却说：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①]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见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第二七八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托洛茨基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夺得政权，苏联无产阶级不仅不能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不能保持政权。

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意见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托洛茨基这个立场和孟什维克奥托·鲍威尔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可惜一点也没有。

八、关于胜利的机会

第八个问题。反对派说：好吧，可是谁有更多的胜利的机会呢，是苏联无产阶级呢，还是世界无产阶级？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说道：“能不能设想欧洲资本主义会腐朽三十年至五十年，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问：为什么我应当接受这个只能称之为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毫无根据的极端悲观心理的前提呢？……我断言，我没有任何理论的和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成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容易些。”（见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第一、应当毫无保留地抛弃欧洲要停滞“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谁也没有要托洛茨基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前途出发，这个前途与我们党的前途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托洛茨基本人既把自己和这个臆造的前途联在一起，自己就应当对这种做法的后果负责。我想，如果指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前途，这个期限至少应该缩短一半。

第二、托洛茨基毫无保留地决定西方无产者战胜现在执政的世界资产阶级，要比苏联无产阶级战胜在政治上已被打垮的、已被赶出国

民经济指挥所的、在经济方面不得不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压力下退却的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

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托洛茨基这样提问题恰好露了马脚。难道孟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异口同声地大叫时，不也是向我们说西方无产者推翻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要比技术不大发达、无产阶级人数不多的俄国的无产者有更多的机会吗？不管孟什维克怎样痛哭流涕，俄国无产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比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者有更多的机会推翻了资产阶级并夺取了政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全世界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表明和没有证实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样提问题吗？

谁有更多的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其解决办法不是拿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比，或者拿我国农民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比。这样的对比是把比较当儿戏。谁有更多的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是要由现实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斗争战线上的实际的力量对比来解决的。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建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时，也许西方无产者就已战胜自己的资产阶级并夺得政权。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反之，在西方无产者还没有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时，也许苏联无产阶级就已建成本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谁有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的解决，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斗争战线上的实际情况为转移的，而且只是以这种实际情况为转移的。

九、实际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以上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基础。

从这些基础中产生了一些在对外对内政策方面和在纯粹党内政策

方面的实际政策性质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就是**第九个问题**的题目。

（甲）党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出发，认为我们正处于两个革命之间的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正走向革命，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开辟接近群众的道路，加强自己和群众的联系，掌握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使广大的工人群众作好准备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搏斗。

可是反对派不相信我们革命的内部力量，惧怕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会毁灭我们的革命，认为（或者曾经认为）可以否认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认为（或者曾经认为）英国罢工是资本主义稳定已经结束的标志；但当终于发现稳定是事实的时候，反对派却强词夺理说，那就该事实倒霉，那就可以跳过事实，同时他们装腔作势地提出修改统一战线的策略、与西方职工运动破裂等等耸人听闻的口号。

可是不顾事实，不顾事物的客观进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离开科学的基础而站到巫术的基础上去了。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政策上的冒险主义。

（乙）党从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而我国的国内市场又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市场出发，认为应当在不断改善基本农民群众（更不用说工人）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认为工业和农业间、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结合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结合中的领导，正如列宁所说，乃是“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和我国建设胜利的全部，因此，我们的一般政策，其中包括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应当符合于这个结合的利益。

可是反对派不相信有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显然他们认为可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来实行工业化，因而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道路，走上把农民当做“殖民地”、当做无产阶级国家的“剥削”对象的道路，而且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工业和农业

的结合、损害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地位、破坏工业化基础的工业化办法（加紧对农民的捐税压榨，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等等）。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的否定态度——这是社会民主党所特有的态度。

（丙）我们的出发点是：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认为在我们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因为显而易见，在党内存在着各种有组织的派别，就会使统一的党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组织，就会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党的萌芽和细胞，也就是说，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反对派虽然不公开反驳这些论点，但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所持的出发点却是：必须削弱党的统一，必须有在党内成立派别的自由，也就是说，必须造成建立新党的因素。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实际工作中的分裂政策。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对党内“制度”的号叫，其实这正是国内非无产阶级分子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反映。

由此就产生了关于两个政党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和反对派的意见分歧总括起来就是如此。

四　在工作中的反对派

现在来谈谈这些意见分歧是怎样表现在实际工作中的。

那末，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实际工作中，在其反党斗争中究竟是怎样表现的呢？

大家知道，反对派不仅在我们党内为非作歹，而且在共产国际其

他支部，如德、法等国党内为非作歹。因此，问题应该这样提出：反对派及其门徒们在联共（布）党内以及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内的实际工作究竟是怎样的呢？

（甲）**反对派及其门徒们在联共（布）党内的实际工作**。反对派是从对党发出最严厉的责难来开始其“工作”的。反对派说党正在“爬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反对派说党的政策“与革命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反对派说党在蜕化并走向特米多尔[①]。反对派说我们的国家“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一切不是在反对派代表的公开宣言和演说（一九二六年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中发表过，就是在反对派门徒们所散发的反对派的秘密文件中发表过。

反对派对党发出这些严厉的责难，从而为在党内组织平行的新支部、组织平行的新的党中央、成立新政党造成基础。反对派的门徒之一奥索夫斯基先生在其论文中曾直言不讳地说，现有的党即我们党是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因此，必须组织一个新党，即与现有的党一同存在和活动的“纯无产阶级政党”。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奥索夫斯基的立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反对派对奥索夫斯基先生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大家知道，奥索夫斯基公开自命为反对派的门徒，反对派对这一点一次也没有试图加以反驳。其次，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曾经袒护奥索夫斯基而反对莫洛托夫同志。最后，大家知道，虽然党一致反对奥索夫斯基，但反对派在中央表决时却反对开除奥索夫斯基出党。这一切都说明反对派对奥索夫斯基的“行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

① 特米多尔是法国资产阶级第一共和国在一七九三年颁布的新历法中一个月份（七月）的名称。雅各宾党人执政后，因逐渐离开支持他们的广大阶层，而于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特米多尔月九日）被大资产阶级代表推翻。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企图从法国革命中举出例子，诬蔑布尔什维克党走向特米多尔，断言党必然会遭到与法国雅各宾党人同样的毁灭。——译者注。

结论：反对派在联共（布）党内的实际工作，已经表现在奥索夫斯基的立场上，表现在他所持的必须在我国成立一个与联共（布）平行并反对它的新党这一立场上了。

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反对派在对党发出这些严厉的责难时，自己并不相信这些责难的严重性，提出来仅仅是为了示威，那末，他们就是把工人阶级引入迷途，这是犯罪的；

或者是反对派过去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自己的责难的严重性，那末，他们就应当采取打垮党的领导干部和组织新党的方针，他们也真的采取了这个方针。

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前，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反对联共（布）的实际工作中的面貌就是如此。

（乙）**反对派的门徒们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实际工作**。以柯尔什先生为首的德国“极左派”，从我们的反对派对党的责难出发，做出了自己的“进一步的”结论并说得更加露骨。大家知道，德国“极左派”的思想家柯尔什硬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业”。大家知道，柯尔什把我们的党叫做“富农化了的”党，而把共产国际叫做“机会主义的”组织。其次，大家知道，柯尔什因此就鼓吹反对苏联现存政权的“新革命”的必要性。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柯尔什的立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反对派对柯尔什先生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柯尔什说的话，就是从我们的反对派首领以众所周知的对党的责难的形式传授给自己门徒的那些前提得出的自然的结论。因为党既然在爬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党的政策既然与革命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党既然在蜕化并走向特米多尔，而我们的国家又“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那末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进行新的革命来反对“富农化了的”政权。此外，大家知道，德国的“极左派”，包括维丁派在内，曾反对开除柯尔什的党籍，

因而对柯尔什的反革命宣传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可是，谁不知道“极左派”是拥护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的呢？

（丙）**反对派的门徒们在法国的实际工作**。关于法国的反对派门徒也必须这样说。我指的是苏瓦林及其在法国一个著名杂志上活动的集团。从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对党的责难中所提供的前提出发，苏瓦林得出结论说，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党内的官僚，是我们党的上层领导集团。苏瓦林硬说：“生路”只有一条，就是进行新革命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中的上层领导集团，首先是反对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在那里，在德国，是反对苏联现存政权的“新革命”。在这里，在法国，是反对中央书记处的“新革命”。那末怎样组织这个新革命呢？没有一个适合于新革命的目标的特殊政党，能不能组织这个新革命呢？当然不能。由此便产生了建立新党的问题。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苏瓦林的言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第一、大家知道，苏瓦林及其集团是反对派的门徒，特别是托洛茨基那一部分反对派的门徒。第二、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反对派还计划把苏瓦林先生安插到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去。诚然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但这不是我们的反对派的过失，而是他们的倒霉！

由此可见，如果不看反对派自己所描绘的外貌，而看他们在我们苏联以及法国和德国的工作过程中的表现，那末我要说，反对派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就要走到打垮我党现有干部并组织新党的地步了。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呢？

或者换句话说，反对派反映着哪种人的情绪呢？

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所谓“俄国问题”近来已经成为西方社会

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报刊极为注意的问题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和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不能不在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当中引起极度的惊惶。革命和反革命间的界限，现时就截然表现在一些人对苏联无产阶级政党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同志友好的态度上。目前“俄国问题”的极伟大的国际意义已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不能不加以重视的事实了。

围绕着“俄国问题”形成了两条战线，一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的战线，一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奋不顾身的朋友的战线。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力求在广大民众中造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苏维埃共和国的朋友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力求在无产阶级广大阶层中间造成支持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流亡分子中的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我们的反对派。

例如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首领保尔·列维说道：

“我们一向认为工人的特殊利益归根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它是与农民私有制的存在相矛盾的，工农利益的一致只是表面的现象，俄国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将使这个矛盾更加尖锐更加鲜明。我们认为利益相同的思想是一种变态的联合思想。如果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点根据，如果历史是辩证地发展着的，那末这个矛盾一定会粉碎联合的思想，正如它在德国已被粉碎一样……　我们这些从旁边，从西欧观察苏联事变的人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观点和反对派的观点是一致的**……　当前的事实是：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独立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又在俄国开始了。”（见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莱比锡国民日报”）

在这里，在这段引文中，对于工农利益“一致”的问题存着糊涂

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保尔·列维因我们的反对派与工农联盟思想作斗争而称赞他们，这也是无庸置疑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主张在苏联复活资本主义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并非无名之辈的唐恩关于我们的反对派说道：

“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着社会民主党的批判，他们正以这种批判**进行……思想上的准备**来接受社会民主党的优良的纲领。”

往下又说：

“反对派不仅在工人群众中间而且在工人共产党员中间培养这种思想和情绪的幼苗，这种幼苗若是好好地加以培植，很容易**结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果实**。”（“社会主义通报”第十七、十八两期合刊）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米留可夫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最近新闻报”关于我们的反对派写道：

“今天，反对派在破坏专政，反对派的每一种新的刊物都在发表越来越‘可怕’的言论，反对派自己正在向愈益猛烈抨击统治制度这方面演变，在目前这已足以令人感激不尽地把反对派当做政治上不满的广大居民阶层的喉舌来看待了。”（见“最近新闻报”第一九九〇号）

往下又写道：

“对苏维埃政权来说，现在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悄悄地爬近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触角从各方面把它包围起来，并在它没有发觉之前就把它消灭的那些人。苏维埃的反对派所扮演的正是这种在我们还没有度过的准备时期中所不可缺少的角色。”（见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最近新闻报”第一九八三号）

我想，这里是用不着解释的。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引用了这几段话，虽然这样的引证还可以举

出几十段几百段来。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的原因。

这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反映的不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而是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急切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瓦解和崩溃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

这样，我们的反对派的派别斗争的逻辑，实际上就使得我们的反对派的战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人的战线在客观上合而为一了。

反对派是否愿意这样呢？也许他们不愿意这样。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派愿意怎样，而在于他们的派别斗争在客观上会引起怎样的后果。派别斗争的逻辑胜过某些人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反对派的战线实际上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人的战线合而为一了。

列宁曾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就是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事情却颠倒成这样：反对派由于采取派别政策而堕落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阵营中去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反对派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脱离了列宁主义。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工人阶级队伍里现在只能有一种政策，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反对派企图在反联共（布）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采取第三者的立场，这必然要以反对派被派别斗争的进程抛到列宁主义的敌人的营垒中去而告终。

从上述事实来看，结果也正是如此。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的原因。

六　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我在上面说过，反对派在其反党斗争中对党发出了种种极严厉的责难。我已说过，反对派在其实际工作中就要走到分裂党和组织新党的地步。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反对派在这个分裂的立场上能够维持多久呢？事实告诉我们，反对派在这个立场上才维持了几个月。事实告诉我们，到今年十月初，反对派已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已不得不退却了。

反对派退却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反对派退却的原因有下列几种。

第一、反对派在苏联没有自己的政治军队。很可能，建立新党是一种吸引人的事情。但是在争论以后既已发现没有可资建立新党的人，那末很明显，退却便是唯一的出路了。

第二、在派别斗争进程中，不论我们苏联的或国外的各种卑鄙龌龊分子都和反对派结成一伙了，而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则竭力称赞反对派，同他们接吻，使他们在工人眼中大丢其脸。因此，反对派应该有所选择：或者接受敌人的这种称赞和接吻，视为理所当然；或者翻然悔改，使粘附在他们身上的肮脏尾巴自动地掉下来。反对派既已退却而且承认了自己的退却，也就是承认了第二条出路是他们唯一可走的道路了。

第三、苏联国内状况要比反对派所预料的好些，而党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程度也要比反对派在斗争开始时所看到的高些。当然，假如国内发生了危机，假如工人日益不满，假如党表现得不够团结，那末反对派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他们是决不会退却的。但是，事实表明反对派在这方面的打算也落空了。

这就是反对派失败的原因。

这就是反对派退却的原因。

反对派的失败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反对派在这个文件中放弃了派别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放弃了派别斗争的方法，公开地毫不含糊地承认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错误。但反对派所放弃的不止于此。既然反对派在自己的“声明”中同“工人反对派”以及一切柯尔什分子和苏瓦林分子划清了界限，从而他们也就放弃了不久以前还使他们和这些派别接近的思想立场。

第二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事实上放弃了不久以前对党发出的种种责难。应该承认这一点，而且在承认以后应该着重指出，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已不敢重复自己对党的责难了。如果把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的记录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记录比较一下，那就不能不指出，以前的种种责难，说党是机会主义，是特米多尔主义，是背弃了革命的阶级路线等等，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此外，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即好多代表向反对派提到过去的种种责难的问题，而反对派对此仍然默不作声，那就不能不承认反对派实际上已经放弃他们过去对党的种种责难了。

是否可以把这种情况看做反对派事实上放弃了自己一系列的思想立场呢？可以而且应该。这是反对派在失败面前自觉地抬起了自己的战斗旗帜。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发出责难是打算建立一个新党。既然这种打算落了空，这些责难至少暂时要收起来了。

第三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完全孤立。应该指出，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连**一票**也没有得到，因而完全陷于孤立。你们回想一下反对派在今年九月底向党举行进攻、举行公开的进攻时所发出的叫嚣，并把这种叫嚣和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可以说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事实比较一

下，你们就会懂得反对派的失败真是“无以复加”了。

反对派实际上放弃了他们对党的责难，虽然有代表要求，他们也不敢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重复这些责难，这个事实能不能否认呢？

不，不能，因为这是事实。

反对派为什么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为什么卷起了自己的旗帜呢？

因为反对派思想旗帜的展开必然地和不可免地意味着组织两个党的理论，意味着所有的卡茨分子、柯尔什分子、马斯洛夫分子、苏瓦林分子及其他卑鄙龌龊的分子的活跃，意味着我们国内一切反无产阶级的力量的蠢动，以及俄国流亡分子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资产者对反对派的称赞和同他们的接吻。

反对派的思想旗帜害了反对派。同志们，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因此，反对派为了不致彻底腐败起见，便不得不退却并抛掉自己的旗帜。

反对派联盟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此。

七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现在我只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意义和作用方面来把几个结论谈一谈。

第一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总结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党内斗争，正式肯定了党对反对派的胜利，孤立了反对派，结束了反对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前硬在我们党内造成的派别混乱局面。

第二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上，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向我们党内一切反对派别、向我们党内一切倾向作斗争的思想的基础上，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现在我们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说得对：全世界都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看着我们在建设战线上的胜利。可是为了在这个战线上取得胜利，就必须使我们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有进行这个事业的决心，使它意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使它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杠杆。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它正式地和最后地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思想武装了我们党。

第三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坚决反击了我们党内所有一切思想上的动摇，从而促进了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内的完全胜利。

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批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承认我们党对反对派的政策是正确的（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那就可以得出第四个结论说，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为使列宁主义在整个共产国际、在世界各国和各族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里获得胜利准备了若干必需的重要条件。（热烈鼓掌，全场欢呼。）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9卷第3—45页

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

（答杨—斯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你的信当然是如期收到了。回信稍迟，请原谅。

（一）列宁说：**“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四〇页）政权集中在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手里：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应被推翻，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应当取得政权，——这就是“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

在革命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内都有效的党的基本战略口号，若不完完全全以列宁的这个根本论点为依据，便不能称为基本口号。

基本口号要成为正确的口号，便一定要以对阶级力量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基础，要规定阶级斗争战线上革命力量的正确配置计划，要使党易于把群众引上争取革命胜利的战线，引上新阶级夺取政权的战线，要使党易于把广大人民群众编成一支为完成此项任务所必需的强大的政治军队。

在革命某一阶段中可能有失败和退却、失利和个别策略错误，但这并不是说基本战略口号是不正确的，例如我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口号——“联合全体农民，中立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和地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而奋斗”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到了失败。

所以，决不能把党的基本口号问题和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成功或失败的问题混为一谈。

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就是党的基本口号在革命进程中虽已做到

推翻了几个旧阶级或一个旧阶级的政权，可是从这个口号中产生出来的一连串重大的革命要求却没有实现，或它们的实现竟拖了一整个时期，或它们的实现还需要求一次革命，但这并不是说基本口号是不正确的。例如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没有做到没收地主土地等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革命第一阶段上的基本口号是不正确的。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使政权转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可是它没有一下子做到一般地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特别是在乡村里使富农陷于孤立，它拖了一个相当时期才把这件事情做成，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基本口号——“联合贫苦农民，中立中农，反对城乡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权而奋斗”是不正确的。

所以，决不能把党的基本口号问题和从这口号中产生出来的某种要求的实现的期限和方式问题混为一谈。

因此，在估计我党的战略口号时，决不能以某一时期内革命运动的偶一成功或失败为准则，尤其不能以从这些口号中产生出来的某种要求的实现的期限或方式为准则。在估计党的战略口号时，只能以对阶级力量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在争取革命胜利、争取政权集中于新阶级手里这一战线上革命力量的正确配置为准则。

你的错误就在于你回避了这个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或是没有懂得这个问题。

（二）你在信中写道：

“断言我们**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前才联合全体农民，这是正确的吗？不，不正确。‘联合全体农民’这一口号，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的第一个时期**都是有效的，因为当时全体农民都是关心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完成的。”

照你这段话说来，党在革命**第一**阶段（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

二月）即问题是要推翻沙皇地主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时的战略口号，跟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即问题是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的战略口号，**是没有区别的**。

可见你是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间的基本差别的。你所以犯这种错误，是因为你大概不愿意了解一件简单的事情：战略口号的主题是革命某一阶段上的政权问题，是**哪个**阶级要被推翻和政权要转到**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几乎用不着证明，你在这里是根本不对的。

你说，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时期，我们都是实行“联合**全体**农民”的口号，因为当时全体农民都关心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完成。可是，谁告诉过你，十月的大转变和十月革命只限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或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呢？你从哪里得出了这一点呢？难道可以把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吗？难道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吗？

怎么可以断定富农（要知道他们也是农民）能支持我们推翻资产阶级并使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呢？

怎么可以否认我们实行土地国有、废除土地私有制、禁止土地买卖等等法令（虽然这种法令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法令）时是和富农作**斗争**而不是和富农联合呢？

怎么可以断定富农（也是农民）能支持苏维埃政权没收工厂、铁路、银行等等法令，能支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无产阶级口号呢？

怎么可以断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内容**不是实行诸如此类的办法，不是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呢？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没有十月革命便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同样，十月革命如果没有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它本身也就不能巩固；十月革命既然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了，它也就得到了全体农民的同情。所有这些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难道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不是十月革命进程中的**从生现象**，而是十月革命的**本质**或**主要**目的吗？你把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剥夺资本家等等，抛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战略口号的主题是任何一个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政权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的问题，那末决不能将无产阶级政权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跟推翻资产阶级并争得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混为一谈，即与那成为革命第二阶段战略口号主题的问题混为一谈，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它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了，并把中世纪一切污垢扫除净尽了。这对乡村具有最主要的和真正决定性的意义。不这样，就不能把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这一点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就说过了。不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不能巩固。

同时必须注意下述一个重要情况。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不是一举而成的事情。实际上，这件事情拖了一整个时期，不仅包括一九一八年的几段时间，像你来信中所说的那样，而且包括一九一九年（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乌克兰）的几段时间。我指的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进攻，那时全体农民面临地主政权复辟的危险，那时农民——正是**全体**农民——不得不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以保证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使自己保有这一革命的果实。必须时刻注意到实际生活过程的这种复杂性和

多样性，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社会主义任务和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的这种“奇巧的”错综结合，才能正确了解你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引文以及党的口号如何见诸实行的诀窍。

能不能说这种错综结合的情形证明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口号不正确呢？能不能说这个口号和党在革命**第一**阶段上的口号没有区别呢？不，不能这样说，相反地，这种错综结合的情形恰巧证明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口号，即联合**贫苦**农民，反对城乡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等等口号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首先**在十月革命中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为了在十月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在十月革命以前准备并组织一支能推翻资产阶级、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相当的**政治大军，并且无须证明，**这样的**政治大军，我们**只有**在无产阶级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口号下，才能准备并组织起来。

很明显，没有**这样**一个从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实行的战略口号，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政治大军，也就不会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不会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因而也就没有可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将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件事跟革命第二阶段上以保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任务的战略口号对立起来。

避免这一切“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承认革命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口号和革命第二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口号有根本的差别，承认我们在革命第一阶段时期是联合**全体**农民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奋斗，我们在革命第二阶段时期则是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本政权，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

承认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分析了革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阶

级力量以后，我们非承认这一点不可。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我们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下进行工作，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这个口号就被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所代替了。

你应该同意，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间以一个口号代替另一个口号的事实，按照你的公式是无法解释的。

列宁还在他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里就指出了党的两个战略口号间的这种根本差别。他把党在准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的口号规定如下：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换句话说，联合全体农民，中立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为民主革命而奋斗。

至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的口号，他则规定如下：

“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同上）

换句话说，联合贫苦农民及一般半无产阶层，中立城乡小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这是一九〇五年的事情。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把当时政治情况估计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跟资产阶级实际政权错综结合的局面时说道：

“俄国时局的特点在于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①]革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而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①]手中。”（见列宁“四月提纲”，“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页）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当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正以全力进行时，列宁在“农民和工人”这篇专论中写道：

“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②]才能推翻君主制度，——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当时（指一九〇五年而言。——斯大林注）的基本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只有领导着**贫苦农民**[③]（即我们党纲所说的半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结束战争，医好战争创伤，开始实行那些已成为绝对必要而**刻不容缓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现时的定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页）

这一点不应了解成这样：似乎我国**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是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走向十月革命的，并且我们在十月革命中在形式上实现了这个口号，因为我们当时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联盟并和他们分掌过领导权，虽然事实上我国当时就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是占多数的。可是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盲动”以后，自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破裂以后，当领导权已**完完全全**转到**一个**政党即我党（我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国家领导权的）手中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在形式上也就不存在了。这在我们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宁回顾经历过的革命道路时写道：

“是的，**当**我们还**和全体**农民**一道**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的，是我们从一九〇五年起

——————————————

①②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中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从**四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①]政权**以前很久**[②]，我们就已经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决不能停止在这个地方，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破产现象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这种破产现象**要求**（不管谁愿意与否）采取**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骤。否则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挽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痛苦。结果正像我们说过的一样。革命进程已证实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和‘全体’农民一道，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和贫苦农民一道，和半无产阶级一道，和一切被剥削者一道，**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③]，因此，革命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六页至第二七七页）

由此可见，列宁曾屡次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一个战略口号和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二个战略口号之间的全部差别。前一口号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专制制度，后一口号是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

十月革命后拖了一整个时期才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既然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全体”农民也就不能不同情我们，——这件事实，像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丝毫不会动摇这个基本原理：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走向十月革命并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在富农（也是农民）的反抗和中农的动摇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

①②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三）其次，你在来信中写道：

“‘**我们是在联合贫农和中立中农**的口号下**走到十月革命的**’这一断语是否正确呢？不，不正确。依照上面说过的理由和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引文可以看出，这个口号只有在‘农民内部阶级分化已经成熟’（列宁）时，即‘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产生出来。”

照你这段话说来，党走上中立中农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时，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在贫农委员会取消以后。这是**完全不对**的。

恰恰相反，中立中农的政策，不是在贫农委员会取消以后即一九一八年以后开始的，而是在那时候**完结**的。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中立中农的政策在我们的实践中**被取消**了（而不是被施行了）。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宣布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道：

“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中立农民**，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懂得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①]。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②]，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所考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我们应当以这种规则和指示为准绳面对中农**采取坚固联盟的立场**。”（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四页至第一二五页）

由此可见，结果是恰恰和你在来信内所说的相反，你在这里把我们**真实的**党的实践颠倒过来，把中立中农政策的**开始**和**终结**混淆起来了。

————————————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当我们还在推翻资产阶级时，当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中农总是叫苦连天并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因此也就不得不使他们中立。当中农开始确信资产阶级“真”被推翻，苏维埃政权已在巩固，富农正被抑制，红军开始在内战战线上获得胜利时，他们就开始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正是在这样的转变发生以后，才能有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党的第三个战略口号：**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坚固联盟**，向前迈进，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你怎能忘记这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呢？

其次，从你的来信得出，在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时**以及在这个革命胜利以后**最初时日**里，中立中农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不适用的，因而是不能采纳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正是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时和在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以前，中农的动摇和抗拒是最厉害的。正是在这个时期，必须联合贫农和中立中农。

你在坚持自己的错误时，说农民问题不仅对于我国，而且对于“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多少相似的”其他国家，都有重大的意义。后一意见当然是对的。可是，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土地问题提纲内，怎样说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对待中农的政策吧。列宁把贫苦农民，或更确切些说，“农村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称为由农业工人、半无产者或极小农和小农所组成的单独集团，然后在讲到中农是农村特别集团的问题时说道：

“所谓‘中农’在经济意义上应了解为一种小耕作者，他们依据所有权或租佃权也占有一块不大的土地，但是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通常使农家不仅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且能得到某些——至少在好年成里——可以变为资本的余粮；第二、这种小的耕作者往往（例如两三户中就有一户）要雇佣他人的劳动力……革命无产阶级不能（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开始时**）给自己提出

把这个阶层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任务，而应当**以中立这个阶层的任务为限**，也就是使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三三页）

既然如此，怎能说中立中农的政策在我国“**只有**”“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即巩固苏维埃政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事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才能“产生”呢？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在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时的战略口号问题，也像中立中农问题一样，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样简单。

（四）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你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几段引文丝毫也不能和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基本口号相对立，因为（甲）这几段引文所谈论的不是党在十月革命**前**的基本口号，而是在十月革命**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乙）它们并不是驳斥而是肯定这个口号的正确性。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现在不得不再重复一遍：决不能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时期内所实行的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和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的时期内以政权问题为主题的战略口号对立起来。

（五）你说到莫洛托夫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文章“论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原来正是这篇文章“推动了”你来要我作解释。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样阅读文章的。我也读过莫洛托夫同志的文章，而且我以为这篇文章和我在我们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党对农民的口号所说的话是毫不矛盾的。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文章内不是说党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基本口号，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而是说党既然在十月革命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它也就获得了全体农民的同情。可是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确认这件事实，并不是否认而是证实下述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中立中农、反对城乡资产阶级而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
八两期合刊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9卷第145—156页

中 国 革 命 问 题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

（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

（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

（丙）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它对革命运动规模的畏惧；

（戊）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

（己）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

由此就产生了中国事件发展的两条道路：

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进攻革命，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而结束革命；

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

二者必居其一。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一专政的经

验可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加以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走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以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的，现时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已没有像十月革命以前存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那种分裂和战争，——这一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俄国革命多得多，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投敌和叛变的事件也将比苏联内战时期多得多。

因此，这两条革命道路之间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奋斗。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在第一次北伐时期，当国民革命军迫近长江，节节胜利，而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还来不及展开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买办）是和革命一道前进的。这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

这并不是说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矛盾。这只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革命时，竭力利用革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限制革命的规模，使革命主要沿着争夺地盘的路线进行。这个时期国民党内右派和左派间的斗争就是这些矛盾的反映。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要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的企图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重大的企图。大家知道，当时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一九二六年四月）。

这条路线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

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

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农村中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以及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城市里汹涌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会委员会的成立，国民革命军向帝国主义海陆军包围着的上海的胜利推进，——诸如此类的事实都说明当时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只有这一情况能够说明下列事实：一九二七年二月国民党右派企图分裂国民党并在南昌成立新中央，这一企图在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一致反对之下遭到了破产。

但这个企图是一种征兆，表示国内正进行着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安心，他们将加紧反革命的工作。因此，联共（布）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三月说得很对：

（甲）“现在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它进一步的胜利只有在发展群众运动这一坚定的方针之下才有可能”；

（乙）“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变为拥有武装自卫力量的实际政权机关的方针”；

（丙）“共产党不应当隐瞒国民党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应当用揭穿右派的办法把群众动员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因此不难了解，后来革命的巨大规模和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袭击，不能不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抛入反革命的阵营，正像国民革命军的占领上海和上海工人的罢工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样。

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南京的炮声在这方面就成了中国斗争力量重新划清界限的信号。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并提出最后通牒，是想表

明他们在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共同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并实行政变，就像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就是说，革命的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拥护进一步展开革命的人们和主张消灭革命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将日益加剧，充满当前整个革命时期。

这就是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而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既然脱离工农并勾结帝国主义，终究要遭受和军阀同样的命运。

由此可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其次，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由此可见，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将来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组织，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千百万劳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增长，而对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

最后，由此可见，共产党在与革命的国民党人在同一队伍中战斗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保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必要条件。

四　反对派的错误

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

反对派要求中国革命以类似十月革命的速度发展起来。反对派不满上海工人没有去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决战。

但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其中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国际环境不像一九一七年那样有利（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战争）。

他们不懂得在后备军还没有跟上的不利条件下是不能进行决战的，例如布尔什维克不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或七月都没有进行决战。

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不避免决战（在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然而**现在**成立苏

维埃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

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一九〇五年的情况是这样，一九一七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在目前**，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提出反对这个地区内的现存政权的口号，这就是说，提出成立新的政权机关的口号，提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人结成联盟的共产党人也加入其中）的政权的口号，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而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权。

其次：这就是说，把两种任务混淆起来了。一种任务是成立和巩固现在革命的国民党所依靠的工农群众组织，例如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另一种任务是成立作为新型国家政权的苏维埃制度以代替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

最后，这就是说，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这就是说，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进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

可见反对派提出**在目前**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①]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

现在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由此可见，反对派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因此，不久以前我党中央全会坚决地摈弃了反对派的政纲是完全正确的。

载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真理报”第九十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9卷第157—163页

——————————————

① 卡维涅克（一八〇二——一八五七）是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他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译者注。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志们！可惜我今天只能谈两三个钟头的话。也许下一回我们可以举行一次时间较长的座谈。我想今天我们只能分析一下你们书面提出的问题。我一共收到了十个问题。我就在今天的谈话中来答复。如果还有补充的问题（据说是有的），我设法在下一次座谈中答复。好吧，我们就来谈本题吧。

第一个问题

“拉狄克断言：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这种论断为什么不对呢？

能不能断言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封建残余呢？

为什么中国军阀既是大工业企业的所有者同时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

拉狄克确实下过类似这个问题中所指出的论断。我记得拉狄克在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发言中，不是完全否认中国农村中有封建残余存在，就是不承认封建残余在中国农村中有重大的意义。

这当然是拉狄克的一个大的错误。

假如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假如这些封建残余对中国农村没有极重大的意义，那就不会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了，那就谈不上土地革命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中国农村里是不是存在着商业资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仅存

在着，而且从农民身上榨取脂膏并不亚于任何封建主。但是这种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它从地主那里袭用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同志们，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拉狄克的错误在于他不了解这种独特性，不了解在保存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的条件下，中国农村中封建残余的统治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的这种**结合**。

所有的军阀、督军、省长以及现在一切残酷的进行掠夺的军事和非军事的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独特性的上层建筑。

帝国主义支持着并巩固着这整个的封建官僚机器。

某些军阀拥有地产，同时是工矿企业的所有者，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俄国许多地主也曾有过工厂和其他工矿企业，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依旧是封建残余的代表者。

既然在一些区域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地主在经济方面和在行政、司法方面都握有实权，既然迄今在一些身份里还有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应该承认，这个中世纪环境中的统治势力是和商业资本的势力独特地结合着的封建残余的势力，地主的势力，军事与非军事的地主官僚的势力。

这些独特的条件就给中国正在发展和还要发展的农民的土地运动造成基础。

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封建残余和封建压迫，在中国就不会有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等等问题了。

没有这些条件，中国的土地革命就会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

“拉狄克断言：既然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几个阶级的政党，那末

国民党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了。他错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问题在这里是提得不正确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说过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这是不对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说：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同志们，这并不是一回事。假如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那末问题就会归结成这样：在加入国民党的各阶级中不论哪一个阶级都不会在国民党以外有自己的政党，而国民党本身就会是所有这些阶级的一个共同的和**唯一的**政党。难道实际上真是这样的吗？难道中国无产阶级参加了国民党就没有自己单独的政党，就没有和国民党不同而且具有自己单独的纲领、自己单独的组织的共产党吗？显然，国民党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的政党，而是各有其党组织的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因此，问题在这里是提得不正确的。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只能说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

第二、说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不承认几个被压迫的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说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这是不正确的。同志们，这是绝对不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过（而且继续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在原则上是容许的，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也加入过这样的政党。我可以举个例子，即马克思本人在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国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并且在这个联盟中与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合作。大家知道，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的，加入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外，还有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只是在一八四九年春天，当德国革命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退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决定建立一个具有独立阶级政策的完全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

可见，马克思甚至比我们今天作为独立的、具有自己单独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参加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得更远。

一八四八年，当问题是要和革命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联盟，这样做是否**适当**，是可争论可不争论的。这是**策略**问题。但马克思**在原则上**承认这种加入是容许的，——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第三、说武汉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就此为止，那是根本错误的。只有既不懂得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又不懂得中国革命性质的人，才会这样说明国民党的特征。国民党不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有各种各样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但它们又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因为它们同法英帝国主义者结成战斗同盟，同他们一起**征服**和**压迫**其他的国家——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加里西亚。

能不能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呢？显然是不能的。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像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一样。这里是有根本差别的。看不出这种差别，把**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帝国主义的**政党混为一谈，就是一点也不懂得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当然，假如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那末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会和它结成联盟，而会叫它滚蛋。但问题正在于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它正和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进行着革命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要比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类型的一切**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高得多。

甚至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在发动政变**以前**就用种种阴谋诡计来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当时也要比克伦斯基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高出一些，因为克伦斯基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进行战争是**为了**奴役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加里西亚，从而**巩固**帝国主义，

而蒋介石进行战争——无论进行得好坏——则是**反对**奴役中国，从而**削弱**帝国主义的。

拉狄克和一般反对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撇开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看不见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看不出武汉的国民党即没有国民党右派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

第三个问题

“你估计国民党是两种力量（共产党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上的演说），**而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决议则估计国民党是连大资产阶级也在内的四个阶级的联盟。这两种估计有没有矛盾呢？**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时，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可能呢？”

第一、必须指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实际状况所下的定义，在你们的“问题”中是转述得不对和不完全确切的。在“问题”中说“连**大**资产阶级也在内”。然而买办也是大资产阶级。这是不是说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认为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党内联盟的一员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买办资产阶级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国民党的死敌。共产国际决议中所说的不是一般大资产阶级，而是**“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因此，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任何大资产阶级，而是**非**买办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

第二、应当声明，我看不出国民党的这两个定义有矛盾。我所以看不出，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给国民党下定义，这两个观点，不论哪一个，都不能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两个都是正确的。

我在一九二五年说国民党是工农联盟的政党的时候，我并不是想说明国民党的**实际**状况，也不是想说明一九二五年有哪些阶级**事实上**

加入了国民党。我说到国民党的时候，我只是把国民党当做东方被压迫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的独特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当做**应当**依靠工人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来谈的。我当时直截了当地说：“在这种国家里，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过渡到**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见斯大林“论东方人民大学的政治任务”，“列宁主义问题”第二六四页）

因此，我当时所指的不是一般人民革命政党（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现在，而是它们的**将来**。在这里我是完全对的。因为国民党之类的组织，只有力求依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联盟才能有前途，而且说到小资产阶级时主要是指**农民**而言，因为农民是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基本**力量。

共产国际所注意的却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其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不是从国民党的将来，不是从它应当成为什么，而是从**现在**，从国民党内部的**实际**状况和正是哪些阶级在一九二六年**事实上**加入了国民党这种观点去考察国民党的。共产国际说得完全正确：在这个时候，**在国民党还没有分裂的时候**，国民党**事实上**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城市和乡村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里还可以添上一句：不仅在一九二六年，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国民党所依靠的也正是这些阶级的联盟。在我曾经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国际决议中直截了当地说：“无产阶级同积极为自己利益而斗争的农民，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组成联盟”；“各种力量的结合在政治方面表现在国民党内和广州政府内相应的联合上”（见决议）。

但是共产国际并不限于论到一九二六年的**实际**状况，而且论到国民党的**将来**，所以它不能不说这种联盟只是暂时的联盟，不能不说在最近期间这种联盟应代之以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决议接着又说：“目前运动正处在第三阶段的门口，正

处在阶级力量重新结合的前夜”；“在这个发展阶段上，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更富有革命性的联盟——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把大部分资本主义大资产阶级**排除出去**”（同上）。

这也就是国民党所应当依靠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联盟，这个联盟从国民党分裂和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以后已在武汉开始形成，一九二五年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报告中所谈到的就是这个联盟（见前）。

由此可见，我们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国民党的：

（甲）从国民党的**现在**方面，从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的实际状况的方面；

（乙）从国民党的**将来**方面，从国民党作为东方国家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应当成为什么的方面。

这两种说明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因为它们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把握国民党，终于提供了一幅详尽的图画。

试问这里有什么矛盾呢？

为了更清楚起见，我们拿英国“工党”来做例子。大家知道，英国存在着一个依靠工人和职员的工会组织的特别的工人政党。称这个党为工人政党是谁也不怀疑的。不仅在英国的而且在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也都是这样称它的。

但是能不能说这个政党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是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工人的阶级政党呢？能不能说它**事实上**是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不是两个阶级的政党呢？不，不能说。**事实上**英国工党是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事实上**这个政党是两个阶级联盟的政党，如果说到在这个党内谁的影响大，是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工人的影响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大，那末应该说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这个党内是占优势的。

其实，这一点也就说明英国工党**事实上**是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附

属品。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却把它叫做**工人**政党。怎样来解释这个“矛盾”呢？可以这样来解释：在确定这个政党为**工人**政党的时候，通常指的不是这个政党现在的实际状况，而是工人政党的结构**形式**，由于这种形式，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政党**将来**一定会变成和资产阶级世界相对立的工人的真正的阶级政党。这并不排斥**事实上**这个党暂时是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这一事实，相反地，而是以这一事实为前提的。

这里也没有矛盾，正像我刚才谈到国民党时所说的一切没有矛盾一样。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时，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可能呢？

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而且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成立时，加入国民党都是不适当的。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是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国民党和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斗争。成立工农苏维埃，就是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在共同参加一个革命民主政党的**两个**政党的领导下，能不能进行这种准备呢？不，不能。革命的历史说明，准备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当然，如果所说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历史说明，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争取到手，才能发展起来。没有这一点，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没有而且不能有真正的和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

因此，不仅在无产阶级专政时，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成立时，共产党就必须退出国民党，以便在自己单独领导之下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

我以为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准备中国十月革命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代替目前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就像在过渡到十月革命的时期我们和社会革命党左派的那种联盟一样。

第四个问题

“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如果不是，那末今后争取民主专政的斗争的道路将是怎样的呢？

马尔丁诺夫断言不经过‘第二次’革命也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末中国的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它可能成为这样的专政。如果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武汉政府就一定会成为民主专政，可是它现在还不是这种专政的机关。

为了使武汉政府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需要些什么呢？这至少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必须使武汉政府成为中国农民土地革命的政府，成为竭力支持这个革命的政府。

第二、必须使国民党以工农出身的土地运动的新领袖补充其上层领导集团，并且扩大其下层组织，把农民协会、工会委员会和城乡其他革命组织都包括进去。

国民党现在约有五十万党员。这太少了，对于中国实在太少了。必须使国民党把数百万的革命农民和工人包括进去，从而变成千百万人的革命民主组织。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国民党才有可能产生出一个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将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

马尔丁诺夫同志是否确实说过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文章，我所以没有看过，是因为我没有可能浏览我们日常的一切著述。但如果他确实说过在中国可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那

末这就是一个错误。

邱贡诺夫有一次问我：“怎么样，斯大林同志，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不兜什么圈子，通过国民党用和平方法一下子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呢？”我反问他：“邱贡诺夫同志，你们中国的情形怎样，——你们那里有没有国民党右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呢？”他回答说有。我就对他说：“那就非打架不可了。”

这还是在蒋介石政变以前。当然，在原则上可以提出中国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的问题。例如列宁有一个时期就曾认为俄国革命可能经过苏维埃而和平发展。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七月的时期。但是在七月失败以后，列宁就承认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以为在中国更应当认为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等等）或国外的（帝国主义者），都太多太强了，不能设想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可以避免严重的阶级搏斗和严重的分裂与投敌行为。

第二、因为没有根据认为国民党的国家组织形式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适当形式。

最后因为：既然在俄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典范形式的苏维埃而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成功，那末有什么根据可以推想这样的过渡通过国民党就可以成功呢？

因此，我以为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第五个问题

“为什么武汉政府不进攻蒋介石，而进攻张作霖呢？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同时向北方进攻，这不是抹杀了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战线吗？”

同志们，你们向武汉政府要求得太多了。既打张作霖，又打蒋介石，又打李济深，又打杨森，那当然是很好的。但目前武汉政府的形势不允许它在所有这四条战线上同时举行进攻。武汉政府对奉军进攻，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奉军向武汉进发，要肃清武汉，所以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

第二、因为武汉派想和冯玉祥军队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在目前对于武汉来说又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政治事件。

在反对蒋介石和张作霖这两条重要战线上同时进攻，目前对于武汉政府是不能胜任的事情。关于西攻杨森和南伐李济深，就更不用说了。

在内战时期，我们布尔什维克是较为强大的，可是我们也没有能够在所有战线上展开顺利的进攻。在目前有什么根据要求武汉政府做更多的事情呢？

其次，现在，当奉军和吴佩孚系军队从北方向武汉推进的时候，进攻上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便利奉军南下，无限期地推迟和冯军的会师，而在东部又一无所得。倒不如暂时让蒋介石在上海地区挣扎，跟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纠缠吧。

夺取上海还要经过战斗，这场战斗不会像现在夺取郑州等地的战斗一样。不，在上海要进行更激烈的战斗。上海是世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重要利益的交叉点，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让出的。

首先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加紧瓦解蒋介石的后方和前线，然后将上海问题全部提出，这是不是比较适当呢？我想这样做是比较适当的。

因此，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抹杀”对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战线，因为只要土地革命发展起来，它反正是抹杀不了的；而土地革命正在发展，将来还要发展，——这一点现在几乎是无可怀疑的。我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抹杀”，而在于制定适当的斗争策略。

某些同志以为现时在所有的战线上进攻是革命性的基本标志。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目前在所有的战线上进攻，乃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不能把愚蠢和革命性混为一谈。

第六个问题

“基马尔式的革命在中国是否可能呢？”

我认为基马尔式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

基马尔式的革命，只有在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这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也没有强大的农民土地革命的国家内，才有可能。基马尔式的革命是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它是在反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其继续发展中实质上是反对农民和工人、阻碍土地革命发生的。

在中国不可能有基马尔式的革命，因为：

（甲）在中国有一定数量的战斗的和积极的工业无产阶级，它在农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

（乙）在中国有展开了的土地革命，它正在扫除自己道路上的封建残余。

千百万的农民在许多省份里已经夺取了土地，并在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斗争，——这就是防止所谓基马尔式革命的可能性的解毒剂。

不能把基马尔党和武汉左派国民党相提并论，正像不能把土耳其和中国相提并论一样。土耳其并没有像上海、武汉、南京、天津那样

的中心。安哥拉远不如武汉，正像基马尔党远不如左派国民党一样。

从国际地位来看，也应该注意到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差别。在土耳其方面，帝国主义已经达到了自己一系列的基本要求，夺取了土耳其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对帝国主义者说来是重要的据点。土耳其现在已经降为一个只有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地域不大的国家。它对于帝国主义既不是重要的市场，也不是有决定意义的投资场所。这种情形所以会发生，就是由于旧土耳其是各种民族的混合体，只在安那托里亚才有稠密的土耳其族居民。

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是有几亿人口的民族密集的国家，是全世界极重要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在那里，在土耳其，帝国主义利用旧土耳其内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对抗，能以割取东部一些极重要的地区而满足；而在这里，在中国，帝国主义必须在民族中国的活的躯体上开刀，把它割成碎片，夺取它整个的省份，以保持自己的旧有阵地，或者至少维持住这些阵地的一部分。

因此，在那里，在土耳其，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能以基马尔派的夭折了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告终；而在这里，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

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托洛茨基）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这一切差别，把基马尔式的革命和土地革命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

我知道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中间有些人抱着基马尔主义的思想。现在妄想扮演基马尔角色的人在中国是不少的。其中第一个就是蒋介石。我知道某些日本新闻记者有意把蒋介石算做中国的基马尔。但这一切都是张皇失措的资产者的梦想和幻觉。在中国，**要就是**张作霖和张宗昌之流的中国的墨索里尼们胜利，然后又被土地革命的浪潮推翻，**要就是**武汉胜利。力图使自己保持在这两个营垒之间的蒋介石及其帮手

们一定要垮台，遭到和张作霖、张宗昌同样的命运。

第七个问题

“在中国现在是不是需要提出农民立即夺取土地的口号，对于湖南农民夺取土地的事实应当怎样估计呢？”

我认为是需要的。事实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在若干地区内已在实行。在好些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成立自己的法庭，惩治自己的敌人，组织自己的自卫力量。我想，中国全体农民在最近期间都要去实现没收土地的口号。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这里。

如果武汉政府想要胜利，如果它想要建立真正的力量去反对张作霖、反对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者，它就应当大力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

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是愚蠢的。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武汉军队的积极支援，要打倒这些势力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看来他们以为：假如蒋介石没有分裂出去，革命事业也许要好些。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蒋介石的政变事实上是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当然，蒋介石的政变不能不使一些地区的工人遭到局部的失败。然而这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威力就在这里。

不能把革命运动看做一直上升的运动。这是对于革命的一种书本

上的非现实的想法。革命总是曲折地进行的，它在一些地区里实行进攻并破坏旧秩序，在另一些地区里却遭到局部失败并实行退却。蒋介石的政变就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曲折之一，这一曲折是必要的，因为藉此可以把一切肮脏东西从革命中清洗出去，并沿着强大的土地运动的道路把革命向前推进。

但是，要使这个土地运动能够形成，就必须使它有一个概括性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没收地主土地。

第八个问题

“为什么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呢？

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由于河南已经组织了工人苏维埃而有做革命运动尾巴的危险呢？”

你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苏维埃呢，是**无产阶级**苏维埃，还是**非无产阶级**苏维埃、“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人民”苏维埃？列宁在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中曾经谈到在东方落后国家里成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列宁指的是中亚细亚那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他指的是像波斯、阿富汗等等国家。其实这也就说明列宁的提纲中没有一句话说到要在那样的国家里组织**工人**苏维埃。

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列宁的提纲指的不是中国，因为对于中国不能说“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他指的是东方其他较落后的国家。

因此，这里说的是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此，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该注意的不是列宁的提纲，而是同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罗易的提纲，这个提纲说到要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成立**工**农苏维埃。但这个提纲中说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时，在这些国家里应该成立工农苏维埃。

什么是工农代表苏维埃呢？工农代表苏维埃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为新的革命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同时工农代表苏维埃又是组织革命的中心。

但是只有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是推翻现存政权的机关时，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时，它才能成为组织革命的中心。如果它不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它也就不能成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反对派在反对列宁主义对工农代表苏维埃的看法时不愿了解这一点。

现在，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建立两重政权，成立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机关。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是否应当推翻武汉政府呢？显然是不应当的。相反地，他们应当支持武汉政府，把它变为反对张作霖、反对蒋介石、反对地主豪绅、反对帝国主义的机关。

既然共产党现在不应当推翻武汉政府，那末现在为什么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去推翻武汉政府，这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和不可容许的；

或者是共产党人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但不实行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不把苏维埃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那时苏维埃就会死亡，变成对苏维埃的讽刺。

列宁在说到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时，总是警告不要这样做的。

你们的“问题”中说到河南已经出现了工人苏维埃，说到共产党如果不把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带到群众中去，便有做运动的尾巴的危险。同志们，这是无稽之谈。现在河南并没有任何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英国报纸散布的谣言。那里有“红枪会”，那里有农民协会，而工

人代表苏维埃目前根本没有。

当然，成立工人苏维埃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并不十分困难。但问题不在于成立工人苏维埃，而在于把它们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不这样做，苏维埃就是空架子，就是对苏维埃的讽刺。过早地成立工人苏维埃，以致后来又把它们断送，变成空架子，这正是把中国共产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变成以苏维埃玩各种各样“极左的”把戏这种行为的附属品。

一九〇五年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任主席赫鲁斯塔廖夫，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也曾要求恢复亦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认为不管环境如何苏维埃本身都能把阶级力量的对比倒转过来。列宁当时反对赫鲁斯塔廖夫说，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不应该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因为后卫队（农民）还没有靠近先锋队（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成立苏维埃，提出起义的口号是冒险的，是不适当的。

由此可见，第一、不可夸大苏维埃本身的作用；第二、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时不能不估计到周围的情况。

一般说来，在中国需要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吗？

是的，需要成立。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在土地革命展开以后，在从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必须成立苏维埃的。

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在中国奠定苏维埃政权的基础。而奠定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两重政权的基础和采取以苏维埃政权代替现在武汉国民党政权的方针。

我以为这样做还不到时候。

你们的“问题”中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易于起领袖的作用，起领导者的作用，需要些什么呢？

这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组织，有自己

的党纲，有自己的政纲，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路线。

第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农民土地运动的前列，教导农民尤其是贫农去组织革命的协会和委员会，去没收地主土地。

第三、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巩固起来，使军队革命化，改造军队，把军队从个别冒险分子的工具变成革命的工具。

最后，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武汉政府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参加武汉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在这些机关中实行进一步展开既反对地主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决的革命的政策。

反对派想以中国共产党脱离革命民主力量和退出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办法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但这是我国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所说过的那种十分可疑的“独立性”。大家知道，孟什维克当时反对列宁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工人政党的领导权，**而是**工人政党的独立性。”列宁当时答复得很对：这就是否认独立性，因为把独立性和领导权对立起来就是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我以为反对派现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时要求或暗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正是滚到一九〇五年时期孟什维克的“独立性”的道路上去了。共产党只有既在国民党党内又在国民党党外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成为领导力量时，才能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和真正的领导权。

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保证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如果中国共产党想做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党，这就是它现在要做的事情。

第九个问题

“目前能不能在中国提出成立正规红军的问题呢？”

我以为从前途来看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如果问题实际存在，那末现在，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

现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它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

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这对于在前线尤其是在后方反对所有突然钻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都是必要的。

没有这一点，就没有防止后方和前线的溃败、防止投敌和叛变的保障。

我以为这条道路是目前唯一可能而又适当的道路。

第十个问题

“现在，在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候，能不能提出夺取中国企业的口号呢？

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夺取在中国的外国工厂，这会不会引起同时夺取中国企业呢？”

我以为，一般说来，夺取中国企业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中国企业主的顽强怠工、大批怠工企业的关闭和人为的失业现象，可以迫使武汉政府现在就开始把某些怠工企业收归国有，并用武汉政府的力量使这些企业开动起来，——这种事情不是不会发生的。

可能武汉政府现在就要被迫**在个别场合下**实行这种预防办法去对付特别坏的和反革命的中国企业主。

至于外国企业，要把它们收归国有则是将来的问题。把这些企业

收归国有，就是对帝国主义者直接宣战。但是要直接宣战，就需要有稍微不同于现在的较为有利的环境。

我以为在革命的现阶段，当革命还没有巩固的时候，这种办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不适当的。

现在的任务不在于此，而在于以全力燃起土地革命的火焰，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领导权，巩固武汉，把武汉变成和中国革命的各种各样敌人作斗争的中心。

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务都堆在自己身上，而冒压伤自己的危险。况且国民党及其政府是不适于解决剥夺中外资产阶级这种极重要的任务的。要解决这些任务，就需要有另一种环境、另一个革命阶段、另一种革命政权机关。

按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反对派的错误”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71—190页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一　几个小问题

同志们！我应当道歉，今天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迟到了，未能完全听到托洛茨基在这里，在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

可是我想，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给执行委员会写了这么多的论著、提纲和书信，我们要批判反对派，材料不会是不够的。

因此，我将根据这些文件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我不怀疑，这个批判同时将是对托洛茨基今天演说的基础的批判。

我将尽可能在论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个别委员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谈的。

看来托洛茨基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行委员会把讨论战争危险、中国革命等等问题变成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我想，托洛茨基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有人喊道：“对！”）况且，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些被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型的半孟什维克赞扬我而不骂我，那对我倒是莫大的侮辱。

反对派现在的这种派别言论是否违背了他们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所承担的义务，这一点我也不多讲了。托洛茨基认定，根据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他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托洛茨基要硬说声明的内容只限于这一点，这就只能叫做诡辩，不能叫做别的。

在反对派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中不仅说到反对派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说到这些观点只有在党所许可的范围内才能坚持，派别活动应当抛弃和肃清，反对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意志和中央的决定，反对派不仅应当服从这些决定，而且应当诚心诚意地“实行”这些决定。

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证明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声明已经被他们自己极粗暴地破坏和撕得粉碎了呢？

在反对派的许多提纲、论文和演说中，下流地和极端诬蔑地歪曲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这一点我也不多说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断地硬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似乎过去坚持而且现在还在坚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个论断是捏造，诽谤，故意歪曲事实，这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实际上，**当**中国革命还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来**当**中国革命已成为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就用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代替了**那一个政策。

只要看看这些文件，如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著名宣言、斯大林的给宣传员的提纲[①]，以及布哈林日前交给

———————————————

① 见第九卷第一九九页至二〇七页。（指旧版页码）——编者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纲，就会确信这一点。

反对派的倒霉正在于他们不造谣不歪曲就活不下去。

现在我们来谈本题。

二 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藉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

既然很多省份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地主不仅握有经济权力，而且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既然直到现在一些省份里还有中世纪的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呢？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封建残余，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

因为不同时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就不能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因为谁要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谁就一定要和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作斗争。

因为不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就不能打倒并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这样，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共产国际（自然联共（布）中央也是这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而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是和刚才说过的共产国际的观点正相对立的。托洛茨基不是完全不承认中国封建残余的存在，就是认为这些封建残余没有决定的意义。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对中国封建官僚压迫的力量和意义估计过低，以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

请让我引证托洛茨基几天以前送交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众所周知的提纲吧。托洛茨基这个提纲的标题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托洛茨基在这个提纲中写道：

“布哈林藉口‘封建残余’在中国经济中似乎起主要作用来为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辩护，他这种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即使布哈林对中国经济的估计是根据经济的分析，而不是根据一些烦琐哲学的定义，‘封建残余’仍旧不能替如此明显地促进了四月政变的政策作辩护。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①]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不仔细看这一段引文就会以为托洛茨基不是反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路线，而是反对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这当然是不对的。事实上在这一段引文中所说的是**否认**封建残余在中国的“主要作用”。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是把中国现在日益展开的**土地**革命宣布为上层的革命，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以要把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说一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背叛共产国际路线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托洛茨基惯用的欺骗手法。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发条，而是次要的、不大的、只配放在引号里面的力量。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因此，中国革命主要是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论调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所持的观点就是如此。

请让我指出：这种观点正是张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观点。

如果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应该承认张作霖和蒋介石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们所要达到的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现中国的关税自主。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和蒋介石的办事员的观点了。

如果封建残余应该放在引号里面，如果共产国际宣称封建残余在革命现阶段上有主要的意义是不对的，如果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关税不自主，而不是和封建残余及支持这些残余的帝国主义作斗争，那末，中国的土地革命还有什么内容呢？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哪里来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根据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土地革命能够从天上掉下来吗？

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等省份里，千百万的农民被卷进极伟大的土地革命中，农民在这些省份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卫力量，赶走地主，“用平民手段”[①]制裁他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如果封建军阀的压迫不是中国的压迫的主要形式，那末，这样强大的土地运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不承认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和军阀的基本同盟者，那末，千百万农民的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怎能同时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呢？

仅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现在就有二百五十余万会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种会员在湖北和河南现在有多少呢？最近期间在中国其他省份又将有多少呢？

还有“红枪会”、“硬肚”[②]等等，——难道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现实吗？

难道可以真正地断言以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口号的千百万农民的土地革命不是反对真正的不容怀疑的封建残余，而是反对想像出来的引号里的封建残余吗？

————————————

① “用平民手段”系马克思语。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以打垮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垮专制制度、封建主义和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译者注

② “红枪会”是中国在民国时期出现的会门组织。它最早在山东与河南地区发展起来，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各地的名称不一，对外以称“大刀会”或者“硬肚”者为多。——本书编者注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陛下”的办事员的观点了，这难道不明显吗？

由此可见，我们有两条基本路线：

（甲）**共产国际的路线**——估计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计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计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计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线**——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种错误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是新的错误。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整个路线的极显著的特点。

低估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错误，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它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托洛茨基。

请让我举出几件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主义的事实，例如举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的事实，那时我们正走向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当时托洛茨基硬说，既然农民中间的分化已经加剧，既然目前我们这里存在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无产阶级把自己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末农民的作用就会降低，而土地革命就不会有一九〇五年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了。列宁对这一点是怎样回答的呢？

请让我从一九一五年列宁关于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论文中引出一段话来：

“托洛茨基的奇特的理论（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注）从布尔什维克这里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并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从孟什维克那里摄取了‘否认’农民作用的思想。农民呢，分为阶层了，分化了，他们可能有的革命作用渐渐消失了；在俄国‘民族’革命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滑稽例子！如果**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面临**社会主义**革命了！！那末‘没收**地主的**土地’的口号（托洛茨基继一九一二年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在一九一五年重复说的）就不对了，那末不应当说‘工人的革命的’政府，而应当说‘工人的**社会主义的**’政府了！！托洛茨基糊涂到什么程度，从他的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来：无产阶级也以坚决性吸引‘**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第二一七号）！！托洛茨基不曾想到：如果无产阶级吸引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推翻君主制，那末这将是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这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五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俄国革命有两条阶级路线，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睡觉的分子，使农村无产阶级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从一九〇六年起，布尔什维克就主张要**特别**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并把这个要求列入了孟什维克占多数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但是‘农民’和马尔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赫沃斯托夫之流的对抗却加强了，增长了，尖锐化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真理，**甚至**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几十篇文章的千言万语都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推翻’不了它。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俄国那些把‘否认’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而现在关键就在这里。”（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点在于他看见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而看不见农民，不了解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正是这个特点构成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错误。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半孟什维主义”也正是在这里。

从这个基本错误中产生了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产生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提纲中的一切糊涂观念。

三　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就拿武汉问题做例子吧。共产国际关于武汉的革命作用的问题的方针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既然中国正经历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胜利，既然南京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末，在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

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

共产国际的方针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代表什么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不代表什么。”

就说武汉是空架子吧。既然武汉是空架子，那末，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要求和这个空架子作坚决的斗争呢？从什么时候起，共产党人竟开始支持空架子，参加空架子，领导空架子呢？共产党人必须和空架子作斗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共产党人拒绝和空架子作斗争，便是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提议和空架子作斗争，即使采取共产党人立即退出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办法呢？为什么托洛茨基提议留在这个空架子里，不退出这个空架子呢？这里的逻辑何在？

这种“逻辑上的”不对头是不是由于托洛茨基对武汉指手划脚地讲了一顿，把它叫做空架子，然后又胆怯起来，不敢在自己的提纲里做出相当的结论呢？

或者拿季诺维也夫做例子来说。季诺维也夫在他今年四月提交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纲中，把武汉国民党估计为一九二〇年时期的基马尔派的政府。但基马尔派的政府是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是没有而且不能有共产党人的位置的政府。看来从对武汉的这种评价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和武汉作坚决的斗争，推翻武汉政府。

具有人类的普通逻辑的普通人是会这样想的。

季诺维也夫却不这样想。他把汉口的武汉政府估计为基马尔派的政府，同时提议给这个政府以最有力的支持，提议共产党人不要退出这个政府，不要离开武汉国民党等等。他直截了当地说：

“必须给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从那里组织对卡维涅克们的反击。在最近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帮助汉口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见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谁能懂得呵！托洛茨基说武汉（汉口）是空架子。相反地，季诺维也夫却断言武汉是基马尔派的政府。由此应该做出结论：和空架子作斗争，为推翻武汉政府而斗争。然而不管托洛茨基也罢，季诺维也夫也罢，都不敢做出从他们的前提中必然产生的结论，而季诺维也夫甚至更进一步，提议“给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反对派纠缠在矛盾里了。他们失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一切前途。

观点糊涂，在武汉问题上失去任何前途，——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把糊涂叫做方针的话，这就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方针。

四　论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

或者再拿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做个例子吧。

关于组织苏维埃的问题，我们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三个决议：列宁论在落后国家中成立**非无产阶级的**农民苏维埃的提纲，罗易论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成立**工**农苏维埃的提纲，以及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特别提纲。

列宁的提纲是说明在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亚细亚诸国成立“农民的”、“人民的”、**非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列宁的提纲里没有一句话说到在这样的国家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列宁的提纲认为苏联无产阶级对落后国家的革命的**直接**援助是在这些国家里成立并发展“农民的”、“人民的”苏维埃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这个提纲指的不是中国或印度，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有一定数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并且在这些国家里建立**工人**苏维埃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先决条件；这个提纲指的是其他较落后的例如波斯等等国家。

罗易的提纲主要是指已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国和印度。这个提纲

建议在一定条件下，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显然，这个提纲对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标题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特别提纲根据俄国和德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这个提纲断言：“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苏维埃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对苏维埃的讽刺。”显然，在讨论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最后这个提纲。

如果同时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形势和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国民党的存在，以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后两个提纲的指示，那末，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是怎样的呢？

现在，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提出推翻左派国民党和在中国成立新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口号。

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为推翻现存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出现不能不造成两重政权，而两重政权又不能不使**全部**政权应当归谁的问题尖锐化起来。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存在着临时政府，它握有一半政权，而且也许是较为实在的政权，因为当时军队还是支持它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工兵代表苏维埃，它们也握有似乎一半政权，虽然不是像临时政府那样实在的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取消临时政府，把**全部**政权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中间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因为既要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加入这个政府。

能不能说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六月俄国的形势类似现在中国的形势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由于俄国当时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现在则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由于俄国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和帝国主义的政府，现在的武汉政府则是反帝国主

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义下的革命的政府。

反对派在这方面向我们建议些什么呢？

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作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但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不只是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它们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机关。反对派不懂得：工农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只有作为新政权机关，才能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不这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就会变成空架子，变成现存政权的附属品，就像一九一八年在德国和一九一七年七月在俄国发生过的情形一样。

反对派是否懂得现时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呢？

我很怀疑季诺维也夫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托洛茨基是完全明白这一点的，因为他在自己的提纲中直截了当地说：“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号召经过两重政权的过渡制度去建立实际的政权机关。”（见托洛茨基的提纲“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由此可见，我们在中国成立苏维埃，同时就是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就是推翻武汉政府和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权。大概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拿俄国革命历史中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一个时期的事变作样本的。当时在我国的确有过两重政权，当时我们的确推翻了临时政府。

但是我已经说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为什么托洛茨基不建议共产党人现在立即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呢？怎能成立苏维埃，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同时又加入你要推翻的武汉政府呢？托洛茨基的提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显然，托洛茨基在这里已无望地陷入他自己的矛盾的迷宫里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他“忘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没有完结，不仅没有胜利，而且只处在它

发展的第一阶段。托洛茨基不懂得拒绝支持武汉政府，提出两重政权的口号，**现在**用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给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

有人向我们说：既然如此，又怎样去了解一九〇五年在俄国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呢，难道当时我们不是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但是，第一、当时只有两个苏维埃，一个在彼得堡，一个在莫斯科，这两个苏维埃的存在并没有造成俄国苏维埃政权系统。

第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当时都是反对旧的沙皇政权的起义机关，这再度证实：不可把苏维埃看做仅仅是组织革命的中心，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和新政权机关才能成为这样的中心。

第三、工人苏维埃的历史说明：只有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顺利条件，也就是只有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顺利条件，这样的苏维埃才能存在和进一步发展。

一九〇五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苏维埃，以及一九一八年德国的工人苏维埃所以灭亡，不都是由于当时没有这样的顺利条件吗？

假如一九〇五年在俄国存在着类似现在中国左派国民党这样的广大革命组织，那末可能当时在俄国就不会有苏维埃了。但是，这样的组织当时在俄国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在俄罗斯工农中间没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俄罗斯人自己就在压迫其他民族，而类似左派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只有在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因为这种压迫会把国内革命分子都集中到一个广大的组织里去。

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

但是，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一九〇五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所起的那种作用。

假如中国没有像左派国民党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胜利，而且不会很快胜利的现在，就把这个费了多年时间才成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未免太愚蠢太无知了。

某些同志根据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将来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且他们把这一点看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一般说来，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不是没有的。在我们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初，也曾谈到革命有经过苏维埃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第一、国民党不是苏维埃，说国民党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事业，并不是说国民党就能适合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事业，其实，工人代表苏维埃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合的形式；

第二、即使在一九一七年俄国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是那样地稀少，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那样地强大和众多，以致革命的每一推进和帝国主义者的每一进攻，都必然会使国民党发生新的分化，使共产党因国民党的威信降低而更为加强起来。

我想，中国革命的和平发展道路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想，在中国，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是不得不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因为在现今的条件下，没有工农代表苏维埃，这种过渡是不可能的。

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必须帮助武汉战胜反革命，必须在各地广泛地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为将来成立苏维埃的基础，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在农民和军队中的势力，——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成立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素的工农代表苏维埃。

在中国成立工人苏维埃，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篇空洞的“革命的”演说。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样轻率地看这个问题。

首先，成立工农苏维埃就是说要退出国民党，因为不能既成立苏维埃，推进两重政权，号召工农建立新政权，同时又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里面。

其次，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就是说要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要以类似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的那种联盟，代替现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在那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而在国民党党内结成联盟的政策是完全适合于这一点的，那末在这里，在成立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问题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要准备并建立这种政权，则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

其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使共产党人负有义务的。现在中国工人每月得八个卢布到十五个卢布，生活条件极恶劣，工作时间非常长。这种情形必须立即结束，而且可以结束，只要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等等。但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工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他们会向共产党人说（而且他

们是对的）：既然我们有苏维埃，而苏维埃又是政权机关，就不能压一压资产阶级，“稍微”剥夺资产阶级一下吗？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农代表苏维埃存在的条件下不走上剥夺资产阶级的道路，那末他们就会成为空谈家了。

试问，现在，在革命现阶段上，是否可以而且需要走这条道路呢？

不，不需要。

将来，在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而且需要拒绝剥夺资产阶级呢？不，不可以。如果以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保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那就是流于妄想，不了解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中阶级力量斗争的诀窍。

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并不像某些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流的极轻率的人向我们描述的那样简单。

从**原则上**来看，一般地是不是容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或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之合作呢？

某些反对派以为这是不可容许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这种参加是完全容许的。

我可以举出马克思一八四八年在德国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莱茵省的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当时这个革命的民主政党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就是由马克思主编的。

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处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内，把革命资产阶级向前推进，同时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右派同盟者的不彻底性，正像中国共产党处在国民党内应当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同盟者左派国民党人的动摇和不彻底一样。

大家知道，直到一八四九年春天，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脱离了这

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并着手成立一个具有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

由此可见，马克思甚至比作为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党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走得更远。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在一八四八年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是否适当，是可争论可不争论的。例如罗莎·卢森堡认为马克思不应当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这是**策略**问题。但是，**在原则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这是无可怀疑的。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环境中参加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那末，关于这一点，我们已有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指示。大家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在工作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中是赞成参加这种政府的。大家知道，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也是主张容许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府的。

五　两条路线

总之，在我们面前有两条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

共产国际的路线。封建残余和依靠这种残余并为各国帝国主义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军阀上层建筑是中国现状中的基本事实。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

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应当利用共产党人的这种参加使无产阶级便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并促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更快地到来。

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而共产党则应成为中国**新**的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时候，当国民党是最适合于并且最能适应中国特点的民族民主革命组织形式的时候，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提议**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立即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瓦解革命运动，削弱武汉，促使武汉垮台，帮助张作霖和蒋介石。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中国的封建残余乃是布哈林的捏造。在中国，封建残余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原来土地革命现在在中国是有的。但它从何而来，连鬼也不知道。（笑声）

既然这种土地革命是有的，那当然只好设法支持它了。

现在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的革命，即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茨基）就是基马尔主义（季诺维也夫）。

一方面，必须建立两重政权以**推翻**武汉政府，其办法是立即成立

苏维埃（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必须**巩固**武汉政府，必须给武汉政府以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其办法原来也是立即成立苏维埃（季诺维也夫）。

照例说来，共产党人应该立即退出这个“空架子”，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可是最好是让他们留在这个“空架子”里，就是既留在武汉政府里又留在武汉国民党里，既然武汉是“空架子”，为什么他们还要留在武汉呢，——这实在只有上帝才知道。谁要是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奸贼和叛徒。

所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就是如此。

几乎再想不出比这种所谓路线更荒谬更糊涂的东西了。

得到的印象是：我们不是和马克思主义者打交道，而是和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办事员，或者说得好一些，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这些旅行家游历了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①]之类的地方，忽略了提出中国革命基本方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中国确实爆发了什么革命，既像土地革命，又像反关税革命，于是就决定写一堆提纲，四月写了一个提纲，五月初写了一个提纲，五月底又写了一个提纲，把这一堆提纲写好，就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他们以为这许多糊涂的和矛盾的提纲就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

同志们，这就是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你们必须在这两条路线中间加以选择。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

我想在最后用几句话谈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派别言论在当前的政治意义和作用。他们抱怨说，没有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对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闻所未闻的谩骂和不能容许的斥责。

——————————————

② 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是苏联著名的风景区和疗养地，均在高加索。——译者注

他们抱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制度”。实质上，他们要得到瓦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自由。实质上，他们要把马斯洛夫一伙人的作风移植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里来。

同志们，我应当说，托洛茨基所选择的攻击党和共产国际的时机太不恰当了。我刚刚得到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绝交的消息。用不着证明，现在到处都会展开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了。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

可能是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但是，几乎用不着证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胆小的孩子。在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战线”。布尔什维主义历史表明，这些“战线”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决心和无比的勇敢一一粉碎了。

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鼓掌）

载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9 卷第 201—221 页

时 事 问 题 简 评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　论战争的威胁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这里所说的不是什么不固定的无形的新战争“危险”，而是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

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过时”了。某些新的国家（美国、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的国家（英国）落在后面了。在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资本主义德国正在复活、成长并日益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怀着嫉视法国的心理正往上爬。

争夺销售市场、争夺输出资本的市场、争夺通向这些市场的海陆道路、争取重新分割世界的疯狂斗争正在进行。美英之间、日美之间、英法之间、意法之间的矛盾正在增长。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正在增长，有时表现为无产阶级公开的革命发动（英、奥）。

帝国主义世界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也在增长，往往表现为公开的冲突和革命的爆发（中国、印尼、北非、南美）。

这一切矛盾的增长都表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尽管稳定是事实，这次危机却较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的危机无比地加深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存在和繁荣，只是使这个危机加深和尖锐罢了。

帝国主义正在准备新的战争，并把它看做解决这个危机的唯一途

径，这是不足为奇的。军备的空前扩张，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法西斯“管理”方法的总方针，对共产党人的十字军讨伐，对苏联的疯狂攻击，在中国的直接干涉，这一切都是同一现象（准备重新分割世界的新战争）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假如没有共产党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假如没有苏联的和平政策成为新战争煽动者的绊脚石，假如帝国主义者不怕彼此削弱从而使帝国主义战线易于遭受新的突破，那末帝国主义者早已厮杀起来了。

我想，后一种情况，即惧怕彼此削弱从而使帝国主义战线易于遭受新的突破，乃是暂时阻止厮杀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帝国主义者的某些集团就有了一种“自然的”意图：把自己阵营里的矛盾推到后面去，暂时掩盖这些矛盾，成立帝国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向苏联进军，以便牺牲苏联来解决日益加深的资本主义危机，即使是局部地暂时地解决也好。

首先倡导这件事情的，首先倡导成立帝国主义者的反苏统一战线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的参谋部——保守党，这一事实对于我们不是什么意外。英国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革命的最凶恶的绞杀者。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到现在的中国革命止，英国资产阶级一直站在而且仍然站在人类解放运动的摧毁者的前列。苏联人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我国因英国资本家的恩赐而遭到的暴行、掠夺和军事侵犯。如果英国资本及其保守党再来领导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策源地的战争，即反苏的战争，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是不喜欢用自己的手来作战的。它总是宁愿借别人的手来进行战争。它有时的确找到了甘愿为它火中取栗的傻瓜。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英国资产阶级建成了欧洲各国的联盟来反对革命的法国。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英国资产阶级进攻苏联，企图建立“十四国联盟”，虽然如此，它还是被赶出了苏联国境。

现在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英国资产阶级企图在那里建立统一战线来反对中国革命。

十分明白，保守党在准备对苏战争，它已经进行好几年的准备工作来建立大小国家的反苏“神圣同盟”。

如果在从前，在最近时期以前，保守党人的这种准备工作多少是隐蔽地进行的，那末在现今，在最近时期，他们却转而采取了“直接的行动”，给予苏联几次公开的打击，企图在万目睽睽之下结成臭名远扬的“神圣同盟”。

第一次公开打击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这次袭击至少有两个目的。它要发现苏联“破坏”工作的“可怕”文件，凭藉这些文件造成普遍愤怒的气氛和反苏统一战线的基础。它要造成和北京政府的军事冲突，使苏联对中国作战。

大家知道，这一次打击是失败了。

第二次公开打击是袭击阿尔柯斯[①]并对苏绝交。这次打击的目的是要建立反苏统一战线，开始全欧洲对苏联的外交封锁，挑起一系列对苏断绝条约关系的事件。

大家知道，这一次打击也失败了。

第三次公开打击是在华沙暗杀沃依柯夫[②]。保守党代理人所组织

————————————————

① 阿尔柯斯是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一九二〇年在伦敦设立的股份公司的简称。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该公司及苏联驻英国商务代表处同遭英国警察的搜查和袭击。——译者注

② 沃依柯夫（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是苏联外交家，自一九二四年十月起，任苏联驻波兰全权大使，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在华沙被白卫分子杀害。——译者注

的对沃依柯夫的暗杀，照主谋者的毒计，是要起萨拉也沃暗杀事件[①]的作用，使苏联和波兰发生军事冲突。

这一次打击看来也失败了。

这些打击暂时都还没有使保守党人得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呢？

因为各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这些国家有许多是愿意和苏联保持经济联系的。

因为苏联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

因为英国的附属国，无论是张作霖的国家或皮尔苏茨基的国家都一样，不愿意做保守党人的无声无臭的工具以损害其本身的利益。

看来可敬的公爵们不愿了解：每个国家，即使它是最小的国家，都情愿把自己当做一个单位，力求过自己的日子，不愿为了保守党人的漂亮眼睛而把自己的生存作孤注一掷。英国保守党人忘记了估计这一切情况。

这是不是说再不会有这样的打击呢？不，不是这样。相反地，这只是说打击将更加厉害地重复下去。不能把这些打击看做偶然的事情。它们是从整个国际环境中、从英国资产阶级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位中、从作为执政党的保守党的地位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

现在的整个国际环境，英国政府反苏“业务”中的一切事实，它组织对苏的财政封锁，它和列强进行关于反苏政策的秘密商谈，它资助乌克兰、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亚等等的流亡“政府”以期在苏联的这些国家内组织暴动，它资助间谍恐怖集团炸坏苏联桥梁、烧毁苏联工厂、恐吓和刺杀苏联驻外使节，这一切都无疑地向我

——————————————

① 萨拉也沃暗杀事件系指奥国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也沃（波斯尼亚）被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而言，这次刺杀案成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始爆发的表面原因。——译自“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编者注

们说明英国保守党政府坚决地走上了组织反苏战争的道路。同时决不可认为保守党人在某种条件下造成某种反苏的军事同盟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任务就是要在欧洲各国敲起新战争威胁的警钟，提高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士兵的警惕性，不倦地使群众有准备地以革命斗争的全副武装对付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组织新战争的种种企图。

任务就是要当众揭露一切“认为”新战争的威胁是“虚构”，以和平主义的谎言安慰工人并漠视资产阶级在准备新战争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因为这些人想使战争出乎意外地袭击工人。

任务就是要使苏联政府今后仍然坚定不移地实行和平政策，实行保持和平关系的政策，不顾我们敌人的挑拨伎俩，不顾他们对我们威信的伤害。

敌人营垒中的挑拨者正在刺激我们，将来也要刺激我们，硬说我们的和平政策是由于我们软弱，由于我们军队软弱。这有时激怒了我们的某些同志，他们易受挑拨并要求采取“断然的”手段。这是神经脆弱。这是缺乏耐性。我们不能够也不应当受敌人愚弄。我们应当走自己的道路，保卫和平事业，表明自己的和平意志，揭穿我们敌人的强盗意图，暴露他们是战争煽动者。

因为，假如敌人逼迫我们，确切些说，当敌人逼迫我们进行战争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我们有可能把苏联的劳动群众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

至于说我们“软弱”或我们军队“软弱”，那末我们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并不是第一次犯错误。约在八年以前，当英国资产阶级对苏联实行干涉，而邱吉尔以“十四国”进军来威胁的时候，资产阶级报刊也叫嚷我们军队“软弱”，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英国干涉者及其同盟者是可耻地被我们胜利的军队赶出国境了。新战争挑拨者先生们不妨记住这一点。

任务就是要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改进我们的军事工业和非军事工业，提高我国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的警惕性，锻炼他们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意志，消灭那种可惜还远没有被消灭的松弛现象。

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的后方并清除其肮脏东西，毫不踌躇地惩办“显贵的”恐怖分子和纵火焚烧我们工厂的人，因为没有巩固的革命后方，就不可能有我国的国防。

不久以前，收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兰斯柏利、马科斯顿和布罗克韦对于枪毙俄国王公贵族中二十个恐怖分子和纵火者的抗议书。我不能把这些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看做苏联的敌人，但是他们比敌人更坏。

他们比敌人更坏，因为他们自称是苏联的朋友，可是又以自己的抗议帮助俄国地主和英国密探今后组织对苏联代表的暗杀。

他们比敌人更坏，因为他们要以自己的抗议使苏联工人在其死敌面前解除武装。

他们比敌人更坏，因为他们不愿了解枪毙二十个“显贵的”分子是革命自卫的必要措施。

无怪乎人们说：“愿上帝使我们摆脱这种朋友，而敌人，我们自己是能对付的。”

至于枪毙二十个“显耀的”人物，那是让苏联的敌人知道，让国内外的敌人知道，苏联是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它的手腕是坚强的。

既然如此，对于我们那种在新战争威胁下向党作新攻击的倒霉的反对派能说些什么呢？对于认为在战争威胁下对党加强攻击是适合时机的反对派能说些什么呢？它不团结在党的周围去反对外来的威胁，却认为利用苏联处境的困难来对党作新的攻击是适合时机的，这能有什么好结果呢？难道反对派反对苏联在将来和帝国主义作战时获得胜利，反对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反对巩固我们的后方吗？或者，也许

这是在新的困难面前畏缩，临阵脱逃，以喋喋不休的左的词句掩饰逃避责任的愿望吧？……

二 关于中国

现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能给走过的道路做出某种总结，并考察一下关于检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的问题。

有几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是必须顾到的，不顾到这些原则，既不可能正确地领导革命，也不可能检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我们的反对派早已忘记了这些原则。但是，正因为反对派有健忘的毛病，所以必须一再提到这些原则。

我指的是这样的列宁主义策略原则：

第一个原则。在共产国际给各国工人运动作出指导性的指示时，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

第二个原则。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利用最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数量众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也好；

第三个原则。一定要估计到这样一个真理：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只有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

我以为顾到这些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便不可能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路线作马克思主义的检查。

我们就从这几个策略原则来考察中国革命问题。

尽管我们党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可惜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领导者”，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实在说来，这些“领导者”不

同于真正领导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衣袋里总藏着两三个现成的、对一切国家都“适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需的”公式。顾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把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和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的问题，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特点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他们不懂得，现在，当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的时候，领导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并善于把这些特点和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的易于实现并得以实现。

由此他们便企图把对一切国家的领导千篇一律化。由此他们便企图机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不顾到个别国家的运动的具体条件。由此便产生了公式和个别国家革命运动之间的永远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这些可怜的领导者领导的基本结果。

我们的反对派正是这类可怜的领导者。

反对派听说**中国**正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他们知道**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便得出一个对**中国**的现成公式：打倒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共同行动，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万岁（一九二六年四月）。

但是反对派忘记中国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国不同，它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国革命不单纯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掌握中国工业、商业和交通命脉，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加于中国劳动群众，而且加于中国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因此，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时期内支持中国革命。

大家知道，实际情形正是如此。如果拿中国革命的广州时期、国民革命军到达长江的时期、国民党分裂以前的时期来说，那就不能不

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支持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容许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条件下与这个资产阶级一起行动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结果是反对派背弃了自己的旧公式，宣布了一个“新”公式：和中国资产阶级一起行动是必要的，共产党人不应当退出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四月）。

这是对反对派的第一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愿顾到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

反对派听说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各国的代表在中国关税自主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反对派知道关税自主首先是中国资本家所需要的，由此便得出一个现成的公式：中国革命是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

但是反对派忘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主要不在于限制中国的关税，而在于它在中国拥有从数万万中国工人和农民身上吸吮血液的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和商行。

反对派忘记了中国人民所以进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支持并鼓励直接剥削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军阀、资本家、官僚等等的力量，是由于中国工人和农民不同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便不能战胜自己的这些剥削者。

反对派忘记正是这种情况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

反对派忘记谁宣传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谁就会否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因为他把中国革命交给中国资产阶级去领导了。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关税自主实质上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纲，因为甚至连张作霖和蒋介石那样的反动头子现在都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建立中国的关税自主了。

由此便产生了反对派的两重性，他们企图摆脱自己的关税自主公

式，企图悄悄地放弃这个公式，而转向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是对反对派的第二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愿认真地研究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

反对派听说商人资产阶级渗入了中国农村，把土地租给无产的农民。反对派知道商人不是封建主，由此便得出一个现成的公式：封建残余，也就是说，农民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在中国革命中没有重大的意义，现时在中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问题。

但是反对派看不见中国经济的特色不是商人资本渗入农村，而是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依然保存的条件下，中国农村封建残余的统治是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相结合的。

反对派不懂得，中国现在那种惨无人道地掠夺并压迫中国农民的整个军事官僚机器，本质上就是农村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方法的统治与商人资本的这种结合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在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个革命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中国的大小封建主。

事实表明这一革命已席卷几千万农民并有扩展到全中国的趋势。

事实表明，封建主，实在的活的封建主，在中国不仅存在着，而且在好多省份里掌握政权，使军队中的指挥人员服从他们的意志，使国民党的领导受他们的影响，接二连三地给中国革命以打击。

在此以后还否认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在此以后还不承认土地革命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反对彰明较著的事实。

由此反对派便放弃了自己关于封建残余和土地革命问题的旧公式，由此反对派便企图偷偷放弃自己的旧公式并默认共产国际的立场是正确的。

这就是对反对派的第三个惩罚，他们所以遭受惩罚，是由于他们不愿顾及中国经济的民族特点。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公式和现实间的不协调，——这就是反对派可怜的领导者的命运。而这种不协调是反对派违背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革命运动中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独有的东西这一列宁主义著名策略原则的直接结果。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原则的：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认清同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基本的原则的任务，并且十分自觉地估计到这种斗争因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如爱尔兰等）、殖民地、宗教派别等等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对第二国际的不满到处都感觉得到，并且在扩大和增长，这种不满是由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由于它不善于或不能够创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领导的中心，这个中心能够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指导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必须认识清楚，**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规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上面**[①]。只要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那末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策略的统一所要求的不是消除多样性，不是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加以正确的变更**，使这些原则正确地适应并且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在每个国家为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为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为推翻资产阶级、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采**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取具体办法的时候，要调查、研究、找出、看透、抓住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①]，——这便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一页至第七十二页）

共产国际的路线就是一定要顾到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路线。

相反地，反对派的路线就是违背这个策略原则的路线。

这种违背也就是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上倒霉的根源。

* * *

现在来说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

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产生了无产阶级在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的问题。

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站着强大的敌人：大小封建主，新旧军阀的军事官僚机器，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掌握中国经济生活命脉并用海陆军来巩固自己剥削中国人民的权利的东方和西方的帝国主义者。

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其他一切而外，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灵活的和考虑周到的政策，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裂痕，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

这种政策是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基本要求。没有这种政策，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认为这种政策是不正确的，非列宁主义的。但这只是说明他们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了，他们离开列宁主义是这样远，就像天地相隔一样。

中国无产阶级在不久以前有过这种同盟者吗？

是的，有过。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上，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些阶级的代表是和共产党人一起在一个叫做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内共同进行工作的。

这些同盟者不是也不能是同样可靠的。他们中间有些是比较可靠的同盟者（农民、城市贫民），有些是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则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党当时不容争辩地是人数比较众多的组织。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孤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右派），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推向左边，把农民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当时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这一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呢？扩大了革命地区，广州军队到达了长江；有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工会、罢工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结成了政党；成立了第一批农民组织的基层组织（农民协会）；共产党人渗入了军队。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

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移到了武汉，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民族资产阶级退到反革命阵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力。

这样，革命便失去了民族资产阶级。这对革命是局部的损失。但革命却进入发展的更高阶段，进入土地革命阶段，使广大农民群众更靠近了自己。这对革命是有利的。

当时，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国民党是不是人数众多的组织呢？无疑地是的。它不容争辩地是一个比广州时期的国民党人数更加众多的组织。

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否则武汉地区（湖北、湖南）当时就不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发展的根据地了。

当时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把它推向左边，把它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当时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呢？是的，是有的。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当时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要把武汉国民党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至少须有两个条件：国民党的彻底民主化和国民党对土地革命的直接赞助。假使共产党人放弃实行这种转变的企图，那就太愚蠢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呢？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从五六千人的小党成长为有五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大党。

工会成长为巨大的全国性的团体，约有会员三百万。农民基层组织成长为拥有几千万人的巨大的团体。

农民的土地运动发展到宏大的规模，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了中心地位。共产党争得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了土地革命的领

导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

诚然，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诚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但是以为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下子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就可笑了。只要把我们党经历过的一系列的分裂、脱离、变节、叛卖等等历史回忆一下，就能明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也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国无产阶级有没有同盟者呢？

是的，是有的。

这些同盟者就是农民和城市贫民。

现时的特征是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

这一脱离的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日益发展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主对武汉领导集团的压力，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天津地区施压力，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分裂，作为容许北进的代价。

反对派怀疑在中国有封建残余存在。但是现在谁都明白，封建残余在中国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甚至比目前革命的进攻力量还要强大。正因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在中国暂时还较强大，所以革命遭到了暂时的失败。

革命在这一次失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也正是革命暂时失败的标志。

但是革命却把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

对于革命的好处就在这里。

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要求正确

的政策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

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是正确的。既然有苏维埃的存在，既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为什么还遭到失败呢？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体当时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些。

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是正确的。既然有苏维埃的存在（苏维埃当时背叛了布尔什维克），既然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政策，布尔什维克当时为什么还遭到失败呢？因为俄国帝国主义当时比工人的革命运动要强大些。

正确的政策并不永远而且一定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要直接战胜敌人，不仅决定于正确的政策，而且首先和主要决定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于革命力量的显著优势，决定于敌人阵营的瓦解，决定于有利的国际形势。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才能导致直接的胜利。

但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是正确的政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应当予以满足的。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

能否断言过去一个时期为中国革命的直接胜利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呢？显然是不能的。

能否断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加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没有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呢？显然是不能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使广大农民群众离开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周围了。

共产党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和广州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为了

扩大革命地区，形成群众性的党，使自己有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并给自己开辟一条接近农民的道路。

共产党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联盟，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组织，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国民党的领导，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创造条件。

民族资产阶级跑进了反革命阵营，和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

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土地革命吓倒，在千百万农民群众心目中信誉扫地，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了。

但是千百万农民群众却因此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为无产阶级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领袖和领导者了。

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这难道不明白吗？

只有这种政策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这难道不明白吗？

除了我们的反对派中的可怜的领导者以外，谁能否认这种政策的正确性和革命性呢？

反对派断言：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之转到反革命方面，说明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

但是，只有忘记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并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的人才会这样说。

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直到一九一八年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联盟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否认这个联盟的正确性。这个联盟的结局如何呢？结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能否**根据这点**就断言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呢？显然是不能的。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和武汉国民党的革命联盟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否认这种联盟在革命第二阶段时期的正确性。反对派自己当时（一九二七年四月）也断言这种联盟是正确的。现在，在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脱离革命之后，怎能根据这种脱离就断言和武

汉国民党的革命联盟是不正确的呢？

只有不坚定的人才会搬弄这样的“论据”，这难道不明白吗？

难道有人断言过和武汉国民党的联盟是永无止期的联盟吗？难道天地间有永无止期的联盟吗？反对派简直丝毫不懂得第二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即无产阶级要与非无产者的阶级和集团结成革命联盟的原则，这难道不明白吗？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策略原则的：

“要能战胜较强大的敌人，就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同时**一定要**最仔细地、小心地、谨慎地、巧妙地**利用敌人中间任何的即使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各国内部各种各样资产阶级之间的任何利害冲突，并且利用任何的即使是最小的机会以获得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尽管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①]。谁要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相当复杂的政治情况中，没有**在实践上**证明自己真正善于应用这个真理，那他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把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上述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一样。”（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二页）

反对派的路线是违背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路线，这难道不明白吗？

相反地，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定要顾到这个策略原则的路线，这难道不明白吗？

* *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现在来谈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

这个策略原则所涉及的是更换口号、更换口号的程序和方法问题。它所涉及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怎样和用什么方法把群众引导到革命的立场上来，使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政治经验深信党的口号的正确性。

要说服群众，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行的。为此必须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为此必须使广大群众亲身体验到推翻现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性。

先进集团、政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已经深信，譬如说，推翻米留可夫—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不可避免性，这是好的。然而单是这一点还不足以推翻这个政府，还不足以把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当前的口号**。为了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公式从最近将来的**前途**变成**当前的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还必须有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使群众自己深信这个口号的正确性并给党以某种支持来实现这个口号。

必须把作为最近将来的**前途**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公式严格地区别开来。以巴格达齐也夫为首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集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正是在这一点上碰了钉子，那时他们过早地提出了“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当时列宁把巴格达齐也夫集团的这种企图看成是危险的冒险主义，当众斥责了它。

为什么呢？

因为后方和前方的广大劳动群众还没有决心接受这个口号。因为这个集团把作为前途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公式和作为当前口号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混淆起来了。因为这个集团**冒进**，使党有脱离当时还相信临时政府的革命性的广大群众和苏维埃而完全孤立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譬如说，在半年以前提出“打倒武汉国

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不，不应当提出。

不应当提出，因为这是危险的**冒进**，这会妨碍共产党人去接近那些还相信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广大劳动群众，这会使共产党脱离广大农民群众而孤立起来。

不应当提出，因为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没有把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发挥净尽，还没有因它反对土地革命、因它反对工人阶级、因它转到反革命方面而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心目中大丢其脸，信誉扫地。

我们总是说：只要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把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发挥净尽，就不能采取使它信誉扫地和更换它的方针，必须让它先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净尽，然后才在实践上提出更换它的问题。

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当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呢？是的，应当，完全应当。

现在国民党领导集团已因它反对革命而大丢其脸，使自己和广大工农群众处于敌对地位，这个口号一定会在人民群众中间获得有力的响应。

现在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都会懂得，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而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是做得正确的。

因为现在摆在农民和工人群众面前让他们选择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国民党现在的领导集团，那末就要拒绝满足农民和工人群众的迫切需要，就要放弃土地革命；**或者**是土地革命和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那末更换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就成为群众的当前口号了。

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要求就是如此，这个原则是有关更换口号的问题，是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新的革命立场上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是以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行动、适时地以另一些口号代替这一些

口号来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党的路线的正确性的问题。

请看列宁是怎样论述这个策略原则的：

“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上，或者没有站在至少对先锋队严守善意的中立而对其敌人完全不予支持的立场上的时候，单把先锋队投入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而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被资本压迫的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这些群众亲身的政治经验**[①]。这是所有的大革命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现在不仅被俄国而且被德国十分有力地和明显地证实了。不仅文化水平低的和多半是不识字的俄国的群众，就连文化程度高的和个个识字的德国的群众，也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真是软弱无力、毫无气节、束手无策、向资产阶级献媚、卑鄙龌龊，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不可免地是极端反动派（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②]及其同伙）的专政，然后才会坚决地转向共产主义。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共产党、共产主义集团、共产主义派别，其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把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酣睡、消沉、守旧、因循而没有醒悟的）群众**引导**到这种新的立场上，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在这些群众走近新的立场、转到新的立场的时候，善于领导这些群众。”（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三页）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意义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② 卡普（一八六八——一九二二）是德国一九二〇年反革命政变——“卡普盲动”的主要领导者，政变后成为政府首领，他的政府仅存在数日即被德国工人的总罢工推翻。——译者注

和作用，他们不承认这个策略原则，他们一贯地破坏这个策略原则。

他们（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一七年初就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还没有完成的土地运动（这是列宁的看法）。

他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工会的反动性，不承认共产党人在反动工会中工作是适当的，否认和这种工会结成临时联盟的必要性。

他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破坏了这个策略原则，企图“跳过”中国革命运动的民族特点（国民党），“跳过”中国人民群众的落后性，于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产党人立刻退出国民党，而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国民党发展阶段还没有完结没有终了的条件下又提出立即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反对派以为既然他们了解了、认清了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不彻底、动摇、不可靠，既然他们认清了与国民党的联盟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每个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都不难认清这一点），那末，这就完全足以展开反国民党、反国民党政权的“坚决行动”了，就完全足以使群众、使广大工农群众“立即”支持“我们”和“我们的”“坚决行动”了。

反对派忘记了，在这里，“我们的”了解还远不足以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率领群众。反对派忘记了，为了这一点，还必须使群众自己根据他们亲身的经验去认清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不可靠性、反动性、反革命性。

反对派忘记了，“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奇怪的是反对派忘记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状况、认识和坚决行动的决心。

我们、党和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是否知道必须推翻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否知道临时政府的存在和苏维埃的活动不能相容，是否知道政权应当转到苏维埃手中呢？是的，是知道的。

以巴格达齐也夫为首的彼得堡的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集团于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了“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企图推翻临时政府，那时候为什么列宁斥责这个集团是冒险主义者呢？

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一部分工人、千百万农民、广大军队群众以及苏维埃本身都还没有决心把这个口号作为当前的口号来接受。

因为临时政府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小资产阶级政党，还没有使自己的作用发挥净尽，还没有使自己在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心目中信誉扫地。

因为列宁知道，为了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无产阶级先进集团即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和觉悟是不够的；为了这一点，还必须使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经验深信这种路线的正确性。

因为必须经过杂乱的联合政府，经过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月、八月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变节和背叛，必须经过一九一七年六月前线上可耻的进攻，经过各小资产阶级政党跟科尔尼洛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诚实的”联合，经过科尔尼洛夫的暴动等等，才能使千百万劳动群众深信推翻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把作为**前途**的苏维埃政权口号，变成作为**当前口号**的苏维埃政权口号。

反对派的倒霉在于他们屡犯巴格达齐也夫集团当时犯过的错误，他们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宁愿顺着巴格达齐也夫的道路“行进”。

我们、党和列宁在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时候和在彼得堡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是否知道立宪会议是和苏维埃政权制度不相容的呢？是的，是知道的。

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召开这个会议呢？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敌人布

尔什维克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后，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自己召开立宪会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这是不是“尾巴主义”，落后于事变，“抑制群众”，破坏“远程射击”策略呢？当然不是的。

布尔什维克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帮助落后的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并确信立宪会议的无用，确信它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千百万农民群众靠近自己，使自己易于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关于这一点写道：

“我们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国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不是比西方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国会制度在俄国是政治上过了时的吗？当然，我们更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国会是否早已存在，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国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什么程度。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由于一系列特殊的条件，已有了极好的准备来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会，——这是完全不容争辩、完全确定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选举……

由此就得出完全不容争辩的结论：已经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国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无害，反而会使革命无产阶级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国会为什么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国会解散，**易于**使资产阶级国会制度成为‘政治上过时的东西’。”（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一页至第四十二页）

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就是这样应用第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

在中国也必须这样应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不论所指的是土地革命、国民党或苏维埃口号都一样。

看来反对派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完全失败。这当然是不对的。中国革命遭到了暂时的失败，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是怎样的失败，是多大的失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可能这是近乎长期的失败，像俄国一九〇五年发生过的那样，革命中断了整整十二年，然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推翻专制政体，为新的苏维埃的革命扫清道路。

不能认为这个前途是没有的。这还不是革命的完全的失败，正像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不能认为是彻底的失败一样。这不是完全的失败，因为当前发展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革命，中国的革命的统一，从帝国主义羁绊下得到解放）还待解决。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当然在中国也谈不上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为只有在革命高涨的环境中苏维埃才能成立和兴盛起来。

但是，恐怕不能认为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暂时还没有根据认为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没有根据，是因为反革命还没有联合起来，也不会很快联合起来，如果一般说来它有一天会联合起来的话。

因为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正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这个战争不能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时不能不使农民破产和更加怨恨。

因为在中国还没有一个集团或政府能够实行类似斯托雷平的改革来作为统治集团的避雷针。

因为已经夺得地主土地的千百万农民是不容易抑制和压倒在地上的。

因为无产阶级在劳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无产阶级的力量还远没有被击溃。

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说来，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

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入地下，经过了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头，来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了。

当然，这里的比拟是有条件的。我作这个比拟是附有一切保留条件的，如果注意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差别，那就会看出这一切保留条件都是必要的。我采用这种比拟仅仅是为了大略地描绘出中国革命失败的程度。

我想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如果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那末，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涨**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昨天，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会是我们的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作为革命的敌人而使自己信誉扫地。

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时期将有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

因此，现在，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是“头一个”说这话的人，这就是他们叫做“远程射击”的策略。

不对，最亲爱的，完全不对！这不是“远程射击”的策略，而是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远了就是射近了的策略。

当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时，这就

是**射远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

当反对派宣称中国革命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时，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偷偷地抛弃了他们的公式。

当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四月宣称中国封建残余被夸大了，而忘记了群众性的土地运动的存在时，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为后来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默认了自己的错误。

当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四月提出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时，这就是**射远了**的策略，因为当时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阵营内部的矛盾，其中一个（托洛茨基）要求采取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而另一个（季诺维也夫）相反地要求“用一切办法帮助”这个武汉政府。

但是，从什么时候起在我们中间开始把这种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远了的就是射近了的策略称为“远程射击”的策略呢？

关于苏维埃必须说，共产国际早就先于反对派而在自己的文件中谈到了中国的苏维埃这一**前途**。至于反对派在今年春天为了对抗革命的国民党（国民党在当时是革命的，否则季诺维也夫就用不着喊叫“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了）而把苏维埃作为**当前口号**提出来，这就是冒险，就是乱叫乱嚷的冒进，就是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犯的那种冒险和那种冒进。

虽然苏维埃口号在中国**最近的将来**可能成为当前口号，但是还远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对派在**今年春天**提出苏维埃口号不是危险的和有害的冒险行为。

同样的，虽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曾于一九一七年**九月**被列宁认为是必要的和切合时宜的口号（见中央关于起义的有名的决定），但还远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这个口号不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冒险行为。

巴格达齐也夫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可以讲他是“头一个”说到，还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说到苏维埃政权的人。这是不是说，巴格达齐也夫是对的，而列宁把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言论斥责为冒险主义就是不对的呢？

看来我们的反对派对巴格达齐也夫的“桂冠”总是羡慕不已。

反对派不懂得，问题并不在于“头一个”说话，从而冒进和搅乱革命事业，而在于**及时地**说话，并且要使所说的话为群众所响应而**变成行动**。

事实就是如此。

反对派离开了列宁主义的策略，其政策是“过左的”冒险主义，——总结就是如此。

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一六九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9卷第229—256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节选）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

按斯大林“论反对派”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论文演说集）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刊印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

（八月一日的演说）

一　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

同志们！我想首先谈谈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各支部即对共产国际波兰支部、奥地利支部、英国支部和中国支部的攻击的问题。我想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在关于各兄弟党的问题上混淆视听，欺骗人们，可是我们在这里所需要的是是非分明，而不是反对派的胡言乱语。

关于波兰党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大胆宣称，既然在波兰党内有以瓦尔斯基为代表的右倾，那就得归咎于共产国际，归咎于共产国际现时的领导。他说，既然瓦尔斯基有一个时期曾经有过（他确实有过）支持皮尔苏茨基军队的观点，那就得归咎于共产国际。

这是完全不对的。我想举出一些事实，举出去年七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速记记录中你们都知道的那些地方，我想引用捷尔任斯基同志这样一个人的话来做证明，他当时说，如果波兰党内有过右倾，那末培植这右倾的不是别人，正是季诺维也夫。

这是在所谓皮尔苏茨基暴动时的事情，当时我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波兰委员会的委员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捷尔任斯基、温什里赫、我、季诺维也夫等人，曾经为波兰共产党拟定决议。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草案，其中说到目前在波兰，当拥护皮尔苏茨基的势力和拥护波兰维托斯政府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时，共产党采取中立政策是不能容许的，并且**目前也不必对皮尔苏茨基进行猛力的攻击**。

我们几个人，捷尔任斯基也在内，当时表示反对，说这个指示是不正确的，它只会把波兰共产党弄糊涂。必须说明不但中立政策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支持皮尔苏茨基的政策也是不能容许的。在提出了若干反对意见之后，这个按照我们的意见修正过的指示被通过了。

我想藉此说明反对瓦尔斯基算不了什么勇敢，因为瓦尔斯基犯了错误已经受到应得的谴责；但是嫁祸于人，把自己在波兰党内培植右倾的罪过，即季诺维也夫的罪过，推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者身上，那就是犯了反对共产国际的罪过。

你们会说这是小事情，我来谈论它是徒劳无益的。不，同志们，这并不是小事情。反对波兰党内右倾的斗争现在继续着，而且还要继续下去。季诺维也夫竟有勇气（如果说得客气些）断言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是支持右倾的。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事实证明季诺维也夫嫁祸于人，诬蔑共产国际。这是他季诺维也夫的惯技，这根本不是他的什么新东西。但是，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每次都要揭穿他这种诬蔑人的伎俩。

关于奥地利。季诺维也夫在这里硬说奥地利共产党弱，它在不久以前维也纳的发动中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说奥地利共产党弱，这是对的。但是否认它的行动正确，那就是诬蔑它了。是的，它还弱，但它所以弱，其中有一点是因为还没有那种能使群众革命化、使社会民主党瓦解并使共产主义成功的可能性迅速增加的深刻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危机；它所以弱，是因为它年轻，是因为善于在左的词句掩护下进行右的机会主义活动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在奥地利早已确立了统治，是因为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社会民主党打垮。但季诺维也夫究竟要把问题说成什么样子呢？他只是暗示，却不敢明说：如果奥地利共产党弱，那就得归咎于共产国际。显然他是想这样说的。但这是一种手段拙劣的陷害。这是诬蔑。恰恰相反，正是在季诺维也夫不当共产国际主席以后，奥地利共产党才摆脱了搅扰，它的内部生活才不再遭受胡乱的干涉，因而才获得前进和发展的可能。奥地利共产党已经最积极地参加了维也纳事变，并博得了工人群众的同情，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说明奥地利共产党正在日益成长，正在变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吗？怎么能否认这些明显的事实呢？

对英国共产党的攻击。季诺维也夫要人们相信英国共产党没有从总罢工和煤矿工人罢工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它经过这次战斗以后似乎反而削弱了。这是不对的。其所以不对，是因为英国共产党的比重正在日益增大。这一点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只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从前英国资产阶级没有认真地注意英国共产党，现在却相反，英国资产阶级疯狂地迫害它，而且不但英国的资产阶级，就是总委员会和英国工党也在组织疯狂的进攻来反对他们“自己的”共产党人了。为什么以前他们或多或少容忍了英国共产党人呢？因为过去英国共产党人还弱，在群众中的影响还小。为什么现在他们不再容忍，为什么他们开始向英国共产党人疯狂进攻呢？因为他们害怕共产党，

认为它是一种力量，因为英国工党和总委员会的首领们害怕它，认为它是他们的掘墓人。季诺维也夫忘记了这一点。

我并不否认共产国际西方各支部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弱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原因在哪里呢？主要的原因在于：

第一、没有那种能使群众革命化、使群众行动起来并急遽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深刻的革命危机；

第二、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比共产党资格老的社会民主党目前在西欧各国的工人中间还是一种占优势的力量，共产党才出现不久，不能要求它们一下子就把社会民主党打垮。

尽管这样，西方共产党还是在成长，它们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还是在提高，其中有些已经成为、而另一些也正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但是阻碍着西方共产党的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反对派的分裂活动，就是现在坐在这里、坐在这个会场里的那个反对派的分裂活动。要使共产党迅速成长需要什么呢？需要共产国际钢铁般的团结，在它的各支部内不发生分裂。可是，反对派在干些什么呢？他们在德国建立了第二党，即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的党。他们正竭力在欧洲其他国家内建立同样的分裂集团。他们，我们的反对派，在德国建立了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国会党团的第二党；他们明明知道目前的分裂不能不阻碍共产党的成长，但他们还是在共产国际内制造分裂，并且现在反而喊叫西方共产党成长缓慢，把责任推到共产国际身上！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分子喊叫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它的领导）犯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孟什维主义的错误。这是对的。但他们拿这一点指摘共产国际的领导，那就完全不对了。相反地，共产国际经常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错误。这一点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从报刊上，从“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上可以知道这一点，你们

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可以知道这一点。反对派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举出而且也举不出共产国际有哪一个指示、哪一个决议会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产生孟什维主义的倾向，因为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指示。如果以为什么地方共产党内或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产生了孟什维主义的倾向就一定要归咎于共产国际，那就太荒谬了。

加米涅夫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孟什维主义的错误，并回答说，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正确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可是我要问：德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革命时期为什么犯孟什维主义的错误呢？为什么出现布兰德勒派呢？是谁支持布兰德勒派呢？反对派现在的首领托洛茨基曾经支持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孟什维主义的错误，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当时加米涅夫不说布兰德勒的出现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正确呢？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教训。他们忘记了：在革命高涨的时候共产党内一定会出现右倾和左倾，其中前者不愿抛弃过去，后者不愿考虑现在。他们忘记了没有一个革命是不发生这些倾向的。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我们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难道当时我们党内没有右倾和左倾吗？难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忘记了这一点吗？同志们，你们记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犯了孟什维主义的错误的历史吗？当时为什么出现这些错误呢？这应当归咎于谁呢？这难道可以归咎于列宁或列宁党的中央委员会吗？反对派怎么能“忘记”诸如此类的事实呢？他们怎么能“忘记”在革命高涨时党内总会出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右倾和左倾呢？而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既要打击左倾分子，又要打击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的高傲使我感到惊奇，你们看，他竟对西方或东方的共产党的极小的错误也不能容忍。在中国，党还很年轻，它成立还不过两年，在那里出现了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你们看，这竟使托洛茨基吃

惊了。可是，托洛茨基自己在孟什维克中间徘徊了多少年呢？这一点他忘记了吗？要知道，他在孟什维克中间徘徊了整整十四年——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为什么他给自己十四年的时间来徘徊于各种反列宁的“派别”之间，然后才靠近布尔什维克，而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连四年的时间也不愿意给呢？为什么他对别人这样高傲，而对自己的徘徊却忘记了呢？为什么呢？所谓“公正”究竟在哪里呢？

二 关 于 中 国

现在谈谈中国问题。

我不想多谈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上的错误了。我不想多谈，因为关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很多，而且很使人信服，这里用不着再重复了。所谓中国革命在现阶段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托洛茨基），这一点我不想多谈了。所谓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的话，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这一点也不必多谈了。关于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诸如此类的错误，你们想必已经从我们党的报刊上知道了。

现在谈谈列宁主义解决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的问题。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处理殖民地以及附属国革命运动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把帝国主义国家（即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即受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加以严格的**区别**。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一回事，在那里，资产阶级是其他民族的压迫者；在那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各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没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是另一

回事，在那里，别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在那里，这种压迫不能不也触犯到民族资产阶级；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革命的因素。

不这样加以区别，不了解这种差别，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第二国际拥护者的道路。

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一点是怎样说的：

“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与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①（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五页）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也不承认一种类型的革命和另一种类型的革命之间的这种差别。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把俄国这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中国这个被压迫的、不得不反对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

在我们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自由资产阶级不能不是反革命的。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当时就没有提出也不能提出同自由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根据这一点，反对派断言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各阶段上也应当如此，在中国，同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反对派忘记了只有那些不了解并且不承认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和压迫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的人才能这样说，只有背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弃列宁主义而滚到第二国际拥护者方面去的人才能这样说。

请看列宁关于可以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是怎样说的：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暂时的联盟**[①]，但不要同他们融为一体，无产阶级运动即使处在萌芽状态，也要绝对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七页）……“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当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只有当这种运动的代表者不阻碍我们以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资产阶级解放**[②]运动。”（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七页）

曾经非常激烈地反对**在俄国**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的列宁却认为**在中国**可以容许这种协议和联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也许列宁错了吧？也许他从革命的策略转到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吧？当然不是！这种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列宁了解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和压迫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这种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列宁了解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能够支持本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反对派不愿意了解这一点，而他们所以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背弃了列宁的革命策略，背弃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

你们是否注意到反对派的首领们在自己的演说中如何竭力避开列宁的这些指示，害怕涉及这些指示呢？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避开列宁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做的大家都知道的策略指示呢？他们为什么害怕这些指示呢？因为他们害怕真理，因为列宁的策略指示推翻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思想政治立场。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反对派糊涂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竟否认中国革命发展有任何阶段。可是，难道会有一种没有自己的一定发展阶段的革命吗？难道我国革命没有过自己的发展阶段吗？拿列宁的“四月提纲”来看就可以知道，列宁认为我国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土地运动为其主要中心；第二阶段是十月革命，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其主要中心。

中国革命有几个阶段呢？

依我看，应当有三个：

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

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现在中国革命正处在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

谁不懂得革命不会没有自己的一定发展阶段，谁不懂得中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三个阶段，谁就一点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得中国问题。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第一、它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第二、它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如香港罢工等）。当时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和根据地呢？当然是的。这一点现在恐怕只有瞎子才会否认。

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正应当具有这样的性质，这对不对呢？我想是对的。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论述中国和印度革命的“补充提纲”中直接指出，在这些国家里，“外国的强暴势力始终阻碍着

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①]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记录第六〇五页）。

中国革命已经走过这个“第一步”即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走过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时期，而进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时期。这个事实就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相反地，例如土耳其（基马尔主义者）的革命却停留在“第一步”，停留在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阶段，甚至不打算转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这个事实就是土耳其革命的特点。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在广州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是什么呢？当时它们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时广州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和革命的根据地呢？当时把广州国民党当做对帝国主义进行解放斗争的政府而加以支持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当中国的广州和土耳其的安哥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时候，我们援助广州和安哥拉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当时是跟着列宁走的，因为广州的和安哥拉的斗争分散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并挫折了帝国主义，从而便利了世界革命策源地的发展事业即苏联的发展事业。我们的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当时和我们一起支持广州和安哥拉，给了它们一定的援助，这是不是对的呢？是对的。谁来试试驳倒这一点吧。

但是，应当怎样理解在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呢？这是不是说共产党人不应当加强工农反对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应当牺牲（即使是最小限度地、即使是片刻地）自己的独立性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我以为报告人已经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文件充分证明共产国际正是教导中国共产党这样理解统一战线的。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引证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发往上海的一封唯一的电报。电报中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我绝不承认这封电报是正确的。我从来没有认为并且现在也不认为共产国际是毫无过错的。个别的错误是会有的，而这封电报无疑是错误的。但是，第一、这封电报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并没有反对派方面的任何声明或表示，**就由共产国际自行取消了**。第二、为什么反对派直到现在对这件事绝口不谈，为什么他们**过了九个月以后**才想起这封电报，为什么他们把这封电报**在九个月以前**就已经由共产国际取消了的事实瞒住了党呢？因此，如果认为这封电报规定了我们领导的路线，那就是恶意诽谤。事实上这是一封个别的偶然的电报，绝对不能代表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我们领导的路线。这一点（我重说一遍）只要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这封电报在几个星期以后就被一些规定了路线并且无疑地能代表我们领导的文件所取消了。

让我来引证这些文件吧。

例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即上述电报发出后一个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目前形势独有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过渡性，现时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以及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之间应当有所选择。**如果无产阶级不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

领导权。”①

其次：

“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②，广州国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权，就不能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

请看，这就是真正规定共产国际领导路线的文件。

非常奇怪，反对派首领们竟避开共产国际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文件。

如果我引证我自己的**也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演说，或许不算是不谦虚吧。这个委员会曾起草（当然，我也参加了）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篇演说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下面就是这篇演说中的几段：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越迅速越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越有力越强大。**”

其次：

“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而举行罢工是不应该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喊声：“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纲中应当指出这一极端不好的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势，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如果这样，中国还要革命做什么呢？”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再看第三个文件，这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发出的，当时中国各城市纷纷提意见围攻共产国际，断言展开工人斗争会引起危机、失业和工厂倒闭。文件上说：

“在城市中退却并收缩工人争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的总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必须在农村中展开斗争，但同时必须利用有利的时机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组织性，以免发生过火行为和冒进现象。特别是必须竭力把城市中的斗争引向反对大资产阶级，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留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范围内。我们认为调解室、仲裁法庭这种制度是适当的，只要在这些机关中可以保证执行正确的工人政策。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警告：发布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自由等法令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四个文件是在蒋介石政变前一个半月发出的。文件上说：

“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部工作，在没有这种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方，必须把它们成立起来；在不可能成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靠隐蔽的共产党员加紧进行工作。

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装的实际权力机关**等方针。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现，不容许随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共产党不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障碍，**共产党不应当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

必须使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者注意：目前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经历着危急的时期；只有在展开群众运动的坚决方针下，革命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遇到极大的危险。因此，现在实施指示比任何时期都更必要。”

更早些，还**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即在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政变前一年，共产国际就警告过中国共产党，向它指出“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

对于殖民地革命第一阶段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国际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理解的。

反对派是不是知道这些指导性的文件呢？当然是知道的。为什么他们对这些指导性的文件绝口不谈呢？因为他们所力求的是纠纷，不是真理。

要知道有一个时期，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懂得一点儿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基本上坚持了共产国际所奉行的、列宁同志在他的提纲中给我们规定的那一政策。我指的是**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共产国际举行第六次全会的时候，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当时他还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还没有来得及投到托洛茨基阵营去。我所以谈到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是因为这次全会在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曾经一致通过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其中对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对广州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所做的估计，大致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所做的一样，可是反对派现在却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个估计了。我所以谈到这个决议，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当时赞成这个决议，并且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个人反对它，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以及现在反对派的其他首领也不例外。

让我从这个决议中举出几段。

请看在这个决议中，**关于国民党**是怎样说的：

“上海和香港中国工人的政治罢工（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九月）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中造成了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动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一切革命民主组织首先是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其中坚分子和

中国共产党人结成了同盟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①]，这个联盟的基础就是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全部军事封建生活制度、争取国家独立并建立统一的革命民主政权的斗争中这些阶层的阶级利益的共同性。”（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决议）

总之，广州国民党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你们可以看出，这几乎就是当时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而不是别人）所祝福过的“马尔丁诺夫主义”。

关于广州国民革命政府：

“**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②]已经和最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城市民主派群众联系起来，依靠他们击溃了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并进行着使广东省全部政治生活彻底民主化的工作）。这样看来，作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先锋队的**广州政府是国内未来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③]（同上）

可见代表着四个“阶级”联盟的广州国民党政府是**革命的**政府，不但是革命的，而且是中国未来革命民主政府的**典范**。

关于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在新的危险面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展开最广泛的政治工作，组织群众性的发动去支持国民革命军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内部矛盾，并以革命民主组织领导下的**最广大居民阶层**（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去对抗帝国主义者。”[④]（同上）

由此可见，在殖民地国家内，在殖民地革命的一定阶段同**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不但是可以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要的。

这倒很像列宁在他的关于共产党人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策略的

————————————————

①②③④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著名指示中告诉我们的话。不过很可惜，季诺维也夫已经把这一点忘记了。

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

“暂时聚集在国民党周围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个别阶层，最近一年来离开了国民党，这就使得国民党的右翼中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公开反对国民党同劳动群众的紧密联盟，主张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内开除出去，并反对广州政府的革命政策。**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斥责了这个右翼，确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成立战斗联盟是必要的，这样就确定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活动的革命方向，保证了国民党能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支持。**”①（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决议）

可见共产党人如果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退出国民党就会是严重的错误。不过很可惜，曾经赞成这个决议的季诺维也夫过了个把月就把这一点忘记了。因为还在一九二六年四月间（过了一个月）季诺维也夫就要求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了。

关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各种倾向和关于不容许跳过革命的国民党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决将在反对两种同样有害的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一方面反对右的取消主义，因为这种右的取消主义忽视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任务，而主张和一般民主民族运动毫无原则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反对极左的情绪，因为这种极左的情绪力求**跳过运动的革命民主阶段**而直接跳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去，**忘记了农民**这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的决定因素。”②（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决议）

你们可以看见，现在用来揭穿反对派那种跳过中国发展的国民党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阶段、低估农民运动和跳到苏维埃方面去的行为的一切证据这里都有了。真是命中要害。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是不是知道这个决议呢？

应当认为是知道的。无论如何季诺维也夫总不会不知道这个决议，因为这个决议是在他担任主席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上通过的，而且他本人是赞成这个决议的。为什么现在反对派的首领们却避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高机关的这个决议呢？为什么他们对这个决议绝口不谈呢？因为这个决议在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上都反对他们。因为这个决议推翻了反对派现在的全部托洛茨基立场，因为反对派的首领们已经离开了共产国际，离开了列宁主义，现在他们害怕自己的过去，害怕自己的影子，不得不畏缩地避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的决议。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谈谈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的锋芒主要指向外国帝国主义，那末第二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的锋芒主要指向国内的敌人，首先是指向封建主，指向封建制度。

第一阶段解决了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的任务没有呢？没有，没有解决。它把这一任务交给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执行去了。它只是初步推动了革命群众去反对帝国主义以结束自己的行程并把这个事业交给未来。

应当认为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不能完全解决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任务。它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这样做是为了把这个事业交给中国革命的下一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去完成。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难道大家不知道在我国革命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事实（虽然环境不同、情况不同）？难道大家不知道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没有完全解决自己的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而把这个任务交

给革命的下一阶段即交给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才完全地彻底地解决了根除封建残余的任务？因此，如果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不能完全完成土地革命，如果革命的第二阶段在推动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并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封建残余之后把这个事业交给革命的下一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去完成，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只会有利于中国将来的苏维埃革命。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当革命运动的中心显然已由广州移到武汉，并且除了武汉的革命中心以外，在南京又形成了一个反革命中心的时候，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尽量利用机会来公开地组织党、无产阶级（工会）和农民（农民协会），一般说来，公开地组织革命。

就是推动武汉国民党人向左转，转向土地革命阶段。

就是把武汉国民党变成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心，变成将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

这个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

事实表明它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能够用进一步发展革命的精神教育广大工农群众。

当时反对派要求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但这是冒险主义，这是冒进，因为立即成立苏维埃在当时就是跳过中国发展的左派国民党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武汉国民党还维持着同共产党人的联盟，还没有在广大工农群众面前丧失威信和暴露自己的面目，还没有把自己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作用全部发挥净尽。

因为在群众还没有根据本身的经验确信武汉政府不中用、有必要把它推翻的时候，提出成立苏维埃和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就是冒进，就是脱离群众，使自己失去群众的支持，因而也就是断送已经开始的

事业。

反对派以为只要他们自己了解武汉国民党的不可靠、不稳固和没有充分的革命性（任何一个政治上有经验的工作者都不难了解这一点），就足以使群众也了解这一切，就足以用苏维埃来代替国民党，就足以带领群众。然而这是反对派常犯的“极左的”错误，他们总把自己的认识和了解当做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认识和了解。

反对派说得对，党应该向前迈进。这是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遵守这个原理就不成其为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全部真理是：党不仅要向前迈进，而且要带领千百万群众。向前迈进而不带领千百万群众，事实上就是脱离运动。向前迈进而脱离后卫，不善于带领后卫，就是冒进，就会使群众运动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前进。列宁式的领导其实就在于使先锋队善于**带领**后卫，使先锋队向前迈进而**不脱离**群众。然而为了使先锋队不脱离群众，为了使先锋队真正能带领千百万群众，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使群众自己根据本身的经验确信先锋队的指示、指令和口号的正确。

反对派倒霉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承认这个领导千百万群众的普通的列宁原则，他们不懂得没有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单是一个党，单是一个先进的集团，是无法进行革命的，革命归根到底是要由千百万劳动群众来“干”的。

为什么我们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虽然深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却没有提出推翻临时政府并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践口号呢？

因为无论后方或前方的广大劳动群众以至苏维埃本身，都还接受不了这样的口号，都还相信临时政府有革命性。

因为临时政府还没有因支持后方和前方的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和威信扫地。

为什么列宁痛斥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提出立即推翻临时政

府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的巴格达齐也夫集团呢？

因为巴格达齐也夫的企图是一种危险的冒进，使布尔什维克党有脱离千百万工农群众的危险。

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巴格达齐也夫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的致命伤。

季诺维也夫说我谈论巴格达齐也夫主义是把现在的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混为一谈。这当然是废话。第一、我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自己就已经附带说“这里的比拟是有条件的”，“我做这个比拟是附有一切保留条件的，如果注意到当前中国的形势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差别，那就会看出这一切保留条件都是必要的”。第二、如果断言在说明某一国家的革命中的某些派别和某些错误时完全不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相比拟，那就太荒谬了。难道一个国家的革命不能向其他国家的革命（即使这些革命不是同一类型的）学习吗？这样，还要革命科学干什么呢？

实际上，季诺维也夫否认革命科学有存在的可能。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一个时期曾经斥责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说他们是实行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中的“路易·勃朗主义”，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只要看一看列宁的“路易·勃朗主义”这篇文章就会明白，列宁虽然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和我们的十月革命不是同一类型的革命，但他在说明十月革命前某些活动家的错误时还是广泛地引用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来做比拟。既然可以谈论十月革命前的一个时期齐赫泽和策烈铁里的“路易·勃朗主义”，为什么不能谈论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巴格达齐也夫主义”呢？

反对派断言武汉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但是，季诺维也夫当时为什么断言“必须用一切办法帮助”武汉国民党，使它成为反对中国卡维涅克之流的中心呢？为什么是武汉地区而不是别的什么地区成了土

地运动最发展的中心呢？正是武汉地区（湖南、湖北）在今年年初是土地运动最发展的中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那个没有群众性的土地运动的广州可以称为“革命根据地”（托洛茨基），而已经开始并发展了土地革命的武汉地区倒不能算做革命运动的中心和“根据地”呢？既然如此，为什么反对派还要求共产党**留**在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内呢？难道反对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是主张同“反革命的”武汉国民党成立联盟吗？反对派怎么会这样“健忘”和糊涂呢？

反对派看到同武汉国民党的联盟时间不长就幸灾乐祸，断言共产国际没有把武汉国民党可能垮台这一点警告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无须证明，反对派的幸灾乐祸只是证明他们政治上的破产。反对派大概以为在殖民地国家中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应当是永久的。然而只有把列宁主义丢得干干净净的人才会这样想。如果在中国封建主和帝国主义现阶段比革命更有力量，如果这些敌对力量的压力使武汉国民党向右转并使中国革命遭到暂时的失败，那也只有感染了失败主义情绪的人才会因此而幸灾乐祸。至于反对派断言共产国际没有把武汉国民党可能垮台这一点警告中国共产党，那是反对派武库里现在大量储存的一种惯用的诽谤。

让我引证几个文件来驳斥反对派的诽谤。

第一个文件（一九二七年五月）：

“现在国民党对内政策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农村中的全部政权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为口号，在各省尤其是在广东有系统地扩展土地革命。**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就在于此**。在中国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的基础就在于此。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否则就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①]……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必须在蒋介石的后方及其部队中加强瓦解工作，援助广东省起义的农民，那里的地主统治是特别难以忍受的。”

第二个文件（一九二七年五月）：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对谭平山的巡视产生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否则就会把事业断送。**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

的。”①

你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是预见到事变的，它及时地发出了关于危险的信号，并警告中国共产党人说：如果国民党人不能成为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武汉国民党是会灭亡的。

加米涅夫说中国革命的失败应当归咎于共产国际的政策，说我们“在中国培植了卡维涅克之流”。同志们，只有存心叛党的人才会这样说我们的党。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失败时期即俄国卡维涅克之流登台的时候，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说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在其“论口号”一文中写道，七月的失败就是“卡维涅克之流的胜利”。孟什维克当时心怀恶意，硬说俄国卡维涅克之流的出现应当归咎于列宁的政策。加米涅夫是不是也以为一九一七年七月失败时期俄国卡维涅克之流的出现，应当归咎于列宁的政策、归咎于我们党的政策，而不应当归咎于别的呢？加米涅夫在这方面模仿孟什维克先生们是否体面呢？（笑声）我没有想到反对派的同志们竟会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

大家知道，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失败，而且这次失败比现在中国革命的失败更为严重。孟什维克当时说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败应当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极端革命的策略。加米涅夫在这里是不是也想仿效孟什维克对我国革命历史的解释而向布尔什维克横加攻击呢？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也许在于列宁的政策，而不在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吧？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也许在于共产国际的政策，而不在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吧？

怎么能断言某个政党的策略能够取消或转换阶级力量的对比呢？一九〇五年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为什么当时我们遭到失败呢？难道事实不是说明，如果采取反对派的政策，中国革命的失败就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会比实际上所遭到的更快吗？对于那些忘记了革命期间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企图只用某个政党的策略来说明一切的人应该怎么说呢？对于这些人只有一句话可说：他们背弃了马克思主义。

结论 反对派最主要的错误是：

（一）反对派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二）反对派看不见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

（三）反对派在殖民地国家革命第一阶段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上背弃了列宁的策略。

（四）反对派不了解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问题。

（五）反对派在先锋队（党）和后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违反了列宁的策略原则。

（六）反对派背弃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和第七次全会的决议。

反对派大肆吹嘘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断言如果采取这个政策，现在中国的情形就会好些。几乎无须证明，假如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反对派的反列宁主义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它就会由于反对派所犯的极严重的错误而使自己完全陷于绝境。

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从一个五六千人的小集团发展为拥有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将近三百万无产者组织到工会里来；中国共产党把千百万农民从沉眠中唤醒并把几千万农民吸收到革命的农民协会里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整团整师的国民革命军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由愿望变成了事实，——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获得这一切成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遵循列宁所规定的道路、遵循共产国际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的。

不用说，如果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采取反对派的政策，采取他们

的错误意见，采取他们的反列宁的方针，中国革命的这些成就不是根本没有，就是微乎其微。

恐怕只有“极左的”叛徒和冒险主义者才能怀疑这一点。

三　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

关于英苏委员会的问题。反对派断言我们似乎是把希望寄托在英苏委员会上。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破产了的反对派常用的一种诽谤。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反对派也应当知道，我们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英苏委员会上，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上。反对派欺骗党，说我们过去或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在英苏委员会上。

那末，英苏委员会究竟是什么呢？英苏委员会是我们的工会和英国的工会即改良主义的工会，和反动的工会联系的一种形式。目前我们使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化的工作是从三方面进行的：

（甲）从共产国际方面，通过各国的共产党支部来进行，这些支部的当前任务就是排除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政治领导；

（乙）从工会国际方面，通过工会中少数革命分子来进行，这些革命分子的当前任务就是战胜工会中反动的工人贵族；

（丙）通过英苏统一委员会来进行，这个委员会是能使工会国际及其各支部易于进行孤立工会中工人贵族的斗争的一种工具。

只要阶级和阶级社会存在，前两方面就是基本的和经常的，对于共产党人是必不可少的。第三方面只是暂时的、辅助的和非经常的，因而也就是不稳固的，不总是可靠的，有时竟是完全不可靠的。把第三方面和前两方面等量齐观，就是违背工人阶级的利益，违背共产主义。既然如此，怎么可以乱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英苏委员会上呢？

我们同意成立英苏委员会，目的是要和英国工会组织内的工人群

众建立公开的联系。

这是为了什么呢？

第一、为了便于建立工人的反对资本的统一战线，至少是为了使工会运动的反动首领难于反对建立这种统一战线。

第二、为了便于建立工人的反对一般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特别是反对武装干涉危险的统一战线，至少是为了使工会的反动首领难于反对建立这种统一战线。

一般说来，共产党人是否可以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呢？

不仅可以，有时简直是必要的，因为在反动工会中有千百万工人，而共产党人没有权利拒绝参加这些工会，拒绝找到接近群众的途径并把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请看一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你们就会知道，列宁的策略要求共产党人不要拒绝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

一般说来，是否可以在工会工作方面或者在政治方面同反动工会成立暂时的协议呢？

不仅可以，有时简直是必要的。至于西方工会多半是反动的，这谁都知道。但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些工会是**群众性的**工会。问题在于通过这些工会可以获得接近群众的机会。问题在于使这种协议不妨碍和不限制共产党人的革命宣传鼓动的自由，使这种协议促进改良主义者的分化，促进暂时还跟着反动首领走的工人群众的革命化。在这种条件下，同群众性的反动工会成立暂时的协议，不仅可以，有时简直是必要的。

请看列宁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那许许多多由无产者到半无产者（就是那些一半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由半无产者到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以及一般的小业主），由小农到中农等等

形形色色的过渡阶层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自己内部没有分为发展程度不同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以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各种无产者集团、对各种工人政党和各种小业主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办法**[①]。全部问题就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制胜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五页至第五十六页）

其次：

“至于说韩德逊之流、克莱因斯之流、麦克唐纳之流、斯诺顿之流是不可救药的反动派，这是正确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和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权），说他们想依照资产阶级的老一套方式来‘实行管理’，说他们一旦抓到政权，他们的行为必定和谢德曼之流、诺斯克之流一模一样，这也是正确的。这些都说得对。**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的利益应该在国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相当的支持。**”[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二页）

反对派倒霉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了解也不承认列宁的这些指示，他们宁愿说一些“极左的”关于工会反动性的空话，而不要列宁的政策。

英苏委员会是不是妨碍了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呢？它能不能妨碍这种工作呢？不，不能。我们一向都在批评而且今后还要批评英国工人运动首领的反动性，向英国工人阶级群众揭露这些首领的变节和背叛行为。我们一向对总委员会的反动活动进行公开的无情的批评，让反对派试来推翻这一事实吧。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有人对我们说，这种批评会使英国人和我们决裂而把英苏委员会搞垮。好吧，让他们决裂吧。但问题完全不在于决裂不决裂。问题在于决裂发生在什么问题上，决裂表现什么思想。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一般战争的威胁，特别是关于武装干涉的威胁。如果英国人要决裂，工人阶级就会知道，英国工人运动的反动首领是因为**不愿意反对**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策划战争而决裂的。几乎用不着怀疑，在这种条件下，英国人所造成的决裂会使共产党人易于揭露总委员会，因为现在战争问题是当前的基本问题。

可能他们不敢决裂。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在批评自由上、在继续批评英国工人运动的反动首领的自由上已经有了保证，可以在广大群众中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和社会帝国主义本质。这对工人运动好不好呢？我想这并不坏。

同志们，我们对英苏委员会问题的态度就是如此。

四 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

关于战争问题。我首先必须驳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那个完全不正确的、与实际情形不符的声明，他们说我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似乎是属于所谓“军事反对派”的。同志们，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穷极无聊捏造出来的谣言。我手头有一本速记记录，从这本记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当时是和列宁一道反对所谓“军事反对派”的。而且这里还有参加过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人，他们可以证明我当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是反对“军事反对派”的。也许我没有像托洛茨基所喜欢的那样仇视地反对“军事反对派”，因为我认为：在军事反对派中间有一些是前线不可缺少的卓越的工作者，但我无疑是反对军事反对派并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这是**事实**，恐怕只有像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这样不可救药的人才能反驳

这个事实。

当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必须结束志愿兵制度和游击主义，必须建立一支真正的、正规的、有铁的纪律的工农军队，必须吸收军事专家来参加这一工作等问题。

当时主张建立正规军和铁的纪律的人曾提出一个决议草案。为这个草案辩护的有列宁、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等人。当时主张在军队中保存游击主义成分的人曾提出另外一个草案，即维·斯米尔诺夫的草案。为这个草案辩护的有维·斯米尔诺夫、萨发罗夫、伏罗希洛夫和皮达可夫等人。

下面就是我的演说中的几段话：

“这里所谈到的一切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俄国有没有一支有严格纪律的正规军。半年前，我们有了一支新的军队，这是在沙皇的旧军队瓦解之后建立的一支志愿军，它组织得不好，实行集体管理，并不总是服从命令。那正是协约国开始进攻的时期。军队的成员即使不完全是工人，至少主要是工人。由于这支志愿军中缺乏纪律，由于并不总是执行命令，由于军队管理上乱七八糟，我们一再遭到失败，把喀山交给了敌人，而克拉斯诺夫则从南方顺利地展开了进攻……事实说明，志愿军是经不起考验的，如果我们不另外建立一支军队，一支充满纪律精神、有组织得很好的政治部、并且一接到命令就善于并能够奋起杀敌的正规军，那我们就不能保卫我们的共和国。

我必须说，那些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工人分子——农民——是不会自愿为社会主义而战的。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后方和前线的许多次骚动，前线的许多次捣乱，都说明在我们军队中占多数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并不想自愿为共产主义而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以铁的纪律的精神去改造这些分子，不仅在后方，而且在前线都引导他们跟随无产阶级前进，使他们为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战斗，并在战争的进程中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唯一能够保卫国家的正规军。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或者我们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的工农正规军而保卫住共和国，或者我们不这样做而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毁灭。

……斯米尔诺夫提出的草案是不能采纳的，因为这个草案只能破坏军队的纪律和取消建立正规军的可能性。”

同志们，事实就是如此。

你们可以看出托洛茨甚和季诺维也夫又是在诽谤。

其次，加米涅夫在这里断言我们在最近一个时期，在这两年中，把我们从前在国际上所拥有的精神资本都挥霍完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完全不对！

加米涅夫是指的哪些居民阶层，我们是在东方和西方的哪些居民阶层中丧失或博得威信，这一点加米涅夫并没有说明。然而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正是这个问题。例如拿中国来说，能不能断言我们在中国工农中间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资本呢？显然是不能的。不久以前，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我们还知道得很少。不久以前，苏联的威信还局限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狭小圈子里，局限于国民党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像冯玉祥那样的活动家和广州的将军们等等的狭小圈子里。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苏联在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是世界上任何势力、任何政党都会羡慕的。但是，苏联的威信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和所有将军等等的心目中却大大地降低了，而他们中间的好多人甚至开始反对苏联了。但这有什么奇怪，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可以要求苏联，要求苏维埃政权和我们党做到使我国**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阶层中**都有精神威信吗？除了无聊的自由派以外，谁能对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对我们来说，是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和所有反动将军中间有威信好呢，还是在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中间有威信好？从我们的国际地位的观点来看，从全世界革

命发展的观点来看，下面两种情形哪一种具有决定意义：是**苏联在中国社会的自由派反动集团中的威信显著降低**而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增高呢，还是**苏联在广大居民群众中精神影响降低**而在那些反动的自由派集团中有威信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加米涅夫是大错特错了……

而在西方呢？能不能说我们已经把我们在西方无产阶级阶层中的精神资本都挥霍完了呢？显然是不能的。例如最近维也纳无产阶级的发动，英国的总罢工和煤矿工人罢工，德国和法国工人为了保卫苏联而举行的成千上万人的游行示威，这些都说明什么呢？这些事实是不是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影响在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心目中日益降低呢？当然不是！相反地，这些事实说明苏联的精神影响在西方工人中间日益增长和加强，西方工人已经开始“按照俄国方式”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搏斗了。

毫无疑问，在和平主义的反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中，对苏联的敌视正在增强，特别是由于枪毙了二十个“显贵的”恐怖分子和纵火分子而更增强了。但是，难道加米涅夫对反动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集团的意见比对西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更为重视吗？枪毙了二十个“显贵的”分子以后，无论在我们苏联或在西方千百万工人群众中间都引起了最深切的同情，这个事实谁敢否认呢？“对他们这帮坏蛋就该这样！”——这就是工人区对于枪毙二十个“显贵的”分子所发出的喊声。

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一种人，他们断言我们愈温和我们就愈好。他们这些人对我们说：“当英国和苏联断绝关系时，苏联的情况很好；当有人杀害了沃依柯夫时，苏联的情况就更好了；但是，当我们显出厉害，以枪毙二十个‘显贵的’反革命分子去回答沃依柯夫的被害时，苏联的情况可就坏了，在枪毙二十个人以前，欧洲有人可怜我们，同情我们；相反地，在枪毙了二十个人以后，人们不同情了，并且开始

指摘我们，说我们不是欧洲舆论所希望的那种乖孩子了。”

对于这种反动的自由派哲学，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对于这种哲学只能说：创造这种哲学的人希望苏联软弱无力，赤手空拳，向敌人屈膝，向敌人投降。过去有过一个“血淋淋的”比利时，这幅图画有一个时期被当做商标，在香烟盒上常常可以看到。为什么不可以来一个“血淋淋的”苏联呢，——这样大家就都会同情它，大家就都会可怜它了。不行，同志们！这一点我们不同意。还是让所有这些自由派和平主义的哲学家连同他们对苏联的“同情”一起滚开吧。只要我们有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同情，什么都好办了。如果真的需要使谁变成“血淋淋的”，那末，我们一定要竭力使某个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使苏联被打得头破血流并变成“血淋淋的”。

关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问题。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大嚷大叫，断言在布哈林的提纲中所谈的是战争的“或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而不是战争的绝对不可避免性。他断言这种说法会把党弄糊涂。我把季诺维也失的文章“未来战争的轮廓”拿来看了一遍。结果怎样呢？原来在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没有一个字、简直没有一个字提到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在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所谈的是新战争的可能性。文章中有整整一章证明战争是**可能**发生的。这一章结尾的一句话是：“正因为如此，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说来，现在考虑一下新战争的可能性，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大笑）同志们，请注意，——“**考虑一下**”新战争的**可能性**。在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中有一个地方谈到战争“**正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但没有一个字、简直没有一个字提到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这个人竟有勇气（如果说得客气些）指摘布哈林的那个谈到战争已经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的提纲。

现在谈战争的“可能性”是什么意思呢？这等于把我们至少拖回到大约七年以前去，因为还在大约七年以前，列宁就说过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是可能发生的。季诺维也夫何必重弹老调，拿自

己的倒退冒充新的言论呢？

现在谈战争**正在成为**不可避免是什么意思呢？这等于把我们至少拖回到大约四年以前去，因为还在克逊最后通牒的时期，我们就说过战争正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季诺维也夫昨天刚写了一篇乱七八糟的荒谬绝伦的关于战争的文章，其中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可是这个人现在竟敢对布哈林关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明确的提纲进行攻击，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季诺维也夫忘记了他昨天写的东西。原来季诺维也夫属于今天写作是为了明天就把它忘掉的那种幸福人物。（笑声）

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断言“推动”布哈林用战争的或然性和不可避免性的精神来写他的提纲的是契切林同志。我要问：是谁“推动”季诺维也夫现在当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时写了一篇谈论战争的**可能性**的文章呢？（笑声）

关于资本主义稳定问题。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攻击布哈林的提纲，断言这个提纲在资本主义稳定问题上离开了共产国际的立场。这当然是胡说。这只是表明季诺维也夫自己在资本主义稳定问题上、在世界资本主义问题上愚味无知。季诺维也夫以为既然是稳定，那就是说，革命事业垮台了。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灭亡的酝酿正从稳定中成熟起来。最近资本主义改进了它的技术并使之合理化，制造出大量无法销售的商品，这难这不是事实吗？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愈来愈法西斯化，它们进攻工人阶级并暂时巩固着自己的阵地，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从这些事实是否应该得出结论说稳定已成了持久的呢？当然是不应该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实促使那种比上次帝国主义战争前的危机远为深刻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日趋尖锐化。

正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日益法西斯化这个事实促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情况尖锐化并引起工人的革命发动（维也纳、英国）。

正是资本主义使技术合理化并生产出市场所无法消纳的大量商品这个事实促使帝国主义阵营中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尖锐化，促使新战争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条件产生出来。

在世界市场有一定限制和“势力范围”已经固定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极大增长使争夺市场的斗争加剧，使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这难道还不容易了解吗？

假如资本主义能把工人的工资提高几倍，假如它能大大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假如它因此而能大大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购买力并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那末，它就能解决这个危机。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正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这样做，正因为资本主义不是把它的“收入”用来增进大多数劳动者的福利，而是用来加紧剥削他们并向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输出资本，以便获得更多的“收入”，——正因为如此，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争夺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就引起了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殊死斗争，这种斗争使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某些帝国主义集团仇视苏联，组织统一战线来反对它呢？因为苏联是一个最富裕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为什么也是这些帝国主义集团要干涉中国呢？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富裕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如此等等。

新战争不可避免的基础和根源就在于此，——不管这种战争是在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爆发的还是进攻苏联的，反正都一样。

反对派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些简单的起码的东西。

关于保卫我国问题。现在让我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谈谈我们的反对派打算怎样保卫苏联的问题。

同志们！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

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末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现在，在战争威胁面前形成了两个阵营，因此也就出现了两种立场：一种立场是无条件地捍卫苏联，另一种立场是反对苏联。在这中间必须加以选择，因为第三种立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从保卫苏联、捍卫苏联的观点来看，反对派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让我来引证托洛茨基写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那封大家都知道的信，让你们看看托洛茨基所保藏的、准备在反苏战争爆发时拿出来用的那种保卫“理论”和保卫口号吧。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已经引用了这封信里的一段话，但是他没有引用全段话。让我把它全部引用出来。

请看托洛茨基对失败主义和护国主义是怎样了解的：

“失败主义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旨在促使敌对阶级所掌握的‘自己的’国家遭到失败的政策。对失败主义的任何其他了解和解释都是伪造。例如，谁要是说正是为了工人国家的胜利应该把那些无知的和无耻的抄袭家的政治路线像垃圾一样地扫除掉，谁决不会因此就成为‘失败主义者’。恰恰相反，在这一具体条件下，他却是革命的护国主义的真正代言人，因为思想垃圾是不会产生胜利的！

在其他阶级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极有教益的事例。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帝国主义战争开始时，领导法国资产阶级的是个既没有舵又没有帆的政府。克列孟梭集团当时是这个政府的反对派。不顾战争和战时的书报检查，甚至不顾德国人已经离巴黎只有八十公里（克列孟梭说：“正是这个缘故”），他激烈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拥护帝国主义者的暴戾残忍。克列孟梭并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相反地，他比维维安尼、庞勒维及其伙伴更忠实、更坚定、更坚决、更聪明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后来事变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克列孟梭集团登台执政后，就用更彻底、更带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政策保证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当时法国报界有没有人称克列孟梭集团为失败主义者呢？大概是有的，因为在一切阶级的队伍里总会有一些糊涂虫和诽谤者拖在后边的。但他们并不总是能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摘自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给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信）

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提出的所谓保卫苏联的“理论”。

“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这原来是指我们党的多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和我们政府的多数。克列孟梭——这是指托洛茨基和他的集团。（笑声）如果敌人到了离克列姆里宫墙约有八十公里的地方，那末，这位新出现的克列孟梭，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原来就是因为敌人离克列姆里只有八十公里，所以力图首先推翻目前的多数，然后才去进行保卫。如果我们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能够做到这

一步，那末，这原来就是真正地无条件地保卫苏联了。

而为了做到这一步，他，托洛茨基，即克列孟梭，“为了工人国家的胜利”就要力图首先“扫除”这种“垃圾”。而这种“垃圾”是指什么呢？原来是指党的多数、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和政府的多数。

看吧，原来当敌人到了离克列姆里八十公里的地方时，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所要做的并不是保卫苏联，而是推翻目前党的多数。这就是他的所谓保卫！

如果这个在四个月内才勉强凑了千把张票的小小的唐·吉诃德式的集团竟向拥有百万人的党威胁说“我要扫除你”，那当然是有些可笑的。既然托洛茨基集团累得满头大汗地工作了四个月才勉强凑了千把人的签名，那就可想而知这个集团已经悲惨到了何等地步了。我想，随便一个反对派集团，只要会做工作，都能凑上几千人的签名。我再说一遍：这个小小的集团，它的首领比军队还多，（笑声）工作了整整四个月才勉强凑了千把人的签名，如果它竟向拥有百万人的党威胁说“我要扫除你”，（笑声）那是可笑的。

一个小小的派别集团怎么能“扫除”拥有百万人的党呢？反对派中间的同志们是否以为目前党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是偶然的，它在党内没有根基，它在工人阶级中没有根基，它会心甘情愿地让小丑般的克列孟梭把它“扫除”呢？不，这个多数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年一年地在我们党的发展进程中聚集起来的，它是在斗争的烈火中、在十月革命时期、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国内战争时期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受过考验的。

要“扫除”这样的多数，就必须在党内发动内战。请看托洛茨基就是打算在敌人离克列姆里八十公里的时候在党内掀起内战的。真是坏到无以复加了……

可是，反对派现在的首领呢？难道他们没有受过考验吗？有一个时期他们曾在我们党内担任极重要的职位，后来却成为变节者，这难

道是偶然的吗？决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是偶然的，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而托洛茨基竟想藉助那个在反对派政纲上签名的小小集团在敌人离克列姆里八十公里的时候扭转我们党的历史车轮，而且据说，一部分同志在反对派政纲上签名是因为他们以为签了名就不会被拉去打仗了。（笑声）

不，最亲爱的托洛茨基，你顶好不要谈“扫除垃圾”吧。顶好不要谈吧，因为这种话是有传染性的。如果多数被你扫除垃圾的方法“传染”了，那我不知道这对反对派是否有好处。要知道，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不是不会被这种方法“传染”而把某个人“扫除”掉的。扫除的言论并不总是称心如意和没有危险的，这种言论是会“传染”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并迫使他们把某个人“扫除”的。既然托洛茨基想用一把扫帚来对付党和党的多数，那末，党要是掉转这把扫帚来对付反对派，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现在我们知道反对派想怎样保卫苏联了。托洛茨基那种为整个反对派所拥护的关于克列孟梭的、实质上是失败主义的理论，十分清楚地给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原来为了保证保卫苏联首先必须做一次克列孟梭式的实验。

这就是反对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第一步。

保卫苏联的第二步原来就是要宣布我们党是中派的党。我们党既对背离共产主义的左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进行斗争，又对背离共产主义的右倾（斯米尔诺夫—萨普龙诺夫）进行斗争，这一事实却被我们无知的反对派说成中派行为。

这些怪人原来忘记了我们对两种倾向进行斗争不过是实行列宁的遗训而已，因为列宁所绝对坚持的就是要对“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反对派的首领们背弃了列宁主义，把列宁的遗训置诸脑后。反对派的首领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联盟即反对派联盟是背离共产主义的左

倾分子和右倾分子的联盟。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现在的联盟是那个尽人皆知的遭到了悲惨命运的托洛茨基八月联盟在新基础上的复活。他们不愿意了解正是这个联盟包藏着蜕化的危险。他们不愿意承认把骗子和反革命分子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之类的“极左倾分子”以及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倾向分子联合在一个阵营里就是取消派八月联盟最坏的翻版。

总之，为了组织保卫苏联，原来必须宣布我们党是中派的党，必须设法剥夺我们党在工人心目中的那种感召力。

这就是反对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第二步。

保卫苏联的第三步原来就是要宣布我们党是不存在的，把它说成是“斯大林的派别组织”。反对派分子想用这一点说明什么呢？他们想用这一点说明没有党而只有“斯大林的派别组织”。他们想用这一点说明他们不必受党的决议的约束，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破坏这些决议。他们想用这一点使自己便于对我们党进行斗争。固然，他们这个武器是从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报”和资产阶级的“舵报”的武库中拿来的。固然，从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那里拿武器，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但是他们哪里还管得到这一点呢？在反对派看来，只要能进行反党的斗争，一切手段都是好的。

总之，为了准备保卫苏联，原来必须宣布党即那个任何保卫非它不可的党是不存在的。

这就是反对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第三步。

保卫苏联的第四步原来就是要分裂共产国际，在德国组织一个以骗子和反革命分子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为首的新党，以便阻挠西欧无产阶级对苏联的援助。

总之，为了准备保卫苏联，原来必须分裂共产国际。

这就是反对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第四步。

保卫苏联的第五步原来就是要给我们党加上特米多尔倾向[①]的罪名，要分裂我们党并着手建立一个新党。因为既然我们没有党，既然只有“斯大林的派别组织”，而党员不必受它的决议的约束，既然这个派别组织是特米多尔化的（虽然，说我们党特米多尔化，那是愚蠢无知的），那末，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总之，为了组织保卫苏联，原来必须分裂我们党并着手组织一个新党。

这就是反对派所谓“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第五步。

你们看，这就是反对派为了保卫苏联而提出的五项最重要的措施。

反对派的这一切措施和保卫我们国家、保卫世界革命策源地是毫不相干的，这还需要证明吗？

而这些人却要我们把他们的失败主义的、半孟什维主义的文章刊登在我们党的报刊上！他们究竟把我们当做什么人呢？难道我们这里会有“从无政府主义者起到君主主义者止”的出版“自由”吗？这种“自由”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为什么我们不刊登孟什维主义的文章呢？因为“从无政府主义者起到君主主义者止”的各种反列宁主义的、反苏维埃的派别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出版“自由”的。

反对派分子坚持要刊登自己那些半孟什维主义的、失败主义的文章，究竟是想干什么呢？他们是想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打开一个小窗户，而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这样做就会使反苏维埃分子活跃起来，就会加强反苏维埃分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并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开辟一条道路。他们敲这个门，却开了另一个门。

请看唐恩先生关于反对派是怎样说的：

“尽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反对派的值得赞同的纲领毫无共同之

————————————

① 所谓特米多尔倾向或特米多尔化，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是指权力从无产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情况，这种蜕化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形式上还是在苏维埃制度的结构内。——本书编者注

点，但他们还是会热烈欢迎反对派的这种合法化的。他们会欢迎政治斗争的合法性，会欢迎公开地自动取消专政而采取新的政治形式来为广泛的工人运动开辟活动场所。”（一九二七年七月“社会主义通报”第十三期）

“公开地自动取消专政”，——反对派的同志们，这就是苏联的敌人所期待于你们的，这就是你们的政策所要产生的后果。

同志们！现在我们面临着两种危险：一种是战争危险，它已经变成了战争威胁；另一种是我们党内某些环节蜕化的危险。为了准备保卫，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建立铁的纪律。没有这种纪律，保卫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巩固党的纪律，我们必须制裁一切正在瓦解我们党的分子。我们必须制裁一切正在分裂我们西方和东方兄弟党的分子。（鼓掌）我们必须制裁一切受骗子苏瓦林、路特·费舍、马斯洛夫以及糊涂虫特伦支持的正在分裂我们西方兄弟党的分子。

只有这样，也只有用这种办法，我们才能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战争，同时我们要竭力忍受某些物质上的牺牲，以推迟战争，赢得时间，向资本主义赎买。

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种危险就是蜕化的危险。

这种危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那里来的（指着反对派）。必须消灭这种危险。（鼓掌多时）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0 卷第 3—43 页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节选）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一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列宁和共产党实际上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哪些新原则？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候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答：我以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

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就是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下面几个问题上列宁做了某种新贡献，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

第一、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即资本主义平稳进化并向全球“和平”扩展的时期。

这个旧阶段是到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完结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逝世了。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即由于资本主义新阶段代替了旧阶段、由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产生的新条件，只能做一种推测。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跃进式的、剧变式的发展所代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表现得特别厉害，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的功绩即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做了一个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揭露了它的溃疡以及它的必遭灭亡的条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原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本政权的方法，——这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甲）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乙）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

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

（丙）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第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看做相当长久并充满革命搏斗和国内战争的时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采取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组织上的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列宁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基本原理为根据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甲）他论证了在一个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这个国家不被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所扼杀；

（乙）他拟定了经济政策的具体办法（“新经济政策”），使握有经济命脉（工业、土地、运输业、银行等等）的无产阶级能运用这些具体办法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从而把全部国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

（丙）他拟定了通过合作社把基本农民群众逐渐引上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具体办法，认为合作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用来改造小农经济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基本农民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第四、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任何人民革命中，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基本要点。列宁在

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向前发展了这些基本要点，把它们扩展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整体系，扩展为无产阶级不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中，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对城乡劳动群众实行领导的严整体系。

大家知道，由于有列宁和列宁的党，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才在俄国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这也就是俄国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原因。

从前的情况通常是这样：在革命时期，工人在街垒里进行搏斗，他们流了血，推翻了旧制度，而政权却落到资产者的手里，然后资产者又来压迫和剥削工人。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德国的情形也是这样。我们俄国的情形却不同了。在我们这里，工人不仅仅是革命的突击力量。俄国无产阶级一方面是革命的突击力量，同时还力求成为领导者，成为城乡所有被剥削群众的政治领袖，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他们离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俄国无产阶级既然是被剥削群众的领导者，它进行斗争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谋取自身的利益，来反对资产阶级，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每一次强有力的发动，无论是在一九〇五年十月或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都把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负有镇压资产阶级使命的新政权机构的萌芽搬上舞台，来对抗资产阶级国会这个负有镇压无产阶级使命的旧政权机构。

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曾经两次企图恢复资产阶级国会，消灭苏维埃：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即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前的预备国会开会期间；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的立宪会议开会期间，——而每一次都遭到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陷于孤立，千百万劳动群众已经认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袖，而苏维埃已经经受过群众的审查和考验，已经被群众看做是自己的工人政权了；对无产阶级来说，拿这个政权

去换资产阶级国会就等于自杀。所以无怪乎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正因为如此，革命在俄国就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

这就是实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的结果。

第五、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析爱尔兰、印度、中国、中欧各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事件时，已提供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的主要的思想。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甲）他把这些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

（乙）他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丙）他宣布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总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没有党就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就是说，既不能夺得政权，也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他指出：

（甲）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高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工会、合作社、国家组织），它的使命是综合和指导这些组织的工作；

（乙）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力量的党才能实现；

（丙）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丁〉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镇压剥削者以及把阶级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不能实现。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里所做的新贡献大体上就是如此，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把马克思的学说具体化了并向前发展了。

所以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决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割开来，更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在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中还说到：

“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我认为这样说是完全不正确的。我认为任何一种人民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创造性的革命，因为它打破旧的制度而创造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

某些落后的国家里有时也发生一些部落反对其他部落的儿戏似的“起义”，这样的所谓“革命”当然是不会有丝毫创造性的。可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种儿戏似的“起义”看做革命。这里指的显然不是这种“起义”，而是发动被压迫阶级去反对压迫阶级的群众性的人民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能不是创造性的革命。马克思和列宁正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并且只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同时很明显，这样的革命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生的，它只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时才能爆发。

第二个问题：能不能说共产党监督着政府？

答：这完全要看对监督是怎么了解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监督的了解是有些特别的。我知道，许多资本主义的政府，尽管有“民主的”国会存在，却受大银行的监督。国会总想使人相信是它们在监

督政府。而事实上政府的成员却是由大财团内定的，政府的行动也是受大财团监督的。谁不知道无论在哪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内，违反大财阀的意旨，内阁是组不成的，只要这些财阀一施财政压力，部长们就抱头鼠窜地下台。和国会的假监督相反，银行对政府的监督才是真监督。

假如你们指的是这种监督，那我必须说，富豪对政府的监督在我们这里是不可思议的，并且是根本不会有的，这至少因为在我们这里银行早已收归国有，而富豪已经被驱逐出苏联了。

也许代表团想问的不是监督而是党对政府的领导吧？如果代表团想问的是这个，那我要回答说：是的，在我们这里是党领导政府的。而这种领导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党得到多数的工人和一般劳动者的信任，它有权代表这个多数来领导政府机关。

苏联的工人政党——苏联的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表现在共产党力求通过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把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并愿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自己的候选人，自己的优秀工作人员，输送到我国重要的国家工作岗位上去。而党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工人和农民对党都采取信任的态度。我国政权机关的领导者是共产党员，他们，这些领导者，在我国有很高的威信，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二表现在党检查各管理机关的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纠正那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缺点，帮助这些机关执行政府的决议，竭力保证它们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它们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

第三表现在任何政权机关在制定工业和农业方面或商业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计划时，党都要给它们总的方针性的指示，确定它们在计划执行期间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向。

资产阶级的报刊对于党这样“干涉”国家事务通常总是表示“惊奇”。但是这种“惊奇”完全是假装的。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政党正是这样“干涉”国家事务和领导政府的，而且在那里是由极少数人操纵领导的，这些人和大银行有着各种联系，因此，他们竭力不让人民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谁不知道在英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有一个由极少数操纵领导的人所组成的秘密内阁呢？只要回忆一下劳合-乔治关于自由党的“幕后”内阁的著名演说就够了。苏维埃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差别就在于：

（甲）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反对无产阶级的；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国家却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

（乙）资产阶级政党靠可疑的秘密内阁不让人民知道自己扮演领导角色；在苏联，共产党却不需要任何秘密内阁，它斥责秘密内阁的政策和行动，公开向全国宣布它担负着领导国家的责任。

有一个代表问：党是不是根据同样的原则领导工会？

斯大林答：基本上是的。党不能正式给工会发任何指示。但是党可以给在工会里工作的党员发指示。大家知道，在工会里，也像在苏维埃、合作社等组织里一样，是有共产党的党组的。这些共产党党组的责任就是力求在工会、苏维埃、合作社等组织里用说服的方法通过各种符合党的指示的决议。它们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在群众中得到莫大的信任。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行动统一起来。要不然，在工人阶级这些组织的工作中就会产生涣散和各自为政的现象。

第三个问题：既然在俄国只有一个党是合法的，那你从哪里知道人民群众是同情共产主义的？

答：是的，在苏联没有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这里只有一个党即

工人的政党共产党是合法的。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确信多数工人、多数劳动群众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呢？当然，这里指的是工人和农民群众，而不是新资产阶级，不是已经被无产阶级打垮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是的，我们有可能，我们有办法知道工人和农民群众是不是同情共产党人。

就拿我国生活中几个最紧要的关头来说，看看我们有没有根据断定人民群众是真正同情共产党人的。

首先拿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期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来说，当时共产党正是以党的名义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当时正是这个党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支持。

当时的情况怎样呢？当时执掌政权的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机关以及一千二百万军队的指挥机关都操纵在这些政党的手里，操纵在政府的手里。共产党当时处于半公开状态。世界各国的资产者都预言布尔什维克党必定垮台。协约国完完全全站在克伦斯基政府方面。但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停止号召无产阶级推翻这个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结果怎样呢？前方和后方的绝大多数劳动群众都非常坚决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于是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起来了。

尽管世界各国的资产者都敌意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党必定灭亡，但是布尔什维克当时却成了战胜者，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情况是不是证明广大劳动群众同情布尔什维克党呢？我认为是的。

这就是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的第一次检验。

再拿下一个时期，武装干涉时期即内战时期来说，当时英国资本家占领了俄国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牟尔曼斯克地区；美、英、日、法各国资本家抬出了高尔察克，占领了西伯利亚；法国和英国资本家捧出了邓尼金和弗兰格里，采取了占领“南俄”的步骤。

这就是协约国和俄国反革命将军们反对莫斯科共产党政府、反对我国十月革命成果的战争。这就是共产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的力量和稳固性的一次最大检验的时期。

结果怎样呢？谁不知道国内战争的结果是侵略者被赶出俄国，反革命将军们被红军一一歼灭。

这就证明了，决定战争命运的归根到底并不是苏联的敌人们大量供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技术装备，而是正确的政策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

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成了战胜者，这是不是偶然的呢？当然不是偶然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共产党在我国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同情呢？我以为是的。

这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力量和稳固性的第二次检验。

现在谈谈目前时期，谈谈战后时期，这时和平建设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经济破坏时期已经被工业恢复时期所代替，最后又被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我国全部国民经济的时期所代替。现在我们有没有办法来检验共产党的力量和稳固性，来确定广大劳动群众对共产党的同情程度呢？我以为是有的。

首先拿拥有将近一千万无产者的苏联工会来说，看看我国工会领导机关的成员。共产党员成为这些机关的领导者是不是偶然的呢？当然不是偶然的。要是以为苏联工人对工会领导机关的成员漠不关心，那就太愚蠢了。苏联工人是在三次革命的风暴中成长和培养起来的。他们学得比任何人都更善于检验自己的领导者，如果这些领导者不能满足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把这些领导者赶走。有一个时期，普列汉诺夫是我们党内最有威望的人。然而，当工人确信普列汉诺夫已经离开无产阶级的路线时，他们就毅然决然把他孤立起来。既然这样的工人对共产党员表示完全信任，把共产党员推举到工会的负责岗位上去，这就不能不直接表明共产党在苏联工人中的力量和稳固性是很

大的。

这就是广大工人群众完全同情共产党的一次检验。

拿最近的苏维埃选举来说。在我们这里，除了那些剥削别人劳动并被剥夺了选举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凡是苏联的成年人，从十八岁起，不分性别和民族，都有参加苏维埃选举的权利。选民总共将近六千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当然是农民。这六千万人中行使了选举权的约有百分之五十一，就是说，有三千多万人。现在请看看我们中央和地方苏维埃领导机关的成员吧。当选的领导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能够说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吗？很明显，决不能说是偶然的。这一事实是不是说明共产党受到千百万农民群众的信任呢？我以为是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和稳固性的又一次检验。

拿拥有将近二百万工农青年的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来说。青年团内当选的领导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能够说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吗？我以为决不能说是偶然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和威信的又一次检验。

最后，拿加入苏维埃联盟的各民族的千百万男女劳动者、男女工人、男女农民的无数代表会议、会议和代表大会等来说，西方人对于这种会议和代表会议有时加以讥笑，硬说俄国人总喜欢多说话。然而对我们来说，这种会议和代表会议无论在考察群众的情绪上或在揭发我们的错误并拟定消除这些错误的方法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的错误不少，而我们并不隐瞒这些错误，我们认为揭发错误和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是改善对国家的领导的最好方法。你们只要看看在这种代表会议和会议上发言人的演说，看看这些工农出身的“普通人”的切实和诚恳的意见，看看他们的决议，你们就会知道共产党的影响有多么大，威信有多么高，你们就会知道这种影响和威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会羡慕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稳固性的又一次检验。

这就是可以用来检验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力量和影响的一些办法。

我就是从这里知道苏联广大工农群众是同情共产党的。

第四个问题：如果有一批非党人士组织了一个集团，他们在选举时提出他们自己的拥护苏维埃政府的候选人，但是同时又要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那末他们能不能有自己的经费并进行积极的竞选呢？

答：我以为这个问题本身含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能想像有一批人既拥护苏维埃政府，同时又要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为什么呢？因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因为要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一批人是不可能拥护苏维埃政府的。因为这样的一批人只能是对整个苏维埃制度深恶痛绝的人。

在苏联，要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分子当然是有的。这就是耐普曼、富农、已经被打垮的剥削阶级残余等等。可是这些分子在居民中只占极少数。我想，代表团在自己所提的问题中指的不是这些分子。如果代表团指的是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那我就必须说，要求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只能引起他们的哄笑和仇视。

对工人来说，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放弃国家工业化，放弃建立新工厂和扩大旧工厂。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斥苏联市场，使我国比较薄弱的工业萎缩下去，使失业人数增加，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使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削弱。归根到底，这就是加强耐普曼和整个新资产阶级的势力。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走这条自杀的道路呢？显然是不能的。

对劳动农民群众来说，取消对外贺易垄断制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使农民群众贫困化。这就是恢复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时期盛行的那种“自由贸易”制度，那时反革命将军和“同盟者”的联合势力曾经为所欲为地抢劫和掠夺千百

万农民。归根到底，这就是加强富农和农村中其他剥削分子的势力。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农民、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农民都已经尝够了这种制度的滋味。有什么根据可以设想农民愿意重新陷入这个圈套里去呢？劳动农民群众是不能主张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有一个代表说：代表团提出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关于取消这个制度的问题是这样看的：如果在苏联不是一党垄断，不是对合法权垄断，那末就会有一整批居民因这个问题而组织起来。

斯大林说：这样，代表团又回到苏联唯一合法政党——共产党的垄断问题上去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讲到用什么办法检验千百万工农群众是否同情共产党时已经简略地答复过了。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层，如富农、耐普曼、已经被打垮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那末他们在我国已经被剥夺了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的权利，正像他们被剥夺了选举权一样。无产阶级不但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铁路、土地和矿山，还剥夺了他们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的权利，因为无产阶级不愿意资产阶级恢复政权。代表团对于苏联无产阶级剥夺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工厂、土地、铁路、银行和矿山大概不会表示反对吧。（笑声）

可是我觉得代表团有点想不通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到此为止，还要更进一步，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我以为这是不完全合乎逻辑的，或者确切些说，是完全不合乎逻辑的。有什么理由要求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宽大呢？难道西方执政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表示过一点点宽大吗？难道他们不是正在把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驱入地下吗？有什么理由要求苏联无产阶级对自己的阶级敌人宽大呢？我以为逻辑上一定是这样。凡认为可以把政治权利归还给资产阶级的人，要是他想合乎逻辑的话，就必然要更进一步提出把工厂、铁路、银行也归还给资产阶级的问题。

有一个代表说：代表团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工人阶级和农民跟共产党不同的意见怎样才能合法地表达出来。如果把问题了解为代表团关心的是把政治权利交给资产阶级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怎样才能合法地表达自己意见的问题，那就不对了。我们指的正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跟共产党不同的意见怎样才能合法地表达出来的问题。

另一个代表说：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工人阶级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在工会及其他组织中表达出来。

斯大林说：很好。那末这里谈的不是恢复资产阶级政治权利的问题，而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问题。

目前苏联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中间有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呢？无疑是有的。要千百万工人、农民在一切实际问题上和各种细节上的想法都一致是不可能的。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一、工人和农民之间，无论按他们的经济地位或按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来说，都有很大的差别。第二、就是工人阶级本身，在看法上也有某些差别，在教育、年龄、性格上也都有差别，血统工人和农村来的工人之间也有差别，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会在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中间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这种争论会在会议上、工会中、合作社中、苏维埃选举时以及其他场合得到合法的表现。

但是，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过去十月革命以前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有根本差别的。在过去，工人和劳动农民中间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推翻地主、沙皇制度、资产阶级的问题上，集中在摧毁资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上。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同意见的争论却不是围绕着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不是围绕着摧毁苏维埃制度的问题，而是围绕着改进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问题，改进它们的工作的问题。这里是有根本差别的。

过去，围绕着以革命手段摧毁现存制度问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成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内部出现几个互相竞争的政党的根据，这

是毫不奇怪的。这些政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另一方面，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不同意见的争论的目的已经不在于摧毁现存的苏维埃制度，而在于改进和巩固这种制度，所以这种争论不会在工人和农村劳动群众中间造成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这也是很容易了解的。

正因为如此，仅仅一个党——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这个党的垄断，不但不会引起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反对，相反地，却被他们看做是一种必要的、合乎心愿的东西。

我们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共产党的垄断），它的这种地位并不是一种人为的和故意假造出来的。这种地位决不可能是人为地用行政手腕等等制造出来的。我们党的垄断是在实际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起来的，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彻底破产而退出舞台的结果。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过去是什么呢？是资产阶级影响在无产阶级中的传播者。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这些政党的存在是靠什么培植和支持的呢？是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权。随着资产阶级的被推翻，这些政党也就必然失去存在的基础，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些政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又成了什么呢？它们成了恢复资本主义和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政党。这些政党必然在工人和劳动农民阶层中丧失任何基础和任何影响，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共产党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之间为争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早在一九〇五年以前，当俄国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最初征兆出现的时候，这个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时期是我国工人阶级中发生剧烈的不同意见的争论的时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间为争取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而进行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工

人阶级经历了三次革命。工人阶级在这几次革命的烈火中考验并审查了这些政党、它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用处以及它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于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当历史总结了过去的全部革命斗争，当历史在自己的天平上衡量了工人阶级内部互相斗争的各个政党的比重时，苏联工人阶级终于做了最后的选择，选中了共产党，认为它是唯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工人阶级选中了共产党，这是什么原因呢？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时，只占极少数，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当时在苏维埃中占了绝大多数，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到了十月革命前夜，整个政权机构和所有的压迫工具都操纵在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手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原因就是当时共产党主张结束战争，主张立即实现民主的和平；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却坚持“把战争进行到胜利为止”，坚持继续帝国主义战争。

原因就是当时共产党主张推翻克伦斯基政府，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主张把工厂、银行、铁路收归国有；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却为克伦斯基政府而斗争，维护资产阶级对工厂、银行和铁路的所有权。

原因就是当时共产党主张立即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使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却要把这个问题拖到立宪会议去解决，而立宪会议又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才召开。

工人和贫农终于选中了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样迅速地垮了台，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这就是共产党的垄断的来源，这就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原因。

下一个时期，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后的国内战争时期，是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彻底灭亡的时期，是布尔什维克党彻底胜利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己促进了共产党的胜利。在十月革命时期被粉碎被打垮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残余，开始同富农的反革命暴动连接起来，同高尔察克分子和邓尼金分子联合一起，为协约国效劳，因而在工农心目中彻底葬送了自己。结果就形成了这样的情况：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变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帮助协约国来扼杀新的苏俄，而布尔什维克党却把一切生气勃勃的、革命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发动一批又一批的工农队伍去进行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反对协约国的斗争。

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胜利必然会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遭到完全失败，那是十分自然的。从此以后共产党成了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唯一政党，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我国，共产党这个全国唯一合法政党的垄断就是这样形成的。

你们提到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农中间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我已经说过，不同意见的争论现在有而且将来还会有，否则就不可能前进。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工人中间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并不是围绕着推翻苏维埃制度这一原则问题，而是围绕着改进苏维埃、纠正苏维埃机关的错误等实践问题，也就是围绕着巩固苏维埃政权这一实践问题。十分明显，这样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只能巩固和改进共产党。十分明显，这样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只能巩固共产党的垄断。十分明显，这样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不会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内部造成其他政党形成的基础。

第五个问题：你能不能把你和托洛茨基之间主要的意见分歧简略地告诉我们？

答：首先我必须说明，和托洛茨基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个人的意见分歧。假如这是个人性质的意见分歧，那党连一个钟头也不会花费在这上面了，因为党是不喜欢使个别人物突出的。

这里指的大概是党内的意见分歧。我是这样了解这个问题的。是

的，党内是存在着这些意见分歧的。关于这些意见分歧的性质，不久以前李可夫在莫斯科、布哈林在列宁格勒所做的报告中都已经十分详细地说明了。这些报告已经发表。对于报告中所谈的意见分歧问题，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要是你们没有这些文件，我可以给你们找来。（代表们说他们有这些文件）

有一个代表说：这些意见分歧，我们回国以后一定会有人问我们，但是，并不是全部文件我们都有。例如“八十三人的政纲”我们就没有。

斯大林说：我没有在这个“政纲”上签名，因此，我没有权利处理别人的文件。（笑声）

第六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展生产的基本动机是取得利润。当然，相对地说，这种动机在苏联是不存在的。什么东西代替了它呢？照你的意见，这种代替的效果如何，它能不能成为经常的？

答：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推动力是取得利润，那是对的。说取得利润既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目的，也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推动力，那也是对的。既然如此，究竟什么是我国工业的推动力呢？

首先是这个情况：我们这里一切工厂都是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属于资本家的，管理工厂的不是资本家的仆从而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觉悟到他们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阶级工作。这种觉悟就是发展和改进我国工业的巨大的推动力量。

应当指出，我们这里绝大多数的厂长是工人，他们是由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取得工会的同意而任命的。并且任何一个厂长如果违反工人或有关的工会的意志就不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其次，应当指出，每一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工厂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是由工人选举出来的并监督着企业行政方面的活动。

最后，应当指出，每一个工业企业都有本企业全体工人参加的工人生产会议，工人在会议上检查厂长的全部工作，讨论工厂行政的工

作计划，指出错误和缺点，并且有可能通过工会、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来纠正这些缺点。

不难了解，所有这些情况根本地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和企业中的各种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把工厂看做和自己完全无关的、别人的财产，甚至把它看做牢狱；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工人已经不把工厂看做牢狱，而把它看做和自己休戚相关的事业，他们深切地关心这个事业的发展和改进。

几乎无须证明，工人对工厂、对企业的这种新的态度，工人对企业的这种深切的感情，就是我国全部工业最大的推动力。

正是因为这个情况，从工人当中涌现出来的生产技术方面的发明家和工业组织者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第二是这个情况：我们这里工业的收入，不是用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而是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用来减低工农所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也就是用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

资本家是不会把自己的收入用来增进工人阶级的福利的。他是为利润而生活的。否则他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资本家榨取利润是为了积累追加资本，并把它输出到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去，以便榨取新的、更多的利润。资本就这样不断地从美国流入中国、印度尼西亚、南美和欧洲，从法国流入法国殖民地，从英国流入英国殖民地。

我们这里却完全不同，因为我们不实行而且也不赞成殖民政策。我们的工业收入留在国内，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用来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以及通过减低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来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其中包括农民市场的容量。在我国，工业利润大约百分之十是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的。在我国，由国家支付的工人阶级保险事业费占工人货币工资的百分之十三。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我现在说不出究竟是多大一部分）用于文化需要、工厂技术教育和工人休假方面。收入的

相当大的一部分（我现在也说不出究竟是多大一部分）用来提高工人的货币工资。工业收入的其余部分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修缮旧工厂，建设新工厂以及减低工业品的价格。

这些情况对于我国全部工业的巨大意义就在于：

（甲）它们促使农业和工业接近起来，使城乡之间的对立日趋缓和；

（乙）它们促使国内市场即城乡市场的容量日益扩大，从而为工业的进一步扩展造成不断扩大的基础。

第三是这个情况：工业国有化这个事实使整个工业经济易于有计划地经营。

这些刺激和推动我国工业的力量是不是经常的因素呢？它们能不能成为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呢？是的，它们无疑是经常起作用的刺激力和推动力。而且我国的工业愈发达，这些因素的力量和作用也就愈增长。

第七个问题：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合作？

这种合作是不是有一定的限度？或者这只是一种尝试，只是为了弄清楚在哪一方面可以进行哪一种合作，而在哪一方面不可以进行？

答：你们指的大概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方面、在商业方面、也许还在外交关系方面签订暂时协定的问题。

我认为两种对立的体系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并不排斥签订这种协定的可能性。我认为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下签订这种协定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宜的。

输出和输入就是签订这种协定最适当的基础。我们需要机器装备、原料（如棉花）、半制品（金属的和其他的），而资本家需要销售这些商品。这就是签订协定的基础。资本家需要石油、木材、粮食，而我们需要销售这些商品。这就是签订协定的基础。我们需要贷款，而

资本家需要这种贷款的优厚利息。这又是信贷方面签订协定的基础；而且大家知道，苏维埃机关是最有信用的付款人。

在外交方面也是一样。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愿意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互不侵犯公约。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愿意签订关于裁减军备以至完全取消常备军的协定，这一点我们早在热那亚会议上就向全世界宣布过了。这就是外交方面签订协定的基础。

这些协定的限度如何呢？这些协定的限度是由两个互相竞赛和斗争的体系的对立性来规定的。在这两个体系所容许的范围内，而且只有在这种范围内，签订协定才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和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签订协定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协定是否只是一种试验，或者是具有比较长期的性质呢？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并且也取决于我们的对方。这取决于总的情况。战争可能把所有一切协定全都推翻。最后，这还取决于协定的条件。奴役性的条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和哈里曼签订了开采格鲁吉亚锰矿的协定。协定订为二十年。可见期限是很不短的。我们还和连纳金矿公司签订了开采西伯利亚金矿的协定。协定订为三十年，——期限是更长的。最后，我们还和日本签订了开采库页岛石油和煤矿的协定。我们希望这些协定具有比较持久的性质。但这当然不仅取决于我们，并且也取决于我们的对方。

第八个问题：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差别是什么？

答：你们指的大概是苏联境内那些从前受沙皇制度和俄罗斯剥削阶级压迫、没有自己国家组织的民族。

基本的差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而在我们苏联，这两种东西都已经根本消灭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除了头等民族即享有特权的民族、“有国家的”民族以外，还有次等民族即“没有国家的”民族，主权不完整

的、被剥夺了某些权利首先是被剥夺了成立国家的权利的民族。而在我们苏联，情形完全不同，所有这些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的现象都消灭了。在我国，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有主权的，因为从前占统治地位的大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特权和国家特权都取消了。

当然，问题不在于发表民族平等的宣言。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发表了不少民族平等的宣言。这些宣言要是不付诸实现，那又有什么价值呢？问题在于消灭那些作为民族压迫的代表者、制造者和实行者的阶级。以前我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就是这样的阶级。我们推翻了这些阶级，因而也就消灭了民族压迫的可能性。正因为我们推翻了这些阶级，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我们这里就把这叫做实现民族自决以至民族分离的思想。正因为我们实现了民族自决，我们才消除了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并在自愿原则上把各民族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现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是我们实现民族政策的结果，就是苏联各民族自愿结合为一个联盟国家的表现。

几乎无须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在民族问题上要采取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还是资本家在执掌政权，而资本家是民族压迫政策的制造者和实行者。

不能不指出例如这样一个事实：领导苏联最高政权机关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并不一定是俄罗斯人的主席，而是按照加入苏联的六个加盟共和国的数目而定的六个主席，其中一个是俄罗斯人（加里宁），另一个是乌克兰人（彼得罗夫斯基），第三个是白俄罗斯人（切尔维雅柯夫），第四个是阿捷尔拜疆人（穆萨别柯夫），第五个是土尔克明人（艾塔柯夫），第六个是乌兹别克人（斐祖拉·霍札也夫）。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民族政策的一个鲜明表现。不用说，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多么民主，也不会采取这种措施。可是这种措施在我们看来却是由我们全部民族平等政策产生出来的一个不言

而喻的事实。

第九个问题：美国工人领袖用两种理由来为他们所进行的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做辩护：

（一）共产党人在工会内部进行派别斗争，攻击工会中非激进的负责人，以此破坏工人运动；

（二）美国共产党人接受莫斯科的命令，他们既然对外国组织比对本国工会更忠诚，他们也就不能成为好的工会活动家。

怎样才能消除这些障碍，使美国共产党人能够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其他组织共同进行工作？

答：我以为美国工人首领为他们所进行的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做辩护的企图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任何人都还没有证明过而且也不能证明共产党人是破坏工人运动的。但是，共产党人是全世界工人运动（包括美国工人运动）的最忠实最勇敢的战士，这一点却应当认为完全得到证明了。

在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时候，共产党人总是走在工人阶级的最前列，最先承受资本家的打击，而改良主义的工人首领这时却躲在资本家的后院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共产党人对改良主义的工人首领的这种懦怯和反动行为，怎能不加以批评呢？这种批评只会活跃和加强工人运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固然，这种批评会破坏反动的工人首领的威信。但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反动的工人首领尽可以提出反批评，而不应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会。

我认为美国工人运动如果要继续存在和向前发展，工会内部就不能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派别斗争。我认为无论改良主义的工人首领怎样抗拒，工会内部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派别斗争以及对反动首领的批评等等都是会日益扩大的。美国工人阶级十分需要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这种批评，以便能在各种不同的派别中间进行选择，并最后使

自己成为美国社会内部一种独立的有组织的力量。

美国改良主义的首领抱怨共产党人，这只是证明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不感到自己的地位是稳固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像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批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工人首领原来是些比他们美国许多资产者更坚决地反对起码民主的人。

断言美国共产党人“遵照莫斯科命令”办事，那是完全不对的。在世界上你们找不到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会愿意违反自己的信念，违反自己的意志，不顾环境的要求，而“遵照”外来“命令”行动。如果什么地方真有这样的共产党人，那末他们是一钱不值的。

共产党人是最勇敢无畏的人，他们和无数的敌人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可贵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因此，说美国共产党人是一些没有自己的信念而只会“遵照”外来“命令”行动的人，那是很荒谬的。

这些工人首领的断言只有一点是对的，就是美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有时还和这个组织的中心机关商讨某些问题。可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美国工人首领反对工人的国际中心组织吗？固然，美国工人首领没有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但是，他们没有加入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工人的国际中心机关，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阿姆斯特丹国际是一个过左的组织。（笑声）

为什么资本家可以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而工人阶级或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不应当有自己的国际组织呢？

格林和他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里的伙伴是在诬蔑美国共产党人，是在奴颜婢膝地重述资本家关于“莫斯科命令”的奇谈，这还不明显吗？

有些人以为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委员们就是专门坐在那里给世界各国写指示的。既然有六十多个国家加入了共产国际，那末就可以想像到共产国际委员们的状况了，他们不睡觉也不吃饭，整天整夜专门坐

在那里给这些国家写指示。（笑声）美国工人首领就是想用这种可笑的奇谈掩盖他们对共产党人的恐惧，抹杀共产党人是美国工人阶级最勇敢最忠实的工作者这一事实！

代表团问到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我认为这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容许美国工会内部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派别斗争，抛弃那种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工会的反动政策，使美国工人阶级有可能在这些派别中间自由选择，因为美国还没有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所以那里的工人还没有可能在工会的各派别之间做最后的选择。

第十个问题：现在是否汇款到美国去支持美国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工人日报”？

如果没有，那末美国共产党人每年要缴多少党费给第三国际？

答：要是你们指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相互关系，那末我必须说明，美国共产党既然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那它想必是向共产国际缴纳党费的；同样，共产国际既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就应该认为它在必要时是会给美国共产党以尽可能的帮助的。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要是你们指的是美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那末我必须声明，我从来不知道有过美国共产党代表向苏联共产党请求帮助的事情。你们可能认为这很奇怪，但这是一个事实，它说明美国共产党人是非常拘谨的。

但是，如果美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请求帮助，那会怎么样呢？我想苏联共产党一定会给以尽可能的帮助。要是一个共产党，而且是掌握政权的共产党，拒绝给一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共产党以尽可能的帮助，那末它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我要说，这样的共产党是一钱不值的。

假如说，美国工人阶级推翻了本国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假如说，另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请求这个在反对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取

得了胜利的美国工人阶级给以尽可能的物质上的帮助，美国工人阶级能不能拒绝给以这种帮助呢？我认为要是美国工人阶级在这方面有所犹豫，那它是非常可耻的。

第十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些好的共产党员对于共产党要求所有新党员都是无神论者这一点并不完全同意，因为现在反动的僧侣都被镇压了。今后要是宗教拥护全部科学并且不反对共产主义，那末共产党能不能对宗教采取中立态度？

今后要是宗教信仰和对党的忠诚不相抵触，那末你们能不能允许党员信奉宗教？

答：这个问题有一些地方是不正确的。

第一，我不知道有过像代表团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好的共产党员”。恐怕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员。

第二、我必须声明，我们的入党条件中，并没有正式规定要求每个候补党员都一定是无神论者。我们的入党条件是：承认党纲和党章，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机关的决议，缴纳党费，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有一个代表说：我常常读到这样的新闻，说党员因为信奉上帝而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说：我只能重复上面已经讲过的入党条件。其他的条件我们是没有的。

这是不是说，党对宗教采取中立态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进行宣传而且将来还要进行宣传来反对宗教偏见。我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这是各人的信仰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实行了教会与国家分离。但是我们在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宣布信教自由的同时，也保留每个公民都有用说服、宣传、鼓动的方法去反对某种宗教、反对任何宗教的权利。党对宗教不能采取中立态度，并且进行反宗教的宣传来反对所有一切宗教偏见，因为党是拥护科学的，而宗教偏见是反对科学的，要知道，任何宗教都是和科

学对立的东西。在美国，不久以前把达尔文主义者判了罪，这种情形在我们这里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党实行全力捍卫科学的政策。

党对宗教偏见不能采取中立态度，并且要进行反对这些偏见的宣传，因为这是清除那些支持剥削阶级、劝人顺从剥削阶级的反动僧侣的影响的一种可靠手段。

党对宗教偏见的传播者、对毒害劳动群众意识的反动僧侣不能采取中立态度。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反动僧侣镇压下去了呢？是的，镇压下去了。可惜只是还没有把他们完全肃清。反宗教的宣传就是一种必能把反动僧侣彻底肃清的手段。有这样的情况：某个党员有时阻碍全力展开反宗教的宣传。如果把这样的党员开除出去，那是很好的，因为在我们党的队伍里不容许有这样的“共产党员”。

第十二个问题：你能不能给我们简略地说明共产主义所力求建立的那个未来的社会？

答：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对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做了一般的说明。

要是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做一个简略的解剖，那末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甲）在那里不会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只会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乙）在那里不会有阶级和国家政权，而只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他们将成为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在经济上自己管理自己；（丙）在那里按计划组织的国民经济，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以高度技术为基础的；（丁）在那里不会有城乡的对立，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对立；（戊）在那里产品将按旧时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则实行分配，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己）在那里科学和艺术将获得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可以达到全盛的境地；（庚）在那里每个人将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必为糊口而操

心，也不必迎合“当代有权有势的人”。

如此等等。

显然，我们距离这样的社会还很远。

至于说到共产主义社会取得完全胜利所必需的国际条件，那末这是会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危机的增长和工人阶级革命发动的增长而形成和成熟起来的。

决不能设想当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走向共产主义时，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会对这种情况毫不在乎，袖手旁观。更不能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会同意做普通的观众，观看某个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实际上，资本家将竭尽全力来扼杀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某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走向共产主义时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力求在自己国家里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汹涌热潮。

由此可见，在国际革命和国际反动势力继续发展的进程中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资本主义中心。这两个阵营的斗争将决定全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载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
“真理报”第二一〇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0 卷第 68—95 页

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出席的有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南美、中国、比利时、芬兰、丹麦和爱沙尼亚的代表共八十人。谈话继续了六小时。

斯大林：同志们，昨天我收到一张用德文写的没有署名的问题表。今天早晨又收到两张问题表：一张是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另一张是丹麦代表团提出的。我们先从第一张问题表谈起，虽然还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代表团提出的。然后可以谈谈其余的两张。如果你们不反对，我们就开始。（代表们表示同意）

第一个问题：苏联为什么不参加国际联盟？

答：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的原因，我们报刊上已经谈过好多次了。我可以指出其中几个原因。苏联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它不参加国际联盟，首先是因为它不愿意对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政策负责，不愿意对国际联盟所授与的以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国家为目的的“委任统治权”负责。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是因为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

其次，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是因为它不愿意对国际联盟所掩饰的和崇奉的、不能不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那种扩军备战和新的军事联盟等等负责。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是因为它根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最后，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是因为它不愿意成为帝国主义阴谋的帷幕的组成部分，而国际联盟就是这种帷幕，并且用它的会员国的花言巧语来掩盖帝国主义的阴谋。

在目前情况下，国际联盟是那些进行幕后勾当的帝国主义头子的“会面地方”。在国际联盟中公开**讲**的那一套不过是用来欺骗人民的废话。而帝国主义头子们在国际联盟幕后非公开**干**的那一套才是国际联盟空谈的演说家们所虚伪掩饰的真正帝国主义勾当。

苏联不愿意充当这出反人民的喜剧中的角色和参加者，那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苏联不容许社会民主党存在？

答：在苏联不容许社会民主党（即孟什维克）存在，其理由正和不容许反革命分子存在一样。这也许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我国的发展条件，我国的发展历史是这样：在沙皇制度时代或多或少算是一个革命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成了执政党，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党；而在十月革命以后，则变成了公开的反革命的政党，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政党。

你们不会不知道我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国内战争中曾站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方面反对苏维埃政权。现在，这个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政党，企图消灭苏维埃制度的政党。

我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演变不仅是苏联的而且也是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特征。沙皇制度存在时，我国的社会民主党或多或少算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其实这也正说明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当时为什么和孟什维克即社会民主党人一起组成一个政党。当所谓民主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时，社会民主党就成为在野的或执政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当革命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时，社会民主党就变成了公开的反革命的政党。

有一个代表问：这是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只在这里，在苏联才是反革命力量，还是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做反革命力量呢？

斯大林：我已经说过，在这一点上是有某些区别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是反革命力量，因为它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而力图恢复资本主义和消灭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民主党不是资本政权的在野党，就是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既反对资本主义中最反动的势力又反对工人革命运动的半执政党，或者是直接而公开地保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完全的执政党。

只是在无产阶级政权成为现实以后，社会民主党才成为彻底反革命的政党，它的反革命锋芒才指向无产阶级政权。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在苏联没有出版自由？

答：你们说的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哪一个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如果指的是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那末这种自由在我国是没有的，而且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存在，它是不会有的。如果指的是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那末我必须指出，你们在世界上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像苏联这样有全面而广泛的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

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并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最好的印刷厂和最好的出版大厦，如果没有包括千百万工人群众的、大大小小的、公开的工人阶级组织，如果没有最广泛的集会自由，那末也就没有出版自由。

你们只要仔细看一看苏联的生活状况，考察一下工人区，就会知道，最好的印刷厂，最好的出版大厦，一幢幢的造纸厂，一幢幢出版上所必需的油墨制造厂，许多高大的会议厅，——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很多为工人阶级出版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完完全全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手里。这在我们这里就叫做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我们这里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的。

我们这里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出版自由，因为他们在我国所代表的是被打垮了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我们从来没有承担过给一切阶级出版自由、为一切阶级谋福利的义务。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取得政权时就公开说过：这个政权是一个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政权将要镇压资产阶级，维护占苏联人口绝大多数的城乡劳动群众的利益。

既然如此，怎么可以向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呢？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不释放被监禁的孟什维克？

答：这里指的大概是那些积极的孟什维克。是的，是这样，我国那些积极的孟什维克在监禁期限未满时是不会被释放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政时，为什么不释放被监禁的布尔什维克呢？

在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执政时，为什么列宁不得不躲入地下呢？在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间，虽然当时领导政府的是有名的孟什维克，是第二国际的积极活动家，但是全世界无产者的旗帜——伟大的列宁还是不得不躲在距离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切尔诺夫和唐恩的“民主共和国”很远的芬兰，而列宁党的机关报——“真理报”报馆还是被资产阶级当局捣毁，这是什么原因呢？

显然，这都因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斗争必然使得双方采取某些高压手段。我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反革命政党。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不逮捕这个反革命政党的活动家。

不仅如此，由此还应该得出结论：在我们这里逮捕孟什维克是十月革命政策的继续。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十月革命是把资产阶级政权推翻了。现在世界各国多少有点觉悟的工人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是做得对的。我

不怀疑你们也会有同样的着法。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究竟打倒了谁？历史表明，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打倒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因为当时执掌政权的正是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郭茨和李伯尔，唐恩和策烈铁里，阿布拉莫维奇和阿夫克森齐也夫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又是什么政党呢？它们是第二国际的政党。

由此可见，苏联无产阶级完成了十月革命，也就是打倒了第二国际的政党。这可能使得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感到不愉快，但是，同志们，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要想否认这个事实就太可笑了。

由此可见，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可以而且必须推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权，以便使无产阶级政权能够取得胜利。

既然可以打倒他们，那末当他们公开而坚决地转向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时，为什么不可以逮捕他们呢？你们是不是以为打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比起逮捕他们来是一种较轻的手段呢？

不能一方面认为十月革命的政策是正确的，同时又否认它的必然结果是正确的。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十月革命是错误的，——那末，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是错误的；

或者十月革命不是错误的，——那末，逮捕那些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就不能认为是错误的。

逻辑上一定是这样。

第五个问题：苏联为什么不准社会民主党新闻处的记者入境？

答：因为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报刊，特别是“前进报”，对苏联及其代表的诽谤比许多资产阶级报纸更为恶毒。

因为许多资产阶级报纸如“佛斯报”，对苏联施行攻击都比“前进报”“客观”得多，“有礼貌”得多，这也许“很奇怪”，但是，这是不可不注意的事实。假使“前进报”的行为不比某些资产阶级报

纸更恶劣，那末它的代表可能和其他资产阶级报纸的代表一样，早已在苏联得到自己的位子了。

前几天，“前进报”的一个代表向我国驻柏林外交代表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提出关于“前进报”记者取得苏联入境权所必需的条件的问题。对他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当‘前进报’用事实证明自己对苏联及其代表的态度并不比‘有礼貌的’自由主义报纸如‘佛斯报’更恶劣的时候，苏联政府将不反对‘前进报’记者进入苏联。”

我以为这个答复是十分明白的。

第六个问题：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合并是否可能？

答：我以为是不可能的。

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立场完全不同，主张完全相反。第三国际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地，第二国际主张保存资本主义，破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一切。

两个国际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拥护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个斗争中，不是第二国际胜利，就是第三国际胜利。毫无疑问，在工人运动中获得胜利的必定是第三国际。

我以为二者的合并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第七个问题：对西欧的形势怎样估计？是否可以指望最近几年内发生革命事变？

答：我以为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危机的因素正在欧洲增长着，以后还要不断增长。资本主义可以局部稳定下来，可以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可以暂时压制工人阶级，——所有这一切，资本主义现时还能做得到，但是它已经永远不能恢复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前曾经有过的那种“稳固”和“均势”了。它永远也不能恢复那种“稳固”和“均势”了。

只要举出欧洲各国以及欧洲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各殖民地时常

爆发革命的火焰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革命的火焰今天在奥地利爆发，明天在英国，后天在法国或德国某个地方，以后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地爆发。

欧洲和殖民地是什么呢？这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外围。欧洲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安宁”，它的外围更加“不安宁”。新的革命事变的条件正在成熟。我以为因萨柯和万泽第被杀害而引起的一些事变，是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发展的最鲜明的标志，是工人阶级不满情绪和愤怒心情日益增长的最鲜明的例证。

对资本主义的绞肉机说来，杀害两个工人算得什么呢？在这以前，难道不是每周每日都杀害数十数百个工人吗？但是，杀害了两个工人（萨柯和万泽第）就足以使全世界工人阶级行动起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资本主义脚下的地皮愈来愈炽热了，这说明新的革命事变的条件日趋成熟了。

资本家能够把革命爆发的第一个浪涛推到岸边，——这个事实丝毫不能够使资本主义得到宽慰。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不会是只涌来一次的巨浪。它始终是以来潮和退潮的方式发展的。在俄国曾经这样，在欧洲也将这样。我们面临着新的革命事变。

第八个问题：俄国党内的反对派强大吗？

答：我以为他们非常弱。不仅如此，他们在我们党内的力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我手头有一份今天的报纸，上面登载着几天来争论的总结。数字说明：拥护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提纲的有十三万五千多名党员，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一千二百名党员，甚至不到百分之一。

我想以后表决的结果定会使反对派更加丢丑。我们的争论将继续到代表大会开幕。在这期间，我们要尽可能向全党征求意见。

我不知道在你们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内是怎样进行争论的。我不知道在社会民主党内一般是不是进行争论。我们对待争论是很认真的。我们将向全党征求意见，你们可以看到反对派在我们党内的比重会比

刚才宣读的数字更加微不足道。很可能反对派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连一个人连一个代表都不会有。

就拿列宁格勒的“三角”工厂或“普梯洛夫”工厂这样规模宏大的企业来说吧。“三角”工厂的工人达一万五千名。其中党员二千一百二十二名。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三十九人。“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约一万一千名，党员一千七百一十八名。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二十九人。

反对派依靠哪些阶层呢？我以为反对派主要依靠非无产阶级阶层。如果问一问那些不满意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非无产阶级阶层居民，他们同情谁，那末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同情反对派。为什么呢？因为反对派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党斗争，是反对那个不能不引起某些非无产阶级阶层不满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斗争。反对派就是居民中的非无产阶级阶层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的反映，对无产阶级专政抗拒的反映。

第九个问题：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在德国散布一种武断的说法，说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现在的领导把工人出卖给反革命，这种说法对不对？

答：应该认为是对的。应该认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把苏联工人阶级完全出卖给世界各国反革命分子。

此外，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决定在最近把所有被赶出我国的地主和资本家招回苏联，并把工厂归还他们。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甚至认为布尔什维克吃人肉的时候也到了。

最后，我们还决定把所有妇女都收归国有，并对自己的亲姊妹实行强奸。（大笑。有些人大声说：“谁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看到你们在笑，可能你们有人会认为我对待问题不严肃。是的，同志们，回答这类问题是不能严肃的。我以为只能用嘲笑来回答这类问题。（热烈鼓掌）

第十个问题：你对反对派和德国的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的态度是怎样的？

答：我对反对派及其在德国的代理人的态度，就像法国的著名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对达拉斯贡的达达兰的态度一样。（代表们活跃起来）

你们想必读过阿尔丰斯·都德那部描写达拉斯贡的达达兰的著名小说吧。那部小说的主人公达达兰实际上是一个平凡的“善良的”小资产者。但是他的幻想竟如此强烈，而“善意的撒谎”的才能又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他终于成了这种非凡的才能的牺牲品。

达达兰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在阿特拉斯山中打死了无数狮子和老虎。达达兰的轻信的朋友因此就称他为世界第一名猎狮家。然而阿尔丰斯·都德确实知道，同样达达兰本人也确实知道，达达兰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狮子，也没有看见过老虎。

达达兰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登过勃朗峰。他的轻信的朋友因此就称他为世界第一名登山家。然而阿尔丰斯·都德确实知道达达兰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勃朗峰，因为他至多只到过勃朗峰山麓。

达达兰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在离法国很远的地方开辟了一大块移民地。轻信的朋友因此就称他为世界第一名移民家。然而阿尔丰斯·都德确实知道，同样达达兰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达达兰这样荒诞的想头，除了自讨没趣以外，什么也得不到。

你们知道达达兰荒诞无稽的吹牛使达达兰之流落到多么狼狈和丢丑的地步。

我以为反对派首领们在莫斯科和柏林大吹大擂，其结局必定使反对派落到同样狼狈和丢丑的地步。（大笑）

第一张表上的问题到这里我们就谈完了。

现在谈谈法国代表团所提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苏联政府想怎样和外国石油公司作斗争？

答：我以为问题提得不正确。这样提问题就会使人以为苏联的石油工业已经开始向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进攻，并且竭力设法打倒和消灭它们。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不，不是这样的。其实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石油公司力图扼杀苏联的石油工业，而苏联的石油工业为了生存和继续发展，就不得不实行自卫。

问题在于苏联的石油工业无论在开采量方面（我们比他们开采得少）还是在和市场的联系方面（他们和世界市场的联系比我们多得多）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石油工业薄弱。

苏联的石油工业怎样实行自卫呢？它是靠改进产品质量来自卫的，它首先是靠减低石油价格的办法即采用在市场上比资本主义公司更便宜地出售石油的办法来实行自卫的。

有人会问：难道苏联如此富裕，竟有可能比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公司更便宜地出售石油吗？当然，苏联工业并不比资本主义公司富裕。不但如此，资本主义公司倒是比苏联工业富裕很多倍。但是，这里问题不在于富裕，问题在于苏联的石油工业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因此，它不需要惊人的超额利润，而资本主义石油公司却非有巨大的超额利润不可。正因为苏联的石油工业不需要超额利润，所以它有可能比资本主义公司更便宜地出售自己的产品。

说到苏联的粮食，苏联的木材等等，情形也是这样。

一般应当说，苏联的商品，特别是苏联的石油，在国际市场上是作为一种减低价格从而改善消费者的生活状况的要素而出现的。苏联石油工业的力量和它用以防御资本主义石油公司侵害的手段就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石油业主，尤其是德特丁，他们所以放开嗓门叫嚣反对苏联和反对苏联的石油工业，用所谓“共产主义宣传”的时髦词句来掩饰他们的抬高石油价格和掠夺消费者的政策，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在农民问题上你们想怎样实行集体制？

答：我们想采取经济、财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办法，逐步地在农业中实行集体制。

我想，关于经济方面的办法问题是最引人注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措施共有三种：

一种是组织个体农户加入合作社；

一种是组织农户，主要是组织贫农加入生产合作社；

一种是通过国家的计划机关和调节机关，从销售农产品方面和供应农民以工业必需品方面来掌握农户。

几年以前的情况是这样：在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存在着大批中介人（即私人企业主），他们把城市产品供应农民，把农民的粮食卖给工人。显然，这些中介人不是白白地“工作”的，他们从农民和城市居民身上榨取了数千万卢布。这是城市和乡村、社会主义工业和个体农户还没有很好结合起来的时期。那时合作社和国家分配机关的作用还比较小。

从那时到现在，情况根本改变了。现在，在城乡之间、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商品流转中，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机关可以说不仅起主要作用，而且起统治作用，甚至是垄断作用。在供应农村布匹方面，合作社和国营机关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七十。而在供应农业机器方面，合作社和国营机关所占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在收购农民的粮食方面，合作社和国营机关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八十。而在收购棉花、甜菜等工业原料方面，合作社和国营机关所占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这就是说，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农民有可能买到比较便宜的城市商品，工人也有可能买到比较便宜的农产品。

第二、这就是说，由于把中介人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赶出去，工

业就有可能领导农民经济，影响它并提高它的发展水平，使它合理化和工业化。

第三、这就是说，由于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国家就可能着手有计划地发展农业，供给农业以优良的种子和肥料，规定农业的生产规模，从价格政策方面影响农业等等。

最后，这就是说，在农村中正在为消灭资本主义成分，为进一步限制和排挤富农，为组织劳动农户加入生产合作社，为国家在可能范围内拨款帮助这些合作社创造有利的条件。

例如拿制糖工业用的甜菜的生产和纺织工业用的棉花的生产来说吧。这两种原料的生产规模以及它们的价格和质量，现在在我们这里不是自发地，由无组织的市场上的角逐，通过投机的中介人，通过交易所和各种资本主义营业所等等来决定的，而是有计划地，由制糖辛迪加、纺织辛迪加的一方和以甜菜种植合作社、植棉合作社为代表的数万农户的另一方订立一定的预购合同来决定的。

这里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这里出现的只是国营辛迪加和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两方，没有任何交易所和中介人参加。国营辛迪加和有关的合作社组织签订合同，规定一方生产一定数量的甜菜、棉花，一方供给农民种子、贷款等等。在经济年度终结时，全部产品交给辛迪加，而农民因此可以按照预订的合同取得相当的款项。我们把这叫做预购合同制。

这个制度的好处是它对双方有利，不用中介人，直接把农民经济和工业结合起来。这个制度是走向农民经济集体化的最正确的道路。

不能说农业的其他部门也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但是可以确信地说，农业的一切部门，连粮食生产也不例外，都将逐步过渡到这条发展道路上去。这条道路是到达农业集体化的捷径。

只有当农民经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即通过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加以改造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劳动农民加入合作社组织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农村满布集体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全盘集体化才会到来。

现在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还没有达到，而且也不会很快地就达到。为什么呢？其原因之一就是需要一大笔钱，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这一大笔钱，但是以后一定会积累起来。马克思说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如果不加以大力资助，不为它花上几亿几亿的经费，它是不会巩固起来的。我以为我们已经进到这样的农业发展阶段即国家开始有可能大力资助新的集体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取得领导地位并领导着农业，——这个事实就是农民经济一定能沿着进一步集体化的道路去发展的最可靠的保证。

第三个问题：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打算废除货币，当时有哪些主要困难？

答：当时无论在国内发展方面还是在对外关系方面都有很多困难。如果就国内经济方面来说，可以指出三个主要困难。

第一、困难在于我们的工业遭到破坏并陷于瘫痪状态（如果武装干涉期间供给我们内战前线以弹药的军事工业不算在内）。我们的工厂有三分之二停工，运输瘫痪，货物没有或几乎没有。

第二、农业凋敝，农户的劳动力被征调到前线。原料缺乏，城市居民首先是工人的面包供应不足。当时我们每天每个工人发给半磅面包，有时只发给八分之一磅。

第三、没有或几乎没有正常的沟通城乡的苏维埃贸易机构可以把城市产品供应农村，把农产品供应城市。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机关还处在萌芽状态。

可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和“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国家的经济状况根本改变了。

工业发展和强大起来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了支配地位。这一

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最近两年来，我们没有外援、没有借任何外债而从自己的积累中拿出了二十多亿卢布投入工业。现在已经不能说农民根本得不到商品了。

农业提高了，产量达到了战前水平。现在已经不能说工人根本得不到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了。

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机关已经发展到在全国商品流转中占领导地位。现在已经不能说我国没有沟通城乡、沟通工农业的分配机构了。

当然，要马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还是不够的。但是要沿着顺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这却是完全够的。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装备我国的工业，并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新工厂。

我们需要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最大限度地供给农民以农业机器，使大多数劳动农民合作化，把个体农户组织到广大的农业集体合作社网中。

我们需要组织一种能够像每个人估计自己的收支预算一样来估计并满足全国城乡需求的沟通城乡的分配机构。

一旦我们把这一切都做到了，我们就可以认为不需要货币的时候到来了。

但是距离这个时候还很远。

第四个问题：“剪刀差”问题怎样？

答：如果把“剪刀差”了解为从成本方面来看的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差异，那末“剪刀差”的情形如下：

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业品出售的价格比在其他条件下所出售的价格还是贵一些。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业还很年轻，必须保护它，使它免受外来竞争的侵袭，必须给它创造能够使它迅速发展的条件。它的迅速发展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对于乡村都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及时供给农民经济以数量充足的布匹和农业机器。这种情况造成了工

业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差异而使农民经济吃一些亏。

为了消除这种对农民经济不利的情况，政府和党立意实行逐步地然而是不断地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能不能说这个政策是切实可行的呢？我认为它是绝对切实可行的。例如大家知道，最近一年来我们已经把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减低了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其次，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业组织不断地减低工业品的成本和出厂价格。毫无疑问，这个政策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此外，我必须指出，不断地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基石，没有它，无论是我们工业经济的改进和合理化还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巩固，都是不可能的。

资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执行的是另外一种政策。那里通常把各企业组成托拉斯和辛迪加，以便在国内抬高工业品价格，把这些价格变为垄断价格，藉此榨取更多的利润并为商品输出国外准备基金，使资本家可以在国外按低价出售同样的商品来达到夺取新市场的目的。

我们俄国在资产阶级制度时期也实行过这样的政策。就拿糖来说吧，当时糖在国内卖得极贵，可是在国外，例如在英国，同样的糖却卖得非常便宜，以致人们拿它来喂猪。

苏联政府实行完全相反的政策。它认为工业应当为居民服务，而不是相反。它认为不断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是一种主要手段，没有它，工业就不能得到正常发展。至于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能促使居民的需求增长，扩大国内（城乡）市场的容量，从而创造进一步扩大工业所必需的不断增大的来源，那就更不必说了。

第五个问题：苏联政府在债权方面向法国的小债权人提出了哪些条件？怎样使法国的食利者知道？

答：我们在战前债务方面的条件，已经在拉柯夫斯基的那次众所周知的谈话里发表了。我想这些条件你们必定都知道了。这些条件是以苏联同时得到贷款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在这方面坚持人所共知的原

则：你给我，我就给你。你贷款给我们，你就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战前的债款；你不给，你就得不到。

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就是在原则上承认了战前债务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说我们一方面保留关于取消沙皇债务的著名法令的效力，同时也同意根据实际协议偿付一些战前债款，只要他们因此而能够给我们所必需的而且也对法国工业有利的贷款。我们把偿付债款当做我们因取得发展我国工业的贷款而付出一笔附加利息。

有人谈到沙皇俄国的军事债务。有人谈到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者向苏联提出的各种苛刻要求。但是，他们忘记了我国革命就是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与此有关的沙皇债务在原则上的否定。他们忘记了苏联不能偿付也不偿付军事债款。

此外，他们还忘记了苏联不会把国家几年来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横遭掠夺和蹂躏这笔账勾销，苏联所提的人所共知的反要求就是与这种掠夺和蹂躏有关的。

谁对这种掠夺和蹂躏负责呢？谁应当对这种行为负责呢？谁应当偿还这笔掠夺和蹂躏的账呢？帝国主义头子们总爱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置诸脑后。但是，他们应当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忘记不了的。

第六个问题：烧酒专卖和反对酗酒这两件事怎样协调？

答：我以为这两件事一般很难协调。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党知道这个矛盾，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党知道现时容许这样的矛盾存在是为害较小的。

我们实行烧酒专卖的时候，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或者是把许多最重要的工厂租给资本家，受他们盘剥，以取得必需的一定的资金来周转；

或者是实行烧酒专卖，以便用本身的力量取得发展我国工业所必需的流通资金，从而免受外国的盘剥。

中央委员们，包括我在内，当时和列宁谈过这个问题，列宁认为

在借不到所必需的外债的情况下，只好直截了当地实行烧酒专卖这个临时的特殊办法。

我们实行烧酒专卖的时候，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

一般说来，当然最好是不要烧酒，因为烧酒是一种祸害。但是，那时就不得不暂时受资本家的盘剥，而为害就更大了。因此，我们宁愿少受些害。现在烧酒能提供五亿多卢布的收入。现在放弃烧酒专卖就等于放弃这笔收入，同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言酗酒现象会减少，因为农民一定会开始酿造私酒并以它来毒害自己。

显然，农村文化发展方面的严重缺点在这里有一定的影响。至于立即放弃烧酒专卖会使我们的工业失掉一笔无从补偿的五亿多卢布的资金，那就更不必说了。

这是不是说将来我国仍然应该实行烧酒专卖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把烧酒专卖作为一种临时办法实行的。因此，只要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找到为进一步发展我们工业的新收入的新来源，烧酒专卖就必定被取消。毫无疑问，这样的来源是一定会找到的。

我们把烧酒酿造事业交给国家掌握，这样做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如果把烧酒交给私人掌握，那结果就会：

第一、加强私人资本；

第二、使政府对烧酒的生产和消费无法进行应有的调节；

第三、使政府将来废除烧酒的生产和消费发生困难。

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逐渐缩减烧酒的生产。我认为我们将来能够完全废除烧酒专卖，把酒精的生产减少到只够技术方面需要的最低限度，然后完全取消烧酒的销售。

我想，如果西欧无产者取得了政权，并给我们必要的帮助，那末，我们大概就不致于跟烧酒和其他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东西打交道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西欧的弟兄们暂时还不想夺取政权，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靠自己的资金来周转。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这是

命运。

可见对于实行烧酒专卖，我们西欧的朋友们也要分担一部分责任。（笑声，鼓掌。）

第七个问题：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审判权，没有见证人，没有辩护人的审讯，秘密逮捕。因为这些办法是法国的社会舆论所难赞同的，所以很想知道实行这些办法的理由。是否打算修改或取消这些办法？

答：国家政治保卫局或肃反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惩罚机关。这个机关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成立的社会保安委员会多少有些相似。它主要是惩办奸细、阴谋分子、恐怖分子、土匪、投机奸商、伪币制造者。它是一种为保护革命利益使之免受反革命资产者及其走狗的侵害而成立的军事政治法庭之类的组织。

这个机关是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天即在各种受俄国和外国资本家资助的阴谋分子、恐怖分子和奸细的组织暴露以后成立的。

这个机关是在一连串谋害苏维埃政权活动家的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即在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委员乌利茨基同志被杀害（他是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的）以后，在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委员沃洛达尔斯基同志被杀害（他也是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的）以后，在列宁被刺（他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以后发展并巩固起来的。

应当承认国家政治保卫局当时百发百中地打击了革命的敌人，而且这个优点一直保持到现在。从那时起，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成为对资产阶级的一种威胁，就成为警醒的革命卫士，就成为无产阶级手中一把出鞘的宝剑。

因此，难怪世界各国的资产者切齿痛恨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什么神话都编造出来了。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什么诽谤都散布出来了。而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政治保卫局正确地捍卫着革命的利益。革命的死敌咒骂国家政治保卫局，——可见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动是正确的。

工人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态度就不是这样。请到工人区走一走，问一问工人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看法。你们会知道他们是很尊敬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把它看做革命事业的忠实卫士。

我了解资产者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憎恨和怀疑。我了解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旅行家，他们一到苏联首先就打听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不是还存在，取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时候是不是到了。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不足为奇的。

但是我不能了解某些工人代表，他们一到苏联就不安地问：国家政治保卫局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多不多，是不是还要惩办各种反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恐怖分子和阴谋分子？取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时候是不是到了？

某些工人代表为什么这样关心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呢？原因在哪里呢？理由是什么呢？

有人鼓吹采取最温和的态度，建议取消国家政治保卫局……可是，能不能担保取消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后世界各国的资本家就不再组织和资助阴谋分子、恐怖分子、破坏分子、纵火分子、爆炸分子的反革命集团呢？没有任何保障可以解除革命的敌人的武装，却要解除革命的武装，——这岂不是愚蠢行为，这岂不是对工人阶级犯罪！

不，同志们，我们不愿意重犯巴黎公社社员的错误。巴黎公社社员对待凡尔赛派太温和了，因此，马克思当时有充分理由责备他们。他们因为自己态度温和而付出的代价是：当梯也尔攻进巴黎的时候，数万工人被凡尔赛派枪杀了。

同志们是不是认为俄国的资产者和地主不如法国的凡尔赛派残暴呢？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们在和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的武装干涉者勾结起来占领了西伯利亚、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时是怎样蹂躏工人的。

我决不想用这点来说明是国内形势使我们必须保存这个革命的惩

罚机关。从国内情况看来，革命的局势已十分稳固和不可动摇，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内敌人并不是孤立无援的。问题在于他们还和那些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支持他们的世界各国资本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国家。我国革命的国内敌人是世界各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资本主义国家是我国革命的国内敌人的基地和后方。我们同国内敌人作战，也就是同世界各国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现在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样的惩罚机关可以不可以。

不，同志们，我们不愿意重犯巴黎公社社员的错误。革命需要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存在下去，使无产阶级的敌人心惊胆寒。（热烈鼓掌）

有一个代表说：斯大林同志，请让我代表在座的代表们向你道谢，感谢你为我们解释并澄清了国外流传的关于苏联的谣言。你可以相信，我们一定会把苏联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本国的工人。

斯大林说：同志们，用不着感谢。我认为回答你们的问题和向你们做报告是我的责任。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认为向自己的阶级弟兄报告他们希望了解的一切问题是应尽的义务。我们的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产儿。我们国家的活动家向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做报告，只不过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履行自己的义务罢了。（鼓掌）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五日
“真理报”第二六〇号和第二六一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0卷第144—163页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七日）

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为它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中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

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都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执掌政权。剥削者更换了，剥削仍然存在。奴隶解放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此。农奴起义时期的情形是如此。英、法、德三国有名的“大”革命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提巴黎公社，因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扭转历史的第一次光荣的英勇的然而没有成功的尝试。

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那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而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过的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政权，组织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转变。

十月革命所以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根据就在这里。

世界各国被压迫阶级所以对十月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把它看做自己获得解放的保障，根源也就在这里。

可以指出几个基本问题来说明十月革命对全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

（一）十月革命卓越的地方，首先是它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在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推翻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并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被雇佣阶级、被奴役阶级、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世界各国无产者。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十月革命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把这些东西变成公有财产，因而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对立起来。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资本家的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不变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十月革命夺得了资产阶级手里的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并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而把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国会制度这一**资本主义**民主制对立起来。拉法格还在一八八七年就正确地说过，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所有从前的资本家都将被剥夺选举权”。

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现在有可能通过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可是，十月革命并没有而且也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十月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旧制度以后，就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也就是党、工会、苏维埃、合作社、文化组织、运输业、工业和红军的建设的十周年。苏联社会主义在建设战线上显着的成就清楚地说明：无产阶级**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管理国家，**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建设工业，**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

地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能够不顾资本主义包围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那种认为被剥削者离不开剥削者正如头部和躯体的其他各部离不开胃部一样的陈旧“理论”，并不是古代史上著名罗马元老梅涅尼·阿格利巴一个人所独有的东西。这种“理论”现在是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政治“哲学”基础，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这一政策的基础。这种带偏见性的“理论”现在是妨害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骗人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十月革命的诸如此类的结果，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不对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发生重大的影响，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不断发展，世界各国无产者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同情日益增长，以及许多工人代表团络绎不绝地到苏维埃国家参观，——所有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都毫无疑义地说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种子已经开始结果了。

（二）十月革命不仅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在“宗主国”内动摇了帝国主义，而且还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外围，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

十月革命既然打倒了地主和资本家，也就粉碎了民族殖民地压迫的锁链，把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内所有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毫无例外地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不解放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的特点就是它在苏联进行的这种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仇视和各民族冲突为旗帜，而是以苏联各民族工人农民互相信任和亲密团结为旗帜，不是为了**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国际主义**。

正因为我国的民族殖民地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在国际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所以向来被蔑视的民族、被奴役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升到了**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民族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榜样来

鼓舞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在**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时代。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世界自古以来就分成低等人种和高等人种，分成黑种人和白种人，前者没有达到文明境地的能力，注定成为剥削的对象，后者是文明的唯一代表者，负有剥削前者的使命。

现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谈被打破了，被抛弃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奇谈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那些获得解放而被引上苏维埃发展轨道的非欧洲民族，他们推进**真正**先进文化和**真正**先进文明的能力是丝毫不亚于欧洲民族的。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分离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隔开的方法，使各民族劳动群众间的民族敌视加深的方法，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唯一方法。

现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谈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奇谈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用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方法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根据**自愿**原则并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结成**兄弟般的联盟**，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世界各国劳动者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之内联合的榜样）的存在不能不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

不用说，十月革命的诸如此类的结果，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不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其他各国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日益发展以及这些民族对苏联的同情日益增长，——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义地说明了这一点。

安然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觉醒的

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十月革命既然把革命种子散播到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后方，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宗主国”的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统治，因而也就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本身的生存发生了问题。

既然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由于纠纷和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以及由于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大屠杀，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已经变成资本主义腐朽和衰亡的过程，那末，十月革命和一个大国因此而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事实，就不能不加速这一过程，一步一步地破坏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不仅如此，十月革命不仅震撼了帝国主义，同时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基地，现在它可以把这个基地作为靠山了。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开的**中心**，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中心，现在它能团结在这个中心的周围，组织**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了**。

首先，这就是说，十月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受了一个永远治不好的致命伤。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永远不能恢复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有过的那种“均势”和“稳固”了。

资本主义可以得到局部稳定，可以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可以把国家管理权交给法西斯主义，可以暂时压制工人阶级，但是它永远不能恢复它从前所炫耀的那种“安宁”和“信心”，那种“均势”和“稳固”了，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革命烈火必然时而在帝国主义中心、时而在帝国主义外围燃烧起来，使资本主义的补缀方法一概无效，使资本主义的死期日近一日。 这正像有名的寓言中所说的：“尾巴拔出来，鼻子陷进去；鼻子拔出来，尾巴陷进去。”

其次，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已经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和比

重、英勇精神和战斗决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迫使统治阶级重视它们，把它们看做一个**新的**重要因素。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世界劳动群众看做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盲目人群”了，因为十月革命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从前没有一个各**全世界性的**公开的会场可以从那里表明并陈述被压迫阶级的希望和意愿，可是现在已经有这种会场了，这就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未必用得着怀疑，如果这个会场被消灭，那末肆无忌惮的黑暗的反动势力就会长期笼罩着“各先进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不能否认，甚至单是“布尔什维克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就牵制着黑暗的反动势力而便利于被压迫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其实就是这个缘故，世界各国剥削者才像野兽一样地仇恨布尔什维克。

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正像从前在**封建制度**灭亡时期，“雅各宾党人”这一名词曾经使世界各国贵族胆颤心惊、深恶痛绝一样，现今在**资本主义**灭亡时期，“布尔什维克”这一名词也使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胆颤心惊、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正像从前巴黎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代表的基地和学校一样，现在莫斯科是新兴**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的基地和学校。对雅各宾党人的仇恨并没有挽救封建制度免于崩溃。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也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免于必然的灭亡，——这还用怀疑吗？

资本主义“稳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谓资产阶级制度不可动摇的奇谈也一同**过去了**。

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四）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时是意识上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思想上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旗帜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旗帜下诞生并巩固起来的。因此，十月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的胜利，列宁主

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第三国际对第二国际的胜利。

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在列宁主义政策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之间掘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前，**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以前**，社会民主党能拿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虽然不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但是也丝毫不设法，绝对不设法使这个思想早日实现，——很明显，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做法对于资本主义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当时，在那个时期，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合在一起的，或者几乎是合在一起的。

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以后**，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会意味着**什么**，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拿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再也不能向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献媚，不然就会给资本主义造成相当的危险。社会民主党既然早已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结果也就不得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公然不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产儿，反对十月革命，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了。

现在社会民主党必然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且确实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了，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谁不全心全意地公开支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谁不对本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谁不为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创造条件，谁就不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已经横着一道鸿沟。从此以后，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的**代表和堡垒了。

可是问题并不只限于这些。十月革命不仅使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且更进一步把社会民主党抛到那些**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而公开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们的阵营中去了。阿德勒之流、鲍威尔之流、维尔斯之流、列维之流、龙格之流、勃鲁姆之流这些先生咒骂“苏维埃制度”而赞扬国会制度的“民主”，就是想以此说明，**为了**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在各“文明”国家保存资

本主义奴隶制度，他们现在进行斗争，而且将来依然要进行斗争。

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列宁说得非常对：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客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间的代理人”；他们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是必然要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社员’”的。

不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衰亡的时代，同时就是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衰亡的时代。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表明了列宁主义必然战胜世界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统治的时代**已经完结了**。

列宁主义和第三国际统治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五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0 卷第 164—171 页

党 和 反 对 派

（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把最近三四个星期以来在党内和党外（这应当直言不讳）展开的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争论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一　争论的简短总结

根据统计数字，现在拥护党、拥护党中央的同志有五十七万二千多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三千多人。

反对派平常喜欢用数字用百分比来炫耀自己，说什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拥护他们等等。现在大家都看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是反对反对派、拥护党中央委员会的。

这“怪”谁呢？“怪”反对派自己！反对派时常逼迫我们进行争论。整整两年来，他们没有一天不提出进行争论的新要求。我们遏止了这种逼迫，我们中央委员遏止了这种逼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党，正像列宁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不是争论的俱乐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党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四面受着敌人包围、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担负着很多创造性的实践任务的政党，因此，它不能老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党内意见分歧上。

但是，争论的时候到了，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一个月，甚至前一个多月，党就按照党章说：好吧，你们愿意争论，你们要求斗争，那末就斗争吧！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拥护党，拥护党中央，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拥护反对派，这就是总结。

反对派的吹嘘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地被揭穿了。

有人会说，这个总结不能算是决定性的。有人会说，除了党，还有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有人会说，在这里，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做出总结。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在这一方面也做出总结了。

十一月七日我们广大国土上的所有城镇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阶层、红军、红海军拥护我们党，拥护政府，反对反对派，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一次最大的游行示威吗？

反对派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那一天自己落得可耻的下场，党和政府在同一天受到千百万劳动人民一致的欢呼，难道这不都是证明不仅党，而且工人阶级，不仅工人阶级，而且劳动农民阶层，不仅劳动农民阶层，而且全部陆海军都全力拥护党，拥护政府，反对反对派，反对瓦解分子吗？（鼓掌多时）

究竟你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总结呢？

同志们，这就是这一次党和反对派即布尔什维克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的简短总结。这一次斗争起先是在党内展开的，后来由于反对派自己的过错才越出了党的范围。

为什么反对派遭到如此可耻的失败呢？要知道，自从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反对派曾经遭到如此可耻的破产。

我们知道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当时他们得到将近四分之一的党员的支持。

我们知道一九二一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的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当时他们得到将近八分之一的党员的支持。

我们知道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反对派，即所谓“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当时他们得到整个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

可是现在呢？现在反对派空前地孤立了。现在他们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恐怕连一个代表也不会有了。（鼓掌多时）

反对派所以破产，是因为他们完全脱离了党，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革命。反对派原是一小撮脱离现实生活、脱离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对派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从那些使反对派和党分离的问题中举出两三个问题来考查一下。

二 工人阶级和农民

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列宁说过，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是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说：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

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列宁认为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是依靠贫农而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

可是，反对派怎样看这个问题呢？他们不仅不重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他们不仅不了解这种联盟对于我国革命发展的全部重要性，而且走得“更远”，提出一个必然会使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破裂、使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结合遭到破坏的政策。

为了不扯得太远，我可以引用反对派的主要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看法。他把农民看做我国工业的“殖民地”，看做应当尽量加以剥削的对象。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反对派的许多主张提高工业品价格的文件，而提高工业品价格必然会使我们的工业萎缩，使富农加强，使中农破

产，使贫农受富农的奴役。

反对派的诸如此类的文件是他们打算同农民决裂、同中农群众决裂的政策的组成部分。

这一点在反对派的“政纲”或反提纲中有没有直接而公开地谈到一些呢？没有，没有谈到。在反对派的“政纲”和反提纲中，所有这一切都被周密地隐藏和掩蔽起来了。相反地，在反对派的“政纲”和反提纲中，你们倒可以找到几十处恭维中农、恭维贫农的地方。此外，那里面还攻击了党，说党有富农倾向。但是那里面没有、丝毫也没有直接而公开地谈到反对派的那条会使工人阶级同农民决裂而且不能不使工人阶级同农民决裂的非常有害的路线。

但是，我现在要尽力把反对派首领们周密地瞒着工农的那些东西放到光天化日之下，摆到桌面上来，使反对派今后不敢再欺骗党。我指的是伊万·尼基梯奇·斯米尔诺夫不久以前在党的罗果日—西蒙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反对派的领导者之一斯米尔诺夫是少数有勇气吐露反对派路线真情的诚实的反对派分子中的一个。你们想知道反对派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上的真正“政纲”是怎样的吗？那就请读一读斯米尔诺夫的演说，研究一下这个演说，因为斯米尔诺夫的演说是反对派少有的道出我们的反对派的真正立场的全部真情的文件之一。

请看斯米尔诺夫在演说中说些什么：

“我们说，必须修改我们的国家预算，使我们的五十亿预算大部分用在工业方面，因为**同中农闹翻总比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要好些**。”

这就是反对派的首领们在其“政纲”和反提纲中隐藏起来而为反对派的另一个首领斯米尔诺夫老老实实地拖到光天化日之下的全部东西中的一个主要东西。

由此可见，“挽救”革命的手段原来不是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

而是同中农**闹翻**。

列宁说：“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

可是反对派不同意这一点，硬说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重要的不是同农民、同基本农民群众结成联盟而是同他们闹翻。

列宁说过，不只是说过，而且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反复地说过，不“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可是反对派不同意这一点，硬说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可以用同中农闹翻的政策来代替。

列宁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同基本农民群众一道前进。

可是反对派不同意这一点，硬说我们不应该同农民一道向前迈进，而应该同他们闹翻。

党和反对派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就在这里。

反对派企图在自己的“政纲”中隐藏自己的真面目，于是就用恭维农民的话来掩人耳目，伪善地攻击党，说党有富农倾向。可是，斯米尔诺夫对反对派的“政纲”提出了根本的修正，扯下了反对派首领们的假面具，向党透露了反对派的真情，即反对派的**真正**政纲的真情。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反对派的“政纲”和反提纲是旨在欺骗党和工人阶级的一纸空文。

同中农闹翻的政策是什么政策呢？同中农闹翻的政策就是同多数农民闹翻的政策，因为中农至少占全体农民的百分之六十。正因为如此，同中农闹翻的政策就会把多数农民推入富农的怀抱。而把多数农民推入富农怀抱的政策就是加强富农，孤立贫农，削弱农村的苏维埃政权，使富农便于扼杀贫农。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实行同多数农民闹翻的政策也就是在农村中掀起内战，阻碍我们以农民生产的原料（棉花、甜菜、亚麻、皮革、羊毛等等）供应我国工业，打乱工人阶级的农产品供应，摧毁我国轻工业的基础，破坏我国的整个建设工作，破坏我们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计划。

同志们，如果不看反对派在其“政纲”和反提纲中的那些空洞的声明，而看斯米尔诺夫对我们做了权威性的解释的反对派的真正政策，那末问题就是这样。

我决不是责备反对派有意造成这一切灾祸。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派的愿望和意图，而在于反对派主张同中农闹翻的政策所必然引起的后果。

反对派在这方面的遭遇和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里面熊的遭遇是一模一样的。（笑声）不用说，熊用一块大石头砸碎它的隐士朋友的脑袋，原来是想把隐士脸上那只讨厌的苍蝇赶走。它的愿望是再友善不过了。然而熊的友善的愿望产生出来的远不是友善的行动，结果隐士一命呜呼。当然，反对派希望革命一帆风顺。但是，反对派为此而提出的方法却必然使革命遭到毁灭，使工人阶级和农民遭到毁灭，使我国的整个建设工作遭到破坏。

反对派的“政纲”是破坏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政纲，是破坏我们整个建设工作的政纲，是破坏工业化事业的政纲。

三　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党的问题。

列宁说，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反对派实际上却持着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所需要的不是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而是破坏党的统一和纪律，分裂党，成立第二党。固

然，关于党的统一，反对派说了又写，写了又说，甚至不是在说而是在喊叫。但是，反对派关于党的统一的言论是一种旨在欺骗党的伪善的空话。（鼓掌）

因为反对派一方面谈论和喊叫统一，另一方面却在建立新的反列宁的党。他们不仅在建立，而且已经建成了这个党。过去曾是反对派分子的库佐夫尼柯夫、佐夫和烈诺的演说之类的真凭实据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凭据可以证明反对派成立拥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等等的反列宁的党已经一年多了。反对派除了虚伪地空谈统一以外，还能用什么来反驳这些事实呢？反对派大喊大叫，说党中央委员会要把他们推到第二党的立场上去是办不到的。真是怪事！难道中央什么时候把反对派往这样的立场推过吗？中央一直在制止反对派滚到组织第二党的路线上去，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这两年来我们意见分歧的全部历史就是我们党中央设法制止反对派的分裂行为并使反对派分子留在党内的历史。

就拿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反对派的人所共知的“声明”的发表经过来说吧。难道这不是中央委员会想要使反对派留在党内吗？

再拿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反对派的第二次“声明”来说吧。如果这不是说明党中央委员会一直关怀着如何使反对派留在统一的党内，那又说明什么呢？

结果怎样呢？结果反对派发表了关于统一的声明，提出了关于统一的诺言，提出了关于取消派别活动的保证，实际上却继续在建立第二党。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决不能凭几句话就相信反对派。说明不应根据反对派的“政纲”和反提纲而应根据反对派的行动来考查反对派。

列宁说，要学会不根据诺言和“政纲”，而根据行动来考查一切

集团、派别和政党。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照列宁那样做，不根据反对派编造的文件和“政纲”而根据反对派的行动来考查反对派。

反对派写出“政纲”和反提纲，喊叫党的统一，这是欺骗党，这是虚伪，这是空洞的**言论**。反对派建立新党，成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等等，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和无产阶级的纪律，这是反对派的**行动**，他们的卑鄙龌龊的**行动**。

当然，这并不是说反对派已经建立了一个什么真正的党。不，这一点他们没有做到，而且是永远做不到的。他们做不到，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他们。反对派企图建立新党，建立第二党，其实是拿建党当儿戏，拿成立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等等当儿戏。被打垮的和丑态毕露的反对派现在是拿建党，拿成立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等等当游戏来安慰自己。（笑声，鼓掌。）

但是，同志们，游戏是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派的建党游戏只能博人一笑。因为对党来说，这种游戏不过是一种滑稽可笑的计谋罢了。

然而，这不仅和党有关系，我国还有阶级，还有反苏维埃分子。而这些反苏维埃分子注视着反对派的游戏，向他们学习如何反对党，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我国革命。在这些分子看来，反对派的建党游戏、反对派对党的攻击、反对派的反苏维埃勾当是一种学校，是一种向苏维埃政权作斗争、发动反革命力量的预备学校。

无怪乎各种反苏维埃分子都麕集在反对派的周围。反对派的建党游戏的危险性就在这里。正因为这里存在着严重的危险性，党对反对派的反苏维埃把戏就不能坐视不理，党就必须把它连根铲除。

工人阶级不能不看到反对派这种反党游戏的全部危险性。在反对派看来，党是棋盘。反对派进行反党的斗争就像下棋一样。他们今天提出取消派别活动的声明，明天就唾弃自己这个声明，后天他们又提出新的声明，以便过几天再唾弃自己这个声明。这就是反对派走的棋步。他们是棋手，只不过是棋手。

工人阶级就不是这样看自己的党。在工人阶级看来，党不是棋盘，而是解放自己的工具。在工人阶级看来，党不是棋盘，而是战胜敌人、争取新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工具。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鄙视那些把他们的党、把他们最神圣的东西变成反对派棋手用来玩弄骗人把戏的棋盘的人。因为工人阶级不能不知道，反对派破坏我们党的铁的纪律，分裂我们党，实质上就是破坏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反对派的“政纲”是破坏我们党的政纲，是解除工人阶级武装的政纲，是发动反苏维埃力量的政纲，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纲。

四 我国革命的前途

我们现在来谈第三个问题，即我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反对派整个方针的特征是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力量，不相信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不相信工人阶级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力量和本领。

我已经引证斯米尔诺夫的演说中大家都知道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说如果我们不同中农闹翻，我国革命必不可免地要遭到“灭亡”。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反对派分子高唱革命的“灭亡”的滥调。我们不是第一次在反对派分子的声明中看到他们在困难面前叫苦连天，张皇失措，预言我国革命日暮途穷，势必破产。反对派自从自己的派别政策遭到接二连三的破产以后，就没有停止过关于我国革命的“灭亡”的叫喊，他们硬把自己集团的灭亡说成革命的“灭亡”。反对派只要处于少数地位，只要受到党的痛击，他们就跑到大街上叫喊革命的“灭亡”，利用各种各样的困难来反对党。

还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约时期，革命处在相当困难的时期，托洛茨基因为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党击败，于是叫喊起我国革命的

“灭亡”来了。但是革命没有灭亡，托洛茨基的预言终究不过是无谓的预言而已。

一九二一年，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由于取消余粮收集制，我们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难，当时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又遭到一次失败，于是他又开始叫喊革命的“灭亡”。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政治局（当时列宁同志在场），托洛茨基断言“布谷鸟已经叫过了”，苏维埃政权毁灭已经为期不远了。（笑声）但是革命没有灭亡，困难被克服了，关于革命的“灭亡”的歇斯底里叫嚣终究不过是叫嚣而已。

我不知道当时布谷鸟叫过还是没有叫过。（笑声）如果布谷鸟叫过，那就应当承认：布谷鸟叫错了。（鼓掌，笑声。）

一九二三年，因施行新经济政策而产生新困难的时期，即发生销售危机的时期，托洛茨基又像布谷鸟一样啼叫革命的“灭亡”，硬把自己的集团在我们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失败说成革命的失败。但是革命不顾这些啼叫，克服了当时面临的一切困难。

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即随着我国工业的增长而产生新困难的时期，托洛茨基（这一次已和加米涅夫及季诺维也夫一道）又啼叫革命的“灭亡”，硬把自己的集团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失败说成革命的失败。但是革命并不打算灭亡，自封的预言家倒被摈弃在一边了，而困难也像过去每次一样被克服了，因为对布尔什维克说来，困难的存在并不是要人们叫苦和哭泣，而是要人们去克服它。（热烈鼓掌）

现在，在一九二七年末，因为在用新技术改造我国全部经济的时期中遇到一些新的困难，他们又开始啼叫革命的“灭亡”，藉以掩饰他们集团本身的真正灭亡。但是，同志们，你们都看到，革命还活着而且很健康，在灭亡的是另外一些人。

他们叫来叫去，一直叫到自己完蛋。（笑声）

反对派的“政纲”是我国革命的“灭亡”的政纲。

五 今后怎样？

在引起我们意见分歧的三个基本问题上，即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我国革命前途等问题上，反对派的真正政纲就是如此。

你们可以看出，这个奇怪的政纲证明反对派完全脱离了党，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我国革命。这是那些违背了列宁主义和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知识分子的政纲。

既然这样，党和工人阶级完全摈弃了反对派，那又有什么奇怪呢？这就是反对派在最近争论期间的反党斗争中遭到可耻的破产的原因。

有人问我们：今后怎样？

反对派抱怨说，他们近几天提出了一个由三十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签名的关于统一的声明，可是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老实说，既然反对派的虚伪声明一再被他们的分裂行动所推翻，对于三十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伪善声明，又能怎样答复呢？大家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像是在一九〇七年，有过三十一个孟什维克的类似的声明。（听众喊道；“对！”）当时列宁把这个声明叫做“三十一个孟什维克的伪善行为”。（笑声）我认为三十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的伪善行为和三十一个孟什维克的伪善行为是毫无二致的。（听众喊道：“完全对！”）反对派两次欺骗了党。现在他们又想第三次欺骗党。同志们，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的欺骗我们受够了，他们的游戏我们看够了。（鼓掌）

今后怎样？

同志们，今后没有地方可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越出党所容许的一切范围了。决不能再同时在两个党内摇来摆去了，决不能既在原来的列宁的党（这是统一的和唯一的党）内又在新的托洛茨基的党内摇来

摆去了。必须在这两个党中间选择一个。

或者是反对派自己取消这个第二党即托洛茨基党，放弃自己的反列宁的观点，并在全党面前公开痛斥自己的错误；

或者是反对派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自己来把托洛茨基党消灭干净。（鼓掌）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或者是反对派分子采取这个必要的步骤，或者是反对派分子不这样做，那末他们就得从党内滚出去。（热烈鼓掌多时，全场欢呼，高唱“国际歌”。）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二六九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0卷第174—185页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节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十九日）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和九日
“真理报”第二七九号和第二八二号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十二月三日）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同志们，我国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我国的外部状况不仅以我国内部力量为转移，而且以这种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以包围着我国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为转移，以这些国家力量的强弱、以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力量的强弱、以这些阶级的革命运动力量的强弱为转移。至于我国革命是被压迫阶级国际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那我就不讲了。

因此，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应当从说明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从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状况讲起。

一、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和争夺国外市场斗争的尖锐化

（甲）第一个问题就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贸易情况。

同志们，这方面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近两年来，即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已经超过战前水平，比战前水平提高了一步。

下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材料。

世界**生铁**产量指数：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六，一九二六年已经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点五，一九二七年还没有完全的材料，只有上半年的材料，这些材料说明生铁产量还在继续增加。

世界**钢**产量指数：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五，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六。

世界**煤**产量指数：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九，一九二六年略为下降，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六点八。这显然是受了英国罢工的影响。

世界**棉花**消费量：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八点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五。

世界五种**谷物**收获量：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二，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五，一九二七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三。

由此可见，世界生产的总指数是在慢慢地小步地前进，渐渐超过了战前水平。

但是同时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却不是慢步前进，而是向前跃进，越过了战前水平，例如美国和日本（在某些方面）就是如此。下面是关于美国的材料：加工工业的增长，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八，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二；采掘工业的增长，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四。

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不像生产增长那么快，它常常是落后

于生产的，但是终究已经接近战前水平了。全世界的和各主要国家的对外贸易指数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一，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一。就个别国家来说：美国一九二五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点三，一九二六年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法国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二和百分之九十九点二；德国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八和百分之七十三点六；日本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六点九和百分之一百七十点一。

整个说来，世界贸易已经接近战前水平，而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

最后，还有第三类事实，这些事实说明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工业的合理化，新工业部门的建立，托拉斯化的加强，工业卡特尔化在国际范围内的加强。我想这些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关于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我只指出一点，就是资本不仅在增加产量方面和贸易方面都有成绩，而且在改进生产技术方面，在技术进步方面，在生产合理化方面也都有成绩，而这一切又使大托拉斯进一步加强，并使势力雄厚的新的垄断性卡特尔相继成立。

同志们，这就是应该指出并且必须用以作为根据的一些事实。

这一切是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因此就是持久的、巩固的呢？当然不是！早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能达到战前水平，能超过战前水平，能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但这还不是说——还远不是说——资本主义的稳定因此能够持久，资本主义能够恢复它在战前的那种稳固性。恰恰相反，正是从这种稳定中，从生产增长，贸易扩大，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而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范围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势力范围仍旧相当固定的情况中，——正是从这种情况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

从局部稳定中产生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坏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

（乙）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这种增长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发展**不平衡**。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并不是彼此不相妨碍，不相倾轧，一个跟着一个地平稳均衡地前进，而是相反，各洲、各国间彼此进行着争夺市场霸权的殊死斗争，其中一些国家被排挤并衰落下去，另一些国家前进并兴盛起来。

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洲，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于是美亚两洲在世界贸易额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而欧洲的比重却日益减小。

现在列举一些数字：欧洲在一九二二年世界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美洲的比重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亚洲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二点三，而在一九二五年欧洲的比重已降到百分之五十，美洲的比重却增到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亚洲的比重却增到百分之十六。一方面有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国家（美国以及日本在某些方面），同时又有经济衰落的国家（英国）。一方面有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德国和最近几年兴起的一些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中国和印度），同时又有资本主义处于稳定状态的国家（法国、意大利）。销售市场觊觎者的数量在增多，生产能力在增长，商品供给量在增加，而市场的规模和势力范围仍旧相当固定。

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基础。

（丙）生产能力不断增长与市场相对固定之间的这种矛盾是市场问题成为目前资本主义主要问题这一事实的根源。一般销售市场问题的尖锐化，特别是国外市场问题的尖锐化，尤其是资本输出市场问题的尖锐化，——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现状。

正因为如此，工厂开工不足就成为通常的现象。加强关税壁垒只不过是火上加油。资本主义已经感到现在的市场范围和势力范围太狭窄了。用和平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的企图，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结果。

大家知道，银行家们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关于贸易自由的著名宣言，结果遭到了破产。国际联盟在一九二七年为达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利益统一”而召开的经济会议，结果也遭到了破产。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市场问题，对资本主义已经行不通了。资本主义**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武力、军事冲突、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从稳定中产生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增长。

二、资本主义的国际政治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

（甲）由于上述原因，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作为国外市场基础的势力范围的问题就成为目前世界资本主义政治中的主要问题。我已经说过，由于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确立的目前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配情况已经过时了。这种分配现在不能使美国满意，因为美国不以南美洲为满足而力图侵入亚洲（首先是侵入中国）；也不能使英国满意，因为英国正在丧失它的自治领和东方许多极重要的市场；也不能使日本满意，因为英美两国在中国时常“妨碍”日本的行动；也不能使意大利和法国满意，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多瑙河沿岸各国和地中海一带有着许许多多的“争端”；尤其是不能使德国满意，因为德国到现在还没有殖民地。

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力求重新瓜分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共同”趋向。用不着证明，亚洲市场和通往亚洲市场的道路成了主要的斗争场所。由此就产生了许多成为新冲突的根源的关键问题。由此就产生了成为争夺亚洲和通往亚洲的道路的霸权的根源的所谓太平洋问题（美、日、英三国的对抗）。由此就产生了成为争夺地中海沿岸优势、争夺通往东方的捷径的根源的地中海问题（英、法、意三国的对抗）。由此就产生了石油问题（英、美两国的对抗）的尖锐化，因为没有石油就不

能作战，谁在石油方面占优势，谁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

不久以前英国报刊上发表了张伯伦关于“调处”地中海问题的“最后”计划。我不能担保这个计划的确实性。但张伯伦计划在报刊上出现是一种征兆，这却是不容怀疑的。这个计划规定把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从法国手中转到意大利手中，把丹吉尔交给法国而由法国付给西班牙一笔补偿费，把喀麦隆归还德国，意大利必须在巴尔干停止“胡闹”等等。

这一切都是在反苏的旗帜下进行的。大家知道，现在每进行一种卑鄙勾当都是要把苏联扯上的。可是这个计划的真正用意究竟在哪里呢？这个计划的用意就在于把法国资产阶级从叙利亚排挤出去。叙利亚历来就是通往东方、通往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地的门户。从叙利亚可以损害英国在苏彝士运河一带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利益。所以张伯伦显然是想消除这种不愉快的情形的。不用说，这个计划在报刊上出现的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这个事实的价值就在于它清楚地说明了所谓“列强”间目前关系中所包藏着的那种争端、纠纷和军事冲突的特征。

至于石油问题和围绕这一问题而进行的斗争的现状，那末美国著名杂志“世界事业”十月号上关于这一点是说得相当清楚的：“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间的和平与相互谅解的非常实际的威胁……美国政府对本国实业家的支持必将随着这方面需要的增长而加强。倘若英国政府把自己和英国**石油**工业视为一体，那末美国政府迟早也会把自己和美国**石油**工业视为一体。斗争一旦转到两国政府方面，就不能不使**战争危险性**极度增大。”

毫无疑问，列强之间正着手组织各种新的联盟，以便准备新的战争来争夺国外市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通往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道路。

（乙）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对日益成熟的军事冲突是否有过“和

平调处”的企图呢？是的，是有过的。这些企图比预料的还要多。但这些企图没有、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不仅如此，这些企图只不过是一种用来掩饰“列强”准备新战争的幌子，一种用来欺骗人民、欺骗“舆论”的幌子。

就拿国际联盟来说吧，根据惯于说谎的资产阶级刊物和说谎本领也并不逊色的社会民主党刊物的意见，它是和平的工具。国际联盟关于和平、关于废除军备和裁减军备的空谈究竟有什么结果呢？除了欺骗群众，除了使军备竞争更形加剧，除了使日益成熟的冲突更形尖锐之外，并没有什么良好的结果。国际联盟空谈和平与废除军备已经三年之久，所谓第二国际支持这种虚伪的空谈也已经三年之久，而“各国”仍然继续加紧武装，扩大“列强”间旧有的冲突，增加新的冲突，因而破坏和平事业，——这种事实难道可以认为是偶然的吗？

三国海军裁军会议（英、美、日三国会议）的失败不是说明太平洋问题是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不是说明“列强”既不愿意废除军备也不愿意裁减军备，又是说明什么呢？国际联盟对于防止这种危险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或者拿苏联代表团不久以前在日内瓦关于真正（而不是装模作样）废除军备问题的发言来说吧。李维诺夫同志提出关于完全废除军备的爽直而诚恳的宣言竟使国际联盟目瞪口呆，竟使国际联盟感到是“完全出乎意料”，——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这个事实不正说明国际联盟不是和平与废除军备的工具，而是掩饰新的军备竞争和新战争准备的工具吗？

从日本到英国，从法国到美国，所有各国被收买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力竭声嘶地叫喊苏联关于废除军备的建议是“不诚恳”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来检验一下苏联建议的诚恳性，不立刻切实地着手废除军备或至少是大量地裁减军备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或者拿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现在的“友好条约”体系即法国和南斯

拉夫的条约、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的条约、由皮尔苏茨基准备的波兰和立陶宛的“友好条约”、“罗迦诺体系”、“罗迦诺精神”等等来说吧，这不是准备新战争和为未来的军事冲突部署力量的体系，又是什么呢？

或者拿下面几件事实来说吧：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法、英、意、美、日等国的**军队员额**由一百八十八万八千人增加到二百二十六万二千人；在同一时期，上述各国的**军事预算**由二十三亿四千五百万金卢布增加到三十九亿四千八百万金卢布；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五个国家的**军用飞机**数量，由二千六百五十五架增加到四千三百四十架；这五个国家的巡洋舰吨数由一九二二年的七十二万四千吨增加到一九二六年的八十六万四千吨；据美国军用化学处处长福莱斯将军所发表的人所共知的声明所说，**军用化学**方面的情况如下：“一个重四百五十公斤的装有路易氏毒气的空投毒气弹，能把纽约十个街区变成无人地区，而五十架飞机投下一百吨路易氏毒气弹就能把整个纽约变成至少在一个星期内是无人地区。”

这些事实不是说明新战争的准备工作正在全力进行，又是说明什么呢？

这就是一般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国际联盟的“和平政策”和“废除军备”政策的结果，以及社会民主党效忠资本的行为的结果。

从前扩张军备是以从头到脚都武装起来的德国的存在为理由的。现在这种“理由”已因德国被解除武装而消失了。

扩张军备是由“列强”间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所引起的，“罗迦诺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战争精神”，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以为现在的“和平关系”就好像一件用细线把一些破布片缝成的破旧的衬衫。只要稍微用力把这根细线一扯，在某个地方把它扯断，这整件衬衫就会东一块，西一块，变成一些破布片。只要在阿尔巴尼

亚或立陶宛、在中国或北非的某个地方把现在的“和平关系”摇动一下，这整个“和平关系的大厦”就会土崩瓦解。

上次帝国主义大战前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在萨拉也沃发生的刺杀案就引起了战争。

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

从稳定中成长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三、世界革命运动的状况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征兆

（甲）为了进行战争，单是扩张军备还不够，单是组织新的联盟还不够。为了进行战争，资本主义国家还必须巩固后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预先巩固自己的后方，不预先制服“自己的”工人和“自己的”殖民地，就不能进行严重的战争。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逐渐法西斯化的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统治法国的是右派集团，统治英国的是希克斯—德特丁—厄卡特集团，统治德国的是资产阶级集团，统治日本的是军阀政党，统治意大利和波兰的是法西斯政府，——这个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因此，工人阶级遭到压制，英国颁布工会法，法国颁布“民族武装”法，许多国家取消八小时工作制，资产阶级到处向无产阶级进攻。

因此，殖民地和附属国遭到更厉害的压制，帝国主义军队在这些国家内日益增加，人数已经达到一百万，其中有七十多万兵士驻扎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和“属地”内。

（乙）不难了解，各国法西斯化的政府所施行的这种残暴压制不能不引起各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和宗主国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革命运动增长的事实，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命运不能没有决定的意义。

你们自己判断吧。**整个地球上**十九亿零五百万人口中，有十一亿三千四百万住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有一亿四千三百万住在苏联，有二亿六千四百万住在中间国家里，只有三亿六千三百万是住在那些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里。

很明显，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觉醒预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中国革命还没有导致直接战胜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对于革命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决定的意义。伟大的人民革命总是不会在它的发动的第一回合就取得彻底胜利的。这样的革命总是经过来潮和退潮而成长和加强起来的。各国情形都是如此，包括俄国在内。中国情形也将是如此。

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它已经把几亿被剥削被压迫者从长期的沉眠中唤醒并使他们行动起来，它已经彻底揭穿了各系军阀的反革命性，撕破了那帮效忠反革命的国民党分子的假面具，巩固了共产党在下层民众中间的威信，把整个运动推上了更高的阶段，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被压迫阶级千百万人民中间引起了新的希望。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

至于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那末在这里，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下层工人群众日益左倾和革命趋于活跃的明显征象。英国总罢工和煤矿工人罢工，维也纳工人的革命发动，法国和德国因萨柯和万泽第被杀害而举行的革命游行示威，德国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在选举运动中获得的成就，英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那种工人向左走而领袖却向右投入公开的社会帝国主义怀抱的明显分化，第二国际的蜕化为帝国主义国际联盟的直接附属品，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间威信的日益降低，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在世界各国无产者中间影响和威信的普遍增高，苏联在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中间威信的增高，“苏联之友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等等，——所有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都说明欧洲正进入革命高潮的新时期。

既然像萨柯和万泽第被杀害这样的事件能够成为工人阶级游行示

威的原因，那末，这无疑地说明工人阶级内部已积聚了革命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寻找并且将来还要寻找原因，寻找机会，寻找有时看起来是最不重要的机会，以便冲出来打击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正处在殖民地和宗主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夜。

从稳定中产生着新的革命高潮。

四、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

（甲）由此可见，世界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危机和日益加剧的不稳定状态的一切征象已经出现了。

如果可以认为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引起内部紊乱和外部关系破裂的**暂时的**战后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并接着来了一个局部稳定时期，那末，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的**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日益加深，使世界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本身发生动摇。

稳定不仅没有阻止这个总的和根本的危机的发展，反而成为这个危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根源。夺取市场斗争的加剧，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必要，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国际联盟的破产，由于可能发生新战争而狂热地建立新联盟和部署力量，军备的疯狂扩张，对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国家的残暴压制，殖民地和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威信的增高，苏联实力的加强和它在欧洲工人及殖民地劳动群众中威信的增高，——这一切就是不能不使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本身发生动摇的事实。

资本主义的稳定日益动摇和不稳固了。

如果大约两年前可以说并且应该说欧洲革命浪潮是在退落，那末现在我们却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肯定说**欧洲显然正在进入新的革命高潮时期**。殖民地和附属国更不必说了，因为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的处境已

经愈来愈不可收拾了。

（乙）资本家希望苏联俯首就范，希望苏联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希望苏联在欧洲工人和殖民地劳动群众中间的威信降低，他们的这种希望已经破灭了。苏联正是作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成长和发展。它在全世界工农群众中间的影响日益增强和巩固。苏联作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瓦解世界帝国主义势力，破坏它在欧洲和殖民地各国的稳定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苏联显然日益成为欧洲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各国被压迫人民的旗帜。

所以为了给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扫清道路，为了加紧压迫“自己的”工人阶级和制服“自己的”殖民地以巩固资本主义的后方，据资产阶级头子们看来，首先就必须制服苏联，制服这个革命的策源地和苗圃，这个同时又是一个可供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商品的巨大市场。因此，帝国主义者中间的武装干涉趋向活跃起来，因此，就产生了孤立苏联的政策，包围苏联的政策，准备条件来对苏联进行战争的政策。

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战争的威胁（对苏联的威胁）就是目前形势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资本主义危机增长的环境中最“受威胁”和最“受苦”的要算是英国资产阶级了，因此，它在加强武装干涉的趋向方面也就担负着发起的作用。很明显，苏联工人对英国煤矿工人的帮助和苏联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同情不能不是火上加油。这一切情况就决定了英国同苏联的绝交以及其他某些国家同苏联关系的恶化。

（丙）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方面两种趋向的斗争，即军事侵略的趋向（首先是英国）和维持和平关系的趋向（其他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是目前我国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个基本事实。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表明和平关系的趋向的事实是：和土耳其

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德国缔结了保证条约，和希腊缔结了关税协定，和德国缔结了贷款协定，和阿富汗缔结了保证条约，和立陶宛缔结了保证条约，和拉脱维亚商定了缔结保证条约，和土耳其缔结了通商条约，调解了和瑞士的纠纷，和波斯缔结了中立条约，改善了和日本的关系，增进了和美意两国的经济关系。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表明军事侵略的趋向的事实是：英国就资助罢工的媒矿工人一事提出照会，苏联驻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外交代表遭到袭击，阿尔柯斯遭到袭击，英国同苏联绝交，沃依柯夫被杀害，英国雇佣走狗在苏联境内进行恐怖活动，苏法关系因召回拉柯夫斯基问题而趋于尖锐化。

如果大约两年前可以说并且应该说当时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某种均势而“和平共居”的时期，那末现在我们却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肯定说**“和平共居”的时期正在过去**，而让位于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袭击和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时期。

固然，英国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企图暂时还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帝国主义阵营中存在着利益矛盾，某些国家愿意和苏联维持经济关系，苏联奉行和平政策，欧洲工人阶级表示反对，帝国主义者害怕一旦对苏联开战会在自己家里爆发革命。但这并不等于英国会放弃组织反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不等于它组织不成这样的战线。虽然英国暂时还没有成功，但是战争威胁仍然存在。

因此，任务就是要估计到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推迟战争，向资本家“赎买”，并采取一切办法来保持和平关系。

我们不能忘记列宁的话，他说我国的建设事业多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推迟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战争，这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把它推迟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候，或是推迟到殖民地革命充分成熟的时候，或是推迟到资本家因瓜分殖民地而互相厮杀的时候。

因此，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是我们必须担负的任务。

我国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并存。实践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有时债务和贷款问题成为一种障碍。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很明确的。这政策是根据“你给我，我就给你”这个公式。你贷款给我们振兴工业，你就能得到一部分战前的债款，我们把这部分债款当做贷款的附加利息。你不给，你就得不到。事实说明，我们在取得工业贷款方面有了一些成绩。这里我不仅是指德国，而且是指美国、英国。其秘密在哪里呢？就在于我国是一个输入机器装备的最大市场，而资本主义国家正需要出售这种产品。

五、结 论

总括起来说：

第一、资本主义包围势力内部矛盾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必然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中以英国为首的一部分国家趋向于武装干涉；资本主义世界中另一部分国家不愿意卷入对苏战争而宁愿调整同苏联的经济关系；这两种趋向之间进行着斗争，使苏联有一定的可能注意到这种矛盾来保持和平。

第二、稳定趋于瓦解；殖民地革命运动增长；欧洲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的征象；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在全世界的威信日益提高；欧洲工人阶级对苏联的同情显着增长；苏联的实力日益增长，我国工人阶级在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因此，党的任务是：

（一）在国际革命运动方面：

（甲）**为发展世界各国共产党而斗争**；

（乙）**为巩固革命工会和巩固工人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而斗争**；

（丙）为巩固苏联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间的友谊而斗争；

（丁）为加强苏联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解放运动的结合而斗争。

（二）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

（甲）为反对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

（乙）反对英国的武装干涉趋向，加强苏联国防力量；

（丙）奉行和平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

（丁）在巩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基础上扩大我国与外国间的贸易；

（戊）同那些受帝国主义统治国压迫和剥削的所谓“弱小的”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建立密切联系。

二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内部状况

同志们，现在让我谈谈我国的内部状况，谈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谈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和巩固等问题。

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曾经委托中央委员会从下列基本任务着眼来进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事业：

第一、使我们的政策能促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蒸蒸日上；

第二、使党的政策能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保证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

第三、在国民经济发展进程中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比重日益增大，而使私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比重日益减小；

第四、使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新工业部门的建立和某些原料生产部门的发展等等都按照这样的方针进行：使总的发展能保障我国的

经济独立，能保障我国不致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附属品；

第五、使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巩固起来；

第六、使工人阶级和贫农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党，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执行这些任务方面做了些什么呢？

一、整个国民经济

第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这里我要举出一些主要的数字来说明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情形，特别是工业和农业的增长情形。这些数字是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些统计中引来的。我指的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控制数字和五年计划草案。

（甲）两年来苏联全部国民经济生产的增长情形：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新的统计，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农业总产值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三，全部工业产值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七，而现在，经过了两年之后，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农业产值已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八点三，工业产值已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点九。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控制数字，预计农业产值将进一步增加到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八，工业产值将增加到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四。

两年来国内中介贸易额的增长情形：如果以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流转额为一百（一百四十六亿一千三百万切尔文卢布），那末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就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二百八十七亿七千五百万卢布），预计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进一步增加到上年度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六强（三百三十四亿四千万卢布）。

两年来我国信贷系统的发展情形：如果以我国所有信贷机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综合平衡表上的数额为一百（五十三亿四千三百万切尔文卢布），那末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就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八十一亿七千五百万卢布）。毫无疑问，我们国有化的信贷系统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两年来铁路运输业的发展情形：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我国全部铁路货运量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一，而现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已经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一，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六。更不必说，最近两年来我国铁路网长度已经由七万四千四百公里增加到七万六千二百公里，比战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点三，比一九一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九。

两年来国家预算的增长情形：我国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的总预算（统一的国家预算加上地方预算）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四（五十亿零二千四百万卢布），而现在，即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总预算应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一十至一百一十二（七十亿卢布以上）。两年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五。

两年来对外贸易的增长情形：我国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对外贸易总额为十二亿八千二百万卢布，即约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二十七，而现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已经达到十四亿八千三百万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预计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增加到十六亿二千六百万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九。

对外贸易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

第一、资产阶级国家时常阻碍我国对外贸易，有时甚至实行暗中封锁；

第二、我们不能按照资产阶级“自己吃不饱，也得要输出”的公式去进行贸易。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有五千七百万卢布

的出超，这是一个好现象。这是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以后对外贸易达到出超的头一年。

总括起来说，两年来我国全部国民收入总的增长情形如下：苏联国民收入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一百五十五亿八千九百万切尔文卢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已经达到二百零二亿五千二百万卢布，就是说，一年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九，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就达到二百二十五亿六千万卢布，就是说，一年内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四。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达到二百四十二亿零八百万卢布，就是说，再增加百分之七点三。

如果注意到美国国民收入平均每年至多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美国国民收入只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次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七），而其他各国，例如英国和德国，国民收入每年至多增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那就应当承认，和欧美资本主义大国相比，**苏联国民收入近几年来的增加速度是打破纪录的**。

结论：我国国民经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展着。

党的任务：继续在一切生产部门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乙）在我国，国民经济不是盲目地按照单纯增加产量的方式发展的，而是遵循一定的严格规定的方向发展的。下面两个基本情况是近两年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第一、我国国民经济是**在**国家**工业化的标志下**，在工业对农业的作用不断增大的标志下发展的。

第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所遵循的**方向**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生产方面和商品流转方面的**比重和领导作用增大**，而使私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减小。

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运输业和电气化除外）中的比重增大的数字如下：按战前价格计算，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四，农业的比重占百分之

六十七点六，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工业的比重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农业的比重已降低到百分之六十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工业的比重将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点二，农业的比重将要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九点八。

两年来作为工业基本核心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增大的数字如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一，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百分之三十七点六，预计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点六。

两年来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大工业中的比重增大的数字如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百分之四十四，预计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点九。

至于工业的**商品**产值和它在全国商品总值中的比重，那末，两年来工业品的比重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一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五，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点七，而农业的商品产值的比重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九，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降低到百分之四十点五，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九点三。

结论：我国正在变成工业国。

党的任务：用一切办法继续推进我国的工业化。

两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比重和领导作用增大而私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减小的数字如下：国民经济中公营部分（国营工业、合作社工业、运输业、电气化等等）的**投资**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十二亿三千一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二十六亿八千三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增加到三十四亿五千六百万卢布，这就是说，公营部分的投资将由一九二

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增加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三。另一方面国民经济中非公营部分的投资却一直相对地减少，只在绝对数字上略有增加，即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十七亿一千七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增加到十八亿三千六百万卢布，这就是说，非公营部分的投资比重将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二**降低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七。

公营**工业总产值**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六点九。另一方面非公营工业的比重却逐年降低：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占全部工业产值中的百分之十九降低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十四，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降低到百分之十二点一。

至于私人资本在**大**工业（即标准工业）中的比重，那末，它不仅在相对降低（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三点九降低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二点四），而且在绝对降低（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一亿六千九百万战前卢布降低到一九二六—一七二七年度的一亿六千五百万战前卢布）。

在国内**商品流转**方面，私人资本主义成分也同样受到排挤。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公营部分在全部中介贸易额方面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二点六，在批发方面为百分之九十点六，在零售方面为百分之五十七点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公营部分在全部流转方面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一点九，在批发方面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四点九，在零售方面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七点四；而私营部分同一时期内在全部中介贸易额方面的比重由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减少到百分之十八点一，在批发方面由百分之九点四减少到百分之五点一，在零售方面由百分之

四十二点七减少到百分之三十二点六，而且预计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私营部分在所有各种商业方面的比重还要继续降低。

结论：我国正满怀信心地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正在把资本主义成分排挤到次要地位并逐步把它从国民经济中排挤出去。

这个事实向我们揭示出“谁战胜谁”这个问题的基础。这个问题是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即在施行新经济政策后提出的。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我们能够排除私商，排除私人资本家并学会经商，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化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或者私人资本竟能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制造分裂而战胜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基本上已经获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只有瞎子或疯子才会否认这一点。

但是“谁战胜谁”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具有另一种性质。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从商业方面转移到生产方面，转移到手工业生产方面和农业生产方面，在这些方面私人资本还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必须有系统地把它从这里排挤出去。

党的任务：扩大和巩固我们城乡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

二、我国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速度

（甲）占我国**全部**工业百分之七十七以上的国有化大工业产值的增加如下：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国有化大工业产值（按战前卢布计算）比上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点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增加百分之十五点八，而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那个大大低于实际可能性的五年计划草案，五年内产值将增加百分之七十六点七，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工业产值将比战前增加**一倍**。

如果拿包括大工业（国营工业和私营工业）和小工业在内的我国全部工业总产值来说，那末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草案，产值平均每年约增加百分之十二，这样，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全部工业产值比战前水平差不多将增加百分之七十。

美国全部工业产值每年增长的数字，在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五年内为百分之八点二，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的五年内为百分之五点二，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的五年内为百分之二点六，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〇年的五年内为百分之三点六。俄国平均每年增长的数字，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的十年内为百分之十点七，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三年的八年内为百分之八点一。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产值和全部工业产值每年增长的百分数是打破纪录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

并且应该指出，美国工业，尤其是俄国战前工业，几乎都是靠外资的大量流入来发育滋长的，而我们的国有化工业却不得不依靠本身的积累。

并且应该指出，我们的国有化工业已经进入改造时期，这时重新装备旧工厂和建立新工厂对于工业产值的增加有决定的意义。

按发展速度来说，我国全部工业，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发展。

（乙）为什么我国大工业能有这种空前的发展速度呢？

第一、因为它是国有化的工业，它不必去追求私人资本主义集团的那种自私的反社会的利益，它有可能按照整个社会的利益来发展。

第二、因为它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它有一切可能打败私人资本主义工业。

第三、因为国家掌握着国有化运输业、国有化信贷业、国有化对外贸易和国家的总预算，国家有一切可能按照计划领导国有化工业，使它成为统一的工业经济，这就使国有化工业和其他工业比较起来有

很大的优越性并使它的发展速度加快许多倍。

第四、因为国有化工业是最大最强的工业，它有一切可能实行不断降低成本、减低出厂价格和减低产品价格的政策，从而扩大自己的产品销售市场，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并为进一步扩大生产提供不断增长的泉源。

第五、因为国有化工业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由于它一贯执行减低价格的政策）能够在城市和乡村、无产阶级和农民彼此逐渐接近的情况下发展；它和资本主义工业截然不同，因为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榨取农民脂膏的资产阶级城市和陷于破产的农村间的敌对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发展的。

最后，因为国有化工业依靠领导我国全部发展的工人阶级，得到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它有可能很容易地提高技术，特别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生产和管理的合理化，而这在资本主义工业制 度下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最近两年来我国技术的迅速提高和新的工业部门（如机器制造业、机床制造业、涡轮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化学工业等等）的迅速发展无可怀疑地说明了这一切。

我们在缩短工作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同时又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条件下所实行的生产合理化也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空前未有的发展速度直接地和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苏维埃生产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

早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前，列宁就正确指出，我们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就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各先进国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三八页）。

党的任务：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已经达到的发展速度，并在最近的

将来加快这种速度，以便创造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必需的有利条件。

三、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

（甲）农村中的情形却与此相反，产值的增加比较缓慢。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总产值（按战前卢布计算）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一，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增加百分之三点二，而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那个大大低于实际可能性的五年计划草案，五年内产值将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四点八，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农业产值将比战前产值增加百分之二十八到百分之三十。

这是勉强过得去的农业增产速度。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种增长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是打破纪录的，也不能认为这种增长足以使农业和我们的国有化工业之间将来保持必要的平衡。

美国农业总产值在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十年内每年增加百分之九点三，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的十年内每年增加百分之三点一，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十年内每年增加百分之一点四。战前俄国农业产值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十年内每年增加百分之三点二到百分之三点五。

固然，我国农业产值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的五年内每年将增加百分之四点八，而且苏维埃时期农业产值增长的百分数和资本主义俄国时期的增长相比显然是增大了。但是不应当忘记，国有化工业的总产值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将比战前工业产值增加**一倍**，全部工业产值到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将超过战前水平约百分之**七十**，而农业产值到那时候将仅仅超过战前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到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不到三分之一**。

因此，决不能认为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乙）为什么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比国有化工业的发展速度缓慢？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农业技术过分落后和农村文化水平太低，另一方面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分散的农业生产没有我们国有化的联合经营的大工业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性。首先，农业生产不是国有化的，不是联合经营的，而是分散的，分成许多零星小块的。它不按照计划经营，大部分暂时还受着小生产自发势力的支配。它还没有按照集体化路线联合起来和合并起来，所以它还是一个便于富农分子进行剥削的场所。这些情况就使分散的农业不可能具有我们国有化工业所具有的那种联合起来的按计划经营的大生产的巨大优越性。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呢？也许在于放慢我国一般工业特别是我们国有化工业的发展速度吧？决不能这样做！这是一种极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空想。（喊声：“对！”）国有化工业应当而且一定要加速发展。这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保证。这是最后使农业本身工业化的保证。

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

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不这样，我国的农业就不能赶上更不能超过那些农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等国）。

在限制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展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把农户引上合作发展的轨道、使国家有计划地循着从供销上和生产上掌握农民经济的路线去影响农村等方面，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固然都

是有决定意义的措施，但毕竟只是使农业转上集体制轨道的一些准备措施。

（丙）两年来党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做得不少。但是还远没有做到可能做到的一切。

就所谓**从外部**即从供应农业以各种必需品和销售农产品方面掌握农业来说，我们获得了以下的成绩：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现在已经占全体农户三分之一左右；消费合作社所掌握的对农村的供应量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五十点八；合作社和国家机关所掌振的农产品销售量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六十三。

但是，就所谓**从内部**即从农业生产方面掌握农业来说，我们是做得太少了。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的产值在全部农业产值中总共只占百分之二强，在农业商品产值中只占百分之七强。

这当然有不少原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例如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善于处理这件工作，不够重视这件工作，农民保守落后，使农民转上公共耕种制轨道所必需的资金不够等等。而这方面需要的资金是很不少的。

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过，我们还没有那种使农业服从国家经营或集体经营原则所必需的基金。我想，现在我们就要有这种基金了，并且这种基金一定会日益增多。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不把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如果不使它们转上公共耕种制的轨道，就不能真正推进集约耕作和农业机械化，就不能使我国农业在发展速度上赶上加拿大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农村工作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重要事业上面。

我想，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合作社机关所属的农具租赁站应当在这个事业上起极大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国营农场有时帮助农民转上集体耕种制的轨道，使农民获得很大的利益。我指的是乌克兰国营农场管理局用拖拉机帮助敖德萨区的农民，以及这些农民写信对它的帮助表示感谢。这封信不久以前刊载在“消息报”上。让我把这封信念一下：（喊声：“请吧！”）

“我们，**舍夫琴柯**村、**克拉辛**村、**加里宁**村、‘**红霞**’村和‘**旭日**’村的移民，谨向苏维埃政权致最深切的谢意，感谢它在恢复经济方面给我们很大帮助。原先我们多半是贫农，没有马匹，也没有农具，无法耕种我们所分得的土地，因此，**不得不把它租给当地的老居民富农去耕种而只取得一部分收成**。收成很坏，因为大家都知道，租户是决不会好好耕种别人的土地的。国家所发给我们的少量贷款都被我们吃光了，我们一年比一年穷了。

今年乌克兰国营农场管理局的一位代表来到我们这里，建议用拖拉机帮我们种地来代替现金贷款。所有的移民，除了个别富农之外，都表示同意，虽然当时大家都不大相信工作会搞好。使我们非常高兴而使富农难过的是拖拉机翻耕了全部生荒地和休耕地一连耕耘了五六遍，清除了地里的杂草，并且把所有的地全种上了良种小麦。现在富农已经不再讥笑拖拉机队的工作了。今年因为缺乏雨水，我们区里的农民差不多都没有种上冬麦，而在那些种上冬麦的地里到现在也还没有出苗。**但是在我们这些移民的地里，几百俄亩休耕地生长着一片绿油油的很美丽的小麦，这在那些最富饶的日耳曼移民区也是看不到的**。

除了播种冬麦之外，拖拉机还耕耘了预备种春麦的全部秋翻地。**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一亩土地是荒芜的或者租给别人的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贫农不是在几俄亩休耕地上种有冬麦的**。

我们自从看见拖拉机耕作之后，就再也不愿意继续贫农的小经营了，**我们决定组织用拖拉机耕作的公共农庄，在农庄里不会再有单独的农民的小块庄稼了**。我们已经和塔拉斯·舍夫琴柯国营农场订立了合同，由它负责帮我们组织用拖拉机耕作的农庄。”（见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消息报”第二六七号）

农民就是这样写的。

同志们，要是这样的例子再多一些，那就可以大大推进农村集体化的事业了。

党的任务：通过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在供销方面扩大对农民经济的掌握，规定我们在农村建设中当前的实际的任务，即逐渐使分散的农户转上联合的大农庄的轨道，转上以集约耕作和农业机械化为基础的公共集体耕种制的轨道，因为这条发展道路是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和克服农村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最重要的手段。

* * *

整个说来，经济建设方面的总结和成绩就是这样。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一切都很好了。不，同志们，我们在这方面还远不是一切都很好。

例如我们这里存在着商品荒的因素。这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个负数。但可惜这个负数暂时还不能避免。因为我们用比发展轻工业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个事实本身就预先决定了我国在最近几年内还会有商品荒的因素。但是，假如我们愿意全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话，我们就不能不这样做。

有些人，例如我们的反对派，他们从投机分子在商店门口排成的长队里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喊叫商品荒，同时要求实行“超工业化”政策。同志们，这当然是蠢话。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这样说。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收缩重工业而去全力发展轻工业。况且不加速发展重工业，要充分发展轻工业也是不可能的。

可以用增加商品输入的办法来缓和商品荒，有一个时候反对派曾经坚持这一点。但这是很愚蠢的，后来连反对派自己也不得不放弃了。减少商品荒的因素，在我国条件下是完全可能办到并且是党所一向坚持的，至于这一工作我们做到怎样的程度，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想，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一切都很好的。

其次，无论在我国工业或商业方面都还有相当多的资本家。这些分子所占的比重并不像我们某些同志有时所形容的那样小。这也是我国经济平衡表上的一个负数。

不久以前我看过拉林同志所著的“苏联的私人资本”这本在各方面都很有趣的书。我建议同志们也看看这本书。你们从这本书上可以看到，资本家是多么狡猾和巧妙地拿工艺合作社的旗帜、拿农业合作社的旗帜、拿某些国营商业机关的旗帜来做护身符。我们是否在采取一切办法来限制、缩小并从国民经济范围内排除资本主义成分呢？我想，并不是一切办法都采取了。据我所知，例如在一般手工工业方面，特别是皮革工业和纺织工业方面，就有不少新的百万富翁在盘剥着手工业者和一般小生产者。我们是否在采取一切办法从经济上围攻并排除这些剥削分子，使手工业者同合作社或国家机关联系起来呢？未必用得着怀疑，这方面还远不是一切办法都采取了。可是这个问题对我们却有极重大的意义。

其次，在农村中富农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平衡表上的一个负数。我们是否在采取一切办法从经济上限制并孤立富农呢？我认为并不是一切办法都采取了。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而苏维埃法制并不是一句空话。这当然不是说不能采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富农。但是行政手段不应当代替经济措施。必须严重注意我们合作

社机关的实践中在和富农进行斗争方面、特别是在农业贷款方面歪曲党的路线的情形。

再其次，工业品成本、工业品出厂价格、特别是城市商品零售价格，减低的速度非常缓慢。这也是我们经济建设平衡表上的一个负数。不能不指出，我们在这方面碰到了国家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党机关的很大的反抗。我们的同志们大概不了解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是改进我国工业、扩大市场并增强我国工业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泉源的基本杠杆之一。未必用得着怀疑，只有对这些机关在实行减低价格政策方面所表现的这种惰性和反抗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消灭这个负数。

最后，还有这样一些负数，如预算中的烧酒项目、对外贸易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后备资源不足。我认为可以开始逐渐减少烧酒的酿造，开辟无线电和电影这样的收入泉源来代替烧酒的收入。真的，为什么不去掌握这些极重要的工具，为什么不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中间选派干练人才去做这件事，以便顺利开展工作，使烧酒的酿造终能缩减下去呢？

至于说到对外贸易，我觉得我们经济方面现有的许多困难得不到解决是和输出不够有关的。我们是否能够增加输出呢？我认为是能够的。我们是否在采取一切办法去大大增加输出呢？我认为并不是一切办法都采取了。

关于后备资源方面的情形也是这样。有些同志有时由于欠考虑，有时由于不熟悉情况，说我们没有什么后备资源，这是不对的。不，同志们，我们是有些后备资源的。我们国家的一切机关，从县和省，直到区域和中央机关，都在尽力储存一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但这种后备资源还很少。这是应当承认的。所以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增加后备资源，有时甚至要缩减某些日常的需要。

同志们，这就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阴暗面，这些阴暗面我们必须予以注意，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消除，以便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前进。

四、阶级。国家机关。我国文化的发展

国内经济状况的问题谈完了，现在谈谈政治状况的问题。

（甲）**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和一般雇佣劳动者数量增加的数字如下：雇佣劳动者（失业者除外）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八百二十一万五千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一千零三十四万六千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其中体力劳动者，包括农业工人和季节工人在内，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五百四十四万八千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七百零六万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六。其中大工业的工人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一百七十九万四千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二百三十八万八千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

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一，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则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九点四，比战前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在同一时期内，其他社会集团（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减少了（例如资产阶级的比重从百分之五点五减到百分之四点八）。全部国营工业中工人的实际工资（附加工资除外）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每月为二十五点一八莫斯科折实卢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每月为三十二点一四卢布，即两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六，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五点四。包括附加工资（社会保险费、文化经费、公用事业费等）在内的工资，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五，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到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点四。社会保险基金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四亿六千一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八亿五千二百万卢布，即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因而使五十一万三千人有可能住休养所和疗养院，保

证四十六万失业者和七十万领抚恤金者（劳动残废者和内战残废者）领到补助金，并使患病工人在病假期间领到全部工资。

用于工人住宅建筑的费用，两年前即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一亿三千二百多万卢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为二亿三千多万卢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二亿八千二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达三亿九千一百多万卢布，其中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文告中所规定的五千万卢布。在过去三年中，工业、运输业、各级执行委员会和合作社方面用于工人住宅建筑的费用（个人建筑的住宅费用不算）为六亿四千四百七十万卢布，连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拨款共为十亿零三千六百万卢布。这笔经费使我们在三年内建筑了面积四百五十九万四千平方公尺的住宅，使二十五万七千工人（如果把工人家属计算在内就约有九十万人）得到了住房。

失业问题。我必须指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是有出入的。我所以引用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数字，是因为这些数字包括了在劳动介绍所登记过的真正失业者。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材料，失业人数在两年内已由九十五万增加到一百零四万八千。其中产业工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五，而脑力劳动者和非熟练劳动者则占百分之七十四。由此可见，我国失业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过剩，至于我国工业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充分吸收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那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

总结：整个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着的提高。

党的任务：继续贯彻进一步改善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工资的方针。

（乙）**农民**。我想，关于农民的分化问题用不着引用数字，因为我的报告已经拖得这样长，而这些数字又是大家都知道的。毫无疑问，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分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化混为一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增长的是两极，即贫农和富农，而中农则被冲刷。

我国的情形恰恰相反，中农的数目因有一部分贫农上升为中农而增加起来，富农也正在增多，而贫农却日益减少。这个事实说明，无论过去和现在，中农都是农业方面的中心人物。依靠贫农，联合中农，这对我国整个建设的命运、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决定的意义。

农村物质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农民收入增加的数字如下：农民的收入在两年前即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三十五亿四千八百万卢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已经增加到四十七亿九千二百万卢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一，而农村人口在这个时期内总共只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三八。这毫无疑问地证明农村的物质生活状况是在改善。

这并不是说全国一切地区的农民都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家都知道，这两年来某些地方的收成好坏是很不一致的，而一九二四年歉收的恶果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国家还要救济一般的劳动农民，特别是贫农。国家用来救济劳动农民的款项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为三亿七千三百万卢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四亿二千七百万卢布。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给贫农的特别救济如下：发给贫苦农户的款项共三千八百万卢布，减免贫苦农户的税款共四千四百万卢布，减免贫苦农户的保险费共九百万卢布，——总共九千一百万卢布。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在上述几个方面给贫农的特别救济约为：三千九百万卢布，五千二百万卢布，九百万卢布，——总共约一亿卢布。

总结：基本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改善了。

党的任务：继续贯彻进一步改善基本农民群众首先是贫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的方针，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提高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农村中的威信。

（丙）**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他们与工农相反：没有根据满意苏维埃政权。他们的不满情绪并不是偶然的。

这种不满情绪是有其生活根源的。

上面我已经讲过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我已经讲过我国工业的增长，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私人工商业者所占比重的降低，小商人的被排挤。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既然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商业机关在日益增长，成千上万的中小资本家也就在日益破产。这几年来有多少中小店铺倒闭了呢？有好几千个。有多少小工业主无产阶级化了呢？有好几千个。有多少职员在我们国家机关实行裁员时被解职了呢？有几百几千个。

我们工业的进展、我们商业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进展以及我们国家机关的改善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基本农民群众，而不利于新资产阶级，不利于一般中等阶层特别是城市中等阶层。所以这些阶层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那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因此在这种人中间就产生出反革命情绪。因此就产生出路标转换派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了新资产阶级政治市场上的时髦货色。

但如果以为所有的职员，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不满情绪，怀有埋怨和愤懑的情绪，那就错了。虽然新资产阶级中间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但是同时知识分子却在分化，数百数千的劳动知识分子离开路标转换派而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同志们，这显然是一个应该指出的好现象。

在这方面带头的是技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既然和生产过程密切相连，也就不能不看到布尔什维克是在引导我国向前迈进，使我国情况日益改善。像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德涅泊尔水电站建筑工程、斯维尔水电站建筑工程、土尔克斯坦铁路建筑工程、伏尔加—顿河运河建筑工程以及许多新建的大工厂这类巨大的企业，不能不对技术知识分子中的许多阶层发生一定的良好的影响，因为这些阶层的命运是和它们的命运相联系的。这对他们说来不仅是饭碗问题，同时也是光荣的事业，创造的事业，这自然使他们和工人阶级接近起来，和苏维

埃政权接近起来。

农村的劳动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村教师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早已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他们不能不欢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所以，虽然某些知识阶层中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但是同时劳动知识分子却正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

党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贯彻孤立新资产阶级的方针，巩固工人阶级和城乡苏维埃劳动知识分子的结合。

（丁）**国家机关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关于官僚主义大家都谈得很多，因此没有必要再来多谈这个问题了。无论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合作社机关还是党的机关里都有官僚主义分子，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和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只要我们这里还有国家政权存在，还有国家存在，这个任务就会始终摆在我们面前，这也是事实。

但是总要有个分寸。如果把反对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弄到毁灭国家机关的地步，弄到使国家机关威信扫地的地步，弄到企图把它搞垮的地步，那就是违背列宁主义，那就是忘记我们的机关是苏维埃机关，是世界上现有一切国家机关中最高类型的国家机关。我们国家机关的力量在哪里呢？就在于它通过苏维埃把政权和千百万工农群众联系起来。就在于苏维埃是供数十万工人和农民学习管理的学校。就在于国家机关不是和千百万人民群众隔绝，而是通过许许多多环绕着苏维埃并因而支持着政权机关的群众组织、各种委员会、各种团体、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等等来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我们国家机关的弱点在哪里呢？就在于它里面有破坏和歪曲国家机关工作的官僚主义分子。为了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在一两年内是清除不了的——就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使它和群众接近，依靠新的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人材来革新它，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它，而不是把它搞垮，不是使它威信扫地。列宁说得非常对，他说：**“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

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就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

我不再多谈我们国家机关中的缺点了，这些缺点本来就是很明显的。我指的首先是“婆婆妈妈的拖拉作风”。我手头有一大堆说明拖拉作风的材料，这些材料揭露出某些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保险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其他机关的玩忽职守的罪行。

例如有一个农民为了求得公允地解决一件事情，一连到一个保险机关去了二十一次，可是始终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还有一个农民，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头子，他步行了六百俄里，想要在县社会救济局那里弄清一件事情，可是始终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还有一个老太婆，一个五十六岁的农妇，她应人民法庭的传唤，步行了五百俄里，又坐马车走了六百多俄里，可是她始终没有得到公允的解决。

这一类的事实多得很，用不着一一列举了。同志们，这是我们的耻辱！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最后，我要谈谈关于“被打下去的人”的一些事实。原来除了从工人中间被提拔起来的人之外，还有一些“被打下去的人”，他们被自己的同志排挤下去，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会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忠诚老实。

例如有一个工人，一个工具钳工，因为很有才干、为人正直而被提拔担任工厂中的某种职务。他一年又一年地工作，很忠实地工作，整顿了秩序，消除了不善经营和浪费的现象。但他这样工作却触犯了一伙打得火热的“共产党员”的利益，扰乱了他们的安宁。结果怎样呢？结果这一伙打得火热的“共产党员”就多方和他为难，因而他不得不“闪开了”。“老兄，你想显得比我们聪明些，不让我们安安稳稳过活和享受，那你就闪开吧”。

还有一个工人，也是一个工具钳工，一个螺丝车床的调整工，被

提拔担任工厂中的某种职务。他拚命地和忠实地工作，但是他这样工作却扰乱了某些人的安宁。结果怎样呢？结果那些人找到机会把这个“不安分的”同志撵走了。这个被提拔的同志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的呢？他的心情是这样：“无论派我到什么地方工作，我总是努力不辜负对我的信任。可是像这种恶作剧的提拔，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受了极大的侮辱。我希望弄个水落石出，但是始终只是一个希望。无论工厂委员会、工厂管理处还是党支部连我说话都不肯听。对于提拔，我是死心了，即使给我一大堆金子，我也决不会去干了。”（见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劳动报”第一二八号）

同志们，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党的任务就是对官僚主义作斗争，改善国家机关，无情地消灭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实践中的那种乱七八糟的現象。

（戊）**关于列宁的文化革命的口号。**消除官僚主义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尽可以责骂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尽可以羞辱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可是，如果广大的工人群众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可能、愿意并善于从下面用工人群众自己的力量来监督国家机关，那末官僚主义无论如何还是会继续存在的。所以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文化——不仅仅在开展识字运动方面（虽然识字是一切文化的基础），而首先是在获得管理国家的技能和本领方面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是改善国家机关和任何其他机关的主要杠杆。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就在这里。

一九二二年三月，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列宁在致中央的一封由莫洛托夫同志收的信里讲过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①]。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同志们，列宁的这段话是决不能忘记的。（喊声：“对！”）

因此，党的任务就是加紧为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文化而斗争。

* * *

我国国内政治状况的总结是怎样的呢？

总结就是：**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现存一切政权中最巩固的政权。**（热烈鼓掌）

然而，苏维埃政权虽然是世界上现存一切政权中最巩固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会羡慕的政权，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是一切都很好了。不，同志们，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我们布尔什维克不能而且不应当掩饰这些缺陷。

第一、我们还有失业现象。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我们应当加以克服，无论如何至少也要使它缩小到最低限度。

第二、我们在工人住宅的建筑方面有严重的缺点，我们发生了房荒，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加以克服，或者至少在最近几年内使它减少到最低限度。

我们这里不仅在一部分中等阶层中，而且在一部分工人中，甚至在我们党的某些环节中，都存在着某种反犹太主义的萌芽。同志们，我们必须十分无情地和这种恶劣现象作斗争。

我们还有放松反宗教斗争这样的缺陷。

最后，我们还存在着文化极其落后的情形，不仅从广义上来说是这样，而且从狭义上来说，即从起码识字的意义上来说，也是这样，因为苏联文盲所占的百分数还是不小的。

同志们，如果我们想以较快的速度前进，我们就必须消灭诸如此类的缺陷。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在结束我的报告的这一节的时候，请让我略为谈谈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几项最值得注意的任命。我不谈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任命问题。我也不谈苏联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民委员的任命问题。我只想谈谈最典型的三项任命。你们知道，洛波夫被任命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他是一个五金工人。你们知道，五金工人乌哈诺夫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代替了加米涅夫。你们也知道，还有一个五金工人柯马罗夫当选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代替了季诺维也夫。所以我们两个京城的“市长”都是五金工人。（鼓掌）固然他们不是贵族出身，但他们管理京城的事务比任何一个贵族都管理得好。（鼓掌）你们会说这是一种五金化的趋向。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坏处。（喊声：“正好相反，好得很！”）

但愿资本主义国家，但愿伦敦，但愿巴黎终于能赶上我们，并选出自己的五金工人来担任“市长”。（鼓掌）

三 党和反对派

一、党内状况

同志们，我不想多谈我们党在数量上的增长和思想上的提高，也不想列举各种数字，因为柯秀尔会把这一切向你们详细报告。

我也不想谈我们党的社会成分以及与此有关的数字，因为柯秀尔在自己的报告中会向你们提供这方面的详细材料。

我想简单谈谈我们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领导工作的提高以及这些方面的领导工作质量改进的情形。同志们，有一个时候，大约两三年前，有一部分同志，好像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笑声，喊声：“好像是？”）曾经责备我们省委员会、区域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

硬说各级党组织不内行，不该干涉我国的经济事务。是的，有过这样一个时候，但现在未必有人再敢这样责备党组织了。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已经熟悉经济的领导工作，党组织已经站在经济建设的前列，而不是做它的尾巴，——这已经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只有瞎子或疯子才会否认。我们决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说明我们党在有计划地领导我国经济建设方面，无论在地方或在中央，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有些人以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同志们，这是一件必须指出的特殊的重要的事情。人们有时援引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机关，彷佛那些机关也是有计划地领导国民经济的。不，同志们，它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且只要那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它们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要做到有计划地领导，必须具备另一种工业体系，即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至少必须具备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信贷系统、国有化的土地、同农村的社会主义的结合、工人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等等。

固然，它们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这里就不同了。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是有**原则性的**差别的。

所以我说，单从我们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问题这一简单事实，也可以看出我们计划领导工作的质量的提高。

我也不想多谈我们党的党内民主的发扬。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在我们这里，党内民主——真正的党内民主，党员群众积极性的真正高涨——正在日益增长和发展。有些人在空谈民主。但是，究竟什么是党内民主呢？究竟是谁的民主呢？如果把民主了解为寥寥无几的脱离

革命的知识分子有漫无止境地夸夸其谈和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等等的自由，那末这种“民主”我们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是破坏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区区少数人的民主。如果把民主了解为党员群众有解决我们建设方面各种问题的自由，了解为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吸引他们来参加党的领导，了解为发挥他们在党内的主人翁的感觉，那末这种民主我们是有的，这种民主我们是需要的，并且我们会不顾一切地来不断发扬它。（鼓掌）

同志们，我也不想多谈我们的集体领导随着党内民主的发扬而逐步增强的情形。就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说吧。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包括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同志的领导中心，定期集会并解决我国建设中的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党未曾有过的一个最民主的和集体行动的中心。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解决我们工作中各项最重要问题的责任日益从狭小的上层手里转到这个和一切建设部门以及我们辽阔国土上的所有地区保持着极密切联系的广大的中心手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也不想多谈我们党员干部增加的情形。毫无疑问，最近几年来，我们党内除了老干部，又不断增添了许多主要是工人出身的新干部。从前我们的干部以数百数千计算，可是现在他们却以数万计算了。我想，如果从最下层组织即从车间和工作小组算起，直到最高机关为止，那末现在我们全国的党员干部已经不下十万人了，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的。这是我们党的极大的发展。这是我们干部数量的极大的增长，是他们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经验的增加，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文化的提高。

最后，还有一个虽然不必多谈但是应该指出的问题。这就是关于党在我国非党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中、在全世界工人和一般被压迫阶级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的问题。未必用得着怀疑，我们党已成为全世界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旗帜，而布尔什维克这一称号已成为工人阶级中

优秀人物的光荣称号。同志们，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同志们，这并不是说我们党内没有什么缺点。不，缺点是有的，并且是严重的。让我来略为谈谈这些缺点吧。

例如拿党组织对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的领导工作来说。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一切都很好呢？不，并不是一切都很好。我们这里不仅在地方，甚至在中央，往往有人可以说是用私人情面、用家庭方式来处理问题。比如说，某个组织的上层领导者伊万·伊万诺维奇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搞坏了工作。但伊万·费多罗维奇却不愿意批评他，不愿意揭露他的错误，不愿意纠正他的错误。他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不愿意“树敌”。犯了错误，搞坏了工作，这有什么要紧！我们中间谁不犯错误呢？今天我原谅他伊万·费多罗维奇，明天他就会原谅我伊万·伊万诺维奇。因为怎么能担保我自己也不犯错误呢？客客气气，舒舒服服。既和气，又友好。人家不是说放任错误就是败坏我们的伟大事业吗？不要紧！也许侥幸能凑合过去。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某些负责工作人员的通常论调。

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批评整个世界的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翻天复地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某些同志的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末除了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毁灭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喊声：“对！”鼓掌。）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如果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者不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而用私人情面来处理问题，互相包庇错误，让脓疮在我们党的机体内部蔓延滋长，那末谁来纠正这些错误和缺点呢？

如果不肃清我们当中在处理我国建设事业各种极重要问题时的这种庸俗习气，这种讲私人情面的作风，那我们就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

家，我们就一定会灭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果拒绝诚恳坦白地进行自我批评，拒绝诚恳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我们就是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堵塞改进我们事业的道路，堵塞保证我们事业获得新成就的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要知道，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样样向上的。不，同志们，我们还有阶级，我们国内还有矛盾，我们有过去的东西，我们也有现在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这种种东西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波浪上一帆风顺地前进。我们是在斗争中、在各种矛盾的发展中、在克服这些矛盾中、在发现和消除这些矛盾中前进的。

只要还有阶级，我们就永远不能说：好，谢天谢地，现在算是万事大吉了。同志们，这种情形我们是永远不会有的。

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

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生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易地生长起来的，它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喊声：“对！”鼓掌。）

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基础。我们如果不以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态度坦白地诚恳地指出和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那我们就会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但我们是要前进的。正因为我们要前进，所以我们应当把诚恳的革命的自我批评当做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不然就不能前进，不然就不能发展。

但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差。而且只要有一点成绩，就忘记缺点，心满意足，自高自大起来。有了两三次大的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再有两三次大的成绩，就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但错误依然如故，缺点也还照样存在，让脓疮在我们党的机体内部蔓延滋长，于是党就害起病来了。

第二个缺点就是把行政方法搬到党内来，用行政方法代替党内有决定意义的说服方法。这个缺点的危险性并不亚于第一个缺点。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造成一种危险，使我们那些具有自动精神的党组织变成空洞无谓的文牍主义的机关。既然我们有不下于六万个最积极的工作人员分布在各种经济机关、合作社和国家机关里，并在那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那就应当承认，其中一部分人在同这些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时有时自己也传染上官僚主义，并且把它带到党组织里来。同志们，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不幸，因为只要还有国家，这种现象总会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存在。正因为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有一定的根源，所以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同这种缺点进行斗争，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吸收他们参加解决我们党的领导方面的种种问题，不断地发扬党内民主，不容许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用行政方法代替说服方法。

第三个缺点就是我们一些同志总是希望顺水行舟，平安无事，不问前途，不顾将来，只求周围一片节庆气氛，只求我们每天都举行庆祝大会，到处都听到掌声，使我们每个人都能轮流选入各种名誉主席团。（笑声，鼓掌。）

这种只希望到处看到节日气氛的心理，这种只醉心于装饰门面、醉心于庆祝各色各样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纪念节日的心理，这种只愿意随波逐流、不管我们会被冲到哪里去的心理，（笑声，鼓掌。）——这一切就构成我们党的实践中的第三个缺点的实质，构成我们党的生活中我们各种缺点的基础。

你们看见过这样的船夫吗？他们老老实实地划船，划得汗流满面，但是不知道流水会把他们冲到哪里去。我在叶尼塞河上看见过这样的船夫。这是一些诚实的、不知疲倦的人。但是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而且不愿意知道波浪会把他们冲到使他们遭到灭亡的危险的礁石上去。

我们有些同志也是这样。他们老老实实地双手不停地划船，随波逐流，至于流水会把他们冲到哪里去，他们不仅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知道。没有前途的工作，没有舵没有帆的工作，——这就是只想随波逐流的心理所造成的后果。

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很清楚的：起初他们身上渐渐发霉，接着他们就变得暮气沉沉，随后他们就陷入庸俗的泥潭，末了他们就变成十足的庸人。这就是真正蜕化的道路。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党的实践和我们党的生活中的一些缺点，关于这些缺点，我向你们说了一些不大中听的话。

现在让我来谈谈关于争论和关于我们的所谓反对派的问题。

二、争论的总结

党内的争论有没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什么价值呢？

人们有时说：你们干吗大肆争论，谁需要这种争论呢？家丑不可外扬，争论问题在内部解决不是更好吗？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争论有时是绝对必要而且是非常有益的。全部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争论。如果争论是在同志范围内进行的，是在党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它的目的是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是批评党内的缺点，因而能够改进我们的事业并武装工人阶级，那末这样的争论是必需而且是有益的。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争论，这种争论的目的不是要改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是要败坏它，不是要巩固党而是要瓦解它并破坏它的威信。这样的争论通常不会使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而会使它解除自己的武装。这样的争论我们是不需要的。（喊声：“对！”鼓掌。）

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大约三个月，即在中央还没有制定提纲，还没有公布提纲时，反对派要求展开全国范围的争论，企图强迫我们进行一种必然有利于我们的敌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敌人、有利于我们党

的敌人的争论。正因为如此，中央才打破了反对派的这种计谋。正因为中央打破了反对派的这种计谋，我们才能把争论引上正轨，使争论能够以中央提交代表大会的提纲作为基础。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整个争论是有好处的。

同志们，至于说家丑外扬，那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而且将来也不会害怕在全党面前公开批评自己和自己的错误。其实，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也正在于它不怕批评，并通过批评自己的缺点来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因此，这次争论是我们党强大有力的标志。不应当忘记，在任何一个大的政党内，特别是在像我们党这样一个执掌政权而又包含着一部分农民和职员的政党内，在一定时期内必然会出现一些对党的实践问题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分子，他们惯于闭着眼睛进行表决，惯于随波逐流。这类分子的大量存在是一种祸害，我们必须和这种祸害进行斗争。这类分子是我们党内的泥潭。

争论就是向这个泥潭申诉。反对派分子向它申诉是要从它中间拉出一部分人。而反对派分子确实从它中间拉出了最坏的一部分人。党向它申诉是要从它中间拉出最好的一部分人，吸引这一部分人来积极参加党的生活。结果，这泥潭虽然本身惰性很大，也不得不自行抉择。并且它在这些申诉之后确实自行抉择了，它的队伍中的一部分人投向反对派，另一部分人投向党，于是泥潭也就不成其为泥潭了。这在我们党的发展的总平衡表上是一个正数。这次争论的结果，我们党内的泥潭缩小了，它不是已经完全不存在就是快要不存在了。这就是争论的好处。

争论的总结怎样呢？总结是大家都知道的。到昨天为止，拥护党的同志有七十二万四千人，而拥护反对派的只有四千多人。你们看，这就是总结。我们的反对派曾经大肆叫嚣，说中央委员会脱离了党，党脱离了阶级，说什么美哉，妙哉，要是嘴里长出蘑菇来，那末一定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拥护反对派。但是，既然嘴里长不出蘑菇来，

于是拥护反对派的人甚至连百分之一也不到。总结就是这样。

为什么全党以及跟它一起的工人阶级能这样急遽地把反对派孤立起来呢？要知道，领导反对派的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善于给自己作广告的人物，（喊声：“对！”）不谦逊的人物，（鼓掌）善于自吹自擂的人物。

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反对派的领导集团原是一些脱离实际生活、脱离革命、脱离党、脱离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集团。（喊声：“对！”鼓掌。）

刚才我谈到我们工作上的一些成绩，谈到我们在工业方面、商业方面、整个经济方面以及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成绩。但是反对派对这些成绩不感兴趣。他们不是看不见这些成绩，就是不愿意看见这些成绩。他们所以不愿意看见这些成绩，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愚昧无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这帮脱离实际生活的知识分子相当顽固。

三、党和反对派之间的基本分歧

你们要问，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些分歧发生在哪些问题上？

同志们，分歧发生在一切问题上。（喊声：“对！”）

不久以前，我看到莫斯科一位非党工人（他就要入党，也许已经入党了）的申请书。请看他是怎样说明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的：

“从前我们寻找党和反对派意见分歧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反对派和党意见相同的地方了。（笑声，鼓掌。）反对派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反对党的，所以我要是一个拥护反对派的人，那我就不会申请入党了。”（笑声，鼓掌。）（见“消息报”第二六四号）

你们看，工人有时是多么善于中肯而简洁地说明问题呵。我认为这一段话最中肯最正确地说明了反对派对党、对党的思想、对党的纲

领和党的策略的态度。

正因为反对派在一切问题上都和党发生分歧，所以反对派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策略和自己的组织原则的集团。凡是成立新党所必需的一切，反对派都已经具备了。只是缺乏一件“小小的东西”，缺乏搞这一手的那么一点力量。（笑声，鼓掌。）

我可以举出党和反对派之间发生分歧的七个基本问题：

第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可能性的问题。我不再援引反对派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和声明了。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没有必要重复。大家都很清楚，反对派是否认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可能性的。反对派既然否认这种可能性，也就直接和公开地滚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去了。

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方针对他们现在的领导者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拒绝参加十月起义，就是从这种方针出发的。当时他们公开说，我们举行起义就是自取灭亡，必须等待立宪会议，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并且不会很快成熟。托洛茨基参加起义也是从这种方针出发的。因为他当时曾经公开说，如果在最近的将来没有西方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及时援助，而以为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那是愚蠢的。

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列宁和党，——这三方面当时是怎样去参加起义的呢？同志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谈几句的。

你们知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在棍子的威胁下参加起义的。当时列宁用棍子赶着他们，用开除党籍威吓他们，（笑声，鼓掌。）他们才不得不拖着腿走去参加起义。（笑声，鼓掌。）

托洛茨基是自愿参加起义的。但他不是简简单单地参加的，而是有小小的附带条件的，这个小小的附带条件当时就已经使他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接近了。有意思的是托洛茨基恰巧在十月革命前夜即

一九一七年六月居然在彼得格勒再版他的旧作“和平纲领”，好像故意要藉此说明他是在自己的旗帜下参加起义的。他在这本小册子里究竟说些什么呢？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和列宁争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问题，他认为列宁的见解是不正确的，并且断言政权固然必须夺取，但是，假如没有胜利的西欧工人的及时援助，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而谁要是不相信托洛茨基的批评，谁就是犯了民族狭隘性的毛病。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那本小册子里的一段话：

“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在一国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

同志们，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小小的附带条件，这个小小的附带条件在许多方面向我们说明托洛茨基现在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的根源和基础。

而列宁是怎样参加起义的呢？党是怎样参加起义的呢？也是有小小的附带条件的吗？不，列宁和他的党参加起义是没有附带条件的。下面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宁在国外发表的一篇有名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的一段话：

“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会引起摩擦，而且会

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开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说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〇三五页）

你们可以看到这完全是另一种方针。托洛茨基参加起义是有一种使他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接近的小小的附带条件的，他断言如果外来的援助不及时，无产阶级政权本身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列宁却相反，他参加起义是没有附带条件的，他肯定说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应当成为帮助其他各国无产者挣脱资产阶级枷锁的**基地**。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参加十月起义的情形。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十年一个鼻孔出气的原因。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对话方式来说明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双方在成立反对派联盟时的会谈情形。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说：“亲爱的同志，你看，我们归根到底还是对的，我们曾经说过不应当举行十月起义，应当等待立宪会议，如此等等。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国家在蜕化，政权在蜕化，我们在走向灭亡，我们这里不会有什么社会主义。本来是不应当举行起义的。你却自愿地参加了起义。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托洛茨基回答他们说：“不，亲爱的同事，你们这样说我是不公道的。起义我是参加了的，但我究竟是怎样参加的，你们却忘记说了。要知道我参加起义并不是干脆的，而是有附带条件的。（大笑）既然现在已经很清楚，外来的援助已经无从期待，那末我们显然是在走向灭亡，这一点我当时在‘和平纲领’中就已经预先说过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想必是这样。我们忘记了小小的附带条件。现在清楚了，我们的联盟是有思想基础的。”（大笑，鼓掌。）

反对派否认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可能性的方针就是这样形成的。

这种方针是什么呢？这就是投降主义。向谁投降呢？显然是向我国的资本主义分子投降。此外还向谁投降呢？向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投降。而那些左的词句和革命的姿态又到哪里去了呢？全都烟消云散了。只要把我们的反对派好好抖一抖，把他们的那些革命辞藻抖掉，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充满着投降主义。（鼓掌）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国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呢？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的。（笑声）然而反对派在他们每次的声明中都要提出这个问题。反对派说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特米多尔式的蜕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正在破产和倒退，我们不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在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是奇怪的、愚蠢的。但是反对派却坚持自己的说法。

同志们，你们看，这又是一个分歧。托洛茨基那个尽人皆知的关于克列孟梭的论点就是以此为根据的。既然政权已经蜕化或正在蜕化，那它还值得爱惜、值得保护、值得捍卫吗？显然是不值得的。如果便于“取消”这种政权的有利形势到来，比方说，如果敌人已经进到离莫斯科只有八十公里的地方，那显然就应当利用形势来扫除这种政权，建立起克列孟梭式的即托洛茨基式的新政权。

显然，这种“方针”丝毫没有列宁主义的气息。这是十足的孟什维主义。反对派已经滚到孟什维主义方面去了。

第三、关于工人阶级同中农联盟的问题。反对派一直隐藏着自己对这种联盟思想的反对态度。他们的政纲，他们的反提纲所以值得注意，主要还不在于其中已经谈到的东西，而在于他们力图对工人阶级隐瞒的东西。但是毕竟出来一位伊·尼·斯米尔诺夫（他也是反对派

的首领之一），他鼓起勇气道出反对派的真情，把反对派拖到光天化日之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们是在“走向灭亡”，如果要想“得救”，就必须同中农闹翻。这话虽然不够聪明，但是说得很明白。

在这里，反对派终于在大家面前露出了他们的孟什维克马脚。

第四、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的问题。既然否认在我国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既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既然否认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必要，那末我国革命所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显然什么也没有了，简直什么也没有了。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已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农民现在再不需要干什么革命了，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土地，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已经可以离开，可以让位给其他阶级了。

你们看，如果把反对派的观点追究到底，那末反对派的方针就是这样。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的投降主义的全部根源。无怪乎崩得派投降主义者阿布拉莫维奇要夸奖反对派。

第五、关于领导殖民地革命的列宁方针的问题。列宁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里共产主义的政策和殖民地国家里共产主义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区别。从这种区别出发，列宁早在大战时期就已经说过，保卫祖国的思想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共产主义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是反革命的，但是对于那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的被压迫国家来说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是正义的。

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在一定阶段和在一定期间可以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甚至结成联盟，只要它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只要它不妨碍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和贫农。

反对派在这方面的罪过就在于他们彻底背离了列宁的这个方针，

而滚到第二国际的立场上去，第二国际认为不应当援助殖民地国家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的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遭到的一切不幸，原因也就在这里。

你们看，这又是一个分歧。

第六、关于世界工人运动中的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反对派在这方面的罪过就在于他们在逐步争取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问题上背离了列宁的策略。要把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不能仅仅靠党的政策正确。党的政策正确是一件大事情，但是这还远不是一切。为了使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就必须使群众根据本身的经验确信共产主义的政策正确。而为了使群众确信这一点，就需要时间，就需要党善于进行灵活巧妙的工作把群众引导到自己的立场上，善于进行灵活巧妙的工作使千百万群众确信党的政策正确。

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问题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苏维埃政权。然而我们当时并没有号召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去举行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起义。为什么？因为当时群众还不可能确信我们的绝对正确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有当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丢尽脸皮的时候，只有当群众开始确信我们的政策正确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引导群众举行了起义。正因为我们适时地引导群众举行了起义，我们那时才获得了胜利。

这就是统一战线思想的根源。列宁所以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其实就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国家里感染了社会民主党妥协主义偏见的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易于根据本身的经验认识共产党人的政策正确，并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反对派的罪过就在于他们完全否定这个策略。有一个时候反对派曾经愚味无知地醉心于统一战线的策略，非常欢迎和英国总委员会达

成协议，认为这种协议是“和平的极重要的保障之一”，是“防止武装干涉的极重要的保障之一”，是“防止欧洲改良主义为害”的极重要手段之一（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但是，反对派在依靠柏塞尔之流和希克斯之流“防止”改良主义“为害”的希望彻底破灭以后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统一战线策略的思想了。

同志们，你们看，这又是一个分歧，它表明反对派完全离开了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

第七、关于列宁式的党性、关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列宁式的统一的问题。反对派在这方面完全背离列宁的组织方针，而走上建立第二党的道路，走上建立新国际的道路。

你们看，这就是说明反对派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滚到了孟什维主义方面去的七个基本问题。

能不能认为反对派的这些孟什维主义观点可以和我们党的思想、和我们党的纲领、和我们党的策略、和共产国际的策略、和列宁主义的组织方针相容呢？

绝对不能，一分钟也不能！

你们会说：在我们这里怎么会产生出这样的反对派呢？他们的社会根源在哪里呢？我想，反对派的社会根源就在于城市小资产者阶层在我们发展的情况下日益破产，在于这些阶层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表示不满，在于这些阶层力图改变这个制度，力图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精神来“改善”这个制度。

前面我已经讲过，由于我们的前进，由于我国工业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比重的增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就日益破产和没落。反对派反映了这些阶层对无产阶级革命制度的怨恨和不满。

这就是反对派的社会根源。

四、今后怎样？

今后怎样对待反对派呢？

在讲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向你们谈谈加米涅夫在一九一〇年和托洛茨基进行合作的一次尝试的经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而且它能给我们一种线索来正确处理所提出的问题。一九一〇年，我们中央在国外举行了一次全会。全会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特别是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当时我们和孟什维克处在同一个党内，自称为一个派别）。全会违背列宁的意见，反对列宁的意见而主张和孟什维克调和，也就是主张和托洛茨基调和。列宁当时处于少数地位。可是加米涅夫怎样呢？他却去和托洛茨基实行合作。不过他进行这种合作，列宁是知道的并且也是同意的，因为列宁想用实际经验向加米涅夫证明，和托洛茨基合作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有害的和不能容许的。

请听加米涅夫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

“一九一〇年我们一派中的多数人曾经试图和托洛茨基同志妥协并取得协议。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激烈地反对这种企图，好像是为了我坚持试图和托洛茨基取得协议而‘处罚’我，他坚持由中央委员会派我做代表去参加托洛茨基同志那个报纸的编辑部。到一九一〇年秋，即在这个编辑部里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已经确信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反对我那种‘调和’路线的态度是正确的，因此，经他同意我就退出了托洛茨基同志那个机关报的编辑部。关于我们当时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分裂，党中央机关报发表了几篇尖锐的文章加以说明。就在那个时候，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建议我写一本小册子来总结一下我们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对我说：‘你已经尝试过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集团中的最左翼（托

洛茨基派）取得协议，你已经确信不可能取得协议，所以你应当写一本总结性的小册子。’自然，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特别坚持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和当时被我们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那种东西之间的关系方面……全部说清楚。”（加米涅夫为他的小册子“两个党”所写的序言）

从这里得出了什么结果呢？请听下去吧：

“和托洛茨基进行合作的尝试（我敢说我是诚心诚意做这次尝试的，单是我那些现在被托洛茨基利用的书信和私人谈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证明，采取调和态度势必滚到拥护取消派的立场上去，坚决站到取消派方面去。”（加米涅夫“两个党”）

再往下听吧：

“呵，如果‘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党内一种情绪而获得了胜利，那对取消派、召回派以及一切反党派别来说，该多么称心如意。”（同上）

同志们，你们看，这就是和托洛茨基进行合作的一次尝试。（喊声：“可以引为教训的尝试！”）关于这次尝试的结果，加米涅夫已经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那本名叫“两个党”的专门小册子里叙述过了。我不怀疑这本小册子当时对所有还幻想和托洛茨基合作的同志们是有很大益处的。

可是现在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加米涅夫是否会再写一本也叫做“两个党”的小册子来谈谈他现在和托洛茨基合作的尝试呢？（哈哈大笑，鼓掌。）这也许不是没有益处的。当然我不能向加米涅夫担保，托洛茨基现在就不会再像先前那样利用他的书信和亲密的谈话来反对他了。（大笑）但是这也用不着怕。无论如何，这里必须有所选择：或者是惧怕托洛茨基利用加米涅夫的信件并泄露他和托洛茨基的秘密谈话，那末就有出党的危险，或者是抛弃任何惧怕心理而留在党内。同志们，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着：不这样，就得那样。

据说反对派打算向代表大会提出一个声明，表明他们现在服从并且将来也会服从党的一切决定，（喊声：“又想来一九二六年十月的那一套吗？”）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喊声：“这种话我们已经听过两次了！”）并且要坚持他们不肯放弃的观点，（喊声：“呵！”“不行，最好还是由我们亲自动手来解散他们吧！”）在党章范围内坚持。（喊声：“又有小小的附带条件。”“我们的党章范围不是橡皮做的。”）

同志们，我想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喊声：“对！”鼓掌多时。）同志们，我们以前也遇到过某种声明的尝试，（鼓掌）这就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和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那两次声明的尝试。（喊声：“对！”）这种尝试的结果如何呢？我虽然不打算写“两个党”这样的小册子，可是我敢说这种尝试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喊声：“对！”）结果是使党受了两次骗，结果是使党的纪律削弱了。试问反对派现在还有什么理由来要求我们，要求伟大的党的代表大会，要求列宁党的代表大会经过这种尝试之后还相信他们的话呢？（喊声：“那太愚蠢了。”“谁相信，谁就倒霉！”）

据说他们还要提出恢复被开除的人的党籍问题。（喊声：“不行！”“让他们滚到孟什维克的泥潭里去吧！”）同志们，我想，这一套也是行不通的。（鼓掌多时）

为什么党开除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呢？因为他们是反党的反对派的全部活动的组织者，（喊声：“对！”）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破坏党的法律，因为他们妄自尊大，以为谁也不敢触犯他们，因为他们想在党内给自己造成一种贵族地位。

可是，难道我们愿意党内存在享受特权的贵族和没有这种特权的农民吗？难道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贵族等级根本铲除之后，现在又要在我们党内恢复这种等级吗？（鼓掌）

你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呢？因

为我们不愿意党内有贵族存在。因为我们党内只有一种法律，并且全体党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如果反对派希望留在党内，那他们就必须无附带条件地毫不含糊地服从党的意志、党的法律、党的指示。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那就让他们到他们认为比较自由的地方去吧。（喊声：“对！”鼓掌。）我们不愿意而且决不会为反对派制定一些优待他们的新法律。（鼓掌）

有人问到条件。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反对派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必须完完全全解除武装。（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他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地老老实实地放弃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呼喊声：“对！” 鼓掌多时。）

他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地老老实实地痛斥他们自己所犯的那些已经成为反党罪行的错误。

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支部交出来，使党能够把它们全部解散。（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或者是这样做，或者是叫他们出党。如果他们不肯出去，就把他们赶出去。（呼喊声：“对！”鼓掌多时。）

同志们，关于反对派的问题就是这样。

四 总 结

同志们，现在我要结束我的报告了。

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总结是怎样的呢？总结如下：

（一）虽然有极大的困难，虽然有“列强”资产阶级的挑衅性的攻击，我们还是和周围各国维持了和平关系；

（二）虽然障碍重重，虽然被收买的销路很广的资产阶级报刊百般污蔑，我们还是巩固了苏联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以及殖民地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三）我们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各洲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

（四）我们党帮助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加强了它们在世界各国的影响；

（五）我们尽力做到了一个党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发展和加速世界革命运动；

（六）我们提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使它的发展达到了打破纪录的速度，并且确立了它在全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七）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

（八）我们依靠贫农巩固了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

（九）虽然存在着敌对的国际包围，我们还是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向世界各国的工人表明了无产阶级不仅善于破坏资本主义而且善于建设社会主义；

（十）我们巩固了党，捍卫了列宁主义，彻底粉碎了反对派。

总结就是这样。

结论怎样呢？结论只有一个：我们是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喊声：“对！”鼓掌。）

由此可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一定能达到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能达到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胜利。（鼓掌多时）

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道路上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困难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不怕困难，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我们是从革命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

困难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像过去一样地克服困难，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钢铁般的列宁的党把我们锻炼出来为的是要和困难作斗争，克服困难，而不是叫苦和哭泣。

正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我们一定会胜利。

同志们！向着我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向着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

（热烈鼓掌多时。全体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欢呼致敬。高唱“国际歌”。）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0卷第186—245页

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

（给联共（布）各级组织）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大约一个半月以前，即一九二七年底，我们的粮食收购发生了极严重的危机。一九二六年底，我们已经收购到四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粮食，可是一九二七年底，收购的粮食才勉强达到三亿普特。可见拿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六年底比较，我们缺粮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这个缺额也就是粮食收购危机在数字上的大略表现。

粮食收购危机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意义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如何呢？

首先，这意味着工人区的供应发生危机，这些地区的粮价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

第二、这意味着红军的供应发生危机，红军战士中产生不满情绪。

第三、这意味着产麻区和产棉区的供应发生危机，这些地区出现投机的粮价，麻农和棉农改种粮食，因而棉、麻生产缩小，纺织工业的有关部门也随之缩小。

第四、这意味着国家手中缺乏粮食后备，既不能满足国内需要（逢歉收时），也不能满足为输入设备和农业机器所必需的出口的需要。

最后，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价格政策遭受破坏，稳定粮价的政策遭受破坏，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遭受破坏。

为了摆脱这些困难，应当弥补亏空，消灭收购方面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的缺额。要消灭这个缺额，应当使党和政府的一切杠杆都动起来，打破各组织中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从上到下把党的优秀力量都投到收购战线上去，无论如何要充分利用泥泞时期以前有限的时间来提

高收购量。

正是为了这些目的，联共（布）中央发出了头两个关于粮食收购工作的指示（第一个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第二个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发出）。但是因为这两个指示没有发生效力，联共（布）中央不得不又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发出了第三个指示，这个指示不论按语气或要求来说都是空前严厉的。指示的结尾指出，如果党组织的领导者在最短期间不能彻底扭转粮食收购方面的状况，那就要给予他们处分了。当然，这种处分只能在非常情况下采用，况且，党组织的书记们做工作并不是为了应付差事，而是为了革命。可是，鉴于上述非常情况，中央认为采取这一步骤是适当的。

在引起粮食收购危机的若干原因中必须指出下列几点：

第一、农村正在发展和富裕起来。首先是富农已经发展和富裕起来了。三年的丰收不是没有作用的。今年的余粮不比去年少，正如今年国内工业品不比去年少而比去年多一样。可是农村富裕阶层今年已经有可能依靠原料作物、肉类产品等等来周转，而把粮食囤积起来以抬高粮价。固然，富农不能算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但他们是农村中的经济权威，他们和以高价收买粮食的城市投机分子勾结在一起，如果不遇到我们收购机关的反对，他们就有可能在抬高粮价的问题上，在破坏苏维埃价格政策的问题上使中农跟着他们走。

第二、我们的收购机关没有担负起自己的任务。它们滥用加价和各种“合法”增价的办法，它们不去制止投机活动，而是彼此之间进行疯狂的竞争，破坏收购机关的统一战线，抬高粮价，从而不自觉地帮助了投机分子和富农破坏苏维埃的价格政策和恶化市场，使收购量降低。固然，党可以加以干涉，把这些缺点消灭掉。但是党陶醉于去年收购工作的成绩，同时又忙于争论，竟放过了这些缺点，以为一切缺点都会自行消灭。而且有许多党组织形式主义地对待收购工作，好像这个工作和它们无关，它们忘记了，对收购工作中的缺点，以及对

一切经济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工作中的缺点，要向工人阶级负责的首先是党。

第三、我们的农村工作路线在许多地区被歪曲了。党的“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这个基本口号往往执行得不正确。各级党组织已经学会了和中农结成联盟，这是党的一个巨大的成绩，但是它们还远不是在一切地方都把贫农工作做好了。至于同富农和富农危险作斗争，那末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方面还远没有做到它们应该做的一切。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最近在我们的各种组织中，不论是党的或其他的组织中，都出现了一些党的异己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有阶级，不了解我们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这样来进行工作：在农村中不得罪任何人，同富农和睦相处，在农村“各阶层”中都保有声望。显然，在农村中有这种“共产党员”是不能改进我们的农村工作、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以及把贫农团结在党的周围的。

其次，在一月份以前，农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由于非谷类农作物、畜牧业和零活等收入增加而比去年大为提高，但是商品的供应总值有一定的减少（虽然运往农村的工业品数量已经增加），也就是说，商品的供应落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提高。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如工业品运往农村迟缓、只依靠农业税、不善于吸取农村游资等等，就给粮食收购危机造成了条件。

不言而喻，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的首先是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地方党组织。

为了消除危机，首先必须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动性，并且告诉它们，收购工作是全党的事情。

第二、必须用打击投机商和富农投机分子的办法来制止投机活动和健全市场，为此可以使用那些禁止在日用品方面进行投机的苏维埃

法律。

第三、必须吸收农村游资，为此可以利用关于捐献、发行农民公债和禁止酿造私酒的法律。

第四、必须使我们的收购机关受党组织的监督，制止这些机关互相竞争，责成它们执行苏维埃价格政策。

最后，必须使党的路线在农村实际工作中不再被歪曲，把对富农危险作斗争的任务当做工作重点，责成我们的党组织“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见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

从中央的指示中可以知道，党在加强收购工作的斗争中正是采取了这些措施，并且在全国展开了相应的运动。

在其他的条件和其他的情况下，党是会采取其他的斗争方式的，例如把几千万普特粮食抛到市场上，去制服不肯拿粮食上市的农村富裕阶层。但是要这样做，国家就必须掌握足够的粮食后备，或者拥有用于从国外输入几千万普特粮食的大量外汇后备。但是，大家知道，国家并没有这些后备。正因为没有这些后备，所以党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反映在中央的指示里，表现在展开了的收购运动中，但是其中大部分只在目前收购年度有效。

有人说我们好像在取消新经济政策，在施行余粮收集制和剥夺富农，如此等等。这是反革命的谣言，必须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改变。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在国家有权、有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调节商业的条件下进行商品流转和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没有这个条件，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单纯恢复，这一点是大谈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反革命造谣者所不愿意了解的。

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断定，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和展开了的粮食收购运动已经使党取得第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收购速度已经确定而

普遍地提高。一月份的收购量比十二月份增加了一倍。二月份的收购速度又有所提高。收购运动对于我们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党的或苏维埃的和合作社的组织，都是一次检查，它使这些组织容易清除蜕化分子和提拔新的革命的工作人员。我们正在揭露收购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并在收购运动的进程中制定纠正这些缺点的办法。农村中党的工作正在改进并日有起色，歪曲党的路线的现象正在消灭。农村中富农的影响正在削弱，贫农工作日趋活跃，农村中苏维埃的社会力量正在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基本农民群众（包括中农）中的威信正在提高。

我们显然正在摆脱粮食收购危机。

但是，除了上述成绩以外，在执行党的指示的实践中还有许多歪曲和过火行为，如果不消灭就会造成新的困难。这些歪曲和过火行为就是某些地区企图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强行摊派农业公债，建立类似巡查队的组织以及任意捕人、非法没收余粮等等。

所有这些现象必须坚决消灭。

除了进一步加强各机关的工作使粮食收购计划全部完成以外，中央并责成党和苏维埃的一切地方组织立即进行春季播种运动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扩大春季播种面积。

针对着个别富农投机分子缩小播种面积的煽动，应当在集体农庄的特别支持之下展开扩大农村贫农阶层和中农的播种面积的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有组织的运动。

根据上述情况，联共（布）中央建议：

（一）毫不放松地继续加强粮食收购运动，无论如何要完成本年度粮食收购计划。

（二）加紧和一切直接或间接提高公议价格的方式作斗争。

（三）坚决消除国家收购机关和合作社收购机关之间的竞争，切实保证收购机关在同投机倒把抬高粮价的包买主和富农进行斗争中的统一战线。

（四）继续对大批商品粮食的真正持有者——富农施加压力，在施加压力时必须完全依照苏维埃法律（例如对两千普特或更多商品粮食的持有者中的个别顽固的坏分子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和乌克兰法律中的相当条款），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用诸如此类的办法去侵犯中农。

（五）从依法没收的投机商和富农投机分子的余粮中抽出百分之二十五，用长期信贷的方式交给贫农作为种子之用，必要时可以作为消费之用。

（六）坚决取缔在加强粮食收购的运动中发生的过火行为和歪曲行为，这种行为在个别情况下已经发展为采用征收余粮的方法，如按户摊派粮食、在个别地区的交界地方设巡查队等等。

（七）在收取农民拖欠国家的款项（农业税、保险费、贷款等方面的尾欠）时，对农村富裕阶层特别是对富农应当继续施加压力，而对贫农，必要时也对力量单薄的中农，则采取减轻或优待的办法。

（八）在捐献方面，对农村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实行较农业税为高的累进率。保证农村贫苦阶层免除捐献，力量单薄的中农和红军家属则减少捐献。在各地开展捐献运动的时候，要发挥社会的自动精神，广泛吸收贫农、青年团、妇女代表和农村知识分子参加这一工作。捐献的款项应该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不得用作机关经费，用款的项目、支出预算等等必须经农民大会具体讨论和批准，款项的使用应该受广大公众的监督。

（九）坚决取缔用行政手段摊派农民公债的行为（用公债券偿付粮款，按户强行摊派公债等等），要特别注意向农民解释农民公债对他们的一切好处，并且利用农村中社会团体的影响和力量在农村富裕阶层中推销农民公债。

（十）要重视满足粮食收购区对工业品的需求。取缔已经出现的粮食和工业品直接或间接的商品交换的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在供应

奇缺的商品方面，对于那些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只要他们出售粮食，就可以用优待合作社社员的办法优待他们。

（十一）继续在收购运动的进程中检查并坚决清洗党的、苏维埃的和合作社的组织，把异己分子和混进来的分子驱逐出去，以坚定的党员和经过审查的非党工作人员代替他们。

约·斯大林

（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托）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第一次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9—15页

论红军的三个特点

（在莫斯科苏维埃纪念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的红军战士、我们的红海军战士、我们的红空军战士、我们的准备入伍的青年——苏联的武装工人致敬。

使党感到自豪的，是它依靠工人和农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红军，这支红军在极伟大的战斗中捍卫并且捍卫住了工农的自由。

使党感到自豪的，是红军光荣地走过了对我国工农的内外敌人进行极残酷的战斗的艰苦道路，是红军已经成为一支使工人阶级的敌人胆颤心惊而使一切被压迫被奴役者欢欣鼓舞的极强大的战斗的革命力量。

使党感到自豪的，是红军走过了把工人和农民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漫长道路，终于争到了庆祝自己诞生十周年纪念日的权利。

同志们，我们红军的力量何在呢？产生这种力量的泉源何在呢？

我们红军和世界上古今所有一切军队根本不同的特点何在呢？

成为我们红军力量和威力的泉源的特点何在呢？

我们红军的第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解放了的工农的军队，它是十月革命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

到现在为止，一切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军队，不管它们的成分怎样，都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军队。这种军队过去是现在还是维

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军队。各国资产者都在撒谎，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这是不正确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军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这是事实。然而这绝对不是说军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恰恰相反，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军队过去和现在都被卷入政治斗争，充当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军队在那里镇压工人，充当统治者的支柱，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和这种军队不同，我们红军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巩固工农政权的工具，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把工人和农民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我们的军队是解放劳动人民的军队。

同志们，在过去以及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都是怕军队的，在人民和军队之间有一道把军队和人民隔开的鸿沟，这一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而在我国又是怎样呢？在我国恰恰相反，人民和军队是一个整体，是一家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不像我国人民这样爱护和关怀军队。在我国，军队受到热爱、尊敬和关怀。为什么呢？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是替统治者效劳，而是替那些以前当奴隶、现在已经获得解放的工农服务的。

我们红军的力量的泉源就在这里。

人民热爱自己的军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样的军队一定会有极巩固的后方，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一支没有巩固的后方的军队算得什么呢？算不得什么。最大的军队，装备最好的军队，往往由于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来自后方、来自劳动人民的支援和同情而土崩瓦解、化为乌有。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唯一得到工农同情和支援的军队。它的力量就在这里，它的坚固性就在这里。

我们红军和世界上过去和现在所有其他一切军队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这里。

党的愿望，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红军的这个特点，使它和工农的这种兄弟般亲密的关系保持并巩固起来。

我们红军的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它是巩固我国各民族间兄弟关系的军队，是解放我国各被压迫民族的军队，是保卫我国各民族自由和独立的军队。

过去军队受到的通常是大国主义的教育，侵略主义的教育，必须征服弱小民族的教育。正因为如此，旧式的军队，资本主义的军队，同时也就是实行民族压迫、实行殖民地压迫的军队。这也就是旧军队的一个基本弱点。我们的军队是和实行殖民地压迫的军队根本不同的。我们军队的全部实质，我们军队的全部制度，是建筑在巩固我国各民族间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是建筑在解放各被压迫民族，保卫苏联各加盟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由和独立的思想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我们红军的力量和威力的第二个主要泉源。这就是我们军队在紧急关头能获得我们广大国土上各民族千百万群众最大的支援的保证。

党的愿望，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红军的这个特点也保持并巩固起来。

最后，谈谈红军的第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我们军队中培养和巩固的是国际主义精神，充满了我们红军全军的是国际主义精神。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通常是以仇视别国人民、仇视其他国家、仇视别国工农的精神教育军队的。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把军队变成驯服的兽群，供国家间、列强间发生军事冲突时驱使。一切资本主义军队力量薄弱的根源就在这里。

我们的军队却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红军的力量在于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受着国际主义的教育，受着尊重别国人民的教育，

受着热爱和尊敬世界各国工人的教育，受着保卫并巩固各国间的和平的教育。正因为我们的军队受的是国际主义的教育，是世界各国工人利益一致的教育，所以我们的军队是世界各国工人的军队。

如果各国资产者胆敢侵犯我国，那末他们就会认识到上述这一点就是我国军队力量和威力的泉源，因为那时他们就会看见，我们的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出来的红军在世界上各个地方，从上海到纽约，从伦敦到加尔各答，到处都有无数的朋友和同盟者。

同志们，这就是贯串在我们军队的全部精神中并成为我们军队力量和威力的泉源的第三个基本特点。

党的愿望，党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军队的这个特点也保持并巩固起来。

我们军队所以强大有力，就是由于它具备这三个特点。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因为我们的军队不是由锡制的兵组成的，而是由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和为了什么而战的觉悟分子组成的。

同志们，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红军有一切理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我们的红军万岁！

红军战士万岁！

红军指挥员万岁！

产生了红军、使它获得了胜利并得到了光荣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热烈鼓掌多时）

载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五十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1 卷第 17—20 页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

（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①]）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

同志们！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具有一个和最近两年来举行的各次全会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这次全会纯粹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是没有党内争吵的会议，是没有党内紧张局面的会议。

排在议程上的都是最迫切的问题：粮食收购问题，沙赫特事件问题，以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工作计划问题。你们可以看出，这些问题都是相当重要的。虽然如此，全会上的讨论还是完全实事求是的，而决议也是一致通过的。

这是因为全会上已经没有反对派了。这是因为人们都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问题，不耍派别手腕，不进行派别煽动。这是因为只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只是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党才有可能认真地和切实地处理实际问题。

这就是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发展阶段的好的方面，也可以说，无比有利的方面。

一　关于自我批评

① 在这篇报告中补入了当时报刊上没有发表的几段文字。——编者注

全会工作的特点，全会讨论和全会决议的特点是：全会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极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不仅如此，在全会的每一个问题上，在每一次发言中，都对我们工作的缺点进行了批评，我们的组织都进行了自我批评。对我们缺点的批评，党、苏维埃和经济组织的真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这就是全会工作的总的精神。

我知道，党的队伍里有一些人一般地不喜欢批评，尤其不喜欢自我批评。这些人，我想可以把他们叫做“涂了漆的”共产党员，（笑声）他们逃避自我批评，经常发牢骚说：又是这该死的自我批评，又是揭发我们的缺点，——能不能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呢？显然，这些“涂了漆的”共产党员和我们党的精神，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既然人们有这种情绪，既然人们远不是热情地对待自我批评，那末请问：我们需不需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从何而来？它有什么好处？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的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是很多的。这一点必须公开老实地承认。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认为是一个新口号。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基础。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末，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除了我们以外，再不会有人来揭露和纠正这些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志们，自我批评应当成为推动我们向前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力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自我批评口号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特别有力地贯彻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党

内形成了一种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新情况。

这种新情况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我们这里再也没有或者几乎再也没有反对派了。表现在我们党内由于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个胜利本身对党非常有利）而可能产生一种高枕无忧、安然自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熟视无睹的危险。

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这对我们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个胜利本身包含着特别不利的方面，那就是党内可能滋长自满自足、自以为是和高枕无忧的情绪。而高枕无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已经停止前进。为了不使这种情形发生，我们就需要自我批评，但不是反对派所进行的那种恶意的、实质上是反革命的批评，而是真诚的公开的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估计到这种情况，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从那时起，自我批评的浪潮就日益高涨，它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上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如果怕我们的敌人，国内和国外的敌人利用我们对缺点的批评来叫嚣：嘿，他们布尔什维克那里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呵，——那就奇怪了。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怕这一点，那就奇怪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正是在于它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让党，让布尔什维克，让我国一切诚实的工人和劳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我们建设中的缺点；让他们指出消灭我们这些缺点的途径，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建设不会有保守、停滞和腐败的现象，使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日益改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一点。至于我们的敌人，那就让他们去乱谈我们的缺点吧，——这种无聊的事情是不会也不应当使布尔什维克不安的。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推动我们去进行自我批评。我指的是群众和领袖的问题。最近我们这里领袖和群众之间开始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这里出现了、从历史上形成了一批威信越来越高的

领导者，他们几乎成了群众所无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们开始眯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领袖，并且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

当然，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并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领导者，这个事实本身是我们党的巨大的成就。显然，没有这样一批有威信的领导者，要领导一个大国是不可设想的。但是，领袖上升的时候逐渐离开群众，而群众开始从下面向上望他们，不敢批评他们，这个事实就不会不产生领袖脱离群众、群众离开领袖的某种危险。

这种危险会使领袖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十全十美。而领导上层骄傲自大，开始从上面向下看群众，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显然，除了党遭到毁灭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可是，我们要的是向前迈进，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毁灭党。正是为了前进并改善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时时刻刻敞开自我批评的大门，应当使苏维埃人有可能“责骂”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使领袖不会骄傲自大，而群众也不会离开领袖。

有时人们把群众和领袖的问题同提拔的问题混为一谈。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虽然提拔新的领袖一事值得党的严重注意，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保存已经提拔起来而且极有威信的领袖，并在他们和群众之间建立经常的牢不可破的联系。问题在于要通过对我们缺点的自我批评和批评来组织党内的广泛的舆论，来组织工人阶级的广泛的舆论，使之成为生动锐敏的精神上的监督力量；极有威信的领袖如果要保持党和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信任，就应当倾听这种力量的呼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报刊的作用，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作用，的确是不可估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不欢迎“真理报”创办“工农检查院专页”来经常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过，批评必须力求严肃深刻，不应该限于表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应当欢迎“青年团真理报”发起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展开猛烈而热情的攻击。

有时人们骂批评者，说他们的批评不全面，说批评有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人们往往要求批评的每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批评不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对批评就加以指摘和谩骂。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你们只要提出这种要求，就会把成千上万愿意纠正我们的缺点但是有时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嘴巴堵住。这是坟墓，不是自我批评。

你们应当知道，工人有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点怕说实话。他们害怕，不只是因为怕说了会“挨揍”，而且也是因为怕批评得不全面会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并考虑到它的好的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

正是为了发扬自我批评而不是扼杀自我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仔细听取苏维埃人的一切批评，即使批评有时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确。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确信：他们不会因批评不全面而“挨揍”，也不会因批评有某些错误而遭到“嘲笑”。只有这样，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具有群众性，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响应。

不言而喻，这里指的不是“任何”批评。反革命分子的批评也是批评。但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摧残我们的工业，瓦解我们党的工作。显然，我们指的不是这样的批评。我说的不是这样的批评，而是那种来自苏维埃人的批评，是为了改善苏维埃政

权机关、改进我们的工业、改进我们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而进行的批评。我们需要批评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而不是为了削弱它。正是为了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正是为了这一点，党才宣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

我们期待于自我批评口号的首先是什么呢？如果自我批评口号得到正确的和诚实的执行，那末它会给我们产生什么结果呢？它至少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加强他们对我们缺点的注意，使这些缺点容易纠正，使我们的建设工作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第二、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培养他们的国家主人翁感，使他们容易学会管理国家。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不仅沙赫特事件，而且一九二七年底的收购危机，对我们很多人都是“意外”呢？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沙赫特事件。一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按照国际资本反苏维埃组织的指示活动了五年。五年来我们的组织草拟并分发了各种各样的决议和决定。当然，我们的煤矿工业总还是上升的，因为苏维埃经济制度富有生命力，非常强大，尽管我们不用脑子而且有了错误，尽管专家们进行破坏活动，它还是占了上风。五年来，这批反革命专家在我们工业中进行暗害活动，炸毁锅炉，毁坏涡轮等等。而我们却若无其事地坐着。“突然”，好似晴天霹雳，——沙赫特事件发生了。

同志们，这是正常的吗？我认为极不正常。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

一种情况是：一二十个领导同志注意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工人群众却不愿意或不能够注意和发现缺点。这里一定会忽略一些缺点，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发现。另一种情况是：千百万工人和一二十个领导同志一起来注意和发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揭露我们的错误，

投入共同的建设事业，并指出改进工作的途径。这里就更能保证不会发生意外，保证及时发现不良现象并及时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现象。

我们必须使工人阶级的警惕性不断提高，而不要使它丧失；我们必须使千百万工人都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我们不仅必须使十来个领导者，而且必须使千百万工人和农民都来注意我国建设的进程，指出我们的错误，揭露我们的错误。只有这样，我们这里才不会发生“意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缺点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我们必须使批评成为群众性的批评，我们必须领会并贯彻自我批评的口号。

最后，谈一谈和实现自我批评口号有关的问题，就是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以及培养他们管理国家的技能的问题。列宁说过：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 **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

不发挥工人的力量和才能，不发挥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力量和才能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缺点并推进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培养工人阶级的这种技能和本领呢？显然不能。

为了发挥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力量和才能，并使他们能够获得管理国家的技能，需要做些什么呢？这首先需要诚实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自我批评，诚实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工人利用机会来公开和直接地批评工作中的缺点，来改进并推动我们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工人积极参与了领导国家、领导经济和领导工业的事业。而这就不会不提高工人的国家主人翁感，不会不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警惕性和文

化水平。

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统治阶级中，工人阶级这一统治阶级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是有点特殊和不十分有利的。所有以前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同时又是富有阶级。他们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工人阶级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在于它是贫穷阶级，它过去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学到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只有现在，在取得政权以后，才得到了这种可能。

我国文化革命问题的迫切性也就在于此。固然，苏联工人阶级在其统治的十年内，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比地主和资本家在几百年内所获得的要大得多。但是，从国际和国内情况来看，我们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因此，凡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文化力量的发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能够促进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的手段，我们都应当尽量利用。

根据上面所说的应当得出结论说：自我批评口号是用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力量并培养工人阶级管理技能的极重要手段之一。由此又得到一个根据，证明实现自我批评口号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使我们把自我批评口号作为当前口号的根据大体上就是如此。

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在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是毫不奇怪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粮食收购问题吧。

二　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首先，我来略为谈谈去年年底在我国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实质。实际情况是这样：从去年十月起，我们的收购量开始下降，十二月降到最低点，到去年年底，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有了一亿三千万普特的

缺额。我们本年度的收成大概不比上年度坏，也可能比上年度差一点。本年度的存粮比上年度多，一般认为本年度我国的商品粮食不比上年度少而比上年度多。

根据这种情况，本年度的收购计划订得比上年度稍微高了些。尽管如此，收购量却下降了，到一九二七年底，我们缺粮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国内粮食很多，而粮食收购量却在下降，使城市和红军受到饥饿的威胁。

这种“奇特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呢？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偶然性呢？有许多人喜欢这样解释，说我们打瞌睡了，说我们忙于对付反对派，因而忽略了一些事情。说我们真的打瞌睡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这里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大错特错了。更不能把收购危机说成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不会是偶然的。这种解释未免太不值钱了。

那末，造成收购危机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里至少有三个条件。

第一、在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首先，我指的是发展城市工业的困难。本来应当拿各种各样的商品大量供应农村，以便从农村取得最大数量的农产品。为此就必须比现在更迅速地发展我国工业。但是要加紧发展工业，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可是，同志们，要达到这样的积累速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由此就产生了农村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

其次，我指的是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同志们，农业增长得很慢。本来农业应当一日千里地发展，粮价应当逐渐下降，收成应当不断提高，肥料应当尽量使用，粮食生产的机械化应当迅速发展。但是，同志们，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而且最近也不会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农业是小农经济，很难接受重大的改进。统计数字说明，战前我们全国约有一千六百万个体农户，现在我们约有二千五百

万个体农户。这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小农经济国家。小农经济是什么呢？这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出产商品最少的经济。同志们，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肥料、机器、农学知识以及其他改进办法，这都是些在大农场中可以有效地采用，而在小农经济中没有采用或者几乎没有采用的东西。这就是小农经济的弱点。这也就是它竞争不过富农的大农场的原因。

一般说来，我们农村中是不是有采用机器、肥料、农学知识等等的大农场呢？是的，是有的。第一、这就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是，同志们，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第二、这就是富农的大农场（资本主义农场）。这种农场在我国并不算少，它们在农业中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在农村中能不能走鼓励私人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呢？显然不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要加紧在农村中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一类的大农场，努力把它们变成国家的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粮食工厂。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才提出全力展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口号。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只能由贫农阶层组成，那就错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集体农庄应当是贫农和中农的农庄，它不仅应当包括个别集团或小集团，而且应当包括整个村子。应当给中农指出前途，告诉他们：通过集体农庄，他们能够最顺利最迅速地发展经济。既然中农不能上升，不能上升为富农，而下降为贫农又是不合理的，那就应当给他们指出前途：他们可以通过集体农庄建设来改善经济。

但是，目前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很少，少得不像话。由此就产生了我们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困难。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粮食生产不足的现象。

第二、由此可见，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建设中的困难就是收购危机

得以爆发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说，收购危机正应当在本年度爆发。大家知道，这些困难不仅本年度有，上年度也是有的。可是，为什么正是在本年度爆发了收购危机呢？秘密何在呢？

秘密在于富农在这一年已经有可能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粮价，进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我们的收购工作。而他们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困难，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三年的丰收起了作用，富农在这个时期内成长起来了，整个农村，特别是富农，在这个时期内都积下了粮食，因此，富农就有试图操纵粮价的可能了；

第二、富农得到城市投机分子的支持，这些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抬高粮价，使物价高涨。

当然，这还不是说，富农是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持有大部分粮食的主要和基本的群众是中农。但是富农在农村中有一定的经济权威，所以在粮价问题上有时能使中农跟着他们走。因此，农村富农分子就有可能利用我们建设中的困难来进行投机，抬高粮价。

如果像富农和投机分子所做的那样，把粮价抬高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那末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假定说，那时我们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得不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从而既使工人阶级也使贫农和中农在物质生活方面受到打击。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无疑是意味着直接破坏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假定说，我们在今年一月或今年春季即准备播种之前把粮价提高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那时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遭到破坏。棉农就会不种棉花而改种粮食，因为种粮食更有利。麻农就会不种亚麻，也改种粮食。种甜菜的农民也会这样做。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我们的工业原料基地就会由于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投机野心而遭到破坏。

但是还不仅如此。假如我们在今年春季提高了粮价，那末我们一定会害了贫农，因为贫农在春天既需要买口粮也需要买种子。贫农和下中农也就有充分权利对我们说：你们欺骗了我们，因为去年秋天我们按低价把粮食卖给你们，可是你们现在却要我们按高价来买粮食，——苏维埃人先生们，你们到底保护谁？保护穷人还是保护富农？

正因为如此，党对富农抬高粮价这一投机进攻必须予以回击，以便打破富农和投机分子拿饥饿来威胁工人阶级和我们红军的妄想。

第三、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另一种情况帮助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他们就不可能把我们建设中的困难利用到他们在事实上所利用到的这种程度，而收购危机也不会这样严重。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收购机关松懈涣散，彼此之间没有统一战线，相互竞争，不愿意对抬高粮价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再就是我们粮食收购区的党组织消极懈怠，不愿意以应有的态度来过问粮食收购运动，不愿意干预这件事情以消除收购战线上普遍的松懈现象。

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陶醉于上年度收购运动的成就，认为本年度收购工作可以听其自流，让一切都听从“上帝的意志”，这样就为富农和投机分子扫清了活动场所。而富农所期待的也正是这个。几乎用不着怀疑，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收购危机是不会这样严重的。

不应当忘记，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收购机关和其他组织在供应农村工业品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八十，在农村中的收购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不用说，这种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在农村中控制住富农，只要我们的组织善于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可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一切都听其自流，这样就便利了（当然是无意的）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同志们，造成去年年底收购危机的条件就是如此。

这样，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你们可以看出，收购危机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即粮食收购问题上，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同志们，这就是粮食收购危机的阶级背景。

你们知道，为了消除收购危机和制止富农的投机野心，党和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实际措施。关于这些措施，我们的报刊上已经讲得很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议中也讲得相当详细。因此，我想不必在这里重复了。

我只想谈一谈由于非常情况而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当然，只要这种非常情况不再存在，这些措施也就会取消。我指的是使用对付投机活动的第一百零七条法律。这条法律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二六年通过的。这条法律我们在上年度没有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正如大家所说的，粮食收购工作的进行是正常的，所以没有理由使用这一条。只是在本年度，一九二八年初，才想起了这一条。所以想起了这一条，是因为富农的投机诡计在我们这里造成了一些非常情况，使我们受到饥饿的威胁。显然，假如下一个收购年度不再发生非常情况，收购工作进行得很正常，那末第一百零七条也就不会使用了。相反地，假如发生非常情况，资本主义分子又“掉起花枪”来，那末第一百零七条就会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如果根据这一点便以为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恢复”余粮收集制等等，那就愚蠢了。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要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但是，有些人以为新经济政策不是意味着加强对包括富农在内的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以战胜他们，而是意味着停止同富农及其他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用说，这种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人的位置。

党和苏维埃政权为了消除粮食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所产生的结

果，你们也都是知道的。简单说来，有下面几点：

第一、我们弥补了亏空，收购了粮食，赶上了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上年度的收购速度。大家知道，在一月到三月这三个月期间，我们已经收购了二亿七千多万普特粮食。当然，我们所需要的不止这一些。我们还需要收购一亿多普特。但这毕竟是一种必要的成绩，它使我们有可能**消除**收购危机。现在我们有充分权利说，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这条战线上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就。

第二、我们整顿了，多多少少整顿了我们各地的收购机关和党组织，在实践中考查了它们的战斗准备，清除了它们中间那些不承认农村中有阶级并且不愿意同富农“吵嘴”的显然已经腐化的分子。

第三、我们改进了农村工作，孤立了富农，稍微得罪了富裕的中农上层，使贫农更加靠近我们，使绝大多数中农跟着我们走。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列宁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口号：依靠贫农，善于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

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大乐意接受这个口号。如果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的情况下的工农联盟就是工人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那就奇怪了。同志们，不是的，我们不鼓吹也不能鼓吹这样的联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工人阶级政权已经巩固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因为，同志们，世界上是没有这种政策的。（笑声，鼓掌。）我们的政策是阶级政策。

我们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所产生的结果大体上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过火行为和歪曲党的路线的事实。大家都知道，在许多场合由于我

们不用脑子，歪曲了我们的政策，首先打击了贫农和中农，不正确地运用了第一百零七条等等。我们现在严惩并且将来还要严惩犯了这些歪曲行为的人。但是，如果因为有这种歪曲行为就看不到党采取的措施（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就不能摆脱收购危机）所获得的良好的和真正重大的结果，那就奇怪了。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主要的东西，而把个别的和偶然的东西提到首位。这样做就是把收购运动最大的成绩淹没在歪曲我们路线的个别现象的一勺水里，其实这些现象完全不是从党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中产生的。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情况使我们的收购运动容易获得成功，并使我们容易对付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呢？

是的，是有的。这样的情况至少可以指出两种：

第一、在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在党消灭了党内敌人而达到了最高度的统一之后，我们党干预了收购运动，并打击了富农和投机分子。不能认为对富农进行斗争是轻而易举的事。要粉碎富农和投机分子的诡计而又不致在国内引起任何混乱，就必须有绝对团结的党、绝对巩固的后方和十分巩固的政权。几乎用不着怀疑，这些条件的存在是在迫使富农立刻退却这一点上起了重大作用的。

第二、我们已经能够把压制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实际措施同工人阶级、红军和农村无产阶层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富农和投机分子使城乡劳动群众遭受饥饿的威胁，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第一百零七条），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在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得到农村大多数人的拥护。富农伤天害理地进行粮食投机，给城乡造成极大的困难，同时违反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也就是违反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志，——这种情况一定会便于我们孤立富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发生了一九二一年发生过的那种情形

（当然是有一定的附带条件的）。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党鉴于国内发生饥荒，就提出了没收教会贵重物品来购买粮食救济灾区的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极广泛的反宗教运动，当时神甫们抓住贵重物品不放，实际上就是反对挨饿的群众，因而激起了群众对整个教会，也对宗教偏见，尤其对神甫及其领导者的愤懑。那时在我们党内有一些怪人，他们以为列宁只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懂得同教会作斗争的必要性，（笑声）在这以前，好像他并不懂得这一点。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以前当然也懂得同教会作斗争的必要性。但是问题完全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把广大群众性的反宗教运动和争取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且要做到使这个运动为群众所了解，为群众所支持。

关于今年年初党因粮食收购运动而采取的措施也必须这样说。有些人以为党只是到现在才懂得同富农危险作斗争的必要性。同志们，这当然是荒谬的。党向来就懂得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并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进行了这个斗争。今年年初党所采取的措施的特点是：党在今年已经有可能把反对农村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坚决斗争同争取广大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因为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党就做到了使农村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跟着自己走而使富农陷于孤立。

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决不在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群众支持领导上这些或那些措施的决心如何，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艺术在于善于选择时间和地点并估计各种情况，以便把火力集中到那个最可能获得最大战果的战线上。

三年以前，我们还没有得到中农的拥护，中农满怀仇恨并攻击我们的乡执行委员会主席，贫农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感到惊异，我们的播种面积只有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五，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农村中扩大粮食和原料的生产，我们还没有为工业建立可靠的粮食和原

料基地。假如我们那时给富农极严重的打击，事实上我们现在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我不怀疑，这样做我们就会失败，就不能把播种面积扩大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就会破坏为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的可能性，就会使富农容易壮大，就会使中农脱离我们，也许现在国内就会发生极严重的政治混乱。

今年年初我们农村中的情况怎样呢？播种面积扩大到了战前规模，为工业建立了巩固的原料和粮食基地，大多数中农拥护苏维埃政权，贫农多少是组织起来了，农村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已经改善并巩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对富农和投机分子的打击才能指望得到巨大的成就，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害神经病的人才不能了解在组织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方面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全部差别，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不考虑时间和地点，不考虑斗争力量的对比，不加选择地在各个战线上用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是多么愚蠢。

同志们，关于粮食收购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谈沙赫特事件吧。

三　沙赫特事件

沙赫特事件的阶级背景怎样？沙赫特事件的根源何在？这个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在怎样的阶级基础上发生的？

有些同志认为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他们一般都说：我们在这里打瞌睡打得太厉害了，疏忽大意了；如果我们不打瞌睡，那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任何沙赫特事件的。这里有人在打瞌睡而且打得很厉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拿打瞌睡来解释一切，那就是不了解问题的实

质。

事实说明了什么呢？沙赫特事件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

事实说明：沙赫特事件是一部分以前掌管煤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策动的经济反革命事件。

其次，事实说明：这些结成秘密集团的专家，是从现在流亡国外的旧主人那里和从西方资本主义反苏反革命组织那里取得经费来进行暗害活动的。

最后，事实说明：这个资产阶级专家集团是遵照西方资本主义组织的指示进行活动，破坏我国工业的。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反苏组织对我国工业的经济干涉。有一个时期发生了军事政治干涉，这种干涉被我们用胜利的国内战争粉碎了。现在我们遇到的是经济干涉的尝试；要粉碎它，我们并不需要进行国内战争，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粉碎它，而且我们正在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来粉碎它。

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从前国际资本想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企图没有实现。现在国际资本竭力设法而且今后还会竭力设法用隐蔽的、不总是可以察觉的、但是相当强大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国的经济实力；它组织暗害活动，在这些或那些工业部门中制造种种“危机”，从而使将来的军事干涉更有可能实现。这里的一切都和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连，根本谈不到什么偶然性。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

进；

或者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若干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执行解放的对外政策，同时又能博得欧美资本家对我们的这种行为的赞扬。我不想来证明，这些天真的人和我们党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比如说，英国要求我们和它在某些地方，如波斯、阿富汗或土耳其划分侵略性的势力范围，同时它保证，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它就同意和我们建立“友谊”。怎么样，同志们，我们也许要做这种让步吧？

全场高喊：不！

斯大林：美国要求我们根本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末一切都好办。怎么样，同志们，我们也许要做这种让步吧？

全场高喊：不！

斯大林：如果我们同意和日本瓜分满洲，我们就可以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能做这种让步吗？

全场高喊：不！

斯大林：或者，比如说，有人要求我们“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并且同意偿付战时和战前的一切债务。同志们，我们也许要同意这样做吧？

全场高喊：不！

斯大林：正因为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所以我们必须估计到国际资本今后将继续给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祸害，不管这是沙赫特事件还是其他类似的什么事件，反正都是一样。

这就是沙赫特事件的阶级根源。

为什么当时国际资本能够对我国进行军事干涉呢？因为在我们国内有整批整批的军事专家，将军和军官，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他们时刻准备着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政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军官和将军能不能发动严重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呢？当然不能。如果没有这批白卫军官和将军的帮助，国际资本能不能发动严重的干涉呢？我认为不能。

当时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军事干涉是偶然的，如果我们不把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等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那就不会发生干涉了。这当然是不对的。马蒙托夫、克拉斯诺夫等白卫将军的释放，在国内战争的发展上起过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军事干涉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于苏维埃政权和国际资本及其俄国走狗将军们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某些资产阶级专家，从前的矿主，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不是指望国际资本会来帮助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制造沙赫特事件呢？当然不能。如果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我国一批把苏维埃政权恨入骨髓的资产阶级专家，国际资本能不能对我国发动像沙赫特事件这样的经济干涉呢？显然不能。一般说来，我国有没有这样一些决心进行经济干涉、破坏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专家呢？我认为是有的。我认为这些人不会很多。但是，我国有数目不大的比军事干涉时期少得多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对苏联进行经济干涉的基础。

这就是沙赫特事件的阶级背景。

现在来谈一谈从沙赫特事件得出的实际结论。

我想谈谈沙赫特事件提供给我们的四个实际结论。

列宁说过，挑选人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沙赫特事件表明，我们的经济干部挑选得不好，不但挑选得不好，而且使这些

干部处于难以发展的条件下。人们提到第三十三号命令，特别是随这个命令颁布的“标准条例”。这个标准条例的特点就是：它几乎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技术厂长，正厂长的权限只是调解纠纷、“代表”本厂、弹弹三弦琴而已。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经济干部是不能充分发展的。

这个命令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那时我们根本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干部，我们还不会管理工业，因而不得不把主要的权力交给技术厂长。但是现在这个命令已经变成了桎梏。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有经验的、能够发展成为我国工业真正领导者的经济干部。正因为如此，现在已经到了废除过时的标准条例而代之以新条例的时候了。

有人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工人共产党员，不可能掌握化学公式和一般技术知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劳动人民和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鼓掌）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攻下了更难攻的堡垒。全部问题在于：要有掌握技术知识的愿望，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布尔什维克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武装自己。可是为了改变我们经济干部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的、有充分权力的管理者，就必须废除旧的标准条例，拿新的来代替它。否则，我们就会有毁坏我们的人材的危险。

难道我们那些堕落的经济工作人员本来就比我们中间任何人都要坏吗？为什么这一类的同志堕落腐化起来，在生活上和资产阶级专家打成一片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经济方面的实际工作中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们挑选经济工作人员的条件以及他们的工作条件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把他们变成资产阶级专家的尾巴。同志们，必须消灭这种现象。

沙赫特事件提供给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里没有把干部训练好，没有把我们的红色专家培养好。这个结论是一定要得出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许多年轻专家不适合于工作，对工业没有用处呢？因为他们学的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是书本上的

专家，没有实际经验，和生产脱节，他们自然会遭到失败。难道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专家吗？不，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专家，即使他们是非常年轻的专家我们也不需要。我们需要的专家，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必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经验上、在和生产的联系上都是很强的。

那些没有见过矿井也不愿意下矿井的年轻专家，那些没有见过工厂也不愿意在工厂里弄脏自己的年轻专家，是永远不能战胜旧的、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但是仇视我们事业的专家的。因此，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不仅旧的专家，不仅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就连工人也往往很不欢迎这种年轻专家。但是为了不再使年轻专家遭到这种意外，必须改变对他们的教育，并且必须这样改变：使年轻专家从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最初几年起就和生产、工厂、矿井等有密切的联系。

第三个结论是关于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管理工业的问题。从沙赫特事件的材料来看，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很坏。坏得不像话，同志们。事实证明：劳动法规遭到破坏，地下六小时工作制并不经常遵守，劳动保护条例遭到践踏。但是工人忍受着，工会默不作声，党组织也不设法消灭这种不像话的现象。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到过顿巴斯，他下到矿井里去，向矿工了解他们的工作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矿工认为对工作条件有发牢骚的必要。这位同志问他们：“同志们，你们的生活怎样？”矿工们回答他说：“同志，没有什么，生活不错。”这位同志说：“我要到莫斯科去，你们有什么话要我转达中央？”矿工们回答他说：“你到那里就说我们的生活不错。”这位同志对矿工们说：“同志们，听我说，我又不是外国人，我是俄国人，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向你们了解真实情况。”矿工们回答他说：“同志，我们对谁都一样，不管对外国人或者对自己人我们都只说实话。”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矿工的面貌。这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英雄。

我们已经积累在工人心中的精神资本的宝藏也正是在这里。这是十月革命的极伟大的遗产，而我们竟像败家子那样无耻地、罪恶地糟蹋这种无价之宝的精神资本，真是痛心！同志们，长久地依靠原有的精神资本，任意糟蹋这种资本是不行的。已经到了消灭这种现象的时候了。早已是时候了！

最后，第四个结论是关于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沙赫特事件表明：一切管理部门，不管是党的、工业的或工会的，在检查执行情况方面都糟透了。只是写决议，发指示，但是谁也不想问问自己：这些决议和指示执行得怎样了？是确实执行了还是束之高阁了？

伊里奇说过，管理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搞得糟透了。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我们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检查执行情况正是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践的烈火中，不仅检查我们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是否正确。因此，这方面有缺陷，也就是我们的整个领导有缺陷。

就拿纯粹党方面的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来说吧。我们通常都是叫州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的书记到中央来报告工作，以便检查中央指示的执行情况。书记们做了报告，也承认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中央就指摘他们，通过老一套的决议，指示说，要深入工作，要展开工作，要强调这点那点，要着重注意这点那点等等。书记们带着这种决议回到各地。以后又叫他们来，同样又是深入、展开等等一套。我不是说，所有这一套没有一点好处。不，同志们，从教育和督促各级组织的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有它好的一面。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检查执行情况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应当承认，这种方法必须拿另一种方法来补充，

那就是把我们党和苏维埃上层人员派去做地方工作。（喊声：“这是好事情！”）我说的是派我们的领导同志暂时到地方上去工作，不是去做指挥员而是去做听从地方组织指挥的普通工作人员。我认为这个办法很有前途，如果老老实实地诚心诚意地加以执行，它可以改进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

如果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正副人民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各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经常到地方上去，在那里进行工作，以便了解工作情况，研究一切困难、一切缺点和优点，那末你们可以确信，这将是对执行情况的最切实有效的检查。这将是丰富我们可敬的领导者的经验的最好方法。如果这个方法成了一种制度（而这是必须成为制度的），那末你们可以确信，我们这里拟定的法律，我们制定的指示，就会比目前的要切合实际和正确得多了。

同志们，关于沙赫特事件的问题就是如此。

四　总　　结

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同志们，这一点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

我们有过收购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已经消除了。收购危机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我们又有沙赫特事件，但是这种事件已在处理而且无疑一定会处理好。沙赫特事件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严重进攻。这是对我国内政的经济干涉。

不用说，无论从内部来的或外部来的诸如此类的进攻，是可能重演而且大概会重演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有最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

同志们，如果我们警惕起来，我们将来也一定会打败我们的敌人，正像我们现在和过去打败了他们一样。

（热烈鼓掌多时）

载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八日
“真理报”第九十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1卷第22—46页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同志们！通常在代表大会上总是谈成绩。毫无疑问，我们是有成绩的。当然，这些成绩并不小，而且也用不着把它们隐瞒起来。但是，同志们，我们这里最近谈成绩谈得这样多，有时谈得这样腻，以致使人再也不想重复了。因此，请允许我打破惯例，不向你们谈成绩，而略为谈谈我们的缺点以及因为这些缺点而产生的我们的任务。

同志们，我指的是有关我们国内建设问题的任务。

这些任务涉及三个问题：我们政治工作路线的问题，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以及培养我们新的经济建设干部的问题。

一　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目前的特点是：我们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进行建设已经五年了。我所说的和平发展的条件不仅是指我们没有和国外敌人作战，而且也是指国内没有内战的因素。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国建设的和平发展的条件。

你们知道，我们和全世界的资本家打了三年仗，就是为了赢得这些和平发展的条件。你们知道，我们已经赢得这些条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极大的成就。但是，同志们，任何胜利，其中也包括这个胜利，还有它不利的一面。和平建设的条件对我们不是没有影响的。这些条

件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工作人员身上和他们的心理上，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在这五年内，我们就像沿着轨道一样平稳地前进着。因此，我们许多工作人员就产生了一种情绪，认为一切都会一帆风顺，我们就好像坐在特别快车上，不用换车，沿着轨道一直向社会主义前进。

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自流”论，“碰运气”论，自然而然“一切都会搞好”的理论，我们这里没有阶级，我们的敌人已经安静、我们这里一切都会如意的理论。由此就产生了某种懈怠、沉睡的倾向。这种沉睡的心理，这种任工作“自流”的心理，也就构成和平发展时期不利的一面。

这种情绪的危险性何在呢？就在于这种情绪会蒙蔽工人阶级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自己的敌人，用夸大敌人的弱点的话来麻痹工人阶级，破坏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

决不能安慰自己说，我们的党有一百万党员，青年团有二百万团员，工会有一千万会员，因此就完全可以保证彻底战胜敌人。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历史证明：最大的军队，由于骄傲自大，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过分轻视敌人的力量，由于沉睡，失去了战斗准备，在紧急关头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结果遭到了灭亡。

就是最大的政党，如果它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如果它不时时刻刻加强本阶级的战斗准备，也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灭亡。同志们，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是最危险的事情。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就是成了“意外”的牺牲品，成了在敌人面前张皇失措的牺牲品。而张皇失措的结果就是瓦解、失败和灭亡。

我可以给你们举出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军队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当时小部队往往把大兵团打得落花流水，因为这些兵团没有充分的战斗准备。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一九二〇年，不下五千人的三个骑兵师被一个步兵营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这仅仅是因为骑兵师陷于突然

受敌的境地，在敌人面前张皇失措，它们不了解敌人，其实敌人的数量非常少，如果这几个师没有处于沉睡的状态，后来也没有陷于张皇失措、束手无策的境地，那末一下子就能把敌人打垮。

关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青年团，我们的工会以及我们的一般力量也必须这样说。以为我们已经没有阶级敌人了，他们已被打垮和肃清了，这是不对的。不，同志们，我们的阶级敌人还存在。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增长，企图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

本年度冬季我们收购方面的困难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

沙赫特事件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事件是国际资本和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表现。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的许许多多事实也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事实你们都知道，所以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

决不能绝口不提工人阶级的这些敌人。轻视工人阶级的阶级敌人的力量就是犯罪。特别是现在，在我国和平发展时期，当破坏工人阶级战斗准备的沉睡论和“自流”论有某种有利地盘的时候，就更不能绝口不提这一切了。

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的重大教育意义就是：它们惊醒了我们所有的组织，打破了“自流”论，再一次有力地指出了阶级敌人的存在，这些敌人存在着，他们并没有打瞌睡，所以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警惕性、革命性和战斗准备去反对这些敌人。

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党的日常工作的政治路线就是：**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去反对它的阶级敌人**。

不能不指出，青年团的这次代表大会，特别是“青年团真理报”，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这一任务了。你们知道，在发言人的讲话中以及在“青年团真理报”的文章里，都指出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同志们，这很好。不过还必须使大家不要把这一任务看做临时的、瞬

息即逝的任务，因为在我们国内还有阶级、我们还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时候，加强无产阶级战斗准备这样一个任务就应该贯串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

二 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任务，关于对我们的缺点组织群众性的批评的任务，关于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监督的任务。

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生活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青年团组织、工会组织或经济组织。人们说到官僚主义分子的时候，通常是指那些非党的旧官吏，这些人在我们的讽刺画中通常被画成是戴眼镜的。（笑声）同志们，这是不完全对的。如果问题只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那末反官僚主义斗争就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糟糕的是问题并不在旧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同志们，问题是在新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问题是在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最后，问题是在共产党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身上。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

就拿我们党组织来说吧。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斯摩棱斯克事件、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等等。试问，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怎样来消除这种祸害呢？我认为要消除这种祸害，除了组织党员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外，除了发扬党内民主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办法。激起党员群众对这些腐化分子的愤恨并且让他们有可能把这些分子撵出去，这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或者拿青年团来说。你们当然不会否认，在青年团的某些组织里有些彻头彻尾的腐化分子，向这些分子展开无情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暂且不谈腐化分子。我们就拿最近的事实来说，青年团内存在着以个人为对象的无原则的小集团斗争，弄得团内乌烟瘴气。为什么在青年团里“柯萨列夫之流”和“索波列夫之流”要多少就有多少，而要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打着灯笼去找呢？（鼓掌）这个事实不是说明青年团上层机构的某些环节正处在官僚主义的僵化过程中，又是说明什么呢？

而工会呢？谁会否认在工会里有的是官僚主义呢？在企业中我们有生产会议，在工会中我们有临时监察委员会。这些组织的任务是：唤起群众，揭发我们的缺点，指出改进我们建设的途径。为什么这些组织在我们这里没有发挥作用呢？为什么这些组织不是生气勃勃的呢？工会里的官僚主义加上党组织里的官僚主义使工人阶级的这些极重要的组织不能发挥作用，这不是很明显吗？

最后，谈谈我们的经济组织。谁会否认我们的经济机关有官僚主义的毛病呢？就拿沙赫特事件来说吧。难道沙赫特事件不是表明了我们的经济机关不是在迈步前进，而是在蹒跚爬行吗？

怎样才能肃清所有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呢？

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组织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来批评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批评它们的缺点和错误。

我知道，激起劳动群众的愤怒来反对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病态，有时会触犯我们某些过去有过功劳而现在害了官僚主义毛病的同志。可是这难道就能阻止我们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吗？我认为不能而且不应当。这些同志过去有功劳，应该向他们弯腰鞠躬，他们现在犯了错误，有了官僚主义，可以把他们痛打一顿。（笑声，鼓掌。）不这样

又怎么办呢？既然事业的利益要求这样，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有人提到来自上面的批评，来自工农检查院、来自我们党中央等等的批评。当然，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这还非常不够。而且现在主要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掀起极广泛的自下而上的批评浪潮来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只有从上下两方面施以压力，只有把重点移到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指望顺利进行斗争并根绝官僚主义。

如果以为只有领导者才有建设的经验，那就错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建设我国工业的千百万工人群众每天都在积累丰富的建设经验，对我们来说，这种经验的价值丝毫不亚于领导者的经验。我们所以需要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自下而上的监督，也就是为了不使千百万群众的这种经验白白地丧失，为了考虑到这种经验并加以采用。

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就是：**展开无情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在制定消灭我们缺点的实际决定中考虑到这种批评**。

不能说青年团特别是“青年团真理报”没有考虑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这里的缺点是：这个任务往往执行得不彻底。而要彻底执行这个任务，不仅必须考虑到批评，而且必须考虑到批评的效果，考虑到批评后所实行的改进。

三　青年必须掌握科学

第三个任务是关于培养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问题。

同志们，在我们面前摆着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极伟大的任务。在农业方面，我们必须为联合的公共大经济打下基础。从莫洛托夫同志今天的公告中你们一定会知道，苏维埃政权提出了把分散的小农经济联合为集体经济和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国营谷物农场的极艰巨的任务。

不解决这些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地迅速地前进。

苏维埃政权在工业方面所依靠的是最巨大最集中的生产，而在农业方面所依靠的却是最分散最细小的农民经济；小农经济是半商品经济，虽然它的播种面积达到了战前的标准，但是它所提供的商品粮食比战前少得多。将来在粮食收购方面可能发生的各种困难的根源就在这里。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切实地在农业方面组织公共的大生产。但是要建立大经济，就必须懂得农业科学。而要懂得，就必须学习。在我们这里懂得农业科学的人简直少得不像话。因此，任务就是要造就新的、年轻的新公共农业建设干部。

在工业方面，我们的情况好得多。但是这里新的建设干部的缺乏也阻碍着我们前进。只要回忆一下沙赫特事件，就能了解造就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干部的问题是多么迫切。当然，我们有旧的工业建设专家。但是，第一、这种专家在我们这里很少；第二、他们不是全都愿意建设新工业；第三、他们中间许多人不了解新的建设任务；第四、他们中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老了，快要不中用了。因此，要把事业向前推进，就必须从工人阶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中加速造就新的专家干部。

我国无论在农业方面或工业方面愿意参加建设和领导建设的人有的是，会建设和会领导的人却少得不像话。相反地，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无知的。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些人决心歌颂我们的没有文化。如果你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并以自己的落后自夸，那你就是“产业”工人，你就得到荣誉和尊敬。如果你摆脱了没有文化的状况，认识了字，掌握了科学，那你就不是自己人了，你“脱离了”群众，不再是工人了。

我认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的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摆脱没有文化的状况，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掌

握科学，不善于根据科学的原则来管理经济，那它就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同志们，应当了解现在的斗争条件和国内战争时期不同。在国内战争时期，可以用冲击的方法，可以凭勇敢和大胆，可以用骑兵式的突袭方法去夺取敌人的阵地。现在，在和平经济建设的条件下，用骑兵式的突袭方法只会把事情搞坏。现在也和从前一样需要勇敢和大胆。但是单凭勇敢和大胆是成不了大事的。现在要打垮敌人，必须善于建设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必须抛掉对待商业的高傲的老爷式的态度。

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

在我们面前有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就叫做科学，它包括许多部门的知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

现在我们不能只限于培养一些各方面都会吹一点的**一般**共产党员干部，**一般**布尔什维克干部。一知半解和自诩渊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桎梏。现在我们需要金属、纺织、燃料、化学、农业、运输、商业、会计等等方面的布尔什维克**专家**。现在我们需要大批大批的、成千上万的能够在各种知识部门中成为行家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快速度。没有这些干部，就谈不到我们能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革命青年向科学大进军，——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热烈鼓掌。高喊：“乌拉！”“好呵！”全场起立。）

载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真理报”第一一三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1卷第48—56页

在 粮 食 战 线 上

（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谈话节录）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问：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源是什么？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何在？既然有这些困难，那末对于我国整个工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对比来看，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答：初看起来，会觉得我国粮食困难是偶然的，只是由于计划得不好，只是由于经济平衡工作中有某些错误。

可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困难的原因在这里要深刻得多。计划得不好和经济平衡工作中有错误在这里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拿计划得不好和偶然的错误来解释一切，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轻视计划工作的作用和意义是错误的。可是夸大计划原则的作用，以为我们已经达到能够计划一切和调节一切的发展阶段，那就更加错误了。

不应当忘记，在我国国民经济中，除了那些受我们计划控制的成分以外，还有另一些暂时不受计划控制的成分，最后，还有敌视我们的阶级，而这些阶级是不能单单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工作来战胜的。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简单的偶然现象，归结为计划工作的错误等等。

那末，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何在呢？

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源就在于我国商品粮食产量比粮食需要量增长

得慢。

工业在发展。工人数量在增加。城市在发展。最后，需要商品粮食的各种经济作物（棉花、亚麻、甜菜等等）的产区也在扩大。所有这些情形使粮食需要量，商品粮食需要量迅速增长。而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却慢得要命。

不能说我们本年度收购来的由国家支配的粮食比去年或前年少。恰恰相反，本年度我们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比往年多得多。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遇到了粮食困难。

请看几个数字吧。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们共收购四亿三千四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一亿二千三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三亿一千一百万普特。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们共收购五亿九千六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一亿五千三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四亿四千三百万普特。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们共收购五亿七千六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二千七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五亿四千九百万普特。

换句话说，本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们收购来供国内需要的粮食比去年多一亿普特，比前年多二亿三千万普特。但是我们本年度在粮食战线上还是发生了困难。

我在一个报告中已经说过，这些困难被农村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富农，利用来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消灭富农的反苏维埃发动。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在这里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指的是商品粮食产量增长得慢的原因问题，指的是虽然我国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而我国商品粮食产量还是比粮食需要量增长得慢的问题。

的确，我国播种面积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的，这是事实。粮食总产量在去年已经等于战前生产标准，就是说已经达到五十亿普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的，这是事实。尽管如此，我们所生产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而输出国外的粮食比战前少了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使我国农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它从生产商品粮食极多的地主大经济和富农大经济转为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战前我国有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六百万个体农户，而现在我国却有二千四百万到二千五百万农户，单是这一点就已经说明现在我国农业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

农业中的大经济，不管是地主经济、富农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它的力量就在于它有可能采用机器，利用科学成就，使用肥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生产的商品粮食最多。相反地，小农经济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或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因此，它是半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

例如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说。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占其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二。换句话说，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相对地比战前地主经济生产的多。而中小农户呢？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只等于其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一点二。可见这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过去战前时期和现在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粮食生产构成的情形。这些数字是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涅姆契诺夫同志提供的。涅姆契诺夫同志在说明书里附带声明说，这些数字不能说完全精确，只能使人做一种大约的估计。但是从一般粮食生产的构成来看，特别是从商品粮食生产的构成来看，这些数字已经完全足以使我们明白战前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的差别了。

	粮食总产量		商品粮食（农村外的）		
	单位百万普特	百分比	单位百万普特	百分比	商品率
战 前：					
（一）地主	600	12.0	281.6	21.6	47.0
（二）富农	1,900	38.0	650.0	50.0	34.0
（三）中农和贫农	2,500	50.0	369.0	28.4	14.7
总 计	5,000	100	1,300.6	100	26.0
战后（1926—1927 年度）：					
（一）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80.0	1.7	37.8	6.0	47.2
（二）富农	617.0	13.0	126.0	20.0	20.0
（三）中农和贫农	4,052.0	85.3	466.2	74.0	11.2
总 计	4,749.0	100	630.0	100	13.3

这个统计表说明什么呢？

第一、它说明绝大部分的粮食生产已经从地主富农方面转到小农中农方面。这就是说，小农中农在完全摆脱了地主压迫并在基本上摧毁了富农势力之后，有可能来大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了。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基本农民群众从十月革命得到的主要好处首先表现在这里。

第二、它说明我国商品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是小农，首先是中农。这就是说，不仅从粮食总产量来看，而且从商品粮食产量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已经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农已经成为农业中的“中心人物”。

第三、它说明在地主经济（大经济）已经被消灭、富农经济（大经济）已经缩小三分之二以上、农业已经转为商品率只占百分之十一

的小农经济、粮食生产方面又还没有比较发达的公共大经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形下，商品粮食产量必然会而且事实上已经较战前大为减少。虽然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而我们现在所持有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这是事实。

这就是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

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看做简单的偶然现象。

毫无疑问，还有一种情况也在这里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这就是我们的商业机关承担了不必要的供应许多中小城市粮食的义务，结果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存粮。可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并不在于这种情况，而在于我国农业的商品率提高得很慢，同时商品粮食需要量却增长得很快。

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认为出路在于恢复富农经济，在于发展和扩大富农经济。这些人不敢说要恢复地主经济，他们大概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是有危险的。可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更乐意说必须大力发展富农经济，以利于……苏维埃政权。这些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

用不着证明，这种反动的“计划”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任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有人说，富农“并不”比城市资本家“坏”，富农一点也不比城市耐普曼危险，因此，我们现在不必“怕”富农，——这种说法是自由派的空话，是用来麻痹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警惕性的。不应当忘记，在工业方面我们能用产品占工业品总产量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去和城市小资本家对立，而在农村生产方面我们能用来和富农大生产对立的，却不过是尚未巩固而粮食产量等于富农经济粮食产量八分之一的集体

农庄和国营农场。不了解富农大经济在农村中的作用，不了解富农在农村中的比重较小资本家在城市工业中的比重大过百倍，那就是发了疯，离开了列宁主义，而投奔到工人阶级的敌人方面去了。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呢？

（一）首先，出路在于从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有机器供应的、用科学成就武装起来的、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食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出路在于在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

列宁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天起就号召党去组织集体农庄。从那时起，我们党内就没有停止过宣传集体农庄的思想。可是，建立集体农庄的号召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广泛的响应。这首先是由于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发展已经给农民情绪的有利于集体农庄的转变准备了条件，而许多集体农庄现在每俄亩已能出产粮食一百五十至二百普特、商品率达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事实，又使贫农和下中农很想参加集体农庄。

还有一种情况也在这里起着不小的作用，这就是国家只是在最近才有可能大力资助集体农庄运动。大家知道，今年国家用于帮助集体农庄的款项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共六千余万卢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完全正确，它认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认为加强集体农庄运动是提高我国粮食生产商品率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一九二七年集体农庄的粮食总产量不下五千五百万普特，商品率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今年年初建立新集体农庄的巨浪和原有集体农庄的扩大，一定会使今年年底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任务在于保持集体农庄运动现在的发展速度，扩大集体农庄，取消那些有名无实的集体农庄，而代之以名副其实的集体农庄，并建立一种制度，使集体农庄把全部商品粮食交给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组织，否则国家就停止给以补助金和贷款。我认为只要遵守这些条件，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集体农庄那里得到将近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

人们有时候把集体农庄运动同合作社运动对立起来，大概他们认为集体农庄是一回事，而合作社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不对的。有些人甚至把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对立起来。不用说，这样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其实，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是最明显的生产合作社形式。有销售合作社，有供应合作社，也有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是整个合作社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集体农庄的合作社。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集体农庄只是在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发展和加强之后才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

（二）其次，出路在于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现有的国营农场一九二七年粮食总产量不下四千五百万普特，商品率为百分之六十五。毫无疑问，在国家一定的支持下，国营农场是会大大提高粮食产量的。

但是任务并不以此为限。苏维埃政权已经做出决定，要在没有农民份地的地区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每个农场占地一万至三万俄亩），这些农场五六年后大约能生产一亿普特商品粮食。这种国营农场已经着手建立。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实现苏维埃政权的这个决定。我认为只要完成这些任务，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新旧国营农场那里得到八千万至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

（三）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支持个体的富农大经济。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支持中小个体农民经济，提高它的单位面积产量，引导它走上合作社组织的轨道。这是一项老任务，早在一九二一年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强调地宣布过。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肯定了这项任务。现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使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更明显了。因此，应当坚决完成这项任务，就像坚

决完成上述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两项任务一样。

所有的材料都说明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几年以内大约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现在我国所使用的木犁至少有五百万部。只要把这些木犁换成铁犁，就能使我国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更不用说，我们还要以一定数量的肥料、精选种子和小型机器等等供给农民经济。实行预购，同整个整个的村子订立合同，供给它们种子等等，同时从它们那里取得相当数量的粮食，这种方法是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的最好方法。我认为只要在这方面认真工作，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中小个体农民经济那里至少多得一亿普特商品粮食。

总之，只要完成这一切任务，那末三四年后，我们国家就可以多掌握二亿五千万到三亿普特商品粮食，就比较能够按国内外的需要适当地机动调度了。

摆脱粮食战线上的困难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大体上就是如此。

把这些主要措施和当前在改进农村商品供应计划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并使我们的商业机关不再承担供应许多中小城市粮食的义务，——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除了上述措施以外，是不是还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比如说，采取减缓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措施（因为我国工业的发展使粮食需要量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暂时超过了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不，不应当。无论如何不应当！减缓工业发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阶级，因为工业发展中的每个前进步骤，每个新工厂，照列宁的说法，都是工人阶级在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中、在对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加强自己阵地的“新堡垒”。相反地，我们应当保持现在的工业发展速度，我们应当一有可能就加快这种速度，以便把大量商品投入农村而从农村取得更多的粮食，以便供给农业首先是供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机器，以便使农业工业化并使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提

高。

也许为了更加“慎重”起见，应当延缓重工业的发展，把主要是供应农民市场的轻工业变成我国工业的基础吧？无论如何不应当！这样做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这样做就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

我们在这里的出发点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有名的指导性的原理，这些原理是我们全党绝对必须遵循的。请听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

还有：

“我们在各方面，甚至在学校经费方面都实行节约。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把它恢复起来，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的国家。”（“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八页）

列宁的这些指示是不能忘记的。

采取上述措施对工农联盟会有什么影响呢？我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只会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

的确，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加速发展起来；如果由于得到直接帮助中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起来，而合作社又能掌握越来越广大的农民群众；如果国家又多得机动调度所必需的几亿普特商品粮食；如果由于采取诸如此类的措施富农被制服和逐渐被战胜，——那末工农联盟内的工农矛盾因而就会日益消失，在粮食收购方面就没有必要再采取非常措施，广大农民群众就会日益转向集体经济形式，为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就会日益具有群众性和组织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采取这些措施只会有利于工农联盟，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只是应当注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其目的是：（甲）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乙）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丙）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对工农联盟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社会革命党主义，无论叫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不能叫做列宁主义。

怎样把工农联盟思想和列宁所说的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这一著名原理结合起来呢？这里有没有矛盾呢？这里只在表面上看来是有矛盾的。其实这里没有任何矛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认定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而在同一个报告中他又再三论证工农联盟的必要，说“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很明显，列宁无论如何也没有认为这里有任何矛盾。

应当怎样了解列宁所说的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这一原理呢？这是不是说农民是由资本家组成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

第一、这是说，个体农民是一个特别阶级，它是把经济建筑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也就和无产阶级不同，因为无产阶级是把经济建筑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

第二、这是说，个体农民是一个本身会分泌、产生和培养资本家、富农以及其他各种剥削分子的阶级。

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工农联盟的事业是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呢？不，不是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能认为是和全体农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不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同富农作斗争，这样的联盟是不能实现的。不把贫农当做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组织起来，这样的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因此，目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只有在列宁所提出的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巩固的

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这一有名的口号下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实行了这个口号，才能引导基本农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由此可见，列宁这两个公式之间的矛盾只是虚假的、表面的。其实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载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
“真理报”第一二七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1 卷第 59—69 页

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看做是一种暂时的、瞬息即逝的东西。自我批评是一种以革命发展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特殊方法，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马克思早就说过，自我批评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法。至于我们党内的自我批评，它在布尔什维主义在我国开始出现的时候，在布尔什维主义一开始成为工人运动中一个特别的革命派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大家知道，列宁早在一九〇四年春天，当布尔什维主义还不是一个独立政党，而是和孟什维克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内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号召全党“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列宁当时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这样写道：

“他们（即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斯大林注）看见我们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着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书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些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①]，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被工人运动的发展克服的。让敌人先生们试把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画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有些像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图画也好！”（“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九〇页）

因此，有些同志是完全不对的，他们认为自我批评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象，是一种时髦的东西，它很快就要过时，正像一切时髦的东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西通常都要过时一样。实际上，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主义武库中不可缺少和经常使用的一种武器，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本性及其革命精神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一种武器。

有时候人们说，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是对于已经执政的、周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党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的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它。

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执掌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而有利于敌人，所以在现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的目的在于揭露并消灭我们的错误和弱点，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自我批评只能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列宁估计到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的情况的这些特点，他在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间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持的态度，是检验这个党是否严肃、是否**真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的义务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开承认错误**[①]，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严肃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对**阶级**以至对**群众**的教育和训练。”（“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九页）

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得万分正确，他说：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②]。而我

——————————————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这些弱点。”（“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八页）

结论只有一个：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

为什么自我批评口号正是在现在，正是在目前的历史时刻，正是在一九二八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呢？

因为现在国内和国外阶级关系的尖锐化暴露得比一两年前更明显了。

因为现在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而对我国工人阶级进行的破坏活动暴露得比一两年前更明显了。

因为沙赫特事件和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对付收购工作的手腕”的教训，以及我们计划方面的错误，对于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不留痕迹地过去。

如果我们想要巩固革命并全副武装地迎接敌人，那就必须**尽快克服**沙赫特事件和粮食收购困难所揭露出来的我们的错误和弱点。

如果我们不想被各种“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弄得措手不及而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那就必须**尽快揭露**我们的那些**还没有被揭露**但无疑是存在的弱点和错误。

拖延迟缓在这里就等于帮助我们的敌人，加深我们的弱点和错误。但是，如果不开展自我批评，不加强自我批评，不吸引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来揭发并消灭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是完全正确的，它在关于沙赫特事件的决议中说：

“保证顺利地实现上述各种措施的**最主要的条件**，应当是**切实贯彻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自我批评的口号。**”①

但是要开展自我批评，首先必须克服摆在党面前的许多障碍。这些障碍就是群众文化的落后、无产阶级先锋队文化力量的不足、我们的因循守旧、我们“共产党员的骄夸”等等。然而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是最大的障碍之一，甚至是最大的障碍。这里指的是我们党组织、国家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组织里有官僚主义分子。这里指的是靠我们的弱点和错误过日子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害怕群众的批评和群众的监督像害怕火一样，他们妨碍我们开展自我批评，妨碍我们克服我们的弱点和错误。决不能把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看做仅仅是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我们组织的影响的表现。列宁说得对：

“……我们必须懂得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斗争也像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的任务一样复杂。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机构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也提到它了，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散漫性是有联系的**。”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六七页）

如果我们真正想开展自我批评并治愈我们建设事业中的脓疮，那就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反对我们组织里的官僚主义的斗争。

我们应当更坚决地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进行**自下而上**的批评，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作为消除官僚主义的主要药剂。

列宁说得对：

“如果我们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那我们就应当**吸收下层群众来参加**”……因为“除了**吸收工人和农民**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呢？”③（“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九八页）

但是，为了“吸收”千百万群众，就必须在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

————————————

①②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性组织里，首先在党内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缺少这个条件，自我批评就等于零，就等于空谈，就等于废话。

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自我批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发扬他们的战斗精神、巩固他们的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力量并帮助他们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的自我批评。

有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需要**劳动纪律**，就可以丢开工作，光来胡扯乱谈。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对工人阶级的嘲弄。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破坏劳动纪律，而是为了**巩固**劳动纪律，为了使劳动纪律成为能够抵制小资产阶级松懈现象的**自觉的**纪律。

另外一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再需要**领导**，就可以离开船舵，一切“听其自然”。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耻辱。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削弱领导，而是为了**加强**领导，为了使它从纸上的和威信不高的领导变成**有生命力的**和真正**有威信的**领导。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自我批评”，它会**破坏**党性，**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削弱**我们的建设工作，**腐蚀**经济工作干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产生关于**蜕化**的空谈。托洛茨基反对派昨天叫我们进行的正是这种“自我批评”。不用说，党和这种“自我批评”是毫不相干的。不用说，党将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来反对这种“自我批评”。

必须把这种与我们**背道而驰的**、具有破坏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严格地区别开来。我们的自我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性，**巩固**苏维埃政权，**改进**我们的建设工作，**加强**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武装**工人阶级。

加强自我批评的运动我们才开始了几个月。我们还没有给这个运动做初步总结所必需的材料。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个运动已经开始产生良好的结果。

不能否认，自我批评的浪潮已经开始增长并扩大，日益扩展到工

人阶级的更广大的阶层并把他们卷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要拿生产会议和临时监察委员会已经活跃起来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固然，还有人企图把生产会议和临时监察委员会的有根据的和审查过的指示束之高阁，我们必须对这种企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企图的目的是要打消工人对自我批评的热情。但是，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类的官僚主义企图，将被日益增长的自我批评浪潮冲得干干净净。

也不能否认，由于自我批评，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已经开始振作起来，更加警惕起来，开始更严肃地对待领导经济工作的问题，而我们党、苏维埃、工会以及其他一切组织的干部对群众的要求也更加敏感，更加关心了。

固然，不能认为在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里已经充分实行党内民主和一般的工人民主。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这项工作将随着运动的继续展开而向前推进。

同样不能否认，由于自我批评，我们的报刊更加活跃和有生气了，而我们的报刊工作者的队伍，如工农通讯员组织，已经开始成为一支极重要的政治力量。

固然，我们的报刊有时还限于表面，还没有学会从零碎的批评意见转到较深刻的批评，从深刻的批评进而概括批评的效果，进而报道我们的建设方面因批评而获得的**成绩**。但是，几乎用不着怀疑，这项工作将在运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向前推进。

然而，除了这些优点以外，还必须指出我们运动中的一些缺点。这里指的是现在在运动初期就已经发生的歪曲自我批评口号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果不立刻予以反对，就会造成把自我批评庸俗化的危险。

（一）首先必须指出：有些报刊表现出一种趋向，把运动从切实批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转到以广告式的叫喊来反对**个人生活中**的极端现象。这也许令人难以相信，但可惜这是事实。

例如拿伊尔库茨克州委员会和州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劳动权力报”（第一二八号）来说。你们会看到报上整版登满了广告式的“口号”：“性生活的放纵是资产阶级的习气”，“喝了一杯又一杯”，“有了房子又要牛”，“双人床上的强盗”，“没有打响的枪”，如此等等。试问，这些只有“交易所报”才做得出的“批评的”叫喊和旨在改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很可能，这些广告式的短文的作者是共产党员。他可能对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敌人”深恶痛绝。但是，他在这里离开了正确的道路，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说的**不是我们**阶级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其次必须指出：甚至那些一般说来还不是不善于正确地进行批评的报刊，有时也犯了**为批评**而批评的错误，把批评变成一种**耸动视听**的竞技。例如拿“青年团真理报”来说。大家都知道“青年团真理报”在开展自我批评方面的功绩。但是，请你们看看该报最近几号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者的“批评”，看看那一连串以此为题材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讽刺画。试问，谁需要这种“批评”？它除了糟蹋自我批评口号以外，还能给我们什么呢？当然，如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着想，而不是为散布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来博得庸人一笑，那末要这种“批评”有什么用处呢？当然，进行自我批评需要各种武器，其中也包括“轻骑队”。但是，难道由此就应得出结论说，轻骑队应当成为**轻举妄动的**骑兵队吗？

（三）最后必须指出：我们许多组织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自我批评变成对我们经济工作人员的**攻击**，使他们在工人阶级面前**威信扫地**。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的某些地方组织向我们**优秀的**经济工作人员发动直接**攻击**，这是事实；而他们的全部罪状是他们没有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否则应如何理解这些地方组织关于撤销这些经济工作人员的职务的决定，这些没有丝毫约束力但分明是想破坏他们的

威信的决定呢？否则应如何理解只管自己批评而不让经济工作人员答复批评呢？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这里开始把“舍米雅卡审判”[①]冒充为自我批评了呢？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批评是来自下面的，那末即使这种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应当忽视。这都是对的。但是，难道由此就应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要求经济工作人员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吗？难道世界上有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错误的人吗？培养经济工作干部需要很多年，我们应当以最爱护最关心的态度对待经济工作人员，这难道很难了解吗？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攻击经济工作干部，而是为了加强和提高他们，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不要把它变成玩弄“双人床上的强盗”，“没有打响的枪”等等题目的广告式的把戏的工具。

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糟蹋自我批评口号，不要把它变成制造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厨房。

请批评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但是不要歪曲自我批评口号，不要把它变成攻击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的工具。

而主要的是：不要用**上面**的“批评的”叫喊代替**下面**的群众性的批评，让工人阶级群众投入这个运动，并在纠正我们的缺点方面，在改进我们的建设方面表现出他们的创造主动性。

载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一四六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1 卷第 92—99 页

————————————

① “舍米雅卡审判”是俄国古代讽刺小说，描写审判官舍米雅卡误以为被告会给他贿赂，做出偏袒被告的荒谬判决。后来“舍米雅卡审判”成了不公正审判的通称。——译者注

联 共（布）中 央 全 会（节选）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十二日）

第一次刊印

论 共 产 国 际 纲 领

（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的演说）

同志们，首先应当讨论一下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篇幅**问题。

有人说纲领草案太长太累赘，要求把它缩短一半或三分之二，要求在纲领中提出一些一般性的公式，并以此为限，就把这些公式叫做纲领。

我认为这些要求是没有根据的。要求把纲领缩短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那些人没有了解摆在纲领草案起草人面前的任务。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纲领不能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党的纲领，或者，比如说，只是几个“文明”国家的纲领。共产国际纲领必须包括世界各国共产党、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既要包括白种人又要包括黑种人。这就是纲领草案基本的和最突出的特点。但是把纲领缩短一半或三分之二，怎么能包括共产国际东方和西方所有支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工作路线呢？请同志们试试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任务吧。因此，我认为把纲领缩短一半或三分之二就等于把纲领变为一张对共产国际各支部毫无用处的空洞的抽象公式表。

在纲领起草人面前摆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包括世界各国共产

党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做到使纲领的各项条文不致成为空洞的公式，而能给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各个不同国家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提供实际的指导原则。你们一定会同意，在一个简短的纲领草案中要解决这个双重的任务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最可笑的是那些建议把纲领缩短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同志竟又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有把现在的纲领草案加长一倍甚至两倍的趋向。的确，如果在纲领草案中对工会、合作社、文化、欧洲的少数民族等等问题都加以详细的论述，那末纲领就决不可能缩短，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现在的纲领草案就不得不加长一倍甚至两倍了。

关于另外一些同志也应当这样说，他们或者要求纲领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具体指示，或者要求纲领解释所有一切，以至解释它的各项条文。第一、不能说纲领只应当是指示，或者主要是指示。这是不对的。决不能对纲领提出这样的要求，更不用说，满足这种要求就会把纲领的篇幅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第二、纲领不可能解释所有一切，以至解释它的各项宣言性的或理论性的条文。起这种作用的是对纲领的说明。决不能把纲领和说明混为一谈。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纲领的结构和**纲领草案中各章的**排列次序**问题。

有些同志要求把关于运动的最终目的即关于共产主义的一章移到纲领的最后去。我认为这种要求也是没有根据的。在纲领草案中，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章和关于过渡时期的一章之间列有关于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章。这样排列是否正确呢？我认为完全正确。如果不首先说明纲领所提出的要**过渡**到那里去的那种经济制度，即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就无从谈到过渡时期。人们在谈论过渡时期，在谈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另一种经济制度。但是向哪里过渡，究竟过渡到哪一种制度去，这就是在论述过渡时期以前首先应该说明的问题。纲领必须使人从不知道到知道，从知道得少到知道得多。谈了资本主义危机接着就谈过渡时期，而不首先说明应当过渡到哪一种制度去，

这就会把读者弄糊涂，并且违反了教育学的起码要求，这种要求同时也是制定纲领的要求。纲领应当帮助读者从知道得少到知道得多，而不是给读者添麻烦。

另外一些同志认为，不应当把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列入纲领草案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和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第二章。他们认为他们这样提是提的纲领的结构问题。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里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把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从第二章中删去，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原因这个基本问题上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纲领的结构，而在于对局部稳定时期政治形势的估计，在于对作为这次稳定因素之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作用的估计。这些同志不会不知道，我们在关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一章中不能没有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因为不把作为稳定最主要因素之一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加以说明，就无法解释这种稳定本身。否则，也就必须从这一章中删去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一段，而把这一段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都放到关于党的一章中去。但是，把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一段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一段都从论述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一章中删去，就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取消对资本主义稳定加以解释的任何可能性。显然，我们不能这样做。

关于**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的问题。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其中最发达的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能不能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呢？我认为不能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及其市场关系和对这种市场关系的利用，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对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都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有些同志否认这个原理。但是否认这个原理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认为无产阶级一取得政权，在我国城乡之间、工业

和小生产之间就立刻有了百分之百现成的分配和供应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不要市场、不要商品流转、不要货币经济而立即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的可能。只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能了解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这就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当走上剥夺中小资产阶级的道路，肩负起替千百万人工造成的新的失业者安排工作和保证生活资料的非常沉重的担子。只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能了解无产阶级专政采取这种政策是多么不明智和愚蠢。新经济政策的好处之一也就在于它使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诸如此类的困难。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新经济政策是一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经的阶段。

关于战时共产主义能不能也这样说呢？能不能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必经的阶段呢？不，不能这样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迫使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主要是采用经济以外的、带有某种军事性的手段，不是通过市场，而是在市场以外来建立城乡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这种政策的目的是组织产品分配以保证对前线革命军队和后方工人的供应。显然，假如没有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也就不会有战时共产主义。因此不能断定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上必经的发展阶段。

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有些同志倾向于这种观点。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都知道一九一八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固然，这个政策曾经被武装干涉暂时打断，只是过了三年，在战争和武装干涉消灭以后，才得以重新实行。但是，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重新实行还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宣布了的

新经济政策的原则，这种情况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应当从哪里开始自己的建设工作，应当把建设工作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当然，这只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

人们有时把战时共产主义和国内战争混淆起来，把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政权无疑是一种国内战争的形式。但是，如果说我国从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就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那就不对了。不采取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不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则而进行国内战争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一九一八年初，在武装干涉以前，我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有人说，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避免武装干涉，也就是说，不能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苏联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日益壮大、共产国际已经加强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有而且不应当有孤立的无产阶级革命了。决不能把世界资本主义日益尖锐化的危机、苏联的存在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等因素撇开不谈。（喊声：“但是匈牙利的革命却是孤立的。”）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情，而现在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了。只要回顾一下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当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曾经准备直接援助德国革命），就会了解某些同志的论据完全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喊声：“德国革命是孤立的，法国和德国之间彼此是隔绝的。”）你把地理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孤立混淆起来了。当然，地理上的距离是起作用的。但是终究不能把它和政治上的孤立混为一谈。

拿干涉者本国的工人来说，你们是不是认为在发生干涉的时候，比如说在干涉德国革命的时候，他们会默不作声，不打击干涉者的后方呢？

拿苏联和苏联的无产阶级来说，你们是不是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对干涉者的胡作非为置之不理呢？

要损伤干涉者，完全不一定要和革命的国家有地理上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只要在干涉者本国要害的地方打他们一下，使干涉者感觉到危险并认识到无产阶级团结的实际力量就够了。假定说，我们在列宁格勒地区使资产阶级的英国吃了亏，使它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是否由此就应当得出结论说，英国必定要在列宁格勒报复我们呢？不，不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可以在任何地方报复我们，比如说，在巴士姆、敖德萨、巴库或者海参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帮助和支援某一国家（比如说欧洲某一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者的形式也必须这样说。

虽然不能认为武装干涉因而也不能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各国**必然的**现象，但是总可以而且必须认为这多少是或然的现象。因此，我不同意这些同志的论据，而同意他们的结论，也就是说在纲领草案中可以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环境下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的公式，改为关于武装干涉和战时共产主义或多或少有实现的**或然性**的公式。

关于**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我不同意有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建议修改关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公式，并要求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天就宣布**全部**土地国有化。

我也不同意另外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建议根本不提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我认为最好像纲领草案那样，说将来要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另外再加上保障中小农民有土地使用权这样一句话。

有些同志认为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国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愈容易，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国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愈困难，因为在那里土地私有制的传统也就愈深，所以同这种传统作斗争也就愈困难。

你们读一读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土地问

题的提纲，你们就会了解这些同志的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在这个提纲中，列宁直截了当地警告说不要在这方面采取轻率和鲁莽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土地私有制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而对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就不能这样说了，在这些国家中，土地私有制的原则在农民的头脑中还不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俄国，农民有一个时候甚至说土地不是任何人的，土地是上帝的。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早在一九〇六年，当他预计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到来的时候，就在我国提出了在保障中小农民有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口号，并且认为农民一定会明白并同意这种措施。

难道不值得注意：也正是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警告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共产党不要立即提出**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口号，因为这些国家渗透了私有观念的农民不能马上领会这个口号。我们能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差别，不注意列宁的指示呢？显然不能。

关于纲领草案的**内容**问题。原来有些同志认为纲领草案就内容来说不完全是国际性的，因为照他们说来，它带有“过多的俄国的”性质。我在这里没有听到类似的反对意见。但是在共产国际周围某些人中原来是有这种反对意见的。

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何在呢？

也许是因为纲领草案中有专门论述苏联的一章？但是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我国革命按**性质**来说是一国的革命，仅仅是一国的革命，而主要不是国际的革命吗？如果是这样，那末为什么我们把我国革命叫做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世界各国革命发展的**杠杆**、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呢？

我们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例如我们的反对派分子，他们认为苏联革命完全是或主要是一国的革命。他们曾经在这个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奇怪的是，原来共产国际周围也有人准备步反对派分子的

后尘。

也许我国革命按**类型**来说是一国的革命，而且仅仅是一国的革命？但是，我国革命是苏维埃革命，而无产阶级国家的苏维埃形式或多或少是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采取的形式。无怪乎列宁说，苏联革命在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苏维埃的纪元。由此难道不应当得出结论说，我国革命不仅在它的性质上而且在革命类型上也主要是国际的革命，是给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基本轮廓的革命吗？

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国际性质使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对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群众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列宁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意义在于它尽一切可能使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并取得胜利，他说这句话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至少应当得出结论说，我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和工具。

同样毫无疑问，不仅苏联革命对各国无产者负有义务并正在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且各国无产者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也负有一些相当重大的义务。这些义务就是：支援苏联无产阶级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反对旨在扼杀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鼓吹帝国主义军队在进攻苏联的时候直接转到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由此难道不应当得出结论说，苏联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是分不开的，苏联革命的胜利就是全世界革命的胜利吗？

既然如此，难道还能把苏联革命说成仅仅是一国的、孤立的、和全世界革命运动没有联系的革命吗？

反过来说，既然如此，如果不和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难道还能理解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任何事件吗？

如果论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纲领**对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对各国无产者的**义务**、**各国无产者**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义务**等基本问题**避而不谈**，那末这个纲领还

有什么价值呢？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带有“俄国性质”这种反对意见会给人一种印象，说得客气一些……一种不好的、令人不愉快的印象。

现在来谈谈个别的意见。

有些同志建议把纲领草案第五十五页上关于“跟着无产阶级专政走的”农村劳动阶层的一句话加以修改，我认为这种意见是正确的。这句话显然是一种误解，也许是校对上的错误，应当加以修改。

但是，这些同志建议把列宁所下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定义都加进纲领草案中去，（笑声）这就完全不对了。在第五十二页上有如下一个基本上是从列宁那里引来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对国外资本主义敌人、对国内剥削阶级残余、对在还没有消灭的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的新资产阶级的萌芽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纲领草案中还有其他一些关于专政的定义，这些定义是针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革命不同阶段上的这些或那些任务而规定的。我想这已经很够了。（喊声：“漏掉了列宁的一个定义。”）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篇幅很多。如果把所有的都加进纲领草案中去，那末它的篇幅恐怕至少要增加两倍。

有些同志对中立中农这一论点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提纲中直截了当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夺取政权的前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共产党至多只能指望中农中立。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之后，共产党才能指望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显然，我们在制定纲领草案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列宁的这个指示，更不用说，这个

指示完全符合我国革命的经验。

有些同志对于民族问题的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断言纲领草案没有考虑到革命运动的民族因素，那是没有根据的。殖民地问题基本上是民族问题。纲领草案中已经相当突出地说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殖民地所受的压迫、民族自决、民族和殖民地的分离权等等。

如果这些同志指的是中欧的少数民族，那末在纲领草案中是可以提到这一点的，但是我反对在纲领草案中对中欧的民族问题做专门的论述。

最后谈谈某些同志对于波兰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第二种类型的国家的意见。这些同志认为把国家分成三种类型，分成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资本主义中等发达的国家（波兰、二月革命前的俄国等等）和殖民地国家是不正确的。他们断定说，波兰应当列入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国家只能有两种类型，即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除了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在革命胜利后立刻就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外，还有一些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有封建残余、有特殊的反封建类型的土地问题的国家（波兰、罗马尼亚等等），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在革命爆发的时候一定会起重大的作用，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为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可能而且一定要经过某些过渡阶段，比如说，经过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阶段。

我们这里也有过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说，农民起不了重大的作用，当前的口号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你们知道，列宁曾经坚决和这个口号划清界限，反对低估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作用和比重。当时我们有些人认为沙皇制度推翻以后，无产阶级立刻就会取得统治地位。而实际情况怎样呢？实际情况是：

二月革命以后，舞台上立刻出现了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使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占了优势。本来微不足道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突然”变成了国家的统治力量。因为什么呢？因为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最初是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我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当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才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几乎没有理由怀疑，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属于这样的国家，它们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将要相当迅速地经过某些过渡阶段。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些同志否认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运动有三种类型是不对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是第二种类型。

同志们，我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问题的意见就是如此。

至于纲领草案的文字或个别地方的措词，那我不能断定说纲领草案在这方面是尽善尽美的。应当认为在这方面还必须加以改善，必须表达得更确切，也许在文字上还要更简练等等。但这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纲领起草委员会的事情。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1 卷第 100—110 页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
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

同志们，我认为首先必须撇开小事情，撇开个人因素等等，以便解决我们所关心的右倾问题。

在我们党内是否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否存在着有利于这种危险的客观条件，怎样对这种危险作斗争，——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但是，我们如果不撇开蒙蔽这个问题并妨碍我们了解问题实质的一切小事情和次要成分，就不能解决这个右倾问题。

查波里斯基认为右倾问题是一个偶然的问题，这是不对的。他硬说，这里全部问题不在于右倾，而在于意气斗争、个人倾轧等等。姑且假定这里也和在任何斗争中一样，意气斗争和个人倾轧有几分作用。可是拿意气斗争来解释一切，看不见隐藏在意气斗争后面的问题的实质，这就是离开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像莫斯科组织这样一个毫无疑问是老练而团结一致的大组织，是不会因为几个爱闹意气的人或爱倾轧的人的积极活动而弄得上上下下都震动起来的。不，同志们，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怪事。更不用说，莫斯科组织的力量和能力是不能这样轻视的。显然，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些更加深刻的、和意气斗争或个人倾轧毫不相干的原因。

弗仑托夫虽然承认有右倾危险存在，但是不认为这种危险值得严肃的实事求是的人去认真过问，这也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右倾问题是空谈家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的研究对象。我完全了解

弗仑托夫，他埋头于日常的实际工作，以致没有工夫来考虑我们的发展前途。但是，这还不是说我们应当把某些党的工作人员的狭隘的、事务性的实际主义变为我们建设工作的教条。健康的事务主义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它在工作中失掉了前途，不把自己的工作服从党的基本路线，那它就变成坏东西了。可是不难明白：右倾问题是关于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规定的发展前途是否正确的问题。

有些同志在讨论右倾问题时把问题着重在代表右倾的人的身上，这也是不对的。他们说，请给我们指出右倾分子或调和分子，请说出他们的姓名，好让我们来惩办他们。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人当然有一定的作用。可是，这里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产生党内右倾危险的条件和环境。尽管可以把人清除，但这还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就把我们党内右倾危险的根柢铲除了。所以人的问题虽然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它没有决定的意义。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一九一九年底和一九二〇年初在敖德萨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我们的军队已经把邓尼金军队赶出乌克兰，正在敖德萨一带消灭邓尼金军队的残部。那时有一部分红军战士怒气冲冲地在敖德萨搜寻协约国，他们相信只要一拿获协约国，战争就会结束。（大笑）可以设想，红军战士当时在敖德萨能够拿获协约国的某个代表。但是协约国问题当然不会因而得到解决，因为当时敖德萨虽然是邓尼金军队的最后一块地盘，但是协约国的根柢不在敖德萨，而在世界资本主义中。

我们有些同志也是这样，他们在右倾问题上把问题着重在代表右倾的人的身上，而忘记了产生这种倾向的条件。

因此，我们在这里首先应当阐明离开列宁路线的右倾和“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产生的条件问题。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

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某一部分共产党员否认竞选中“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适当性（法国），或反对共产党单独提出候选人（英国），或不愿强调对“左派”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问题（德国），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力图使共产主义去迁就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

总之，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柢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我们的某一部分共产党员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资助是浪费金钱；或否认在自我批评基础上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适当性，认为自我批评会动摇我们的机关；或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迁就（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我国资本主义成分大大加强。而我国资本主义成分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和资本主义恢复的机会的增多。

总之，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们，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并使农民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挖除资本主义的根柢。这些根柢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

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说，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小生产在世界上可惜还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并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页至第八页）。

很明显，既然小生产在我国很普遍，甚至占优势，既然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经常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末我国就有使资本主义恢复成为**可能**的条件。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为消灭和铲除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所必需的手段和力量呢？是的，是有的。列宁关于苏联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为此就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从国家工业化着眼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命脉，迅速发展工业，使国家电气化，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使农民普遍合作化，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渐联合为公共的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如此等等。

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是必须记住的。凡细心考察过农村生活，而把它和城市生活做过比较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除资本主义的根

柢，还没有摧毁国内敌人的根基和基础。国内敌人是依靠小经济的，我们要摧毁这个敌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只有电气才是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否则国家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是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的。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一定会使经济基础从小农经济转到大工业经济。只有国家实现了电气化，只有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页至第四八四页）

第一、由此可见，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挖除资本主义根柢的时候，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有时候人们把树砍倒了，却没有把树根挖掉，因为力量不够。由此就产生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可能性**。

第二、由此可见，除了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以外，在我国还有**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我们努力实现国家电气化，**如果**我们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我们就**能够**消灭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能够挖除资本主义的根柢并在我国达到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目的。由此就产生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

最后，由此可见，不能仅仅在工业方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听凭农业去自发地发展，以为农村“自然会跟着”城市走。城市里社会主义工业的存在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因素。但是这还不是说有了这个因素就完全够了。要使社会主义的城市能够把农民的乡村引导到底，就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包括农业在内**[①]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

列宁的这一句话和他的另一句话即“新经济政策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①]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恰恰相反，这两句话是完全相符的。列宁决不是说新经济政策给予我们现成的社会主义。列宁只是说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可能**建成和**社会主义实际建成**是大有差别的。决不可以把可能性和现实混为一谈。正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列宁才主张实现国家电气化，主张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在我国最后胜利的条件。

可是要在一两年内实现这个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内使国家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工业，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合作化，为农业建立起新的技术基础，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为此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多年紧张的建设工作。当这一点还没有做到的时候（而这一点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们就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在这里，小生产经常地并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这里，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还是存在。

因为我国无产阶级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复杂的最实际最现实的生活中，所以在小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就“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来从各方面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经常引起小资产阶级的无气节、散漫性、个人主义、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复发的现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从而把某种犹豫心理、某种动摇情绪散播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我们党的队伍里各种动摇和各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其根源和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基础就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不能认为我们党内的右倾或“左”倾问题是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

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低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看不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诀窍，因而很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步，要求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要求宽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要求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推到后面去，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

我们党内的“**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高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只看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而看不见我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陷于悲观失望，只好用我们党正在特米多尔化的胡说来安慰自己。

列宁说，“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根据列宁这句话，“左”倾就做出不正确的结论说：在苏联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对农民是毫无办法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是已经过时的思想；如果没有西方胜利了的革命的及时援助，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会垮台或蜕化；如果不采纳那种幻想的、不惜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的超工业化计划，那就必须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已经毁灭了。

由此就有“左”倾政策中的冒险主义。由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的”跳跃。

毫无疑问，如果“左”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自己的农民基础，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脱离其余的工人群众，因

而就会使无产阶级遭受失败，使资本主义恢复的条件容易形成。

可见，这两种危险，无论是“左”倾危险或右倾危险，这两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无论是右倾或“左”倾，虽然从不同的两端出发，但引起的后果是一样的。

这两种危险哪一种坏些呢？我认为两种都坏。

从对这两种倾向顺利进行斗争的观点来说，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左”倾危险现在在党看来比右倾危险更为明显。我们对“左”倾已经进行了几年紧张的斗争，这个情况对于党当然不会没有作用。很明显，在对“左”倾即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几年中，党学会了许多东西，要用“左的”词句来欺骗党已经不是容易的了。

至于右倾危险，它过去就已经存在，现在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加强（和上年度收购危机有关）而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来了；我认为这种危险在我们党内某一部分党员看来还不十分明显。因此任务就是：除了丝毫不放松对“左”倾危险即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斗争以外，还要着重反右倾的斗争，并竭力设法使右倾危险在党看来也和托洛茨基主义危险一样明显。

右倾问题如果不是和我们发展中的**困难**问题有联系，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是问题也就在于右倾的存在使我们发展中的困难复杂化，并阻碍我们克服这些困难。正因为右倾危险阻碍我们进行克服困难的斗争，所以克服右倾危险的问题对于我们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现在稍微谈谈我们的困难的性质。应该注意到，我们的困难决不能认为是停滞或衰落中的困难。有经济衰落或经济停滞中的困难，在发生这种困难的时候，人们就竭力使经济停滞现象的害处减轻一些，或者使经济衰落的程度减轻一些。我们的困难和这种困难毫无共同之处。我们的困难的特点就在于它们是**高涨**中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当我们讲到困难的时候，通常指的是要把工业**提高**百分之几，把播种

面积**扩大**百分之几，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多少普特，如此等等。正因为我们的困难是高涨中的困难，而不是衰落或停滞中的困难，所以这种困难对于党也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危险。

但是困难终究是困难。要克服困难就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必须有刚毅性和坚韧性，而刚毅性和坚韧性又不是每个人都充分具备的，也许因为有人觉得累了，疲劳了，或者因为有人宁愿过比较安静的、没有斗争和波折的生活，——所以，这里就发生犹豫和动摇，转到阻力最小的方面去，说什么要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宽容资本主义分子，否认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否认一切超出平常的、安静的日常工作范围的事物。

可是，我们不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就不能前进。而要克服困难，首先必须战胜右倾危险，首先必须克服右倾，因为右倾阻碍我们和困难作斗争，并企图摧毁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斗争的意志。

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对右倾进行真正的斗争，而不是口头上的纸上的斗争。我们党内有些人为了良心上过得去，也就不反对宣布对右倾危险作斗争，好像神甫有时念着“阿勒卢亚，阿勒卢亚”一样，可是不采取（决不采取）任何实际办法来为反右倾斗争奠定巩固的基础，并在事实上克服这种右倾。这样的派别在我们这里就叫做对右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调和的**派别。不难了解：对这种调和派的斗争就是对右倾，对右倾危险的总斗争的组成部分。因为不同这种庇护机会主义者的调和派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就不能克服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关于右倾分子的问题无疑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它没有决定的意义。在上年度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我们党的下层组织里碰到右倾危险分子，当时在乡里和村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反对党的政策，弄到和富农分子结合起来的地步。你们知道，这种分子在今年春季已经被清除出党，这一点已经在今年二月我们党中央的一个大家知道的文件中特别提到了。

可是，如果说我们党内再没有这种分子，那就不对了。如果往上面去看看县的和省的党组织，并好好地观察一下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那你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里找到右倾危险分子以及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人。大家知道，在我们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好些工作人员所寄来的“信”、“声明”和其他文件中，右倾趋向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你们知道，在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中提到了这些信和文件。

如果再往上面去看看，提出关于中央委员的问题，那就必须承认，在中央的成员中也有一些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因素，固然这些因素是极少的。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就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

而在政治局内又是怎样呢？在政治局内有没有什么倾向呢？在我们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分子，又没有“左”倾分子，也没有对他们采取调和态度的分子。这是必须在这里十分肯定地说明的。对党不怀好意的分子和各种反对派分子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倾或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已经到了抛弃这种谣言的时候了。

在莫斯科组织里或它的上层机关莫斯科委员会内是不是有过犹豫和动摇呢？是的，是有过的。如果现在硬说那里没有发生过犹豫和动摇，那是愚蠢的。彭柯夫的诚恳坦白的发言就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彭柯夫在莫斯科组织和莫斯科委员会里并不是居于末位的人。你们已经听见，他坦白地公开地承认了他在我们党的政策的许多极重要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当然不是说，整个莫斯科委员会都发生过动摇。不，不是这个意思。像今年十月莫斯科委员会告莫斯科组织全体党员书这样的文件，就毫无疑问地证明莫斯科委员会已经克服了它的某些委员的动摇。我不怀疑，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是一定能彻底纠正这种情况的。

各区组织干涉了这件事，提出了必须铲除莫斯科组织里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和动摇的问题，有些同志对此表示不满。我不知道这种不满

能有什么理由。莫斯科组织里各区积极分子会议发出了自己的呼声，要求铲除错误和动摇，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我们的工作不是在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吗？自我批评可以提高党的和整个无产阶级的下层群众的积极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各区积极分子会议真正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那又有什么不好或危险呢？

中央干涉这件事情是不是做得对呢？我认为中央是做得对的。别尔津认为中央提出撤换一个为区组织所反对的区领导人的问题是做得太严厉了。这是完全不对的。我请别尔津回想一下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〇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时有些中央委员在党的路线方面犯了一些在我看来并不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按照列宁的提议对这些人进行了处分以警效尤，其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土尔克斯坦，另一个人几乎被取消了中央委员资格。

列宁当时这样处理是不是对呢？我认为他是完全对的。当时中央的情形并不像现在这样。当时有一半中央委员是跟着托洛茨基走的，而中央本身的情形是不稳固的。现在中央这样处理是宽大得无可比拟了。为什么呢？也许因为我们想比列宁慈善些？不，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现在中央的情形已经比当时稳固了，所以中央现在已经有可能处理得比较宽大。

萨哈罗夫硬说中央干涉得太迟，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对，是因为他大概不知道中央的干涉其实是从今年二月就开始的。萨哈罗夫如果愿意，是可只确信这一点的。固然，中央的干涉并没有立刻收到良好的效果。可是，如果拿这一点去责备中央，那就奇怪了。

结论：

（一）右倾危险是我们党内的严重危险，因为它是生根于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

（二）右倾危险因有各种困难而加深，不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能克服这些困难；

（三）在莫斯科组织里有过犹豫和动摇，有过不稳固的因素；

（四）莫斯科委员会的核心在中央和各区积极分子会议的帮助下已经采取一切办法去铲除这种动摇；

（五）毫无疑问，莫斯科委员会一定能克服已经发现的错误；

（六）任务就在于消除内部斗争，使莫斯科组织团结一致，在开展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顺利地进行支部的改选。（鼓掌）

载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二四七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1卷第155—166页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同志们，我要讲的是政治局提纲中所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家工业化以及在保证以尽快的速度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条件下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工业化的主导因素的问题。

其次一个问题，是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因而我们国内政策方面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问题，也就是如何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提高并改造农业的问题。

最后，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离开党的路线的各种倾向、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及目前我们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危险，是右倾的问题。

一　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

迅速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这个原理是我们提纲的出发点。

迅速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投资。但是这样做会使我们的一切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都很紧。而事实也是这样，最近三年来，在改造时期中，我们的控制数字的特点是：这些数字的制定和实现都是很紧的。无论是看一看我们的控制数字，或者是翻一翻我们的预算草案，或者是和我们党内的同

志（无论是在党组织方面工作的同志，或者是领导我们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和合作社建设的同志）谈一谈，——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计划很紧。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般地说，我们需不需要把计划定得这样紧呢？不紧不行吗？难道不能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吗？我们采取迅速发展工业的方针，是不是由于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性情急躁呢？

当然不是！在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里工作的都是一些清醒而冷静的人。如果撇开内部和外部的环境抽象地来讲，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但是问题在于：第一、不能撇开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第二、如果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出发，那就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个环境促使我们迅速发展我国工业。

现在请允许我来分析一下这个环境，分析一下促使我们迅速发展工业的这些内部和外部的条件。

外部条件。我们是在一个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取得了政权的。除了少数大工业单位多少有些新的技术基础以外，我们千百个工厂的技术是根本不能拿现代技术成就来衡量的。可是，我们周围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拥有比我国发达得多的和现代化的工业技术。你们看一看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看到那里的技术不仅是在前进，而且简直是在突飞猛进，超过了旧式的工业技术。由此可见，一方面，我国有最先进的苏维埃制度和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应当作为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基础的我国工业技术却过分落后。你们是否以为，在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可以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

要克服这种矛盾必须做些什么呢？为此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我们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即苏维埃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

为了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还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国家。或者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我们被压倒。

不仅从建成社会主义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保卫我国的独立来看这也是对的。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高度的技术，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

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迅速发展工业，就是这一点促使我们迅速发展工业。

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并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这种落后是历来就有的，是我国的全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这种落后，无论是在从前，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或是在后来，在革命以后的时期，人们都觉得是一种祸害。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但是十分明显，任何一个旧的阶级，无论是封建贵族或是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消灭我国落后性的任务。而且这些阶级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不能以多少令人满意的形式提出这个任务。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性。而且只有建立了自己的专政并掌握着对国家的领导的无产阶级，才能消灭这种落后性。

如果以为我国的落后并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而是我国的全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而且不应该对此负责，——如果这样来安慰自己，那就愚蠢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取得了政权并担负起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家的任务，我们就对一切负责而且应当对一切负责，既对好的负责也对坏的负责。正因为我们对一切负责，我们就应当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如果我们真正想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能做到。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就应当

不断地使我国工业迅速发展。我们已经在使我国工业迅速发展，这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的。

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或突如其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一九一七年，在十月革命爆发前的时期我们就提出来了。早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列宁在他的“灾祸临头和防止之法”一书中就提出这个问题了。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可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严厉方式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各先进国家…… 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向前猛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三八页）

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了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的问题。

这段话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的时期写的，当时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政权，还没有社会主义化的工业，还没有广泛发展的包括千百万农民的合作社网，还没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当我们已经有了能够根本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的一些重要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列宁的话大体上这样变动一下：

“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在**政治**方面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这还不够。我们应当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运输业、信用系统等等，利用合作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等，以便**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假如我们的工业和技术像德国那样发达，假如我国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像德国那样大，那末迅速发展工业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

度发展工业，不必担心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我们知道我们一下子就会超过它们。而那时我们也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了。但是问题正在于：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于德国的，我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还远没有赶上德国。

假如我们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一**，假如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那末迅速发展工业的问题就不会这样迫切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包围对于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危险，我国的经济独立问题自然就退到次要的地位了，我们就可以加入较发达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体系，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国家得到机器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而供应这些国家原料和粮食，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发展我国的工业。但是，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还没有这种条件，我们还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把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的问题当做我国发展的生死存亡问题提出来。

促使我们迅速发展我国工业的**外部**条件就是如此。

内部条件。除了外部条件以外，还有促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即我国工业迅速发展的内部条件。我指的是我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我指的是小商品生产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在我国还占绝对优势，和这种生产比较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大工业就像大海中的孤岛，虽然这个岛的基础在一天天扩大，但它仍然是大海中的孤岛。

我们通常说，工业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工业是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就能在集体制的基础上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

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当抛弃这种看法。但是也要记住：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末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资后备的来源。如果让农业仍然处在技术十分落后的状态中，如果不保证工业有农业基础，不改造农业，不使农业跟上工业，那末能不能把工业向前推进呢？不，不能。

因此，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农业有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速并推进自己的改造事业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比起改造联合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来，改造分散的零星的农业当然是一件困难得多的工作。但是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必须把它解决。而解决这个任务非在迅速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不可。

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有了保证；或者我们放弃这个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是必须记住的。凡细心考察过农村生活，而把它和城市生活做过比较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除资本主义的根柢，还没有摧毁国内敌人的根基和基础。国内敌人是依靠小经济的，我们要摧毁这个敌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只有电气才是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

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页至第四八四页）

可见列宁所理解的全国电气化并不是孤立地建造个别的发电站，而是逐步地“把**包括农业在内**[①]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这种大生产是这样或那样地、直接或间接地和电气化事业联系着的。

这个演说是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前夕，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论证所谓电气化计划即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时发表的。有些同志根据这一点说：这段话里所说的原理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已经不适用了。试问，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这当然是事实。我们现在拥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拥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集体农庄，我们拥有旧的和新的国营农场，我们拥有稠密的发达的合作社网，我们拥有为农民经济服务的农具租赁站，我们现在采用预购的方法作为结合的新形式，我们可以运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杠杆来逐步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小农国家，这也是事实。而这一点却是主要的。只要这个主要之点还存在，列宁关于“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非空话这一论点就还是有效的。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四月间所写的“论粮食税”一书的纲要中也说过同样的但是更加尖锐的话：

“**如果**经过一二十年的电气化，小农的个人主义和**他们**在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就一点也不可怕了。**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又说：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年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难。”（“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页至第三〇三页）

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或者电气化，即“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或者回到资本主义去。

列宁对于“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的问题就是这样了解的。

这里问题不在于对农民表示爱抚，并把这看做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的方针，因为靠爱抚是做不出大事来的；问题在于帮助农民把他们的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因为这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基本道路。

可是，不迅速发展我国工业，首先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把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

促使我们迅速发展工业的内部条件就是如此。

使我国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定得很紧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就是如此。

我们的经济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所以很紧，并规定向基本建设大量投资以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其根源就在这里。

有人会问：提纲中什么地方，提纲中哪一部分谈到了这一点呢？（喊声：“是呀，什么地方谈到了这一点呢？”）提纲中规定的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工业基本投资额就说明了这一点。要知道，我们把提纲叫做控制数字提纲。同志们，好像是这样的吧？（喊声：“是的。”）那末，在这个提纲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投入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为十六亿五千万卢布。换句话说，我们本年度投入工业的资金比上年度多三亿三千万卢布。

由此可见，我们不仅保持了工业的发展速度，而且还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工业投资比上年度多，也就是说，使工业中的基本建设工程

绝对地和相对地都增加了。

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的主要点就在这里。可是有些同志看不到大象。他们只是对控制数字提纲的细节乱加批评，而最重要的东西却没有看见。

二 谷物问题

我在上面所讲的是提纲中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现在来谈谈第二个基本问题——谷物问题。提纲的特点是：它着重地提到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发展问题。提纲的这种方针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早在七月全会上就已经说过，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过分**落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弱点。

有人一讲到我们的农业落后于工业，就抱怨这种情况，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农业一向落后于工业，并且将来还会落后于工业。在我国工业高度集中而农业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然，联合的工业要比分散的农业发展得快。由此也就产生了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因此，农业一般落后于工业，还不能作为提出谷物问题的理由。

只有当农业的一般落后于工业变为农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的时候，才出现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业问题。目前国民经济状况的特点是：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和工业区对商品粮食的需求大大增长的情况下，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任务不在于把工业的发展速度**降低**到谷物业的发展水平（这样会使一切混乱起来，会使发展变成倒退），而在于使谷物业的发展跟上工业的发展速度，并把谷物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到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无论工业或农业）迅速前进的水平。

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末谷物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或者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小农的乡村之间的分裂就

不可避免。

同志们，我们这里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谷物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说我们谷物业的发展现在处于“停滞状态”，或者甚至“退化”了呢？弗鲁姆金在他的第二封信里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根据他的要求，今天已经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位委员了。他在这封信里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农业正处于“停滞状态”。他说：“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在报刊上谈到退化，但是我们在党内不应当掩盖，这种落后等于退化。”

弗鲁姆金的这个论断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正确！我们政治局委员完全不同意这个论断，而政治局的提纲和这种对谷物业状况问题的说明是根本不同的。

那末，退化是什么？它在农业中应当表现于什么地方？显然，它应当表现于农业的后退和下降，表现于从新的经营方式倒退到旧的中世纪的经营方式。它应当表现于农民比如说由实行三圃制改为实行休耕制，由使用铁犁和机器改为使用木犁，由使用精选种子和纯种种子改为使用非精选种子和不良种子，由现代的农业文化改为低级的农业文化，如此等等。但是，难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诸如此类的事实吗？每年都有几万几十万户农民由实行三圃制改为实行四圃和多圃制，由使用不良种子改为使用纯种种子，由使用木犁改为使用铁犁和机器，由低级的农业文化改为高级的农业文化，这难道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这算什么退化呢？

弗鲁姆金总是喜欢抓住某些政治局委员的片言只字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十分可能，他这次将竭力抓住布哈林的片言只字，以便证明布哈林在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也是这样”说的。但布哈林远不是“也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是退化的可能性或危险性这一抽象的理论问题。抽象地说，这样提出问题是完

全可能的和合乎情理的。而弗鲁姆金做的是什么呢？他把退化的可能性这一抽象问题说成农业退化的**事实**了。这就是他所谓对谷物业状况的分析！同志们，这不是很可笑吗？

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它建立的第十一年竟使农业退化了，那还了得！这样的政权应该赶走，不应该支持。如果这个政权真的使农业退化了，那末工人们早就把它赶走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专家向我们叫嚷退化，他们甚至睡觉都梦见农业退化。有一个时候托洛茨基向我们叫嚷过退化。我没有料到弗鲁姆金也会走上这条可疑的道路。

弗鲁姆金关于退化的断言的根据是什么呢？首先是今年我们的谷物播种面积比去年小了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也许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乌克兰草原地带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区的秋播作物遭灾，乌克兰的同一地区今夏又遭了旱灾。假如没有这些完全能左右农业的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今年的谷物播种面积至少要比去年多一百万俄亩。

其次，他的断言的根据是我们今年的谷物总产量仅仅比去年稍微多一点（多七千万普特），而小麦和黑麦比去年少了两亿普特左右。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切情况呢？这也是因为遭了旱灾和秋播作物遭了霜灾。如果没有这些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就会比去年多三亿普特左右。怎么能把旱灾、霜灾等等对某些地区的收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撇开不谈呢？

现在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扩大播种面积百分之七，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百分之三，增加谷物总产量约百分之十。毫无疑问，我们将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这些任务。但是，尽管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某些地区还是有可能又突然遭到霜灾或旱灾，发生局部的歉收；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使谷物总产量比我们计划的数字，或者甚至比今年的总产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这是不是说农业“正在退化”，而这种“退化”应归咎于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呢？这是不是说我们使农民“失去了”经济刺

激，我们“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呢？

几年以前托洛茨基就犯过这种错误，硬说“下雨”对农业没有作用。李可夫在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下驳斥了他。现在弗鲁姆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撇开对农业起决定作用的气候条件，力图把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党的政策。

要提高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必须采取哪些途径和方法呢？

必须采取的途径或方法有三个：

（甲）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他们的播种面积；

（乙）继续发展集体农庄；

（丙）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并发展新的国营农场。

关于这些，早在七月全会的决议中就已经说过了。提纲把七月全会上说过的重复了一遍，但是把问题提得更具体，提出了这方面一定的投资数字。弗鲁姆金在这里又找到藉口来吹毛求疵了。他认为，既然把个体经济放在第一位，而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那末这无非是表明他的观点胜利了。同志们，这是可笑的。当然，如果从某些农业形式的比重来看问题，那就应当把个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因为个体经济出产的商品粮食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几乎多五倍。但是，如果从经济类型，从哪一种经济形式最接近我们来看问题，那就应当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放在第一位，因为和个体农民经济比较起来，它们是农业的高级类型。这两种看法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采用的，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在这三方面进行，使农业首先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在实际上提高呢？

为此首先必须使我们党的干部的注意力转到农业方面来，使他们特别注意谷物问题中的具体问题。应当抛弃关于一般农业的泛论和空

谈，而转为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制定提高谷物业的**实际**措施。已经到了从言论转为行动并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了，要研究**怎样**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他们的播种面积，**怎样**改进并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怎样**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供给农民优良种子和良种牲畜方面帮助农民，**怎样**通过农具租赁站用机器和其他农具帮助农民，**怎样**扩大并改进预购的工作和一般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喊声：“这是实际主义。”）这种实际主义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有把解决谷物问题这一极重要的工作淹没在关于一般农业的空谈中的危险。

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我们的主要产粮区的负责工作人员在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做一些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具体报告。在这次全会上，你们将要听到安得列也夫同志关于解决北高加索谷物问题的方法的报告。我想，以后我们还要陆续听取乌克兰、中央黑土地带、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区的类似的报告。为了把党的注意力转到谷物问题方面来，并使我们党的干部转上具体地提出和谷物问题有关的问题的轨道，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

第二、必须使我们党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其实际工作中把中农和富农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要把他们搅在一起，不要在应该打击富农的时候打到中农身上。现在总该是消灭这些所谓错误的时候了。例如拿个别税的问题来说吧。我们的政治局的决议和有关的法令规定，个别税的征收面不得超过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就是说，只向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征收。但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有许多地区征收面扩大到百分之十或十二，甚至更多，因此触犯了中农。现在还不到结束这种罪行的时候吗？

可是我们亲爱的“批评家们”不去拟定消灭诸如此类的恶劣现象的具体办法，而去考究字眼，提议把“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改为“最有实力的一部分富农”或“最上层的一部分富农”。好像这些并

不是一个意思！已经证实：在我国富农约占百分之五。已经证实：按照法令应该缴纳个别税的农户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即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已经证实：在实践中许多地区违反了这个法令。而“批评家们”不去拟定消灭这些现象的具体办法，却在字眼上进行无谓的批评，不愿意了解这样做是丝毫无济于事的。十足的书呆子！（喊声：“有人提议向所有的富农征收个别税。”）那末，这就是说应当要求废除只向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农户征收个别税的法令。可是，我倒没有听到有谁要求废除关于个别税的法令。有人说，随意扩大个别税征收面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地方预算。但是，补充地方预算是不能用违反法令、违反党的指示的方法的。我们党还存在，它还没有被消灭。苏维埃政权还存在，它还没有被消灭。如果地方预算的经费不够，就应该提出地方预算的问题，而不应该违反法令，不应该取消党的指示。

其次，必须继续加强对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刺激。毫无疑问，粮价的提高，革命法制的实际执行，用预购的方式给予贫农、中农农户的实际帮助等等，将大大地增进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弗鲁姆金认为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这种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这当然是胡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令人不能理解：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他们的联盟究竟依靠什么？不能认为这种联盟是精神上的联盟。终究必须了解，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打算盘的联盟，是两个阶级的利益的联盟，是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以互利为目的的阶级联盟。很明显，如果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那末我们就不会有结合，就不会有工农联盟。显然，这里所指的不能是“创造”或“挑起”对贫农、中农群众的经济刺激，而只能是增进这种刺激，继续加强这种刺激，使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相互有利。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所指的正是这一点。

最后，必须加强对农村的商品供应。我指的一方面是消费性的商品，另一方面特别是能够提高农产品生产的具有生产性的商品（机器、

肥料等等）。不能说我们在这方面一切都很好了。你们知道，商品缺乏的现象还远没有消除，而且大概不会很快消除。我们党内某些人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立刻就能消除商品缺乏的现象。可惜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商品缺乏的现象，第一、是和工农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巨大增长有联系的，商品的生产虽然逐年增加，但是还不能满足全部需求；第二、是和目前的工业改造时期有联系的。

工业的改造意味着把资金从消费资料的生产方面转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去。不这样做，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重大的工业改造，尤其在我们苏维埃的条件下。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把钱投入新企业的建设，城市和新的消费者的数量不断地增加，而这些新企业只有在三四年以后才能出产大批新商品。不难了解，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助于消除商品缺乏现象的。

这是不是说，在商品缺乏的现象面前我们只好束手待毙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采取具体办法来减少商品缺乏的现象。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们立即应当做到的。为此必须竭力加强那些和提高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工业部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沃龙涅什选种筒制造厂以及其他等等）。其次，为此必须尽可能地加强那些和增加稀缺商品（呢绒、玻璃、钉子等等）有关的工业部门。如此等等……

库比雅克说，从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看来，本年度用于个体农民经济的款项比上年度少。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库比雅克大概没有把我们本年度用预购的方式给农民的约三亿卢布的贷款（比上年度几乎多一亿卢布）计算在内。如果估计到这个情况（而这个情况是不能不估计到的），那末可以看出，我们本年度用于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款项比上年度多。至于新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方面本年度投入的资金将近三亿卢布（比上年度多一亿五千万卢布左右）。

应当特别注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预购的方法。不能把这些东

西看做仅仅是扩大我们商品粮食资源的手段。它们同时还是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的新形式**。

关于预购的方法我们已经讲得很多，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谁都明白，普遍采用预购的方法会使个体农户所做的努力容易联合起来，使国家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固定起来，从而使城乡结合巩固起来。

我希望你们注意集体农庄，特别是注意国营农场，把它们看做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促进农业改造的杠杆，是在农民的头脑中引起革命并帮助他们摆脱因循习气，摆脱守旧思想的杠杆。拖拉机、大型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队在我们产粮区出现，对于周围的农民经济不会没有作用。用种子、机器、拖拉机帮助周围的农民，无疑会被农民评价为并且看做是竭力引导他们走上农业大大提高的康庄大道的苏维埃国家力量和威力的标志。这个情况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现在大概也还估计不足。但是，我认为这是目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解决谷物问题和巩固新的结合形式方面所起的和所能起的最主要的作用。

我们在解决谷物问题方面的工作应当采取的途径和方法大体上就是如此。

三　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

现在来谈谈我们提纲中的第三个基本问题——关于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问题。

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是：小生产在我国占优势，从小生产中不断生长出资本主义分子，我们党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以及我们党的某些环节为这种自发势力所侵蚀。

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基本上就是如此。

所有这些倾向都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

这里指的主要是右倾。右倾究竟是什么呢？它的趋向是什么呢？它的趋向是迁就资产阶级思想，是使我们的政策迁就“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要求。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危险呢？就会使我们党在思想上被粉碎，使资本主义分子放肆起来，使资本主义复辟或像列宁所说的“回到资本主义去”的机会增多。

右倾的趋向主要潜伏在什么地方呢？潜伏在我们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也潜伏在党的机关特别是党的农村下层环节中。

我们党员中间有没有表现右倾的人呢？无疑是有的。李可夫举出反对建设德涅泊水电站的沙屠诺夫斯基为例。毫无疑问，沙屠诺夫斯基犯了右倾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但是，我还是认为沙屠诺夫斯基不能作为典型来说明右倾的特征，说明右倾的面目。我认为在这方面第一把交椅应当让弗鲁姆金去坐。（笑声）我指的是他的第一封信（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及在这里已经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位委员的他的第二封信（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现在把这两封信分析一下。我们先看一看第一封信的“基本论点”。

（一）**“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这是不是事实呢？显然不是事实。如果这是事实，那末我们的结合就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要知道，从六月（信是在六月写的）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只要不是瞎子，谁都会看到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仍然存在并日益巩固。弗鲁姆金写这种和事实不符的东西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恐吓党，使党向右倾让步。

（二）**“最近采取的方针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这是不是事实呢？完全不是事实。很明显，如果今年春季我们已经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在经济上没有希望，没有前途，那末所有主要产

粮区的中农就不会扩大春季播种面积了。我国春季播种是在四五月间进行的。而弗鲁姆金的信是在六月写的。在我国，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是粮食的主要收购者呢？是国家以及和国家相联系的合作社。很明显，如果中农群众苦于经济上没有前途，如果他们处于和苏维埃政权“破裂”的状态，那他们就不会按照国家这个粮食主要收购者的愿望去扩大春季播种面积了。弗鲁姆金的话显然和事实不符。弗鲁姆金在这里也竭力想以没有前途这种“恐怖”景象来恐吓党，使党向他弗鲁姆金的观点让步。

（三）“**应当回到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去**。”在这里讲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无庸置疑的。这句话的重点不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而在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放弃“加紧向富农进攻”（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我这样说，是因为弗鲁姆金以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来否认党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前进的一步，而否认这前进的一步就是把党拉向后退。中央七月全会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结论。全会在决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企图避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这一决定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倾向在我国的表现”。我现在直截了当地告诉弗鲁姆金，政治局在七月全会的决议中所说的这一点就是指的弗鲁姆金和他的第一封信。

（四）“**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经济的贫农**。”我们从来就是尽力和尽可能地给予那些加入或甚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贫农以最大限度的帮助的。这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比较起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新东西并不是这一点，而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力发展集体农庄运动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弗鲁姆金嘴里说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经济的贫农，实质上是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全力发展集体农庄运动这一党的任务

敷衍推诿。弗鲁姆金实质上是反对展开从集体农庄方面来加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工作。

（五）“不要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扩展国营农场。”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我们不过刚刚开始认真地进行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和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这一工作。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如果我们有一笔用于这个事业的后备资金，那末我们在这方面所应拿出的钱要比我们现在拿出的多得多。“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这样的字眼，在这里是用来引起人们的“恐怖”，并以此掩饰自己不愿意稍微认真地发展国营农场。弗鲁姆金实质上是在这里反对从国营农场方面来加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你们现在把弗鲁姆金的所有这些论点汇集起来，就会得到说明右倾的一个总的概念。

现在来看一看弗鲁姆金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它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错误。第一封信里说中农经济没有前途，而第二封信里则说农业“退化”。第一封信里说要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即放松对富农的进攻，而第二封信里则说“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第一封信里关于工业只字未提，而第二封信则发挥了少向工业建设投资的“新”理论。但是，这两封信有两点是一致的，就是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看法是一致的。弗鲁姆金在两封信里都反对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显然，第二封信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错误。

关于“退化”的理论我已经说过了。毫无疑问，这个理论是那些一味叫喊苏维埃政权要灭亡的资产阶级专家捏造的。弗鲁姆金让那些栖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周围的资产阶级专家把自己吓倒了，而现在他自己又企图恐吓党，想使党对右倾让步。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讲得够多了，因此不必再重复了。讲我们来看看其余两点：关于富农经济和关于工业的基本投资。

关于富农经济。弗鲁姆金说：“**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不妨碍富农发展他们的剥削经济。而不妨碍富农发展他们的剥削经济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放纵农村资本主义，给它自由，让它发展。这恰恰是法国自由主义者的老口号：“让他做吧，让他走吧”，就是说，不要妨碍资产阶级干自己的事，不要妨碍资产阶级自由行动。

这个口号是法国的老自由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同束缚资产阶级而不让它发展的封建政权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这样说来，我们现在应当从**社会主义的**口号——“要不断加强对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见控制数字提纲），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口号——不要束缚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难道我们想由布尔什维克变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吗？弗鲁姆金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口号和党的路线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弗鲁姆金：“斯大林同志，请把其他几点也读出来。”）我把这一点全读出来：“我们也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同时要和它的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怎么，可敬的弗鲁姆金，难道你以为下半句话会使情况变好而不会变坏吗？和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和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这个口号是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方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我们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确实提出过这个口号，并且把我们力求消灭的奴役性的剥削方式和我们当时因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而不能限制和消灭的非奴役性的、所谓“进步的”剥削方式区别开来。但是那时我们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现在，如果我没有弄错，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所持的方针是而且不能不是消灭一切剥削方式，其中包括“进步的”剥削方式。你怎么能要我们从正在发展并向前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向后转，退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上去呢？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

其次，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法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要求封建政权不妨碍资产阶级发展的时候，提出的具体要求就是给资产阶级政权。当时他们是对的。资产阶级为了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必须要有政权。因此，如果推论下去，那就应当说：让富农参加政权。因为终究必须了解这一点：剥夺富农的政权而把它集中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就不能不束缚富农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读了弗鲁姆金的第二封信自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工业的基本建设。在讨论控制数字的时候，我们面前有三种数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请求八亿二千五百万卢布，国家计划委员会给七亿五千万卢布，而财政人民委员部只同意给六亿五千万卢布。我们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决定的呢？党中央决定给八亿卢布，也就是说，比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整整多一亿五千万卢布。财政人民委员部给得少，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谁都知道财政人民委员部吝啬，它也不能不吝啬。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弗鲁姆金所以坚持只给六亿五千万卢布，并不是由于吝啬，而是以新创的“可能”论为根据的。他在第二封信和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专论中断言：**如果我们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超过六亿五千万卢布，那就必定会使我们的经济事业恶化**。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弗鲁姆金反对保持现在工业发展的速度，看来，他不了解降低这个速度才真的会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状况恶化。

你们现在把弗鲁姆金第二封信里关于富农经济和关于工业基本建设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加上“退化”论，你们就会看到右倾的面目了。

你们想知道什么是右倾，右倾是什么样子吗？读一读弗鲁姆金的两封信，研究一下，你们就会明白了。

关于右倾面目的问题就是如此。

但是，提纲不仅谈到右倾，还谈到所谓“左”倾。什么是“左”倾呢？我们党内是否真有所谓“左”倾呢？我们党内是否有像我们提纲中所说的反中农趋向，超工业化趋向等等呢？是的，是有的。它们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七月全会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我指的是七月全会关于粮食收购政策的著名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谈到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那些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向后退的人（这是右派），也反对那些要把非常措施变为党的经常方针的人（这是“左派”，是托洛茨基主义趋向）。

很明显，我们党内有托洛茨基主义因素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趋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举行争论的时候，好像将近有四千人投票反对我们的政纲。（喊声：“有一万人。”）我想，如果投票反对的党员有一万，那末因为没有到会而根本没有投票的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员该有两万了。这就是那些没有退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应当认为这些人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此外，我认为一部分后来脱离托洛茨基组织回到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抛弃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而且他们大概也不反对在党员中间散布自己的观点。最后，在我们党的一些组织中，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有些抬头了。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你们就会得到一切必要的因素来说明党内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存在。

这是很明显的：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存在的情况下，在这种自发势力向我们党侵袭的情况下，我们党内不会没有托洛茨基主义趋向。逮捕托洛茨基派的骨干或者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是一回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这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说：哪里有右倾，那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列宁谈到召回派时说过，“左派”也就是孟什维克，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现在的“左派”也应该这样说。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实质上就是右派，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面，是用“左的”词

句掩饰起来的右派。

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有人会说：既然“左”倾实质上就是右的机会主义倾向，那末它们之间的差别何在？两条战线究竟何在？的确，既然右派获得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增多，而“左派”获得胜利也会引起同样的后果，那末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把一些人叫做右派，把另一些人叫做“左派”？如果它们之间有差别，那末差别何在？两种倾向的社会根源是一个，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这难道不对吗？如果这两种倾向获得胜利，它们所引起的后果是完全相同的，这难道不对吗？那末，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

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政纲不同，要求不同，办法和手段不同。

例如右派说，**“不应当建设德涅泊水电站”**，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一个德涅泊水电站建筑工程对我们来说算什么，我们要每年建设一个德涅泊水电站”**，（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不要碰富农，让他们自由发展吧”**，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不仅要打击富农，而且还要打击中农，因为中农也和富农一样是私有者”**，——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困难来了，还不是屈服的时候吗”**，相反地，“左派”反对说，**“困难对我们来说算什么，你们所说的困难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们要开足马力向前飞奔”**，（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这就是“左派”的独特政纲和独特手段的一幅图画。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左派”有时能够用“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诱惑一部分工人，并且能够把自己装扮成右派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可是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左派”的社会根源和右派是一样的，他们常常和右派成立协议，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路线。

正因为如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但是，既然托洛茨基主义趋向是“左”倾，这是不是说“左派”比列宁主义还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左的**（没有引号的）一派。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前的时期，我们列宁主义者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极左派加入第二国际的。我们没有留在第二国际，我们在第二国际中宣传分裂，是因为我们正是极左派，不愿意和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以及社会沙文主义者处在一个党内。

这个策略和这种思想后来就成了世界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是**唯一**没有引号的左派。因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党。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不仅同那些被我们叫做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子的人作斗争，而且同那些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作斗争。

谁都会明白，把那些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趋向的人叫做“左派”，这应当了解为讽刺。列宁把“左派共产主义者”叫做左派，有时候加引号，有时候不加引号。但是谁都会明白，列宁把他们叫做左派，是讽刺他们，是以此着重指出他们仅仅在口头上，在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的趋向。

既然托洛茨基分子昨天还和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成统一的反列宁主义的联盟，公开而直接地和国内反苏维埃的阶层勾结起来，那他们怎么能谈得上是左派（没有引号的）呢？“左派”和右派昨天还公开地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党，这个联盟显然得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难道不是说明了，如果“左派”和右派没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机会主义本质，他们就

不能结成统一的联盟吗？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在一年前瓦解了。一部分类似沙屠诺夫斯基的右派分子退出了这个联盟。因此，联盟的右派今后将正是以右派的面目出现，而“左派”将以“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右派性质。但是，有什么保证能说“左派”和右派不会再搅在一起呢？（笑声）很明显，这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保证的。

既然我们坚持两条战线斗争的口号，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是宣布我们党内必须有**中派主义**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中派主义呢？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正是把事情说成这样的：有“左派”，这就是“我们”托洛茨基分子，“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有“右派”，这就是其余一切人；还有“中派”，它们摇摆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能不能认为对我们党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呢？显然不能。只有那些把一切概念都混淆起来的、早已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那些看不见和不了解战前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和共产党（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之间的**原则差别**的人才会这样说。

不能把中派主义看做一个空间的概念：比如说，一个地方坐的是右派，另一个地方坐的是“左派”，而中间坐的是中派。中派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思想体系是迁就的思想体系，是**在一个共同的党内**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列宁主义相违背的、相对立的。

中派主义对于战前时期的第二国际来说是自然的现象。第二国际中有右派（占多数），有左派（没有引号的），也有中派，中派的全部政策就是以左的词句来粉饰右派的机会主义，并使左派服从右派。

那时以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左派的政策是什么呢？是同中派作坚决的斗争，争取同右派分裂（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建立由真正的左派，由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革命的新国际。

为什么那时会产生第二国际内部的这种力量配置和布尔什维克在

第二国际中的这种政策呢？因为那时第二国际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社会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一个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不能不集中火力反对企图使无产阶级成分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必须宣传分裂思想，不这样无产者就不能建立自己的一个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能不能断定说，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同样的力量配置，在我们党内也应当实行布尔什维克在战前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内实行过的那个政策呢？显然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这就是不了解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和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共产党之间的**原则差别**。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党的阶级基础是一种，在共产党人这里党的阶级基础完全是另外一种。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中派主义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不同利益联盟的党不会没有中派，而布尔什维克也必须采取分裂路线。在共产党人这里，中派主义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的党性不相容的，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而不是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

正因为我们党的统治力量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最左派（列宁主义者），所以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在我们党内实行分裂政策是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理由的。（喊声：“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分裂的可能？”）这里谈的不是分裂的可能性，而是在我们这个一个阶级的列宁的党内实行分裂政策，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能认为有理由的。

谁不懂得这个原则差别，谁就是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谁就是和列宁主义决裂。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只有发了疯的和失去了最后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能当真断定说，我们党的政策，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政策是中派主义的政策。

列宁在我们党内向来都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派”，

又反对明显的孟什维主义倾向。看一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党是在反对两种倾向，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后，同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党在自己的发展中所经过的阶段。大家都知道列宁的一句话：我们必须进行既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列宁就是中派主义者，他实行了中派主义的政策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末，我们的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说到右倾，它当然不是战前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倾向还不等于是机会主义。我们知道列宁当时是怎样解释倾向这个概念的。右的倾向，这是一种还没有形成机会主义的而且是可以纠正的倾向。因此，不能把右的倾向和已经形成的机会主义看成一个东西。

说到“左”倾，它是一种和战前时期第二国际中的极左派即布尔什维克绝对相反的东西。“左”倾分子不仅不是没有引号的左派，而且他们实质上也就是右倾分子，不过和右倾分子有差别，就是他们不自觉地以“左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真正本质。看不到我们党内的“左”倾分子和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个**唯一的**左派（没有引号的）之间的全部深刻差别，就是反党的罪恶行为。（喊声：“而使各种倾向合法化呢？”）如果同各种倾向进行公开斗争就是使它们合法化，那就应当承认，列宁早已使它们“合法化了”。

他们这些倾向分子，无论右派或“左派”，都是从非无产者阶层的各色各样分子中招募来的，这些分子反映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党的侵袭和党的个别环节的腐化。一部分来自其他政党的人，党内具

有托洛茨基主义趋向的人，从前党内各种派别的残余，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正在官僚主义化的（和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并且和这些机关中明显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的党员，我们农村组织中和富农结合起来的富裕党员以及其他等等，——这就是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培养基。很明显，这些分子不能接受任何真正左派的和列宁主义的东西。他们只能培养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者培养以左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所谓“左”倾。

正因为如此，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

其次，提纲中说，展开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这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这里最好回忆一下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我们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是从何着手的呢？也许是从组织处理着手的吧？当然不是！我们是从思想斗争着手的。这个斗争从一九一八年进行到一九二五年。在一九二四年，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已经做出决议说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但是托洛茨基还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可见我们“容忍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留在中央。为什么我们容许他们留在党的领导机关呢？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分子虽然和党有分歧，对中央的决议还是服从的，对党还是忠顺的。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比较大规模地进行组织处理呢？只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了派别，成立了自己的派别中央，把自己的派别组织变为新的党并开始号召人们举行反苏维埃游行以后。

我认为我们同右倾作斗争也应该走这条道路。虽然右倾正在党内增长，但是目前还不能把它看做一种已经形成和定形的东西。它仅仅是在形成和定形中。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因此结论是：展开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

斗争的主要方法。这个结论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在我们某些党员中间有着相反的趋向：同右倾作斗争不从思想斗争着手，而从组织处理着手。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你给我们指出十个二十个右倾的人吧，我们一转眼就会把他们粉碎，这样就铲除了右倾。同志们，我认为这种情绪是不对的和危险的。正是为了不致随着这种情绪东飘西流，为了把反对右倾的斗争引上正确的轨道，必须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思想斗争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

这是不是说我们排斥任何组织处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但毫无疑问这是说，组织处理在这里应起从属作用；如果右倾分子没有破坏党的决议，我们就不应当把他们赶出这些或那些领导组织和领导机关。（喊声：“莫斯科的实际情况呢？”）

我认为莫斯科的领导同志中间未曾有过右倾分子。那里有过对右倾情绪的不正确的态度。甚至可以说，那里有过调和趋向。但是我不能说，莫斯科委员会中有过右倾。（喊声：“组织斗争不是有过吗？”）

组织斗争是有过的，虽然占着从属地位。有过这种斗争是因为莫斯科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改选，而且各区积极分子会议有撤换他们的书记的权利。（笑声）（喊声：“难道我们宣布过改选书记吗？”）谁也没有禁止过改选书记。中央的六月宣言明确指出，如果不能保证下层组织有撤换任何书记和任何委员会的权利，那末开展自我批评就会成为空谈。你能用什么话来反对这样的宣言呢？（喊声：“在党代表会议以前吗？”）是的，即使在党代表会议以前。

我看到某些同志的脸上流露出卜者[①]的笑容。同志们，这是不好的。我看到你们中间有些同志迫切地盼望尽快撤销某些表现右倾的人的职务。但是，亲爱的同志们，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撤销职务比进行广泛而周密考虑的关于右倾、右倾危险以及反右倾斗争的解

① 卜者，即占卜的人。——本书编者注

释运动要容易。但是不能认为最容易的就是最好的。要努力组织广泛的反对右倾危险的解释运动，不要吝惜时间，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运动愈广泛愈深入，对右倾就愈不利。所以，我认为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反右倾斗争的中心环节。

至于说到莫斯科委员会，我不知道对于乌格兰诺夫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做结论时所说的话还能做些什么补充。他坦白地声明：

“如果稍微回忆一下历史，回忆一下一九二一年我在列宁格勒和季诺维也夫作战的情形，就会知道当时‘激战’的规模比现在大些。当时我们战胜了，因为我们是对的。现在我们打败了，因为我们错了。这对我们是会有益的。”

可见乌格兰诺夫现在进行了斗争，如同他当时进行过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一样。但是他最近进行斗争究竟是反对谁呢？看来是反对中央的政策。还能是反对谁呢？这个斗争在什么基础上才能进行呢？显然是在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基础上。

因此，提纲完全正确地强调必须反对对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各种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特别是反对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认为这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提纲中指出，我们目前应当特别强调同右倾作斗争的必要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右倾危险在目前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趋向的斗争，并且是集中火力的斗争，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这个斗争的结果是击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骨干。不能说，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最近也进行得同样激烈。这种斗争所以没有进行得特别激烈，是因为右倾在我们这里还处在形成和定形的时期，它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加强（与我们的粮食收购困难有关）而正在加强和增长起来。所以主要的打击应当对准右倾。

同志们，我在结束讲话之前还想指出一个在这里没有谈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在我看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政治局委员向你们提出了控制数字提纲。我在演说中维护了这个提纲，说它是绝对正确的。我不谈对这个提纲可能提出的个别修正。但是，这个提纲基本上是正确的，能保证我们正确执行列宁的路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我应当向你们声明，这个提纲是我们在政治局内一致通过的。我认为这个事实多少有些意义，因为一切对我们党不怀好意的人、反对我们党的人以及我们党的敌人不时在我们队伍里散布谣言。我指的谣言是：似乎我们政治局内有右倾、“左”倾、调和态度以及鬼才晓得的其他什么东西。就让这个提纲作为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团结一致的再一次，第一百次或第一百零一次的证明吧。

我希望这次全会同样一致地通过这个提纲作为基础。（鼓掌）

载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真理报”第二七三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1 卷第 173—203 页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五月制作

斯大林选集

第三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选集

第三卷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

二〇一七年·中国

И. Сталин.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 1

《斯大林选集》第三卷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

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二月初）…… 3
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8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 11
一　“民族”概念 …… 11
二　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 13
三　民族和民族语言的未来 …… 17
四　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 …… 22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九年四月）…… 27
一　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 …… 28
二　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 33
三　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 …… 39
四　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 …… 45

五 党的领导问题 …… 94
六 结论 …… 101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叶·米库林娜“群众的竞赛”一书序言）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103
大转变的一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 106
一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 …… 106
二 在工业建设方面 …… 108
三 在农业建设方面 …… 110
结论 …… 117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19
一 “平衡”论 …… 120
二 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 122
三 小农经济“稳固”论 …… 124
四 城市和乡村 …… 128
五 关于集体农庄的本质 …… 132
六 阶级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转变 …… 135
七 结论 …… 138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 140
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144
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
（一九三〇年二月九日）…… 148
一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提出的问题 …… 148
二 斯大林同志的答复 …… 149

胜利冲昏头脑（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 153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159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178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178
二　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高涨和苏联的内部状况 …… 195
三　党 …… 248
致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摘自原信）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273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
——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 277
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
——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287
一　劳动力 …… 287
二　工人的工资 …… 289
三　劳动组织 …… 292
四　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问题 …… 295
五　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征兆 …… 298
六　关于经济核算 …… 301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领导 …… 303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一九三一年）…… 306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319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节选）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 333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的报告）…… 333
一 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 …… 333
二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 …… 341
三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346
四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352
五 五年计划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358
六 五年计划在城乡间商品流转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362
七 五年计划在和敌对阶级残余进行斗争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 365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371
一 集体农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 371
二 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 …… 377
三 几点意见 …… 380
和罗宾斯上校的谈话（简要记录）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 385
和“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先生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394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398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 398
二 苏联国民经济的继续高涨和内部状况 …… 414
三 党 …… 441
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九日）…… 464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471

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 487
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 490
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讲话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93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农庄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
（一九三五年二月）…… 497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499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见集体农庄
种植甜菜的女突击队员时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 505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508
1.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 …… 508
2.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 …… 512
3.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 …… 516
4.最近的任务 …… 519
5.简单的几句话 …… 520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522
一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 522
二　1924—1936 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 523
三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 529
四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 533
五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 539
六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 …… 548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
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至五日）…… 550
一 政治上的麻痹大意 …… 551
二 资本主义包围 …… 553
三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 555
四 经济胜利的阴暗面 …… 560
五 我们的任务 …… 562
结束语 …… 572
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
——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 586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导言
（一九三八年九月）…… 590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
（一九三八年九月）…… 592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
（一九三八年九月）…… 622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633
一 苏联的国际形势 …… 633
二 苏联的国内形势 …… 644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 662

补遗：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 682

本 卷 说 明

新编《斯大林选集》共分四卷，是根据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和档案附卷十卷编辑的。各卷内容的起讫时间为：第一卷，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第二卷，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第三卷，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第四卷，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三年。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原《斯大林选集》，仅为两卷，按照当时的政治、理论需要，剔除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工人运动、暴力革命、论反对派、卫国战争，以及中国革命等方面的大量文献。现新编《斯大林选集》已尽可能予以增补、充实，以力求全面地反映这位历史伟人和革命导师的思想、理论和**非凡经历**。

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中，有众多关于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新编《斯大林选集》亦撮要单独编辑成“斯大林历史档案选”，作为附卷附于第四卷之后，供读者参考。第四卷之后还附有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总目录和档案附卷十卷总目录的下载地址。

本选集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

本选集中的注释，一为原书著者（斯大林）注，二为译者注，三为编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置于当页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选集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选集中的部分篇目标题，是我们拟加的。

本选集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书编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新编《斯大林选集》

第三卷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

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节录）（简要记录）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二月初）

同志们！不管多么令人痛心，也不得不确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团。过去党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个集团存在，因为布哈林分子对党严密地隐瞒了这种集团存在的事实。但是现在这已经是尽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了。

从这个集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它有自己的、和党的政策相对抗的特殊政纲。第一、它违反党的现行政策，要求降低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硬说现在的工业发展速度会“招致灭亡”。第二、它也违反党的政策，要求收缩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断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我国农业发展中不起也不能起重大作用。第三、它也违反党的政策，要求规定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并放弃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调节作用，断言国家的调节作用使贸易不可能发展。

换句话说，布哈林集团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它不主张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而主张让它自由发展。

同时，布哈林集团反对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反对向富农征收“过高的”税，放肆地责备党，说党采取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布哈林所以需要这种可笑的责备是为了保护富农，把劳动农民和富农搅在一起，混为一谈。

布哈林集团要求党按照它的政纲的精神根本改变党的政策。它并且声明：如果党的政策不改变，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就要

辞职。

这次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在讨论过程中弄清楚的事实就是如此。

此外还弄清楚了：布哈林受这个集团的委托，曾经和加米涅夫进行幕后谈判，以便组织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来反对党和党中央。看来，布哈林分子并不指望他们的政纲会在我们党中央取得胜利，所以认为必须背着党中央来组织这种联盟。

过去我们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一次爆发是在中央七月全会（一九二八年）以前。当时的意见分歧也是发生在这些问题上：关于工业发展的速度，关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关于私人贸易的完全自由，关于对富农的非常措施。但是，当时全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通过了共同的一致的决议。当时我们都认为布哈林及其拥护者抛弃了自己的错误，意见分歧也因共同决议的通过而消除了。大家知道的由政治局全体委员签字的关于政治局内部团结一致、没有意见分歧的声明（一九二八年七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意见分歧的第二次爆发是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以前。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显然表明，政治局内并不是一切都很好，至少有一位政治局委员打算修改或“订正”中央的路线。在我们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看来，丝毫不容怀疑，“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一篇反党的折衷主义的文章，它指望减缓工业发展的速度并按照大家知道的弗鲁姆金那封信的意见来改变我们党的农村政策。这里还要加上关于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辞职问题。原来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那时来到控制数字决议起草委员会，声明说他们要辞职。但是在控制数字委员会工作过程中，全部意见分歧都这样或那样地解决了：保持了现在的工业发展速度，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的继续展开获得了同意，保持了向富农征收的最高税额，也保持了国家在贸易方面

的调节作用，说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可笑责备在全体委员大笑声中遭到了否定，三人的辞职声明收回了。结果是政治局全体委员通过了关于控制数字的共同决议。结果是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大家知道的决议：政治局全体委员无论在中央十一月全会上或全会外都要宣称政治局内部是团结一致、没有意见分歧的。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投票赞成一致的决议只是做做样子，他们保留了自己和党不一致的特殊看法；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实际上会真正拒绝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工作；加米涅夫的档案中有一种“记录”，从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一个持有自己的政纲、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起来反对党的特殊集团，——这一切当时我们能不能知道呢？

显然不能知道。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意见分歧是存在的，而且分歧是严重的。看来弗鲁姆金的桂冠使布哈林睡不着觉。列宁早在一九一六年写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就万分正确地说过，布哈林“在政治上极不坚定”。现在这种不坚定性已经由布哈林传染给他的集团的成员了。

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主要是：他们确信宽容和放纵富农是解决我们粮食困难和其他一切困难的手段。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宽容富农，不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给他们自由等等，那末困难就会消除，国家政治状况就会好转。不用说，布哈林分子的这种确信富农能起拯救作用的幼稚看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简直不值得批评。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不了解富农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死敌。他们不了解实行宽容和放纵富农的政策就是使我国整个政治状况恶化，使国内资本主义分子更有机可乘，使我们失去乡村的贫农，使中农灰心丧气，使我们和我国工人阶级决裂。他们不了解不论怎样放纵富农都不能减轻我们的粮食困难，因为在规定收购价格和由国家机关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下，富农反正不会

自愿交出粮食，而我们如果不愿意破坏苏维埃制度，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放弃国家调节贸易的政策。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们不了解这些粗浅的道理。至于放纵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上都同列宁政策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原理绝对不相容，那就不用说了。

同志们会说，这一切都不错，但是出路何在呢？由于布哈林集团的出现，必须采取什么对策呢？关于摆脱现状的出路，大多数同志都已经发表意见。大多数同志要求会议表现出果断的精神，坚决拒绝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辞职（李可夫已经收回自己的辞职声明）。大多数同志要求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斥责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政纲，要求会议斥责布哈林及其集团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拼凑反党联盟。我完全同意这些建议。

布哈林分子不同意这样的决定。他们不顾党章，要求保证他们有派别集团的自由。他们不顾党的切身利益，要求保证他们有违反党和中央决议的自由。试问，有什么根据呢？

照他们说来，如果普通党员不执行中央的决议，那就应当按照党的法规予以极严厉的处分；如果所谓领袖，比如说，政治局委员违反中央的决议，那就不仅不能处分他们，而且简直不能批评他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把批评看做“恶意攻击”的。

显然，党不能采取这种荒谬的观点。如果我们对领袖们宣布一种党的法规，对党内的“平民”宣布另一种党的法规，那末我们就根本没有什么党，没有什么党的纪律了。

他们控诉“恶意攻击”。但是这种控诉是破绽百出的。既然布哈林有权写“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之类的荒谬的反党文章，那末党员就更有权批评这种文章。既然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自以为有权违反中央的决议，顽固地拒绝在委托给他们的岗位上工作，那末党员就更有权

批评他们的这种行为。如果把这叫做“恶意攻击”，那末让他们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们是怎样了解自我批评、党内民主等等口号的。

有人说，如果列宁来处理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一定会比现在中央处理得宽大些。这是完全不对的。现在的情形是这样：两位政治局委员经常违反中央的决议，顽固地拒绝留在党交给他们的岗位上，而党中央不但没有处分他们，反而劝了他们两个月，劝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列宁在这种场合是怎样处理的，请回想一下吧。难道不记得列宁同志因托姆斯基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把他赶到土尔克斯坦去了吗？

托姆斯基：这是季诺维也夫的好意，一部分也是你的好意促成的。

斯大林：如果你想说可以叫列宁相信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事情，那末这只能令人发笑……　请回想一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关于施略普尼柯夫的事。列宁因为施略普尼柯夫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党支部中批评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某一决议草案，就建议取消他的中央委员资格。

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现在粗暴地违反中央的决议并公然制定反党的机会主义新政纲的罪行，要比上述托姆斯基和施略普尼柯夫的过错恶劣得多，这一点谁能否认呢？可是中央委员会不但没有要求把他们中间的哪一位逐出中央委员会或派到什么土尔克斯坦去，反而只是试图说服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当然，同时也揭穿他们非党的、有时简直是反党的立场。你们还要怎样宽大呢？

我们大多数中央委员对布哈林分子过于自由主义和宽容了，也许我们这样做无意中鼓励了他们反党的派别“工作”，这样说不是更正确吗？

还不到结束这种自由主义的时候吗？

我提议接受这次会上大多数人的建议，并转入下面的问题。

第一次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26—230页

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同志！

信写得太迟了。但是迟写总比不写好。

（一）我认为在文艺方面（以及在戏剧方面）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问题这一提法的本身是不正确的。“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因此，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非**党的和无比广阔的领域，那就奇怪了。这些概念在文艺界党的（共产党的）某个小组里还可以应用。在这种小组里可能有“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但是，在文艺发展的现阶段，把这些概念应用于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以至反苏维埃的和完全反革命的流派的文艺界，那就是把一切概念都颠倒了。如果在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

（二）综上所述，应该得出结论说：我不能认为“郭洛万诺夫主义”是“右倾”危险或“左倾”危险，因为它是在党派范围以外的。“郭洛万诺夫主义”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当然，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郭洛万诺夫本人不能改好，他不能摆脱自己的错误，甚至当他决心抛弃自己错误的时候也要追究他和攻击他，这样来迫使他出走国外。

又如布尔加柯夫的“逃亡”，同样不能认为是“左倾”危险或“右倾”危险的表现。“逃亡”是企图引起人们对某些反苏维埃流亡者阶层怜悯（甚至同情）的表现，也就是企图为白卫分子的活动做辩

护或半辩护的表现。像现在这个样子的“逃亡”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

但是我决不会反对上演“逃亡”，只要布尔加柯夫给自己的八个梦再加上一两个梦，描写出苏联国内战争的内部社会动力，使观众能够了解，所有这些自称为“诚实的”谢拉菲穆之流和各种各样的编制以外的大学讲师被赶出俄国，并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任性，而是因为他们曾经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不管他们如何“诚实”），布尔什维克把这些剥削的“诚实”拥护者赶走是体现了工农的意志，因此是做得完全正确的。

（三）为什么常常上演布尔加柯夫的剧本呢？大概因为**我们自己的**适于上演的剧本不够。闹剧本荒的时候，甚至“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也算好剧本了。当然，“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通过竞赛，创作真正的、有意思的、富有艺术性的苏维埃性质的剧本，来代替旧的和新的非无产阶级的低级作品，逐步地把它们从舞台上排挤下去。而竞赛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只有在竞赛的情况下才能使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形成和定形。

至于“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这个剧本本身，它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尔宾这样一家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不得不放下武器，服从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对他们布尔什维克是毫无办法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显示了布尔什维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

当然，作者对这种显示是一点也“没有过错”的。但是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四）确实，斯维捷尔斯基同志常常搞出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和歪曲行为来。但是同样确实的是，剧目委员会在其工作中犯的错误

并不比他少，虽然是另一方面的错误。请回忆一下“火红的岛”、“平等者的阴谋”以及其他类似的低级作品吧，这些作品不知为什么很乐意地让真正资产阶级的室内剧院上演了。

（五）关于“自由主义”的“谣言”，最好是不去谈它，——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事，让莫斯科的商人太太们去搞吧。

约·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第一次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1—233页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这些信和我最近几个月来收到的其他同志关于同一问题的许多信是相似的。然而我决定只回答你们，因为你们把问题提得更露骨，从而可以帮助把问题弄明白。固然，你们在自己的信中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不正确的解答，但这是另一回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谈。

我们就来谈本题吧。

一　“民族”概念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有了自己的民族理论。依据这个理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大家知道，这个理论已经是我们党内所公认的了。

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你们认为这个理论不够完备。因此，你们建议给民族的四个特征加上第五个特征，这就是：具有自己的单独的民族国家。你们认为没有这第五个特征，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

我认为你们所提出的、给“民族”概念加上新的第五个特征的那个公式是大错特错的，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政治上都不能证明是对的。

按照你们的公式，就只好仅仅承认那些和其他国家分离而有自己

的单独国家的民族才是民族，而一切不能成立独立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就只好从民族范畴中一笔勾销，并且被压迫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好从“民族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概念中取消了。

不仅如此，按照你们的公式，就只好认定：

（甲）爱尔兰人只是在“爱尔兰自由国”成立以后才成为民族，而在这以前他们不是民族；

（乙）挪威人在挪威从瑞典分离出来以前不是民族，而只是在分离以后才成为民族；

（丙）乌克兰人在乌克兰是沙皇俄国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不是民族，他们只是在中央拉达和斯柯罗帕茨基统领统治之下从苏维埃俄国分离出来以后才成为民族，但是他们在把自己的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后，又不再是民族了。

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显然，使人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的公式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公式。

在实践上——政治上，你们的公式不可避免地会引导到替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压迫做辩护，这种压迫的体现者根本不承认那些没有自己单独的民族国家的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是真正的民族，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给了他们压迫这些民族的权利。

更不必说，你们的公式会引导到替我们各苏维埃共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做辩护，这些人硬说各苏维埃民族在把自己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后就不再是民族了。

关于“补充”和“修改”俄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问题就是如此。

剩下的只有一个出路：承认俄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二　民族的产生和发展

你们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你们把现有一切民族都搅在一起，看不见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

你们断定说：民族还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产生并存在了。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在封建主义时期，既然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不仅没有用民族的纽带彼此联系起来，而且根本否认这种纽带的必要性，那末民族怎么能产生和存在呢？和你们的错误论断相反，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各该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该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

当然，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

说到这里，应该指出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关于民族的产生问题所讲的那些出色的话。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从氏族联系的发展中推论出民族联系和民族统一的产生；列宁在和他论战的时候说道：

“这样说来，民族联系乃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综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大概是取材于一些用作小学教材的童话。

按这个启蒙课本的原理说来，社会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然后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这不过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对俄国历史的进程也没有任何概念。在古俄罗斯还可以说有过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这种氏族联系毫无疑义已不存在了，就是说，当时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方的联合上：地主和教堂接纳了从各地来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很难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当时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那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有其管理方面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的特殊的军队（地方诸侯是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特殊的税关等等。仅仅在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中（大约自十七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请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综合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一卷第一三七页至第一三八页）

所谓“现代”民族产生的情形就是如此。

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为了“民族统一”而鼓吹民族内部的阶级和平；掠夺异民族的领土来扩大本民族的领土；不信任和仇视异民族；压迫少数民族；同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这就是这种民族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政治内容。

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例如法兰西、英吉利、意大利、北美利坚以及其他类似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在我国无产阶级

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前的俄罗斯、乌克兰、鞑靼、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俄国其他的民族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族。

显然，这种民族的命运是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民族势必退出舞台。

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小册子中说，“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民族运动实质上既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这里指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

关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情形就是如此。

但是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民族。这就是新式民族即苏维埃民族，这种民族是在俄国资本主义推翻以后，在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政党消灭以后，在苏维埃制度确立以后，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

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是团结和领导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残余，为了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民族内部结成联盟；为了各个民族及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发展而消灭民族压迫的残余；为了建立各族人民间的友谊和确立国际主义而消灭民族主义的残余；在反对侵略和侵略战争的政策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同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这就是这种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政治面貌。

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

这些新式民族是由于资本主义被消灭而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基础上通过以社会主义精神根本改造旧式民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谁也不能否认，现在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俄罗斯民族、乌克

兰民族、白俄罗斯民族、鞑靼民族、巴什基尔民族、乌兹别克民族、哈萨克民族、阿捷尔拜疆民族、格鲁吉亚民族、阿尔明尼亚民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不论按阶级成分和精神面貌说来，或者按社会政治的利益和趋向说来，都和旧俄境内各个相当的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根本不同。

这就是历史所知道的两种民族类型。

你们不同意把民族的命运（这里是指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你们不同意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也将消灭的论点。可是，如果不把这些民族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究竟又能把它和什么东西联系在一起呢？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民族也势必消失，这难道很难理解吗？难道你们认为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在苏维埃制度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能存在和发展吗？这怎么行……

你们担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民族的消灭就等于所有民族的消灭，任何民族的消灭。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除了资产阶级民族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它们的团结性和生命力远远超过了任何资产阶级民族，这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的错误就在于：除了资产阶级民族以外，你们看不见其他的民族，因而你们忽视了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废墟上产生的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整个时代。

问题就在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并不就是所有民族的消灭，而仅仅是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废墟上，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产生和发展起来，这种民族比任何资产阶级民族都团结得多，因为它们没有那些腐蚀资产阶级民族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且它们的全民性远远超过了任何资产阶级民族。

三　民族和民族语言的未来

你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认定不仅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候，而且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的消失、民族的融合以及统一的共同的语言的形成都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这里，你们把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即把“民族压迫的消灭”和“民族差别的消灭”混淆起来了，把“民族国家壁垒的消灭”和“民族的消亡”、“民族的融合”混淆起来了。

不能不指出，把这些各不相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中，民族压迫早已消灭了，但是由此决不应该得出结论说：民族差别已经消失了，我国各民族已经消灭了。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中，民族国家壁垒如边防、税关早已取消了，但是由此决不应该得出结论说：各个民族已经融合起来了，各种民族语言已经消失了，这些民族语言已经被我们一切民族的某种共同语言代替了。

你们不满意我在东方民族共产主义大学里的演说（一九二五年），因为在那次演说中我否认了下面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例如在我们国家内胜利的时候，各种民族语言将要消亡，各个民族将要融合起来，而且将要出现一种共同语言来代替各种民族语言。

你们认为我这种说法和列宁的一个著名论点是矛盾的，这个论点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

其次，你们认为我这种说法和列宁的另一个论点也是矛盾的，这个论点是：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将开始消亡；在这个胜利以后，各种民族语言将开始被一种共同语言所代替。

同志们，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严重的错误。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这些各不相同的现象混为一谈，搅在一起，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容许的。不应该忘记：这些各不相同的现象反映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两个时代不仅在时间上（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在本质上都是互不相同的。

民族猜疑、民族隔阂、民族仇视、民族冲突，当然不是被某种“天生的”民族恶感推动着和支持着的，而是被帝国主义征服异民族的野心以及这些民族对于民族奴役的威胁所感到的恐惧推动着和支持着的。毫无疑问，只要世界帝国主义存在，这种野心和这种恐惧也将存在，——因此，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民族猜疑、民族隔阂、民族仇视、民族冲突也将存在。能不能断言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消灭就是大多数国家内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消灭呢？显然不能。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虽然严重地削弱了世界帝国主义，但是仍然没有创造而且不能创造为世界各个民族和各种民族语言融合为一个共同的整体所必需的条件。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消灭**一切国家里**的帝国主义，消灭征服异民族的野心以及对于民族奴役的威胁所感到的恐惧，根本消除民族猜疑和民族仇视，把各个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联合起来，从而创造为一切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所必需的实际条件。

这就是这两个时期的根本区别。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把这两个不同的时期混为一谈，搅在一起，

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请看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的演说吧。在这个演说中说：

“人们（例如考茨基）谈论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一切语言的消亡而形成的统一的全人类的语言。我不大相信这个无所不包的统一语言的理论。无论如何，经验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这种理论。直到现在，情形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语言的数目，因为它震动了人类的最下层，把他们推上政治舞台，唤起早先大家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许多新的民族追求新的生活。谁能想到过去的沙皇俄国是一个至少有五十个民族和民族集团的国家呢？可是十月革命打断了旧的锁链，把许多被遗忘了的民族和族推上舞台，给了他们新的生活和新的发展。”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我是反对考茨基这一类的人的，因为他（即考茨基）对于民族问题始终是门外汉，他不了解民族发展的诀窍，不理解民族稳定性的巨大力量，他认为远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前，还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民族融合就已经是可能的，他奴颜婢膝地赞扬日耳曼人在捷克的同化“工作”，轻率地断定捷克人差不多已被日耳曼化了，捷克人作为一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其次，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我在演说中所指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而仅仅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并且我当时认定（现在继续认定）：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没有提供各个民族和各种民族语言的融合所必需的条件，相反地，这个时期为以前受沙皇帝国主义压迫而现在被苏维埃革命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民族的复兴和繁荣造成有利的环境。

最后，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你们忽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的巨大差别，因而不了解斯大林演说的含义，结果就陷入了你们自己的错误的迷宫。

现在来看一看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各个民族

消亡和融合的几个论点。

请看从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引用的列宁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不知为什么在你们的信中没有全部引证出来：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 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必然的融合。”（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五页至第一三六页）

请看列宁的另一个论点，这也是你们没有全部引证出来的。

“只要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那末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策略的统一所要求的不是消除多样性，不是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加以正确的变更，使这些原则正确地适应并且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二页）

应当指出，这段引文是从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摘引来的，这本书是在一九二〇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以后**出版的。

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列宁不是把民族差别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时期，就是说，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

其次，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列宁认为把民族差别消亡的过程

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在我们国家内胜利时期的企图是“可笑的幻想”。

此外，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所发表的演说中否定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在我们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消亡的可能性是绝对正确的，而你们坚持一种和斯大林的论点完全相反的意见是绝对错误的。

最后，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你们把社会主义胜利的两个不同的时期混淆起来是不了解列宁，歪曲列宁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路线，因此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背离列宁主义的道路。

如果认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刚刚失败以后，可以用所谓从上面下命令的方式一下子实现民族差别的消灭和民族语言的消亡，那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企图用从上面下命令的办法，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各民族的融合，——这就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断送民族解放事业，葬送组织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团结的事业。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同化政策。

你们当然知道，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

此外，大家知道，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的稳定性以及对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所有同化主义者中最残酷的一种）蹂躏和摧残巴尔干各民族达几百年，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消灭这些民族，反而不得不投降了。沙皇俄国的俄罗斯化主义者和普鲁士德国的日耳曼化主义者，其残酷几乎不亚于土耳其同化主义者，他们摧残和蹂躏波兰民族有一百多年，正如波斯和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摧残、蹂躏和戕害阿尔明尼亚民族和格鲁吉亚民族达几百年一样，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消灭这些民族，反而也不得不投降了。

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以便从世界帝国主义刚刚失败以后民族发展的观点来正确地预见事变可能的进程。

如果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将是民族和民族语言消亡的开始，将是统一的共同语言形成的开始，那是错误的。相反地，在第一个阶段民族压迫将被彻底消灭，这个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将是确立各民族平等权利的阶段，将是消灭民族互相猜疑的阶段，将是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国际联系的阶段。

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这是为了交际的便利，为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合作的便利。总之，在这个阶段民族语言和民族间共同的语言将平行地存在。可能是这样：最先形成的将不是一个一切民族共同的、具有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经济中心，而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只有在这以后，这些中心才会联合为一个共同的、具有一切民族的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

在我看来，各民族的未来的大致的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

四　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

你们的错误之一在于：你们不是把民族问题看做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从属于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而是看做某种独

立自在的和永恒的、在历史进程中基本上不变更自己的方向和性质的东西。因此，你们看不见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所看到的东西，这就是：民族问题并不是始终具有同样的性质，民族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依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变更的。

这一点在逻辑上也就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你们如此轻率地把革命发展的各不相同的时期混为一谈，搅在一起，不懂得在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变化会引起民族问题的性质和任务的相应的变化，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要随之而改变，因此，不能把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和革命发展某一时期相联系的政策同这个时期硬行分开，而随便搬到另一个时期。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出发点始终是下面这个原理：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在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民族问题具有和各该历史时期的革命性质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任务，因此，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就随之而改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时期，历史在俄国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当前的任务，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把民族问题的解决和俄国民主变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党认为：推翻沙皇制度，消灭封建残余并实现国家完全民主化，就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办法。

党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就是如此。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名论文就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写道：

“……我肯定地说：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一般地还有解决民族问题的可能，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顺便举了瑞士做例子。”（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二十三页）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小册子也是属于这个时期的，

在这个小册子中也写道：

“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消除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在后一个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个帝国主义联盟间的长期战争摧毁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威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达到了极点，殖民地和附属国也随同“宗主国”的工人阶级加入了解放运动，民族问题转变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开始变为实际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因而成了当前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能满足于前一时期的政策，他们认为必须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变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党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帝国主义军队从殖民地和附属国境内驱逐出去并保证殖民地和附属国有分离和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消除民族仇视和民族主义并巩固各族人民间的国际联系，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和在这个基础上树立各族人民间兄弟般的合作，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条件下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最好办法。

党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就是如此。

这个时期还远没有充分显示自己的力量，因为它才刚刚开始，可是毫无疑问，它将表现出自己的决定作用……

应当单独提出我国革命发展的目前时期和党的当前政策的问题。

应该指出：我国暂时还是决心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的**国家。而且它实际上已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尤其是社会主义**在一**

切国家内的胜利，暂时还是很远的事。

其次，应该指出：我们既然推翻了早已摈弃自己的旧民主主义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权，也就附带地解决了“国家完全民主化”的任务，消灭了民族压迫制度和实现了我国各民族的权利平等。

大家知道，这些办法是消灭民族主义和民族仇视、确立各族人民互相信任的最好的方法。

最后，应该指出：民族压迫的消灭已经导致我国先前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复兴，它们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我国各族人民友好的民族间的联系的巩固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合作的建立。

必须记住：这些复兴起来的民族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旧式民族的废墟上产生的、劳动群众的国际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

因此，党认为必须帮助我国各个已经复兴的民族完全站立起来，振兴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兴办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剧院和其他文化机关，使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国家的、经济的机关民族化，就是说，使这些机关在人员成分上是本民族的，培养本民族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制裁所有那些企图阻挠党的这种政策的分子（固然人数不多）。

这就是说，党支持而且将来也要支持我国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党将鼓励巩固我国各个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的事业，党将保护和捍卫这个事业而反对所有一切反列宁主义的分子。

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你们不赞成我们党的这种政策。第一、这是因为你们把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和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混淆起来，不懂得我们新式苏维埃民族的民族文化按内容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第二、这是因为——请原谅我不客气——你们在列宁主义问题方面很蹩脚，并且对民族问题了解很差。

请你们至少注意一下下面这个粗浅的道理。我们都在讲我国有进

行文化革命的必要。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而不是夸夸其谈，那末在这方面至少必须实现第一个步骤：首先使初等教育成为不分民族的全国公民的义务教育，然后中等教育也如此。显然，不这样做，我国任何的文化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所谓文化革命了。而且不这样做，我国就既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真正高涨，也不会有可靠的国防。

但是，既然我国文盲的比例还很高，我国许多民族中文盲竟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那末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为此必须在全国建立稠密的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网，供给精通本民族语言的教师干部。

为此必须使所有的管理机关，从党的和工会的机关到国家的和经济的机关都民族化，就是说，使这些机关在人员成分上是本民族的。

为此必须兴办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报刊、剧院、电影院和其他文化机关。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使用本民族语言呢？这是因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巨大的进步。

既然如此，我认为就不怎么难以了解：列宁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除了我国现行政策以外，不能实行任何别的政策，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继续做列宁主义者的话。

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吧，就在这里结束。

我想，我已经答复了你们所有的问题和疑问。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

第一次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237—252 页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上的演说）[①]（速记记录）
（一九二九年四月）

同志们！我不想谈到个人因素，虽然在布哈林集团某些同志的演说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谈，是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谈的。布哈林谈到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读了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昨天在私人关系上还是朋友，现在却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了。乌格兰诺夫和托姆斯基的演说也流露出这种口气。他们说，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可是突然彼此之间发生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

我认为所有这些怨言和号叫是一个破钱都不值的。我们不是家族集团，不是私人友谊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决不容许把私人友谊的利益摆在事业的利益之上。

同志们，如果我们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我们**老**，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老布尔什维克所以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老**，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永远年轻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离开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颓废和堕落了，即使他活到一百岁，他也没有权利称为老布尔什维克，他也没有权利要求党尊敬他。

其次，决不能把私人友谊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常言道，友谊是友谊，公事是公事。我们都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如果私人友谊

———————————————

① 在这篇演说中补进了当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的三十多页原文。——编者注

的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冲突，那就应该把私人友谊放在次要地位。作为布尔什维克，我们只能这样提出问题。

我也不想谈到布哈林反对派某些同志的演说中所夹杂的那些对个人的暗示和隐约的责备。看来这些同志想用暗示和双关语来掩盖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政治基础。他们想用政客手腕来代替政治。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托姆斯基的演说。他的演说是企图用政客手腕代替政治问题的工联主义政客的典型的演说。但是，他们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的。

现在我们来谈本题。

一 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

我们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还是有两条路线，——同志们，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发表的演说中说，总路线我们只有一条，如果说我们有某些“不大的”意见分歧，那末这是因为在对总路线的了解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这样说对不对呢？可惜不对。不但不对，而且和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了解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那末，为什么布哈林跑到以加米涅夫为首的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去，企图和他们组织派别联盟来反对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呢？布哈林在那里说中央的路线会“招致灭亡”，说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党中央有原则性的分歧，说必须彻底更换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末，为什么布哈林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勾结起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呢？为什么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这件

事上支持他呢？

如果总路线是一条，那末，怎么能设想遵循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陷害遵循同一条总路线的另一部分委员呢？

难道能够设想，在存在着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情况下会有这种倒戈政策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末，布哈林一月三十日的那个彻头彻尾反对中央及其总路线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末，三人团（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二月九日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在这个宣言中厚颜无耻地对党进行粗暴的诬蔑，责备党（甲）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乙）实行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丙）实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

也许这些宣言已经不复存在于世了？也许这些宣言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了？也许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经同意收回这些无疑是错误的和反党的宣言了？那就让他们公开老实地告诉我们吧。那时大家就会明白，我们的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了解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想这样做。不但不想这样做，而且也不打算在将来撤销他们的宣言，他们声称将继续坚持他们在这些宣言中所陈述的观点。

既然如此，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究竟在哪里呢？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集团看来又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实行这种会招致灭亡的政策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吗？这真是胡说八道。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反对派看来又是培植官僚主义，那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吗？这真是无稽之谈。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反对派看来又是瓦解共产国际，那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瓦解共产国际而不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斗争吗？怎么能相信这种荒谬的话呢？

不是的，同志们，李可夫说我们有一条共同的路线，这话是不大对头的。不管怎样，如果看看刚才所说的布哈林集团在宣言和行动方面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有一条共同路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有共同的总路线的情况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一贯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屡次决议，在党内实行怠工达半年之久，难道这是可以设想的吗？如果我们确实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那末，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竭力实行的这种瓦解性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实行辞职政策的例子。例如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一部分同志要求改变党的政策，拒绝担任委托给他们的职务。大家知道，当时他们实行辞职政策的理由是要求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我们党中央实行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政策。但是，当时的辞职政策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的根据是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其中一条路线主张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另一条路线主张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共同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布哈林反对派一方面宣称总路线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实行从十月革命时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里抄袭来的辞职政策，那就丝毫不合逻辑了。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路线是一条，那末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辞职政策就是不可理解和无法解释的；或者我们的路线是两条，那末辞职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释的。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末政治局中的三人团（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认为在政治局通过关于五年计划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提纲时可以**弃权**的事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的总路线是一条，而一部分同志在经济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竟放弃了表决权，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不，同志们，世界上是不会有这种怪事的。

最后，如果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了解上有细微的差别，那末，为什么布哈林反对派的同志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同意接受政治局委员会在今年二月七日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呢？这个和解方案给布哈林集团指出了一条完全可以接受的出路，使他们能够摆脱他们自己所陷入的绝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下面就是大多数中央委员在今年**二月七日**提出的和解方案的原文：

“从委员会内部交换意见中查明：

（一）布哈林承认和加米涅夫谈判是政治错误；

（二）布哈林承认，他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他在激烈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

（三）根据这一点，布哈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四）布哈林不再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

（五）因此，布哈林收回他在一月三十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一切文件 （演说的速记记录等等）。

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

报’主笔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

如果我们的路线确实是一条，只是我们在了解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末，为什么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绝这个和解方案呢？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应当竭力抓住政治局向他们提出的这个和解方案，以便消除党内的紧张局面，造成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的环境，这难道很难理解吗？

有人谈到党的统一，谈到政治局内的集体工作。但是，谁想达到真正的统一并重视工作的集体性，谁就应当接受这个和解方案，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究竟为什么拒绝这个和解方案呢？

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那末天地间既不会有二月九日的三人团宣言，也不会有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绝中央政治局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的事，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不，同志们，如果看看上面所说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你们所说的有一条共同路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可见实际上我们不是一条路线，而是两条路线，其中一条是中央的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

李可夫在他的演说中说我们的总路线是一条，这是说谎。他想以此掩饰他自己的那条不同于党的路线的路线，以便暗中破坏党的路线。机会主义的政策正是在于抹杀意见分歧，掩盖党内的真实情况，掩饰自己的立场，使党不能把问题完全弄清楚。

机会主义需要这样的政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用路线一致的空谈做掩护，而在实际上执行它自己的那条不同于党的路线的路线。李可夫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中就是采取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

不妨听一听列宁同志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对一般机会主义者所做的评定。这个评定对我们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的一般意义，而且是

因为它对李可夫完全适用。

列宁关于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这样说的：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现代一切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之间像黄颔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改、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三七三页）

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的面目，他们害怕明确性和肯定性，力图掩盖事物的真实情况，抹杀党内真正的意见分歧。

是的，同志们，应当善于正视现实，不管现实多么令人不愉快。如果我们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就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同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不怕真理，不怕正视真理，不管真理多么令人痛苦。而现在的真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

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二　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我们的意见分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们是和什么有关的呢？

它们首先是和最近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阶级变动

问题有关的。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带有偶然性。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是在最近发生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造成了发展中的转变。

布哈林集团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看不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看不见而且不愿意看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了解党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而这种不了解就成了布哈林反对派的特征。

布哈林反对派的领导者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中完全避开了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问题，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甚至丝毫没有暗示一下我们的意见分歧正是和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关的。同志们，这一点你们是否注意到了呢？他们无所不谈，既谈哲学，又谈理论，但是对于决定当前我们党的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那些阶级变动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也许是因为健忘？当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记主要东西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和不了解目前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新的革命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主要东西，忽略了政治家没有权利忽略的阶级变动。正因为如此，布哈林反对派在我们党的新任务面前就显得张皇失措和束手无策。

请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内最近的一些事件。请你们回想一下最近党因为我们国内发生新的阶级变动而提出的那些口号。我说的是这样一些口号：**自我批评**的口号，加强**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清洗苏维埃机关**的口号，**培养新的经济工作干部和红色专家**的口号，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口号，**向富农进攻**的口号，**降低产品成本**和彻底**改进工会实际工作**的口号，**清党**的口号等等。有些同志觉得这些口号令人胆颤心惊，头晕眼花。可是很明显，这些口号是当前党最迫切最需要的口号。

最初，我们因为沙赫特事件而重新提出了新的经济工作干部的问题，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红色专家来代替旧专家的问题。

沙赫特事件表明了什么呢？沙赫特事件表明了：资产阶级还远没有被消灭，他们对我国经济建设正在组织而且以后还会组织暗害活动，我们的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一部分党组织忽略了我们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因此必须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来巩固并改善我们的组织，提高并加强我们组织的阶级警惕性。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评**口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我们各个组织的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就不能改善我们的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就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和镇压资产阶级暗害活动的工作向前推进。暗害活动不仅在煤矿区，而且在金属生产方面，在军事工业方面，在交通人民委员部内，在金铂工业等等方面，都曾经发生并且继续在发生，这是事实。因此就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

其次，由于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由于富农进行反对苏维埃价格政策的发动，我们着重提出了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向富农进攻、对富农和富裕分子使用强迫手段收购粮食的问题。

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表明了什么呢？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表明了：富农并没有打瞌睡，富农在发展，他们在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而我们的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不是看不见敌人，就是迁就敌人，不和敌人作斗争。

因此就再一次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提出了检查和改善我们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一般收购机关的口号。

再其次，由于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工业和农业的新任务，就产生了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加强劳动纪律、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等等口号。这些任务要求重新审查工会和苏维埃机关的全部实际工作，彻底活跃这些组织，并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因素。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反对工会和苏维埃机关里的官僚主义的口号。

最后，关于清党口号的问题。如果以为不砥砺党本身就可以巩固我们的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就可以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恶习，那就可笑了。毫无疑问，官僚主义分子不仅生活在经济组织、合作社组织、工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里，而且生活在党组织里。既然党是所有这些组织的领导力量，那末很明显，清党是彻底活跃和改善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必要条件。因此就提出了清党的口号。

这些口号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们自己可以看出，这些口号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一条叫做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不可分割的链条上的不可缺少的环节**。

这些口号首先是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业的时期有关的。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向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实行全线进攻。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向建成社会主义方面前进的一个极大的进展。但是为了进行这种改造，必须首先提高和加强经济、苏维埃、工会、党以及合作社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必须砥砺我们的一切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脏东西，必须提高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这些口号是和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进攻的事实有关的。决不能认为所谓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还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这种暗害活动所以危险，尤其是因为它和国际资本有联系。资产阶级的暗害活动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分子还远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

至于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那更不能认为已经继续了一年多的富农反对苏维埃价格政策的发动是偶然的。很多人至今还不能解释为什

么富农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自发地拿出粮食，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不再自发地拿出粮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过去富农还比较软弱，没有可能认真安排自己的经济，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余粮运到市场上去；而现在，经过连年丰收，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已经积蓄了必要的资本，于是他们就有可能在市场上玩弄手腕，就有可能把粮食这种宝中之宝囤积起来作为自己的后备，而宁愿把肉类、燕麦、大麦以及其他次要农产品运到市场上去。现在希望富农会自愿地拿出粮食是可笑的。

这就是现在富农抗拒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根源。

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可是要击破阶级敌人的抵抗并为社会主义的前进扫清道路，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砥砺我们的一切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提高这些组织的干部，并动员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村劳动阶层群众去反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

我们党目前的口号就是在这种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变动也应当这样说。如果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没有变化，那就可笑了。如果断言稳定日益巩固，日益坚牢，那就更可笑了。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稳定每月每日都在毁坏着，动摇着。争夺国外市场和原料的斗争的尖锐化，军备的扩充，美英之间对抗的加剧，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左倾，欧洲各国罢工和阶级搏斗时期的到来，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正在增长。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和它的“左”翼作斗争

的任务，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作斗争的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影响的代理人。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的隐蔽所。

由此就产生了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口号。

由此就产生了共产主义在工会中的所谓新策略。

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些口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懂得：不实现这些口号，就不能准备无产阶级群众去进行新的阶级战斗，就不能战胜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挑选出能够率领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领袖。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我们党目前在对内政策方面和在共产国际方面的口号就是在这些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党看到了这些阶级变动。它了解新任务的意义并动员力量去解决这些任务。所以它可以有充分准备地应付事变。所以它不怕摆在它面前的困难，因为它对克服困难已经有了准备。

布哈林集团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这些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正因为他们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所以他们总是表现张皇失措，他们总是准备逃避困难，在困难面前退却，放弃阵地。

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河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

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使自己的队伍精神沮丧：“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大笑）

布哈林集团的方针和行动同在困难面前张皇退却的第二种渔夫的方针和行动一模一样，这还用得着证明吗？

我们说，欧洲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正在成熟，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同共产党内的右倾作斗争，把右倾分子驱逐出党，加紧同掩护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加紧同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作斗争等等。可是布哈林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布哈林进行“恶意攻击”。

我们说，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和加强企业中的劳动纪律，要实现这些任务，非根本改变工会的全部实际工作不可。可是托姆斯基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托姆斯基进行“恶意攻击”。

我们说，国民经济的改造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同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清除这些机关里的腐化分子、异己分子和暗害分子等等。可是李可夫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李可夫进行“恶意攻击”。

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除了自己的肚脐以外，看不见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布哈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不见新的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正因为他们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所以他们不得不做事变的尾巴，在困难面前低头。

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三　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

我已经说过，布哈林看不见和不了解新的革命高潮的日益增长的条件向共产国际提出的把右倾分子驱逐出共产党、制止调和态度并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新任务。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完全证实了这种情况。

这方面的意见分歧是从什么事情开始的呢？

是从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开始的。通常，提纲都是预先经过联共（布）代表团审查的。可是这一次没有遵守这个条件。于是由布哈林签署的提纲在送交联共（布）代表团的同时也分发给了出席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但是提纲中的许多条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这个提纲提出了大约二十处的修正。

这种情况使布哈林的处境有些尴尬。但这是谁的过错呢？布哈林为什么不经联共（布）代表团审查就把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呢？既然提纲不能令人满意，联共（布）代表团能够不提出修正吗？结果弄成了这样：联共（布）代表团实际上等于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新提纲，各国代表团就把它和布哈林签署的原来的提纲对立起来。很明显，如果布哈林不急于把自己的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就不会有这种尴尬的处境了。

我想指出联共（布）代表团对布哈林的提纲所提出的四个主要修正。我所以想指出这几个主要修正，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性质。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性质问题。照布哈林的提纲说来，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相反地，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并且基本上相当**巩固**。很明显，对所谓第三个时期，即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做这样的估计是联共（布）代表团不能同意的。所以不能同意，是因为保留对第三个时期的这种估计会使我们的批评家得到藉口，说我们采取了所谓资本主义“恢复健康”的观点，即希

法亭的观点，即我们共产党人所不能采取的观点。因此，联共（布）代表团提出了修正，从修正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而且不可能是巩固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这种稳定正被事变的进程动摇着，而且以后还会被动摇。

同志们，这个问题对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具有决定的意义。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在动摇着还是在巩固着，——共产党在日常政治工作中的全部方针都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我们现在是处在革命运动低落的时期即单纯聚集力量的时期，还是处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时期即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阶级战斗的时期，——共产党的策略方针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联共（布）代表团所提出而后来为代表大会所采纳的修正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提出了以第二种前途即以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前途为依据的明确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在布哈林的提纲中说，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基本任务之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须强调和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左”翼作斗争的问题，就是这个“左”翼玩弄“左的”词句并以此巧妙地欺骗工人，从而阻碍工人群众离开社会民主党。很明显，不粉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战胜整个社会民主党。可是在布哈林的提纲中，关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竟完全没有谈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此，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调和态度问题。布哈林的提纲中说到必须和右倾作斗争，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当我们向右倾宣战的时候，右倾分子总是装扮成调和分子，使党陷于困难的境地。为了防止右倾分子玩弄这种手腕，必须提出坚决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

因此，联共（布）代表团认为必须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布哈林的提纲中没有提到必须在共产党内保持铁的纪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缺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加紧和右倾作斗争的时期，在贯彻清除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口号的时期，右倾分子总是组成派别，建立他们自己的派别纪律，违反和破坏党的纪律。为了使党不致受到右倾分子的派别袭击，必须提出党的铁的纪律和党员无条件服从这个纪律的问题。否则就根本谈不到和右倾进行严重斗争。因此，联共（布）代表团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了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第六次代表大会采纳了。

我们能不能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这些修正呢？显然不能。古时候有人关于哲学家柏拉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爱柏拉图，但是我们更爱真理。关于布哈林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爱布哈林，但是我们更爱真理，更爱党，更爱共产国际。因此，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这些修正。

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第一阶段**。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二阶段是和所谓维托尔夫和台尔曼事件有关的。维托尔夫是汉堡党组织的前任书记，被控盗用党的经费，因此被开除出党。虽然台尔曼同志和维托尔夫的罪行毫无关系，但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分子竟利用维托尔夫接近台尔曼同志这一点，把维托尔夫事件变成了台尔曼事件，并开始来推翻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你们大概已经从报刊的报道中知道，调和分子爱维尔特和黑尔哈特当时竟能暂时把德国共产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拉到自己方面去反对台尔曼同志。结果怎样呢？他们解除了台尔曼的领导职务，诬告他营私舞弊，并且没有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得到它的批准就公布了“相应的”决议。

由此可见，他们不但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和调

和态度作斗争的指示，不但没有和右倾以及调和态度作斗争，实际上反而极粗暴地违反了这个指示，和德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进行斗争，和台尔曼同志进行斗争，以便在德国共产党的队伍里**掩护**右倾并**巩固**调和派的地位。

而布哈林不但不去掉转船舵，扭转局势，不但不去恢复被违反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的效力，叫调和分子守规矩，反而在他的一封人所共知的信里建议**批准**调和分子的篡夺行为，把德国共产党交给调和分子，再一次在报刊上诬蔑台尔曼同志，再一次宣布台尔曼同志有过错。这就叫做共产国际的“领导者”！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领导者”吗？

中央讨论了布哈林的建议并把它否决了。这当然是布哈林所不喜欢的。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并不是要人们去违反它，而是要人们去执行它。既然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向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宣布斗争，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在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基本核心手中，而调和分子爱维尔特和黑尔哈特却想推翻这个决议，那末布哈林的职责就是叫调和分子守规矩，而不是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让给他们。这是布哈林的过错，因为他“忘记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三阶段是和反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的问题，和粉碎布兰德勒与塔尔盖麦的派别组织并把这个派别组织的首领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关的。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对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是：他们总是避不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实质上这是决定德国共产党的命运的问题。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知道这一点，但总是阻挠这件事，一贯避不参加有关机关的会议。为了什么呢？大概是为了既在共产国际面前又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面前都不失为“洁白君子”。为了以后可以说：“把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麦开除出共产党的并不是我们布哈林派，而是他们大多数中央委员。”这就叫做和右

倾危险作斗争！

最后，**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是和布哈林在中央十一月全会前提出的要求有关的。他当时要求从德国召回奈依曼，要求叫台尔曼同志守规矩，说台尔曼同志似乎在一次演说中批评了布哈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布哈林的要求，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实布哈林的要求是对的。布哈林答应提出控诉奈依曼和台尔曼的文件。可是他什么文件也没有提出来。他不但没有提出文件，反而把洪别尔－德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表的一篇人所共知的演说分发给联共（布）代表团团员，而这篇演说正是后来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评定为机会主义演说的。布哈林把洪别尔－德罗的演说分发给联共（布）代表团团员，并把它推荐为控诉台尔曼的材料，想证实他要求召回奈依曼和要求叫台尔曼同志守规矩是正确的。实际上他却以此证明了他是赞同洪别尔－德罗的，而洪别尔－德罗的立场是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看做机会主义立场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几点主要的意见分歧。

布哈林认为，我们同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消除德国共产党内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传统，把布兰德勒分子和塔尔盖麦分子开除出党，就是“瓦解”共产国际，“毁灭”共产国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强调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就是巩固共产国际，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帮助各国共产党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因为党是靠清除自身的腐朽物而巩固起来的。

由此可见，这不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之间单纯看法上的细微的差别，而是在共产国际政策的根本问题上的相当严重的意见分歧。

四　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

上面我已经说过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我说过布哈林集团患了盲目症，看不见这些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我说过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布哈林反对派的张皇失措，害怕困难，准备向困难低头。

决不能说布哈林派的这些错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恰恰相反，这些错误是和已经过去的那个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发展阶段有关的，当时的建设是通过和平道路进行的，也可以说是自流地进行的，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阶级变动，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和旧时期即恢复时期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它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斗争方式，重新部署我们的力量，改善并巩固我们的一切组织。

布哈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还过着旧生活，他们看不见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不了解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的必要性。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盲目症，张皇失措，在困难面前惊惶不安。

一、阶级斗争问题

布哈林集团的这种盲目症和这种张皇失措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种盲目症和这种张皇失措的理论基础就是布哈林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我指的是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指的是他不了解在无产阶级

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诀窍。

有些人在这里屡次引证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那段人所共知的话。但是在这里引证这段话时有一些遗漏。让我把这段话全部引证出来。同志们，为了说明布哈林已经远远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做是必要的。

请听吧：

“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①

有些同志在引证布哈林书中的这段话时不知为什么把最后一句关于承租企业家的话遗漏了。罗季特大概想给布哈林帮忙，就利用这一点在这里从座位上叫喊起来，说人家曲解了布哈林的意思。可是这整段引文的要点正是在于最后一句关于承租企业家的话。因为既然把承租企业家和富农相提并论，而富农又长入社会主义，那末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不仅富农，而且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大笑）

这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罗季特：布哈林说的是“异类”。

斯大林：布哈林说的不是“异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所以，富农和承租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异类。布哈林的错误正是在于他认为富农和承租企业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但还是会长入社会主义的。

请看布哈林的理论弄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城乡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都长入社会主义，——请看布哈林说出了多么愚蠢的话。

不，同志们，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让布哈林自己把它拿去吧。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现在，按照布哈林的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罗季特：这样说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预定要有的。

斯大林：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

罗季特：问题就在这里。

斯大林：但是照布哈林说来，资本家会长入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罗季特，你怎么不了解这一点呢？如果城乡资本家会长入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那末，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进行斗争呢？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采取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呢？

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但是既然城乡资本家，既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会长入社会主义，那末，一般说来是否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呢？如果需要，那是为了镇压哪一个阶级呢？

罗季特：问题就在于布哈林所说的长入是预定要有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我看罗季特已经发誓要为布哈林效劳了。但是他的效劳像熊的效劳一样，因为他本来想救布哈林，事实上却把布哈林沉到水底了。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①]（哈哈大笑）

——————————————

① 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描写熊为隐士效劳，用大石头驱除隐士头上的苍蝇，结果反把他打死。——译者注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没有这种利益的对立性，那就只有宣布阶级利益的协调。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或者是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或者是**阶级利益协调的理论。

布伦坦诺或悉尼·维伯之类的“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那还可以理解，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可是，一个想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同时鼓吹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

布哈林在他的演说中企图引用列宁的一段有名的话来证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同时他硬说列宁所说的和布哈林所说的**一样**：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对列宁的粗暴而不可容忍的诬蔑。

下面是列宁这段话的原文：

“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四四页）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讲到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这里只说到我们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工人和农民的合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认为耐普曼有长入社会

主义的可能呢？当然不是。只有不知羞耻的人才会这样解释列宁的这段话。这只是说，我们**现在**不消灭资产阶级，我们**现在**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而容许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所谓一定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这些法律是要不断限制资本家并逐步把他们从国民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的。

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能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柢呢？不，不能。

依靠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不能消灭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培植阶级并使阶级永久存在，因为这个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的。

而列宁的这段话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根据的。

在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列宁的专政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布哈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恰恰相反，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

列宁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像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九页）

关于消灭阶级，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

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

这两个公式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由此可见，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它是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的理论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

有人会说，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值得多谈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说出了——不仅说出了，而且喊出了——布哈林的错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当这个理论搁着不用的时候，还可以不去理它：在各种各样的同志的作品中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蠢话！直到最近我们都是这样处置的。可是最近情况变了。近几年来嚣张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已经开始鼓舞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具有现实的性质了。现在已经不能说它是搁着不用的了。现在布哈林的这个奇怪理论妄图成为我们党内右倾的旗帜，成为机会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已经不能忽视这个理论。因此，我们必须粉碎这个不正确的和有害的理论，使我们的党员同志便于和右倾作斗争。

二、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

布哈林从他的第一个错误中产生出来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对资本主义分子加紧反抗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资本主义分子比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快，因而他们就加紧进行反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呢？不，这里说的不是这个。并且，说资本主义分子比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快是不对的。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已经濒于毁灭了。

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正在胜利地进攻资本主义分子，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正在**下降**，正因为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资本主义分子才感觉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进行反抗。

资本主义分子所以暂时还能够加紧进行反抗，不仅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援助他们，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他们的相对增长和社会主义的增长比较起来虽然在减低，但他们的绝对增长还是有的，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蓄力量来抵抗社会主义的增长。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在目前这种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加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个简单明白的真理。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以庸人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企图用各种偶然的原因来解释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例如：苏维埃机关“不中用”，地方同志执行政策“不谨慎”，“缺乏”灵活性，“过火行为”等等。

请看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他完全是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

“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而且这种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例如富农或者靠剥削别人发财并钻进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人刺杀农村通讯员，——这就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这是不对的，因为最尖锐的斗争形式是暴动。——斯大林注）。可是，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地方苏维埃机关还软弱无力的地区。十分明显，**随着这种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下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农村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①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这样说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是在机关方面，是在我们的下层组织中用还是不中用，软弱还是强有力。

这样说来，例如沙赫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这是资产阶级分子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一种形式，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种形式）并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增长，而是由于我们的机关不中用。

这样说来，在沙赫特区发生大规模暗害活动以前，我们的机关是好的，而后来在发生大规模暗害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机关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变成毫不中用的了。

这样说来，在去年以前，当粮食收购工作还在自流地进行，我国阶级斗争还没有特别尖锐化的时候，我们的地方组织是好的，甚至是理想的，而从去年起，当富农的反抗采取了特别尖锐的形式的时候，我们的组织突然就变成不好的、毫不中用的了。

这不是解释，而是嘲弄解释；这不是科学，而是巫师说鬼话。

这种尖锐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生活：是我们把他们资本家打倒，如列宁所说的和他们做一次最后决战，还是他们把我们打倒。

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所以暂时还能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他们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城乡小资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每日每时都从自己中间分泌出大小资本家来，而这些资本主义分子会采取一切办法来卫护自己的生存。

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不管我们的下层苏维埃机关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的。

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就在这里。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资本家反抗的加紧和资本家比重的增长混同起来了。这样混同起来是毫无根据的。所以没有根据，是因为资本家进行反抗决不是意味着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垂死的阶级进行反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他们增长得快，他们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反抗。

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家进行反抗的原因就在这里。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那末党的政策应当怎样呢？

党的政策应当是唤起工人阶级和农村被剥削群众，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加强他们的动员准备，以便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以便和正在进行反抗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布哈林的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见解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

三、农民问题

布哈林的第三个错误是在农民问题上发生的。大家知道，农民问题是我们政策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的条件下，农民是由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即由贫农、中农和富农组成的。很明显，我们对这些集团的态度不能是一样的。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这就是我们对这些社会集团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尽人皆知的。

可是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有些不同。在他说明农民的特征的时候，农民分化的事实不见了，存在着几个社会集团的事实也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叫做农村的灰色斑点。在他看来，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他在这里演说时也就是这样说的，他说：难道我国的富农可以叫做富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布哈林在这里说：我国的中农难道像中农吗？这不过是挨饿的穷人罢了。很明显，对农民的这种看法是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根本错误的看法。

列宁说过，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这个原理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做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

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工农联盟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和农民的**任何一种**联盟，而只是建立在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的**那种联盟**。

由此可见，列宁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论点不但不

和工农联盟的思想相矛盾，反而给这个旨在反对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反对农村中农民资本主义分子的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农民的联盟提供了根据。

列宁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指明工农联盟只有建立在和农民本身所分泌出来的那些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巩固的。

布哈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和不接受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忘记了农村中的社会集团，在他的视野中富农和贫农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清一色的中农群众。

这种情况表明了布哈林的毫无疑义的右倾，这种右倾和“左”倾即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相反，“左”倾除了贫农和富农以外看不见农村中的其他社会集团，中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和农民联盟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集团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和中农群众建立**巩固**联盟的政策，而布哈林集团则**主张**和全体农民建立**任何一种**联盟。用不着证明，这两种立场都是不正确的，一个是半斤，一个是八两。

列宁主义无疑主张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盟，即主张和中农建立联盟，但不是主张建立任何一种联盟，而是主张和中农建立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

列宁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协议是可以随便了解的。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这种协议只有当它拥护工人阶级专政而且成为消灭阶级的一种手段的时候，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原则上可能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工人阶级和农民成立协议的公式，当然就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和工人阶级专政的一切敌人所主张的公式。”（“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八二页）

其次：

列宁说：“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并领导着政权。它领导

着农民。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适应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陷入那些现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最凶恶敌人的小资产者的营垒，即陷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营垒。”（“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九六页）

这就是列宁对于和基本农民群众联盟即和中农联盟问题的看法。

布哈林集团在中农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中农的两重性，看不见中农介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两重地位。列宁说，“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为什么呢？因为中农一方面是劳动者，这就使他和工人阶级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这就使他和富农接近。由此就产生了中农的动摇。这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这种动摇也是每日每时都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

列宁说：“农民作为劳动者，他倾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他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倾向于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九页）

因此，和中农的联盟只有当它的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时候，只有当它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并促进消灭阶级的时候，才能是巩固的。

布哈林集团忘记了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

四、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

布哈林的第四个错误是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发生的。布哈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看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方面，只看见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我们在一九二一年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是把它的锋芒指向战时共产主义，指向排斥**任何**私人贸易自由的制度和秩序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容许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这一方面布哈林记住了。这是很好的。

但是，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有这一方面，那就错了。布哈林忘记了新经济政策还有另一方面。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决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新经济政策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方面。而且新经济政策的这一个方面比它的第一个方面对我们更为重要。在我国市场上没有像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常见的那种自由玩弄价格的现象。粮食价格基本上是由我们规定的。工业品价格是由我们规定的。我们努力实行降低产品成本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以便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这种独特的市场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没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只要新经济政策存在，就应当保存它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另一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取消这两方面中的一方面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会受到“从左边”即从那些想取消**任何**贸易自由的人们方面来的危险。这是不对的。这是极大的错误。而且这种危险现在是最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里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不懂得保持**一定的**贸易自由是完全必要的和适当的。

从右边来的危险，即从那些想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想“解放”市场，从而开辟私人贸易完全自由的纪元的人们方面来的危险要现实得多。毫无疑问，这种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危险现在要现实得多。

不应当忘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是在这方面进行活动，正是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也应当记住，富农和富裕分子的号叫，

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的号叫（我们的许多同志常常受这种号叫的影响），正是从这方面来攻击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看不见破坏新经济政策的这第二种真正现实的危险，这个事实无可怀疑地说明他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屈服了。

布哈林提议使市场“常态化”，按地区“调整”粮食收购价格，即提高粮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不满意苏维埃的市场条件，他想逐渐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提议向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让步。

姑且假定我们听从了布哈林的劝告。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比如说，我们在秋天，在收购初期提高了粮价。但是由于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各种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会用高出两倍的价钱来收买粮食，而我们又不能和投机分子竞争，因为他们总共不过收买一千万普特左右，而我们却要收买几亿普特，所以粮食持有者还是会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待价格继续上涨。这样，到了春天，当国家最需要粮食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再度提高粮价。而在春天提高粮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害了贫农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他们在春天不得不买进粮食，一部分做种子，一部分供消费，而这些粮食就是他们在秋天按照比较低廉的价格卖出去的。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是否就能收到什么显著的效果即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呢？最可能的是得不到，因为总有一些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又会用高出一两倍的价钱来收买这些粮食。于是我们又必须准备再一次提高粮价，徒劳无益地争取赛过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

由此可见，只要一走上提高粮价的道路，我们就必定会继续滚下去，而且没有保证可以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

第一、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我们以后还必须提高农业所生产的原料的价格，以保持各种农产品的一定比价。

第二、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我们在城市里就不能保持低廉的粮食零售价格，因而就必须提高粮食的**售**价。因为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损害工人利益，我们就必须加速提高工资。但是，这样做就不能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因为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就会违反工业化的利益，使资金从城市流入农村。

结果我们就必须不是在**降低**或至少稳定价格的基础上，而是在**提高**粮价和工业品价格的基础上来拉平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采取使工业品和农产品**涨价**的方针。

不难了解，这样“调整”价格不能不弄得完全取消苏维埃价格政策，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这会有利于谁呢？

只会有利于城乡富裕阶层，因为工人阶级以及贫农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是买不起昂贵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占便宜的是富农和富裕分子，是耐普曼和其他富有阶级。

这也是结合，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结合——同城乡富有阶层的结合。工人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将有充分权利来质问我们：我们是什么政权，是工农政权还是富农耐普曼政权？

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常态化”和按地区“调整”粮价的必然结果。

很明显，党不能走这条死路。

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概念是多么混乱，他做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俘虏是多么服贴，——这一点就从他对城乡之间、国家和农民之间新的商品流转形式问题所表现的极端否定的态度中也看得出来。他看见国家成了农民的商品供应者，农民正在成为国家的粮食供应者，就表示愤怒，大肆反对。他认为这是违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规章，几

乎是破坏新经济政策。试问，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

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

农民已经**变成**国营工业所需要的棉花、甜菜、亚麻的供应者，而国营工业已经**变成**这些农业部门的城市商品、种子和生产工具的供应者，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策的观点看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预购的方法在这里是建立城乡之间这些新的商品流转形式的基本方法。难道预购的方法是同新经济政策的要求抵触的吗？

由于采用这种预购的方法，农民不仅在棉花、甜菜、亚麻方面，而且在粮食方面**正在成为**国家的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小宗交易、少量交易可以叫做商品流转，而按照预先就货物的价格和质量订立的合同（预购合同）进行的大宗交易就不能叫做商品流转呢？

城乡之间按照预购的方法进行商品流转的这些新的群众性的形式正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形式是我们各个组织在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大的进步，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布哈林竟不会了解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了。

五、所谓“贡税”问题

布哈林的第五个错误（我说的是他的主要错误），是他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即所谓“贡税”问题上对党的路线进行了机会主义的歪曲。

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一九二九年二月）关

于“剪刀差”问题的著名决议说的是什么呢？决议说的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

农民缴纳的这种超额税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是事实。我们还把它叫做什么呢？我们还把它叫做“剪刀差”，叫做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是否需要采取这种“流入”的办法呢？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迅速发展的速度，采取这种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因为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

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取消这种超额税呢？可惜不能。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取消它。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取消它。

于是，由于“剪刀差”而形成的这种超额税就成了“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不是贡税，而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落后而产生的“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需要这种超额税是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

这是不是说，征收这种额外税我们就是剥削农民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苏维埃政权的本质不容许国家对农民有任何剥削。我们许多同志在七月全会的发言中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苏维埃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剥削农民的，因为劳动农民物质福利的不断提高是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这就排斥了任何剥削农民的可能性。

农民是否担负得起这种额外税呢？是的，担负得起的。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这种额外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征收的。

第二、因为农民有自己的个人经济，个人经济的收入使农民能够缴纳额外税；对于工人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人没有个人经济，虽然

如此，工人却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工业化事业。

第三、因为额外税的数量是逐年减少的。

我们用“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字眼来称呼这种额外税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用这些字眼可以提醒我们的同志：征收这种额外税是令人不愉快的，不是出于本愿的，把它长期保留下去是不可容许的。我们这样称呼加于农民的额外税，是想指出我们征收这种税并不是出于本愿，而是由于需要，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一有可能就尽快取消这种额外税。

关于“剪刀差”问题，关于“流入”问题，关于“超额税”问题，关于在上述文件中被称为“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曾经企图挑剔“贡税”这个字眼，并责备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但是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这是布哈林分子极粗暴地诬蔑我们党的卑鄙企图。现在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默认，他们关于军事封建剥削的胡说是彻底破产了。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布哈林分子承认“剪刀差”和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他们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责备是诬蔑，承认党是完全正确的；

或者他们否认“剪刀差”和“流入”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就请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好让党把他们算入我国工业化的反对者之列。

不管怎样，我可以引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许多演说，在那些演说中他们无条件地承认“剪刀差”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承认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就是承认“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提法。

怎么样，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坚持“流入”的观点，还坚持在目前

保留“剪刀差”的观点呢？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

布哈林：流入是需要的，但“贡税”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大笑）

斯大林：这样看来，**在问题的实质上我们并没有意见分歧**，这样看来，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所谓“剪刀差”，额外税，“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目前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然而是暂时的一种手段。

很好。那末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吵嚷呢？因为他们认为“贡税”这个**字眼**或“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不通用的，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个**字眼**吗？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贡税”这个**字眼**。

同志们，我肯定地说，这个字眼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例如在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早已得到了公认。同志们，这会使一些没有读过列宁著作的人感到奇怪，然而这是事实。布哈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税”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税”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就得到了公认，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或许在布哈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那末，亲爱的同志们，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例如你们就拿列宁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九一八年五月）来读一读下面一段话：

“存有几千小款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无疑希望把这几千小款用在自己身上，反对贫民，反对任何全国性的监督，而这几千小款却给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造成数十亿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一千的价值。再假定说，在我国，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二百落了空。每一个觉

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一千中拿出三百来就能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三百，不是二百，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打破，那末以后减少这种‘贡税’，比如说减到一百或五十，就会是十分容易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〇五页）

看来已经清楚了。能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宣称列宁同志主张对工人阶级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呢？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试试看！

喊声：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用过“贡税”这个概念。

斯大林：你是不是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党呢？你真是一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大笑）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税”，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

有些爱挑剔的人会以为“论‘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的“贡税”这个字眼是列宁同志的失言，是偶然的失言。但是经过检查证明，这些爱挑剔的人的猜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你们就拿列宁同志的另一篇文章（更正确地说是小册子）“论粮食税”（一九二一年四月）来读一读其中的第三二四页（“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六卷第三二四页）。[①]你们可以看到，刚才引证的关于“贡税”那一段话，列宁同志在那里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最后，你们再拿列宁同志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月，“列宁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四四八页）[②]一文来看一看，你们可以看到，列宁在这里也说到“我们因为在组织全民统计和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方面的落后而付出的贡税（已不加引号）”。

————————————

①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一一页至第三一二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二二页。——译者注

由此可见，“贡税”这个**字眼**在列宁的文章中决不是偶然的东西。列宁同志使用这个**字眼**是为了强调“贡税”的暂时性，加强布尔什维克的毅力，以便一有可能就取消工人阶级因为我们的落后，因为我们的“缺点”而付出的这种“贡税”。

由此可见，在用“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说法上，我是和一些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伙的，和列宁同志一伙的。

布哈林在这里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容许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贡税”这个字眼。他说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如果他指的是斯列普柯夫、马列茨基、彼得罗夫斯基、罗季特等等一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那末布哈林的气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与其说像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像自由主义者。如果他指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列宁同志，那末应当承认，“贡税”这个字眼在他们中间早已得到了公认，而不大熟悉列宁著作的布哈林在这里是说错了。

但是“贡税”问题还不限于此。问题在于：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挑剔“贡税”这个字眼而且说起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话来，这并不是偶然的。毫无疑问，他们吵嚷说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是想表示他们对于我们各机关所实行的我们党对待富农的政策的极端不满。对党在领导农民方面的列宁的政策不满，对我们的粮食收购政策不满，对我们的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不满，最后，希望“解放”市场和规定私人贸易完全自由，——这就是布哈林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号叫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我没有看见过责备党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第二个例子。这种反党武器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库里拿来的。那末是从哪里拿来的呢？是从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的武库里拿来的。当立宪民主党人想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先生们，你们是在农民的白骨上建设社会主义。布哈

林对于“贡税”吵吵嚷嚷，就是附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就是做人民公敌的尾巴。

六、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

最后是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城乡结合的新形式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党的经济政策问题方面的**实际**分歧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什么是结合的新形式呢？从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就是说，除了城乡结合的旧形式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的新形式。在旧形式下，工业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花布、鞋子、一般纺织品等等），而在新形式下，工业将满足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农业机器、拖拉机、优良种子、肥料等等）。

过去我们**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很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而现在除了继续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以外，我们还必须尽力供应那些对于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农业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

当问题是**恢复**农业、使农民经营过去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满足于旧的结合形式。可是现在，当问题是**改造**农业的时候，这就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更进一步，需要帮助农民在新技术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

其次，这就是说，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农业。我们正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而且已经重新装备了一部分，为工业奠定了新的技术基础，给工业供给了新的优良机器和新的优秀干部。我们正在建设新工厂，我们正在改造和扩建旧工厂，我们正在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在这个基础上，

城市正在发展，新的工业区正在增多，旧的工业区正在扩大。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正在增长。而农业仍然使用着旧式农具，使用着古老陈旧的耕作方法，使用着原始的、现在已经不适用或几乎不适用的旧技术，采用着旧的、个体小农的经营方式和劳动方式。

例如我国在革命前约有一千六百万农户，而现在至少有二千五百万农户，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不是说明农业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又是说明什么呢？而分散的小经济的特征就在于它无力充分利用技术、机器、拖拉机和农业科学成就，它是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

由此就产生了农产品商品量的不足。

由此就产生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破裂的危险。

由此就产生了使农业跟上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必要性。

要避免这种关系破裂的危险，就必须开始认真地在新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农业。而要重新装备农业，就必须逐步地把分散的个体农户联合为大农庄即集体农庄，必须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建设农业，必须扩大集体经济，必须发展原有的和新建的国营农场，必须有步骤地把预购这种群众性的形式应用到农业的一切主要部门中去，必须扩大帮助农民掌握新技术并使劳动集体化的机器拖拉机站系统，——一句话，必须逐步地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到集体大生产的基础上去，因为只有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成就和新技术，才能一日千里地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当丢开个体贫农中农经济。不，不是这个意思。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在供给工业以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在最近的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必须帮助还没有联合为集体农庄的个体贫农中农经济。

但这是说，单靠个体农民经济**已经**不够了。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必须以全力发展集体经济形式和国营

农场来**补充**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

因此，必须在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和公共的集体经济形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即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全力发展合作社运动，使农民易于把他们的细小的个体经济转上集体劳动的轨道。

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真正发展农业。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使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摆脱破产和贫困。

最后，这是说，必须全力发展我国工业——我国农业生产在改造方面所赖以滋养的主要泉源，必须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必须建设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

无须证明，不通过广泛订立预购合同来把基本农民群众引向集体经营形式，不以大量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等等供给农业，就不能发展集体农庄，就不能发展机器拖拉机站。

但是不加速发展我国工业，就不能以机器和拖拉机供给农村。因此，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是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钥匙。

结合的新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就是这样。

布哈林集团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必要性。但这不过是**口头上的**承认，其目的是要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幌子下偷运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其实布哈林是反对结合的新形式的。布哈林所持的出发点不是迅速发展工业这一改造农业生产的杠杆，而是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使市场“常态化”，容许在农产品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由此就产生了他对集体农庄的不信任态度，他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演说中和他在中央七月全会前提出的提纲中都表现了这种态度。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收购粮食时所采取的一切对付富农的非常措施的否定态度。

大家知道，布哈林躲避非常措施就像小鬼躲避阎王一样。

大家知道，布哈林直到现在还不能了解，富农在目前条件下是不

会自愿地、自发地交出充分数量的粮食的。

这一点现在已经由我们两年来收购工作的经验证明了。

如果商品粮食还是不够，那该怎么办呢？布哈林回答说：不要用非常措施惊扰富农，要从国外输入粮食。就在不久以前，他还提议从国外输入五千万普特左右的粮食，就是说，用大约一亿卢布的外汇输入粮食。如果外汇需要用来输入工业设备，那又怎么办呢？布哈林回答说：应当尽先从国外输入粮食。这显然是要把输入工业设备的事情放在后面。

这样说来，解决谷物问题和改造农业的基础不是迅速发展工业，而是通过自由市场和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来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在内）。

于是我们就有了两个不同的经济政策方案。

党的方案：

一、我们重新装备（改造）工业。

二、我们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改造）农业。

三、为此必须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广泛地订立预购合同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作为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结合**的手段。

四、至于目前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那末必须承认可以采取一些依靠中农和贫农群众共同赞助的临时的非常措施，作为击破富农反抗和从富农手里取得最大限度余粮的一种手段，而这些余粮是避免输入粮食和保存外汇以发展工业所必需的。

五、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在供给国家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但是单靠它已经不够了；因此，必须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加紧发展机器拖拉机站来**补充**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以便易于把资本主义分子从农业中排挤出去，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步引上大规模集体经济的轨道，引上集体劳动的轨道。

六、但是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加紧发展工业，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不然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也不能改造农业。

结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布哈林的方案：

一、使市场“常态化”，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和抬高粮价，即使这样做会使工业品、原料和粮食涨价。

二、相当地减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以便全力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布哈林在七月提出的提纲，布哈林在七月全会上的演说）。

三、以自流的方式收购粮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采取甚至不可以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富农，即使这些措施受到中农和贫农群众的赞助。

四、缺粮时就输入约值一亿卢布的粮食。

五、如果外汇不够，不能同时输入粮食和工业设备，那就应当减少工业设备的输入，也就是说，减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不然我国农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直线下降”。

结论：**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

布哈林的方案是**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破坏**结合的新形式的方案。

我们的意见分歧就是这样。

有时人们问：我们在发展结合的新形式，发展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等方面是不是做迟了呢？

有人武断地说，党在这件事情上至少做迟了两年。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不了解苏联经济情况的“左的”空喊家才会这样说。

在这件事情上做迟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的是预见到建立集体

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那末我们早在十月革命时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还在那时，在十月革命时期，党就已经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并且可以看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过的我们的党纲。那里十分清楚地注意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

但是单靠我们党的领导上层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还不足以实现和组织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可见这里说的不是预见，而是**实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计划。但是要实现这样的计划需要许多条件，这些条件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直到最近才出现的。

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

为了实行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的计划，首先必须使党员**群众**在这方面支持党的领导上层。大家知道，我们党是一个有百万党员的大党。因此，必须说服广大党员群众，使他们相信领导上层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第一。

其次，为此必须在农民中间造成拥护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必须使农民不害怕集体农庄，使他们根据经验相信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优越，而自行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一件需要相当时间的严重事情。这是第二。

再其次，为此必须使国家有一笔为资助集体农庄建设、为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必需的经费。亲爱的同志们，这件事情是需要几亿几亿卢布的。这是第三。

最后，为此必须使工业有相当高度的发展，以便供给农业以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这是第四。

能不能断言我们在两三年以前就已经具备了这一切条件呢？不，不能这样断言。

决不能忘记，我们是**执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在野党可以提出一

些口号（我说的是运动中的根本的实践口号），以求在取得政权后加以实现。谁也不会责备在野党不立刻实现他们的根本口号，因为大家都明白，执政的不是他们在野党，而是别的政党。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政党的口号不是单纯的鼓动性的口号，而是一种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些口号具有**实际决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我们党不能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然后又把它搁置起来不去执行。这样做就是欺骗群众。要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特别是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引上集体制轨道这样重大的口号，就必须具备直接实现这个口号的条件，而且必须创造和组织这些条件。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来说，单靠党的领导上层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还需要具备为立刻**实现**和**贯彻**我们的口号所必需的条件。

比如说在两三年以前，我们的党员**群众**对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是已经有了准备呢？不，他们当时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准备。党员群众向结合的新形式方面的严重转变是从粮食收购方面发生第一批严重困难的时候才开始的。由于发生了这些困难，党员群众才感觉到加速建立结合的新形式，首先是加速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部必要性，并在这方面坚决支持自己的中央。你们看，这就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现在已经具备的一个条件。

在两三年以前，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千百万农民群众拥护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严重运动呢？不，没有。谁都知道，在两三年以前，农民敌视国营农场，而把集体农庄鄙视为毫无用处的“康姆尼”。可是现在呢？现在是另一种情况了。现在我们已经有整个整个的农民阶层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看做农民经济获得种子、良种牲畜、机器、拖拉机等等帮助的来源。现在只要供给机器和拖拉机，集体农庄事业就会加速前进。

一些相当大的农民阶层中的这种转变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呢？

首先是合作社和合作社运动的发展。不容怀疑，如果没有合作社特别是在农民中间造成了拥护集体农庄的心理基础的农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我们就不会看到现在整个整个的农民阶层所表现的那种参加集体农庄的渴望。

现有的办得很好的集体农庄在这里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们给农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经济即集体经济是可以改进农业的。

现有的设备完善的国营农场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它们帮助农民改善了经济。至于你们都熟知的其他事实，我就不谈了。你们看，这又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现在已经具备的一个条件。

其次，能不能断言在两三年以前我们就已经有可能大量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给这方面拨出几亿卢布呢？不，不能这样断言。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当时甚至缺少资金去发展最低限度的工业，而没有这些工业就根本不能实现任何工业化，更不用说改造农业了。我们当时能不能从作为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工业中抽出这些资金，把它交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呢？显然不能。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资金。

最后，能不能断言在两三年以前我们在工业方面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基础来加紧供给农业以机器、拖拉机等等呢？不，不能这样断言。当时的任务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工业基础**以便**将来**供给农业以机器和拖拉机。当时我们也就是把有限的资金用来建立这个基础的。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发展农业的工业基础。至少这个基础在我国正在加速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只是到最近才在我国造成了大量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必需的条件。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不能说我们在发展结合的新形式方面做迟了。

七、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

右倾反对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在我们政策的各个基本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大体上就是这样。

有人说：布哈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之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他那套理论并不完全行得通。这就从我刚才所分析的他在党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一大堆错误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错误，即在共产国际方面的错误，在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上的错误，——所有这些错误出现在他身上决不是偶然的。不，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布哈林的这些错误是从他的不正确的理论观点，从他的理论缺陷中产生出来的。是的，布哈林是理论家，但他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有人援引列宁同志评论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的那封有名的信。让我们来读读这封信吧：

列宁说：“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间，关于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我想说几句话。据我看，他们是最出色的人材（在最年轻的人材中间），关于他们必须注意下面一点：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还理应被看做全党所喜爱的人，但是**他的理论观点是否可以看做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还大可怀疑，因为他带有某种经院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而且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完全懂得辩证法）**。”[①](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速记记录第四册第六十六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总之，不懂辩证法的理论家。经院哲学的理论家。他的“理论观点是否可以看做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还大可怀疑”的理论家。这就是列宁对布哈林的理论面目所做的评定。

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这样的理论家还需要补习一下。假如布哈林知道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家，他还需要补习一下，他是一个还没有领会辩证法的理论家，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假如他知道这些，那末他就会谦虚一点，这对党是只会有好处的。但糟糕的是布哈林不知道谦虚。糟糕的是他不仅不知道谦虚，而且在许多问题上，首先是在国家问题上，竟教训起我们的导师列宁来了。这就是布哈林糟糕的地方。

说到这里，让我援引一下一九一六年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所发生的那次大家知道的理论争论。这对我们揭露布哈林妄想教训列宁的那种不自量的奢望，以及他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弱点的根源，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一九一六年在“青年国际”杂志上登载了布哈林的一篇署名Nota Bene的论文，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专门反对列宁同志的。布哈林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差别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组织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进步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只是意味着退到旧技术，退到旧式企业……”

“……社会民主党是群众的教师，或者至少应当成为群众的教师，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目前的战争表明，国家观念的根蒂已经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发表的一篇有名的论文中批评布哈林的这种观

点说：

“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有什么差别，但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上的**主要**差别。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想‘取消’国家，把它‘炸毁’（《sprengen》），像Nota Bene同志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不过他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社会主义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引得太不完全了——认为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就会‘消亡’，逐渐‘泯灭’……”

“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但是作者恰恰没有明确的了解。‘国家观念的根蒂’一语是十分糊涂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观念’和对国家观念的否定相冲突，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即以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来利用国家反对资产阶级以便推翻这个阶级）相冲突。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一五五页至第一五六页）

看来很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布哈林滚入了什么样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泥坑！

斯腾：列宁当时还没有详细阐述“炸毁”国家的必要性。布哈林虽然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但是已经着手阐述这个问题了。

斯大林：不，现在说的不是这个，现在说的是对于一般国家的态度，说的是布哈林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包括工人阶级的国家在内。

斯腾：列宁当时只谈到利用国家的问题，在对布哈林的批评中丝毫没有谈到“炸毁”问题。

斯大林：你弄错了。“炸毁”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我敢向你担保，这里说的是布哈林（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工人应当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因而也敌视过渡时期的国家，敌视工人阶级的国家的态度。

你试向我们的工人解释一下，说工人阶级应当抱着在原则上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国家。

布哈林在他登载于“青年国际”杂志上的论文中所陈述的观点，是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国家的观点。

布哈林在这里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即忽略了整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如果真正想镇压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就非有自己的国家不可。这是第一。

第二、说列宁同志当时在他的批评中没有提到“炸毁”、“取消”一般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对的。从我所摘引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列宁不仅提到了这种理论，而且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把它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并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建立**和**利用**新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论来和它对立。

最后，决不能把“炸毁”和“取消”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或“打破”、“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混为一谈。有人喜欢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以为它们是同一思想的表现。但这是不对的。列宁在批评“炸毁”和“取消”一般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以“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

为了使问题更加清楚，我在这里不妨引证列宁同志关于国家问题的一篇手稿，这篇手稿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底或一九一七年初（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写的。从这篇手稿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甲）列宁批评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错误的时候，是以无产阶级国家“消亡”和“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

（乙）照列宁的说法，虽然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但他还是“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分子，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了他们”。请看这篇手稿的原文：

“**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对于国家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下面是信中最重要的一段话的全文：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按这几个字的文法意义来说，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的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施行，国家就会自行消散**（sich auflöst）**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不得不用来以暴力镇压敌人的一种暂时机关，那末说什么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因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国家的时候，那它就**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而一到有可能来谈自由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到处都把**国家**（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一字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极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这大概是最精彩和最激烈的所谓‘**反**

对国家’的一段话了。

（一）‘应当抛弃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

（二）‘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那究竟是什么呢？显然是从国家到无国家的过渡形式！）

（三）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in die Zähne geworfen 直译为指着鼻子说）得很够了。（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替他们那些德国朋友的这种明显的错误惭愧；但他们认为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当然是正确地认为，这种错误远没有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严重。请注意这点！！）

（四）‘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施行’，国家就会‘自行瓦解（“消散”）（请注意）和消失’……（请和后来的“消亡”对照一下）……

（五）国家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所需要的一种‘暂时机关’……（当然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六）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Niederhaltung一字原意不是镇压，而是制止复辟，制服）无产阶级的敌人。

（七）到有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

（八）‘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建议‘到处’（在纲领中）都把‘国家’一字改成‘公团’（Gemeinwesen）‘公社’！！！

由此可见，不仅机会主义者，而且考茨基也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庸俗化和污辱了。

机会主义者对这八项极丰富的思想一项也不懂！！

他们只看见目前的实际需要：利用政治斗争，利用现代国家来训练和教育无产阶级，来‘夺取让步’。这是对的（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但这还只是百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可以用算术来表示的话。

考茨基在他的宣传作品和一般政论作品中完全抹杀了（或者忘记

了？或者不懂得？）第一、二、五、六、七、八等项和马克思的《Zerbrechen》一字（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和潘涅库克辩论的时候〔见下面第四十五页至第四十七页〕，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

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主张：（甲）**现在**利用国家；（乙）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利用国家，——这是对实际工作立刻就有最重要意义的两项。（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项！）

我们和机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持有下面这些更深刻、‘更恒久的’真理：（子）国家是‘暂时’性的；（丑）现在关于国家的‘废话’是**有害的**；（寅）无产阶级专政不完全带有国家性质；（卯）国家和自由是相矛盾的；（辰）把国家一字改成‘公团’，‘公团’是更正确的观念（概念，纲领用语）；（巳）‘粉碎’（Zerbrechen）官僚军事机器。

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德国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科里布等等）直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而正式纲领和考茨基却**间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日常鼓动中不谈到它，**容忍**科里布及其同伙的背叛行为。

一九一六年八月曾向布哈林写过：‘让你的关于国家的思想**成熟起来**再说吧。’可是，他还**没有让**自己的思想成熟起来，就又署名《Nota Bene》爬到刊物上发表文章了，结果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分子，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了他们**！！但实际上，布哈林是比考茨基接近真理的。”

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争论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问题看来已经很清楚：布哈林犯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已经是改正这些错误，跟随列宁前进的时候了。但是只有列宁主义者才会这样想。布哈林原来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他反而硬说：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列宁；不是他跟随了或者应当跟随列宁走，相反地，倒是列宁不

得不跟随布哈林走。

同志们，你们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吗？那末，请再往下听吧。一九一六年发生这些争论后过了九年（在这九年当中布哈林一直保持着缄默），**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即在一九二五年，布哈林在“法权革命”文集上发表了从前“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编辑部（即列宁）所未予发表的“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布哈林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公然声称：在这次争论中对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同志们，这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事实。

请听这个注释的原文吧：

“弗·伊·（即列宁）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错误，那个错误是硬加在我头上的，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关于‘炸毁’国家**（当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原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把这个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问题混淆起来了**[①]。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的问题上了。

当我从美国回到俄国遇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秘密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弗·伊·隐藏起来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转告你，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你没有意见分歧了。’**伊里奇**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炸毁’**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②]，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后来又把专政学说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发展中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布哈林就是这样议论列宁的。

你们看，这就是没有学成的理论家的过分妄自尊大的标本！

很可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真的向布哈林说过布哈林在这里所写的话。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列宁有某些根据认为布哈林放弃了或准备放弃自己的错误。仅此而已。可是布哈林却另有想法。他认定：从今以后，应当被看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始者或者至少是提倡者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

我们一向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我们是列宁主义者。而现在看来，列宁和我们（他的学生）都是布哈林主义者。同志们，真是有点好笑。可是，既然遇到了布哈林的这种狂妄自大，那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有人以为布哈林在他上述文章的注释中不过是偶而失言，他说了蠢话，后来就忘了。但这种想法原来是不对的。布哈林说这些话原来是十分认真的。这就从下面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布哈林在这个注释中所做的关于列宁**错误**而布哈林**正确**的声明，在不久以前，就是在一九二七年，即在布哈林第一次攻击列宁后过了两年，又在马列茨基所写的布哈林传略中发表了，而布哈林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抗议马列茨基的这种……大胆行为。很明显，布哈林反对列宁的言行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这样说来，对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提倡者不是列宁，而是布哈林。

同志们，布哈林的理论偏见和理论野心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这个人在这里演说时却还有勇气说我们党的理论观点中“有某种东西腐朽了”，说我们党的理论观点中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说这种话的就是这个布哈林，就是这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现在犯了（过去也犯过）许多极严重的错误，不久以前还是托洛茨基的门生，

昨天还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反对列宁主义者，还跑去和他们暗中勾结的布哈林！

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

八、五年计划还是两年计划

现在让我来谈谈李可夫的演说。布哈林曾经企图给右倾提供理论根据，而李可夫在他的演说中竭力想为这件事情打下实际建议的基础，拿我国农业方面的困难的“可怕景象”来吓唬我们。这并不是说，李可夫没有涉及理论问题。不，他是涉及理论问题的。可是，他涉及理论问题的时候，至少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李可夫在他那个被政治局委员会否决了的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草案中说，“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在于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虽然政治局委员会否决了这个完全不正确的观点，但是李可夫在这里演说时仍然为这个观点辩护。

苏维埃国家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话对不对呢？不，不对。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我们需要的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一定的**增长，即能够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贯比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增长。五年计划如果忘记了这个中心思想，就不是五年计划，而是五年胡说了。

任何一个社会，无论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都关心劳动生产率的一般增长。**苏维埃**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关心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而是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比其他经济形式首先比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占优势，因而能够保证战胜和排挤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那种增长。可是，李可夫忘记了**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的这个真正的中心思想。这是他的第一个理论错误。

他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看不见或者不愿意了解集体农庄和任何个体经济（包括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在内）在商品流转方面的差别。李可夫断言，从粮食市场上的商品流转方面看来，从取得粮食方面看来，他认为集体农庄和粮食私有者之间没有差别，所以在他看来，我们向集体农庄，向粮食私有者还是向阿根廷的某个粮商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重复人所共知的弗鲁姆金的论调，弗鲁姆金有一个时候曾经断言，在他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和无论向什么人买粮食，向私有者还是向集体农庄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

这是用伪装形式为富农在粮食市场上的阴谋诡计辩护、辩解和辩白。虽然这种辩护是从商品流转的观点上进行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真相，这终究是为富农在粮食市场上的阴谋诡计做辩护。如果从商品流转方面看来集体经济形式和非集体经济形式之间没有差别，那末是否还值得去发展集体农庄，是否还值得给它们优待，是否还值得去执行战胜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这一困难任务呢？显然，李可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观点。这是他的第二个理论错误。

这些不过是顺便提一提。现在来谈谈李可夫在演说中提出的实际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断定说，除了五年计划以外，还需要有另外一个平行的计划，即发展农业的两年计划。他以农业方面的困难作为提出这个平行的两年计划的根据。他说，五年计划是一件好事，他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如果我们同时还提出一个农业的两年计划，那就更好了，否则农业就会停滞不前。

从表面上看，这个提议似乎没有任何坏处。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看，那就可以看出：想出农业的两年计划是为了强调五年计划具有不现实的、纸上空文的性质。我们能不能同意这一点呢？不，不能。我们对李可夫说过：如果你在农业方面不满意五年计划，如果你认为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用于发展农业的拨款不够，那就请你直率地说出你的

补充建议，说出你的追加投资额，我们同意把农业方面的这些追加投资额加进五年计划。结果怎样呢？原来李可夫并没有任何关于农业追加投资的补充建议。试问，究竟为什么需要平行的农业两年计划呢？

其次，我们对他说过：除了五年计划以外，还有年度计划，这是五年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你在发展农业方面的那些具体的补充建议加进头两年的年度计划，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建议的话。结果怎样呢？原来李可夫并不想提出这种具体的追加拨款的计划。

于是我们明白了：李可夫提出两年计划不是为了发展农业，而是想强调五年计划具有不现实的、纸上空文的性质，想破坏五年计划的威信。为了安慰“心灵”，为了装饰门面，就需要五年计划；为了行动，为了进行实际工作，就需要两年计划，——这就是李可夫的战略。李可夫提出两年计划，是为了以后在五年计划实际执行过程中拿两年计划来和五年计划对立，改编五年计划，使五年计划迁就两年计划，削减工业拨款。

就是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否决了李可夫关于平行的两年计划的建议。

九、播种面积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吓唬党，断言苏联的播种面积有不断缩小的趋势。同时他向党暗示，播种面积的缩小应当归咎于党的政策。他没有公开说我们的农业正在走向退化。但是他的演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我们有某种类似退化的现象。

播种面积有不断缩小的趋势，这样说对不对呢？不，不对。李可夫在这里利用的是全国播种面积的平均数。但是使用平均数的方法如果不用按地区统计的材料加以校正，那就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方法。

也许李可夫曾经读过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他读

过，他就应当记得列宁在那本书中怎样责骂那些在估计播种面积的增长时采用平均数的方法而忽视按地区统计的材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真奇怪，李可夫现在竟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如果按地区观察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就是说，如果科学地对待问题，那就可以看出，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在**不断**增加，另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时**缩减（主要是受气候条件的影响），但是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我国有什么地方，哪怕只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播种面积在**不断**缩小。

的确，在遭受霜灾或旱灾的地区，例如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播种面积最近有缩小的现象……

喊声：*并不是整个乌克兰。*

施里赫特尔：*乌克兰的播种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七。*

斯大林：我指的是乌克兰的草原地带。但是在其他没有受到不良气候条件影响的地区，例如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和巴什基里亚，播种面积是不断增加的。

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而另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时缩小呢？实际上，不能武断地说党的政策在乌克兰是一种，而在苏联的东部或中部是另一种。同志们，这是胡说八道。很明显，气候条件在这里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是的，富农缩小播种面积并不是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这也许应当“归咎于”党的帮助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的政策。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我们什么时候答应过实行一种能使农村所有的社会集团（包括富农在内）都满意的政策吗？而且一般说来，如果我们还想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那末难道我们能够实行一种既使剥削者满意又使被剥削者满意的政策吗？如果由于我们实行了列宁的旨在限制和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富农开始部分地缩小他们的播种面积，这又有什么特别呢？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

也许这个政策不正确，——那末请直截了当地向我们说。自命为

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因为富农部分地缩小播种面积而惊惶起来，硬说这是一般播种面积的缩小，忘记了除富农以外还有贫农和中农，他们的播种面积正在扩大，忘记了还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的播种面积正在加速增加，这不是很奇怪吗？

最后，在李可夫的演说中，关于播种面积问题还有一个不正确的地方。李可夫在这里抱怨说，在某些地方，即在集体农庄最发展的地方，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开始缩小了。这是事实。但这有什么不好呢？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既然贫农和中农开始抛弃个人耕地而转上集体经济，那末集体农庄的扩大和增多就必然会引起贫农和中农个人耕地的缩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你想要怎样呢？

现在集体农庄有二百多万公顷土地。到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集体农庄将要有二千五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集体农庄的耕地靠吸收谁的耕地来扩大呢？靠吸收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而你想要怎样呢？否则又怎样把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呢？在许多地区，集体农庄的耕地将要靠吸收个人耕地增加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真奇怪，有人竟不愿意了解这些简单的道理。

一〇、粮食收购问题

关于我们在粮食方面的困难，有人在这里说了一大堆荒唐话。但是，他们把我们在粮食方面发生暂时性的困难的主要因素忽略过去了。

他们首先忘记了今年我们收获的黑麦和小麦（我说的是总收获量）大约比去年少五亿至六亿普特。这能够不影响到我们的粮食收购吗？当然不能不影响到。

也许这应当归咎于中央的政策吧？不，这同中央的政策毫不相干。这是由于乌克兰草原地带发生严重歉收（霜灾和旱灾）和北高加索、

中央黑土区、西北区发生部分歉收的缘故。

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去年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我们在乌克兰收购了二亿普特粮食（黑麦和小麦），而今年只收购了二千六百万至二千七百万普特。

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小麦和黑麦的收购量在中央黑土区几乎减少了八分之七，在北高加索几乎减少了四分之三。

今年在东部某些地区内，粮食收购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这不能补足当然也没有补足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中央黑土区少购的数字。

不应当忘记，在收成正常的情况下，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收购的粮食约为全苏联收购的全部粮食的一半。

真奇怪，李可夫竟把这个情况忽略过去了。

最后，还有第二种情况也是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发生暂时性的困难的主要因素。我指的是农村富农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反抗。李可夫回避了这个情况。但是回避这个因素，就是回避粮食收购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手里有很多余粮并在粮食市场上起重要作用的农村富裕阶层不愿意按照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价格自愿地把必要数量的粮食卖给我们。为了保证城市、工业区、红军和技术作物区的用粮，我们每年大约需要五亿普特粮食。用自流的方法，我们大约能收购三亿至三亿五千万普特。其余的一亿五千万普特就不得不用有组织地对农村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取得。这就是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向我们说明的问题。

最近两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自流的方法从前有成效，而现在已经不够了呢？发生的变化是：近几年来富农和富裕分子成长起来了，几年的丰收对他们发生了作用，他们在经济上巩固了，积蓄了一些资本，因此，他们现在能够在市场上玩

弄手腕，把余粮囤积起来等待高价，而依靠其他农产品来周转。

决不能把粮食看做普通商品。粮食不是棉花，棉花是不能吃的，也不是任何人都买的。粮食和棉花不同，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它是人人都买而且没有它就不能生存的一种商品。富农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并以此感染了一般的粮食持有者。富农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富农知道余粮不仅是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盘剥贫农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富农手里的余粮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因此，我们从富农手里取得这些余粮，不仅有助于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而且能打破这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阶级的手段。

要取得这些余粮，必须做些什么呢？首先必须消除有害和危险的自流心理。必须**组织**粮食收购工作。必须发动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组织他们共同支持苏维埃政权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按照捐献原则实行的粮食收购方法，其意义就在于它能发动农村劳动阶层反对富农以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经验表明，这个方法能使我们获得良好的结果。经验表明，这些良好的结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取得了农村富裕阶层的余粮，从而有助于国家的粮食供应；第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发动了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在政治上教育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为我们在农村中的一支强大的千百万人的政治军队。有些同志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然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粮食收购方法的重要结果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结果。

固然，这种方法有时候同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的办法结合起来了，于是引起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可笑的号叫。但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能在某些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我们的阶级敌人即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呢？为什么在城市里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机分子，把他们放逐到土鲁汉斯克边区去，而对于那些进行粮食投机活动、企图扼杀苏维埃

政权并盘剥贫农的富农，就不能用社会强制的方法，按照贫农和中农卖给我们收购机关粮食的价格去收购他们的余粮呢？这是从哪里得出来的结论呢？难道我们党曾经表示过**在原则上**反对对投机分子和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吗？难道我们没有对付投机分子的法律吗？

看来，李可夫和布哈林主张**在原则上**反对对富农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要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你们不会不知道，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甚至主张恢复贫农委员会政策——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那末对富农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又算得什么呢？这和贫农委员会政策比较起来，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

他们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希望说服阶级敌人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余粮自愿卖给我们。他们希望那些已经成长起来、进行着投机活动并且有可能依靠其他农产品来玩弄手腕而把余粮藏起来的富农按照我们的收购价格自愿把自己的余粮卖给我们。他们不是疯了吗？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不知道什么是阶级，这不是很明显吗？

他们是不是知道在为加强粮食收购工作而召开的村民大会上，富农怎样嘲弄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政权呢？他们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事实，例如在哈萨克斯坦，我们的鼓动员花了两个钟头劝说粮食持有者把粮食拿出来供应国家，可是富农口里衔着烟斗走出来回答说："小伙子，你跳个舞，我就给你两普特粮食。"

喊声：混蛋！

斯大林：你们试试说服这样的人吧。

是的，同志们，阶级就是阶级。谁也逃不出这个真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方法的好处其实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发动贫农和中农阶层去反对富农，它能够帮助我们击破富农的反抗，强迫他们把余粮交给苏维埃政权机关。

目前在布哈林集团中最时髦的字眼就是粮食收购工作中的"过火

行为”。这个字眼在他们那里是最畅销的货物，因为它能够帮助他们掩盖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当他们想掩盖自己的路线时，他们通常总是说：我们当然不反对对富农施加压力，可是，我们反对在这方面所发生的触及中农的过火行为。接着他们就叙述这些过火行为的“可怕景象”，宣读“农民”的来信，宣读马尔柯夫一类同志的张皇失措的信，然后就做出结论：必须取消对富农施加压力的政策。

请看：**因为**在实行正确的政策中有过火行为，**所以就必须取消这个正确的政策**。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藉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同时，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处心积虑地保持缄默，绝口不提还存在着另一种过火行为，更危险和更有害的过火行为，即同富农结合，迁就农村富裕阶层，用右倾分子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党的革命政策。

当然，我们大家都反对这些过火行为。我们大家都反对对富农的打击触及中农。这是很明显的，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用布哈林集团所热心使用的那套关于过火行为的废话来取消我们党的革命政策，用布哈林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我们党的革命政策。不，他们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的。

请你们说一说，党的哪一个政治措施在实行中没有发生过某种过火行为。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这一点**来斥责唯一正确的路线本身吗？

就拿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这样的措施来说吧。毫无疑问，这个措施是我们党最近所实行的最革命的措施之一。谁不知道，我们实行这个实质上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的措施时常常发生许多过火行为，有时是最可恶的过火行为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取消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政策呢？

布哈林反对派的拥护者是不是知道，他们拿粮食收购工作中的过火行为做王牌，是滚到什么样的泥坑里去了呢？

十一、外汇后备和粮食输入问题

最后，略为谈谈粮食输入和外汇后备问题。我已经说过，李可夫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曾经屡次提出从国外输入粮食的问题。李可夫起初说必须输入八千万至一亿普特粮食。这大约需要两亿卢布的外汇。后来他提出输入五千万普特，即价值一亿卢布外汇的粮食的问题。我们否决了这种做法，认定对富农施加压力，取得他们握有的大批余粮，要比花费准备用来输入我国工业设备的外汇好些。

现在李可夫改变了战线。现在他硬说资本家要贷给我们粮食，而我们似乎不想接受。他说，从经过他的手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资本家愿意贷给我们粮食。同时他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或者由于任性，或者由于其他某种不可理解的原因而不愿意接受贷给我们的粮食。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如果以为西方的资本家突然怜悯起我们来，愿意几乎白白地或者长期地贷给我们几千万普特粮食，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是胡说。

那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各种不同的资本家集团想摸我们的底，想试探我们的财政力量、我们的支付能力、我们的坚定性已经有半年了。他们找我国驻巴黎、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和阿根廷的商务代表，答应以三个月或最多六个月的最短期的信贷方式卖给我们粮食。他们要达到的与其说是想以信贷方式卖给我们粮食，不如说是想探知我们的情况是否真的困难，我们的财政力量是否真的已经枯竭，我们的财政状况是否稳固，我们是否会上他们的钩。

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对于我国的财政力量争论得很厉害。有些人说，我们已经破产，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即使不是几星期的事，也只是几个月的事了。另外一些人说，这话不对，苏维埃政权很稳固，

它有财政力量和足够的粮食。

现在的任务在于我们要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和刚毅性，不要理睬关于贷给我们粮食的虚伪诺言，要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我们不输入粮食也行。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决定拒绝南森之类的各种慈善家关于以信贷方式输入苏联一百万美元粮食的建议。

根据同一理由，我们对巴黎、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侦探关于贷给我们少量粮食的建议给了否定的回答。

根据同一理由，我们决定在粮食消费方面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在粮食收购方面发挥最高度的组织性。

我们这样做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输入粮食，保存外汇以输入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向我们的一切敌人表明，我们稳固地屹立着，我们不打算理睬小恩小惠的诺言。

这样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所以正确，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在我国内部发现了取得粮食的新的可能性。它所以正确，还因为我们既然避免了输入粮食，既然抛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侦探，我们就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提高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并彻底粉碎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的胡说。

前几天，我们和德国资本家的代表们进行了几次初步谈判。他们答应给我们五亿贷款，并且事情看来是这样的：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业得到苏联的定货，的确认为给我们这笔贷款是必要的。

前几天，英国保守党代表团来到我国，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得到苏联的工业定货，也认为确认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必需的，给我们贷款是适当的。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出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必要的坚定性，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新的可能性，就不能首先从德国人方面，随后又从一部分英国资本家方面得到贷款。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似乎因为任性而拒绝接受以想像中的长期信贷方式贷给我们的想像中的粮食。问题在于要识破我们敌人的面目，识破他们的真正意图，并表现出为巩固我国国际地位所必需的刚毅性。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拒绝输入粮食的原因。

由此可见，粮食输入问题并不像李可夫在这里所说的那样简单。粮食输入问题是我国的国际地位问题。

五 党的领导问题

这样，我们就分析了我们在理论方面以及在我们党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对内政策方面发生意见分歧的一切主要问题。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李可夫说我们有**一致的**路线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实际上我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总路线，是我们党的革命的列宁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在布哈林集团中有想像不到的糊涂观点，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第二条路线在党内的势力很小，于是总想用某种方法伪装起来。但是你们可以看出，这条路线还是存在着，而且是一条同党的路线**不同的**路线，是一条几乎在我们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右**倾的路线。

现在来谈谈党的领导问题。

一、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问题

布哈林说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派，说布哈林集团不是反对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从全会的争论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布哈林集团是新反对派。这个集团的反党活动在于它企图修正党的路线，它企图

修改党的路线，并准备条件使另一条路线即反对派的路线（它只能是右倾的路线）代替党的路线。

布哈林说三人团不是派别集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布哈林集团含有派别活动的一切因素。这里既有政纲，又有派别性的小圈子，既有辞职政策，又有反对中央的有组织的斗争。还需要什么呢？既然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的真相已经昭然若揭，为什么还要隐瞒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就是为了在这里说出我们意见分歧的全部真相。真相就是布哈林集团是派别集团。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派别集团，我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内有过的一切派别集团中最讨厌最爱吹毛求疵的派别集团。

这就从他们现在企图利用阿札里亚骚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来达到他们的派别目的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其实，这个所谓阿札里亚“暴动”同喀琅施塔得暴动那样的暴动比较起来算得什么呢？我认为，和这种暴动比较起来，所谓阿札里亚“暴动”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是否有过托洛茨基分子或季诺维也夫分子企图利用这种严重的喀琅施塔得暴动来反对中央、反对党的事情呢？同志们，应该承认，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相反地，在发生这种严重暴动的时期，存在于我们党内的一些反对派集团都曾经帮助党来镇压暴动，不敢利用暴动来反对党。

而现在布哈林集团是怎样做的呢？你们已经有机会看到，他们企图最卑鄙最无耻地利用这个极小的阿札里亚“暴动”来反对党。这不是极端严重的由派别活动造成的头昏眼花和吹毛求疵，又是什么呢？

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到在和资本主义国家接壤的边疆地区不发生骚动事件。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实行一种能使我们社会中的一切阶级，使富人和穷人，使工人和资本家都感到满意的政策。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到在我们这里没有不满分子。布哈林集团中的这些同志不是疯了吗？

怎么能要求我们这些和国内外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做到在我们国内没有不满分子，在和敌视我们的国家接壤的某些边疆地区不会偶而发生骚动事件呢？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使国际资本能竭尽全力在我国边疆地区组织我国不满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那又是为了什么呢？除了头脑简单的自由主义者以外，还有谁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派别性的吹毛求疵有时能把人弄到自由主义者的盲目无知和目光短浅的地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二、忠顺和集体领导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断言，布哈林对我们党中央来说是最“无可责难”和最“忠顺”的党员之一。

请允许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们不能相信李可夫的话。我们需要事实。李可夫却拿不出事实来。

例如拿布哈林同那个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的加米涅夫集团进行幕后谈判，即进行关于组织派别联盟、改变中央政策、更换政治局委员、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反对中央的谈判来说吧。试问，布哈林对自己中央的“忠顺”和“无可责难”究竟在哪里呢？

相反地，这不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完全**违反对自己的中央、对自己的党的忠顺态度吗？如果这叫做对中央的忠顺态度，那末什么叫做对自己的中央的背叛行为呢？

布哈林爱说忠顺，爱说老实，但是为什么他不想看看自己，问问自己：他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幕后谈判反对自己的中央，因而背叛了自己的中央，是不是最不老实地违反了忠顺于自己的中央的起码要求呢？

布哈林在这里说党中央缺乏集体领导，并且要我们相信，是中央

政治局大多数委员违反了集体领导的要求。

当然，我们的全会对一切都能容忍。它也可以容忍布哈林的这些厚颜无耻的假仁假义的话。但是只有真正不知羞耻的人才敢于在全会上这样反对大多数中央委员。

事实上，既然大多数中央委员都驾上国家的大车，尽一切力量向前拉，请求布哈林集团在这项艰难的事业中帮帮忙，而布哈林集团不但不帮助自己的中央，反而千方百计地加以阻碍，把棍子投到车轮下，以辞职相威胁，并和党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商量反对我们党中央，那末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集体领导呢？

除了伪君子以外，还有谁能否认，和托洛茨基分子建立反党联盟而背叛自己中央的布哈林，不愿意而且不会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中实行集体领导呢？

除了瞎子以外，还有谁能看不见，布哈林总是空谈中央的集体领导，指摘大多数中央委员，是为了以此掩盖自己的叛变立场呢？

应当指出，布哈林违反忠顺于党中央的起码要求和党中央集体领导的起码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在和约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后就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跑到我们党的敌人那里，和他们进行幕后谈判，企图和他们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和中央。当时他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了些什么，可惜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打算逮捕列宁并举行反苏维埃政变……然而最奇怪的是：布哈林一方面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和他们串通一气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一方面却继续叫喊（也像现在这样）必须实行集体领导。

此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在我们党的莫斯科区域委员会中拥有多数并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支持时竟号召全体党员表示不信任党中央、拒绝服从党

中央并提出我们党内的分裂问题。这是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在中央已经通过必须接受布列斯特和约条件的决议以后的事情。

布哈林的忠顺和集体领导就是这样。

李可夫在这里说必须实行集体工作。同时他指出他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主张集体工作，这样也就是暗指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是反对集体工作的。但是，李可夫没有举出一个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话。

为了揭穿李可夫的这种无稽之谈，让我举出几个事实，几个例子，来说明李可夫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

第一个例子：你们都知道向美国输出黄金的事情。也许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以为黄金是根据人民委员会或中央的决定，或者是得到中央的同意，或者是通知中央之后向美国输出的。但是，同志们，事实不是这样。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我们有一个非经中央批准不得输出黄金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被违反了。究竟是谁准许输出黄金的呢？原来是李可夫的一个代理人通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准许输出黄金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和美国一家私营大银行谈判的问题。这家银行的财产在十月革命后被收归国有，现在它要求赔偿损失。中央已经得悉，我们国家银行的代表正在和这家银行谈判赔偿它的损失的条件。

你们知道，赔偿私人损失问题是同我国对外政策有直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许有人以为这个谈判是得到人民委员会或中央的准许进行的。但是，同志们，事实不是这样。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后来，中央得悉这个谈判之后，决定停止谈判。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是谁批准这个谈判的呢？原来是李可夫的一个代理人通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批准这个谈判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供应富农和中农农业机器的问题。事情是这样：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李可夫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代理人）决定**减少**对中农的农业机器供应，**增加**对农村上层阶层即富农的机器供应。请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委员会的这个反党反苏维埃的决议原文：

“在哈萨克和巴什基里亚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西伯利亚边区和下伏尔加边区、伏尔加中游区和乌拉尔区，本条指出的农业机器和农具的销售百分数，对农村上层阶层**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对中农阶层**降低**到百分之三十。”

请看：在党加紧向富农进攻并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阶级的时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却通过了关于**降低**对中农的机器供应额和**提高**对农村上层阶层的供应额的决议。

这就叫做列宁的共产主义政策！

后来，中央知道了这件怪事之后，撤销了经济委员会的决议。但是，是谁批准这个反苏维埃决议的呢？是李可夫的一个代理人通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批准这个决议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看来，这些例子尽够说明李可夫和他的代理人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了。

三、反右倾斗争问题

布哈林说，被我们党的组织“恶意攻击”（用他的话说）的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了“公民死刑”[①]。他说，党在报刊和会议上批评三

① 一种侮辱性的假死刑。——译者注

个政治局委员即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错误，是使他们受到了“公民死刑”，而他们这三个政治局委员却“不得不”默不作声。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这是企图削弱党的反右倾斗争的一种自由主义化的共产党员的谎话。在布哈林看来，如果他和他的朋友犯了右倾错误，那末党没有权利揭露这些错误，党应该停止反右倾的斗争，等待布哈林和他的朋友自愿地放弃自己的错误。

布哈林对我们的要求岂不是太多了吗？他是否以为党是为他而存在，不是他为党而存在呢？当全党都动员起来反对右倾并向困难进行坚决攻击的时候，谁强迫他默不作声，静坐不动呢？为什么他布哈林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现在不出来进行坚决斗争去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呢？如果布哈林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决定采取这个并不怎么困难的步骤，党是会欢迎他们的，这一点难道有谁会怀疑吗？究竟为什么他们不决定采取这个他们终究必须采取的步骤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把自己集团的利益摆在党和党的总路线的利益之上呢？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没有参加反右倾的斗争，这究竟应该怪谁呢？关于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公民死刑”的那些话，是这三个政治局委员想强迫党默不作声并停止反右倾斗争的一种掩饰得很拙劣的企图，这不是很明显吗？

决不能把反右倾的斗争看做我们党的次要任务。反右倾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在自己的党内，在领导运动和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政治参谋部里，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右倾分子正在企图涣散党，瓦解工人阶级，使我们的政策适合“苏维埃”资产阶级的口味，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如果我们容许这一切，那末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准备逐渐消灭革命，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逃避困难，把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吗？

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

叛革命呢？

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不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能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而不克服这些困难，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胜利呢？

既然如此，那末所谓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公民死刑”的可怜话还有什么价值呢？

不，同志们，布哈林分子用自由主义者的所谓“公民死刑”的废话是吓不倒党的。党要求他们和我们党的全体中央委员站在一个行列中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坚决的斗争。党要求布哈林集团这样做，是为了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击破阶级敌人的反抗并彻底克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

或者布哈林分子执行党的这个要求，那末党就会欢迎他们；或者他们不这样做，那末就让他们自己去埋怨自己吧。

六 结 论

现在我来做结论。

我提出下列几项建议：

（一）首先应该斥责布哈林集团的观点。应该斥责这个集团在它的宣言和它的代表的演说中所陈述的观点，认定这些观点是和党的路线不相容而和右倾的立场完全相符合的。

（二）应该斥责布哈林和加米涅夫集团的幕后谈判，认定这是布哈林集团不忠顺和进行派别活动的最明显的表现。

（三）应该斥责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实行的辞职政策，认定这是粗暴地违反了党纪的起码要求的。

（四）应该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现任职务，并警告他们，如有不服从中央决议的丝毫企图，中央将不得不取消他们的政治局委员

的资格。

（五）应该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各个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议上发言时不说出任何离开党的路线、离开中央和中央各机关的决议的话。

（六）应该采取措施，使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刊物，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

（七）应该规定特别办法（直至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和开除出党）来对付那些企图泄漏党、党中央、党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的人。

（八）应该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党内问题的决议分发给各级地方党组织和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代表，这个决议暂时不在报刊上公布。

在我看来，出路就是这样。

有些同志坚持立即取消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我不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在我看来，现在不必采取这种极端办法。

全文第一次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78页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叶·米库林娜“群众的竞赛”一书序言）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几乎用不着怀疑，广泛展开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的竞赛，在目前我国建设中，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家各个不同角落的整个整个工厂的竞赛，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竞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间的竞赛，这种群众性的生产上的互相呼应在劳动者的专门合同中固定下来，——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表明，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已经展开了。

劳动群众的强大的生产高潮开始了。

甚至最顽固的怀疑论者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了。

列宁说：“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的劳动者参加这样一种使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事，表现自己的天才的工作。天才在人民中间是取之不尽的，可是资本主义把这种天才成千上万以至成百万地压抑、蹂躏和窒息了……”

“……只是现在，才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创造了表现进取心、竞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可能……”因为“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关于竞赛问题发出专门的告工人和劳动者书就是以列宁的这些论点为根据的。

有些官僚主义的“同志”认为竞赛是布尔什维克的一种例行的时

髦花样，既然是时髦花样，就一定会随着“季节”的结束而消失。这些官僚主义的“同志”当然是错了。实际上，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实际上，竞赛是工人阶级用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扭转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

另外一些官僚主义的“同志”被竞赛的巨浪吓倒了，他们企图给竞赛制造一个人为的框子，把竞赛加以限制，把竞赛事业“集中”起来，缩小它的规模，从而去掉竞赛中最重要的东西——群众的**主动性**。不用说，官僚主义者的企图是不会实现的。无论如何，党是会采取一切办法来粉碎这种企图的。

不能把社会主义竞赛看做办公室里的事情。社会主义竞赛是群众实事求是的革命的**自我批评**的表现，这种**自我批评**所依靠的是千百万劳动者的创造**主动性**。凡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压制群众的这种自我批评和这种创造主动性的人，都应该作为我们伟大事业的障碍而被丢在道旁。

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地表现在它束缚群众的活力、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它埋没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它不让我们利用这些后备力量去同我们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社会主义竞赛的任务在于粉碎这些官僚主义的束缚，为发挥群众的活力和创造主动性开辟广阔的场所，发掘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并把这些后备力量投入天平盘去同我们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有时人们把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混为一谈。这是很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

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

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

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能使千百万劳动群众表现出空前未有的生产热情。不用说，竞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产生什么类似这种群众热情的东西。

近来我们的报刊上关于竞赛的文章和报道越来越多了。人们说到竞赛的哲学、竞赛的根源、竞赛的可能结果等等。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报道：比较连贯地描写**群众自己如何**进行竞赛，千百万工人群众在实行竞赛和签订合同时的**体验如何**，工人群众怎样把竞赛事业看做**自己的切身事业**。可是，这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正是竞赛的极重要的一面。

我认为叶·米库林娜同志的小册子是根据竞赛的**实际**材料来连贯地叙述竞赛是劳动群众自己的事情的初次尝试。这本小册子的价值在于它朴素而真实地叙述了构成社会主义竞赛内部动力的那些伟大劳动高潮的深刻过程。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真理报”第一一四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2 卷第 79—81 页

大转变的一年

（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

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这个转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在于它已经使我们在我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建（改造）事业的各个主要方面取得了许多决定性的**胜利**。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党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了我们的退却，以便在以后，在新经济政策的下几个阶段组织**转变**并向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胜利的进攻**。

列宁在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说过：

“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快跑，更有力地向前跳。仅仅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才在施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却……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九九页）

过去一年的总结毫无疑问地说明，党在自己的工作中胜利地执行了列宁的这个极重要的指示。

*　　*　　*

如果拿过去一年对我们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总结来看，那末我们在这条战线上进攻的**胜利**，我们过去一年的**成就**，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主要部分。

一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

几乎用不着怀疑，最近一年来我国建设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我们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达到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表现于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发挥了**创造主动性**，掀起了强大的**劳动高潮**。这是我们过去一年的第一个主要**成就**。

群众的创造主动性的发挥和劳动高潮的掀起是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促成的：

（甲）通过**自我批评**反对束缚着群众劳动主动性和劳动积极性的官僚主义；

（乙）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反对旷工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纪律的分子；

（丙）通过实行**不断生产制**反对生产中的守旧思想和因循习惯。

结果，我们在劳动战线上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我们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每个角落里都呈现出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在劳动中的互相呼应。而这个成就的意义实在是无可估量的，因为只有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潮和劳动热情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如果没有这种增长，社会主义在我国就不能最后战胜资本主义。

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九四页）

根据这一点，列宁认为：

“我们必须充满劳动热情、劳动意志和顽强精神，因为现在只有这样才能最迅速地挽救工人和农民，挽救国民经济。”（“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七四页）

这就是列宁在党面前提出的任务。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坚决地克服了这条

道路上的困难。

党在过去一年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就是这样。

二 在工业建设方面

党的第二个成就是和党的第一个成就密切地联系着的。党的第二个成就就是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基本上顺利解决了重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积累问题**，**加快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并创造了把我国变为**金属**国家的前提。

这就是我们过去一年的第二个主要**成就**。

轻工业问题是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解决了。比较困难、更加重要的是重工业问题。

所以**比较困难**，是因为它需要大量投资，而且工业落后的国家的历史表明，重工业没有大量长期的借款是不能发展的。

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不发展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就不能实行任何工业化。

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既没有得到长期的借款，也没有得到比较长期的信贷，所以问题的尖锐性对我们就非常明显了。

世界各国的资本家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拒绝给我们借款和信贷，他们以为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资金积累问题，我们在改造重工业问题上必定失败，因而不得不向他们低头，受他们盘剥。

过去一年的总结在这方面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过去一年的总结的意义在于它彻底粉碎了资本家老爷们的如意算盘。

过去的一年表明，尽管苏联受到公开的和隐蔽的财政封锁，可是我们并没有去受资本家盘剥，而且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胜利地解决了资金积累问题，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这一点现在连工人阶级的死敌也不能否认了。

第一、既然去年大工业的基本投资是十六亿多卢布，其中约有十三亿卢布投入了重工业，而今年大工业的基本投资是三十四亿多卢布，其中有二十五亿多卢布将投入重工业；第二、既然去年大工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今年大工业的总产值应当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业的总产值应当增加百分之四十六，——那末重工业建设的资金积累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已经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们正在加快步伐沿着发展我国重工业的路线前进，超过旧速度，把我们“历来的”落后性扔在后面，这难道可以怀疑吗？

既然如此，那末五年计划的预计数字在过去一年已经超额完成，被资产阶级论客看做“无法实现的梦想”的、使我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集团）胆颤心惊的五年计划**最高**方案实际上变成了五年计划**最低**方案，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列宁说：“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把它恢复起来，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的国家……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八页至第三八九页）

请看，列宁是多么尖锐地提出资金积累问题和党在建设重工业方面的任务。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坚决地克服了这条道路上的种种困难。

这当然不是说工业不会再有严重的困难了。建成重工业的任务不仅会遇到资金积累问题，而且会遇到干部问题，就是：

（甲）**吸收**成千上万的拥护苏维埃的技师和专家**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的问题；

（乙）**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新的红色技师和红色专家的问题。

如果说资金积累问题可以认为基本上已经解决了，那末干部问题却还待解决。而在目前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情况下，干部问题正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列宁说：“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 **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二三页至第二二四页）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首先是“文化力量”问题，是一般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和工业管理的干部问题。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尽管在资金积累方面取得了对重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极大成就，但是只要干部问题没有解决，建成重工业的问题就不能认为已经完全解决了。

因此，党的任务是：切实地解决干部问题，无论如何要攻下这个堡垒。

党在过去一年的第二个成就就是这样。

三 在农业建设方面

最后，谈谈党在过去一年的第三个成就，这个成就是和前两个成就有机地联系着的。这里指的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从细小的落后的**个体**经济进到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进到共耕制，进到机器拖拉机站，进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进到用数百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装备起来的巨大的国营农场。

这里党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使许多地区的基本农民群众从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转到**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仅仅

有利于一小撮富翁资本家，而绝大多数农民不得不破产和忍受贫困的痛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则排挤富翁资本家，按新方式重新武装中农和贫农，用新工具，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来武装中农和贫农，使他们摆脱贫困和富农的盘剥，走上协作的集体耕种制的广阔道路。

党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在农民中间组织了这种**根本转变**，并引导了广大的贫农和中农群众跟着我们前进，尽管我们遇到了许多难于置信的困难，尽管各色各样的黑暗势力，从富农和神甫到庸人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进行了疯狂的反抗。

请看几个数字。

一九二八年，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是一百四十二万五千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是六百多万公担（三千六百多万普特），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是一百三十九万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约三百五十万公担（两千多万普特）。

一九二九年，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是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约八百万公担（约四千七百万普特），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是四百二十六万二千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约一千三百万公担（约七千八百万普特）。

在即将到来的一九三〇年，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照控制数字规定大概达到三百二十八万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将是一千八百万公担（约一亿一千万普特），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必将达到一千五百万公顷，其商品谷物产量将是四千九百万公担左右（约三亿普特）。

换句话说，在即将到来的一九三〇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商品谷物产量将要达到四亿多普特，即占**整个**农业商品谷物产量（农村外的流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应当承认，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工业也**未曾有过**，虽然这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般说来已经很快了。

很明显，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大农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

着伟大的前途，它将显示出发展的奇迹。

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取得这个空前的胜利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至少应当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取得这个胜利是因为党执行了列宁的教育群众的政策，通过发展合作社运动逐步地引导农民群众走向集体农庄。取得这个胜利是因为党从两方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一方面反对那些企图超过运动而用命令手段发展集体农庄的人（“左的”清谈家），另一方面反对那些企图把党拉向后退而做运动尾巴的人（右倾糊涂虫）。党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政策，就不能把集体农庄运动变为农民自己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列宁说：“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农村中的建设将遇到很大困难，在这里必须更加稳步前进，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行公共耕种制是极端荒谬的，能够赞成公共耕种制的只有极少数的觉悟农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决定这样做。因此，我们仅仅采取了革命发展所绝对必需的办法：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到前进的运动从这些群众亲身的经验中、从他们亲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二一页）

如果说党在集体农庄建设战线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那末这是因为党切实地执行了列宁的这个策略指示。

其次，在农业建设方面取得这个空前的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正确地估计到了农民对新农具、对新技术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正确地估计到了农民保存旧式耕作方法就没有出路，并且估计到这一切之后及时地给了农民许多帮助：成立农具租赁站、拖拉机队和机器拖拉机站，组织公共耕种制，建立集体农庄，用国营农场的力量从各方面帮助农民经济。

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政权，苏维埃政权，

它用事实证明了它有决心而且有能力给予劳动农民群众以系统的长期的**生产上的**帮助。

历来苦于缺乏农具的劳动农民群众不会不热烈欢迎这种帮助，走上集体农庄运动的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从今以后，工人的旧口号“面向农村”大概要用集体农民的新口号“面向城市”来补充，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最后，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取得这个空前的胜利是因为我国先进工人担任了这项工作。我指的是成十成百地散布在我国各主要地区的工人工作队。必须承认，在一切现有的和可能有的集体农庄运动宣传员中，工人宣传员对于农民群众是最好的宣传员。工人已经说服了农民，使他们相信集体大经济比个体小经济优越，并且现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是显示出这种优越性的明显的例证，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成就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成就在我看来是近几年来一切成就中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

“科学”的反对意见，即否认建立面积四万到五万公顷的大规模谷物工厂是可能的和适当的那种意见，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实践推翻了“科学”的反对意见，再一次表明了不仅实践应当向“科学”学习，而且“科学”也不妨向实践学习。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大规模谷物工厂是扎不下根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忘记这个“小小的”差别。

在资本家那里，因为存在着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购买许多土地或不缴纳绝对地租，就不能建立大规模谷物工厂，而要这样做就不能不使生产担负很大的开支。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既没有绝对地租，也没有土地的买卖，这就不能不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资本家那里，建立大规模谷物农场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

润，或者至少是获得相当于所谓平均利润率的利润，一般说来，不这样资本家就没有兴趣去建立谷物农场。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大规模谷物农场同时又是国营农场，它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发展既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也不需要平均利润率，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利润，这又为大规模谷物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大规模谷物农场无论在信贷上或税收上都没有特别的优待，而在旨在支持社会主义经济的苏维埃制度下，现在和将来都有这种优待。

最可敬的“科学”竟把这一切都忘记了。

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集团）的断言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他们断定说：

（甲）农民不会加入集体农庄；

（乙）加速发展集体农庄只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工农结合的破裂；

（丙）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合作社；

（丁）发展集体农庄和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会使国家没有粮食。

所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陈词滥调都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

第一、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而且是整村、整乡、整区加入的。

第二、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工农结合，给了工农结合以新的、生产的基础。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如果基本农民群众还有什么严重的不满，那就不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集体农庄政策，而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在供应农民机器和拖拉机方面赶不上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

第三、关于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的争论，是只配爱恒瓦里德和斯列普柯夫一类年轻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去进行的烦琐争论。

很明显，当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合作社的低级形式即供销合作社是“大道”，而当合作社的高级形式即它的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时候，集体农庄就成为发展的“大道”了。

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加引号的大道，这个计划包括农业合作社的一切形式，从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到高级形式（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把集体农庄同合作社**对立**起来，就是侮辱列宁主义并证明自己愚昧无知。

第四、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如果不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如果不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我们现在既不会有今年粮食收购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不会有已经积蓄在国家手中的几千万普特常备粮。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成就。

托洛茨基主义的所谓工人阶级没有本领领导基本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孟什维克“观点”正在破产，正在被粉碎。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中农转到集体农庄方面来了。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工业和农业的五年计划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年计划，那些不相信我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人是没有权利庆贺我们的五年计划的。

世界各国资本家梦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神圣的私有制原则”正在破灭，正在化为泡影。被他们看做资本主义滋养料的农民正在大批大批地离开被颂扬的“私有制”旗帜而走上集体制的轨道，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正在破灭。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资本主义分子拼命企图发动旧世界一切力量来反对举行进攻的社会主义，因而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资产阶级是不愿意“长入”社会主义的。

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资产阶级的走狗，形形色色的司徒卢威分子和盖森分子、米留可夫分子和克伦斯基分子、唐恩分子和阿布拉莫维奇分子最近对布尔什维主义发出了恶毒的狂吠。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正在消失，这可不是开玩笑。

阶级敌人的这种发狂的憎恨和资产阶级走狗的这种恶毒的狂吠，除了证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困难的战线上确实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列宁说：“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能够在事实上向农民指明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来帮助农民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才能牢靠地和实在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一七四页）

列宁就是这样提出把千百万农民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方法问题的，就是这样提出把农民引上集体农庄建设轨道的方法问题的。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坚决地克服了这条道路上的种种困难。

列宁说：“只有我们真正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十

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地知道，这在目前还是一种梦想），那末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给予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只有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才是对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〇页）

列宁就是这样提出在技术上重新武装中农的方法问题的，就是这样提出把中农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方法问题的。

过去的一年表明，党也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到即将到来的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们的田野上将要有六万多台拖拉机，再过一年将要有十万多台拖拉机，而再过两年就会有二十五万多台拖拉机了。几年前认为是“幻想”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把它变为现实，而且绰绰有余了。

这就是中农转到“康姆尼”方面来的原因。

党的第三个成就就是这样。

党在过去一年的几个主要成就就是这样。

结　论

我们正在开足马力沿着工业化的道路前进，向社会主义前进，把我们历来的“俄罗西的”落后性扔在后面。

我们的国家正在变成金属的国家，汽车化的国家，拖拉机化的国家。

当我们使苏联坐上汽车，使农夫坐上拖拉机的时候，让那些以自己的“文明”自夸的可敬的资本家们试试追上我们吧。我们还要看看，

到那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落后的国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先进的国家。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

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九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2卷第88—100页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普遍注意的主要事实，就是集体农庄运动的蓬勃发展。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特点是：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只有个别贫农集团加入集体农庄，现在中农也大批加入集体农庄了。这就是说，集体农庄运动已经由劳动农民个别集团和个别阶层的运动变成几百万几千万基本农民群众的运动了。这一点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具有强大的日益增长的**反富农的**巨浪性质的集体农庄运动，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富农的反抗，击破富农，为农村中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自豪，那末关于我们在一般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理论**工作成就就不能这样说了。而且应当承认，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但是，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不想在这里多讲理论的意义。你们对于理论的意义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义。糟糕的是我们正是在这方面，在我国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开始跛脚了。

否则又怎样解释在我们这里，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于我国经济问题还流行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呢？怎样解释这些大大小小的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呢？怎样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这些能消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的特效解毒剂竟开始被遗忘，不在我们报刊上广泛宣传，不知为什么没有被提到首要地位呢？不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彻底战胜阶级敌人，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为了不落后于实践，必须立即根据新的情况研究这一切问题。不这样就不能战胜那些引起我们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资产阶级理论。不这样就不能根除这些已经成为顽固偏见的理论。因为只有和理论上的资产阶级偏见作斗争，才能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现在让我从这些被称为理论的资产阶级偏见中拿出几个来批判一下，并通过对我国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说明来揭示出这些偏见的荒诞性。

一 “平衡”论

你们当然知道，在共产党员中间还流行着一种所谓我国国民经济各种成分“平衡”论。这种理论当然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右倾营垒中的许多人在鼓吹这种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我们首先有社会主义成分，——这是一个箱子；此外，我们还有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者说资本主义成分，——这是另一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大家知道，按几何学说来，平行线是不会相交的。可是，这个高

明理论的编造者认为，这两条平行线总有一天会相交，而当它们相交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没有看到，在这两个所谓“箱子”后面站着阶级，而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

不难了解，这种理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难了解，从客观上说，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

可是，这种理论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报刊上流行着。而且不能说它已经受到我们理论家的严重反击，更不用说致命的反击了。发生这种荒诞的事情，不是由于我们的理论思想落后，又是由于什么呢？

其实，只要从马克思主义宝库中取出再生产理论来和各种成分平衡论相对立，就能把这后一个理论打得粉碎。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教导说，现代社会不逐年实行积累就不能发展，而没有逐年扩大的再生产就不能实行积累。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我们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发展的，因为它的规模每年都在扩大，它有自己的积累，并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的大工业并没有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相反地，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还是小农经济。能不能说我国小农经济是按照扩大再生产原则发展的呢？不，不能这样说。我国小农经济的大部分不仅不能实现逐年扩大的再生产，相反地，连简单再生产也是很少有可能实现的。如果农业基础是这样一种既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而又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小农经济，那末能不能加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呢？不，不能。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

呢？不，不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崩溃。

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农业成为大农业，使农业能实行积累和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

但是怎样使农业成为大农业呢？

要做到这一点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用在农业中培植资本主义的方法使农业成为大农业，结果是使农民贫困，使资本主义企业在农业中发展起来。我们摈弃了这条道路，因为它是和苏维埃经济不相容的。

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农业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结果是使小农经济联合成为以技术和科学装备起来的大规模集体经济，这种经济有可能向前发展，因为它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

因此，问题就是这样：或者走第一条道路，或者走第二条道路；或者向资本主义**后退**，或者向社会主义**前进**。任何第三条道路都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平衡”论就是企图指出第三条道路。正因为它指望着第三条（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因此，只要拿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各种成分“平衡”论相对立，就能把这后一个理论打得粉碎。

为什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不这样做呢？谁需要使这种可笑的“平衡”论在我们报刊上流行，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束之高阁呢？

二 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现在来谈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二种偏见，即第二种资产阶级类型的理论。我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流”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右倾营垒中的同志们竭力鼓吹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的编造者的论断大致如下：我们这里有过资本主义，当时工业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而农村是自发地、自流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按照资本主义城市的形象进行改造的。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这样**，为什么在苏维埃经济制度下不能也是这样呢？为什么农村，小农经济不能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自发地按照社会主义城市的形象进行改造呢？这种理论的编造者根据这一点就断言农村能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农村本来就能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我们何必为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操心，我们何必争吵呢？

你们看，这又是一种从客观上说来目的在于给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一种新武器来反对集体农庄的理论。

这种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

而我们的理论家直到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痛斥这种引起我们集体农庄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奇怪理论，这不是很奇怪吗？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城市对个体小农农村的领导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正因为如此，工业对农业有改造的作用。但是，单靠这个因素是否就能使小农的农村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自流地跟着城市走呢？不，不能。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个体经济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经济。当然，小农商品经济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经济是同一类型的，因为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列宁在评论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说得万分正确，他说：“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①]是完全相反的。正是由于这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个原因，“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并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

能不能说农民小商品经济基本上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生产也是同一类型的呢？很明显，如果不离开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这样说的。否则列宁就不会说：“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流”论是一种腐朽的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因此，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城市只有在农村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按照新的社会主义轨范来改造农村，才能**带领**小农的农村。

奇怪的是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我们土地问题理论家应有的反击。

三　小农经济“稳固”论

现在来谈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三种偏见，即小农经济“稳固”论。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大经济优越于小经济的著名原理，认为这个原理只在工业中有效，而在农业中是不适用的。鼓吹这种理论的大卫和赫茨之类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企图“依据”的事实是：小农吃得苦，耐得劳，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甘愿忍受任何困苦；因此，小农经济在和农业中的大经济作斗争的时候就表现出稳固性。

不难了解，这种“稳固性”比任何不稳固性都坏。不难了解，这

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有一个目的：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因为这种理论有这样的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就把这种理论击破了。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反对这种理论的新论据，而我们的理论家却令人奇怪地不愿意利用或不会利用这种新武器去反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我所指的实践是：我国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土地已经国有化，这就使小农摆脱了对自己那一小块土地的奴隶般的依恋，因而使他们易于从**小**农经济转向**大规模的**集体经济。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过去和现在而且在将来还会把西欧的小农束缚在他们的小商品经济上呢？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他们私有的一小块土地，是土地私有制。他们为了买一小块土地成年累月地攒钱，他们买到以后，自然就不愿离开它，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他们的个体经济的基础，他们宁愿忍受各种困苦，宁愿陷入愚昧和贫困的境地。

能不能说这个因素在我们这里，在苏维埃制度条件下还同样继续发生作用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正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们这里的农民也就没有西方农民的那种对一小块土地的奴隶般的依恋。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小农经济易于转上集体农庄的轨道。

这就是在我们这里，在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农村的**大**经济，农村的集体农庄能够很容易地显示出对**小**农经济的**优越性**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消灭了绝对地租、废除了土地私有制而实行了土地国有化的苏维埃土地法的伟大革命意义。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我们拥有新论据去反对那些说小农经济在反对大经济的斗争中表现出稳固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不充分地利用这个新论据去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理论呢？

我们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根据之一，就是“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的名著“剩余价值学说史”和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所提供的理论前提，这些著作是最丰富的理论思想宝库。我指的是关于一般地租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绝对地租的理论。现在很明显，这些著作的理论原理已经在我们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光辉的证实。

只是令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查杨诺夫一类的“苏维埃的”经济学家的反科学理论应当在我们报刊上自由流行，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地租和绝对地租理论的天才著作就不应当广泛宣传并提到首位，倒应当束之高阁呢？

你们大概记得恩格斯的“农民问题”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你们当然记得恩格斯多么慎重地对待把小农引上协作经济道路，引上集体经济道路的问题。让我从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中引证有关的一段话吧：

“我们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生活得好些，使他们易于转到协作社，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做的话；如果他们还不能决定这样做，那我们就设法给他们**尽量多的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①

你们看，恩格斯多么慎重地对待把个体农民经济引上集体制轨道的问题。怎样解释恩格斯的这种初看起来似乎过分慎重的态度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农民有“自己的一小地”土地，他们很难离开它。西方的农民就是这样。存在着土地私有制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就是这样。当然，在这里是需要十分慎重的。

能不能说在我们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况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没有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个体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实行了使个体农民易于转上集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体制轨道的土地国有化。

这就是近来我们的集体农庄运动能够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发展的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还没有打算把我国农民情况和西方农民情况之间的这种差别相当清楚地揭示出来。但是，这样的工作不仅对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而且对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会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将来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究竟要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在没有这种基础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对于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无关重要的。

我在不久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大转变的一年”[①]）中发挥了几个人所共知的证明农业中的大经济优越于小经济的论据，在那里我指的是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无须证明，所有这些论据也完全适用于集体农庄这种大经济单位。我说的不仅是那些有机器拖拉机基础的发达的集体农庄，而且是那些代表集体农庄建设中所谓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依靠农民的原有农具的初级集体农庄。我指的是目前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所建立的那些不过是把农民的生产工具集合起来使用的初级集体农庄。

例如拿前顿河区霍泊尔区的集体农庄来说吧。从表面上看，这些集体农庄在技术方面似乎和小农经济没有区别（机器很少，拖拉机很少）。其实，在集体农庄里面单是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使用就产生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所梦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转上集体农庄轨道后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为什么会有这种“冲昏头脑”的效果呢？因为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当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

———————————————

① 见本卷第一〇六页至第一二一页。——编者注

集体农庄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因为农民已经有可能开垦在单干条件下难以开垦的熟荒地和生荒地。因为农民已经有可能把生荒地拿到自己手里。因为已经有可能使用荒原、零星小块土地和地界等等。

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问题对于我国农业有极大的意义。你们知道，过去俄国革命运动的轴心就是土地问题。你们知道，土地运动的目的之一是要消除缺地现象。当时许多人认为缺地现象是绝对的，就是说，俄国再没有适于耕种的闲地了。而实际情形怎样呢？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在苏联有过而且现在还有几千万公顷的闲地，但是农民用他们可怜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开垦这些土地的。正因为农民过去无法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所以他们就趋向于耕种“熟地”，耕种属于地主的土地，耕种适于在单干条件下用农民原有的农具耕种的土地。这就是“缺地”的根本原因。因此，无怪乎我们的以拖拉机装备起来的谷物托拉斯现在有可能使用约两千万公顷的闲地，这些土地是农民没有耕种过的，而且是以单干的方式用小农的农具所不能耕种的。

各个阶段（不论是最初阶段或是用拖拉机装备起来的更发展的阶段）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农民现在已经有可能使用熟荒地和生荒地了。这就是农民过渡到集体劳动之后播种面积大大扩大的秘密所在。这就是集体农庄优越于个体农民经济的一个根本原因。

不用说，当我们的机器拖拉机站和机器拖拉机队去帮助全盘集体化地区的初级集体农庄的时候，当集体农庄本身有可能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时候，集体农庄对个体农民经济的优越性就更加不容争辩了。

四　城市和乡村

关于所谓“剪刀差”问题，存在着一种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培

植的偏见，对这种偏见也像对其他一切不幸还流行在苏联报刊上的资产阶级理论一样，应该宣布无情的战争。我指的是一种认为十月革命给予农民的东西似乎比二月革命少，认为十月革命其实什么也没有给予农民的理论。

这种偏见有一个时候曾被一位“苏维埃的”经济学家在我们的报刊上宣扬过。固然，这位“苏维埃的”经济学家后来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喊声：“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个人就是格罗曼。但是，这种理论得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拥护，并被利用来反对党。而且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说，这种理论目前在“苏维埃的”舆论界已经不流行了。

同志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牵涉到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它牵涉到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问题。它牵涉到最迫切的“剪刀差”问题。因此，我认为这种奇怪的理论是值得分析一下的。

说农民从十月革命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是否正确呢？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我手里有著名统计学家涅姆契诺夫同志的著名统计表，这个统计表在我的“在粮食战线上”一文中发表过。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革命前地主“生产”的粮食不下六亿普特。所以，**地主**当时是六亿普特粮食的持有者。

根据这个统计表，**富农**当时“生产”的粮食是十九亿普特。这是富农当时所拥有的一种很大的力量。

根据同一个统计表，**贫农**和**中农**生产的粮食是二十五亿普特。

这就是旧的农村，十月革命前的农村的情景。

十月革命后农村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可以引用同一个统计表的数字。例如拿一九二七年来说吧。**地主**在这一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很明显，他们一点也没有生产，而且也不能生产，因为地主已经被十月革命消灭了。你们一定懂得，这必然大大改善农民的状况，因为农

民摆脱了地主的羁绊。这当然是农民由于十月革命而得到的很大的好处。

富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不是十九亿普特，而是六亿普特。可见富农的力量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被削弱了三分之二以上。你们一定懂得，这不能不改善贫农和中农的状况。

而**贫农和中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不是二十五亿普特，而是四十亿普特。可见贫农和中农在十月革命后所生产的粮食比革命前多了十五亿普特。

这就是说明贫农和中农从十月革命得到了莫大好处的事实。

这就是十月革命给予贫农和中农的东西。

既然如此，怎么能硬说十月革命没有给予农民任何东西呢？

但是，同志们，还不止此。十月革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消灭了土地的买卖，实行了土地国有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农民要生产粮食，完全用不着购买土地了。从前，他们为了购买土地成年累月地攒钱，只要买到土地，情愿借债，情愿遭受盘剥。购买土地的费用当然加在粮食生产的成本上。现在农民用不着这样做了。现在农民不必购买土地就能生产粮食。因此，农民用来购买土地的几亿卢布，现在都留在农民的荷包里了。这是什么，是改善了农民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农民的状况呢？显然是改善了农民的状况。

其次，直到最近，农民还不得不以单干方式使用旧式农具耕种土地。大家都知道，使用旧式的、现在已经不适用的生产工具单干，不能为生活得好些，不能为不断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发展自己的文化、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道路提供必要的好处。现在，在大力开展集体农庄运动以后，农民已经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同邻居的劳动联合起来，联合为集体农庄，开垦生荒地，利用熟荒地，得到机器和拖拉机，从而把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甚至两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由于联合为集体农庄，农民现在已经有可能用同样的劳动生

产出比以前多得多的东西。因此，这就是说，粮食生产的成本比以前低得多了。最后，这就是说，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出卖粮食得到的钱会比以前多得多。

既然如此，怎么能硬说十月革命没有给予农民好处呢？

说这种荒唐话的人显然是在诬蔑党，诬蔑苏维埃政权，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剪刀差"问题，消灭"剪刀差"问题，现在应当有新的提法。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如果集体农庄运动以现有的速度发展下去，"剪刀差"在最近期间就会消灭。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城乡之间的对立将加速消除。

同志们，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有极大的意义。它改变着农民的心理，使他们面向城市。它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创造了基础。它为用集体农民的"面向城市"的口号补充党的"面向农村"的口号创造了基础。

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现在农民从城市得到了机器、拖拉机、农艺师、组织者以及为反对和战胜富农所需要的直接帮助。极不信任城市，把城市看做强盗的旧式农民退到后面去了。代替他们的是对城市抱着希望，希望从城市得到**生产上的**实际帮助的新式农民，即集体农民。生怕下降为贫农而只想悄悄地（会剥夺选举权呵！）上升到富农地位的旧式农民，已经由有着新的前途——加入集体农庄，摆脱贫困和愚昧而走上经济和文化高涨的广阔道路的新式农民所代替了。

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变化的。

同志们，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竟没有采取一切办法去痛斥和根除一切企图诬蔑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日益增长的集体农

庄运动的资产阶级理论。

五 关于集体农庄的本质

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类型**，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有一个人在这里发言时侮辱集体农庄。他断言集体农庄这种经济组织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毫无共同之处。同志们，我必须指出，对集体农庄做这样的估计是完全不正确的。毫无疑问，这种估计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经济类型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很明显，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决定的。否则还有什么可以决定经济类型呢？但是，难道在集体农庄里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阶级吗？难道在集体农庄里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吗？难道集体农庄不是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实行基本生产工具公有化吗？有什么根据断言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类型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呢？

当然，在集体农庄里是有矛盾的。当然，在集体农庄里是有个人主义残余甚至富农思想残余的，这些残余还没有消失，但是过一个时候，随着集体农庄的巩固，随着集体农庄的机械化，这些残余必定会消失。但是整个说来，把矛盾和缺点都包括在内，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因素基本上是农村发展的新道路，是和富农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相反**的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难道可以否认吗？在我国条件下，集体农庄（我说的是集体农庄，而不是冒牌的集体农庄）是在同资本主义分子进行殊死搏斗中发展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地和策源地，这难道可以否认吗？

有些同志企图侮辱集体农庄而把它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一九二三年我们还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列宁在他的“论合作制”一书中指出的是合作社的一切形式，既包括它的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也包括它的高级形式（集体农庄）。他当时关于合作社，关于合作社企业是怎样说的呢？请看列宁的“论合作制”一书中的一段话吧：

“在我们的现存制度下，合作社企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社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们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①]，如果它们是建筑在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上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页）

可见列宁并不是把合作社企业孤立起来观察，而是把它们和我们的现存制度联系起来观察，注意到合作社企业是在生产资料属于国家的国家里，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经营的；列宁这样观察合作社企业之后，就断定说它们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

列宁关于一般合作社企业就是这样说的。

关于目前的集体农庄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说，这不是很明显吗？

列宁认为在我国条件下“单纯的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你们可以看出，上面提到的那位发言人侮辱集体农庄，就是犯了极严重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

从这个错误中产生了他的另一个错误——关于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这位发言人把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说得有声有色，使人会以为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并无不同之处**。甚至会以为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更加残酷。而且不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发言人一个人犯了这种错误。空谈阶级斗争，叫嚷集体农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庄内的阶级斗争，是目前我们的一切“左的”空喊家的特征。在这种叫嚷中最可笑的是这些叫嚷者在没有或几乎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看见了”阶级斗争，而在有阶级斗争并且阶级斗争很尖锐的地方却看不见阶级斗争。

集体农庄内是否有阶级斗争的因素呢？是的，是有的。既然集体农庄内还保存着个人主义心理甚至富农心理的残余，既然集体农庄内还存在着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的某些不平等现象，那末集体农庄内就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因素。能不能说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是相同的呢？不，不能。我们的“左的”清谈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这个差别。

集体农庄**外**的，集体农庄成立**以前**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同**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用这些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盘剥**贫农的富农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

而集体农庄**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说，富农已经被击溃并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其次，这就是说，贫农和中农已经在基本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联合为集体农庄。最后，这就是说，这是集体农庄庄员之间的斗争，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还没有摆脱个人主义残余和富农思想残余，企图利用集体农庄内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图利营私，而另一部分人想把这些残余和这些不平等现象从集体农庄中铲除掉。只有瞎子才看不见集体农庄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之间的差别，这不是很明显吗？

如果以为有了集体农庄，就有了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错了。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庄员已经变成社会主义者，那就更错了。不是的，要改造集体农民，克服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还必须做很多工作。集体农庄机械化实现得愈快，集体农庄拖拉机化实现得愈快，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愈快。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集体农庄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杠杆的极大的

意义。集体农庄的伟大意义，正在于它是农业中采用机器和拖拉机的主要基地，是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农民、改造农民心理的主要基地。列宁说得对：

“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物质基础，只有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和小农有关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四页）

集体农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只有通过它，千百万个体小农才能参加拥有机器和拖拉机的大经济，而机器和拖拉机是经济繁荣的杠杆，是农业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杠杆，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我们的“左的”清谈家把所有这些都忘记了。

我们的这位发言人也把这一点忘记了。

六　阶级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转变

最后谈谈国内阶级变动和社会主义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问题。

我们党最近一年来的工作的特点就是：

（甲）我们党、我们苏维埃政权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全线进攻；

（乙）大家知道，这个进攻产生了并且继续产生着非常显著的**良好**结果。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实行并且还在继续实行我们整个政策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

直到最近，党都是主张**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向的。大家知道，这个政策早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宣布了。这个政策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以及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重新宣布了。大家都记得列宁评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的著名的信（一九二二年），列宁在那封信里再一次说到必须实行这个政策的问题。最后，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肯定了这个政策。直到最近，我们都是实行这个政策的。

这个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它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们能不能向富农举行这样的进攻呢？当时我们能不能指望这样的进攻获得胜利呢？不，不能。这样做就是最危险的冒险主义。这样做就是最危险地以进攻为儿戏。因为这样做我们一定会失败，既然失败了，就会使富农的阵地巩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在农村还没有能够据以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的据点，即广大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网。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社会主义生产**代替**富农的资本主义生产。

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曾拚命强迫党采取立刻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党没有采取这种危险的冒险行动，因为党知道，严肃的人是不能允许自己以进攻为儿戏的。向富农进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不能把它和反富农的高调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它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拼命强迫党采取的同富农扭打的政策混为一谈。向富农进攻，这就是击破富农并消灭富农阶级。离开这些目的，进攻就是高调，就是扭打，就是空喊，随便叫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向富农进攻，这就是准备实际行动，打击富农，而且把他们打得再也站不起来。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所说的真正的进攻。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们能不能举行这样的进攻而指望获得胜利呢？不，不能。

的确，富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通过农村

外的交换卖出了大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多少呢？大约八千万普特，其中运到市场去的（商品粮食）约为三千五百万普特。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我们当时能不能用我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和商品粮食**代替**富农的生产和商品粮食呢？显然不能。

在这种情况下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加强富农的阵地而得不到粮食。正因为如此，当时尽管有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冒险主义高调，我们也不能够而且不应当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

可是现在呢？现在的情况怎样呢？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击破富农的反抗，消灭富农阶级，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大家知道，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不下于四亿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农经济的总产量少两亿普特）。其次，大家知道，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的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即比一九二七年富农的商品粮食多些）。最后，大家知道，一九三〇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粮食总产量将不下于九亿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农的总产量多），而它们所提供的商品粮食将不下于四亿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农的商品粮食多得多）。

同志们，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国经济中所发生的变动。

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向富农举行的坚决进攻现在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

如果说的是真正的坚决进攻，而不限于空洞的反富农高调，那就应当这样向富农进攻。

这就是我们近来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

的政策的原因。

那末，对于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怎样办呢？是否可以容许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呢？——各地的人们问。真是可笑的问题！当我们主张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可能转为向富农坚决进攻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时候，剥夺富农财产是不能容许的。那时不容许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而现在呢？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我们有可能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击破富农的反抗，消灭富农阶级，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现在剥夺富农财产是由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群众自己进行的。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

还有一个同样可笑的问题：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

七 结 论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的理论工作决不能忽略的六个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的意义首先在于对这些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就能根除一切资产阶级理论，而这些理论有时——真叫我们丢脸——竟被我们的党员同志传播着，引起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的思想混乱。早就应该铲除这些理论，抛弃这些理论了。因为只有和诸如此类的理论作无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的理论思想才能成长和巩固起来。

最后，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它们使过渡时期经济中的旧问题有了新面貌。

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集体农庄问题，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现在都有了新的提法。

必须揭露把新经济政策了解为退却而且仅仅了解为退却的那些人的错误。事实上，列宁还在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时就曾说过，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退却，它同时又是准备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举行新的坚决进攻。

必须揭露认为需要新经济政策只是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的那些人的错误。我们需要的不是城乡之间的任何一种联系。我们需要的是能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那种联系。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

还必须提出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问题。必须研究我国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格式问题。中央统计局在一九二六年当做国民经济平衡表公布的东西，不是平衡表，而是数字游戏。巴札罗夫和格罗曼对国民经济平衡表问题的见解也是不合适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苏联国民经济平衡表的格式制定出来，如果他们一般说来愿意研究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的话。

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分出一部分工作人员根据过渡时期经济问题在目前发展阶段的新的提法去专门研究这些问题，那就很好了。

载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真理报”第三〇九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2 卷第 105—125 页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非常抱歉，信回迟了（太迟了！），请不要骂我。我忙得不成样子。此外，还生过一点病。这当然不能替我辩护，但可以说明一些情况。

（一）我们不能没有自我批评。无论如何不能，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没有自我批评，机关的停滞和腐朽，官僚主义的滋长，工人阶级创造主动性的破坏就不可避免。当然，自我批评会给敌人提供材料。在这一点上你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也为我们的前进，为劳动者建设力量的发挥，为竞赛的展开，为突击队等等提供了材料（和推动力）。好处是会抵销和**盖过**坏处的。

可能我们的报刊过分强调了我们的缺点，有时候甚至（无意地）宣扬了这些缺点。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可以肯定的。这当然不好。因此，你要求用我们的成绩来和我们的缺点相平衡（依我说，要用成绩来盖过缺点）。在这一点上你当然也是正确的。我们一定立即弥补这个缺陷。这一点你可以不必怀疑。

（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青年。有垂头丧气的，疲倦懈怠的，悲观失望的（例如捷宁）。也有朝气勃勃的，活泼愉快的，意志坚强和不达胜利决不罢休的。现在，当我们割断生活中的旧联系而建立新联系的时候，当我们破坏走惯了的道路而铺设没有走惯的新道路的时候，当从前过着富裕生活的整批整批居民脱出轨道，离开队列，给从前受压制、受折磨的千百万人让开道路的时候，青年不可能都是清一色的同情我们的群众，他们中间不可能没有分化和分裂。第一、在青年中间有富家子弟。第二、即使拿我们自己的（按社会地位）青年来说，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意志、力量、毅力和理解力，都能把大规模破坏旧事物和急速建设新事物的景象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也是**合乎愿望的**景象，并且是和那种应当让人能够“休息”和“享福”的“四海升平”的天堂般的安乐生活很少相像的景象。显然，在这种“令人头昏的混乱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没有疲倦懈怠的人，神经过度紧张的人，未老先衰的人，悲观失望的人，脱逃的人以及投到敌人阵营里去的人。这是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消耗”。

现在主要的是：在青年中间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垂头丧气的人，而是我们的战斗的青年团员——摧毁资本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解放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数众多的新的一代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也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三）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采取有组织地从思想上（以及从其他一切方面）影响的办法竭力减少灰心者、叫苦者、怀疑者等等的人数。相反地，我们的党、我们的文化组织、我们的报刊、我们的苏维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这种影响并取得重大成果。因此，我们（我们的朋友）完全接受你的建议：

（甲）创办“国外”杂志；

（乙）出版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通俗文集，吸收阿·托尔斯泰和其他文学家参加这个工作。

不过必须附加一句：这些事情一件也不能交给拉狄克或他的某个朋友去领导。问题不在于拉狄克的善良心愿或诚恳态度。问题在于派别斗争的逻辑，他和他的朋友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斗争（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会推动他们进行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并且不仅我们党的历史）教导说，事物的逻辑比人的心愿的逻辑更有力量。如果把这些事情交给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领导，而吸收拉狄克和他的朋友做撰稿人，那就会更正确些。这样做会更正确些。

（四）我们认真地讨论了关于创办专门杂志“关于战争”的问题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没有出版这种杂志的理由。我们认为比较适当的是在现有的**政治**杂志上论述战争问题（我说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况且不能把**战争**问题同**政策**问题分开，因为战争是政策的表现。

至于描写战争的小说，那必须严加选择之后再出版。在书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描写战争的“恐怖”、引起对**一切**战争（不仅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也对其他**一切**战争）的反感的文艺小说。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小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把读者从**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引到了解必须打倒组织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小说。此外，要知道我们不是反对**任何**战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战争。但是我们**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虽然大家知道这种战争不仅没有免于“流血的恐怖”，甚至充满了这种恐怖。

在我看来，打算反对战争“恐怖”的沃龙斯基的立场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没有多大区别。

（五）你说得完全正确，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报刊上，在反宗教宣传问题上极为混乱。有时竟说出了有利于敌人的令人惊奇的蠢话。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多极了。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和做反宗教工作的同志们商谈你的建议。关于这一点我下次写信告诉你。

（六）我不能满足加米古洛夫的请求。没有时间！此外，我算什么批评家，真是见鬼！

就此搁笔。

紧紧握手并祝你健康。

谢谢你的问候。

约·斯大林

听说你需要一位俄国医生。是真的吗？想要哪一位？请来信告知，

一定派去。

约·斯·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

第一次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2卷第126—129页

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红星报”第十六号刊载的“消灭富农阶级”一文一般说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有两个地方说得不确切。我认为必须予以纠正。

一、该文说：

“在恢复时期，我们实行了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从改造时期开始，我们就从限制的政策过渡到排挤他们的政策了。”

这种论断是不对的。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和排挤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政策。这是同一个政策。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是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即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分。不能把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同排挤富农**阶级**看成一样。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是排挤和战胜那些受不住税收压力、受不住苏维埃政权的种种限制办法的富农**个别队伍**。很明显，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不能不导致排挤富农个别队伍。因此，排挤富农个别队伍不能不看做是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分。

我们不仅在恢复时期实行了这个政策，而且在改造时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以后的时期，在我们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一九二九年四月）时期，以及在这次代表会议以后直到一九二九年夏季，我们也都实行了这个政策；而从一九二九年夏季起，我们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开始了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方面的**转变**。

如果看一看党的最重要的文件，例如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到一九二九年四月第

十六次代表会议（见“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的决议）这个期间的文件，那就不能不看出，“限制富农剥削趋向”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增长”的论点总是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论点**同时并提**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党**没有**把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同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即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分开**。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及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完全是站在“限制农业资产阶级的剥削趋向”（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采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办法”（同上）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坚决限制富农剥削趋向”（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向富农进攻”即“进一步地、更有步骤和更坚决地限制富农和私商”（同上）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更坚决地从经济上排挤”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这一政策的基础上。

因此，（甲）该文作者把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和排挤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说成两个不同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事实说明，这里只有一个限制资本主义的总的政策，而排挤富农个别队伍是这个政策的组成部分和结果。

因此，（乙）该文作者断言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只是在改造时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期才开始的，这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无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即在恢复时期，还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即在改造时期，排挤都是有的。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期，只是用新的补充办法加强了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因此，对富农个别队伍的排挤也就必然加强了。

二、该文说：

“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完全是从排挤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后一政策在新阶段上的继续。”

这种论断是不确切的，因而也是不对的。当然，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由以前限制即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整个时期准备好的。但这还不是说，它和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没有**根本**区别，它似乎是限制政策的**继续**。像我们的作者那样说，就是否认从一九二九年夏季起在农村发展中所发生的**转变**。那样说，就是否认这个时期内我们在我们党的农村政策上实行了**转变**的事实。那样说，就是给我们党内的右倾分子造成一种思想上的护符，因为右倾分子现在正抓住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反对党的**新**政策，就像过去弗鲁姆金抓住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反对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一样。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加强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的出发点是：虽然对富农实行了这种限制，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在相当时期内还是**要继续存在**的。**根据这一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保留土地租佃法，虽然明明知道大多数租佃者都是富农。**根据这一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保留农村雇佣劳动法，要求切实执行这个法律。**根据这一点**，再次宣布了不准剥夺富农财产。这些法律和这些决议是否同**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抵触呢？当然**不**抵触。这些法律和这些决议是否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抵触呢？当然**是**抵触的！因此，现在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就不得不把这些法律和这些决议搁在一边，而全盘集体化的范围不是逐日扩大而是逐时扩大的。况且，这些法律和这些决议已经被全盘集体化地区集体农庄运动的进程本身搁在一边了。

既然如此，能不能断言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是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的**继续**呢？显然不能。

该文作者忘记了：如果把生产工具和土地自由使用权**保留**在富农

阶级手里，如果在我们的实践中**保存**农村雇佣劳动法和土地租佃法并禁止剥夺富农财产，那末用税收和其他任何限制办法都是不能排挤富农阶级的。作者忘记了：在实行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时只能指望排挤富农的个别队伍；这和在相当时期内**保存**富农阶级并不抵触，相反地，倒是预计到这一点的。要排挤富农阶级，单靠限制和排挤富农个别队伍的政策是不够的。要排挤富农阶级，必须在公开的战斗中**击破**这个阶级的反抗，**剥夺**这个阶级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基础（土地的自由使用、生产工具、租用土地、劳动雇佣权等等）。

这就是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方面的**转变**。否则关于排挤富农阶级的谈论就只能是合乎右倾分子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无谓空谈。否则就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农村集体化，更谈不到全盘集体化了。我们农村中的那些正在粉碎富农而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看来我们的某些同志还不了解这一点。

因此，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

载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红星报”第十八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2 卷第 130—133 页

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

（一九三〇年二月九日）

一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提出的问题

一、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提纲中说苏维埃俄国有两个主要阶级。

现在我们说要把富农和新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来消灭。

这是不是说我国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了第三个阶级？

二、你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怎样了解这个"抛开"，又怎样抛法？

三、随着在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党应当怎样改变现在决定着无产阶级和农民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口号，"要善于和中农成立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而只是稳固地依靠贫农"（列宁）？

四、必须采取哪些方法才能消灭富农阶级？

五、同时实行两个口号，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在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实行限制和排挤富农的口号，是否会引起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的富农自我消灭（糟蹋财产和生产资料）？

六、我国富农阶级的消灭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革命浪潮的高涨，对"喘息时机"的长短会有什么影响？

七、你对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革命高潮转变为直接革命形势的可能性怎样估计？

八、整个整个车间的工人决定入党，从党和工人阶级今后的相互关系来看，对工人阶级的这种新动态应当怎样估计？

九、由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大规模发展，扩大农村党组织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在扩大的范围和接收各阶层集体农庄庄员入党方面，我们的政策应当怎样？

十、你对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极重要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的看法怎样？

二　斯大林同志的答复

第一个问题。列宁说过有两个**主要**阶级。但是，他当然知道存在着第三个阶级即资本主义阶级（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当然不是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才“形成”阶级的。他们在新经济政策以前就已经存在，不过是一个**次要的**阶级。新经济政策在发展的最初阶段，曾在某种程度上便利了这个阶级的发展。但是，新经济政策更多地帮助了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党转入全线进攻，就把问题急剧地转到了打垮并消灭农村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方面。

为了说得确切起见，必须指出，党并没有指示把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扩大到城市新资产阶级方面去。应该看到耐普曼和富农之间的差别：耐普曼基本上早就被剥夺了**生产**基础，所以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不占多少重要的地位；而富农直到最近在农村中还占重要的经济地位，我们**只是现在**才剥夺他们的**生产**基础。

我认为我们的某些组织忘记了这个差别，它们企图用消灭城市资产阶级的口号来“补充”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所以犯了错误。

第二个问题。我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大会上演说时所讲的那句尽人皆知的话应当这样了解：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

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

第三个问题。很明显，随着苏联大部分地区的集体化，富农阶级将会消灭，——因此，伊里奇的公式的这一部分就不适用了。至于集体农庄里的中农和贫农，那末随着集体农庄的机械化和拖拉机化，他们将融合为集体化农村的工作人员的统一的队伍。因此，将来在我们的口号中就不会再有“中农”和“贫农”的概念了。

第四个问题。消灭富农阶级的主要方法是普遍集体化。其余一切办法都必须适应这个主要方法。凡是和这个方法抵触或者会减弱它的作用的都必须抛弃。

第五个问题。决不能把“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和“限制富农”的口号说成两个**独立的**和**平等的**口号。从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时起，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就成了**主要**口号，而在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限制富农的口号就从独立的口号变成了**补助**口号，变成了主要口号的**辅助**口号，变成了使这些地区易于为过渡到主要口号准备条件的口号。可见在目前新的情况下，“限制富农”的口号所占的地位同它一年前和更早以前所占的地位比较起来已经根本改变了。

应该指出，可惜我们的某些报刊没有注意到这个特点。

在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一部分富农预料到要被剥夺财产而实行“自我消灭”，“糟蹋财产和生产资料”，这是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必须反对这种行为。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准许把剥夺富农财产不当做集体化工作的一部分，而当做在集体化以前和离开集体化而进行的独立工作来做。准许这样做，就是拿**分配**所没收的富农财产使个别农民个人致富的政策来代替把这些财产变为集体农庄**公有**的政策。这种代替是后退一步，而不是前进一步。反对

富农“糟蹋”财产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加强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的集体化工作。

第六个问题。你们所列举的手段和条件**能**大大缩短“喘息”时期。但是，它们无疑地**一定**会加强和增多我们的防卫手段。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形势，取决于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内的矛盾的增长，取决于世界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扩展。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不能说：“在这条线之内是革命高潮，一过这条线就是向直接革命形势的飞跃。”只有书呆子才会这样提问题。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

第八个问题。整个整个车间甚至整个整个工厂的工人希望入党，这是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革命热情大大提高的标志，是党的政策正确的标志，是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热烈拥护这个政策的标志。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接收一切希望入党的人入党。在车间和工厂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甚至有暗害分子。因此，党应该继续采用**个别**对待每个希望入党的人和**个别**接收入党这一经过考验的方法。我们不仅需要数量，而且需要质量。

第九个问题。不言而喻，集体农庄中党的队伍将比较迅速地发展。最好是集体农庄运动中一切在反富农斗争中锻炼得最坚强的分子，特别是雇农和贫农分子，都能在党的队伍里得到发挥自己力量的机会。这里当然应该特别坚决地实行个别对待和个别接收入党的方法。

第十个问题。在我看来，在经济学家的争论中有很多烦琐的和臆造的东西。如果剥去争论的外壳，那末争论双方的主要错误如下：

（甲）任何一方都未能很好地运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既反对“鲁宾主义”，又反对“机械主义”；

（乙）双方都离开了苏联经济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基本问题而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因而把两年的工作消耗在抽象的题目上，这当然是合乎我们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二月九日

载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
“真理报”第四十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2卷第134—138页

胜 利 冲 昏 头 脑

（论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的胜利。甚至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获得了重大胜利。这些胜利确实是伟大的。

截至今年二月二十日，苏联全国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已经集体化了，这是事实。这就是说，截至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日，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集体化五年计划的一倍以上。

截至今年二月二十八日，集体农庄**已经**收藏了春播用的种子三千六百多万公担，等于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约合二亿二千万普特，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在粮食收购计划顺利完成以后，单是集体农庄方面就收藏了二亿二千万普特种子，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就。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农村向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可以认为已经有保障了**。

无须证明，这些胜利对于我们国家的命运，对于作为我国领导力量的整个工人阶级以及对于党本身都有极大的意义。姑且不说直接的实际结果，这些胜利对于党本身的内部生活，对于我们党的教育也是有巨大意义的。这些胜利鼓起了我们党的勇气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这些胜利用相信我们的事业必胜的信念武装了工人阶级。这些胜利把千百万新的后备力量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

因此，党的任务是：**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

但是，胜利也有它的阴暗的一面，特别当它是比较“容易地”，所谓“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的时候。这样的胜利有时使人产生自负

和骄傲的心理：“我们什么都能干！”“我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些胜利往往使人陶醉，人们也就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解现实的能力，出现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而过低估计敌人力量的趋向，出现想“一下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问题的冒险企图。这样也就不会关心**巩固**既得的胜利和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为什么我们要巩固既得的胜利呢，我们就这样也能“一下子”跑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因为“我们什么都能干！”“我们什么都不在乎！”

因此，党的任务是：和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绪作坚决斗争，把它从党内消除出去。

不能说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绪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什么广泛的散布。但是，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毕竟是有的，而且没有根据可以断定说这种情绪不会加强起来。如果这种情绪在我们这里得到公认，那末毫无疑问，集体农庄运动就会大大削弱，这个运动被破坏的危险就会成为现实。

因此，我们报刊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揭穿诸如此类的反列宁主义的情绪。

举几个事实来说。

一、我们的集体农庄政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是以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原则**和**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为依据的。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集体农庄运动应当依靠基本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决不能把先进地区集体农庄建设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到落后地区去。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这样的“政策”一下子就会破坏集体化思想。在规定集体农庄建设的速度和方法的时候，应当周密地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

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我们的产粮区走在一切地区的前面。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在这些地区我们有最多的已经巩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通过这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农民已经有可能相信新技术的力量和意义，相信新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力量和意义。

第二、因为这些地区在粮食收购运动中有两年反富农斗争的经验，这不能不有助于集体农庄运动。

最后，因为这些地区最近几年来从工业中心得到了大批优秀干部。

能不能说其他地区，例如消费地区（如我国北方各区）或者还落后的民族居住的地区（如土尔克斯坦），也具备了这些特别有利的条件呢？

不，不能这样说。

很明显，和自愿原则一样，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是健康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而我们的实际情况有时又是怎样呢？能不能说自愿原则和估计到地方特点的原则没有在某些地区遭到破坏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说。例如大家知道，在北方某些消费地区，立即组织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比产粮区要少些，但是人们往往竭力用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用发展集体农庄的纸上决议，用组织实际上还不存在但是已经有一大堆吹牛的决议说得它好像“存在”的纸上集体农庄，来**代替**组织集体农庄的准备工作。

或者拿土尔克斯坦某些地区来说，那里立即组织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比北方消费地区还少。大家知道，在土尔克斯坦某些地区已经有人企图用武力威胁的办法，用不供给暂时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灌溉用水和工业品的威胁办法来“赶上并超过”苏联各先进地区。

在这种普利施别也夫下士[①]的“政策”同党在集体农庄建设事业

————————————

① 指俄国作家契诃夫所写的短篇故事“普利施别也夫下士”中的主人公。他骄傲自大，愚昧无知，蛮不讲理，干涉他人自由，想压制和窒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译者注

中以自愿原则和估计到地方特点的原则为依据的政策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很明显，它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谁需要这种歪曲，这种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这种对农民的可耻的威胁呢？除了我们的敌人，谁也不需要！

这种歪曲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会加强我们的敌人而破坏集体农庄运动的思想。

以“左派”自居的制造这种歪曲的人事实上是在帮助右倾机会主义，这不是很明显吗？

二、我们党的政治战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它善于在每一个时机找出运动的**基本环节**，抓住了这个基本环节，然后就把整个链条拖向一个总的目标去解决任务。是否可以说党在集体农庄建设体系中已经找出了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呢？是的，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

这个基本环节是什么呢？

也许是**共耕社**吧？不，不是共耕社。生产资料还没有公有化的共耕社是集体农庄运动中已经过时的阶段。

也许是**农业公社**吧？不，不是公社。公社在目前还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个别现象。把这种不仅生产公有化而且分配也公有化的农业公社作为**主要**形式，条件还没有成熟。

在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即现在应当抓住的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农业劳动组合**。

在**农业劳动组合**中实行公有化的是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谷物业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劳动、土地使用、机器和其他农具、耕畜以及经营用的建筑物。在农业劳动组合中**不实行公有化**的是：宅旁园地（小菜园、小果园）、住宅、一部分产乳牲畜、小牲畜、家禽等等。

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因为它是解决谷物问题的最适当的形式。而谷物问题又是**整个农业体系中的基本环节**，因为不解决谷物问题就不能解决畜牧业（小牲畜和大牲畜）问题，也不能解

决给工业提供主要原料的技术作物和特种作物问题。正因为如此，农业劳动组合在目前时期是集体农庄运动体系中的基本环节。

集体农庄“标准章程”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它的最后定本今天公布了[①]。

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也应当从这一点出发，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切实研究这个章程并彻底实行这个章程。

党在目前时期的方针就是这样。

能不能说党的这个方针在实行时没有遭到破坏和歪曲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说。大家知道，在苏联某些地区，争取集体农庄存在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劳动组合还没有巩固，但是有人企图跳出劳动组合的范围，一下子跳到农业公社。劳动组合还没有巩固，但是他们已经在使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公有化”，而这种“公有化”也就变成了纸上的官僚主义的命令，因为现在还没有使这种公有化成为必要的条件。他们这样做，仿佛谷物问题在集体农庄中已经解决，它是已经过时的阶段，目前时期的基本任务不是解决谷物问题，而是解决畜牧业和养禽业问题。试问，谁需要这种把集体农庄运动的各种形式搅成一团的鲁莽“工作”呢？谁需要这种愚蠢的对事业有害的急躁冒进呢？当谷物问题还**没有解决**，集体农庄的劳动组合形式还**没有巩固**的时候，拿住宅、全部产乳牲畜、全部小牲畜和家禽的“公有化”来戏弄集体农民，——这样的“政策”只能合乎我们的死敌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在这种热心的“公有化者”当中，有一位竟向劳动组合下命令，责令“三天之内把每个农户的家禽总数统计出来”，设置专门的“指挥员”来指挥统计和监督工作，“占领劳动组合中的制高点”，“指挥社会主义战斗，不得离开岗位”，而——当然的事——把整个劳动

——————————————

①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真理报”。

组合紧握在拳里。

这是什么呢，是领导集体农庄的政策还是**瓦解**集体农庄和**破坏**集体农庄**威信**的政策呢？

至于那些从拆下教堂的钟**着手**组织劳动组合的所谓“革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把钟拆下，——这该是多么革命呵！

在我们队伍里怎么能产生这种“公有化”方面的鲁莽儿戏，这种想跳过自身的可笑企图，这种目的在于回避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的阶级敌人的企图呢？

它们只有在我们集体农庄建设战线上“容易地”和“出乎意料之外地”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它们只有在一部分党员产生了鲁莽情绪，认为“我们什么都能干！”“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它们只有在我们的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暂时丧失了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眼光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为了纠正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工作路线，**必须消除这种情绪**。

这就是党的当前任务之一。

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

我们党所以强而有力和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在领导运动的时候善于保持和加强自己同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联系。

载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
“真理报”第六十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2卷第140—145页

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大家从报上知道，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和中央的“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著名决议在集体农庄运动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引起了很多反应。因此，近来我收到了庄员同志们的许多来信，要求答复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来我应当以私人通信方式答复来信。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半数以上的来信没有写明寄信人的地址（忘记写地址了）。可是，信中所涉及的问题对于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有莫大的政治意义。此外，当然我也不能不答复那些忘记写明自己地址的同志。因此，我不得不从来信中挑出一切必要的问题，公开地即在报刊上答复庄员同志们的来信。加上中央对此已有直接的决定，所以我就更乐意这样做了。

第一个问题：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在哪里？

答：在于不正确地对待了中农。在于在和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了暴力。在于忘记了和中农群众的经济结合不应当建立在强制手段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和中农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在和中农联盟的基础上。在于忘记了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贫农联合中农去反对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富农。

当和中农结成统一战线向富农进攻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可是，当我们的某些陶醉于胜利的同志不知不觉地从进攻富农的道路滚到反对中农的道路的时候，当他们因为追求集体化的高的百分数而对中农采用暴力，褫夺中农的选举权，像剥夺富农那样剥夺中农财产的时候，进攻就被歪曲，和中农的统一战线就被破坏，富农当然也就得到了企图恢复元气的机会。

他们忘记了：在和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时，暴力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对待作为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时，暴力就是不可容许的和极端有害的了。

他们忘记了：在解决军事性质的任务时，骑兵式的突袭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在解决集体农庄建设任务而且是联合中农来进行的建设任务时，骑兵式的突袭就是不适用的和极端有害的了。

这就是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

请看列宁关于和中农的经济关系所说的话：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这里没有上层可以拆去，而留下整个基础和整个结构。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上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 要想在经济方面对中农采用暴力，那是再愚蠢不过了**。”（“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七页、第一八八页）

其次：

“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七页）

看来是很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答：主要错误至少有三个。

（一）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党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的基本指示和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关于自愿

原则的规定。

列宁主义教导说，必须根据自愿原则，用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公共的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的方法把他们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列宁主义教导说，只有向农民**指明**并用事实、用经验**证明**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好，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有利，集体农庄能使农民，使贫农和中农摆脱贫穷和困苦的时候，才能说服农民，使他们相信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列宁主义教导说，没有这些条件，集体农庄就不能巩固。列宁主义教导说，任何想用暴力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农庄经济的企图，任何想用强迫手段建立集体农庄的企图，都只能产生不良后果，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当遵守这个基本规则的时候，集体农庄运动就节节取得胜利。但是，我们的某些陶醉于胜利的同志竟开始忽视这个规则，开始表现出过分的急躁，并且因为追求集体化的高的百分数而开始用强迫手段建立集体农庄。无怪乎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了。迅速出现的集体农庄，像它迅速出现那样迅速地消失了，而一部分昨天还很信任集体农庄的农民现在开始躲避集体农庄了。

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一个和主要的错误。

请看列宁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所说的话：

“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过渡到**公共**耕种制，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但是，任何强迫手段都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采取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强迫这样做。农业**公社**是**根据自愿原则**建立的，过渡到**公共耕种制**只能是**自愿的**，在这方面，任何强迫手段都是工农政府所不能采取的，而且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如果你们中间任何人看到这样的强迫手段，那你们应当知道，这是滥用职权，这是违反法律，这是我们正在竭力纠正而且一定要纠正的现象。”[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第二十六页至第二十七页）

其次：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能够在事实上向农民**指明**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来帮助农民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才能牢靠地和实在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此，任何有助于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的措施，其意义都是难以估价的。我们有千百万零散的、分布在穷乡僻壤的个体农户…… 只有当过渡到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是必要而可能的这一点**在实践中**和**在**农民亲身**经验中得到证明**的时候，我们才有权利说，俄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农民国家已经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一七四页）

最后，再看列宁著作中的另一段话：

“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们鼓励各种协作社以及中农农业公社，但是不应当容许在建立这种协作社和农业公社的时候采取**任何强迫手段**。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自由发起的、其好处经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在这件事上过分急躁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加强中农对新事物的成见。那些擅敢利用不仅是直接的而且哪怕是间接的强迫手段来使农民加入公社的苏维埃政权代表，都应当受到极严厉的处分，应当撤销他们在农村中的工作。”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四页）

看来是很明白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党是会十分严格地执行列宁的这些指示的。

（二）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个

————————————————

①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忘记了苏联有各种各样的地区，这些地区各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水平。忘记了这些地区中间有先进的、中等的和落后的。忘记了集体农庄运动的速度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方法对于这些远不相同的地区**不能是一样的**。

列宁说：“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搬到一切边区”（“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八页）。

其次，列宁说：

“如果死板地把俄国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混为一谈，使它们服从于一定的死板格式，那就愚蠢万分了。”（“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八页）

最后，列宁责成高加索的共产党员，要他们

“**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他们的共和国的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特殊情况；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改变它的形式以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九五页）。

看来是很明白了。

根据列宁的这些指示，我们党中央在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的决议（见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报”）中按照集体化的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成三类，其中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和伏尔加河下游基本上可以在一九三一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其他产粮区（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等）基本上可以在一九三二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其余地区可以把集体化的完成延到五年计划期末，即延到一九三三年。

而实际上又是怎样呢？实际上我们的某些陶醉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初步成就的同志把列宁的指示和中央的决议都安然忘记了。莫斯科省因为拼命追求集体化的虚夸数字，竟责成其工作人员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就完成集体化，虽然该省拥有不下三年的时间（到一九三二年底）。中央黑土区因为不愿意“落后于他人”，竟责成其工作人员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就完成集体化，虽然该区拥有不下两年的时间（到一九三一年底）。而南高加索人和土尔克斯坦人因为热心于“赶上并超过”各先进地区，竟采取了在“最短期间”完成集体化的方针，虽然他们拥有整整四年的时间（到一九三三年底）。

很明显，在这种匆忙的集体化“速度”之下，那些对集体农庄运动准备较差的地区因为热心于“超过”准备较好的地区，就不得不施行强烈的行政压力，企图用自己的行政热情来弥补集体农庄运动快速度发展所缺少的因素。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在这些地区造成了混乱，后来不得不由中央加以干涉来消除这种混乱。

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二个错误。

（三）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不容许跳过运动尚未完结的形式的原则。违背了列宁的原则：不要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不要命令群众运动，不要脱离群众，而要和群众一起前进并推动他们前进，把他们引导到我们的口号下面，并帮助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来相信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性。

列宁说：“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农村中的建设将遇到很大困难，在这里必须更加稳步前进，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行公共耕种制**是**极端荒谬**的，能够赞成公共耕种制的只有极少数的觉悟农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决定这样做。因此，我们仅仅采取了革命发展所绝对必需的办法：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到前进的运动从这些群众

亲身的经验中、从他们亲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二一页）

根据列宁的这些指示，中央在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的著名决议（见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报”）中认为：

（甲）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

（乙）因此必须制定作为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的标准章程；

（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决不能容许从上面“命令”集体农庄运动和“把集体化当做儿戏”。

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决不能容许跳过农业劳动组合而径直成立公社；决不能用“命令”集体农庄和“把集体农庄当做儿戏”来代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

看来是很明白了。

而实际上又是怎样呢？实际上我们的某些陶醉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初步成就的同志把列宁的指示和中央的决议都安然忘记了。这些同志不去组织建立农业劳动组合的群众运动，却使个体农民径直“转上”公社章程。不去巩固运动的劳动组合形式，却用强迫手段使小牲畜、家禽、自用产乳牲畜和住宅“公有化”。

列宁主义者所不容有的这种急躁情绪的后果现在是大家都知道的。稳固的公社通常当然没有建立起来。但是许多农业劳动组合却放弃了。固然，“好的”决议留下来了。但是它们有什么用处呢？

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三个错误。

第三个问题：怎么会产生这些错误，党应当怎样纠正这些错误？

答：这些错误是由于我们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迅速取得胜利而产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生的。胜利有时能冲昏人的头脑。胜利往往使人产生过分的自负和骄傲。这特别容易发生在执政党的代表人物身上。尤其是像我们党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比的力量和威望的党。列宁所激烈反对的那种共产党员骄夸的事实，在这里是很可能产生的。相信法令、决议和命令万能的心理，在这里是很可能产生的。党的革命措施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某些角落变成党的个别代表的空洞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的危险，在这里是很现实的。我指的不仅是地方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别省委工作人员和个别中央委员。

列宁说："共产党员的骄夸，就是说，侧身于共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妄想用共产党员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自己的一切任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五十四页）

集体农庄运动中的错误，对党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路线的歪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让这些错误和歪曲行为今后仍然继续下去，如果不把它们迅速而彻底地消灭，那末它们的危险在哪里呢？

这里的危险就在于这些错误会直接使我们去破坏集体农庄运动，和中农闹翻，使贫农队伍瓦解，使我们的队伍混乱，使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削弱，使富农恢复起来。

简单地说，这些错误有一种趋向，要把我们从巩固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的道路，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推上同这些群众决裂的道路，推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这种危险在二月下半月就已暴露出来了，当时我们的一部分迷惑于过去的胜利的同志和列宁的路线背道而驰。党中央注意到这种危险，立即干预这件事，委托斯大林在专论集体农庄运动的文章中给那些轻举妄动的同志们以警告。有些人以为"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是斯大林个人的创举。这当然是胡说。我们中央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让什么人在这种事情上表现个人的创举。这是中央所采取的深入探查的办法。

而当错误的深度和范围已经查明的时候，中央就立即以自己的威望的全部力量来打击错误，公布了它的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的著名决议。

要使狂奔疾驰的人悬崖勒马转上正确的道路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所以称为列宁党的中央委员会，就是因为它善于克服更大的困难。而且它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整个整个的队伍要止住自己的奔驰，及时转上正确的道路并在行进中整编自己的队伍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党所以称为列宁党，就是因为它有足够的机智来克服这些困难。而且它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

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要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并在自己身上找到在最短期间消灭这些错误的力量。因为陶醉于不久以前的胜利而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而坚决地纠正错误——这就是主要的困难。只要克服了这个困难，只要抛弃了夸大的计划数字和文牍官僚主义的追求最高数字的做法，只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集体农庄的组织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上，就能使错误彻底消灭。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党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个危险的困难。

列宁说："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这些弱点。"[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八页）

列宁的这些话是不能忘记的。

第四个问题：反对歪曲党的路线是不是后退，是不是退却？

答：当然不是！只有那些把继续犯错误和继续进行歪曲当做进攻，而把和错误作斗争当做退却的人，才会说这是退却。用堆积错误和再三歪曲来实行进攻，——不用说，这是很好的"进攻"……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我们提出了农业劳动组合作为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制定了相应的标准章程作为集体农庄建设工作的指南。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提出了巩固工人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的生产结合作为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础。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作为目前时期我们在农村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口号。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还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就规定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一定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为几类并为每一类地区规定了特殊的速度。我们是不是离开这件事而退却了呢？当然不是！

这怎能说是党的“退却”呢？

我们要使那些犯了错误和有歪曲行为的人从他们的错误中退出来。我们要使鲁莽的人从他们的鲁莽行为中退到列宁主义立场上来。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继续向我们的阶级敌人实行**真正的**进攻。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就是后退呢？当然不是！这只是说我们要实行**正确的**进攻，而不要把进攻当做鲁莽的儿戏。

只有怪人和“左”倾过火分子才会把党的这个立场看做退却，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这种妄谈退却的人至少不懂得两件事情。

（甲）他们不知道进攻规律。他们不懂得**不巩固**既得阵地的进攻是必遭失败的进攻。

比如在军事方面，进攻在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为胜利的进攻呢？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人们不是一味前进，而是同时努力**巩固**既得的阵地，根据已经改变的情况**重新部署**自己的力量，**使**后方机关**跟上来**，**把**后备队**调过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保证自己免遭意外，消灭任何一次进攻都不能避免的个别地方被突破的现象，从而准备彻底消灭敌人。一九二〇年波兰军队的错误，如果单从军事方面来说，在于他们

忽视了这个规则。这也就是他们一口气打到基辅，然后又不得不同样地一口气退到华沙的原因之一。一九二〇年苏维埃军队的错误，如果也是单从军事方面来说，在于他们进攻华沙时重犯了波兰军队的错误。

关于阶级斗争战线上的进攻规律也必须这样说。**不巩固**既得的阵地，**不重新部署**自己的力量，不给前线保证**后备队**，不使**后方机关**跟上来等等，就不能实行顺利的进攻以消灭阶级敌人。

全部问题在于鲁莽的人不懂得进攻规律。全部问题在于党懂得这些规律并实现这些规律。

（乙）他们不懂得进攻的阶级本质。他们大叫进攻。但是向**哪个**阶级进攻，联合**哪个**阶级去进攻？我们是联合中农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因为只有这种进攻才能使我们取得胜利。但是，如果这种进攻因为党的个别队伍陶醉于胜利而开始离开正确的道路，把自己的锋芒转向我们的同盟者，转向中农，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需要的是**任何一种**进攻，而不是联合一定阶级去反对一定阶级的进攻吗？要知道唐·吉诃德也以为他向风车冲锋就是向敌人进攻。可是大家知道，他在这种所谓进攻中曾碰得头破血流。

大概唐·吉诃德的桂冠使我们的“左”倾过火分子睡不着觉吧。

第五个问题：我们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右倾危险还是“左”倾危险？

答：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右倾危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这种说法同中央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的决议中关于“左”倾过火分子的错误和歪曲行为是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障碍的著名论点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因为“左”倾过火分子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的错误是一种为右倾在党内的加强和巩固造成有利环境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错误把党的路线歪曲了，因而便利了破坏党的威

信的活动，也就便利了右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的斗争。破坏党的领导的威信是右倾分子藉以掀起反党斗争的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左”倾过火分子，是他们的错误和歪曲行为给右倾分子造成的。因此，为了胜利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必须克服“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左”倾过火分子在客观上是右倾分子的同盟者。

“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主义之间的特殊联系就是这样。

这种联系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个事实：某些“左”倾分子时常说要和右倾分子结成同盟。这种联系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种特殊现象：一部分“左”倾分子昨天还在“实行”高呼乌拉的进攻并企图在短短两三个星期内使苏联全国集体化，而今天却消极起来，心灰意懒，把斗争地盘安然让给右倾分子，从而实行在富农面前真正退却（没有引号！）的路线。

目前时期的特点，就在于和“左”倾过火分子的错误作斗争是我们胜利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条件和特殊形式。

第六个问题：怎样估计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这件事？

答：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这件事说明最近在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不巩固的集体农庄，目前不坚定的分子正在离开这些集体农庄。这就是说，有名无实的集体农庄将要消失，巩固的集体农庄将要继续存在和更加巩固。我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某些同志因此而悲观失望，张皇失措，拼命抓住夸大的集体化百分数。另外一些人则幸灾乐祸，预言集体农庄运动必定“失败”。这两种人都大错特错了。这两种人都远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集体农庄运动实质的了解。

退出集体农庄的首先是那些所谓死魂灵。这甚至不是退出，而是暴露了空架子。我们是不是需要死魂灵呢？当然不需要。我认为北高加索人和乌克兰人解散有死魂灵的集体农庄而组织真正有生命的和真正稳固的集体农庄是做得完全正确的。这种做法对集体农庄运动是只有好处的。

其次，退出的是那些公开敌视我们事业的异己分子。很明显，这种分子被驱逐得愈快，对集体农庄运动就愈好。

最后，退出的是那些动摇分子，这种人既不能叫做异己分子，也不能叫做死魂灵。这是**今天**我们还没有能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事业的正确，但**明天**我们一定能说服他们的那些农民。这种农民的退出是集体农庄运动的一个严重损失，虽然这个损失是暂时的。因此，争取集体农庄的动摇分子是目前集体农庄运动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由此可见，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并不仅仅是一种坏现象。由此可见，既然这种退出使集体农庄清除了死魂灵和公开异己分子，那末它也就是使集体农庄健全和巩固的一种有益过程。

一个月以前，有人认为产粮区的集体化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果指的是真正的和比较稳固的集体农庄，那末这个数字显然是夸大了的。如果在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以后产粮区的集体化能保持百分之四十（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极大成绩。我是拿产粮区的平均数字来说的，我清楚地知道我们个别全盘集体化地区的集体化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产粮区的集体化达到百分之四十，——这就是说，到一九三〇年春季我们就完成了原定集体化五年计划的**一倍**。

谁敢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方面的这个**历史性**成就的**决定**意义呢？

第七个问题：动摇的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不是做得对？

答：不，他们做得不对。他们退出集体农庄是违反自己切身利益的，因为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他们退出集体农庄就是把自己置于更坏的境地，因为他们使自己失去了苏维埃政权给予集体农庄的那些优待和好处。集体农庄中的错误和歪曲行为不能成为退出的理由。应当留在集体农庄里用共同的力量来纠正错误。既然苏维埃政权将用全部力量和这些错误作斗争，那末这些错误就更容易纠正了。

列宁说：

“商品生产下的小经济制度**决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所受的贫困和压迫。”（“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五十一页）

列宁说：

“靠小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七页）

列宁说：

“如果我们仍旧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是不免要灭亡的。”（“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五页）

列宁说：

“只有依靠共同的、劳动组合的、协作的劳动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迫使我们进入的绝境。”（“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三页）

列宁说：

“必须过渡到模范大农庄中的共同耕种制”，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摆脱俄国现在所处的那种经济破坏状态，那种简直是绝望的状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六页）。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集体农庄是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唯一**手段。

很明显，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做得不对的。

列宁说：

“你们大家从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活动中当然可以知道，我们对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旨在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公共的、协作的或劳动组合的经济并逐渐促进这种转变的一般组织赋予多么**巨大的意义**。”[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页）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列宁说：

“苏维埃政权把公社和协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予它们以直接**优先权**。”[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八六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将给集体农庄以个体农户所享受不到的优待和优先权。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在分配土地方面，在供应机器、拖拉机、种子等等方面，在减轻赋税方面，在发放贷款方面，将给集体农庄以优待。

为什么苏维埃政权给集体农庄以优待和优先权呢？

因为集体农庄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手段。

因为优先帮助集体农庄是帮助贫农和中农的最切实的方式。

前几天，苏维埃政权决定对集体农庄的全部公有化的耕畜（马、犍牛等等），对集体农庄集体所有的和庄员个人所有的全部奶牛、猪、羊和家禽**免**税**两年**。

此外，苏维埃政权决定把庄员偿付贷款的期限**延**至年底，并把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四月一日以前被判处的全部罚款和法律处分**取消**。

最后，苏维埃政权决定在本年度必须给集体农庄五亿卢布的贷款。

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集体农民的。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那些在退潮时能够站稳脚跟，在反对集体农庄的敌人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保住了集体农庄并擎住了集体农庄运动的伟大旗帜的集体农民的。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那些现在是我们集体农庄的基本核心，而且将要巩固和办好我们的集体农庄，把千百万农民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贫农和中农庄员的。这些优待是用来帮助那些现在是集体农庄的骨干，并且完全配称为集体农庄运动的英雄的集体农民的。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退出集体农庄的农民是**得不到**这些优待的。

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做错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他们只有回到集体农庄里来才能保证自己得到这些优待，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八个问题：对公社怎么办，是不是应当把它们解散？

答：不，不应当而且用不着把它们解散。我说的是真正的公社，而不是纸上的公社。在苏联产粮区有许多值得奖励和支持的优秀公社。我指的是那些经受多年考验，受过斗争锻炼，完全证实了自己有存在价值的老公社。不应当把它们解散，但是应当把它们改造成劳动组合。

建立和管理公社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事情。只有具备了有经验的干部和受过锻炼的领导者，巨大而稳固的公社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匆忙地从劳动组合章程转到公社章程，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所以对待这件事情要特别郑重，丝毫不能急躁，劳动组合是一件比较容易办的事情，是广大农民群众比较容易了解的。所以劳动组合是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最普遍的形式。只有随着农业劳动组合的加强和巩固，才能造成农民转向公社方面的群众运动的条件。但这不会是很快的事情。所以作为高级形式的公社只有在将来才能成为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环节。

第九个问题：对富农怎么办？

答：前面我们所说的都是关于中农的问题。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因此，我们对中农的政策应该是友好的。富农则是另一回事了。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消灭掉。这是说我们将设法包围他们并把他们消灭。

请看列宁关于富农所说的话：

“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

上，他们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和资本家多。但是富农在人民中间毕竟占少数……　这些吸血者在战争期间靠人民的贫困发了财，他们抬高粮食和其他产品的价格，积蓄了成千累万的金钱。这些蜘蛛靠因战争而破产的农民，靠挨饿的工人长肥了。这些水蛭吸了劳动人民的血，城市和工厂的工人愈挨饿，他们就愈发财。这些吸血鬼过去和现在都把地主的土地抓到自己手里，他们再三盘剥贫苦农民。”（“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三十九页）

我们在实行限制这群吸血者、蜘蛛和吸血鬼的剥削趋向的政策时是容忍了他们的。我们所以容忍了他们，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富农经济，代替富农生产。现在我们有可能用我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济来代替他们的经济，而且绰绰有余了。现在用不着再容忍这些蜘蛛和吸血者了。再容忍这些焚烧集体农庄、杀害集体农庄活动家并企图破坏播种的蜘蛛和吸血者，就是违反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因此，必须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那种最坚决最彻底的精神去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第十个问题：集体农庄最近的实际任务是什么？

答：集体农庄最近的实际任务是为播种而斗争，为最大限度地扩大播种面积而斗争，为正确组织播种而斗争。

目前集体农庄的其他一切任务都必须适应于播种任务。

目前集体农庄的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于组织播种的工作。

这就是说，集体农庄及其非党积极分子的稳固性，集体农庄的领导者及其布尔什维克核心的才能，将不是在响亮的决议和堂皇的祝词中受到检验，而是在正确组织播种这一实际工作中受到检验。

但是要光荣地实现这个实际任务，必须把集体农庄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集体农庄建设的**经济**问题方面去，转到**集体农庄内部**建设的

问题方面去。

直到最近，集体农庄工作人员所注意的中心问题还是追求集体化的高的数字，而且人们不愿意看见真正集体化和纸上集体化之间的差别。现在应该抛弃这种醉心于数字的心理。现在工作人员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巩固**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在组织上趋于**完善**，**组织**集体农庄中的实际工作。

直到最近，集体农庄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还集中于组织大集体农庄，组织所谓“大型农场”，而这些“大型农场”往往变成在农村中没有经济根基的笨重的纸上机关。于是，表面工作吞没了实际工作。现在应该抛弃这种醉心于表面的心理。现在工作人员的注意力应该着重于农村集体农庄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当这项工作有了相当成绩的时候，“大型农场”自然就会出现。

直到最近，还很少注意吸收中农参加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可是在中农中间有许多出色的管理人材，他们能够成为集体农庄建设中极好的经济工作人员。现在应该消除我们工作中的这个缺点。现在的任务就是吸收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参加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让他们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

直到最近，还没有充分注意农村中的妇女工作。过去一段时期表明，农村中的妇女工作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现在应该坚定不移地消除这个缺点。

直到最近，某些地区的共产党员还认为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解决集体农庄建设的一切任务。因此，他们没有充分注意吸收非党分子参加集体农庄的负责工作，没有充分注意提拔非党分子担任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没有充分注意在集体农庄中组织广大的非党积极分子。我们党的历史证明，集体农庄建设的过去一段时期再一次表明，这种方针是根本不正确的。如果共产党员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用一堵墙同非党分子隔开，他们就会葬送整个事业。共产党员在争取实现社会

主义的战斗中能够得到光荣，共产主义的敌人能够被击溃，其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员善于吸收非党优秀分子参加工作，他们善于在非党的广大阶层中间吸取力量，他们善于把广大非党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党的周围。现在应该坚决不移地消除我们对非党分子的工作中的这个缺点。

纠正我们工作中的这些缺点，彻底消除这些缺点，——这也就是把集体农庄的**经济**工作纳入正轨。

总之：

（一）正确地组织播种，——这就是任务。

（二）把注意力集中在集体农庄运动的经济问题上，——这就是解决这一任务所必需的手段。

载于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真理报”第九十二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2 卷第 147—165 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增长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同志们！自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两年半了。时间看来并不很长。但是，在这期间世界各民族和各国的生活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要用一两个字来概括这个时期的特征，那末可以称它为**转变**时期。不仅对我们苏联，而且对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个转变时期。但是，在这两个转变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对苏联来说，这个转变意味着转向新的更大的经济**高涨**；而对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个转变则意味着转向经济**衰落**。在我们苏联这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工业或农业方面都是**日益高涨**。在他们资本家那里，经济**危机**无论在工业或农业方面都是**日益增长**。

简括说来，目前形势的面貌就是这样。

请回忆一下两年半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当时，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和贸易都在增长，几乎所有农业国的原料和粮食的生产都在增长。当时，美国是最兴旺的资本主义国家，红极一时，人们高唱“繁荣”的胜利歌，拜倒在金元面前，赞美新技术，颂扬资本主义合理化。宣告资本主义“恢复健康”和资本主义稳定的坚不可摧的纪元到来。“普遍”叫嚣苏维埃国家“必定灭亡”，苏联“必定崩溃”。

昨天的情况是这样。

现在的情况怎样呢？

现在，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工业国都发生了经济危机。现在，所有农业国都发生了农业危机。不是“繁荣”，而是群众的贫困和失业人数的大量增加。不是农业高涨，而是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破产。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万能的幻想已在破灭。颂扬金元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胜利歌声愈来愈微弱了。关于资本主义犯“错误”的悲观的号叫愈来愈高了。而关于苏联“必定灭亡”的“普遍”叫嚣则代以必须惩治“这个国家”的“普遍”的狠毒的切齿声，因为这个国家在四周都发生危机的时候竟敢发展自己的经济。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结果正像布尔什维克在两三年前所说过的那样。

布尔什维克说过，在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被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技术的发展，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发展，必不可免地会引起剧烈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报刊曾经嘲笑布尔什维克的“奇特预言”。右倾分子曾经表示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预言，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空谈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实际上结果怎样呢？结果正像布尔什维克所说过的那样。

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具体材料。

一、世界经济危机

（甲）在研究这次危机的时候，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下列一些事实：

一、目前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就是说，商品的生产量超过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这就是说，纺织品、燃料、工厂制品和食品的生产量超过基本消费者即人民群众能用现钱购买的数量，因为人民群众的收入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民群

众的购买力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所以资本家为保持高昂的价格就把“多余”商品如纺织品、粮食等等堆积在仓库里甚或销毁，同时缩减生产，解雇工人，于是人民群众就因为商品生产过多而不得不过贫困的生活。

二、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它所以是世界危机，不仅因为它遍及世界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工业**国，甚至不断把德国数十亿马克赔款注入自己机体的法国也没有能够幸免一定程度的萧条，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种萧条一定会转为危机。它所以是世界危机，还因为**工业**危机是和**农业**危机同时发生的，而农业危机现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主要**农业**国的各种原料和粮食的生产方面了。

三、目前的世界危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虽然它带有**普遍**性，但它袭击各国的时间和程度各不相同。工业危机最先开始于波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去年它在那一带延续了整整一年。农业危机开始的明显的征象早在一九二八年底就在加拿大、美国、阿根廷、巴西和澳大利亚显露出来了。在这整个时期美国的工业是上升的。到一九二九年中，美国的工业生产几乎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只是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才开始转变，接着就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工业生产危机，把美国抛到一九二七年的水平。接着加拿大和日本发生了工业危机。随后中国和各殖民地国家也发生了破产和危机，在这些国家里，危机因银价下跌而日益加深，生产过剩的危机同已经被封建剥削和繁重捐税弄得疲惫不堪的农民经济的破坏交织在一起。至于西欧方面，那只是在本年初才开始发生危机，而且各国的程度也不一样，法国的工业生产在这个时期竟还有继续增长的表现。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地叙述一些证明危机存在的数字。关于危机存在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人争辩了。所以，我只引证一下德国“商情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一个不大的但具有代表性的统计表。这个统计表表现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波兰以及苏联等国采矿工业和大型

加工工业的各主要部门的发展情形。这个统计表从一九二七年算起，而以一九二八年的生产水平为一百。

这个统计表如下：

年份 \ 国别	苏联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波兰
1927年	82.4	95.5	105.5	100.1	86.6	88.5
1928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9年	123.5	106.3	107.9	101.8	109.4	99.8
1930年（第1季度）	171.4	95.5	107.4	93.4	113.1	84.6

这个统计表说明什么呢？

首先，它说明美国、德国和波兰的大工业生产经受着**极明显的危机**，其中**美国**的生产水平经过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的**高涨**以后，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百分之十点八，降到一九二七年的水平；**德国**的生产水平经过三年的**停滞**以后，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八点四，降到比一九二七年的水平低百分之六点七的程度；**波兰**在去年发生**危机**以后，生产水平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十五点二，降到比一九二七年的水平低百分之三点九的程度。

第二、它说明**英国**已经有三年在老地方踏步不前，停留在一九二七年的水平上下，经受着沉重的经济**停滞**，而且它的生产水平在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已经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零点五，因而进入了**危机**的初期阶段。

第三、它说明在资本主义大国中只有法国的大工业稍有**增长**，增长的百分数在一九二八年是十三点四，一九二九年是九点四，而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仅仅比一九二九年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七，可见这里的增长曲线是逐年**下降**的。

最后，它说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只有苏联的大工业一直在**蓬勃发展**，而且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水平超过了一九二七年的水平

一倍以上，增长的百分数从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十七点六提高到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五，而一九三〇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二，可见这里的增长曲线是逐年上升的。

有人会说，截至本年第一季度完结时的情况固然是这样，但本年第二季度的情况可能好转。然而第二季度的材料完全推翻了这种推测。相反地，这些材料说明第二季度的情况更加恶化。这些材料说明纽约交易所的股票更加下跌，美国的破产浪潮更加汹涌；说明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南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各国的生产日益缩减，工人的工资更加降低，失业人数日益增加；说明法国有许多工业部门已经进入停滞时期，这种停滞在目前国际经济环境下就是危机开始的征象。失业者现在美国有六百多万，德国约有五百万，英国有二百多万，意大利、南美和日本各有一百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各有五十万。更不用说，使千百万农场主和劳动农民陷于破产的农业危机已经进一步尖锐化了。农业的生产过剩危机达到了这种地步：为了保持高昂的价格和资产阶级的利润，巴西有两百万袋咖啡抛到海里，美国把玉蜀黍当煤炭烧，德国拿几百万普特黑麦喂猪，对于棉花和小麦则采取一切办法缩减播种面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这就是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一般情况。

（乙）现在，当世界经济危机扩大它的破坏作用，使整个整个的中小资本家阶层沉入水底，使整批整批的工人贵族和农场主陷于破产，使千百万工人群众挨饿的时候，大家都要问：危机的原因在哪里？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怎样和危机作斗争？怎样消灭危机？于是就有人编造了各种各样关于危机的“理论”。于是就有人提出了整批整批“缓和”、“预防”和“消灭”危机的方案。资产阶级的在野党攻击资产阶级政府，说它们“没有采取一切办法”来预防危机。“民主党人”谴责“共和党人”，“共和党人”谴责“民主党人”，而双方又一致

谴责胡佛集团及其“联邦准备银行体系”未能“制止”危机。甚至有这样的聪明人，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诡计”。我指的就是有名的“工业家”列赫别尔格，老实说，他不大像一个工业家，倒很像著作家中的“工业家”或工业家中的“著作家”。（笑声）

很明显，所有这些“理论”和方案都是和科学毫无共同之处的。必须承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危机面前完全破产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把他们前辈有时还表现过的那点起码的生活敏感都丧失无遗了。这些先生们忘记了，不能把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偶然现象。这些先生们忘记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些先生们忘记了，危机是随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一百多年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每隔十二年、十年、八年或更短的时间就发生一次。在这个时期内，各种类型和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府，各种等级和各种才能的资产阶级活动家毫无例外地都曾经试图用自己的力量“预防”和“消灭”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他们所以失败，是因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预防或消灭经济危机。既然如此，那末现今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同样遭受失败，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既然如此，那末资产阶级政府的各种措施实际上不是使危机缓和，不是使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状况改善，而是使破产现象日益厉害，使失业浪潮更加汹涌，使较弱的资本主义联合被较强的资本主义联合吞并，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是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却总是被资本家竭力保持在**最低限度**范围内。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并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发展技术，实

行合理化，加紧剥削工人，并且把自己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为了不落后于他人，所有资本家都无论如何不得不走上这条拼命发展生产能力的道路。但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千百万工农群众（归根到底他们是基本购买者）的购买力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由此就产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由此就产生了或长或短的周期性的人所共知的后果：商品滞销，生产缩减，失业增长，工资降低，从而生产水平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猛烈破坏性的表现。

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把生产不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用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它能够把利润不用于满足寄生阶级的奢望，不用于改进剥削方法，不用于输出资本，而用于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那就不会有危机了。但这样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

一般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就是这样。

但是在说明**目前的**危机的特征时还不能以此为限。不能把目前的危机看做过去的危机的简单重复。目前的危机是在某些新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必须弄清这些条件，才能看到危机的全貌。目前的危机因为有许多特殊情况而更加复杂和深刻。不弄清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对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这些特殊情况是什么呢？

这些特殊情况归结为以下几件突出的事实：

一、危机特别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国家**，打击了资本主义的堡垒，即打击了集中着世界各国生产和消费量不下半数的美国。显然，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危机的影响范围大大扩展，不能不使危机尖锐化，并给世界资本主义造成许多额外困难。

二、在经济危机扩展的进程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危机和各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不但同时发生，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因而使

困难加重，并且注定了经营积极性必然普遍低落。更不用说，工业危机将使农业危机更为严重，而农业危机又将使工业危机拖延下去，结果就不能不使整个经济危机深刻化。

三、现在的资本主义和从前的资本主义不同，它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注定了，尽管生产过剩，各种资本主义联合也必然要竭力设法保持商品的垄断高价。显然，这种情况使商品基本消费者人民群众因危机而特别痛苦，使他们遭到破产，因而不能不使危机拖延下去，不能不阻碍危机的消除。

四、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爆发了，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

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大战及其后果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我们现在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唯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成长，日益繁荣，它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而且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显示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动摇着资本主义的基础。

其次，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战争和苏联革命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已经威信扫地；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为所欲为了。

再其次，这意味着：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各殖民地和附属国都出现并成长了本国的年轻的资本主义，它们在市场上有成效地和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因而使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

最后，这意味着：战争给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留下了沉重的遗产，就是**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和已经由失业后备军变为**失业常备军**的**千百万失业大军**，这些情况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前就已经给资本主义造

成许多困难，而在危机期间还必然会使情况更加复杂。

这就是使世界经济危机加深并尖锐化的各种情况。

必须承认，目前的经济危机是至今一切世界经济危机中最严重和最深刻的危机。

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尖锐化

世界经济危机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各种矛盾的暴露和尖锐化。

（甲）**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争夺原料的斗争、争夺资本输出的斗争正在暴露并尖锐化。现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对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旧的划分感到不满。他们看到力量对比起了变化，必须与此相适应地重分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势力范围等等。这些矛盾中主要的是美英之间的矛盾。无论是成品输出方面或是资本输出方面，斗争主要是在美英之间进行的。只要拿起任何一份经济方面的报纸，任何一份关于商品和资本输出的文件看一下，就会相信这一点。斗争的主要场所是南美、中国以及老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自治领。这个斗争中的优势——而且是肯定的优势——是在美国方面。

除了这个主要的矛盾，还有许多非主要的但相当重要的矛盾，如美日之间、德法之间、法意之间、英法之间的矛盾等等。

毫无疑问，由于危机的日益发展，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争夺资本输出的斗争一定会逐月逐日地激烈起来。

斗争的手段是：关税政策，廉价商品，低息贷款，重新部署力量和建立新的军事政治联盟，扩充军备和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发动战争。

我讲过，危机已经扩展到一切生产部门。但是有一个部门没有被

危机波及。这个部门就是军事工业。尽管有危机存在，但是它还一直在发展。各资产阶级国家在疯狂地扩充军备和重整军备。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闲谈，而是为了战争。战争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因为它是重分世界，重分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唯一手段。

十分明显，在这种环境中，所谓的和平主义已奄奄一息，国际联盟正活活腐烂，“裁军方案”已堕入深渊，而海军裁军会议则变成革新和扩充海军的会议。

这就是说，战争危险将加速增长起来。

让社会民主党人去空谈和平主义，空谈和平，空谈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等等吧。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和英国执政的经验表明，和平主义不过是他们掩蔽准备新战争所必需的假面具而已。

（乙）**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正在暴露并将尖锐化。我所指的战败国主要是德国。毫无疑问，由于危机的爆发和市场问题的尖锐化，对德国的压迫将更加厉害，因为德国不仅是一个债务国，而且是一个极大的输出国。可以把战胜国和德国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描绘成一座金字塔，美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摆着老爷架子坐在塔顶上，手里拿着写着“付款！”字样的杨格计划，德国被压在下面，已经筋疲力尽，但不得不竭尽全力来执行偿付千百亿赔款的命令。你们想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罗迦诺精神”。如果以为这种情况对世界资本主义毫无影响，那就是丝毫不懂实际生活。如果以为德国资产阶级能在最近十年内付出二百亿马克，而身受“自己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德国无产阶级会让德国资产阶级从他们身上榨取这二百亿马克而不发生激烈的战斗和震动，那就是发了疯。让德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去假装相信会有这种奇迹吧。我们布尔什维克是不相信奇迹的。

（丙）**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正在暴露并尖锐化。经济危机的日益增长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加紧压迫作为主要销

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确，这种压迫已经达到极点。欧洲资产阶级实际上现在和“自己的”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北非洲的殖民地正处于战争状态。“独立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被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而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集团执行着帝国主义阵营中自己主子的意志，彼此混战，使中国人民遭受灾难。

应当认为，诋毁俄国驻华使馆人员是破坏中国“和平和安宁”的罪魁的骗人胡说已经彻底破产了。无论在中国南部或中部都早已没有俄国的使馆了；可是那里却有英国、日本、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使馆。无论在中国南部或中部都早已没有俄国的使馆了；可是在彼此混战的中国军阀那里却有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军事顾问。那里早已没有俄国使馆了；可是那里却有英国、美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大炮、步枪、飞机、坦克和毒气。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南部和中部看到的不是“和平和安宁”，而是受欧美“文明”国家资助和指使的最疯狂最带破坏性的军阀战争。我们看到的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文明传播”工作的一幅十分耐人寻味的图画。只是不明白，这究竟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关系？

如果以为帝国主义者这样横行无忌不会受到惩罚，那就太可笑了。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用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来回答了他们。据说那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是毫不奇怪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把中国从彻底破产和贫困中拯救出来，那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非洲等等，那末这些国家的有时带有民族解放战争形式的革命运动正在发展，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资产者老爷们打算把这些国家淹没在血泊里，依靠警察的刺刀，求助于甘地一类的人物。毫无疑问，警察的刺刀是一个靠不住的支柱。以前沙皇政府也曾经竭力依靠警察的刺刀，但是结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支柱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末沙皇政府

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是结果也不过得到了狼狈的下场而已。

（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并尖锐化。危机已经使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变本加厉。危机已经激起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新浪潮，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使失业人数增多，使失业常备军扩大，使工资降低。这些情况当然使形势革命化，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并推动工人去进行新的阶级战斗。

因此，工人群众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幻想正在破灭和消失。自从有了社会民主党人执政的经验（破坏罢工、组织同盟歇业并枪杀工人），关于“生产民主”、“工业和平”、斗争的“和平方法”一类骗人的诺言，在工人听来已分明是一种恶意的嘲弄了。现在还能找到很多工人相信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欺骗宣传吗？有名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的工人游行示威（反对战争危险）和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的工人游行示威（抗议失业），都表明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已经抛弃了社会法西斯分子。经济危机将使工人中间的社会民主主义幻想受到一次新的打击。在因经济危机而陷于破产和贫困之后，工人中间还相信“每个工人”有可能通过参加“民主化的”股份公司发财致富的人现在已经为数不多了。不用说，危机将给一切诸如此类的幻想以致命的打击。

工人群众离开社会民主党就是表示他们转向共产主义。实际情形也确实是这样。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的成就，有共产党员参加和领导的罢工浪潮，经济罢工转为共产党员所组织的政治抗议，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人的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在工人阶级中得到极热烈的响应，——这一切都表明，工人群众认定共产党是能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唯一政党，是值得工人信赖的唯一政党，是可以而且值得跟着它去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唯一政党。这就是群众向共产主义方面的转变。这就是使我们各兄弟共产党变成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性的党的保证。只是共产党员必须善于估计形势和恰当

地利用形势。各国共产党向资本家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社会民主党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粉碎了所有一切离开列宁主义而帮助社会民主党的倾向，因而证明他们是站在正确道路上的。必须使他们永远坚定地站在这条道路上。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指望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过来，并顺利地准备无产阶级迎接即将来临的阶级战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指望进一步扩大共产国际的影响，提高共产国际的威信。

因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实说明什么呢？

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

说明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

说明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为政治危机。

第一、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为此就利用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

第二、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

最后，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

三、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甲）上面我已经谈过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但除了这些矛盾以外，还有一种矛盾。我说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诚然，不能把这种矛盾看做**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它是整个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它瓦

解和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不仅如此，它还彻底揭露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并且使它们交织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为它是革命的堡垒，单是它的存在就使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它阻碍组织新战争，阻碍重新瓜分世界，阻碍资本家去支配它的广大的国内市场，而这个市场特别在现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是资本家尤其感到需要的。

由此就产生一种冒险袭击苏联和进行武装干涉的趋势，这种趋势一定会随经济危机的扩大而加强起来。

目前这种趋势的最明显的代表者是现今的资产阶级法国，它是博爱的“泛欧”计划的故乡，凯洛格公约的“摇篮”，世界一切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最富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

但是，进行武装干涉是吉凶难测的。这一点资产阶级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们想，如果武装干涉进行得顺利，结局是苏联失败，那就好了。但是，如果结局是资本家失败，那怎么办呢？要知道，已经有过一次武装干涉遭到破产了。既然在布尔什维克力量薄弱时进行的第一次武装干涉遭到破产，那末怎能保证第二次武装干涉不会同样遭到破产呢？大家都看到，现在布尔什维克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在国防准备上都强大得多了。而且又怎样对付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呢？他们不让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他们一定会反对武装干涉，并且一旦发生武装干涉，他们会打击资本家的后方。对苏联加强贸易联系岂不是更好吗？况且这连布尔什维克也并不反对。

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和苏联继续维持和平关系的趋势。

这样，我们就看到两种因素和两种相反的趋势：

一、执行破坏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政策，对苏联进行挑衅性的袭击，公开地和隐蔽地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这些都

是威胁苏联国际地位的因素。这些因素所产生的结果是：英国保守党内阁和苏联绝交，中国军阀强占中东铁路，对苏联实行财政封锁，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教权派对苏联进行“讨伐”，外国间谍组织我国专家进行暗害活动，组织如“连纳金矿”的某些职员所干的爆炸和放火等事件，谋害苏联使节（波兰），故意阻挠我国货物的出口（美国、波兰）等等。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情并支持苏联，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增长，苏联的国防力量加强，苏维埃政权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这些都是巩固苏联国际地位的因素。这些因素所产生的结果是：中东铁路冲突事件顺利解决，和大不列颠恢复邦交，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加强等等。

苏联的外部状况是由这些因素的斗争决定的。

（乙）有人说，妨碍改善苏联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联系的绊脚石是债款问题。我认为这不是讨债的理由，而是侵略分子鼓吹武装干涉的藉口。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明确而有充分根据的。在给予我们贷款的条件下，我们同意偿付一小部分战前债款，把它当做贷款的附加利息。没有这个条件，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偿付债款。向我们多要一些吗？有什么理由？借用这些债款的是已经被革命推翻的沙皇政府，苏联政府是不能对沙皇政府的债务负责的，这难道还不知道吗？有人谈到国际法和国际义务。但是，“盟国”老爷们是根据什么国际法把贝萨拉比亚从苏联手中夺去，把它交给罗马尼亚的贵族去奴役呢？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家和政府是根据什么国际义务进攻苏联，干涉苏联，掠夺苏联整整三年之久，致使苏联人民遭到惨重损失呢？如果这叫做国际法和国际义务，那末什么才叫做掠夺呢？（笑声，鼓掌。）“盟国”老爷们既然干出这种掠夺勾当，也就没有权利援引国际法和国际义务，这不是很明显吗？

其次，有人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妨碍建立“正常”关系。

资产者老爷们为了防止宣传的有害影响，往往用“边防线”和“铁丝网”来把自己隔开，把看守“铁丝网”的光荣差使开恩交给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等国。据说德国因为人家似乎不愿意委托它看守“边防线”和“铁丝网”而嫉妒。显然用不着证明，关于宣传的滥调并不是反对建立“正常关系”的理由，而是鼓吹武装干涉的藉口。既然本国具有适于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生长的土壤，那末一个人要是不愿意成为可笑的人，又怎能把自己和这种思想“隔开”呢？沙皇政府也曾经企图把自己和布尔什维主义“隔开”，但是大家知道，没有能“隔开”。所以没有能隔开，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到处都在生长，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生长起来的。看来，除了中国、印度和印度支那以外再没有别的国家被更严地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隔开”了。结果怎样呢？不管有怎样的“边防线”，布尔什维主义还是在那里生长着，并且会继续生长，因为那里显然存在着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条件。这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资本家老爷们能设法把自己和经济危机、群众的贫困、失业现象、低微工资以及对劳动者的剥削“隔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他们那里也就不会有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了。但是，问题正在于一切坏分子都力图藉口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来为自己的软弱或无能辩护。

其次，有人说，绊脚石是我们的苏维埃制度、集体化、反富农斗争、反宗教宣传、对“学者”中的暗害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别谢多夫斯基之流、索洛蒙之流和德米特利也夫斯基之流等等资本奴仆的被驱逐。这未免太滑稽可笑了。原来他们不喜欢苏维埃制度。但是我们也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呀。（笑声，鼓掌。）我们不喜欢的是他们那里有数千万失业者被逼得挨饿受穷，而一小撮资本家却占有亿万财富。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同意不干涉他国内政，那末也就不值得再提这个问题了，这不是很明显吗？集体化、反富农斗争、和暗害分子作斗争、反宗教宣传等等，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苏联工农不可剥夺的

权利。苏联宪法是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最彻底执行的。因此很明显，谁不愿意尊重我国宪法，谁就可以走开，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行。至于别谢多夫斯基之流、索洛蒙之流和德米特利也夫斯基之流等等，那我们今后也仍然要把这种人当做对革命有害无益的废品抛掉的。让那些特别同情废物的人去抬举他们吧。（笑声）我们革命的磨盘磨得很好。它把一切有用的东西取出来交给苏维埃，而把废物抛掉。据说在法国巴黎的资产者中间，这种废品大有销路。好吧，那就让他们尽量输入吧。不错，这会使法国贸易平衡表进口项多少加重一点，而这是资产者老爷们始终反对的。但是这已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我们还是不要去干涉法国内政吧。（笑声，鼓掌。）

妨碍苏联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这种“障碍”是臆造的“障碍”，是用来作为进行反苏宣传的藉口的。

我们的政策是主张和平并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联系的政策。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关系改善了，签订了许多有关贸易、技术援助等等的协定。其次，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苏联参加了凯洛格公约，依照凯洛格公约精神和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国签订了世所共知的议定书，和土耳其签订了延长友好中立条约有效期限的议定书。最后，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尽管战争挑拨者屡次挑衅和冒险袭击，我们还是保住了和平，没有让敌人把我们卷入冲突。今后我们还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继续执行这个和平政策。别人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要，自己的土地呢，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给任何人。（鼓掌）

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这样。

任务在于今后仍然要用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无比坚强的精神继续执行这个政策。

二　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高涨和苏联的内部状况

现在谈谈苏联的内部状况。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经济**危机**和**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的情况，与此相反，我国内部却呈现着国民经济**日益高涨**、失业人数**日渐减少**的景象。大工业成长起来了并加快了自己的发展速度。重工业巩固了。工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大大地扩大了。农业中的新力量——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成长起来了。两年前我国发生过谷物生产危机，当时的粮食收购主要是依靠个体经济，现在重心已经转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方面，谷物危机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解决。基本农民群众完全转到集体农庄方面了。富农的反抗被打破了。苏联的内部状况更加巩固了。

这就是目前苏联内部状况的一般情况。

现在让我们看看具体材料。

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甲）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即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包括林业、渔业等等在内的**全部农业**总产值（按战前卢布计算）为一百二十三亿七千万卢布，即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六，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一百零九点一，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农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将不会低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三到百分之一百一十四。

可见整个农业的产值虽然增长较慢，但是在不断增长。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即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包括面粉工业在内的**全部**大小**工业**的总产值（按战前卢布计算）为八十

六亿四千一百万卢布，即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五，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一百四十二点五，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将不会低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八十。

可见整个工业是在空前迅速地增长。

（乙）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即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我国全部**铁路货物周转量**为八百一十七亿吨公里，即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而在下一年度，即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点二，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二点四，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不会低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至于新铁路的建设方面，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即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算起，铁路网长度已经由七万六千公里增加到八万公里，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六点七。

（丙）如果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国内**中介贸易额**为一百（三百一十亿卢布），那末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流转额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四点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六十点四，而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流转额将为百分之二百零二，即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一倍。

（丁）如果以我国所有**信贷机关**一九二七年截至九月三十日的**综合平衡表**上的数额为一百（九十一亿七千三百万卢布），那末到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一，而到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日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一点一，即比一九二七年增加一倍。

（戊）如果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国家总预算**为一百（六十三亿七千一百万卢布），那末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国家预算

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点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六点七，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四点四，即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预算增加一倍（一百二十六亿零五百万卢布）。

（己）我国**对外贸易额**（进出口）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九，而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点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九，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不会低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

（庚）总括起来说，全部**国民收入**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增长的情形如下（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不变价格计算）：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国民收入为二百三十一亿二千七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二百五十三亿九千六百万卢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九点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二百八十五亿九千六百万卢布，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六；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的国民收入，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应不低于三百四十亿卢布，即在一年内将增加百分之二十。可见在报告所涉及的三年内，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以上。

如果注意到美国、英国、德国这样的国家的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不超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那就应当承认，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真正是**超记录的**。

二、工业化的成就

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是自发地进行的，而是遵循一定的方向即遵循工业化的方向，是在工业化的标志下，在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体系中的比重增大的标志下，在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标志下

进行的。

（甲）从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来看，整个工业和整个农业的对比关系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变动情形如下：在战前，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一，农业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七点九；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工业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农业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四点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工业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八点七，农业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一点三；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工业的比重应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三，农业的比重则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七。

这就是说，在国民经济总体系中，工业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农业的比重，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鼓掌）

（乙）从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商品**产值中的比重来看，工业所占的优势更加鲜明。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工业的商品产值在国民经济的商品总产值中的比重为百分之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商品产值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一点二，而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工业为百分之七十一点二，农业为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工业为百分之七十二点四，农业为百分之二十七点六；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工业将为百分之七十六，农业将为百分之二十四。

农业的情况所以特别不利，其原因之一就是农业带着小农和商品率很低的性质。同时很明显，这种情况必将随农业规模的扩大（通过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随农业商品率的提高而发生相当的变化。

（丙）但是，一般的工业发展情况还不能使人看到工业化速度的全貌。为了看到全貌，还必须弄清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对比关系的变动情形。因此，应当认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的不断增大是工业化发展的最鲜明的标志。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全部**工业总产值

中的比重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二，日用品的生产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二点八，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比重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七，日用品的生产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一点三，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比重将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七，日用品的生产的比重将为百分之六十七点三。

如果不是拿全部工业，而**只是**拿纳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的、包括工业一切基本部门的工业来看，那末，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日用品的生产的对比关系的情况就更好：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生产与日用品生产的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七比百分之五十七点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四十四点六比百分之五十五点四；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八比百分之五十二。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的标志下，是在巩固和发展本国重工业的标志下进行的。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发展了并继续扩展着我国经济独立的基础——我国的重工业。

三、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地位及其增长速度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的标志下进行的。但是，我们需要的并不是随便一种工业化。我们需要的工业化是保证**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对**小**商品形式的工业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所占的优势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我国工业化的特点在于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保证工业中的**公营**部分战胜**私营**部分，小商品经济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工业化。

下面就是关于各个部分的基本投资和总产值增长情形的一些材料。

（甲）如果拿工业中各个部分的**基本投资**的增长情形来看，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公营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基本投资为十二亿七千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十六亿一千四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二十亿四千六百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四十二亿七千五百万卢布；**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基本投资为六千三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六千四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五千六百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五千一百万卢布。

第一、这就是说，工业中公营部分的基本投资在这期间**增加了两倍**以上（即增加到百分之三百三十五）。

第二、这就是说，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基本投资在这期间**减少了五分之一**（即减少到百分之八十一）。

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是依靠原有资本维持的，并且正在走向灭亡。

（乙）如果拿工业中各个部分的**总产值**的增长情形来看，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公营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总产值为一百一十九亿九千九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一百五十三亿八千九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一百八十九亿零三百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二百四十七亿四千万卢布；**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总产值为四十亿四千三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三十七亿零四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三十三亿八千九百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三十三亿一千万卢布。

第一、这就是说，工业中公营部分的总产值在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六点二）。

第二、这就是说，工业中私营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总产值在同一时期内几乎**减少了五分之一**（即减少到百分之八十一点九）。

如果不是拿全部工业的产值，而只是拿**大**工业（即标准工业）的产值并按公营和私营两部分来观察，那末公营部分和私营部分的对比关系如下：公营部分在全国大工业的产值中的比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九十八点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一，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三；私营部分在全国大工业的产值中的比重，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百分之二点三，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一点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零点九，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零点七。

由此可见，大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已经走向灭亡。

很明显，“谁战胜谁”的问题，即在工业方面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还是资本主义成分战胜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由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取得胜利而解决了，彻底而确定不移地解决了。（鼓掌）

（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纳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的**国营**工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发展速度**的材料。如果以纳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总产值为一百，那末这种工业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总产值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点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八点六，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将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九点八。

这就是说，纳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的、包括工业一切基本部门和全部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在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多**。

不能不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工业都不曾有过这样飞快的发展速度。

这种情况也就使我们有根据说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丁）某些同志对于“**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个口号抱着怀疑态

度。就在最近，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五年计划是幻想。更不必说资产阶级论客了，他们一听到“五年计划”四个字就惊讶得目瞪口呆。但是，如果我们从五年计划在头两年的实行情况来看，那末实际情形怎样呢？五年计划最高方案执行情况的检查向我们说明什么呢？它不仅说明我们能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而且还说明我们许多工业部门能在三年内甚至在两年半内完成五年计划。在机会主义营垒中的怀疑分子看来，这可能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否认这个事实是愚蠢的和可笑的。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石油工业**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应当出产价值九亿七千七百万卢布的产品。但实际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已经能够出产价值八亿零九百万卢布的产品，即等于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三。可见我们在不过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石油工业方面的五年计划。

在**泥炭工业**方面，按照五年计划规定，我们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应当得到价值一亿二千二百万卢布的产品。但实际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能够生产价值一亿一千五百万卢布以上的产品，即等于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产值的百分之九十六。可见我们在两年半内，甚至更早些，就可以完成泥炭工业方面的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普通机器制造业**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应当生产价值二十亿五千八百万卢布的产品。但实际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能够生产价值十四亿五千八百万卢布的产品，即等于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可见我们在两年半至三年内就可以完成普通机器制造业方面的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农业机器制造业**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应当生产价值六亿一千万卢布的产品。但实际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

三〇年度就能够生产价值四亿卢布的产品，即等于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可见我们在三年内，甚至更早些，就可以完成农业机器制造业方面的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电器工业**到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应当生产价值八亿九千六百万卢布的产品。但实际上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就能够生产价值五亿零三百万卢布的产品，即等于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六以上。可见我们在三年内就可以完成电器工业方面的五年计划。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空前发展速度就是这样。

我们正加速前进，将要在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赶上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产量方面已经赶上了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说我国工业已经达到了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不，还远不能这样说。不能把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工业发展的**水平**混为一谈。我们有许多人竟把它们混淆起来，认为既然我们达到了空前的工业发展速度，那末我们也就已经达到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是根本不对的。

例如拿我国发展速度很高的电力生产来说吧。在电力生产方面，我们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差不多使发电量增加到百分之六百，而美国在同一时期发电量只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八十一，加拿大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一十八，德国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四十一，意大利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二。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的速度简直是空前的，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但是，如果拿这些国家电力生产的发展水平（例如一九二九年的）来和苏联的发展水平比较一下，那末苏联的情况是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苏联电力生产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但是，它在一九二九年的发电量只有六十四亿六千五百万千瓦时，而美国却有一千二百六十亿千瓦时，加拿大有一百七十六亿二千八百万千瓦时，

德国有三百三十亿千瓦时，意大利有一百零八亿五千万千瓦时。

可见差别是很大很大的。

这样看来，就发展水平来说，我们比所有这些国家都落后。

例如再拿我国生铁的产量来说吧。如果以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生铁产量为一百（二百九十万吨），那末我国生铁产量在三年内，即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九十（五百五十万吨）。可见发展速度是很高的。但是，如果从我国生铁生产的发展水平来看，并把苏联的生铁产量和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比较一下，那末情况就很难令人满意。首先，我们只是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才达到并超过战前生铁生产的水平。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如果不进一步加快冶金业的发展速度，我国全部工业生产的命运就会受到威胁。至于我国和西方各国生铁工业的发展水平，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一九二九年，美国的生铁产量为四千二百三十万吨，德国为一千三百四十万吨，法国为一千零四十五万吨，英国为七百七十万吨，而苏联的生铁产量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终结时却总共只有五百五十万吨。

可见差别是不小的。

这样看来，就生铁生产的发展水平来说，我们比所有这些国家都落后。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这一切说明：

（一）**不能把**工业发展速度和工业发展水平**混为一谈**；

（二）我国工业在发展水平方面远远**落后**于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三）只有**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我们才有可能在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四）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鼓掌）

四、农业和谷物问题

上面我谈的是包括林业和渔业等等在内的整个农业的情况，没有把农业划分为几个主要部门来谈。如果从整个农业中抽出几个主要部门，例如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业来看，那末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材料，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

（甲）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谷物播种**面积为一百，那末各年度谷物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如下：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九，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九十四点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二，而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播种面积将达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一。

令人注意的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谷物播种面积缩减的事实。这种缩减并不像右倾机会主义者营垒中的那些无知之徒胡说的那样是由于谷物业的退化，而是由于七百七十万公顷的秋播作物（占苏联秋播作物的百分之二十）的遭灾。

其次，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谷物**总**产值为一百，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形：一九二七年为战前标准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九，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九十点八，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九十四点四；而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达百分之一百一十。

这里同样令人注意的是一九二八年的谷物总产值的减少，这是因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秋播作物的遭灾。

至于说到谷物总产值中的**商品**部分（农村外的流转），那末情况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如果以一九一三年谷物产值中的商品部分为一百，

那末一九二七年的商品产值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五十八，而在今年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至少将为百分之七十三。

由此可见，就谷物播种面积和总产值来说，我们只是在今年一九三〇年才达到并稍微超过战前标准。

其次，由此可见，就谷物中的**商品**产值来说，我们还远没有达到战前标准，而且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比这个标准差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这就是在一九二八年显得特别尖锐的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源。

这也就是谷物问题的根源。

（乙）**畜牧业**方面的情形大致也是这样，但具有更令人不安的征兆。

如果以一九一六年各种牲畜的头数各为一百，那末各年度的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马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九，牛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三，绵羊和山羊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九点三，猪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三；一九二八年，马为百分之九十四点六，牛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五，绵羊和山羊为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猪为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点一；一九二九年，马为百分之九十六点九，牛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点六，绵羊和山羊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点八，猪为百分之一百零三；一九三〇年，马为一九一六年标准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牛为百分之八十九点一，绵羊和山羊为百分之八十七点一，猪为百分之六十点一。

可见如果注意到最近一年的材料，那就可以看到畜牧业已经开始缩小的明显征象。

从畜牧业特别是肉类和脂油的**商品出产率**来看，情形更令人不安。如果以各年度的肉类和脂油的总产值为一百，那末肉类和脂油的商品出产率如下：一九二六年为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一九二七年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九，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三十点四，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二

十九点二。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规模狭小而商品率低的畜牧业经济已经呈现出不稳固和经济上不可靠的明显征象。

这就是说，畜牧业在最近一年不是超过一九一六年的标准，而是有离开这个标准下降的明显征象。

这样一来，随着我们基本上已经在顺利解决的谷物问题之后，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了肉类问题，其紧张性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亟待解决。

（丙）供给我国轻工业以原料的**技术**作物的发展却是另一种情景。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技术作物**播种面积**为一百，那末情形如下：**棉花**，一九二七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一，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四，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五十一点四，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二百一十七；**亚麻**，一九二七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九十五点七，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九，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甜菜**，一九二七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六，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四点二，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点八，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九；**油料作物**，一九二七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九点四，一九二八年为百分之二百三十点九，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二百一十九点七，一九三〇年将不低于百分之二百六十。

技术作物**总产值**方面的情形大体上也同样良好。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总产值为一百，那末情形如下：**棉花**，一九二八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五，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九，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为百分之一百八十二点八；**亚麻**，一九二八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一点六，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八十一点五，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为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三；**甜菜**，一九二八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三，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九点四；**油料**

作物，一九二八年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一点九，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四十九点八，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为百分之二百二十。

由此可见，如果不把一九二九年遭受螟虫灾害的甜菜收获量计算在内，那末技术作物业方面的情形是比较良好的。

然而，就是在这里，在技术作物业方面，由于小经济占优势，将来可能发生而且大概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动摇和不稳固，就像受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影响最少的亚麻和油料作物在上述数字中所反映的那种动摇和不稳固一样。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摆着下列几个农业问题：

（一）如何保证技术作物区有足够的廉价粮食来稳定技术作物的生产状况；

（二）如何保证畜牧区有足够的廉价谷物和饲料来发展畜牧业并解决肉类问题；

（三）如何彻底解决当前农业中的主要问题——谷物问题。

可见谷物问题是农业系统中的基本环节，是解决农业其他一切问题的钥匙。

可见解决谷物问题是解决农业的其他许多问题的首要任务。

但是，解决谷物问题，从而把农业引上蓬勃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要根本消灭农业的落后状态，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装备农业，供给它新的科学工作干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商品率。没有这些条件就休想解决谷物问题。

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能不能实现这一切条件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小农经济无力采用和掌握新技术，无力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无力充分增加农业的商品率。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路：**扩大**农业**规模**，建立以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农庄。

但是苏维埃国家不能走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它只能够而

且只应该建立以新技术装备起来的**社会主义**型的大农庄。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就是这样的农庄。

由此就产生了建立国营农场和把个体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大农庄的任务，这是解决一般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问题的**唯一**道路。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二八年初发生严重的粮食困难以后，党在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

必须指出，我们党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还没有发生严重的粮食困难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根本问题作为实践任务提到日程上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人所共知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直截了当地说：

“在目前时期，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

再援引一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的总结报告中有关的一段话也许不是多余的，这段话同样明确而肯定地提出了根据集体化原则消灭农业落后状态的问题。请看报告中是怎样说的：

“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

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协作的集体的播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五、农民向社会主义方面的转变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速度

农民向集体化方面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开始的。这个转变也不能一

下子开始。固然，党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宣布了集体化的口号。但是要使农民大批转向社会主义，仅仅宣布口号还不够。要达到这个转变，至少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农民群众自己相信党所宣布的口号是正确的，并且当做自己的口号来接受它。所以，这个转变是逐渐准备起来的。

准备了这个转变的是我国发展的整个进程，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整个进程，首先是供给农业各种机器和拖拉机的工业的发展。准备了这个转变的是对富农坚决斗争的政策，是我们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以新方式进行的、使富农经济受到贫农和中农群众监督的粮食收购工作的进程。准备了这个转变的是使个体农民习惯于集体经营的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准备了这个转变的是集体农庄网的建立，农民从那里检验了集体经济形式对个体经济的优越性。最后，准备了这个转变的是分布于全苏联的、以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国营农场网的建立，农民从这里有可能相信新技术的力量和优越性。

如果把我们的国营农场只看做粮食泉源，那就错了。其实，国营农场和它的新技术，它对周围农民的帮助，它的空前的经营规模，是促使农民群众转变并推动他们走上集体化道路的领导力量。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开始的、在我国生活中开辟了一个大转变时期的有千百万贫农和中农参加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

为了有充分准备地迎接并领导这个运动，中央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中央采取了下列三方面的措施：建立和资助国营农场；建立和资助集体农庄；以及组织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生产，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和拖拉机队等等把这些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供给农村。

（甲）早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一个决定，要在三四年内建立一批**新国营农场**，要它们在这一期限终结时至少能出产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后来这个决定经中央全会批准了。当时就成

立了谷物托拉斯来负责执行这个决定。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巩固**原有国营农场**并扩大其播种面积的决定。当时成立了国营农场管理总局来负责实施这个决定。

不能不指出，这些决定曾经遭到我们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当时有人说，投入国营农场的钱是“白扔了的”钱。同时，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所支持的“学者们”也批评说，建立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是办不到的和荒谬的。但是，中央不顾一切仍然执行了自己的路线，并把它贯彻到底。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资助国营农场拨出了六千五百七十万卢布（周转性短期贷款除外）。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拨出了一亿八千五百八十万卢布。最后，本年度拨出了八亿五千六百二十万卢布。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交给国营农场使用的拖拉机有一万八千台，共计三十五万匹马力。

这些措施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呢？

谷物托拉斯的**播种**面积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十五万公顷，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一百零六万公顷，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将达四百五十万公顷，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将达九百万公顷，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即在五年计划期末，将达一千四百万公顷。**国营农场管理总局**的播种面积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四十三万公顷，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八十六万公顷，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将达一百八十万公顷，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将达二百万公顷，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将达二百五十万公顷。**乌克兰国营农场管理局**的播种面积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十七万公顷，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二十八万公顷，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将达五十万公顷，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将达七十二万公顷。**糖业总局**的播种面积（谷物播种面积）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七十八万公顷，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八十二万公顷，一九三〇—一九三

一年度将达八十六万公顷，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将达九十八万公顷，而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将达九十九万公顷。

第一、这就是说，到五年计划期末，仅仅谷物托拉斯的谷物播种面积就将**等于**全阿根廷现有的谷物播种面积。（鼓掌）

第二、这就是说，到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国营农场的谷物播种面积的总和，要比全加拿大现有的谷物播种面积**多**一百万公顷。（鼓掌）

至于国营农场的谷物**总**产量和**商品**谷物产量，那末各年度的变动情形如下：全国国营农场的谷物总产量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九百五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为六百四十万公担；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一千二百八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为七百九十万公担；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达二千八百二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将为一千八百万公担（一亿零八百万普特）；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将达七千一百七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将为六千一百万公担（三亿七千万普特），如此等等。

这就是我们党建立国营农场的政策已经取得的和预期的成果。

按照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建立新国营农场的决定，我们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应当从新建的国营农场至少取得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但实际上我们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单是从新建的国营农场就能取得二亿普特以上。结果超额完成计划一倍。

原来那些嘲笑过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的人是把他们自己狠狠地嘲笑了一顿。

按照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的五年计划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各系统的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应为五百万公顷。但实际上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今年已达三百八十万公顷，而明年即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度将达八百万公顷。

这就是说，我们将在三年内完成并超额完成国营农场建设的五年

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国营农场的谷物总产量应为五千四百三十万公担。但实际上国营农场的谷物总产量今年已达二千八百二十万公担，而明年将达七千一百七十万公担。

这就是说，在谷物总产量方面，我们将在三年内完成并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三年完成！

现在让那些资产阶级论客及其机会主义应声虫们去胡说什么不能在三年内完成并超额完成国营农场建设的五年计划吧。

（乙）至于**集体农庄的**建设，情况就更好。

早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全会就通过了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如下决定：

“坚定不移地实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这种集体经济是建筑在新技术基础上的**自愿联合**，它无论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或从保证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商品率方面来说，都是高级形式的谷物经济。”（见一九二八年中央七月全会“关于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决议）

后来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和一九二九年中央十一月全会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专门决议都肯定了这个决议。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农民开始根本转向集体农庄，大批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专门决议。

在这个决议中，中央

（一）确认**农民已经大批转向**集体农庄，并且有可能在一九三〇年春超额完成集体农庄建设的五年计划；

（二）确认**以集体农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其

他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宣布必须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三）预计按公有化原则耕种的播种面积在一九三〇年春就将**大大超过三千万公顷**；

（四）把苏联分为三类地区，并规定**每类地区**基本上完成集体化的**大致期限**；

（五）**改变土地规划方法**以利于集体农庄，并改变资助农业的方式，规定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至少给集体农庄五亿卢布贷款；

（六）确定集体农庄运动中的**劳动组合形式**为当前**集体农庄制度的基本环节**；

（七）驳斥了党内那些藉口机器和拖拉机不够而企图阻挠集体农庄运动的机会主义分子；

（八）最后，警告党的工作人员要防止集体农庄运动中可能发生的过火行为，避免用从上面下命令的方式来建立集体农庄的危险，因为这种危险会造成以集体化儿戏代替真正的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威胁。

应当指出，中央的这个决议受到我们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极端敌视。有些人议论纷纷，说中央陷入幻想，说中央把人民的金钱“滥花”在“不存在的”集体农庄上去。右派分子洋洋得意，预言我们“必定”失败。但是，中央不顾一切，既不顾右派的庸俗嗤笑，也不顾“左”倾分子的急躁和狂妄，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自己的路线，并把它贯彻到底。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资助集体农庄拨出了七千六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拨出了一亿七千万卢布，本年度则拨出了四亿七千三百万卢布。此外，又拨出了六千五百万卢布作为集体化基金。规定了优待集体农庄的办法，结果使集体农庄的财力增加了二亿卢布。

把剥夺富农的价值四亿多卢布的产业交给了集体农庄。交给集体农庄使用的拖拉机不下三万台（共计四十多万匹马力），此外，还有拖拉机管理总局的七千台拖拉机为集体农庄服务，国营农场系统也用拖拉机帮助集体农庄。今年贷给和帮助集体农庄的种子有一千万公担（六千一百万普特）谷物。最后，在建立机器马匹站方面也给了集体农庄直接的组织上的帮助，这种机器马匹站已经有七千处以上，使用的马不下一百三十万匹。

这些措施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呢？

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一九二七年为八十万公顷，一九二八年为一百四十万公顷，一九二九年为四百三十万公顷，一九三〇年包括春季播种面积和秋季播种面积至少为三千六百万公顷。

第一、这就是说，三年来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增加到四十倍以上。（鼓掌）

第二、这就是说，现在我国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相当于**法意两国播种面积的总和。（鼓掌）

至于集体农庄的谷物**总**产量及其**商品**部分，那末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集体农庄出产了四百九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为二百万公担；一九二八年出产了八百四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为三百六十万公担；一九二九年出产了二千九百一十万公担，其中商品部分为一千二百七十万公担；一九三〇年，根据一切材料看来，将出产二亿五千六百万公担（十五亿五千万普特），其中商品部分至少将为八千二百万公担（五亿多普特）。

必须承认，在一般说来发展速度相当快的我国工业中，任何一个部门都未曾有过像集体农庄建设的这样空前的发展速度。

所有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

首先，它们说明，三年来集体农庄的谷物总产量增加到五十倍以上，其中商品部分增加到四十倍以上。

第二、它们说明，我们今年有可能从集体农庄方面取得占全国商品谷物产量**一半以上**的商品谷物。

第三、它们说明，今后决定农业及其基本问题的命运的不再是个体农民经济，而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第四、它们说明，我国消灭富农阶级的过程正在极其迅速地进行。

最后，它们说明，国内已经发生的经济变动使我们有充分根据肯定说，我们使农村走上了新的道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顺利进行。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的决议中规定，到一九三〇年春按公有化原则耕种的集体农庄播种面积应为三千万公顷。而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三千六百万公顷。结果超额完成了中央的计划。

原来那些嘲笑过中央的决定的人是把自己狠狠地嘲笑了一顿。无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或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过火行为，都没有给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空谈家帮了什么忙。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应为二千零六十万公顷。而实际上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今年已达三千六百万公顷。

这就是说，我们在两年内就已经超额完成集体农庄建设五年计划百分之五十以上。（鼓掌）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集体农庄的谷物总产量应为一亿九千零五十万公担。而实际上集体农庄的谷物总产量今年就将达二亿五千六百万公担。

这就是说，我们在两年内就将超额完成集体农庄谷物产量五年计划百分之三十以上。

五年计划两年完成！（鼓掌）

现在让那些机会主义的长舌妇去胡说什么不能在两年内完成并且超额完成集体农庄建设五年计划吧。

六、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的改善

由此可见，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社会主义部分蒸蒸日上的发展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从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方面来看，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已经为根本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呢？怎样奠定的呢？

第一、因为社会主义部分的增长，首先就意味着城乡剥削成分的缩减，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下降。这就是说，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在我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必然因剥削阶级收入的减少而增加。

第二、因为在公营（社会主义）部分增长的条件下，先前用于供养剥削阶级及其奴仆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今后必将留在生产内部，用于扩大生产、建设新工厂、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力量必将增加，而失业现象必将减少以至消失。

最后，因为公营部分的增长既然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也就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容量不断扩大，工人和农民对于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就是说，国内市场的发展将要超过工业的发展，并推动工业向前发展，使它不断扩大。

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都使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得到不断改善。

（甲）首先谈谈工人阶级**人数增多**和**失业人数减少**的问题。

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失业者除外）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一千零九十九万人，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一千一百四十五万六千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一千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根据一切材料看来，至少为一千三百一十二万九

千人。其中体力劳动者（包括农业工人和季节工人）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七百零六万九千人，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七百四十万四千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七百七十五万八千人，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八百五十三万三千人。其中大工业的工人（职员除外）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二百四十三万九千人，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二百六十三万二千人，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二百八十五万八千人，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三百零二万九千人。

这就是说，我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三年来雇佣劳动者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五，体力劳动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七，产业工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二。

现在谈谈**失业**问题。应当说，在这方面无论劳动人民委员部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都搞得非常混乱。

一方面，根据这两个机关的材料看来，我国约有一百万失业者，其中具有起码的熟练程度劳动者占百分之十四点三，而百分之七十三左右是所谓脑力劳动者和非熟练劳动者，并且后者中绝大多数是和工业生产没有发生过关系的妇女和少年。

另一方面，根据这些材料看来，我们又异常缺乏熟练的劳动力，劳动介绍所只能满足我们各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因而我们不得不急速地、匆忙地训练毫不熟练的人，把他们培养成熟练工人，以满足我们各企业的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需求。

请试试弄清这笔糊涂账吧。不过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这些失业者既不是我国工业的失业**后备**军，更不是我国工业的失业**常备**军。结果怎样呢？甚至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材料看来，最近失业人数也已经比去年**减少**七十多万人。这就是说，截至本年四月三十日止，失业人数已减少百分之四十二以上。

这就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部分增长的又一成果。

（乙）如果从国民收入按阶级分配的情形来看，那末成果就要显

得更加惊人。国民收入按阶级分配的问题，对于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说来，是一个根本问题。无怪乎德国、英国、美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力图把这个问题弄得模糊不清以利于资产阶级，他们时常发表一些这方面的“完全客观的”调查资料。

根据全德统计局的材料，一九二九年德国国民收入中工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资产阶级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根据美国联邦商务委员会和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材料，一九二三年美国国民收入中工人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四强，资本家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五强。最后，根据经济学家鲍莱和斯坦姆的材料，一九二四年英国国民收入中工人阶级收入的比重稍低于百分之五十，资本家收入的比重稍高于百分之五十。

当然，不能相信这些调查的结论。所以不能相信，是因为在这些调查材料中除了纯经济方面的错误以外，还有另一种错误，其目的在于一方面隐瞒资本家的收入，把它说少一些，另一方面夸大工人阶级的收入，把它说多一些，并且把那些领取高薪的官吏也算在工人里面。至于这些调查资料往往不把农场主和一般农业资本家的收入计算进去，那就更不用说了。

瓦尔加同志对这些材料做了批判性的分析。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原来工人和其他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德国为百分之五十五，在美国为百分之五十四，在英国为百分之四十五，资本家收入的比重在德国为百分之四十五，在美国为百分之四十六，在英国为百分之五十五。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

苏联的情况又怎样呢？

请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

（甲）我国**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农民**的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七十五点二（其中城

乡工人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七十六点五（其中城乡工人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七十七点一（其中城乡工人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三点五）。

（乙）**富农和城市资本家**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八点一，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六点五，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一点八。

（丙）**手工业者**（其中大部分是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六点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五点四，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四点四。

（丁）**国家部分**（其收入就是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收入）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八点四，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十，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十五点二。

（戊）最后，所谓**其他方面**（指抚恤金）收入的比重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一点八，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一点六，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一点五。

由此可见，**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剥削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约为**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而在我们这里，**在苏联，剥削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不超过百分之二**。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这样的惊人事实：据美国资产阶级著作家**邓尼**说，美国在一九二二年，“私有者的百分之一掌握了全部国民财富的百分之五十九”，而英国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度，也是据**邓尼**说，“全部私有者中不到百分之二的人占有了全部国民财富的百分之六十四”（见邓尼“美国在征服不列颠”）。

在我们苏联，在苏维埃国家里能不能发生这种事情呢？显然不能。苏联早就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私有者”。

可是，既然苏联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只有将近百分之二的

国民收入落入剥削阶级手中，那末其余大量的国民收入到哪里去了呢？

很明显，这部分收入是留在工人和劳动农民手中。

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和它在千百万工农群众中的威信的泉源就在这里。

苏联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福利不断增进的基础就在这里。

（己）根据这些决定性的事实，就完全可以了解为什么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提高，工人的社会保险费预算不断增加，对贫农和中农的帮助不断加强，用于建筑工人住宅、改善工人生活、妇婴保健工作的经费不断增多，因此，死亡率特别是儿童死亡率减低而苏联人口不断增加。

例如大家知道，工人的**实际工资**（社会保险费和从利润中拨做改善工人生活的基金也计算在内）已经增加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七。最近三年来，仅仅工人的社会保险费预算一项，就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九亿八千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的十四亿卢布。最近三年来（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妇婴保健工作的经费为四亿九千四百万卢布。学前教育（幼儿园、露天幼儿园等）经费在同一时期为二亿零四百万卢布。工人住宅的建筑经费为十八亿八千万卢布。

当然，这并不是说，为大大增加实际工资所必需的一切都已经做到了，再不能把实际工资提得更高了。如果说还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应当归咎于我们一般供应机关的官僚主义，首先和特别是消费合作社的官僚主义。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国内商业中的公营部分在批发方面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在零售方面占百分之八十九以上。这就是说，合作社不断排挤私营部分而成为商业方面的垄断者。这当然很好。但不好的是，这种垄断在若干情形下是对于消费者有害的。原来合作社虽然在商业方面几乎占据垄断地位，但它们宁愿供应工人以“收入”较多即利润优厚的商品（服饰品

等等），不去供应工人以“收入”较少而为工人所更需要的商品（农产品）。因此，工人需要的农产品约有百分之二十五不得不多花钱到私人市场去买。更不必说，合作社机关最关心的是平衡表，因此即使中央领导机关发下极严厉的指令，但它们还是迟迟不减低零售价格。可见合作社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像社会主义经济，而像一种沾染了某种耐普曼习气的特殊经济。既然合作社不执行认真提高工人实际工资的任务，试问，谁需要这样的合作社，它的垄断对工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虽然如此，在我国，实际工资还是逐年在不断提高，这说明我国制度、国民收入的分配制度和工资方面的整个方针是有可能抵销和弥补合作社所造成的种种缺陷的。

此外，如果再加上许多其他因素，如提高公共饮食业的作用、减低工人住宅费用、设立工人和工人子女的巨额助学金、举办文化服务等等，那就可以大胆地说，工人工资增加的百分数比我们某些机关的统计数字要大得多。

把这一切综合在一起，再加上八十三万多产业工人（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三点五）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一百五十多万产业工人（占总数百分之六十三点四）改行每周五日工作制，再加上为工人广泛设立的休养所、疗养院和天然疗养地（最近三年来有一百七十多万工人在这里休养过），——所有这一切都为工人阶级造成了很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使我们有可能培养出身强力壮、愉快活泼、能把苏维埃国家的威力提到应有的高度、并能挺身保卫它使它不受敌人侵犯的新的一代工人。（鼓掌）

至于对农民的帮助，无论是对个体农民或对集体农民的帮助（包括对贫农的帮助），最近三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在信贷和国家预算方面至少拨出了四十亿卢布。大家知道，在这三年内，仅仅种子帮助一项，拨给农民的谷物就不下一亿五千四百万普特。

无怪乎我国工人和农民一般都生活得不坏，一般人口死亡率比战前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六，儿童死亡率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五，我国人口**每年增加**约三百万人。（鼓掌）

至于工人和农民的文化生活状况，那末在这方面也是有一些成绩的。但是这些成绩很小，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满意。如果不算各种工人俱乐部、农村阅览室、图书馆和今年有一千零五十万人参加的识字班，那末文化教育事业的情况如下：本年度初等学校学生有一千一百六十三万八千人，中等学校学生有一百九十四万五千人，工业技术学校、交通学校、农业学校和普通生产技术训练班学生有三十三万三千一百人，中等专业学校和同等程度的职业学校学生有二十三万八千七百人，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学生有十九万零四百人。这一切就使苏联识字人数的百分数能够由战前的百分之三十三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点六。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过渡到初等普遍义务教育。我所以说这是“主要问题”，是因为这种过渡是文化革命方面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而向这方面过渡的时机早已成熟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具有在苏联各个地区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一切必要条件。

在过去，我们不得不“在各方面，甚至在学校经费方面都实行节约”，以“挽救和恢复重工业”（列宁）。但是，最近我们已经恢复了重工业，并且正在把它向前推进。因此，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当着手彻底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时候了。

我认为，如果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一个肯定的、十分坚决的决定，那是完全正确的。（鼓掌）

七、增长中的困难，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全线进攻

我已经讲过我们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的成就。我已经讲过在工业

方面、农业方面以及在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方面的成就。最后，我还讲过在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的成就。

但是，如果以为这些成就是我们“轻而易举、平平稳稳”取得的，是所谓自流产生的，不需要特别努力，不需要聚精会神，不经过斗争和震动，那就错了。这样的成就是不会自流产生的。事实上，这些成就是我们在和困难作坚决的斗争中，在为克服困难而进行的严重而长期的斗争中取得的。

我们大家都在谈论困难。但不是人人都了解这些困难的性质。然而困难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是有极重大意义的。

我们的困难的特点是什么，这些困难的后面隐藏着哪些敌对力量，我们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甲）在说明我们的困难时，至少应当注意到下面一些情况。

首先，必须估计到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改造**时期的困难。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些困难和我国经济**恢复**时期的困难根本不同。恢复时期的问题是要充分利用原有工厂和在农业原有基础上帮助农业，而目前的问题是要根本改建，改造工业和农业，改变它们的技术基础，用现代技术去装备它们。这就是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改建国民经济的整个技术基础。这就需要大量增加国民经济的投资，需要有能掌握新技术并且能推进新技术的较有经验的新干部。

第二、应当注意到，在我国改造国民经济不仅限于改建它的技术基础，同时还要改变社会经济关系。我这里指的主要是农业。在已经联合起来并实行社会主义化的工业方面，技术改造基本上已经具备现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改造的任务就是加紧排挤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农业方面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简单了。改造农业的技术基础当然也是追求同样的目的。但是我国农业的特点是：小农经济仍占优势，小经济不可能采用新技术，因此，不同时改变旧的社会经济结

构，不把个体小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不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连根铲除，就**不可能**改建农业的技术基础。

显然，这些情况不能不使我们的困难复杂化，不能不使我们克服这些困难的工作复杂化。

第三、应当注意到，我们在国民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既然是要割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并打倒旧世界的一切势力，也就不能不引起这些势力的拼命反抗。大家知道，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我国工业各部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进行的恶毒的暗害活动，在农村中**富农**反对集体经济形式的凶暴斗争，机关中那些充当阶级敌人代理人的**官僚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措施的怠工行为——这就是我国的垂死阶级现时的主要反抗形式。很明显，这些情况是不能有助于我们改造国民经济的工作的。

第四、应当注意到，我国的垂死阶级的反抗并不是脱离外界而孤立进行的，而是受资本主义包围支持的。不能把资本主义包围看做单纯的地理上的概念。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行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帝国主义世界不愿意让苏联站稳脚跟并有可能赶上以至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它们就援助苏联内部的旧势力。很明显，这种情况也不会有助于我们的改造工作。

但是要全面说明我们的困难，还必须注意一种情况。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困难的特殊性。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困难不是**衰落**中的困难或**停滞**中的困难，而是**增长**中的困难，**高涨**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根本不同。在美国，当人们谈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衰落**中的困难，因为美国现在正经受着危

机即经济衰落。在英国，当人们谈到困难的时候，指的是**停滞**中的困难，因为英国已经有好几年处于停滞状态，即停止向前发展。而当我们谈到我国的困难的时候，指的既不是衰落，也不是发展中的停滞，而是我国力量的**增长**，我国力量的**加强**，我国经济的**前进**。到某某时候**前进**多少，**多**制造出百分之几的产品，**多**播种几百万公顷土地，**提前**几个月建成工厂、筑好铁路，——这就是在我国当人们谈到困难时所指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困难和美国或英国等国的困难不同，我们的困难是**增长**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是这样一些困难，它们**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它们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我们的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们**本身就给我们造成克服它们的基础**。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困难不是因细小和偶然的“毛病”而引起的困难，而是阶级斗争引起的困难。

第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困难后面隐藏着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些困难由于我国的垂死阶级拼命反抗，由于这些阶级得到外援，由于我们自己的机关里存在着官僚主义分子，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党员缺乏信心和因循守旧而复杂起来。

第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必须打退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镇压他们的反抗，从而为迅速前进扫清道路。

最后，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我们的困难是**增长**中的困难，所以困难的性质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镇压阶级敌人所必要的**可能性**。

但是要利用这些**可能性**并把它们变成**现实**，要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和克服困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组织向资本主义分子的**全线进攻**，并且孤立我们自己队伍里的阻碍进攻、张皇失措、在党内散布不相信胜利的思想的机会主义分子。（鼓掌）

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在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分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幼稚公式中寻找出路。我国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按照布哈林的公式发展的。我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发展的。是我们打垮、压倒他们剥削者，还是他们打垮、压倒我们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总之，**组织社会主义全线进攻**，——这就是我们在开展**整个**国民经济改造工作时所面临的任务。

党正是这样了解自己的使命的，它组织了向我国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

（乙）但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一般是否可以举行进攻并且是全线进攻呢？

有些人以为进攻是和新经济政策抵触的，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退却，退却既然终止，新经济政策就应当废除。这当然是蠢话。这种蠢话或者是来自根本不懂列宁主义、竟想“一下子”“废除”新经济政策的托洛茨基分子；或者是来自同样根本不懂列宁主义、竟想以“新经济政策有被废除的危险”的胡说来作为拒绝进攻的藉口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如果新经济政策只是退却，列宁就不会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当我们最彻底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说“退却终止了”。列宁在谈到退却终止的时候不是同时又声明我们打算“认真而长期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吗？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了解什么新经济政策和进攻抵触的胡说是多么荒谬了。实际上，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分子。我们转入全线进

攻时还不废除新经济政策，因为私营商业和资本主义分子还存在，“自由的”商品流转还存在；但是，我们确实正在终止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开展它的下一阶段即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这一阶段是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

请看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以后所说的话：

“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快跑，更有力地向前跳。仅仅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才在施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却。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实行改编、调整、改组，以便在退却之后开始极顽强地向前进攻，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为了把这一切行动进行得有条不紊，就应当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不是三思而是百思而后行。”（“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九九页）

看来是很清楚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转入进攻的时候是否已经到了呢？进攻的时机是否成熟了呢？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也是在一九二二年说过，必须：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四三页）

但是这里还是这个问题：这样加速前进、加快我国发展速度的时候是否已经到了呢？我们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转入决定性的全线进攻，时机选择得是否正确呢？

党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给了明确而肯定的答复。

是的，这样的时机已经到了。

是的，转入全线进攻的时机，党是选择得正确的。

工人阶级积极性的不断增长和党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空前提高说明了这一点。

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积极性的不断增长和这些群众向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根本转变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工业发展方面以及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成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现在不仅有可能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而且还能够超过富农生产几倍，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谷物问题并贮存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后备，把生产商品谷物的重心从个体生产方面转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方面，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切都证明，转入全线进攻和宣布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的时机，党是选择得正确的。

如果我们听从了布哈林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话，如果放弃了进攻，减缓了工业的发展速度，延迟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并以个体农民经济为基础，那会怎样呢？

我们就一定会破坏我国工业，断送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落得没有粮食而为富农的横行扫清道路。我们就会落得一场空。

如果我们听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话，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在我们还没有任何可能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时候展开进攻，那会怎样呢？

我们就一定会在这次进攻中遭到失败，暴露出自己的软弱，加强富农和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的阵地，把中农推入富农的怀抱，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落得没有粮食。我们就会落得一场空。

结果都是一样。

无怪乎我国的工人说：“向‘左边’走，却到了右边。”（鼓掌）

有些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进攻中主要的是高压手段，如果不强化高压手段，那就没有进攻。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这当然是不对的。

高压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因素，但它是辅助的，不是主要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进攻中主要的是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加快从经济上排挤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速度，动员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动员群众反对资本主义。你们尽可以逮捕并流放几万几十万富农，但如果你们不同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速建立新的经济形式，用新的经济形式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破坏并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经济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基础，那末富农终究还会复活和生长起来的。

另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进攻就是一味前进，不必做相当的准备，不必在进攻进程中重新部署力量，不必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不必利用后备力量来扩大胜利，如果出现了某些现象，例如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那就是说“革命退潮”了，运动低落了，进攻中止了。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这当然是不对的。

第一、任何一次进攻，即使是最顺利的进攻，也不免在战线的个别地段稍被突破和略为冒进。如果根据这一点就说进攻中止了或进攻失败了，那就是不懂进攻的实质。

第二、过去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任何**顺利的**进攻可以不必在进攻进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可以不必巩固已经占领的阵地，可以不必利用后备力量来扩大胜利并把进攻进行到底。如果一味前进，就是说不遵守这些条件，进攻就必然遭到挫折和失败。一味前进就是置进攻于死地。我们国内战争的丰富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革命退潮”通常是在运动**低落**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在运动继续**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包括工

业建设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我国全部社会主义建设继续**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我国革命继续**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怎能把这两者加以类比呢？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之间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丙）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实质是什么呢？

首先，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实质是：动员群众提高阶级警惕性和革命积极性去反对我国的资本主义分子；动员群众发挥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去反对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埋没了蕴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使我们不能利用；组织群众竞赛和掀起群众劳动高潮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其次，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实质是：改造工会、合作社、苏维埃以及其他各种群众组织的全部实际工作以适应改造时期的需要；在这些组织里建立由最积极最革命的工作人员组成的核心，排挤和孤立机会主义分子、工联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驱逐这些组织中的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从下面提拔新的工作人员。

再其次，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实质是：尽量动员资金投入我们的工业，投入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并调派优秀党员去开展这一切工作。

最后，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实质是：动员党本身去组织进攻的全部工作；巩固和砥砺党组织，驱逐官僚主义分子和蜕化分子出党；孤立和排挤脱离列宁路线的右倾和“左”倾分子，把真正的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

这就是目前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基础。

党是怎样实现了这个进攻计划的呢？

你们知道，党最彻底地实现了这个计划。

首先，党开展了广泛的**自我批评**，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建设工作的缺点上，集中在我们各组织和各机关的缺点上。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宣布必须加强自我批评。一方面，揭露出党的个

别环节缺乏革命嗅觉的沙赫特事件和各工业部门中的暗害活动，另一方面，反富农的斗争和我们农村组织中所暴露的缺点，这一切进一步推动了自我批评的开展。中央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的公告中最终地确定了开展自我批评运动，号召党和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不顾情面地”展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党摈弃了来自敌对营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和削弱苏维埃政权力量的托洛茨基主义“批评”，宣布自我批评的任务就是无情地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来**改进**我们的建设工作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大家知道，党的号召得到了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极热烈的响应。

其次，党组织了广泛的反**官僚主义**运动，提出了把异己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从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的口号。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关于提拔工人参加国家机关和吸收广大工人监督苏维埃机关（工厂自愿辅助运动）的著名决议就是这个运动的继续。大家知道，这个运动激起了工人群众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开展这个运动的结果，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加深了，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党，整个整个的车间和工厂的工人通过决议要求入党。最后，开展这个运动的结果，我们的组织清除了许多保守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摆脱了旧的机会主义的领导。

其次，党在各工厂组织了广泛的社会主义**竞赛**，掀起了群众性的**劳动高潮**。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关于竞赛的号召把这件事情引上了轨道。突击队正在把它向前推进。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它所领导的青年工人，使竞赛和突击运动不断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必须承认，我们的革命青年在这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现在已经毋庸怀疑，各工厂的社会主义竞赛，几十万工人的相互报告在竞赛方面所获得的成绩，**突击运动**的广泛开展，即使不是目前我国建设事业中的最重要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群众心理上和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上所发生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根本改变了我们工厂的面貌。不久以前，在我们这里还有人说什么竞赛和突击运动是“臆造”的，“没有根据”的。现在这些“聪明”人甚至不值一笑了，他们简直被认为是过了时的“聪明人”。现在竞赛和突击运动是已经争得的和已经巩固的事情。我国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人已经有两百多万，而参加突击队的工人也不下一百万，这都是事实。

竞赛中最突出的地方是：竞赛使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使过去被认为是可耻而沉重的负担的劳动变为**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在他们资本家那里，为社会所称道的最合心愿的事情是收地租，靠利息生活，不从事劳动，认为劳动是下贱的事情。相反地，在我们苏联，为社会所称道的最合心愿的事情是能够成为备受千百万劳动者尊敬的劳动英雄，突击英雄。

竞赛中应当认为同样突出的一个事实是：竞赛在农村中也开始展开了，它已经把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席卷进去了。无数的事实都表现出千百万国营农场工作人员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真正劳动热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两年前谁能想到竞赛和突击运动能获得这样的成就呢？

再其次，党动员了国家的财力来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供给国营农场许多优秀的组织者，派出两万五千名先进工人去帮助集体农庄，提拔了集体农民中的优秀分子担任集体农庄的领导工作，开办了许多集体农庄庄员训练班，从而为培养坚定而有经验的集体农庄运动的干部奠定了基础。

最后，党按战斗规范整编了自己的队伍，重新武装了报刊，组织了两条战线的斗争，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当头击溃了右倾分子，孤立了调和分子，从而保证了为顺利进攻所必需的党的队伍在列

宁路线基础上的统一，而且正确地领导了进攻，制止了右派营垒中的渐进论者以及集体农庄运动中的“左”倾过火分子，并把他们引上了正确的道路。

这些就是党为进行全线进攻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大家都知道，这场进攻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获得了胜利。

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克服我国国民经济改造时期的许许多多困难。

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胜利地克服我国建设中的最大困难——使基本农民群众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困难。

外国人有时探听苏联的内部状况。但是，苏联的内部状况是稳固的、不可动摇的，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请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吧，看看这些国家里危机和失业的增长，看看这些国家里的罢工和同盟歇业，看看这些国家里的反政府的游行示威。试问这些国家的内部状况怎能和苏联的内部状况相比呢？

必须承认，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现存一切政权中最稳固的政权。（鼓掌）

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苏联内部状况的面貌。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状况的面貌。

于是自然就发生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两种状况加以对照和比较，那末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个问题所以特别有意思，是因为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报刊，从明显的资本主义报刊到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报刊，都在异口同声地叫喊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苏联的“灭亡”，苏联“财政经济的破产”等等。

那末，在分析了我们苏联的状况和他们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以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让我们举出几个大家都知道的主要事实吧。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方面都是经济**危机**和生产**衰落**。

在我们苏联这里，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都是经济**高涨**和生产**发展**。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日益**恶化**，工人的工资日益**减少**，失业人数日益**增多**。

在我们苏联这里，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工人的工资日益**增加**，失业人数日益**减少**。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罢工和游行示威日益**增多**，以致**丧失了**千百万个工作日。

在我们苏联这里，没有罢工，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热情不断**高涨**，给我国**增加了**千百万个额外工作日。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内部状况**尖锐化**，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运动日益**增长**。

在我们苏联这里，内部状况**稳固**，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民族问题**尖锐化**，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群岛等地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增长**并转变为**民族战争**。

在我们苏联这里，民族友爱的基础日益**巩固**，民族**和睦**有保障，千百万苏联各族人民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

在他们资本家那里，人们**张皇失措**，情况日益**恶化**。

在我们苏联这里，人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情况日益**改善**。

有人在空谈什么苏联的“灭亡”，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等等。要是说那些如此“突然地”落入经济危机漩涡而至今还未能爬出衰落泥沼的人必然灭亡，岂不更正确吗？

为什么他们资本家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而我们苏联却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呢？

有人说，国民经济状况在很多方面取决于资本的多寡。这当然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和苏联呈现高涨不是因为我们的资本多，他们的资本少吗？不，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苏联的资本比资本主义国家少得多。如果这里问题**决定于**积累的情况，那末我们就应当发生危机，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应当呈现高涨了。

有人说，经济状况在很多方面取决于经济工作干部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才能。这当然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和苏联呈现高涨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干部少，我们的技术干部多吗？不，当然不是！谁都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在技术上有经验的干部比我们苏联多得多。我们从来不隐瞒而且也不打算隐瞒，在技术方面我们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的学生，而首先和主要是美国人的学生。不，这里问题并不决定于技术干部的多寡，虽然干部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也许问题的答案是我国的文化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吧？也不是。谁都知道，我国人民的一般文化水平比美国、英国和德国低。不，问题不在于人民的文化水平，虽然文化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莫大的意义。

也许这里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的个人才干吧？也不是。危机是随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每隔十二年、十年、八年或更短的时间就发生一次。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既然如此，胡佛及其集团也遭到失败又有什么奇怪呢？不，这里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

那末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苏联虽然文化落后，资本不足，缺少技术熟练的经济工作干部，但它却处在经济日益**高涨**的状态，并且在经济建设战线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资本充足，技术干部很多，文化水平比较高，但是，他们却处在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状态，并且在经济发展方面**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制度**和资本家的经济**制度不同**。

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合理**。

原因在于苏维埃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

什么是苏维埃经济制度呢？

苏维埃经济制度就是：

（一）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经被推翻而代之以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政权；

（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厂等已经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过来并转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所有；

（三）生产的发展所服从的不是竞争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原则，而是计划领导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

（四）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保证剥削阶级及其为数众多的寄生仆役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扩大城乡社会主义生产；

（五）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和劳动者的需求（购买力）的不断增长既然是扩大生产的日益增长的泉源，因而也就保证劳动者免遭生产过剩的危机，免受失业增长和贫困的痛苦；

（六）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自己劳动人民做工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是：

（一）国家政权属于资本家；

（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剥削者手里；

（三）生产所服从的不是改善劳动群众物质生活状况的原则，而是保证资本主义高额利润的原则；

（四）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而是为了保证剥削者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五）资本主义合理化和生产迅速**发展**是以保证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因而不免要受到千百万劳动群众的贫困生活和物质生活水平**下降**的阻碍，因为千百万劳动群众不总是能够满足自己的甚至是最低最低限度的需求，这种情况必然为不可避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失业的增长和群众的贫困造成条件；

（六）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被剥削者，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的阶级即剥削阶级做工的。

这就是**苏维埃**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的地方。

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比**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优越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苏联这里经济日益高涨，而在他们资本家那里经济危机日益加深。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苏联这里，群众的消费（购买力）的增长总是超过生产的增长，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而相反地在他们资本家那里，群众的消费（购买力）的增长从来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并且总是落在生产后面，往往使生产陷入危机。

正因为如此，在他们资本家那里，在危机期间以销毁“剩余”商品和焚毁“多余”农产品来保持高昂价格、保证高额利润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而在我们苏联这里，人们会把犯这种罪行的罪人送到疯人院里去。（鼓掌）

正因为如此，在资本家那里，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组织革命斗争反对现存资本主义政权，而在我们苏联这里，千百万工人和农

民在展开伟大的劳动竞赛，决心挺身捍卫苏维埃政权。

正因为如此，苏联的内部状况坚固稳定，而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状况则动荡不定。

必须承认，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末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最近几年是检验和在实践中考验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即苏维埃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时期。这几年来，说苏维埃制度“灭亡”和“破产”的预言真是太多了。关于资本主义“繁荣”的谈论和赞颂则更多。结果怎样呢？这几年的事实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而苏维埃经济制度则具有许多**优点**，这些优点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全民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所不敢梦想的。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俄共（布）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说：

“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都注视着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这是已经达到的。资本家要抹杀、隐瞒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他们就拼命寻找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错误和我们的弱点。世界规模的斗争已转到这个战场上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一定会最终地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页）

应当承认，列宁提出的任务我们党正在胜利地完成。

九、当前的任务

（甲）　一般任务

（一）首先是**苏联全国工业的正确分布**问题。不管我们怎样发展国民经济，都不能撇开工业这一国民经济领导部门的正确分布问题。目前的情况是：我国工业和我国国民经济基本上都是依靠乌克兰煤矿钢铁基地。显然，没有这样一个基地，要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的乌克兰燃料钢铁基地就是这样一个基地。

但是，只有这一个基地，今后是否能满足苏联南部、中部、北部、东北部、远东和土尔克斯坦各地区的需要呢？一切材料说明，这是不可能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情况是：这个基地对于我们已经不够了。新情况是：今后在大力发展这个基地的同时还要立即开始建立第二个煤矿钢铁基地。应该成为这个基地的是乌拉尔—库兹涅茨克联合工厂，就是说，要把库兹涅茨克的炼焦煤和乌拉尔的铁矿结合起来。（鼓掌）由于正在下新城建设汽车制造厂，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设拖拉机制造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设机器制造厂，在萨拉托夫和诺沃西比尔斯克建设联合收割机制造厂；由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有色金属工业不断发展，需要在东部建立许多修理厂和许多基本冶金工厂；最后，由于决定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和土尔克斯坦建设纺织厂，——由于这一切，就绝对需要立即着手在乌拉尔建立第二个煤矿钢铁基地。

你们知道，我们党中央在关于乌拉尔钢铁工业托拉斯的决议中所提出的主张正是这样。

（二）其次是**苏联全国农业各基本部门的正确分布**问题，即**我国各地区按农作物种类和农业部门实行专业化**的问题。很明显，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要严格实行专业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小经济是不稳固的经济，它没有必需的后备，因而不得不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各种各样的作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灾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同样很明显，不保证国家掌握一定的粮食后备，也不可能实行专业化。现在，当我们已经过渡到大经济并且保证国家掌握了粮食后备的时候，

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向自己提出按作物种类和农业部门正确实行专业化的任务。而这件事情的起点就是彻底解决谷物问题。我说这是“起点”，因为不解决谷物问题，不在畜牧区、产棉区、甜菜区、亚麻区和烟草区设立大批粮仓，就不能向前推进畜牧业和技术作物业，就不能保证我国各地区按作物种类和农业部门实行专业化。

任务在于利用已经发掘出的可能性并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三）其次是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干部**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我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很低。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是一部分和从前的企业主有联系的并且受到外国方面怂恿的专家领导了暗害活动。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因素是我们许多做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缺乏革命警惕性，常常在精神上做了暗害分子的俘虏。然而，在我们面前摆着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任务，它需要大批能够掌握新技术的新干部。因此，干部问题就真正成为我们十分迫切的问题。

我们在采取下列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坚决和暗害分子作斗争；

2. 尽量关心和照顾已经和暗害分子划清界限的绝大多数专家和技术人员（我指的不是乌斯特里雅洛夫一类高谈阔论和装模作样的人，而是那些老老实实和工人阶级一起工作的真正的科学工作者）；

3. 组织国外的技术援助；

4. 派遣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到国外去学习并一般地吸取技术经验；

5. 把技术学校移交给各有关经济机关，以便最快地培养出足够的工农出身的技术人员和专家。

任务在于展开实现这些措施的工作。

（四）**反官僚主义斗争**问题。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在于它埋没了潜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使我们不能利用，它力图打消群众的创造主动性，用文牍主义束缚它，结果使党的每一新的创

举都变成琐碎无聊的小事。其次，官僚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反对**检查执行情况**，企图把领导机关的重要指示变成脱离实际生活的纸上空文。有危险的不单是而且主要也不是我们机关留用的那些旧官僚主义分子，而是——特别是——那些新官僚主义分子，即苏维埃的官僚主义分子，其中“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也决不是扮演末等角色。我指的是那些把文牍主义的命令和“指令”奉为偶像的“共产党员”，他们力图用这样的命令和“指令”来代替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

任务在于击破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官僚主义，消灭官僚主义的“风俗”和“习惯”，为利用我国制度的后备力量，为发挥群众的创造主动性和自动精神扫清道路。

这个任务是不轻的。它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想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我们国家，那就无论如何应该解决它。

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党进行着四方面的工作：开展**自我批评**，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清洗**机关以及从下面**提拔**工人阶级中的忠诚的工作人员参加机关工作。

任务在于竭尽全力来执行这一切措施。

（五）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方面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就不能解决改造的任务，就不仅不能赶上并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连自己的独立生存也不能保住。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对于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党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下列三方面的措施：不断**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在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中建立**同志的劳动纪律**以及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这一切都是在已改进的技术和合理的劳动组织的基础上实行的。

任务在于继续开展实现这些措施的群众运动。

（六）**供应**问题。这里包括**充分供应**城乡劳动者必需品的问题、使**合作社机关**适应工农需要的问题、不断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的问题以及**减低**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问题。关于消费合作社的缺点，我已经讲过了。必须消灭这些缺点并力求实现**减低价格的政策**。至于商品缺乏（“商品荒”）的现象，那末我们现在已经有可能扩大轻工业的原料基地和发展城市日用品的生产了。粮食供应可以说已有保证。比较困难的是肉类、乳制品和蔬菜的供应。很可惜，这个困难在几个月内是不能消灭的。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克服这个困难。一年以后，首先是由于有了为克服这个困难而建立起来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我们将有可能充分保证肉类、乳制品和蔬菜的供应。当我们已经拥有粮食后备和纺织品、大量建筑着的工人住宅、廉价的公用事业服务的时候，再掌握这些产品的供应，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掌握决定工人预算和工人实际工资的一切基本因素。这就是说工人实际工资的迅速提高得到完全可靠的保证。

任务在于使我们的各组织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七）**信贷**和**货币流通**问题。合理地组织信贷事业和正确地调度后备资金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党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下列两方面的措施：把全部短期信贷业务集中于国家银行，在公营部分中实行非现金结算。这样，第一、国家银行就变成计算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全国性机关；第二、有大量货币从流通中抽出。毫无疑义，这些措施一定会促使（而且已经在促使）全部信贷事业走上正轨，促使我们的切尔文得到巩固。

（八）**后备**问题。一般国家，特别是我国，没有后备是不行的，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好几次，现在用不着再重复了。我们在粮食、商品和外汇方面是有一些后备的。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段时期内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些后备的良好作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些”后备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各方面都有更丰富的后备。

因此，任务在于积蓄后备。

（乙）工业方面的任务

（一）主要问题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要知道，我国的生铁产量只是在本年度，即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才达到并超过战前标准。这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要消除这个威胁，就必须加速发展钢铁工业。到五年计划期末，我们需要的生铁不是五年计划所要求的一千万吨，而是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吨。如果我们愿意真正开展我国的工业化事业，我们就无论如何应当完成这个任务。

布尔什维克应当表明他们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抛开**轻**工业。不，不是这个意思。直到目前为止，为了恢复重工业，我们曾经在各方面节约，包括在轻工业方面节约。但是，重工业我们已经恢复了。只是需要使它继续发展。我们现在可以转向轻工业并使它加速向前发展。我国工业发展中的新现象之一，就是我们现在有可能同时加速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棉花、亚麻和甜菜的播种计划今年已经超额完成，罗布麻和人造丝问题已经解决，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有可能真正地向前推进轻工业了。

（二）**实行合理化、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我们的许多企业在实行合理化方面有不少缺点，降低成本的计划完不成，产品质量低劣，这些情况不能再容忍了。这些缺点和缺陷压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使它不能向前进展。已经是而且早就是洗去这种可耻污点的时候了。

布尔什维克应当表明他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三）**一长制**问题。破坏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的现象也使人不能容忍了。工人时常埋怨说：“工厂里没有人作主”，“工作中没有秩序”。我们不能再容忍我们的企业由生产有机体变成议会。归根到底

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应当了解，不保证实行一长制，不建立工作过程中的严格的责任制，我们就不能解决改造工业的各项任务。

（丙）农业方面的任务

（一）**畜牧业**和**技术作物业**问题。现在，当我们基本上已经解决谷物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着手同时解决当前迫切的畜牧业问题和技术作物业问题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时，我们应当走解决谷物问题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说，通过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它们是我们政策的据点）逐步改造目前的小农畜牧业和技术作物业的技术基础和经济基础。“养牛托拉斯”、“养羊托拉斯”、“养猪托拉斯”、“牛油牛奶托拉斯”加上畜牧业集体农庄；现有的技术作物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些就是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起点。

（二）**继续展开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问题。几乎用不着多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整个农村建设中的**首要**问题。现在连瞎子都能看见，农民从旧到新，从遭受富农奴役到享受集体农庄自由生活的巨大的根本的转变已经实现了。旧的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富农阶级注定要灭亡，并且一定会被消灭。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路，集体农庄的道路。而集体农庄的道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没有体验过的道路。农民群众亲自用各种方式体验过和检验过这条道路。他们体验到并认定这条道路是使农民摆脱富农奴役、摆脱贫困、摆脱愚昧的新办法。这就是我们取得成就的基础。

农村中的新运动怎样继续发展下去呢？走在前面的将是国营农场，它们是改造农村旧经济结构的中坚。跟在它们后面的将是大批集体农庄，它们是农村新运动的据点。这两个系统协同工作，就给苏联各地区的完全集体化创造了条件。

集体农庄运动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它已经从**农民本身**中间

提拔了集体农庄事业的几千个**组织者**和几万个**鼓动者**。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我们这些老练的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有集体农庄的农民，集体农庄事业的几万个农民组织者和鼓动者将要自己举着集体化旗帜前进。而农民鼓动者是集体农庄运动出色的鼓动者，因为他们能找到为其余农民群众明白易懂而又能够接受的道理来说明集体农庄的好处，而这些道理是我们这些老练的布尔什维克连想都想不到的。

有人发出必须放弃全盘集体化政策的论调。听说连我们党内也有这种“思想”的拥护者。但是，只有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全盘集体化的方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没有它，就不可能完成苏联各地区集体化的五年计划。如果不背叛共产主义，不出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那又怎么能放弃这个方法呢？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一切都会“顺利地”和“正常地”进行。集体农庄内部的动摇还是会发生的。来潮和退潮还是会发生的。但这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引起集体农庄运动建设者的惊惶。这更不能成为集体农庄运动蓬勃发展的严重阻碍。集体农庄运动无疑是健全的运动，它一定能不顾一切，不顾个别阻碍和困难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任务在于准备力量并做好工作来进一步开展集体农庄运动。

（三）**使机关**尽量**接近区**和**村**的问题。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区域划分**，我们就不能展开改造农业和发展集体农庄运动的巨大工作。扩大乡而把它们改为区，取消州而把它们改为较小的单位（专区），最后，成立省作为中央的直接据点，——这就是区域划分的概况。区域划分的目的是使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接近区和村，以便有可能及时解决农业的一些迫切问题，即发展农业，改造农业等问题，我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划分给了我们整个建设事业很大的好处。

但是，使机关实际接近并且真正接近区和村所应做的一切，是否都做到了呢？没有，没有都做到。现在集体农庄建设的重心已经转到区级组织方面。集体农庄建设和农村的其他一切经济工作，包括合作社方面、苏维埃方面、信贷方面、收购方面的一切经济工作都集中到区级组织。为了展开这一繁杂工作，供给区级组织所需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是否已经够了呢？毫无疑问，供给区级组织的工作人员是非常不够的。出路何在呢？为了改正这个缺点，保证我们各个工作部门的区级组织都有足够的必要的工作人员，需要做些什么呢？为此至少需要做到两件事情：

（一）撤销专区，（鼓掌）因为它已经变成省和区之间的一道不必要的隔板，拿空出来的专区级工作人员来加强区级组织；

（二）使区级组织直接和省（边区委员会、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

这样就会彻底完成区域划分的工作，彻底完成使机关接近区和村的工作。

大家听到将要撤销专区都鼓掌欢迎。当然，专区是应当取消的。但是，如果以为这样我们就有权痛骂专区，像有些同志在“真理报”上所做的那样，那就错了。不应当忘记，专区曾经担负过巨大的工作，起过很大的历史作用。（鼓掌）

同样我认为，在撤销专区这件事上过分急躁也是错误的。中央已经通过撤销专区的决定。但中央决没有认为这件事应当立刻进行。很明显，在撤销专区以前，必须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丁）运输方面的任务

最后是**运输**问题。运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是用不着多说的。运输不仅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大家都知道，它对国防也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尽管运输具有重大意义，可是运输业，运输业的改造还是落后于一般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有使运输变成国民经济中可能阻碍我们前进的“薄弱环节”的危险，这还用得着证明吗？难道还不是结束这种情况的时候了吗？

情形特别糟的是内河运输。实际情况是：伏尔加河航务局的运输量刚刚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而德涅泊河航务局的运输量只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和四十——这就是内河运输所能记入自己的“成绩”表的一切。不用说，这是很大的“成绩”！难道还不是洗去这种耻辱的时候了吗？（喊声：“是时候了！”）

归根到底，任务在于用布尔什维克精神从事运输事业并把它向前推进。

* * *

党的当前任务就是这样。

为了实现这些任务，需要做些什么呢？

为此，首先和主要的是必须**继续**开展对资本主义分子的全线进攻并**把它进行到底**。

目前我们政策的中心和基础就在这里。（鼓掌）

三 党

现在来谈谈党的问题。

上面我已经谈过苏维埃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的地方。谈过我国的制度在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斗争中给我们提供的巨大可能性。谈过如果没有这些可能性，如果没有利用这些可能性，我们就不能得到我们在过去这个时期中所获得的那些成就。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党是否正确地利用了苏维埃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些可能性呢？党是否埋没了这些可能性，因而妨碍了工人阶级彻底发挥自己的全部革命力量呢？党是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可能性来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呢？

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党的路线和正确执行这条路线起着远非次要的作用。

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右倾机会主义者断定说，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可以不必为工业化的速度、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发展等等操心，反正胜利的到来会所谓自流地得到保证。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愚蠢的。这样说，就是否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否认党对这个建设事业所负的责任。列宁决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只说过，“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必须摈弃机会主义的自流论，必须改建（改造）国民经济并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

其次，右倾机会主义者断定说，在我国制度内不存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发生分裂的基础，因此可以不必为制定对待农村各社会集团的正确政策操心，反正富农会长入社会主义，而工农联盟会所谓自流地得到保证。这种说法同样是不对的，愚蠢的。只有那些不了解党的政策（而且还是执政党的政策）是决定工农联盟命运的基本因素的人，才会这样说。列宁决没有认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没有分裂的危险。列宁说过，“在我国社会制度内**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但是，“**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末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列宁认为：

“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留心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预防**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

可见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也决不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在我国制度内存在着防止这种分裂和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可能性**。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把**防止**分裂的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必须埋葬机会主义的自流论，必须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由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由此可见，必须把我国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利用**这些可能性即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严格区别开来。

由此可见，完全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党没有看到这些可能性或者不会正确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因此得到的会不是胜利而是失败。

但是这里还是这个问题：党是否正确地利用了苏维埃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些**可能性**和**优越性**呢？党是否尽了一切力量来**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从而保证我国建设事业获得最大胜利呢？

换句话说，党和党中央在过去这个时期中是否正确地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呢？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为了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需要做些什么呢？

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除了其他一切条件外，还必须使党的路线正确；必须使群众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积极拥护这条路线；必须使党不要仅限于制定总路线，而要天天领导这条路线的实现；必须使党同脱离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以及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必须使党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锤炼自己队伍的统一和铁的纪律。

党和党中央为实现这些条件做了些什么呢？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问题

（甲）党在目前的基本方针，就是由社会主义在经济战线的**个别地段**上的进攻**转入**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全线**进攻。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是**工业化**代表大会。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是**集体化**代表大会。

这些都是给**总**进攻做准备。

和过去各个阶段不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面临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全线总**进攻的时期，是加紧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

简略地说，我们党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这样。

这条路线是否正确呢？

是的，是正确的。事实说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鼓掌）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所获得的胜利和成就证明了这一点。过去这个时期党在城乡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所获得的决定性的胜利，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实行不正确政策的结果。只有正确的总路线才能使我们获得这样的胜利。

我们的阶级敌人，资本家和他们的报刊，教皇和形形色色的主教，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布拉莫维奇及唐恩一类的“俄国”孟什维克近来对我们党的政策所发出的疯狂号叫证明了这一点。资本家和他们的奴仆咒骂我们党，这就是说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鼓掌）

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命运证明了这一点。托洛茨基

分子营垒中的先生们曾经胡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蜕化”，什么“特米多尔”，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必然胜利”等等。而事实上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托洛茨基主义瓦解了，完蛋了。大家知道，一部分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了，并在他们的代表人物的许多声明中承认党是正确的，自认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的。另一部分托洛茨基分子则确实蜕化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事实上成了为资产阶级报刊搜集联共（布）情报的人员。而本该“蜕化”（或者“已经蜕化”）的苏维埃政权却依然健在并在建设社会主义，在胜利地给我国资本主义分子及其小资产阶级应声虫以致命打击。

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右倾分子的命运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曾经胡说和叫喊党的路线会“招致灭亡”，苏联“必遭灾祸”，必须把国家从党和党的领导手里“拯救出来”等等。而事实上结果怎样呢？事实上结果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都获得了极大的胜利，而本想“拯救”国家但后来承认自己的看法错误的右倾分子集团现在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了。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的日益提高，千百万劳动群众对党的政策的积极拥护，以及工人和集体农民所发挥的那种巨大的使我国的敌人和朋友都感到惊异的空前未有的劳动热情证明了这一点。至于那些标志着对党的信任加深的事实，如整个整个的车间和工厂的工人申请入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党员人数增加了六十多万，单是今年第一季度就有二十万人入党，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不是表明千百万劳动群众认识到我们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并决心拥护它，又是表明什么呢？

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党的总路线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那就不会有这些事实。

（乙）但是，党不能仅限于制定总路线。它还应该天天检查总路线的实际执行情况。它应该领导总路线的实现，在工作进程中修订已

通过的经济建设计划，使它日趋完善，纠正和防止错误。

我们党中央是怎样完成这项工作的呢？

中央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加快速度和缩短期限方面修改五年计划并使它更加精确，检查各经济组织执行规定任务的情况。

下面举出中央根据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完成期限的精神修改五年计划的几项重要决议。

在钢铁工业方面：五年计划预定生铁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达到一千万吨；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定额太低，认为应该把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的生铁产量提高到一千七百万吨。

在拖拉机制造业方面：五年计划预定拖拉机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达到五万五千台；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任务太轻，认为应该把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的拖拉机产量提高到十七万台。

汽车制造业的情形也是这样。五年计划原定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生产十万辆汽车（载重汽车和轻便汽车），而中央则决定增加到二十万辆。

有色金属工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的情形也一样。有色金属工业的产量比五年计划初定数字增加一倍多，农业机器制造业的产量也比五年计划初定数字增加一倍多。

至于**联合收割机**的制造，就更不用说了。它根本没有被列入五年计划，而它的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至少要达到四万台。

在国营农场建设方面：五年计划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播种面积扩大到五百万公顷；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定额太低，认为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到五年计划期末应达到一千八百万公顷。

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五年计划预定到五年计划期末播种面积扩大到两千万公顷；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定额显然太低（这个定额今年就已经超过了），认为到五年计划期末苏联农业集体化基本上应告结束，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到那时应当占苏联目前个体农户耕种的

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九。（鼓掌）

如此等等。

一般说来，中央就是这样领导党的总路线的执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工作的。

有人会说，中央把五年计划初定数字改动得这样厉害，这是在破坏计划工作的原则并损害计划机关的威信。但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才会这样说。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五年计划并不是什么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五年计划也和任何计划一样，不过是一个大致的计划，应当根据各地的经验，根据计划执行的经验来修订它，使它精确、完善。任何五年计划都不能估计到潜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一切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只有在工作进程中，在各工厂、各集体农庄、各国营农场、各区等等实现计划的进程中才能发掘出来。只有官僚主义分子才会认为编制计划是计划工作的**结束**。编制计划不过是**计划工作的开始**。真正的计划领导只是在计划编制以后，在进行了实地检验以后，在实现计划、修订计划和使计划精确的过程中才展开。

正因为如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共和国各计划机关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完成期限的精神，根据实际经验修订和改善五年计划。

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十年计划的时候，关于计划工作和计划领导的原则列宁这样说过：

“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纲领，否则它就不能是党的纲领。它应当用党的第二个纲领即用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我们应当采取一个相当的计划；当然，这只会是一个大致的计划。党的这个纲领不是那样不可改变，像我们的真正党纲一样只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修改。不，这个纲领每天在每个工厂里，每个乡镇中都会加

以改进、充实、完善和变更……　各地在注意科学和实践的经验的同时，应当不断地努力争取比原定期限更早地完成计划，以便使群众看到，经验能够使我们缩短完全恢复工业所需要的漫长时期。这全靠我们自己。让我们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车修理厂、每一方面都改善经营管理，这样我们就一定会缩短期限。而且我们也正在缩短它。”（“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二页、第四八三页、第四七九页）

可见中央变更和修改五年计划、缩短期限和提高建设速度是沿着列宁指示的道路前进的。

中央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五年计划完成期限依据的是哪些可能性呢？依据的是蕴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只有在工作进程中才能发掘出来的那些潜力，依据的是改造时期给我们提供的那些可能性。中央认为，**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生产的条件下**，改造工业和农业的技术基础可以发掘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梦想不到的那些加快速度的可能性。

只有这些情况才能解释下面的事实：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产值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多，而它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又要比本年度增加百分之四十七，**仅仅这个增加额**就等于战前**全部**大工业的产值。

只有这些情况才能解释下面的事实：国营农场的建设在三年内就会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集体农庄的建设在两年内就已经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有这样一种理论，按照它的说法，只在恢复时期才可以有高速度发展，一进入改造时期，建设速度就应当逐年急剧减低。这个理论叫做“递减曲线”论。这种理论是为我们的落后辩护的理论。它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是一种蓄意让我国永远保持落后状态的资产阶级理论。在过去或现在和我们党有关系的人们之中，

坚持和鼓吹这种理论的只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

关于托洛茨基分子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他们是超工业化主义者。但是，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种说法只有在讲到**恢复**时期末期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因为那时托洛茨基分子确实曾经发挥过超工业化的幻想。至于**改造**时期，**托洛茨基分子在建设速度方面却是最极端的最低速度派和最卑鄙无耻的投降派**。（笑声，鼓掌。）

托洛茨基分子在他们的政纲和宣言中并没有提出有关速度的数字材料，只是一般地空谈速度。但是有一个文件，其中托洛茨基分子用数字表达了他们对国营工业发展速度的看法。我指的是那份根据托洛茨基主义原则所写的国营工业“固定资本恢复问题特别会议”的报告书。简略分析一下这个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写成的文件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完全反映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递减曲线图。

这个文件提议，**投入**国营工业的资金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十五亿四千三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十四亿九千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十三亿二千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十亿六千万卢布（均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价格计算）。

托洛茨基分子的**递减**曲线就是这样。

实际上我们投入了多少资金呢？实际上我们投入国营工业的资金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为十亿六千五百万卢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十三亿零四百万卢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十八亿一千九百万卢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四十七亿七千五百万卢布（均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价格计算）。

布尔什维克的**上升**曲线就是这样。

根据这个文件，国营工业的**产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应增加百分之三十一点六，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点五，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

托洛茨基分子的**递减**曲线就是这样。

实际上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实际上国营工业的产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七，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而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将增加百分之四十七。

布尔什维克的**上升**曲线就是这样。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他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中，专门为这个投降主义的递减曲线论辩护。他在那本书里直截了当地说，既然“战前扩大工业基本上是靠建立新工厂”，而“目前扩大工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利用旧工厂和充分利用原有设备”，那末，“**随着恢复过程的终结**，增长率自然会**大大减低**”，并且他提议 “在最近几年内，把工业的增长率提高到不仅超过战前增长率百分之六的一倍，而且超过两倍，也许还要多”。

总之，工业每年增长三个百分之六。这究竟等于多少呢？每年总共增长百分之十八。因此，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国营工业的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八是**改造时期**计划加快发展速度的最高限度，应当作为理想来追求。现在把托洛茨基分子的这种浅薄的小聪明和我们最近三年来产值的实际增长（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为百分之三十二）比较一下，把托洛茨基分子的这种投降主义哲学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的控制数字（增加百分之四十七，超过**恢复**时期产值增加的**最高**速度）比较一下，你们就会看出托洛茨基分子的“递减曲线”论的全部反动性，就会看出托洛茨基分子对**改造**时期所具有的可能性是多么不相信。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分子现在叫喊工业和集体农庄建设的布尔什维克发展速度“过快”。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分子现在和我们的右倾分子是区分不开的**。

很明显，不粉碎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的“递减曲线”论，我们就既不能展开真正的计划工作，也不能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建设期限。为了领导实现党的总路线，为了修订和改进五年建设计划，为了提高建设速度和防止建设中的错误，首先要击破和消灭反动的“递减曲线”论。

中央正是像上面我所说的那样做的。

二、党内事务的领导问题

也许有人会以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实现党的总路线的工作，在我们党内是平平稳稳进行的，没有斗争，也没有紧张活动。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个工作是在同党内种种困难作斗争中，是在同一般政策方面和民族问题方面脱离列宁主义的各种倾向作斗争中进行的。我们党不是生存和活动在真空中。它是生存和活动在实际生活当中，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而我们的环境，大家知道，是由各种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构成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展开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这些现象对于剥削阶级不会没有影响。通常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是垂死阶级的破产，农村富农阶级的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活动地盘的缩小。很明显，这一切不能不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不能不使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如果以为这些阶级的反抗不会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某种反映，那是可笑的。而这种反抗也确实在党内有了反映。我们党的队伍里的种种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也就是垂死阶级反抗的反映。

如果不同时和我们党内各种倾向作斗争，如果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后方有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有不相信我们的事业并且千方百计阻碍我们前进的人，就不可能对阶级敌人展开真正的斗争。

因此，同脱离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为什么右倾是现在党内的主要危险呢？因为它反映着富农危险，而富农危险在目前，在展开大规模进攻和根除资本主义的时候，是国内的主要危险。

要克服右倾，消灭“左”倾，为全党最紧密地团结在列宁路线的周围扫清道路，中央必须做些什么呢？

（甲）首先必须肃清党内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肃清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遗毒。作为一个反对派的托洛茨基集团早已被我们击溃和抛弃了。现在托洛茨基集团是一个竭力向资产阶级报告我党情况的反无产阶级和反苏维埃的反革命集团。但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残余，托洛茨基主义的遗毒还没有完全从党内清除出去。所以，必须首先肃清这些遗毒。

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

首先，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靠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如果最近期间胜利的世界革命的援助不能及时到来，我们就应该向资产阶级投降，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扫清道路。可见这是一种用世界革命胜利的“革命”词句做掩蔽来否认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资产阶级观点。

抱有这种观点，能不能发动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发挥劳动热情，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参加群众性的突击运动，向资本主义分子展开大规模进攻呢？显然不能。如果认为干过三次革命的我国工人阶级发挥

劳动热情和参加群众性的突击运动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土壤施肥，那就愚蠢了。我国工人阶级掀起劳动高潮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并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你们打消工人阶级对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信心，也就是摧毁竞赛、劳动高潮、突击运动的一切基础。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发动工人阶级掀起劳动高潮、开展竞赛并组织大规模进攻，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无力领导农民从个体农民经济转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如果最近期间世界革命的胜利不能及时到来援助工人阶级，农民就会恢复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可见这是一种用世界革命胜利的“革命”词句做掩蔽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有力量有可能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

抱有这种观点，能不能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集体农庄运动，组织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消灭富农阶级呢？显然不能。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组织农民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并消灭富农阶级，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不可能引导劳动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理论。

最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党内有铁的纪律的必要，认为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认为有成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必要。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联共（布）不应当是统一和团结的战斗的党，而应当是一些各有自己的中央、自己的纪律、自己的报刊等等的集团和派别的集合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宣布党内有组织政治派别的自由。这就是说，既然党内有组织政治集团的自由，那末国内也就应当有组织各种政党的自由，即应当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见

这是要用“党内民主”、党内“制度的改进”的词句做掩蔽来承认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直至容许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组织各种政党的自由。知识分子集团间的派别争吵的自由并不是党内民主；而党所开展的广泛的自我批评和党员群众的高度积极性才是实际的、真正的党内民主的表现，这是托洛茨基主义所不能了解的。

对党抱有这种观点，能不能保证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对阶级敌人进行胜利斗争所必要的钢铁般的统一呢？显然不能。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保证党的钢铁般的统一和无产阶级的纪律，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理论。

事实上的投降主义是**内容**，“左的”词句和“革命”冒险主义的姿态是掩蔽和吹嘘投降主义内容的**形式**，——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

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两重性反映了正在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两重地位，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力图“马上”跳到社会主义，以免遭到破产（由此产生了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和**歇斯底里**），如果这样做不可能，就对资本主义做任何让步（由此产生了政策上的**投降主义**）。

正因为托洛茨基主义具有这种两重性，所以它好像“猛烈”攻击右倾分子，而结果总是和他们这些不带假面具的投降主义者结成**联盟**。

而党内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发生过的“左的”过火行为又是什么呢？这种过火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企图（固然是不自觉的）在实践中在我国恢复托洛茨基主义传统，恢复托洛茨基主义对中农的态度。这种过火行为的产生是由于在政策上犯了列宁所说的“过分采用行政手段”的错误。这就是说，我们某些同志为集体农庄运动的一些成就所陶醉，竟不以建设者的态度，而主要是以行政人员的态度去对待集体农庄建设问题，因而犯了一系列极严重的错误。

我们党内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以为不该制止“左”倾过火分子。

他们认为不该得罪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该反对他们的陶醉情绪，即使这种情绪造成了错误。同志们，这是胡说。只有那些硬要随波逐流的人才会这样说。这些人永远也不能领会列宁路线：在环境要求的时候，在党的利益要求的时候，要逆流而进。他们是尾巴主义者，不是列宁主义者。党所以能使我们整批整批的同志转上正确的道路，党所以能纠正错误并获得成就，就是因为它为实现总路线能毅然决然地逆流而进。这也就是实践中的列宁主义，领导中的列宁主义。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不克服“左的”过火行为，我们就不能在集体农庄运动中取得现在所有的那些成就。

和托洛茨基主义残余及其在实践中的遗毒进行斗争的情形就是这样。

关于过去是或者现在还是由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情形就有些不同了。

关于右倾分子，不能说他们不承认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不，他们是承认的，这就是他们和托洛茨基分子不同的地方。但右倾分子糟糕的地方在于他们表面上承认在一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却不愿意承认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方法和手段。他们不愿意承认，大力发展工业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钥匙。他们不愿意承认，必须同资本主义分子作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须向资本主义展开大规模进攻。他们不了解，这一切方法和手段是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一套措施。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可以悄悄地、自流地建成，不必经过阶级斗争，不必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分子要就是无声无息地自行消亡，要就是长入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奇迹历史上不曾有过，所以**右倾分子实际上是滚到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上去了**。

关于右倾分子，也不能说他们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不，他们是承认的，这也是他们和托洛茨基分子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表面上承认，同时却否认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他们不愿意承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手段和“大道”。他们不愿意承认，不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就不能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村。他们认为农村能够悄悄地、自流地转上社会主义轨道，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只要通过供销合作社就行了，因为他们相信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目前主要的不是高速度发展工业，也不是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是“放纵”市场的自发势力，“解放”市场，给个体经济以至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解除羁绊”。但是，富农是不能长入社会主义的，而“解放”市场就等于武装富农阶级和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所以**右倾分子实际上是滚到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的观点上去了**。

正因为如此，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的斗鸡式的斗争通常是以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组织**联盟**的幕后谈判而告终的。

右倾机会主义的基本罪过在于它**脱离**列宁的阶级斗争的观念而滚到**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上去了。

毫无疑问，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会使工人阶级完全解除武装，使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武装起来，并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机会增多。

右倾分子不主张成立另外一个政党，这是他们和托洛茨基分子又一个不同的地方。右倾分子的首领们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向党投降了。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右倾主义已经被埋葬，那就愚蠢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不是拿这种情况来衡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于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富农对党施行的压力。正因为右倾反映着垂死阶级主要分子的反抗，所以

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这就是党认为必须同右倾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的原因。

毫无疑问，如果不同右倾作坚决斗争，不孤立右倾的领导分子，我们就不能动员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动员贫农和中农群众的力量去展开社会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恢复我们的重工业，消灭富农阶级。

党内的“左”倾和右倾的情形就是这样。

任务在于今后还要继续进行**两条战线**的不调和的斗争，既反对代表**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左”倾，又反对代表**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右倾。

任务在于今后还要继续和党内那些不懂或假装不懂必须坚决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调和**分子作**不调和**斗争。

（乙）如果我们不谈谈党内在**民族问题**方面所存在的倾向，那末我们就不能看出党内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的全貌。我指的第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第二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两种倾向不像“左”倾或右倾那样明显和顽固。可以把它们叫做爬行的倾向。但这还不是说它们不存在。不，它们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发展。这一点是丝毫不容怀疑的。所以不容怀疑，是因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普遍气氛，不能不使在党内有着反映的民族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尖锐起来。因此必须揭穿和暴露这两种倾向的真面目。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什么呢？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民族差别；企图准备撤销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企图破坏民族平等权利原则，破坏党关于机关民族化与报刊、学校及其他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民族化的政策。

这类倾向分子在这方面所持的出发点是：既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各民族应该融合成一体，而它们的民族语言则应该变成统一的

共同语言，那末现在已经是消灭民族差别和放弃支持以前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发展民族文化的政策的时候了。

在这方面，他们还引证列宁的话，不正确地引用列宁的话，有时简直是歪曲和诬蔑列宁。

列宁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民族的利益必将融合成一个整体，——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是撤销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来维护……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列宁在一九一三年同崩得分子争论时说过，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是消灭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来维护……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

列宁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压迫和民族壁垒是会消灭的，——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是废除照顾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特点的政策转而采取同化政策来维护……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

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民族问题上的这种倾向尤其因为它是戴上国际主义假面具并以列宁的名字做掩蔽的，所以是一种最精致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第一、列宁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差别应该消失，而各民族的语言应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恰恰相反，列宁说过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话，他说："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①]（"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二页）

忘记了列宁的这个基本指示，怎么还能引证列宁的话呢？

不错，有一位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是叛徒和改良主义者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的考茨基先生武断地说过和列宁教导我们的完全相反的话。他反对列宁的意见，断言如果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奥联邦获得胜利，那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德语并使捷克人**德意志化**，因为“单是挣脱了束缚的交换的力量，单是德意志人所带去的现代文化的力量，就能不用任何强制的德意志化而**使落后的捷克小资产者、农民和无产者变成德意志人，因为他们这种没落的民族已经不能给予他们任何东西**”（见“革命和反革命”德文版序言）。

显然，这种“观念”是和考茨基的社会沙文主义完全吻合的。一九二五年我在东方民族大学的讲话中就曾经驳斥过考茨基的这种看法。但是，一个肆意妄为的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胡说，对于我们愿意彻底做国际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难道还能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

谁对呢，是考茨基还是列宁？

如果是考茨基对，那末为什么像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这样比较落后的民族，虽然和大俄罗斯人的关系要比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并没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的胜利而俄罗斯化，相反地，却作为独立的民族复兴和发展起来了呢？为什么像土尔克明人、柯尔克兹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更不用说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和阿捷尔拜疆人等等）这样的民族，虽然他们落后，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而俄罗斯化，相反地，却复兴和发展成独立的民族了呢？我们可敬的倾向分子为了追求表面的国际主义而落入了考茨基的社会沙文主义的魔掌，这不是很明显吗？他们主张在**一个**国家内即在苏联一国内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实质上是力图恢复先前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即**大俄罗斯**语言的**特权**，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哪里是国际主义呢？

第二、列宁从来没有说过，消灭民族压迫和把各民族的利益融合

成一个整体就等于消灭民族差别。我们消灭了民族压迫。我们消灭了民族特权并确立了民族平等权利。我们消除了苏联各民族间旧意义上的国界，即界碑和关税壁垒。我们确立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一致。但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把民族差别即民族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等消灭了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民族差别即民族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等还存在，那末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取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的要求就是一种违反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反动要求，这不是很明显吗？我们的倾向分子是否了解，现在取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这就是使苏联各族千百万人民群众不可能使用**本族**语言受教育，使他们不可能有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机关，使他们不可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呢？我们的倾向分子为了追求表面的国际主义而落入了反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魔掌，忘记了，完全忘记了对苏联**各**族人民，无论是大俄罗斯人或非大俄罗斯人都同样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文化革命口号，这不是很明显吗？

第三、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民族文化的口号是反动的口号。恰恰相反，列宁向来主张**帮助**苏联各族人民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正是在列宁而不是在别的什么人的领导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拟定并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决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党的任务在于：**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人民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帮助**他们：（甲）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适合于这些民族的民族生活习惯条件的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乙）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使用本族语言的、并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的本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机关、经济机关和政权机关；（丙）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文娱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丁）广泛地建立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的和职

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

列宁完完全全拥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民族文化的口号，这不是很明显吗？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族文化口号，就是否认苏联境内非大俄罗斯各族人民发展文化的必要性，否认各该族人民受普遍义务教育的必要性，而让各该族人民去受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奴役，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列宁确实曾经认为**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反动的口号。但是难道还能有别的看法吗？

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文化呢？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是用民族主义的毒素来毒化群众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族文化呢？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是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

如果不背离马克思主义，怎么能把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呢？

列宁反对资产阶级制度下的民族文化的口号时，打击的是民族文化的资产阶级**内容**，而不是它的民族形式，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如果以为列宁把社会主义文化看做是一种**无民族性的**即没有某种民族形式的文化，那就愚蠢了。崩得分子有一个时候确实曾经把这种荒谬见解硬加在列宁身上。但从列宁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列宁严厉地抗议过这种诬蔑，断然和这种荒谬见解划清了界限。难道我们可敬的倾向分子真的要步崩得分子的后尘吗？

既如上述，我们的倾向分子的论据还剩下什么呢？

除了玩弄国际主义旗帜和诬蔑列宁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

倾向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就是民族文化瓦解和消灭的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实际情形恰恰

相反。事实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荣**时期，因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各民族本身并不是普通的“现代”民族，而是**社会主义**民族，它们的民族文化按内容说也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社会主义**文化。

看来他们不懂得，随着使用本族语言的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施行和巩固，民族文化必将**更加有力地**发展起来。他们不懂得，只有在发展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才能真正使各落后民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他们不懂得，列宁的**帮助**和**支持**苏联各族人民发展民族文化的政策的基础正在于此。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我们主张各民族的文化在将来**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文化，而同时又主张在目前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繁荣**民族文化。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应该让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繁荣起来，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以便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创造条件。在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繁荣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文化，是**为了**当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它们能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的社会主义（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文化，——列宁关于民族文化问题的提法的辩证性正在于此。

有人会说，这样提问题是“矛盾的”。但是，我们在国家问题上难道不也是有这样的“矛盾”吗？我们主张国家的消灭。而我们同时又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这个至今存在的一切国家政权中最强大最有力的政权。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矛盾的”吗？是的，是“矛盾的”。但这是生活中的矛盾，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

或者拿列宁关于直到分离的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提法来说吧。列宁有时把民族自决这一论题表述为一个简单公式：“为联合而分离”。

你们想一想吧：为联合而分离。简直会觉得这是一种奇谈怪论。但是，这个“矛盾的”公式却反映着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生活中的真理，这个真理使布尔什维克能够攻克民族问题方面最难攻下的堡垒。

关于民族文化的公式也必须这样说：在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繁荣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消亡并融合成一种共同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一种共同的语言）准备条件。

谁不懂得我国过渡时期的这种特殊性和“矛盾性”，谁不懂得历史过程的这种辩证法，谁就根本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倾向分子糟糕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懂得而且也不愿意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情形就是这样。

不难了解，这种倾向反映着从前占统治地位的大俄罗斯民族中的垂死阶级想恢复自己已经丧失的种种特权的意图。

由此就产生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危险，这是党内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主要危险。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什么呢？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是：力图独树一帜并在本民族的狭隘范围内闭关自守，力图抹杀本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力图用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流的方法防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力图漠视那些使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接近和联合的东西，而只看到那些能使他们彼此疏远的东西。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反映了过去被压迫民族中的垂死阶级对无产阶级专玫制度的不满，反映了它们想单独成立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并在那里确立自己的阶级统治的企图。

这种倾向的危险在于它培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削弱苏联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并帮助干涉者。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就是这样。

党的任务在于：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保证对苏联各族劳动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所必需的条件。

我们党内的各种倾向，即在一般政策方面的“左”倾和右倾和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两种倾向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党内的状况就是这样。

现在，当党在争取实现总路线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的时候，当我们党的列宁路线在全线奏捷的时候，许多人有忘掉各种倾向分子在我们的工作中给我们所造成的那些困难的倾向。不仅如此，某些有庸俗看法的同志直到现在还认为本来可以不必和各种倾向分子作斗争。不用说，这些同志是极其错误的。只要回顾一下，回忆一下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所干的那些勾当，只要回想一下过去这个时期和各种倾向作斗争的历史，就会了解党内这种庸俗看法是多么空虚和无聊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制裁各种倾向分子，没有在公开斗争中击溃他们，我们就不会获得现在我们党理应引以自豪的那些胜利。

我们党在反对脱离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了。它在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中炼成了自己队伍的**列宁主义的统一**。现在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就是全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现在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和**团结**；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少有的一次代表大会，这里不再有能够拿出自己的特殊路线来对抗党的总路线的定形的和团结的反对派。

为什么党能取得这种决定性的成就呢？

党所以取得这种成就，是因为它在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中始终执行着**原则性的**政策，从来没有堕落到暗中拉拢和玩弄外交欺骗手腕的地步。

列宁说过，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们所以能在反对

各种倾向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忠实地一贯地遵守了列宁的这个遗训。（鼓掌）

* * *

同志们，我就要讲完了。

总的结论是什么呢？

在过去这个时期中，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成就。我们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高举伟大的列宁旗帜。如果我们想要胜利，那我们今后还应当高举列宁的旗帜，保持它的纯洁无瑕。（鼓掌）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

我们举着列宁的旗帜在十月革命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

我们举着列宁的旗帜在争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

我们举着这面旗帜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必将获得胜利。

列宁主义万岁！

（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全场欢呼。）

载于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真理报”第一七七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2卷第171—225页

致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

（摘自原信）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你十二月八日的信收到了。看来你需要我的答复。那末好吧。

首先谈谈你的一些琐碎的词句和暗示。假如这些不漂亮的“小东西”是一种偶然的因素，那倒可以不去管它。但是这些“小东西”是那么多，那么猛烈地“喷涌出来”，以致决定了你整封信的音调。大家知道，音调是构成乐曲的。

你把中央的决议看做“绞索”，看做“我的（即你的）毁灭的时刻到了”的标志。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一个共产党员不去领会中央决议的实质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蔑视这个决议，把它看做“绞索”，这叫什么共产党员呢？……

在该称赞你的时候，中央曾多次称赞过你。当我们党内的个别集团和同志攻击你的时候，中央曾多次保护过你（其实是有些勉强的！）。当不少诗人和作家犯了个别错误的时候，中央纠正了他们。这一切你都认为是正常的和理所当然的。可是当中央不得不批评你的错误的时候，你就突然嗤之以鼻，叫起“绞索”来了。有什么根据呢？也许中央没有权利批评你的错误？也许中央的决议对你没有约束力？也许你的诗超乎一切批评之上？你没有发觉你已经染上某种令人不快的所谓“自高自大”的毛病吗？杰米杨同志，放谦虚一些吧……

你的错误的实质在哪里呢？你的错误的实质就在于：对苏联生活缺点的批评，你最初运用得很准确很巧妙的这个必要的和应该的批评使你过分迷醉了，而你一旦迷醉之后，这种批评就在你的作品中开始发展为对苏联的**诽谤**，对苏联过去和对苏联现在的**诽谤**。你的“从热

炕上爬下来吧”和“不讲情面”就是如此。你的“比里尔瓦”就是如此，这本书我已经遵照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在今天读过了。

你说莫洛托夫同志称赞过“从热炕上爬下来吧”这篇小品文。很可能是这样。我对这篇小品文的称赞也许不下于莫洛托夫同志，因为在这篇小品文里（正如在其他小品文里一样）有许多击中要害的精采的地方。但是在那里也还有一匙焦油，它弄脏了整幅图画，把它变成了十足的“比里尔瓦”。问题就在这里，构成这些小品文的乐曲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自己来判断吧。

现在全世界都承认，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从西欧移到俄国来了。世界各国的革命者都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苏联，把它看做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策源地，承认它是自己唯一的祖国。世界各国的革命工人都一致向苏联工人阶级，首先向苏联工人的先锋队——**俄罗斯**工人阶级欢呼，把它当做自己公认的领袖，因为它实行着其他各国无产者曾经梦想实行的最革命最积极的政策。世界各国革命工人的领导者都如饥如渴地研究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最有教益的历史，研究这个阶级的过去，研究俄罗斯的过去，他们知道除了反动的俄罗斯以外，还有过革命的俄罗斯，有过拉吉舍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热里雅鲍夫和乌里杨诺夫、哈尔土林和阿列克谢也夫这样一些人的俄罗斯。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工人心里产生（不能不产生！）革命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能够移山倒海，能够创造奇迹。

而你呢？你不去理解革命历史上这个最伟大的过程，不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的歌手的任务，反而跑到什么洼地里，在摘自卡拉姆津著作的非常乏味的引文和引自“家训”的同样乏味的格言之间纠缠不清，并向全世界宣布：过去的俄罗斯是装满了丑恶和颓废的瓶子；现在的俄罗斯是十足的“比里尔瓦”；“懒惰”和渴望“坐在热炕上”几乎是一切俄罗斯人的民族特点，因此也是完成过十

月革命的、当然仍旧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工人的民族特点。这就是你的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不是的，可敬的杰米杨同志，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而是对我国人民的**诽谤**，是对苏联的**侮辱**，对苏联无产阶级的**侮辱**，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侮辱**。

既然如此,你还想叫中央默不作声！你把我们的中央看成什么了？

你还想叫我因为你原来对我有“历史上的好感”而默不作声！你是多么幼稚，多么不了解布尔什维克……

也许你这位“有学问的人”不会拒绝听听下面这段列宁的话吧：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丝毫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在尽最大的努力，以便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占**祖国**人口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生活的程度。我们因目睹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对我们美丽的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而感到无限的痛心。我们因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因**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推翻神甫和地主而感到自豪。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大俄罗斯人（沙皇专制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话的。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吐露的热爱祖国的话。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没有的。现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少，但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够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向神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逢迎献媚的极端奴

才相。”（见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心”）

请看列宁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关于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心是说得**多么**好。

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

“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心（不是奴隶心目中的那种自豪心）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同上）

这就是列宁的明白而大胆的“纲领”。

这个“纲领”对于那些和自己的工人阶级、和自己的人民血肉相连的革命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这个“纲领”对于那些和自己的工人阶级、和自己的人民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联系的列列维奇之流的蜕化分子是不可理解的，是不自然的。

能不能把列宁的这个革命的“纲领”和你最近的几篇小品文中所表现的那种不健康的趋向调和起来呢？

可惜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它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事情就是这样，你所不愿意了解的也就是这一点。

因此，**无论如何**你必须回到原来的列宁的道路上来。

主要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张皇失措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无谓哀鸣，惊慌地说人家要把杰米杨“孤立”起来，说“再不发表”杰米杨的作品了等等。

约·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次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3卷第19—22页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

（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

同志们！你们代表会议的工作快要结束了。现在你们就要通过决议了。我相信这些决议是会一致通过的。在这些决议中（这些决议我知道得不多），你们赞成一九三一年的工业控制数字并且保证完成这些控制数字。

布尔什维克的话是严肃的。布尔什维克是习惯于履行他们所许下的诺言的。可是保证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数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保证使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不仅如此，你们做这样的保证还意味着你们不只是要四年完成我们的五年计划（这是已经解决了的事情，再不需要任何决议），——**这就是说，你们要在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三年完成五年计划**。

代表会议提出诺言完成一九三一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五年计划，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有过“沉痛的经验”。我们知道，诺言并不总是履行的。一九三〇年初也曾提出过这种完成年度计划的诺言。当时必须使我们的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然而诺言并没有完全履行。事实上，一九三〇年工业产值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我们要问一问：今年会不会又出现这种情形呢？我们工业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现在提出诺言在一九三一年使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但是有什么保证能履行这个诺言呢？

为了完成控制数字，为了使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为了不是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而是在基本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部门三年完成五年计

划，需要什么呢？

为此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要有实际的或者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客观的”可能性。

第二、要有领导我们企业的愿望和本领，以便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

去年我们有没有完成全部计划的“客观的”可能性呢？是的，是有的。不容争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事实是：去年三月和四月工业产值比前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试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完成全年计划呢？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件事呢？缺乏什么呢？**缺乏利用现有可能性的本领。缺乏正确领导工厂和矿井的本领**。

我们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即完成计划的“客观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没有充分具备第二个条件，即领导生产的本领。正因为缺乏领导企业的本领，所以计划没有完成。我们没有使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而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

当然，**增长**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件大事。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值在一九三〇年都没有**增长**，而且现在也没有**增长**。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毫无例外地都发生了生产急剧**下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本来能够增长得更多。我们具有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客观的”条件。

那末，有什么保证能使今年不再重复去年的意外事件，使计划全部完成，使现有的可能性被我们充分地利用，使你们的诺言不致有某一部分成为纸上空文呢？

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

我们有没有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数字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呢？

有的，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是什么呢？要使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什么呢？

首先需要国内有充足的**自然富源**：铁矿石、煤炭、石油、粮食、棉花。我们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有的。而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就拿乌拉尔来说吧，它是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出来的富源总汇。矿石、煤炭、石油、粮食——在乌拉尔哪一样没有呢！我们国内什么都有，也许只是橡胶没有。但是再过一两年，连橡胶我们也会有的。在这方面，在自然富源方面，我们是完全有保障的。在我国，自然富源甚至是绰绰有余的。

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个**愿意而且能够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富源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政权呢？有的。固然，在利用自然富源的工作方面，我们的工作人员之间有时不免发生一些争执。例如去年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在建立第二个煤矿钢铁基地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斗争，而没有这个基地我们就不能继续发展。但是，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些障碍。我们很快就会有这个基地。

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这个政权受到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我们的政权是不是受到这样的拥护呢？是的，是受到的。你们在世界上再找不到另外一个像苏维埃政权那样受到工人和农民拥护的政权。我不准备举出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突击运动的发展、为生产财务响应计划而斗争的运动等等事实。这一切显然表明千百万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事实是大家知道的。

为了完成并超额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数字，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种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而且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失业、浪费和广大群众的贫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我们的制度不患这种病症，因为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

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因为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地积累资财，并且按国民经济各部门合理地加以分配。我们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这就是我们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有决定意义的地方。

请看资本家想怎样摆脱经济危机。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料价格。可是，他们不肯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这就是说，他们想靠牺牲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利益，牺牲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摆脱危机。资本家在拆自己的台脚，结果不是摆脱危机而是加深了危机，积累了引起更加剧烈的新危机的新前提。

我们的优越性在于我们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我们没有而且不会有几百万失业者，我们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如此，我们是工业积聚程度最高的国家。这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最优良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工业，从而保证空前未有的劳动生产率，空前未有的积累速度。我们过去的弱点在于我们的工业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但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没有了。

不久，也许再过一年，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农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它们就是大经济形式）今年出产的商品谷物已经占我国全部商品谷物的一半。这就是说，我们的制度，苏维埃制度，使我们有了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梦想不到的迅速前进的可能性。

为了一日千里地前进，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个**政党**，这个党要十分团结和统一，足以把工人阶级一切优秀分子的努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去，这个党要十分有经验，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而能一贯实行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党呢？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政策使我们获得重大的胜利。这一点现在不仅工

人阶级的朋友，就连工人阶级的敌人也都承认。请看人所共知的“可敬的”绅士们——美国的菲诗、英国的邱吉尔、法国的彭加勒怎样向我们党暴跳狂吠呵。他们为什么暴跳狂吠呢？就因为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就因为这个政策使我们接连不断地获得胜利。

同志们，这就是使我们容易实现一九三一年控制数字、帮助我们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而在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甚至三年完成五年计划的一切客观的可能性。

可见完成计划的第一个条件即“客观的”可能性我们是具备的。

我们有没有第二个条件即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呢？

换句话说，我们对工厂和矿井有没有正确的经济领导呢？

这里是不是一切都很好呢？

可惜这里并不是一切都很好。我们既然是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公开坦白地说出这一点。

领导生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些人并不总是用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待领导企业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往往以为领导就是签署公文和命令。这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是事实。有时不禁令人想起谢德林小说中的彭帕杜尔。你们记得彭帕杜尔太太是怎样教导小彭帕杜尔的：不要埋头学问，不要钻研业务，让别人去干这些事情吧，这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签署公文。应当承认，可耻的是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不少靠签署公文来进行领导的人。至于钻研业务，掌握技术，变成内行，——这方面他们却根本不管。

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干过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的人，是解决了建立现代工业的重大任务的人，是把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可是在领导生产方面我们为什么会屈服于一纸公文呢？

原因就在于签署公文要比领导生产容易。于是很多经济工作人员就走上了这条阻力最小的道路。这里也有我们的过错，中央的过错。

十年以前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既然共产党员还没有很好地懂得生产技术，既然他们还需要学习管理经济，那末就让旧的技师、工程师、专家去管理生产，你们共产党员不要去干预业务；虽然可以不干预，但是你们要不懈地研究技术，研究管理生产的科学，以便将来和忠实于我们的专家一道成为真正的生产领导者，真正的内行。”当时的口号就是这样。可是事实怎样呢？这个公式的后一部分被抛弃了，因为学习要比签署公文困难；公式的前一部分被庸俗化了，把不干预曲解为放弃研究生产技术。结果就变成胡闹，有害和危险的胡闹。必须摆脱这种状况，愈快愈好。

生活本身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发出警报，说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事件就是第一次严重的警报。沙赫特事件表明：党组织和工会缺乏革命警惕性。这一事件表明：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在技术方面落后得不象话；某些旧工程师和技师因为在工作上无人监督，就比较容易滚到暗害活动的道路上去，况且国外敌人还不断用种种“建议”来缠住他们。

第二次警报就是“工业党”审判案。

当然，暗害活动的基础是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敌人是要疯狂地反抗社会主义进攻的。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暗害活动如此猖獗。

暗害活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规模呢？这是谁的过错呢？这是我们的过错。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来处理经济领导问题，如果我们老早就开始研究业务，掌握技术，如果我们更多地和精明地干预经济领导，那末暗害分子就不能干出这样多的暗害勾当来。

必须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内行，必须面向技术知识，——这就是实际生活要我们走的道路。但是，无论第一次警报，甚至第二次警报，都还没有促成必要的转变。已经是而且早已是面向技术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个过时的不干预技术的旧口号而使自己成为专家，成为

能手，成为精通经济工作的行家的时候了。

人们时常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一长制呢？只要我们还没有掌握技术，我们就没有而且不会有一长制。只要在我们中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还没有足够的精通技术、经济和财务问题的人材，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一长制。如果你们不掌握工厂和矿井的技术、经济和财务，那末随便你们写多少决议，随便你们怎样宣誓，也都无济于事，也都不会有一长制。

因此，任务就是要我们自己掌握技术，成为内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计划全部完成，而一长制也才能实行。

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科学、技术经验、知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得到的。今天没有，明天就会有。这里主要的就是要有布尔什维克的掌握技术，掌握生产科学的热烈愿望。有了热烈愿望，就能得到一切，就能战胜一切。

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这些先生们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

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超过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这就是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更重大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无产阶级所负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和第一种义务相符合的。但是我们把这种义务看得更高。苏联工人阶级是世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所以取得了胜利，不仅是由于苏联工人阶级的努力，而且是由于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我们早就被粉碎了。有人说，我国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突击队。这说得很好。但是这使我们担负了极重大的义务。国际无产阶级为什么支持我们呢？我们凭什么配受这种支持呢？因为我们最先投入了对资本主义的战斗，我们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权，我们最先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所进行的事业一旦成功，就会翻转整个世界，解放整个工人阶级。可是要怎样才能成功呢？要消灭我国的落后状况，展开布尔什维克的高度的建设速度。我们应当这样

向前迈进，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可以望着我们说：看呵，这就是我们的先锋队，这就是我们的突击队，这就是我们的工人政权，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很好，让我们来支持他们反对资本家，让我们来推进世界革命事业吧。我们是否应当实现世界工人阶级的希望呢？我们是否应当履行我们对他们所负的义务呢？是的，是应当的，如果我们不愿意丢尽脸的话。

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和国际的义务。

你们看，就是这些义务要求我们采取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

我并不是说我们这几年来在领导经济方面什么也没有做。是做了的，甚至做得很多。我们使工业产值比战前增长了一倍。我们创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生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期间真正努力掌握生产、生产的技术、生产的财务和经济，那我们会做得更多。

我们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我们有一切“客观的”可能性来做到这一点。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而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并且仅仅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已经是我们学会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种不干预生产的陈腐方针的时候了。已经是领会另一个方针，即适合于目前时期的**要干预一切**的新方针的时候了。如果你是厂长，你就要干预一切事务，就要熟悉一切，什么都不要忽略过去，就要学习再学习。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一个经济工作人员竟不愿意研究技术，不愿意掌握技术，——这是笑话，这就不成其为经济工作人员了。

有人说，掌握技术是困难的。不对！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下的堡垒。我们已经解决了许多极困难的任务。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建立了规模极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把中农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到了。剩下的已

经不多，这就是钻研技术，掌握科学。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甚至我们现在不敢梦想的速度。

只要我们真正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载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五日
“真理报”第三十五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3卷第24—33页

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

（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从会议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我们各工业部门执行计划的情形是十分参差不齐的。在过去五个月内，有些工业部门的产值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有些工业部门至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后，有个别工业部门增长得非常少，只增长了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甚至比这还少。属于最后一类的有煤矿工业和钢铁工业。可见情形是参差不齐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参差不齐的情形呢？某些工业部门落后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某些工业部门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煤矿工业和钢铁工业增长得更少，落在其他部门后面呢？

原因在于近来工业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要求采取新的领导方法的新环境，而我们的某些经济工作人员不去改变工作方法，仍然按照旧方式工作。这就是说，问题在于工业发展的新条件要求按照新方式来工作，而我们的某些经济工作人员不了解这一点，不懂得现在必须按照新方式来领导。

这就是我们的某些工业部门落后的原因。

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条件是什么呢？这些新条件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新条件至少有六个。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些条件。

一　劳动力

首先要谈的是保证各企业**劳动力**的问题。从前通常是工人自动跑到工厂里来，所以当时在这方面有某种自流现象。这种自流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当时有失业人口，有农村中的分化，有贫困，有驱使人们从农村跑进城市的饥饿的威胁。你们还记得“庄稼汉从农村逃进城里来”这句话吧？当时是什么东西迫使农民从农村跑进城市呢？是饥饿的威胁，是失业，是因为当时农民觉得农村是他们的后母，农民总想逃开它，随便逃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能找到一点工作就行。

不久以前我国的情形就是这样，或者几乎是这样。

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情形还完全是这样呢？不，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现在的环境已经根本改变了。正因为环境改变了，所以我们就再也没有劳动力的自流现象了。

在这个时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第一、我们消灭了失业，因而也就消灭了压迫“劳动市场”的力量。第二、我们根本打破了农村中的分化，因而也就消除了驱使农民从农村跑进城市的普遍的贫困。最后，我们供给了农村数万台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打垮了富农，组织了集体农庄，使农民有了像人一样地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现在已经不能把农村叫做农民的后母了。正因为再不能把农村叫做后母，所以农民就留在农村安居乐业，而我们就再也没有“庄稼汉从农村逃进城里来”的现象，再也没有劳动力的自流现象了。

可见我们现在有了完全新的环境和保证各企业劳动力的新条件。

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再不能指望劳动力的自流了。这就是说，应当由自流“政策”转到**有组织地**给工业招收工人的政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各经济组织同集体农庄和庄员订立合同。你们知道，某些经济组织和集体农庄已经开始采用这种办法，而且经验表明，订立合同的办法无论对集体农庄或工业企业都有很大的好处。

第二、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立即使最繁重的劳动过程**机械化**，并且大力开展这一工作（在森林工业、建筑业、煤矿工业、装卸工作、运输业、钢铁工业等方面）。这当然不是说，应该抛弃手工劳动。恰恰相反，手工劳动还会长期地在生产中发挥极大的作用。这只是说，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对我们是一种**新的**和**决定的**力量，没有它就不能保持我们的发展速度，也不能维持新的生产规模。

我们还有不少的经济工作人员既“不相信”机械化，也“不相信”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这就是那些不了解新环境，不愿意按照新方式工作，而怀念着劳动力“自流”到企业里来的“旧日黄金时代”的经济工作人员。不用说，这种经济工作人员是和新环境向我们提出的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相去万里的。看来他们以为劳动力的困难是偶然的现象，以为缺乏劳动力的现象会按所谓自流方式自行消灭。同志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劳动力的困难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这种困难才会消灭。

总之，**采用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的办法来有组织地招收工人，使劳动机械化**，——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一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条件。

二　工人的工资

我刚才已经谈过有组织地给我们各企业招收工人的问题。但是招收工人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要保证我们各企业有劳动力，必须把工人固定在生产中，使企业中的工人成员相当地固定下来。几乎用不着证明，没有相当精通生产技术并熟悉新式机器的固定的工人成员，就不能前进，就不能完成生产计划。没有这种固定的工人成员，就得每次都来重新训练工人，花一半时间去训练他们，而不是去进行生产。我

们现在的实际情形怎样呢？能不能说我们企业中的工人成员是相当固定的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我们的企业中还有所谓劳动力的**流动现象**。而且许多企业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不仅没有消灭，反而在增长和加强起来。无论如何，工人成员在半年甚至在一季中不至少变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企业是很难找到的。

从前，在工业恢复时期，我们的技术设备还不复杂，生产规模还不很大，还可以勉强“容忍”所谓劳动力的流动现象。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环境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在大规模的改造时期，生产规模扩大了，技术设备极端复杂了，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也就成了生产的祸害，足以使我们的企业解体。现在“容忍”劳动力的流动现象就是瓦解我国工业，消除完成生产计划的可能，破坏改进产品质量的可能。

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何在呢？

就在于工资规定得不合理，工资等级制规定得不合理，工资方面有“左的”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企业制定的工资率几乎把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之间的差别抹杀了。平均主义使非熟练工人不想成为熟练工人，因而丧失了上进的前途，于是他就觉得自己是工厂里的“游客”，只是暂时在这里工作，稍微“赚一点钱”，然后就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幸福”。平均主义使熟练工人不得不从一个企业跑到另一个企业，以求最后找到一个能够真正重视熟练劳动的企业。

由此就产生了“普遍的”从一个企业跑到另一个企业的现象，产生了劳动力流动的现象。

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取消平均主义，打破旧的工资等级制。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在规定工资等级制时注意到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之间的差别。钢铁备料工和扫地工人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火车司机和抄写员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马克思和列宁说过：熟练劳动和非

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也还会存在；这种差别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消失；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也应该按劳动来发给，而不应该按需要来发给。但是，我们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中的平均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这种差别已经消失了。究竟是谁对呢？是马克思和列宁对呢，还是平均主义者对？应当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是对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谁现在不顾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而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来规定工资等级制，谁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列宁主义。

在每个工业部门中，在每个企业中，在每个车间中，都有一部分主要的比较熟练的工人。我们如果真想保证企业中有固定的工人成员，就应当首先和主要地把这一部分工人固定在生产中。他们，这一部分主要的工人，就是生产的基本环节。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固定在车间中，就意味着把全体工人固定下来，根本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但是怎样才能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呢？只有提升他们，只有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只有在规定工资时充分地照顾到工作人员的熟练程度，才能把他们固定在企业中。

而提升他们和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是什么意思呢？这对非熟练工人会有什么影响呢？除了其他一切以外，这就是给非熟练工人开辟前途，刺激他们上进，刺激他们成为熟练工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熟练工人。但是要造就熟练的工人干部，就必须给非熟练工人开辟前途，刺激他们前进和上升。我们愈是大胆地这样做就愈好，因为这是消灭劳动力流动现象的基本手段。在这件事上节约，就是犯罪，就是违反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利益。

但是这还不够。

要把工人固定在企业中，还必须进一步改善工人的供应和居住条件。不能否认，近几年来我们在住宅建设和对工人的供应方面做了不

少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还远不能满足工人迅速增长的需要。决不能藉口从前住宅比现在少，因此就可以安于既得的成绩。也不能藉口从前工人的供应比现在坏得多，因此就可以满足于现状。只有那些腐朽透顶的人才会藉口过去来安慰自己。不应当以过去为出发点，而应当以现在工人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出发点。必须了解，我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从前的工人了。现在的工人，我们苏联的工人，希望满足他们的一切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既要满足粮食供应方面的需要，又要满足住宅方面的需要，还要满足文化及其他一切方面的需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而我们也有保证他们的这些条件的义务。固然，我国工人没有失业的痛苦，他们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桎梏，他们已不再是奴隶，而是自己事业的主人。但是这还不够。他们要求满足他们的一切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我们也有义务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们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工作，进行竞赛，开展突击运动。不要忘记，绝大多数工人非常热情地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些要求，并且英勇地实现着这些要求。因此，工人在实现苏维埃政权的要求时，自然也要求苏维埃政权履行它的义务，进一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

总之，**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消灭平均主义，合理地规定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二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条件。

三 劳动组织

上面我已经谈过必须消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必须把工人固定在企业中。但是把工人固定下来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单单消灭流动现象

是不够的。还必须给工人创造适当的劳动条件，使他们有可能有效地工作，提高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因此，必须把企业中的劳动组织得能使生产率一月高于一月，一季高于一季。

能不能说我们企业中的现行劳动组织符合于现代生产的要求呢？可惜不能这样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一些企业，那里的劳动组织得很糟糕，那里不是秩序井然，工作协调，而是毫无秩序，乱七八糟；那里盛行的不是对工作负责的现象，而是完全不负责任和无人负责的现象。

无人负责是什么意思呢？无人负责就是对所担任的工作不负任何责任，对机器、机床、工具不负责任。显然，在无人负责的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产品质量，爱护机器、机床和工具的。你们知道，无人负责现象在铁路运输方面引起了什么结果。无人负责现象在工业中也正引起同样的结果。我们在铁路运输方面已经消灭了无人负责现象，因而提高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工业方面也应当这样做，以求把这方面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不合理的劳动组织和无人负责现象、每个工作人员对所担任的具体工作不负责任的现象相处得很好。从前，这种不合理的劳动组织还可以勉强“过得去”。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环境完全改变了。在目前生产规模如此宏大并且已经有了许多大型企业的情况下，无人负责现象就是工业的祸害，这种祸害会威胁到我们各企业在生产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一切成绩。

为什么无人负责现象能在我们某些企业中生根呢？它是作为连续生产制的不合法的伴侣出现在企业中的。如果说连续生产制一定会引起生产中的无人负责现象，那是不对的。如果劳动组织得合理，如果规定每个人对一定的工作负责，如果指定一定的工人使用一定的机器和机床，如果轮换的班次组织得合理，各班的质量和熟练程度彼此不相上下，那末连续生产制就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工作质量，

根除无人负责现象。例如铁路运输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现在那里正在实行连续生产制，但是无人负责现象已经没有了。能不能说我们工业企业中实行连续生产制的情形也一样良好呢？可惜不能这样说。问题在于我们某些企业实行连续生产制太仓卒了，没有准备好相当的条件，没有适当地组织质量和熟练程度大体相等的轮换班次，没有规定每个人对所担负的具体工作负责。结果就使连续生产制自流而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结果是我们某些企业中有了纸上的口头的连续生产制以及非纸上的实在的无人负责现象。结果是对工作缺乏责任感，不爱护机器，让机床大批毁坏，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无怪乎工人说：“我们本来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工作，但是既然什么事情都没有人负责，那末谁会重视我们呢？”

由此可见，我们某些同志在某些地方实行连续生产制太仓卒了，因为实行得太仓卒了，就曲解了连续生产制，使连续生产制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

要消灭这种情形并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有两条出路：或者照铁路运输方面所做的那样，改变实行连续生产制的条件，使连续生产制不致变成无人负责现象。或者在现在还没有具备做这种试验的有利条件的地方，照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样，抛掉纸上的连续生产制，暂时改为六日生产制，并准备条件，以便将来在必要时可以再来实行真正的非纸上的连续生产制，再来实行没有无人负责现象的连续生产制。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对于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但是他们却默不作声。为什么呢？看来是因为害怕真理。但是，布尔什维克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起真理来了呢？在某些企业中，连续生产制变成了无人负责现象，因而也就被曲解到了极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试问谁需要这样的连续生产制呢？谁敢说保存这种纸上的被曲解了的

连续生产制的利益高于合理组织劳动的利益，高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益，高于真正的连续生产制的利益，高于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的利益呢？我们把纸上的连续生产制埋葬得愈快，我们实现合理的劳动组织也就会愈快，这不是很明显吗？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痛骂一顿，发表一些冠冕堂皇的演说，就可以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据我所知，有些经济工作人员反对无人负责现象只限于动辄在大会上把无人负责现象痛骂一顿，大概以为说过这些话以后，无人负责现象就会自行消灭，就会所谓自流地消灭。如果他们认为靠演说和痛骂就可以从实践中铲除无人负责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同志们，无人负责现象是任何时候也不会自行消灭的。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而且应当去消灭无人负责现象，因为我们掌握着政权，我们大家要对一切负责，也要对无人负责现象负责。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员不是从事于演说和痛骂，而是拿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矿井或工厂，研究劳动组织方面的一切细节和“小事”，把那里的无人负责现象真正消灭，然后把这个企业的经验推广到其他企业中去，那就要好得多。那就不知道要好多少。这才是真正为反对无人负责现象而斗争，为合理的布尔什维克的劳动组织而斗争，为在企业中合理地配置力量而斗争。

总之，**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改善劳动组织，在企业中合理地配置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任务。◇59◇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三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四个条件。

四　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问题

一般工业指挥人员，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形也改变了。

从前我们的情形是这样：我国全部工业的主要来源是乌克兰的煤

矿钢铁基地。乌克兰把金属供给我国所有的工业区，无论是南方，或者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它又把煤炭供给我们苏联的基本企业。这里我不谈乌拉尔，因为乌拉尔在这方面所占的比重和顿巴斯比较起来要小得多。这样，我们在当时有三个培养工业指挥人员的主要基地：南方、莫斯科区、列宁格勒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我国当时仅有的为数极少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可以勉强过得去。

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完全不同了。我认为现在很明显，我们要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单靠乌克兰煤矿钢铁基地已经不能对付了。你们知道，虽然乌克兰的煤炭和金属产量日益增长，但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你们知道，我们因此不得不在东方建立新的煤矿钢铁基地，即乌拉尔—库兹巴斯。你们知道，我们建立这个基地不是没有成绩的。但是这还不够。其次，我们需要在西伯利亚建立冶金业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我们已经在建立了。此外，我们需要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尔克斯坦建立新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最后，我们需要展开极广泛的铁路建设。这是苏联全国利益——各边疆共和国利益和中央地区利益所要求的。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我们从前还够用的为数极少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现在已经不够用了。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旧有的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基地已经不够了，必须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建立巨大的新的基地网。如果我们真想实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纲领，那我们现在就应当保证自己有比原来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指挥人员。

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任何一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了解我国工人阶级的政策、能够领会这个政策并决心老老实实地实现这个政策的**那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

段**工人阶级应当为本身造就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造就能够维护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苏联工人阶级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

苏维埃政权注意到这种情况，为工人和劳动农民打开了国民经济各部门高等学校的大门。你们知道，现在有几万名工农青年在高等学校里学习。从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等学校是公子哥儿独占的场所，而现在在苏维埃制度下，工农青年却是高等学校里的统治力量了。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能从我们的高等学校得到几千名新的技师和工程师，我国工业的新的指挥员。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将不仅是由读过高等学校的人所组成的，而且是由我们企业中的实际工作人员、熟练工人、工厂和矿井中的工人阶级文化力量来补充的。竞赛的发起人，突击队的领导者，劳动高潮的实际鼓舞者，各部分建设工作的组织者，——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的阶层，这个阶层也应当和读过高等学校的同志一起组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核心，组成我国工业指挥人员的核心。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要排挤这些来自“下层”的有创造性的同志，要更大胆地提拔他们去担任指挥职务，使他们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使他们有可能充实自己的知识，并且要不惜金钱来为他们造成适当的环境。

在这些同志中间有不少是非党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更大胆地提拔他们去担任领导职务的障碍。恰恰相反，正是应当特别关心他们这些非党员同志，应当提拔他们去担任指挥职务，使他们真正相信党是重视有能力和有本事的工作人员的。

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提拔党员同志去担任工厂的领导职务。因此，他们往往排挤那些有能力和有创造性的非党员同志，而把那些即使能力较差和没有创造性的党员提到首位。不用说，再没有比这种所谓

“政策”更愚蠢和更反动的了。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政策”只能破坏党的威信，使非党工人离开党。我们的政策决不是要把党变成闭关自守的帮会。我们的政策是要使党员工人和非党工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相互检查”的气氛（列宁）。我们党在工人阶级中强大有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总之，**使苏联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四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条件。

五 旧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转变的征兆

关于对待旧的资产阶级生产技术知识分子的问题也要有另一种提法。

两年以前我们的情形是这样：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而且暗害活动在当时是一种时髦的东西。一部分人进行暗害活动，另一部分人包庇暗害分子，还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观，保持中立，再有一部分人则在苏维埃政权和暗害分子之间动摇不定。当然，大多数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多少还是忠顺地继续工作的。但这里所说的不是大多数人，而是技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那一部分人。

暗害活动是由什么造成的，是由什么培植起来的呢？是由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由于苏维埃政权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进攻政策，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进行反抗，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化，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有困难。如果说从事战斗的暗害分子的积极性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阴谋以及我们国内的粮食困难所支持的，那末另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向积极的暗害分子方面的动摇就是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孟什维克空

谈家的时髦论调而加强起来的。这些空谈家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反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苏维埃政权反正是在蜕化而且很快就要垮台的”，“布尔什维克正以自己的政策促成武装干涉”等等。此外，既然连右倾分子中间的某些老布尔什维克都抵挡不住这种“时疫”而在当时离开了党，那末从来没有闻过布尔什维主义气味的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也蒙上帝保佑而表现动摇不定，就自然是不足为奇的了。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所能实行的唯一政策就是**粉碎**积极的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收**忠顺分子。

一两年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能不能说我们现在的环境还完全是那样呢？不，不能这样说。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环境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击溃了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正在顺利地消灭他们。当然，这不会使旧知识分子感到高兴。很可能他们还对自己的已被击溃的朋友表示同情。但是，同情者尤其是中立者和动摇者，在自己的积极活动的朋友遭到无可挽救的惨败以后，还甘愿和这些朋友遭受同样的命运，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

其次，我们克服了粮食困难，不仅克服了粮食困难，而且还向国外输出粮食，其数量之多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于是动摇分子的这一“论据”也就破产了。

再其次，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我们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战线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获得了确定不移的胜利。

于是旧知识分子“武库”中最主要的东西也就完蛋了。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武装干涉的希望，那就必须承认，这种希望已经成了——至少暂时成了——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的确，人们答应实行武装干涉已经有六年了，可是武装干涉一次也没有尝试过。现在必须承认，我们的高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过是上了当而已。更不必说，

积极的暗害分子在有名的莫斯科审判案中的行为本身就应当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暗害活动的思想破产了。

当然，这些新的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我国旧的技术知识分子。新的环境在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当中应当造成而且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新的情绪。正因为如此，从前同情过暗害分子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有了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明显的征兆。现在不仅这一部分旧的知识分子，就连昨天的明显的暗害分子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在许多工厂里和工人阶级同心合力地工作，这个事实毫无疑问地说明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转变已经开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这里再也没有暗害分子了。不，不是这个意思。暗害分子是有的，而且只要我国还有阶级，只要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暗害分子还是会有的。这只是说，既然从前这样或那样同情过暗害分子的很大一部分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现在已经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那末剩下的积极的暗害分子就为数不多了，他们已经陷于孤立，而且不得不暂时转入极端秘密的状态。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我们对待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应该根据这种情形而改变。在暗害活动猖獗时期，我们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而现在当这些知识分子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时期，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应该主要地表现于吸收和关怀他们的政策。如果在已经改变了的新的条件下还继续实行旧政策，那是不正确的和不合辩证法的。如果现在还几乎把每个旧专家和旧工程师都看做未被拿获的犯人和暗害分子，那是愚蠢的和不合理的。在我们这里，“反专家主义”向来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被看做有害的和可耻的现象的。

总之，**改变对旧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态度，多多关心和照顾他们，更大胆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五个新条件就是如此。

现在我们来谈最后一个条件。

六　关于经济核算

如果我不谈到另一个新条件，那还不能算全面。这里指的是为工业、为国民经济积累资金的来源问题，是加快这种积累的速度问题。

从积累方面来看,我国工业发展中的新的和特别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旧的积累来源已开始不能保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了。因此，我们如果真想保持并加快布尔什维克的工业化速度，就必须找到新的积累来源并扩大旧的积累来源。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可以知道，任何一个想把自己的工业提到更高水平的新兴国家都必须得到外来的援助，即长期的信贷或借款。西方各国的资本家有鉴于此，就完全拒绝给我国信贷和借款，以为没有信贷和借款，我国的工业化就一定会破产。可是资本家们想错了。他们没有估计到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有某些特别的积累来源足以恢复和继续发展工业。的确，我们不仅恢复了工业，不仅恢复了农业和运输业，而且已经把改造重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巨大工作引上了轨道。当然，我们在这方面是花了几百亿卢布的。这几百亿卢布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是从轻工业方面，从农业方面，从预算上的积累方面得来的。我们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

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过去，旧的积累来源足够用来改造工业和运输业，而现在，旧的积累来源显然已开始不够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改造旧工业。现在的问题是要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建立技术装备优良的新工业。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苏联各产粮区、畜牧区和原料区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苏联的东部和西部之间建立新的铁路网。当然，旧的积累来源是不能保证这一巨大工作的完成的。

不仅如此，还必须指出另一种情况，就是在我们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由于不善经营，经济核算的原则已经被破坏无余了。事实上，在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计算、成本核算和可靠的收支平衡表的编制早已停止了。事实上，在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节约制度”、“缩减非生产开支”、“生产合理化”早已成了过时的概念了。显然，他们指靠的是国家银行“反正会拨给我们必要的款项”。事实上，近来许多企业的成本已开始提高了。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把成本降低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上，可是他们却把成本提高了。而降低成本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把成本降低百分之一，就等于在工业内部积累一亿五千万至二亿卢布。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成本就等于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损失几亿卢布。

从这一切应该得出结论：已经不能单靠轻工业，单靠预算上的积累，单靠农业方面的收入了。轻工业是一个极丰富的积累来源，而且它现在也有继续发展的一切可能，但这个来源不是无穷的。农业也是一个丰富的积累来源，但是在目前农业改造时期，它本身还需要国家的资助。至于预算上的积累，你们自己知道，这种积累不可能而且不应该是无穷的。此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重工业。因此，必须使重工业，首先是它的机器制造业，也能拿出积累来。因此，除了加强和扩大旧的积累来源外，同时还必须使重工业，首先是机器制造业，也能拿出积累来。

出路就在这里。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需要消灭不善经营的现象，动员工业内部的资源，在我们的一切企业中实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不断降低成本，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加强工业内部的积累。

这就是到达出路的途径。

总之，**实行并巩固经济核算制，提高工业内部的积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七 用新方式工作，用新方式领导

同志们，以上就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条件。

这些新条件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为工业造成了新的环境，要求我们用新方法来工作，用新方法来领导。

由此可见：

（甲）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指望劳动力的自流了。要保证工业有劳动力，就必须有组织地招收工人，必须使劳动机械化。如果以为我们不必实行机械化就可以保持今天的建设速度和生产规模，那就等于希望用匙子舀尽海水。

（乙）其次，不能再容忍工业中劳动力的流动现象了。要消除这个祸害，就必须按新方法规定工资，使企业中的工人成员相当地固定下来。

（丙）其次，不能再容忍生产中的无人负责现象了。要消除这个祸害，就必须按新方式组织劳动，必须适当地配置力量，使每一部分工人都对工作、对机器、对机床、对工作质量负责。

（丁）其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我们从资产阶级俄国继承下来的为数极少的旧工程技术人员了。要提高现有的速度和生产规模，就必须使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

（戊）其次，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所有的旧专家和旧工程技术人员都看成是一样的了。要适应已经改变的环境，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政策，尽量关心那些确定不移地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旧专家和旧工程技术人员。

（己）最后，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旧的积累来源了。要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开辟新的积累来源，消除不善经营的现象，实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提高工业内部的积累。

这就是工业发展的新条件，这些条件要求我们用新方法来工作，用新方法来领导经济建设。

为了按新方式进行领导，需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需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了解新的环境，具体地研究工业发展的新条件，根据新环境的要求来改造自己的工作。

其次，需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领导者不是“一般地”、不是“从空中”来领导企业，而是具体地切实地领导企业；需要使他们不是从一般的空谈出发，而是以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每一个问题；需要使他们不限于纸上的敷衍或一般的空话和口号，而要精通业务，了解工作的细节，熟悉“小事”，因为现在大事是由“小事”积成的。

其次，需要把我们现有的有时包括一二百个企业的那些庞大的公司立刻划小，分为几个公司。一个公司的主席要和一百个或一百个以上的工厂打交道，当然不能真正地了解这些工厂，了解这些工厂的生产能力和工作情况。他既然不了解工厂，当然就不能领导它们。因此，要使公司的主席有可能真正地研究工厂的情况并领导工厂，就必须使他们摆脱过多的工厂，必须把一个公司分为几个公司，使公司接近工厂。

其次，需要把我们的公司由委员会管理制改为一长管理制。现在的情况是公司的委员会里有十个至十五个人坐在那里写写公文，讨论讨论问题。同志们，继续实行这样的管理方法是不行的。必须停止纸上的“领导”而去进行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让公司的主席和几个副主席留下来领导公司。这对于管理公司完全够了。其余的委员最好派到下面去，派到工厂去。这无论对于他们或对于工作都要有益得多。

其次，需要使公司的主席和副主席更经常地巡视各工厂，花更多的时间留在那里工作，更好地熟悉工厂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教导现场

的工作人员，而且要向他们学习。如果以为现在可以远离工厂坐在办公室内，从办公厅来进行领导，那就错了。要领导工厂，就必须更经常地和企业的工作人员接触，必须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最后，略微谈谈我们一九三一年的生产计划。在党的周围有一些庸人，他们硬说我们的生产计划是不现实的，是不能完成的。这就像谢德林小说中的“绝顶聪明的鲃鱼”①一样，它总是在自己周围散布一种“愚蠢的空气”。我们的生产计划是不是现实的呢？绝对是现实的！所以是现实的，至少是因为我们具备实现这一计划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所以是现实的，至少是因为这一计划的完成现在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极丰富的可能性的本领和愿望。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许多企业和工业部门已经**超额完成了**计划呢？这说明其他的企业和工业部门也能够完成并超额完成计划。

如果以为生产计划是一张开列着数字和任务的一览表，那是愚蠢的。事实上生产计划是千百万人的活的实际行动。我们的生产计划的现实性就在于我们有千百万创造新生活的劳动者。我们的计划的现实性就在于有活的人，有我们大家，我们的劳动意志，我们按新方式工作的决心，我们完成计划的决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呢？是的，是有的。因此，我们的生产计划是可能实现而且应该实现的。

（鼓掌多时）

载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
“真理报”第一八三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3卷第43—61页

————————————

① “绝顶聪明的鲃鱼”是俄国著名作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一篇寓言故事，描写一条鲃鱼因为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而不敢出外，整天躲在仅能容身的洞里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它自以为绝顶聪明，可是大家却认为它是傻瓜。——译者注

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一九三一年）

敬爱的同志们！

我坚决抗议把斯卢茨基那篇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供讨论的文章刊载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一九三〇年第六期）上。

斯卢茨基硬说，列宁（布尔什维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战前一般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即对暗藏的机会主义的危险以及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态度的危险估计不足。换句话说，照斯卢茨基说来，列宁（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对机会主义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因为对中派主义估计不足实质上就是拒绝对机会主义进行大力的斗争。这样说来，列宁在战前时期还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或者直到这次大战结束时，才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斯卢茨基在他的论文中就是这样说的。可是你们不但不去痛斥这个新出现的“历史学家”的诽谤和捏造行为，反而去和他进行讨论，供给他讲坛。我不能不抗议把斯卢茨基的论文作为供讨论的文章刊载在你们的杂志上，因为决不能把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问题，把列宁**是否**对中派主义这种机会主义**进行过**不调和的原则斗争，列宁**过去是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问题变成讨论的对象。

你们在十月二十日送给中央的“编辑部声明”中承认，编辑部把斯卢茨基的论文作为供讨论的文章刊载出来是犯了错误。这当然很好，虽然编辑部的声明出现得很晚。但是，你们在声明中又犯了一个新的

错误，因为你们宣称：“编辑部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进一步探讨一切有关布尔什维克和战前第二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政治上是非常迫切的和必要的。”这就是说，你们又打算把人们拉来讨论那些本来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公理的问题。这就是说，你们又想把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问题由公理变成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

大家知道，列宁主义是在对各色机会主义，其中包括对西方的中派主义（考茨基）以及对我国的中派主义（托洛茨基等等）进行无情的斗争中产生、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连布尔什维主义的公开敌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这是公理。而你们却把我们往后拉，企图把公理变成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也许是由于不知道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也许是由于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想使斯卢茨基之流和托洛茨基的其他门徒不能说人家堵住他们的嘴吧？多么奇怪的一种靠牺牲布尔什维主义的切身利益而实行的自由主义……

编辑部认为斯卢茨基的论文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讨论研究呢？

（一）斯卢茨基硬说，列宁（布尔什维克）没有实行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和战前时期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分裂的路线。你们想讨论斯卢茨基的这个托洛茨基主义论点。但是这里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斯卢茨基简直是在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诽谤应该加以痛斥，而不应该把它变成讨论的对象。

每个布尔什维克，如果他真的是布尔什维克，都知道还在大战以前很久，大约从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起，当俄国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派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刚刚出现左派的时候，列宁就一方面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对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实行了决裂、分裂的路线。

每个布尔什维克都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布尔什维克当时（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就已经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队伍中博得了“分裂派”和“捣乱派”的光荣称号。但是既然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国际内，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是一个组织上没有形成、思想上没有锻炼、甚至怕说“决裂”和“分裂”两个字眼的软弱无力的集团，那末，列宁能有什么办法，布尔什维克能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要求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从俄国去替左派在西方政党内制造分裂吧。

况且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软弱不仅仅是战前时期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特点。大家知道，在战后时期左派仍然保留了这个缺点。大家知道，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即大战开始两年多以后发表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①]这篇著名论文中对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做了一个估计，在那篇论文里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许多极严重的政治错误，说到了**“德国所有左派分子的软弱性，他们被考茨基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的东西四面八方包围着”**，在那篇论文里列宁说到了**“尤尼乌斯还没有完全摆脱德国那些即使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包围’，这些人害怕分裂，害怕彻底说出革命的口号”**。

当时在第二国际所有的派别中，俄国布尔什维克按组织经验和思想锻炼来说是唯一能够采取重大措施去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直接实行决裂、分裂的派别。如果斯卢茨基之流即使不是企图证明而只是企图假定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没有用全部力量去和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唐恩）实行分裂，把中派主义者（托洛茨基和其他八月联盟分子）驱逐出去，那末关于列宁的布尔什维主

——————————————

① 尤尼乌斯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罗莎·卢森堡。——译者注

义立场问题，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问题还可以进行争论。但是问题就在于斯卢茨基之流对这种荒谬的假定连提都不敢提一下。所以不敢，是因为他们知道，俄国布尔什维克对各色机会主义者实行坚决分裂政策（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二年）的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对这种假定的有力的驳斥。所以不敢，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马上就会受到痛斥。

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同时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及中派主义者实行决裂的路线、分裂的路线，他们能不能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很久的时候（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二年）就同本国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调和主义者实行分裂呢？俄国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对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的政策是西方左派所应采取的政策的榜样，这一点有谁能够怀疑呢？俄国布尔什维克竭力推动西方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去同本国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实行决裂，实行分裂，这一点有谁能够怀疑呢？至于西方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当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效法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地步，那就不是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过错了。

（二）斯卢茨基责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没有坚定不移地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说他们只是在严重的附带条件下才支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说派别性的考虑妨碍了他们彻底支持左派。你们想通过讨论来反对这种骗人的毫无根据的责备。但是这里究竟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斯卢茨基在这里耍手腕，力图用没有根据的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责备来掩饰德国左派立场上的真正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德国左派常常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动摇不定，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愿意背叛**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革命，那末他们在支持德国左派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出一些严重的附带条件，不能**不**严厉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骗人的手腕应该加以痛斥，而不应该把它变成讨论的对象。

是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一定的严重的附带条件下才支持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同时批评了他们的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但是，因此就应该称赞布尔什维克，而不应该责备他们。

有人怀疑这一点吗？

让我们来看一看最明显的历史事实。

（甲）一九〇三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党员资格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当时布尔什维克想用自己的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来造成一种组织上的屏障，防止非无产阶级分子涌进党内来。当时因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所以非无产阶级分子涌进党内来的危险是非常现实的。俄国孟什维克坚持相反的立场，主张给非无产阶级分子大开入党之门。由于俄国革命的各个问题对世界革命运动有重要的意义，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就决定干预这件事。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即当时左派的首领，也干预了这件事。结果怎样呢？他们两人都表示赞成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责备布尔什维克有极端集中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趋向。后来孟什维克就抓住了这种卑鄙的市侩式的论调，并且把它散布于全世界。

（乙）一九〇五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布尔什维克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思想。布尔什维克断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便在保证得到农村贫农支持的情形下立刻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孟什维克否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他们宁愿采取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而反对工农联盟的政策，他们竟宣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相矛盾的反动的布朗基主义的方案。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帕尔乌斯和罗莎·卢森堡是怎样对待这些争论的呢？他们编造了一种空想的、半孟什维主义的、彻头彻尾充满了孟什维克的否认工农联盟

政策的精神的不断革命方案（对马克思的革命方案的畸形的曲解），并拿这个方案来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和劳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方案相对立。后来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在某种程度上）就抓住了这个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方案，并且把它变成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武器。

（丙）战前时期在第二国际各党内出现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民族殖民地问题，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问题，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法问题，推翻帝国主义的道路问题。为了扩大无产阶级革命和包围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支持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政策，发挥了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同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民族革命解放运动结成统一战线的方案。因此，各国的机会主义者，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立刻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们把布尔什维克当做疯狗来攻击。当时西方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什么立场呢？他们发挥了半孟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民族自决原则（直到实行分离和组织独立国家为止的原则），反对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解放运动有重大革命意义的论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有可能结成统一战线的论点，并拿所有这些极端轻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半孟什维主义的糊涂思想来和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案相对立。大家知道，后来托洛茨基就抓住了这个半孟什维主义的糊涂思想，并且利用它作为反对列宁主义的武器。

这就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所犯的一些尽人皆知的错误。

至于德国左派所犯的在列宁的有关论文中受到严厉批评的其他错误，我就不用说了。

他们在估计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政策时所犯的那些错误，我也不用说了。

从战前历史中举出的德国左派所犯的这些错误，不是说明左派社

会民主党人虽然有其左派性，但还没有解下孟什维主义的行囊，又是说明什么呢？

当然，德国左派不仅有过严重的错误。他们也还有过重大的革命的事迹。我指的是他们在内政问题例如选举斗争问题上，在国会斗争和国会外斗争问题上，在总罢工、战争、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等等问题上的许多功绩和革命言论。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才把他们当左派看待，支持他们，推动他们前进。但是，这并没有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一个事实：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同时也有过许多极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他们还没有抛弃孟什维主义的货色，因此就需要布尔什维克的极严厉的批评。

现在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如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愿意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背叛革命的利益，背叛共产主义，那末，他们在支持西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能不能**不提出严重的附带条件，不严厉批评**他们的错误呢？

斯卢茨基本来应该（假如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话）因此称赞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反而以此责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这样就彻底暴露了他是一个半孟什维克，是一个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这不是很明显吗？

斯卢茨基竟设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估计西方的左派时是以自己派别性的考虑为出发点的，这就是说，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自己派别组织的利益而牺牲了伟大的国际革命事业。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设想是再卑鄙再无耻不过了。所以再卑鄙不过，是因为连孟什维克中的那些狂妄的卑鄙小人现在也开始了解，俄国革命并不是俄国人的私事，恰恰相反，它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所以再无耻不过，是因为连第二国际中的那些职业诽谤家现在也开始了解，布尔什维克的始终一贯的和革命到底的国际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工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

是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把俄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问题、工农联盟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国会斗争和国会外斗争问题、总罢工问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帝国主义问题、民族自决问题、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运动问题、援助这种运动的政策问题等等提到了第一位。他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作为检验西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坚定性的试金石。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吗？是的，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他们不仅有权利这样做，而且应该这样做。他们所以应该这样做，是因为所有这些问题同时又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策略是服从于世界革命的任务的。他们所以应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在这些问题上才能够真正检验第二国际各派别的革命性。试问，这里究竟有什么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性”呢？这究竟和“派别性的”考虑有何相干呢？

还在一九〇二年，列宁就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写道：“**历史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国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从“做什么？”一书出版以来已经有三十年了。谁也不敢否认，这一时期的事变灿烂地证实了列宁的话。从这里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说，俄国革命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世界革命的枢纽，俄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吗？

只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才能够真正检验西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性，这不是很明显吗？

把这些问题看做“派别性的”问题的人彻底暴露了他们是卑鄙小人和蜕化分子，这不是很明显吗？

（三）斯卢茨基硬说，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正式文件来证明列

宁（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进行过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把这种官腔当做无可反驳的论据，来证明所谓列宁（布尔什维克）对第二国际中的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的说法。你们想通过讨论来反对这种无稽之谈，反对这种骗人的狡猾手段。但是这里究竟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斯卢茨基力图用关于文件的废话来掩饰他的所谓立场的贫乏和虚伪，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斯卢茨基认为党的现有的文件还不够。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难道第二国际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方面的那些尽人皆知的文件还不足以十分明显地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斗争中的革命的不调和性吗？斯卢茨基究竟看过这些文件没有？他还需要什么样的文件呢？

假定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文件以外，又找到一堆其他的文件，比如说布尔什维克的又一次论述必须消灭中派主义的决议。这是不是说，仅仅有了纸上的文件就足以表明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真正革命性和真正不调和性呢？除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外，还有谁会单单凭信纸上的文件呢？除了档案库的老鼠以外，还有谁不懂得，检验政党和首领首先必须根据他们的**行为**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宣言呢？历史上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愿意签署任何革命的决议，以便应付那些讨厌的批评家。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实行了**这些决议。其次，历史上还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口沫飞溅地要求**其他**各国的工人政党采取最革命的行动。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在自己党内或自己国内**没有屈服于自己的**机会主义者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列宁教导我们检验革命政党、派别和首领时不要根据他们的宣言和决议，而要根据他们的**行为**，不就是这个缘故吗？

如果斯卢茨基真想检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不调和性，那末他用来作为他的论文的**基础**的就不应该是个别文件和两三封私人信件，而应该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历史、行动**的检验，这不是很

明显吗？难道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曾有过机会主义者、中派主义者吗？难道布尔什维克没有对所有这些派别进行过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吗？难道这些派别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同西方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没有联系吗？难道布尔什维克也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左派集团一样没有把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击溃吗？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呢？为什么斯卢茨基忽视了这些对评定布尔什维克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运用根据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行动来检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最可靠的方法呢？为什么他宁愿采取在偶然检到的一些纸片中翻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方法呢？

这是因为采取更可靠的方法，即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立刻就会根本推翻斯卢茨基的整个立场。

这是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就会表明布尔什维克是世界上彻底击溃了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并把他们驱逐出党的**唯一的**革命组织。

这是因为以布尔什维克的实际行为和真正的历史为根据，就会表明斯卢茨基的老师托洛茨基分子是在俄国培植了中派主义并为此成立了八月联盟这个专门组织作为中派主义策源地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集团。

这是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就会完全揭穿斯卢茨基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伪造者，他企图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这种诬蔑性的责备来掩盖战前托洛茨基主义的中派主义。

编辑同志们，关于斯卢茨基和他的文章的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编辑部容许和我们党的历史的伪造者进行讨论是犯了错误。

什么东西竟能推动编辑部走上这条不正确的道路呢？

我认为推动编辑部走上这条道路的是目前在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中

间相当流行的那种腐朽的自由主义。有些布尔什维克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它固然犯了错误，干了不少蠢事，有时甚至具有反苏维埃的性质，但总还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由此就产生了对待托洛茨基分子和具有托洛茨基思想的人的某种自由主义态度。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看法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早已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了。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是谁供给了反革命资产阶级一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武器，就是说，是谁提出了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布尔什维克必然蜕化的论点等等呢？供给反革命资产阶级这种武器的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苏联一切反苏维埃集团在企图论证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必然性的时候，总是援引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关于苏维埃政权必然蜕化、关于资本主义一定会恢复的尽人皆知的论点，这个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是谁供给了苏联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一种策略上的武器，就是说，是谁进行了公开发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呢？供给反革命资产阶级这种武器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试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反苏维埃游行示威。托洛茨基分子的反苏维埃发动鼓舞了资产阶级，放纵了资产阶级专家的暗害活动，这是事实。

是谁供给了反革命资产阶级一种组织上的武器，就是说，是谁进行了建立秘密的反苏维埃组织的尝试呢？供给反革命资产阶级这种武器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反布尔什维克的非法集团。托洛茨基分子的反苏维埃的秘密勾当促进了苏联各个反苏维埃集团在组织上的形成，这是事实。

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正因为如此，对托洛茨基主义，哪怕是对已被击溃的和暗藏的托

洛茨基主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就是糊涂到近乎犯罪，近乎背叛工人阶级。

正因为如此，某些“著作家”和“历史学家”企图把暗藏的托洛茨基主义废物偷运到我们文坛上来的行为应当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坚决反击。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容许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进行文字上的讨论。

在我看来，托洛茨基主义私贩中的“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目前力图从两方面进行走私的勾当。

第一、他们力图证明列宁在战前时期对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于是就让那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去推测：列宁在当时还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只是在战后，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进行“改造”以后，才成为真正的革命家。斯卢茨基可以算是这一类私贩的典型代表。

从上面我们看到，斯卢茨基及其同伙是不值得我们长久和他们周旋的。

第二、他们力图证明列宁在战前时期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于是就让那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去推测：列宁在当时还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在战后，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进行“改造”以后，才懂得这一转变的必要性。“联共（布）历史读本”的作者沃洛谢维奇可以算是这一类私贩的典型代表。

固然，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主张不间断的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固然，这类事实和文件可以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很多很多。但是，列宁生平活动的事实和沃洛谢维奇之流有何相干呢？沃洛谢维奇之流写文章，是为了涂上一层布尔什维克的颜色来偷运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私货，来诽谤布尔什维克，

来伪造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

由此可见，沃洛谢维奇之流和斯卢茨基之流是一路货色。

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私贩们所走的“道路和歧途”。

你们自己知道，把论坛供给这一类“历史学家”以便利他们的走私勾当，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应做的事情。

据我看来，编辑部的任务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把我们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纳入科学的布尔什维克的轨道，加强注意去反对我们党的历史的托洛茨基主义伪造者和其他一切伪造者，经常揭穿他们的假面具。

这样做所以更为必要，是因为连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我指的是不带引号的历史学家，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也不免犯了替斯卢茨基之流和沃洛谢维奇之流助长声势的错误。可惜这里连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也不例外，他所著的关于联共（布）历史的书籍虽然有它的优点，但是也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

致

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载于一九三一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六期（总第一三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65—77 页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路德维希：承蒙你接见，我非常感激。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卓越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业。我觉得我很会鉴别人，可是我一点也不懂得社会经济条件。

斯大林：你太谦虚了。

路德维希：不，的确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要提出的一些问题你也许会觉得奇怪。今天我在这里，在克列姆里宫看见了彼得大帝的某些遗物，因而我要向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容许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拟？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者？

斯大林：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

路德维希：但是要知道，彼得大帝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为了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国来，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斯大林：是的，当然，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这个任务不是要巩固什么“民族”国家，而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要巩固国际主义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在任何程度上的巩固都会有助于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巩固。我在提高工人阶级和巩固这个阶级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工作中的每一步骤如果不是为了巩固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那末我认为我的一生是没有目的的。可见你的比拟是不恰当的。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

路德维希：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你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

斯大林：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至少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这样了解马克思的。而我们研究马克思已经不止十年了。

路德维希：大约在三十年前，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许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信徒的德国教授向我们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的作用，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斯大林：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路德维希：在我们面前这张桌子的周围有十六把椅子。在国外，人们一方面听说苏联是个一切事情都必须由集体决定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听说一切事情都是由个人决定的。究竟是由谁决定的呢？

斯大林：不，个人不能决定。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片面的。

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七十个委员。在这七十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专家、我们优秀的合作社专家、我们优秀的供应专家、我们优秀的军事家、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熟悉国营农场的人、我们优秀的熟悉集体农庄的人、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的人、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人。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任何人的个人意见和建议。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做决定，那末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个别人的错误，因为我们重视这些改正，所以我们做出的决定是相当正确的。

路德维希：你做过几十年的地下工作。你曾经秘密运送过武器、书报等等。你不认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会借用你的经验，用同样的方法来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吗？

斯大林：这当然是完全可能的。

路德维希：你们的政权在和敌人斗争时所以严厉无情，原因是不是就在这里？

斯大林：不，主要原因不在这里。可以举出几个历史上的例子。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最初他们对自己的敌人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孟什维克继续合法存在，并出版自己的报纸。社会革命党人同样继续合法存在，并有自己的报纸。甚至立宪民主党人也继续出版自己的报

纸。当克拉斯诺夫将军向列宁格勒举行反革命进攻而落入我们手中的时候，按战时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把他当俘虏押起来，而且应该把他枪毙。但是，我们因为他说了“真心话”而把他释放了。结果怎样呢？不久就弄清楚了：这种温和态度只会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我们对工人阶级的敌人采取这种温和态度是犯了错误。如果我们以后再犯这个错误，我们就是对工人阶级犯罪，我们就是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点不久就完全弄清楚了。很快就弄清楚了：我们对我们的敌人愈温和，这些敌人的反抗就愈厉害。不久，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郭茨等人和右派孟什维克就在列宁格勒组织了士官生的反革命发动，由于这次发动，我们的许多革命水兵牺牲了。就是那位因为说了“真心话”而被我们释放的克拉斯诺夫组织了白卫哥萨克。他和马蒙托夫联合起来，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两年武装斗争。不久就弄明白了：这些白卫将军的后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的代理人。于是我们相信，我们采取温和态度是多么错误。我们从经验中懂得了只有对这些敌人采取最无情的镇压政策，才能战胜他们。

路德维希：我觉得苏联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对苏维埃政权有恐惧、害怕的心理，而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在一定程度内是建筑在这种恐惧心理上的。我很想知道，在你意识到为了巩固政权而必须引起恐惧的时候，你个人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要知道，在你和你的同志、你的朋友交往的时候，你采取的完全是另外的手段，不是引起恐惧的手段，而对居民却要引起他们的恐惧。

斯大林：你错了。然而，你的错误也是许多人的错误。难道你以为用恫吓、恐吓的手段能够保持政权十四年之久并始终得到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沙皇政府是最善于恫吓的。它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老经验。欧洲资产阶级，其中包括法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竭尽全力帮助了沙皇制度，教导它去恐吓人民。尽管有这种经

验，尽管有欧洲资产阶级的帮助，恐吓政策还是使沙皇制度覆灭了。

路德维希：可是要知道，罗曼诺夫皇朝却支持了三百年。

斯大林：是的，可是在这三百年中间有过多少次起义和暴动：斯杰潘·拉辛的起义，叶梅连·普加乔夫的起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更不必说，现在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条件和旧时的条件是根本不同了，那时候群众的愚昧无知、没有文化、驯服和政治上的闭塞使当时的“统治者”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执掌政权。

至于苏联人民，至于苏联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温顺、驯服和畏缩。欧洲有很多人用旧眼光来看苏联人，以为生活在俄国的人第一、是驯服的，第二、是懒惰的。这是过时的和根本不正确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从俄国地主开始跑到巴黎，在那里挥霍掠夺来的金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的时候起在欧洲形成的。这的确是些意志薄弱和毫无用处的人。由此就得出了“俄国人懒惰”的结论。但是这同过去和现在都靠自己劳动来谋得生活资料的俄国工人和农民毫不相干。认为在短时期内进行了三次革命、摧毁了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现在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的俄国农民和工人是驯服的和懒惰的，那就太奇怪了。

你刚才问我，在我们这里是否由一个人决定一切。我们的工人现在决不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一个人专政。在我们这里，最有威望的人只要不再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只要失去了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就会完全垮台，就会一钱不值。普列汉诺夫曾经享有非常高的威望。结果怎样呢？一旦他在政治上跛了脚，工人就把他忘记了，就离开他并且把他忘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曾享有很大的威望，当然远不如普列汉诺夫那样。结果怎样呢？一旦他离开了工人，工人就把他忘记了。

路德维希：完全忘记了吗？

斯大林：有时也想起他，——怀着憎恶的心情想起他。

路德维希：是所有的人都怀着憎恶的心情吗？

斯大林：说到我们的工人，他们是怀着憎恶、愤怒和仇恨的心情想起托洛茨基的。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居民确实是害怕苏维埃政权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我指的是正在被消灭的垂死阶级的残余，首先是不大的一部分农民，即富农。但是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对这些集团实行恐吓政策，这种政策确实是存在的。大家知道，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这里不仅限于恐吓，而且更进一步，要消灭这个资产阶级阶层。

但是如果拿苏联劳动居民来说，拿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说，那末他们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是积极支持苏维埃制度的。他们所以支持苏维埃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是为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苏维埃政权所以巩固的基础就在这里，而不在于所谓恐吓政策。

路德维希：我很感谢你这个回答。请原谅我再向你提出一个会使你感到奇怪的问题。在你的生平历史中有一些所谓“强盗性的”事迹。你对斯杰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到兴趣？你对他，对这个“有思想的强盗”抱什么态度？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对鲍洛特尼柯夫、拉辛、普加乔夫以及其他这样的历史人物向来是感到兴趣的。我们认为这些人的发动是被压迫阶级自发暴动的反映，是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自发起义的反映。对我们说来，研究这种农民起义的最初尝试的历史总是有兴趣的。但是这里当然不能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做任何比拟。个别的农民起义，即使不像斯杰潘·拉辛的起义那样带有“强盗性”和无组织性，也不能得到任何重大的结果。农民起义只有在和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由工人领导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只有以工人阶级为首的联合起义，才

能达到目的。

除此以外，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由此可见，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相比拟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路德维希：请允许我对你的生平历史提几个问题。当我在马萨利克那里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从六岁起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是什么和在什么时候使你成了社会主义者的？

斯大林：我不能说我从六岁起就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甚至也不是从十岁或者十二岁。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十五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和当时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影响，使我对秘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发生了兴趣。

路德维希：是什么激起了你的反抗行为？也许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

斯大林：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而当时我读书的正教教会中学就不同了。为了抗议正教中学里所实行的侮辱人的校规和耶稣教会的办法，我决心要成为并且真的已经成为革命者，成为真正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了。

路德维希：可是难道你不承认耶稣教徒有好的品质吗？

斯大林：是的，为了实现丑恶的目的，他们在工作中是有一贯性和顽强性的。但是，他们的基本方法是监视、间谍活动、刺探情况和侮辱人，这里能有什么是好的呢？例如在宿舍中的监视：九点钟铃响喝茶，我们都到食堂去，而当我们回到自己房间里的时候，发觉我们所有装东西的箱子在这段时间内都已经搜查过、翻过了……　这里能有什么是好的呢？

路德维希：我看到在苏联对美国的一切特别尊重，甚至可以说是

崇拜美国的一切，也就是说，崇拜金元国家，崇拜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你们工人阶级中也有这种情绪，他们不仅对拖拉机和汽车，而且对一般的美国人也是这样。你怎样解释这一点呢？

斯大林：你太夸大了。我们对美国的一切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尊重。但是，我们尊重美国在各方面——在工业、技术、文学和生活方面的求实精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美国人中间有许多在精神和身体方面健康的人，在对待工作和事业的整个态度上健康的人。这种求实精神和这种朴实作风我们是赞成的。虽然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那里工业中的风气和生产中的习惯有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而对欧洲的老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那里还存在着封建贵族的老爷习气。

路德维希：你讲得很正确，甚至你自己也不会怀疑的。

斯大林：谁知道，也许是怀疑的。

虽然封建制度作为社会制度在欧洲早已被打破了，但是它的相当多的残余在生活和习惯中还继续存在。封建环境还继续产生技师、专家、科学家和作家，他们把老爷习气带到工业、技术、科学和文学中去。封建传统还没有被彻底打破。

对美国就不能这样说了，美国是一个没有地主、没有贵族的“自由移民者”的国家。因此，美国在生产中的风气是健全的和比较朴实的。我们的工人和经济工作人员到了美国，立刻就看出了这个特点。他们带着某种愉快而惊奇的心情说，在美国，在生产过程中很难从外表上把工程师和工人区别开来。这当然使他们很高兴。而在欧洲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既然说到我们对某一个民族的好感，或者更正确地说，对某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好感，那末当然应该说到我们对德国人的好感。我们对美国人的感情是不能和这种好感相比的！

路德维希：为什么恰恰是对德意志民族呢？

斯大林：至少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给世界贡献了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人物。只要指出这个事实本身就够了。

路德维希：近来在德国某些政治家中间有一种严重的顾虑，生怕苏联和德国传统的友好政策会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这种顾虑是由于苏联和波兰的谈判而引起的。如果这次谈判的结果，苏联承认波兰现在的疆界成了事实，那末就会使全体德国人民大失所望，因为德国人民直到现在还认为苏联是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是不打算承认它的。

斯大林：我知道在德国某些政治家中间有某种不满和忧虑，生怕苏联在和波兰的谈判中或者在和波兰签订的什么条约中会采取一种意味着苏联承认和保证波兰的领土和疆界的措施。

据我看来，这种顾虑是错误的。我们一向声明我们愿意和任何国家缔结互不侵犯公约。我们已经和许多国家缔结了这种公约。我们公开声明我们也愿意和波兰签订同样的公约。既然我们声明我们愿意和波兰签订互不侵犯公约，那末我们这样做就不是为了讲空话，而是为了真正签订这种公约。我们可以说是特种的政治家。有一些政治家，他们今天答应或者声明一件事，到第二天不是忘记了，就是否认他们声明过的东西，而且竟不觉得难为情。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在国外做的事情，国内必然会知道，全体工人和农民必然会知道。如果我们说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那末我们就会丧失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波兰人声明他们愿意和我们举行关于缔结互不侵犯公约的谈判时，我们自然表示同意并着手进行谈判。

在德国人看来，可能发生的最大危险是什么呢？是对德国人的关系的改变，关系的恶化吗？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正如波兰人一样，应当在公约中声明我们将不采取暴力和侵略来改变波兰和苏联的疆界或者来破坏双方的独立。正如我们向波兰人许下这种诺言一样，他们也向我们许下这种诺言。我们两国不打算进行战争来破坏双方的独立或疆界的完整，没有这一点就不能缔结公约。没有这一点就谈不到什

么公约。我们所能做到的至多就是这样。

这是不是承认凡尔赛体系呢？不是的。或者这也许是保证疆界吧？不是的。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做波兰疆界的保证人，正如波兰没有做过而且也不会做我们疆界的保证人一样。我们对德国的友好关系仍然和以前一样。这是我坚决相信的。

因此，你所说的顾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种顾虑是由某些波兰人和法国人所散布的谣言引起的。如果公约由波兰签了字，当我们把它公布出来的时候，这种顾虑是会消失的。大家将会看到，这个公约并不包含任何反对德国的东西。

路德维希：我非常感谢你这个声明。请允许我向你提出下面的问题：你谈到“平均主义”而且这个名词对普遍的平等来说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是要知道，普遍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斯大林：所有的人都领取同样的工资，同等数量的肉、同等数量的面包，穿同样的衣服，领取同样的和同等数量的产品，——这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所不知道的。

马克思主义只是说：在阶级还没有彻底消灭的时候，在劳动还没有从生存手段变成人们的第一需要，变成为社会谋福利的自愿劳动的时候，人们将按自己的劳动来领取工作报酬。“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公式。

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每个人一方面按自己的能力来劳动，另一方面将按自己的需要来领取劳动报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十分明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同的人具有而且将来也会有不同的需要。社会主义从来不否认人们在口味上、在需要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对施蒂纳平均主义趋向的批判，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对一八七五年“哥达纲领”的批判，只要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后来的著作，你就会看到他们对平均主义的抨击是多么

尖锐。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只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幼稚地设想，似乎俄国布尔什维克想把一切财富聚集在一起，然后把它们平均分配。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就是这样设想的。像克伦威尔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者”那样的人就是这样设想共产主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和这种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路德维希：你抽纸烟了。斯大林先生，你那只传奇似的烟斗在哪里呢？你曾经说过，言论和传奇是会消失的，而事迹却会存在。但是请你相信，国外千百万不知道你的某些言论和行动的人都知道你的传奇似的烟斗。

斯大林：我把烟斗忘在家里了。

路德维希：我现在向你提一个可能使你感到十分惊奇的问题。

斯大林：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早就忘记惊奇了。

路德维希：我们在德国也是这样。

斯大林：是的，你们在德国很快就会不再惊奇了。

路德维希：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你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受到迫害。你参加过战斗，你的许多亲密的朋友都死了，而你还活着。你怎样解释这一点呢？你相信命运吗？

斯大林：不，不相信。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相信“命运”的。命运这个概念，即“希克查尔”[①]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偏见，就是胡说，就是古希腊人的神话这一类东西的残余，古希腊人认为命运之神支配着人们的命运。

路德维希：那末，你没有死这件事是不是偶然的呢？

———————————————

① “希克查尔”系德文《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的译音，作命运解。——译者注

斯大林：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两种原因凑在一起就使我没有死。但是，这完全不影响另外一个人会代替我的职位，因为总有一个人必须担任这个职务。“命运”是一种不合乎规律的东西，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我是不相信神秘主义的。当然，我避开了危险是有原因的。但是当时也可能发生一些会引起完全相反的结果的其他偶然事件和其他原因。这和所谓命运是毫不相干的。

路德维希：列宁在国外侨居过多年。你在国外住的时间却很短。你是不是认为这是你的缺陷？你认为给革命带来更多利益的是那些侨居国外并且有可能认真研究欧洲，但是和人民没有直接联系的人呢，还是那些在俄国工作并且了解人民情绪，但是不大知道欧洲的革命者？

斯大林：在做这种比较时应当把列宁除外。虽然列宁住在国外很久，但是留在俄国的同志中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和俄国实际情况以及国内工人运动有密切的联系。每当我到国外去看他时（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我总是看见他那里有一大堆俄国实际工作者寄来的信件，列宁总是比那些留在俄国的同志更熟悉俄国情况。他始终认为居住国外对自己是一种负担。

在我们党内和党的领导人员中，留在俄国而没有到过国外的同志当然比在国外侨居过的人多得多，他们当然有可能比在国外侨居过的人给革命带来更多的利益。要知道，我们党内在国外侨居过的人已经剩下很少了。这样的人在二百万党员中只占一二百人。在七十个中央委员中几乎只有三四个人是在国外侨居过的。

至于认识欧洲，研究欧洲，那末那些想研究欧洲的人住在欧洲当然有更多的机会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中间没有长期居住国外的人是有某种损失的。可是居住国外对研究欧洲的经济、技术、工人运动干部、各种文学著作或科学著作完全没有决定的意义。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住在欧洲当然更容易研究欧洲。但是，没有在欧

洲住过的那些人所受到的损失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相反地，我知道有许多同志，他们在国外住了二十年，住在沙洛顿堡或拉丁区的某个地方，在咖啡馆里坐了好多年，喝喝啤酒，却始终没有能够研究欧洲，也没有了解欧洲。

路德维希：你是不是认为德国这个民族对秩序的爱更甚于对自由的爱呢？

斯大林：在德国，有一个时候人们确实非常尊重法律。一九〇七年我曾经在柏林住过两三个月，当时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常常嘲笑某些德国朋友这样尊重法律。例如流传过这样的笑话：柏林社会民主党委员会规定在某日某时举行一次游行示威，凡城郊各组织的人员都必须参加这次游行示威，某郊区一个二百人的小组虽然按时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城市，但是没有来得及参加游行，因为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站了两小时，不敢离开月台：在出口处没有收票的检票员，车票没有人可交。人们开玩笑说，需要有一个俄国同志来给德国人指出一条简单的出路：走出月台，不要交票……

可是，难道现在德国还有什么类似的情形吗？难道现在德国还有人尊重法律吗？难道那些本来应该比所有的人都更维护资产阶级法律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自己不是在破坏法律，不是在捣毁工人俱乐部，不是在肆无忌惮地杀害工人吗？

更不用说工人了，我以为他们早已不再尊重资产阶级法律了。

是的，近来德国人已经大大地改变了。

路德维希：在什么条件下，工人阶级才能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完完全全团结起来？为什么共产党人说，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团结才有可能？

斯大林：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周围的这种团结可以最容易地实现。但是，这种团结还在革命前无疑就会基本上实现。

路德维希：功名心对于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是一种刺激还是一种障碍？

斯大林：在不同的条件下，功名心的作用是不同的。依据条件为转移，功名心对于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可能是一种刺激，也可能是一种障碍。它多半是一种障碍。

路德维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月革命是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

斯大林：十月革命既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也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完成。法国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制度以建立资本主义。十月革命的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以建立社会主义。

载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八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3卷第79—92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节选）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

载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和十七日
“真理报”第十号和第十七号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的报告）

一　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

同志们！当五年计划出现的时候，人们未必预料到五年计划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相反地，当时许多人认为五年计划是苏联的私事，固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但毕竟是苏联一国的私事。

可是历史表明了，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历史表明了，五年计划不是苏联的私事，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情。

还在五年计划出现以前很久的时候，当我们正在结束反对武装干涉者的斗争而过渡到经济建设轨道的时期，列宁就已经说过：我们的经济建设有深刻的国际意义；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各样的阶层中遇到深刻的反应，并把人们分成两个营垒，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拥护者的营垒，另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反对者的营垒。

列宁在当时说：

“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世界各国所有的劳动者毫无例外地（绝非夸大）都注视着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这是已经达到的……　世界规模的斗争已转到这个战场上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一定会最终地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以缓慢的、逐步的——求速是不行的——而又是不断的上升和前进去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三页）

列宁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正在结束反对武装干涉者的战争，我们正在由反对资本主义的军事斗争过渡到经济战线上的斗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

从那个时候起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苏维埃政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每一步骤，每一年，每一季，都灿烂地证实了列宁同志这些话的正确性。

但是最灿烂地证实列宁这些话的正确性的是我们的五年建设计划，这一计划的产生，这一计划的发展，这一计划的实现。的确，在我国经济建设道路上，大概任何一个步骤都不像五年计划及其发展和实现问题那样在欧洲、美洲、亚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阶层中遇到如此深刻的反应。

最初，五年计划在资产阶级及其报刊方面遇到的是嘲笑。“幻想”、“梦呓”、“乌托邦”，——这就是他们当时给我们五年计划的称呼。

后来，当他们开始看见五年计划的实现产生出实际结果的时候，他们就敲起警钟，硬说五年计划威胁到资本主义各国的生存，硬说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使欧洲市场商品充斥，将使倾销政策加强，将使失业现象加深。

后来，当这套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把戏也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的时候，各种公司、报刊、团体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代表就接连不断地到苏联来游历，想亲眼看看苏联究竟在搞些什么。这里我不是说工人代表团，他们从五年计划最初出现的时候起就表示钦佩苏维埃政权的创举和成功，就表示决心拥护苏联工人阶级。

从这个时候起，所谓社会舆论、资产阶级报刊、各种资产阶级团体等等就开始发生分裂。有一些人硬说五年计划已经完全破产，布尔什维克已经濒于灭亡。相反地，另一些人说：布尔什维克虽然是些坏人，但他们的五年计划还是有办法的，他们大概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里引证各种资产阶级报刊的评论也许不是多余的。

例如就拿美国的“纽约时报”来说吧。该报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写道：

“五年工业计划抱有打破任何比例观念的目的，并且‘不管代价如何’都要达到这个目的，如莫斯科所往往傲然自夸的那样。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计划。这是投机的把戏。”

这样说来，五年计划甚至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投机把戏。

又如英国资产阶级的“每日电讯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的评论：

“如果把五年计划看做‘计划经济’的试金石，那末我们就应当说它已经完全破产了。”

“纽约时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评论：

“集体化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它已经使俄国濒于饥荒。”

波兰资产阶级的“波兰报”一九三二年夏季的评论：

“实际情况表明，苏维埃政府及其农村集体化政策似已陷入绝境。”

英国资产阶级的“金融时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评论：

“斯大林和他的党由于实行自己的政策，已经面临五年计划体系破产和五年计划所应实现的一切任务都遭到失败的局面。”

意大利“政治”杂志的评论：

“如果以为一亿六千万人民四年来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制度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四年来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超人的努力没有做出一点事情来，那就荒谬了。恰恰相反，他们已经做出了许多事情……可是，灾祸仍然存在，这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朋友和敌人，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左倾反对派分子和右倾反对派分子都确信无疑的。”

最后，美国资产阶级的“当代历史”杂志的评论：

“所以，我们考察俄国现状后得出结论说：五年计划按它所宣布的目的来说，尤其是按它的基本的社会原则来说，都已遭到失败。”

这就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的评论。

对于这些评论的作者大概不值得加以批评吧。我想是不值得的。所以不值得，是因为这些“死硬的”人物是属于中世纪时期的化石一类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事实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我们这里怎样实现五年计划，他们反正是要固执己见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同一个资产阶级营垒的其他报刊的评论吧。

请看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报纸“时报”一九三二年一月的评论：

“苏联不依靠外国资本而实现工业化，就是赢了第一局。”

这个“时报”在一九三二年夏季又发表评论：

“共产主义正在用极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业，而资本主义制度却只能缓步前进……　法国因为地产分散于无数小私有者之间，农业机械化是无法实行的；但是苏维埃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农业工业化了……　布尔什维克在和我们比赛中成了胜利者。”

英国资产阶级的“圆桌”杂志的评论：

“五年计划的成绩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现象。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制造厂、莫斯科的‘阿模’汽车制造厂、下新城的汽车制造厂、德涅泊水电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的巨大的钢铁厂、正在变成苏联的鲁尔的乌拉尔的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化学工厂，——所有这些成绩以及全国工业方面的其他成绩都证明苏联工业好像灌溉得很好的植物一样，不管有什么困难，还是在日益增长，日益巩固……　五年计划为苏联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非常有力地加强了苏联的实力。”

英国资产阶级的“金融时报”的评论：

“机器制造工业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他们在报刊上和在演说中称赞这些成绩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要忘记，从前俄国所出产的只是一些最简单的机器和工具。固然，就是在目前，机器和工具输入额的绝对数字也还在增加；但是，进口机器与苏联国产机器的比例数却在不断缩小。现在苏联制造着本国冶金工业和电器工业所必需的一切设备。它已经创立了本国的汽车工业。它创立了制造一切工具和仪器（从最精确的小仪器直到最重型的压力机）的工业。在农业机器方面，苏联已经不依赖国外输入了。同时，苏联政府正在设法使五年计划四年实现的事业不致因煤铁出产迟误而受到阻碍。毫无疑问，新建的大型工厂是能够保证重工业产值的巨大增长的。”

奥国资产阶级的“新自由报”一九三二年初的评论：

“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以咒骂的，可是必须了解它。五年计划是一个新的庞然大物，必须加以注意，至少必须从经济上加以注意。”

英国资本家，“自治领联合银行”总经理基勃逊·札尔维一九三二年十月的评论：

“我要声明，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肯定地说，我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俄国正在前进，而我们这里

却有大批大批的工厂停闭，约有三百万失业者完全无法找到工作。人们嘲笑过五年计划，预言它必遭失败。但是你们可以相信，在五年计划条件下所达到的实际结果已经超过原来的规定……　在我所游历过的一切工业城市中都有新区域出现，这些新区域是按照一定计划建成的，有点缀着树木和街心公园的宽广街道，有最新式的房屋，有学校，有医院，有工人俱乐部，当然还有许多替做工作的母亲照顾孩子的托儿所和儿童之家……　不要轻视俄国人的计划，不要错误地希望苏联政府会遭受失败……　今天的俄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理想的国家。俄国是一个有惊人的积极性的国家。我相信俄国所抱的志向是健全的……　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俄国全体青年和全体工人都具有一件可惜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所缺少的东西，这件东西就是希望。”

美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杂志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评论：

“五年计划在四年内获得了真正**卓绝的成绩**。苏联用战时的强度从事于创造新生活基础的建设任务。**国家的面貌简直改变得不可认识了**……　莫斯科就是这样，那里有成百条新铺的柏油路、新的街心公园、新的建筑物，附近有新建设的市镇，城郊有林立的新工厂。其他较小的城市也是这样。在草原和沙漠地带也出现了新的城市，不是几个而是五十个以上的城市，每个城市的人口自五万至二十五万不等。所有这些城市都是最近四年来产生的，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或几个新建起来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的中心。几百个新的区域电站以及许多像德涅泊水电站一类的大型电站正在逐渐实现列宁的公式：‘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　苏联大量生产了无数种过去俄国从来没有生产过的东西：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优质钢、合成橡胶、滚珠轴承、大型发动机、具有五万瓦发电能力的涡轮、电话设备、采矿工业用的电机、飞机、汽车、自行车以及几百种新式机器……　在俄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开采铝、镁、磷灰石、碘、炭酸钾以及其他许多贵重矿物。**苏联平原上的指路标已经不是教堂的十字架和圆顶，而是**

谷仓和秣草保藏室。在集体农庄里建筑着房屋、牲畜栏和猪圈。电气已经深入农村，无线电和报纸已经普及农村。工人正在学习使用最新的机器。青年农民在生产方面使用着农业机器，这种机器比美国任何时候所见过的都更巨大，更复杂。俄国已开始‘用机器来思想’了。俄国正在迅速地由木材的时代进到铁、钢、混凝土和电动机的时代。”

英国“左派”改良主义的“前进”杂志一九三二年九月的评论：

“特别惹人注目的是苏联所进行的巨大的工作。新的工厂、新的学校、新的电影院、新的俱乐部、新的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新的建筑物。其中有许多已经竣工，其余的还在建筑中。要把最近两年来已经完成的工作和还在进行的工作都向英国读者一一叙述出来是很困难的。要相信这一切，就得亲眼去看看。我们在战时所达到的成绩和苏联现在所做的比较起来真是微不足道的。美国人承认说：即使在美国西部各州最紧张最热烈的建设时期，也丝毫不曾有过像苏联目前的这种狂热的创造积极性。苏联最近两年来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以致很难想像再过十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请你们抛弃那些顽固地荒谬地诽谤苏联的英国报纸所叙述的妄诞可怕的故事吧。请你们抛弃那些戴着中等阶级的眼镜小视苏联，但是毫不了解苏联情况的浅学的知识分子所散布的似是而非的言论和感想吧……　苏联正在健全的基础上建设着新社会。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怕危险，就必须用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毅力热情地工作，就必须克服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大国内劳力建设社会主义时必然会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可是，我在两年内两次游历苏联后得到了一个印象：苏联在稳步前进，在计划着、创造着和建设着，而且规模极大，分明是向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挑战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集团的营垒中所发生的意见分歧和分裂，其中有

一些集团主张消灭似乎五年计划已经破产的苏联，而另一些集团显然主张和苏联实行贸易合作，大概是指望从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取得一些利益。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对五年计划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问题的态度是一个应当单独提出的问题。每年都有许多外国工人代表团到苏联来参观，这里我们只要引证一个工人代表团，例如比利时工人代表团的评论就够了。比利时工人代表团的这个评论足以代表所有一切工人代表团的评论，无论是指英国代表团或法国代表团，德国代表团或美国代表团或其他各国代表团都一样。这个评论原文如下：

“我们在旅行时所看见的伟大建设使我们不胜钦佩。无论在莫斯科或在马凯叶夫卡、戈尔洛夫卡、哈尔科夫和列宁格勒，我们都可以看到人们在多么热情地工作。所有的机器都是最新式的。工厂里都很清洁，空气新鲜，光线充足。我们看到在苏联是怎样给予工人医疗卫生帮助的。工人住宅建筑在工厂附近。工人区设有学校和托儿所；儿童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可以看到旧工厂和新工厂、旧住宅和新住宅之间的差别。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使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着新社会的劳动者的巨大力量。我们看到了苏联巨大的文化高涨，而其他国家却各方面笼罩着衰败现象，笼罩着失业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劳动者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了多么可怕的困难。因此，我们更加了解他们在向我们指出自己的胜利时所具有的那种自豪心。我们深信他们一定能克服一切障碍。”

这就是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我们只进行了两三年的建设工作，我们只显示了五年计划的初步成就，全世界就分成了两个营垒，一个营垒的人向我们狂吠不已，另一个营垒的人却因五年计划的成就而惊讶万分；更不必说，全世界还有我们自己的日益加强的营垒，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营垒，他们因苏联工人阶级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他们决心支持苏联工人阶级而使全世界资产阶级胆颤心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五年计划的各种成就和成果的国际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各国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正因为它们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所以资产阶级就想从五年计划的失败中取得新论据去反对革命，相反地，无产阶级却力求从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取得而且实际上已经取得新论据去拥护革命，反对全世界资产阶级。

五年计划的成就正在动员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去反对资本主义，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毫无疑问，五年计划的国际革命意义真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注意五年计划，五年计划的内容，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分析五年计划的总结，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实现的总结。

二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

现在我们来谈五年计划问题的实质。

什么是五年计划呢？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具有落后的往往是中世纪的技术的国家引上现代新技术的轨道。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苏联由一个任凭资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软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资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把苏联变为工业国家的同时彻底排挤资本主义分子，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战线，建立起在苏联消灭

阶级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和改组的工业。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分散的小农业引上大规模集体经济的轨道，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经济基础，并以此消灭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可能性。

最后，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要在国内创造一切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必要前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力量，从而能够彻底打退所有一切外来的军事干涉的企图，彻底打退所有一切外来的武装侵犯的企图。

五年计划的这个基本任务是由什么决定的，是以什么理由为根据的呢？

其理由就是必须消灭那种使苏联处于难堪的地位的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必须在我国创造一种使我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不仅能够赶上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

其理由就是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的基础上，只有不仅不逊于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现代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

其理由就是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个对立的基础上，建立在**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上和**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小农经济上。

其理由就是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经济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

列宁说：

“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

可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严厉方式提

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各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向前猛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三八页）

列宁说：

“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是必须记住的。凡细心考察过农村生活，而把它和城市生活做过比较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除资本主义的根柢，还没有摧毁国内敌人的根基和基础。国内敌人是依靠小经济的，我们要摧毁这个敌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包括农业在内的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　只有国家实现了电气化，只有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页至第四八四页）

党制定五年计划和规定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时所持的理由就是以这些原理为基础的。

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

但是要实现这种宏伟的计划，决不能茫无头绪，乱抓一把。要实现这种计划，首先必须找出计划的基本环节，因为只有找出并抓住基本环节，才能把计划的其他一切环节拉出来。

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是什么呢？

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就是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改造并振兴全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实现五年计划必须从重工业着手。因此，必须把恢复重工业当做实现五年计划的基础。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有列宁的指示：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民经济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　不挽救重

工业，不把它恢复起来，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的国家……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八页至第三八九页）

但是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在五年计划开始时我们这样一个落后而不富裕的国家里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重工业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和必要数量的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材，否则就根本不能恢复重工业。党是否知道这一点并且考虑到这一点呢？是的，是知道的。不仅知道，并且大声疾呼地宣布了这一点。党知道英国、德国、美国的重工业是怎样建成的。它知道这些国家的重工业或者是靠巨额借款，或者是靠掠夺其他国家，或者是靠同时采用这两种办法建成的。党知道这些道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行不通的。那末，它所指靠的究竟是什么呢？它所指靠的是我国本身的力量。它所指靠的是：我们既有苏维埃政权，又以土地、工业、运输业、银行和商业的国有化为依据，所以能够厉行节约以积累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充足的资金。党直截了当地说：这件事情需要有重大的牺牲，如果我们真想达到目的，我们就应该公开和自觉地忍受这种牺牲。党指靠用我国内部的力量实现这个任务，而不要外来的奴役性的信贷和借款。

关于这一点，列宁是这样说的：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我们应常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很多浪费现象的痕迹全部铲除干净。

这不会是农民的狭隘观点吗？

不是的。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九页）

从穷苦的庄稼汉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的马上，——这就是党在制定五年计划和努力实现五年计划的时候所追求的目的。

厉行节约，积累为供给我国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这就是我们要建立重工业和实现五年计划所必须走的道路。

是大胆的任务吗？是困难的道路吗？可是，我们党所以叫做列宁的党，就因为它没有权利害怕困难。

不仅如此，党十分相信五年计划能够实现，十分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所以它认为可以提出任务，不在五年内，如五年计划所要求的那样，而在四年内，确切地说，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如果把特别季度算进去的话）完成这件困难的事业。

由此就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个有名的口号。

结果怎样呢？

后来事实表明了：党是对的。

事实表明了：如果党没有这种勇气，如果它不是这样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它就不能取得我们现在有权引以自豪的胜利。

三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现在我们来谈五年计划实现的总结问题。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取得了胜利呢？

是的，取得了胜利。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超过了我们所预期的程度，超过了我们党内那些最急躁的人所预期的程度。现在连敌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了。我们的朋友当然更不会否认这一点。

从前我们没有钢铁工业，即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汽车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机床制造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巨大的现代化学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真正的巨大的现代农业机器制造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航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在电力生产方面占最末位，现在我们已经升到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了。

从前我们在石油制品和煤炭的生产方面占最末位，现在我们已经升到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了。

从前我们只在乌克兰有一个煤碳钢铁基地，而且我们经营这个基地是很吃力的。现在我们不仅发展了这个基地，而且在东部建立了我国所引以自豪的新的煤碳钢铁基地。

从前我们只在我国北部有一个纺织工业基地。现在我们在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西部很快就会有两个新的纺织工业基地。

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新的巨大的工业部门，而且给这些部门建立了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的规模和范围。

这一切就使资本主义分子最终地和永远地被排挤出工业范围以外，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了苏联唯一的工业形式。

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一九三二年）末的百分之七十。

这一切就使我们能够在五年计划第四年度末把原定在五年内完成的总的工业生产大纲完成百分之九十三点七，使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两倍**以上，超过一九二八年水平**一倍**以上。至于重工业生产大纲，那末我们已经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八。

固然，我们总的五年计划大纲还有百分之六没有完成。但这是因为邻国拒绝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公约和远东方面发生了纠纷，我们为了加强国防，不得不立刻改组一批工厂来制造现代化国防武器。因为这种改组需要经过一个准备时期，所以这些工厂停止生产达四个月之久，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五年计划总的生产大纲在一九三二年的完成。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弥补了国防力量方面的缺陷。可是这样做不能不使五年计划生产大纲的完成受到不良的影响。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偶然的情况，我们就不仅已经完成，而且一定已经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总的生产数字。

最后，这一切就使苏联由国防准备不足的弱国变成了国防力量雄厚的强国，变成了能够随时应付一切意外事件的国家，变成了能够大量制造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并将这些武器供给自己的军队去抵御外侮的国家。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大体上就是如此。

现在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既然如此，那末资产阶级报刊关于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遭到“破产”的废话还有什么价值呢。

现在遭受着严重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值增长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请看人所共知的官方统计吧。

苏联工业总产值在一九三二年末**增加**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百三十四，而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内**降低**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四，英国**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五，德国**降低**到百分之六十二。

苏联工业总产值在一九三二年末**增加**到**一九二八年水平**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九，而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内**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六，英国**降低**到百分之八十，德国**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五，波兰**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四。

这些统计正是说明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在和苏联工业体系竞赛时经不起考验，苏联工业体系在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优越。

有人对我们说：建成了许多新工厂，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放弃工业化政策，放弃扩大生产资料生产的政策，或者至少把这件事情放到末位，而多生产一些布匹、鞋子、衣服和其他各种日用品，那就好得多了。

日用品的确生产得不够用，因而造成了相当的困难。但是必须知道而且必须考虑到这种把工业化任务放在末位的政策会使我们得到什么结果。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内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的十五亿卢布外汇中拿出一半来输入棉花、皮革、羊毛和橡胶等等。那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布匹、鞋子和衣服。可是那时我们就会没有拖拉机工业，也没有汽车工业，就会没有比较巨大的钢铁工业，就会没有金属来制造机器，因而就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

那时我们就不可能用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器供给农业，因而就会挨饿。

那时我们就不可能战胜国内资本主义分子，因而就会大大增加资

本主义复辟的机会。

那时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而没有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国家就会变成外敌用武的对象。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都可以蹂躏它。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遇到的就会是军事干涉，就会是战争而不是互不侵犯公约，这种战争是危险的致命的战争，是流血的实力悬殊的战争，因为在这个战争中我们在拥有一切现代化进攻武器的敌人面前几乎是手无寸铁的。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

很明显，自重的政府，自重的党是不能采取这种会招致灭亡的观点的。

正因为党摈斥了这种反革命的立场，党在工业方面完成五年计划的事业中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最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党仿佛是鞭策了国家，督促它向前奔驰。

党实行这种最高速度的政策是不是做得正确呢？

是的，是绝对正确的。

落后了一百年并因落后而有灭亡危险的国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赶快用新技术来重新武装自己，终于走上康庄大道。

其次，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最后，党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我国国防的弱点。时局的条件，资

本主义国家军备的扩充，废除军备主张的失败，国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仇视，——这一切都迫使党迅速加强国防力量，加强国家独立的基础。

可是，党是否有实现最高速度政策的实际可能呢？是的，是有的。它所以有这种可能，不仅是因为它及时推动我国迅速前进，而且首先是因为它在大规模的新建设事业中能够依靠旧工厂或革新过的工厂，这些工厂已经为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所掌握，因而提供了实现最高发展速度的可能。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新建设的迅速高涨、大规模建设的热潮、新建筑工程中的英雄和突击队员、汹涌的发展速度的实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能不能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必须实行完全相同的最高发展速度的政策呢？

不，不能这样说。

第一、由于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即为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建立现代新技术基础的任务。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鞭策和督促国家呢？很明显，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

第二、由于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我们**已经**把国防力量提到应有的高度。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鞭策和督促国家呢？很明显，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

最后，由于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我们已经建成几十几百个新的、拥有复杂的新技术的大工厂和联合厂。这就是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业总产值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已经不是那些技术已被掌握的旧工厂，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那样，而是那些技术还没有被掌握而必须掌握的新工厂。但是掌握新企业和新技术要比利用那些技术已被掌握的旧工厂或革新过的工厂困难得多。这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来提高

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熟练程度，来获得充分利用新技术的新技能。既然如此，那末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初两三年内，即使我们想要实行，也不能实行最高发展速度的政策，这不是很明显吗？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的工业产值必须采取较慢的增长速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我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产值平均每年至少必须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这样的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梦想不到的。不仅这样的速度，就连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也是它们现在梦想不到的。这也就是它们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色。具有苏维埃经济制度的苏维埃国家却是另一种情况。在我国经济制度下，我们完全可能而且必须使产值每年**至少**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掀起了进行**新建设**的热情和热潮，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就。这是很好的。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够了。现在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要有掌握新工厂新技术的热情和热潮，还要认真提高劳动生产率，认真降低成本。

现在主要点就在这里。

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大约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半期无论在建设方面或者在工业产值的增长方面都开始新的迅速的跑步。

最后，略为谈谈发展速度和产值每年增长的百分数问题。我们的工业家对这个问题很少研究。但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什么是产值增长的百分数呢？每增长百分之一所包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例如拿一九二五年即恢复时期来说吧。当时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当时工业总产值为七十七亿卢布。当时增长百分之六十六按绝对数字说就是增加三十多亿卢布。所以当时每增长百分之一就等于增加四千五百万卢布。再拿一九二八年来说。一九二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

六，按百分数说等于一九二五年的三分之一强。当时工业总产值为一百五十五亿卢布。全年增长的绝对数字是三十二亿八千万卢布。所以当时每增长百分之一就等于增加一亿二千六百万卢布，即几乎比一九二五年（该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多两倍。最后，拿一九三一年来说。一九三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即等于一九二五年的三分之一。当时工业总产值为三百零八亿卢布。该年增长的绝对数字是五十六亿多卢布。所以当时每增长百分之一就等于增加二亿五千万卢布以上，即比一九二五年（该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多五倍，比一九二八年（该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强）多一倍。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研究产值增长速度时不能只限于考察增长的总的百分数，还必须知道每增长百分之一所包含的内容和全年产值增长的总数。例如我们决定使一九三三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十六，即等于一九二五年的四分之一。但这并不是说这一年产值增长的绝对数字也会等于一九二五年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五年产值增长的绝对数字是三十多亿，每增长百分之一等于增加四千五百万卢布。毫无疑问，一九三三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十六的绝对数字将不下五十亿卢布，即几乎比一九二五年多一倍，而每增长百分之一至少也将等于三亿二千万至三亿四千万卢布，即比一九二五年每增长百分之一所包含的数字至少多六倍。

同志们，如果具体考察增长的速度和百分数问题，那末情况就是如此。

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就是如此。

四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现在我们来谈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问题。

在农业方面，五年计划是集体化的五年计划。党实行集体化是以什么为出发点的呢？

党的出发点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化以外，还必须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拥有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大规模的集体农业，作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唯一的稳固基础。

党的出发点是：不实行集体化，就不能把我国引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就不能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

列宁说：

“靠小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七页）

列宁说：

“如果我们仍旧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是不免要灭亡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五页）

列宁说：

“只有依靠共同的、劳动组合的、协作的劳动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迫使我们进入的绝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三页）

列宁说：

“必须过渡到模范大农庄中的共同耕种制；不这样就不能摆脱俄国现在所处的那种经济破坏状态，那种简直是绝望的状态。”（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六页）

列宁根据这一点得出以下的基本结论：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当它能够在事实上向农民指明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的时候，只有当它能够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来帮助农民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才能牢靠地和实在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

三页至第一七四页）

党实行农业集体化大纲，在农业方面实行五年计划大纲就是以列宁的这些原理为出发点的。

因此，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无法利用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农户联合为用一切现代最先进的农具武装起来的大规模集体农庄，并在所有的闲地上建立国营模范农场，即国营农场。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任务就是要把苏联由落后的小农国家变为拥有建立在集体劳动基础上并能提供最高商品率的大规模农业的国家。

党在农业方面四年实现五年计划大纲时获得了什么成绩呢？党实现了这个大纲还是遭到了失败呢？

党所获得的成绩是：它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组织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大约五千处国营谷物农场和国营畜场，同时在四年内把播种面积扩大了二千一百万公顷。

党所获得的成绩是：集体农庄现在已经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联合起来，并拥有农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就是说，**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两倍**。

党所获得的成绩是：它现在每年已能收购十二亿至十四亿普特商品谷物，而在个体农民经济占优势时期每年只能收购五亿至六亿普特商品粮食。

党所获得的成绩是：富农阶级虽然还没有彻底消灭，但是已被击溃，劳动农民摆脱了富农的奴役和剥削，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建立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即集体经济的基础。

党所获得的成绩是：苏联已经由小农经济的国家改造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的国家。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大体上就是如此。

现在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既然如此，那末资产阶级报刊关于集

体化遭到“失败”，关于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遭到“破产”的废话还有什么价值呢。

现在遭受着严重的农业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请看人所共知的官方统计吧。

各主要产粮国家的播种面积缩减了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美国的棉花播种面积缩减了百分之十五，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甜菜播种面积缩减了百分之二十二至三十，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亚麻播种面积缩减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农业总产值由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一十亿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五十亿美元。美国谷物总产值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二亿八千八百万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三亿九千一百万美元。美国棉花总产值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三亿八千九百万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三亿九千七百万美元。

所有这些事实不是说明了苏维埃农业体系比资本主义农业体系优越吗？这些事实不是说明了集体农庄是比个体农户和资本主义农场更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吗？

有人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十分能够赢利的，说它们耗费资金很多，说保留这种企业是毫无理由的，说最好把它们解散，只把其中能够赢利的保留下来。但是只有丝毫不懂国民经济问题，丝毫不懂经济问题的人才会这样说。几年以前，纺织企业大半是不能赢利的。当时我们有一部分同志建议我们关闭这些企业。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话，我们就会怎样呢？我们就会在国家面前，在工人阶级面前犯下极大的罪行，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会破坏我们的已在上升的工业。我们当时是怎样做的呢？我们等了一年多，结果使全部纺织工业变成了能够赢利的工业。而我们的高尔基城的汽车制造厂呢？它暂时也是不能赢利的。难道也要下令把它关闭吗？又如我们的暂时也不能赢利的钢铁

工业呢？同志们，难道也要把它关闭吗？如果这样来看赢利问题，那末我们就只应当尽量发展某些赢利最多的工业部门，如糖果工业、面粉工业、化妆品工业、针织工业和儿童玩具工业等等。我当然不反对发展这些工业部门。恰恰相反，这些工业部门必须加以发展，因为它们也是居民所需要的。可是，第一、它们没有重工业来供给设备和燃料就不能发展。第二、它们不能成为工业化的基础。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

决不能用商人眼光，从目前着眼来看赢利问题。应当从整个国民经济，从几年的时间着眼来看这个问题。只有这种观点才能称为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应该用在工业方面，而且尤其应该用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方面。你们只要想一想：我们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建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大约五千处国营农场，就是说，建立了完全新的大企业，这种企业对于农业的意义和大工厂对于工业的意义一样重大。请你们指出一个国家来，它能够在三年内建立起来的新的大企业就算不是二十万零五千个，而只是二万五千个吧。你们是指不出来的，因为这样的国家是没有而且不曾有过的。我们在农业方面却建立了二十万零五千个新企业。可是世界上竟有一些人要求这些企业立刻能够赢利，如果不能立刻赢利，那就把它们破坏，把它们解散。赫罗斯特拉特[①]的桂冠使这些非常奇怪的人睡不着觉，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说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能赢利时绝对不是想说它们一概不能赢利。绝对不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高度赢利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们现在已经有几千个集体农庄和几十处国营农场是十分能够赢利的。这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我们党的骄傲，是苏

① 赫罗斯特拉特，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的年轻人，为了扬名，竟焚毁了爱非斯城的阿尔蒂密斯神殿。喻指不择手段追逐名声的人。——本书编者注

维埃政权的骄傲。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当然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间有旧的，有新的，也有十分年轻的。这是些还很幼弱，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经济机体。它们在自己的组织建设中所处的时期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工厂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所处的时期。显然，其中大多数还不能赢利。但是毫无疑问，它们经过两三年就一定能够赢利，正如我们的工厂在一九二一年以后就能赢利一样。如果根据它们目前还不是一概都能赢利而拒绝给以帮助和支持，那就是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面前犯下极大的罪行。只有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提出不需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

党在农业方面实现五年计划时加速进行了集体化。党实行加快集体化速度的政策是否做得正确呢？是的，是绝对正确的，虽然在这方面不免有过一些急躁行动。党在实行消灭富农阶级和铲除富农巢穴的政策时决不能半途而废，它应当把这件事情贯彻到底。这是第一。

第二、党一方面拥有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另一方面利用我国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国有！）的条件，所以有一切可能来加速进行农业集体化。党在这方面确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因为它已经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集体化大纲两倍。

这是不是说，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应当实行加快集体化速度的政策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苏联各主要地区的集体化。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所做到的已经超过我们所预期的程度。我们不仅基本上完成了集体化，而且已经使绝大多数农民意识到集体农庄是最适当的经济形式。同志们，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急急忙忙地来迅速进行集体化呢？显然不需要。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加快集体化速度的问题，尤其不是要不要有集体农庄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早已完全解决了。集体农庄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走向旧的个体经济的道路已经完全截断了。现在的任

务是要在**组织上**巩固集体农庄，把暗害分子从集体农庄中驱逐出去，挑选受过审查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来供给集体农庄，使集体农庄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

现在主要点就在这里。

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情形就是如此。

五　五年计划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上面我讲到了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成就，讲到了苏联工业和农业高涨的情形。从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看来，这些成就产生了什么结果呢？从根本改善劳动者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看来，我们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成就的主要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个主要结果是**消灭了失业现象**，消除了工人中不相信明天的心理。

第二个主要结果是几乎全体贫农都参加了集体农庄建设，在这个基础上打破了农民分化为富农和贫农的过程，**因而消灭了农村中的贫困现象**。

同志们，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这种成绩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哪怕是最“民主的”国家所梦想不到的。

我们苏联的工人早已忘记失业现象了。大约三年前我们还有将近一百五十万失业者。我们消灭失业现象已经有两年了。在这段时间内工人已经忘记了失业现象，忘记了失业的痛苦，忘记了失业的惨状。请看一看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失业而造成的惨状吧。在这些国家里现在至少有三四千万失业者。这是些什么人呢？通常都说这是些“走投无路的人”。

他们每天都在设法获得工作，寻找工作，几乎任何工作条件都愿

意接受，可是谁也不收容他们，因为他们是“多余的”人。与此同时，却有大批商品和产品被那些命运的宠儿，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任意消耗。

不给失业者饭吃，因为他们无饭钱可付；不给他们屋子住，因为他们无房钱可付。他们靠什么生活，在哪里居住呢？他们的生活靠老爷餐桌上抛下来的一点点施舍，靠在垃圾箱里寻找腐烂的残余食品。他们住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而且大多数住在郊外用木箱板和树皮匆忙搭成的小屋里。不仅如此，不仅失业者遭受失业的痛苦，而且在业工人也遭受失业的痛苦。他们所以遭受失业的痛苦，是因为大批失业者的存在使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不稳固，使他们产生了不相信明天的心理。今天他们还在企业里工作，可是他们不知道明天醒来时是否已被解雇。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主要成绩之一，就是我们消灭了失业现象，使苏联工人摆脱了失业的惨状。

关于农民也必须这样说。他们也已经忘记了农民分化为富农和贫农的情形，忘记了富农剥削贫农的情形，忘记了每年都有几十万几百万贫农破产而沦为乞丐的情形。三四年前我国贫农至少占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即将近二千万人。而在更早的时候，在十月革命以前，贫农至少占农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什么是贫农呢？这就是通常在经营农业时或者缺乏种子，或者缺乏耕马，或者缺乏农具，或者缺乏所有这一切东西的人。贫农就是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通常受富农盘剥，而在旧俄时代既受富农盘剥又受地主盘剥的人。就在不久以前，还有二百多万贫农每年跑到南部，跑到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去谋生，受富农雇用，而在更早的时候，受富农和地主雇用。每年跑到工厂门口来补充失业者队伍的贫农更多。当时不仅贫农处于这种恶劣的境况，而且中农也大半和贫农一样遭受贫穷和困苦。所有这一切情况农民已经忘记了。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结果，给了贫农和下中农什么呢？它打败和击溃了富农阶级，使贫农和一大半中农摆脱了富农的盘剥。它把贫农和一大半中农吸引到集体农庄里来，并为他们造成了稳固的地位，从而消灭了农民分化为剥削者（富农）和被剥削者（贫农）的可能，消灭了农村中的贫困。它把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和下中农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从而消灭了农民破产和贫困的过程。现在我国已经没有几百万农民每年离乡背井跑到远方去谋生的现象了。现在要吸引农民离开自己的集体农庄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必须和集体农庄订立合同，而且还要送给庄员免费的火车票。现在我国已经没有几十万几百万农民陷于破产，站在工厂门口哀求工作的现象了。这种事情过去是有的，但它早已成为过去了。现在农民是生活有保障的主人，是拥有拖拉机、农业机器、种子储备和存粮等等的集体农庄的庄员。

这就是五年计划给予贫农和下中农的东西。

这就是五年计划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的主要成绩的实质。

由于在改善工农物质生活状况方面获得了这些主要成绩，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有了如下的事实：

（甲）大工业的工人和职员人数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一倍**，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百分之五十七；

（乙）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工农收入，在一九三二年增加到四百五十一亿卢布，即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五；

（丙）大工业的工人和职员每年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七，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百分之十八；

（丁）社会保险基金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二百九十二（一九三二年为四十一亿二千万卢布，而一九二八年为十亿五千万卢布），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百分之一百一十一；

（戊）公共饮食业迅速发展，它供应各个最主要的工业部门百分

之七十以上的工人，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五倍。

当然，我们还没有做到完全满足工农的物质需要。我们在最近几年内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已经做到使我国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逐年改善。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也许还有资产阶级报刊的某些代表，包括资产阶级报刊驻莫斯科的一部分通讯员，才会怀疑这一点，而他们对于国民经济和劳动者状况的了解未必胜过阿比西尼亚国王对于高等数学的了解。

资本主义国家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请看官方统计吧。

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了。在美国，据官方统计，单是加工工业中的在业工人人数就由一九二八年的八百五十万人减少到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万人；而据美国劳工联合会统计，美国全部工业中的失业人数在一九三二年末已经达到一千一百万人。在英国，据官方统计，失业人数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二十九万人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二百八十万人。在德国，据官方统计，失业人数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三十七万六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万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都是如此，而且官方统计照例都要缩小失业工人的数字，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是在三千五百万至四千万之间。

工人的工资不断下降。据官方统计，美国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二八年水平降低百分之三十五，英国在同一时期内降低百分之十五，德国甚至降低百分之五十。据美国劳工联合会统计，美国工人由于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工资降低而受到的损失在三百五十亿美元以上。

英国和德国本来就很少的工人保险基金大大缩减了。美国和法国完全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失业保险形式，因此，无家可归的工人和无人照料的儿童人数急剧增长，特别是在美国。

资本主义各国农民群众的状况也不见得好些，那里的农业危机根

本破坏了农民经济，使数千百万破产的农民沦为乞丐。

五年计划在改善苏联劳动者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就是如此。

六　五年计划在城乡间商品流转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现在我们来谈五年计划在城乡间商品流转额增长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问题。

工业和农业产量的巨大增长，工业和农业方面作为商品的剩余产品量的增长，以及工农需要的增长，——这一切不能不使而且确实已使城乡间的商品流转活跃和扩大起来。

城乡间的生产结合是结合的基本形式。可是单靠生产结合还不够。必须用商品方面的结合来补充生产结合，使城乡联系成为巩固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只有通过苏维埃商业的扩展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以为单单通过某一条孔道，例如通过合作社，就可以扩展苏维埃商业，那是不正确的。要扩展苏维埃商业，就必须利用所有的孔道：合作社网、国营商业网、集体农庄商业。

有些同志以为扩展苏维埃商业，特别是扩展集体农庄商业，就是回到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这是完全不对的。

苏维埃商业，包括集体农庄商业在内，是和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商业根本不同的。

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我们容许资本主义活跃，容许私人商品流转，容许私商、资本家和投机分子“活动”。

这是一种多少还自由的、只是由国家调节作用来加以限制的商业。当时在国内商品流转方面，私人资本主义部分还占相当大的地位。更不必说，我们当时既没有像现在这样发展的工业，又没有集体农庄和

国营农场，它们按计划工作并供给国家以大量农产品和工业品后备。

能不能说我们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呢？当然不能这样说。

第一、决不能把苏维埃商业和虽然受国家调节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商业相提并论。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商业容许资本主义活跃，容许私人资本主义部分在商品流转方面活动，而苏维埃商业却以不许资本主义活跃，不许私人资本主义部分在商品流转方面活动为出发点。什么是苏维埃商业呢？苏维埃商业是没有大小资本家参加的商业，是没有大小投机分子参加的商业。这是特种商业，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制度发展条件下才实行的商业。

第二、我们现在有相当发展的国营工业和完整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系统，它们供给国家以大量农产品和工业品后备来扩展苏维埃商业。这是在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条件下所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第三、我们在最近时期已经把私商、私贩和各种中介人完全逐出商品流转范围。当然，这绝对不是说私商和投机分子已经不会利用他们最方便的场所，即利用集体农庄商业，按隔代遗传律重新出现于商品流转中了。况且，集体农庄庄员自己有时也愿意进行当然不会使他们增光的投机活动。可是，我们有苏维埃政权不久以前颁布的关于取缔投机活动和惩办投机分子办法的法律来反对这种恶劣现象。你们当然知道，这个法律是不很温和的。你们当然懂得，这样的法律是在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条件下所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既然如此，那末说什么回到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商业就是丝毫不懂得，简直是丝毫不懂得我们的苏维埃经济。

有人对我们说：没有健全的货币经济和健全的通货，就不可能扩展商业，即使这种商业是苏维埃商业；首先必须医治货币经济和我们苏联通货，因为我们苏联通货是没有丝毫价值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认为这些可敬的经济学家对于政治经

济学的了解并不胜过坎特布里的大主教对于反宗教宣传的了解。怎么能硬说我们苏联通货没有丝毫价值呢？我们用这种通货建筑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德涅泊水电站、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高尔基城汽车制造厂、莫斯科汽车制造厂以及几十万个集体农庄和几千处国营农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些先生们莫非认为这一切企业都是由麦秸或泥土建成而不是由具有一定价值的实际材料建成的吗？如果估计到在我国商品流转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有组织的市场而不是只有从属作用的无组织的市场，那末苏联通货的稳定性是由什么来保证的呢？当然不仅仅是由黄金储备来保证的。苏联通货的稳定性首先是由国家所掌握的、按照固定价格投入商品流转中的大量商品来保证的。哪一个经济学家能够否认苏联所独有的这种保证要比任何黄金储备更能切实地保证通货的稳定性呢？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是否终究会懂得，他们已经完全被那种把黄金储备当做通货稳定性的“唯一”保证的理论弄糊涂了呢？

关于和扩展苏维埃商业有关的问题就是如此。

由于五年计划的实现，我们在扩展苏维埃商业方面获得了什么成绩呢？

在五年计划结束时我们有如下的成绩：

（甲）轻工业产值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七；

（乙）合作社营和国营商业的零售商品流转额按一九三二年价格计算为三百九十六亿卢布，就是说，零售商业的商品额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

（丙）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网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十五万八千处大小商店；

（丁）集体农庄商业日益发展，个别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农产品收购量日益增加。

事实就是如此。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商品流转情况却完全不同，在那里，危机使商业急剧缩减，使企业大批关闭，使中小商人破产，使大商号倒闭，使商业企业的大批商品因劳动群众的购买力不断降低而卖不出去。

五年计划在发展商品流转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就是如此。

七　五年计划在和敌对阶级残余进行斗争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五年计划在工业、农业和商业方面实现的结果，我们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驱除了资本主义分子，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

这种情形对资本主义分子应当产生什么结果，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什么结果呢？

结果是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即私营工业家及其仆从、私商及其走卒、从前的贵族和神甫、富农及其走狗、从前的白卫军官和巡官、从前的警察和宪兵、各种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切反苏维埃分子都被打倒了。

这些从前的人物既然被打倒而分散在苏联各地，就钻进我们的工厂，钻进我们的机关和商业组织，钻进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企业，主要是钻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们戴上“工人”和“农民”的假面具，钻到那里隐藏起来，其中有些人甚至钻进了党内。

他们是带着什么东西钻进这些地方的呢？当然是带着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心情，带着对新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和文化形式深恶痛绝的心情钻进来的。

这些先生们已经没有力量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正面进攻了。他们和他们的阶级已经多次实行过这种进攻，但是他们被击溃、被打散了。因此，他们现在还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危害和暗害工人、集体农庄

庄员、苏维埃政权和党。于是他们就暗中活动，竭力进行危害勾当。他们放火焚烧仓库，破坏机器，组织怠工。他们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组织暗害活动，而且其中有些人，包括某些大学教授，在疯狂地进行暗害活动时竟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牲畜中间散播瘟疫和炭疽热，在马匹中间散播脑膜炎等等。

但是主要点还不在这里。这些从前的人物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国家财产、合作社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的勾当。在工厂里进行盗窃侵吞，在铁路货运中进行盗窃侵吞，在仓库和商业企业里进行盗窃侵吞,特别是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进行盗窃侵吞,——这就是这些从前的人物的主要“活动”形式。他们凭自己的阶级本能意识到公有制是苏维埃经济的基础，要危害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动摇这个基础。于是他们就真的用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的办法来动摇公有制。

为了组织侵吞的勾当，他们就利用昨天还是个体农民，今天已是集体农民的那些集体农庄庄员的私有习惯和残余。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知道人们的意识的发展是落后于人们的实际地位的。按地位来说，庄员已经不是个体农民，而是集体农民了，但他们的意识暂时还是旧的私有者的意识。因此，剥削阶级出身的那些从前的人物就利用庄员的私有习惯，来组织侵吞公产的勾当并以此动摇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即公有制。

我们许多同志竟宽容这种现象，不懂得这种大规模盗窃侵吞的事实的意义和作用。他们好像瞎子一样，对这些事实熟视无睹，以为“这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正如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一样，我们苏维埃制度的基础是公有制。如果说资本家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在当时达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那末我们共产党员就更加应当宣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巩固一切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中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容许盗窃侵吞公共财产（不管是国家财产或合作社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

放过这种反革命的胡作非为，就是帮助敌人来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我们苏维埃政府不久以前公布关于保护公有制的法律，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这个法律是目前革命法制的基础。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集体农庄庄员的首要职责就是必须极严格地执行这个法律。

有人说，目前的革命法制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毫无区别，目前的革命法制是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的恢复。这是完全不对的。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的锋芒主要是指向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现象，指向“非法的”没收和捐税。新经济政策初期的革命法制在私有主、个体农民和资本家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的条件下保障了他们财产的安全。而目前的革命法制就完全不同了。目前的革命法制的锋芒并不是指向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现象，因为这种现象早已不存在了，而是指向公共经济中的盗贼和暗害分子，指向流氓和侵吞公共财产的人。由此可见，目前的革命法制关心的主要是保护公有制，而不是其他什么事情。

因此，为保护公有制而斗争，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给我们规定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进行斗争，——这就是党的基本任务之一。

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为粉碎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并打破其盗窃勾当所必需的东西。

有些同志把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和国家消亡的论点了解为替懒惰和宽大辩护的论据，了解为替阶级斗争熄灭和削弱国家政权这一反革命理论辩护的论据。不用说，这种人和我们党是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这是应该被驱逐出党的蜕化分子或两面派分子。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

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

五年计划实现的结果，我们已经完全把敌对阶级的最后残余从他们的生产阵地上赶出去了，我们击溃了富农阶级并准备好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基础。这就是五年计划在和资产阶级的最后队伍进行斗争方面的总结。但是这还不够。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从前的人物从我们自己的企业和机关中赶出去，使他们永远不能为害。

决不能说这些从前的人物用暗害和盗窃手段就能使苏联的现状有所改变。他们要抗拒苏维埃政权的措施是太软弱无力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同志不用革命警惕性把自己武装起来，不从实践中抛弃那种宽容盗窃侵吞公共财产的事实的庸俗态度，那末从前的人物就能干出不少的危害行为来。

必须注意到，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这当然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迅速肃清这些分子而避免特别的牺牲，我们就必须注意到这一切。

正因为如此，革命警惕性是布尔什维克现在特别需要的品质。

八 总 结

五年计划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在改善劳动者生活和发展商品流转方面、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展开反对垂死阶级的残余及遗毒的阶级斗

争方面完成的基本总结就是如此。

苏维埃政权在最近四年来所获得的成就和成果就是如此。

如果根据这些成就而认为我们这里一切都很好，那就错了。当然，我们这里还不是一切都很好的。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在我们的实践中还有不善经营和杂乱无章的现象。可惜我现在不能谈到这些缺点和错误，因为委托我做的总结报告范围不容许我来说明这些问题。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虽然有各种缺点和错误，而且我们谁也不否认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存在，可是，我们取得了使全世界工人阶级钦佩的重大成就，取得了真正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虽然有各种错误和缺点，可是党终究在四年完成五年计划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在这里能够起主要作用而且真的起了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

保证我们不顾一切地取得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的基本力量是什么呢？

首先是千百万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积极性和忘我精神、热情和创造性，他们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个情况，我们就不能达到目的，就不能前进一步。

其次是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它们号召群众前进，在走向目的的道路上克服了一切困难。

最后是苏维埃经济制度特有的优点和优越性，它包含着克服困难所必需的巨大的可能性。

这就是保证苏联取得了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的三个基本力量。

总结：

一、五年计划的总结推翻了资产阶级活动家和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关于五年计划是幻想、梦呓、不能实现的梦想的论断。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五年计划已经实现了。

二、五年计划的总结打破了资产阶级关于工人阶级只会破坏旧制度，不会建设新制度的著名的“信条”。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工人阶级既善于破坏旧制度，也善于建设新制度。

三、五年计划的总结打破了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在单独一个国家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了。

四、五年计划的总结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而其他一切经济制度都不稳固、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困难面前经受考验的论断。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没有力量的和不稳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衰颓，它应当让位给另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制度，即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苏维埃经济制度是不怕危机而能克服资本主义所不能解决的种种困难的唯一的经济制度。

五、最后，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只要共产党知道自己的目标而且不怕困难，那末它就是不可战胜的。

（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转为欢呼，全场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3卷第122—159页

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集体农庄男女庄员同志们！我本来不打算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讲话。我所以不打算讲话，是因为在我以前讲话的几位同志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了，而且说得很好，很中肯。既然如此，是不是还用得着我来讲话呢？可是因为你们一定要我讲话，而权力又在你们手里，（鼓掌多时）我就只好遵命了。

现在我就个别的几个问题说几句话。

一　集体农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一个问题：集体农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呢？集体农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无谓的问题。你们集体农庄突击队员对于集体农庄是否站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一点大概是不会怀疑的。因此，这个问题在你们看来可能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像你们这样想法。有不少的农民，其中也有庄员，还怀疑集体农庄道路是否正确。这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的确，人们数百年来过着旧的生活，走着旧的道路，在富农和地主跟前低头做人，在高利贷者和投机分子跟前低头做人。不能说这条旧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得到过农民的赞同。可是，这条旧道路总是一条已经走熟了走惯了的道路，而且谁也没有实地证明可以过另外一种生

活，过较好的生活。何况在各个资产阶级国家里，人们仍然过着旧的生活……　而布尔什维克却像疾风骤雨一般，突然冲进这个旧的泥潭似的生活里来说：是抛弃旧道路的时候了，是开始过新生活，过集体农庄生活的时候了，是开始不过资产阶级国家里大家所过的那种生活，而过新生活，过劳动组合生活的时候了。而这种新生活是怎样一种生活呢，有谁知道。恐怕它比旧生活更坏吧。至少新道路是一条没有走惯的道路，是一条没有走熟的道路，是一条还没有完全熟悉的道路。留在旧道路上不是好些吗？等一等再转上新的集体农庄的道路不是好些吗？冒险是不是值得呢？

这就是现在一部分劳动农民所怀抱的疑问。

我们是否应该消除这些疑问呢？我们是否应该公开提出这些疑问，指出这些疑问有什么价值呢？显然是应该的。

所以，上面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不能说是一个无谓的问题。◇213◇

那末，集体农民所走上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的呢？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向新道路即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是在三年以前开始的。这种看法只有一部分对。当然，群众性的集体农庄建设在我们这里是在三年以前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个过渡的标志是富农被击溃，千百万贫农和中农群众加入集体农庄。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为了开始这种群众性的向集体农庄建设的过渡，必须具备一些先决条件，一般说来，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

首先，必须有苏维埃政权，它曾经帮助而且正在继续帮助农民走上集体农庄道路。

第二、必须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剥夺他们的工厂和土地，并宣布工厂和土地为人民的财产。

第三、必须压制富农，剥夺他们的机器和拖拉机。

第四、必须宣布只有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和中农才能使用机器和拖拉机。

最后，必须使国家工业化，创立新的拖拉机工业，建设新的农业机器制造厂，以便供给集体农民以充足的拖拉机和机器。

没有这些先决条件，就根本谈不到三年前开始的群众性的向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

所以，要过渡到集体农庄道路，首先必须进行十月革命，推翻资本家和地主，剥夺他们的土地和工厂，创立新工业。

向新道路即集体农庄道路的过渡是从十月革命就开始的。这个运动所以直到三年前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是因为十月革命的经济果实直到那个时候才完全显露出来，我们直到那个时候才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

在各国人民的历史上有过不少次革命。它们和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们都是片面的革命。一种剥削劳动者的形式被另一种剥削形式代替了，但是剥削本身仍然存在。一些剥削者和压迫者被另一些剥削者和压迫者代替了，但是剥削者和压迫者本身仍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的目的才是消灭**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

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废除了。可是，这个革命用农奴主和农奴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奴隶主和奴隶占有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替了。在奴隶制度下，“法律”允许奴隶主杀死奴隶。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只”允许农奴主出卖农奴。农奴革命把农奴主消灭了，把农奴制的剥削形式废除了。可是，这个革命用资本家和地主，用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代替了农奴主和农奴制的剥削形式。一些剥削者被另一些剥削者代替了。在农奴制度下，“法律”允许出卖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只”允许使劳动者失业和贫困，破产和饿死。

只有我们的苏维埃革命，只有我们的十月革命才这样提出问题：不是用一些剥削者代替另一些剥削者，不是用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

种剥削形式，而是根绝任何剥削，根绝所有一切剥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压迫者，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鼓掌多时）

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是农民向新的集体农庄道路过渡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前提。

农民支持十月革命是不是做得对呢？是的，他们是做得对的。他们所以做得对，是因为十月革命帮助他们摆脱了地主和资本家，高利贷者和富农，商人和投机分子。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赶走压迫者，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压制富农和投机分子，——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最终摆脱旧时的羁绊，仅仅击溃剥削者是不够的。为了做到这一点，还要建立新生活，建立一种使劳动农民能够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而且能够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上升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农村中建立新制度，即集体农庄制度。这就是问题的另一面。

旧制度和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有什么不同呢？

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按劳动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农具——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工作，为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过着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分子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在旧制度下，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它帮助富豪反对劳动农民。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政府是工农的，它帮助工人和农民反对所有一切富豪。旧制度导向资本主义。新制度导向社会主义。

可见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有些人以为可以走什么第三条道路。有些还不完全相信集体农庄

道路的正确性而摇摆不定的同志特别喜欢搬出这条谁也不知道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想要我们回到旧制度去，回到个体经济去，不过不要地主和资本家。同时，他们想要我们“只”容许富农和其他小资本家作为我国经济制度中的合法现象而存在。其实，这并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第二条道路，即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请你们问一问农民：他们是不是愿意恢复富农盘剥，回到资本主义去，取消苏维埃政权而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呢？你们只要问一问农民，就会知道大多数劳动农民认为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哪一条道路。

所以，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向前进，向上走，走到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或者**向后退，向下走，走到旧的富农资本主义制度。

劳动农民摈弃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了集体农庄建设道路是做得对的。

有人说，集体农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它又是一条困难的道路。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对。当然，在这条道路上困难是有的。美好的生活不花代价是得不到的。可是问题在于：主要的困难已经度过了，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困难简直是不值得认真谈到的。无论如何，同工人在十年至十五年前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比较起来，庄员同志们，你们目前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你们的发言人在这里讲话的时候称赞列宁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和顿巴斯的工人。他们说，他们工人有成绩，而你们庄员的成绩却少得多了。我觉得你们的发言人在演说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同志的羡妒：如果我们集体农民有像你们列宁格勒、

莫斯科、顿巴斯和哈尔科夫工人那样的成绩，那该多好呵……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你们知道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用了多大的代价才换得这些成绩，他们经过怎样的艰难困苦才终于取得这些成绩吗？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一九一八年工人生活中的一些事实。当时常常整个整个星期不发给工人一块面包，更不必说肉类和其他食品了。当时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能够领到八分之一磅黑面包，还掺着一半粗渣，就算是好日子了。而且这种情况不是继续了几个月或半年，而是继续了整整两年。但是工人忍耐着，并没有灰心丧气，因为他们知道好时光一定会到来，他们一定会取得重大的成就。结果怎样呢？你们看见，工人没有想错。你们只要把你们的艰难困苦和工人受过的艰难困苦比较一下，就会看出你们的艰难困苦简直是不值得认真谈到的。

怎样才能推进集体农庄运动和全力展开集体农庄建设呢？

首先，集体农庄必须拥有十分固定而适于耕种的土地。你们是否有这种土地呢？是的，是有的。大家知道，所有的好地都交给集体农庄，而且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了。所以，集体农庄庄员可以尽力耕种和改良这些土地，不必害怕这些土地会落到别人手里。

其次，集体农庄庄员必须能够使用拖拉机和机器。你们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呢？是的，是有的。大家知道，我们的拖拉机制造厂和农业机器制造厂首先而且主要是为集体农庄生产的，它们供给集体农庄以一切现代工具。

最后，政府必须以人材和拨款来全力帮助集体农民，而不让敌对阶级余孽破坏集体农庄。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政府呢？是的，是有的。这个政府就叫工农苏维埃政府。请你们指出来给我看看，还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帮助资本家和地主，不是帮助富农和其他富豪，而是帮助劳动农民的。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这样的国家。只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里才有这样的政府，它竭力保护工人和集体农民，保护城

乡一切劳动者，反对一切富豪和剥削者。（鼓掌多时）

所以，你们有展开集体农庄建设和完全摆脱旧时羁绊的一切条件。

现在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诚实地劳动，按劳动分配集体农庄的收入，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爱护拖拉机和机器，好好照料马匹，完成你们的工农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巩固集体农庄，把钻进集体农庄的富农和富农走狗驱逐出去。

你们大概会同意我的意见：克服这些困难，就是说，诚实地劳动和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是并不怎样困难的。何况你们现在不是为富豪工作，不是为剥削者工作，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

由此可见，集体农庄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劳动农民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二　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新道路上，在集体农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什么成绩呢？我们想在最近两三年内取得什么成绩呢？

社会主义是一件好事。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是一件无可争辩的好事。可是，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情。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我们将来能取得什么成绩，而在于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什么成绩。农民走上了集体农庄道路。这是很好的。可是，农民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什么成绩呢？我们沿着集体农庄道路前进取得了什么显著的成绩呢？

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帮助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了集体农庄。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千百万贫农群众因加入集体农庄并在集体农庄里使用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农具而上升到中农的水平。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千百万从前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贫农群众现在在集体农庄里成了中农，成了

生活有保障的人。我们取得的成绩是打破了农民分化为贫农和富农的过程，击溃了富农，帮助贫农在集体农庄里成了自己的劳动的主人，成了中农。

四年以前，在集体农庄建设展开以前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富农日益富裕，日益上升，而贫农则日益贫困和破产，遭受富农的盘剥。当时中农常常向富农的地位爬，但是每一次都跌下来补充贫农的队伍而使富农称快。不难猜想，在这一片混乱中占便宜的只有富农，也许还有几个富裕农民。当时农村里每一百户中有四五户富农，八户或十户富裕农民，四十五户到五十户中农，三十五户贫农。所以，受富农盘剥的贫农至少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我还没有算中农中半数以上的力量单薄的阶层，他们按生活状况来说同贫农很少区别，他们也是直接依赖于富农的。

我们展开集体农庄建设的结果，消灭了这种混乱和不公平现象，打破了富农盘剥，把所有这些贫农群众都吸收到集体农庄里来，在集体农庄里给了他们有保障的生活，把他们提高到中农的水平，使他们能够使用集体农庄的土地，享受对集体农庄的优待，使用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器。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使不下二千万农民人口，不下二千万贫农摆脱了贫困和破产，摆脱了富农盘剥，因加入集体农庄而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同志们，这是很大的成绩。这样的成绩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的。

这就是集体农庄建设的实际的明显的结果，是农民走上集体农庄道路的结果。

但这还只是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所取得的**第一个**成绩。

如果以为我们应当停留在这第一步上，停留在这第一个成绩上，

那就不正确了。不，同志们，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成绩上。要继续推进并彻底巩固集体农庄，我们必须走**第二**步，我们必须取得**新的**成绩。这第二步是什么呢？这第二步就是要把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都提得更高。这第二步就是要**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是的，同志们，成为生活富裕的人。（鼓掌多时）

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依靠集体农庄把贫农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我们现在必须更前进一步，帮助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上升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鼓掌多时）

我们现在有达到我们这个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我们的机器和拖拉机现在利用得还不好。我们的土地耕种得还不大好。我们只要改造机器和拖拉机的使用，只要改进土地的耕种，就能做到使我们的产量增加一两倍。而这就完全足以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集体农庄土地上的劳动者了。

从前，富裕农民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要成为富裕农民，就必须欺负自己的邻人，就必须剥削他们，和他们做买卖时高价卖出，低价买进，雇佣几个雇农，竭力剥削他们，积累一点小资本，稳固以后就爬上富农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从前在个体经济下，富裕农民就引起贫农和中农的不信任和仇恨。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条件也不同了。现在，集体农庄庄员要成为生活富裕的人，完全不需要欺负或剥削自己的邻人。而且现在要剥削什么人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这里不再有土地私有制或租佃制，机器和拖拉机都属于国家，而拥有资本的人在集体农庄里面已经不时髦了。曾经时髦过，但是这种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集体农庄庄员要成为生活富裕的人，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在集体农庄里诚实地工作，正确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正确地使用耕畜，正确地耕种土地，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

有时有人说：既然有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劳动呢？从前劳动，现在还劳动，难道还不到不劳动的时候吗？同志们，这种说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是懒汉的哲学，而不是诚实的劳动者的哲学。社会主义决不否认劳动。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劳动上的。社会主义和劳动是彼此分不开的。

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的话是反对什么人的呢？是反对剥削者，反对那些自己不劳动而强迫别人劳动，靠剥削别人发财致富的人的。还反对什么人呢？还反对那些好逸恶劳，想靠别人养活的人。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好逸恶劳，而是所有的人都诚实地劳动，不是为别人劳动，不是为富豪和剥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为社会劳动。如果我们诚实地劳动，为自己、为自己的集体农庄诚实地劳动，那末我们就能做到在短短两三年内把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提高到享有丰富产品并过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的水平。

这就是我们的当前任务。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鼓掌多时）

三　几点意见

现在让我谈谈几点意见。

首先谈谈我们的农村**党员**。你们中间有党员，可是非党员更多。参加这次大会的非党员比党员多，这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正是首先需要吸收非党员参加我们的事业。有些共产党员是用布尔什维克态度来对待非党庄员的。可是也有一些共产党员摆党员架子，不许非党员接近他。这是不好的，而且是有害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共产党员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善于把千百万非党积极分子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能争取到千百万非党工人和农民对我们党的信

任，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胜利。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党员不要和非党员隔绝，不要把自己关在党的圈子里，不要摆党员架子，而要倾听非党员的呼声，不仅要教导非党员，而且要向非党员学习。

不要忘记，党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记住，所有的党员自己有一个时候都曾经是非党员。今天他不是党员，明天他就会成为党员。这里究竟有什么可以自傲的呢？我们老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不少人已经在党内工作了二三十年。可是要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个时候也曾经是非党员。假如在二三十年以前，当时的党员鄙视我们，不许我们接近党，那我们会怎样呢？也许我们还会有好几年和党疏远。可是，同志们，我们老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些最不中用的人。（会场愉快活跃，鼓掌多时。）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党员，现在有时瞧不起非党员的一些年轻党员应当记住这一切，应当记住：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

现在稍微谈谈**妇女**，谈谈**女庄员**。同志们，集体农庄中的妇女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知道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轻视妇女，甚至讥笑妇女。可是，同志们，这是一个错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妇女占人口的一半。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运动已经把许多卓越的能干的妇女提拔起来担任领导职务。你们只要看一看这次大会，看一看大会的成员，就可以看出妇女早已由落后者上升为先进者了。妇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埋没这支力量就是犯罪。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推动集体农庄中的妇女前进，运用这支力量。

固然，苏维埃政权在不久以前和女庄员发生过一点小误会。我指的是奶牛问题。可是现在奶牛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于是误会也就消释了。（鼓掌多时）我们已经做到使大多数庄员每户有一头奶牛。再过一两年，你们就找不到一个自己没有奶牛的庄员了。我们布尔什维克

一定设法使我国所有的庄员每户有一头奶牛。（鼓掌多时）

至于女庄员自己，她们应当记住集体农庄对于妇女的作用和意义，应当记住她们只有在集体农庄里面才有可能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没有集体农庄，就没有平等，在集体农庄里面，就有平等权利。请女庄员同志们记住这一点，请她们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集体农庄制度。（鼓掌多时）

现在对于集体农庄中的**男女共青团员**说几句话。同志们，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青年应当接替我们老年人。青年应当举起我们的旗帜直到胜利的终点。农民中间有不少老年人背着旧包袱，带着旧习惯，怀念着旧生活。当然，他们不是时常都跟得上党，跟得上苏维埃政权的。我们的青年就不同了。他们没有背上旧包袱，所以他们最容易领会列宁的遗训。正因为青年最容易领会列宁的遗训，所以他们负有引导落后分子和动摇分子前进的使命。固然，青年缺乏知识。但是，知识是可以求得的。今天没有知识，明天就会有了。因此，你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列宁主义。男女共青团员同志们，学习布尔什维主义，引导动摇分子前进吧！少说空话，多做工作，你们就一定会成功。（鼓掌）

现在稍微谈谈**个体农民**。这里很少有人说到个体农民。但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个体农民了。不，不是这样一回事。个体农民还存在，决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因为他们是我们明天的集体农庄庄员。我知道有一部分个体农民已经完全堕落，跑去做投机买卖了。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庄员接受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时选择得很严格，有时根本就不接受他们。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是不容有异议的。但是另外还有更大的一部分个体农民，他们没有去做投机买卖，而以诚实的劳动取得自己的面包。这些个体农民也许并不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但是他们还没有加入。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还怀疑集体农庄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现在庄员中间有一种憎恨个体农民的心理。

当然，也应当了解庄员，处在庄员的地位来想一想。他们近几年来受到了个体农民不少的侮辱和讥笑。但是，侮辱和讥笑在这里不应当有重大的意义。不能忘掉侮辱而把自己的感情置于集体农庄事业的利益之上的领导者是一个不好的领导者。如果你们想做领导者，你们就应当善于忘掉个别个体农民给你们的侮辱。两年以前，我接到了一个寡居农妇从伏尔加寄来的信。她抱怨人家不愿意接受她加入集体农庄，要求我帮助她。我当时写信去问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给我回信说，他们不能够接受她加入集体农庄，因为她侮辱过集体农庄大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在一次农民大会上，庄员号召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这个寡妇听了号召之后就提起裙子说：给你们，把集体农庄拿去吧！（全场活跃，笑声。）

毫无疑问，这个寡妇做得不对，侮辱了大会。可是，既然她经过一年以后真诚悔过并承认了错误，能不能还拒绝接受她加入集体农庄呢？我认为不能拒绝。我就把这个意见写给集体农庄了。他们接受了这个寡妇加入集体农庄。结果怎样呢？原来她现在在集体农庄的工作队伍里不是站在后面，而是站在前列。（鼓掌）

这又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领导者如果想成为真正的领导者，那末当事业的利益需要他忘掉侮辱的时候，他就必须善于忘掉侮辱。

关于一般个体农民也必须这样说。我不反对接受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要加以选择。可是，我反对不加选择地堵死一切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道路。这不是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集体农庄庄员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在不久以前也曾经是个体农民。

最后，稍微谈谈**别金楚克区集体农庄庄员的一封来信**。这封信已经在报上发表，你们大概都读过了。这封信确实是很好的。它证明在我们的庄员中间有不少有经验有觉悟的集体农庄事业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骄傲。但是信里有一个不正确的地方，对于这

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意的。原来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把他们在集体农庄中的劳动看做平凡的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把那些往往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演说家和领袖们的劳动看做伟大的创造性的劳动。能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呢？不，同志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也许他们是由于谦虚而犯了这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因此就不算错误。把领袖看做唯一的历史创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设工厂、矿井、铁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创造一切生活资料，供给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我们的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大概把这一点忘记了。一个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夸耀自己的功绩，这是不好的。结果会造成妄自尊大，而妄自尊大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看不到自己的“平凡的”“不显著的”劳动实际上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劳动，那就更坏了。我希望别金楚克区的同志们接受我对他们那封信提出的这个小小的修正。

同志们，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经久不息的鼓掌，转为欢呼。全场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高呼“乌拉”。会场中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乌拉！先进的集体农庄庄员万岁！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载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真理报”第五十三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3卷第176—189页

和罗宾斯上校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简要记录）

斯大林：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呢？

罗宾斯：能够有机会拜访你，我认为是很大的荣幸。

斯大林：这没有什么特别。你过甚其词了。

罗宾斯（笑）：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我在俄国各地到处都发现列宁——斯大林、列宁——斯大林、列宁——斯大林两个名字连在一起。

斯大林：这也是过甚其词。我怎么能和列宁相比呢。

罗宾斯（笑）：说苏俄政府——人民委员会在这整个时期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政府，这也是过甚其词吗？

斯大林：这大概不是过甚其词。

罗宾斯：引人注意的和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向反动的方向走，列宁所创立的这个政府是强有力的。它反对一切敌对的路线。

斯大林：这是对的。

罗宾斯：在看五一游行的时候，我特别明显而强烈地感觉到俄国十五年来的发展，因为我看过一九一八年和现在一九三三年两次五一游行。

斯大林：最近我们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十五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罗宾斯：对于国家生活来说，对于苏维埃俄国在这期间达到这样巨大的进步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斯大林：我们本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做到。

罗宾斯：把两次游行的基本动机、基本方针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一九一八年的游行是对外的，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革命的号召。现在的动机不同了。现在男子、妇女和青年参加游行是为了说明：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将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来保卫的国家。

斯大林：那时的游行是鼓动性的，而现在的游行是总结性的。

罗宾斯：你大概知道，十五年来我一直关心两国之间建立合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并力求消除美国当政人士现有的敌对态度。

斯大林：我是在一九一八年从列宁的谈话中，以及后来根据一些事实知道这一点的。我知道这一点。

罗宾斯：我完全是以一个公民的私人身分到这里来的，并且代表我个人说话。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是要弄清楚两国关系的前途，弄清楚俄国工人的工作本领和创造发明能力方面的一些真正事实。反苏宣传说，俄国工人懒惰，俄国工人不会工作，机器到他们手里就完了，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对于这种宣传，我不仅要用言语而且要用手头已经掌握的事实来加以驳斥。

与此相联，使我感到兴趣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农业状况的问题。有些人硬说工业化破坏了农业，农民停止了播种，停止了收割庄稼。每年都有人断定说，俄国今年一定要饿死。我想知道一些农业方面的事实，以便驳斥这些论断。我希望看到今年第一次种上新作物的田地。我对苏联主要谷物的发展情况特别感到兴趣。

我感到兴趣的第三个问题是国民教育问题，是儿童和青年的发展，是他们的教育。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国民教育，即所谓创作天才和发明才能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美国有两种类型的创造，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创造，另一种是广泛的生活中的创造，即创造精神在生活中的表现。我感到兴趣的是儿童在怎样发展，青年在怎样发展。我希望实际看一看他们在怎样学习，他们在怎样受教育和怎样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我已经得到了一些宝贵的材料，并希望以后能得到一些补充材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关于农业的发展问题，我希望在旅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时候和从那里到罗斯托夫、哈尔科夫的往返途中能够看到真正的事实。我希望参观一下集体农庄，并且看一看古代的农耕地交错现象是怎样消灭的，大农业是怎样发展的。

斯大林：你需要我的意见吗？

罗宾斯：是的，我想知道你的意见。

斯大林：关于苏联工人似乎不会使用机器并破坏机器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我对这一点必须说明：我国没有像西欧和美国所有的那种现象，在那里，工人因为机器夺去了他们的面包而有意识地破坏机器。我们的工人不这样对待机器，因为我们是在没有失业的情况下大量采用机器的，因为机器在我国并不是像在你们国家那样夺去工人的面包，而是减轻他们的劳动。至于工人工作不熟练，缺少文化，那末这是事实，我国有文化的工人很少，而且他们不像欧洲或美国的工人那样善于使用机器。不过这是我们的暂时现象。例如，如果研究一下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哪里的工人学会掌握新技术更快些，是欧洲的工人，是美国的工人，还是五年来俄国的工人，那末我认为是俄国的工人学会得更快些，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西方的技术当然是发达的，但是在那里掌握轮式拖拉机的制造却花了好几年时间。我们掌握这种事业就快些。例如在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在不过十二个月至十四个月的时间内就掌握了拖拉机的制造。现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不仅完成设计能力，不仅一天制造一百四十四台拖拉机，而且有时候制造一百六十台，也就是说，超过了设计能力。我是拿这个做例子的。我国的拖拉机工业是新的工业，这种工业从前是没有的。航空工业也是新的精细的事业，也很快就被掌握了。从掌握的速度来看，汽车工业

的情况也相似。机床制造业也是这样。

在我看来，这样迅速地掌握了机器的制造并不是因为俄国工人有特别的才能，而是因为生产事业，比如说，飞机、飞机发动机、拖拉机、汽车、机床等的制造，在我国不是被看做私人的事业，而是被看做国家的事业。在西方，工人进行生产是为了领取工资，而把其他一切都搁在一边。在我们这里，生产被看做公共的事业，国家的事业，被看做光荣的事业。这就是我们这样迅速地掌握了新技术的原因。

我总认为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说某个民族的工人似乎没有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如果从种族观点来看问题，那末在美国，比如说，黑人被认为是“下等人”，但是他们掌握技术并不比白种人差。任何民族的工人掌握技术的问题都不是生物学问题，也不是遗传问题，而是时间问题：今天掌握不了，明天就能学会并能掌握。不论什么人，连布西门人也在内，只要帮助他，就能掌握技术。

罗宾斯：还需要有掌握技术的志向和愿望。

斯大林：当然。俄国工人的志向和愿望是绰绰有余的。他们认为掌握新技术是光荣的事情。

罗宾斯：这一点我在你们的工厂里已经感觉到了，我在那里看到了由于社会主义竞赛而产生的新的热情和新的志向，这决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因为工人期待于自己的工作的是某种比金钱所能给予的更好更多的东西。

斯大林：这是对的。这是光荣的事情。

罗宾斯：我要把那些表明工人发明和工人创造性建议增加情况的图表带回美国，这些发明和建议改造了生产，给生产节约了大量资金。我看到了许多工人发明家的照片，他们在改进生产和节约资金方面给了苏联很大的贡献。

斯大林：这样的工人在我国出现得相当多，这都是很有才能的人。

罗宾斯：我到过你们莫斯科所有的大工厂——“阿模”汽车制造

厂、滚珠轴承工厂、“铣刀”工厂以及其他工厂，我到处都看到提高工人发明的组织。这许多工厂里的工具车间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这些工具车间为自己的工厂制造极贵重的工具，这些车间的工人尽自己的全部能力紧张地工作，表现出他们的全部创造主动性，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斯大林：尽管如此，我们也有许多缺点。我们的熟练工人很少。可是我们需要有很多这样的工人。我们的技术人员也很少。技术人员的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是仍然跟不上需要。美国人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这是应当承认的。他们比别人更好更勇敢地帮助了我们。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他们。

罗宾斯：我在你们的企业中看到了一种国际主义，它给了我很强烈的印象。你们工厂的领导方面愿意采用任何国家——法国、美国、英国或者德国的技术成就，而对这些国家没有任何偏见。我觉得正是这种国际主义会使你们有可能把其他国家的机器的一切优点集中到一种机器上，而制造出更完美的机器。

斯大林：会这样的。

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关于工业化似乎破坏了农业的问题。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工业化没有破坏而是挽救了我国的农业，挽救了农民。我国在几年以前还存在着非常分散的细小的和极细小的农民经济。由于土地日益分散，农民的份地小到简直没有地方放一只鸡。如果再加上木犁和瘦马这一类不仅不能开垦生荒地，甚至连普通不很松的土地都耕不了的原始农具，你就可以想像到农业衰落的情景了。三四年前，我们苏联大约有七百万部木犁。农民只有两条道路：或者躺下等死，或者转而采用使用土地的新形式，采用机器耕地的方法。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维埃政权及时向农民发出的号召，把自己的小块土地联合为大块土地、使用政府的拖拉机来耕种这些土地、使用政府的收割机和脱谷机来收割庄稼和打粮食的号召得到了农民极其热烈

的响应。很明显，农民接受了苏维埃政府的建议，开始把自己的小块土地联合为大块土地，使用了拖拉机和其他机器，从而走上了使农业成为大农业的广阔道路，走上了根本改进农业的新道路。

由此可见，实行工业化的结果，农民得到了拖拉机和其他机器，工业化挽救了农民，挽救了农业。

整个村子的小农户联合为大农庄的过程我们就叫做集体化，而联合起来的大农庄本身则叫做集体农庄。我国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是国有的，这大大有助于集体化。土地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我国也就没有土地买卖，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集体农庄的建立和发展。

我不是想以此说明，所有这一切，即集体化和其他等等，在我们这里进行得都很顺利。困难当然是有的，而且并不少。集体化像任何一件大的新事业一样，不仅有朋友，而且也有敌人。虽然如此，拥护集体化的农民还是占绝大多数，而集体化的敌人却愈来愈少了。

罗宾斯：任何一种前进都需要相当的代价，这一点我们是注意到并且估计到了的。

斯大林：虽然有这些困难，但是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而且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丝毫不容置疑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承认了农业集体化已经成为不会改变的事实，而大多数农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所以这是已经赢得的成果。现在我国农业中的主要形式是集体农庄。如果拿播种或收割的数字来看，拿粮食生产的数字来看，目前个体农民的谷物收获量只不过占谷物总收获量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余部分都是集体农庄生产的。

罗宾斯：我关心一个问题：是不是去年的收割工作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是不是现在的播种运动进行得令人满意，而去年的收割工作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

斯大林：去年的收割工作不如前年那样令人满意。

罗宾斯：我读过你的演说词，根据这个演说词，我想今年的收割工作一定会比较顺利。

斯大林：很可能，今年的收割工作会好得多。

罗宾斯：你们能把农业工业化，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想你对这个极大的成就的估价是不会比我低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都遭受着深刻的危机并需要工业化。各资本主义国家总算还能够解决工业生产问题，但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解决不了农业问题。苏联的巨大成就，是它已经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且正在胜利地解决这个任务。

斯大林：是的，这是事实。

我们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和缺点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三个问题，关于儿童和一般青年的教育问题。我们的青年是好的，是朝气勃勃的。我们的国家不同于其他一切国家，它不惜金钱来很好地抚育儿童，来很好地教育青年。

罗宾斯：美国有人认为你们用一种固定的界限来限制儿童的发展，而这些界限使得儿童没有发展创造精神的自由，没有发展智力的自由。你不认为发展创造精神的自由和表现一个人内在的东西的自由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吗？

斯大林：第一点，关于限制的说法是不对的。第二点是对的。毫无疑问，在闭塞和狭隘限制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的自由，也没有对主动精神的鼓励，儿童是不能发展自己的才能的。至于青年，已经给他们打开了一切道路，青年在我们这里可以自由地深造。

在我们这里，不打儿童，很少处罚他们，让他们能够自己选择他们所喜爱的东西，让他们能够走上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我认为任何地方都不像我们苏联这样关心儿童，关心儿童的教育和发展。

罗宾斯：能不能认为，新一代的人摆脱了贫困的压迫，摆脱了经济条件的恐怖，结果必然会造成创造力的新繁荣，造成新艺术的繁荣，

造成从前受这一切桎梏所束缚的文化和艺术的新高涨呢？

斯大林：这无疑是对的。

罗宾斯：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了解也不特别多，但是我希望美国参加、有可能参加苏维埃俄国这里所进行的发展事业，希望美国人通过承认、通过提供信贷、通过建立两国之间的正常的相互关系（比如在远东的相互关系）来获得这种可能，希望你们这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得到保障，希望这种伟大事业能够胜利完成。

斯大林（微笑）：谢谢你的好意。

罗宾斯：参议员波拉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在美国国家领导者中间是苏联最坚决的朋友，是争取承认苏联的战士。

斯大林：这是对的，他对我们两国之间建立正常关系这件事是很关心的。但是很遗憾，目前他还没有取得成就。

罗宾斯：我相信，一切实际事实现在对我们两国之间建立正常的相互关系所起的作用，比最近十五年来任何时候所起的作用都有力得多。

斯大林：这是对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在从中阻挠，依我看来，英国在从中阻挠。（笑）

罗宾斯：无疑是这样的。但是情况毕竟迫使我们首先从自己本身的利益出发，并且我们本身的利益和其他国家推动我们去做的事情之间的冲突，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能推动美国去建立这种相互关系。我们关心美国出口事业的发展。直到现在还没有被谁真正利用过的具有很大容量的唯一大市场就是俄国市场。美国的实业家如果愿意，就会提供长期信贷。他们关心远东的安宁，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像和苏联建立正常的相互关系那样能促进这种安宁。在这方面，李维诺夫先生在日内瓦所做的关于侵略国定义问题的声明，是同曾经在和平问题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布利安—凯洛格公约的方针完全符合的。美国所关心的是全世界相互间的经济关系的稳定，我们很清楚地懂得，只要苏联还

处在整个经济体系之外，就不能有相互间的正常的经济关系。

斯大林：这一切都是对的。

罗宾斯：我过去是而且始终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乐观主义者。还在十五年以前，我就信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袖。当时人们把他们说成是德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其中也把列宁看做是德国的代理人。但是，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列宁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和最伟大的领袖。

我希望我所得到的第一手的消息也许能促进我所说过的两国之间亲密合作的那个计划的实现。

斯大林（含笑）：但愿如此。

罗宾斯（笑）：如果你按美国人的说法，你就会说，“但愿我的胳膊有更大的力量”。说这句话的人不相信他的胳膊有很大的力量。

斯大林：就算这样吧。

罗宾斯：我认为参加创造新世界，参加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再高尚再伟大不过了。参加创造和建设新世界这件事实不仅在现在，而且从今后几千年看来，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斯大林：这个事业毕竟是很困难的。（笑）

罗宾斯（笑）：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关心。

斯大林：谢谢你，你过了十五年还记得苏联，并且来访问它。

（两人同笑，罗宾斯鞠躬告别。）

第一次刊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4—202页

和“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先生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杜兰特：你是不是同意通过“纽约时报”向美国人民讲几句话？

斯大林：不，加里宁已经做过了，我不能侵犯他的特权。

如果说到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那末我对恢复邦交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当然是满意的，因为从政治上来说，它增加了维护和平的可能，从经济上来说，它消除了偶然因素，使我们两国有可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讨论双方所关心的问题；最后，它为互相合作开辟了道路。

杜兰特：在你看来，苏美贸易额可能达到多少？

斯大林：李维诺夫在伦敦经济会议上所讲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并准备定购大批货物，支付货款。但是，我们需要有利的信用条件，而且我们必须有能够偿还贷款的把握。我们不能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按期付款的把握是不愿意定货的。

大家都奇怪，我们还在支付，而且能够支付。我知道现在通常都不偿还贷款了。但是我们在偿还贷款。其他国家都停止支付了，但是苏联没有这样做，而且将来也不会这样做。许多人认为我们不能够支付，我们拿不出什么来支付，但是我们向他们表明了我们是能够支付的，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杜兰特：苏联开采黄金的情况怎样？

斯大林：我们有很多产金区，它们在迅速发展。我们的产量已经超过沙皇时代一倍，现在一年的产值在一亿卢布以上。特别是在最近

两年，我们改进了勘探工作方法，发现了巨量储藏。但是，我们的工业还年轻，不仅炼金工业，就连钢铁工业和炼铜工业，整个冶金工业都还年轻，我们年轻的工业暂时还没有力量给炼金工业以应有的帮助。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快的，但是产量还不高。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采金用的洗矿机和其他机器，我们就能在短时期内使采金量增加三倍。

杜兰特：苏联在国外的债务总额是多少？

斯大林：四亿五千万卢布多一点。我们在最近几年偿还了很大的数目，两年以前，我们的债务是十四亿。所有这些债务我们已经在偿还，到一九三四年末或一九三五年初将按期分批偿清。

杜兰特：假定说，对苏联的支付决心已经不必怀疑，但是苏联的支付能力怎样呢？

斯大林：在我国，前者和后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因为我们不借不能偿还的债务。请看一看我们和德国的经济关系。德国曾经宣布缓期偿还它的大部分外债，我们也可以援引德国的先例，用完全相同的办法对待德国。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们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依赖德国的工业了。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我们所需要的设备。

杜兰特：你对美国的看法怎样？我听说你和布里特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你对他的看法怎样？你是不是还像三年前一样，认为我们的危机（如同你当时对我说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

斯大林：布里特给我和我的同志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时常听列宁讲到他，列宁也是喜欢他的。我喜欢他的是：他讲话不像一般外交家，他是一个直爽的人，他想什么就说什么。一般说来，他在这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从各方面看来，罗斯福是一位果断而刚毅的政治家。有一种叫做唯我论的哲学体系，它的内容是：一个人不相信外界的存在，只相信我自己。很久以来就表明美国政府信奉这种哲学体系，不相信苏联的存在。但是，罗斯福显然不是这种古怪理论的信奉者。他是一个现实

主义者，他知道现实就是他所看到的东西。

至于经济危机，它确实不是最后一次危机。当然，危机震撼了一切事业，但是近来似乎情况开始好转。可能经济衰落的最低点已经过去了。我不认为能够达到一九二九年的高涨，但是最近期间由危机过渡到萧条，到少许复苏（固然有某些上下起伏），不仅不是不可能的，而且简直是肯定的。

杜兰特：对日本怎样呢？

斯大林：我们希望和日本有良好的关系，但是遗憾得很，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如果明智的政策在日本占了上风，我们两国就能友好相处。但是，我们担心好战分子会把明智的政策排斥到后面去。这就是真正的危险，对这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任何一国的政府如果看到有遭受侵犯的危险而不作自卫准备，那末它的人民是不会尊重它的。我认为从日本方面来说，如果它进攻苏联，那是不明智的。它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好，它有薄弱的地方——朝鲜、满洲和中国，而且它未必能够指望在这个冒险行动中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可惜优秀的军事专家不一定是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一定能够把武器的力量和经济规律的力量区别开来。

杜兰特：对英国怎样呢？

斯大林：我认为和英国的贸易协定将会签订，经济关系将会发展，因为保守党应该懂得，他们阻碍同苏联的贸易是得不到一点好处的。但是，我怀疑在目前条件下，两国在贸易方面是否能够得到像预料那样大的利益。

杜兰特：你对意大利所提出的关于改革国际联盟的问题的态度如何？

斯大林：我们没有接到意大利关于这方面的任何建议，虽然我们的代表和意大利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杜兰特：你对国际联盟是不是任何时候都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

斯大林：不，不是任何时候也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这样。你大概不十分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国际联盟才能够成为制止或阻碍军事行动发生的一种因素。如果真是这样，如果国际联盟能够起微小的作用，哪怕只是使战争受到一点阻难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和平事业，那末我们也就不反对国际联盟。是的，如果历史事变的进程将是这样，那末尽管国际联盟有很大的缺点，我们也不会不支持它。

杜兰特：什么是目前苏联对内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扩大城乡间的商品流转，加强各种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怎样容易，可是比我们已经解决的那些问题要容易些，因此，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工业问题解决了。农业问题，即农民集体化这个最困难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了。现在必须解决商品流转和运输问题。

载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
“真理报”第四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3 卷第 204—207 页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和苏联的外部状况

同志们！自从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三年多了。时间并不很长。但是，这个时期的内容比其他任何时期都丰富。我认为在最近十年中，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像这个时期发生过这样多的事件。

在**经济**方面，这几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延续的年份。危机不仅笼罩了工业，而且也笼罩了整个农业。危机不仅在生产和商业范围内闹得很凶，而且也扩展到信用和货币流通范围，完全打乱了各国之间原有的信用关系和外汇关系。从前在某些地方还有人争论有没有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现在这一点已经没有人争论了，因为危机的存在和它的破坏作用已经十分明显了。现在人们所争论的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能够摆脱危机呢，还是没有出路；如果有出路，那该怎么办？

在**政治**方面，这几年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国家内部的关系更加尖锐化的年份。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了东北，使远东的关系尖锐化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复仇思想占了上风，使欧洲的关系尖锐化了；日本和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更加推动了军备的扩充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遭到失败，又一次证明了革命危机正在成熟，法西斯主义决不能长久存在，——这就是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最重要的事实。无怪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已奄

奄一息，而废除军备的趋势正在被扩充军备和补充军备的趋势所公开而直接地代替。

在这种经济震荡和军事政治灾祸的汹涌浪潮中，苏联却似中流砥柱，巍然屹立，继续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维护和平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经济危机仍然闹得很凶，而在苏联，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继续高涨。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正在疯狂地准备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新战争，而苏联却继续进行反对战争威胁和保卫和平的一贯而坚决的斗争，并且不能说苏联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得到任何成就。

目前国际形势的一般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主要材料。

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变动

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经济危机和以前所有的经济危机不同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延续得最久，拖得最长。从前的危机一两年就过去了，而目前的危机已经延续到第五个年头，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一年比一年衰落，并把它往年积累的脂膏消耗殆尽。无怪乎这次危机是所有一切危机中最严重的危机。

现在的工业危机为什么会空前持久呢？

首先，因为工业危机席卷了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使一些国家很难靠牺牲另一些国家来摆脱危机。

第二、因为工业危机和席卷了所有一切农业国和半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结果不能不使工业危机复杂和加深。

第三、因为农业危机在这期间加剧了，笼罩了所有一切农业部门（包括畜牧业在内），使农业退化，退到由机器改为手工劳动，退到用马匹代替拖拉机，退到大大减少人造肥料的使用，有时甚至完全不

用，结果使工业危机更加持久。

第四、因为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的卡特尔竭力保持高昂的商品价格，结果使危机特别严重，使积存商品的销售受到阻碍。

最后，这是主要的，因为这次工业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爆发的。这时候，不论在各主要国家里，或者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在战前和十月革命前有过的那种力量和巩固性；这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承受了帝国主义战争遗留下来的企业经常开工不足的现象和千百万人的失业大军，再也无力摆脱它们。

这就是决定目前的工业危机十分持久的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也说明危机为什么不仅限于生产和商业范围，而且也扩展到信用系统、外汇和债务范围等等，打破了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社会集团之间原有的传统关系。

商品跌价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不管垄断的卡特尔如何反抗，商品价格仍然以不可抗拒之势不断下跌，并且最先跌价和跌得最厉害的是那些没有组织的商品所有者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本家的商品，而那些有组织的商品所有者即联合为卡特尔的资本家的商品价格却跌得比较慢和比较少。价格下跌使债务人（工业家、手工业者、农民等）难以支持，相反地，却使债权人处于闻所未闻的特权地位。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许多公司和一些企业主遭到大破产。在最近三年中，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有几万个股份公司因此倒闭了。股份公司破产之后，就出现了通货贬值，这稍微减轻了债务人的困难。通货贬值之后，国家就把停止支付外债和内债合法化了。像德国的达姆斯塔德银行和德勒斯顿银行、奥国的信用机关银行这样一些银行的破产，像瑞典的克莱格尔康采恩、美国的殷苏尔康采恩这样一些康采恩的破产，都是大家知道的。

很明显，跟随着动摇了信用系统的基础的这些现象而来的一定是

而且实际上已经是信用和外债的停止支付、盟国之间的债务的停止支付、资本的停止输出、对外贸易的更加缩减、商品出口的更加减少、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的加剧、各国之间的商业战争以及倾销政策。是的，同志们，倾销政策。我说的不是欧洲和美国高贵的国会中某些高贵的议员不久以前还力竭声嘶地大叫大嚷的那种臆造的苏维埃倾销政策。我说的是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现在都在实行而这些勇敢的高贵的议员对之谨慎地保持沉默的那种真正的倾销政策。

同样很明显，这些伴随着工业危机而在生产范围之外爆发的破坏现象，不能不反过来影响工业危机的进程，使它加深和复杂起来。

这就是工业危机变动的一般情况。

现在看一看官方材料中说明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工业危机变动的一些数字。

工业总产值（以 1929 年为 100）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苏 联	100	129.7	161.9	184.7	201.6
美 国	100	80.7	68.1	53.8	64.9
英 国	100	92.4	83.8	83.8	86.1
德 国	100	88.3	71.5	59.8	66.8
法 国	100	100.7	89.2	69.1	77.4

显然，这个统计表是用不着加以说明的。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相比，是在逐年下降，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开始有些恢复，但是还远没有达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而苏联的工业却在逐年增长，不断高涨。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在一九三三年末的产值和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相比，平均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而苏联工业的产值在同一时期却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以上。（鼓掌）

根据这个统计表来看，也许会以为在四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英国的情况最好。但是这并不完全正确。如果拿这些国家的工业和战前水平比较一下，那末情况就有些不同了。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工业总产值（以战前水平为100）

	1913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苏 联	100	194.3	252.1	314.7	359	391.9
美 国	100	170.2	137.3	115.9	91.4	110.2
英 国	100	99.1	91.5	83	82.5	85.2
德 国	100	113	99.8	81	67.6	75.4
法 国	100	139	140	124	96.1	107.6

由此可见，英国和德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美国和法国稍微超过了战前水平，而苏联的工业产值在这个时期比战前水平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以上。（鼓掌）

从这两个统计表中还应该得出一个结论。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从一九三〇年起，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起，一直是在下降，一九三二年降到最低点，一九三三年才开始有些恢复和上升。如果拿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各月份的统计材料来看，那就更能证实这个结论，因为这些统计材料说明，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值虽然在一九三三年间起伏不定，可是并没有表现出有降低到一九三二年夏季所达到的最低点的趋势。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看来已经度过了最低点，在一九三三年内没有再回到这个最低点。

有些人喜欢说这种现象完全是由军事通货膨胀这一类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的。毫无疑问，军事通货膨胀在这里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对日本来说尤其正确，因为在日本，这种人为因素是引起某些工业部门

（主要是军事工业部门）稍微复苏的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力量。但是，如果用军事通货膨胀来解释一切，那就是严重的错误。这种解释所以不正确，至少是因为我所说明的工业中的某些进展不是在个别的和偶然的区域内看得到，而是在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内（其中包括通货稳定的国家）都看得到。显然，除了军事通货膨胀以外，资本主义的内部经济力量在这里也起着作用。

资本主义通过增加工人劳动强度来加紧剥削工人，实行把农民的劳动产品即粮食和一部分原料的价格压得极低的政策，把殖民地和经济力量薄弱国家的农民的劳动产品（主要是原料，其次是粮食）的价格压得更低。资本主义用这些方法来**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殖民地和经济力量薄弱国家的农民**而稍微改善了工业状况。

这是不是说现在的情况是从危机过渡到普通的萧条，从而会引起工业的新的高涨和繁荣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无论如何现在还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高涨即将到来。而且，根据一切情况看来，至少在最近这种材料是不会有的。所以不会有，是因为不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有稍微重大的发展的一切不利条件还继续发生作用。这些不利条件就是：这次经济危机所处的情况即资本主义总危机还在延续，企业经常开工不足，大批失业现象经常存在，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固定资本还没有那种通常可以预示高涨到来的稍微重大的更新趋势，以及其他等等。

显然，现在的情况是从工业的最低点，从最深刻的工业危机过渡到萧条，但不是过渡到普通的萧条，而是过渡到特种的萧条，它不会导致工业的新的高涨和繁荣，但也不会使工业回到最低点。

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状况的尖锐化

持久的经济危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的政治状况的空前尖锐化。

争夺国外市场斗争的加剧、自由贸易最后一点残余的消灭、禁止进口的关税、商业战争、外汇战争、倾销政策以及其他许多在经济政策上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的类似措施使各国之间的关系极端尖锐化，给军事冲突造成了条件，把战争这个利于更强的国家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手段提到日程上来了。

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了东北、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向华北推进使形势更加尖锐化。争夺太平洋斗争的加强和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海上军备的扩充就是这种尖锐化的结果。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复仇的魔影使欧洲形势更加尖锐化，使欧洲各国的军备更加扩充。

无怪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现在正苟延残喘，而废除军备的空谈正在被扩充军备和补充军备的“认真的”言论所代替。

现在又像一九一四年那样，好战的帝国主义的政党，战争和复仇的政党是最出风头的。

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状况也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而更加尖锐化。四年的工业危机已经把工人阶级弄得精疲力尽，痛苦不堪。四年的农业危机不仅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农民阶层完全破产，而且特别使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的无产农民阶层完全破产。不管在统计方面耍什么花招来故意缩小失业人数，但是根据资产阶级机关的官方材料，失业人数在英国仍达三百万，在德国仍达五百万，在美国仍达一千万，更不用说欧洲其他国家了。如果再加上人数超过一千万的半失业者，再加上千百万破产的农民群众，那就可以看到劳动群众的贫困和痛苦的大概情景了。人民群众虽然还没有达到向资本主义冲击的地步，但是冲击的思想已经在群众意识中成熟起来，这是几乎用不着怀疑的。西班牙革命推翻了法西斯制度，中国的苏区正在扩大，而中国资产阶

级和外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势力阻止不住这种扩大，这些事实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也就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什么正在竭力设法把能够被工人阶级利用来反对压迫者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后一点残余消灭，或使之化为乌有，把共产党逼入地下，并采取公开的恐怖手段来保持自己的专政。

把沙文主义和准备战争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要素，在对内政策方面把镇压工人阶级和实行恐怖手段作为巩固未来战场的后方的必要手段，——这就是现代帝国主义政治家目前所特别关心的。

无怪乎法西斯主义在好战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中间现在成了最时髦的商品。我指的不仅是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而首先是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这个法西斯主义叫做国家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即使经过最精密的检查，也不能在它里面发现一点点社会主义的成分。

因此，不仅应当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看做工人阶级软弱的表现，看做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应当把它看做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看做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因而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现，看做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在和平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因而不得不采用战争政策的表现。

情况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作为摆脱现状的出路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当然，没有根据可以推断说，战争能给予真正的出路。恰恰相反，战争必然会使情况更加混乱。而且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问题，就像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如果资产阶级政治家不顾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教训，还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抓住战争，那就是说，他们已

经糊涂透顶，已经走入绝境，准备急速地跳进深渊。

因此，不妨简略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正在制定的那些发动战争的计划。

有一些人认为应当对某一个强国发动战争。他们想把这个国家打得一败涂地，靠牺牲它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假定说，他们发动了这样的战争。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人们也曾经想消灭一个强国——德国，靠掠夺它来发财致富。可是结果怎样呢？他们并没有把德国消灭，却在德国种下了对战胜国的强烈仇恨，并为复仇思想造成了肥沃土壤，以致他们直到现在还不能，而且大概也不是很快就能把他们自己搞得一团糟的事情处理好。他们所得到的却是资本主义在俄国被粉碎，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以及——当然的事——苏联的成立。有什么可以保证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会使他们得到比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更好的”结果呢？做相反的推断不是更正确吗？

另一些人认为应当对某一个军事方面软弱而市场广大的国家发动战争，例如对中国发动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国家，它不过是一个需要由强国去占领的“无组织的地区”。他们显然想完全瓜分中国，靠牺牲它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假定说，他们发动了这样的战争。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大家知道，在十九世纪初叶，人们对意大利和德国的看法正像现在对中国的看法一样，就是说，他们认为意大利和德国是“无组织的地区”，而不是国家，并对它们进行了奴役。可是由此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大家知道，结果是德国和意大利都进行了争取独立的战争，都统一成了独立的国家。结果是这两国人民对奴役者的仇恨心理加强了，其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而且大概也不会很快就消除。试问，有什么可以保证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战争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呢？

还有些人认为应当发动“优等种族”，比如说日耳曼“种族”，对“劣等种族”，首先是对斯拉夫人的战争，认为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给予摆脱现状的出路，因为“优等种族”负有扶植“劣等种族”和统治它们的使命。假定说，他们把这个同科学有天壤之别的奇怪理论变成了实践。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大家知道，古罗马帝国对现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的祖先的看法正像现在“优等种族”的代表人物对斯拉夫种族的看法一样。大家知道，古罗马帝国把德国人和法国人鄙视为“劣等种族”，“野蛮人”，认为他们应该永远服从“优等种族”，服从“大罗马帝国”。在我们内部可以说说，古罗马帝国这样做还有一些理由，而现在的“优等种族”的代表人物就不然了。（掌声如雷）结果怎样呢？结果是非罗马人，即所有的“野蛮人”都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以雷霆万钧之势把罗马帝国推翻了。试问，有什么可以保证现在的“优等种族”的代表人物的野心不会遭到同样悲惨的结局呢？有什么可以保证柏林的那些舞弄文墨的法西斯政治家会比罗马帝国的老练的征服者更幸运呢？做相反的推断不是更正确吗？

最后，还有些人认为应当对苏联发动战争。他们想击溃苏联，瓜分它的领土，靠掠夺它来发财致富。如果以为只是某些日本军人有这种想法，那就错了。我们知道，欧洲某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物也在制定这样的计划。假定说，这些先生们由言论转入了行动。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几乎用不着怀疑，这种战争对资产阶级将是最危险的战争。所以将是最危险的战争，不仅因为苏联各族人民将为保卫革命果实进行殊死战斗，还因为战争不仅将在前线进行，而且将在敌人的后方进行。资产阶级用不着怀疑，苏联工人阶级在欧洲和亚洲的无数朋友一定会从后方竭力打击本国的压迫者，因为他们向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挑起了罪恶的战争。如果资产阶级先生们在这场战争的第二天便失去了几

个和他们亲近的、现在“靠上帝保佑”得以平安统治着国家的政府，那就请他们不要埋怨我们。（掌声如雷）

你们大概还记得，这样的反苏战争在十五年前已经有过一次。大家知道，人人尊敬的邱吉尔当时给那次战争冠上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十四国进军”。你们当然记得，那次战争把我国全体劳动者团结成了挺身抵御外敌以保卫自己工农祖国的英勇战士的统一营垒。那次战争的结果你们是知道的。结果是把武装干涉者从我国赶出去了，并在欧洲成立了许多革命的“行动委员会”。几乎用不着怀疑，第二次反苏战争一定会使侵略者遭到完全失败，使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爆发革命，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垮台。

头脑糊涂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的军事计划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他们既不聪明，也不勇敢。（鼓掌）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选择了战争的道路，那末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四年的危机和失业弄得痛苦不堪的工人阶级就会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是说，革命危机正在成熟并将日益成熟。资产阶级陷入自己的战争圈套愈深，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愈频繁，革命危机就成熟得愈快。

有些同志认为：既然有革命危机，资产阶级就必然会陷入没有出路的境地，因此，资产阶级的死亡已经预定，革命的胜利已经有了保证，他们只要等待资产阶级的灭亡和起草胜利的决议就行了。这是很大的错误。革命的胜利从来不是自行到来的。它是需要准备和争取的。而能够准备和争取它的，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时候，形势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根本动摇了，而革命的胜利还是没有到来，

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果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那就愚蠢了。

说到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的一段关于革命危机的至理名言：

“现在我们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普遍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英国人文雅的说法把这个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不安宁’；另一种是革命家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资产阶级现在像一只狂妄无耻的失去理性的野兽，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情况尖锐化，加速自己的死亡。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证明’资产阶级绝对没有任何可能用某些微小的让步来麻醉某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来镇压某一部分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某种运动或起义。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那就是空洞的学究主义，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个问题和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遭受着最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必须用革命政党的实践来‘证明’这些革命政党具有充分的觉悟性、组织性、与被剥削群众的联系、果断精神和才能，足以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顺利的革命，进行胜利的革命。”（“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〇二页至第二〇三页）

三、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很容易理解，在这种战云密布的险恶情势下，苏联执行自己的和平政策是多么困难。

在这种战争前的狂热已经笼罩着许多国家的情况下，苏联在这些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的和平立场上，反对战争威胁，维护和平，欢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主张维护和平的国家，揭穿那些准备战争和挑拨战争的人并摘下他们的假面具。

苏联在这个困难而复杂的保卫和平的斗争中指靠什么呢？

（甲）指靠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

（乙）指靠深切需要维护和平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的道义上的支持。

（丙）指靠那些由于某种动机不愿意破坏和平而愿意和苏联这样一个有信用的主顾发展贸易关系的国家的审慎态度。

（丁）最后，指靠我们的决心抵御外来袭击以保卫祖国的光荣军队。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我们争取同邻国缔结互不侵犯公约和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的运动。你们知道，这个运动是有成绩的。大家知道，我们不仅同我们西方和南方的大多数邻国（其中包括芬兰和波兰）缔结了互不侵犯公约，而且同法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缔结了互不侵犯公约，我们还同这些邻国（包括小协约国在内）订立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巩固了苏联和土耳其的友谊，改善了苏联和意大利的关系并达到了确实令人满意的地步，改善了和法国、波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关系，恢复了和美国、中国的关系等等。

从反映苏联和平政策的成就的许多事实中应当指出两件确实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

（一）首先，我指的是近来苏联和波兰的关系以及苏联和法国的关系的好转。大家知道，从前我国和波兰的关系是不大好的。在波兰，有人杀害过我国的代表。波兰曾经以西方各国的反苏壁垒自居。所有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打算在武装侵犯苏联时利用波兰来做前锋。苏联和法国的关系也不见得好些。只要回忆一下在莫斯科审判拉姆津暗害集团时的一些事实，就可以想起当时苏联和法国的相互关系了。而现在这种令人不快的关系已开始逐渐消失。它正在被另一种关系，即只能说是彼此接近的关系所代替。

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同这些国家订立了互不侵犯公约，虽然这些公约本身具有极重大的意义。问题首先在于互相猜疑的空气已开始消散。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把这种走向接近的过程看做十分稳固的、能够保证最后成功的现象。突然事变和政策上的曲折变化，例如在反苏情绪仍然强烈的波兰，还远不能认为是不会有的。但是，我们两国关系的好转，不管它将来的结果如何，作为促进和平事业的因素来说，总是一件值得指出并加以推进的事实。

这种转变的原因何在，它是由什么促成的呢？

首先是由于苏联的实力和威力的增长。

在我们这个时代，通常是不尊重弱者，只尊重强者的。

其次是由于德国的政策有某些改变，这些改变反映出德国复仇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绪的增长。

有些德国政治家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苏联现在采取了指靠法国和波兰的方针，说苏联已经由凡尔赛条约的反对者变成了它的拥护者，说这种变化是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这是不对的。当然，我们决不会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而喜不自胜。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这至少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妨碍苏联和这个国家建立最好的关系。问题也不在于我们像人们所臆造的那样对凡尔赛条约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我们受过布列斯特和约的耻辱，是不会赞美凡尔赛条约的。我们只是不赞成世界由于这个条约而被卷入新战争的漩涡。关于臆造苏联改变了方针的问题也应当这样说。我们并没有指靠过德国，正像我们现在并没有指靠波兰和法国一样。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指靠苏联自己，而且仅仅指靠苏联自己。（热烈鼓掌）如果苏联的利益要求我们和某些不愿意破坏和平的国家接近，那末我们就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不，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德国的政策改变了。问题在于还在目前的德国政治家上台执政以前，特别是在他们上台执政以后，德国

就已经展开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即旧政策和“新”政策之间的斗争：旧政策反映在苏联和德国订立的一些大家知道的条约中，而“新”政策基本上和一度占领过乌克兰、进攻过列宁格勒并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变成了这一进攻的桥头堡的德皇的政策相似，并且“新”政策显然占了上风。拥护“新”政策的人在各方面都占优势，拥护旧政策的人却处在不得志的地位，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胡根堡在伦敦发表的尽人皆知的言论也不是偶然的，德国执政党对外政策的领导者罗森堡发表的同样尽人皆知的声明也不是偶然的。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

（二）其次，我指的是苏联和美国之间正常关系的恢复。毫无疑问，这件事在整个国际关系中具有极重大的意义。问题不仅在于这件事增加了维护和平事业的机会，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打下了相互合作的基础。问题在于这件事在新旧两个时期之间立下了界标：在旧时期中，各国把美国当做一切反苏趋向的堡垒，而在新时期中，这座堡垒已经自愿拆除以适应两国双方的利益。

这就是反映苏联和平政策的成就的两个主要事实。

但是，如果以为我们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一切都很顺利，那就不正确了。不，我们还远不是一切都很顺利的。

你们可以回忆一下英国所使用的压力：对我国出口货实行禁运，企图干涉我国内政，以此摸我们的底，试探我们的抵抗能力。固然，这种企图毫无结果，禁运后来也取消了，但是这些袭击行动所留下的不快之感，至今还在有关英苏关系的一切方面（包括贸易协定的谈判在内）都令人感觉得到。而这些对苏联的袭击行动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大家知道，有一部分英国保守党人不进行这种袭击就不能过日子。正因为这些袭击行动不是偶然的，我们就应当估计到他们今后还会袭击苏联，制造种种威胁，使苏联受到损害等等。

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苏联和日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大加改善的必要。日本拒绝签订它和苏联同样需要的互不侵犯公约，这就又一次有力地证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并不很好。关于中东铁路谈判的中断（这是不能归咎于苏联的），以及关于日本的代理人在中东铁路上所干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非法逮捕中东铁路上的苏联职员等等，也应当这样说。至于日本有一部分军人在另一部分军人明目张胆的赞同下在报刊上公开鼓吹必须和苏联作战并侵占沿海区，而日本政府不但不叫这些战争挑拨者守规矩，反而装成和这件事无关的样子，那就更不用说了。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造成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当然，我们今后仍然要坚决执行和平政策并力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愿意改善这种关系的。但是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因此，我们应当同时采取一切措施保卫我们的国家以防备突然事变，随时准备捍卫我们的国家以抵御侵犯。（热烈鼓掌）

由此可见，除了我们的和平政策的成就以外，我们还有一些不好的现象。

苏联的外部状况就是这样。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它是维护和平并加强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的政策。苏联不想威胁任何人，更不想侵犯任何人。我们主张和平并捍卫和平事业。但是我们不怕威胁，我们准备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热烈鼓掌）谁愿意和平并力求和我们建立事务联系，谁就一定会得到我们的支持。而那些企图侵犯我国的人会遇到毁灭性的回击，使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把自己的猪鼻嘴伸到我们苏联的菜园子里来。（掌声如雷）

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这样。（掌声如雷）

任务在于今后仍然要十分坚决而彻底地执行这个政策。

二 苏联国民经济的继续高涨和内部状况

现在谈谈苏联的内部状况问题。

从苏联的内部状况来看，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无论在国民经济方面或在文化方面都呈现着日益扩展的高涨景象。

这个高涨不仅是单纯的数量上的力量积累。这个高涨的特色是它使苏联的结构发生了原则性的变化，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掉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它由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了（确切些说，正在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广泛地设立了用苏联各民族语言来教学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创立了各种新的生产部门：机床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化学工业，发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联合收割机制造业，大型涡轮和发电机、优质钢、铁合金、合成橡胶、氮、人造纤维的生产等等部门。（鼓掌多时）

在这个时期内，几千个完全现代化的新工业企业建成并开工生产了。像德涅泊水电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工厂、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制造厂、波布里克动力化学联合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器制造厂这样一些大型企业建成了。几千个旧企业在新技术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在苏联各民族共和国和各边疆地区，例如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布里亚特—蒙古、鞑靼、巴什基里亚、乌拉尔、西伯利亚东部、西伯利亚西部、远东等地方，建成了许多新企业，创立了许多工业基地。

成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五千多处国营农场，并为它们建立

了新的区中心和工业区。

在几乎是荒野的地方出现了居民众多的新的大城市。旧的城市和工业区也大大发展了。

把库兹涅茨克的炼焦煤和乌拉尔的铁矿石结合起来的乌拉尔—库兹涅茨克联合厂的基础已经奠定了。于是我国东部新的钢铁基地可以说已经由理想变成了现实。

在乌拉尔山脉西面和南面的斜面区，即在乌拉尔区、巴什基里亚和哈萨克斯坦一带，新的强大的石油基地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显然，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家投入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六百多亿卢布巨额基本投资并没有白投，它已经开始产生果实了。

由于这些成绩，苏联的国民收入已经由一九二九年的二百九十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亿卢布，而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在同一时期内都锐减了。

很明显，所有这些成绩和这个高涨必然会使而且实际上已经使苏联内部状况更加巩固起来。

在一个技术落后、文化落后的幅员广阔的国家里怎么会在短短三四年内发生了这些巨大的变化呢？这不是怪事吗？如果这种发展是在资本主义和个体小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那才真是怪事。可是，如果注意到我国的这种发展是在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产生的，那就不能说是怪事了。

很明显，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在数千万人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比资本主义和个体农民经济体系占优势的基础上，这种雄伟的高涨才能扩展起来。

因此，毫不奇怪，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苏联的经济和文化的蓬勃高涨同时也就是资本主义成分的消灭和个体农民经济的被排挤到后面去。事实是：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比重在工业方面占百分之九十九，在农业方面，如果按谷物播种面积来说，占百分之八十四点五，

而个体农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只不过百分之十五点五。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在苏联已经被消灭，而个体农民经济在农村中已经被排挤到次要地位。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施行时指出，我国有五种社会经济成分：（一）宗法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经济），（二）小商品生产（大多数是出卖粮食的农民），（三）私人资本主义，（四）国家资本主义，（五）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结果一定是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我们现在可以说，第一种、第三种和第四种社会经济成分已经不存在了，第二种社会经济成分已经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了，而第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成分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独占统治地位的唯一的领导力量。（热烈鼓掌多时）

总结就是这样。

这个总结就是苏联内部状况稳固的基础，就是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前方阵地和后方阵地坚固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联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各个问题的具体材料。

一、工业的高涨

在我国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发展最快的是工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即从一九三〇年起，我国工业增加了一倍多，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六，而和战前水平相比则几乎增加了三倍，即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一点九。

这就是说，我国工业化是开足马力进行的。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值中占了首要地位。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百分数

（按1926—1927年度的价格计算）

	1913年	1929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一、工业（小工业除外）	42.1	54.5	66.7	70.7	70.4
二、农业	57.9	45.5	33.3	29.3	29.6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这就是说，我国已经稳固地最终成为工业国了。

工业发展总额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的增长在工业化事业方面具有决定的意义。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材料表明，这一项的比重在工业总额中占了主要地位。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大工业两类主要部门产值的比重

（按1926—1927年度的价格计算）

	总产值（单位10亿卢布）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全部大工业	21	27.5	33.9	38.5	41.9
其中：					
（甲类）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10.2	14.5	18.8	22	24.3
（乙类）消费品	10.8	13	15.1	16.5	17.6
比重（百分比）					
（甲类）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48.5	52.6	55.4	57	58
（乙类）消费品	51.5	47.4	44.6	43	42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显然，这个统计表是用不着解释的。

在我们这个技术还年轻的国家里，工业负有特别的任务。它不仅应当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自己，不仅应当改造包括轻工业、食品工业和森林工业在内的一切工业部门，它还应当改造各种运输业和一切农业部门。可是只有当机器制造业这个改造国民经济的基本杠杆在工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时候，工业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材料表明，我国的机器制造业在工业总额中已经起主导作用了。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各个工业部门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百分数

	苏联			
	1913 年	1929 年	1932 年	1933 年
煤矿工业	2.9	2.1	1.7	2
炼焦工业	0.8	0.4	0.5	0.6
采油工业	1.9	1.8	1.5	1.4
炼油工业	2.3	2.5	2.9	2.6
钢铁工业	未详	4.5	3.7	4
有色金属工业	未详	1.5	1.3	1.2
机器制造工业	11	14.8	25	26.1
基本化学工业	0.8	0.6	0.8	0.9
棉纺织工业	18.3	15.2	7.6	7.3
毛纺织工业	3.1	3.1	1.9	1.8

这就是说，我国工业是在健全的基础上发展着，而改造的钥匙——机器制造业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只是必须善于利用它，合理地利用它。

按社会部分来看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工业的发展是很有意思的。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大工业总产值按社会部分分配表

（按1926—1927年度的价格计算）

	总 产 值（单位百万卢布）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全部产值	21、025	27、477	33、903	38、464	41、968
其中：					
一、公营工业	20、891	27、402	未详	38、436	41、940
其中：					
（甲）国营工业	19、143	24、989	未详	35、587	38、932
（乙）合作社营工业	1、748	2、413	未详	2、849	3、008
二、私营工业	134	75	未详	28	28
	百 分 比				
全部产值	100	100	100	100	100
其中：					
一、公营工业	99.4	99.7	未详	99.93	99.93
其中：					
（甲）国营工业	91.1	90.9	未详	92.52	92.76
（乙）合作社营工业	8.3	8.8	未详	7.41	7.17
二、私营工业	0.6	0.3	未详	0.07	0.07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已经消灭，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现在是我国工业中唯一的垄断的体系。（鼓掌）

但是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工业所取得的一切成绩中，最重要的成绩要算是工业在这期间培养和造就了成千上万新的工业人材和新的工业领导者，大批新的工程师和技师，几十万掌握了新技术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前进的年轻的熟练工人。毫无疑问，没有这些人材，工业就不会有它现在有权引以自豪的这些成就。材料说明，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工厂艺徒学校培养出来参加工业生产的大约有八十万比较熟练的工人，高等技术学校、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来的有十八万多工程师和技师。如果说干部问题确实是我国发展中最严

重的问题，那就应当承认我们的工业已经开始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国工业的主要成绩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以为工业只有成绩，那就不正确了。不，它也有缺点。其中主要的是：

（甲）**钢铁工业**仍然落后；

（乙）**有色金属工业**没有整顿好；

（丙）对于发展**地方煤矿**采掘事业（莫斯科附近地区、高加索、乌拉尔、卡拉干达、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远东、北方边区等地）在全国燃料总平衡表中的极重大的意义估计不足；

（丁）对于在乌拉尔、巴什基里亚和恩巴等三个地区建立新的**石油基地**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

（戊）对于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方面以及在森林工业方面扩大**日用**品的生产缺乏认真的关心；

（己）对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

（庚）对于改造**产品质量**问题采取了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态度；

（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和实行**经济核算**方面仍然落后；

（壬）劳动和工资组织得不好的现象、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现象还没有消灭；

（癸）包括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内的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机关中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还远没有消灭。

这些缺点绝对需要迅速消除，这是几乎用不着再解释的。

大家知道，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它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度内也没有完成计划。如果今后还继续落后，那末它们就会成为工业发展的障碍和工业

完不成计划的原因。至于建立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的新基地，那末不难理解，我们不完成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就会使工业和运输业搁浅。关于日用品和发展地方工业问题，以及关于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和实行经济核算等问题，也是用不着解释的。至于劳动和工资组织得不好的现象以及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那末顿巴斯的事例以及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各企业的事例都已证明，这个危险的病症潜伏在一切工业部门中，阻碍着它们的发展。如果不把这个病症除掉，那末工业就会瘫痪。

当前的任务是：

（一）保持机器制造业目前在工业系统中的主导作用。

（二）消灭钢铁工业的落后状态。

（三）整顿有色金属工业。

（四）大力发展一切已经查明的地区的地方煤矿采掘事业，建立新的采煤区（例如在远东的布列雅区），并把库兹巴斯变成第二个顿巴斯。（鼓掌多时）

（五）认真地着手建立乌拉尔山脉西面和南面斜面区的石油基地。

（六）扩大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日用品生产。

（七）发展地方苏维埃工业，使它能够在日用品生产方面发挥主动性，并尽可能给以原料和资金的帮助。

（八）改进产品质量，停止出产非成套的产品，不顾情面地惩罚一切违反或忽视苏维埃政权关于产品质量和生产成套产品的法律的同志。

（九）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

（一〇）消灭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和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一一）消灭各经济人民委员部一切环节中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经常检查下级机关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

二、农业的高涨

农业方面的发展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农业主要部门的高涨速度比工业慢许多倍，但比个体经济占优势的时期还是快些。而在畜牧业部门我们甚至有过相反的过程，即牲畜头数减少了，只是到了一九三三年，而且只是在养猪业一个部门才出现了高涨的标志。

显然，把分散的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有很大的困难，在几乎是荒野的地方建立许多大规模的谷物农场和养畜场是困难的事情，并且一般说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把它引上集体农庄新轨道的改组时期需要许多时间和大量经费，——这一切因素必然预先决定了农业高涨的速度是缓慢的，牲畜头数的下降是比较长期的。

实际上，对农业来说，报告所涉及的时期与其说是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的时期，不如说是为最近将来的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创造前提的时期。

如果拿各种作物播种面积增加的统计材料来看，然后再单独拿技术作物播种面积增加的统计材料来看，那末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农业发展的情形如下。

苏联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单位百万公顷）

	1913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全部播种面积	105.0	118.0	127.2	136.3	134.4	129.7
其中：						
（甲）谷物	94.4	96.0	101.8	104.4	99.7	101.5
（乙）技术作物	4.5	8.8	10.5	14.0	14.9	12.0
（丙）蔬菜瓜类作物	3.8	7.6	8.0	9.1	9.2	8.6
（丁）饲料作物	2.1	5.0	6.5	8.8	10.6	7.3

苏联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单位百万公顷）

	1913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棉花	0.69	1.06	1.58	2.14	2.17	2.05
纤维用亚麻	1.02	1.63	1.75	2.39	2.51	2.4
甜菜	0.65	0.77	1.04	1.39	1.54	1.21
油料作物	2	5.2	5.22	7.55	7.98	5.79

这两个统计表反映出农业中的两条基本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在农业改组达到高潮的时期，当数万个集体农庄相继成立的时候，当这些集体农庄把富农从土地上赶走而把空出来的土地拿到自己手里的时候，竭力扩大播种面积。

第二条路线是停止一味扩大播种面积，由一味扩大播种面积转为改进土地的耕作，实行正确的轮作制和休闲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在实际需要时暂时缩小现有的播种面积。

大家知道，第二条路线，即农业中唯一正确的路线是在一九三二年宣布的，当时农业的改组时期接近结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成了农业高涨的一个基本问题。

但是不能把播种面积增加的统计材料看做农业发展情形的十分完备的指标。有时候，播种面积增加了，而产量却没有增加，或者甚至减少了，这是因为土地耕作粗糙了，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了。因此，必须拿总产量的统计材料去补充播种面积的统计材料。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苏联谷物和技术作物的总产量（单位百万公担）

	1913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谷物	801	717.4	835.4	694.8	698.7	898
棉花（籽棉）	7.4	8.6	11.1	12.9	12.7	13.2
亚麻（纤维）	3.3	3.6	4.4	5.5	5	5.6
甜菜	109	62.5	140.2	120.5	65.6	90
油料作物	21.5	35.8	36.2	51	45.5	46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农业改组达到最高潮的年份，即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是谷物减产最厉害的年份。

其次，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由于亚麻区和产棉区的农业改组速度比较缓慢，亚麻和棉花产量几乎完全没有下降，相当平稳地一直上升，保持着高度发展水平。

再其次，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油料作物产量只受到少许波动，和战前比较仍然保持着高度发展水平；而甜菜由于甜菜区的农业改组速度最快，并且进入改组时期最晚，在改组的最后一年，即在一九三二年，产量下降得最厉害，降到了战前水平以下。

最后，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三三年，即改组时期结束后的第一年，是谷物和技术作物发展中转变的一年。

这就是说，首先是谷物，其次是技术作物，今后将坚定不移地稳步走向强大的高涨。

改组时期令人最头疼的是农业中的畜牧业部门。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苏联牲畜头数（单位百万头）

	1916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甲）马	35.1	34	30.2	26.2	19.6	16.6
（乙）牛	58.9	68.1	52.5	47.9	40.7	38.6
（丙）绵羊和山羊	115.2	147.2	108.8	77.7	52.1	50.6
（丁）猪	20.3	20.9	13.6	14.4	11.6	12.2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牲畜头数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没有增加，而和战前水平比较还在继续下降。显然，一方面，农业的畜牧部门中充满了大富农分子，另一方面，富农乘改组期间的有利时机加紧煽动农民屠宰牲畜，这两个事实都在这个统计表中反映出来了。

其次，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牲畜头数的下降从改组的第一

年（一九三〇年）起就已开始，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三年，而且下降的程度在头三年最大，到一九三三年即改组时期结束后的第一年，当谷物业已经走上高涨道路的时候，牲畜头数的下降达到最低限度。

最后，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养猪业方面已经开相反的过程，在一九三三年已经出现趋向高涨的标志。

这就是说，一九三四年应当成为而且能够成为整个畜牧业转向高涨的一年。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国农户集体化的发展是怎样的呢？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集　体　化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集体农庄数（单位一千）	57	85.9	211.1	211.05	224.5
集体农庄内户数（单位百万）	1	6	13	14.9	15.2
农户集体化百分数	3.9	23.6	52.7	61.5	65

按各个部分来看，谷物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各部分的谷物播种面积（单位百万公顷）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对 1933 年的播种面积的百分数
一、国营农场	1.5	2.9	8.1	9.3	10.8	10.6
二、集体农庄	3.4	29.7	61	69.1	75	73.9
三、个体农民	91.1	69.2	35.3	21.3	15.7	15.5
苏联全国谷物播种面积	96	101.8	104.4	99.7	101.5	100

这两个统计表说明什么呢？

这两个统计表说明：农业改组时期，即集体农庄及其庄员人数急速增加的时期已经结束，还在一九三二年就已经结束。

因此，今后集体化的过程将是集体农庄逐渐吸收和改造个体农户残余的过程。

这就是说，集体农庄已经最终地永远地取得了胜利。（热烈鼓掌多时）

其次，这两个统计表说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共占有苏联全国谷物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四点五。

这就是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一起成了决定整个农业及其所有各部门的命运的力量。

其次，这两个统计表说明：占全国农户总数百分之六十五的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有全国谷物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九，而其余占全国农民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五的个体农户只占有全国谷物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十五点五。

此外，集体农庄在一九三三年交给国家的各种粮食为十亿多普特，个体农民虽然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交粮计划，可是总共只交了一亿三千万普特左右，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个体农民交给国家的粮食约为七亿八千万普特，集体农庄交的粮食不过一亿二千万普特。如果注意到上面这个事实，那就十分清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的作用完全改变了，集体农庄在这期间变成了农业中的统治力量，而个体农民变成了不得不服从和适应集体农庄制度的次要力量。

必须承认，劳动农民，我们苏联的农民，已经最终地永远地站到社会主义的红旗下面来了。（鼓掌多时）

让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资产阶级和托洛茨基派的长舌妇们去胡说什么农民天生就是反革命的，农民负有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使命，农民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同盟者，在苏联

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吧。事实证明，这些先生们是在诬蔑苏联，诬蔑苏联的农民。事实证明，我们苏联的农民已经最终地离开资本主义的岸边而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事实证明，我们在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剩下的只是建成它的上层建筑，这件事无疑要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容易得多。

但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它们的播种面积和产量的增长上，而且在它们的拖拉机数量的增加上，在它们的机械化程度的增长上也反映出来了。毫无疑问，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这方面是有长足进步的。

下面是这方面的统计表。

苏联农业中的拖拉机数量（折旧数量除外）

	台　数（单位千台）					马　力（单位千匹）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拖拉机总数	34.9	72.1	125.3	148.5	204.1	391.4	1003.5	1850	2225	3100
其中：										
（甲）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	2.4	31.1	63.3	74.8	122.3	23.9	372.5	848	1077	1782
（一）各系统国营农场的拖拉机	9.7	27.7	51.5	64	81.8	123.4	483.1	892	1043	1318

可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有二十万零四千台拖拉机，三百一十万匹马力。这个力量显然是不小的，它能够铲除农村中资本主义的一切根子。这个力量超过了列宁当年作为远景说过的拖拉机数量的一倍。

至于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所属各国营农场的农业机器数量，请看下面的统计表。

属于机器拖拉机站的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联合收割机（单位千台）	七台	0.1	2.2	11.5
发动机和锅驼机（单位千台）	0.1	4.9	6.2	17.6
复式和半复式脱谷机（单位千台）	2.9	27.8	37	50
脱谷用的电力装置	168	268	551	1283
机器拖拉机站的修理厂数	104	770	1220	1933
载重汽车（单位千台）	0.2	1	6	13.5
轻便汽车（单位一辆）	17	191	245	2800

属于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所属各国营农场的

	1930 年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联合收割机（单位千台）	1.7	6.3	11.9	13.5
发动机和锅驼机（单位千台）	0.3	0.7	1.2	2.6
复式和半复式脱谷机（单位千台）	1.4	4.2	7.1	8◇290◇
脱谷用的电力装置	42	112	164	222
修理厂 （甲）大修厂 （乙）中修厂 （丙）小修厂	 72 75 205	 133 160 310	 208 215 578	 302 476 1122
载重汽车（单位千台）	2.1	3.7	6.2	10.9
轻便汽车（单位一辆）	118	385	625	1890

我想这些统计材料是用不着解释的。

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成立政治部，供给农业以熟练的工作人员，对农业的高涨也有不小的意义。现在大家都承认，政治部工作人员在改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作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大家知道，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增强农业干部而派往农村的共产党员有二万三千多名，其中担任农业工作的有三千多人，担任国营农场工作的有两千多人，担任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工作的有一万三千多人，担任国营农场政治部工作的有五千多人。

供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人材的情况也是这样。大家知道，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派到农业中去的这方面的工作人员有十一万一千多人。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单是农业人民委员部一个系统培养出来和派出去的拖拉机手、联合收割机正副司机和汽车司机就有一百九十万人以上。

在同一时期内训练出来和重新受过训练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田间工作队长、畜牧队长和会计员共有一百六十万人以上。当然，这对我国农业来说是不够的。不过总算是有了一些。

可见国家已经造成一切条件，使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所属各机关易于领导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

能不能说已经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条件呢？

可惜不能这样说。

首先，这两个人民委员部所犯的以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态度处理事情的毛病比其他人民委员部都更严重。它们只是决定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检查执行情况，叫违反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命令的人守规矩，而把忠诚老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加以提拔。

本来，拖拉机和机器既然这样多，各农业机关就应该好好保管这些贵重机器，及时加以修理，比较合理地使用它们。但是，各农业机关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可惜做得很少。拖拉机和机器的保管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修理工作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各农业机关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了解，主要的修理工作是小修和中修，而不是大修。至于拖拉机和机器的使用，那末这方面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更是十分明显和尽人皆知的，因而是用不着证明的。

农业的当前任务之一就是实行正确的轮作制，扩大全休闲地，改进一切农业部门的选种工作。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可惜目前还做得很少。谷物和棉花的选种工作很混乱，还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整顿好。

提高技术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供给技术作物以肥料。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目前还做得很少。肥料是有的，但是农业人民委员部所属各机关不善于收集，而收集以后又不关心把肥料及时送到各地去合理地使用。

关于国营农场，应当说它们现在还担负不起自己的任务。我决不是轻视我们国营农场的巨大的革命化作用。但是，如果把国家投入国营农场的大量资金和国营农场现有的实际工作效果对照一下，那就可以看到一种对国营农场很不体面的极不相称的现象。产生这种不相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国营谷物农场的规模过于庞大，场长管理不了庞大的国营农场，国营农场本身太专业化，没有轮作制和休闲地，自己没有畜牧业部分。显然，必须缩小国营农场的规模并消除它们的过分专业化。也许有人以为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把它解决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是由一些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毫无关系的人主动提出并加以解决的。

最后，谈谈畜牧业问题。关于畜牧业的严重情况我已经报告过了。也许有人以为我们的农业机关正在竭力设法消除畜牧业的危机，以为它们正在敲起警钟，动员工作人员去着手解决畜牧业问题。可惜过去和现在都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农业机关对畜牧业的严重情况不但没有敲起警钟，反而竭力掩蔽问题，有时甚至在报告中企图对全国舆论隐瞒畜牧业的真实情况。这种行为是布尔什维克所完全不应有的。既然如此，那末希望农业机关能把畜牧业引上大道并提到应有的高度就等于希望在沙滩上盖房子。我们全党，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党员和非党员，应当把畜牧业担当起来，要知道畜牧业问题在目前是一个首要问题，正如已经胜利解决了的谷物问题是我们昨天的首要问题一样。用不着证明，曾经在走向目标的道路上不止一次地克服了严重障碍的苏维埃人也一定能够克服这个障碍。（掌声如雷）

必须消除的缺点和必须在最近解决的任务，简略而极不完全地列

举出来就是这样。

但是，这些任务还不能概括一切。在农业方面还有其他一些任务，关于这些任务也应该讲几句。

首先，应当注意到，把我国各地区划分为工业区和农业区的那种旧的分法已经过时了。我国不再有供给工业区以粮食、肉类、蔬菜的纯粹农业区，同样也不再有能够指靠从外面，从其他地区得到一切必需的农产品的纯粹工业区。发展的趋势是我国所有的地区都要成为或大或小的工业区，而且愈往前去，它们也就愈会成为工业区。这就是说，乌克兰、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和其他从前的农业区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大批农产品运往别处，运往工业中心，因为现在它们必须供给本地日益增多的城市和工人了。由此可见，每个地区如果不愿意陷入困难的境地，那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农业基地，自己出产蔬菜、马铃薯、油类和乳类，并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出产粮食和肉类。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完全做得到的，而且现在已经在做了。

任务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件事情进行到底。

其次，应当注意到，把我国各地区划分为消费区和生产区的那种大家知道的分法也开始失去它的绝对性质了。像莫斯科省和高尔基省这样的“消费”区今年也交给国家八千万普特左右的粮食。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在所谓消费地带约有五百万公顷灌木丛生的荒地。大家知道，这一带的气候并不坏，雨水不少，没有旱灾。如果清除这些土地上的灌木并采取一些组织措施，那就会有一个广大的谷物区，这个谷物区在当地单位面积产量一般很高的情况下，每年所能提供的商品谷物不会少于伏尔加河下游区或伏尔加河中游区现在供给的数量。这会给北部各工业中心很大的帮助。

显然，任务在于要在消费地带各地区建立广大的谷物产地。

最后，谈谈伏尔加河东岸地区的防旱问题。在伏尔加河东岸各地区营造森林和防护林带是有巨大意义的。大家知道，这个工作已在进

行，不过不能说进行得十分紧张。至于伏尔加河东岸地区的灌溉事业，这从防旱方面看来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容许把它长期搁置不办。固然，这件事情由于某些外部情况吸引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受到一些阻碍。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理由把这件事情继续搁置下去了。我们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定要有一个不受天气变化影响而能每年提供两亿普特左右商品谷物的巨大的、完全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如果考虑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城市的发展，同时考虑到国际关系方面可能发生的各种纠纷，那就可以知道，这是十分必要的。

任务在于着手组织伏尔加河东岸地区灌溉事业的重大工作。（鼓掌）

三、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这样，我们就说明了我国工业和农业的状况，我国工业和农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发展情形以及它们目前的情况。

总结起来，我们的成绩如下：

（甲）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在农业的主要部门方面，生产都有强大的高涨。

（乙）在这种高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农业方面都最终战胜了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变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唯一体系，资本主义成分已被排挤出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丙）绝大多数个体农民完全脱离了小商品个体经济，他们已联合成为以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集体农庄，集体经济完全战胜了小商品个体经济。

（丁）集体农庄靠吸收个体农户而更加扩大，因此，个体农户的数量逐月下降，实际上变成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辅助力量。

很明显，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剥削者的胜利不能不使劳动者的

物质生活状况及其全部日常生活得到根本改善。

寄生阶级的消灭使人剥削人的现象消失了。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不再受到剥削。从前剥削者由人民劳动中榨取的那种收入，现在已完全留在劳动者手里，其中一部分用来扩大生产和吸收新的劳动队伍参加生产，一部分则用来直接提高工农的收入。

工人阶级的灾难——失业现象消失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有千百万失业者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忍受着贫困和痛苦，在我们这里却再也没有找不到工作和领不着工资的工人了。

随着富农盘剥的消失，农村中的贫困现象也消失了。现在，任何一个农民，不管是集体农庄庄员还是个体农民，只要愿意诚实地工作，不偷懒，不游荡，不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就有可能过人的生活。

剥削的消灭，城市中失业现象的消灭，是村中贫困现象的消灭，——这就是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具有历史意义的成绩，这种成绩是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工人和农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我国各大城市和各工业中心的面貌改变了。资产阶级国家各大城市不可避免的标志就是贫民窟，即城郊的所谓工人住宅区，那里拥挤着黑暗、潮湿、破落不堪的住所，其中大部分是地窖，栖身在这些住所里的照例是一些穷人，他们生活在污垢之中，诅咒自己的命运。在苏联，实行革命的结果，这些贫民窟已经绝迹了。它们已经被新建的很好的光线充足的工人住宅区代替了，并且这些工人住宅区往往比城市中心还漂亮。

农村的面貌改变得更大。在旧农村里，教堂盖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巡官、神甫和富农的漂亮房子盖在前面，农民的破烂茅屋都在后面。这样的旧农村现在开始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新农村。在新农村里，有公共经营用的建筑物，有俱乐部、无线电、电影院、学校、图书馆和托儿所，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脱谷机和汽车。富农剥削者、高

利贷吸血鬼、投机商人、巡官老爷这班旧时的有名人物都绝迹了。现在的有名人物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学校和俱乐部的领导人，拖拉机队和联合收割机队的队长，田间工作队和畜牧队的队长，集体农庄田地上优秀的男女突击队员。

城乡间的对立正在消失。城市在农民的心目中不再是剥削他们的中心。城乡间的经济结合和文化结合的纽带正日益巩固。现在农村从城市和城市工业方面得到拖拉机、农业机器、汽车、人材和资金的帮助。同时，农村本身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业，如机器拖拉机站、修理厂、集体农庄的各种工业企业、小型电站等等。城乡间的文化鸿沟正在填平。

这就是劳动者在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主要成绩。

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有如下的情况：

（一）国民收入由一九三〇年的三百五十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亿卢布，并且，因为资本主义分子（其中包括承租企业家）在国民收入中取得的份额现在已不到百分之零点五，所以几乎全部国民收入是在工人、职员、劳动农民、合作社和国家之间分配的。

（二）苏联的人口由一九三〇年末的一亿六千零五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末的一亿六千八百万人。

（三）工人和职员的人数由一九三〇年的一千四百五十三万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千一百八十八万三千人，其中体力劳动者的人数在这一时期内由九百四十八万九千人增加到一千三百七十九万七千人，大工业工人（包括运输业工人）的人数由五百零七万九千人增加到六百八十八万二千人，农业工人的人数由一百四十二万六千人增加到二百五十一万九千人，商业方面的工人和职员的人数由八十一万四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九万七千人。

（四）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基金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三十五亿九千

七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百四十二亿八千万卢布。

（五）工业工人每年的平均工资由一九三〇年的九百九十一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五百一十九卢布。

（六）工人和职员的社会保险基金由一九三〇年的十八亿一千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四十六亿一千万卢布。

（七）全部地面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

（八）国家为帮助农民而设立了二千八百六十处机器拖拉机站，投资二十亿卢布。

（九）国家为帮助农民而发放给集体农庄十六亿卢布的贷款。

（一〇）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家为帮助农民而贷给他们二亿六千二百万普特谷物做种子和供食用。

（一一）国家为帮助力量单薄的农民而给予他们税收和保险方面的优待共三亿七千万卢布。

至于我国的文化发展，我们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有如下的情况：

（一）全苏联实行了初等普遍义务教育，识字人数由一九三〇年末的百分之六十七提高到一九三三年末的百分之九十。

（二）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五万八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千六百四十一万九千人，其中受**初等**教育的学生由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七千人增加到一千九百一十六万三千人，受**中等**教育的学生由二百四十五万三千人增加到六百六十七万四千人，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由二十万七千人增加到四十九万一千人。

（三）受学前教育的儿童人数由一九二九年的八十三万八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九十一万七千人。

（四）普通的和专门的高等学校的数目由一九一四年的九十一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六百所。

（五）科学研究机关的数目由一九二九年的四百所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八百四十所。

（六）俱乐部一类机构的数目由一九二九年的三万二千个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五万四千个。

（七）电影院、俱乐部的电影放映站和电影放映队的数目由一九二九年的九千八百个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万九千二百个。

（八）报纸一期的发行数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万份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三千六百五十万份。

也许不妨指出，在我国高等学校学生中，工人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一点四，劳动农民的比重为百分之十六点五；而在德国，比如说，在高等学校学生中，工人的比重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学年度仅为百分之三点二，小农的比重仅为百分之二点四。

必须指出一件可喜的事实和农村文化水平提高的标志，这就是集体农庄女庄员在社会组织工作方面的积极性的提高。例如大家知道，现在女庄员担任集体农庄主席的约有六千人，担任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委员的有六万多人，担任生产队长的有两万八千人，担任小组长的有十万人，担任集体农庄商品养畜场主任的有九千人，担任拖拉机手的有七千人。

不用说，这些材料是不完全的。但就是这很少的一些材料也足以有力地说明农村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同志们，这个情况是有巨大意义的。所以有巨大意义，是因为妇女占我国人口的半数，她们是一支劳动大军，并且她们负有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即我们的将来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让这一支劳动大军过着愚昧无知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欢迎劳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欢迎她们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认为这是我国文化水平提高的明显标志。（鼓掌多时）

最后，还必须指出一件事实，但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实。我指的是教育系和医科在我们这里至今还受人轻视这个令人不能容忍的现象。这是一个近乎违反国家利益的大缺点。一定要消除这个缺点。而且愈

快愈好。

四、商品流转的高涨和运输业

这样，我们就有了如下的情况：

（甲）包括日用品在内的工业品的产量增加了；

（乙）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了；

（丙）城乡劳动群众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需要和需求增加了。

为了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并保证全体消费者群众都能得到必需的商品和产品，还需要什么呢？

有些同志认为具备这些条件就足以使全国的经济生活十分活跃。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假定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可是如果商品到不了消费者的手中，那末经济生活不但不会十分活跃，反而会混乱不堪和完全解体。终究必须懂得，商品归根到底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消费而生产的。我们有过这样的事情：有不少的商品和产品，可是它们不但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中，反而好多年来一直徘徊在所谓商品运销网的官僚主义的曲折道路上，不能和消费者见面。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就失去了扩大生产的任何刺激，商品运销网堆满了货物，而工人和农民却得不到商品和产品。结果，尽管有商品和产品，而全国的经济生活还是陷于混乱。要使全国经济生活十分活跃，要刺激工业和农业不断提高自己的产量，那就还要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城市和乡村间、全国各地区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扩展的**商品流转**。必须使全国各地布满批发站和大小商店。必须使商品源源不断地从生产场所经过这些批发站、大小商店的孔道流到消费者手中。必须使国营商业网、合作社营商业网、地方工业、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都被吸引来参加这一事业。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展的**苏维埃商业，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业，

没有投机分子参加的商业。

由此可见，扩展苏维埃商业是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继续前进。

虽然这个真理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还是不得不克服许多横在扩展苏维埃商业道路上的障碍，简单说来，这些障碍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完全不懂苏维埃商业的必要性和意义的结果。

首先，一部分共产党员对于商业，而且对于苏维埃商业，还抱着一种高傲的鄙视的态度。这些所谓共产党员把苏维埃商业看做次要的毫无价值的事情，把商业工作人员看做没有出息的人。显然，这些人不了解，他们对苏维埃商业的这种高傲态度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而是狂妄自大但一无所有的没落贵族的观点。（鼓掌）这些人不了解，苏维埃商业是我们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事业，而商业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售货员，只要他们诚实地工作，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的执行者。（鼓掌）很明显，党必须把这些所谓共产党员稍微打击一下，把他们的贵族偏见抛到污水坑里去。（鼓掌多时）

其次，我们曾经不得不克服另一种偏见。这里指的是在我们一部分工作人员中间流行的“左派”清谈，说什么苏维埃商业似乎已经成为过时的阶段，说我们必须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说货币很快就要取消，因为货币似乎已经变成简单的计算符号，说既然很快就要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那就用不着发展商业了。应当指出，这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分子竭力破坏苏维埃商业扩展的“左派”小资产阶级清谈不但流行在一部分“红色教授”中间，而且也流行在某些商业工作人员中间。这些连最简单的苏维埃商业都不能办好的人竟妄谈他们有决心办好更复杂更困难的直接的产品交换，这当然是滑稽可笑的。不过，唐·吉诃德之流所以叫做唐·吉诃德，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起码的生活嗅觉。这些和马克思主义相去万里的人显然不懂得，货币在我们这里还会长

期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完成的时候为止。他们不懂得，虽然货币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工具，但是，苏维埃政权已经把这种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的利益，以便全力扩展苏维埃商业，从而为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准备条件。他们不懂得，产品交换只有在苏维埃商业办得尽善尽美的时候才能代替苏维埃商业，而办得尽善尽美的苏维埃商业现在我们根本没有，并且也不会很快就有。很明显，党在竭力设法扩展苏维埃商业的时候，认为必须把这些“左派”畸形儿打击一下，让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清谈被风刮走。

其次，我们曾经不得不克服商业工作人员机械他分配商品的不良习惯，消灭忽视商品种类和消费者要求的态度，消除机械地调拨货物的现象和商业中的无人负责现象。为了这个目的，设立了许多省批发站和区联合批发站，设立了几万个新的大小商店。

其次，我们曾经不得不消除合作社在市场上的垄断状况，因此，我们责成各人民委员部建立销售本单位产品的商业，责成供给人民委员部广泛发展经营农产品的商业，结果是一方面以竞赛的办法改善了合作社营商业，另一方面降低了市场上的物价，健全了市场。

我们广泛设立了廉价食堂（“公共食堂”），在工厂中成立了工人供应部，停止供应那些和工厂没有关系的人，单是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一个系统就停止供应了不下五十万个和该部没有关系的人。

我们成立了统一集中的短期信用银行，即国家银行和分设在各地的二千二百个能够资助商业活动的分行。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们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有了如下的成绩：

（甲）大小商店由一九三〇年的十八万四千六百六十二个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十七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个；

（乙）新设立了一千零十一个省批发站和八百六十四个区联合批

发站；

（丙）新设立了一千六百个工人供应部；

（丁）设有营业性的粮食商店的城市现在增加到三百三十个；

（戊）公共食堂现在发展到可以供应一千九百八十万人；

（己）包括公共食堂在内的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的商品流转额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八十九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四百九十亿卢布。

如果以为苏维埃商业的这种发展足以满足我国经济的需要，那就错了。恰恰相反，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目前的商品流转状况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任务在于继续扩展苏维埃商业，吸引地方工业参加这个事业，扩大集体农民的商业，力求在发展苏维埃商业方面取得新的决定性的成就。

但是必须指出，问题不能只限于扩展苏维埃商业。我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商品流转的发展，有赖于苏维埃商业的发展，而苏维埃商业的发展又有赖于我国铁路、水路和汽车运输业的发展。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有商品，也有扩大商品流转的充分可能，但是运输业跟不上商品流转的发展，不能运送货物。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经常发生的。因此，运输业现在是一个薄弱环节，我国整个经济，首先是我国的商品流转，会受到它的阻碍，而且大概已经开始受到它的阻碍了。

固然，铁路运输业的货物周转量由一九三〇年的一千三百三十九亿吨公里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七百二十亿吨公里。但是这还不够，这对于我们，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太少了。

水路运输业的货物周转量由一九三〇年的四百五十大亿吨公里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九十九亿吨公里。但是这还不够，这对于我国经济来说是太少了。

更不用说汽车运输业了。汽车（载重汽车和轻便汽车）的数量由一九一三年的八千八百辆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末的十一万七千八百辆。

这对于我国的国民经济来说简直少得不好意思提到。

毫无疑问，如果运输机关没有犯大家知道的所谓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方法的毛病，那末所有这些运输业的工作就会好得多。因此，除了必须以人材和资金帮助运输业以外，任务还在于根除运输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工作态度，使它们成为效率更高的机关。

同志们！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工业的基本问题，现在工业稳固地站住了脚。我们也正确地解决了农业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公开地说，现在农业也稳固地站住了脚。但是，如果我们的商品流转开始跛足，而运输业又成了我们的绊脚石，那末我们就会失去这些成绩。因此，扩大商品流转和彻底改进运输业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我们就不能前进。

三　党

现在谈谈党的问题。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旗帜下，在各种反列宁主义集团残余被肃清的旗帜下举行的。

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个集团的组织者们现在在国外资产阶级政党的后院里混日子。

右倾分子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个集团的组织者们早已抛弃自己的观点，现在正竭力设法向党赎罪。

各种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的集团被击溃、被驱散了。这些集团的组织者们不是和主张武装干涉的流亡者完全勾结在一起，就是低头认罪了。

这些反革命集团的大多数参加者不得不承认党的路线正确而向党投降了。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还不得不证明党的路线正确，还不得不和一些著名的反列宁主义集团进行斗争，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也还不得不把这些集团的最后一批信徒彻底击溃，而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既没有什么要证明的，大概也没有什么人要打击的了。大家都看得见，党的路线胜利了。（掌声如雷）

国家工业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现在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消灭富农和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我们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显然，所有这些成就，首先是五年计划的胜利，把各种各样的反列宁主义集团打得一败涂地，打得粉碎了。

必须承认，党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了。（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一、政治思想领导问题

但这是不是说，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继续进攻已经成为多余的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不是说，我们党内一切都很好，党内再不会出现任何倾向，因此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党的敌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都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残余还留在个别党员的头脑中，并且时常流露出来。决不能把党看做一种和周围的人们隔绝的组织。党是在围绕着它的人们中间生存和活动的。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往往从

外界渗入党内，这是不足为奇的。而滋长这种情绪的土壤在我国也无疑是有的，这至少是因为我国城市和农村中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居民阶层，他们就是这种情绪的培养基。

我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说过，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种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能不能说我们已经克服了经济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呢？不，不能这样说。更不能说我们已经克服了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因为人们意识的发展落后于人们的经济地位，而且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力图恢复和支持苏联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我们布尔什维克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包围必须时刻戒备。

很明显，这些残余不能不是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在我们个别党员的头脑中活跃起来的良好土壤。此外，如果注意到我们大多数党员的理论水平不很高，党机关的思想工作薄弱，我们党的工作人员担负的纯粹实际工作过重而使他们不可能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你们就会了解，个别党员头脑中对列宁主义的一些问题的糊涂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种糊涂观念往往出现在我们的报刊上，并有助于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残余活跃起来。

正因为如此，不能说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进攻政策再也不需要了。

可以举出列宁主义中的几个问题来说明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残余在某些党员中间还有多大的生命力。

例如拿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来说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说过，我们正向着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当然，无阶级社会是不会按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是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的手段，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的。

问题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可是，谁不知道，这个明白浅显的列宁主义论点的宣布竟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引起了不少的糊涂观念和不健康的情绪呢？我们走向无阶级社会，这个论点是当做口号提出的，而他们却了解为自发的过程。于是他们就这样想：既然说是无阶级社会，那就是说，可以削弱阶级斗争，可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可以根本取消国家，因为国家反正在最近必然会消亡。于是他们就欣喜若狂，等待着很快就会没有任何阶级，就是说，不会再有阶级斗争，就是说，不必再操心和担忧，就是说，可以放下武器，高枕而卧，等待无阶级社会的降临。（全场大笑）

毫无疑问，这种糊涂观念和这些情绪同大家知道的右倾分子的观点一模一样。按照这种观点看来，旧东西必然会自流地成长为新东西，总有一天我们必然会不知不觉地进到社会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已被击溃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残余还完全能够活跃起来，它还远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种糊涂观点和这些非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掌握了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那末我们党就会涣散而被解除武装。

其次，拿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的问题来说吧。现在大家都承认，劳动组合在目前条件下是集体农庄运动唯一正确的形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甲）劳动组合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乙）劳动组合成功地使个人生活利益适应公共利益，从而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昨天的个体农民。

公社和劳动组合不同，劳动组合只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公社在不久以前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共化了，就是说，公社社员和劳动组合组员不同，他们没有私有的家禽、小家畜、奶牛、谷物和宅旁园地。这就是说，在公社中，与其说是照顾到社员的个人生活利益，把它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不如说是为了达到

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而用公共利益把社员的个人利益压抑下去了。很明显，这是公社的最大弱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公社没有得到广泛发展，而只有几个或几十个。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公社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避免垮台，就不得不放弃生活公共化的办法，开始按劳动日计工，把谷物分给各户，允许社员私有家禽、小家畜、奶牛等等，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公社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正常发展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这当然不是说公社根本不需要了，它不再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了。不，公社是需要的，它当然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但不是目前的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并且自然改为劳动组合的公社，而是将来的在技术更发达和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社。目前的农业公社是在技术不很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实行了平均主义，很少照顾到社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因此现在不得不改为把庄员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的劳动组合。将来的公社是从发达的富裕的劳动组合中成长起来的。将来的农业公社是在劳动组合的田地上和养畜场中有了丰富的谷物、家畜、家禽、蔬菜和其他各种产品的时候，在劳动组合中附设有机械化洗衣坊、现代化厨房、食堂、面包厂等等的时候，在庄员看见从农场方面领取肉类和乳类比自己饲养奶牛和小家畜便宜的时候，在女庄员看见在公共食堂吃饭、向面包厂取面包、在公共洗衣坊洗衣比自己料理这些事情方便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将来的公社是在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发达的劳动组合的基础上，在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呢？当然不是很快的。但是一定会这样。如果人为地加速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那就是犯罪。那就会打乱一切而帮助我们的敌人。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应当随着全体庄员对这种转变的必要性的确信程度而逐步地进行。

关于劳动组合和公社的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看来是很明白的，而且几乎是很浅显的。

可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糊涂观念。他们认为党既然宣布了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那就是远离了社会主义，从公社即从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向低级形式后退了。试问，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在劳动组合里没有平等，因为在劳动组合里还保存着组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而在公社里却有平等，因为在公社里社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状况都是平均的。但是，第一、我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都拉平，都实行平均主义的公社了。实践证明，如果公社不放弃平均主义，不在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那末它们就一定会灭亡。所以不必去援引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第二、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谬论，这种谬论适合于某种原始的禁欲主义教门，但是不适合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需要和口味都一样，所有的人的个人生活方式都一样。最后，难道在工人中间不是保存着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吗？这是不是说，工人比农业公社社员距离社会主义更远呢？

看来，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说，这种设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甲）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

会）。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质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任何其他的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也不承认的。

如果由此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们的口味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说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和同量的饭食，那就是胡说八道，诬蔑马克思主义。

现在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痛斥了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鼓吹“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鄙的平均主义”而称它为反动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严厉批判杜林提出来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立的那种“激进派的平均主义社会主义”。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要求平等的实际内容就是要求消灭阶级。任何超出这一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列宁也这样说：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演说，“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

三二九页）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资产阶级作家们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描绘成过去沙皇时代的兵营，那里一切都服从平均主义“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对资产阶级作家们的无知和愚蠢负责的。

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糊涂观点和对农业公社的平均主义趋向的迷恋是同我们“左派”糊涂虫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模一样的。“左派”糊涂虫有一个时候把农业公社理想化到这种地步，甚至企图在工厂里建立公社，在公社里，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各按自己的职业工作，但是必须把工资交出来混在一起，然后再平均分配。

大家知道，“左派”糊涂虫的这些平均主义的儿戏使我们的工业受到了多大的损害。

由此可见，已被击溃的反党集团的思想残余还有相当大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些“左派的”观点在党内获得了胜利，党就会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的党，而集体农庄运动就会完全瓦解。

又如拿“**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一口号来说吧。这个口号不仅和庄员有关。它更和工人有关，因为我们要使全体工人成为生活富裕的人，成为过富裕的和十分文明的生活的人。

看来问题是很明白的。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美满生活，那就用不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资本主义，在好几年中建设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可是，这个很明白而且实在很浅显的口号在一部分党员中间竟引起了许多疑虑、糊涂观念和混乱思想。他们说，这个口号不是回到“发财吧”那个被党摈弃的旧口号去了吗？他们接着说，如果大家都成了生活富裕的人，而穷人再也没有了，那末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工作

中究竟依靠谁呢？没有穷人我们究竟将怎样工作呢？

也许这是很可笑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存在着这种幼稚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这却是无疑的不可忽视的事实。

看来，这些人不了解“发财吧”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两个口号之间隔着一道鸿沟。第一、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和生活富裕的口号有关的不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是全体集体农庄庄员。第二、**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发财是为了支配其余的人和**剥削**他们，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条件下过富裕生活的口号**排除了**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的任何可能性。第三、“发财吧”的口号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当资本主义部分地恢复起来的时候，当富农还有力量、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还占优势、集体农庄经济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提出的，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当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已被消灭、农村中的富农已被击溃、个体农民经济已被排挤到次要地位、集体农庄已变为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的时候提出的。更不用说，“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不是孤立地提出的，而是和“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的口号下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提出的。

“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却是号召用加强集体农庄经济实力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变为生活富裕的劳动者的办法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这不是很明显吗？（呼喊声：“对！”）

这两个口号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这不是很明显吗？（呼喊声：“对！”）

至于说没有穷人似乎就不能有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就不能有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甚至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蠢话。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但是当资

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因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

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对贫穷和富裕的这种糊涂观点是我们“左派”糊涂虫观点的反映。“左派”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而把集体农庄看做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舞台。

由此可见，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已被击溃的反党集团的思想残余还没有丧失自己的生命力。

很明显，如果这一类糊涂观点在我们党内获得了胜利，集体农庄就不会有它们在最近两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它们就会在最短期间瓦解。

再如拿**民族问题**来说吧。在这里，在民族问题方面，也和在其他问题方面一样，有一部分党员持有一种能造成相当危险的糊涂观点。我说过资本主义残余的生命力。应当指出，在民族问题方面，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有生命力。所以更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们有可能用民族外衣很好地伪装起来。很多人认为斯克雷普尼克的堕落变节是个别的例外事件。这是不对的。斯克雷普尼克

和他的集团在乌克兰的堕落变节并不是例外事件。在其他民族共和国里，个别同志也有这种错误。

民族主义倾向，不管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什么意思呢？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民族主义倾向反映出“自己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企图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恢复资本主义。可见这两种倾向的根源是共目的。这个根源就是**离开**列宁的国际主义。如果你们想打击这两种倾向，那就首先应当打击这个根源，打击那些离开国际主义的人，不管他们倾向于地方民族主义还是倾向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热烈鼓掌）

有人在争论：哪一种倾向是主要危险，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一种表面的因而也是空泛的争论。如果想提出一种对任何时间和条件都适用的辨别主要危险和非主要危险的现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方法。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因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鼓掌多时）

在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倾向在不久以前还不是主要危险，但是当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而让它发展到和武装干涉者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倾向就成了主要危险。解决什么是民族问题方面的主要危险的问题不是靠空泛的表面的争论，而是靠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靠研究这方面所犯的错误。

关于一般政策方面的**右倾和“左”倾**也必须这样说。在这方面也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的个别党员有不少糊涂观点。他们在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时候往往丢开了“左”倾，减弱了反“左”倾的斗争，认为它不危险或者不很危险。这是一种严重而危险的错误。这是对“左”倾让步，党员是不容许这样做的。所以不容许这样做，尤其是因为最近“左派”已经完全滚到右派的立场上去了，实质上已经和右

派毫无区别了。

我们一向都说，“左派”就是右派，不过用左的词句掩饰了右的实质。现在“左派”自己证实了我们的这个说法。就拿去年的托洛茨基派“公报”来看吧。托洛茨基派先生们在那些公报里要求什么，写些什么呢？他们“左的”纲领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要求：**解散国营农场**，因为国营农场不能赢利；**解散大部分集体农庄**，因为这些集体农庄有名无实；**放弃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恢复租让政策，把我国的许多工业企业租出去**，因为这些企业不能赢利。

这就是卑鄙的懦夫和投降主义者的纲领，这就是要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

这个纲领和极右派的纲领有什么区别呢？显然毫无区别。由此可见，“左派”为了和右派结成联盟进行共同的反党斗争，公开地附和了右派的反革命纲领。

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左派”不危险或者不很危险呢？说这种蠢话的人是在帮助列宁主义的死敌，这不是很明显吗？

由此可见，在这里，在离开党的路线的各种倾向方面，不管是一般政策上的倾向还是民族问题上的倾向，人们意识中和我们的个别党员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也是有充分的生命力的。

这就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几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一部分党员有模糊观点、糊涂观念，甚至有完全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要知道，可以拿来证明个别党员有糊涂观点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既然如此，能不能说我们党内一切都很好呢？

显然不能。

我们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任务是：

（一）把党的理论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

（二）在党的一切环节中加强思想工作；

（三）在党的队伍中不倦地宣传列宁主义；

（四）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党组织及其周围的非党积极分子；

（五）不要掩饰而要大胆地批评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

（六）不断地揭露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和思想残余。

二、组织领导问题

我讲过了我们的成就，讲过了党的路线无论在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或在克服党内各种反列宁主义集团方面所取得的胜利，也讲过了我们的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但这并不是说，在一切地方，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胜利，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成就和胜利。我们还有不少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各种缺陷。在我们面前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任务。但这无疑是说明大部分刻不容缓的当前任务已经胜利解决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党获得了极伟大的胜利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胜利是怎样造成的，它实际上是怎样获得的，经过什么斗争，经过哪些努力？

有些人以为只要制定正确的党的路线，把它公布出来，把它制成一般的提纲和决议并一致通过，胜利就会自行到来，即所谓自流地到来。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才会这样想。事实上这些成就和胜利不是自流地取得的，而是在争取执行党的路线的残酷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任何时候都不会自行到来，它通常是由人们争取来的。好的拥护党的总路线的决议和宣言，这只是事情的开始，因为它们只表示争取胜利的愿望，

而不是胜利本身。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在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后，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取决于组织实现党的路线的斗争，取决于正确地挑选人材，取决于检查领导机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否则，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决议就会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危险。不仅如此，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

事实上，胜利是通过不断和执行党的路线的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进行残酷的斗争，通过克服这些困难，通过动员全党和工人阶级去克服困难，通过组织克服困难的斗争，通过撤换不中用的工作人员，挑选能够和困难作斗争的优秀工作人员而达到和取得的。

这是些什么困难，它们藏在什么地方呢？

这些困难是我们组织工作的困难，是我们组织领导的困难。这些困难藏在我们自己身上，藏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人员身上，藏在我们的组织里面，藏在我们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其他一切组织的机关里面。

应当了解，我们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一切组织及其领导者的力量和威信增长到了空前的程度。正因为他们的力量和威信增长到了空前的程度，所以现在一切事情或者几乎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藉口所谓客观条件是没有理由的。既然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已经为多年的经验所证实，而工人和农民拥护这条路线的决心又是不容置疑的，那末所谓客观条件的作用就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我们的组织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就成为决定性的独一无二的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今后我们工作中产生缺陷和缺点的责任十分之九不在“客观”条件，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并且仅仅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党有二百多万党员和候补党员。我们的共青团有四百多万团员和候补团员。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工农通讯员。我们的国防航空

化学建设协会有一千二百多万会员。工会有一千七百万以上的会员。我们获得成就应该归功于这些组织。如果尽管有这些有助于获得成就的组织和可能性，而我们在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缺点，还是有不少缺陷，那就只能归咎于我们自己，归咎于我们的组织工作，归咎于我们的组织领导不好。

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一般领导”的空谈代替了实际的具体领导，各组织实行职能管理制而缺乏个人负责制，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和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对执行情况缺乏经常的检查，害怕自我批评，——这就是我们的困难的根源，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困难藏身的地方。

如果以为用决议和决定就能克服这些困难，那就太天真了。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早就善于在口头上表示忠实于党和政府的决议，而在实际上把这些决议束之高阁。要战胜这些困难，必须消除我们的组织工作落后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的现象，必须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组织领导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必须做到使我们的组织工作能够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切实执行。

要战胜这些困难并获得成就，必须组织克服这些困难的斗争，必须吸引工农群众参加这个斗争，必须动员党本身，必须清除党和经济组织中的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和蜕化的分子。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

为此需要组织下列工作：

（一）开展自我批评，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二）动员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去和困难作斗争；

（三）动员工农群众为实现党和政府的口号和决议而斗争；

（四）在劳动者中间开展竞赛和突击运动；

（五）广泛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使党和苏维

埃的领导接近农村；

（六）缩小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和托拉斯的规模，使经济领导接近企业；

（七）消除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消灭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八）取消“职能管理制”，加强个人负责制，采取废除委员会制的方针；

（九）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采取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方针以进一步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一〇）把熟练的工作人员从办公室调到更接近生产的地方；

（一一）揭发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把他们从管理机关驱逐出去；

（一二）把违反党和政府的决议的人、敷衍欺骗的人、爱说废话的人撤职，任用新人，即任用能保证具体领导所担负的工作并能保证加强党和苏维埃纪律的认真办事的人；

（一三）清洗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精简人员；

（一四）最后，把不可靠的和蜕化的人清洗出党。

党为克服困难，为把我们组织工作的水平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以保证党的路线的实现而必须采取的办法，基本上就是这些。

你们知道，我们党中央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正是这样进行组织工作的。

中央在这里所遵循的是列宁的英明思想：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挑选人材和检查执行情况**。

关于挑选人材和撤换那些不称职的人，我想说几句话。

除了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撤职的那些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以外，我们还有两种工作人员阻挠着我们的工作，妨碍着我们的工作，不让我们前进。

一种工作人员是那些过去有过一些功劳而现在已经成为要人的人，

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不是为他们而是为傻瓜制定的。这些人并不认为执行党和政府的决议是自己的义务，因而破坏党和国家纪律的基础。他们违反党的纪律和苏维埃的法律是指靠什么呢？他们指靠苏维埃政权会因为他们过去有功而不去触犯他们。这些妄自尊大的要人认为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可以违反领导机关的决议而不受惩罚。对这种工作人员该怎么办呢？必须毫不犹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不管他们过去有过什么功劳。（呼喊声：“对！”）必须把他们降职并把这件事在报纸上公布。（呼喊声：“对！”）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打掉这些妄自尊大的官僚主义要人的傲慢习气，叫他们安分一些。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在我们整个工作中加强党和苏维埃的纪律。（呼喊声：“对！”鼓掌。）

现在来谈第二种工作人员。我指的是那种爱说废话的人，可以说是一些老实的爱说废话的人，（笑声）是一些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但是不会做领导工作，不会组织什么工作的老实人。去年我曾经和这样一个同志谈过话，这个同志很受人尊敬，但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能够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沉没在废话中。下面就是这一次的谈话。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笑声）

我问：那末结果怎样呢？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笑声）

我问：那末以后又怎样呢？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笑声）

我问：究竟怎样了？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笑声）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哈哈大笑）

这就是爱说废话的人的面目。他们动员起来了，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他们既有转变，又有进展，可是工作却没有动起来。

这和不久以前一位乌克兰工人所描述的某一组织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有人问他这个组织有没有路线，他回答说："路线吗……路线当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见。"（大笑）看来这个组织也有老实的爱说废话的人。

当我们把这些爱说废话的人撤职，把他们远远地调离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摊开双手困惑不解地问道："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撤职？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召集突击队员大会吗？难道我们没有在突击队员会议上宣布党和政府的口号吗？难道我们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选为名誉主席团吗？（大笑）难道我们没有给斯大林同志拍致敬电吗？——你们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哈哈大笑）

对这些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该怎么办呢？要知道，如果仍然让他们担任实际工作，他们就会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沉没在滔滔不绝的废话中。显然，必须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派他们去做别的非实际的工作。实际工作中是没有爱说废话的人的位置的。（呼喊声："对！"鼓掌。）

关于中央如何指导了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中挑选人材的工作，如何设法加强了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我已经简略地报告过了。在进行代表大会第三项议程的时候，卡冈诺维奇同志会更详细地向你们报告。

关于今后如何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我想说几句话。

正确地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在反对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斗争中有决定的意义。领导机关的决议是在执行呢，还是被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搁置起来了？这些决议是在正确地执行呢，还是被

歪曲了？机关是在诚实地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进行工作呢，还是在空忙一阵？——这一切只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才能及时地知道。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这是随时帮助查明机关的工作状况并揭发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的探照灯。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缺点和缺陷十分之九是由于对执行情况缺乏正确的检查而产生的。毫无疑问，如果对执行情况有这样的检查，缺点和缺陷是一定能够防止的。

但是，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要达到目的，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必须是经常的，而不是时断时续的；第二、在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各个环节中领导对执行情况的检查的必须不是次要的人，而是有充分威信的人，即各组织的领导者自己。

正确地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对于各中央领导机关有极大的意义。工农检查院按其组织来说，不能够满足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的要求。几年以前，当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比较简单，还不大令人满意，还可以指望有可能**检查**各人民委员部和各经济组织的工作的时候，工农检查院是胜任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工作已经扩大并更加复杂了，已经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由一个中央机关来**检查**经济工作了，因此，工农检查院应当改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检查，而是对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检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对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监督**。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不以检查所有一切为目的，而能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监督工作，集中于检查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组织。只有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按照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受地方机关支配的代表。为了使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够在必要时处分任何负责工作人员，必须使它的委员候选人由党的代表大会提名，经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认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加强苏维埃监督工作和

苏维埃纪律。

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大家知道，它首先而且主要是为防止党内分裂而成立的。你们知道，有一个时候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过分裂的危险。你们知道，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所属各组织防止了分裂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不再有分裂的危险了。现在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检查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组织。只有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才能成为这样的组织。党的监察委员会按照党和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在各地有不受地方组织支配的代表。很明显，这样一个负责的组织应当有很高的威信。为了使这个委员会有充分的威信，使它能够处分任何一个犯错误的负责工作人员，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必须使它的委员只有党的最高机关即党的代表大会才能选举和撤换。毫无疑问，这样的组织完全能够保证对党中央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并加强党的纪律。

关于组织领导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任务是：

（一）今后也要使我们的组织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二）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

（三）使组织领导能够完全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的实现。

* * *

同志们，我就要结束我的总结报告了。

从这个总结报告中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现在大家都已经承认，我们的成就是伟大的不平常的。国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转上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轨道。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实现了。这就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产生了自豪感，并加强了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这当然很好。但是成就有时也有它阴暗的一面。成就有时也能产

生某些危险，如果让这些危险发展下去，它们就会葬送全部事业。例如有这样一种危险，就是我们某些同志会因这些成就而冲昏头脑。大家知道，这种情形我们是有过的。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就是我们某些同志为这些成就所陶醉而骄傲自满到极点，开始用一些吹嘘的话来安慰自己，说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徒步过海”，“我们一拳就能把敌人打倒”等等。同志们，这种危险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这种情绪是再危险不过的，因为它能解除党的武装，瓦解党的队伍。如果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占了上风，我们的一切成就就会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当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胜利完成了。这是事实。但是，同志们，事业没有就此结束，而且也不能就此结束。前面还有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也是必须完成而且必须胜利完成的。你们知道，计划是在和困难作斗争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完成的。这就是说，将来还会有困难，将来还要和困难作斗争。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将要向你们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你们从他们的报告中就会知道，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我们还要克服怎样巨大的困难。这就是说，不要使党高枕而卧，而要在党内提高警惕性；不要使党酣睡，而要使它保持战斗准备状态；不要解除党的武装，而要把它武装起来；不要使党涣散，而要使它保持动员状态以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

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不要醉心于已得的成就，不要骄傲自满**。

我们所以获得成就，是因为我们有党的正确的领导路线，并善于组织群众去实现这条路线。不用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取得的和有权引以自豪的那些成就。但是有正确的路线而又善于实现它，这在执政党生活中是极少有的。

请你们看看周围的国家吧：你们能找到很多有正确的路线并实现这条路线的执政党吗？老实说，这样的党现在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党都过着没有前途的生活，都在危机的混乱状态中挣扎，看不见爬出泥潭的道路。只有我们的党才知道把事业引向何处，而且

胜利地把它引向前进。我们党为什么有这种优越性呢？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因为它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始终忠实于这个学说，只要我们掌握住这个指南针，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会获得成就。◇332◇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某些国家中已经被消灭了。有人说，它似乎被一种叫做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消灭了。这当然是胡说。只有不知道历史的人才会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消灭工人阶级。而消灭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的。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于舞台以来，到今天已经有八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有几十个几百个资产阶级政府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结果怎样呢？资产阶级政府上台下台，而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热烈鼓掌）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正是在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被彻底消灭的那个国家里获得了胜利。（热烈鼓掌）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国家现在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危机和失业的国家，而在其他一切国家内（其中包括法西斯国家），危机和失业已经笼罩了四年，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不，同志们，这不是偶然的。（鼓掌多时）

是的，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种种成就，就因为我们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旗帜下进行工作和斗争的。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要始终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旗帜**。（鼓掌）

苏联工人阶级所以强大，不仅因为它有久经战斗考验的列宁的党。其次，苏联工人阶级所以强大，不仅因为它有千百万劳动农民群众的支持。苏联工人阶级所以强大，还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支持它、帮助它。苏联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的共和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产儿。毫无疑问，苏联工人阶级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支持，就不能掌握住政

权，就不能保证有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因而就不会有它现在所取得的成就。苏联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间的国际联系，苏联工人和世界各国工人间的兄弟联盟，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和威力的基石之一。西方的工人说，苏联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突击队。这说得很好。这就是说，全世界无产阶级今后也准备尽一切力量和可能来支持苏联工人阶级。但是这就把一些重大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了。这就是说，我们应当以自己的工作来证明我们没有辱没全世界无产者的突击队这一光荣称号。这使我们有责任更好地工作，更好地奋斗，争取社会主义在我国最终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胜利。

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要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业，忠实于世界各国无产者兄弟联盟的事业**。（鼓掌）

结论就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可战胜的伟大旗帜万岁！

（全场热烈鼓掌多时。全体向斯大林同志欢呼致敬。高唱“国际歌”。唱完“国际歌”后，再次更热烈地欢呼。高呼：“斯大林乌拉！”“斯大林万岁！”“党中央万岁！”）

载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真理报”第二十七号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3卷第208—273页

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①]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九日）

现在我把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②]一文分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我认为必须把下述几点意见附在这篇文章之前。

阿多拉茨基同志建议在最近一期纪念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二十周年的《布尔什维克》上，刊载1890年在国外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著名论文《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假设有人建议把这篇文章刊载在恩格斯的文集中，或者刊载在一本历史杂志上，那我认为是十分正常的。但是，现在是建议我们把它刊载在我们的战斗性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载在纪念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二十周年的那一期上，可见，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因此，我认为在最近一期《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不适宜的。

————————————

① 本篇是斯大林写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一封信。——编者注

②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是维·伊·查苏利奇以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撰写的，由德文译成俄文连载于1890年2月和8月《社会民主党人》第1集和第2集。这一著作当时还用德文、英文、法文，波兰文和保加利亚文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该文中译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57页。——编者注

这些缺点是什么呢？

1.恩格斯在说明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并对这种卑鄙龌龊的政策进行应有的抨击时，他用来解释这种政策之所以产生的，主要不是俄国军事封建商人上层对出海口、海港，对扩大对外贸易和占领战略据点的“需要”，而是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是一帮似乎是万能的和非常有才能的外国冒险家，这帮人不知为什么处处走运，事事走运，这帮人使人惊讶地克服了达到自己冒险目的的所有一切障碍，以惊人的狡诈欺骗了欧洲所有的统治者,终于使俄国成了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

恩格斯这样来说明问题，可能使人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但可惜这竟是事实。

下面就是恩格斯文中相应的地方。

恩格斯说：“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在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茨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谢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如利文[①]。它的创始人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②]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

① 卡·奥·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1814—1835年先后任俄国驻巴黎公使和大使，1335—1839年任驻伦敦大使。卡·瓦·涅谢尔罗迭，伯爵，1816—1856年任俄国外交大臣。赫·安·利文，公爵，1810—1812年任俄国驻柏林公使，1812—1831年任驻伦敦大使。——编者注

② 亚·米·哥尔查科夫，公爵，1854—1856年任俄国驻维也纳大使，1856—1882年任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1875—1882年任俄国外交副大臣，1882—1895年任外交大臣。——编者注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瓦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①]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②]（见上述恩格斯的文章）

可以认为，在俄国历史上，在俄国的外交史上，外交界就是一切，而沙皇、封建主、商人和其他社会集团则是不足道的或者几乎是不足道的。

可以认为，假设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不是象涅谢尔罗迭或吉尔斯这样的外国冒险家，而是象哥尔查科夫等人那样的俄国冒险家,那么，俄国的对外政策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了。

十分卑鄙龌龊的侵略政策决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这一点我不来谈了。尽人皆知，侵略政策也是——不是在较小的程度上，甚至是在较大的程度上——欧洲各国国王和外交家所具有的，其中包括拿破仑这样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皇帝，他虽然并不是出身于皇室，但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却成功地运用了阴谋、欺骗、背信弃义、阿谀奉承、残暴行为、收买、暗杀和纵火。

显然，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

① 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亚克萨尔特河即锡尔河。——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16—17 页。——编者注

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由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

2.恩格斯在说明欧洲局势和揭示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的原因和前景时写道：

“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1000万到1500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①

“……俄国的国民议会为了克服哪怕是最主要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②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54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53页。——编者注

“欧洲正好象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无庸置疑的。”①

“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②（同上）

不能不指出，在这些说明欧洲局势和列举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的话里，忽略了一个后来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即争夺殖民地、争夺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的**帝国主义**斗争这个当时就已有极大意义的因素；忽略了作为后来的世界大战的因素的英国的作用，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矛盾，这些矛盾当时就已有重大意义，后来对世界大战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几乎是决定的作用。

我认为，这种忽略是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缺点。

从这个缺点产生了其余缺点。现在不妨指出其中的下列几点：

(一)**过高地估计了**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件事在促使世界大战日益逼近这方面的作用。诚然，恩格斯起初把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当作大战的因素放在首位，但后来，他把这个因素放到次要地位，而把俄国沙皇政府的侵略意图放到首位，断言，“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这当然是夸大了。

(二)**过高估计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俄国的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议会）在防止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方面的作用。恩格斯断言，俄国沙皇政府的覆灭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唯一手段。这显然是夸大了。设有“国民议会”的俄国新的资产阶级制度不可能防止大战，至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56页。——编者注

少是因为大战的主要推动力在于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这方面。问题在于，自从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沙皇政府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独立作用就开始显著地下降，而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沙皇俄国实质上起着欧洲主要大国的辅助的后备军的作用。

(三)过高估计了沙皇政权的作用，认为它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恩格斯语）。俄国沙皇政权是全欧洲（以及亚洲）反动势力的强大堡垒，这是无可怀疑的。但要说它是这个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那是使人怀疑的。

必须指出，恩格斯的文章的这些缺点，不仅有“历史价值”，它们还有，或者说应当有极重要的实际意义。其实：如果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斗争被忽略了，不被看作是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的因素，如果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也被忽略了，如果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这一大战的因素被放到了次要地位，而把俄国沙皇政府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当作大战的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最后，如果俄国沙皇政府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那么，比如说，资产阶级德国同沙皇俄国的战争就不是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人民的战争，而是解放的、或者几乎是解放的战争，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未必可以怀疑，按照这样的思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 1914 年 8 月 4 日决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并宣布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免受沙皇俄国的侵略、免受“俄国野蛮行为”的侵害等口号的堕落行为，就可以得到开脱。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 1891 年（恩格斯的文章发表一年之后）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日益逼近的大战的前景时直接说，“德国的胜利因而将是革命的胜利”[①]，“俄国要是发动战争，那就前进，冲向俄国人及其同盟者，不管他们是谁”[②]！

显然，按照这样的思路，那就不可能有产生革命的失败主义的余地，不可能有产生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的余地。

恩格斯的文章的缺点就是如此。

看来，恩格斯对于当时（1890—1891 年）已缔结好了的矛头针对德奥联盟的法俄同盟，甚感不安。因此，他的目的是要在自己的文章中攻击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使它失去欧洲的首先是英国的舆论的任何信任，但是在实现这个目的时，忽略了许多其他的极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造成了文章的片面性。

既然如此，是否还值得把恩格斯的文章刊载在我们的战斗性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作为指导性的文章，或者至少是作为极有教益的文章呢？因为很明显，把它刊载在《布尔什维克》上就是默然给它作这样一种推荐。

我认为是不值得的。

约·斯大林

1934 年 7 月 19 日

译自 1941 年 5 月《布尔什维克》
第 9 期第 1—5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4 卷第 4—10 页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169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185—186 页。——编者注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承蒙接见，不胜感谢。不久以前我去过美国，和罗斯福总统作了一次长谈，我想弄明白什么是他的领导思想。现在我来拜访您，是想详细地问一问，您在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世界……

斯大林：做得还很不够……

威尔斯：我有时候游历全世界，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斯大林：象您这样的大活动家，并不是“普通人”。当然，只有历史才能表明一个大活动家的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您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世界的。

威尔斯：我不是故意谦逊。我是指我竭力用普通人的眼光，而不是用有党派的政治家或十分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眼光来看世界。这次美国之行，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旧的金融界在崩溃，全国的经济生活以新的方式在改造。列宁当年曾经说过，要“学习做生意”，要向资本家学习这一点。现在资本家应当向你们学习，以便领会社会主义精神。我以为，在美国，问题是在于进行深刻的改造，是在于建立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您和罗斯福是从两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但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有没有思想上的联系、思想上的血缘关系呢？例如，我在华盛顿就曾经看到了这里所进行的事情：扩大管理机关，建立许多新的国家调节机关，组织各种各样的行政机构。象贵国一样，那里也是领导本领不够。

斯大林：美国的目的和我们苏联的目的不同。美国人所追求的目的，是从经济紊乱、经济危机的基地上产生的。美国人希望不改变经济基础，而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摆脱危机。他们力求把现存的经济制度所招致的破坏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我们国家里，您知道，旧的经济基础已被破坏，建立起了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基础。即使您所说的那些美国人能够部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这种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他们还保存着这种一定要导致而且不能不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制度。因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谈不到改造社会，谈不到消灭这种产生无政府状态和危机的旧的社会制度，而只是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这些美国人主观上也许认为他们是在改造社会，但是客观上在他们那里还保留着现今的社会基础。所以，客观上是不可能对社会进行任何改造的。

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能有的。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计划经济力求消灭失业。我们假定，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把失业减少到某种最低限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资本家，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完全消灭失业，消灭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失业工人后备军的使命，就是压制劳动市场，保证工资比较低廉的劳动力。您看，这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破绽。其次，计划经济要求加强产品为人民群众所特别需要的那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可是您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扩大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动机来进行的，哪一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比较高，资本就流向哪一个经济部门。您永远不能迫使资本家自己受损失，同意较低的利润率，以便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那么您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

威尔斯：您的话有好多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着重指出，如果整

个国家接受计划经济原则，如果政府逐渐地、一步步地开始彻底实行这个原则，那么最终金融寡头就会消灭，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就会建立起来。罗斯福的“新政”口号具有巨大的效果，而且据我看来，那是社会主义的口号。我觉得不要强调两个世界的对抗，要在当前环境下力求确立一切建设性力量间的共同语言。

斯大林：当我说在保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下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原则时，我丝毫不想以此贬低罗斯福的卓越的个人品质——他的主动、勇敢和坚决。毫无疑问，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脑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说，我相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个信念绝不意味着怀疑罗斯福总统个人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精神。但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您所说的那种目的。当然，在理论上并不排斥这样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逐渐地、一步步地走向您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解释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个目的。但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意味着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利润的代表者，稍微加强一下国民经济的调节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罗斯福或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其他首脑，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完全失败。要知道银行不在罗斯福手中，工业不在他手中，大企业、大农场不在他手中。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无论是铁路也好，商船也好，都掌握在私有主手中。最后，熟练劳动者大军、工程师和技师，他们也都不在罗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中，他们都是为私有主工作。不可忘记国家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职能。这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的机关，征收捐税的机构。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经济手中。 因此，不管罗斯福有多大的精力和能力，我担心他不会达到您所说的目的，

要是他真有这个目的的话。也许，经过几代以后，可以稍微接近于这个目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少有可能的。

威尔斯：也许我比您更相信从经济上说明政治。由于各种发明和现代科学，强大的力量得到了利用，这些力量导致把人们更好地组织起来，使人的集体更好地发挥作用，即导致社会主义。不管社会理论如何，把个人行动加以组织和调整，已成为客观的必然。如果从国家监督银行开始，进而监督运输业，监督重工业，监督一般工业，监督商业等等，那么这种无所不包的监督就等于把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国有化了。这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要知道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是象黑与白那样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有着许多中间阶段。有与土匪行为相近的个人主义，也有与社会主义意义相同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实现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经济组织者、熟练的技术知识分子，而这种知识分子是可以一步步地争取到社会主义组织原则方面来的。这是最主要的。因为首先是组织，然后才是社会主义。组织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组织，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只是一种思想罢了。

斯大林：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下，“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是难道能否认阶级之间的对立，有产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吗？一方面是有产者阶级，他们掌握着银行、工厂、矿山、运输业、殖民地种植园。这些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以外，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他们不服从集体的意志，他们力求使任何集体都服从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是穷人阶级、被剥削者阶级，他们没有工厂，没有银行，他们为了谋生

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他们被剥夺了满足自己最起码的需要的可能性。这些互相对立的利益和欲望，怎么能调和起来呢？据我所知，罗斯福并没有找到调和这些利益的途径。经验告诉我们，这也是不可能的。您对于美国的情况要比我知道得清楚些，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主要是根据书报来观察美国情形，但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方面，我却有一点经验，这种经验告诉我，如果罗斯福真的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满足无产者阶级的利益，那么资本家就会拿别的总统来代替他。资本家们会说，总统可以上台下台，我们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如果某一总统不能保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另找一个。总统能拿什么来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呢？

威尔斯：我反对这样简单化地把人类分为穷人和富人。当然，有专以发财为目的的一类人。但是这些人，难道不也象在这里一样被认为是障碍物吗？有一些人不是以发财为目的，他们有一定数量的钱，希望投资，由此获得利润，但是根本不认为这是自己活动的目的，这种人难道在西方很少吗？这些人把投资看作一种很勉强的必要。有一些有才干的和忠心耿耿的工程师、经济组织者，他们的活动不是受发财而完全是受其他刺激推动的,这种工程师、经济组织者难道很少吗？据我看来，有一个为数众多的实在是能干的人们组成的阶级，他们意识到现存制度的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使命是在将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起巨大的作用。近几年来，关于必须在广大的工程师、飞行员中间和军事技术界等等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我已做了许多，想了许多。对这些人作直截了当的阶级斗争宣传，是没有用的。这些人懂得这个变为血泊的世界是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但是他们认为你们那种简单的阶级斗争的对立是毫无意义的。

斯大林：您反对简单化地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当然，有中间阶层，也有您所说的技术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有很诚实的好人。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诚实的坏人。什么人都有，但是人类

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不否认中间阶层的存在,这些中间阶层不是站在这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方面,便是在这一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场。但是,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的这一基本划分和两个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忽视事实。这一斗争正在进行,而且还要进行下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由无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来决定的。

威尔斯:但是劳动的、劳动效率很高的、可是并不穷的人难道很少吗?

斯大林:当然也有小土地占有者、手工业者、小商人,但决定各国命运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生产社会一切必需品的劳动群众。

威尔斯:但是要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资本家。有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也有甘愿牺牲的资本家。例如,老摩根,他就是只想发财,他简直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只是把财富聚积在自己手中。可是我们看一下洛克菲勒,他是出色的组织者,他是组织石油销售的模范,值得仿效的榜样。或者看一下福特。当然,福特是很狡滑的,自私自利的,但他不是你们正要学习的合理化生产的热情的组织者吗?我要着重指出,最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对于苏联的社会舆论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其原因首先就是日本的态度和德国的事件。但也有不单是从国际政治产生的其他一些原因。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广大的各界人民认识了以私人营利为基础的制度正在瓦解。在这些条件下,我以为不应该过于强调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抗,而应该竭力把一切建设性运动、一切建设性力量尽可能地结合起来。我觉得我比您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认为世界离开旧制度死亡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斯大林:当我说到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时,我根本不打算以此来说明,他们都是一无所能的最不中用的人。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无疑是具有很大的组织能力的,这一点我绝不想否认。我们苏联人

向资本家学习很多东西。就说这个被你说得那么糟糕的摩根，无疑也是优秀的能干的组织者。但是，如果说到立志改造世界的人们,那么，在那些一心一意专事营利的人中间，当然是找不到这种人的。我们和那些专事营利的人站在对立的两极上。您说到福特。当然，他是能干的生产组织者。可是难道您不知道他是怎样对待工人阶级的吗？难道您不知道他毫无道理地把多少工人抛到街头吗？资本家是和利润血肉相连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和利润分开。资本主义将被工人阶级所消灭，而不是被生产“组织者”，不是被技术知识分子所消灭，因为这一阶层不能起独立的作用。要知道，工程师、生产组织者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而是按照别人的命令、按照主人的利益所要求的去做工作的。当然也有例外，这个阶层中间也有摆脱了资本主义欺骗的人。技术知识分子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创造“奇迹”，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利益。但是他们也能带来巨大的害处。我们苏联人对于技术知识分子有不少切身的经验。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抗拒这一建设，实行怠工。我们曾经多方努力把技术知识分子吸引到这一建设中来，对他们用了各种办法。经过不少的时间，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才走上了积极帮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们当中优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前列了。我们有了这一经验，就决不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造成危害，又能创造“奇迹”。当然，如果经过一次突击就能使技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脱离资本主义世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是空想。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据您看来，比方在英国和法国，这种人是很多的吗？不，愿意同自己的主人决裂而去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的呀！

此外，要改造世界，就应该有**政权**，这一点难道可以忽视吗？威尔斯先生,我觉得您非常低估政权问题,您根本没有想到它。要知道即

使有美好愿望的人，如果不能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和没有掌握政权，他们能做出什么来呢？最多他们只能协助夺取政权的新阶级，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世界翻转过来的。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这个阶级可以代替资本家阶级，成为象资本家阶级那样握有充分权力的主人。这样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当然，应该接受技术知识分子的帮助，而反过来又应该给技术知识分子以帮助。但是不应该认为技术知识分子能起独立的历史作用。改造世界是一个巨大、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要完成这个巨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远航必须有大船。

威尔斯：是的，但要远航，就必须有船长和领航员。

斯大林：对的，但要远航，首先就必须有大船。要是没有船，那么领航员算什么呢？是一个没有事做的人。

威尔斯：大船就是人类，而并不是阶级。

斯大林：威尔斯先生，看来，您是从一切人都是好人这个前提出发的。可是我没有忘记，有很多的坏人。我不相信资产阶级的好心。

威尔斯：我回想起几十年以前技术知识分子的情形。那时候技术知识分子很少，但是事情很多，每个工程师、技师、知识分子都找得到应用自己知识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个最不革命的阶级。今天技术知识分子太多，他们的情绪急剧地改变了。以前甚至听也不愿听革命言论的熟练知识分子，现在对革命言论感到兴趣了。不久以前我应邀参加了我们英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皇家学会的宴会。主席的演说赞成社会计划化和科学管理。三十来年以前，该学会甚至没有人会听我刚才说的话。而现在领导该学会的，是具有革命观点和主张科学地改造人类社会的人。你们宣传阶级斗争，是没有估计到这些事实的。情绪在改变。

斯大林：是的，我知道这一点，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陷入了绝境。资本家正在找寻但又找不到一个符合这个阶级的尊严、这个

阶级的利益的摆脱绝境的出路。他们可以部分地爬出危机，但是他们是找不到可以使他们昂着头走出来而根本不损害资本主义利益的出路的。当然，广大的技术知识界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开始觉悟到,他们跟那个能够指出摆脱绝境的出路的阶级有共同的利益。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什么是革命，而且在实践上是怎样，您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是否群众自己会在某个时候举行起义呢？您是否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少数人进行的这一事实是确定的真理呢？

斯大林：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干劲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也会束手无策。

威尔斯：哪怕是消极的支持吗？也许是下意识的支持吧？

斯大林：部分地也依靠半本能的支持，依靠半自觉的支持。但是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威尔斯：我观察了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我觉得这种宣传在现代条件下听起来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这种主张以暴力推翻社会制度的宣传，只有在某一暴政实行绝对统治的时代才是适当的。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统治的制度反正在毁坏，本来在解体，就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暴动上，面应该放在效率上，放在本领上，放在生产率上。我觉得暴动的调子已经陈腐了。在那些建设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看来，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是一种障碍。

斯大林：当然，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这是真的。然而人们正在作新的挣扎，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捍卫、拯救这个正在灭亡的制度，这也是真的。您从正确的断定中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您正确地断定旧世界是在毁坏。但是您认为它在自行崩溃，那就不对了。不，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

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保卫它，以防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他们，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制度的侵犯。

是的，您说旧社会制度在毁坏，这是对的，但是它不会自行崩溃。例如，就拿法西斯主义来说吧。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企图用暴力来维持旧世界的反动力量。您对法西斯分子将怎样办呢？劝告他们吗？说服他们吗？但要知道这对他们是不会有丝毫效力的。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尽力防止正在灭亡的旧制度击溃你们，别让旧制度给你们的双手戴上镣铐，你们是要用这双手去推翻这个旧制度的。您可以看得出来，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共产党人不能不估计到事实。

威尔斯：不过请您注意看一看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要知道这不简单地是制度的崩溃。这是那种蜕变为露骨暴徒行为的反动暴力的爆发。我觉得，在谈到跟这些反动的愚笨的暴徒冲突时，社会主义者应当诉诸法律，并且不要把警察看作敌人，而要支持警察跟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觉得，不可简单地用旧的、呆板的、暴动的社会主义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行动。

斯大林：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这个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已经衰亡的阶级不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请您回忆一下17世纪的英国历史。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说过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了吗？然而难道不需要克伦威尔用暴力去粉碎旧制度吗？

威尔斯：克伦威尔是依靠宪法和以立宪制度的名义行动的。

斯大林：为了宪法他采用了暴力，处决了国王，解散了议会，逮捕了一些人，杀了另一些人！

再从我国历史中举个例子吧。难道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不是知道沙皇制度在腐朽，在崩溃吗？然而为了推翻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啊！

而十月革命呢？难道知道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指出了唯一正确出路的人还少吗？难道人们不懂得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吗？但是您知道，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我们进行了多么大的抵抗，我们流了多少血啊！

或者再看一看 18 世纪末的法国。在 1789 年以前很久，许多人就已经知道，王权和农奴制度腐朽到了什么地步。但是没有人民起义，没有阶级冲突，对它们就没有办法而且也不可能有办法。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直到最后才相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要他们确信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坏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的阶级拿起武器，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使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

威尔斯：但领导法国大革命的还有不少律师。

斯大林：难道您否认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吗？难道法国大革命是律师的革命，而不是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保卫了第三等级的利益并取得了胜利的人民革命吗？难道法国大革命领袖中间的律师们，是按照旧制度的法律行动吗？难道他们没有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法制吗？

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共产党人掌握了这个历史经验。共产党人是会欢迎资产阶级自愿地退出舞台的。但是经

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不知道应当彻底消灭敌人的统帅呢？做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您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正是一种革命的合适方法。

威尔斯：我绝不否认暴力的必要性，但是我认为斗争形式应当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现存法律所给予的可能性，应当保卫这种可能性不受反动的侵犯。旧秩序之所以用不着加以瓦解，是因为它本身正在充分地瓦解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反对秩序、反对法律的斗争，是一种陈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我有意地要夸张一点，以便更清楚地显示真理。我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如下：第一，我拥护秩序；第二，既然现存制度不保障秩序，我就要抨击它；第三，我认为宣传阶级斗争思想，会把社会主义同恰好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们隔离开来。

斯大林：为了进行巨大的严重的社会事业，必须有一个主力，支柱，即革命阶级。其次,必领把辅佐力量对这个主力的援助组织起来，这个辅佐力量在目前情况下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力量也可以加入的党。您刚才说到“受过教育的人们”，但您所指的是哪一种受过教育的人呢？不论在 17 世纪的英国，在 18 世纪末的法国，在十月革命时代的俄国，难道站在旧秩序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是很少的吗？有很多受过很高教育的人站在旧制度方面，替旧制度服务，他们维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很明显，蠢才是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的。我并不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地，我却强调他们的作用。问题只在于，说的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各种各样的。

威尔斯：如果不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那就不可能有革命。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例子，它不曾触动旧的教育制度，因而它从未成为共和国；另一个是英国工党的例子，它坚持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的决心不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意见。现在让我来回答您所提出的三点：

第一，对于革命来说，主要的就是要有社会支柱。这个革命支柱就是工人阶级。

第二，必须有辅佐的力量，共产党人把这种力量称作党。具有知识的工人以及技术知识分子中间跟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分子，都可以加入这个党。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是强有力的。如果他们反对工人阶级，那么他们就变成毫不足道的人了。

第三，必须有政权作为改革的杠杆。新政权建立新法制、新秩序，这种秩序就是革命秩序。

我不是拥护任何的秩序。我只拥护与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秩序。如果旧制度的某些法律可以被利用来为争取新秩序而斗争，那就应当也利用旧法制。您说既然现存制度不保障人民所必需的秩序，就应该加以抨击；对您的这个意见，我是没有丝毫异议的。

最后，如果您认为共产党人醉心于暴力，那就不对了。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让位给工人阶级，那么共产党人是会乐意放弃暴力方法的。但是历史经验是否定这个假设的。

威尔斯：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阶级自愿把政权让给另一个阶级的例子。在1830年到1870年这个时期中，未经过任何残酷斗争便发生了贵族自愿把政权转交给资产阶级的过程，贵族的影响到18世纪末还是很大的，而资产阶级则是君主制的多情的支柱。政权的这一转移，后来便导向金融寡头统治的确立。

斯大林：可是您不知不觉地从革命问题转到改良问题了。这不是同一个东西。您不认为宪章运动在19世纪英国的改良事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吗？

威尔斯：宪章派做的事情很少，而且已经销声匿迹了。

斯大林：我不同意您的意见。宪章派和他们所组织的罢工运动曾起了巨大作用，曾经迫使统治阶级在选举制度方面、在消灭所谓“衰败城镇”[①]和实行“宪章”某几条方面作了许多让步。宪章派曾经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并且促使一部分统治阶级为了避免重大的震动而作了一些让步，实行了一些改良。一般地应该说，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英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贵族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看来，从维持他们的政权看来，都是最聪明、最圆滑的。我们就从现代历史上举一个例子吧。比如1926年英国总罢工。当时工联总理事会号召罢工，任何资产阶级遇到这种事件，首先就会逮捕工联领袖。英国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从他们的利益看来，他们是做得很聪明的。不论在美国、德国、法国，我都不能想象资产阶级方面会有这样圆滑的阶级战略。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英国统治阶级从来不惜实行若干小的让步和改良。但是以为这些改良是革命，那就错了。

威尔斯：关于我国的统治阶级，您的评价比我的要高。但是一般讲来，小的革命和大的改良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很大呢？改良不是小的革命吗？

斯大林：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作革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通过改良，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使一种制度悄悄地过渡到另一种制度来实现。

————————————

① “衰败城镇”，是指英国18世紀末和19世纪初一些人口减少但仍沿袭旧制享有选举议员权利的小城镇和乡村。这种特权后被取消。——编者注

威尔斯：我很感谢您这次谈话，因为它对我有很大的意义。您在给我解释时，大概回忆起了您在革命前的地下小组里阐明社会主义原理的情形。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每一句话是千百万人注意听的。这就是您和罗斯福。其他的人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不会有人登载，不会有人理会。我还不能评价贵国所进行的事情，因为我昨天才到这里。不过我已经看见了健康的人们的幸福面容，我知道你们正在进行一种非常重大的事业。跟 1920 年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斯大林：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更聪明些，那么我们做的事情也许还多些。

威尔斯：不，如果人们全都更聪明些。不妨想出一个改造人类头脑的五年计划，因为人类头脑显然还缺少为完善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很多东西。

斯大林：您是不是打算出席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呢？

威尔斯：可惜得很，我杂务在身，只能在苏联逗留一星期。我这次来是为了会晤您，我对我们的谈话深为满意。但是我打算跟我能够会见的苏联作家谈谈他们能否参加笔会的问题。这是高尔斯华绥所创立的一个国际作家组织，在他逝世以后我就担任了主席。这个组织还是很薄弱的，可是它在很多国家里都有分会，而且（这是更重要的）该会会员的言论可以广泛地发表出来。这个组织坚持有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权利，连反对的意见也在内。我打算和马克西姆·高尔基谈一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允许有这样广泛的自由。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这一点叫作“自我批评”。它在苏联是广泛地运用的。

如果您有什么愿望的话，我是乐意帮助的。

威尔斯：谢谢。

斯大林：谢谢您和我的谈话。

康·乌曼斯基记录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0版
第599—613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4卷第11—26页

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

瓦纳格小组[①]没有完成任务，甚至对任务本身也不理解。这个小组编的是**俄罗斯**历史提纲，而不是**苏联**历史提纲，也就是说，编的是罗斯历史提纲，而没有包括加入苏联的各民族的历史（没有照顾到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各民族、中亚细亚和远东各民族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部各民族——鞑靼人、巴什基尔人、莫尔多瓦人、楚瓦什人等等的历史材料）。

提纲中没有着重指出俄国沙皇政府协同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一起实行兼并和殖民主义的作用（“沙皇政府是各民族的监狱”）。

提纲中没有着重指出俄国沙皇政府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起到19世纪50年代和以后在对外政策方面所起的反革命作用（“沙皇政府是国际宪兵”）。

提纲中把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前的时期（当时农民还没有成为农奴），把专制的国家制度和封建制度〈当时俄罗斯还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半国家）混淆在一起。

提纲中把反动和反革命，把“一般”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概念混淆在一起。

提纲中没有指出被沙皇政府所征服的俄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和根源，因而把这些人民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革命——

---

① 1934年5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关于苏联学校中历史教学的决定》中，批准了新历史教科书编写小组名单，其中包括以瓦纳格教授为组长的《苏联历史》教科书编写小组成员。——编者注

十月革命的理由，没有得到说明，同样，建立苏联的理由也没有得到说明。

提纲中充满了各种陈腐的老一套的提法，如“尼古拉一世的警察恐怖”、“拉辛之乱”和“普加乔夫之乱”、“19 世纪 70 年代地主反革命的进攻”、“产业革命的最初步骤”、“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同 1905—1907 年的革命作斗争的最初步骤”等等。提纲的编撰者盲目地照抄各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陈腐的和完全不科学的提法，忘记了他们应该教给我们的青年以马克思主义的、有科学根据的提法。

提纲没有反映出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提纲的编撰者显然忘记了，俄国革命家认为自己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名大师的学生和追随者。

提纲没有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根源和作为西欧帝国主义列强的后备军的沙皇政府在这个战争中的作用，同样也没有指出俄国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主义对西欧资本的依赖，因此，十月革命作为使俄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解放者的意义，没有得到说明。

提纲中没有讲到世界大战前夜整个欧洲存在着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也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议会制的衰落，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体现者和使工农摆脱资本主义的机关的意义，没有得到说明。

提纲中没有讲到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和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表现的斗争。

诸如此类等等。

一般的应该说，提纲编撰得极其粗糙，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文理上也是不太通的。

至于提纲的体裁不够恰当，玩弄“字眼”，例如把伪德米特里叫作“被人称作的”德米特里，又如“18 世纪老封建主的胜利”（但是，

不知道“新的”封建主在哪里，他们的表现怎样，如果在这个时期他们是存在的话〉等等，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认为，必须根据上述几点的精神根本改编提纲，同时应该估计到，这里说的是编撰**教科书**,因而应该斟酌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提法，而不是登在杂志上的不负责的文章,可以毫无责任感地随便乱讲一通。

我们需要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是，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这是第一，而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又不脱离整个欧洲历史，并且一般的也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

约·斯大林
安·日丹诺夫
谢·基洛夫
1934 年 8 月 8 日

译自 1936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
第 3 期第 63—64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4 卷第 27—29 页

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

（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

由于近代史的本身内容最丰富，事件太多，同时由于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近代史中（如果是指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最主要的是法国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欧洲和美洲的确立，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近代史教科书从法国革命那章开始就比较好。为了要和以前的事件联系起来，可以在前面写一篇不长的引言，简要地叙述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的主要事件，而把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的详细叙述，放到中世纪史教科书的末尾去。

因此我们建议，把第一部分（共 6 章）即整个第一篇从提纲中删去，代之以简要的引言。

我们认为，提纲的主要缺点是，对法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深刻差别和对立，强调得不够突出。而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这一思想，应该成为近代史教科书的主要中心。阐明法国的（以及一切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把人民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但又给他们套上新的锁链——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锁链，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则粉碎了一切锁链，并且把人民从一切形式的剥削下解放出来，——这应该是贯穿近代史的一条红线。

所以，不容许把法国革命简单地称作“大”革命，而应该把它称为和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

同样，也不能把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该把它称为和解释为**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

因此，应该改编近代史教科书的提纲，同时要选择相应的提法和

术语。

我们认为,提纲中把近代史分为两部分是没有理由和没有根据的,是按照某种不可理解的标志划分的,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

第一部分——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这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

第二部分——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这是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巴黎公社给了资本主义第一次打击、旧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以及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苏联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时期。

第三部分——从1918年末（战争结束的一年）到1934年末。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是法西斯主义和加紧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时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时期，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最后残余根除的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胜利和高涨、社会主义在农村中胜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胜利的时期。我们认为提纲的编撰者把历史中断在1923年是一个大错误。应该纠正这个错误，将历史写到1934年末。针对这点，必须将材料、篇章进行改编和重新分配。

最好是把提纲中那些陈腐的老一套的说法，如“旧制度”、“新制度”等删去。旧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前的制度”比较好，或者代之以“封建专制制度”就更好，而“新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了这样的变更，所谓“新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同成为人类社会制度更高类型的苏联的苏维埃制度比较，就显得是旧制度了。

最好把提纲中过多的“时代”也删去。“执政府时代”、“拿破

仑时代”、“督政府时代”——时代不是太多了吗？

我们认为，提纲中谈殖民地问题的篇幅太少，也是不对的。对乔治·桑·施本格勒、吉卜林这样一些人注意的相当多，而对殖民地问题和譬如说象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状况，注意的却少了。

同样，最好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这种提法改为“德意志和意大利重新统一为独立国家”。否则，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不是指象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一些以前分裂的国家争取重新统一，而是指把这两个国家统一为一个国家。

总的说来，我们的意见是，近代史提纲比苏联历史提纲编得较有条理，但是在这个提纲中混乱的地方仍然相当多。

约·斯大林

谢·基洛夫

安·日丹诺夫

1934 年 8 月 9 日

译自 1936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第 3 期第 65—66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 14 卷第 30—32 页

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的讲话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曾经经历过技术人才缺少的时期。我们曾经面临过这样的抉择：或者是先在技术学校中训练人才，而在学校还没有培养出技术干部时，把生产和大量使用机器推迟 10 年；或者是立即开始制造机器，在国民经济中大量使用机器，以便在生产和使用机器的过程中训练技术人才，培养干部。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由于缺少受过技术训练和善于使用机器的人才，因此在走这条道路时，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笔费用和额外开支，但是我们公开而自觉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诚然，在这段时期内,损坏了不少机器,但是我们却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造就了经济工作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干部。在 3—4 年中，我们不但在各种机器(拖拉机、汽车、坦克、飞机等等）的制造方面,而且在大量使用机器方面,都培养了许多技术干部。在欧洲要花几十年才能办到的事，我们却在 3—4 年内就大致上和基本上完成了。这就绰绰有余地抵偿了这些费用和额外开支、机器的损坏和其他损失等。这就是我国迅速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我国的钢铁工业办得没有成绩，没有发展起来，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成就。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钢铁工业已获得了巨大成就。是的，我们已取得了胜利。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成就而骄傲起来。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忘记缺点，忘记今后的任务，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指出冶金工作者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并向他们提出了希望。

斯大林同志说：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钢产量都超过生铁产量。有些国家的钢产量超过生铁产量25—30%。在我国却相反，钢产量低于生铁产量。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呢？要知道现在已不能把我国看作是一个“木材的”国家，一个没有废铁的国家等等。现在我国已是一个金属的国家了。难道现在还不是消灭生铁和钢生产之间的不协调现象的时候吗？

斯大林同志要冶金工作者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各冶金工厂平炉车间和轧钢车间在熟悉和掌握技术方面存在的落后现象。

斯大林同志说：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党的“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①]的口号。很多人机械地去理解这个口号，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机器，似乎就做到了这个口号所要求的一切。这是不正确的。技术是不能脱离使用技术的人的。离开了人，技术就是死的东西。“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一口号指的并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以掌握技术的人为主的技术。只有这样来理解这个口号才是正确的。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重视技术，那就应该公开说，目前最主要的是掌握技术的人才。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如果过去片面地强调技术，强调机器，那么现在就应该强调掌握技术的人才。这是我们关于技术的口号所要求的，应该爱护每一个有才能的、懂得技术的工作人员，应该爱护他，培养他。应该象园丁培植心爱的果树那样，关切地和细心地培养人才。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成长，让他们看到前途，及时地提拔他们，如果一个人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就应当及时地调换别的工作，而不要等到他最后失败时才调动。关切地培养人才，评定人才，在生产中正确地配备人力，组织人力，实行能巩固决定性的生产环节并推动人们

———————————————

① 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75页。——编者注

去达到更高的熟练程度的工资制，这就是我们为培养人数众多的生产技术干部大军所应该注意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对各工厂厂长说：你们那里并不是一切都能令人满意的。在炼铁方面，你们已经多少培养和配备了一些有经验的技术人才，但是在冶金工业的其他环节上你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钢和钢材的生产才落后于生铁的生产。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最终消灭这个缺点。请注意，除了生铁以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钢和钢材。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 年版第 192—194 页

二[①]

斯大林同志说：

——巴尔金同志，您说得不对。您说的工作，光靠党是不能完成的。同党一起参加这个工作的，也有象您这样的非党人士和老专家。光靠党是不能在 1917 年 10 月完成革命的。当时参加革命的党员一共才 13 万人。

党的功绩是什么呢？这就是党能够组织群众，能够使大家都来工作，能够作出正确的工作指示。要是你们记得过去关于生铁生产的讨论，如你们大概会知道当时曾经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铁决不可能超出 1000 万吨，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铁必须达到 1700 万吨。

党能够权衡轻重，适当地引导工作，使之达到一定的，当时可能

——————————————

① 以下摘自苏联科学院院士、冶金学家伊·巴·巴尔金所写的《远大的目光》一文。巴尔金在这篇文章里回忆说，接见中，当他发言强调指出钢铁战线的胜利只有在斯大林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时，斯大林接着讲了这一段话。——编者注

达到的水平：1000 万吨。为了使工业达到这个水平，当时除了机器以外，还必须培养和得到能利用这些机器进行工作的相应的干部。

你们知道，过去我国的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是怎样一个状况。从前我们没有拖拉机，也没有航空工业。现在我们两者都有了。当时必须选择：或者是首先训练出使用这些机器的人才，然后才大量生产机器；或者是马上就大量生产机器，让成千上万的人在运用机器的过程中学会使用机器。第一条道路太遥远了。第二条道路比较近一些，能使我们在培养千部方面赢得时间，虽然也要求付出一定的牺牲。我们走上了第二条道路。我们没有错，因为我们走了这条道路，就在短时期内造就了大批干部、拖拉机手和飞行员。这样，我们在培养大批的干部方面就赢得了最重要的东西——时间。

同志们，培养干部是件大事情。你们是怎样培养炼铁工人、炼钢工人和轧钢工人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我希望同志们在下面的发言中谈谈钢铁工业中的干部情况，谈谈培养熟练工人和专家的情况。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不是一个冶金工作者，但是，我知道，在各个国家中，钢的生产比生铁的生产多 25%。而我国则恰好相反，钢落后于生铁。我希望听到同志们谈谈每个工厂和整个钢铁工业究竟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才能消灭这种不协调的现象。我知道，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可以通过建造新平炉的办法来消灭。平炉我们正在建造，今后还要继续建造。但是，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大概也可以通过扩大平炉生产能力的办法来消灭，这一点，从你们关于冶金工厂工作的资料中可以看得出。有些工厂工作得好，有些工作得差。原因何在呢？为什么不能够使所有的工厂都工作得好呢？是什么东西在起阻碍作用呢？我想得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译自 1935 年 11 月 7 日《真理报》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 14 卷第 33—36 页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农庄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①]

（一九三五年二月）

如果你们想巩固劳动组合，如果你们想有一个包括千百万农户，而不是几户或几百户的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如果你们想达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在现时的条件下就应当在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共同利益之外，务必考虑他们的个人利益。……

你们说给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不得超过十分之一公顷，这就是一点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你们有些人认为不能给他们奶牛，另一些人认为不能给他们母猪。总之，你们想卡集体农庄庄员。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是不对的。

你们是先进人物。我理解你们是很关心集体农庄制度，很关心集体农庄经济的。但是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和你们一样吗？你们在集体农庄中毕竟是少数。而多数人想的不大一样。应不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应当考虑的。

如果你们的劳动组合还没有极丰富的产品，如果你们不能供给集体农庄所有庄员及其家庭所需要的一切，那么，集体农庄就不能承担起既满足公共需要又满足个人需要的担子。在这种情况下，倒不如直

————————————————

① 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2月11—17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大会于2月14日选出了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斯大林的这篇讲话全文未见发表，这里摘录的是苏联《真理报》1935年3月13日的社论《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引用的部分。——编者注

率地说，某一部分工作是公共的，而某一部分工作是个人的。倒不如直率地、公开地、老实地承认集体农庄的农户应有自己的个人的经济，它规模不大，但是是个人的。倒不如立足于既要有满足公共需要所必需的公有的、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组合经济，也要有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需要所必需的不大的个人的经济。既然有家庭、孩子、个人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那就不能不加以考虑。而你们也没有权利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个人日常生活的利益。否则就不可能巩固集体农庄。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农庄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是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所在。

译自1935年3月13日《真理报》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4卷第38—39页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同志们！不可否认，我们近来无论在建设方面或在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是在我们这里人们就过多地谈论起领导人的功绩，领袖们的功绩来了。人们把所有一切，几乎把我们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他们。这当然是不对的，不正确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领袖。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一点。我想就干部问题，就我们所有的干部，其中也包括我们红军的干部问题讲几句话。

大家知道，我们从旧时代所得到的遗产，是一个技术落后的、近于赤贫的和遭到破坏的国家。它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又遭到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在这个国家里，居民很少识字，技术水平很低，工业好象零星的孤岛淹没在无数极小农户的汪洋大海中，——我们从旧时代继承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时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国家从中世纪和愚昧无知的轨道转到现代化工业和机械化农业的轨道上去。可见，任务是严重而困难的。当时，问题这样摆着：**或者是**我们在最短期间解决这个任务并在我国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或者是**我们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时我们这个技术薄弱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玩物。

我国当时处在技术极其缺乏的时期。没有足够的机器供应工业。没有机器供应农业。没有机器供应运输业。没有国家工业改造所绝对必需的起码的技术基础，而只有一些创立这种基础的前提。当时必须创立头等的工业，必须使这个工业在技术上不仅能够改造工业，而且

能够改造农业并改造我国的铁路运输业。为此必须作出牺牲，在各方面厉行节约，节约饮食，节约教育经费，节约布匹，以便积累建立工业所必需的资金。那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克服十分缺乏技术的困难。列宁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我们在这一事业中也正是踏着列宁的足迹前进的。

当然，在这样巨大而困难的事业中，决不能期望获得接连不断的和迅速的成功。在这种事业中，只有经过几年以后，才会看到成就。因此必须用坚强的精神、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顽强的耐心，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克服最初的挫折，坚定不移地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不许在自己的队伍里有动摇和犹豫。

大家知道，我们正是这样进行这一事业的。可是，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具有足够的顽强精神、耐心和坚定性。当时在我们的同志中，有些人开头遇到一些困难，就叫人退却。常言道："既往不咎。"这固然是对的。但是，人既然有记性，在总结我们的工作时就会在无意中想起过去的事情来。我们当时确实有一些同志是害怕困难并叫党退却的。他们说："你们的工业化、集体化、机器、钢铁工业、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倒不如多给一些布匹，多买一些生产日用品的原料，多给人们一些美化日常生活的零星物件更好些。要在我国落后的情形下建立工业，而且是头等的工业，这是危险的幻想。"

当然，我们当时也可以把我们厉行节约获得的、花在建立我国工业上的30亿外汇卢布，拿去进口原料，增加日用品的生产。这也是一种"计划"。可是，如果我们采用了这种"计划"，我们就不会有冶金业，就不会有机器制造业，就不会有拖拉机和汽车、飞机 和坦克了。我们在外来敌人面前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人。我们就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就会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俘虏。

显然，当时必须在两个计划中间选择一个：一个是退却的计划，

是要使社会主义遭受失败，而且不能不使社会主义遭受失败的计划；另一个是进攻的计划，是要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胜利，而且你们知道，是已经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了胜利的计划。

我们选择了进攻的计划，循着列宁的道路前进，而撇开了那些同志，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东西，却根本不愿看见我国最近的将来，不愿看见我国社会主义的将来。

可是，这些同志并不始终只限于批评和消极抵抗。他们还以在党内举行暴动反对中央委员会来威胁我们。他们甚至曾用子弹威胁过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看来，他们指望吓倒我们，迫使我们离开列宁的道路。这些人显然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具有特殊气概的人。他们忘记了，布尔什维克不是用困难和威胁所能吓倒的。他们忘记了，把我们锻炼成钢的是在斗争中不知道和不承认恐惧为何物的伟大的列宁，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我们的父亲。他们忘记了，敌人愈是发疯，党内的反对者愈是歇斯底里地发狂，布尔什维克就愈加奋发地进行新的斗争，愈加急速地向前迈进。

当然，我们也根本没有打算过离开列宁的道路。而且，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站稳脚跟以后，扫除路上的种种障碍，更加急速地前进了。固然，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时曾经不得不狠狠地打击了这些同志中间的某些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应当承认，对于这件事我也是出了一臂之力的。

是的，同志们，我们是充满信心地、一往直前地沿着使我国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道路前进的。现在这条道路可以认为是已经走过来了。

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已经拥有强大的头等的工业，强大的机械化的农业，日益发展的和蒸蒸日上的运输业，有组织的和装备精良的红军。

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度过了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

可是，度过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新的时期，

进入了我认为是十分缺乏人才、缺乏干部和缺乏能够驾驭技术并推进技术的工作者的时期。问题在于我们有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运输业、军队，我们有技术来装备所有这一切部门，但是缺乏具有足够的必要的经验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从前我们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曾经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在一切工作部门里建立了极其广泛的技术基础，使我们能够用头等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人才。这是很好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数量的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么我们国家所得到的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能说我们的人都已经充分了解到和认识到这个新口号的伟大意义了吗？我看不能这样说。否则，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不会有人时常用一种岂有此理的态度去对待人才、对待干部、对待工作者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对我们的工作者，对无论在哪个部门中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采取最关切的态度，用心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支持时帮助他们，当他们做出初步成绩时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前进等等。而实际上我们却往往看到人们对工作者竟采取一种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态度和简直是岂有此理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往往不去考察人才，不是先考察后任用，而是往往象对待小卒子那样把他们摆来摆去。重视机器，报告我们工厂里有多少

技术设备，这一点已经学会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人用同样的热情来报告说，我们在某个时期内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怎样帮助这些人才在工作中成长起来和受到锻炼，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工作者，重视干部。

我回想起了我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碰见的一件事。这是在春季涨水时发生的。当时有 30 个人到河里去捞取被波涛汹涌的大水冲下來的木料。当傍晚他们回到村里时，却少了一个同伴。当我问第 30 个人在哪里时，他们冷淡地回答道：第 30 个人“留在那里了”我问：“怎么会留在那里呢？”他们又同样冷淡地回答道；“那还要问什么，当然是淹死了。”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忙着要走，说是“要给母马饮水去”。我责备他们对人还不如对牲畜那样爱惜，他们中间便有一个人在其余的人的赞同下回答道：“干吗我们要爱惜人呢？人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来的。而母马呢……你试一试去做出一匹母马来看。”你们看，这件事也许不太重要，但是很能说明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领导人对人才、对干部采取的冷淡态度以及不会重视人才，就是上述这个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发生的事情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对人的奇怪态度的残余。

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想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让我举杯祝贺我们的红军高等院校毕业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你们在组织和领导我国国防事业中获得成就！

同志们！你们已经在高等学校毕业了，你们在那里受到了初步的锻炼。但是，学校还只是一个预备阶段。干部的真正锻炼，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在学校以外，在同困难作斗争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的。同志们，要记住：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难，不躲避困难，反而前去迎接困难，以便克服和消灭困难的干部，才是好的干部。真正的干部，只有在同困难作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如果我们的军队拥有足够数量的真正受过锻炼的干部，那它就将是无敌的。

同志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
第525—530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4卷第41—46页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见集体农庄种植甜菜的女突击队员时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新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个新生活我们叫作集体农庄的生活，社会主义的生活。我们听到了一些纯扑的劳动者的朴素的发言，她们讲述了她们为了在竞赛中获得成就是怎样进行斗争和克服困难的。我们听了一些不平常的妇女的讲话，我要说，这些妇女是劳动英雄，因为只有劳动英雄才能获得她们所取得的那种成就。过去我国没有这样的妇女。我已经 56 岁,阅历不少，也见过很多男女劳动者，但是这样的妇女我没有见过。这是一批完全新的人。只有自由的劳动，只有集体农庄的劳动，才能在农村中产生这样的女劳动英雄。

在旧时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妇女。

不妨想一下，在从前，在旧时代里，妇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当一个妇女还在做姑娘的时候，她就被看作劳动者中所谓最下等的人。她为父亲一刻不停地工作，但父亲骂她时还要说：“你是我养活的。”在她出嫁以后，又得为丈夫工作，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得做什么，而丈夫在骂她时也是这样说：“你是我养活的。”农村妇女曾经是劳动者中最下等的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在农妇中是不可能出现劳动英雄的。当时，对妇女来说，劳动是一件可诅咒的事情，她们要千方百计地逃避它。

只有集体农庄的生活才能便劳动成为光荣的事情，只有这种生活才能在农村中产生出真正的女英雄。只有集体农庄的生活才能消灭不

平等的现象，才能使妇女翻身。这一点你们自己都是很清楚的。集体农庄采用了劳动日制。劳动日制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是在劳动日面前人人平等，男人也好，妇女也好。谁做的劳动日多，谁挣的也多。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父亲或是丈夫，都不能责骂妇女，说她是靠他养活的。现在，妇女只要参加劳动就有劳动日，她自己是主人。我记得，我在集体农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和几个妇女同志谈了一次话。有一个来自北方边疆区的妇女同志说：

“大约两年以前，任何一个求婚的人都不愿意瞧一瞧我的院子。我是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现在我有500个劳动日。现在怎样呢？求婚的人多得不得了，他们都说想和我结婚。而我呢，还得考虑考虑，我要自己挑选一个未婚夫。”

集体农庄的劳动日制使妇女获得了解放并使她们成为独立的人。现在，妇女在做姑娘时不是为父亲工作，出嫁以后也不是为丈夫工作，她首先是为自己工作。这就是农妇的解放，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这种制度使劳动妇女和所有劳动的男子一律平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一些出色的妇女。因此，我把今天的会见不简单地看成是先进人物和政府成员们的普通会见，而看作是一个检阅解放了的妇女劳动的成就和能力的节日。我认为政府应当表扬到这里来向政府报告她们的成就的女劳动英雄。

怎样庆祝今天呢？我和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加里宁、米高扬等同志在这里商议了一下，认为应当请求政府授予我们的女劳动英雄以列宁勋章，授予小组长以列宁勋章，而授予一般突击队员以劳动红旗勋章。当然，应该特别表扬玛丽亚·杰姆钦科同志。

伏罗希洛夫：她真行。

莫洛托夫：她是主要人物。

斯大林：我认为对这整个事情的倡导人玛丽亚·杰姆钦科，除了

授予她以列宁勋章外，还应当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嘉奖，并授予她的小组的女庄员们以劳动红旗勋章。

喊声：她们都在这里，只有一个没有来。她病了。

斯大林：生病的也要奖励。我们想这样来庆祝今天这个日子。

译自《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竞赛》
1941 年版第 201—203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4 卷第 55—57 页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①]上的讲话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1.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

同志们！关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说得很多，而且说得很好，因此我实在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可是，既然你们把我叫到讲台上来了，我总得说几句话。

不能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看作是一个普通的男女工人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定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册最光荣的篇章之一的男女工人运动。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就在于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为什么是新的阶段，为什么是更高的阶段呢？因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一社会主义竞赛形式，比社会主义竞赛的旧阶段优越。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第一个阶段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而且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

——————————————

① 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于1935年11月14—17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参加会议的有3000名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编者注

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座的这些人，象斯达汉诺夫、布瑟金、斯梅塔宁、克里沃诺斯、普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术、驾驭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三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这都是新的特殊的人才。

其次，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以打破当前的技术定额，打破现有的设计能力，打破现行的生产计划和平衡表为目的的男女工人运动。所以要打破这些定额，是因为它们对现在来说，对我们的新人才来说，已经是陈旧的了。这个运动打破了旧的技术观点，打破了旧的技术定额、旧的设计能力和旧的生产计划，而要求规定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设计能力和生产计划。它负有在我国工业中进行一场革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其实是一次深刻的革命运动。

这里有人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表现，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而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劳动生产率的典范。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因为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

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但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并把我

们苏联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会，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否则，就绝对不会有丰裕的产品和各种消费品。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

但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还不止这一点。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的需要、而是按他为社会所做的工作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很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依然存在，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能保证消费品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只得不按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而按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消费品。

共产主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所做的工作、而是按他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的需要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足以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的高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而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可以保证消费品十分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就有可能按各个成员的需要来分配这些消费品了。

有些人以为，可以在工程师和技师即脑力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降低到中等熟练工人水平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的方法来做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才这样来想象共产主义。其实，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如果以为没有提高到这种水平的可能，那就可笑了。这在苏维埃制度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因为在

这里，全国的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劳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压迫，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有受到完备的技术教育的一切机会。毫无疑问，只有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为了开始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需的高度劳动生产率和丰裕的消费品。

因而，从这方面看来，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正是包含着我国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的萌芽，虽然还是幼弱的萌芽，但毕竟是萌芽。

真的，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志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年轻的或中年的男女工人，是有文化素养、有技术素养的人才，他们作出了工作严格认真的榜样，善于在工作中珍惜时间的因素，学会了不仅用分而且用秒来计算时间。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学过所谓基本技术知识，而且还在继续充实自己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的那种保守主义和思想僵化；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正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今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不很多，可是明天他们会增加 10 倍，——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很明白吗？

同志们，这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意义。

当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着手打破旧的技术定额时，他们是不是想到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这种伟大意义呢？当然没有。他们当时所关心的，是力求使企业消除完不成计划的现象并超额完成经济计划。但他们在力求达到这一目的时，必须打破旧的技术定额，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程度。然而，如果以为这个情况会多多少少降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那就可笑了。

关于1905年第一次在我国组织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些工人，也可以这样说。他们当然没有想到工人代表苏维埃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们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只是为了防御沙皇政府的进攻，防御资产阶级的进攻。但是，这个情况丝毫也不与下述这件毫无疑义的事实相矛盾，即列宁格勒工人和莫斯科工人在1905年开始的争取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运动，归根到底导致了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资本主义的毁灭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2.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

现在我们站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摇篮边，站在这个运动的泉源旁。应当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某些特点。

首先令人注意的事实，就是这个运动是自行开始的，几乎是自发地开始的，由下面开始的，并没有受到我们各企业行政方面的任何推动。不仅如此，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违反我们各企业行政的意志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向你们说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锯木工人穆辛斯基同志不知受了多少罪，他背着经济组织，背着检验员，暗中作出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斯达汉诺夫本人的遭遇也并不见得好些，因为在他前进时不仅须要防御某些行政人员，而且须要防御某些因他“标新立异”而讥笑和诽谤他的工人。至于布瑟金，那么大家知道，他由于自

己的“标新立异”，几乎失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幸亏车间主任索科林斯基同志出来干涉，这才把他留在厂里了。

由此可见，如果要说我们各企业行政上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起过什么作用，那么这种作用不是为了帮助它，而是为了阻碍它。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从下面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运动。正因为它是自行产生的，正因为它是来自下面的，所以它是现代最富有生命力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

其次，还应当讲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地，而是象飓风那样空前迅速地传播到我们苏联全国各地的。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呢？斯达汉诺夫把采煤的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甚至更多。布瑟金和斯梅塔宁也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而另一个是在制鞋工业方面。报纸报道了这些事实。于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焰就立刻燃遍了全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传播得这样快呢？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是两个大组织家，在苏联各州各区有很多关系，而且亲自组织了这件事情吧？不是，当然不是！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居心要成为我国伟人，而亲自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星散布到全国各地去的吧？同样不是。你们在这里已经看见了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他们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是谦虚朴实的人，没有任何想做全苏伟人的野心。我甚至觉得，他们看到这个运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在我国发展成这样的规模，还有些困惑。虽然这样，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两人点燃的火星，也已经足以使这件事情发展成了熊熊火焰，那就是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件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只有完全成熟的，有一触即发之势的运动，才能这样快地传播，才会象雪球那样愈滚愈大。

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呢？这个运动传播得这样迅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斯达汉诺夫运动有哪些根源呢？

原因至少有四个。

（1）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基础，首先就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根本改善。生活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于是就产生了高的生产定额。于是就产生了男女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首先就在这里。如果我国有危机，如果我国有使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失业，如果我国人民生活得不好，不象样，不愉快，那么我国是决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在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向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显示了自己的物质成果。在过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我们知道，只有一次革命勉强取得过政权。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没有来得及打破，更没有来得及向人民显示革命的美好物质成果。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人民创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赶走资本家，赶走地主，赶走沙皇的爪牙，夺得政权，取得自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是很好的。但是，单靠一个自由，可惜还远远不够。如果粮食不够，油类不够，布匹不够，住宅不好，那么单靠一个自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愉快了，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

（2）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二个根源，就是我国已经没有剥削现象了。在我国，人们不是替剥削者做工，人们做工不是为了让不劳而获者发财致富，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由工人阶级优秀分子掌握政权的苏联社会。正因为如此，劳动在我国是有社会意义的，

它是光荣和荣耀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是私人的、个人的。你做得多些，你就多赚些钱，自顾自地生活吧。谁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知道你。你替资本家做工吗，你是替他们赚钱吗？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人家雇你就是要你去替剥削者赚钱。你不愿意这样干，那就请你滚到失业工人队伍里去，随你的便挨饿受冻去吧，而我们随时都能雇到别的更驯服的工人。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是不受重视的。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会产生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可是，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那就不同了。在这里，劳动者是受人尊敬的。在这里，他不是替剥削者做工，而是为自己做工，为自己的阶级做工，为社会做工。在这里，劳动者不会觉得自己是无人过问的孤苦伶仃的人。恰巧相反，在我们这里，劳动者觉得他是自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是一种社会活动家。如果他好好做工，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他就是一位劳动英雄，就会十分光荣。显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

（3）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三个根源应当认为是在我国有了新技术。斯达汉诺夫运动与新技术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没有新技术，没有新工厂，没有新设备，我国就不会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如果没有新技术，那么至多只能把技术定额提高一倍的样子。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依靠了新技术。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化，我国工厂的改造，我国有了新技术和新设备，是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4）但是，单靠新技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尽管有头等的技术，头等的工厂，如果没有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人才，那么这些技术就不过是技术而已。为了使新技术能够产生效果，一定还要有能够操纵技术和推进技术的人才，有这样的男女工人干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在我国男女工人中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干部。大约两年以前，党说过：我们虽然建成了新工厂，给了我们各企业新设备，但

我们只做了一半事情。党在当时说过：除了有建设新工厂的热情以外，还要有学会运用这些新工厂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显然，这两年来，学习了这种新技术，产生了新干部。现在很清楚，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干部。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新人才，那我们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所以，男女工人中那些学会了运用新技术的新人才，就是形成和推进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力量。

这些就是产生了和推进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条件。

3. 新的人才和新的技术定额

我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象大水决堤一样以突然爆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显然，这个运动曾经必须克眼某些障碍。有人妨碍过它，有人压制过它，然而，在它把力量积蓄起来以后，它就冲破这些障碍而传遍全国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究竟是谁妨碍过它呢？

妨碍它的，是旧技术定额以及站在这些定额背后的那些人。几年以前，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根据我国男女工人当时的技术落后状况规定了某种技术定额。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几年了。在这几年中，人才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而技术定额却仍然没有改变。当然，这些定额现在对于我国的新人才来说是已经陈旧的了。现在大家都在责骂这些现行的技术定额。但是，这些定额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这里问题根本不在于当时把这些技术定额规定得太低，而首先在于现在，当这些技术定额已经陈旧的时候，有人企图把它们当作现代的定额保留下来。他们死抓住我国男女工人的技术落后不放，只考虑这种落后，一切都从落后出发，最后，竟到了欣赏落后的地步。但是，既然这种落后已经成为过去，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

们应当崇拜我们的落后，把它奉为圣像，奉为偶像吗？既然男女工人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那该怎么办呢？既然旧技术定额已经不再符合实际情况，而我国男女工人已在事实上超过它们 5 倍、10 倍，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发过誓说一定要忠于我们的落后吗？同志们，我们似乎没有这样做过吧？难道我们是以我国男女工人的永远落后为出发点吗？我们好象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吧？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打破我们某些工程师和技师的保守主义，打破旧传统和旧定额，给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以广阔的活动场所吗？

有些人在谈论科学。他们说：科学上的规定，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的规定，是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要求矛盾的。但是，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哪一种科学呢？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象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陈腐不堪的托勒密体系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如果我们那些远远落在斯达汉诺夫运动后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能够不再抱住旧的技术定额不放，认真地、用科学的精神、用新的斯达汉诺夫的精神来改造自己的工作，那就好了。

有人会对我们说：好吧，那么对整个技术定额怎么办呢？技术定额究竟是工业需要的呢,还是完全不要任何技术定额也可以过得去呢？

有些人说：我们再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定额了。同志们，这是不对

的，而且是很愚蠢的。没有技术定额，就无法进行计划经济。除此以外，所以需要技术定额，是为了促使落后群众赶上先进分子。技术定额是一种巨大的调节力量，它能在生产中把广泛的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周围。所以，我们需要有技术定额，但不是现行的定额，而是较高的定额。

另外有些人说：技术定额是需要的，可是现在就应该把它提高到斯达汉诺夫们、布瑟金们、维诺格拉多娃们以及其他人所达到的高度。这也是不对的。这种定额在目前这个时候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些比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等人的技术素养差些的男女工人，就会完不成这种定额。我们现在需要的技术定额，应当是一种介于现行技术定额和斯达汉诺夫和布瑟金等人所达到的定额之间的定额。例如就拿玛丽亚·杰姆钦科来说吧。大家知道，她是著名的甜菜500公担丰产模范。她达到了每公顷500公担或500公担以上甜菜的产量。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成绩当作譬如说乌克兰全部甜菜种植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呢？不可以。现在还谈不到这一点。玛丽亚·杰姆钦科每公顷收获了500公担或500公担以上的甜菜，而今年每公顷甜菜的平均产量，例如在乌克兰，却只有130—132公担。可见，这里的差别是不小的。是不是可以把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规定为每公顷400公担或300公担呢？所有的内行人都说，暂时还不能这样。显然，1936年全乌克兰的单位面积产量定额，必须规定为每公顷200－250公担。而这个定额也是不低的，因为完成这个定额，就能使我们获得比1935年多一倍的糖。工业也是如此。斯达汉诺夫大概已超过现行技术定额10倍，甚至10倍以上。如果把他所达到的这种成绩宣布为全体风镐采煤工人的新技术定额，那就不合理了。很明显，我们必须规定一个介乎现行技术定额和斯达汉诺夫同志所达到的定额之间的定额。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现行技术定额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这些定额已经落后而变成阻碍我国工业的东西了，所以，

为了不致阻碍我国工业，必须用新的较高的技术定额来代替它们。既然有了新的人才，到了新的时期，也就应当有新的技术定额。

4. 最近的任务

为了更好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我们最近的任务是什么呢？

为了突出重点，我们把它归结为两个最近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继续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使它扩大和深入到苏联各州各区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约束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所有墨守成规、不愿前进、一味阻碍斯达汉诺夫运动开展的分子。为了把斯达汉诺夫运动全力推广到我国各地，单靠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本身，当然是不够的。一定要我们的党组织也参与这件事，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运动进行到底。顿涅茨克州党组织在这一方面显然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莫斯科州党组织和列宁格勒州党组织在这一方面也做得很好。其他各州的情形怎样呢？其他各州大概还正在“动起来”例如，关于乌拉尔就没有听到或者很少听到有什么动静，虽然大家都知道乌拉尔是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在西伯利亚西部和库兹巴斯也是如此，那里的人大概也还没来得及“动起来”呢。然而，不容置疑，我们的党组织一定会担负起这件工作，帮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至于事情的另一方面，即约束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间顽固的保守分子的问题，那就比较复杂一些了。首先必须进行说服，用同志的态度来耐心说服工业方面的这些保守分子，使他们相信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进步性和用斯达汉诺夫精神改造工作的必要性。如果说服不了，那就只得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例如拿交通人民委员部来说吧。不久以前，在这个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里，有一些教授、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其中也有共产党员,硬说每小时 13—14 公里的火车旅行速度已经到了极限，如果

不想违反“运营科学”，就不能超过这个极限。这是颇有威信的一部分人，他们在口头上和刊物上鼓吹自己的观点，并向交通人民委员部有关机关发出种种指示，而且他们本来就是铁路运营人员中的“权威”。我们虽然不是内行，但是根据铁路事业方面许多实际工作人员的建议，也奉劝过这些有威信的教授说，13—14 公里的速度，决不能当作极限，在工作组织得当时，是可以超过这个限度的，但他们不仅没有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改变态度，反而拚命反对铁路事业方面的先进分子，加紧宣传他们的保守主义观点。当然，我们只好把这些受人尊敬的人物轻轻打击一下，并客客气气地请他们离开交通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的火车旅行速度已经是每小时 18—19 公里了。同志们，我认为，在我们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里，如有绝对必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当然只有在顽固的保守分子不停止妨碍和阻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行为时才采取这种办法。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帮助另外一种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师改造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领导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些人并不想阻碍斯达汉诺夫运动，他们是同情这个运动的，但他们还不会改造他们的工作，还不会领导这个运动。同志们，我应当说，这样的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师在我国是不少的。而只要我们帮助这些同志，这些同志在我国是一定会更加多起来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切实执行这些任务，那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就会非常猛烈地开展起来，就会普及到我国各州各区去，而向我们显示出新成就的奇迹来。

5. 简单的几句话

关于这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意义，我还要说几句话。列宁教

导说，只有不仅善于教导工农，而且善于向工农学习的领导者，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些人听不惯列宁的这些话。但是，历史表明，列宁在这方面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的确，千百万劳动者，工人和农民，是在劳动，在生活，在斗争。他们并不是白白地生活，他们在生活和斗争时，积累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忽视这种经验的领导者，决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者，——这一点难道可以怀疑吗？所以，我们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不仅应当教导工人，而且应当向工人学习。我决不否认，你们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在这里，在会上，向我们政府领导人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我们政府领导人，也向你们，向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向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同志们，谢谢你们的指教，非常感谢！

最后，关于应当如何纪念这次会议的问题，我还有两句话要说。我们主席团这里已经商量过了，决定必须给这次政府领导者和斯达汉诺夫运动领导者的会议留下某种纪念。最后我们决定，呈请授予你们中间100—120人以最高的奖赏。

喊声：对。

斯大林：同志们，既然你们赞成，那我们就这样办吧。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
第531—544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4卷第59—72页

关于苏联宪法草案

（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任务

同志们！

大家知道，提出宪法草案来给这次代表大会审核的宪法委员会，是根据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成立的。这个决议在1935年2月6日通过，决议说：

“1.按以下方针修改苏联宪法：

（一）使选举制更加民主化——用平等的选举来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选举，用直接的选举来代替多级的选举，用无记名的选举来代替记名的选举；

（二）更准确地规定宪法的社会经济基础——使宪法适合苏联目前的阶级力量对比（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建立，富农已被粉碎，集体农庄制度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苏联社会的基础，等等）。

2.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宪法委员会，委托宪法委员会根据第一项规定的原则起草宪法的修改草案，然后提交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

3.苏联苏维埃政权机关下届选举，应根据新选举制举行。”

这是1935年2月6日的事。在通过这个决议的第二天，即1935

年2月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为执行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而成立了由31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责成宪法委员会起草苏联宪法的修改草案。

这就是宪法委员会开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正式依据和苏联最高机关的指示。

因此，宪法委员会修改1924年通过的规行宪法，应当估计到从1924年到现在苏联生活中取得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切进展。

二

1924—1936年在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在1924—1936年这一时期内，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哪些变化须要宪法委员会在宪法草案中反映出来呢？

这些变化的实质何在呢？

我们在1924年的情形怎样呢？

这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当时，苏维埃政权在尽一切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打算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经济体系的竞赛过程中，造成社会主义体系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当时的任务是要在这一竞赛过程中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完成作为国民经济基本体系的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

当时，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状况很不好。固然，它在慢慢恢复起来，可是生产量远未达到战前水平，它建立在落后的贫乏的旧技术的基础上。当然，它是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的。我国工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约占80%。可是，资本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的比重，毕竟还不少于20%。

当时，我国的农业更不成样子。固然，地主阶级已被消灭，可是，农业资本家阶级，即富农阶级，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整个说来，农业好象是无数用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汪洋大海，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象是这个大海中的一些零星岛屿，老实说，它们当时在我们国民经济中还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力量薄弱，而富农却还有力量。我们当时还没有说消灭富农，而是说限制富农。

国内商品流转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商品流转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只占约 50—60%，而其余的地盘还被商人、投机者和其他私人占据着。

1924 年我国的经济状况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 1936 年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如果说当时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的时期，那么现在我们是处在新经济政策最后一个时期，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

首先来看我国的工业。我国工业在这个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巨大的力量。现在已经不能说它是力量薄弱和技术设备不好的工业了。恰巧相反，它现在建立在丰富的现代新技术的基础上，十分发达的重工业以及更发达的机器制造业的基础上。而最主要的，就是资本主义已经从我国工业范围中完全驱逐出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现在是在我国工业中独占统治的体系。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工业按产量来说已超过战前工业 6 倍多这一事实，是不能看作一件小事的。

在农业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于无数技术落后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富农到处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而是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的、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即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大家知道，在农业中，富农已被消灭，而用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经济成分只占很小的地位，它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

从播种面积来看，至多不过2—3%。不能不指出一件事实，就是集体农庄现在已经有了316000台拖拉机，共570万马力，而同国营农场合起来计算，已有40多万台拖拉机，共758万马力。

至于国内商品流转，商人和投机者已经被我们从这方面完全驱逐出去了。现在全部商品流转都已掌握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手中。新的苏维埃的商业，没有投机者参加的商业，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业，已经产生而且发展了。

因此，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

而这说明什么呢？

这就是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由于苏联国民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一切变化，我们现在有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经济不会有危机和失业，不会有贫困和破产，而公民们有一切可能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

1924—1936年这一时期在我国**经济**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就是如此。

由于苏联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些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大家知道，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剩下了工人阶级。

剩下了农民阶级。

剩下了知识分子。

可是，如果以为这些社会集团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

果以为他们还是象在譬如说资本主义时期一样，那就错了。

例如拿苏联工人阶级来说。人们往往照旧叫它无产阶级。但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无产阶级就是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资本家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下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阶级。无产阶级就是被资本家剥削的阶级。而在我国，大家知道，资本家阶級已被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已从资本家手中夺来，交给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国家。因而，已经没有能够剥削工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了。因而，我国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反而是同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既然它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而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那么任何剥削工人阶级的可能都完全铲除了。既然如此，难道还可以把我国工人阶级叫作无产阶级吗？当然不可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粉碎资本家阶级，从资本家手中夺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把产生无产阶级的生产条件消灭。可以说苏联工人阶级已经实现了解放自己的这些条件吗？绝对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苏联无产阶级已经变成完全新的阶级，已经变成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确立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引导着苏联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苏联工人阶级。

由此可见，苏联工人阶级是完全新的、摆脱了剥削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我们来谈农民问题。人们通常都说，农民是小生产者阶级，它的成员好象一盘散沙，分布在全国的地面上，各人单独地在自己的小经济范围内用落后的技术埋头种地，他们是私有制的奴隶，是遭到地主、富农、商人、投机者、高利贷者等等肆意的剥削的。的确，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农民，就其基本群众来说，正是这样的阶级。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农民，苏联农民，就其大多数而言，是与这样的农民相像的呢？当然不可以这样说。这样的农民在我国已经没有了。我们苏

联的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在我国已没有能够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了。所以，我国农民是摆脱了剥削的农民。其次，我们苏联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是集体农庄农民，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和财产不是建立在个体劳动和落后技术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集体劳动和现代技术的基础上的。最后，我国农民的经济基础不是私有制，而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集体所有制。

由此可见，苏联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这样的农民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最后，我们来说知识分子问题，来说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以及所有职员等等的问题。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已经不是那种旧的顽固的知识分子，那种企图使自己超脱各阶级，而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血肉相连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首先，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在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中，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占的百分数很小。苏联知识分子80—90%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们势必为富人阶级服务，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势必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现在是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在这里，他们同工农并肩前进，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由此可见，这是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第一，这些变化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这就是说，这些社会集团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

第二，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

最后，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在消失。

这就是苏联**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

关于苏联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形，如果不说一说还有一方面的变化，那是不完全的。我指的是苏联**民族**相互关系的方面。大家知道，苏联约有 60 个民族和民族集团。苏维埃国家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很明显，苏联各族人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我们不能不具有头等的意义。

大家知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 1922 年在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它是根据苏联各族人民平等和自愿的原则组成的。1924 年通过的现行宪法，是苏联第一个宪法。那时，各族人民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调整，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心理的残余还没有消失，离心力还继续发生作用。当时必须在这种条件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互助的基础上调整各族人民的兄弟合作关系，把他们联合成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苏维埃政权不能不看到这项事业的困难。它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失败经验。它看到了旧奥匈帝国瓦解的经验，但它毕竟进行了创立多民族国家的实验，因为它知道，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多民族国家，一定能够经得住所有一切考验。

从那时起，已经有 14 年了。为了审查这一实验，这样一个时期已经足够长了。结果怎样呢？过去这一时期，毫无疑义地证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多民族国家的实验，是完全成功了。这是列宁的民族政策取得的毫无疑义的胜利。

为什么会有这个胜利呢？

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不存在，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不存在，反对一切奴役而忠

实地实现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各族人民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一切方面已经切实实行互助，最后，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即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已经有了蓬勃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苏联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中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失，而相互友爱的感情已经发展，因而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

因此，我们现在有了完全形成的、经住了一切考验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巩固，是世界上任何一洲的任何一个单民族国家都比不上的。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各民族相互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这就是1924—1936年这一时期在苏联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各种变化的总结。

三
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

苏联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变化，在新宪法草案中得到了什么反映呢？

换句话说，提交这次代表大会审核的宪法草案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宪法委员会受委托修改1924年宪法的条文。宪法委员会工作的结果，产生了宪法的新条文，即苏联新宪法草案。宪法委员会起草新宪法草案时是从宪法不应该同纲领混淆这一点出发的。这就是说，纲领和宪法有重大的差别。纲领上说的是还没有的东西，是要在将来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相反，宪法上应当说的是已经有的东西，是现在已经获得和已经争取到的东西。纲领主要是说将来，宪法却是说现在。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吧。

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大家知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公式。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反映社会主义已经争取到了这一事实呢？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当以社会主义已经争取到了这一事实为基础呢？完全应当。其所以应当，是因为社会主义在苏联是已经获得和争取到了的东西。

可是，苏联社会还没有实现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公式作为通行的原则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虽然它把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作为自己的目的。我们的宪法是不是能以现在还没有、还应当争取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为基础呢？当然不能，因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苏联还没有实现而应当在将来实现的东西。如果不愿意使宪法变成纲领或关于将来的成就的宣言，那就不能这样做。

这就是我们的宪法在当前历史时期的范围。

这样，新宪法草案是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结。所以，它是把事实上已经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这就是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通常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动摇这一信念为出发点的。这些宪法的主要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原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对人的剥削，以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存在；在社会的一个极端是多数劳动者受冻挨饿，而在另一个极端是少数不劳而获的人奢侈挥霍；以及其他等等。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就是以资本主义的这种准则为依据的。它们反映这些准则，用立法程序把这些准

则固定下来。

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已被消灭这一事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这一事实。苏联新宪法草案的主要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已经争取到和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现象的消灭；失业的消灭；劳动是每个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劳动权，即每个公民有得到有保障的工作的权利；休息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等等。新宪法草案就是以社会主义的这些准则为依据的。它反映这些准则，用立法程序把这些准则固定下来。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二个特点。

再其次，资产阶级宪法暗中从以下的前提出发，社会是由彼此对抗的阶级，即占有财富的阶级和没有财富的阶级组成的；无论哪一个党执政，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权（专政）都应当属于资产阶级；宪法所以需要，是为了把合乎有产阶级愿望并有利于有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

和资产阶级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所依据的是：社会上已经不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的；执政的正是这两个劳动阶级；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权（专政）属于工人阶级这个社会的先进阶级；宪法所以需要，是为了把合乎劳动者愿望并有利于劳动者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三个特点。

再其次，资产阶级宪法暗中从以下的前提出发，各民族和种族彼此不能平等；有享受完备权利的民族，也有享受不完备权利的民族；此外,还有第三种民族或种族，例如殖民地的民族或种族，他们享受的权利要比享受不完备权利的民族还要少。这就是说，所有这些宪法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宪法，即统治民族的宪法。

和资产阶级宪法不同，苏联新宪法草案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性质。它的出发点是，一切民族和种族权利平等。它的出发点是，各民族和种族在肤色或语言、在文化水平或国家发展水平方面的区别，以及其他任何区别，都不能成为替民族不平等现象辩护的根据。它的出发点是，一切民族和种族，不管它们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如何，不管它们强或弱，都应当在社会一切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

这就是新宪法草案的第四个特点。

新宪法草案的第五个特点，就是它的彻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从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宪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宪法直接否认公民权利的平等和民主自由，或在事实上把它们化为乌有。另一类宪法很乐意地接受、甚至标榜民主原则，但同时加上许多附带条件和限制，而使民主权利和自由残缺不全。它们说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选举权，但同时又用居住期限、教育程度以至财产资格来加以限制。它们说公民有平等权利，但同时又加上附带条件，说这不涉及妇女，或只涉及一部分妇女。如此等等。

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完全没有这类附带条件和限制。它根本不分什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认为所有公民都是积极的。它不承认男性和女性、“定居者”和“暂居者”、有产者和无产者、受过教育者和未受过教育者有权利上的差别，认为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决定每个公民在社会上的地位的，不是财产状况，不是民族出身，不是性别，不是职位,而是个人的能力和个人的劳动。

最后，新宪法草案还有一个特点。资产阶级的宪法通常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不注意实现这些权利的条件，实现这些权利的可能，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它们空谈公民平等，可是忘记了，既然资本家和地主在社会上有财富和政治势力，而工人和农民却没有财富和政治势力，既然资本家和地主是剥削者，而工人和农民是被剥削者，

那么厂主同工人、地主同农民，就不能有真正的平等。又如，它们空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可是忘记了，既然工人阶级不可能拥有适当的集会场所、良好的印刷厂、充分的印刷纸张等等，那么这些自由对于工人阶级就会变成空话。

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它不仅仅宣布公民权利平等，而且用立法程序把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把公民已经摆脱任何剥削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它不仅仅宣布劳动权，而且用立法程序把苏联社会没有危机的事实，把失业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证劳动权。它不仅仅宣布民主自由，而且按立法程序，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来保证这些自由。因此，很明显，新宪法草案的民主主义，并不是“通常的”“公认的”一般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

这就是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各个基本特点。

这就是1924-1936年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各种进展和变化在新宪法草案上的反映。

四
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现在来说一说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外国资产阶级报刊怎样对待宪法草案的问题，当然是很有意思的。由于外国报刊反映各资产阶级国家里各阶层居民的舆论，所以我们不能不来说一说这些报刊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从外国报刊对我国宪法草案的最初反应看，它们有一种不理睬这个草案的倾向。这里我指的是最反动的法西斯报刊。这种批评家认为最好是干脆不理睬宪法草案，似乎天地间根本没有过、根本就没有这

个宪法草案。也许有人说，不理睬不是批评。但这是不对的。不理睬作为一种特别的藐视办法，也是一种批评方式，固然是愚蠢可笑的，但毕竟是一种批评方式。可是，他们采取隐瞒手段，并没有发生效果。最后，他们不得不打开闷葫芦，告诉世界说，真痛心，苏联宪法草案毕竟存在，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开始发生蛊惑人心的影响。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总还有舆论，有读者，有活人，他们想知道事实的真相，要长期硬是欺骗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的。靠欺骗是走不多远的……

第二种批评家承认宪法草案确实存在于天地间，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它事实上不是宪法草案，而是一纸空文，是用来玩弄某种手腕和欺骗人们的空洞诺言。同时他们又说，而且苏联也不能拟出较好的草案，因为苏联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而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既然苏联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宪法也就不能是真正的宪法。这种批评家的典型代表，说来奇怪，就是德国半官方杂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该杂志公然说：苏联宪法草案是空洞的诺言，是欺骗，是“波将金的村落”[①]。它毫不犹豫地宣称：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苏联“不过是一个确定的地理概念”，所以苏联宪法也就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宪法。

对于这种所谓批评家可以说些什么呢？

俄国伟大作家谢德林在他的一篇寓言故事[②]中，描写了一个刚愎

———————————————

① “波将金的村落”是指装饰门面借以骗人的东西。格·亚·波将金是沙皇俄国的将军、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1783 年策划把克里木并入俄罗斯，因此被授予塔夫利达公爵的封号。据传说，1787 年他陪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南巡时，为了向女皇显示新兼并的克里木的繁荣，在沿途搭起了许多假的居民点、粮仓、堡垒等建筑物。——编者注

② 指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一位励精图治的长官怎样因为热心害得上司发愁的故事》。——编者注

自用，十分狭隘、迟钝，可是非常自信和尽职的官僚的典型。这个官僚在他“管辖的”地區杀了成千累万的居民，烧毁了几十座城市，建立了“秩序和安宁”以后，眺望四周，忽然在天边看见了一个美国，这个国家固然不很著名，但那里却有着诱惑人心的自由，用另一种方法管理国家。这个官僚一看见美国，就气愤地说：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当然，它是在几世纪以前偶然被人打开的，可是难道不能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吗？他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美国重新封起来！”

我觉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杂志的那些老爷，同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一模一样。苏联早已成了这些老爷的眼中钉。苏联象灯塔一样屹立着已经有19年了，它用解放的精神感染全世界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气得发狂。而它，这个苏联,却不仅存在，而且日益成长，不仅日益成长，而且日益繁荣，不仅日益繁架，而且制定了新宪法草案，制定了使各被压迫阶级精神焕发、满怀新希望的草案。既然如此，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又怎能不气愤呢？他们大声叫喊：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如果它是1917年10月打开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呢？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苏联重新封起来，当众宣布苏联这个国家不存在，苏联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已！

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虽然十分迟钝，可是他写下把美国重新封起来的批示时，总还表现出一点了解实情的能力，因为他立刻自言自语地说：“但也许这是不能由我作主的吧。”我可不知道，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是否有充分的智力猜想到，他们在纸上当然能够“封闭”这个或那个国家，可是如果认真来说，那么“这是不能由他们作主的”……

至于说苏联宪法好象是空洞的诺言，好象是“波将金的村落”等等，那我就要援引一系列确定不移的、无须证明的事实。

在1917年，苏联各族人民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地主阶级，把从前属于地主、官府和寺院的15000万公顷土地交给了农民，而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不在内。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资本家阶级，没收了他们的银行、工厂、铁路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宣布这些东西为社会主义财产,派工人阶级的优秀人物领导这些企业。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按社会主义的新原则、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组织了工业和农业，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现在苏联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50%，工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6倍，而国民收入则比战前增加了3倍。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失业，实现了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保证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能够实行。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最后，苏联制定了新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不是诺言，而是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把已经取得积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既然如此，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关于“波将金的村落”的废话，如果不是为了对人民隐瞒苏联真相，使人民陷入迷途，欺骗人民，试问又是为了什么呢。

事实就是如此。而事实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是改变不了的。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也许会说，那就该事实倒霉。可是，那时就可以用俄国一句著名的谚语来回答他们：“傻子是不讲道理的。”

第三种批评家不反对承认宪法草案有相当多的优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是一种好现象，但看来很怀疑草案中许多条文能够实现，因为

他们确信这些条文根本无法实现，只是纸上空文。如果说得客气一点，这就是怀疑论者。这种怀疑论者是各国都有的。

应当说，我们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们。当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时候，杯疑论者就说过：布尔什维克也许不是坏人，但掌握政权这件事他们是办不好的，他们一定会失败。可是事实上失败了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怀疑论者。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这种怀疑论者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当然是不坏的东西，但是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又加上外国人，大概会战胜这个政权的。可是事实上怀疑论者就在这一点上也失算了。

在苏维埃政权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怀疑论者又跑出来说：五年计划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未必能实现，五年计划的事布尔什维克大概是搞不成的。但事实又证明怀疑论者倒霉：五年计划在四年内完成了。

关于新宪法草案以及怀疑论者对这一草案的批评也是这样。草案一公布，这种批评家就又跑出来发表他们那一套悲观的怀疑论，说宪法中有些条文未必能实现。毫无疑问，怀疑论者现在这一次，也会象他们过去屡次失败了那样遭到失败。

第四种批评家攻击新宪法草案，认为这个草案是“向右转”，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是“取消布尔什维克制度”。他们用各种腔调说:“布尔什维克向右转了，这是事实。”在这方面特别卖力气的，是某些波兰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纸。

对于这些所谓批评家可以说些什么呢？

如果扩大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使专政变成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的更灵活、因而也更强大的体系这一点，竟被他们解释成不是加强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削弱这个专政，甚至放弃这个专政，那就可以问一问，这些老爷一般是不是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专政呢？如果用立法程序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固定下来，用立法程序把工业化、集体化和民主

化的成就固定下来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竟是“向右转”，那就可以问一问，这些老爷究竟知道不知道，左和右的区别是什么？

毫无疑问，这些老爷在批评宪法草案时头脑完全混乱了；既然他们头脑混乱了，就把左右都弄错了。

说到这里，不禁会想起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来。果戈理描写说，这个“娃儿”有一次替乞乞科夫的马车夫绥里方带路，但她因为不会分辨向左向右，脑筋乱了，结果弄得很窘。应当承认，波兰报纸的批评家虽然十分自负，但是他们的理解程度却与《死魂灵》中地主家甩的“娃儿”彼拉格娅相差不远。你们记得，马车夫绥里方因为彼拉格娅分不清左右，认为必须斥责她，于是对她说：“啊唷，你这泥腿……连左右也分不清。”我觉得也应当这样斥责这些倒霉的批评家，对他们说：阿唷，你们这班蹩脚的批评家……连左右也分不清。

最后，还有一种批评家。如果上面那种批评家责备宪法草案是放弃工人阶级专政，那么恰巧相反，这一种批评家责备宪法草案丝毫没有改变苏联现状，没有触动工人阶级专政，没有容许政党自由，而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同时，这一种批评家认为在苏联没有政党自由，就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标志。

我应当承认，新宪法草案确实保留了工人阶级专政制度，同样也毫无变动地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如果可敬的批评家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缺点，那就只能对此感到遗憾。我们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优点。

至于说到各种政党存在的自由，那么在我们这里却持有略为不同的观点。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先进部分。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

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它对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保护得不坏，这大概不能有任何怀疑吧。

人们谈论民主，但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对抗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归根到底是给有势力的人享受的民主，是给有财产的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相反地，民主在苏联却是给劳动者享受的民主，也就是说给所有的人享受的民主。由此可见，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不是苏联新宪法草案，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

资产阶级对苏联新宪法草案的批评就是如此。

五
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现在，我们来谈公民们在全民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的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大家知道，在全民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相当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所有这些意见，都在苏联报刊上公布了。因为这些修改意见的内容很不相同，价值也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应当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修改意见的特点，就在于它们说的不是宪法问题，而是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问题。关于保险事业的个别问题，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某些问题，关于工业建设的某些问题，关于财政的问题，——这就是第一类修改意见提到的问题。提出这些修改意见的人，大概没有弄懂宪法问题和日常立法问题的区别。正因为如此，他们竭力

要把尽可能多的法律塞到宪法里去，简直要把宪法变成一部法律汇编。可是，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础。这一类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既然与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认为应当把它们交到我国将来的立法机关去。

应当归入第二类的修改和补充意见，企图把历史资料的成分，或者关于苏维埃政权现在还没有取得而将来应当取得的成就的宣言成分，载入宪法。要在宪法内指出党、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多年来在为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克服了哪些困难，要在宪法内说明苏维埃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这一类修改意见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提到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类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和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也应当不采纳。宪法是把已经取得、已有保障的成果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如果我们不愿意曲解宪法的这一基本性质，我们就不应当使宪法通篇都是关于以往历史的资料，或关于苏联劳动群众将来成就的宣言。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和其他文件去说。

最后，应当归入第三类的是和宪法草案有直接关系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这一类修改意见中有一大部分是属于文字上修改性质的。因此，可以把它们交给本届代表大会审定委员会，——我想代表大会一定会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委托它来最后审定新宪法全文的。至于第三类修改意见中其余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有比较实质性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必须在这里说一说。

(1)首先谈一谈对宪法草案第1条的修改意见。共有四个修改意见。第一个意见主张用“劳动者国家”几字来代替“工农国家”。另一个意见主张把“工农国家”改为“工农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国家”。

第三个意见主张用“苏联境内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国家”来代替“工农国家”。第四个意见主张用“集体农庄庄员”或“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来代替“农”字，

是否应当采纳这些修改意见呢？我认为不应当。

宪法草案第1条说明的是什么呢？它说明苏联社会的阶级成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宪法内是不是可以不提到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问题呢？不可以。大家知道，苏联社会是由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宪法草案第1条说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宪法草案第1条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劳动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从前，知识分子是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一部分是农民出身，而工人出身的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苏维埃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可是，不管它的出身如何，不管它的性质怎样，它还是一个阶层而不是阶级。

这种情形会不会损害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呢？一点也不会！宪法草案第1条所说的并不是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权利，而是这个社会的阶级成分。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其中包括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主要在宪法草案第十、第十一两章内说明了。从这两章内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所以，关于劳动知识分子的权利会受损害，是根本谈不到的。

关于苏联各民族和种族也是这样。在宪法草案第二章内已经写明，苏联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各民族的自由联盟。是不是需要在说明苏联社会阶级成分而不是说明苏联社会民族成分的宪法草案第1条里，重复这一公式呢？显然不需要。至于苏联各民族和种族的权利，在宪法草案第二、第十和第十一章内都已说明。从这几章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享有

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损害。

用“集体农庄庄员”或用“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来代替“农”字，同样是不正确的。第一，在农民中，除了集体农庄庄员，还有一百多万非集体农庄庄员的农户。怎样处理他们呢？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是不是想把他们去掉不算呢？如果这样，那就不合理了。第二，虽然大多数农民已经经营集体农庄经济，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他们已经没有个人经济，个人的园地等等了。第三，如果这样，那就也要用“社会主义工业劳动者”来代替“工”字了，但是，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议这样做。最后，难道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消失了吗？如果他们还没有消失，那是不是应当把他们的固定名称从词典中删去呢？提出这个修改意见的人，大概不是指现在的社会，而是指将来的社会，指将来已经没有阶级，而工人和农民都变成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的社会。所以，他们显然是跑到前面去了。可是，在制定宪法时，不应当从将来出发，而应从现在、从已有的事实出发。宪法不可以、而且不应当跑到前面去。

(2) 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十七条的修改意见。这个意见主张把宪法草案上关于各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的第十七条全部删去。我认为这个提议是不正确的，因此是代表大会不应当采纳的。苏联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愿联盟。如果把关于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这一条从宪法上删去，那就违反了这个联盟的自愿性质。我们可以同意这个做法吗？我认为不可以而且不应当同意这样做。有人说，在苏联，没有一个共和国会愿意退出的，所以第十七条没有实际意义。说在我们苏联没有一个共和国会愿意退出，这当然是对的。可是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应当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同样，在苏联也没有哪一个加盟共和国会愿意压迫另一个加盟共和国。可是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

应当把关于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平等的一条从苏联宪法上删去。

(3) 再其次，有人提议在宪法草案第二章内另外加上一条说：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可以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这个提议可以采纳吗？我认为不应当采纳。这个提议，不仅从内容来说不正确，而且从它的理由来说也是不正确的。把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不能以该共和国经济和文化的成熟程度为理由；同样，把某个共和国保留为自治共和国，也不能以该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落后为理由。如果这样，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列宁主义的态度。例如鞑靼共和国还是自治共和国，而哈萨克共和国却成了加盟共和国，但这还不是说，从文化和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哈萨克共和国高于鞑靼共和国。实际情形恰巧相反。例如，关于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情况也是这样，从文化和经济方面来看，前者高于后者，但前者还是自治共和国。

究竟要具备哪些标志才有根据把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呢？

这种标志有三个。

第一，这个共和国必须在边疆，而不是四周都被苏联领土环绕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加盟共和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那就一定要这个成了加盟共和国的共和国有可能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而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只有同某一外国交界，即不是四周都被苏联领土环绕着的共和国。当然，我们没有哪一个共和国会在事实上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可是，既然加盟共和国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那就必须使这个权利不致变成毫无意思的纸上空文。例如拿巴什基尔共和国或鞑靼共和国来说吧。假定这两个自治共和国改成了加盟共和国,试问，它们能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四周都被苏联的共和国和州环绕着，老实说，它们就是要想退出苏联也无处可退。因此，把这些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是不正确的。

第二，这个民族在用它的名称命名的苏维埃共和国人口中，必须是比较聚居而占多数的。例如拿克里木自治共和国来说吧。它虽然是边疆共和国，但克里木鞑靼人在该自治共和国内并不占多数，反而是占少数。所以，如果把克里木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那是不正确的，不合逻辑的。

第三，这个共和国按人口数量来说，必须不是一个很小的共和国，它的人口至少要在一百万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为人口极少而军队不大的一个小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指望维持独立国的生存，那就不正确了。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强盗会立即把它抓到手的。

我认为，没有这三个客观标志，在目前的历史时期提出把某个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的问题，是不正确的。

(4) 再其次，有人提议，把第 23、24、25、26、27、28、29 等条内关于各加盟共和国所属各边疆区和各州行政区域划分的详细记载删去。我认为这个提议也是不能采纳的。在苏联有些人非常喜欢不厌其烦地改变各边疆区和各州的界线，以致在工作中造成混乱和缺乏信心。宪法草案正是要给这些人一个限制。这是很好的，因为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要有自信的气氛，要有稳定性、明确性。

(5) 第五个修改意见是关于第 33 条的。提意见的人认为建立两院制是不适当的，提议取消民族院。我认为这个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如果苏联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那么一院制会比两院制好。但是苏联不是单民族的国家。大家知道，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一个不分民族而代表苏联一切劳动者共同利益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联盟院。可是，苏联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以外，还有与民族特点有关的**各自特有的特别**利益。可以忽视这些特别利益吗？不可以。是不是需要一个正是反映这些特别利益的专门最高机关呢？绝对需要。无疑，没有这样一个机关，就无法管理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机关就是第二院，即苏联民族院。

有人援引欧美各国议会史中的事实，说两院制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坏处，第二院一般都成了反动的中心，成了前进的障碍。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可是，这些现象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里的两院是不平等的。大家知道，第二院往往比第一院有更多的权利，而且第二院照例不是通过民主方式成立的，往往是用上面指定议员的方式成立的。毫无疑问，如果两院平等，第二院也象第一院那样用民主方式成立，就不会有这种坏处。

(6) 其次，有人对宪法草案提出补充，要求两院代表名额相等。我认为这个提议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来，这个提议有明显的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它强调两院的平等。

(7) 再其次，有人对宪法草案提出补充，说民族院代表也应当象联盟院代表一样由直接选举产生。我认为这个提议也是可以采纳的。固然，这会在选举方面造成某些技术上的不便。可是，这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它一定会提高民族院的威信。

(8) 再其次，是对第 40 条的补充，说应当赋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颁布临时立法文件的权利。我认为这个补充是不正确的，是代表大会不应当采纳的。终究必须铲除不由某一个机关而由许多机关立法的情形了。这种情形同法律稳定性的原则相抵触。而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律的稳定性。立法权在苏联只应当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一个机关来行使。

(9) 再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 48 条的补充，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而由全国人民选举。我认为这个补充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根据我国的宪法制度，在苏联不应当有和最高苏维埃同等地由全国人民选举而能和最高苏维埃对立的个人总统。苏联的总统是集体的，这就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内。这个主席团不是由全国人民，而是由最高苏维埃选举，并应向最高苏维埃报告工作。历史经

验表明，建立最高机关的这种办法，是最民主的，能够保障国家免于各种意外事故。

(10) 再其次，是对同一条，即第48条的修改意见。主张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增加到11人，使每个加盟共和国有一个副主席[①]。我认为这个意见可以采纳，因为这会改善我们的事业，而且只会巩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威信。

(11) 再其次，是对第77条的修改意见。要求成立一个新的全苏人民委员部——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我认为这个意见也应当采纳，因为把我国国防工业特别分出来，给它正式建立一个相当的人民委员部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觉得这只会改善我国的国防事业。

(12) 再其次，是对宪法草案第124条的修改意见。要求根据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方针来修改这条宪法。我认为这个意见应当否定，因为它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

(13)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修改意见。我说的是对宪法草案第135条的修改意见。这个意见主张剥夺神职人员、过去的白卫分子、所有从前的显赫人物和不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人的选举权，或者，无论如何应当限制这种人的选举权，只给他们选举权而不给他们被选举权。我认为这种意见也应当否定。苏维埃政权从前剥夺不劳动者和剥削者的选举权，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有一定期限的。有一个时候，这些人进行反对人民的公开战争，反抗苏维埃法律。关于剥夺他们选举权的苏维埃法律，是苏维埃政权对他们这种反抗的回答。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不少时间了。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们已经把剥削阶级消灭，而苏维埃政权已经变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了。修改这

————————————————

① 这里指的11个加盟共和国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土库曼、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编者注

种法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了呢？我认为已经到了。有人说这有危险，因为那些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某些过去的白卫分子、富农、神父等等，会钻进国家最高机关里来。但这里究竟有什么可怕呢？你怕狼，那你就不要到树林里去。第一，并不是所有从前的富农、白卫分子或神父都敌视苏维埃政权。第二，如果在某些地方人民竟会选举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那就证明我们的鼓动工作做得太坏，我们就理应受到这种耻辱；如果我们的鼓动工作真是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进行的，那人民就决不会容许这些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混进自己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说，应当做工作，而不应当叫苦，应当做工作，而不应当等待用行政命令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列宁在1919年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认为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遍选举权是有益的。请你们注意：**没有任何限制**。他说这话的时候，外国武装干涉还没有消灭，我国工业和农业还处在极坏的状态。从那时起，已经过去17年了。同志们，难道还没有到实行列宁这一指示的时候吗？我认为已经到了。

请看列宁在1919年写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是怎样说的。让我来读一下：

“为了避免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做不正确的概括，俄共应当向劳动群众说明，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部分公民被剥夺选举权，但这决不是那类在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终身被宣布为无权的公民，而只是剥削者，只是那些违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俄国现时，这个比例未必超过百分之二、三。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无产阶级的国

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任何限制**[①]的普遍选举权。”（《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94页）[②]

看来是很清楚了。

对苏联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就是如此。

六
苏联新宪法的意义

从进行了差不多5个月的全民讨论的结果来看，可以预料宪法草案是一定会被这次代表大会批准的。

再过几天，苏联就会有以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主义的宪法了。

这将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用简单明了的语句，几乎是用记录的体裁，说明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事实，说明苏联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事实，和广泛的最彻底的民主在苏联胜利的事实。

这个文件证明，资本主义国家里千百万诚实的人过去和现在所渴望的东西，已经在苏联实现了。

这个文件证明，在苏联已经实现的东西，在其他国家里也完全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苏联新宪法的国际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算过高的。

现在，法西斯主义浊流污辱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玷污了文明世界优秀人物的民主要求，苏联新宪法将成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书，说明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战胜的。苏联新宪法对于所有目前

---

① 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58页。——编者注

进行反法西斯暴行的斗争的人，将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和实际上的援助。

苏联新宪法对于苏联各族人民有更大的意义。苏联宪法对资本主义各国人民来说具有行动纲领的意义，而对于苏联各族人民，却是他们斗争的总结，是他们在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战线上胜利的总结。走过了艰难和斗争的道路，现在得到了这一个说明我们胜利果实的宪法，我们是多么高兴啊。知道了我国人民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进行了斗争，他们是怎样取得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我们是多么高兴啊。知道了我国人民的大量鲜血没有白流，而是产生了应有的结果，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这就会在精神上武装我国工人阶级，我国农民，我国劳动知识分子。这就会推动他们前进，激发他们的理所当然的自豪感。这就会加强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动员他们去进行新的斗争，争取共产主义的新胜利。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
第545—573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4卷第94—121页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①]上的报告和结束语）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至五日）

同志们！

从全会上的一些报告和对这些报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我们这里遇到的是下面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得这样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以致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这就是从全会上的一些报告和对这些报告的讨论中，自然而然得出的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

① 这次联共（布）中央全会于1937年2月23日—3月5日举行，讨论了党组织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的任务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并决定把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开除出党。——编者注

一

政治上的麻痹大意

我们的领导同志，具有同各种反党反苏维埃的派别作斗争的丰富经验，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却表现得如此幼稚和盲目，不善于看清人民的敌人的真面目，不善于识别披着羊皮的豺狼，不善于扯下敌人的假面具，这是什么原因呢？

能不能断言，在苏联境内活动的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对我们说来可能是什么意外的、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不，不能这样断言。最近10年来，从沙赫特事件时期起，有正式文件记载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暗害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能不能断言，我们最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代理人的暗害、间谍或恐怖活动，没有发出过什么预防信号和警告指示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这样的信号是发出过的，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忘记它。

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就是第一个严重警告，说明人民的敌人将玩弄两面手法，他们在玩弄两面手法时将伪装成布尔什维克，伪装成党员，以便骗取信任和打入我们的组织。

“列宁格勒总部”审判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案也一样，对于从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的事实中所得出的教训，又提供了新的根据。

“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联盟”审判案，扩大了前几次审判案的教训，非常清楚地表明，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把一切敌对的资产阶级分子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变成了德国警察暗探局进行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的代理人，两面手法和伪装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潜入我们组织的唯一手段，警惕性和政治洞察力则是

防止这种潜入和消灭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匪帮的最可靠的手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1935年1月18日发出的关于基洛夫同志惨遭暗杀的秘密信中，曾坚决地警告过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的温厚宽容和庸俗的粗心大意。在这封秘密信中说：

“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温厚宽容，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这种右倾硬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并且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温厚宽容，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要抓住‘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1936年7月29日发出的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间谍恐怖活动的秘密信中，再一次号召党组织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都要善于识别人民的敌人。在这封秘密信中说：

“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内奸、破坏分子、白卫分子、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

这就是说，信号和警告都曾经发出过。

这些信号和警告号召什么呢？

它们号召克服党的组织工作的弱点，把党变成任何一个两面派分

子都钻不进去的坚固堡垒。

它们号召克服掉不重视党的政治工作的态度，坚决扭转过来，大力加强这一工作，加强政治警惕性。

结果怎样呢？事实表明，我们的同志对信号和警告接受得太迟钝了。

审查和换发党证运动中尽人皆知的全部事实，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警告和信号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党的同志，尽管他们具有同反苏维埃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尽管发出过一系列的预防信号和警告指示，可是对于人民的敌人的暗害、间谍和破坏活动仍然表现得政治上眼光短浅，其原因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党的同志变得比以前坏了，变得觉悟性和纪律性都比以前差了呢？不，当然不是！

是不是他们开始蜕化了呢？也不是。这样的假定都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种粗心疏忽、麻痹大意、温厚宽容、盲目无知，是从哪里来的呢？

问题在于，我们党的同志，陶醉于经济运动和经济建设战线上的巨大成绩，简直忘记了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忘记的一些很重要的事实。他们忘记了苏联的国际坏境方面的一个基本事实，看不见同以党证作掩护并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的现在一些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直接有关的两个很重要的事实。

二

资本主义包围

我们党的同志忘记的或者简直看不见的事实是什么呢？

他们忘记了，苏维埃政权只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了胜利，而其余六分之五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地。他们忘记了，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这里有人常谈资本主义包围，但是不愿想一想资本主义包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资本主义包围，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很现实而又令人很不愉快的现象。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有一个国家即苏联，在自己境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继续推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并包围苏联，等待时机来进攻它，粉碎它，或者至少破坏它的实力和削弱它。

我们的同志忘记了这一基本事实。要知道正是这个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包围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

例如拿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幼稚的人可能认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在这些同一类型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但是只有幼稚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离睦邻关系远得很。事实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清楚地证明，资产阶级国家互相派遣自己的间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有时甚至派遣杀人凶手到彼此的后方，给他们的任务是混进这些国家的机关和企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网，“必要时”破坏这些国家的后方，以便削弱这些国家和破坏它们的实力。现在的情况是如此。过去的情况也是如此。就以拿破仑第一时代的欧洲国家为例。法国当时布满了从俄国人、德意志人、奥地利人、英国人的阵营派来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反过来说，英国、德意志各邦、奥地利和俄国在各自的后方，也有为数不少的来自法国阵营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英国间谍曾两次谋刺拿破仑，几次策动法国旺代省的农民反对拿破仑政府。而拿破仑政府是怎样一个政府呢？是资产阶级政府，它扑灭了法国革命，而仅仅保存了那些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果实。不用说，拿破仑政府对自己的邻邦是以牙还牙的，同样采用了派遣自己的破坏分子的办法。过去，在130年以前，情况是如此。现在，在

拿破仑第一之后过了130年，情况也是如此。现在，法国和英国布满了德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反过来说，德国也布满了英国和法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美国布满了日本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而日本也布满了美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

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

试问，为什么资产阶级国家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应当比它们对自己同类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更温和，更友好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遣间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自己同类的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少些呢？你们这个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多一两倍，这样设想不是更正确些吗？

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们党的同志把这一切都忘记了，由于忘记了，所以就遭到了突然的袭击。

正因为如此，日德警察暗探局的托洛茨基代理人的间谍和破坏活动，对于我们某些同志说来，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了。

三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其次，我们党的同志在同托洛茨基代理人进行斗争时，看不见和没有注意到：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象以前的，比如说,7—8年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时期有

了重大的演变，这个演变根本改变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因此，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方法，也应当根本改变，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托洛茨基主义在8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治派别，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交给的任务进行活动的。

什么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呢？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或政党，它有自己一定的政治面貌、政纲和纲领，在工人阶级面前它不隐瞒，也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相反地，它在工人阶级面前公开而诚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它不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在工人阶级面前宣布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相反地，它正大光明地到工人阶级中间去，以便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过去，在7—8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固然，它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但是它总还算是一个政治派别。

能不能说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如说，1936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托洛茨基分子，害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真正面目，害怕向工人阶级公开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在工人阶级面前力图隐瞒自己的政治面貌，担心工人阶级一旦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就会骂他们是异己分子，把他们赶走。正是因此，现在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

如果回想一下，在1936年的审判案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坚决否认他们有什么政纲。当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审判案中陈述自

己的政纲。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声明他们没有任何政纲。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否认他们有政纲是扯谎。现在连瞎子都看出，他们是有自己的政纲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否认他们有任何政纲呢？因为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的政治面目，他们害怕宣布自己的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真正政纲，担心这种政纲会受到工人阶级的唾弃。

在 I937 年的审判案中，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却走了另一条路。他们不否认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有政纲。他们承认他们有一定的政纲，他们在自己的供词中供认了并陈述了这个政纲。可是他们陈述这个政纲，不是为了号召工人阶级，号召人民支持托洛茨基的政纲，而是为了咒骂它是反人民和反无产阶级的政纲。使资本主义复辟，消灭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恢复剥削制度，为加速反苏战争爆发而同德日法西斯势力结成联盟，为发动战争和反对和平政策而斗争，分割苏联的领土，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而把滨海地区割让给日本人，准备使苏联在敌国侵犯时遭到军事失败，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而采用的手段即进行暗害、破坏活动，对苏维埃政权领导者分别实行恐怖手段，替日德法西斯势力进行间谍活动，——这就是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所陈述的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纲。显然，托洛茨基分子不能不向人民、向工人阶级隐瞒这样的政纲。他们不仅向工人阶级，而且向托洛茨基派群众，不仅向托洛茨基派群众，甚至向总共只有 30—40 人组成的托洛茨基派上层领导隐瞒这个政纲。当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要求托洛茨基允许他们召集 30—40 人组成的托洛茨基分子小型代表会议来传达这个政纲的性质时，托洛茨基禁止他们这样做，说即使把这个政纲的真正性质只告诉极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做法”可能引起分裂。

这些“政治活动家”不仅向工人阶级，而且向托洛茨基派群众，不仅向托洛茨基派群众，而且向托洛茨基派上层领导隐瞒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政纲，——这就是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面貌。

但是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能叫作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了。

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杀人凶手组成的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是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死敌组成的一伙匪帮。

这就是最近7—8年来托洛茨基主义演变的无可争辩的结果。

这就是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和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区别。

我们党的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和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这个深刻的区别。他们看不见，托洛茨基分子早已不是有思想的人了，托洛茨基分子早已变成了拦路抢劫的强盗，只要能向苏维埃国家和苏维埃政权捣乱，他们可以采用任何卑鄙手段，干出一切下流勾当，直到搞间谍活动和直接背叛自己的祖国。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这一点，因此就不善于及时地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便用新的方法更加坚决地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分子近几年来的下流勾当，对我们党的某些同志说来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了。

还有，最后，我们党的同志看不见，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代理人在其中起着相当积极作用的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同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

第一，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人是公开的异己分子。他们大部分是过去的企业主、过去替旧主人服务的经理、过去的老股份公司的股东，或者单单是在政治上公开同我们为敌的旧资产阶级专家。我们的人，谁也不怀疑这些老爷们真正的政治面目。就是沙赫特分子自己，也并不隐瞒他们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态度。对于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就不能这样说了。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衣袋里装着党证，所以这些人

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异己分子。如果说旧的暗害分子公开反对我们，那么，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则是向我们的人献媚，夸奖我们的人，拍他们的马屁，以便骗取信任。你们看，这就是重大的区别。

第二，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人的力量，在于他们多少掌握了必要的技术知识，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这样的知识，不得不向他们学习。这种情况给了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以极大的优越条件，使他们有可能为所欲为地，毫无阻碍地进行暗害活动，使他们有可能**在技术上**欺骗我们的人，现在的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就不同了。现在的暗害分子，在技术上并不比我们的人有任何优越的地方。相反地，我们的人在技术上比现在的暗害分子，比托洛茨基分子受过较高的训练。从沙赫特事件到今天，我们这里成长了几万名真正受过技术锻炼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可以举出几千几万名在技术上成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来。同他们比起来，所有这些皮达可夫们和利夫希茨们、舍斯托夫们和博古斯拉夫斯基们、穆拉洛夫们和德罗布尼斯们，都是一群夸夸其谈的人，从技术素养来看不过是一些初学之辈。既然如此，现代的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力量就在于党证，在于有党证。他们的力量就在于，党证给了他们政治上的信任，给他们打开了混进我们所有的机关和组织的门径。他们的优越条件就在于，他们有党证，伪装作苏维埃政权的朋友，**在政治上**欺骗我们的人，滥用信任，偷偷地进行暗害活动，把我们的国家的机密泄露给苏联的敌人。这种“优越条件”就其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来说是可疑的，但是总算是“优越条件”。这种“优越条件”的确说明了这样一个情况，即托洛茨基的暗害分子，由于是有党证的人，有混进我们机关和组织的一切岗位的门径，所以就成了外国谍报机关的至宝。我们党的一些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不了解旧的暗害分子和新的暗害分子之间、沙赫特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间的全部区别，由于看不见这一点，也就不能及时地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便用新的方

法同新的暗害分子作斗争。

四
经济胜利的阴暗面

这就是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忘记了或看不见的我们国内外环境中的一些基本事实。

这就是我们的人对近几年来发生的暗害和破坏活动的事件感到意外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的人看不见这一切，为什么他们忘记了这一切呢？

所有这些健忘、盲目、麻痹大意、温厚宽容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不是我们的人在工作中的先天缺陷呢？

不，这不是先天缺陷。这是暂时的现象，只要我们的人作一些努力，就能迅速加以克服。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我们党的同志近几年来完全埋头于经济工作，他们十分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由于陶醉于这一切事情，就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把其余的都丢掉了。

问题在于，他们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就以为这个工作包括了一切，而对于象苏联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包围、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同暗害活动斗争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根本不注意了，认为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更次要的事情。

胜利和成绩，当然是伟大的事情。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胜利的确是巨大的。然而，胜利也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有其阴暗面。大的胜利和大的成绩，往往使政治经验少的人产生麻痹大意、温厚宽容、自满、过分自信、自高自大和浮夸的毛病。你们不能否认，近几

年来，浮夸分子在我们这里多得数不胜数。用不着奇怪，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而重要的胜利的情况下，会产生浮夸情绪、夸耀我们的成就的情绪，会产生低估我们敌人力量的情绪、高估自己力量的情绪，由于这一切，就出现了政治上的盲目。

在这里，对于因胜利而产生的危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我应当讲几句话。

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我们凭经验是知道的。我们同这种危险已经进行了几年的斗争，应当说，不是没有成绩的。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往往使不坚定的人产生灰心丧气、不相信自己力量的情绪、悲观主义的情绪。相反地，哪里克服了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那里的人们就会在这个斗争中受到锻炼，从斗争中成长为真正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就是因困难而产生的危险的性质。这就是克服困难的结果。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因胜利而产生的危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是的，是的，同志们，是因胜利和成绩而产生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于，节节胜利，步步成功，一再超额完成计划的胜利环境，会使政治经验少和见识不很多的人产生麻痹大意和自满情绪，会造成一种使人不知分寸和政治嗅觉迟钝而一味庆祝胜利、互相祝贺的气氛，会使人们松劲，使他们高枕无忧。

在这种令人昏眩的自高自大和自满的气氛里，在这种大肆夸耀和自吹自擂的气氛里，人们往往忘记了对我国命运具有头等意义的一些重大事实，人们开始看不见象资本主义包围、新形式的暗害活动、因我们的胜利而产生的危险等等这样一些不愉快的事实，这是毫不奇怪的。资本主义包围？这是胡说八道！既然我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所谓资本主义包围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新形式的暗害活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这全是区区小事！既然我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们的经济计划，这一切小事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党章，党的机关的选举制，党的领导者向党员群众报告工作的制度？这一切是不是

需要呢？既然我们的经济在发展，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改善，这些小事是不是值得过问呢？这全是区区小事！计划我们正在超额完成，我们的党并不坏，党中央也不坏，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有些古怪的人坐在莫斯科那里，坐在党中央那里，凭空想出来一些什么问题，谈论什么暗害活动，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我们某些没有经验的同志，由于昏头昏脑地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竟多么容易而“简单地”得了政治盲目病。

因胜利、因成绩而产生的危险就在于此。

我们党的同志因陶醉于经济胜利，忘记了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内外的事实，看不见包围着我国的一系列危险，其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的麻痹大意、健忘、温厚宽容和政治上的盲目，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们经济工作和党的工作缺点的根源就在于此。

五
我 们 的 任 务

怎样消灭我们工作中的这些缺点呢？

为此需要做些什么呢？

必须实行以下办法：

（1）首先必须把纠缠于这个或那个机关中的“日常事务”的我们党的同志的注意力，转到国际和国内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去。

（2）必须把我们党的政治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把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和经济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和布尔什维克锻炼作为首要任务。

（3）必须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经济胜利的意义不容争辩地是极其伟大的，我们今后仍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取得这种胜利，但是，

经济胜利毕竟不能包括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事业。

必须说明，因经济胜利而产生的、表现为自满、麻痹大意、政治嗅觉迟钝的阴暗面，只有把经济胜利同党的建设和我们党展开的政治工作的胜利结合起来，才能消灭掉。

必须说明，经济胜利本身，它的巩固和持久，完完全全取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的胜利，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经济胜利就会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东西。

（4）必须记住而且时刻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包围是决定苏联国际环境的基本事实。

要记住而且时刻不要忘记，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外国谍报机关就会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恐怖分子。要记住这一点，并同那些低估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的意义以及低估暗害活动的力量和意义的同志们作斗争。

要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任何经济胜利，不管这些胜利是多么伟大，都不能取消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以及从这一事实产生的结果。

要采取必要的办法，使我们的同志，党的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有可能认识外国谍报机关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实行方法和技术。

（5）必须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托洛茨基分子是替外国谍报机关进行破坏、暗害和间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早已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他们早已不再为任何一种同工人阶级利益相容的思想服务，他们变成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

必须说明，在反对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现在需要的不是旧方法，不是辩论的方法，而是新方法，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

（6）必须向我们党的同志说明，现时的暗害分子同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是有区别的。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暗害分子，利用我们的

人的技术落后，靠技术欺骗了我们的人，而现时的暗害分子则持有党证，利用我们的人在政治上的麻痹大意，靠对他们这些党员在政治上的信任，来欺骗我们的人。

必须以进行干部政治教育、精通布尔什维主义和铲除在政治上轻信态度的新口号，以完全适合目前时期的新口号，来补充适合沙赫特事件时期的掌握技术的旧口号。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不能在十来年前，在沙赫特事件时期，一下子提出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掌握技术，第二个口号是进行干部政治教育吗？不，不能。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这样办事。在革命运动的转折关头，总是要提出一个基本口号作为中心环节，以便抓住这个环节，通过它拖出整个链条，列宁曾经这样教导我们：要找到我们工作链条中的基本环节，紧紧抓住和拖出这个环节，以便通过它拖出整个链条，向前迈进。革命运动的历史表明，这个策略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在沙赫特事件时期，我们的人的弱点就是技术落后。当时我们的弱点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技术问题。至于我们对当时的暗害分子的政治态度，那是完全鲜明的，即布尔什维克对政治异已分子的态度。我们提出了掌握技术的口号并且在前一个时期培养了几万个以至几十万个有技术修养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从而消灭了我们这种技术上的弱点。而现在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已经有了在技术上有修养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现在充当暗害分子的已经不是公开的异己分子，不是比我们的人有任何技术上的优越条件的人，而是持有党证并享受党员一切权利的人。现在我们的人的弱点，不是技术上的落后，而是政治上的麻痹大意，是对偶然取得党证的人的盲目信任，是缺少对人的审查——不是根据政治宣言而是根据工作结果来审查。现在对我们说来，关键问题不是克服我们干部在技术上的落后，因为这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而是克服政治上的麻痹大意和对偶然取得党证的暗害分子在政治上的轻信态度。

这就是沙赫特事件时期为干部而斗争的关键问题和目前时期的关键问题的根本区别。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在十来年前一下子就提出两个口号，既提出掌握技术的口号又提出进行干部政治教育的口号。

正因为如此，现在必须以精通布尔什维主义、进行干部政治教育和消灭我们在政治上的麻痹大意的新口号，来补充掌握技术的旧口号。

（7）必须粉碎和抛弃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

这不仅是腐朽的理论，而且也是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痹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而让阶级故人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应该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将继续进行垂死挣扎。

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主义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必须记住这一切，并经常保持警戒。

（8）必须粉碎和抛弃另一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凡是不经常进行暗害活动而且有时还在工作中表现出一些成绩的人，似乎不可能是暗害分子。

这种怪论暴露出制造这种理论的人是幼稚的。任何一个暗害分子，如果不想在最短期内被揭发出来，就不会时刻都进行暗害活动。相反地，真正的暗害分子，一定要在工作中时而也表现出成绩来，因为这是保存他这个暗害分子、骗取信任并继续进行暗害活动的唯一方法。

我想，这个问题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

（9）必须粉碎和抛弃第三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经常完成经济计划，似乎就能使暗害活动及其结果化为乌有。

这类理论只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工作人员的本位主义自尊心感到满足，使他们安心，并削弱他们对暗害活动的斗争。“经常完成我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证明了我们的一切经济计划都定得太低，因为这些计划没有估计到我国国民经济内部蕴藏的巨大的后备和潜力。

第二，各人民委员部总的来说完成了经济计划，并不等于某些很重要的部门也完成了计划。相反地，事实表明，许多人民委员部虽然完成了甚至超额完成了年度经济计划，可是并没有经常完成国民经济中某些很重要的部门的计划。

第三，毫无疑问，如果暗害分子没有被揭发出来和驱逐出去，那么经济计划的完成就会坏得多，这一点是眼光短浅的制造上述理论的人应该记住的。

第四，暗害分子通常不是在和平时期而是在战争前夜或战争时期进行自己主要的暗害活动的。姑且假定我们被“经常完成经济计划”这种腐朽的理论弄得昏昏欲睡而不去触动暗害分子，制造这一腐朽理论的人是否设想过，如果我们让暗害分子以“经常完成经济计划”这种腐朽理论作护身符而留在我们国民经济内部，那么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多么大的危害。

“经常完成经济计划”的理论是有利于暗害分子的理论，这难道

还不明显吗？

（10）必须粉碎和抛弃第四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似乎是消灭暗害活动的基本手段。

杜撰出这种理论，是为了在侈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情况下，使暗害分子免受打击。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和非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在库兹巴斯和顿巴斯滥用我们一些在政治上麻痹大意的同志的信任，经常欺骗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捣他们的鬼，人为地制造一系列影响他们顺利工作的障碍，最终使他们的工作垮了台。例如，在顿巴斯，既然暗害分子在基本建设方面进行破坏，使速度落后的采煤准备工作同所有其他工作脱了节，那么单是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能干出什么来呢？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需要我们给以实际帮助，去反对暗害分子各色各样的阴谋诡计，以便把事业推向前进，并完成自己伟大的使命，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同暗害活动作斗争，为消灭暗害活动而斗争，制止暗害活动，是使斯达汉诺夫运动能够广泛展开的必要条件，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想，这个问题也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

（11）必须粉碎和抛弃第五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托洛茨基暗害分子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后备力量，似乎他们用尽自己最后的一批干部了。

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只有幼稚的人才能杜撰出这种理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是有自己的后备力量的。这些后备力量首先就是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这些后备力量就是国外许多与苏联为敌的集团和组织。

以托洛茨基反革命的第四国际为例，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间谍和破坏分子。这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这个间谍国际将给托洛茨基分子的间谍和暗害活动派遣干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或者，再以挪

威骗子舍夫洛集团为例，这个集团曾给间谍头子托洛茨基以栖身之所并帮助他向苏联捣乱。这个集团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谁能否认这个反革命集团今后仍将为托洛茨基间谍和暗害分子效劳呢？

或者，再以和舍夫洛一样的法国骗子苏瓦林集团为例。这个集团不是后备力量是什么呢？难道能否认这个骗子集团同样将帮助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其反苏的间谍暗害活动吗？

所有这些德国老爷们，这些向法西斯分子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的形形色色的路特·费舍之流、马斯洛夫之流、乌尔班斯之流，不是托洛茨基的间谍暗害活动的后备力量是什么呢？

或者，再以著名的骗子伊斯门为首的一伙美国作家为例，所有这些要笔杆的匪徒都是靠污蔑苏联工人阶级为生的，他们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后备力量是什么呢？

总之，说托洛茨基分子似乎用尽了最后的一批干部，这种腐朽的理论是应该抛弃的。

最后，还必须粉碎和抛弃一种腐朽的理论，说什么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人数很多，而暗害分子人数很少，因为拥护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有几千万人，而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可以不必注意这一小撮暗害分子。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杜撰出这种极端荒谬的理论，是为了安慰我们某些由于不善于同暗害活动作斗争而在工作中失败的领导同志，是为了麻痹他们的警惕性，让他们安心睡觉。

说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却有几千万，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暗害分子不能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损害。要进行捣乱和暗害，根本不需要大批人。要修建第聂伯河国家建筑工程，需要有几万工人。但是要炸毁这个工程，也许至多需要几十个人。要在战争期间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是要在前线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在某

个集团军的司令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的司令部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并交给敌军的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象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几十个以至几百个。

因此，不能以我们人数很多而托洛茨基暗害分子人数很少來安慰自己。

必须做到在我们的队伍中根本没有托洛茨基暗害分子。

关于如何消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消灭我们一切组织（无论是经济组织和苏维埃组织，还是行政组织和党组织）共同存在的缺点的问题，情况就是如此。

消灭这些缺点所必需的办法，就是这些。

至于专门党组织及其工作中的缺点，那么在交给你们审阅的决议草案中，已经相当详细地谈到消灭这些缺点的办法了。因此，我想，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叙述这一方面的情况。

我只想略微谈一谈我们党的干部的政治训练和提高问题。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如果我们善于把我们党自下而上的全体干部，在思想上加以训练并且在政治上加以锻炼，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国内外环境中毫无围难地辨别方向，如果我们善于把他们造就成完全成熟的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能够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那么我们就解决了我们一切任务的十分之九。

我们党的领导成分的情况怎样呢？

我们党的成分，如果指党的领导人员，大约有 3000—4000 个高级领导者。可以说，这是我们党的将领一级。

其次，有 3—4 万个中级领导人员。这是我们党的军官一级。

再其次，有 10—15 万个党的下级领导人员。这是我们党的士官一级。

提高这些指挥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锻炼，以那些等待提拔的新生力量来充实这些干部，从而扩大领导干部的队伍，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要办到这一点，需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必须建议我们党的领导者，从支部书记到州和共和国的党组织的书圮，要在一定期间内为自已挑选两个人，两个党务工作人员，能够充当他们真正的副手。也许有人会说，到哪里去找呢，每个书记都要有两个副手，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没有适当的工作人员。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能干的人，有才能的人，我们这里成千上万。只需要去了解他们，及时提拔他们，使他们不致老呆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而开始腐朽起来。要找就会找到。

其次，为了使支部书记得到党的训练和进修，必须在每个州的中心设立以 4 个月为一期的“**党的训练班**”。应当派所有基层党组织（支部〉的书记前去受训，而在他们受训期满并回到原工作岗位后，再派他们的副手及基层党组织最能干的委员前去受训。

再其次，为了使该组织第一书记得到政治上的进修，必须在苏联各地，例如在 10 个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设立以 8 个月为一期的“**列宁主义训练班**”。应当派区和专区的党组织第一书记前去受训，而在他们受训期满回到原工作岗位后，再派他们的副手及区和专区的组织中最能干的委员前去受训。

再其次，为了使市组织书记得到思想上的进修和政治上的提高，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 6 个月为一期的“**党史和党的政策研究班**”。应当派市委第一书记或第二书记前去受训，而在他们训练期满回到原工作岗位后，再派市组织内最能干的委员前去受训。

最后，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 6 个月为一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讨论会**”。派去受训的必须是州组织、边疆区党组织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应当从这些同志中间造就出

不仅一批而且好几批能够代替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者的人才。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做到的。

同志们，我的话就要结束了。

这样，我们叙述了我们工作中的基本缺点，既有我们一切组织，即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党组织共同的缺点，也有只是我们专门党组织所特有的缺点。这些缺点正被工人阶级的敌人利用来进行其破坏、暗害、间谍和暗杀的活动。

其次，我们指出了一些基本办法，它们是消灭这些缺点，使外国谍报机关的托洛茨基法西斯代理人的破坏、暗害、间谍和恐怖的袭击无能为害所必须采取的。

试问，我们能不能实现这一切办法呢？我们是不是有一切必要的可能性做到这一点呢？

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的。我们所以能够，是因为我们拥有为实现这些办法所必需的一切手段。

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

缺少的只有一点，就是消灭自己的麻痹大意、自己的温厚宽容、自己的政治近视的决心。

关键就在这里。

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并举起了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难道我们就不能搞掉这种可笑的和荒谬的毛病吗？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我们一定能搞掉这种毛病，当然，如果我们真想搞掉的话。我们不是简简单单地搞掉它，而是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真正地搞掉它。

当我们搞掉了这种荒谬的毛病时，我们便能完全有把握地说，我们不怕国内外的任何敌人，我们不怕他们的袭击，因为正象我们现在粉碎他们那样，正象我们过去粉碎了他们那样，我们将来也一定会粉碎他们。

结 束 语

同志们！

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讲到了所讨论的事情的基本问题，讨论情况表明，我们现在有了完全明确的认识，了解了任务，并且有决心消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是讨论情况也表明，对于我们在组织和政治的实践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我们还没有充分明确的了解。我算了一下，这样的问题共有7个。

请让我对这些问题讲几句话。

（1）应当认为，现在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过分陶醉于经济工作和经济胜利而低估和忘记党的政治问题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使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党的政治问题方面，以便使经济上的胜利与党的政治工作上的胜利结合起来，齐头并进。

怎样在实践中实现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呢？怎样实现使党组织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从讨论中可以看到，有些同志喜欢从这里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以为现在似乎应当根本摆脱经济工作。至少有这样一种说法，好了，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要从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了，现在也可以从事党的政治工作了。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不，不正确。当我们党的同志陶醉于经济胜利而离开了政治时，这是一个极端，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牺牲。如果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由于要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而想离开经济工作，那么这是另一个极端，它将使我们遭受的牺牲并不比前者小。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济，正如我们不能离开政治一样。为了便于研究起见，人们通常在方法上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但是，这只是为了便于研究，才仅仅在方法上人为地加以分开。相反地，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两者

共同存在，共同起作用。谁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以削弱政治工作为代价来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以削弱经济工作为代价来加强政治工作，那他一定要碰钉子。

决议草案中专门有一条，谈到使党组织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并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这一条文的意思并不是要摆脱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导，而仅仅是再不容许以我们党组织去实际代替经济机关（其中特别是农业机关），并使它们陷于无专人负责的境地。因此，必须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机关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经常帮助这些机关，经常巩固这些机关，不是撇开这些机关而是通过这些机关去领导经济。必须给经济机关、首先是给农业机关以优秀人才，必须给这些机关配备有能力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的新的优秀工作人员。只有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才能指望党组织完全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显然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只要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党组织就不得不在今后一定的短时期内，直接从事农业工作及其一切细节，如耕地、播种、收获等等。

（2）关于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等等，我要讲两句话。我想，现在大家都明白了，现时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不管他们用哪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己，早已不是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派别了，他们已变成了一伙职业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显然必须无情地粉碎和铲除这些老爷们，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是我们祖国的叛徒。这一点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怎样在实际上实现粉碎和铲除托洛茨基主义的日德代理人的任务呢？这是不是说，要粉碎和铲除的不仅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且连那些一度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而后来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也要粉碎和铲除呢？这是不是说，要粉碎和铲除的不仅是真正进行暗害活动的托洛茨基代理人，而且连那些偶尔在

某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曾经经过的一条街上走过路的人也要粉碎和铲除呢？这些说法至少在这次全会上是有人提出过的。能不能认为这样解释决议是正确的呢？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正如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必须个别对待，分别处理。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一切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处理，只能损害我们同真正的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和间谍作斗争的事业。

在我们负责同志中间，有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他们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仅不亚于而且还胜过我们一些可尊敬的、未曾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的同志。现在要摈斥这样的同志，那是愚蠢的。

在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思想上一向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却和个别的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过个人的联系，当他们一看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实际面貌，就立刻断绝了这种联系。他们没有马上断绝同个别托洛茨基分子的个人朋友联系，而迟了一些，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是，要把这些同志列为托洛茨基分子一伙，那是愚蠢的。

（3）正确地挑选工作人员和正确地分配他们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挑选工作人员，第一，要根据政治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值得政治上的信任；第二，要根据业务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

这就是说，不要把看业务变成事务主义原则，即不要只注意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而不注意他们的政治面貌。

这就是说，不要把看政治变成独一无二的原则，即不要只注意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而不注意他们的业务能力。

能不能说我们党的同志实行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准则呢？可惜不能这样说。在这次全会上已经说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说完全。问题在

于，这个经过考验的准则在我们的实践中往往被破坏了，而且是被非常粗暴地破坏了。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

显然可以看出，这不是由负责工作人员组成的领导集团，而是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其成员都力求和平相处，互不得罪，家丑不外杨，互相吹捧，并且时常向中央送交空洞而令人作呕的胜利报告。

不难理解，在这种小家族环境里，既不能有批评工作缺点的余地，也不能有工作领导者自我批评的余地。

显然，这种小家族环境会为培养阿谀者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些阿谀者毫无自尊心，因而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就拿米尔左扬和瓦伊诺夫的例子来说。前者是哈萨克斯坦的边疆区党组织的书记，后者是雅罗斯拉夫尔州党组织的书记。这两个人在我们中间并不是名列最末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是怎样挑选工作人员呢？前者从他早先工作过的阿塞拜疆和乌拉尔带了30—40个“自己的”人到哈萨克斯坦，并把他们安置在哈萨克斯坦的负责岗位上。后者也从他早先工作过的顿巴斯带了10多个“自己的”人到雅罗斯拉夫尔，并把他们也安置在负责岗位上。可见，米尔左扬是有自己的小团体的。瓦伊诺夫也是有自己的小团体的。难道不能按照人所共知的布尔什维克挑选和配备人员的准则从当地人中间挑选工作人员吗？当然是能够的。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挑选工作人员的准则，这种准则排除了庸俗的市侩态度的可能性，排除了根据小家族和小团体的标志挑选工作人员的可能性。此外，他们在挑选对个人忠实的人们做工作人员时，显然是想给自己造成无论对当地人以及对党中央都带有某种独立性的环境。假定米尔左扬和瓦伊诺

夫由于某种情况而从他们现在工作的地方调到其他什么地方。那么，他们应当如何处理他们的“尾巴”呢？难道他们又得把自己的“尾巴”带到新的工作地方去吗？

请看，违背布尔什维克正确挑选和分配工作人员的准则竟达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

（4）审查工作人员，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这是什么意思呢？审查工作人员，这就是说，不是根据工作人员的保证和宣言，而是根据他们的工作结果来审查他们。

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这就是说，不仅是在办公室，不仅是根据形式上的工作报告来检查，而首先是要在工作的地方，根据执行的实际结果来检查。

一般讲来，是否需要这样的审查和检查呢？毫无疑问是需要的。其所以需要，第一，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了解工作人员，确定他们的真正品质。其所以需要，第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检查才能确定执行机关的优点和缺点。其所以需要，第三，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检查才能确定任务本身的优点和缺点。

有些同志认为，只能自上而下地审查工作人员，即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工作结果来审查被领导者。这是不对的。自上而下的审查固然是需要的，这是审查工作人员及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的有效办法之一。但是，自上而下的审查，还远不能包括全部审查工作。还有另外一种审查，自下而上的审查，即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审查领导者，指出领导者的错误，指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这种审查是审查工作人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党员群众是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在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审查自己的领导者，方法就是听取领导者的工作报告，批评缺点，以及选举或不选举某些领导同志参加领导机关。正如我们党章所要求的，在党内要切实执行民主集中制，党的机关要无条件地按选举手续产生，

要保证提出和撤消候选人的权利，实行无记名投票，自由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都必须实行，以便于党员群众审查和监督党的领导者。

非党群众是在非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在各种各样的群众会议上审查自己的经济领导者、工会领导者和其他领导者，方法就是在会上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批评缺点，并指出改正缺点的办法。

最后，人民是在选举苏联政权机关时，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投票，来审查自己的国家领导者。

任务就在于把自上而下的审查和自下而上的审查结合起来。

（5）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训练干部，这是什么意思呢？

列宁曾经教导说，诚恳地揭发党的错误，研究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必要的办法，是正确训练和教育党的干部，正确训练和教育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列宁说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①

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义务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是逃避有关自己错误的问题，如象我们这里所常有的情形一样，而是诚恳和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诚恳和公开地订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诚恳和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不能说我们许多同志都乐意这样做，但是布尔什维克，如果真正愿意做布尔什维克，就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揭发错误的原因，订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从而帮助党给干部以正确的训练和正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编者注

确的政治教育。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只有在公开和诚恳的自我批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有两个例子说明列宁的原理是正确的。

例如，拿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错误来说。你们大概记得1930年，当时我们的党员同志想在短短3—4个月内解决把农民转到集体农庄建设上来这个极复杂的问题，当时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制止这些着了迷的同志。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中最危险的时期之一。当时的错误在于，我们的党员同志忘记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忘记了不能凭借行政压力使农民转到集体农庄道路上来，忘记了集体农庄建设不是需要几个月而是需要几年细心的和深思熟虑的工作。他们忘记了这一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你们大概记得，中央关于胜利冲昏头脑和要求我们地方的同志不要忽视现实情说而跑得太远的指示曾遭到激烈的对抗，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中央顶住逆流，把我们党员同志引上正确的道路。结果怎样呢？现在谁都明白了，党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我们党员同志引上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我们有几万个从事集体农庄建设和集体农庄领导的农民出身的出色的干部。这些干部从1930年的错误中得到了训练和教育。但是，如果党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么我们现在也就不会有这批干部。

另外一个是工业建设方面的例子。我指的是我们在沙赫特暗害事件时期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工业干部技术落后的全部危险性,我们容忍这种落后现象,想依靠怀有敌对情绪的专家来展开广泛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因而必然使我们的经济干部充当了资产阶级专家的不好的政治委员。你们大概记得，当时我们的经济干部多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多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技术落后,多么勉强地接受“掌握技术”这个口号。结果怎样呢？事实表明，“掌

握技术”这个口号起了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有几万和几十万个掌握了技术和推动我们工业前进的出色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干部。但是，如果党当时在那些不愿意承认自己技术落后的经济工作人员的顽固态度面前屈服了，如果党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么我们现在也就不会有这批干部。

有些同志说：公开说出自己的错误是不妥当的，因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被我们的敌人看作是我们软弱的表现，并且会被他们利用。同志们，这是无关紧要的，根本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地，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和诚恳改正这些错误，只能加强我们的党，提高我们党在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威信，提高我们国家的力量和实力。而这是主要的。只要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我们在一起，其余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另一些同志说：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其结果并不能训练和巩固我们的干部，反而会削弱和瓦解他们；我们应当体谅和爱护自己的干部，我们应当体谅他们的面子和心情。为此他们提议掩饰我们同志的错误，减弱批评的力量，最好是别管这些错误。这样的方针不仅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首先对于他们想“体谅”和“爱护”的干部是危险的。用掩饰干部错误的办法来体谅和爱护干部，就一定会毁掉这些干部本人。如果我们不把 1930 年的错误揭露出来，并通过这些错误来训练自己的集体农庄布尔什维克干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毁掉这些干部。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同志们在沙赫特暗害事件时期的错误揭露出来，并通过这些错误来训练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工业干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毁掉自己的工业干部。谁想用掩饰错误的方法来体谅我们干部的面子，谁就会既毁掉干部也毁掉干部的面子，因为谁掩饰他们的错误，谁就会使他们容易再犯新的、也许更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应当认为会使这些干部完全垮台，损害他们的“面子”和“心情”。

（6）列宁曾教导我们，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我们领导者不应当骄傲，应当了解，我们虽然是中央委员或人民委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具备了正确领导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官衔本身并不提供知识和经验。称号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还不足以实行正确的领导，因此必须以群众的经验、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人民的经验来充实自己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

这就是说，一分钟也不能削弱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更不用说断绝我们同群众的联系了。

最后，这就是说，要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普通党员的呼声、所谓“小人物”的呼声、人民的呼声。

正确领导是什么意思呢？

这绝不是坐在办公室写指示。

正确领导，这就是说：

第一，正确地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非考虑群众的经验不可，群众能亲身体验到我们领导的结果；

第二，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非有群众方面的直接帮助不可；

第三，组织对这种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

我们领导者只是从一个方面，我是说，从上面来看事物、事件和人的，因此我们的眼界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相反地，群众却是从另一个方面，我是说，从下面来看事物、事件和人的，因此他们的眼界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了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就必须把这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才是正确的。

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有两个例子说明列宁的这个原理是正确的。

这是几年以前的事。我们中央委员讨论了改善顿巴斯的状况的问题。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措施草案，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曾经三次把草案退回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曾经三次收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草案。可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最后，我们决定从顿巴斯找几个工人、普通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同这些同志谈了三天。我们所有中央委员都应当承认，只有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这些“小人物”，才能启示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你们大概记得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顿巴斯采煤办法的著名的决议。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认为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这个决议是正确的、甚至认为是卓越的，而这个决议正是由基层的普通人启示我们作出的。

另一个例子。我指的是尼古拉延科同志的例子。尼古拉延科是什么人呢？尼古拉延科是一个普通党员。她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整整一年中，她一直发出警告，说基辅党组织的情况不好，她揭发了小家族习气，对工作人员的市侩庸俗态度，压制批评的现象，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专横行为。她被赶走了，就象赶走讨厌的苍蝇一样。后来，有人为了摆脱她，竟把她抓起来并开除了党籍。无论是基辅的组织，无论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都没有帮助她获得真理。只是由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干涉，才帮助解开了这个难解的结扣。事情经过审查后，查清了什么呢？查清了尼古拉延科是正确的，基辅组织是不正确的。事实正是如此，分毫不差。而尼古拉延科究竟是什么人呢？她当然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人民委员，不是基辅州组织的书记，她甚至不是哪一个支部的书记，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普通党员。

由此可见，平常的人有时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

象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十个几百个。

由此可见，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

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

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只有当领导者和群众保持极密切的联系，领导者和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和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保持极密切的联系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

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立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接触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雄克很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完全可能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

（7）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指的是我们党的一些同志，对个别党员的命运，对开除党员党籍或恢复被开除党员党籍问题所采取的形式主义和冷漠的官僚主义态度。问题在于，我们党的一些领导者犯了对人，对党员、对工作人员漠不关心的毛病。不但如此，他们不考察党员，不知道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成长，他们根本不了解工作人员。因此，他们不是分别对待党员、党的工作人员。正因为他们在评定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时不是分别对待，所以他们通常是随便乱搞，或者是笼统而没有分寸地夸奖他们，或者是笼统而没有分寸地打击他们，成千成万地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样的领导者一般都是力求考虑几万人，不关心“个人”、个别党员，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开除几千几万个党员出党，他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自慰地说，我们党有 200 万党员，开除几万个一点也不会改变党的状况。然而，实际上，只有那些极端反党的人，才会这样对待党员。

由于对人，对党员、对党的工作人员采取这种冷漠的态度，所以在一部分党员中间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些不满和怨恨，而托洛茨基两面派便灵巧地抓住了这些心怀怨恨的同志，巧妙地把他们拖入托洛茨基暗害活动的泥坑。

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 1927 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 854000 党员，参加表决的有 73 万党员。其中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 724000 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 4000 人，即占 0.5%左右，弃权的有 2600 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有 123000 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把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 4000 人，加上所有弃权的人，假定他们也同情托洛茨基分子,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人的 5%，而不是援例加上 0.5%，就是

说，大约有 6000 党员，那么，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 12000 党员。你们看，这就赴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此外述有一种情况，在这 12000 人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离开了它，那么你们就明白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了。虽然如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在我们党的周围仍然有一些后备力量，这是因为我们一些同志在开除党籍和恢复党籍问题上采取了不正确的政策，我们一些同志对个别党员和个别工作人员的命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从而人为地增加了一些心怀不满和怨恨的人，这就给托洛茨基分子造成这样一些后备力量。

大多数党员被开除党籍都是由于所谓消极。什么是消极呢？原来有人认为，如果党员不**精通**党纲，那就是消极，就应当开除。可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咬文嚼字地解释我们的党章。要精通党纲，就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考验而且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们党员中间是否有很多人已经精通了我们的党纲，已经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和经过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那么我们就只有把知识分子和一般有学问的人留在党内。谁需要这样的党呢？我们有经过检验的和经过一切考验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列宁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凡**承认**党纲，缴纳党费，并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请注意，在列宁的公式中并没有说**精通**党纲，而是说**承认**党纲。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用不着证明，在这方面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我们党的那些妄谈什么精通党纲的同志。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党所依据的出发点，是只有那些已经精通党纲、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才可以作为党员，那么我们党就不会在党内设立几千个党员学习小组,几百个党校，让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精通我们的纲领。十分明显，我们党所以在党员中间成立这样的学校和学习小组，正因为我们党知道党员还没有精通党纲，还没

有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要端正我们关于党员资格和开除党籍问题的政策，就必须取消现在关于消极问题的愚蠢的解释。

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还有另一种错误。问题在于，我们的同志不承认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中间的东西。一个工人、一个党员只要稍微犯了一点过错，开党的会议迟到了一两次，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缴纳党费，就立刻被驱逐出党。

人们不注意他的过错的程度，不到会的原因，没有缴纳党费的原因。这些问题上的官僚主义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不难了解，正是由于这种冷漠的政策，许多杰出的骨干工人、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被抛出了党外。在开除党员之前给以劝告，如果这无效，再给以警告或严重警告，如果这仍然无效，再给以改正错误的期限，或者万不得已时，再把他转为预备党员，而不要一下子就开除党籍，难道不能这样做吗？当然，是能这样做的。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关心人，关心党员，关心党员的命运。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某些同志所缺少的。

同志们，是消灭这种岂有此理的现象的时候了，早就是时候了。

译自《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54 年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 14 卷第 129—164 页

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

（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

我认为，我们的一些联共（布）历史教科书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有三个主要原因。或者是因为它们在叙述联共（布）历史时没有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它们仅限于叙述和简单地描写各种派别的斗争的事件和事实，而没有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或者是因为它们在结构方面，在事件分期方面，有不正确的地方。

要避免这些缺点，作者应当注意以下几点意见。

应当在教科书的每一章（或篇）之前，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作一简要的历史的说明。否则，联共（布）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而只不过是对往事的一种肤浅的莫名其妙的叙述。

第二，不仅应当叙述那些能表明苏联在资本主义时期在党和工人阶级中曾经存在大量派别的事实，而且应当对这些事实作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指出：（一）在革命前的俄国，既存在一些新的、从资本主义观点看来是现代的阶级，也存在一些旧的、资本主义前的阶级；（二）国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三）工人阶级的成分复杂，这是党内和工人阶级内便于存在大量派别的条件。否则，大量派别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第三，不仅应当用简单叙述的口吻来说明各种派别激烈斗争的事实，而且应当对这些事实作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指出：布尔什维克同反布尔什维克派别所进行的斗争是维护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斗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及一般地说，在敌对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党内矛盾

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上述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克服这些矛盾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不同反列宁主义的派别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不战胜它们，我们党就一定会蜕化变质，就象第二国际那些社会民主党没有进行这样的斗争而蜕化变质一样。在这方面倒可以使用1882年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①]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

最后，应当把联共（布）历史中的事件的分期工作做得有条理些。

我想，下列提纲或类似下列的提纲可以作为基础。

提纲

一

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而斗争。

（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建立起到1900—1901年最初几号《火星报》出现止。）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出现。

（1901—1904年）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9—372页。——编者注

三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

（1904—1907 年）

四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

（1908—1912 年）

五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前工人运动高涨年代。

（1912－1914 年）

六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大战和俄国第二次革命(二月革命)时期。

（1914 年—1917 年 3 月〉

七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1917 年 4 月—1918 年）

八

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时期。

（1918—1920 年）

九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

（1921—1925 年）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1926—1929 年）

十一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

（1930—1934 年）

十二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

（1935—1937 年）

约·斯大林

译自 1937 年 5 月《布尔什维克》
第 9 期第 8—10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4 卷第 165—168 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导言

（一九三八年九月）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经历了漫长而光荣的途程，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出现的人数不多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发展为现在领导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

联共(布)是在革命前俄国工人运动基础上，由那些同工人运动相联系并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成长起来的。联共(布)过去和现在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为指针。联共(布)的领袖们在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联共(布)在工人运动内部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即同社会革命党(更早是同他们的前辈——民粹派)、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作原则斗争中，在党内则是同孟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派别，即同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和其他反列宁主义集团做原则性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联共(布)是在同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劳动群众的一切敌人即地主、资本家、富农、暗害分子和特务作革命斗争中，在同资本主义包围势力的一切雇佣走狗作革命斗争中，得到巩固和锻炼的。

联共(布)的历史是三次革命，即 1905 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 年 2 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 1917 年 10 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

联共(布)的历史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资本家政权的历史，是在国内战争时期粉碎外国武装干涉的历史，是在我国建成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

研究联共(布)的历史，就是用我国工农为社会主义斗争的经验丰富自己。

研究联共(布)的历史，研究我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作斗争、同劳动群众的一切敌人作斗争的历史，有助于**掌握布尔什维主义**，能提高政治警惕性。

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英勇历史，就是用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规律的知识武装自己，用革命动力的知识武装自己。

研究联共(布)的历史，就能增强信心，确信列宁斯大林党的伟大事业必将最后胜利，确信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胜利。

本书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的简要叙述。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5卷第35—36页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
（一九三八年九月）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辩证方法的时候，通常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的仅仅是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摒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且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

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①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援引费尔巴哈，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摒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大家知道，费尔巴哈虽然在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竭力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恩格斯屡次说过：费尔巴哈“虽然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2--654页）①

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词，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在古代，所谓辩证法，指的是以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

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是：

（1）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和第229页。——译者注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如果被孤立地、同周围现象没有联系地拿来看，那就无法理解，因为自然界的任何领域中的任何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条件没有联系、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就可以理解、可以论证了。

(2)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

因此，辩证方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恩格斯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原始的细胞。——编者注)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484页)[①]

恩格斯说，因此，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同上，第23页)[②]

(3)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19-420页。——译者注

程，看作量变不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动力，了解为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恩格斯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3页）①

恩格斯所在说明辩证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写道：

"在物理学中……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汽或冰。……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译者注

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湿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物理学的所谓常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点。——编者注)，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变化)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527--528页)①

接着，恩格斯讲到化学时又说；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拿氧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末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同上，第528页)②

最后，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批评这位大骂黑格尔而暗中又剽窃黑格尔关于从无感觉世界王国进到感觉的王国，从无机界王国进到有机生命王国，是向新状态的飞跃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时写道：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过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同上，第45—46页)③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87-488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81页，——译者注

(4)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进行的。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　《哲学笔记》俄文版第263页)[①]

其次：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301页)[②]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

不难了解，把辩证方法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那就很明显，在估计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不应当像历史学家常做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这个社会运动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

奴隶占有制度，从现代的条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反常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712页。——译者注

的荒谬事情。然而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奴隶占有制度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 1905 年的俄国，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意味着前进一步。资产阶级民族共和国的要求，从我们苏联现在的条件看来，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了一步。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现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其次。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社会秩序，没有什么私有制和剥削的“永恒原则”，没有什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样。

这就是说，不要指靠已经不再发展的社会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要指靠正在发展的、有前途的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俄国无产阶级同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是占极少数。但是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农民则是一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就指靠无产阶级。他们没有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后来从一个不大的

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其次，　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其次，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政策。

以上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观察社会生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那从根本上说来，它是同哲学唯心主义截然相反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1）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的体现，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

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而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1页)①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持着唯物主义的现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在谈到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时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318页)②

(2)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 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 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29页)③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译者注

其次：

“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32页)①

马克思谈到物质和思维问题时说道：

“**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同上，第302页)②

列宁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时写道：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意识、感觉、经验……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265－267页)③

其次：

“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同上，第119－120页)④

“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同上，第288页)⑤

“脑是思想的器官。”(同上，第125页)⑥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4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82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146—147页。——译者注

⑤ 同上，第361页。——译者注

⑥ 同上，第153页。——译者注

唯心主义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不相信我们知识的可靠性，不相信客观真理，并且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而只有还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

恩格斯在批判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所谓世界不可认识和“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论点，坚持唯物主义关于我们的知识是可靠知识这一著名原理时写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进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倒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30页）①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222页

列宁指责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尤什凯维奇以及马赫的其他信徒堕入信仰主义，列宁坚持唯物主义的著名原理，即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科学知识是可靠的；科学的规律是客观真理。列宁写道：

“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科学想达到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末一切信仰主义就被完全否定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102页)①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特征就是这样。

显而易见，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末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不再是一堆“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成为社会有规律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为一种科学。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不应该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不应该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

其次。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24页。——译者注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就是说，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①]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以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封建制度下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一种，——那不能用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的“本性”和“属性”来解释，而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解释。

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

① 原文为“ у ч р е ж д е н и 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译者注

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①]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不陷入空想家的地位，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当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

包括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空想派之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他们陷入唯心主义，不是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上，而是不顾这种需要并且违反这种需要，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理想计划”和“包罗万象的方案”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

但是，从马克思的话中不能引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意义，它们不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暂且只是说到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起源**，只是说到它们的**产生**，只是说到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译者注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可见，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因此马克思说：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406页）[①]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为着有可能去影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加速这些条件的发展，加速这些条件的改善，就应当依据这样一种社会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译者注

理论和社会思想，这种理论和思想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因而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能动员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一直决心粉碎社会反动势力、为社会先进势力开辟道路的无产阶级党的大军。

“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先进理论、先进思想有动员作用、组织作用和改造作用，他们陷入庸俗唯物主义，把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的作用看成几乎等于零，从而要党消极起来，无所作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以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为依据，把这种理论提到它应有的高度，并且把充分利用这种理论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看作自己的职责。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来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和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之同的关系问题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

现在还要说明一个同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于归根到底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和政治设施等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应该作怎样的了解？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究竟是什么，它们的特征究竟怎样？

首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怎样呢？地理环境是不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人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

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这是很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

当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

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三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而美国早已达到资本

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十八倍，比苏联高二十五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比利时，同苏联相比，比利时更是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在比利时占统治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1）既然如此，那末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农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要有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生产它们，要生产它们，就需要有人们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些工具，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还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生产的另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时候，在生产内部彼此建立这种或那种相互关系，即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

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

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①

可见，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2) 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们利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得粗浅一些，过着不同方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下又有一种生产方式，如此等等。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政治设施也是各不相同的。

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或者说得粗浅一些：人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人们的思想方式也就怎样。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译者注

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这就是说，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社会的观点和思想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每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到社会的经济中去寻求。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应当掌握生产发展规律的知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供，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

(3) 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

时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也确实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就会发生危机，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是两者冲突的例子，在那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同生产力的性质极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结果，就是破坏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本身是以破坏现存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为使命的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反之，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①]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所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

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

下面就是从古代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情景。从粗笨的石器

———————————————

①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问题，可参看斯大林后来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译者注

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铧犁等等)，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加工材料的金属工具进一步改良，渡过到冶铁风箱，过渡到陶器生产，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得到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从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进而过渡到机器制。出现现代大机器工业，——这就是人类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远不完备的情景。这里很明显，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斗争。为了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或邻近部落的牺牲品。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同时用来防御猛兽的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选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这时人们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这时，不知道畜牧业、也不

知道农业的那种贫乏原始的狩猎经济，已经被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所代替；这时已经有可能在各个人之同和各部落之同交换产品，有可能把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生产资料确实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时已经有可能迫使大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并且把大多数人变为奴隶。这里社会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那种共同的自由的劳动没有了，占主要地位的是受不劳动的奴隶主剥削的奴隶的强迫劳动。因此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也没有了，代替它的是私有制。这里，奴隶主是第一个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者。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农奴，但是可以买卖农奴。除了封建所有制以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铁的冶炼和加工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机的推广，农业、种菜业、酿酒业和榨油业的继续发展，除手工业作坊以外工场手工业企业的出现，——这就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特征。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对劳动感兴趣。于是，封建主就抛弃奴隶，抛弃这种对劳动不感并趣、完全没有主动性的工作者，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

私有制在这里得进一步的发展。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同时这里已经没有了私自占有生产工作者的情形，这时的生产工作者，即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既不能屠杀，也不能出卖的，因为雇佣工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但是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为了不致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套上剥削的枷锁。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外，还存在着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这种私有制在初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手工业企业被用机器装备起来大工厂所代替。用农民简陋的生产工具耕作的贵族庄园，被根据农艺学经营的、使用农业机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代替。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工作者比闭塞无知的农奴更有文化、更加伶俐，能够懂得机器和正确地使用机器。因此，资本家宁愿利用摆脱农奴制羁绊、有相当文化程度来正确使用机器的雇佣工人。

可是，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以后，使陷入它解决不了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并且减低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中小私有者破产，把他们变成无产者，缩小他们的购买力，因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这样就使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因而破坏本身的基础，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要求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不相容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在危机时期，资本家由于自己使居民群众遭受破产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不得不烧掉产品，销毁制成的商品，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千百万居民则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生产太多。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

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孕育着革命，这个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这就是说，剥削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特征，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

因此，生产力在这里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

这就是人类史上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情景。

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发展的情况，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说：“劳动资料[①]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

①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指生产工具。——编者注

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资本论》1935年俄文版第1卷第121页）[①]

其次：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 页）[②]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才是停滞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页）[③]

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道：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为《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④]

(4) 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109页。——译者注

④ 同上，见232页。——译者注

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其所以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辈新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工作的结果，因此新的一辈在最初必须接受他们在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现成东西，必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质资料。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改进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因素时，不会意识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进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谋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原始公社社会的某些成员在逐渐地摸索着石器过渡到铁器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他们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意识到，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是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会引起奴隶占有制度，——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开始建大工场手工业企业，同行会小作坊并存，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机器化大工业，

丝毫也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重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度地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日常的狭隘实践的利益。

因此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编者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①]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②]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不经过冲突、不经过震荡的。相反地，这种过渡通常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办法实现的。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它们的使命就是用暴力消灭旧生产关系，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

① 着重号是编者加的。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译者注

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话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1938 年俄文版第 52 页)①

其次：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 50 页)②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1935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603 页)③

以下就是马克思在 1859 年为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有历史意义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作的天才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3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272 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56 页。——译者注

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社会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由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270页)①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情形。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
第11版第574—602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5卷第152—181页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译者注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

（一九三八年九月）

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可以作出什么样的基本总结呢？联共(布)的历史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

(一)首先，党的历史教导说，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的历史教导说，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这样一个党，就是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而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就是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决不是通常那种西欧类型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在国内和平条件下熏陶出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牵着走、幻想“和平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党。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只能是新型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能够训练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党。

这样的党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斯大林同志说：“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规范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准备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地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62—63页）①

———————————————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2—74页。——译者注

(二)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本阶级的领导者，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但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才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相反，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对自己的行动失去信心，没有能力引导工人所级前进。

有人也许以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只要做到用心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和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就算不错了。他们是指望把熟读的结论和原理用于各种环境，用于实际生活的一切场合。但这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条问答、看成是信条，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咬文嚼字的人和书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显然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决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抱住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个字句不放。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领会这个理论的**实质**，学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善于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这个理论**，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它的某些已经陈旧的原理和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 年 2 月)以前,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社会最适宜的政治组织形式。固然，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但可惜马克思的这一指示没有在著作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于是就被人遗忘了。此外，恩格斯在 1891 年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所作的权威性声明，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①]，也无容置疑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这个原理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奉行的准则。但是，俄国 1905 年的革命，特别是 1917 年 2 月的革命，提出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即一个社会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俄国两次革命经验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这一点，列宁在 1917 年 4 月，即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提出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的口号。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议会制共和国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破坏了民主。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的一个原理变成了教条。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4 页。——译者注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不敢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旧原理。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苏维埃就会瓦解，我们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说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奉行的准则。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研究,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变成木乃伊。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如果他在理论上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马克思主义的旧结论，而代之以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结论，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开始衰退，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机会主义并不总是意味着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在企图抱住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已经过

时的原理不放，把它们变成教条，以便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从而也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的先进干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他们没有学会把这个理论看作行动的指南，如果他们没有学会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那末布尔什维克党就不会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恩格斯在批评那些担负着美国工人运动领导工作的侨居美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时写道：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埋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06页）①

列宁批评加米涅夫和某些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即在革命运动已经向前发展而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仍抱住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放时写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译者注

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00—101页)①

(三)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不战胜这些党派、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就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打垮这些起初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到十月革命后又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党派，那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建成社会主义。

一切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后来又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一帮特务、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凶手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依靠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50页)②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26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2页。——译者注

(四)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

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是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的历史。

党的历史教导说，所有这些投降主义集团实质上都是孟什维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的仆从，是孟什维主义的继续。它们也同孟什维主义一样，起着在工人阶级中和党内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作用。因此，消灭党内这些集团的斗争，就是消灭孟什维主义的斗争的继续。

如果不打败“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我们就不能把党建立起来并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不打败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我们就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如果不打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我们就不能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就不能保住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旗帜，就不能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起来。

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用了过多的时间去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过高估计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作用。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有机会主义，正如不能容忍健全的机体上有脓疮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是它的先头堡垒，是它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信念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在工人所有的领导司令部内，在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内，把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反对列宁反对党，遭到了与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同样的结局，即变成了法西斯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特务、暗害分子、凶手、破坏分子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 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存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62—463 页)①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72页)②

(五)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5—346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4页。——译者注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掩饰老大难的问题，用虚假的表面上的一切满意来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妄自尊大，躺倒在功劳簿上，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耐心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00页）[①]

又说：

"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列宁选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60—261页）[②]

（六）最后，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如果党善于像列宁所说那样"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4页）[③]，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2页。——译者注

如果党在自己的党的狭小圈子里闭关自守，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同志说：“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存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立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靠近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

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的基本教训。

载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第388—399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5卷第434—444页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①]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一
苏联的国际形势

同志们！自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五年了。你们看，这个时期是不短的。在这个时期内，世界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各个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在这个时期内国际环境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呢？我国国内外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个时期无论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是发生极严重震荡的时期。在经济方面，这些年是萧条的年份，而后来从1937年下半年起，则是新的经济危机的年份，是美国、英国、法国工业重新衰落的年份，因而也是产生新的经济困难的年份。在政治方面，这些年是发生严重的政治冲突和震荡的年份。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次战争是在从上海到直布罗陀的广大地区内进行的，它席卷了5亿多人口。欧洲、非洲、亚洲的地图正在被

——————————————

① 这次代表大会于1339年3月10—21日在莫斯科举行，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第三个五年计划、修改党章、选举修改党纲的委员会和选举党中央机关。——编者注

用强力改画着。战后的所谓和平制度的整个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

相反，对苏联来说，这些年却是它壮大和繁荣的年份，是它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高涨的年份，是它的政治和军事威力进一步增长的年份，是它为维护全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年份。

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国际环境中的变化的具体材料。

1. 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经济危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

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一直延续到1933年底。此后，危机转为萧条，继而工业开始有些复苏，有些上升。可是，工业的这种复苏没有象通常复苏时期那样转为繁荣。相反，从1937年下半年起又开始了新的经济危机，首先卷入的是美国，随后是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这样，资本主义各国还没有来得及从不久以前的经济危机打击之下复原，就又面临了新的经济危机。

这种情况自然使失业现象更为严重起来。资本主义各国的失业人数，本来已经从1933年的3000万人减少到1937年的1400万人，现在由于新的危机又增加到1800万人。

新危机的特点在于，它同上次危机大不相同，不是比上次更好，而是比上次更坏。

首先，新危机并不象1929年发生的危机那样开始于工业繁荣之后，而是开始于萧条和少许复苏之后，但是这种少许复苏没有转为繁荣。这就表明，目前的危机将比上次危机更为沉重，更难于克服。

其次，目前的危机并不是在和平时期爆发的，而是在第二次帝国

主义大战已经打了起来的时期爆发的。这时，日本同中国作战已经进入第二年，它破坏着极为广大的中国市场，使其他各国商品几乎无法染指；这时，意大利和德国已经把自己的国民经济转上了战时经济的轨道，并为此消耗了自己的原料储备和外汇储备；这时，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强国都开始按战时方式进行改造。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所拥有的按通常方式摆脱目前危机的资源，将比上次危机时期少得多。

最后，和上次危机不同，目前的危机不是普遍的危机，它暂时主要只是席卷了还没有转上战时经济轨道的几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至于象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已经按战时方式改造了本国经济的侵略国，由于它们加紧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还没有陷于生产过剩的危机，不过它们正在接近这种危机。这就是说，当经济实力雄厚的非侵略国开始摆脱危机阶段的时候，各侵略国就一定会由于在战争狂热中耗尽了自己的黄金储备和原料储备，而进入最剧烈的危机阶段。

只要列举资本主义各国现存的有形黄金储备的统计数字，就可以清楚地着出这一点。

资本主义各国的有形黄金储备

（单位：百万旧美元）

	1936 年底	1938 年 9 月
总　共	12980	14301
美　国	6649	8126
英　国	2029	2396
法　国	1769	1435
荷　兰	289	595
比利时	373	318
瑞　士	387	407
德　国	16	17
意大利	123	124
日　本	273	97

从上表可以看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黄金储备加在一起，还没有瑞士一国的储备多。

下列一些数字足以说明最近五年来资本主义各国工业危机的情况和苏联工业高涨的情况。

以 1929 年为标准的工业总产值百分比

（1929 年==100）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美　国	66.4	75.6	88.1	92.2	72.0
英　国	98.8	105.8	115.9	123.7	112.0
法　国	71.0	67.4	79.3	82.8	70.0
意大利	80.0	93.8	87.5	99.6	96.0
德　国	79.8	94.0	106.3	117.2	125.0
日　本	128.7	141.8	151.1	170.8	165.0
苏　联	238.3	293.4	382.3	424.0	477.0

从上表可以看出，苏联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危机的国家，它的工业一直在上升。

其次，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并且正在发展。

再其次，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比德国更早地把自己的国民经济转上战时经济轨道的意大利和日本，工业下降时期在 1938 年已经开始了。

最后，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比意大利和日本较迟地按战时方式改造本国经济的德国，工业暂时还处在稍许向上发展的状态，固然发展得不多，但总算是向上发展，——这同日本和意大利不久以前的情况很相似。

毫无疑问，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德国工业一定也会走上日本和意大利已经走上的那条下坡路。因为，把国家经济转上战时经济轨道

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使工业朝着片面的军事方向发展，极力扩大同居民需要无关的战争必需品的生产，极力缩减居民消费品的生产，特别是缩减其市场投放量，因而就是缩减居民的消费，便国家陷入经济危机。

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新的经济危机发展的具体情况。

显然，这种不顺利的经济情况不能不造成列强之间关系的尖锐化。上次危机已经搞乱了全局，使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尖锐化了。日本占领东北和华北，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这一切都反映出列强之间斗争的尖锐程度。新的经济危机一定会使，而且确实正在使帝国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市场竞争，不是商业战争，不是倾销政策了。这些斗争手段早已被认为不够用了。现在的问题是要用军事行动来重新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和分割殖民地。

日本开始为它的侵略行为辩护，说什么在缔结九国公约时，它少分了东西，没有让它靠损害中国来扩大自己的领土，而英国和法国却占有庞大的殖民地。意大利回想起，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后的分赃中，它少分了东西，它应当靠缩小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得到补偿。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凡尔赛和约而受到严重损失的德国附和了日本和意大利，要求扩大自己在欧洲的领土，索还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被战胜国夺去的殖民地。

这样就开始形成了三个侵略国的同盟。

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2. 国际政治形势的尖锐化，战后和约体系的崩溃，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开始

现在我列举一下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一些激起了新的帝国主

义大战的最重要事件。1935 年，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并且占领了它。1936 年夏，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进行了武装干涉，而且德国占领了西班牙北部和西属摩洛哥，意大利则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巴利阿里群岛。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又于 1937 年侵入华北和华中，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并开始把外国竞争者从占领区排挤出去。1938 年初，德国侵占了奥地利，而在 1938 年秋，又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8 年底，日本侵占了广州，而在 1939 年初又侵占了海南岛。

这样，悄悄地降临到各国人民头上的战争就席卷了 5 亿多人口，战事蔓延在广阔的土地上，从天津、上海和广州，经过阿比西尼亚，一直到直布罗陀。

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战胜国，主要是英国、法国和美国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制度，即战后和平制度。这个制度的主要基础在远东是九国公约，在欧洲是凡尔赛条约以及一系列其他条约。国际联盟的使命是，在这个制度范围内，以各国统一战线为基础，以集体保护各国安全为基础来调整各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三个侵略国以及它们所发动的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彻底推翻了这个战后的和平制度的体系。日本撕毁了九国公约，德国和意大利撕毁了凡尔赛条约。为了便于自由行动，这三个国家都退出了国际联盟。

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我们的时代，要想不顾各种条约，不顾社会舆论，一下子就挣脱锁链而直接奔向战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这一点相当清楚。法西斯头子也了解这一点。所以，法西斯头子在奔向战争以前，决定用某种手法来炮制舆论，就是说要迷惑舆论，欺骗舆论。是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英国和法国在欧洲的利益吗？得了吧，这算什么同盟！“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同盟。“我们”只不过有一个毫无害处的“柏林—罗马轴心”即某种关于轴的几何学公式而已。

是德、意、日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美，英、法在远东的利益吗？没有的事！我们没有任何军事同盟。“我们”只不过有一个毫无害处的“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即对几何学的一点小小的爱好罢了。

是反对英国、法国、美国利益的战争么？胡扯！“我们”进行的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战争，而不是反对这些国家的战争。如果不信，就请读一读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缔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侵略者老爷们就是想这样来炮制舆论的，虽然显而易见这是一套无法掩饰真相的笨拙把戏，因为要想在蒙古的沙漠上，在阿比西尼亚的群山间，在西属摩洛哥的丛林里寻找共产国际的“策源地”，是可笑的。

但是，战争是铁的事实，任何东西都掩盖不了。因为用任何“轴心”、“三角”和“反共产国际协定”都掩盖不了如下的事实：就是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广大领土，意大利侵占了阿比西尼亚，德国侵占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占领了西班牙，——这一切都是违反非侵略国的利益的。战争始终是战争，侵略者的军事同盟始终是军事同盟，而侵略者始终是侵略者。

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特点在于，它还没有成为普遍的世界大战。侵略国进行着战争，百般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首先是英国、法国、美国的利益，而英国、法国、美国却一再后退，接连向侵略者让步。于是，我们看到，侵略国正在靠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公开地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而非侵略国不但没有一点反抗的企图，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纵容。

这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

应当怎样解释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这种片面的奇怪的性质呢？

拥有巨大能力的非侵略国怎么会这样轻易地、不加抵抗地放弃自己的阵地和义务而去讨好侵略者呢？

是不是由于非侵略国力量薄弱呢？当然不是！非侵略的民主国家

加在一起，无论在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无疑都比法西斯国家强大。

既然如此，究竟为什么这些国家一再地向侵略者让步呢？

比如说，这种情况也许可以用害怕革命的心理来解释，因为非侵略国一旦加入战争，战争又会成为世界性的，那时就有可能爆发革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当然知道，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革命在最大的国家之一取得了胜利。他们害怕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也会使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取得胜利。

但是现在，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大多数非侵略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转上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

从表面上也许可以这样来说明不干涉政策：“让每个国家按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去防御侵略者吧，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既要同侵略者做生意，也要同他们的牺牲者做生意。”但是事实上，不干涉政策就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大战。在不干涉政策中贯串着一种倾向，一种愿望，这就是不妨碍侵略者去干它们的黑暗勾当，比如不妨碍日本纠缠于对华战争，更好是对苏战争，比如不妨碍德国陷入欧洲事务和纠缠于对苏战争，让所有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的漩涡中去，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它们疲惫不堪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出台活动，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出台活动，并迫使那些筋疲力尽的交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

真是价廉物美啊！

就拿日本为例。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开始侵入华北以前，法国和英国的一切有权威的报纸都大声叫嚷说，中国力量薄弱，无力抵抗，日本及其军队在两三个月内就能征服中国。然后，欧美的政治家就开

始等待和观望。后来，当日本展开军事行动时，他们就向日本让出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心脏上海，让出了华南的英国垄断势力的基地广州，让出了海南岛，让日本包围香港。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很像在鼓励侵略者说；你继续往战争里陷吧，将来我们再看着办。

或者，拿德国为例。他们不顾维护奥地利独立的义务，而把奥地利让给了德国；他们违背所有一切义务而让出了苏台德区，使捷克斯洛伐克处于听天由命的地步，然后就在报刊上大肆造谣说，“俄国军队软弱无力”，“俄国空军瓦解了”，苏联内部发生了“骚动”，从而推动德国人继续东进，约许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战利品，并且说：你们只要同布尔什维克开战，以后的一切都会很顺当的。必须承认，这也很像是在推动侵略者，鼓励侵略者。

英法和北美的报刊就苏维埃乌克兰问题发出的叫嚣很值得注意。这些报界人士声嘶力竭地叫喊道：德国人正在向苏维埃乌克兰进军，德国人现在已经控制了约有 70 万人口的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德国人至迟在本年春季就会把拥有 3000 多万人口的苏维埃乌克兰并入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看起来，这种可疑的叫嚣的目的，是要激起苏联对德国的愤怒，毒化气氛，挑拨我们同德国发生无缘无故的冲突。

当然在德国完全可能有一些疯子梦想把苏维埃乌克兰这头大象合并到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这只小甲虫那里去。如果在德国确实有这样的狂妄分子，那么可以肯定地讲，在我国就一定能够为这些疯子找到必要数量的拘束衣。但是，如果撇开疯子而转向正常的人，那么一本正经地谈论把苏维埃乌克兰合并到所谓喀尔巴阡乌克兰去，岂不显然是可笑和愚蠢的么？只要设想一下，一只小甲虫跑到一头大象跟前，两只手往腰里一插，对它说道：“唉，你呀，你呀，我的小兄弟，我是多么可怜你呀……你生活在这里，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法西斯头子,——这算什么生活呀…… 我看到你时不能不对你说，除非合并到我这里来，否则你是没有救的……好吧，就这

样办吧，我允许你把你那块小小的领土合并到我这块广阔无垠的领土上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有些政治家和报界人士对“进军苏维埃乌克兰”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开始亲自揭露不干涉政策的真实内幕。他们公开地讲，并且白纸黑字地写道，德国人太使他们“失望了”，因为看吧，德国人非但没有继续东进去反对苏联，却转过头来向西方索取殖民地。可以设想，他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各区奉送给德国人，作为德国人负责对苏开战的价钱，而现在德国人拒绝兑现，并且叫他们滚远一些。

我绝不想从道德上来讲不干涉政策，讲变节、背叛等等。向不承认人类道德的人讲道德，是幼稚的。正如那些老奸巨滑的资产阶级外交家所说的，政治终究是政治。但是必须指出，主张不干涉政策的人们所开始的巨大而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会使他们遭到严重的失败。

这就是现时盛行的不干涉政策的真面目。

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形势。

3. 苏联和各资本主义国家

战争在各国关系中造成了新的局面。它给这些关系带来了惊慌和怀疑的气氛。战争破坏了战后和平制度的基础，推翻了国际法的起码概念，从而使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的价值发生问题。和平主义和裁军方案已经被埋葬了。代替它们的是武装的狂热。所有的大小国家，其中首先包括实行不干涉政策的国家，都开始武装起来了。所谓慕尼黑会议对侵略者所作的让步和慕尼黑协定似乎开辟了“绥靖”新纪元的甜言蜜语，现在谁也不再相信了。连参加慕尼黑协定的英国和法国本身也不相信这些甜言蜜语了，它们加强自己的武装并不亚于其他国家。

显然，苏联不能无视这些严重的事变。侵略者发动的任何一个战争，甚至是在世界上某个遥远的角落的一个很小的战争，无疑都是对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一种危险。至于已经席卷了亚洲、非洲、欧洲5亿多人口的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则是更严重的危险。因此，我国一方面始终不渝地执行维护和平的政策，同时又极力加强了我们的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准备。

同时，苏联为了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还决定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1934年底，我国加入了同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虽然软弱，但它总还可以作为揭露侵略者的场所，作为一种虽然软弱但可以阻碍发动战争的和平工具。苏联认为，在这样不安的时刻，甚至象国际联盟这样一个软弱的国际组织，也不应加以忽略。1935年5月，法国和苏联缔结了互助条约来对付侵略者可能的进攻。与此同时，又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类似的条约。1936年3月，苏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缔结了互助条约。1937年8月，苏联同中华民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在这些困难的国际条件下执行了自己的对外政策，坚持维护和平的事业。

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很明确的：

1.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

2.我们主张同所有与苏联交界的邻国都保持和平和亲近的睦邻关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苏维埃国家边界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

3.我们支援遭受侵略和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4.我们不怕侵略者的威胁，我们准备用双倍的打击去回答企图破

坏苏联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战争挑拨者的打击。

这就是苏联的对外政策。

苏联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所依靠的是：

1.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

2.我们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

3.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

4.自己的红军和红海军；

5.自己的和平政策；

6.迫切需要维护和平的各国劳动者在道义上的支援；

7.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破坏和平的那些国家的明智态度。

* * *

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1.今后还要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的政策；

2.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

3.大力加强我们的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量；

4.加强同那些关心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的各国劳动者的国际友谊联系。

二

苏联的国内形势

现在来谈谈我国的国内形势。

从苏联的国内形势来看，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呈现出一幅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高涨、文化进一步发展、国家政治力量进一步巩固的图景。

应当认为，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最重要成果是在现代新技术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农业的改造。我国已经不再有，

或者几乎不再有使用落后技术装备的旧工厂和使用古老农具的旧农户了。目前，我们工农业的基础是现代的新技术装备。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从生产的技术装备来看，从工农业的新技术装备程度来看，我国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先进的国家，因为在其他国家里，旧设备成了生产的累赘，阻碍着新技术装备的采用。

应当认为，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国社会政治发展方面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残余，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成一条共同的劳动战线，加强了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加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充分民主化，就是新宪法的制定。谁也不敢否认，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结果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由于进行了这一切工作，我国国内形势十分稳定，国家政权异常巩固，使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感到羡慕。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我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具体材料。

1. 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高涨

（一）**工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工业的进展呈现出一幅不断高涨的图景。这种高涨不仅反映出一般产值的增长，而且首先反映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工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是私营工业的灭亡。

请看下列统计表：

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增长了一倍以上，而且全部都是社会主义工业产值的增长。

其次，从下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体系是苏联工业的唯一体系。

最后，从下表可以看出，私营工业的最终灭亡，现在是连瞎子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了。

1934—1938年间苏联工业的增长情况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与上年相较的百分比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单位：百万卢布（按1926—1927年度价格计算）											
总产值	42030	50477	62137	80929	90166	100375	120.1	123.1	130.2	111.4	111.3	238.8
其中：												
1.社会主义工业	42002	50443	62114	80898	90138	100349	120.1	123.1	130.2	111.4	111.3	238.9
2.私营工业	28	34	23	31	28	26	121.4	67.6	134.8	90.3	92.9	92.9
	百分比											
总产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其中：												
1.社会主义工业	99.93	99.93	99.96	99.96	99.97	99.97						
2.私营工业	0.07	0.07	0.04	0.04	0.03	0.03						

不能认为私营工业的灭亡是偶然的。它所以灭亡，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制度。它所以灭亡，其次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我们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就以现代新技术装备为基础重新装备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会而且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从生产的技术装备来看，从工业生产采用新技术装备的规模来看，我国的工业在世界上居于首位，这是事实。

如果按照同战前水平相比的百分数，把我国工业的增长速度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相比较，那么就会看到如下的情况：

1913—1938 年苏联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情况

	1913 年	1933 年	1934 年	1935 年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苏　联	100.0	380.5	457.0	562.6	732.7	816.4	908.8
美　国	100.0	108.7	112.9	128.6	149.8	156.9	120.0
英　国	100.0	87.0	97.1	104.0	114.2	121.9	113.3
德　国	100.0	75.4	90.4	105.9	118.1	129.3	131.6
法　国	100.0	107.0	99.0	94.0	98.0	101.0	93.2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业同战前水平相比，增长了 8 倍多，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却仍然围绕战前水平踏步不前，只超过这一水平 20—30%。

这就是说，在增长速度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世界上居于首位。

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在生产的技术装备和增长速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我们究竟在哪一方面落后呢？我们在经济方面，即在我国工业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水平方面仍然是落后的。我们在 1938 年生产了约 1500 万吨生铁，而英国生产了 700 万吨。看来我们的情况似乎比英国好些。但是，如果把这些生铁的吨数按人口数目来分摊一下，结果就是，英国在 1933 年每人可以分得 145 公斤生铁，而苏联每人只能分得 87 公斤。又如，英国在 1938 年生产了 1080 万吨钢和约 290 亿度电（电力生产），而苏联生产了 1800 万吨钢和 390 多亿度电。看来我们的情况似乎比英国好些。但是，如果把所有这些吨数和度数按人口数目来分摊一下，结果就是：英国在 1938 年每人可以分得 226 公斤钢和 620 度电，而苏联每人只能分得 107 公斤钢和 233 度电。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国的人口比英国多几倍，因而需要量也比英国多：苏联有17000万人口，而英国还不到4600万。一国工业的经济实力并不表现在不计人口多少的工业总产量上，而是表现在直接按人口平均消费量计算的工业产量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量越多，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越雄厚，相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越少，这个国家及其工业的经济实力就越薄弱。可见，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国家对消费品的需要量也越多，因而这个国家的工业产量也应当越多。

就拿生铁的产量为例。英国在1938年的生铁产量是700万吨，要在经济上超过英国的生铁产量，我们就必须把每年的生铁产量提高到2500万吨。德国在1938年总共生产了1800万吨生铁，要在经济上超过德国，我们就必须把每年的生铁产量提高到4000—4500万吨。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这里指的不是1938年这个危机年度的水平，这一年美国只生产了1880万吨生铁，而是指1929年美国工业高涨时期的水平，这一年美国生产了约4300万吨生铁），我们就必须把每年的生铁产量提高到5000—6000万吨。

关于钢和钢材的生产，关于机器制造业等等，也必须这样说，因为，所有这些工业部门也和其他部门一样，归根到底都决定于生铁的生产。

我们在工业的生产技术装备和发展速度方面已经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很好。但是这还不够，应当在经济上也超过它们。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做到这一点，只有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才可以期望我国将有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我们才可能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

要想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有些什么呢？为此首先要有强烈的不可遏止的进取心，要有不借牺牲的决心，要有用大

量的基本建设投资来全力扩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决心。我们有这些条件吗？当然有！其次，为此还需要有高度的工业生产技术和高度的工业发展速度。我们有这些条件吗？当然有！最后，为此还需要时间。是的，同志们，需要时间。要建设新的工厂。要培养新的工业干部。但是，为此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的时间。在两三年内是不可能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为此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是拿生铁及其产量为例吧。在生铁的产量方面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呢？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某些工作人员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建议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终结时的生铁产量规定为6000万吨。这就是说，他们认为生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额可以达到1000万吨。这当然是一种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坏。而且，这些同志不仅仅在生铁产量方面沉溺于幻想。例如，他们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苏联人口每年的增长额应当是300—400万，甚至更多。这也是一种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坏。可是，如果撇开幻想家而从现实出发，那就可以根据生铁生产技术的现状，把生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额规定为200—250万吨，这是完全可能达到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史以及我国的工业史都表明，这样的年增长额是紧张的，然而是完全能够达到的。

所以，要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的时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技术越完善，我们也就能越快地实现这一极重要的经济任务，也就能使完成这一任务的期限更为缩短。

（二）**农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农业和工业一样沿着高涨的路线发展。这种高涨不仅表现在农产品的增长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增长和巩固，另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灭亡上。集体农庄的谷物播种面积从1933年的7500万公顷增长到1938年的9200万公顷；而个体农户的谷物播种面积在这个期间则从1570万公

顷缩减到60万公顷，即缩减到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0.6%。至于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我就不去谈了，在这方面，个体经济的作用已经缩小到零。此外，大家知道，现在已经加入集体农庄的有1880万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3.5%，而从事渔业和其他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没有计算在内。

这就是说，集体农业已经最终地巩固和确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现在是我国农业的唯一形式。

如果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有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动同革命前播种面积的规模比较一下，就会看到如下的情况：

苏联所有作物的播种面积

	单位：百万公顷						1938年对1913年的百分比
	191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全部播种面积……	105.0	131.5	132.8	133.8	135.3	136.9	130.4
其中：							
（1）谷物……	94.4	104.7	103.4	102.4	104.4	102.4	108.5
（2）经济作物…	4.5	10.7	10.6	10.8	11.2	11.0	244.4
（3）瓜菜……	3.8	8.8	9.9	9.8	9.0	9.4	247.4
（4）饲料……	2.1	7.1	8.6	10.6	10.6	14.1	671.4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们所有作物的播种面积都增加了，首先是饲料、经济作物和瓜菜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了。

这就是说，我国农业日益成为技术程度和产品率更高的农业，而正确的轮作制的采用就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至于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器的装备究竟增长了多少，这可以从下面几个统计表中得到答复：

（1）苏联农业中的拖拉机总数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一）拖拉机的数量（单位：千台）							
全部拖拉机……	210.9	276.4	360.3	422.7	454.5	483.5	229.3
其中							
（一）机器拖拉机站中的拖拉机…	123.2	177.3	254.7	328.5	365.8	394.0	319.8
（二）国营农场和辅助农业企业中的拖拉机……	83.2	95.5	102.1	88.5	84.5	85.0	102.2
（二）曳引力（单位：千马力）							
全部拖拉机……	3209.2	4462.8	6184.0	7672.4	8385.0	9256.2	288.4
其中							
（一）机器拖拉机站中的拖拉机…	1758.1	2753.9	4281.6	5856.0	6679.2	7437.0	423.0
（二）国营农场和辅助农业企业中的拖拉机……	1401.7	1669.5	1861.4	1730.7	1647.5	1751.8	125.0

（2）苏联农业中的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器的总数
（单位：千部。按年底数字计算）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联合收割机……	25.4	32.3	50.3	87.8	128.8	153.5	604.3
内燃机和锅驼机……	48.0	60.9	69.1	72.4	77.9	83.8	174.6
复式和半复式脱粒机…	120.3	121.9	120.1	123.7	126.1	130.8	108.7
载重汽车……	26.6	40.3	63.7	96.2	144.5	195.8	736.1
轻便汽车（单位：辆）…	3991	5533	7555	7630	8156	9594	240.4

除了这些数字外，如果再注意到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国机器

拖拉机站的数目从1934年的2900个增加到1938年的6350个的事实，那么根据所有这些统计数字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国农业在现代新技术装备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因此，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相比，我国的农业不仅是规模最大和机械化程度最高、因而商品率也最高的农业，而且是现代技术装备最充足的农业。

如果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谷物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增长情况同革命前的情况比较一下，那就会看到如下的情况：

苏联谷物和经济作物的总产量

	单位：百万公担						1938年对1913年的百分比
	191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谷物……	801.0	894.0	901.0	827.3	1202.9	949.9	118.6
棉花（籽棉）……	7.4	11.8	17.2	23.9	25.8	26.9	363.5
亚麻（纤维）……	3.3	5.3	5.5	5.8	5.7	5.46	165.5
甜菜……	109.0	113.6	162.1	168.3	218.6	166.8	153.0
油料作物……	21.5	36.9	42.7	42.3	51.1	46.6	216.7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1936年和1938年在东部和东南部各区发生了旱灾，尽管1913年是空前的丰收年，但是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的谷物和经济作物的总产量与1913年的水平相比，却一直不断在增长。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谷物生产的商品率问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据著名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同志计算，在战前，从50亿普特的谷物总产量中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粮只有13亿普特左右，就是说当时谷物生产的商品率为26%。涅姆钦诺夫同志又算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种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率，例如在1926—1927年，约占总产量的47%,而个体农民经济的商品率只有12%左右。如果更谨慎地

对待这个问题，把 1938 年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商品率算作总产量的 40%，结果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谷物业在这一年中能够提供而且确实提供了将近 23 亿普特的商品谷物，即比战前的谷物生产多提供了 10 亿普特的商品谷物。

可见，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生产的高度商品率，是它们的最重要的特点，这对国家的供应具有莫大的意义。

我国所以能够这样容易而迅速地解决了谷物问题，解决了以足够的商品谷物供应这个庞大的国家的问题，其秘密就在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具有这样的特点。

应当指出，最近三年来，我们每年收购的谷物都不下 16 亿普特，有时候，例如在 1937 年，还增加到 18 亿普特。如果再加上每年采购的约 2 亿普特谷物以及通过集体农庄贸易得到的几亿普特谷物，那我们就可以得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提供的上述商品粮的总数。

其次，值得指出的是，最近三年来，商品谷物的基地已经从过去被认为是我国谷仓的乌克兰移到了我国北部和东部，即移到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家知道，最近两三年来，乌克兰收购的谷物每年只有 4 亿普特左右，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这几年中每年收购的商品谷物则有 11—12 亿普特。

这就是谷物生产方面的情况。

至于畜牧业，那么在这个最落后的农业部门中，近几年来也有重大的进展。固然，在马匹总数和养羊业方面，我们还落后于革命前的水平，但是在牛和养猪业方面，我们却已经超过了革命前的水平。

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材料：

苏联的牲畜总数（单位：百万头）

	按每年7月的数字计算							1938年对1916年（据调查）的百分比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1916年（据调查数字）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马……	35.8	16.6	15.7	15.9	16.6	16.7	17.5	48.9	105.4
牛……	60.6	38.4	42.4	49.2	56.7	57.0	63.2	104.3	164.6
绵羊和山羊	121.2	50.2	51.9	61.1	73.7	81.3	102.5	84.6	204.2
猪……	20.9	12.1	17.4	22.5	30.5	22.8	30.6	146.4	252.9

毫无疑问，养马业和养羊业方面的落后状况在最短期间就会消除。

（三）**商品流转和运输**。随着工农业的高涨，我国的商品流转额也增长了。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网扩大了25%。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额增长了178%，集体农庄集市贸易额增长了112%。

下列就是有关的统计表：

商 品 流 转 额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8年对1933年的百分比
1.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网（商店和货摊）——按年底数字计算……	285355	286236	268713	289473	327361	356910	125.1
2.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额（包括公共饮食业）——单位：百万卢布……	49789.2	61814.7	81712.1	106760.9	125943.2	138574.3	278.3
3. 集体农庄集市贸易额——单位：百万卢布……	11500.0	14000.0	14500.0	15607.2	17799.7	24399.2	212.2
4. 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各州设立的商品批发站——按年底数字计算……	718	836	1141	1798	1912	1994	277.7

显然，如果运输业的转运额没有一定的增长，国家的商品流转就不会得到这样的发展。的确，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有各类运输的转运额，特别是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转运额都增长了。水路运输的转运额也增长了，但是很不稳定，而 1938 年的水路运输的转运额可惜竟比上一年还有所降低。

下列就是有关的统计表：

货　运　额

	1933 年	1934 年	1935 年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1938 年对 1933 年的百分比
铁路（单位：10 亿吨公里）……	169.5	205.7	258.1	323.4	354.8	369.1	217.7
河运和海运（单位：10 亿吨公里）……	50.2	56.5	68.3	72.3	70.1	66.0	131.5
民用航空运输（单位：百万吨公里）……	3.1	6.4	9.8	21.9	24.9	31.7	1022.6

毫无疑间，1938 年水路运输方面的某些落后状况，将在 1939 年消除。

2. 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进一步提高

工农业的继续不断高涨不能不引起，而且也确实引起了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进一步提高。

剥削现象的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巩固，失业以及与之有关的城乡贫困的消失，工业的大规模扩展和工人人数的不断增长，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土地的永远固定给集体农庄使用，对集体农庄供应大量头等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所有这一切都为进一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状况创造了实际条件。而工

人和农民物质状况的改善，自然又使构成我国重大力量并为工人和农民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的物质状况得到了改善。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为那些离开农村而在饥饿的恐怖之下过活的、无工可做和无家可归的农民想点办法，把他们安插到工业部门和发点慈悲为他们找点工作了。这样的农民在我国早已没有了。这当然很好，因为这证明我们的农村是富裕的。现在的问题只能是请集体农庄答应我们的要求，每年为我们日益增长的工业输送哪怕是150万左右的青年集体农庄庄员。已经富裕起来的集体农庄应当注意到，如果没有它们的这种支援，我国的工业就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如果工业得不到扩展，我们就不能满足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集体农庄完全能够满足我们这个要求，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大量技术装备能够解放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一投入到工业中去，就能够给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

总起来说，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我们在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状况方面有如下一些标志；

1. 国民收入从1933年的485亿卢布增加到1938年的1050亿卢布；

2. 工人和职员人数从1933年的2200多万人增加到1938年的2800万人；

3. 工人和职员的全年工资总额已经从3495300万卢布增加到9642500万卢布；

4. 工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从1933年的1513卢布提高到1938年的3447卢布；

5. 集体农庄的货币收入从1933年的566190万卢布增长到1937年的1418010万卢布；

6. 谷物区内发给集体农庄每个农户的谷物平均数，从1933年的61普特提高到1937年的144普特,而且种子、种子储备、公共牲畜的

饲料储备、交售的谷物、付给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等都没有计算在内；

7. 国家对社会文化设施的预算拨款，从 1933 年的 583990 万卢布增长到 1938 年的 3520250 万卢布。

至于人民的文化状况，它也随着人民的物质状况的提高而提高了。从人民文化发展方面来看，报告所涉及的时期真正是文化革命的时期。用苏联各民族语言进行的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实现，各级学校和学生数目的增如，高等学校毕业的专家数目的增加，新的苏维埃知识界的形成和巩固，——这就是人民文化高涨的一般情况。

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数字：

（1）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标　　志	计算单位	1933—1934 年　度	1938—1939 年　度	1938—1939 年度对 1933—1934 年度的　百　分　比
各级学校的学生总数……	千人	23814	33965.4	142.6
其中：				
初等教育……	千人	17873.5	21288.4	119.1
中等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	千人	5482.2	12076.0	220.3
高等教育……	千人	458.3	601.0	131.1
在苏联参加学习的人数（包括各种学习方式）…	千人	—	47442.1	—
群众图书馆数目……	千所	40.3	70.0	173.7
群众图书馆的藏书量……	百万册	86.0	126.6	147.2
俱乐部数目……	千所	61.1	95.6	156.5
剧院数目……	座	587	790	134.6
电影放映站数目（窄片放映站除外）……	个	27467	30461	110.9
其中有声电影放映站……	个	498	15202	增加 30 倍
农村中的电影放映站数目（窄片放映站除外）……	个	17470	18991	108.7
其中有声电影放映站……	个	24	6670	增加 277 倍
报纸的年发行量……	百万份	4984.6	7092.4	142.3

（2）1933—1938年间苏联新建学校数

年份	学校数		
	在城市和市镇	在农村	总计
1933……	326	3261	3587
1934……	577	3488	4065
1935……	533	2829	3362
1936……	1505	4206	5711
1937……	730	1323	2053
1938……	583	1246	1829
1933—1938年的总数	4254	16353	20007

(3)1933—1938年间从高等学校毕业青年专家人数

（单位：千人）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全苏联总数（不包括军事专家）	34.6	49.2	83.7	97.6	104.8	106.7
1. 工业和建筑工程师……	6.1	14.9	29.6	29.2	27.6	25.2
2. 运输和邮电工程师……	1.8	4.0	7.6	6.6	7.0	6.1
3. 农业机械化工程师、农艺师、兽医和畜牧学家……	4.8	6.3	8.8	10.4	11.3	10.6
4. 经济学家和法学家……	2.5	2.5	5.0	6.4	5.0	5.7
5. 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员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其中包括艺术工作者……	10.5	7.9	12.5	21.6	31.7	35.7
6. 医生、药剂师和体育工作者……	4.6	2.5	7.5	9.2	12.3	13.6
7. 其他专业……	4.3	11.1	12.7	14.2	9.9	9.8

由于进行了这一切巨大的文化工作，在我国便产生和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工人阶级、农民和苏联职员，他们同我国人民血肉相连，没有身受剥削的桎梏，仇恨剥削者并决心忠诚地为苏联各族人民服务。

我认为，这个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界的产生，是我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3. 苏维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国内形势的进一步稳定，苏维埃制度的进一步巩固。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确立，工业和农业的高涨，劳动者物质状况的改善，人民群众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的增长，——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实现的这一切不能不使苏维埃制度进一步巩固起来。

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现在的苏联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在苏联社会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而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分裂着，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状况动荡不定，而摆脱了剥削羁绊的苏联社会却没有这样的矛盾，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象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在这一基础上又产生了1936 年 11 月通过的苏联宪法以及国家最高机关选举的充分民主化。

至于谈到国家最高机关的选举，那就要指出，它光辉地体现了构成我国国内形势特点的苏联社会的一致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大家知道，在 1937 年 12 月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时，投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联盟的票的几乎有 9000 万选民,即占所有参加投票人数的 98.6%，而在 1938 年 6 月选举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时,投共产党员和非党

人士联盟的票的有9200万选民，即占所有参加投票人数的99.4%。

这就是苏维埃制度所以巩固的基础，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具有的取之不尽的力量的源泉。

这还说明，一旦发生战争时，我们军队的后方和前方由于彼此一致和内部统一，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巩固，这一点是国外那些爱搞军事冲突的人应当记住的。

国外有些报界人士胡说什么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清洗出去，似乎就“动摇了”苏维埃制度，引起了“瓦解”。这种胡说八道只值得加以耻笑。把暗害分子和敌对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怎么会动摇和瓦解苏维埃制度呢？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这一小撮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对外国奴颜婢膝，在每一个外国官老爷面前奴气十足，匍伏跪拜，甘愿为他充当间谍，这一小撮人不懂得摆脱了资本锁链的最普通的苏联公民都比任何一个带着资本主义奴隶制枷锁的身居高位的外国官老爷高明得多，——谁需要这帮可鄙的卖身投靠的奴才呢？他们对人民能有什么价值呢？他们能“瓦解”谁呢？1937年判决枪毙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决枪毙了罗森霍尔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试问，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这种“瓦解”没有在选举的结果中反映出来呢？

如果听信这些胡言乱语的外国人，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是让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逍遥法外，不去打扰他们的暗害、凶杀

和间谍活动，苏维埃组织就会巩固得多和稳定得多了。这些老爷们如此厚颜无耻地为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辩护，岂不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吗？

把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就一定会使而且确实已经使这些组织进一步巩固了，这样讲岂不是更正确吗？例如，哈桑湖事件不是恰好说明了把间谍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巩固这些组织的最可靠的手段吗？

* * *

党在对内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1.继续发展我们的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技术，以便在工业的生产技术装备和发展速度方面已经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后，能在最近10—15年之内在经济上也超过它们。

2.继续发展我们的农业和畜牧业，以便在最近的3—4年内使谷物的年产量达到80亿普特，使每公顷的平均产量达到12—13公担，使经济作物的产量平均增加30—35%，使羊和猪的头数增加一倍，牛的头数增加40%，马的头数增加35%。

3.继续改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

4.始终不渝地贯彻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彻底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巩固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巩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友爱合作，极力巩固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发展和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

5.不要忘记资本主义包围，必须记住外国谍报机关将把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派到我国来，必须记住这一点并加强我们社会主义的侦察机关，不断地帮助它粉碎和铲除人民的敌人。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从政治路线和日常实际工作方面看来，报告所涉及的时期是我们党的总路线完全胜利的时期。

社会主义体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确立，在新技术基础上对工农业改造的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的提前完成，谷物的年产量达到70亿普特的水平，贫困和失业的消灭，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提高，——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成绩。这些成绩表明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

在这些宏伟的成绩面前，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的人，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各种各样的蜕化变质分子，如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都不得不缩成一团，藏起他们那陈旧的“政纲”，而转入地下。他们没有顺从人民意志的勇气，宁愿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法西斯分子同流合污，为外国谍报机关效劳，充当间谍，答应帮助苏联的敌人来瓜分我们国家，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

这就是反对我们党的路线，后来成了人民公敌的人的可耻下场。

党粉碎了人民公敌并肃清了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以后，在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上更加一致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周围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表明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党内生活的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具体材料。

1. 改善党的成分的办法。划小组织单位。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工作，首先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调整党的成分，排除不可靠分子，选拔优秀分子；另一方面是，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的、实际的、具体的工作。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代表1874488个党员。如果把这个数目同前一次即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党员数目比较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党内增加了60万个新党员。党不能不感到，在1930—1933年的条件下，这样大批的人涌入党内，是不健康地和不恰当地扩大了党员数量。党知道，加入它的队伍的不仅有忠诚老实的人，而且还有不合格的分子，还有企图利用党的旗帜达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党不能不知道，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党员的数量，而且首先在于党员的质量。于是就提出了调整党的成分的问题。当时决定把1933年就开始的清洗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工作继续下去，这个工作确实一直继续到1935年5月。其次，当时决定停止接收新党员，在1936年9月以前，确实一直没有接收新党员，直到1936年11月1日，才恢复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其次，基洛夫同志惨遭凶杀的事件证明党内有不少可疑分子，于是当时决定审查和换发党证，这两项工作直到1936年8月底才结束。只是在此以后，党才开始接收新党员和预备党员。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才肃清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合格的、消极的、有野心的和公开敌对的分子，而选拔了最坚定最忠实的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这一次即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共代表将近160万个党员，就是说，比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少了27万个党员。但这一点坏处也没有。相反，这是在好转，因为党是靠清除本身的坏东西而巩固的。现在我们的党在

党员数量上虽然少了一些，但是在质量上却更好了。

这是很大的成绩。

至于改善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使它接近基层工作和进一步具体化，那么党认为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是使党的机关易于领导这些组织，并使领导工作本身变得具体、生动和实际的最好办法。划小组织单位的办法，不仅在人民委员部方面实行了，而且在行政区域的组织方面，即在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区等等方面也实行了。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我们现在已经不是 7 个加盟共和国，而是 11 个加盟共和国，不是 14 个苏联人民委员部，而是 34 个苏联人民委员部，不是 70 个边疆区和州，而是 110 个边疆区和州，不是 2559 个市区和乡区，而是 3815 个市区和乡区。与此相适应的是，现在在党的领导机关系统中总共有以联共（布）中央为首的 11 个中央委员会，6 个边疆区委员会，104 个州委员会，30 个专区委员会，212 个市委员会，336 个市区委员会，3479 个乡区委员会，113060 个基层党组织。

决不能说，划小组织单位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一工作很可能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不管怎样，它无论在改善日常领导工作方面，或者在使领导本身接近基层的具体工作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我还不去说，划小组织单位的办法使我们能够提拔成千上万的新的人才来担任领导工作.

这也是很大的成绩。

2. 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

调整党的成分，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的具体工作，这并不是而且也不能是进一步巩固党及其领导的唯一办法。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实行的另一种巩固党的办法，就是根本改善干部工作，改善挑选干

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以及在工作过程中审查干部的工作。

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正是在这里才产生了正确地挑选干部、培养干部、提拔新人才、正确配备干部以及按照所做的工作来审查干部的问题。

正确地挑选干部是什么意思呢？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还不是说要为自己找几个副手和助理，成立一个办公室，从那里发出各种指令来。这也不是说要滥用自己的职权，毫无道理地把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调来调去，进行无休止的“改组”。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

第一，要重视干部，把他们看作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爱护他们，尊重他们。

第二，要了解干部，细心考察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每一个干部究竟在什么岗位上才最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第三，要用心培养干部，帮助每个成长着的工作人员不断提高，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照料”这样的工作人员，加速他们的进步。

第四，要及时而大胆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不让他们老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不让他们消沉下去。

第五，在安排工作人员的岗位时要做到使每个工作人员都各得其所，使每个工作人员都能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

使干部配备工作的总方向完全适应于政治路线的要求，因为进行这种配备是为了实现这一政治路线。

在这方面大胆而及时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人对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朝后看，迷恋过去、迷恋旧事物而不能自拔，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执行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

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及时而大胆地把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党在巩固党的领导方面所获得的重大成绩之一，就是它在挑选干部时，正是自下而上地、卓有成效地实行了这个把年老工作者和年轻工作者配合起来的方针。

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有些材料可以说明，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提拔了 50 多万个年轻的党员布尔什维克和靠近党的布尔什维克担任国家系统和党的系统的领导职务，其中有 20%以上是妇女。

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自下而上地挑选干部的工作完全集中起来，并把它提到应有的、科学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高度。

为此就要取消把考察、提拔和挑选干部的工作分散于各部各科的作法，而要把它集中在一个部门。

联共（布）中央干部局，以及每一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的相应的干部部，就应当是这样的部门。

3. 党的宣传工作。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借以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另一件很要紧很重大的工作，就是党的口头上和刊物上的宣传鼓动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工作，提高党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

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极重要意义，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极重要意义，大概已没有必要再来大谈特谈了。我所指的，不仅是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共青团、工会、商业和合作社组织、经济组织、苏维埃组织、教育组织、军事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调整党的成分和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的事情，尽可以做得很满意；提拔干部、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尽可以做得很满意；这一切尽可以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却因某种缘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前途茫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和党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在国家

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国际的局势中毫无困难地辨别方向，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而这个任务，我们无疑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

我们年轻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各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各个专业进行的。这是必要的，适当的。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为，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应当密切关心本国命运，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积极参加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当然，这对于布尔什维克专家来说是一种附加的负担。但是，这是一种大有好处的负担。

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

发展规律的科学。

关于改进宣传工作和改进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的办法问题，联共（布）中央曾经多次讨论过，参加讨论的还有各州党组织中的宣传员。当时注意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8年9月出版的事实。当时认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为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联共（布）中央这些工作的结果曾经公布在《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安排》[①]这一著名的决议中。

联共（布）中央根据这个决议，并注意到1937年联共（布）中央三月全会《论党的工作缺点》的著名决议，规定了如下一些主要办法来消除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缺点，并改善对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

1.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一个部门，把各个宣传鼓动部和报刊部合并为统一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同时在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成立相应的宣传鼓动部；

2.认为迷恋于在小组中进行宣传的办法是不正确的，而由党员个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方法则是比较适当的，所以必须使党集中注意报刊宣传和组织讲演宣传；

3.在每一个州中心为我们的基层干部设立一年制的进修班；

4.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为我们的中级干部设立两年制的列宁主义学校；

5.在联共（布）中央下面设立三年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以培养党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干部；

6.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设立一年制的宣传员和报纸工作人员进修班；

————————————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分册第501—521页。——编者注

7.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下面为各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员设立半年制的进修班。

毫无疑问，这些已经在实行但还没有充分实行的办法，一经贯彻就会立即产生良好的结果。

4.几个理论问题

必须指出，在我们的宣传和思想工作中还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几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缺乏十分明确的认识，有一种糊涂观念，我所指的是关于国家、而特别是关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以及关于我们苏维埃知识分子的问题。

人们有时问道："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国内已不再有敌对阶级了，没有什么人可以镇压了，这就是说，国家已不再需要了，国家应当消亡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取消国家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的时候吗？"

或者还有人这样问："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正向共产主义前进，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应当有任何国家,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国家送进古物陈列馆的时候吗？"

这些问题证明，发问的人是非常认真地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个别原理。但是这些问题同时又说明，发问的同志并没有了解这一学说的实质，并没有弄清这一学说的个别原理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尤其是不了解当前的国际环境，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的事实。从这些问题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包围的事实，而且

还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到我们国家里来，并力图寻找时机对我国实行武装侵犯的作用和意义；从这些问题中，同样可以看出他们也低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机关、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受外来侵犯所必需的那种作用和意义。必须承认，犯这种低估过失的不仅是上面所讲的那些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全体布尔什维克毫无例外地都犯了这种过失。我们直到最近，即在 1937—1938 年间，才知道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的上层分子所干的间谍活动和阴谋勾当，而从材料上却可以看出，早在十月革命的初期，这些老爷就充当了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并进行了阴谋活动，——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怎么会忽视这样严重的事情呢？这个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人们通常总是这样来回答：我们没有料到这些人竟会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可是，这不能算是解释,尤其不能当作辩护的理由，因为我们犯了过失的事实始终是事实。那么这一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这一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谍报机关的力量和意义，它们竭力利用人们的弱点，利用人们的虚荣心，利用人们的无气节而把他们网罗到自己的间谍网中，用他们来包围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关。这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我们国家的侦察机关的作用和意义，低估了这个侦察机关，却胡说什么苏维埃国家的侦察机关是不值一提和无关紧要的东西，胡说什么苏维埃侦察机关也和苏维埃国家本身一样，很快就要被送进古物陈列馆去。

我们的这种低估态度，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

这种态度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有不完善和不充实的地方而产生的。它所以能够流行起来，是因为我们对国家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抱着一种不能容许的疏忽态度，虽然我们二十年来的国家活动的实际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进行理论总结的丰富材料，

虽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顺利地弥补这个理论上的缺陷。我们忘记了列宁的一个极重要的指示，他认为我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有义务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于这点，列宁说道：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卷第492页）[①]

例如，我们看一看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论的经典性的公式：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弗·恩格斯《反杜林论》1933年党的出版社版第202页）[②]

恩格斯的这个原理是否正确呢？

是的，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具有下面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时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页。一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321页。——编者注

才是正确的：（一）如果仅仅从一国内部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而预先撇开国际因素，并且为了便于研究起见，把它看作是一个离开国际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国家；或者是（二）如果假定社会主义已经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外来侵犯的威胁已不再存在，军队和国家已没有必要加强。

可是，假如社会主义仅仅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了胜利，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撇开国际条件不顾，那又应当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的公式没有给予回答。恩格斯本来就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他也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恩格斯是从社会主义已经大致同时地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这个假定出发的。所以，恩格斯在这里研究的并不是某一国的某个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的条件下的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其公式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试问：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发生怎样的变化？”只是因为问题带有这样一般的抽象的性质，所以恩格斯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时，完全撇开了像国际条件、国际环境这样的因素。

但是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不能把恩格斯关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的一般公式，推广运用到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这种个别的具体的情况，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受着外来武装侵犯的威胁，因此不能撇开国际环境不顾，它应当拥有训练得很好的军队，组织得很好的惩罚机关和坚强的侦察机关，因而应当拥有自己的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以便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

不能要求距今 45—55 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

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要求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局限于背熟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学会经常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存在二十年的经验，最后，并学会根据这个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和完善。列宁在1917年8月，即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前的几个月，写了他那部名著《国家与革命》。列宁认为他这部著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使它不被机会主义者歪曲和庸俗化。列宁本来还打算写《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二部分，以便把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毫无疑问，列宁想在他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根据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存在的经验，来进一步探讨和发展关于国家的理论。可是，他的逝世使他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列宁所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应该由他的学生们来完成。

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国家政权的工具，主要集中于军队、惩罚机关、侦察机关和监狱。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内部的（主要的）职能是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外部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从前的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是这样。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是这样。

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把资产阶级赶下台，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完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打碎它的旧军队、它的官僚机构、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决不能

由此得出结论说，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够保存某些根据无产阶级国家需要而改变过的旧国家的职能。尤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应当始终不变，我们国家的一切原有职能在将来也应当完全保存下去。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将来还会发生变化。

列宁说得完全对：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3页）[①]

自十月革命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各剥削阶级被消灭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镇压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抵御武装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工业和农业，准备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因此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实现了两个基本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这一点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那些国家的职能也是要镇压不顺从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为了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来镇压少数剥削者，而从前的国家却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第二个职能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这一点也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的国家也用武装保护自己，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是为了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成果，而从前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0页。——编者注

犯，却是为了保护少数剥削者的财富和特权。这里还有第三个职能，这就是我们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不过，这个新的职能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文化革命，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家。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也因此而改变了。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再没有什么人需要镇压了。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因此红军、海军以及为缉捕和惩罚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那么它们的矛头已经不是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

由此可见，我国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并且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发展过程不能就此停止。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那么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存下来呢？是的，要保存下来，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尚未消灭，假如那时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尚未消除的话。同时很明显的是，我们国家的形式，又会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不，不被保存下来而要消亡下去，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已经消灭，假如那时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资本主义的包围的话。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

对这个问题，象对国家问题一样，在我们党内也存在一些模糊见解和糊涂观念。

虽然党对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而与党的立场不能相容的观点。大家知道，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的确，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发展时期，无论其成分或状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仅接近人民，而且和人民真诚合作，这是他们与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则区别。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点的。他们依然弹着老调，错误地用旧的观点和态度来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持这样的观点和态度在从前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知识分子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服务的。

在从前，在革命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界首先是由有产阶级，即贵族、工业家、商人和富农等出身的人组成的。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也有小市民、小官吏、甚至农民和工人出身的人，可是他们没有而且也不能在其中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整个知识界都是由有产阶级供养并为它们服务的。因此，当时我国的革命分子，首先是工人，对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往往变成一种仇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固然，旧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几个甚至几十个勇敢而革命的人物，他们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观点，并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结起来。但是这样的人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毕竟为数太少了，所以他们并不能改变整个知识界的面貌。

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在

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胜利以后，当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已创造了实际条件，使国家能够制定和实施新宪法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还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就脱离了其余的知识分子群众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实行怠工。这一部分人因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了。后来，其中保全下来的大多数人都被我国的敌人召募去做暗害分子和间谍，从而自绝于知识分子的队伍。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另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到来，但是后来他们看来是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才决定去供职，决定和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现在旧知识分子中的这一类人，大部分都已经年老了，已开始丧失其工作能力。旧知识分子中的第三部分人，主要是比前一部分人的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靠拢人民，拥护苏维埃政权。他们须要补习，而他们也确实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进行了补习。但是，与旧知识分子这种分化瓦解的痛苦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新知识分子力量形成、动员和积聚的蓬蓬勃勃的过程。几十万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补充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减少了的队伍。他们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苏维埃的方式使知识界复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旧知识分子的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结果，我国现在就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在成分方面或社会政治面貌方面，都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界根本不同。

对于旧的、革命前的、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适用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这种理论指出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

斗争。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了。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指出必须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关怀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合作。

这看来是很明白的。

尤其使人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虽然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这一切根本的变化，可是在我们党内竟然还有人企图把那种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理论，用来对待我们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对待这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原来，这些人武断地认为，那些不久前还是按斯达汉诺夫方式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后来一被送到高等学校里去受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这样说来，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照这些奇怪的同志看来，我们的这种计划竟包含着莫大的危险，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一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以后，他们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险。也许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落到颂扬落后、无知、愚昧的地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理论上的错误从来没有使人得到好处，而且也不会使人得到好处。

关于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 * *

在进一步巩固党的方面，我们的任务是：

1.不断地改善党的成分，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通过个别挑选的方式，只将那些经过考验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接收入党；

2.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从而使它们的领导工作日益实际和具体，日益减少忙于开会和文牍主义的情况；

3.把挑选干部的工作集中起来，关心对干部的培养，细心地考察工作人员的优点和缺点，更大胆地提拔年轻的工作人员，使挑选干部

和配备干部的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4. 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起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我们干部的政治锻炼。

* * *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总结报告了。

我把我们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经历的道路作了一番概括的叙述。党和党中央在这个时期内的工作结果，是大家知道的。我们有过缺点和错误。党和党中央并没有隐瞒这些缺点和错误，而是努力加以纠正。我们也有重大的成功和巨大的成绩，但是这些成功和成绩决不应该冲昏我们的头脑。

主要的总结就是我国工人阶级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事业的正确性。这就是主要的总结，因为它加强了确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确信工人阶级必然获得最终胜利的信心。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人民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商人和富农是活不下去的。我国工人阶级却用事实证明，人民没有剥削者是能够很好地活下去的。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工人阶级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旧制度以后，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我国工人阶级却用事实证明，它不仅完全有能力破坏旧的制度，还完全有能力建立起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的制度，而且是既没有危机又没有失业的制度。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硬说，农民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国集体农庄农民却用事实证明，农民是能够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的走狗们所特别力求达到的，主要是想打消工人阶级对本身力量的信心，打消它对自己能够而且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从而使资本主义奴隶制永远存在下去。因为资产

阶级知道，资本主义还没有被推翻、还继续存在着，这并不是由于它本身有什么优点，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自己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没有充分的信心。不能说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毫无成效的。必须承认，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走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毒化了工人阶级的心灵，使他们犹疑不决和缺乏信心。假如我国工人阶级的成就、它的斗争和胜利，能够提高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斗志，坚定它对本身力量的信心、获得胜利的信心，那么我们的党就可以说，它的工作没有白做。可以用不着怀疑，情形一定会是这样。

我们战无不胜的工人阶级万岁！

我们战无不胜的集体农庄农民万岁！

我们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万岁！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全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万岁！

译自《列宁主义问题》1952 年第 11 版第 603—651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 14 卷第 221—269 页

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①]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

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作者是值得怜悯的，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

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

建议把这本书烧掉。

约·斯大林

译自1953年11月《历史问题》
第11期第21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4卷第185页

————————————

① 这是斯大林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的一封信。——编者注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五月制作

斯大林选集

第四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斯大林选集

第四卷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三年

二〇一七年·中国

И. Сталин.

目　录

本 卷 说 明 …… 1

《斯大林选集》第四卷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三年

广播演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 3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9
四个月战争的经过 …… 10
“闪击战”的破产 …… 10
我军暂时失利的原因 …… 13
“民族社会党人”是些什么人？ …… 14
德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 17
我们的任务 …… 19
检阅红军时的演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 22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信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 …… 25
“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 29
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和取消政治委员制——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 …… 35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 37
1.后方的组织工作 …… 37

2.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 38
3.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 41
4.苏联、英国和美国反对希特勒德国
及其欧洲盟国的战斗联盟 …… 43
5.我们的任务 …… 46
关于盟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答美联社记者问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 49
应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最高统帅命令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 51
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问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 56
永远纪念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 …… 58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 …… 59
1.战争进程中根本转折的一年 …… 60
2.全民支援前线 …… 63
3.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法西斯同盟的瓦解 …… 67
关于盟国在法国北部登陆一事——答《真理报》记者问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 …… 72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 …… 73
1.德国处在两个战场的夹攻中 …… 73
2.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勋 …… 77
3.反德同盟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和平与安全问题 …… 80
关于《军事思想》和《军事通报》杂志——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 …… 85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最高统帅命令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 …… 87

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告人民书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91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93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时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94
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告人民书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95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98
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八周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110
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113
就邱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 117
原子弹是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的
——答《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斯先生问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 123
和美国共和党人士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记录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126
在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 136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七月）…… 138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 138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 160
答同志们 …… 166

评艾德礼的言论和联合国的行为——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五一年）…… 175
关于原子武器问题答《真理报》记者
（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 180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给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
（一九五二年二月至九月）…… 182
对于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 182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 216
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 222
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 …… 242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 251

附 卷

斯大林历史档案选

—生平综合篇—

苏维埃文化应在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 年 7 月 3 日）…… 256
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谦虚也更准确
——在同作家们会见时的讲话片断
（1932 年 10 月 26 日）…… 258
就《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问题的讲话
（1946 年 8 月 9 日）…… 259
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致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
（1924 年 8 月 19 日） …… 264
再次请辞“总书记”职务
（1926 年 7 月 22 日） …… 266

三次请辞“总书记”职务
（1926 年 12 月 27 日）…… 267
建议取消“总书记”的设制
（1927 年 12 月 19 日）…… 268
我老了，请大家另选一位书记吧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1952 年 10 月 16 日）…… 272
围绕着我个人的狂热从何而来
——与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的谈话
（1937 年 1 月 8 日）…… 274
我们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这种赞美
——致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信
（1945 年 11 月 10 日）…… 277
对《斯大林传略》第一版的批评
（谈话记录）…… 278
对身后的预言
（1939 年） …… 280

—党政建设篇—

中央组织局一九二六年三-八月的工作计划
——在中央组织局会议上的讲话
（1926 年 3 月 15 日） …… 282
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问题
——在联共（布）二、三月全会上的结束语
（1937 年 3 月 5 日）…… 287
要有年轻的新鲜力量注入中央委员会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1952 年 10 月 16 日）…… 309

关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
——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37年6月2日）…… 311
丧失警惕性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的片断
（1940年） …… 338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
（1938年10月1日） …… 341

—经济建设篇—

把个体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
（1928年1月20日） …… 382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和实际结论
（1928年4月6-11日） …… 396
关于工业化、集体化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28年7月9日）…… 412
发展农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撑点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28年7月11日） …… 445
展开一场宣传集体农庄的运动——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9月2日）…… 453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
（1935年2月）…… 455

—中国革命篇—

关于目前中国大革命的形势
——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27年4月5日）…… 457

关于在中国成立苏维埃的问题
（1927 年 9 月 27 日） …… 468
周恩来记录的斯大林同瞿秋白等人的谈话
（1928 年 6 月 9 日）…… 470
同王明等谈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
（1937 年 11 月 11 日）…… 475
与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革命的谈话
（1936 年 11 月—1942 年 3 月）…… 478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二）
（1951 年 2 月 9 日）…… 482

—苏中关系篇—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诸问题——与刘少奇会谈纪要
（1949 年 6 月 27 日） …… 487
关于中苏条约及撤军、贷款、援助等问题
——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1949 年 12 月 16 日）…… 492
关于签订新约及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
——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1950 年 1 月 22 日） …… 498
关于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
（1950 年 8 月 27 日） …… 504

—朝鲜战争篇—

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出兵的关系——致毛泽东电
（1950 年 10 月 5 日） …… 506
对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展开攻势表示祝贺——致毛泽东电
（1950 年 12 月 1 日） …… 508

不宜过早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致周恩来电
（1950 年 12 月 7 日） …… 509
给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5 月 6 日）…… 511
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5 月 29 日） …… 513
关于持久作战和提高士气等问题——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6 月 5 日）…… 515
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6 月 30 日） …… 517
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8 月 29 日） …… 519
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11 月 19 日）…… 520

—国际共运篇—

不要像老师那样对工人说话
（1934 年 4 月 7 日）…… 521
需要提出符合战争当前阶段的问题
（1939 年 10 月 24、25 日）…… 525
必须注意欧洲工人的这些特点
（1939 年 11 月 7 日） …… 527
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
——谈共产国际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1941 年 4 月 20 日） …… 529
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
（1943 年 5 月 8、11 日）…… 531

我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1943 年 5 月 21 日） …… 532
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德国革命提纲的意见
（1923 年 8 月 20 日） …… 533
对德国革命共产国际不应下达具体指令
（1923 年 8 月 21 日） …… 536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之一）
（1929 年 5 月 6 日）…… 539
力量不足以继续战斗的情况是会有的
（1939 年 4 月 7 日）…… 547
对法国共产党工作的建议
（1944 年 3 月 5 日）…… 549
关于在保加利亚成立劳动党的建议
（1946 年 9 月 2 日）…… 551
关于苏南关系诸问题给铁托的信
（1948 年 3 月 27 日） …… 553
关于蒙古与苏联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同乔巴山会谈纪要
（1946 年 2 月 22 日） …… 559
与哥穆尔卡和明茨关于波兰局势的谈话内容
（1945 年 11 月 14 日）…… 563
致伊朗人民党主席比雪华里的信
（1946 年 5 月 8 日）…… 566
关于印度革命道路的问题——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一）
（1951 年 2 月 9 日）…… 569
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资本家们分化为两大派别
（1945 年 1 月 28 日） …… 580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 ——答季米特洛夫
（1948 年 11 月 6 日之前） …… 581

—终卷篇—

一九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

——在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1948 年 3 月 14 日） …… 583

插图

马-恩-列-斯 …… 590

附录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i3sDSnN

包含在“新编斯大林全集及档案附卷”文件夹）

一、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总目录

二、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十卷总目录

本 卷 说 明

新编《斯大林选集》共分四卷，是根据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和档案附卷十卷编辑的。各卷内容的起讫时间为：第一卷，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第二卷，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第三卷，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第四卷，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三年。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原《斯大林选集》，仅为两卷，按照当时的政治、理论需要，剔除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工人运动、暴力革命、论反对派、卫国战争，以及中国革命等方面的大量文献。现新编《斯大林选集》已尽可能予以增补、充实，以力求全面地反映这位历史伟人和革命导师的思想、理论和**非凡经历**。

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中，有众多关于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新编《斯大林选集》亦撮要单独编辑成“斯大林历史档案选”，作为附卷附于第四卷之后，供读者参考。第四卷之后还附有新编《斯大林全集》正卷二十卷总目录和档案附卷十卷总目录的下载地址。

本选集中的日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之前都依旧历（正教历），其后为公历。

本选集中的注释，一为原书著者（斯大林）注，二为译者注，三为编者注，均用圆形注码（①、②、③……）标明，释文置于当页末；正文中原加着重号的文字，在本选集中均用黑体字标示。

本选集中的部分篇目标题，是我们拟加的。

本选集文字虽经多次校对，错讹之处仍恐难免，希读者指正。

本书编者　诸夏怀斯社

联系邮箱　hqxsk@163.com

新编《斯大林选集》

第四卷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三年

广　播　演　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

同志们！公民们！

兄弟姊妹们！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

希特勒德国从 6 月 22 日起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和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继续向前进犯。希特勒军队侵占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的大部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地区、乌克兰西部一部分地区。法西斯空军正在扩大其轰炸区域，对摩尔曼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基辅、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大肆轰炸。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我们光荣的红军怎么会让法西斯军队占领了我们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呢？难道德国法西斯军队真的象法西斯的吹牛宣传家所不断吹嘘的那样，是无敌的军队吗？

当然不是！历史表明，无敌的军队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拿破仑的军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可是这支军队却先后被俄国的，英国的和德国的军队击溃了。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威廉[①]的德国军队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军队，可是这支军队曾经数次败在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的手中，终于被英法军队击溃了。对于现在希特勒的德国

———————————

① 威廉，当时的德国皇帝。——本书编者注

法西斯军队也应当这样说。这支军队在欧洲大陆上还没有遇到过重大的抵抗。只是在我国领土上，它才遇到了重大的抵抗。既然由于这种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精锐师已被我们红军击溃，这就是说，正象拿破仑和威廉的军队曾经被击溃一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也是能够被击溃的，而且一定会被击溃。

至于说我们的一部分领土毕竟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这主要是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反苏战争是在有利于德国军队而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情况下发动的。问题就在于,德国军队是进行着战争的国家的军队,它已经全部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德国用来进攻苏联并且集结到苏联边境的 170 个师已经完全处于战备状态,只等进攻的信号了,而当时苏联的军队还需要进行充分动员，还需要向边境集结。这里还有一个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就是法西斯德国不顾它会被全世界认为是进攻一方,而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它同苏联在 1939 年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显然，爱好和平的我国是不愿意首先破坏条约的，因此也就不能走上背信弃义的道路。

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 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吃人魔鬼领导的。当然，这是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缔结的，即和平协定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触犯爱好和平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荣誉。大家知道，德国同苏联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正是这样的条约。

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得到了些什么呢？我们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胆敢冒险违反条约进攻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这肯定是我们有

所得，而法西斯德国有所失。

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得到了些什么，又失掉了些什么呢？这使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取得了某种有利的地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输了，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毫无疑问，德国在军事上暂时有所得，只是偶然因素，而苏联在政治上大有所得，却是重大的长久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红军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必将日益扩大。

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英勇的陆军，我们全体英勇的海军，我们全体的飞行员——我们的雄鹰，我国各族人民，欧洲、美洲、亚洲所有的优秀人士，以及德国所有的优秀人士，都谴责德国法西斯分子的背信弃义行为而同情苏联政府，赞同苏联政府的行为，并且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会被击溃，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由于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我国已经同最凶恶而阴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国军队正在同以坦克和飞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英勇作战。红军和红海军正在克服重重困难，为保卫每一寸苏联国土而奋不顾身地战斗。拥有数千辆坦克和数千架飞机的红军主力正在投入战斗。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是举世无双的。我们对敌人的抗击日益加强。全体苏联人民都同红军一道奋起保卫祖国。

为了消除我们祖国面临的危险,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粉碎敌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必须使我们苏联人了解到威胁我国的危险的严重程度，坚决克服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克服和平建设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战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当战争使形势根本改变了的时候，就是十分有害的了。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摧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

克人、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制度,把他们德意志化,把他们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因此，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必须使苏联人了解这一点，不要再漠不关心，必须使他们动员起来，按照新的战时的方式改造自己的全部工作，拿出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气概。

其次，必须使怨天尤人的人和怕死鬼、惊惶失措分子和逃兵在我们的队伍中毫无容身之地，使我们的人在斗争中无所畏惧，并且奋不顾身地投入我们反法西斯奴役者的卫国解放战争。我们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列宁曾经说过,苏联人的基本品质应当是在斗争中勇敢、大胆、不知畏惧、决心同人民一起为反对我们祖国的敌人而战斗。必须使布尔什维克的这种优良品质成为红军、红海军以及苏联各族人民中千百万人所具有的美德。

我们应当立即按照战时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使一切都服从于前线的利益,都服从于组织粉碎敌人的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现在都看到，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保证全体劳动者享有自由劳动和美好生活的我们的祖国，是咬牙切齿、极为仇视的。苏联各族人民应当奋起反对敌人，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国土。

红军、红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联国土，应当为保卫我国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应当表现出我国人民所固有的勇敢、主动和机智。

我们应当组织对红军的全面支援，保证大力补充红军队伍，保证供应红军一切必需品，组织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迅速运输，以及广泛救护伤员。

我们应当巩固红军的后方,使全部工作都服从于这个事业的利益,做到一切企业都能加紧工作，生产更多的步枪、机枪、火炮、子弹、

炮弹、飞机,组织对工厂、电站、电话和电报通信设施的警卫工作,整顿地方防空事宜。

我们应当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消灭间谍、破坏分子和敌人的伞兵，在这些方面及时地协助我们的锄奸营。必须注意到，敌人是阴险狡猾的，善于欺骗和造谣。必须估计到这一切，不要受敌人的挑拨。凡是因惊惶失措和贪生怕死而有害防务的人，不论是谁，都应当立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全部铁路机车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的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机关保管，以便运到后方。凡是不能运走的一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燃料等，都应当绝对销毁。

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建立破坏小组，以便同敌军部队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通信设施，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沦陷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活动。

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绝不能看成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它同时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在这场伟大战争中，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受希特勒头目们奴役的德国人民，将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

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关于支援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援助我国的宣言，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苏联各族人民对此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同红军一道对进犯我国的敌人奋起作战的，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我国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将奋起作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劳动者已经开始成立有成千上万人的民兵队伍来支援红军。在我们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中，在每一个遭到敌人侵犯危险的城市里，我们都应当成立这样的民兵队伍，发动全体劳动者起来斗争，挺身捍卫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祖国。

为了迅速动员苏联各族人民的一切力量，抗击背信弃义地进犯我们祖国的敌人，国防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它现在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和红海军，粉碎敌人，争取胜利。

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支援我们英勇的红军和我们光荣的红海军！

用人民的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

为争取我们的胜利，前进！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9—17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3—8 页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同志们！

自从我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及在我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以来，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现在我们即将跨入苏维埃制度存在的下一年，第二十五年。

在十月革命的周年庆祝大会上，通常都要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一年的和平建设方面的成就。我们的确有可能作这样的总结，因为我们在和平建设方面的成就，不仅逐年增长，而且逐月增长。这些成就是什么，这些成就有多么大，——这是所有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知道的。

但是，过去的一年不仅是和平建设的一年，而且是同背信弃义地进攻爱好和平的我国的德国侵略者进行战争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只是在前 6 个月继续进行了我国的和平建设工作，下半年有 4 个多月是在同德帝国主义者进行的残酷战争的环境中度过的。所以，战争成了过去一年我国发展中的转折点。战争使我们的和平建设工作大大缩小了，而在某些部门则根本停止了。战争迫使我们按战时方式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战争把我国变成一个为前线服务、为我们的红军和海军服务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后方。

和平建设时期结束了。反对德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了。

因此，提出关于过去这一年的下半年的，其实是下半年四个多月的战争总结以及我们在这次解放战争中的任务的问题，是完全恰当的。

四个月战争的经过

我在战争爆发时的一次演说中已经说过，战争给我国造成了危险的威胁，我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必须了解到和意识到这种危险，并按战时方式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现在，我在作四个月战争的总结时，应当着重指出，这种危险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发加重了。敌人占领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侵入了顿巴斯，象乌云一样笼罩了列宁格勒，并且威胁着我们光荣的首都莫斯科。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正在掠夺我国，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用劳动建设起来的城市和乡村。希特勒匪帮正在屠杀和蹂躏我国的和平居民，连妇女、儿童和老人都不怜惜。在我国境内的德军占领区里，我们的弟兄正在德国压迫者的枷锁下呻吟着。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捍卫着祖国的荣誉和自由，奋勇击退野兽般的敌人的进攻，树立了英勇无畏的榜样，使敌人血流成河。但是敌人不顾一切损失，丝毫不爱惜自己士兵的鲜血，仍旧向前线调遣一批又一批的部队来接替被打垮的部队，并倾其全力要在冬季到来之前占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为敌人知道，冬季对他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在四个月的战争中,我们的损失是，阵亡 35 万人，失踪 378 000 人,负伤 102 万人。在同一时期,敌人的损失是被打死打伤和俘虏 450 万人以上。

毫无疑问，由于四个月的战争，德国比苏联大为削弱了，因为德国的人员后备快要枯竭，而苏联的后备力量现在才充分显露出来。

“闪击战”的破产

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开始进攻我国的时候，认为他们一定能够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消灭”苏联，并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挺进到乌拉尔。应该说，德国人并没有隐瞒这个“闪击”制胜的计划。相反，他们倒是百般地宣扬这个计划。但是，事实表明“闪击”计划是十分轻率和毫无根据的。现在应该认为，这个疯狂的计划是彻底破产了。

“闪击战”在西欧成功了，而在东方遭到了失败和破产，其原因何在呢？

德国法西斯战略家断言他们能够在两个月内消灭苏联，并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挺进到乌拉尔，他们指望什么呢？

首先,他们指望的是,如他们曾渴望的那样建立一个反苏大同盟，他们以为预先用革命的怪影来恐吓英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就能吸引这些国家参加这个同盟，这样就把我国同其他国家完全隔离开来。德国人知道，他们利用各个国家内的阶级矛盾以及这些国家同苏联之间的矛盾的这个政策，在法国已经见效了，法国的执政者由于害怕革命的怪影而放弃了抵抗，惊慌失措地把自己的祖国葬送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德国法西斯战略家以为，英国和美国也会如此。其实，德国法西斯分子把有点小名气的赫斯派到英国，就是为了说服英国的政治家参加反苏大进军。但是德国人大大地失算了。不论赫斯如何努力，英国和美国不仅没有参加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反苏进军，反而同苏联站在一个阵营里来反对希特勒德国。苏联不仅没有被孤立，反而有了新的盟国，如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德国利用矛盾和以革命怪影吓人的政策失效了，已经不适用于新的环境。这个政策不仅不适用，反而对德国侵略者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个政策在战争的新的条件下，正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

第二，德国人指望苏维埃制度不巩固，苏联后方不巩固，他们以为,只要红军一遭到严重打击和失利，工人和农民之间就会发生冲突，苏联各民族之间就会发生纠纷,暴动就会发生,国家就会四分五裂，这

就一定会便于德国侵略者长驱直入乌拉尔。但是德国人在这方面也大大地失算了。红军的失利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了工农联盟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不仅如此，红军的失利还把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以忘我精神支援自己的红军和红海军的统一的牢不可破的营垒。苏联后方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巩固。可以肯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象我国现在这样丧失这么多的领土，一定经受不住考验而陷于崩溃。既然苏维埃制度这样容易地经受住了考验并且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后方,这就是说，苏维埃制度是现在最巩固的制度。

最后，德国侵略者指望红军和红海军软弱，他们以为德国的陆海军可以一举击溃和驱散我们的陆海军，从而打开一条长驱直入我国腹地的道路。但是德国人在这方面又大大地失算了，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我们的陆海军。当然，我们的陆海军还缺少锻炼，它们总共才打了四个月的仗，还没有能成为一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队，而它们面对的敌人却是已经打过两年仗的经验丰富的德国陆海军。但是，第一，我军的士气比德军的士气高，因为我军是在保卫祖国，抵御外国侵略者，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而德军则是在进行侵略战争，掠夺别的国家，他们甚至一分钟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卑鄙勾当是正义的。毫无疑问，保卫祖国的思想，我国人民为之而战的思想,必定会使我军产生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能使红军紧密团结的英雄;而侵略和掠夺别国的思想，德国人专门为之而打仗的思想，也必定会使德军产生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丧尽道德和腐蚀德军的职业强盗。第二，德军深入我国腹地,远离德国后方，不得不在敌对的环境中作战，不得不在别国境内建立新的后方，而且这个后方又遭到我国游击队的破坏，这就从根本上瓦解着德军的供给，使他们害怕自己的后方，打破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地位巩固的信念；而我军却是在本土作战，不断得到自己后方的支援，得到人员、弹药和粮食供应的保障，并且完全信任自己的后方。正因为如此,我军比德国人所想象的要强大,而德军

却比根据德国侵略者的夸大宣传所能想象的要软弱。不久以前，我军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保卫战中歼灭了德军大约 30 个精锐师，这表明，在卫国战争的烈火中正在锻炼而且已经锻炼出一批新的苏联战士和指挥员、飞行员、炮兵、迫击炮手、坦克兵、步兵和水兵，他们明天就会成为使德军胆寒的力量。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注定了“闪击战”在东方必然破产。

我军暂时失利的原因

这一切当然都是对的。但是，除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些对红军不利的条件，因此，我军遭受暂时失利，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我国的一些地区让给敌人，这也是实际情况。

这些不利的条件是什么呢？红军在军事上暂时失利的原因在哪里呢？

红军失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欧洲没有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第二战场。问题在于，现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支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英国或美国的军队，因此德国人不必分散自己的力量，不必在东西两个战场上作战。而这种情况就使德国人以为他们在西方的后方是有保障的，能够把自己的全部军队及其欧洲盟国的军队都调来进攻我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国是在没有任何军事外援的情况下，单独地进行解放战争，抗击德国人、芬兰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的联合力量。德国人由于暂时的胜利而神气起来，为自己的军队大肆吹嘘，硬说他们的军队在一对一的作战中总能够把红军打败。可是德国人的这种断语是空洞的吹牛，因为既然这样，人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还要求芬兰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帮助他们进攻没有军事外援而全靠自己的力量作战的红军。毫无疑问，欧

洲没有反对德国人的第二战场是大大有利于德军的处境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在欧洲大陆上一旦出现第二战场时——而第二战场必然会在最近出现，——我军的处境就会大为有利，而德军则极为不利。

我军暂时失利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坦克不足，航空兵力量也有些不足。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坦克，没有足够的航空兵在空中掩护，步兵是很难作战的。我们的航空兵在质量上超过了德国的航空兵，我们光荣的飞行员获得了无畏战士的荣誉。但是我们的飞机目前还比德国人的少。我们的坦克在质量上超过了德国的坦克，我们光荣的坦克兵和炮兵曾多次把拥有大量坦克的嚣张一时的德军打得狼狈逃窜。但是我们的坦克毕竟只有德国人的几分之一。这就是德军所以暂时得胜的秘密。不能说我们的坦克工业搞得不好，给我们前线送去的坦克很少。不是的，坦克工业搞得很好，生产出不少的优质坦克。但是德国人生产的坦克要多得多，因为他们现在不只是支配着本国的坦克工业，而且还支配着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法国的工业。不然，红军早就把德军击溃了。德军没有坦克就不去作战，如果他们在坦克方面不占优势，就经受不住我们部队的打击。

为了使德军在坦克方面的优势化为乌有，从而根本改善我军的处境，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不仅把我国的坦克生产扩大几倍，而且还要大量增产反坦克飞机、反坦克枪、反坦克炮、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迫击炮，更多地修筑防坦克壕以及其他各种防坦克障碍物。

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民族社会党人”[①]是些什么人？

我们通常把德国侵略者即希特勒分子叫作法西斯分子。而希特勒分子竟然认为这不对，并坚持继续自称为“民族社会党人”。可见，

德国人想要我们相信，希特勒分子的党，掠夺欧洲并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罪恶进攻的德国侵略者的党，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能这样吗？社会主义同掠夺和压迫欧洲人民的野兽般的希特勒侵略者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吗？

能不能认为希特勒分子是**民族主义者**呢？不，不能。实际上希特勒分子现在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帝国主义者**。当希特勒分子从事收拾德国领土、重新合并莱茵区和奥地利等地时，还有相当的根据可以认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但是，在他们侵占了别国领土和奴役了欧洲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兰西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沿岸人等等，并开始争夺世界霸权以后，希特勒的党就不再是民族主义的党了，因为它从这个时候起就成了帝国主义者、掠夺者和压迫者的党了。

希特勒分子的党是帝国主义者的党，同时又是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者中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帝国主义者的党。

能不能认为希特勒分子是**社会主义者**呢？不，不能。实际上希特勒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剥夺欧洲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起码的民主自由的最凶恶的反动派和黑帮。为了掩盖其反动的黑◇303◇帮本质，希特勒分子咒骂英国和美国的内部制度是财阀制度。但是，在英国和美国却有起码的民主自由，有工人和职员的工会，有工人的政党，有议会；而在德国，在希特勒制度下，所有这些组织都被消灭了。只要把这两类事实对照一下，就可以了解希特勒制度的反动本质和识破德国法西斯分子所谓英美财阀制度的一套鬼话。其实，希特勒制度是俄国在沙皇统治下曾有过的那种反动制度的翻版。大家知道，希特勒分

——————————————

① 原文“национал социалисты”过去译为“国家社会党人”。——编者注

子很乐意象沙皇制度那样践踏工人的权利，知识分子的权利和各族人民的权利，他们也很乐意象沙皇制度那样制造中世纪式的虐杀犹太人的大暴行。

希特勒的党是民主自由的敌人的党，是中世纪式的反动势力和制造黑帮大暴行的党。

而如果这些寡廉鲜耻的帝国主义者和穷凶极恶的反动派继续披着“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外衣，那么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欺骗人民和愚弄头脑简单的人，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掩盖自己的强盗帝国主义的本质。

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 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①

希特勒说：“德国人要用一切手段征服全世界。如果我们想建立我们的大德意志帝国，我们就应当首先撵走和消灭斯拉夫各族——俄罗斯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

希特勒说：“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只能用暴力管理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待他们。如果政治上需要，就应当撒谎、出卖以至屠杀。”

戈林说；“谁反对我们，就杀谁，杀吧，杀吧，对此负责的不是你们，而是我，因此，你们杀吧！”

希特勒说:“我要把人从所谓良心这个屈辱人的怪物下解放出来。良心也象教育一样，是摧残人的。我的优点就是，我不受任何理论的或道德的考虑的约束。”

在一名被打死的德国士官身上搜出一份德军统帅部 9 月 25 日给步兵第 489 团的命令，命令中说：

————————————

① 这句话出典于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编者注

“我命令向每一个出现在600米距离内的俄国人开枪。俄国人应当知道，他们面对一个坚决的敌人，他们不能期待这个敌人给予任何宽恕。”

在一名被打死的中尉古斯达夫·齐格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身上搜出一份德军统帅部告士兵书，里面说：

“你没有心和神经，在战争中不需要这些。消灭你自己的怜悯心和恻隐心吧，杀死每一个俄国人，每一个苏联人，即使在你面前的是老人或妇女，是女孩或男孩，也不要停手。杀吧，这样你才能拯救自己免于死亡，保证你一家的前途，使你流芳百世。”

你们看，这就是希特勒党首领们和希特勒统帅部的纲领和指示，这就是一群丧失人性和堕落到禽兽地步的人的纲领和指示。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竟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里科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

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

今后我们的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的任务，我们陆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占领军一个不剩地歼灭干净。

对德国占领军决不留情！

消灭德国占领军！

德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德国侵略者道德退化，早已丧失人性，堕落到禽兽般的地步，——

单是这一点就说明他们必然自取灭亡。

但是,决定希特勒侵略者及其军队必然灭亡的,不仅仅是道德因素。

另外还有三个正在日益发挥作用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希特勒强盗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第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德国的**欧洲**后方不巩固,欧洲的“新秩序”不巩固。德国侵略者奴役了从法国到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从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到巴尔干和苏维埃乌克兰这片欧洲大陆的人民，剥夺了他们起码的民主自由，剥夺了他们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夺去了他们的粮食、肉类、原料，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奴隶，残杀了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而且认定自己在夺得了欧洲的霸权之后，现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德国的世界霸权。他们把这叫作“欧洲的新秩序”。但是,这是什么“基础”,这是什么“新秩序”呢？只有妄自尊大的希特勒蠢才们才看不见，欧洲的“新秩序”及其臭名昭彰的“基础”是一座随时都会爆发并把德帝国主义的纸牌搭的小房子埋葬的火山。有人引证拿破仑，硬说希特勒的行动象拿破仑，他的一切都象拿破仑。但是,第一,在这方面不应当忘记拿破仑的命运。第二,希特勒象拿破仑不过是小猫象狮子一样,因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只有柏林的希特勒蠢才们才不能了解，被奴役的欧洲人民将起来斗争和举行起义来反对希特勒暴政。在欧洲人民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斗争中，苏联、英国和美国一定会给他们充分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有谁会怀疑呢？

第二，这就是希特勒侵略者的**德国**后方不巩固。当希特勒分子在收拾被凡尔赛条约弄得山河破碎的德国时，他们还能得到为复兴德国的理想所鼓舞的德国人民的支持。但是，在这个任务一经解决，希特勒分子开始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走上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的民族的道路，把欧洲各族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都变为目前德国的仇敌之后，

在德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们反对继续战争,主张消除战争。已持续两年多但还看不到尽头的流血战争，几百万人的牺牲，饥饿,贫困,瘟疫,到处敌视德国人的气氛,希特勒的把苏联人民变成目前德国的仇敌的愚蠢政策，—— 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德国人民转过来反对这个不必要的毁灭性的战争。只有希特勒蠢才们才不能了解，不仅德军的欧洲后方，就连德军的德国后方也是一座即将爆发并把希特勒冒险家埋葬的火山。

最后，这就是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反对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同盟。英国、美国和苏联结成了一个旨在粉碎希特勒帝国主义者及其侵略军的统一阵营，这是事实。现代的战争是摩托战争。谁在摩托产量方面占绝对优势，谁就能赢得战争。如果把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摩托产量加在一起，那么，我们在摩托方面的优势至少是德国的三倍。这就是希特勒强盗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基础之一。

不久以前，有英国代表比弗布鲁克先生和美国代表哈里曼先生参加的三国莫斯科会议[①]，决定不断地支援我国坦克和飞机。大家都知道，根据这个决定我们已经开始得到坦克和飞机。更早以前，英国就供应我国象铝、铅、锡、镍、橡胶这类紧缺物资。如果再加上美国最近决定给苏联十亿美元贷款这一事实，可以肯定地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同盟已经成为现实，它正在为我们共同的解放事业的利益发展着并将继续发展下去。

这些就是决定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因素。

我们的任务

列宁把战争分为两类：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和解放的、正义的

———————————————

① 这次会议于 1941 年 9 月 29 日—10 月 1 日举行。——编者注

战争。

德国人现在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目的是掠夺别国领土和征服别的民族。因此，一切正直的人都应当起来反对德国侵略者这个敌人。

与希特勒德国不同,苏联及其盟国进行的是解放的、正义的战争，目的是把欧洲和苏联被奴役的人民从希特勒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一切正直的人都应当象支援解放者的军队那样支援苏联、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军队。

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的民族这样的战争目的；无论是对欧洲各国的人民和领土，或者是对亚洲各国包括伊朗在内的人民和领土，都是一样。我们首要的目的是，从德国法西斯的压迫下解放我国的领土和我国的人民。

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把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期待我们帮助的斯拉夫民族和欧洲其他被奴役的民族这样的战争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民族进行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斗争，然后让他们完全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安排。绝对不干涉别国人民的内政！

但是，要实现这些目的，就必须粉碎德国侵略者的军事实力，必须一个不剩地消灭为奴役我们祖国而侵入我国的所有德国占领军。

为此,必须使我们的陆海军得到我们举国一致的积极有效的支援；使我国的男女工人和职员在企业中孜孜不息地工作，以供给前线越来越多的坦克、反坦克枪、反坦克炮、飞机、火炮、迫击炮、机枪、步枪和弹药；使我们的男女集体农庄庄员在自己的田地上孜孜不息地工作,以供给前线和国家越来越多的粮食、肉类、工业原料;使我们整个国家和苏联各族人民组成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同我们的陆海军一起为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自由，为消灭德国军队而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

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能够而且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并消灭了德国侵略者，我们才能得到持久的正义的和平。

彻底消灭德国侵略者！

解放在希特勒暴政压迫下呻吟的一切被压迫民族！

苏联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我们的红军和我们的红海军万岁！

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8—36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10—22 页

检阅红军时的演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于莫斯科红场）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工人、集体农庄庄员、智力劳动者同志们，在敌后暂时处在德国强盗铁蹄下的兄弟姊妹们，破坏德国侵略者后方的我们光荣的男女游击队员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同志们！今天是在严重的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的。德国强盗背信弃义的进攻和强加于我们的战争，造成了对我国的威胁。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地区，敌人窜到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口。敌人估计，我们的军队将一触即溃，我们的国家将屈膝投降。可是，敌人大大地失算了。我们的陆海军虽然暂时失利，但是在整个战线上正在英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给敌人以重创，而我们的国家，我们举国上下，却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同我们陆海军一起，共同粉碎德国侵略者。

我们的国家曾经经历过比现在的处境更加严重的日子。请回想一下 1918 年我们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的情形。当时我国四分之三的领土都在外国武装干涉者手中。我们暂时失去了乌克兰、高加索、中亚细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当时我们没有同盟国，我们没有红军(那时我们才刚开始建立红军),我们缺乏粮食，缺乏武器，缺乏服装。当时有 14 个国家围攻我国。可是，我们并没有灰心,并没有丧气。当时我们在战争的烈火中组织了红军，并把我国变成了一座军营。当时，伟大的列宁的精神鼓舞我们为反对武装干涉者而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粉碎了武装干涉者，收复了全部失地，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国的状况要比23年前好得多。现在,我国无论工业、粮食和原料，都比23年前丰富许多倍。我们现在有同盟国，他们同我们一起结成反对德国侵略者的统一战线。我们现在得到陷于希特勒暴政压迫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现在拥有精锐的陆军和精锐的海军，他们正在坚决保卫着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我们无论对于粮食、武器或服装都不感到严重的缺乏。我们全国，我国的各族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的陆海军，帮助他们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匪帮。我们有源源不断的人员后备。现在伟大的列宁的精神和他的胜利旗帜，就象23年前一样，鼓舞着我们去进行卫国战争。

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德国侵略者，这难道可以怀疑吗？

敌人并不象某些惊慌失措的知识分子所形容的那样强大。魔鬼也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可怕。谁能否认，我们红军曾屡次把嚣张一时的德军打得仓皇而逃呢？如果不是根据德国宣传家大肆吹嘘的声明来判断问题,而是根据德国的实际情况来判断问题，那就不难了解，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正面临崩溃。现在饥饿和贫困笼罩着德国，在四个月的战争中,德国已损失士兵450万人,德国血流殆尽,人员后备枯竭,不仅陷于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欧洲各国人民，而且连看不到战争尽头的德国本国人民都充满了愤怒的情绪。德国侵略者正在作垂死挣扎。毫无疑问，德国是不能够长久挣扎下去的。再过几个月，再过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德国一定会由于其罪行累累而崩溃。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

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

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

消灭德国占领军！

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

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37—40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24—26 页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信[①]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

红军在极大地消耗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之后，转入了反攻，迫使德国侵略者西退。

德军为迟滞我军前进而转入了防御，开始构筑设有掩体、障碍物和野战工事的防御地区。德军指望在春季来临之前以此迟滞我军进攻，以便调集兵力在春季重新转入对红军的进攻。可见，德军是想赢得时间，得到喘息。

我军的任务是不给德军这种喘息的机会，不停顿地逼其西退，迫使它在春季到来之前就消耗掉预备队，那时我军将有大量新的预备队，而德军却不再拥有预备队，从而保证在 1942 年彻底粉碎希特勒的军队。

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使我军学会突入敌人的防线，学会组织对敌人防御全纵深的突破，并以此为我军步兵、坦克和骑兵打开前进的道路。现在德军不是只有一道防线，它正在构筑并且不久将要有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如果我军不学会迅速而彻底地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线，我军就无法前进。

是否可以说我军已经学会了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线呢？

可惜还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这样说。至少还远远不是我们所有的集团军都学会了突破敌人的防线。

————————————

① 1974 年 1 月苏联《军事历史》杂志第 1 期《文献和资料》栏刊载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1942 年 1 月 10 日指示信》一文，摘引和评论了斯大林和亚·米·华西列夫斯基联名颁发的这封指示信。本篇是辑录这篇文章中的引文而成的。——编者注

要保证突破敌人防线的全纵深，需要什么呢？

起码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在我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实践中用集中于一个方向的突击集团的行动来代替成一线配置的各个师的行动，第二，必须以炮兵进攻代替所谓的炮火准备。

(1)突击集团的行动。遗憾的是,我军进攻时大多数集团军还没有学会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线。我军通常以沿正面配置成一线的各个师或旅实施进攻。显然，这样组织进攻不会奏效，因为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段都无法形成兵力优势。这样的进攻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当我们在战线的一个地段上建立了对敌军的巨大兵力优势时，进攻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为此，每一个担负突破敌人防御任务的集团军都必须建立突击集团，即在战线的一定地段上集中三四个师实施突击。集团军首长的首要任务即在于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一定的地段上造成决定性的兵力优势和成功地突破敌人的防御。

方面军首长在组织突破和进攻时的任务，同样如此。当然，方面军突击集团的编成不应是几个师，而应是几个集团军，因为方面军范围的突破是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广泛的行动，要求具有比集团军范围的进攻大得多的兵力。

(2)炮兵进攻的组织。在突破敌人防御和组织对敌人的进攻中，炮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集中在某一地段的炮兵有力的、长时间的支援，要突破敌人防御和实施进攻是不可能的。

我们往往在没有炮兵，没有任何炮兵支援的情况下把步兵投入对敌人防线的进攻,然后却抱怨步兵不去对付防御工事里的敌人。显然，这种“进攻”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不是进攻，而是犯罪，是对祖国犯罪，对被迫作出无谓牺牲的军队犯罪。

那么，炮兵应当怎样支援步兵进攻呢？

我们通常把炮兵对步兵的支援理解为进攻前的“炮火准备”。炮兵通常在步兵进攻前半小时、一小时，有时是两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内

进行射击，然后炮兵就停止行动，让步兵进攻，而不顾敌人防御全纵深还没有被破坏，敌人的火炮和机枪发射点还没有被压制。这就叫作“炮火准备”。不难看出，这样的炮兵支援是不充分的，而在这种不充分的支援下所实施的进攻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因此，我军对敌人防御所实施的进攻，尽管经过了“炮火准备”，往往还是力量渐衰，而且为使进攻奏效，还不得不反复进行所谓的“炮火准备”。

由此可见，所谓的”炮火准备”，作为炮兵支援步兵进攻的一种手段，已经不符合战争的要求，已经过时，应当摈弃。

为了使**炮兵支援**有效，从而使步兵进攻奏效，必须抛弃炮火准备的做法，改用炮兵进攻的做法。

这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这意味着炮兵不能局限于进攻前一两个小时的一次行动，而应当同步兵一起进攻，应当在整个进攻期间实施射击，避免长时间的间断，直到敌人防线的全纵深被突破为止。

第二，这意味着步兵不应当象在所谓的“炮火准备”时那样在炮兵停止炮击后发起进攻，而应当在炮兵进攻的同时,在炮火隆隆声中，在炮兵音乐的伴奏下实施进攻。

第三，这意味着炮兵不应当分散行动，而应当集中行动，并且不应当集中在战线的随便什么地方，而应当集中在集团军和方面军的突击集团行动的地域内，并且只能集中在这个地域内，因为没有这个条件炮兵进攻就不可能实施。

我们的任何一个集团军，不论它的炮兵多么少，只要把集团军属炮兵团使用上，再从每师的师属炮兵中各抽调（譬如说）两个连和20—30 门 120 毫米迫击炮，就可以在自己的突击集团行动地域内集中 60—80 门火炮。这样编成的炮兵群完全足以摧毁敌人的防御,从而给集团军突击集团以非常宝贵的炮兵支援。如果我们的集团军不这样做，那是因为它们低估了炮兵密集火力对步兵进攻的重大意义。

我们的任何一个方面军，不论它的炮兵多么少，只要把方面军炮兵预备队使用上，再抽调一些集团军属炮兵团以及哪怕三分之一的师属炮兵,就同样可以在方面军突击集团行动地域内集中150—200门火炮。这样编成的炮兵群完全足以摧毁方面军地域内敌人的防御。如果我们的方面军不这样做，那是因为它们低估了炮兵密集火力对步兵进攻的重大意义。

结论：

(1) 敌人为了迟滞红军前进已转入防御，正在构筑筑垒防线。

(2) 红军不能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它应当进攻，迫使敌人西退。

(3) 为了顺利进攻，我们应当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御。

(4) 为了突入和突破敌人的防御,我们必须学会在集团军地域内，在方面军地域内实施突击集团行动。

(5) 为了使突击集团取得成功，就应当让它们在突破敌人防◇317◇御全纵深时始终得到有力的炮兵支援。

(6) 为了保证步兵得到这样的炮兵支援，就需要抛弃“炮火准备”的做法，改用炮兵进攻的做法。

(7) 为了使炮兵进攻奏效，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员应当把炮兵的主要部分集中到突击集团行动的地域内。

(8) 只有步兵突击集团和大量炮兵的联合行动才能保证进攻取得胜利。

约·斯大林

亚·华西列夫斯基

译自1974年1月《军事历史》杂志
第1期第70-71、72-73、74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6卷第27—30页

“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55号。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我国各族人民是在反对卑鄙无耻地侵犯我们祖国的生存和自由权利的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的严酷日子里，庆祝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的。在从北冰洋到黑海的辽阔战线上，红军和红海军战士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以便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从我国驱逐出去，捍卫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

红军抗击敌人侵略，保卫祖国，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二十四年前建立红军，就是为了同当时力图瓜分我国、使我国丧失独立的外国武装干涉者的侵略军队作斗争。年轻的红军在初次作战时,在1918年2月23日，就在普斯科夫和纳尔瓦附近彻底粉碎了德国侵略者。所以1918年2月23日就成为红军的诞生日。从此以后，红军就在同外国武装干涉者作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它在1918年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捍卫了我们的祖国，把德国侵略者驱逐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它在1919—1921年同协约国军队作战中,捍卫了我们的祖国，把他们驱逐出我们国境。

由于在国内战争中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者，所以苏联各族人民得到了长期的和平和进行和平建设的条件。在这二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和集体农庄农业，繁荣了科学和文化，巩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但是苏联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敌人有可能再来侵犯我们祖国。所以随着工农业和科学文化的高涨，苏联的军事实力

也加强了。这个实力是某些喜欢侵占别国领土的人已经亲身领略过的。嚣张一时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现在正在领略这个实力。

8个月以前，法西斯德国蛮横无耻地破坏了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地进犯我国。敌人估计，红军将一触即溃，并丧失抵抗力。可是敌人大大地失算了。他们没有估计到红军的力量，没有估计到苏联后方的巩固，没有估计到我国各族人民争取胜利的意志，没有估计到法西斯德国的欧洲后方不可靠，最后，也没有估计到法西斯德国及其军队内在的虚弱。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进犯，红军曾被迫退却，放弃一部分苏联领土。但是在退却时,红军消耗了敌人的兵力，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我国各族人民都没有怀疑过，这种退却只是暂时的，敌人一定会被阻止，然后被击溃。

在战争过程中，红军不断汲取了新的活力，补充了人员和技术装备，得到了新的预备队师的加强。于是红军在辽阔战线的重要地段上转入进攻的时机来到了。在短时间内，红军就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在季赫温附近，在克里木和在莫斯科附近，给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在莫斯科附近的激战中，红军击溃了德国法西斯军队，解除了苏联首都被围的威胁。红军击退了莫斯科附近的敌人，并迫使敌人继续向西退却。莫斯科州和图拉州的全部以及暂时被敌人占领的其他州的几十个城市和几百个乡村，都已经从德国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现在德国军队已经没有战争最初几个月里那种由于背信弃义突然进攻所造成的军事优势了。作为德国法西斯军队一种潜力的突然性因素，已经完全消失。于是德国法西斯分子突然进攻所造成的战争条件的不均等状态也就消除了。现在战争的命运不会由突然性这种偶然因素来决定，而要由那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巩固性，军队的士气,师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来决定。

这里必须指出一点：当突然性这个因素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武库中刚一消失，这个军队就濒于覆灭了。德国法西斯分子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无敌的，断言在同红军单独作战时，一定能击溃红军。现在红军是单独对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不但如此，德国法西斯军队还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和芬兰的军队在前线上的直接支援。红军则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支援。然而结果是：嚣张一时的德国军队正在遭受失败，红军却正在取得重大的胜利。德军在红军的强大打击下，正在向西逃窜，人员和技术装备受到巨大损失。他们节节顽抗，力图拖延他们覆灭的日子。但是敌人是徒劳的。现在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军手里，希特勒的这部松散生锈的机器，无论怎样拚命挣扎，也挡不住红军的攻击。不久以后，红军就会以强大的打击，赶走列宁格勒附近的野兽般的敌人，肃清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卡累利阿的城市和乡村中的敌人，解放苏维埃的克里木，那时红旗将重新在整个苏联领土上胜利地飘扬。

但是，如果满足于既得的胜利，以为德军已经不足为患，那就是不可饶恕的目光短浅的表现，那就是苏联人所不应有的虚夸和骄傲。不要忘记，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敌人虽然遭受着失败，但是还没有被粉碎，更没有被彻底消灭。敌人还是强有力的。它将鼓起最后的力量去争取胜利。并且它愈是失败，就愈加凶残。所以我国一分钟也不能放松组织后备力量支援前线的工作。必须使源源不断的新部队开赴前线，打击野兽般的敌人，争取胜利。必须使我们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加倍努力地生产。必须使前线获得日益增多的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机枪、步枪、自动枪和弹药。

这就是红军的力量和威力的主要源泉之一。

但是红军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这一点。

红军的力量首先在于,它进行的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是解放的、正义的卫国战争。红军的任务是解放被德国侵略者占领

的苏联领土，解放遭受德国侵略者压迫的我国城乡的居民，这些居民在战前是自由的，过着人的生活，而现在则遭到压迫和掠夺，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红军还要解放遭受德国法西斯恶魔侮辱和欺凌的我国妇女。试问还有什么能比这种任务更高尚更光荣呢？没有一个德国兵能够说他是进行着正义的战争，因为他不能不看到，他是被迫去为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作战的。德国士兵没有能鼓舞他，能使他引为自豪的高尚光荣的战争目的。相反地，任何一个红军战士都能自豪地说，他是进行着正义的解放战争，进行着捍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战争。红军有鼓舞他们建立功勋的高尚光荣的战争目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卫国战争中，涌现出成千成万为祖国的自由誓死奋战的英雄。

红军的力量就在于此。

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虚弱也就在于此。

有时外国报刊胡说什么红军的目的是要消灭德意志民族和消灭德意志国家。这当然是一种笨拙的谎言和对红军的愚蠢的诬蔑。红军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愚蠢的目的。红军的目的，就是要把德寇驱逐出我国和解放被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占领的苏联领土。解放苏联领土的战争，很可能导致希特勒匪帮的垮台或者覆灭。这种结局我们是欢迎的。可是，如果把希特勒匪帮同德意志民族混为一谈，同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那就很可笑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希特勒之流可以上台下台，而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国家依然存在。

最后，红军的力量在于，它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对于其他民族的种族仇恨，对于德意志民族也是一样；红军是按照各民族，各种族一律平等的精神，按照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精神教育出来的。德国人的种族理论和种族仇恨的实践，使得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成为法西斯德国的敌人。苏联的种族平等理论和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实践，则使得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成为苏联的朋友。

红军的力量就在于此。

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虚弱也就在于此。

有时外国报刊胡说什么苏联人所以仇恨德国人，就因为他们是德国人，红军所以消灭德国士兵，就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就因为仇恨德国的一切，因此红军抓住德国兵就杀掉。这当然是同样的笨拙的谎言和对红军的愚蠢的诬蔑。红军没有种族仇恨心理。它没有这种卑劣情绪，因为它是按照种族平等和尊重其他民族权利的精神教育出来的。此外，还不要忘记，在我国，表现种族仇恨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但是既然德国法西斯侵略军想奴役我们祖国，当他们已经被我军合围而又不肯缴械投降时,红军当然只好消灭他们。红军消灭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想奴役我们祖国。红军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一样，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来消灭奴役自己祖国的匪徒，而不问他们属于哪一个民族。不久以前，在加里宁、克林、苏希尼奇、安德列阿波尔和托罗佩茨等城市，当德军守备部队已经被我军合围时，我军曾建议他们投降并且答应在他们投降后保全他们的生命。可是德军守备部队竟拒绝缴械投降。自然，只好用武力把他们赶走，于是就有不少的德国兵被打死了。战争总是战争。如果德军官兵愿意投降，那么红军就接收他们为俘虏，并保全他们的生命。如果德军官兵拒绝投降，而且还手持武器企图奴役我们祖国，那时红军自然就要消灭他们。请想一想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话吧：“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①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我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希望你们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

① 马·高尔基的这句名言，是他发表在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编者注

红军和红海军万岁！

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列宁的旗帜万岁！

在列宁的旗帜下前进，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41—48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31—36 页

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和取消政治委员制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307号。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于莫斯科市）

关于在红军中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和取消政治委员制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42年10月9日《关于在红军中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和取消政治委员制》的指令，**我命令：**

1．解除各部队、兵团、司令部、军事学校、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各总部和红军其他机关的政治委员以及各分队的政治指导员所担任的职务，任命他们为相应的政治副指挥员（副首长）。

2．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限期一个月在其受权范围内授予政治工作人员以指挥员军衔。

各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在1942年11月15日以前把授予正营级政治干部以上的政治工作人员以指挥员军衔的鉴定材料，通过红军总政治部呈报国防人民委员部。

3，兵团司令员、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更坚决地把有军事素养的政治工作人员提拔到指挥岗位上来，特别是在连长、营长这一环节。

4，各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在本年10月20日以前组织方面军的为期两个月、有学员150—250人的指挥员训练班，以便把最有担任指挥工作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员培养成连长。训练班学员的挑选工作，与红军总政治部配合进行。

5．红军总干部部从今年11月1日起在“射击”训练班中举办

为期两个月的训练班，训练最通晓军事的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便从他们当中培养200名团长和600名营长。训练班学员的挑选工作，由红军总政治部协同总干部部进行。

6．本命令任命的政治副指挥员（副首长）保持原薪。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译自1942年10月10日《真理报》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6卷第46—47页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

（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庆祝我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自从我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以来，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我们即将跨入苏维埃制度存在的下一年，第二十六年。

在十月苏维埃革命的周年庆祝大会上，通常都要把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过去一年的工作作一个总结。现在，我受委托向你们作过去一年，即从去年11月起到今年11月止的工作总结报告。

过去的一段时期，我们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和平建设和为我国前线组织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是领导红军进行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

1.后方的组织工作

在这一时期内，我们领导机关的和平建设工作是，把我们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基地转移到我国东部地区,撤退工人和企业设备，并在新的地区安置起来，扩大播种面积，增加东部地区的秋播地，最后，根本改善我们为前线生产的企业的工作,加强后方的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纪律。应当说，这是我们的管理经济和行政的各人民委员部（其中包括我们的铁路运输）的一项规模巨大，极其困

难，极其复杂的组织工作。但是，困难被克服了。而现在，尽管有战时的一切困难，我们的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作，无疑做得是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军事工厂和同它们协作的企业都忠实地、按时地供给红军以火炮、迫击炮、飞机、坦克、机枪、步枪和弹药。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忠实地、按时地供给居民和红军以粮食，供给我国工业以原料。应当承认，我国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巩固的和有组织的后方。

这一切复杂的组织工作和建设工作,不仅改变了我们国家的面目，并且也改变了后方人们自己的面貌。人们更加振作，不那么松懈，更加遵守纪律，学会了按战时方式工作，认识到自己对祖国，对前线的祖国捍卫者——红军所负的职责。在后方，没有公民责任感的懒散松懈的人日益少了。充满公民责任感的有组织纪律性的人日益多了。

但是，我已说过，过去的一年不仅是和平建设的一年，而且是进行卫国战争反对卑鄙无耻、背信弃义地进攻爱好和平的我国的德国侵略者的一年。

2. 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领导机关的军事活动表现在保障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实施进攻战役和防御战役。在过去的一年里，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冬季时期，红军在打退德军向莫斯科的冲击后，取得了主动权，转入了进攻，驱逐德军，4 个月内,有些地方前进了 400 多公里。第二个时期——夏季时期，德国法西斯军队利用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的机会，调集了他们的一切没有动用的预备队，突破了西南方向的战线，取得了主动权，5 个月内，有些地方前进了约 500 公里。

第一个时期的军事行动，特别是红军在罗斯托夫、图拉、卡卢加地区，在莫斯科附近，在季赫温和列宁格勒附近的胜利的行动，揭示了两个极有意义的事实。第一，这些军事行动表明了，红军及其战斗干部已经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仅能够抵御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攻势，而且能够在野战中粉碎他们，迫使他们后退。第二，这些军事行动表明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尽管非常顽强，但是有着严重的本质上的弱点，这些弱点在对红军有利的某些条件下，会促使德军失败。德军以凯旋式的步伐踏遍了整个欧洲，一举击败了被认为精锐之师的法国军队，只是在我国才遇到了真正的军事抵抗，不仅遇到抵抗，而且在红军打击之下，不得不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后退 400 多公里，在退却途中丢弃了大量的火炮、汽车和弹药，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单用冬季的作战条件，决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苏德战场军事行动的第二个时期显出有利于德国人的转变，主动权转到了德国人手里，德国军队在西南方向突破我军战线，进抵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新罗西斯克、皮亚季戈尔斯克、莫兹多克地区。德国人和他们的盟国利用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的机会，把自己的一切没有动用的预备队都投入战场,并且把它集中于一个方向,即西南方向，在这里造成了巨大的兵力优势，获得了重大的战术胜利。

看来，德国人已经不那么强有力了，不能象去年夏季进攻的头几个月那样，朝南、北、中三个方向同时展开进攻了，但是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在某一个方向组织重大的进攻。

德国法西斯战略家在我国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照外国报纸包括德国报纸的反应来看,可能认为,进攻的主要目的是占领格罗兹尼和巴库的石油区。但是事实完全推翻了这种假设。事实告诉我们，德国人向苏联的石油区方面挺进，并不是主要目的，而是次要目的。

既然如此,那么德国人进攻的主要目的究竟何在呢？主要目的是，从东面迂回莫斯科，切断莫斯科同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后方的联系，然后攻击莫斯科。德国人向南方、向石油区方面挺进的次要目的，不仅是占领石油区，而且与其说是占领石油区，不如说是把我们的主要预备队吸引到南方,削弱莫斯科战线,以便在攻击莫斯科时易于取胜。德军的主要集团现在不在南方，而在奥廖尔和斯大林格勒一带，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不久以前，德国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落到了我们手里。在这个军官身上搜到了一幅地图，上面标明了德军进攻的时间表。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德国人打算在今年 7 月 10 日占顿博里索格列布斯克，7 月 25 日占领斯大林格勒，8 月 10 日占领萨拉托夫,8 月 15 日占领古比雪夫，9 月 10 日占领阿尔扎马斯，9 月 25 日占领巴库。

这个文件完全证实了我们的情报：德国人发动夏季攻势的主要目的是从东面迂回莫斯科和攻击莫斯科；而向南挺进的目的，除了其他的一切以外，就是把我们的预备队远远地引离莫斯科，削弱莫斯科战线，以便易于攻击莫斯科。

简单说来，德国人发动夏季攻势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围莫斯科,在今年结束战争。

去年 11 月,德国人打算以正面突击拿下莫斯科,迫使红军投降,从而结束东方的战争。他们曾经向自己的士兵灌输过这种幻想。但是，大家知道，德国人的这种打算落空了。德国人去年在对莫斯科的正面突击中碰了钉子以后，想在今年通过迂回运动拿下莫斯科，以此结束东方的战争。他们现在正在向自己的被愚弄的士兵灌输这种幻想。大家知道，德国人的这种打算也落空了。德国法西斯战略家原想一箭双雕，既夺得石油，又包围莫斯科，结果却使自己陷于困境。

因此，德国人夏季攻势的战术胜利，由于他们的战略计划显然不

现实，而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 关于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德国人在今年仍然能够把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并且在我国战场上获得了重大的战术胜利，其原因何在呢？

这是因为德国人及其盟国调集了自己的一切没有功用的预备队，把它投入东方战场，并在其中一个方向上造成巨大的兵力优势。毫无疑问，没有这些措施，德国人不可能在我国战场上获得胜利。

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调集自己的一切预备队，并把它投入东方战场呢？因为欧洲没有第二战场，所以他们有可能不冒任何风险地采取这种行动。

这就是说,德国人今年在我国战场上获得战术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欧洲没有第二战场，使他们有可能把一切没有动用的预备队投入我国战场，并且在西南方向上造成巨大的兵力优势。

假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欧洲有第二战场，而且第二战场牵制住譬如说 60 个德国师和 20 个德国盟国师，那德军在我国战场上的处境会怎样呢？不难猜想，他们的处境会是悲惨的。不仅如此，那会是德国法西斯军队末日的开始，因为在那种情形下，红军就不会在现在所在的地方，而会在普斯科夫、明斯克、日托米尔、敖德萨附近一带。这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今年夏天就已经面临崩溃了。而所以没有这样，是因为欧洲没有第二战场这一点挽救了德国人。

让我们从历史上来考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曾不得不在两个战场上作战,在西方战场上主要对英国和法国，在东方战场上对俄军。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存在反对德国的第二战场。在当时德国拥有的 220 个师中，摆在

俄国战场上的不超过85个德国师。如果加上用在俄国战场上的德国盟国的军队，即37个奥匈师、2个保加利亚师和3个土耳其师，那么对付俄军的军队总共为127个师。德国及其盟国的其余的师，主要是用在对付英法军队的战场上，其中一部分担任欧洲被占领区的守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例如今年9月的情形怎样呢？

根据确实可靠的情报，在德国现在拥有的256个师中，摆在我们战场上的不下179个德国师。如果加上22个罗马尼亚师、14个芬兰师、10个意大利师、13个匈牙利师、1个斯洛伐克师和1个西班牙师，那么现在用在我国战场上的军队总共为240个师。德国人及其盟国的其余的师担任被占领国（法国，比利时、挪威、荷兰、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守备，它们中的一部分在利比亚同英国进行争夺埃及的战争，而利比亚战场总共只牵制了4个德国师和11个意大利师。

因而，现在对付我国战场的师不下于240个，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27个，现在对红军作战的德国师是179个，而不是85个。

这就是德国法西斯军队今年夏季在我国战场上获得战术胜利的主要原因和基础。

时常有人拿德国人对我国的侵犯同拿破仑对俄国的侵犯相比。但是这种比较是经不起分析的。在远征俄国的60万军队中,拿破仑带到博罗季诺的不过13—14万。这就是他在莫斯科附近时所能运用的全部军队。而现在我们红军面对的却是300多万用现代战争的一切手段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怎能相比呢？

有时也有人拿德国人对我国的侵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对俄国的进攻相比。但是，这种比较也是经不起分析的。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欧洲第二战场，使德国人的处境非常困难，而在这次战

争中却没有欧洲第二战场。第二，在这次战争中，对付我国战场的軍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多一倍。很明显，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

现在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摆在红军面前的困难该是多么严重，多么罕见，而红军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解放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又是多么伟大。

我想，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经受住德国法西斯强盗及其盟国这伙野兽般的匪帮的这种猛烈攻势。只有我们苏维埃国家，只有我们红军才能经受住这种猛烈攻势。不仅经受住，而且粉碎它。

常有人问，欧洲第二战场究竟是否会开辟。是的，会开辟，早一些或者迟一些，但是会开辟。所以会开辟，不仅因为我们需要它，而且首先因为我们的盟国对它的需要并不亚于我们。我们的盟国不可能不了解，在法国失败以后，没有反对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场，会使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包括各盟国自己在内，都遭到不好的结局。

4. 苏联、英国和美国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战斗联盟

现在已经可以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希特勒德国强加于各国人民的战争的过程中,发生了力量的根本划分,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意德同盟和英苏美同盟。

同样不容争辩的是，这两个对立的同盟遵循着两个不同的对立的行动纲领。

意德同盟的行动纲领，可以由下列几点来说明：种族仇恨；“优等”民族的统治；征服其他民族并侵占它们的领土；经济上奴役被征

服民族并掠夺它们的国民财富；消灭民主自由；普遍建立希特勒制度。

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是：消灭种族的特权；各民族平等和它们的领土不可侵犯；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和恢复其自主权；每一民族有权按自己意志来处理事务；经济上援助遭难的民族，协助它们真正达到物质上的优裕；恢复民主自由；消灭希特勒制度。

意德同盟的行动纲领使得欧洲的一切被占领国 ——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以及苏联的被占领区——燃起了仇恨意德暴政的怒火，极力使德国人及其同盟者遭受损失，并且等待适当的机会为它们现在所受的侮辱和蹂躏向奴役它们的人报仇雪耻。

因此，目前的一个特点是，意德同盟日益孤立，它在欧洲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备力量日益枯竭，它本身日益削弱和瓦解。

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使得欧洲的一切被占领国完全同情这个同盟的成员国，并决心尽力给它们以各种援助。

因此，目前的另一个特点是，这个同盟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备力量在欧洲，而且不仅在欧洲，日益增长，并且在这个同盟的周围有着愈来愈多的千百万同情者，决心同它一起反对希特勒暴政。

如果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观点来考察这两个同盟的力量对比问题，那么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在这方面我们英苏美同盟无疑占着优势。

但是有一个问题：单靠这种优势是否足以获得胜利呢？常有这样的情形，资源很多，但是使用得极不得当，使优势等于零。很明显，除了资源以外，还必须有善于动员这些资源的能力和正确运用这些资源的本领。是否有根据怀疑英苏美同盟中人们具有这样的本领和这样的能力呢？有人怀疑这一点。但是他们根据什么怀疑呢？这个同盟中的人，在动员本国资源和正确地把它们用于经济和文化政治建设方面，曾

经显示了本领和能力。试问有什么根据怀疑这些在动员和分配资源用于经济和文化政治建设方面曾显示了能力和本领的人,现在就没有能力为实现军事目的而进行同样的工作呢？我想这是没有根据的。

有人说，英苏美同盟有一切可能获得胜利，而且肯定会胜利，要是它没有那个能够削弱和腐蚀它的本质上的弱点的话。按照这些人的意见，这个弱点表现在这个同盟是由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不同的成分所组成，这种情况使他们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否认参加英苏美同盟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别，那是可笑的。但是，这是否就排斥这个同盟的成员国为了反对使它们受奴役威胁的共同敌人而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呢？绝对不排斥。况且，已经造成的威胁，无条件地要求同盟的各成员国必须采取共同行动，以拯救人类免于倒退到野蛮时代和残暴的中世纪时代。难道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还不足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组织共同斗争反对希特勒暴政，并取得对它的胜利吗？我认为是完全够的。

这些人的假设所以不正确，还因为它已被过去一年的事件完全推翻。事实上，如果这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英苏美同盟的成员国彼此日益疏远的事实。然而我们不仅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却看到证明英苏美同盟的成员国日益接近和结成为统一的战斗联盟的事实和事件。过去一年的事件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在 1941 年 7 月,德国进攻苏联几星期后，英国同我国订立了《关于共同对德作战》的协定。那时我们同美国还没有就这一点订立任何协定。过了 10 个月以后，1942 年 5 月 26 日，莫洛托夫同志访问英国时，英国同我们订立了《关于在反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帮凶的战争中结成联盟和战后实行合作互助条约》。这个条约的有效期为 20 年。它标志着我国和英国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 1942 年 6 月,莫洛托夫

同志访问美国时，美国同我们签订了《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原则的协定》，这个协定使苏美关系有了一个重大的进步。最后应当指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访问莫斯科,确立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完全的互相谅解。毫无疑问，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苏联、英国和美国日益接近,并结成为反对意德同盟的战斗联盟。

由此可见，事物的逻辑比任何别的逻辑都更加有力。

结论只有一个：英苏美同盟有战胜意德同盟的一切可能，并且毫无疑问一定会取得胜利。

5. 我们的任务

战争撕破了一切帷幕，暴露出了一切关系。情况如此明显，以致在这次战争中要确定我们的任务是再容易不过了。

吃人的希将勒在同土耳其埃尔基勒特将军的谈话（这次谈话发表在土耳其《共和国报》上）中说道；“我们要消灭俄国，使它永远不能再站起来。”看来，很明确，虽然有点蠢笨。我们没有这种消灭德国的任务,因为不可能消灭德国,就象不可能消灭俄国一样。但是，消灭希特勒的国家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当的。

我们第一个任务，正是要消灭希特勒国家及其鼓舞者。

吃人的希特勒在同这位将军的同一次谈话中继续说道：“我们要把战争一直进行到俄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为止。”看来，很明确，虽然无知。我们没有这种消灭德国一切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任务，因为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懂得，这不仅对德国来说，也和对俄国来说一样，是不可能的，而且从胜利者的观点看来也是不适宜的。但是消灭希特勒的军队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当的。

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正是要消灭希特勒的军队及其领导者。

希特勒恶棍把残酷地折磨苏联战俘、成百地屠杀苏联战俘、成千地饿死苏联战俘当作常规。他们蹂躏和屠杀我国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男女老幼,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抱定目的,要奴役或消灭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克里木和高加索的居民。只有那些丧尽天良、行同禽兽的下流败类，才会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人犯下如此的暴行。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他们在欧洲遍设绞架和集中营。他们实行了卑鄙的“人质制度”。他们常因有人妨碍某个德国畜生强奸妇女或抢劫百姓,而把抓来“做人质”的无辜百姓滥肆枪杀和绞死。他们把欧洲变成了各国人民的监狱。而他们竟把这称为 “欧洲新秩序”。我们知道这些暴行的凶犯，“欧洲新秩序”的建设者，所有这些新上任的总督、省长、警备司令和副司令是些什么人。成千上万的受害者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让这些刽子手知道，他们逃不脱对自己罪行所应负的责任，逃不出受害的各国人民的惩罚的手心。

我们的第三个任务，是要消灭这种可恨的“欧洲新秩序”，并严惩其建设者。

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些。

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我们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同我们的盟国共同进行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正在使我们获得对人类的卑鄙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胜利。在这场战争的旗帜上写着：

英苏美战斗联盟的胜利万岁！

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暴政下获得解放万岁！

我们光荣的苏维埃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

消灭万恶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军队和他们的“欧洲新秩序”！

光荣属于我们的红军！

光荣属于我们的海军！

光荣属于我们的男女游击队员！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61—71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49—60 页

关于盟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

——答美联社记者问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卡西迪先生：

对您 11 月 12 日寄来的问题，回答如下：

1．“苏联方面怎样评价盟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

答：苏联方面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卓越事实，它表明盟国武装力量的实力正在增长，并展示了意德同盟不久将崩溃的前景。

非洲的军事行动又一次地驳斥了那些断言英美领导者没有能力组织重大的军事行动的怀疑论者。毫无疑问，只有第一流的组织家才能完成这样重大的战役：经过大洋在北非顺利登陆，迅速占领卡萨布兰卡到布日伊一带港口和广阔地区,巧妙地粉碎西部沙漠上的意德军队。

2．“这次军事行动在减轻对苏联的压力方面有多大的效果以及苏联期待什么样的进一步的援助？”

答：现在来谈这次军事行动在减轻对苏联的直接压力方面有多大效果，为时还早。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效果将是不小的，并且对苏联的压力在最近时期会有一定的减轻。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这里，问题首先在于，由于非洲的战局意味着主动权转到我们盟国手中，欧洲的军事政治状况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有利于英苏美同盟。它破坏轴心国体系中的领导力量希特勒德国的威信，从精神上瓦解希特勒在欧洲的盟国。它使法国摆脱麻木状况振奋起来，动员法国的反希特勒力量，并为组织法国反希特勒军队提供根

据地。它为打垮意大利和孤立希特勒德国创造条件。最后它为在更靠近德国的要害地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创造前提，而这对战胜希特勒暴政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3.“为了加速取得最终的胜利，东方苏联的进攻力量同西方盟国相配合的可能性怎样？”

答：可以不用怀疑，红军会象它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执行了自己的任务那样，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2 年 11 月 13 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82—84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65—66 页

应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最高统帅命令

（第195号，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男女工人、男女农民、智力劳动者同志们！暂时处在德国压迫者铁蹄下的兄弟姊妹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

我国人民是在卫国战争的严酷日子里庆祝“五一”节的。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红军,他们的期望并没有错。苏联军人挺身而起，保卫祖国，捍卫苏联人民的荣誉和独立，已近两年了。

在1942—1943年的冬季战局中，红军使希特勒军队遭受了惨重的失败，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围歼了敌人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两个集团军，俘虏了敌人官兵30多万，从德国人的枷锁下解放了苏联几百个城市和几千个村庄。

冬季战局表明，红军的进攻力量增强了。我军不仅把德国人从他们在1942年夏季占领的领土上赶了出去,而且还收复了许多已被敌人占领约一年半之久的城市和地区。德国人已经没有力量阻止红军的进攻了。

希特勒统帅部甚至为了在哈尔科夫地域一个狭窄的地段上反攻，都不得不从西欧调来30多个新的师。德国人打算在哈尔科夫地域合围苏军,并给我军布置一个“德国人的斯大林格勒”。但是,希特勒统帅部想为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进行报复的企图破产了。

同时，我们盟国战无不胜的军队在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域击溃了意德军队，肃清了这些地域的敌人，现在又在突尼斯地域继续打击敌人，而英勇的英美空军正在对德意军事工业中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开辟反对意德法西斯分子的欧洲第二战场的预告。

这样，自战争以来，红军从东方对敌人的打击与我们盟军从西方对敌人的打击，第一次汇合成为一个总的统一的打击。

所有这一切就从根本上震撼了希特勒的军事机器，改变了世界大战的进程，并创造了战胜希特勒德国的必要前提。

结果，敌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处境严重恶化,开始叫喊军事危机。诚然，敌人竭力用“总”动员的喧嚷来掩盖自己的危局。可是，任何喧嚷也不能抹煞法西靳阵营确实遭受严重危机的事实。

法西斯阵营的危机首先表现在敌人不得不公开放弃自己原来的闪击战方针。现在，在敌人阵营中谈论闪击战已经不时髦了，喧嚣一时的闪击战的侈谈已为持久战不可避免这种沮丧号泣所代替。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以前大吹特吹其闪击战术，现在却抛弃了这个战术，德国法西斯分子现在所吹嘘的已经不是什么他们进行了或准备进行闪击，而是他们如何巧妙地逃出了英军在北非的围击，或苏军在杰米扬斯克地域的合围。法西斯报刊现在登满了夸张的消息，报道德军怎样从前线逃走，怎样避免在东方战场或突尼斯战场某一地段陷入新的斯大林格勒。看来，希特勒的战略家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来夸口了。

其次，法西斯阵营的危机表现在法西斯分子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谈论和平。如果按照外国报刊的消息来判断,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人想在英美背弃苏联的条件下同英美媾和,或者相反,他们想在苏联背弃英美的条件下同苏联媾和。德帝国主义者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之徒，他们厚颜无耻地以己之心度盟国之腹，以为盟国中总有某一个会陷入圈套的。显然，德国人空谈和平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处境

很好。法西斯分子阵营空谈和平，只能说明他们正在遭受严重的危机。可是，同这批血洗欧洲并使欧洲布满绞架的德国法西斯阵营中的帝国主义强盗能谈得上什么和平呢？只有希特勒军队被彻底歼灭和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使欧洲获得和平，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德国法西斯分子空谈和平，岂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覆灭在即了吗？

德意法西斯阵营正遭受严重的危机，濒临覆灭。

当然，这还不是说，希特勒德国的覆灭已经到来了。不是的，不能这样说。希特勒德国及其军队已被震撼了，正在遭受危机，可是他们还未被粉碎。如果认为覆灭会自行到来，那就太天真了。要使希特勒德国的覆灭成为事实，就必须使希特勒军队再遭受两三次像它在最近五六个月中从西方和东方所遭到的这样强大的打击。

因此，苏联人民及其红军，和我们的盟国及其军队一样，还面临着彻底战胜希特勒恶魔的严重和艰苦的斗争。这场斗争需要他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发挥高度的坚忍精神，具有钢铁般的坚定性。他们应当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可能来粉碎敌人，以此来开辟走向和平的道路。

同志们！苏联人民对于自己的红军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决心贡献全部力量,来继续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实力。苏联人民在不到四个月当中，就为红军捐献了 70 多亿卢布。这再一次证明，反对德国的战争，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真正的全民战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勇敢顽强地忍受战争所引起的困苦，在企业和机关中、在运输业中,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努力地工作。可是,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要求红军得到更多的火炮、坦克、飞机、机枪、自动枪、迫击炮、弹药、装备和粮食。这就是说，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全体苏联知识分子都必须为前线加倍努力工作。

我们后方的全体人民和一切机关，都必须象精确的钟表一样，协

调而准确地工作。我们要记住伟大列宁的遗训：**“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应该一切都为了战争，稍有松懈和干劲不足，就应该按照战时法令惩办。”**①

红军为了报答本国人民的信任和关怀，应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毫不留情地歼灭德国侵略者，毫不停歇地把他们赶出苏联国土。战争以来，红军已获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几十万战士已熟练地掌握了手中武器。许多指挥员已学会了在战场上巧妙地指挥军队的本领。但满足于这一点是不恰当的。战士们必须学会出色地掌握手中武器，指挥员必须成为指挥战斗的能手。但是这还不够。在军事上，特别在这种现代化战争中,不能停步不前。在军事上停步不前,就等于落伍。大家知道，落伍的人是会挨打的。因此，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求全体红军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要求红军全体指挥员和战士研究战争经验，学会怎样打胜仗。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

在向你们致敬和祝贺“五一”节时，

我命令：

1.全体战士——步兵、迫击炮手、炮兵、坦克兵、飞行员、工兵、通信兵、骑兵——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准确执行指挥员的命令,准确执行条令和教令的要求,严守纪律，维护组织性和秩序。

2.各兵种的指挥员和合成军队的指挥员成为统率军队的能手，善于组织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和指挥它们作战。要研究敌情，改善军队的耳目——侦察上作，要记住，不这样做就不能准确地打击敌人。要提高军队司令部的工作素养，使红军部队和兵团的司令部成为指挥军队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52页。黑体是斯大林用的。——编者注

的模范机关。要把军队后勤机关的工作提高到现代化战争所要求的水准，要牢记，战斗行动的结局，取决于军队弹药、装备和粮食的供给是否充分和及时。

3.全体红军巩固并发展冬季战斗的胜利，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能让给敌人，准备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决战。在防御中，要发扬我军战士所固有的顽强坚定的精神。在进攻中，要坚决果敢，正确协同，大胆实施战场机动来围歼敌人。

4.男女游击队员给敌人的后勤机关、交通线、军用仓库、司令部和各种企业以强有力的打击，破坏敌人的通信线路。要吸收敌占区内广大苏联人民积极参加解放斗争，从而使苏联公民免被赶到德国去当奴隶，免受希特勒野兽的屠杀。要为我们的妻儿、父母、兄弟姐妹所流的鲜血和眼泪，无情地向德国侵略者报仇。要用一切力量支援红军同卑鄙的希特勒奴役者作斗争。

同志们！

敌人已经尝到了我军歼灭性打击的力量。红军和我们盟军共同打断法西斯野兽脊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

我们英勇的红军万岁！

我们英勇的海军万岁！

我们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消灭德国侵略者！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97—104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6卷第81—85页

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

——答英国路透社首席记者问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金[①]先生：

您要我对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作一答复的请求已收到。现将我的答复寄上。

问：“英国对关于取消共产国际的决议甚有好评。苏联对这一问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未来的影响，看法如何？”

答：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这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

解散共产国际所以正确是因为：

（一）这揭穿了希特勒分子的谎话，说什么“莫斯科”企图干涉别国的生活，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从此以后，这种谎话就彻底破产了。

（二）这揭穿了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敌人的诬蔑，说什么各国共产党似乎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来的命令行事。从此以后，这种诬蔑也彻底破产了。

（三）这便于爱好自由国家的爱国者，把本国的一切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的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四）这便于各国爱国者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联合成统一的

———————————————

① 金当时是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编者注

国际阵营，去同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从而为各民族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扫清道路。

我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将使盟国及其他联合国家的统一战线，在争取战胜希特勒暴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我认为，解散共产国际完全适时是因为，正是现在，当法西斯野兽作最后挣扎的时候，必须组织爱好自由国家的共同进攻，以便打死这只野兽，使各国人民摆脱法西斯的压迫。　　顺致

敬意

约·斯大林

1943 年 5 月 28 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07—108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89—90 页

永远纪念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289号。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于莫斯科市）

1943年2月23日，第56近卫步兵师第254近卫步兵团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争夺**切尔努什基**村战斗的决定性时刻，冲向敌人的土木发射点，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枪眼，牺牲自己，从而保证了进攻分队的胜利。

1943年6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追授近卫军列兵**马特洛索夫**同志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马特洛索夫同志的伟大功勋应该成为全体红军军人发扬军人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榜样。

为了永远纪念苏联英雄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夫·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

我命令：

1．授予第56近卫步兵师第254近卫步兵团以“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第254近卫步兵团”的称号。

2．把苏联英雄、近卫军列兵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马特洛索夫**的名字永远载入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第254近卫团第1连的名册。

国防人民委员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1943年9月11日《真理报》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6卷第95页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

同志们！

今天苏联各族人民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

我国在卫国战争环境中庆祝自己人民革命的纪念日是第三次了。

1941 年 10 月，我们祖国曾处在艰难的日子里。敌人逼近了首都，从陆地上包围了列宁格勒。我们的军队迫不得已曾实行退却。那时要求我军作出巨大的努力，要求人民竭尽全力，以便阻挡敌人，并在莫斯科附近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

到 1942 年 10 月的时候，我们祖国面前的危险更加增大了。当时，敌人离莫斯科不过 120 公里，已经突入了斯大林格勒，进到了高加索山麓。但是，就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我国军民也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韧不拔地经受了一切考验。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来阻挡敌人和回击敌人。他们忠于伟大的列宁的遗训，不惜力量和生命来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大家知道，军队和人民所作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

在去年十月革命节以后不久，我军就转入了进攻，给了德军以新的强大的打击，起初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在高加索、在顿河中游一带，后来，1943 年初，是在大卢基附近、列宁格勒附近、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域。从此以后，红军再没有丧失过主动权。在今年整个夏季中，红军对敌人的打击日益猛烈，它的作战艺术每个月都在提高。从

那时候起，我军不断获得巨大的胜利，德军则接连遭受失败。不管敌人怎样费尽心机,它在苏德战场上仍然没有取得任何稍许重大的胜利。

1.战争进程中根本转折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至二十六周年——是卫国战争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所以是转折的一年，首先因为这一年红军从战争以来第一次对德军实现了夏季大进攻，并且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我军打击下，不得不慌忙放弃其占领的地区，时常靠逃跑来避免合围，把大量的技术装备、成堆的武器和弹药以及大批受伤官兵遗弃在战场上。

因此，这一年下半年我们夏季战局的胜利，是这一年年初我们冬季战局胜利的继续和完成。

现在，当红军发展冬季战局的胜利，在夏季给了德军以强大打击的时候，那种所谓红军不能在夏季实施胜利进攻的神话，可以说是被最終埋葬了。过去这一年表明了，红军在夏季也能够象在冬季一样很好地进攻。

由于进行了这些进攻战役，我军在过去这一年中,且战且进,在中部战线前进了 500 公里，在南部前进了 1300 公里，解放了将近 1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即差不多等于被敌人暂时侵占的苏联国土的三分之二，而且把敌军从弗拉基高加索击退到了赫尔松，从埃利斯塔击退到了克里沃罗格，从斯大林格勒击退到了基辅，从沃罗涅日击退到了戈梅利,从维亚济马和勒热火击退到了奥尔沙和维捷布斯克的接近地。

德军因为不相信自己过去在苏德战场上的胜利稳固可靠，所以长期以来预先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地带，特别是在大的江河一带。可是在今年的战斗中，无论是江河，还是强大的工事，都挽救不了德军。我

军摧毁了德军的防御，而且仅仅在1943年夏季三个月中,就巧妙地强渡了四条很大的江河障碍，即北顿涅茨河、杰斯纳河、索日河和第聂伯河。至于德军在罗斯托夫以西米乌斯河一带和在梅利托波尔附近莫洛奇纳亚河一带的防御这一类障碍，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红军正在第聂伯河以西胜利地打击敌军。

这一年所以是转折的一年，还因为红军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打死和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中许多最有经验的老干部，同时在这一年胜利的进攻战斗中锻炼和增加了自己的干都。过去一年来，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战斗中，损失了400多万官兵，其中被打死的至少有180万人。此外,德军在这一年中,损失了14000多架飞机,25000多辆坦克和不下4万门火炮。

现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已经不是战争开始时那样的军队了。在战争开始时，它有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干部，而现在，德军中掺杂了许多初出茅庐的尚无经验的年轻军官。德国人急急忙忙把他们派往前线,是因为既没有必需的后备军官，又没有时间训练他们。

红军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它的干部成长起来了，并在过去这一年的胜利的进攻战斗中锻炼出来了。它的战斗干部的数量，正在增长，而且会继续增长，因为它有必需的后备军官，使它有时间和可能来训练年轻的军官干部，并把他们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

很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我军当面之敌240个师中有179个是德国师，而今年红军当面之敌257个师中有207个是德国师。德国人大概是打算用增加自己师的数量来补偿其质量的降低。但是，德国人在过去这一年来的失败表明，师的质量变坏，是不能用增加其数量来补偿的。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这两个极重要的事变已预先决定了今年年底以前德军在我国战场上的失败。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结果，合围和消灭了30万德军，俘虏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被围敌军。要想了解斯大林格勒战场上这次空前大激战的规模，就必须知道，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竟收殓和埋葬了147200名战死的德军官兵和 46700名阵亡的苏军官兵。斯大林格勒是德国法西斯军队覆灭的起点。大家知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激战以后已经不能恢复元气了。

至于说到库尔斯克会战，其结果是德国法西斯军队两个主要进攻集团被击溃，我军转入反攻，后来又发展成为红军强大的夏季进攻。库尔斯克会战是从德军南北两面进攻库尔斯克开始的。这是德军想实现其夏季大进攻并在进攻奏效时挽回自己损失的最后一次尝试。大家知道，这次进攻的结果是完全失败了。红军不只是击退了德军的进攻，而且还使自己转入了进攻，同时在夏季实施了一系列连续的突击，把德国法西斯军队赶过了第聂伯河。

如果说斯大林格勒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么，库尔斯克会战就把它推到了覆灭的边缘。

最后，这一年所以是转折的一年，因为红军的胜利进攻使得法西斯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政治状况根本恶化，使它面临极深刻的危机。

德国人曾打算实现今年夏季在苏德战场上的有效进攻，来捞回自己的损失和提高自己在欧洲已经动摇的威信。但是红军推翻了德国人的这种算盘，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自己转入了进攻，迫使德军西退，从而使德军威信扫地。

德国人曾打算采取持久战的方针，开始构筑防线和“壁垒”，同时大肆宣传，说他们的新阵地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在这里红军也推翻了德国人的算盘，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和“壁垒”，继续顺利进攻，不让他们有时间来拖延战争。

德国人曾打算用“总”动员来扭转前线状况。但是事变在这里也

推翻了德国人的算盘。夏季战局已经消耗了“总”动员的三分之二的兵力，但并没有看到,这使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状况有什么改善。也许，还要宣布一次“总”动员。可是没有根据设想，重复这类办法就会使某个国家不走向“总”崩溃。

德国人曾打算紧紧抓住乌克兰，想用乌克兰的农产品来供给自己的军队和居民，用顿巴斯的煤来供给为德军服务的工厂和铁路运输。但是，在这里他们也失算了。由于红军的顺利进攻，德国人不只是失掉了顿巴斯的煤矿，而且还失掉了乌克兰产粮最多的州，并且没有根据设想，他们在最近时期不会失掉乌克兰的其余部分。

很明显，这一切失算，不能不使法西斯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政治状况恶化，而且的确根本恶化了。

法西斯德国正遭受深刻的危机。它已经处在覆灭的边缘。

2. 全民支援前线

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援，没有苏联人在工厂、矿山、运输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忘我劳动，红军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苏联人民在困难的战争条件下，保证自己的军队获得了一切最基本的必需品，不断改进了他们的技术兵器。在整个战争期间，敌人在武器的质量方面从来没有能够超过我军。同时，我国工业给前线生产的技术兵器的数量也愈来愈多。

过去的一年，不仅在军事行动上，而且在我们的后方工作上，也是转折的一年。在我们面前，已经没有把企业撤退到东部和使工业转入军火生产的那种任务了。现在苏联的战时经济已经安排就绪并且迅速发展着。因此人民可以集中全部力量来增产和进一步改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坦克、飞机、火炮和自行火炮。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

的成绩。红军依靠全民的支援，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武器装备，向敌人倾泻了千百万颗炸弹和炮弹，把成千上万的坦克和飞机投入了战斗。完全有理由说，苏联人在后方的忘我的劳动，将同红军的英勇斗争一样，作为人民在保卫祖国中的史无前例的功勋载入史册。

苏联工人在和平建设时期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而在卫国战争时期又展开了紧张的、热火朝天的工作支援前线，在劳动中表现了真正的英雄气概。

大家知道，希特勒分子在反苏战争中，不仅拥有本国的非常发达的工业，而且拥有各附庸国和被占领国的相当强大的工业。然而希特勒分子还是不能保持他们在反苏战争开始时的那种技术兵器数量方面的优势。如果说敌人在坦克、飞机、迫击炮和自动枪数量方面原有的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我军现在对于武器、弹药、装具等不感到严重的不足，那么，这首先应当看作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功劳。

苏联农民在和平建设时期，在集体农庄制度的基础上把落后的农业变成了先进的农业，而在卫国战争时期，他们对于人民的共同利益表现了农村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高度觉悟。他们以忘我的劳动支援前线，这就证明,苏联农民认为目前反对德国人的战争是自己切身的事业,是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的战争。

大家知道，由于大批法西斯军队的突然进犯，我国曾暂时失掉乌克兰、顿河和库班等重要农业区，然而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于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还是没有严重地中断过。当然，如果没有集体农庄制度，没有男女集体农庄庄员的忘我劳动，我们是不能解决这个极端困难的任务的。如果说在战争的第三年里，我们的军队没有感到粮食不足，如果说居民有粮食的供应，而工业有原料的供应，那么，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力量和生命力的表现，是**集体农民**的爱国主义的表现。

我国的运输部门，首先是铁路运输部门，以及内河运输、海上运输和汽车运输部门,在支援前线的事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知道，运输是前线后方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手段。我们可以生产出大批武器和弹药，但是如果没有运输部门及时地运到前线，那么它们就可能成为对于前线毫无用处的东西。应当说，在把武器、弹药、粮食、军服等等及时送上前线的工作中，运输部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尽管存在着战争时期的困难而且缺乏燃料，我们还是把一切必需品供给了前线，那么，必须承认这首先是我国**运输部门的职工**的功劳。

我国知识界在支援前线的事业中也不落后于工人阶级和农民。苏联知识分子忠诚地为我国国防事业工作，不断地改进红军的武器装备以及生产的技术和组织。他们帮助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发展工业和农业，在战争条件下把苏联科学和文化推向前进。

这是**我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苏联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地奋起保卫祖国，正确地认为目前的卫国战争是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的一切劳动者的共同事业。现在连希特勒的政治家们都看到，他们指望苏联各民族分裂和冲突是多么的愚蠢。**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经受了战争的一切困难和考验，在全体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巩固了。

苏联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此。

无论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或是在战争时期，苏联人民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都是列宁的党——布尔什维克党。无论过去和现在，没有哪一个党象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这样的威信。这是很自然的。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争得了自由，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卫国战争时期，党又是我们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全民斗争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党的组织工作把苏联人的一切努力联合在一起，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使我们的一切人力和物力

都服从于粉碎敌人的事业。在战争时期，党同人民更加亲密了，党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我国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此。

目前的战争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著名指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验。战争历史教导说，只有那些在经济的发展和组织方面，在本国军队的经验、技能和士气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的坚定和团结一致方面都胜过敌人的国家，才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我们的国家正是这样的国家。

苏维埃国家从来还没有象现在，在卫国战争第三年，这样巩固和坚定。战争的教训证明，苏维埃制度不仅是和平建设年代组织国家经济文化高涨的最好形式，而且也是战争时期动员人民的全部力量回击敌人的最好形式。26 年前创立的苏维埃政权，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就把我们国家变成了不可摧毁的堡垒。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红军拥有最巩固的和最可靠的后方。

苏联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此。

毫无疑问，苏维埃国家在战争结束后将是一个强大的和更加巩固的国家。德国侵略者破坏和蹂躏我国国土，力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实力。红军的进攻，比以前更大规模地揭露了希特勒军队野蛮的强盗本性。德国人在占领区内屠杀了我国数十万和平居民。德寇像中世纪的蛮族或阿提拉[①]匈奴军一样践踏田野，焚毁城市和乡村，破坏工业企业和文化机关。德国人的暴行说明法西斯侵略者的虚弱，因为只有横行一时但却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会胜利的人，才能干出这种勾当。因此希特勒

———————————————

① 阿提拉是公元 4—5 世纪侵入欧洲的匈奴人所建立的匈奴帝国的国王。在位时，占有里海至波罗的海和莱茵河间广大地区，东、西罗马帝国均被迫纳贡。阿提拉曾率军转战欧洲各地，大肆焚掠杀戮。——编者注

分子的处境愈是无望,他们的掠夺暴行也就愈加猖狂。我国人民决不会饶恕德国恶魔的这些罪行。我们要迫使德国罪犯对于他们的全部暴行负责!

在法西斯匪徒暂时统治过的地区，我们要恢复被破坏的城市和乡村，工业、运输业、农业和文化机关，为从法西斯奴役中拯救出来的苏联人创立正常的生活条件。现在已经在全力恢复我们解放的地区内的经济和文化。但是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从德国占领下解放的地区内彻底消除德国人蹂躏所造成的恶果。这是全体人民的重大任务。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短期内解决这个困难的任务。

3．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法西斯同盟的瓦解

过去的一年，不仅是苏联卫国战争转折的一年，而且是整个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

一年来在军事形势和外交形势上所发生的变化，都有利于苏联和苏联的友好盟国，而不利于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劫掠帮凶。

红军胜利的结果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苏德战场的范围，改变了世界大战的整个进程，并且获得了巨大的国际意义。盟国战胜共同敌人的时刻临近了，而盟国间的关系及其军队的战斗合作，却与敌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和巩固了。不久以前在报纸上发表的苏英美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历史性决定，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联合国家充满了决心来共同打击敌人，这将导致最终战胜敌人。

在这一年中，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打击，曾得到了我们的盟国在北非、地中海区域和意大利南部的战斗行动的支援。同时盟国对

德国的重要工业中心进行了并继续在进行大轰炸，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军事实力。如果加上盟国经常供给我们各种武器和原料这一事实，那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我军夏季战局的胜利。当然，目前盟军在南欧的行动，还不能看作是第二战场。但是这毕竟有些类似第二战场的地方。显然，不久就会在欧洲开辟的真正的第二战场，将大大加速战胜希特勒德国和更加巩固盟国的战斗合作。

因此，过去这一年来的事变表明，反希特勒同盟是各国人民的牢固的联合体，是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挑起了这场战争的希特勒匪帮，把德国及其附庸国引到了绝境。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失败和我们盟军给予意德军队的打击，动摇了法西斯同盟的整个大厦，它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倒塌。

意大利永远脱离了希特勒的同盟。墨索里尼丝毫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势，因为在实质上他是德国人的俘虏。现在轮到同盟的其他参加者了。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特勒的其他附庸国看见德国的军事失败也都灰心丧气，现在已经彻底丧失了战争结局会有利于它们的信心，一心想怎样逃出被希特勒拖下去的泥坑。协同希特勒德国抢劫的帮凶，不久以前还俯首听命于自己的主子，现在，到了要对抢劫负责的时候，就寻找方便的时机，偷偷离开匪帮，溜之大吉。

希特勒同盟参加者加入战争，是预计很快就会获得胜利的。他们早就安排好了：谁吃甜头，谁吃苦头。当然,他们是要叫敌人吃苦头,而自己来吃甜头的。但是现在已经十分明显，德国及其奴仆不但吃不到甜头，而且不得不分吃苦头了。

希特勒的帮凶见势不妙,目前都在绞尽脑汁地想怎样退出战争,以便少吃点苦头。

意大利的例子向希特勒的各附庸国表明，它们同德国人的必不可免的破裂越是拖延下去，让德国人在它们国内横行得越久，它们的国家遭到的蹂躏就越大,它们的人民受苦就越多。意大利的例子还表明，希特勒德国并不想保护自己的附庸国,它只图延缓自己毁灭的时刻,而故意把它们变成毁灭性战争的疆场。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事业已经输定了，它所建立的血腥的“新秩序”正在破产，在欧洲各被占领国中，全民反对法西斯奴役者的义愤的爆发日益增长。德国在其同盟国和中立国中原有的威望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中立国家的联系已经破裂了。

希特勒匪帮叫嚣德国人要统治全世界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人已顾不上统治全世界了，——不求发胖，只图保命。

由此可见，战争的进程证明了，法西斯国家的联盟是始终没有牢固的基础的。希特勒同盟是建立在其参加者进行侵略、抢劫这种意向的基础上的。当希特勒分子在军事上得胜的时候，法西斯同盟还似乎是一个坚固的联合体。可是法西斯军队一遭到失败，就使这个强盗同盟实际上陷于瓦解了。

希特勒德国及其附庸国正处在覆灭的前夜。

随着盟国对希特勒德国的胜利,组织和恢复欧洲各国人民的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问题将提上日程。我国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应当同我们的盟国共同实行：

(1)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欧洲各国人民,并协助他们重建被法西斯奴役者所肢解的自己的民族国家,——法国、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及其他处在德国枷锁下的各国人民，都应当重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人民；

(2)给欧洲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完全的权利和自由,来自行决定

他们的国家制度问题；

(3)采取措施使所有的法西斯罪犯,即挑起这场战争并使各国人民遭受灾难的罪犯，不管他们隐藏在哪一国，都要为他们的一切暴行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制裁；

(4)在欧洲建立一种使德国完全没有可能重新进行侵略的秩序；

(5)在互信互助的基础上建立欧洲各国人民长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来恢复被德国人所破坏的经济和文化。

* * *

在过去的一年里，红军和苏联人民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已取得了在战争中有利于我国的根本转折，而战争现在正走向最好的结局。但是苏联人不应当停留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不应当为自己的胜利所陶醉。如果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了安然自得的情绪，胜利是可能被放走的。没有斗争和努力,就不能获得胜利。胜利要从战斗中取得。现在，胜利很近了。但是，要争得胜利，就必须更加鼓起劲头，必须使整个后方都忘我地进行工作，使前线的红军善于作战和坚决作战。如果我们不利用一切可能来加速消灭敌人，那就是对祖国、对暂时处在法西斯专制下的苏联人、对在德国人压迫下受苦受难的欧洲各国人民犯罪。决不能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因此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来最终消灭敌人。

苏联人民和红军对当前斗争的困难看得很清楚。但是现在已经很明显，我们胜利的时刻快到了。战争已进到了把占领者从苏联国土上完全驱逐出去和消灭法西斯“欧洲新秩序”的阶段。我们完全肃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的敌人，把克里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和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人民，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同志们！

为英苏美战斗联盟的胜利而战！

为把欧洲各国人民从法西斯枷锁下解放出来而战！

为从我们国土上完全驱逐德国恶魔而战！

我们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海军万岁！

我们勇敢的男女游击队员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消灭德国侵略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09—127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96—108 页

关于盟国在法国北部登陆一事

——答《真理报》记者问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三日）

《真理报》记者询问**斯大林同志对盟国登陆兵在法国北部登陆一事作何估计**，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将盟国解放大军攻入法国北部的七天战斗情形作一总结，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盟国登陆部队在广阔范围内强渡拉芒什海峡和在法国北部大举登陆是完全成功的。这无疑是我们盟国的光辉胜利。

不能不承认，这次行动按其计划的周密，规模的宏大和实施的巧妙来说，在战争史上还没有类似的先例。

大家知道，号称“无敌”的拿破仑，当年企图强渡拉芒什海峡和夺取不列颠群岛的计划遭到了可耻的破产。狂人希特勒吹嘘了两年，说他定要强渡拉芒什海峡，结果连实现这种威吓的尝试都没有敢作。只有英美军队才光荣地实现了强渡拉芒什海峡和大举登陆的宏大计划。

这件事将作为一项杰出成就载入史册。

1944 年 6 月 13 日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48—149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124 页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

（在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

同志们！

今天苏联人民庆祝我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二十七周年。

我国在进行反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卫国战争的条件下庆祝苏维埃革命的纪念日，已经是第四次了。

这当然不是说，战争的第四年的总结同战争的前三年没有差别。恰好相反，它们有根本的区别。战争的头两年是德军进攻并向我国腹地推进的两年，红军当时被迫进行防御战；战争的第三年是我国战场上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红军展开了强大的进攻战，在一系列决定性的战斗中击溃了德军,肃清了苏联三分之二的国土上的德军，迫使他们转入防御，并且红军仍然是在没有得到盟国重大支援的情况下单独与德军作战的；而战争的第四年则是苏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取得对德军的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这次被迫在两个战场上作战的德军已被击退到德国边界上去了。

过去一年的结果，是德军被驱逐出苏联、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中部，军事行动转到了德国境内。

1．德国处在两个战场的夹攻中

红军在今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德军被驱逐出苏联国境，这是由

我军还在今年1月就已开始，后来在整个报告年度内展开的对德军的一系列毁灭性打击所早已决定了的。

第一次打击是今年1月我军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附近进行的，当时红军摧毁了德军的永备工事防御，把他们击退到波罗的海沿岸去了。这次打击的结果，是解放了列宁格勒州。

第二次打击是今年2—3月在布格河一带进行的，当时红军击溃了德军，并把他们击退到德涅斯特河对岸。由于这次打击，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

第三次打击是今年4—5月在克里木地域进行的，当时德军被打到黑海里去了。由于这次打击，克里木和敖德萨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

第四次打击是今年6月在卡累利阿地域进行的，当时红军击溃了芬兰军队，解放了维堡和彼得罗扎沃茨克，把芬兰军队打退到芬兰内地。这次打击的结果，是解放了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大部分领土。

第五次对德军的打击是今年6—7月进行的，当时红军在维捷布斯克、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等城市附近彻底击溃了德军，并以在明斯克附近合围德军30个师完成了这次打击。由于这次打击，我军：（一）完全解放了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二）前出到了维斯瓦河，并解放了同我们联盟的波兰的很大一部分领土；（三）前出到了涅曼河，并解放了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四）强渡涅曼河，逼近德国边界。

第六次打击是今年7—8月在乌克兰西部地区进行的，当时红军在利沃夫附近击溃了德军，并把他们击退到桑河和维斯瓦河对岸去了。由于这次打击：（一）解放了乌克兰西部；（二）我军强渡了维斯瓦河，并在维斯瓦河对岸桑多梅日以西建立了大登陆场。

第七次打击是今年8月在基什尼奥夫、雅西地域进行的，当时我军彻底击溃了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在基什尼奥夫附近合围了德军22个师,罗马尼亚师尚未计算在内，以此合围完成了这次打击。由于这次打击：（一）解放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共和国；（二）打垮了德国的盟国罗马尼亚，它已对德国和匈牙利宣战了；（三）打垮了德国的盟国保加利亚，它也对德国宣战了；（四）为我军打通了进入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的道路；（五）使我军能伸出手来援助同我们联盟的南斯拉夫反对德国侵略者。

第八次打击是今年9—10月在波罗的海沿岸进行的，当时红军在塔林和里加附近击溃了德军，并把他们驱逐出波罗的海沿岸。由于这次打击：（一）解放了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二）解放了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三）打垮了德国的盟国芬兰，它已对德国宣战；（四）德军30多个师被切断了同普鲁士的联系,在图库姆斯、利巴瓦地域内陷入夹攻，现正被我军歼灭中。

今年10月,我军在匈牙利境内蒂萨河与多瑙河之间开始了第九次打击，目的是要迫使匈牙利退出战争，并掉过头来反对德国。这次打击还没有结束,但已有如下的结果:（一）我军直接援助同我们联盟的南斯拉夫驱逐德军和解放贝尔格莱德；（二）我军得以越过喀尔巴阡山脉，伸出手来援助同我们联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它的一部分领土已从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

最后，今年10月底，在芬兰北部对德军进行了打击,把德军从佩琴加地域赶走了，我军追击德军，已进入同我们联盟的挪威境内。

我现在不来列举这些战役中敌人被击毙和被俘的数字，以及我军缴获的火炮、坦克、飞机、炮弹、机枪等等的数字。这些数字想必你们已从苏联新闻局的公报中知道了。

这就是红军过去一年进行的主要战役,经过这些战役,德军已被驱

逐出我国国境。

这些战役的结果，德国及其盟国的军队被击溃和打垮的达120个师。去年同我军对阵作战的是257个师,其中德军207个师，而现在，在敌人进行了一切“总”动员和“额外总”动员之后，同我军对阵作战的，总共才有204个德国师和匈牙利师，其中德军不超过180个师。

必须承认，这次战争中的希特勒德国及其法西斯军队，同过去各次战争中的德国及其军队比较起来，是一个更强大、更阴险、更有经验的敌人。而且还必须补充一句，德国人在这次战争中利用了差不多全欧洲的生产力和各附庸国数量相当大的军队。然而，德国尽管有了这些有利的作战条件，仍然落到了必然灭亡的边缘，这只能说是因为德国的主要敌人——苏联在力量上超过了希特勒德国。

过去一年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中的一个新情况，就是红军在今年已不象前几年那样是单独地同德军作战，而是同我们盟国的军队一起共同对德军作战了。德黑兰会议并没有白开。德黑兰会议关于从西东南三个方向共同打击德国的决议已在极其准确地实现。在红军进行苏德战场上夏季各战役的同时，盟军开始攻入法国，并组织了强大的进攻战役，迫使希特勒德国在两个战场上作战。我们盟国的陆海军在法国沿海实施了就其组织程度和范围来说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登陆战役，并巧妙地克服了德军的工事。

于是，德国就陷入两个战场的夹攻之中了。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经不住红军和盟军的共同打击。敌人的抵抗被粉碎了，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就被驱逐出意大利中部、法国、比利时和苏联国境。敌人被击退到了德国边境。

无可怀疑，如果没有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牵制住德军达75个师的话，我军是不能在那样短的期限内粉碎德军的抵抗并把它驱逐出苏联国境的。但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红军今年夏季的强大进攻

战役牵制住德军达200个师的话，我们的盟军是不能如此迅速地打退德军并把它驱逐出意大利中部、法国和比利时国境的。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继续使德国处于两个战场的夹攻之中。

这就是胜利的关键。

2．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勋

红军之所以能顺利完成自己对祖国的职责，把德军驱逐出苏联国土，这是因为我们全国，我国各族人民从后方忘我地支援红军。过去一年中，所有苏联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忘我的工作，以及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领导工作，都是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在过去一年中,工业、农业、运输业获得了新的成就,我国战时经济有了新的高涨。

在战争第四年，我国工厂制造的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和弹药比战争初期要多几倍。在恢复农业方面，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我国收复顿河与库班河一带肥沃田地以后，在解放乌克兰以后，遭到严重损失的我国农业正在迅速恢复。苏联铁路运输部门担负起了其他国家的运输部门未必能够担负得起的重担。这一切都说明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基础较之敌国的经济，有无比的生命力。

十月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给了我国人民和我国军队以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尽管苏维埃国家担负着战争的重担，尽管德军暂时占领了我国经济上极重要的广大地区，然而苏维埃国家在战争进程中，对前线的武器和弹药的供应并没有减少,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现在红军所拥有的坦克、火炮、飞机、不是比德军的少，而是比德军的多。至于说到我们的技术兵器的质量，那要比敌人的优良得多。正

象红军在单独进行的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在军事上战胜了法西斯军队一样，苏联后方的劳动者，在同希特勒德国及其帮凶进行的单独战斗中，也在经济上战胜了敌人。苏联人放弃了许多必需的东西，自觉地忍受物质上的严重困难，以便给前线更多的东西。这次战争中空前未有的困难不但没有摧毁，反而更好地锤炼了苏联人民的钢铁意志和英勇精神。我国人民理应赢得英雄人民的荣誉。

我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他们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建立新的工厂。苏联工人阶级在这次战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劳动功勋。

我国知识分子在技术和文化革新的道路上勇敢前进，卓有成效地向前发展现代科学,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为红军生产武器。苏联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的劳动，对打败敌人作出了极宝贵的贡献。

军队没有现代化的武器,是不能作战和胜利的。可是，没有面包，没有粮食，军队也是不能作战和胜利的。红军在战争的第四年里，由于集体农民的关怀，没有感到缺乏粮食。男女集体农庄庄员供给工人和知识分子以粮食，供给工业以原料，保证为前线制造武器和装备的工厂正常开工。我国集体农民充分认识自己对祖国应尽的义务，积极协助红军取得对敌人的胜利。

苏联妇女和我国光荣的青年在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肩负着劳动的主要重担，他们所建立的史无前例的劳动功勋将永远载入史册。为了祖国的荣誉和独立，苏联妇女和男女青年在劳动战线上表现了英勇精神。他们真正无愧于他们的那些正在保卫祖国，打击德国法西斯恶魔的父亲和儿子、丈夫和兄弟。

苏联人在后方的劳动功勋，同我国军人在前线的不朽战功一样，是来自强烈的、生气勃勃的苏维埃爱国主义。

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力量，就在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基础不是种族偏见或民族主义偏见,而是人民对自己的苏维埃祖国的耿耿忠诚和忠实，以及我国各民族劳动者的兄弟友爱。在苏维埃爱国主义中，各族人民的民族传统是同苏联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切身利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不是分裂我国各民族，恰好相反，是把它们团结成统一的兄弟家庭。应当认为，这就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日益巩固的友谊的基础。同时,苏联各族人民尊重外国人民的权利和独立,一向表示愿意同邻国和平友好相处。应当认为，这就是我国同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联系日益发展和巩固的基础。

苏联人之所以痛恨德国侵略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异族人，而是因为他们使我国人民和所有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遭受了数不清的灾难和痛苦。我国民间历来有句俗话：“并不是因为狼是灰的才打狼，而是因为狼吃了羊。”

德国法西斯分子把仇视人类的种族论选作自己的思想武器，本来是以为，鼓吹兽性的民族主义就可以给德国侵略者统治被奴役的民族造成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前提。可是希特勒分子所实行的种族仇视政策，实际上却成了德国法西斯国家国内虚弱和国际上孤立的根源。种族仇视的思想和政策，是希特勒强盗联盟瓦解的因素之一。起来反对德帝国主义者的,不仅有被奴役的法国、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等国人民，而且还有从前希特勒的附庸国——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希特勒匪帮实行吃人的政策，使得世界各国人民都起来反对德国，而所谓的“优等德意志种族”却遭到了举世的憎恨。

在战争进程中,希特勒分子不仅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而且遭到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已在我国树立起来的一切种族和民族平等的思想，各族人民友爱的思想，完全战胜了希特勒分子的兽性民族主义

和种族仇视的思想。

现在，在卫国战争快要胜利结束的时候，苏联人民的历史作用的全部伟大意义显现出来了。现在大家都承认，苏联人民以自我牺牲的斗争，从法西斯暴徒的铁蹄下拯救了欧洲的文明。这就是苏联人民对人类历史的伟大功勋。

3．反德同盟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和平与安全问题

过去的一年是反德同盟共同事业胜利的一年，苏英美三国人民正是为了这个共同事业而团结成了战斗联盟。这一年是反对希特勒德国的三个主要国家意见一致和行动协调加强的一年。

德黑兰会议关于对德共同行动的决议以及这个决议的光辉实现，是反希特勒同盟战线巩固的鲜明标志之一。历史上关于对共同敌人采取共同行动的大战役计划，很少有象德黑兰会议所拟定的共同打击德国的计划那样，实现得这样完满，这样准确。无可怀疑，如果没有三大国的意见一致和行动协调，德黑兰会议的决议便不能实现得这样完满和准确。而另一方面，德黑兰决议的顺利实现，不会不促进联合国家战线的巩固，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组织战后安全问题的决议，应当认为是联合国家战线巩固的同样鲜明的标志。有人说，三国在某些关于安全的问题上有分歧。分歧当然是有的，而且在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上也还会发生分歧。甚至就是在同一政党的人中间也常发生分歧。而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政党的代表中，就更会发生分歧了。值得惊讶的倒不是有分歧，而是分歧如此之少，而且几乎每次都照例是本着三大国意见一致

和行动协调的精神解决的。问题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这些分歧没有越出三大国一致的利益所容许的范围，以及归根到底都是根据这种一致的利益来解决的。大家知道，我们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有过比较重大的分歧。但是，大家同样知道，这些分歧终于本着完全一致的精神解决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分歧也是这样。这次会议的特点，并不是那里暴露了某些分歧,而是关于安全的问题，有十分之九都在这次会议上本着完全一致的精神解决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决议应当看作是反德同盟战线巩固的鲜明标志之一。

最近在莫斯科同英国政府首脑邱吉尔先生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在友好的气氛和完全一致的精神下进行的谈判，应该认为是联合国家战线巩固的更鲜明的标志。

在整个战争期间，希特勒分子拚命企图离间联合国家，使它们彼此对立，使它们相互猜疑和仇恨，并且使它们互不信任，而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使它们互相斗争，以削弱它们在军事方面的努力。希特勒的政治家们有这种企图是十分自然的。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联合国家在反对希特勒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一致，最大的军事政治胜利莫过于盟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分裂。可是,大家知道，法西斯政治家们想破坏大国联盟的挣扎是如何地枉费心机。这就表明，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

可以不必怀疑，既然民主国家的战斗联盟经受住了三年多的战争的考验，既然这个联盟已经为奋起保卫本国自由和荣誉的各国人民的鲜血所凝结起来，那么，这个联盟更会经受住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考验。

但是，过去的一年不仅是盟国反德战线巩固的一年，而且是这一战线扩大的一年。继意大利之后，德国的其他盟国——芬兰、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也被迫退出了战争，这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必须指出，这些国家不仅退出了战争，而且已同德国决裂，并对德国宣战，从而加入了联合国家战线。这无疑是联合国家反希特勒德国战线的扩大。无可怀疑，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不久也会被打垮。这将意味着希特勒德国在欧洲完全孤立和必然崩溃。

联合国家即将胜利地结束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了。

联合国家将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对于这一点，现在已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了。

赢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就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事业。可是，赢得战争的胜利，还不是说保证了各国人民将来的持久和平和可靠的安全。任务不仅是要在战争中赢得胜利，而且是要使新的侵略和新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是永久不发生，至少也要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

德国失败以后,它当然要在经济方面和军事政治方面被解除武装。但是，如果以为它不会企图恢复自己的实力和进行新的侵略，那就太天真了。谁都知道，德国的头目们现在就已在准备新战争。历史表明，只要有一个二三十年的短时期，德国就可以从失败中复原，恢复自己的实力。有什么办法来防止德国的新侵略，如果战争终于发生了，又有什么办法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加以扑灭，而不让它扩展成为大战呢？

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得特别恰当，是因为历史表明，侵略国是进攻国，它们对于进行新战争通常都比爱好和平的国家有准备，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愿意进行新战争，通常都是很晚才去备战。在这次战争中，侵略国还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已有准备好了的**入侵军队**，而爱好和平的国家甚至连十分象样的保证动员的**掩护军队**都没有，这是事实。象珍珠港“事件”、菲律宾和太平洋其他岛屿的失守、香港和新加坡的失守这样一些不幸的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当时日本这个侵略国比奉行爱好和平政策的英国和美国对战争更有准备。同样地，我们在

战争的第一年就丧失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这种不幸的事实也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当时德国这个侵略国比爱好和平的苏联对战争更有准备。如果说这些事实的发生，是由于日本人和德国人的什么个人品质，由于他们优于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由于他们有什么远见等等，那就太天真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品质，而在于那些希望进行新战争的侵略国，是长期备战并为此不断积聚力量的国家，它们通常都比而且必然比不愿意进行新战争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战争更有准备。这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这也可以说是历史规律性，不估计到这个规律性是危险的。

因此，不能否认，爱好和平的国家将来可能又会被侵略弄得措手不及，当然，如果它们不在现在就制定能够防止侵略的特别办法的话。

总之，有什么办法来防止德国的新侵略,如果战争终于发生了,又有什么办法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加以扑灭，而不让它扩展成为大战呢？

为此，除了完全解除各侵略国的武装以外，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建立一个由爱好和平国家的代表组成的捍卫和平、保障安全的特别组织，并使这个组织的领导机关握有为防止侵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数量的武装力量，责成这个组织在必要时毫不迟延地使用这些武装力量去防止或消灭侵略，并惩办侵略祸首。

这不应当是既没有权力又没有手段来防止侵略的那个可悲的国际联盟的重演；这将是握有捍卫和平和防止新侵略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新的特别全权国际组织。

能不能指望这个国际组织的行动是充分有效的呢？如果担负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主要重担的各大国今后也会本着一致和协调的精神行事，这种行动就将有效。如果违背了这个必要条件，这种行动就不会有效。

* * *

同志们！

苏联人民和红军正在顺利地实现卫国战争进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红军光荣地完成了它的爱国天职，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我们祖国。我们的国土从此永远摆脱了希特勒妖孽。现在红军还有最后一个使命：就是同我们盟国的军队一起完成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事业，把法西斯野兽打死在它自己的洞穴里，在柏林上空升起胜利的旗帜。有根据指望红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光荣的海军万岁！

强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2年版第152—169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6卷第128—139页

关于《军事思想》和《军事通报》杂志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8号。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于莫斯科市）

《军事思想》杂志，从内容来看，不符合交给它的任务，即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问题，增进红军军官和将军的军事知识。

《军事思想》杂志对于战争、战略学和战役学、俄国名将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遗产等问题研究得不够，就是说，它正好忽略了它应该研究的基本问题。

该杂志国外栏或者是完全没有，或者是向读者介绍国外作者的文章而对其中不正确的甚至有害的观点也不加批判。

该杂志没有辟书评和图书介绍栏。

《军事思想》杂志编辑委员会不胜任交给它的任务，特别是因为它的许多成员都在前线，实际上没有参加编辑部的工作。

该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没有给杂志以应有的领导，也没有组织起能给红军创办一本有权威的指导性杂志的作者队伍。

《军事通报》杂志没有根据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对现代战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军事通报》杂志很少介绍外国军队的战术和武器装备问题。

为了改进《军事思想》和《军事通报》两杂志的内容，提高它们在研究军事理论、增进红军军官军事知识和教育红军军官方面的作用，——

我命令：

1.《军事思想》杂志作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每月出版一期，篇幅是6个印张，发行15000份。

该杂志的总的领导，由总参谋长担任。

《军事思想》杂志的基本任务规定如下：

研究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问题；

研究战争、武装力量建设、战略学和战役学等基本问题；

研究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合成军队指挥员的训练问题；

研究俄国名将和卓越军事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遗产；

介绍和批判外国军事权威的观点；

研究外国军队及其战斗经验。

该杂志辟下列固定的专栏：军事历史栏，外国军事消息栏，书评和图书介绍栏。

该杂志的阅读对象为师级和师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2.《军事通报》杂志作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全军杂志，每月出版两期，篇幅是3个印张，发行5万份。

该杂志的总的领导，由红军步兵总监担任。

《军事通报》杂志的基本任务规定如下：

根据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来阐明现代战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诸兵种协同动作、战术训练和射击训练以及军人教育等问题；

介绍外国军队的编制、战术、武器装备和战斗经验。

该杂志辟下列固定的专栏；书评和图书介绍栏，军官文化生活栏，问题解答栏。

该杂志的阅读对象为团长以下的军官（包括团长在内）。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苏 联 元 帅 约·斯大林

译自《布尔什维克报刊资料汇编》
1945年第2版第2册第361—362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6卷第149—150页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最高统帅命令

（第20号。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同志们！

苏联劳动者们！

今天我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今年，我们祖国各族人民是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的情况下庆祝“五一”节的。

红军在莫斯科附近和列宁格勒附近、在格罗兹尼附近和斯大林格勒附近抗击敌军的艰苦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的战无不胜的军队正在德国中部，在越过柏林很远的地方，在易北河一带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在一个短时期内，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领土、奥地利很大一部分领土以及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都已解放了。

同时，红军占领了德帝国主义的巢穴东普鲁士，占领了波美拉尼亚，占领了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德国首都柏林的主要区域，在柏林上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

由于红军进行这些进攻战斗，德军在3—4个月内，就有80多万官兵被俘，约100万官兵被打死。在这期间，红军部队缴获和击毁了敌人的飞机达6000架，坦克和自行火炮达12000辆，野战炮23000余门，以及大量其他种类的武器和装备。

应当指出，在这些战斗中，和红军并肩向共同敌人进行有效进攻的，有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师。

由于红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德国统帅部不得不抽调几十个师到苏德战场上来，从而使其他战场的整个整个的地段完全空虚。这种情况有助于我们盟国的军队在西方展开有效的进攻。于是我们盟国的军队和红军就得以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打击德军，把德军分割成了两个相互隔绝的部分，使我军和盟军连接成了一条战线。

无可怀疑，这种情况标志着希特勒德国的灭亡。

希特勒德国的末日快到了。它的大部分领土已被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占领。德国已丧失了最重要的地区。留在希特勒分子手中的工业已不能供给德军以充分的武器、弹药和燃料。德军的人员后备已经耗尽。如果不算它的盟国日本，德国已经完全孤立,已经孤独无援了。

希特勒冒险家们为了找寻摆脱绝境的出路，用尽各种诡计，直到向盟国献媚，力图在盟国阵营中制造不和。希特勒分子的这些新的狡诈诡计，一定会完全破产。这些诡计只能加速德军的崩溃。

骗人的法西斯宣传使用种种胡言乱语来恐吓德国人民，说什么联合国家軍队要灭绝德国人民。联合国家的任务并不是消灭德国人民。联合国家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严惩战争罪犯，并迫使德国人赔偿他们使其他国家遭到的损失。但是，只要德国和平居民忠诚执行盟国军事当局的要求，联合国家并不触犯而且也不会触犯他们。

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辉煌胜利，表明红军有强大的威力和高超的作战艺术。在战争进程中，我们祖国锻炼出了一支能够保卫我国人民的伟大社会主义成果和保障苏联国家利益的头等基干军队。

虽然苏联进行耗费极大的规模空前的战争已将近 4 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却在巩固和发展，各解放区遭到德国侵略者掠夺和破坏的经济正在顺利而迅速地恢复。这是我国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联知识分子、妇女和青年在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鼓舞和指引下英勇努力的结

果。

德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了。希特勒德国的崩溃已指日可待。自命为世界统治者的希特勒头目们的一切幻想都已落空。身受致命重伤的法西斯野兽已经奄奄一息。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要彻底打死法西斯野兽。

红军和海军军人们！

现在正在向希特勒巢穴作最后一次冲击。你们要在结束战争的最后战斗中，树立作战技巧和勇敢的新榜样，你们要更猛烈地打击敌人，巧妙地突破敌人防御，追击并合围德国侵略者，不让他们喘息，直到他们停止抵抗为止。

你们是在祖国国土以外作战，要特别警惕！

你们要同从前一样高度地保持苏联军人的荣誉和尊严！

苏联劳动者们！

你们要用顽强的和孜孜不息的劳动来加强对前线的全面支援。要迅速医治我国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要更加加强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实力！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同志们！

苏联劳动者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五一”节！

为了庆祝红军在前线获得的历史性胜利，以及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在后方取得的伟大成绩，为了庆祝国际劳动节，

我命令：

今天，5 月 1 日,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巴库、第比利斯、埃里温、阿什哈巴德、塔什干、斯大林纳巴德、阿拉木图、伏龙芝、彼得罗扎沃茨克、基什尼奥夫、维尔纽斯、里加、

塔林，以及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齐鸣礼炮20响。

我们强大的苏维埃祖国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万岁！

战无不胜的红军和海军万岁！

在争取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为彻底粉碎希特勒德国，前进！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年版第187—191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16卷第155—158页

为战胜德国法西斯——

告　人　民　书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

同志们，男女同胞们！

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法西斯德国被迫向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屈膝，承认自己已经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5 月 7 日，在兰斯签订了投降的初步议定书。5 月 8 日，德军统帅部的代表在柏林，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面前，签署了最终投降书，投降书自 5 月 8 日 24 时开始执行。

我们深知德国头目们的豺狼癖性，他们素来把条约和协定看成一纸空文，所以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话。但是，今天从早晨起，德军为了履行投降书，已开始大批向我军缴械投降。这已经不是纸上空文。这是德国武装力量的真正投降了。的确，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批德军仍然不肯投降。但我相信，红军会使他们觉醒过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声明，彻底击败德国的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国人民取得对德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日子来到了。

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的紧张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终了。

从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伟大旗帜，将飘扬在欧洲上空。

三年前，希特勒公开宣称，肢解苏联，把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其他地区从苏联割裂出去是他的任务。他直截了当地声明：“我们要消灭俄国，使它永远不能再站起来。”这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希特勒的妄想本来就不能实现，战争的进程更把它打得粉碎。实际结果与希特勒分子的梦话正好相反。德国被彻底打败了。德军正在投降。苏联获得了胜利，虽然它既不打算肢解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

同志们！伟大卫国战争的结果是我们完全胜利了。欧洲的战争时期结束了。和平发展时期开始了。

我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胜利！

光荣属于保卫了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赢得对敌胜利的我们的英勇的红军！

光荣属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

在同敌人作战中牺牲了的、为了我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92—194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159—160 页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最后再一次举杯。

我想举杯祝我们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健康。

我喝这杯酒，首先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

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我们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

我举杯祝俄罗斯人民健康，不仅因为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而且因为他们有清晰的头脑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耐性。

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 1941-1942 年曾经历过危急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那时离开这些地方，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是旁的人民，他们也许会对政府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请走开吧，我们要另立一个能同德国媾和并保障我们的安宁的政府。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政府的政策正确,而甘愿承受牺牲,以保证把德国击溃。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成了我们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感谢俄罗斯人民的这种信任！

祝俄罗斯人民健康！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196—197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第 184 页

在克里姆林宫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时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你们别以为我要讲一些什么不平凡的话。我的祝词是最普通的，最平常的。我想为那些头衔小、名位不足称道的人的健康干杯。为那些被认为是伟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人干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大家，元帅们和方面军、集团军的司令员们，说得粗俗一点，就一文不值。只要有一个“螺丝钉”坏了，就都完了。我举杯祝贺那些普通的、平凡的、质朴的人们,祝贺那些使我们的伟大国家机器在科学、经济和军事各个部门都能积极活动起来的“螺丝钉”。他们的人数非常多，他们的名字数不胜数，因为这是几千万人。这是些质朴的人。关于他们谁也没有写过什么，他们没有名位，头衔很小，但是，他们就象基础支持着顶端那样支持着我们。我为这些人，我们的可敬的同志们的健康干杯！

译自1945年6月27日《真理报》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6卷第167页

为战胜日本法西斯——

告　人　民　书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同志们！

男女同胞们！

今天，9 月 2 日，日本的政府代表和军事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在海陆两方面已被彻底击败，四面八方被联合国家的武装力量所包围，它承认自己已被战败而放下了武器。

在这次世界大战前夜，形成了世界法西斯主义和世界侵略势力的两个策源地：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它们。使人类和人类文明濒于毁灭的是它们。西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在四个月前已被消灭，结果是德国被迫投降。过了四个月，东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也被消灭，结果是德国的主要盟国日本也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可以说，为奠定全世界和平所必需的条件已经赢得了。

应当指出，日本侵略者不仅使我们的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受到了损失。他们也使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 1904 年日俄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 1904 年 2 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就利用沙皇政府的虚弱，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地域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

的形势。它果然击毁了俄国三艘头等军舰。值得注意的是,37 年以后,日本又对美国丝毫不差地重复使用了这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它在 1941 年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这个国家好几艘战列舰。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俄国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岛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通向大洋的一切出口——进而也封锁了通向苏联堪察加半岛和苏联楚科奇半岛各港口的一切出口。显然,日本是想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夺去。

可是,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不止于此。1918 年,当我国已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后,日本又利用当时英、法、美对苏维埃国家的敌对态度,依靠它们来侵犯我国,占领了远东,蹂躏我国人民,掠夺苏联远东达 4 年之久。

不仅如此。1938 年日本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①]附近的哈桑湖地域侵犯我国,目的是要包围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域,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②]一带进犯,企图冲进苏联领土,截断我国西伯利亚铁道干线,并把远东从俄国割裂出去。

诚然,日本在哈桑湖与哈勒欣河地域的进攻被苏军粉碎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耻辱。1918—1922 年日本的武装干涉也被顺利地粉碎,日本占领者从我国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1904 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 40 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

——————————————

① 即海参崴。——编者注

② 即哈拉哈河。——编者注

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

为了胜利，我们苏联人民没有吝惜过力量和劳动。我们经受了艰苦的岁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胜利了。从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祖国已经摆脱了西方德国入侵和东方日本入侵的威胁。盼望已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到来了。

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伟大的胜利，祝贺战争的胜利结束，祝贺全世界和平的到来!

光荣属于取得对日胜利的苏、美、中、英武装力量!

光荣属于保卫了我们祖国的荣誉和尊严的我国远东部队和太平洋舰队!

光荣属于我国伟大的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

在争取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胜利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译自《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1952 年版第 203-206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16 卷[①]第 172—174 页

————————————

① 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同英国首相丘吉尔、艾德礼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的通信，以及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三次会议的记录、文件，见新编《斯大林全集》第 17、18、19 卷，此处从略。——本书编者注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同志们！

从上届最高苏维埃选举到现在，已经 8 年了。这是一个富有极重大事件的时期。前 4 年是苏联人民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紧张工作的年份。后 4 年包括了同德国侵略者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战争的事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变。战争无疑是过去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情。

如果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偶然发生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国务活动家犯了错误而发生的，那就不正确了，虽然错误确实是有过的。其实，这次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的。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

如果这些国家能根据它们的经济实力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那也许能避免战祸。但是这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危机的结果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危机的结果就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当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说，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要知道，主要的法西斯国家，即德日意三国，在侵犯同盟国之前，就把自己国内最后一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消灭净尽，在自己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蹂躏了各小国的主权和自由发展原则，宣布侵占他国领土是自己的国策，并公开声明他们要取得世界霸权，要在全世界推行法西斯制度，而且轴心国又以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中部地区的事实，表明他们决心把奴役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这种口头威胁变成现实。因此，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它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民主自由。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能加强——并且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苏美英以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而这个同盟后来在粉碎轴心国武装力量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就是这样。

现在，大概谁都承认：这次战争确实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各国人民生活中的一种偶然现象；它实际上成了各国人民为保护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战争，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是一场速决的闪击战。

对于我国说来，这次战争是我们祖国历史上最残酷最艰苦的战争。

但是这次战争并不只是一件可诅咒的事情。它同时又是考验和检查人民一切力量的伟大学校。这次战争暴露了后方和前线的一切真情实况，无情地揭掉了遮住各个国家、各国政府以及各个政党真面目的种种掩盖物，使它们不戴面具、毫无粉饰地登上舞台，显露出它们的所有短处和长处。这次战争可以说是对我们苏维埃制度，对我们国家，

对我们政府以及对我们共产党举行了一次考试，对他们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好像是对我们说：看吧，这就是你们的人和组织，这就是他们的活动和经历，——请仔细查看查看他们，并按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以报偿吧。

这就是这次战争的好处之一。

这个情况，对我们选民说来，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和客观地评价党及其人物的活动，并作出正确的结论。要是在别的时期，就必须研究和分析党的代表人物的演说和报告，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两相对照，作出总结等等。这就需要进行一番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并且还不能担保这中间不犯什么错误。现在却是另一种情形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而战争本身已经检查了我们各个组织和领导人的工作并且作出了总结。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弄清楚并做出正确的结论，就容易得多了。

那么，战争的总结究竟怎样呢？

这里有一个主要的总结，所有其他的总结，都是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作出来的。这个总结就是，战争的结局是敌人失败，而我国和我们的盟国得胜。我们以彻底打败敌人结束了战争，——这就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总结。但是这个总结太一般了，所以我们决不能以此为限。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打败敌人，这就意味着争得了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这毕竟还是一个一般的总结，我们也就不能满足于这一点。为了认识我们这次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就要更具体地来考察这个问题。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认识我们这次所取得的对敌人的胜利，从我国内部力量的状况和发展来看，这次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

大家知道，在外国报刊上有人不止一次地断言，说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试验”，说苏维埃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没有根基，是肃反委员会机关强加于人民的一座“纸牌搭的小房子”，说只要有人从外面稍微推一下，这座“纸牌搭的小房子”就会完全倒塌。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次战争驳倒了外国报刊上这一切毫无根据的断语。战争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是从人民中间生长起来并受到人民极力拥护的真正的人民的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有充分生命力的和稳固的社会组织形式。

不仅如此，现在所讲的已经不是苏维埃社会制度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因为经过这次战争的明显的教训以后，任何一个抱怀疑态度的人都不敢再怀疑苏维埃社会制度的生命力了。现在所讲的是，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雄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

第二，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制度，我们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经住了战争的一切考验，证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

大家知道，外国报界的著名人士不止一次地声称，说苏维埃多民族国家是一个“人工造成而不合实际的建筑物”，说一旦发生某种麻烦，苏维埃联盟的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苏维埃联盟一定会遭到奥匈帝国那样的命运。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次战争驳倒了外国报刊上这些毫无根据的议论。战争表明，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制度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它在战争时期更加巩固了，证明它是具有充分生命力的国家制度。这些先生不懂得，拿我们的国家和奥匈帝国相提并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在挑起民族间的猜忌和敌视的那种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苏维埃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相反，它培植着我国各族人民相互友爱和兄弟般合

作的感情。

不过，经过这次战争的教训以后，这些先生再也不敢否认苏维埃国家制度的生命力了。现在所讲的已经不是苏维埃国家制度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因为它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现在所讲的是，苏维埃国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苏维埃国家制度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

第三，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苏维埃的武装力量，是我们的红军，它以英雄的气概经受了战争的一切艰难困苦，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军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现在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一致承认红军胜任自己所担负的伟大使命。但是在五六年以前，也就是在战争前夜，却不是这种情形。大家知道，当时外国报界的许多著名人士和外国许多公认的军事权威都不止一次声言，说红军的状况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说红军装备差，而且没有真正的指挥人员；说红军士气低得不成样子；说红军也许适于防御，但是决不适于进攻；说红军一遭到德军打击，就会像“泥足巨人”一样坍塌。这种议论不仅在德国有，而且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也有。

现在我们可以说，战争驳倒了这些毫无根据的可笑的议论。战争表明，红军并不是“泥足巨人”，而是拥有完全现代化的装备、非常老练的指挥人员以及优良的精神素质和战斗素质的现代头等军队。不要忘记，正是红军彻底粉碎了不久前还使欧洲各国军队胆战心惊的德国军队。

应当指出，这些评论红军的“批评家”愈来愈少了。不但如此，目前外国报刊上出现了愈来愈多的评论，赞扬红军的优良素质，赞扬红军的战士和指挥员的技能，赞扬红军战略、战术十分完善等等。这是很自然的。既然红军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附近，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附近，在基辅和基洛夫格勒附近，在明斯克和博布鲁伊斯克

附近，在列宁格勒和塔林附近，在雅西和利沃夫附近，在维斯瓦河和涅曼河畔，在多瑙河和奥得河畔，在维也纳和柏林附近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当然也就不能不承认红军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头等军队了。

我们就是这样来具体地认识我国这次取得的对敌人的胜利的。

这次战争的总结，基本上就是这样。

假如以为不必预先使全国作好积极防御的准备，就能够获得这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那就错了。假如以为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在 3—4 年以内就能够作好这种准备，那同样是错误的。假如以为我们获得胜利只是由于我国军队勇敢，那就更加错误了。没有勇敢精神，固然不能获得胜利。但是单靠勇敢精神，也还打败不了军队众多、装备优良、军官训练有素和供应良好的敌人。要能经住这样一种敌人的打击，并且给以回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那么除了我国军队那种无比的勇敢精神以外，还必须有完全现代化的并且是数量充足的装备，以及组织得很好的并且也是数量充足的供应。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备，而且是在数量上充分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制造武器、装具和企业设备用的**金属**，维持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用的**燃料**，制作军服用的**棉花**以及供给军队的**粮食**。

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已经拥有为基本上满足这些需要所绝对必需的物质条件呢？我认为是可以这样肯定地说的。为了准备这一宏伟的事业，必须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三个五年计划。正是这三个五年计划帮助我们创造了这些物质条件。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在 1940 年，我国在这方面的情形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比 1913 年要好几倍。

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拥有怎样的物质条件呢？

为了帮助你们弄清这点，我现在把共产党在使我国做好积极防御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简略地报告一下。

如果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1940年的材料来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1913年的材料比较一下，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在1913年，我国生产了422万吨**生铁**，423万吨**钢**，2900万吨**煤**，900万吨**石油**，2160万吨**商品谷物**，74万吨**籽棉**。

这就是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拥有的物质条件。

这就是旧俄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至于说到1940年，那么，我国在这一年里生产了1500万吨**生铁**，即几乎等于1913年的4倍；1830万吨**钢**，即等于1913年的4.5倍；16600万吨**煤**，即等于1913年的5.5倍；3100万吨**石油**，即等于1913年的3.5倍；3830万吨**商品谷物**，即比1913年多1700万吨；270万吨**籽棉**，即等于1913年的3.5倍。

这就是我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拥有的物质条件。

这就是苏联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可见，差别是极大的。

生产上这样一种空前的增长，决不能认为是国家由落后达到进步的一种简单平常的发展。这是使我们祖国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一个飞跃。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在这个时期以前，我们必须恢复被破坏的工业，医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如果同时还注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四年完成的，而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在第四年度就被战争打断了的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

不能不承认，实现这样宏伟的事业，十三年的时间是一个非常短的期限。

其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当时这些数字一公布，就引起外国报刊纷纷议论。朋友们认为是出现了“奇迹”，而不怀好意的人却说五

年计划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肃反委员会的把戏”。但是，既然世界上根本没有奇迹，而肃反委员会又不是那样神通广大，竟能把社会发展的规律取消，于是，国外的“舆论”也就只好承认事实了。

共产党是依靠什么政策来保证我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创造这些物质条件的呢？

首先，就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

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流入重工业，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是可以克服的。在这方面，工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大大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迅速地聚集资金，并使它流入重工业。

毫无疑问，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在这样短的期间把我国变成工业国。

其次，就是依靠了农业集体化政策。

为了消灭我国农业方面的落后状况，并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更多的棉花等等，必须由小农经济过渡到大经济，因为只有大经济才

能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并提供更多的商品产品。但是，大经济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是集体的。共产党决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而且因为这条道路需要有一个过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先要使农民破产，使他们变成雇农。因此，共产党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走上了把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以扩大农业规模的道路。结果表明，集体化的方法是最进步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并不要让农民破产，而特别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几年以内就使全国各地布满了能够采用新技术、利用农艺上的一切成就和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产品的巨大集体农庄。

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集体化政策,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消灭我国农业历来落后的状况。

不能说，党的政策没有遇到过抵制。不但那些始终厌弃一切新事物的落后的人，而且党内有许多著名的党员，也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托洛茨基派和右派所干的一切反党阴谋诡计，他们在暗中破坏我国政府的措施这方面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保持着领导力量的地位。毫无疑问，共产党如果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那就不能坚持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

共产党是不是正确利用了这样造成的物质条件，来发展军工生产并供给红军必需的装备呢？

我认为它做到了这点，并且做得极有成效。

如果不算战争的第一年，当时工业由于往东撤退而阻碍了军工生产的发展，那么，党在战争其余三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使它不仅能供

给前线足够数量的火炮、机枪、步枪、飞机、坦克和弹药，而且还有了储备。同时，大家知道，我们的装备在质量上，不仅不亚于德国，而且一般说来，甚至超过了它。

大家知道，我国的坦克工业在战争的后三年，每年平均生产了3万多辆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车。

其次，大家知道，我国的航空工业在同一时期，每年生产了将近4万架飞机。

大家还知道，我们的枪炮工业在同一时期，每年生产了将近12万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将近45万挺轻重机枪，300多万枝步枪，以及约200万枝自动枪。

最后，大家知道，我们的迫击炮工业在1942—1944年期间，每年平均生产了将近10万门迫击炮。

自然，我们同时生产了相应数量的炮弹、各种迫击炮弹、航空炸弹，以及步枪和机枪子弹。

大家知道，例如，单是在1944年内就生产了24000多万颗炮弹、炸弹和迫击炮弹，74亿发子弹。

红军的武器和弹药的供给情形火体上就是如此。

可见，这种情况同我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供给情况是不相同的，当时前线经常缺乏火炮和炮弹，军队作战没有坦克和飞机，三个士兵用一枝步枪。

至于说到红军的粮食和军服的供给，谁都知道，前线在这方面不仅一点也不缺乏，甚至还有必要的储备。

我国共产党在战前和战时的工作情况就是如此。

现在我来稍微谈谈共产党在最近将来的工作计划。大家知道，这一计划已在最近期间就要批准的新的五年计划中载明。新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我国遭受战祸的区域恢复起来，使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较大地超过这个水平。至于最近期间就将废除配给制

就更不用说了，将来要特别注意扩大日用品生产，用不断降低所有商品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广泛建设各种科研机构，使科学能够发挥它的力量。

我不怀疑，如果我们对我国的科学家们给以应有的帮助，他们在最近期间就不仅会赶上，而且会超过国外科学的成就。

至于较长时期的计划，党打算造成国民经济的蓬勃的新高涨，使我们能够把我国工业水平提高到，譬如说，战前水平的 3 倍。我们必须使我国工业每年能生产生铁达 5000 万吨，钢达 6000 万吨，煤达 5 亿吨，石油达 6000 万吨。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这大概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些。但这是可能做到的，而且也是我们应当做到的。

这就是我关于我国共产党不久以前的活动以及它将来的工作计划的一个简短报告。

你们的任务就是来裁判一下：共产党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正确到什么程度，它能不能做得更好些。

据说，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①]，对他们不应批评，不应检查。这话不对。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批评和检查。这不仅对事业有补益，而且对胜利者本人也有补益，这样就会少骄傲一点，多谦逊一点。我认为选举运动就是选民对作为执政党的我国共产党进行裁判的法庭。选举结果便是选民的判决。如果我国共产党害怕批评和检查，那它就没有多大价值了。共产党愿意接受选民的判决。

——————————————

① “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这句话出自一则俄国故事：据说俄军名将亚·瓦·苏沃洛夫 1773 年在俄土战争中违反彼·亚·鲁勉采夫元帅的命令进攻图尔图凯获胜，因此被交付军事法庭裁判。叶卡捷琳娜二世得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编者注

在竞选时，共产党并不是单独活动。它是和非党人士结成联盟进行选举的。从前，共产党员对非党人士和无党无派是有点不信任的。这是因为当时各种资产阶级团体在选民面前假若不戴起假面具，便很不利，所以它们往往用无党无派的旗子来掩饰。从前就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一个叫作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壁垒把非党人士和资产阶级隔开了。这个壁垒同时又把非党人士和共产党员联合成为一个由**苏维埃人**所组成的共同的集体。他们生活在共同集体里，一起为加强我国实力而斗争，一起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尊严而流血战斗，一起锻造并锻造出了我国对敌人的胜利。他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一些人入了党，而另一些人没有入党罢了。但这是形式上的区别。重要的是两者都在创造一个共同的事业。因此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联盟是一件自然而至为重要的事情。

最后，请允许我对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提出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你们可以不必怀疑，我一定竭力不辜负你们的信任。

译自《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54 年版第 10—24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 20 卷第 3—14 页

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八周年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第8号。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于莫斯科市）

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今天，我们庆祝红军建军二十八周年。

红军是在其力量全盛的时候，是在战胜了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而誉满天下的时候，迎来二十八周年的。红军在经过长期严酷的战争之后，已经成了一支具有优良的精神素质和战斗素质，拥有完全现代化的装备和经验丰富、久经锻炼的指挥人员的头等军队。

在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战争中，红军胜任自己所担负的伟大使命，证明自己是苏维埃国家利益的忠实可靠的保卫者。我们的战士、军官和将军没有辜负人民的信任，光荣地完成了祖国所赋予的职责。苏联人从亲身的体验中确信，红军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国各族人民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军队，为自己军队的胜利而自豪，并将永远铭记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

红军所以取得如此卓越的胜利，首先因为它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它保卫人民的利益。苏联人热爱自己的军队，并经常关心加强这支军队的实力。这种关心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表现得格外明显。为了前线，为了胜利，我国全体人民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如果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忘我劳动，如果没有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援，红军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

其次，红军所以取得胜利还因为有共产党对它的关怀和教育。

苏联人民遵照伟大列宁的遗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祖国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而为红军战胜敌人创造了一切必要的物质条件。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年代里，共产党把我们国家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把人民和军队的全部力量引向一个总的目标——歼灭敌人。共产党向苏联军人阐明战争的意义和目的，教育他们热爱祖国，提高他们的士气，培养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纪律观念。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战争胜利结束后，苏联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平的经济发展阶段。现在，苏联人民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在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之后，继续前进，争取新的经济高涨。我们不能仅仅巩固这些阵地，因为这会使我们停滞不前。我们要继续前进，为国民经济新的更大的高涨创造条件。我们要在最短期限内医治好敌人给我国所造成的创伤，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的发展水平，以便在最近期间大大超过这一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并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

在新的条件下，红军要警惕地保卫苏联人民的和平建设劳动，可靠地保障苏联的国家利益，确保我们祖国的边界不受敌人侵犯。

在战争时期，红军战士、军官和将军的主要任务是夺取胜利，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和知识去彻底粉碎敌人。在和平时期，全体战士、军官和将军的首要任务则是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知识。全体红军战士和军士要刻苦学习军事，熟练手中武器，圆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军官善于训练和教育部属。在战争年代，红军的军官和将军出色地掌握了在战场上统率军队的本领；现在，所有的军官和将军应当娴熟地掌握在和平环境里训练和教育军队的本领。

伟大卫国战争使军事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战场上取得的战斗经验，对于军队的训练和教育來说，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因此，整个军队训练应当以善于汲取以往这场战争的经验为基础。这一经验同样必须全面地应用于军官的理论教育以及进一步发展苏联军事科学。应当记住，军事在不断地、迅速地发展着。红军应当不仅跟上军事的发展，而且推动它前进。

红军拥有头等的武器装备，这是它的战斗实力的基础。任务就在于要精通这些武器装备，熟练地掌握它，并像爱护服珠一样地爱护它。

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军人秩序，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就不可能取得成绩，因此，维护纪律和秩序是军队全体人员首要的职责。维护纪律和秩序的骨干，首先应当是我军各级指挥干部，包括军士长和军士——红军战士最直接的首长和教育者。

红军的战士、军官和将军为人民、为祖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是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或贪图安逸。不居功骄傲，在各自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把全部力量和知识贡献给红军的建设，这就是对每个苏联军人的要求。

红军和红海军的战士、军士、军官和将军同志们！

我代表苏联政府和我们的共产党向你们致敬，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二十八周年。

为了庆祝红军节，**我命令：**

今天，2 月 23 日，在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在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齐鸣礼炮 20 响。

我们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我们战无不胜的海军万岁！

我们光荣的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强大的祖国万岁！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苏 联 大 元 帅　　约·斯大林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 年)》1952 年版第 43—46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 20 卷第 15—17 页

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尊敬的拉辛同志：

您 1 月 30 日关于克劳塞维茨的信和您的论战争和军事学术的简短提纲收到了。

（1）您问，列宁评价克劳塞维茨的原理是否已经过时了？

据我看，问题提得不对。

这样提出问题，可能使人以为，列宁分析过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和军事著作，对它们作出了军事上的评价，并遗留给我们一系列我们应当遵循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指导原理。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因为列宁关于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及其著作的这样一些“原理”，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列宁和恩格斯不同，他并不认为自己精通军事。不仅在过去，在十月革命以前，而且后来在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到国内战争结束时，他都不认为自己精通军事。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曾责成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会内的年轻同志“周密地研究军事”。至于说到他自己，他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他研究军事已经晚了。实际上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在自己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和对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的评论中没有涉及纯粹的军事问题，诸如：军事战略和战术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进攻和退却之间、防御和反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等等。

既然如此，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列宁对克劳塞维茨感到兴趣，列宁又为什么要赞扬他呢？

列宁赞扬克劳塞维茨，首先是因为当时已享有军事问题权威声誉

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战争同政治有直接的联系，政治产生战争，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再一次揭穿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其他人的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①]。

其次，列宁赞扬克劳塞维茨，是因为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正确的原理：在某些不利的条件下，退却是和进攻同样合理的斗争形式。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再一次揭穿那些不承认退却是合理的斗争形式的“左派”共产主义者[②]。

可见，列宁不是作为一个军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对待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的，列宁感兴趣的是克劳塞维茨著作中的那些说明战争同政治的联系的问题。

所以，在批判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这件事情上，列宁没有任何指示束缚住我们这些列宁的继承者，限制我们的批评自由。

由此可见，您把美舍利亚科夫同志批评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的论文（见1945年《军事思想》第6—7期）估计为“反列宁主义的攻击”，估计为对列宁所作评价的“修正”，都是文不对题的。

（2）我们是不是应当根据事情的实质来批判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呢？是的，应当。我们必须从我们事业的利益和现代军事科学的观点出发，不仅批判克劳塞维茨，而且批判毛奇、施利芬、鲁登道夫、凯特尔和德国军事思想的其他代表人物。近30年来，德国曾两次把流血最多的战争强加于世界，而两次它都被打败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这是不是说明，不仅整个德国，而且连它的军事思想也是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5、284页和第24卷第368—339页以及其他各页。——编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27卷第306—307页。——编者注

经不起考验的？无疑是这样的。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的军人，包括我们俄国军人在内，曾如何尊重德国的军事权威。是否必须消除这种不应有的尊重呢？必须消除。为此就需要批判，特别需要我们方面，即德国的战胜者方面的批判。

至于说到克劳塞维茨个人，他当然是过时了的军事权威。实际上，克劳塞维茨是战争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代表，然而现在我们是处在战争的**机器**时代。毫无疑问，机器时代需要新的军事思想家。现在还到克劳塞维茨那里去求教，那就可笑了，

不对那些著名权威人士的过时了的原理和见解进行批判的分析，就不能进步，就不能推进科学。不仅对于军事权威人士是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是如此。恩格斯有一次说过，在 1812 年时期的俄国统帅中，巴克莱-德-托利将军是唯一值得注意的一个统帅[①]。当然，恩格斯是错了，因为库图佐夫作为统帅来说，无可争辩地要比巴克莱-德-托利高明得多。但就在我们这时代，也可能有人口沫飞溅地坚持恩格斯这一错误的见解。

我们在进行批判时，不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个别原理和见解，而应遵循列宁当年所作的著名指示：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沦，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 卷第 492 页）[②]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92—93 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03 页。——编者注

我们对待军事权威人士，更必须采取这样的态度。

（3）至于说到您的论战争和军事学术的简短提纲，因为它是概略性的，所以我只能提出一般的意见。提纲里哲学和抽象原理太多。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语法和逻辑的术语听起来刺耳。关于军事科学的党性问题提得太粗浅。那些对斯大林的过分的歌颂也非常刺耳——简直使人读不下去。提纲里缺少**论反攻**（不要同反冲击混为一谈）的部分。我所说的反攻是指在敌人进行了顺利的、但没有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进攻以后进行的反攻，在敌人进攻期间，防御方面聚集力量，转入反攻，并使敌人遭受决定性的失败。我认为，组织得好的反攻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进攻类型。您是个历史学家，似应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古代的安息国人就已经懂得这样的反攻了，当时安息国人曾引诱罗马的统帅克拉苏及其军队深入本国腹地，然后转入反攻，并消灭了他们。我们的天才统帅库图佐夫也很懂得这一点，他用准备周密的反攻，打垮了拿破仑和他的军队。

约·斯大林

1946 年 2 月 23 日

译自 1947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
第 3 期第 6—8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20 卷第 18—21 页

就邱吉尔先生的演说
答《真理报》记者问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

问：您怎样评价邱吉尔先生最近在美国发表的演说？

答：我认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

问：是否可以认为，邱吉尔先生的演说会损害和平和安全的事业？

答：无疑是的。实际上，邱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而且邱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

应当指出，邱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希特勒干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宣布只有讲德语的人才是最优秀的民族。邱吉尔先生干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也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硬说只有讲英语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负有决定世界命运的使命。德国的种族论使希特勒及其同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德国人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应当统治其他民族。英国的种族论也会使邱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得出这样的结论：讲英语的民族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实际上，邱吉尔先生和他在英国和美国的朋友，向不讲英语的民族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东西：自愿承认我们的统治吧，只有这样才能万事大吉，否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各民族在五年残酷的战争中流血牺牲，是为了本国的自由和独立，而不是为了以邱吉尔之流的统治来代替希特勒之流的统治。

因此，完全可以设想，那些不讲英语的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是不会同意接受新的奴隶制度的。

邱吉尔先生的悲剧就在于他这个死硬派托利党人，不懂得这一普通而明显的真理。

毫无疑问，邱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即号召同苏联开战。同样明显的是，邱吉尔先生的这种方针是同现有的英苏同盟条约不相容的。诚然，邱吉尔先生为了混淆视听，顺便地说到苏英互助合作条约的期限完全可以延长到50年。但是邱吉尔先生的这种声明和他的反苏战争方针，和他的反苏战争宣传，怎么可以相容呢？很明显，这两个东西是绝不相容的。如果邱吉尔先生一方面号召进行反苏战争，同时认为有可能把英苏条约的期限延长到50年，那就是说他把这一条约看成了一纸空文，他之所以需要它只是为了用它来掩盖和粉饰他自己的反苏方针。因此，不可认真地对待邱吉尔先生在英国的朋友们的虚伪声明，说要把苏英条约期限延长到50年或更多年。如果一方破坏条约并把它变成一纸空文，那么把条约期限延长是没有意义的。

问：在邱吉尔先生的演说中；有一部分是攻击那些和我国相邻的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批评这些国家与苏联之间建立的睦邻关系的，您怎样评价邱吉尔先生演说的这一部分呢？

答：邱吉尔先生演说的这一部分，是诽谤成分、粗鲁和毫无分寸的成分混合起来的。

邱吉尔先生硬说：“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城市和这些城市区域的居民，都是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以内，并且他们不仅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置于苏联的影响之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服从于日益增强的莫斯科的控制。”邱吉尔先生把这一切说成是所谓苏联无限制的“扩张倾向”。

用不着特别费力，就可以说明邱吉尔先生在这里是蛮横无礼地诽谤莫斯科和上述的苏联邻邦。

第一，说维也纳和柏林完全受苏联的控制，这是十分荒谬的，在维也纳和柏林都设有四国代表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苏联只占四分之一的票数。有时有些人不能不造谣诽谤，可是总应当有个限度。

第二，不要忘记以下的情况。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由于德国的侵犯而在同德国人作战中，以及由于德国的占领和苏联人被赶到德国去做苦工，苏联便永远地丧失了约700万人。换句话说，苏联所损失的人要比英美两国损失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好几倍。可能在某些地方有人想忘记苏联人民为保证把欧洲从希特勒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作出的巨大牺牲，但是，苏联是不会忘记这些牺牲的。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呢？假使没有发疯的话，那怎么会把苏联这些和平的愿望看作是扩张倾向呢？

其次，邱吉尔先生硬说，“处在俄国人统治下的波兰政府，被鼓励对德国进行巨大的非正义的侵犯。”

在这里，完全是粗暴的和侮辱性的诽谤。现在的民主波兰是由一些杰出的人物领导的。他们事实上证明了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祖国的利益和尊严，而这是他们前任所做不到的。邱吉尔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现在的波兰领导者可以容许任何外国代表在自己国家内实行“统治”呢？邱吉尔先生在这里所以诽谤“俄国人”，难道不是企图在波兰和苏联关系方面散播纠纷的种子吗？

邱吉尔先生不满意波兰使自己的政策转变到与苏联友好和建立同盟关系方面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波兰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主要的成分是冲突和矛盾。这种情况使邱吉尔先生之类的国务活动家有可

能玩弄这些矛盾，在保护波兰不受俄国人侵犯的借口下，把波兰抓到自己手里，用俄国和波兰发生战争的怪影来吓唬俄国，而保持自己仲裁者的地位。但是，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因为波兰与俄国的相互敌视关系，已被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代替，波兰，现在的民主波兰再也不愿成为外国人手里的玩物。我觉得正是这一情况便得邱吉尔先生大发脾气，使得他粗鲁地、毫无分寸地攻击波兰。不让他再坐收渔利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至于说到邱吉尔先生因为波兰收回过去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而扩大了波兰西部边界，所以攻击苏联，那么，在这里我觉得他显然是颠倒是非。大家知道，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是在三大国柏林会议上根据波兰的要求通过的。苏联曾屡次声明，它认为波兰的要求是正当的和正义的。很有可能，邱吉尔先生不满意这一决定。可是，当邱吉尔先生不惜用毒箭反对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时，他为什么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决定是柏林会议一致通过的，以及投票赞成这一决定的不仅有俄国人，而且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一事实呢？邱吉尔先生为什么要混淆人们的视听呢？

再其次，邱吉尔先生硬说：“原来在所有这些东欧国家中无足轻重的共产党，已获得了大大超过其党员人数的非凡势力，力图到处建立极权控制，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内，警察政府都占上风，直到现在，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在这些国家里没有任何真正的民主。”

大家知道，现今在英国管理国家的是一个政党——工党，而且在野党都没有参加英国政府的权利。这就是邱吉尔先生所谓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在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都是由几个政党——四个到六个政党组成的联盟来管理国家，而且，如果反对派是比较诚实的，就保证有参加政府的权利。这就是邱吉尔先生所谓的极权主义、暴政和警察制度。为什么？有什么根据？不要期待邱吉尔先生能够回答。邱吉尔先生不懂得，他关于极权主义、暴政和警

察制度的叫嚣，使他陷于多么可笑的境地。

邱吉尔先生希望波兰由索森科夫斯基和安德斯管理，南斯拉夫由米哈伊洛维奇和巴维利奇管理，罗马尼亚由什蒂尔贝伊公爵和拉德斯库管理，匈牙利和奥地利由哈布斯堡王朝的某一个国王来管理，如此等等。邱吉尔先生想使我们相信，这些替法西斯看家的老爷们能保证“真正的民主主义”。邱吉尔先生的“民主主义”就是这样的。

当邱吉尔先生谈到共产党影响在东欧日益增长时，他是在接近真理。可是还须指出，他说的不完全确实。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在东欧增长起来，而且几乎在欧洲一切以前被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或者被德国、意大利、匈牙利侵占过的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苏联等），都增长起来了。

不能认为共产党人的影响的增长是偶然的，这完全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共产党人的影响之所以增长，是因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欧洲的艰难年代里，共产党人是反对法西斯制度，争取各国人民自由的可靠的、勇敢的、奋不顾身的战士。邱吉尔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有时候也提到“出身并不高贵的普通人”，并且老爷式地拍拍他们的肩膀，假装是他们的朋友。可是，这些人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普普通通。他们这些“普通人”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政策，他们也知道如何保卫自己。正是他们，千百万这样的“普通人”，把票投给工党，而使邱告尔先生和他的党在英国落选了。正是他们，千百万这样的“普通人”，孤立了欧洲反动派，孤立了主张同法西斯主义合作的人，而支持左派的民主政党。正是他们，千百万这样的“普通人”，在斗争和反抗法西斯的烈火中考验了共产党人，认定共产党人是完全值得人民信任的。共产党人在欧洲的影响，就是这样增长起来的。历史发展规律就是这样。

当然邱吉尔先生不喜欢事变这样发展，他正在敲起警钟，诉诸于

武力。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也不喜欢在俄国出现苏维埃制度。他当时也曾敲过警钟，组织过“14 国”讨伐俄国的进军，目的是想使历史车轮往后倒退。但是，结果是历史比邱吉尔的干涉更强大有力，邱吉尔先生的唐·吉诃德式的行为，使他当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我不知道，邱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否能够组织新的进军来讨伐“东欧”。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组织起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千百万“普通人”都在保卫和平事业——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像 26 年前一样被击败。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 年)》
1952 年版第 47—55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20 卷第 25—30 页

原子弹是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的

——答《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
亚历山大·沃斯先生问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书面提出的问题）

问：现在全世界都在不负责任地纷纷谈论“新战争”的危险，您是否相信有这种实际危险呢？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存在，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来防止战争呢？

答：我不相信“新战争”的实际危险。

现在发出“新战争”叫嚣的，主要是军界和政界的情报人员和他们在文官中的为数不多的拥护者。他们所以需要这种叫嚣，至少是为了：（一）用战争的怪影来恐吓他们的缔约伙伴中的某些天真的政治家，以便帮助自己的政府从缔约伙伴那里获取更多的让步；（二）使本国在一个时期内难以缩减军事预算；（三）阻止军队复员，并以此来预防本国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

必须把现时所进行的“新战争”叫嚣，同目前并不存在的“新战争”实际危险严格区别开来。

问：您是否认为英国和美国在有意识地对苏联造成“资本主义包围”？

答：我不认为英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能够“对苏联”造成“资本主义包围”，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的话，但是这一点我不能够断言。

问：用华莱士先生最近演说中的话来说，英国、西欧和美国是否可以相信苏联的对德国的政策不会变成俄国人图谋反对西欧的工具？

答：我认为苏联利用德国反对西欧和美国是不会有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不会有的事情，不仅因为苏联同英法之间有反对德国侵略的互

助条约，同美国之间有三大国波茨坦会议决议，而且因为这种利用德国反对西欧和美国的政策违背苏联根本的民族利益。

简单地说，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在于使德国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我想，德国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是确立巩固的持久和平的最重要保证之一。

问：有人说西欧共产党的政策是“由莫斯科指使的”，您对这种指责有什么意见？

答：我认为这种指责是荒谬的，是从破产了的希特勒—戈培尔武库中借来的。

问：尽管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您是否相信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有长期友好合作的可能性，是否相信华莱士演说中说到的两种制度间的“友好竞赛”？

答：我无条件地相信。

问：据我了解，当工党代表团在这里时，您曾表示相信苏联和英国之间有可能建立友好关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建立英国广大人民群众所热烈盼望的这种友好关系呢？

答：我确实相信苏联和英国之间能够建立友好关系。加强两国之间政治，贸易和文化的联系，将大大促进这种关系的建立。

问：您是否认为全部美军最迅速地从中国撤退，是未来的和平所迫切需要的？

答：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

问：您是否认为美国在事实上垄断原子弹是对和平的主要威胁之一？

答：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活动家爱那么说的那样厉害。原子弹是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的，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当然，垄断原子弹秘密会造成威胁，但是对付这点至少有两种办法：（一）对原子弹的垄断

不会继续很久；（二）原子弹的使用将被禁止。

问：就苏联而言，您是否认为，当苏联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时，它同外部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会减少？“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是否可能？

答：我不怀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

“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6年)》
1952年版第68—70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20卷第35—37页

和美国共和党人士
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记录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史塔生说，他感谢斯大林的接见。他史塔生请求接见，是为了向作为国家元首的斯大林表示敬意。他史塔生已完成其周游欧洲各国的有趣旅行，旅行时他对各国战后经济状况特别关心。照他史塔生的意见，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各国人民的繁荣有重大意义。苏美之间的关系，在战时曾经有过重大意义，今后也将有重大的意义。他史塔生了解到苏美两国经济制度是不同的。苏联的经济建筑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它的发展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美国存在的是私人资本的自由经济。他史塔生很想知道斯大林是否认为这两种经济制度能在战后在同一世界内共同生活和彼此合作。

斯大林回答说，这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既然是谈它们的合作，它们彼此的差别也就没有重大的意义。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之间却发生了战争。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它们彼此并未作战，而且在战时还相互合作。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这里当然是指，如果有合作的愿望，那么，尽管经济制度不同，合作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合作的愿望，那么，即使是经济制度相同，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会打起来的。

史塔生说，合作的愿望当然有很大的意义，但过去在战前，两国都有人在各种不同的讲话中说不能合作，在战前，斯大林本人也谈过这一点。但是，他史塔生想知道，斯大林是否认为由于战争事件，由

于德日法西斯轴心的失败，形势已经改变，现在如果有合作愿望，则苏美之间即可望合作。

斯大林回答说，他决不可能说过两种不同的制度不能合作。关于两种制度合作的思想，是列宁首先提出的。斯大林说，列宁是我们的导师，我们苏联人则是列宁的学生。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违背列宁的指示。可能他斯大林曾经说过：一种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不愿合作，但这是指愿望这方面而言，而不是指合作的可能性方面。至于合作的可能性，他斯大林所持的是列宁的观点：两种经济制度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合乎愿望的。同样，讲到苏联的人民和共产党的合作愿望，那他们是有这种愿望的。这种合作无疑只会对两国有益处。

史塔生回答说，这是很显然的。他所提到的那些话，是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1937年全会上说的。在这些话中所谈的是“资本主义包围”以及“垄断的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从今天斯大林的话中，他史塔生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现在日本和德国失败以后，形势已经改变了。

斯大林说，在共产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或任何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他斯大林都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过两种制度不可能合作。他斯大林说过存在着资本主义包围和进攻苏联的危险。如果一方不愿合作，这就是说，存在着进攻的威胁。的确，德国不愿意同苏联合作，就进攻了苏联。苏联能不能同德国合作呢？苏联能够同德国合作，但德国人不愿意合作。否则，苏联就会像同其他任何国家合作一样，同德国合作了。可见，这是指愿望方面而言，而不是指合作的可能性方面而言。

应当把合作的可能性同合作的愿望区别开来。合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但合作的愿望却不是始终都有的。如果一方不愿意合作，那结果就会发生冲突、战争。

史塔生说，愿望应该是相互的。

斯大林回答说，他应当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俄国人是有合作愿望的。

史塔生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一点，并且说他想谈谈斯大林关于美国同德国经济制度相同的说法。他应当说，当德国发动战争时，美国同德国的经济制度是彼此不同的。

斯大林不同意这一点，并说，美国与德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不同的，但是在经济制度上却没有差别。政治制度是暂时的政治的因素。

史塔生说，曾有很多文章大谈其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垄断，帝国主义以及压迫工人等祸害。照他史塔生的意见，在美国，防止了资本主义的垄断倾向和帝国主义倾向的发展，而且美国的工人享受到的投票权，比马克思或恩格斯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得多。美国的经济制度同当时希特勒德国所存在的经济制度的差别就在这里。

斯大林说，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他们不能预见到他们逝世 40 年以后会发生的事情。

有人把苏维埃制度称为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而苏联人则称美国的制度为垄断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始彼此谩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那就不能得到合作。应该从存在着人民所赞同的两种制度的历史事实出发。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合作。

至于醉心于批评垄断和极权主义，那是进行宣传，而他斯大林并不是一个宣传家，而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斯大林说，我们不应该成为宗派主义者。当人民希望改变制度时，他们就会把它改变的。当他

斯大林同罗斯福会晤并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他和罗斯福都没有彼此漫骂为垄断者或极权主义者。这就大大有助于他和罗斯福建立相互的合作，并赢得了对敌的胜利。

史塔生说，双方自战争结束以来的这类批评，是造成误解的原因之一。他史塔生想知道，如果苏联同美国建立了合作，斯大林是否希望将来更广泛地交换思想、学生、教师、艺术家和旅行者。

斯大林回答说，如果建立了合作，那必然会如此的。商品的交换会引起人的交换。

史塔生说，过去苏联同美国产生误解，是因为苏联方面不愿意交换思想，这表现在对外国记者从莫斯科发出的报道实行检查上面。例如，拒绝准许《纽约先驱论坛报》派记者驻莫斯科，便是苏美两国人民缺乏相互了解的原因之一。

斯大林回答说，拒绝给《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办理签证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但这种误会是偶然的现象，同苏联政府的政策无关。他斯大林知道《纽约先驱论坛报》是一家大报，但一部分美国记者对苏联的态度恶劣，这一事实也是重要的。

史塔生回答说，确实有这样的记者。《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已得到允许驻在莫斯科，但只是在外长会议开会期间。现在该报提出派记者常驻莫斯科的问题。《纽约先驱论坛报》是共和党的主要机关报，而现在，在共和党已在国会占多数之后，它就有更重大的意义了。

斯大林说：“这反正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看不出共和党同民主党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差别。”至于记者问题，他斯大林想起了一件事情。三大国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时，在会上，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做了很好的工作。一个美国记者，这人的姓名，他斯大林现在记不起了，发出一个报道，说铁木辛科元帅出席了德黑兰会议，虽然实际上他并没有在那里，并且说他斯大林在宴会上打了铁木辛科元帅。这是无礼的和诽谤性的捏造。怎么样呢？这样的记者应该称赞吗？在德黑兰会议的

参加者庆祝邱吉尔65岁寿辰的宴会上，出席的有邱吉尔、布鲁克、李海等近30人，他们都可以作证，绝对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可是这位记者将他臆造的报道发给了报社，而美国报纸便发表了它。这样的记者，能够信任吗？斯大林说，我们并不认为这件事应归罪于美国或它的政策。然而这类事件经常发生。这使苏联人产生了一种恶感。

史塔生说，当然，记者发出错误报道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例子是有的。但是，另外一些记者纠正了前者的错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知道哪些记者可以信赖，哪些记者不可以信赖，结果我们看到，人们会认识清楚，并为进行巨大的军事努力而团结起来。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正确的。

史塔生说，每当一个记者显然有意地作出完全不正确的报道时，他的报馆便会把他撤回去，这样，我们的报纸便会为自己造就出能干的诚实的记者干部了。

斯大林说，先是这些记者写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报馆发表了，赚了钱，然后便把这些记者辞退。

史塔生说，两种制度应该在出版、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范围内，找到搞好相互关系的手段。

斯大林说，这是正确的。

史塔生表示他认为，如果对记者的报道不规定检查制度，那对我们两国人民的合作和相互谅解来说，就是比什么基础都要好的基础。

斯大林说，苏联很难不实行检查制度。莫洛托夫曾几次试图这样做，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每当苏联政府废除检查制度，它都得后悔，结果只得重新实行。前年秋天，苏联废除了检查制度。他斯大林当时正在休假，于是记者们开始报道莫洛托夫强迫斯大林去休假，以后他们开始报道他斯大林要回来赶走莫洛托夫。这些记者就这样把苏联政府描绘得像一个动物园似的。当然，苏联人感到愤怒，于是只好重新实行检查制度。

史塔生说，照他现在的了解，斯大林认为如果有合作的要求和愿望，合作是可能的。

斯大林回答说，完全正确。

史塔生说，机械化和电气化对提高生活水平有重大的意义，而把原子能用于工业，对各国人民，包括苏美两国人民在内，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他史塔生认为建立原子能检查、管制制度，并宣布把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为非法，这对于世界各国人民都有重大意义。斯大林是否认为将来有制订出关于管制和调整原子能的生产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的前景？

斯大林回答说，他对此抱有希望。关于这个问题，苏联同美国有很大的分歧，但是正如他斯大林所希望的，双方终归会相互了解的。照他斯大林看来，国际管制和检查将会建立起来，这将有重大的意义。利用原子能于和平目的，将使生产过程发生重大变革。至于利用原子能于军事目的，这大概会被禁止。这是各国人民的愿望和良心所要求的。

史塔生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解决了的话，原子能将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大的福利，而如果不解决的话，它将成为最大的祸害。

斯大林说，他认为是能够建立国际检查和管制的。事情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史塔生为这次谈话向斯大林表示感谢。

斯大林回答说，请史塔生不必客气，俄国人是尊重他们的客人的。

史塔生说，在旧金山会议时，他曾同莫洛托夫进行过一次非正式的谈话。这次谈话的结果是邀请他访问俄国。

斯大林说，他认为欧洲的情况现在很坏。史塔生先生以为如何？

史塔生回答说，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未遭到战争灾难，它们的情况并不那么坏。例如，瑞士和捷克斯洛伐克。

斯大林说，瑞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小国。

史塔生说，大国的情况很坏。它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是财政、原料和粮食问题。

斯大林说，欧洲是世界上这样一块地方，那里工厂很多，但是缺乏原料和粮食。悲剧就在这里。

史塔生说，由于鲁尔的煤矿采掘水平低，所以欧洲缺煤。

斯大林说，英国也缺媒，这是十分奇怪的。

史塔生说，幸亏美国的煤炭采掘水平高。美国每一昼夜采掘200万吨肥煤。因此美国能够把大量煤炭运往欧洲。

斯大林说，美国的情况不坏。美国有两个大洋保护。北与弱国加拿大为邻，南与弱国墨西哥为邻。美国用不着怕它们。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后，有60年一直享受和平而没有打仗。这一切都有助于美国的迅速发展。此外，美国居民是由那些早已从国王和土地贵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组成的。这种情况也有利于美国的蓬勃发展。

史塔生说，他的曾祖父是为摆脱帝国主义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的。当然，美国的地理位置对美国有很大的帮助。史塔生说，我们很走运。在离我们海岸很远的地方就把敌人打败了。美国能够将战时生产恢复为平时生产，并在战争结束后大规模地恢复生产。现在的任务是避免萧条和经济危机。

斯大林问，美国是不是将要发生经济危机？

史塔生回答说，他认为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他史塔生相信可以调节美国的资本主义，把就业率稳定在高水平上，避免任何严重的危机。可是主要的任务是避免美国经济制度中的危机。但如果政府实行英明的政策，并考虑到1929—1930年的教训，那么在美国占优势的就将是可以调节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就能避免危机。

斯大林说，要这样做，就必须有一个抱有很大决心的很强有力的政府。

史塔生说，这是正确的，除此以外，人民应该了解旨在稳定和支持经济制度的那些措施。这是一个新任务，因为在世界各种经济制度中还不曾有过与此相类似的先例。

斯大林说，现在美国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即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两个竞争者——日本和德国——已被排除。因此，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将增长，这将为美国的发展造成有利的条件。像欧洲、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市场对美国是开放着的。这将帮助美国。这种条件以前从未有过。

史塔生说，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市场没有用以支付的资金，因此是美国的一种负担，而不是有利的生意。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危险的体现者的排除，从和平的角度来说，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自然是件大好事，当然世界贸易在过去并不是对美国有重大意义的因素。美国的市场曾经只限于美国境内或西半球范围内。

斯大林说，在战前，美国的生产品大约有10%输出到其他国家。至于购买力，他斯大林认为商人们会找到资金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并把它们转卖给本国的农民。中国、日本、欧洲和南美的商人已经积累了金钱。现在美国的出口将可能增加到20%。是这样吗？

史塔生说，他并不以为如此。

斯大林问："真的么？"

史塔生肯定地回答并且说，如果美国的出口增加到15%，他将认为美国很走运了。大多数商人积累的是地方通货，这种通货多半只限于在当地使用，而不能用来汇拨。因此，照他史塔生的估◇531◇计，美国的出口不会超过15%。

斯大林说，然而，如果注意一下美国的生产额，15%将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史塔生同意这点。

斯大林说，据说美国工业现在有许多订货。这是真的吗？据说美国的工厂做不完这些订货，所有工厂都是百分之百的开足了工。这是

真的吗？

史塔生回答说，是真的，但这些订货都是国内的。

斯大林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史塔生说，对粮食、妇女衣服和鞋子的要求现在能够满足，但是车床、汽车和火车头的生产是落后的。

斯大林说，美国报刊上有这样的报道，说经济危机很快就要到来。

史塔生说，报刊上曾报道说，美国失业人数去年11月份必定达到800万人。可是结果证明这些报道是错误的。任务在于平衡高的生产水平并获得稳定，以避免经济危机。

斯大林指出，史塔生大概是指调节生产。

史塔生回答说是的，并说美国有人断言将发生萧条，但他史塔生较为乐观，断定美国人能够避免萧条，因为他史塔生可以断言，人们对调节的了解比以前更深刻了。

斯大林问："工商界人士怎样呢？他们是否愿意被调节和受限制呢？"

史塔生回答说，工商界人士通常是反对这样做的。

斯大林指出，他们当然要反对。

史塔生说，然而他们了解1929年的萧条不应重演，并且他们现在比较懂得调节的必要性了。政府的高度调节，大量的决定和接着采取的合理行动，当然是必要的。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

史塔生说，这在任何制度和任何形式的政府下都是必要的。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下，犯错误对于人民都是不好的。

斯大林同意这点。

史塔生说，日本和德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说，这些国家的经济是由对经济一窍不通的军人管理的。例如在日本，经济是由只知道如何打仗的东条领导的。

史塔生说，这是正确的。他史塔生对斯大林给予他谈话的机会和时间表示感谢。

斯大林问，史塔生打算在苏联逗留多久。

史塔生说，他想明天到基辅去，以后他想去向斯大林格勒的英勇保卫者表示敬意，然后打算经列宁格勒离开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他史塔生正在太平洋美国舰队，他在那里紧张地注视着斯大林格勒的史诗。

斯大林说，尼米兹海军上将看来是位很出色的海军领导者。

斯大林问史塔生是否到过列宁格勒。

史塔生说，他还没有到过列宁格勒，他打算经由列宁格勒离开苏联。

斯大林说，他同史塔生谈话得益非浅。

史塔生说，他同斯大林谈话，对他研究经济问题方面的工作也得益不少。

斯大林说，在战前他也用过很多时间来研究经济问题，他之成为军人是由于必要。

史塔生问，他是否可以得到巴甫洛夫所记的谈话记录，以及是否允许他史塔生见到记者时同他们谈论这次谈话。

斯大林说，史塔生可以得到谈话记录，史塔生当然可以同记者谈论这次谈话，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7 年）》
1952 年版第 1 册第 15—27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20 卷第 50—59 页

在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

我想就昨天签订的苏芬友好互助条约的意义讲几句话。

这个条约标志着我们两国关系的转变。大家知道，150 年来，俄国同芬兰的关系是互不信任的。芬兰人不信任俄国人，而俄国人也不信任芬兰人。苏联方面过去曾经试图消除俄国人同芬兰人之间的不信任。这是 1917 年列宁宣布芬兰独立时的事情。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卓越的行动。但遗憾的是，不信任未能因此而消除，——不信任依然是不信任。结果，我们之间发生了两次战争。

我希望，我们能从我们曾彼此交战两次、长久的互不信任的时期转入我们关系上的新时期——互相信任的时期。必须使我们所缔结的条约消除这种不信任，并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创立新的基础，必须使这个条约成为我们两国关系走向信任和友好的重大转折点。

我们希望，这一点不仅在座的各位能很好的理解，而且这个大厅以外的芬苏两国人民也能很好的理解。

不能认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一下子就可以消除。这一点是不能很快就做到的。不信任的残余和尾巴还会在长时期内存在,要消除它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进行很多斗争，來建立苏芬两国相互友好的传统，并使这种传统得到巩固。

条约有平等的，也有不平等的。苏芬条约是平等的条约，因为它是在双方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缔结的。

许多人不相信大民族和小民族之间的关系能够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苏联人认为，这样的关系是能够有的，而且是应当有的。苏联人认

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其本质上的特点，即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就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作出的、使这个宝库更加充实、更加丰富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

因此，苏联人认为，芬兰虽然是个小国，但在这个条约中是作为与苏联平等的一方。

在大国的政治家中，把小民族看成同大民族平等的人是不多见的。他们大多数都是藐视小民族的。他们并不反对有时对小民族作单方面的保证。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政治家是不愿意同小民族缔结平等条约的，因为他们不认为小民族是自己的对手。

为了苏芬条约，为了这一条约所标志的我们两国关系上的好转，干杯。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1948 年）》
1950 年版第 1 册第 23—24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20 卷第 62—63 页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①]

（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七月）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有一部分青年同志要求我在报刊上就语言学问题，特别是就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我的意见。我不是语言学家，当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同志。至于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同我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同意回答这些同志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问：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

————————————————

① 1950年5月9日—7月4日，苏联《真理报》组织了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每周定期出版两整版的讨论专刊。该报编者说：组织这次讨论的目的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语言学发展中的停滞现象，确定这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斯大林在这一年的6—7月写了几篇著作，在《真理报》发表，随后于8月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书名由真理报出版社出了单行本。——编者注

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作例子来说吧。最近30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语的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增如了一大批新的词语；许多词语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那么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消失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

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谁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语在十月革命以前为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很好，就同现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很好一样。

关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摩尔达维亚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土库曼语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都应该说也是这样的，它们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就同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得很好一样。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它对社会成员是共同的，对社会是统一的，同样地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

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使自己必然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其次，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 100 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语为例，那么它在这个长时期内，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语按照它的结构来说，是同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内，俄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内，俄语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先了；有很大一批词的含义改变了；语言的语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语言的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主要的都保存下来了，成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把现有的语言结构

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都像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以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人走路”、“做”、“生产”、“做买卖”等等不叫作水、地、山等等，而叫作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使语言中的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不按照现在语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种语法来进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语言变革对于革命宥什么益处呢？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历史是决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的。试问，如果证明现有的语言及其结构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满足新制度的需要，那么这样的语言变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且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以而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有发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现有的语言，并创立新的语言来代替它，那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吗？除了像唐·吉诃德之类的人以外，谁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

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总括说来：

（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对社会是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有人反驳说，所谓阶级，应当是指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内。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驳，而是玩弄词句，是不值得一驳的。

至于后来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нация)语言[①]，那么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

① 俄文 народность 和 нация，一般都译为“民族”。斯大林在本文中把 народность 一词用来专指产生于部落之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把 нация 一词用来专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人们共同体。本文中 народность 译成“民族”，并附注原文：нация 译成“民族”，一般不附注原文，只是在同一句子中与 народность 并用时，才附注原文，以示区别。——编者注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整个帝国是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 ）的集合体。因此，我指的不是这些帝国和类似的帝国，而是组成这些帝国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的。历史表明：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①]、土语，但是部落或者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从属于自己。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上面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

① 原文是 диалект ，指地域方言，在本文中也用以指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现统一译为“方言”。——编者注

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①]。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与此相对立的则有“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能不能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看作语言呢？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没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在这些方言和习惯语中到底有些什么呢？其中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词，一些不包含民族语言中“粗鲁”用语和短语的特别风雅客气的用语和短语，以及若干外来语。然而基本的即绝大多数的词和语法构造还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因此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有人援引马克思，引证他的《圣麦克斯》一文的一个地方，那里说到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②]，这种语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证明，好像马克思是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好像马克思否定了统

————————————————

① 即客厅语言，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所谓“雅语”。沙龙是法语 salon 一词的音译，意即客厅。——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55 页。——编者注

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圣麦克斯》中引证另一段话，在那里马克思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①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而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从属于高级形式。

那么，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那套词汇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们生意人的习惯语。

可见，这些同志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曲解了它，是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②。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方言，他完全懂得，方言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不很同意语言同方言是有区别的……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卷第410页。——编者注

政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作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呢？

有人援引拉法格的话，说拉法格在《语言和革命》[①]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语言的“阶级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格的确谈论过“贵族语言”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习惯语”。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拉法格关心的不是语言和习惯语的区别问题，他把这些方言有时叫作“人造语”，有时叫作“习惯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说：“使贵族显得与众不同的人造语……是从资产者、手艺人、城市和乡村都讲的那个全民语言中分出来的。”

可见，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贵族语言”及其他方言和习惯语是从属性的，是依附于全民语言的。

因此，引证拉法格的话没有达到目的。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像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伯爵领地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第三，大家知道，

———————————————

① 即保尔·拉法格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编者注

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中”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而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的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么就不需要有对社会是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为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

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语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们某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继续存在着。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愿使自己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质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

其次，有人引证列宁的话，说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绝对正确。但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种文化的话，显然是想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那么语言也应当有两种，因为语言是同文化相联系的，——由此可见，列宁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列宁主张“阶级的”语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

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像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分子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论的[①]。奇怪的是，我们某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②]

可见，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有人援引斯大林，他们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③]这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确领导着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一样。可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0卷第5—7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08页。——编者注

③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0页。——编者注

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说来：

（一）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二）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三）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问：语言的特征是什么？

答：语言属于在社会存在的时间内始终起作用的社会现象之列。它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

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对社会一切成员是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大家知道，语言中所有的词共同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就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①。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少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词汇反映语言的状况：词汇越丰富、越纷繁，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达。

但是词汇本身还不是语言，词汇好比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建筑业中的建筑材料并不就是房屋，虽然没有建筑材料就不可能建成房屋。同样，语言的词汇也并不就是语言，虽然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当语言的词汇受着语言语法的支配的时候，就会获得极大的意义。语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词组合成句的规则，这样就赋予语言一种有条理、有含义的性质。语法（词法，句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和句中词的组合的规则的汇集。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有了语法，语言才有可能赋予人的思想以物质的语言的外壳。

语法的特点在于，它得出词的变化的规则，而这不是指具体的词，而是指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词；它得出造句的规则，而这不是指某些具体的句子，例如具体的主语、具体的谓语等等，而是指任何的句子，不管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如何。因此语法从词和句的个别和具体的东西中抽像出来，研究作为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的基础的一般的东西，并且以此构成语法规则、语法规律。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

———————————————

① 指仅由一个词根构成的单纯词。——编者注

的、抽象化的工作的成果，是思维的巨大成就的标志。

就这一方面来说，语法很像几何学，几何学得出自己的定理，也是从具体对象中抽象出来，把各种对象看成没有具体性的物体，不是规定某些具体对象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规定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言和上层建筑不同，上层建筑同生产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经济这个中介。语言则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着，正像它同人的工作的一切范围（毫无例外）中的其他一切活动直接联系着一样。因此语言的词汇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此外语言还有一点和上层建筑不同，它无须等待基础的消灭，它在基础消灭以前，且不管基础的状态怎样，就使自己的词汇发生变化。

但是语言的词汇的变化不是像上层建筑一样的，不是以废除旧的、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实现，而是以新词去充实现有词汇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新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发展而产生的。同时，虽然通常从语言的词汇中消失一些已经陈旧的词，可是增添的新词的数量却要多得多。至于基本词汇，基本上是完全保留下来的，并且被当作语言的词汇基础来使用。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基本词汇能在许多历史时期中被有效地利用，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消灭它，况且把千百年积累起来的基本词汇消灭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间内创造出新的基本词汇，那就会使语言瘫痪，就会把人们相互交际的事情完全弄糟。

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还要慢。语法构造是许多时代以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比基本词汇还要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当然也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善自己的规则并使之更精确，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语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证明，这些基础能够在许多时代中有效地为社会服务。

由此可见，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

历史表明，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有些历史学家不去解释这种现象，而只是表示惊奇。可是这里并没有值得惊奇的任何根据。语言的稳固性是由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的稳固性造成的。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经在几百年中竭力摧残、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在这个时期中，巴尔干各族人民语言的词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词语，发生过“聚合”和“分离”，可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还是坚持下来和生存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把语言及其结构看作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可以推想，现代语言的要素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奠下基础了。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是有它的语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语法构造。

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印刷机的出现，出版物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分解了和离散了，混合了和融合了，而往后，就出现了民族语言和国家，发生了革命，旧的社会制度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所有这一切，给语言及其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以为语言的发展也像上层建筑一样，是用消灭现存的和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发展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来实现的。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

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逐渐的长期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规的。

有人说，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语言发展的阶段论认为突然的爆发是必要的，是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的条件。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个理论中，很难找到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果阶段论真的认为在语言发展历史中有突然的爆发，那就更糟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在语言发展中有突然的爆发，有现存语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语言的突然创造。拉法格说在法国“1789 年到 1794 年间发生了突然的语言革命”（见拉法格的《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是不正确的。那时在法国没有任何语言革命，更谈不上什么突然的语言革命。当然，在这个时期中法语的词汇增加了许多新词语，消失了一些陈旧的词，有些词的含义改变了，仅此而已，但是这样的改变，丝毫也不决定语言的命运。语言中主要的东西是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语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保存下来，没有重大的改变，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直到现在，在现代的法语中还继续生存着。更不用说，要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立新的民族语言（“突然的语言革命”！），五六年的时间是少得可笑，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我们曾在 3—10 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

级的个体农民的制度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的过渡。这是一个在乡村中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变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变革是根据现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

有人说，历史上有过各种语言融合的许多事实，由此可以推想，在融合的时候，新语言的形成是经过爆发,经过从旧质到新质的突然过渡而发生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语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在几年中就能得出结果的一次决定性的突击行动；语言的融合是延续几百年的漫长的过程。因此这里谈不上任何的爆发。

其次，如果以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会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语言，它不像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同其中任何一种都有质的区别，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融合的时候，通常是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死亡。

可见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种语言，保留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使它能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语言会从失败的语言中吸取一些词来丰富自己的词汇，但是这并不是削弱它，相反地，是加强它。

例如，俄语就是这样，它在历史发展过程巾，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

当然，俄语的词汇由于从其他语言中取得了许多词而充实起来了，

但是这不仅没有使俄语削弱，相反地，使它丰富和加强起来。

至于俄语的民族特质，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因为它保留了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继续前进，继续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趋于完善。

无疑地，语言融合论并不能给予苏联语言学任何重要的东西。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如果这是对的，那就应当承认，语言融合论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任务，——它简直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任务，或者是不懂得这个任务。

问：《真理报》开展语言学问题的自由讨论，是否做得对？

答：做得对。

语言学问题将朝着什么方向解决，这到讨论结束时就会清楚的。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次讨论有了很大的益处。

首先，这次讨论发现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状况，甚至连十分胆怯地试图批评语言学中的所谓“新学说”，都会遭到语言学界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语言学方面的一些优秀的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由于对尼·雅·马尔的遗著采取了批判态度，由于对尼·雅·马尔的学说稍微表示不赞同，就被撤职或降级。有一些语言学工作者提升到负责职位，并不是由于他能干，而是由于他无条件地尊奉尼·雅·马尔的学说。

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举一个例子，所谓《巴库教材》（尼·雅·马尔在巴库所讲授的讲义）本来已经由著者本人废弃并禁止翻印，但是这帮领导者（梅夏宁诺夫同志称他们为尼·雅·马尔的“学生”）竟下令重印，并且把它

作为参考书，毫无保留地推荐给学生。把本来已经废弃了的《教材》当作完美无缺的参考书，这就是欺骗了学生。如果我不是相信梅夏宁诺夫同志和其他的语言学工作者的诚实，那我就要说，这样的行为就等于暗害行为。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在语言学界形成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①]，养成不负责任的习气，助长这种专横行为。

讨论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为它揭露了这种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并且把它打得粉碎。

但是讨论的益处还不限于此。讨论不仅粉碎了语言学界的旧制度，而且还暴露了对于语言学中一些最重要问题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糊涂观念，这种糊涂观念竟在这门科学的领导集团中占着统治地位。在开始讨论以前，尼·雅·马尔的“学生们”默不作声，隐瞒了语言学中的恶劣情况。讨论开始以后，到了无法再沉默的时候，他们才迫不得已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结果怎样呢？原来在尼·雅·马尔学说中有许多破绽、错误、不明确的问题和没有经过探讨的论点。试问，尼·雅·马尔的“学生们”为什么直到现在展开讨论以后才说出这些东西来呢？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有关心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以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公开老实地说出这些东西呢？

尼·雅·马尔的“学生们”承认了尼·雅·马尔的“某些”错误以后，看来还以为只有在“订正了的”尼·雅·马尔理论的基础上，苏联语言学才能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尼·雅·马尔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让我们摆脱尼·雅·马尔的“马克思主义”吧！尼·雅·马尔的确曾经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曾经为此努力过，可是他没有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或“拉

——————————————

① 19世纪头25年在俄国施行的警察暴虐、军阀专横、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制度，因其推行者陆军大臣阿·安·阿拉克切耶夫伯爵而得名。——编者注

普派”一样，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

尼·雅·马尔把语言是上层建筑这样一个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把语言有“阶级性”这另一个同样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同各民族历史和各语言历史全部进程相矛盾的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给语言学带来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所不应有的不谦虚的、骄横的、妄自尊大的腔调，以至于轻率地空口否定尼·雅·马尔以前语言学中的一切。

尼·雅·马尔大肆叫嚣，污蔑历史比较法[①]是“唯心主义的”。其实应当说，历史比较法虽然有严重缺点，但是毕竟比尼·雅·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要素分析法[②]要好，因为前者还推动语言研究工作，后者却只是要人躺在炕上，围绕着标榜一时的四要素去胡思乱想。尼·雅·马尔妄自尊大地贬斥研究语言类别（系族）的任何企图，认为这是“原始语”[③]理论的表现。其实，不可否认，语言的亲属关系，例如各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无疑是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语

————————————————

① 19世纪初开始采用的一种研究语言史前史的方法。它通过亲属语言或方言的比较，揭示其语音对应规律，构拟原始语的系统，以说明亲属语言和方言的形成和演变。——编者注

② 即尼·雅·马尔的所谓四要素古生物学分析法。马尔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发音成分不外四个要素，每一要素由两个辅音组成，按原來图腾部落的观念和名称分别称作сал，бер，йон，ро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由这四个要素发展而来的。——编者注

③ 亦称基础语、母语或祖型语。按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一般理解，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都是由同一原始语分化发展而成的。——编者注

言的亲属关系，会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给语言学带来很大的益处。更不用说，“原始语”理论同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听了尼·雅·马尔的说法、特别是他的“学生们”的说法，会使人以为在尼·雅·马尔以前不曾有过任何语言学，语言学是从尼·雅·马尔的“新学说”出现以后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谦虚得多，他们认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前时期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科学发展的产物。

因此，这次讨论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的事业，这就是它暴露了苏联语言学中的思想错误。

我想，我们的语言学愈快地摆脱尼·雅·马尔的错误，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遭受的危机。

取消浯言学界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抛弃尼·雅·马尔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我看，这就是苏联语言学健全发展的道路。

載于 1950 年 6 月 20 日《真理报》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答叶·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 问：您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语言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那么，认为语言既是基础所具有的，又是上层建筑所具有的一种现象是否恰当？还是认为语言是一种中间的现象更正确些？

答：当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固有的那种共同特点的，这就是说，它为社会服

务，正如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社会服务一样。但是，一切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共同东西，其实也仅限于此。再进一步，便开始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严重差别。

问题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的专门特点就是：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等思想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设施。语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语言的这些特点，语言学就会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

简短些说，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

语言也不能列入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现象一类，因为这种“中间”现象是不存在的。

但是语言也许可以列入社会生产力一类，譬如说，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吧？的确，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点；生产工具，像语言一样，对于各个阶级表现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并能同样地服务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不管是旧的阶级，或是新的阶级。根据这个情况是否可以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呢？不，不可以。

有一个时候，尼·雅·马尔看到他的“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的公式遭到了反对，就决定“改造”一下，宣称“语言是生产工具”。尼·雅·马尔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是否对呢？不，他完全不对。问题在于，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类似之处，只限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但是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生产”词而已。确切些说，有生产工具的人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但是同样这些人如果只有语言而没有生产工具，那就不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不难了解，假如语言能够生产物质资料，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了。

2. 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语言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②]。马克思说：“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③]依据您的意见，语言学应当在哪种程度上来研究语言的含义方面，研究语义学和历史语义学以及修辞学呢？或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应当是形式吗？

答：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之一。词语的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当保证语义学在语言学中应有的地位。

然而，在研究语义学问题和使用它的材料时，千万不可过高估计它的意义，尤其不可滥用它。我指的是某些语言学者，他们过分沉醉于语义学，无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同思维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他们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硬说语言在消亡着，没有语言也行。

请注意尼·雅·马尔所说的下面的话：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25 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5 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109 页。——编者注

“语言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以声音表露出来；思维的活动没有表露也可以进行。……语言（有声的）现在已开始把自己的职能让给那些绝对战胜空间的最新发明了，而思维则借其未加利用的过去的积累和新的成就而上升，并且将排挤和完全代替语言。未来的语言就是在不依赖于自然物质的技术中成长起来的思维。在它面前，任何语言，甚至有声的、仍然同自然规范相联系的语言也会站不住脚。”（见尼·雅·马尔的《选集》）

如果把这种施展“魔力”的玄妙莫测的话译成普通人讲的话，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

（二）尼·雅·马尔认为，人们的交际，不用语言，而借助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不依赖于“自然规范”的思维本身就可以办到；

（三）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又使思维“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他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有些人说，思想是在用言语表达出来之前就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是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外壳、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简短些说，过高估计语义学和滥用语义学，使尼·雅·马尔走向唯心主义。

因此，如果保护语义学，防止像尼·雅·马尔和他的“学生们”

那样加以夸大和滥用，那么语义学对语言学就能有裨大的益处。

3. 问：您十分正确地指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和道德原则是绝对对立的。这些现象的阶级性质必然反映在语义方面（有时也反映在语言的形式上即词汇上，如您的文章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分析具体的语言材料时，首先在分析语言的含义方面时，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概念的阶级实质？特别是在讲到语言不仅表现人的思想，而且也表现人对现实的态度时〈这时人的阶级属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这些概念的阶级实质？

答：简单说来，您想知道，阶级是否影响到语言？阶级是否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人们依据阶级属性而赋予同一词语以不同的含义的情形有没有呢？

是的，阶级影响到语言，并且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有时也对同一个词语有不同理解。这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对于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发展会有重大的意义，它们会削弱全民语言的意义或改变它的性质。

第一，这种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在语言中是极少的，未必能占全部语言材料的百分之一。因此，占绝大多数的其他所有的词语以及它们的语义对于社会各阶级是**共同的**。

第二，在言语中应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专门的词语时，并不是按照某种“阶级”语法的规则（这种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而是按照现有的全民语言的语法规则。

因此，专门的词语的存在以及语义上的差别的事实，并不推翻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是证实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

4. 问：您在文章中完全正确地评价了马尔，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这是不是说：语言学家们，包括我们这些青年在内，应该抛

弃马尔的**全部**语言学遗产呢？可是马尔仍然作过一些有价值的语言研究（契科巴瓦、桑热耶夫及其他一些同志在讨论中都曾写到这些）。我们在批判地研究马尔的同时，是否还可以吸取他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呢？

答：当然，尼·雅·马尔的著作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尼·雅·马尔之所以犯了极重大的错误，是由于他把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塞进语言学中去，他企图创造一种独立的语言理论。但是尼·雅·马尔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野心，诚实地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某些语言。在这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宥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显然，这种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应当从尼·雅·马尔那里吸取过来加以利用。

5. 问：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形式主义**是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基本原因之一。语言学中的形式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如何克服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很想知道您的意见。

答：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责难一切不赞成尼·雅·马尔“新学说”的语言学者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和不聪明的。

尼·雅·马尔认为语法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认为那些把语法构造当作语言基础的人是形式主义者。这就是极端愚蠢了。

我认为“形式主义”是“新学说”的创造者们为了便于同自己在语言学界的对手作斗争而捏造出来的。

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原因，并不是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所发明的“形式主义”，而是语言学界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和理论上的缺陷。阿拉克切耶夫制度是尼·雅·马尔的“学生们”建立的。尼·雅·马尔及其最亲近的战友们给语言学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为了不再有停滞现象，就应该把两者一起铲除。铲除这些溃疡，才会使苏联

语言学健康起来，才会使它走上康庄大道，才会使苏联语言学能够在世界语言学中占第一位。

1950年6月29日

载于1950年7月4日《真理报》

答 同 志 们

答桑热耶夫同志

尊敬的桑热耶夫同志：

答复您的来信太迟了，因为您的信昨天才从中央机关转给我。

您无疑是正确地解释了我在方言问题上的观点。

“阶级”方言，正确些说，应当叫作习惯语，并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为少数社会上层分子服务的。此外，它们没有自己本身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并且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наци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例如，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基础的俄语中的库尔斯克-奥廖尔方言（库尔斯克-奥廖尔“话”），情形就是这样。成为乌克兰民族语言基础的乌克兰语中的波尔塔瓦-基辅方言，也应该说是这样的。至于这些语言中的其他方言，则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溶入这些语言，并在这些语言中消失。

也有相反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нация），它的统一的语言由于该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国家的崩溃而瓦解；在统一语言中还没有消失的地

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例如，统一的蒙古语可能就是这样。

1950年7月11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真理报》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

你们的错误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并用另外的题目偷换了我给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的答复中所研究的题目。

1.我在那封复信中批判了尼·雅·马尔，因为他在谈到语言(有声语言）和思维时，把语言同思维分割开来，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由此可见，我在复信中所说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我并且断定说：这种人的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在会讲话的人那里，是不存在同语言材料没有联系的赤裸裸的思想的。

你们没有接受或驳斥这个论点，却举出了不正常的不会讲话的人、聋哑人来，这些人不会讲话，当然他们的思想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由此可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没有讲到也不能讲到，因为语言学研究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而不是不会讲话的不正常的聋哑人。

你们用没有讨论过的另外一个题目来偷换正在讨论的题目。

2.从别尔金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词的语言”（有声语言）和“手势语言”（照尼·雅·马尔的说法叫“手”语）同等看待。看来他认为：手势语言和词的语言是同等的东西；人类社会有一个时期是没有词的语言的，当时“手”语起到了后来出现的词的语言的作用。

但是，如果别尔金同志当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民族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народец），哪怕是像19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①]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народец），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离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

由于所谓的手势语言极端贫乏和有限，它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言语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锄和带有五铧犁和条播机的现代的履带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

3. 由此可见，你们所注意的首先是聋哑人，然后才是语言学问题。显然地，正是这种情况使你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吧，如果你们要坚持，我不妨满足你们的要求吧。那么聋哑人的情形到底怎样呢？他们的思维是否在活动，思想是否在产生呢？是的，他们的思维是在活动，思想是在产生。很明显，既然聋哑人不能讲话，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这是不是说，聋哑人的思想是赤裸裸

———————————————

① 澳洲人指澳洲土著人。他们在19世纪时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崇拜图腾，各部落有自己的语言。据调查，澳洲土著人的语言不下百余种。火地人指南美洲南端火地岛的印第安人。他们是16世紀被欧洲殖民者从南美洲大陆驱逐到这个苦寒地区的，以数十人的亲属集团为单位靠渔猎生活，十九世纪时仍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编者注

的、同“自然规范”（尼·雅·马尔的用语）没有联系的呢？不，不是的。聋哑人的思想的产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像、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像、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

1950 年 7 月 22 日

载于 1950 年 8 月 2 日《真理报》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您的信收到了。

由于工作很忙，答复稍迟了些。

您的信是从两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出发的：第一个假定认为，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时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第二个假定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说，这两个假定都大错特错了。

举几个例子来说。

1. 在 19 世纪 40 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 20 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无法克服的弱点，

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①]。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以此为根据，开始要求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消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

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编者注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而言的，当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仍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这个公式就不适用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公式。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会说：这种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必须抛弃其中一个绝对错误的公式，而把另外一个绝对正确的公式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切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而恩格斯的公式则对于下一时期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陆续的胜利将导致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内的胜利，从而造成实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

对于霍洛波夫同志信中引证斯大林的不同著作中关于语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公式，也应该这样说。

霍洛波夫同志引证斯大林《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其中作了一个结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通常是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而另一种则会死亡；可见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种语言。其次，他又引证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另一个结论，那里说：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已经巩固并且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各民族语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不会是大俄罗斯语，也不会是德意志语，而将是某种新的语言[①]。

——————————————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6页。——编者注

霍洛波夫同志把这两个公式对照了一下，发现它们不仅彼此不一致，而且互相排斥，于是失望了。他在信中写道：“从您的文章里我理解了语言的融合永远不会产生某种新的语言，可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根据您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我曾确信：在**共产主义**时期，各种语言会融合成一个共同的语言。”

显然，霍洛波夫同志发现了这两个公式间的矛盾，并且深信矛盾应当消灭，于是认为必须丢掉公式中的不正确的一个，而抓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都正确的另一个，但是究竟抓住哪一个呢，——他不知道。好像是走投无路了。霍洛彼夫同志根本没有想到：两个公式可能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他们不深入问题的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的历史条件而只作形式上的引证，就必然会走投无路。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问题的本质，就没有任何根据感到走投无路了。问题在于：斯大林的《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小册子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所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所得出的公式也不相同。

斯大林在他的小册子中论及语言融合问题的那个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时代，这时剥削阶级是世界上的统治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国家的区别使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根深蒂固，民族平等还不存在，语言的融合是通过争取其中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的斗争进行着，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摆在日程上的不是各种语言的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有胜利的语言和失败的语言。斯大林的公式说：譬如两种语言的融合，结果不是形成新的语吉，而是其中一种语言胜利，另一种语言失败，这一公式正是指上述这些条件。

至于说到斯大林的另一个公式，即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

的讲话中论及各种语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这一公式，那么这里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将被各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很明显，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到一些语言的被压制和失败与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在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从这些语言中将首先产生出一些最丰富的统一的区域语言，然后这些区域语言再融合为一种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或英语，而是吸取了许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

因此，两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要求这两个公式不彼此矛盾，要求它们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的荒谬，这就像要求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同社会主义统治时代不彼此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的汇集，这些教条是不顾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永远”不变的。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么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场合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而没有懂得它们的内

容的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1950 年 7 月 28 日

载于 1950 年 8 月 2 日《真理报》
译自《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3 年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20 卷第 69—105 页

评艾德礼的言论和联合国的行为

——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五一年）

问：英国首相艾德礼最近在下院说，苏联在战争结束后没有裁军，即没有把军队复员，说从那时起，苏联愈来愈多地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艾德礼首相这样说是对苏联的诽谤。

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在战后已经把军队复员了。大家都知道，复员是分三批进行的：第一和第二两批是在1945年，第三批是自1946年5月至9月。此外，在1946年和1947年，又把苏军中年龄较大的人员复员，而在1948年初，所有剩下的年龄较大的人员都已经复员了。

这些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如果艾德礼首相擅长财政学或经济学，他就不难了解：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苏维埃国家在内，能够在尽力发展民用工业的时候，在开工修建需要数百亿预算支出的类似伏尔加河、第聂伯河、阿姆河上的水电站那样的伟大建设工程的时候，在继续实行同样需要数百亿预算支出的不断降低日用品价格的政策的时候，在投资数千亿以恢复被德国占领者破坏的国民经济的时候，还同时增加自己的武装力量，扩大军事工业。不难了解，这种轻率的政策必将招致国家的破产。艾德礼首相应该从他自己以及美国的经验中懂得，增加国家的武装力量和进行军备竞赛，就会使军事工业扩大，民用工业缩减，就会使巨大的民用建设工程停顿，赋税增加，日用品价格上涨。显然，如果苏联不是縮減而是扩大民用工业，不是收缩而是扩大新的规模很大的水电站和灌溉系统的建设，不是停止而是继续实行降低物价的政策，那么，

它要是不冒破产的危险，就不能同时又扩大军事工业和增加自己的武装力量。

如果艾德礼首相不顾所有这些事实和科学见解，仍然认为可以公开诽谤苏联和它的和平政策，那么，这只能说，他是想用诽谤苏联的办法来为工党政府现在正在英国进行的军备竞赛作辩解。

艾德礼首相所以需要诬蔑苏联，他所以需要把苏联的和平政策说成是侵略政策，而把英国政府的侵略政策说成是和平政策，是为了迷惑英国人民，硬要他们相信对苏联的诬蔑，从而用欺骗手段把他们拉进美国统治集团正在策划的新的世界大战。

艾德礼首相把自己说成是和平的拥护者。但是，如果他真的主张和平，为什么他拒绝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苏联、英国、美国、中国、法国立即缔结和平公约的建议呢？

如果他真的主张和平，为什么他拒绝苏联关于立即开始裁减军备、立即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呢？

如果他真的主张和平，为什么他迫害拥护保卫和平的人，为什么他禁止保卫和平大会在英国召开呢？难道保卫和平的运动会威胁英国的安全吗？

显然，艾德礼首相所主张的不是维护和平，而是发动新的侵略性的世界大战。

问：关于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您的看法怎样？它的结局会怎样？

答：如果英国和美国最终拒绝了中国人民政府的和平建议，朝鲜的战争便只能以武装干涉者的失败而告终。

问：为什么？难道美国和英国的将军和军官比中国和朝鲜的差吗？

答：不，并不差。美国和英国的将军和军官一点也不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将军和军官差。至于美国和英国的士兵，大家都知道，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中，他们表现得非常之好。那么，

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士兵们认为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是完全正义的。问题在于这场战争在美英的士兵中是极其不得人心的。

的确，很难使士兵们相信：既不威胁英国又不威胁美国而其台湾被美国人侵占了的中国是侵略者，而侵占了台湾并将军队推向中国边境的美国倒是自卫的一方。很难使士兵们相信；美国有权在朝鲜领土上和中国边境附近保卫美国的安全，而中国和朝鲜却没有权利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或在本国边境附近保卫自身的安全。因此，这场战争在英美士兵中是不得人心的。

显然，如果士兵们认为强迫他们进行的战争是极端非正义的，如果士兵们因此而在前线敷衍塞责，不相信他们的使命合乎正义，情绪低落，那么，就是最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也要吃败仗的。

问：您对于联合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看法怎样？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议。

的确，只有丧尽了天良，才会硬说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逼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的一方，而保卫自己的边境并力求收复被美国人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是侵略者。

原来作为维护和平的堡垒而建立的联合国，现在正在变为战争的工具，变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工具。组成联合国中侵略核心的是10个参加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和20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现在在联合国中决定着战争与和平的命运的就是这些国家的代表。就是他们在联合国中通过了可耻的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的决议。

现在联合国中事态的特点是：例如，美洲的一个小小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口未必有200万，现在却在联合国中和印度占有同样的比重，而比起在联合国中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那比重就更大得多了。

这样，联合国正在变成侵略战争的工具，同时它也就不再是权利平等的国家的世界性组织了。实际上，现在联合国与其说是世界性组织，还不如说是满足美国侵略者需要的美洲人的组织。不仅美国和加拿大力图发动新的战争，而且还有20个拉丁美洲国家，也走上了这一条道路，这些国家的地主和商人，渴望在欧洲或亚洲的某个地方爆发新的战争，以便以特别高的价格，向交战国出售货物，在这种血腥的生意中大发横财。20个拉丁美洲国家的20个代表，现在是美国在联合国中的抱得最紧、最顺从的队伍，这一点对谁也不是秘密。

联合国就是这样走上了国际联盟的不光彩的道路。因而它正在埋葬自己的道义上的威信，并注定要瓦解。

问：您是否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答：不。至少在目前，不能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自然，在美国、英国以及法国，都存在渴望新战争的侵略势力。他们需要战争，是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为了掠夺其他国家。这就是那些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他们把战争看作是能产生巨额利润的收入的源泉。

他们，这些侵略势力，掌握着并且指挥着反动的政府。但他们同时又害怕本国人民，因为人民不要新的战争，主张维护和平。所以，他们力图通过反动政府，用谎言蒙蔽和欺骗本国人民，把新战争说成是防御战争，把爱好和平国家的和平政策说成是侵略政策。他们竭力欺骗本国人民，以便强使人民接受自己的侵略计划，并把人民拖入新的战争。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害怕保卫和平的运动，怕这个运动会

揭穿反动政府的侵略意图。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否决了苏联关于缔结和平公约、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他们害怕通过这些建议便会破坏反动政府的侵略措施，并使军备竞赛成为不必要。

侵略势力和和平力量之间的这一斗争，会怎样结束呢？

如果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坚持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如果战争挑拨者蒙蔽了人民群众，欺骗了他们，把他们拖入新的世界大战，那战争就会成为不可避免。

因此，广泛的维护和平的运动，作为揭露战争挑拨者罪恶阴谋的工具，现在具有头等的意义。

至于苏联，它在今后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政策。

译自《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1952 年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20 卷第 106—110 页

关于原子武器问题答《真理报》记者

（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

问：对于苏联试验原子弹，近来外国报刊在吵吵嚷嚷，您对这种吵嚷的看法怎样？

答：的确，我国在不久以前试验了一种原子弹。今后还要按照我国防御英美侵略集团进攻的计划，进行各种规格的原子弹的试验。

问：由于原子弹的试验，美国各式各样的人士在发出警报，叫嚷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种警报是否有任何根据？

答：这种警报是毫无根据的。

美国人士不会不知道，苏联不仅反对使用原子武器，而且还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大家知道，苏联曾几次要求禁止原子武器，但是每一次都被大西洋集团的国家拒绝了。这就是说，一旦美国进攻我国，美国统治集团就将使用原子弹。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不得不备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准备来对付侵略者。

当然，侵略者希望在他们进攻苏联的时候，苏联没有武装。但是苏联不同意这样，认为应当有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侵略者。

因此，如果美国不想进攻苏联，那么美国人士的警报就应该认为是无的放矢的，是虚构的，因为苏联并不想在什么时候进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

美国人士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原子武器的秘密已不仅仅为美国所有，而且已为其他国家，首先是苏联所有。他们想使美国成为原子弹生产的垄断者，想使美国拥有无限的可能性来恫吓和讹诈其他国家。可是他们到底有什么根据，有什么权利这样想呢？难道维护和平的利益需要这种垄断吗？事情恰好相反，正是维护和平的利益需要首先消

除这种垄断，然后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这样说岂不是更正确些吗？我想，只有鼓吹原子弹的人看到他们已不再是垄断者的时候，他们才会同意禁止原子武器。

问：对于原子武器方面的国际管制，您的看法怎样？

答：苏联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和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苏联主张建立国际管制，使禁止原子武器、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并把已经制成的原子弹完全用于民用目的的决定，得到十分严格的和认真的执行。苏联所主张的正是这种国际管制。

美国人士也谈“管制”，但是他们的“管制”的出发点不是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而是继续这种生产，而且其数量要同各国所拥有的原料的数量相适应。所以，美国的“管制”的出发点不是禁止原子武器，而是要使这种武器公开化和合法化。从而使战争挑拨者用原子武器来消灭几万几十万和平居民的那种权利，也成为合法的。不难了解，这不是管制，而是对管制的嘲笑，是对各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的欺骗。很明显，这种“管制”是不能使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满意的，他们所要求的是禁止原子武器和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

译自1951年10月6日《真理报》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20卷第111—112页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①]

——给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

（一九五二年二月至九月）

对于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我已经收到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而举行的经济问题讨论会的一切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建议》，《关于消除未定稿中的错误和不确切处的建议》，《关于争论问题的说明材料》。

对于这一切材料，以及对于教科书未定稿，我认为必须提出如下的意见。

1.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他们认为，由于历史赋予了苏维埃国

———————————————

① 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于1951年11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在1952年2—9月就这次讨论会的有关问题而写的著作，最早发表于1952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8期。——编者注

家以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它的领导人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

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不受人们影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现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我们且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经被认为是无法防止的灾害，是人们无力抗拒的。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控制自然界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力转而有利于社会，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

这是不是说，人们因而就废除了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创造了新的自然规律，新的科学规律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防止水的破坏力量发生作用并利用它以利于社会的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丝毫没有违反、改变或消灭科学规律，没有创造新的科学规律的。恰恰相反，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确切地根据自然规律、科学规律而实现的，因为对自然规律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坏。

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规律——无论指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是一样——也必须这样说。在这里，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不同，不是长久存在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規律。但是原来的这些规律，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规律，这些新的规律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的这样一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将摆脱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而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对必然的认识”[①]。究竟“对必然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编者注

（“必然”）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说道：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①

可见，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对那些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消灭现存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经济规律的人们，决不是有利的。恰恰相反，这个公式所要求的不是消灭经济规律，而是认识它们和善于运用它们。

有人说，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质，这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不对的。这是把规律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已经证明：社会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规律方面的情形一样，正如上面所举的江河泛滥的例子一样。

有人援引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特殊作用，仿佛这种作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去消灭现存的经济发展规律，并“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规律。这也是不对的。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能像以往的革命那样，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而必须消灭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消灭了什么现存的经济规律，“制定了”什么新的经济规律，而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

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不依靠这个规律，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规律，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来，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衰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经济规律的另一个特点。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就需要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当时我国有了这种力量,这就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在其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这种力量。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旧的社会力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之所以在我国获得了充分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秘密就在于此。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的经济规律。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就

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这也是不对的。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规律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规律。

因此，当人们讲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经济力量，讲到“支配”它们等等的时候，他们决不是想说：人们能够“消灭”科学规律或“制定”科学规律。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说，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熟练地运用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支配它们。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现规律，它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可是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复众所周知的真理。当然，这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

复我们所知道的某些真理，那就不对了。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轻的新干部靠近我们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一显身手，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愕万分，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于是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对它来说“什么都是轻而易举”的，它能消灭科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同志呢？应该怎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呢？我认为，有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是对这些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最好的办法之一。

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做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而且，他们还引证了恩格斯的如下的话：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①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ˆ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编者注

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就是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在19世纪末，在《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英国，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都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而对外贸易在英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极为巨大的。我认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英国的商品生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的命运问题。

附带说一句，不仅在19世纪末，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经达到了英国那样的程度。至于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可是仍然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应该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予以确定的。

于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个国家内，譬如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已经使生产资料集中到可以剥夺并转归社会所有的程度，可是那里的农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分散在人数众多的中小

私有生产者之间，没有可能提出剥夺这些生产者的问题，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该怎么办呢？

恩格斯的公式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也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公式是在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应当怎样。

于是就要问，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如果他们不愿意使自己丢尽脸皮的话。

也不能把另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社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一）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二）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三）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

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

（四）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五）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存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有人说，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于市场而资本家能够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加以剥削，就是说，**只有**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否则，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

不可以这样认为。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占有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占有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子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

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30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來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成分呢？是让国营成分干脆吞没集体农庄成分（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计算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特殊问题。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他们宣称，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消灭商品生产形式，那么在我国似乎就应当恢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切经济范畴：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资本、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这些同志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资本主义生产。他们不了解，我国的商品生产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认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

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和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用”，这真是十分荒谬的：仿佛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用，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现在来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像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他的这本已经不是研究资本主义而是用了一部分篇幅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著作中承认交给社会用于扩大生产，用于教育、保健事业、管理费用、后备基金等等的劳动，是与用来满足工人阶级消费需要的劳动同样必要的。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应当消除旧概念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新情况之间这种不相适合的现象，而用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

我们能容忍这种不适合的现象到一定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是我们应当最后肃清这种不适合的现象的时候了。

3.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

有时人们问，在我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发生作用呢？

是的，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

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的交换。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它的作用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规律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规律的。

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这的确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来合理地进行生产,并使他们遵守纪律。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各种生产数值，精确地计算这些数值，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实有的东西，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蹋它们。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导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这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促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迅速成长，迅速变成现今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

领导者。

糟糕的并不是价值规律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在价格政策问题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紊乱现象。这里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经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调整出售给棉农的谷物的价格，并提高交纳给国家的棉花的价格。于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们感到惊异，因为按照这个建议，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而一吨谷物的价格和一吨面包的价格相等。中央委员们指出：由于磨粉和烘烤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应当高于一吨谷物的价格；棉花总应当比谷物值钱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场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建议人对于中央委员们的这些意见，没有能够说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话来。因此，中央只得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降低谷价，提高棉价。假如这些同志的建议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结果会怎样呢？那我们就会使棉农破产，就会没有棉花。

然而，这一切是不是说价值规律在我国也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发生作用的广阔的场所，价值规律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前面已经说过，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必须这样说。无疑地，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程度。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整个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要求制定的。

这一切就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使得价值规律在我国的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因此也就有了这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和蓬勃地发展，价值规律在我国却没有引导到生产过剩的危机，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发生作用的广阔范围的同一个价值规律，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速度很低，却引导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人说，价值规律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永恒的规律；如果说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么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的效力。

这是完全不对的。正如价值规律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上，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量，将不是以曲折迂回的方法，不是凭借价值及其各种形式来计算，如像在商品生产制度下那样，而是直接以耗费在生产产品上的时间数量即钟点来计算的。至于说到劳动分配，那么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那时已失去效力的价值规律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就是：在我们现今的

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规律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优先发展最能赢利的轻工业，而去发展往往赢利较少、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关闭那些暂时还不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不能产生“应有效果”的重工业企业，也不开设确实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轻工业的新企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依据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的价值规律，把工人从那些对国民经济很需要但赢利很少的企业，调到更能赢利的企业中去。

显而易见，如果循着这些同志的脚步走去，那我们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让给消费资料的生产。然而，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消灭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因为不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放在首要地位，就不能使国民经济不断增长。

这些同志忘记了，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他们忘记了，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因而，也是被大致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的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限制着的。

某些同志由此作出结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消灭着生产赢利的原则。这是完全不对的。情形正好相反。如果不从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角度，不从一年的时间来考

察赢利，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从比方 10—15 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这是唯一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法），那么，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暂时的不牢固的赢利，就决不能与牢固的经久的高级赢利形式相比拟，这种高级赢利形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及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所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它们使我们避免那种破坏国民经济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害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地不断地增长。

简略地说：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

4.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这个标题涉及一些本质上互不相同的问题，但是我把它们都合并在一章中，这并不是要把它们混为一谈，而只是为了节省篇幅。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产生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用系统的整个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对农民的剥夺和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破产。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态度。

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结果也正是这样。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方面所给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的基础，而不断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线上。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

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见恩格斯《反杜林论》）[①]，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中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大家知道，工人对待厂长、工长、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这种敌对态度就是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它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失了。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为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他们之间过去的仇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编者注

至于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失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提出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臆造出来的呢？它对于我们有没有什么实践的或理论的意义呢？决不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臆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对于我们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例如，如果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别来说，那么在我国，这种差别不仅归结为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归结为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有着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情况使得商品流通保存下来，只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个差别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失。因此，不能否认，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这个本质差别的消失，对于我们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问题，也必须这样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开始展开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以前，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进行得并不顺当的，许多同志甚至提出了放慢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太低，远远落后于技术人员的水平。然而当社会主义竞赛在我国已具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正是在这以后，工业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迈进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具有了群众性呢？因为在工人中间成批的同志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技术知识，而且更前进了，与技术人员站在同一水平上，开始修正技师和工程师的意见，打破已经陈旧的现行定额，实行新的更现代的定额等等。假如不是少数几批工人，而是大多数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国的工业就会提高到其他国家的工业

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因此，不能否认，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某些同志断定说，将来，不仅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会消失，而且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别也会消失。这是不对的。工业和农业之间本质差别的消灭，不能引导到它们之间任何差别的消灭。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种差别无疑是会存在的，虽然是非本质的。甚至在工业中，如果就它的各种不同的部门来说，那么工作条件也不是到处一样：例如，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械化鞋厂工人的工作条件，采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某些差别，就更加会保存下来了。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必须这样说。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即文化技术水平的悬殊，无疑是会消失的。但是某种差别，虽然是非本质的差别，还会保存下来，这至少是因为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

持有相反论断的同志们所依据的，大概是我的某些言论中大家知道的一个说法，在那里说到了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消灭，而没有附带说明，那是指**本质**差别的消灭，而不是一切差别的消灭。同志们正是这样理解我的说法，以为它的意思是说一切差别的消灭。但这就表明，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把它抛掉，代之以另一个说法，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差别将会保存下来。

5. 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由这种危机产生的。在战争时期打得不可开交的两个资本主义同盟，其中每一个都指望粉碎敌方，而获得世界霸权，它们都想从这里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美国指望击溃自己最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夺取国外市场、世界的原料资源，并取得世界霸权。

然而战争使这些指望落空了。诚然，作为美、英、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者的德国和日本是被击溃了。但同时，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应该指出，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苏联、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

当然，在这方面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封锁，而是在于战后时期中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

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

这是资本家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是这很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

由于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面前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①]，仍旧有效呢？

（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②]的论点，仍旧有效呢？

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

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条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认为，社会

———————————————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5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42页。——编者注

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美国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控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不让它们互相作战和彼此削弱；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对于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严重损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已经汲取到这种程度，不会让自己再把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相互间的战争，——由于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便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些同志错了。他们只看见显露在表面上的外部现象，而没有看见那些暂时还没有明显地发生作用、但终究会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

从外表上看来，一切都好像是“平安无事”：美国已使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仰其配给；德国（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陷入了美国的铁爪中，顺从地执行着美国的意旨。但是如果以为，这种“平安无事”会“永世地”保存下去，以为这些国家将无止境地忍受美国的统治和压迫，以为它们不会设法挣脱美国的镣铐，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那就错了。

我们首先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吧。无疑地，这两个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无疑地，廉价的原料和有保证的销售市场，对于它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可不可以设想，当美国人在按照“马歇尔计划”进行“援助”的掩盖下，打入英国和法国的经济，竭力把它变成美国经济的附属品的时候，当美国资本在英、法殖民地夺取原料和销售市场，从而为英、法资本家的高额利润制造奇灾大祸的时候，英法两国竟会无止境地忍受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这样说：资本主义的英国，接着还有资本主义的法国，归根到底将不得不从美国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同美国发生冲突，以便保证自己的独立地位，当然也保证自己的高额利润，——这岂不是更正确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

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统治基础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

有人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对苏联作战，即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第二，因为资本家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叫嚷什么苏联的侵略，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苏联一会侵略，因为他们估计到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知道苏联自己是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曾经有人认为德国是彻底垮了，正如现在某些同志认为日本和德国是彻底垮了一样。当时也有人谈论和在报刊上叫嚷美国已使欧洲仰其配给，说德国再也不能站起来，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虽然如此，但是，德国却在被打败后，经过这么 15—20 年的工夫，又从奴役下挣脱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一个强国站立起来并站住了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并提高它的军事经济潜力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英国和美国。当然，美国和英国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意在指使德国站立起来之后反对苏联，即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德国却首先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英、法、美

集团。而当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宣战的时候，英、法、美集团不仅没有与希特勒德国联合起来，反而不得不同苏联结成联盟来反对希特勒德国。

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试问，有什么保证能使德国和日本不重新站立起来，不设法从美国的奴役下挣脱出来，从而过自己的独立生活呢？我认为这样的保证是没有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

有人说，既然现今已经有强大的人民力量成长起来，它们正在保卫和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的论点，应该认为是已经过了时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现今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唤起人民群众去为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斗争。因而，它所抱的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只限于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民主目的。在这一点上，现今维护和平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运动是不同的，因为后一运动曾经走得远些，它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

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现今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

最可能的是，现今的和平运动即维护和平的运动，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会使上述这个战争得以防止，使它暂时推迟，使当前的和平暂时维持，使好战政府辞职而代之以别的愿意暂时维持和平的政府。这当然是好的。甚至是很好的。但是，这仍然不是以根本消除资本主

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其所以不是，是因为纵然有保卫和平运动的这一切胜利，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要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7.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曾经几次在讨论会上提出过。在这方面发表过各种不同的意见，直到最荒谬的意见。诚然，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强烈的反应，而且在这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可是，参加讨论的人谁也没有否认这些规律的存在。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规律是什么呢？它的特点何在呢？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这样一种规律，它不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某一个别方面或某些个别过程，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

价值规律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不是的。价值规律首先是商品生产的规律。它像商品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过，而且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例如在我国，也继续存在着，诚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限制了的。当然，价值規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广阔的作用范围，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方面发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仅不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主义利润的基础，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价值规律不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依据同一理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或各国资本主义

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都不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有人说，平均利润率的规律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不对的。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于平均利润，何况这种平均利润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有下降的趋势。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比较正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润。

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个概念的，是剩余价值规律，即资本主义利润的产生和增殖的规律。这个规律确实预先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然而，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过于一般的规律，它没有涉及最高利润率的问题，而保证这种利润率却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要弥补这个缺陷，就必须把剩余价值规律具体化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应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同时要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随便什么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有人说，对于资本主义在现今条件下的发展来说，平均利润总还可以认为是足够的。这是不对的。平均利润是最低限度的赢利，再低下去，资本主义生产就会成为不可能了。但是，如果认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头子夺取殖民地、奴役各国人民、策动战争只是想给自己保证平均利润，那就可笑了。不，不是平均利润，也不是那照例比平均利润稍为高些的超额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动力。正是由于必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垄断资本主义才采取这样冒险的步骤，例如奴役和不断掠夺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把许

多独立国变为附属国，组织新战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头子们看来，战争是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最好的“生意”），以及夺取世界的经济霸权，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意义之一也就在于：这个规律既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面一切最重要的现象，既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它的胜利和失败，它的长处和短处，——它的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于是就使我们能够了解和说明这一切现象。

请看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例子中的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实践中，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蓬勃发展的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先进技术的旗手、生产技术发展方面的革命家。但是大家同样知道，也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停止发展的另一种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新技术发展方面的反动者，并常常转而使用手工劳动。

怎样来说明这种惊人的矛盾呢？只有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必要性才能加以说明。当新技术向资本主义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拥护新技术。当新技术不再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反对新技术，主张转而采用手工劳动。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情彭，就是如此。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存在呢？是的，是存在的。这个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而，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是带有从高涨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涨的间

歇状态的生产发展，而是生产的不断增长；不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来的技术发展中的周期性的间歇状态，而是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完善。

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是不对的。如果不知道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是为着什么任务而进行，或者任务不明确，那么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以及或多或少真实地反映这一规律的国民经济计划化，是不能自行产生任何效果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只是在具有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所要实现的任务时，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国民经济计划化尤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是包含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中，即表现于这一规律的上述要求内。因此，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起来。

至于说到国民经济的计划化，那么，它只有遵守下列两个条件，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这两个条件是：（一）它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要求；（二）它在各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8.其 他 问 题

（1）关于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外的强制问题。

当然，经济外的强制在巩固地主-农奴主的经济权力方面起过作用，但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不是经济外的强制，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2）关于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财产问题。

如果教科书未定稿中说“集体农庄每一个农户有乳牛、小牲畜和家禽供个人使用”，那就不正确了，大家知道，事实上，乳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是供集体农庄农户个人使用，而是农户的个人**财产**。

“供个人使用”这个说法，大概是从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搬来的。但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中是有错误的。在更加缜密制定的苏联宪法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即是：

“集体农庄每一个农户……拥有宅旁园地上的副业、住宅、产品牲畜、家禽和小农具，作为个人财产。”

这当然是正确的。

此外，应该更详细地说，每个集体农庄庄员按当地的条件，有一头到多少头乳牛，多少只绵羊、山羊、猪（也是按当地的条件由多少到多少）以及不限数量的家禽（鸭、鹅、鸡、火鸡）作为他个人的财产。

这种详细叙述对于我们的外国同志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他们想确切知道，在我国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集体农庄农户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为其个人财产。

（3）关于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数额问题，以及关于购买土地的费用数额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由于土地收归国有，“农民免除了交给地主的地租，其总额每年约为5亿卢布（应当说：“金卢布”）。应该把这个数字弄准确，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所包括的并不是整个俄国的地租，而只是俄国大多数省份的地租。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俄国的一些边区，地租是以实物缴纳的，看起来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此外，必须注意到，农民不仅免除了地租，而且也免除了每年购买土地的费用。教科书未定稿中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呢？在我看来,并没有考虑到，然而这是应该考虑到的。

（4）关于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关的结合问题。

“结合”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这个名词只是很肤浅和叙述式地表明垄断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接近，可是没有揭示这种接近的经济意义。问题在于，这种接近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单是结合，而是国家机关服

从于垄断组织。因此，应该去掉“结合”这个名词，而代之以“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这个说法。

（5）关于在苏联使用机器的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在苏联，在机器能给社会节省劳动的一切场合下，都是使用机器的。”这完全不是应有的说法。第一，机器在苏联总是给社会节省劳动的，因此在苏联的条件下机器不给社会节省劳动的情形是根本没有的。第二，机器不仅节省劳动，而且同时还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因此，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情况不同，在我国的条件下，工人是极乐意在劳动过程中利用机器的。

所以应该说，没有任何地方像在苏联这样乐意使用机器，因为机器给社会节省劳动，并且减轻工人的劳动；由于在苏联没有失业的现象，所以工人极乐意在国民经济中利用机器。

（6）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问题。

当人们谈到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通常总是指在业工人，而没有估计到所谓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物质状况。这样看待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问题，是不是正确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既然有失业工人后备军，而它的成员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生存，那么失业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但是，既然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之中，那么他们的赤贫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在业工人的物质状况。因此我认为，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也应该估计到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状况。

（7）关于国民收入问题。

我认为，一定要在教科书未定稿内添进关于国民收入的新的一章。

（8）关于教科书中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者列宁和斯大林的专门一章的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之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章，应该从教科书

里删去。这一章在教科书中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它并未提供什么新东西，而只是乏味地重复那些在前几章中已经比较详细讲过的东西。

在其余的问题上，我对于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列昂节夫、谢皮洛夫、加托夫斯基和其他同志的《建议》，没有什么意见。

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

我认为，同志们没有估计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全部意义。这本教科书不仅对于我们苏联的青年是需要的；它对于各国共产党人以及同情共产党人的人们是特别需要的。我们的外国同志们都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镣铐的，我们是怎样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了全国经济的，我们是怎样达到了和农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我们是怎样使得我们这个不久以前还是贫弱的国家变成了富强的国家的，什么是集体农庄，为什么我们虽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还没有消灭商品生产、货币、商业等等。他们想知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并不单纯出于好奇，而是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因此，一本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国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因此，需要一本能成为不仅是国内革命青年而且是国外革命青年的必读的教科书。它的篇幅不应太大，因为篇幅太大的教科书不能作为必读书，而且很难领会、掌握。但是它应当包含有关我国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体系的经济的一切基本东西。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提议给教科书添进许多新的章节，历史学家就历史方面、政治家就政治方面、哲学家就哲学方面、经济学家就经济方面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这会使得教科书的篇幅无限扩大。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这本教科书是用历史方法来阐明政治经济学问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应当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变成经济关系史。

我们需要一本500页至多不超过600页的教科书。这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读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可是，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

10. 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办法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过于热心地“斥责”教科书未定稿，责骂作者们的错误和疏忽，肯定说未定稿失败了。这是不公正的。当然，教科书中是有错误和疏忽的，错误和疏忽在大事情中差不多总是有的。但是不管怎样，绝大多数参加讨论会的人终究承认，教科书未定稿可以作为将来教科书的基础，只要作若干修正和补充就可以了。的确，只要把教科书未定稿和现在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教科书未定稿比现有的一切教科书都高明得多。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的巨大功绩就在这里。

我认为，要改善教科书未定稿，应该指派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其中不仅有教科书的作者们，不仅有赞成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人，而且有反对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和猛烈批评教科书未定稿的人。

最好是委员会中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统计学家来检查数字并给未定稿添加新的统计材料，而且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来检查措词的确切性。

应该暂时解除委员会委员的其他任何工作，在物质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保证，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力于教科书的编纂工作。

此外，应该委派一个比方说由三个人组成的校审委员会来最后校审教科书，这对于求得文体的统一也是必要的，可惜在教科书未定稿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把最后定稿的教科书送交中央的期限为一年。

约·斯大林

1952年2月1日

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

诺特京同志：

我没有急于回信，因为您所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不是紧急的。加上另外有些问题带有紧急性，自然就把您的来信搁下了。

现在我来逐点回答。

关于第一点。

在我的《意见》中有一个大家知道的论点：社会在科学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就能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您断定这个论点不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说它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有效，说经济过程的自发性质，比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没有可能利用经济规律以利于社会。

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就曾经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大家知道的规律来反对封建制度，推翻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适合封建制度内部生长起来的生产力的性质。资产阶级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是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封建主反抗这一点，并不是由于他们愚钝，而是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要求他们阻挠这一规律的实现。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这样说。工人阶级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且使这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工人阶级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已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先进力量变成了反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竭力反抗这一规律的实现，——它之所以反抗，并不是由于它没有组织性，也不是因为经济过程的自发性质推动它去反抗，而主要是由于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反对这一规律的实现。

由此可见：

1.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而且在其他社会形态下，都能在这种或那种程度内利用经济过程、经济规律以利于社会；

2.在阶级社会里，利用经济规律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阶级背景，而且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旗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先进阶级，而衰朽的阶级则加以反抗。

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完成过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而是消灭任何剥削；而其他阶级的革命，却只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局限在它们和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相矛盾的狭隘阶级利益的范围以内。

在《意见》中说到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阶级背景。那里说：“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但是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关于第二点。

您断定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达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的完全适合，而在其他社会形态下，只能实现不完全的适合。

这是不对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时代，当资产阶级破坏了封

建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无疑有过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否则，资本主义就不会有像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有过的那样迅速的发展了。

其次，“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

既然这样，那么“完全适合”这种说法该怎样来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第三点。

从您的议论中可以看出，您把我们国有化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首先是生产工具，看作是商品。

可不可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看作是商品呢？据我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

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商品所有者在出售商品之后，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业，丝毫不失去

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不但不会成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

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又讲生产资料的价值，讲它们的成本，讲它们的价格等等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是为了计价、为了核算、为了计算企业的盈亏、为了检查和监督企业所必需的。但这只是事情的形式方面。

第二，这是为了在对外贸易中便于把生产资料出售给外国所必需的。这里，在对外贸易领域内，并且**仅仅是在这个领域内**，我们的生产资料才确实是商品，才确实被出售（不是带引号的出售）。

这样看来，在对外贸易流通领域内，我国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无论在实质上或形式上都保持着商品的属性，可是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现象呢？

原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并不是以变革的方式，而是以逐渐变化的方式进行的，旧的东西并不是干脆被废除干净，而是把自己的本性改变得与新的东西相适应，仅仅保持着自己的形式；至于新的东西，也不是干脆消灭旧的东西，而是渗透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职能，并不破坏它的形式，而是利用它的形式来发展新的东西。不仅商品是这样，而且我国经济流通中的货币也是这样，连银行也是这样，它们失去自己旧的职能并取得了新的职能，同时保持着旧的形式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

如果从形式上，从现象表面的过程来看问题，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仿佛资本主义的范畴在我国经济中也保持着效力。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问题，即把经济过程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把深处的发展过程和表面现象严格区别开来，那就可以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在我国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形式，是外表，实质上这些范畴在我国已经适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根本改变了，

关于第四点。

您断定说，价值规律对于农业中所生产的、依照收购价格交售给国家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发生着调节的影响。您在这里所指的是原料——例如棉花——这样的“生产资料”。在这里您还可以再加上亚麻、羊毛及其他农业原料。

应该首先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农业所生产的并不是“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之一的原料。不能玩弄“生产资料”这个术语。马克思主义者说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首先是指生产工具的生产，——马克思把这叫作“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它构成“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①]。把一部分生产资料（原料）和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等量齐观，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来比，生产工具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谁都知道，原料本身不能生产生产工具，虽然某几种原料也是生产生产工具所必需的材料，可是，没有生产工具是不能生产任何原料的。

其次，价值规律对农产原料的价格的影响，是否像您诺特京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是**调节**的影响呢？如果我国存在着农业原料价格的“自由”涨跌，如果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如果我国没有计划经济，如果原料的生产不是由计划来调节的，那么，价值规律的影响就会是调节的影响了。但是，因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

系中，并没有这些“如果”，所以价值规律对于农业原料价格的影响无论如何不会是调节的影响。第一，我国农业原料的价格是固定的，由计划规定的，而不是“自由”的。第二，农业原料的生产规模并不是由自发的力量，并不是由什么偶然的因素来决定，而是由计划来决定的。第三，为生产农业原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不是集中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而是集中在国家手中。既然这样，还有什么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呢？其实，价值规律本身也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所特有的上述事实来调节的。

因此，不能否认，价值规律是影响农业原料价格的形成的，它是这方面的因素之一。但是尤其不能否认，这种影响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调节的影响。

关于第五点。

说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赢利，我在《意见》中曾经反驳了某些同志，这些同志肯定说，既然我国计划性的国民经济并不偏重于赢利的企业，既然容许不赢利的企业也和这些企业并存，那它仿佛抹煞了经营的赢利原则本身。在《意见》中说，从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着眼的赢利，决不能和社会主义生产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高级赢利相比，因为社会主义生产使我们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保证我们的生产不断地增长。

但是，如果从此得出结论说，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的赢利没有特别价值，不值得重视，那就不对了。这当然是不对的。个别企业和个别生产部门的赢利，从发展我国生产的观点来看，是有巨大意义的。无论在计划建设或计划生产时，这都是应该注意到的。这是我国现今发展阶段上经济活动方面的起码知识。

关于第六点。

您在谈到资本主义时所说的“大大改变了形态的扩大的生产”，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应该说，这样的生产、而且还是扩大的生产，是

世界上所没有的。

显然，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

关于第七点。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这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看作不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

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

约·斯大林

1952 年 4 月 21 日

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

今年 3 月 20 日，雅罗申科同志写了一封信分送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信中谈到在大家知道的十一月讨论会上所讨论过的一些经济问题。他在这封信中抱怨说，在讨论会的一些总结性的主

要文件中以及在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没有得到任何反映”。此外，雅罗中科同志在信中还建议：请淮许他在一年或一年半内编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给他两个助手来做这一工作。

我认为，必须从实质上来分祈一下雅罗申科同志的抱怨和他的建议。

我们先从他的抱怨谈起。

在上述文件中没有得到任何反映的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

一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

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评定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那就应该说，他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还过分缩小了生产关系的作用，竟至宣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雅罗申科同志同意承认生产关系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条件下有某种作用，因为在这里，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但是他把这种作用只看作是消极的作用，是一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作用。生产关系的其他职能，任何积极的职能，雅罗申科同志是看不到的。

至于说到已经没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生产关系“再也不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时，雅罗申科同志便认为，在这里，生产关系的任何独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产关系不再是发展的

重大因素，而且被生产力所吞没，犹如部分被整体吞没一样。

雅罗申科同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生产力的组织中，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手段、一个成分”（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雅罗申科同志回答说：“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泾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正因为如此，雅罗申科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些经济问题，如我国经济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要问题。他公然宣称，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争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的作用，这种争论在我们这里常常带有烦琐的性质，**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以及对这种组织的科学论证”（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分組讨论会上的发言）。

这样就成了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了。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安排好“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了。他认为，只要这样做，就完全足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公然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斗争，就是在社会生产中正确组织生产力和合理使用生产力的斗争。（见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雅罗申科同志郑重宣称：“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这样，“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

雅罗申科同志从这一切便作出结论说，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社会

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有两种政治经济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是研究人们的生产关系；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应当不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是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

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就是这样。

对于这种观点可以讲些什么呢？

第一，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苏联工业的生产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 1917 年 10 月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如果我国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中没有发生这种变革，我国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在最近 20—25 年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在 30 年代在农村中没有用新的集体化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没有这种生产的变革，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的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

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这是现在一切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的。看来雅罗申科同志却不知道这一点。

第二，说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独立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在消失，说生产关系是在被生产力吞没，说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结为生产力的组织，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社会在与自然力作斗争中来取得必要的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虽然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它们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它们能够互相影响。硬说这两个方面中有一个可以被另一个吞没而变成它的组成部分，就是极严重地违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①

可见，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备生产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编者注

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

雅罗申科同志显然是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个原理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合理组织生产力的问题，而抛开了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波格丹诺夫的《普遍组织科学》[①]之类的东西了。

这样，雅罗申科同志在把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个正确思想拿过来以后，却把这个思想弄到了荒谬的地步，竟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作用；而且，本来是有血有肉的社会生产，在他那里却成了片面的和干瘪的生产工艺学，即布哈林的“社会组织技术”[②]之类的东西了。

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约·斯大林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③]

这就是说，每个社会形态，连社会主义社会也在内，都有自己的

——————————————

① 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这部著作于1913—1917年出版。该书认为，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建立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均衡”，是“组织”生产力，而生产力是和生产关系无关的单纯的工艺学。——编者注

② 参看弗·伊·列宁《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注》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编者注

由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究竟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雅罗申科同志已经取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这个多少带独立性的领域，而把生产关系剩下的一点点残余归并到生产力组织之内。试问，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呢？看起来，既然生产关系这一多少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消失，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只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了。

这样就成了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了。这是相当可笑的事情……

一般讲来，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可能的呢？雅罗申科同志显然认为是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最后，说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说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说只要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文献中，对于共产主义有另一个定义，另一个公式，即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①]。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喜欢列宁的公式，而代之以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第一，谁也不明白，雅罗申科同志所吹嘘的这个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或“合理”组织究竟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几十次重复这个神话般的公式，然而他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没有试图用片言只字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了解这个仿佛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

第二，如果对这两个公式加以选择的话，那么应该抛弃的，就不

是唯一正确的列宁的公式，而是雅罗申科同志的所谓公式，他的这个公式显然是臆造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是从波格丹诺夫的武器库——《普遍组织科学》中拿来的东西。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做到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能获得极丰富的产品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能从“按劳分配”的公式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这是大错特错的，这暴露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一窍不通。雅罗申科同志过于简单地、像小孩那样简单地想像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如果让集体农庄集团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经济事实仍然存在，那就既不能获得能满足社会一切需要的极丰富的产品，也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在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以前，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劳动将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从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则成为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

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中科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

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长的矛盾，并及时地采取措施，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增长，来克服这种矛盾。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集团的即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商品流通这样一些经济现象。当然，在目前，这些现象还被我们有成效地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它们对于我国社会肯定是有益的。毫无疑问，它们在最近的将来也还会是有益的。但同时这些现象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地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

3.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为了做到这点，究竟需要什么呢？

如果认为不用大大改变现今的劳动状况，就可以使社会成员的文

化达到这样巨大的发展，那就不正确了。为了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6小时，然后再缩短到5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空闲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再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

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希望，劳动将在社会成员心目中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①]，“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恩格斯）[②]，公有制将被社会全体成员看作是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从社会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将是从一种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到另一种更高的经济即共产主义经济的根本过渡。

可见，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件事，并不像雅罗申科同志所想像的那样简单。

如果像雅罗申科同志那样，企图把这件需要进行极大经济变更的复杂多样的事情整个归结为“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那就等于用波格丹诺夫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

二

雅罗申科同志的其他错误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33页。——编者注

雅罗申科同志从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出发，作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对象的不正确的结论。

雅罗申科同志从每一社会形态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经济规律出发，否认需要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但他是完全不对的，他在这里是与恩格斯、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背道而驰了。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反杜林论》）[①]。因此，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某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而是各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规律。

大家知道，列宁是完全同意这点的，他在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所作的评注中说，布哈林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商品生产,首先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他同时指出，在这里，布哈林是“比恩格斯倒退了一步”[②]。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中所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与此完全符合的。在这个未定稿中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规律”的科学。

这是很明白的。各种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服从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律，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例如，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的规律，在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的规律。所以，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规律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互相联系着。

恩格斯说得完全对：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编者注

② 见弗·伊·列宁《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批注》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编者注

“要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反杜林论》）①

显然，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雅罗申科同志是和布哈林相呼应的。

其次，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探讨和发展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理论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在丧失自己独立的作用，并被生产力吞没而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必须说，在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过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没有经济问题即生产问题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吗？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生产力组织问题来代替经济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雅罗申科同志正好是这样做的，——他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他与布哈林扭在一起了。布哈林**说过**，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政治经济学也必定消灭②。雅罗申科同志没有这样说，却在这样**做**，却在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诚然，他同时装出不完全同意布哈林的样子，但这是诡计，而且是一钱不值的诡计。事实上，他所做的正是布哈林所鼓吹而为列宁所反对的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页。——编者注

② 见弗·伊·列宁《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批注》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编者注

事情。雅罗申科同志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

其次，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但是他大错特错了。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雅罗申科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①]；（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这个定义中没有用恩格斯定义中的“交换”一词。所以没有用，是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理解为商品交换，这种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这有时就会引起误会，虽然恩格斯所说的“交换”不仅是指商品交换。但是，恩格斯用“交换”一词所指的东西，显然在上述定义中已作为其组成部分包括在内了。因而，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这个定义，就其内容讲来，是和恩格斯的定义完全符合的。

2. 当人们谈到某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时，他们通常是从下列这点出发的：一个社会形态不能有几个基本经济规律，它只能有某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来作为基本规律。不然的话，每个社会形态就会有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62 页。——编者注

几个基本经济规律，而这是和基本规律的概念本身相矛盾的。然而，雅罗申科同志并不同意这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以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这是难以相信的，但这是事实。他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中说：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总量的多少和比例，是由被吸引到社会生产中的现有劳动力和劳动力增长的前途来决定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

这是他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雅罗申科同志在同一发言中宣称：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的比例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决定的，而这种生产要有把一切能劳动的人口吸引到社会生产中来所必需的规模。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同时又是我国宪法根据苏联人享有劳动权这点所提出的要求。”

这是所谓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最后，雅罗申科同志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宣称：

“从这点出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在我看来，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

这已经是第三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了。

所有这些规律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或者仅仅它们中间的一个才是呢？如果是它们中间的一个，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呢？对于这些问题，雅罗申科同志在最后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并没有给予回答。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表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时，想必是“忘记了”他在三个月前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中他已经表述过的其他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大概他以为别人不会注意这个很成问题的手法。但他的打算显然是落空了。

我们就假定，雅罗申科同志所表述的前两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已不存在，就假定雅罗申科同志现在认为在他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所表述的第三个公式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来看一看雅罗申科同志的这封信吧。

雅罗申科同志在这封信中说，他不同意斯大林同志在《意见》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他说：

“在这个定义中主要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这里表明，生产是达到满足需要这个主要目的的手段。这个定义使人有根据认为，您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是从生产占首要地位出发，而是从消费占首要地位出发的。”

显然，雅罗申科同志完全没有了解问题的本质，并且看不见，谈论消费或者生产占首要地位，这与问题毫不相干。当人们讲到某种社会过程对其他过程占首要地位时，他们的出发点通常是：这两种过程多少是同一类的。可以而且必须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对消费资料的生产占首要地位，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下，我们所说的都是生产，因而它们多少是同一类的。但决不能说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或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如果这样说，那就是不正确的。因为生产和消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诚然，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着的领域，但毕竟是各不相同的领域。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了解，这里所说的不是消费或生产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给社会生产定出什么**目的**，它使社会生产——比方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服从于什么**任务**。因此，雅罗申科同志关于“生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基础，犹如是其他任何社会的生活基础一样”的说法，也是与问题毫不相干的。雅罗申科同志忘记了，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他忘记了，跟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

究竟可不可以讲社会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讲资本主义生产或社会主义生产所服从的任务呢？我以为是可以而且应当的。

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其发展的形式上）；不是产品，而是剩余产品。从这一观点出发，劳动本身只有在为资本创造利润或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他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因此，所使用的生产劳动量只是在剩余劳动量由于它——或者比例于它——而增长的情况下，才会使资本感到兴趣。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如果劳动不产生这种结果，它就是多余的，就要被制止。

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在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下，这是资本的这样一种趋势：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

从这种理解来看，工人本身就像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的那样，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产的目的。”（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①

马克思这些话之所以精辟，因为这些话不仅简要而精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提示了应当向社会主义生产提出的主要目的，主要任务。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利润，至于消费，只有在保证取得利润这一任务的限度内，才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在这以外，消费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就失去意义。人及其需要就从视野中消失了。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应当服从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624—625页。——编者注

质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中所说的那样，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这里所说的是消费对生产“占首要地位”。这当然是糊涂想法。其实，我们这里的问题不是消费占首要地位，而是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它的主要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这样。

雅罗申科同志想保持所谓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于是断定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的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这是完全不对的。雅罗申科同志粗暴地歪曲了和损害了斯大林同志《意见》中所表述的公式。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生产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却被取消了。结果弄成生产增长是为了生产增长,生产是目的本身,而人及其需要就从雅罗申科同志的视野里消失了。

所以，毫不奇怪，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人既已消失，雅罗申科同志“概念”里剩下的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随之消失了。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弄成了不是生产对消费“占首要地位”，而好像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首要地位”这类的东西了。

3.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问题是要单独谈一谈的。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它不包含对于其他社会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可能有效的什么东西。他说：

“把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经济制定的再生产公式搬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上来，是对马克思学说作教条主义理解的结果，而且是和他的学说的本质相矛盾的。”（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其次，他断定说：“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不能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基础。”（同上）

讲到马克思在其中规定了生产资料的生产（第 I 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第 II 部类）之间的一定比例关系的简单再生产理论时，雅罗申科同志说：

“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是由马克思的第 I 部类的 v+m 和第 II 部类的 c 这个公式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述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在发展中的相互联系是不应当存在的。”（同上）

他断定说：“马克思所制定的关于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适用的，因为马克思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规律。”（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

雅罗申科同志就是这样糟蹋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

当然，马克思由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结果而制定出来的再生产理论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自然也就具有商品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关系的形式。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如果仅仅看到这个形式，而看不出它的基础，看不出它那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效的基本内容，就是一点也不懂得这个理论。假如雅罗申科同志稍微懂得这个理论，那么他也就会懂得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有效的许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些基本原理，比如关于社会生产之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

料的生产的原理；关于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关于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原理；关于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关于社会基金的形成和用途的原理；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这一切基本原理，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有效的，而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计划国民经济时，不运用这些原理也是不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雅罗申科同志本人虽然如此高傲地蔑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但他在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时却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去求助于这些“公式”。

列宁、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注，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些意见中，大家知道，列宁承认，马克思关于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的比例关系的公式，也就是雅罗中科同志所极力反对的公式，不论对于社会主义或“纯粹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二阶段，都仍然是有效的。

至于马克思，那么大家知道，他不喜欢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并没有研究过他的再生产公式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他在《资本论》第 2 卷第 20 章《第 I 部类的不变资本》这一节中论述第 I 部类的产品在这一部类内的交换时，顺便指出，这一部类内的产品交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下那样不断地进行。马克思说：

“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 I 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见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第 8 版第 2 卷第 307 页）①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473—474 页。——编者注

因此，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但他决不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仅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显然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也会是有效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时，是从他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的，他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也应该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那种“共同社会体系”和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时，也是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的，认为这些基本原理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一定适用的。

事实就是如此。

结果，在这里，在再生产问题上，雅罗申科同志虽然对于马克思的“公式”发出放肆的议论，却又碰了壁。

4.雅罗申科同志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的末尾，建议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写道：

“根据我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以及这封信中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定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我能在一年内，至多一年半，在两个人的帮助下，从理论上来解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基本问题，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定会把这一科学变成人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有效武器。”

不能不承认，雅罗申科同志所犯的毛病并不是谦虚。如果使用某些著作家的笔法，可以说：“甚至完全相反。”

上面已经讲过，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领导机关的经济政策混为一谈。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社会基金的形成等等——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

我更不必说，雅罗申科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我们不能给予他这样的委托。

* * *

结论；

（1）雅罗申科同志对讨论会领导人的抱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讨论会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不能在自己总结性的文件中反映雅罗申科同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2）雅罗申科同志提出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请求中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①]的气味。

约·斯大林

1952 年 5 月 22 日

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

我收到了你们的信。可以看出，你们是在深刻地认真地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信中有不少正确的说法和有意思的见解。但除此以外，信中也有一些严重的理论上的错误。我在这封回信中只想谈谈这些错误。

1.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

———————————————

① 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后來成了撒谎家和吹牛家的代名词。——编者注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断定说：“仅仅由于从事物质生产的苏联人的自觉行动，才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一论点是完全不正确的。

是不是在我们之外客观地、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地存在着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呢？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客观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公式对这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就是说，这两位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理论的观点上，这种理论断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社会领导机关所“创造”、“改造”的。换句话说，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当然，人们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假定说，我们暂且采取不正确理论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生活中有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并宣告可能“创造”经济规律，“改造”经济规律。结果会怎么样呢？这就会使我们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使我们处在奴隶似地依赖于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们不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简直无法在这偶然性的混乱中找出头绪来。

这就会使我们取消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因为不承认客观的规律性，不研究这些规律性，科学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取消了科学，我们就没有可能预见国内经济生活中事变的进程，即没有可能把哪怕是最起码的经济领导工作做好。

归根到底，我们就会听凭那班不理解和不考虑客观规律性而决心“消灭”经济发展规律和“创造”新规律的“经济”冒险主义者任意摆布。

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曾经提出了如下一个

马克思主义对这问题的经典说法：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①

2. 关于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办法问题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这当然不是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民的（“国家的”）所有制的水平，必须采取些什么办法呢？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320页。——编者注

有些同志认为，应该依照从前处理资本主义财产的例子，干脆把集体农庄财产收归国有，宣布它是全民的财产。这个建议是完全不正确的，是绝对不能采纳的。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财产，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像处理资本主义财产那样来处理它。无论如何不能因为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全民的财产，就说集体农庄的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财产。

这些同志以为，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是唯一的或无论如何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转归国家所有，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国有化形式，而是原始的国有化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关于这点所正确说过的那样。当国家还存在的时候，转归国家所有，无疑地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始的国有化形式。但国家并不是永世长存的，随着社会主义的活动范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的扩大，国家将日渐消亡，因而把个别人的财产和个别集团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的问题当然也就会消失。国家一定消亡，而社会是一定留存下来的。因此，作为全民财产的继承者的，已经不是将要消亡的国家，而是以中央经济领导机构为代表的社会本身。

那么，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所建议的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基本办法是：把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生产工具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样来解除国家对农业提供基本建设投资的负担，让集体农庄自己负责维持和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他们说：

“如果以为集体农庄的投资应该主要用在集体农庄的文化需要上，而用于农业生产需要的投资，大部分仍旧应该由国家负担，那就不正确了。由于集体农庄已经完全能够把这一负担承当起来，解除国家这一负担，岂不是更正确些吗？为了使我国的消费品极其丰富，国家在

自己的投资方面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为了论证这一建议，建议人提出了几个论据：

第一，建议人援引斯大林所说生产资料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这句话，而对斯大林的这一论点表示怀疑，宣称国家毕竟在向集体农庄出售生产资料，如像大镰刀、小镰刀以及小发动机等等之类的小农具。他们认为，既然国家把这些生产资料出售给集体农庄，那么国家也可以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之类的一切其他生产资料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一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国家是把小农具出售给集体农庄的，依照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和宪法，这是可以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小农具和像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那样的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相提并论，或者，把它们和也是农业基本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相提并论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其所以不可以，是因为小农具丝毫也决定不了集体农庄生产的命运，可是像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以及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决定农业的命运的。

不难理解，当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出售给集体农庄的时候，他所指的不是小农具，而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即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土地。建议人玩弄“生产资料”这个字眼，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他们不知不觉地碰了壁。

第二，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又引证说，在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的时期——1929 年底和 1930 年初，联共（布）中央自己曾经主张把机器拖拉机站转归集体农庄所有，同时要求集体农庄在三年内偿清机器拖拉机站的价值。他们认为，虽然这事情当时“因为”集体农庄“贫穷”而失败了，但是现在，当集体农庄已经富裕的时候，可以重新实行这个政策——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一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在 1930 年初，联共（布）中央确实曾经通过一项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的决定。当时是按照一部分集体农由突击队员的建议，作为试验、作为尝试而通过这个决定

的，为的是在不久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加以考察。但头一次检查就表明这一决定是不妥当的。过了几个月，即在 1930 年底，就把这个决定取消了。

后来集体农庄运动进一步的增长和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庄员以及领导工作人员都最后地确信，把农业的基本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手中，是保证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度增长的唯一方法。

我们大家都庆幸我国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谷物、棉花、亚麻、甜菜等等生产的增长。这种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呢？这种增长的源泉就是现代技术，就是许许多多为这一切生产部门服务的现代化机器。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而是在于技术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须继续日新月异地改进，旧的技术必须作废，代之以新技术，新的再代之以最新的。不这样做，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不断进步就是不可思议的，要取得丰富的收获，要使农产品丰富，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要把几十万台轮式拖拉机作废，代之以履带拖拉机，把几万台陈旧了的联合收割机作废，代之以新的联合收割机，以及例如，为经济作物制造新的机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负担几十亿的支出，这些支出非经过 6—8 年之后不能完全收回。即使我国的集体农庄是百万富翁，它们负担得了这样大的支出吗？不，负担不了，因为它们没有力量负担要在 6—8 年之后才能完全收回的几十亿的费用。这种支出只有国家才负担得了，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负担得起由于旧机器作废和换用新机器所受到的损失，因为国家，并且只有国家才能在 6—8 年之内承担这种损失，直到这笔费用收回为止。

既然如此，那么要求把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使集体农庄遭受巨大损失，使集体农庄破产，破坏农业的机械化，降低集体农庄生产的速度。

由此可得出结论说，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

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就是向落后方面倒退一步，就是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

就暂且假定一下，我们接受了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建议，并着手把基本生产工具、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第一，结果就会是集体农庄成了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换句话说，它们就会处于我国无论哪一个企业都没有的特殊地位，因为大家知道，在我国，甚至国有化的企业也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究竟用什么来作为集体农庄的这种特殊地位的根据呢？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进步的、前进的考虑呢？可不可以说，这样的地位就会促使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就会加快我们的社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如果说这样的地位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不是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反而远离共产主义，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第二，结果就会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些吗？

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大概他们以为，就是有商品流通，也可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商品流通是不会妨碍这个事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而犯的严重错误。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会使杜林的所谓“经济公社”走向复活资本主义的地步。大概，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是不同意这一点的。那就对他们更糟了。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

者是从这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及按照需要来分配产品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排斥任何商品交换的，因而也排斥把产品转化为商品，也就是把产品转化为价值的。

关于萨宁娜和文热尔两同志的建议和论据的情形，就是如此。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

集体农庄不是普通的企业。集体农庄是在土地上工作，而它耕种的土地早已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并不是它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

其次，集体农庄借以进行工作的基本生产工具，并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因而，集体农庄不是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

再次，集体农庄是合作企业，它使用自己庄员的劳动，按照劳动日把收入分配给庄员，而且集体农庄有自己年年更换的、用于生产的种子。

试问，集体农庄究竟占有一些什么？它可以完全自由地任意支配的集体农庄财产又是什么呢？这种财产就是集体农庄的产品，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即谷物、肉类、油类、蔬菜、棉花、甜菜、亚麻等等，而建筑物和集体农庄庄员园地中的个人副业不计在内。问题在于，这种产品的大部分，即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进入市场，从而列入商品流通系统。正是这种情况现在阻碍着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所以正应该从这一方面展开工作，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我们还没有发达的产品交换制度，但是有产品交换的萌芽，即农

产品的“换货”。大家知道，对植棉、种麻、种甜菜和其他的集体农庄的产品早已实行“换货”了。诚然，这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换货”，但总算是在“换货”了。要顺便指出：“换货”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应该用产品交换来代替它。任务是在于，要使农业的一切部门中都培植这些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把它们发展成为广泛的产品交换系统，使集体农庄用自己的产品换得的不仅是货币，而主要是必要的制成品。这样的制度需要大量地增加城市送交农村的产品，所以，推行这种制度不能过分性急，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但是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

这样的制度既缩小着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就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此外，它使我们有可能把集体农庄的基本财产即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纳入全民计划的总系统中。

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要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这将是实际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办法。

这样的制度对于集体农庄的农民是否有利呢？无疑是有利的。其所以有利，是因为集体农庄农民从国家手中获得的产品，将比在商品流通中获得的要多得多，价钱也更便宜。大家知道，和政府订有产品交换（“换货”）合同的集体农庄所获得的利益，较之没有订立这种合同的集体农庄，要多得无比。如果把产品交换制度推广到全国所有的集体农庄，那么我国全体集体农庄农民就都能享受这些利益了。

约·斯大林

1952 年 9 月 28 日

译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1952 年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第 20 卷第 115—183 页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①]上的讲话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

同志们！

让我代表我们的代表大会，向所有派遣代表光临我们的代表大会或给代表大会拍来贺电的兄弟党和团体表示谢意，感谢它们的友好祝贺，感谢它们希望我们成功的愿望，感谢它们的信任。

我们特别珍视这种信任，这种信任表示它们决心支持我们党为各国人民的光明的未来而斗争，为反对战争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如果认为我们党已成为强大的力量而不再需要支持，那就错了。

这是不对的。我们党和我们国家过去和将来始终需要外国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

这种支持的特点就在于：任何兄弟党对我们党的和平愿望的一切支持，同时也就是对它们本国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的支持。当1918－1919年英国资产阶级武装进攻苏联的时候，英国工人在“不准干涉俄国”的口号下组织了反对战争的斗争，这就是支持，首先是对他们本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支持，其次也是对苏联的支持。现在多列士同志或陶里亚蒂同志宣布他们国家的人民不会对苏联人民作战，这就是支持，首先是对法国和意大利正在为和平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

——————————————

① 这次代表大会于1952年10月5—14日在莫斯科举行，议程是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1951—1955年苏联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修改党章和选举党中央机构。大会通过决议，把党的名称由“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并把中央政治局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党监察委员会改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编者注

的支持，其次也是对苏联的和平愿望的支持。这种互相支持的特点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党的利益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利益不但不矛盾，反而是融合在一起的。至于苏联，它的利益是和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根本分不开的。

自然，我们党不能不报答兄弟党，我们党也必须支持兄弟党和支持它们本国的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大家知道，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在 1917 年我们党取得政权以后，在我们党采取了实际措施来消灭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以后，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给予我们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们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资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党没有辜负这种希望，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粉碎了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暴政，使欧洲和亚洲的各国人民摆脱了法西斯奴役的威胁。当然，只要这支“突击队”还是唯一的一支突击队，只要它还是几乎单枪匹马地执行这个先进的任务，那么，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是很困难的。不过，这是过去的情况。现在完全不同了。现在，从中国和朝鲜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经出现了人民民主国家这些新的“突击队”，——现在，我们党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而且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愉快了。

那些还没有取得政权而继续在资产阶级残酷法律的统治下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或工农的政党，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当然，它们工作起来是比较困难。但是，它们不像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在沙皇制度时期那样困难了，那时候，稍微往前动一动都被宣布为滔天的罪行。但是，俄国共产党人坚持下来了，没有为困难所吓倒，而且获得了胜利。这些政党也会这样的。

为什么这些政党进行工作，终究不像沙皇时期俄国共产党人那样困难了呢？

第一，因为在它们面前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斗争和成就的榜样。因此，它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错误和成就中学习，从而便于进行自己的工作。

第二，因为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本身已经和以前不同了，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已经变得更加反动，已经失去同人民的联系，因而把自己削弱了。自然，这种情况也一定会便于革命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进行工作。

从前，资产阶级敢于实行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从而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树立了声望。现在，连自由主义的影子也没有了。所谓“个人自由”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仅仅那些拥有资本的人才被承认有个人权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则被当作只适于供剥削的“人料”。人人平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被践踏了，代替它的是少数剥削者享有充分权利而占公民大多数的被剥削者毫无权利的原则。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被抛弃了。我认为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围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

从前，资产阶级被当作民族的领袖，它维护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把它们看得“高于一切”。现在，连“民族原则”的影子也没有了。现在，资产阶级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来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毫无疑问，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本国的爱国者的话，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自然，所有这些情况一定会便于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进行工作。

因此，有一切理由指望受资本统治的国家中的兄弟党能够成功和胜利。

我们的兄弟党万岁！

兄弟党的领导者们永远健康！

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万岁！

打倒战争挑拨者！

译自《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1952年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第20卷第186—189页

附　卷

斯大林历史档案选

苏维埃文化应在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2年7月3日）

第5018/C号

致政治局全体委员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关于通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以争取接近我们的青年诗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非常及时的。我认为，某些“无产阶级思想家们”（波格丹诺夫[①]等人）议论得很多的苏维埃文化（就其狭义内容而言），现在才刚刚开始形成。这种文化应当在倾向于苏维埃的年轻诗人和文学家同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反革命流派和集团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把倾向于苏维埃的诗人团结成一个核心，并千方百计地在这场斗争中支持他们，这就是任务所在。我认为，这种团结年轻文学家的最适当的形式，应当是组织起一种独立的，譬如说，“俄罗斯文化发展协会”或者类似的机构。试图把青年作家拴到书刊检查委员会或别的某个“官方”机关那里的办法，只会把年轻诗人推开，并把事情搞糟。最好是一定让一名非党的但是倾向于苏维埃的作家，例如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②]这样的人，去担任协会的领导。物质上的支持，直到以某种可接受的形式出现的补贴，

————————————————

① 波格丹诺夫（马林诺夫斯基），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医生，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家。

② 伊万诺夫，俄国作家，20年代以《游击队员们》、《铁甲列车14-69》等作品著称。

是绝对必需的。

为提供情况，附上宣传鼓动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同志对我的相应查询的回答。

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一第142—143页

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谦虚也更准确

——在同作家们会见时的讲话片断

（1932年10月26日）

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可以成为好的艺术家。有过这样的艺术家。例如莎士比亚。

……

我以为，一个人要是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话，就不会去写诗，他会成为经济管理人员或者想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全都想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提纲塞满艺术家的脑袋里。艺术家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他要是真实地表现生活，就不能不发现，不能不表现引导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他在同高尔基的谈话中更明确地论述了这个概念：）

我们不必特别强调苏联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无助于创作力量的统一。不应该冒进，提出“共产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现在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谦虚也更准确。这个说法的优点，首先是简洁（只有两个词），其次是好懂，第三是表明文学发展中的继承性（资产阶级民主社会运动阶段产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无产阶级杜会主义运动阶段转变、发展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年版第210-211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一第144页

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

就《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问题的讲话

（1946 年 8 月 9 日）

我们列宁主义者认为，任何一本杂志，不管是科学杂志还是文艺杂志，都不能是不问政治的。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作家、许多责任编辑以及其他一些人都以为，政治是政府的事，是中央委员会的事。他们说，政治家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一个人写得好，写得漂亮，有艺术性，就应该放行，尽管其中有腐朽的地方，会使我们的青年迷失方向，会毒害他们。这就是我们与许多文学家和担任编辑部领导职务的人的分歧所在。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求我们文学界的领导同志和写作者以苏维埃制度赖以生存的东西即政治为准则，以使我们教育青年时不采取轻率的、缺乏思想性的态度。不像左琴科那样去教育人，因为他们鼓吹无思想性，他们说：“让你们和你们的批评去见上帝吧！我们想休息休息，快活地生活，笑上一笑”。因此他们写了这样一些毫无内容的浅薄东西，甚至不是什么特写和短篇小说,而是催吐药粉。能容忍这样的人呆在文学界吗？不，我们不能养这样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编辑、编委会成员、作家同志们，你们要考虑这一点。苏维埃制度不能容忍以轻率的态度、缺乏思想性的精神来教育我们的青年，因此我们的文学家同志们应该改弦更张。左琴科在写作。我们的另一些人在忙着，不总是能得到版面，而左琴科能得到版面。这就是对全民事业的非政治态度。

其次，对作家持一团和气的态度。不是采取政治立场，而是持一

团和气的态度。这一切都由于文学家不问政治。由于对人一团和气，他们干脆不作批评。这也是不行的。这方面的自由主义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对我们青年进行正确教育的利益。哪一个更高：是一团和气的关系还是国家的利益？我认为后者更高。人们互相迁就。不应该害怕批评。没有批评将一事无成。还不仅如此。一个人不会作自我批评，不会检查自己的工作，每一天结束时不会向自己提问：“我今天工作得怎样？”——这样的人不能是苏维埃人，这样的人是懦夫。不仅如此。这个人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真相。因此许多人才不喜欢别人批评他们。而我们欢迎人们对我们的批评。这不舒服,但我们欢迎，因为没有这样的批评，一个人就会腐朽变质。当机体的疾病耽误了，病魔就会把爪子伸得更深。病情越早暴露就越好，越能活．治愈得越快。对个别人来说，对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应该勇敢面对批评，应该每一天有勇气总结自己的工作，问一问自己．我能干得更好吗？不错。我取得了成果。可是我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形成人们不断完善、不断前进的局面。我们文学界的领导同志也缺少这一点。他们由于一团和气就想牺牲我们青年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这是不行的。

这是总的前提。可是实际上因此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愿意我们杂志的编辑们工作出色。有的编辑负责任，也有的编辑不负责任，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这还不全是这么回事。应该有一个主编在杂志方向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他手下有高级的编辑委员会、副主编。但应该有一个人对文学产品负责，主持杂志，能对国家和党负责。编辑部里应该有人,哪怕是一个人，有批评发表作品的作家的道义权利。如果放在那里的是一个不小的人物，但在文学问题上却是糊涂虫，那没有人会听他的，他也不可能承担起批评的权利。瞧，该有一个威信高的人，精通文学的人。也许他自己曾经写作过，也许他有经验，但该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能有充分的权利给作者们提出意见。他可以说：

“我读了这部作品。我认为这部作品很出色。这跑不了。可是仔细看看的话，那里有些地方不好。”因此编辑部里应该有个人能进行批评，帮助年轻作家，能站在正确的道路上。要是编辑们把不冒犯任何人当作准则，顾忌阿赫玛托娃当年有威望,而现在在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不能当面跟她说：“您该知道，现在是1946年，也许30年前您为过去写作得很好，而我们是现在的杂志。”应该有勇气说。

难道我们的杂志是私人企业？是单独的一群人？当然不是。在别的国家里。杂志是像提供利润的工厂那样的企业。如果杂志不提供利润，那就要被关掉。这是单独一群资本家、英国勋爵的私人企业。谢天谢地，我们不是这样的制度。我们的杂志是人民的、我们国家的杂志，任何人无权去迁就不愿承认我们任务和我们发展的人的口味。阿赫玛托娃等人，关我们什么事。我们的利益是一个——教育青年，回答他们的需求，把新一代教育成朝气蓬勃、相信自己的事业、不怕障碍、决心克服任何障碍的一代。难道安娜·阿赫玛托娃能教育这样的人？还是那个粗俗的短篇小说作家左琴科能行？同他们有什么好客气的！

要的就是这样的编辑．他们不怕对作家们说真话。他们把正确教育青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当作目标。要是我们不这样以对事业的信仰的精神教育青年，我们就不能击败德国人。大家清楚这一点．大家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应该选拔这样的编辑，他能勇敢地主持自己的事情，不左顾右盼，只考虑国家的利益、正确教育青年的利益——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现在来具体谈谈杂志。《星》杂志提供了许多好作品。要是萨亚诺夫能承担，他有足够勇气真正领导这样的战斗杂志。那我倒愿意他继续担任主编。有时杂志成了邮箱，来什么，就收下什么。杂志同邮箱有什么区别？区别是把坏东西放在一边，把好东西收下。要是萨亚诺夫同志能使《星》不变成邮箱和仓库，能使《星》成为领导作家写

作的杂志．能指出前进的方向路线，我就支持萨亚诺夫。有人说他性格软弱，意志不坚定。对还是不对，我不了解他。至于左琴科则不能让他进．因为总不能让我们去改变口味。让他改弦更张吧！他不想改弦更张那就让他见鬼去。

另一本杂志是《列宁格勒》。我发现这两本杂志总的来说也许材料不够．因此有时才刊登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因为杂志总得出版。难怪出现了双月合刊，而且不标明月份，隐瞒了。瞧，萨亚诺夫同志默不作声，让他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杂志在全俄罗斯发行，却不标明这一期杂志是在哪个月出版的。这是否是因为高质量的材料不够，他们有时不得不按强制目录把商品放行。对列宁格勒和对我们人民的事业来说，也许办一份杂志更好，给它更多的纸张，把优秀的作家引进到那里去。维什涅夫斯基同志把这件事描述得十分悲惨。没有任何悲剧。这叫作合理化。（会场上笑声）将办一份有更多纸张、更高质量作家的杂志。事情办好了，以后也许通过芽殖[①]将创办三份杂志。要是列宁格勒出现五份杂志的话，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样一点也不坏。不过现在看来力量不够，你们因此不得不为了数量而牺牲质量。我以为办一份好杂志要比办两份蹩脚杂志好。近来《星》杂志缺人。

至于那些从前线回来、想把爪子伸进杂志的人,他们中也有军人，有军衔，级别高，非常执着。这样的人你们不应该放进来。有的是军人，军衔高,级别高，要是他在文学上差呢？同样决不能放他们进去。编辑同志们，请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感到为难，要是我们从前和现在的军人成了文学家，来缠着你们，请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感到为难。对他

——————————————

① 芽殖（Budding），即出芽生殖，是指生物细胞核邻近的中心体产生一小突起，逐渐冒出小芽，当芽长到正常大小后，与母细胞脱离，成为一独立的细胞的过程。——本书编者注

们要像对其他作家一样批评。请你们知道，党中央只会夸奖你们，因为你们有力量连这样的人都敢批评。尽管他们军衔高，级别高，对文学却一知半解。关于这件事，维什涅夫斯基说,有一个军人来找过他。要是他是个傻瓜呢？就这么跟他说：“去学习，你会得到尊敬；要是学不好。就不应去要不该得的东西。”军衔高，级别高，为此他得到了奖励，但文学不应因此受到损害，教育的利益不应因此受到损害。这些人在战场上打得很英勇，但大家不要以为，那里没有像左琴科那样哭鼻子的人和作家。什么人都有，因为在军队中有 1250 万人。难道可以以为他们全都是天使，真正的人。难道可能会这样？什么情况都有。对这些人应像对所有的人一样，你写得好，就给你荣誉和尊敬，写得不好，那就去学习。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6 年第 3 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一第 146—150 页

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

——致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

（1924年8月19日）

俄共中央全会：

从列宁离职到以后逝世，我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在政治局共事已经一年半了，这段经历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不可能在一个小的集体范围内，与这两位同志开诚布公地共同进行政治工作。有鉴于此，我请求批准我退出中央政治局。

鉴于总书记不可能不是政治局委员，也请求我退出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

请批准我休假进行治疗，为期约两个月。

休假期满后，我请求另行分配工作，或者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或者到雅库特州，或者到国外的任何地方，从事不显眼的工作。

上述问题，请全会在我缺席和我不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因为我认为，除了这封信的第一段已提出的意见外，再作其他说明都于事业不利。

恳请古比雪夫同志将这封信的副本分送给各位中央委员。

致以

共产主义的敬礼！

约·斯大林

1924年8月19日

古比雪夫同志：

我写此信给您，而不是给中央书记们，是因为：第一，在这件可

谓有争执的事情中，我不可能绕过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中央书记们不了解此事的有关情况，我也不愿平白地打扰他们。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祖国》杂志
1994 年第 7 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一第 165—166 页

再次请辞“总书记”职务

（1926年7月22日）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讲话

请允许我就宣读的这封信[①]谈几点意见。从这封信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一个结论是：想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由另一个具有同样品质、但不粗暴的人取而代之。出席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不认为这是不谦虚——所有代表团，无一例外，都主张斯大林留任总书记之职。我手头就有这些决议，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宣读。

（有人喊道：不需要。）

虽然如此，在十三大以后紧接着召开的我党中央一中全会上，我仍然提出辞职。全会对我的辞职请求未予考虑，我记得，还一致决定要我留任总书记。这样一来，我该怎么办呢，同志们？我是身不由己呀，我服从全会的决定。

第二个结论是：由于我是按照党的意志留在总书记岗位上的，我也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克服粗暴作风，改掉它。

（有人喊道：还有不谦恭这一条。）

还有不谦恭……

原载俄罗斯《祖国》杂志
1994年第7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一第167页

——————————

① 指列宁给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信。

三次请辞“总书记”职务

（1926 年 12 月 27 日）

致主持中央全会的李可夫的辞职声明

中央全会（李可夫同志）：

谨请解除我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兹声明，我不能再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也没有能力再在这一岗位上工作。

约·斯大林

1926 年 12 月 27 日

原载俄罗斯《祖国》杂志
1994 年第 7 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一第 168 页

建议取消“总书记”的设制

（1927 年 12 月 19 日）

斯大林：同志们！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已经有三年了。每次中央全会都拒绝了我的请求。我知道，不久以前的种种情况使党还需要我留在这个岗位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果断，是消除反对派危险的某种解毒剂。我知道，尽管列宁同志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但当时确实需要让我留任总书记。但是，现在这些情况，已经不复存在。说不复存在，是因为反对派如今已被粉碎。反对派似乎还从未遭到过这样的惨败，他们不仅被粉碎，而且被开除出党。因此，当初全会拒绝我的请求，不肯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的那些理由现在已不复存在，当时这些理由似乎还是正确的。再说，你们都有列宁同志的指示，我们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我认为应该加以落实。我认为，党在不久以前不得不对这个指示保持沉默，是为党内发展的众所周知的情况所迫。我再说一遍，这些特殊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我认为，该把列宁的指示付诸实施了。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同志们，请大家相信，这样做只会给党带来好处。

多加多夫：无需辩论，直接表决。

伏罗希洛夫：我建议否决上面的声明。

李可夫[①]：无需辩论，直接表决。柯秀尔同志的建议可作为基础。现在对斯大林同志解除他总书记职务的建议进行表决。谁赞成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弃权？一人弃权。除一人弃权外，所有的人都反对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

① 此次全会由李可夫主持。

斯大林：那么，我想提出另一个建议。中央委员会或许会认为取消总书记的设制是适宜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有不设这一职位的时候。

伏罗希洛夫：那时候我们有列宁。

斯大林：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没有总书记的设制。

有人喊道：是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

斯大林：对，好像是十一大以前我们没有这种设制。那时列宁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如果说列宁认为必须提出建立总书记制的问题，那么我估计，他是从十大以后我们党内出现的特殊情况出发的。当时党内形成了力量较大且组织严密的反对派。现在，这些情况在党内不复存在，因为反对派已被彻底粉碎，因此，可以考虑取消这种设制。许多人都把总书记有某些特权的说法归咎于总书记的设制。我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应当说，同志们也可以证实，总书记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不同于书记处其他成员权力的特殊权力。

有人喊道：那么责任呢？

斯大林：也没有比书记处其他成员更多的责任。我认为，有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机构，有书记处——由5人组成的执行机构，书记处的这5名成员，大家都是平等的。实际上也是这样进行工作的，总书记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责任。没有发生过未经书记处批准而独自下达指示的事情。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实际上没有拥有特殊权力的总书记，而只有一个称为中央书记处的集体。我不晓得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个名存实亡的设制。况且这种总书记的设制、名称，在各地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在中央，总书记的设制实际上没有带来任何特殊权力和特殊责任，而在地方却发生了某些不正常的情况，现在在所有的州里，被称作书记的同志们之间都由于这一设制而发生争斗，例如在各民族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里。总书记现在太多了，地方上产生的特权无不与此有关。为什么还要保留呢？

施米特：地方上可以取消。

斯大林：我想，党如果取消总书记的职位，从而使我有可能从这个岗位走下来，对党是有利的。可以在党章中不规定设总书记一职，这样做比较容易。

李可夫：我建议，不要给斯大林同志创造辞去这一职务的条件。至于外州和地方机关的总书记，则需要改变，似不必改变中央的现状。总书记的职位，当初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设置的。在那以后的时间里，不管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还是他逝世后，（组织上和政治上都）证明这种设制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正确的。设置这一职位和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的工作，所有反对派，所有现在被我们开除出党的那些人，也都参与了。全党所有人对于是否需要总书记的设置和谁来出任总书记记都没有异议。我认为，这样就完全彻底地解决了执行遗嘱的问题（因为这一条已经解决了），同时，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同我们一模一样。这是全党尽人皆知的。难道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情况有了什么变化，（需要）取消总书记的设制吗？

斯大林：反对派已被粉碎。

李可夫：是啊，正是由于党的出色工作，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出色工作，反对派才被粉碎。

有人喊道：对！

李可夫：难道一方面我们在十五大之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需要把中央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吗？难道需要把中央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以致要在我们的（这个）决议中对已被完全消灭的反对派作出无论何时和以任何方式都不应作出的让步（我看，很可能会让人理解成这样）吗？既然列宁在世时和（列宁）以后的实践，既然总书记的设制本身（以及应当担任总书记的那个人）和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所做的工作，均已被我们的整个组织生活和政治生活（不管是列宁在

世时，还是在列宁逝世后）证明是正确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么，我认为，就没有任何理由改变现状。

斯大林同志有一点说得是正确的，即（我们）书记处、政治局和组织局（以及各地）的工作，完全是由集体做的，一切事情都由所有成员集体负责，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同志对书记处所负的责任毕竟要比书记处其他成员大一些，这也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这种责任应当延续下去。

有人喊道：（这是事实！）对！

李可夫：我提议，对斯大林同志的建议予以否决。

有些人喊道：对，表决吧！

李可夫：有人提议进行表决。

有些人喊道：是的，是的。

李可夫：现在进行表决。谁赞成斯大林同志取消总书记设制的建议？谁反对？谁弃权？没有。

斯大林：同志们，在第一次表决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时，我没有表态，忘记表态了。请把我的一票算作反对票。

有人喊道：这没有多大关系。

原载俄罗斯《祖国》杂志
1994 年第 1 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一第 169—172 页

我老了，请大家另选一位书记吧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摘录）

（1952年10月16日）

……

（维·米·莫洛托夫在讲台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为自己辩解并声称自己始终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

斯大林（打断莫洛托夫）说：“胡说八道！我没有什么学生。我们大家都是伟大导师列宁的学生。”

（斯大林提议解决组织问题，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取代政治局的是大大扩充了的主席团，还有苏共中央书记处——共计36人。）

斯大林说：“名单里有除了安·安·安德列耶夫之外的原政治局全体委员，受人尊敬的安德列耶夫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他耳朵聋了，完全听不见声音，不能工作了，让他安心养病吧。”

（会场上有人喊道：“应当选举斯大林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不行！请解除我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马林科夫（在讲台上）说：“同志们！我们大家应当全体一致地请求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继续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斯大林（在讲台上）说：“中央全会上用不着鼓掌。应当不带情绪地、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请求解除我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我老了，文件也不看了，请大家另选一位书记吧。”

（铁木辛哥说：“斯大林同志，人民不会理解的。我们大家一致选举您为我们的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不可能有另一种决议。”）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支持铁木辛哥。**斯大林**站了很长时间，看着会场，然后一摆手坐下了。）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2005 年版第 757 页　档案附卷一第 173—174 页

围绕着我个人的狂热从何而来

——与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的谈话（节录）

（1937年1月8日）

福伊希特万格：我在这里只有四五个星期。初步的印象之一是：我觉得对您表达尊敬和热爱的某些形式是夸张的和低俗的。您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朴实的谦虚的人。这些形式对您来说是不是一种多余的负担？

斯大林：我完全同意您的话。当夸大到过于夸张时是令人不愉快的。人们为一些小事而倾倒。在几百封致敬信当中我只回答一二封，不允许把其中大多数发表出来，只要我知道，就完全不允许发表过于热情的致敬信。这些致敬信十分之九确实都是低俗的。它们都给我以不愉快的感觉。

我想要不进行辩护，——不能进行辩护，而想要力所能及地说明这种围绕着我个人的达到甜腻腻的程度的遏制不住的狂热是从何而来的。看来是因为我们国内解决了整整几个世纪几代人——巴贝夫派、埃贝尔派[①]，以及法国、英国、德国的革命者的各种其他的派别——力求解决的任务。看来这个（工农群众一直关心的）摆脱剥削的问题的解决，使得人们欣喜万分。人们对摆脱剥削过于高兴了。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喜悦了。

摆脱剥削是一件很大的事，于是群众以自己的方式来庆贺这件事。把一切都归功于我，——这当然是不对的，一个人能做什么呢？他们把我看作一个综合性概念，于是在我周围燃起了傻乎乎的兴奋的大火。

———————————————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巴贝夫、埃贝尔追随者们组成的派别。

福伊希特万格：我作为一个同情苏联的人，看到并且感觉到对您的敬爱的感情是完全真诚的和低层次的。正因为您受到这样的爱戴，您能否说一句话制止这些使您国外的一些朋友感到困惑的表达感情的形式呢？

斯大林：我几次试图这样做。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对他们说——这不好，这不合适。人们心里想，我这样说是装谦虚。

曾经想在我五十五岁时搞庆祝活动。我通过联共（布）中央禁止这样做。于是有人抱怨我妨碍他们搞庆祝活动和表达自己的感情，说问题不在于我。另一些人说，我装腔作势。怎么能禁止这些喜悦的表现呢？用强制手段不行。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可以友好的请求……

这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讨厌这样做的。很难阻止人们表达自己的喜悦。我下不了决心采取严厉的措施反对工人和农民。

胜利是十分巨大的。过去地主和资本家是创造者，不把工人和农民当作人看。现在对劳动者的奴役取消了。这是巨大的胜利！地主和资本家被赶走了，工人和农民成为生活的主人。于是便过分地高兴。

我们的人民在总的文化水平方面还是落后的，因此表达高兴表达成这种样子。在这方面不能用法律禁止做什么：可能会落到可笑的境地。这使国外的一些人感到不舒服，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化水平不能一下子达到。我们在这方面正在做很多事情：例如仅只在 1935 年和 1936 年这两年在城市里已建了两千多所新学校。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力图提高文化。但是效果要在五六年后才表现出来。文化是缓慢地提高的。而狂热却是急速地和不雅观地上升的……

福伊希特万格：我说的不是工农群众敬爱的感情，而是另一些情况。陈列在各个地方的您的雕塑像很难看，做得很差。在莫斯科建筑的展览会上首先还是想到您的，——可是干什么陈列这样不好的雕塑像呢？在搞得很雅致的伦勃朗的展览会上，干什么要在那里摆上难看

的雕塑像？

斯大林：问题是提得很有道理的。上面我讲的是广大群众，而不是各个机关的官吏。至于说到官吏，那么不能说他们没有欣赏能力。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没有陈列斯大林的雕塑像，那么或者报纸，或者上级会骂他们，或者参观者会感到惊讶。这就涉及官吏们的功名利禄的事了，这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不受到触动，需要摆上斯大林的雕塑像。

取得胜利的任何政党总是会有异己分子、向上爬的人混进来的。他们根据看风使舵的原则竭力保护自己——摆雕塑像，书写自己也不相信的口号。关于说到雕塑像的质量差，那么不仅是有意这样做的（我知道通常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还由于不会选择。例如在五一节的游行队伍中我看到我和我的同志们的画得像鬼一样的画像。人们兴高采烈地高举着，但这些画像、雕塑像不合适。不能下一道命令规定只许摆好的雕塑像，——去它们的吧！没有工夫管这些事，我们有另一些要操心的事，对这些雕塑像不会看上一眼。

俄罗斯联盟信息出版中心出版
《斯大林文集》第 14 卷
第 2 版第 179—182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一第 179—181 页

我们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这种赞美①

——致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信

（1945年11月10日）

丘吉尔的谈话，对于俄罗斯和斯大林充满溢美之词，我认为将它发表出来是一个错误。这种赞美对于丘吉尔是必要的，他是为了抚慰他那肮脏的良心，掩饰他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特别是掩盖这个事实，即，丘吉尔和他在工党里头的信徒是反对苏联的英、美、法集团的组织者……。发表这个谈话，我们就帮了这些绅士们的忙……，我们现在有很多身居要职的工作人员对丘吉尔、杜鲁门和伯恩索夫的这种赞扬感到傻乎乎的狂喜，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些绅士们说出的不利的话感到沮丧。我认为这些情绪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使我们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一种谄媚。假如将来我们再发表这种类似的谈话，我们将灌输这样一种谄媚和奴颜婢膝的思想。我且不说苏联领导人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这种赞美，就我个人来说，这种赞美也是很刺耳的。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一第184页

——————————————

① 1945年11月9日，丘吉尔借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之际，发表了一通谈话。在谈话中，他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真正的伟人，一个国家之父。当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也找不出什么错，于是，便让《真理报》全文发表了。11月10日，斯大林从索契的疗养地给他们写了这封信。

对《斯大林传略》第一版的批评

（谈话记录）

错误非常多。基调不好，像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腔调。我的学说名目繁多，甚至包括关于战争的学说。闹半天，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看到了吗？似乎列宁只谈到了社会主义，而关于共产主义他什么也没有说。而我，你们看，讲了共产主义。再往下看，似乎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学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提出工业化问题以及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恰恰应归功于列宁。

传记中有很多赞扬的话，对个人的作用大加吹捧。读者在读完这本传记后应该做什么？是下跪和面对着我画十字吗……

再看看关于巴库是怎么说的。什么在我到来之前，布尔什维克没做什么，而我一出现，一切焕然一新。信不信由你！而真实情况是什么？需要建立干部队伍。而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干部队伍在巴库已经形成。在相应的地方，我列举了这些人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涉及另一个时期。要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像捷尔仁斯基、伏龙芝和古比雪夫，他们当时还健在和进行工作，但没有写他们，没有他们……

而这同样适用于卫国战争时期。当时起用了有才华的人，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锻炼他们。正是这样的一批人聚集在红军最高司令部周围。

没有一个地方清楚地说出，我是列宁的学生。实际上，我过去认为，现在依然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对此，在众所周知的与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我已明确讲到……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

是相反。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在已开辟的道路上前进。

莫恰洛夫[①]记录

引自《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2015年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一第186—187页

———————————

① 莫恰洛夫是《斯大林传略》第一版的撰写人之一，他留下了自己两次与斯大林会面时的谈话记录。会见中，该书的第一版受到了斯大林激烈批评。谈话具体时间不详。

对 身 后 的 预 言

（1939 年）

斯大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1939 年，即在我国后来发生的事件之前半个世纪，他就预言（女革命家亚·米·柯伦泰记下了他的话）：

我们党和人民的许多事情会遭到歪曲和诬蔑，首先是在国外，国内也一样。

追求世界统治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将因为我们的成就而报复我们，它依旧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野蛮国家和供应原料的附属国。我的名字也将遭到咒骂和诽谤，许多暴行会都会强加于我。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将尽全力来摧毁我们的联盟，使俄罗斯再也不能站立起来。

苏联的力量在于各族人民友好。敌人攻击的矛头应当首先指向破坏这种友谊，指向使周边地区脱离俄罗斯的企图。在这方面，应当承认，我们做得还不是尽善尽美。

民族主义将特别严重地兴起。在一定时期内，它将压倒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不过时间不长。各个民族内部都会出现许多猥琐的领袖和叛徒。

整个说来，未来的发展道路将更加复杂，甚至疯狂，转折将是最急剧的。结局将是东方翻腾起来，同时西方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

不论事态如何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子孙后代的目光仍将关注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和胜利。后代人将举起自己先辈的旗帜，他们将按照自己过去的榜样来建设自己的未来。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 年版第 795-796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一第 220—221 页

中央组织局一九二六年三-八月的工作计划

（1926 年 3 月 15 日在中央组织局会议上的讲话）

先谈一般性的意见。“检查”这个词在计划[①]里反复出现。这是整个计划的中心。我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计划的中心是从颁发指示转向检查这些指示的执行情况。我们的指示多得很。人们写呀，改写呀，再改写呀，发呀，然后把指示忘掉。于是重新再发指示，又把它束之高阁，如此等等。一部分指示，由于某种缘故合乎执行者的口味，被执行了，其余的都被搁到了一边。我们有代表大会的决议，可是人们常常从演说家的讲话中寻找指示。为了结束这种状况，就必须从言论和指示转向行动。同志们，请回想一下，还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提出了必须从言论转向行动的问题，指出了当前的关键是“检查执行情况”。必须实现列宁的这些指示，必须检查党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列宁还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就把这一点作为基本任务提出来了。我们像往常一样比列宁迟缓和落后了两三年，到现在才开始来实现它。必须对已经发出、没有被废止但是被忘掉了的所有指示，都从其执行情况的观点来加以检查。

一般性的意见就是这样。

现在我想把注意力放在某几点，对它们略加解释。关于通报工作，柯秀尔[②]说得对：这里应当说到来自地方的通报和来自中央的通报。

————————————

① 据 1926 年 3 月 18 日《真理报》报道，这个计划包括三十五项，于 3 月 15 日由联共（布）中央批准。

② 柯秀尔，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我想请大家注意第四点即关于苏维埃支部工作的那一点，而据我理解，苏维埃支部也包括经济机关支部在内。这一点怎么理解？我对这一点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苏维埃支部要成为我们机关中的真正苏维埃秩序的维护者。要知道有大量岂有此理事在国外的全权代表处、商务代表处和国内的苏维埃机关里发生着，一个方面是侵吞人民财产，再一个方面是对公民采取骇人听闻的官僚主义态度。常有这样的事：一些“普通”公民一连好几个月叩机关的大门，可是因为他们在机关里没有“关系和熟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人们奔走好几个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见不到机关领导人的面，没法向他们递交申诉书和申请书。这还成话吗？支部应当监督苏维埃机关，包括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要它们具有哪怕是起码的秩序，具有起码的同情心和愿望来倾听人们的意见，而少一些官僚主义。

所以，苏维埃支部面临的任务，就是进行监督，不让人民财产被侵吞，不许借分红等等的名义搞诈骗，分发钱财，不许出现那种愚钝的、犯罪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在我们的机关和居民之间，即在我们的机关和跟机关没有“关系”的老百姓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克服的障壁，一堵无法穿过的死墙，使这些老百姓寻找真理而不可得。支部，特别是支部委员会和支部书记，应当怎样在这里起作用。支部书记作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的一些例子说明到处在偷窃。大家知道，某商务代表处有个工作人员携款潜逃。那里的支部书记干什么呢？又例如，大家知道，国家银行把几千万卢布当作职员薪俸开销了。那里的支部和支部书记干什么呢？为什么支部书记不把这些岂有此理的事情报告中央或中央监委呢？

假若一个老百姓遇到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而对苏维埃政权失掉一切信心，那么支部书记就应当把这种情况报告给党和党的组织。但我知道，所有这些岂有此理的事情，不仅是在共产党员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有时还是共产党员带头干的。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问

题，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会都应当关心。苏维埃支部生活的内容决不能只限于作关于张伯伦[①]的报告和唱《国际歌》。必须做到，苏维埃支部要能够同全党息息相关，帮助党改善和进一步简化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使它们同居民接近，成为廉洁的节约的机关。

其次，我对草案第三页上的第 10 点讲点意见。这里说的是在定期报刊上就节约开支的制度、反对附加开支、缩减编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组织宣传鼓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报刊是蹩脚的。它们常常回避人员编制的膨胀、机关的浪费、举办庆祝会和纪念会成风、工厂的旷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停滞不前等现象。报刊随波逐流。如果我们要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必须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不必要的支出。社会主义生产是具有比资本主义生产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生产。然而报刊却往往拒绝揭发浪费分子，不去反潮流，不愿意向工人们解释所有这些问题。而如果向工人们解释，他们是会理解的。要使每个工人、每个共产党员都来监督资金的花费，在这方面厉行节约，要吸收所有的人参加这个事业。钱是当着大家的面花的。他们不会看不到。

给你们举个例子：现已证明，我们出口粮食是不赢利的，因为各地采购时每普特粮食比应花的多花了五戈比。去年，在采购运动展开前，曾经就地方采购的各项开支作了預计。你们知道我们的开支预计是怎么作的，——打得很宽并且给了附加。结果说明，預计的支出在所有项目上都是正确的，然而各地采购每普特却多花了五戈比。预计是每普特八戈比，结果是十三戈比。这样便把事情办糟了。出口粮食变得不赢利了。而出口粮食不赢利就意味着进口要缩减，工业建设要缩减。这额外的开支是怎么弄出来的呢？是由于在地方上到处搞采购粮食的大机构，铺得很开，而不在支出方面实行节约，一句话，白白

——————————————

① 张伯伦，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

花费了人民的钱财。工人们看见了这种情况没有？看见了。农民呢？农民也看见了。共产党员就没有看见这种情况吗？当然看见了，但可惜他们自己也参与了，不是参与节约，而是参与浪费。由于这个缘故，就需要报刊经常揭发我们国家机关的所有这些缺点和溃疡。不然什么也改不了，人也得不到改造。不然不得了。

现在请注意第三页的第 2 点：“苏维埃改选的总结”。在这方面我想简单说两句。问题是我们某些苏维埃机关和某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大大滋长了宽容心理，非常愿意叫非无产阶级分子喜欢，向他们让步。既然说要活跃苏维埃，那末某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就以为，需要讨所有的人喜欢，连富农和其他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不例外。我们中央有决定，宪法和选举权不改变。但实际上却出现了新的选民集团——商人、富农都选举。为什么？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了《选举细则》，把宪法给放宽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委员会”走得更远，竟奉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所谓的法律专家们出的主意。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叫非无产阶级分子喜欢。为了显示眼光的“远大”，博取“纯粹”公众的称赞。这里需要再三检查。最近，在我们好多个苏维埃同志身上，那种情愿向非无产阶级分子让步的情绪，已发展到了可怕的地步。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说过：威胁制服不了共产党员，阿谀奉承却可以制服他。现在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有的共产党员，只要“纯粹”公众夸奖一下他眼光“远大”，就高兴得软了下来，被俘虏过去，而离开党和党的指示。我将在讨论议程第二项时更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再就是最后一个问题，第三页第 4 点。不久前我收到了阿斯芬季亚罗夫的一封短信，他在信中抱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某些民族共和国里（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和巴什基尔）关系紧张，中央对民族共和国的人们漠不关心。我认为，阿斯芬季亚罗夫是对的。需要听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民族部的专门报告，首先是关于巴什基

尔和哈萨克斯坦的报告，采取措施来制止中央以及地方上的这种不可容许的违反党的民族问题指示的行为。

载于1926年5月3日
《联共（布）中央通报》
第16-17（137-138)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二第8—12页

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问题

——在联共（布）二、三月全会上的结束语

（1937年3月5日）

同志们，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讲到了所讨论的事情的基本问题。现在请允许我在结束语中简要地谈一谈更为具体的几个问题。

看来，现在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过分陶醉于经济运动和经济事务，陶醉的原因是这些事务能带来直接结果，而且可以说，这也就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这件事，这样过分陶醉而忘记其他问题是行不通的。我认为，同志们对此都已懂得，都已认清了。

从一些发言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从这个明确的甚至可以说是公理性的论点中得出了极端的结论。有人认为："好了，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要从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了……"（笑声）"……现在可以从事党的政治工作了"。

同志们，这是另一个极端。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济，正如我们不能和不应该离开政治一样。我们仅仅是为了便于研究，才在方法上人为地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相反地，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两者共同存在，共同起作用。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离开经济。千万不能。决议草案的意思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不能自行代理经济机关的职能，不能取代，不能把经济工作的指挥部——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一样

————————————

① 此件部分内容已收入新编《斯大林全集》第14卷第151-164页，这里发表的是按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5年第11-12期刊载的有关文献的原文译出的。原先发表的文献篇幅少了三分之一，并在文字上有修订，其中有些内容涉及当时联共（布）的高层领导人。

——搬到第一书记的办公室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我们只是定下了方针。要实现关于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和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的方针，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应当充实农业机关，给这些机关配备优秀人才。工业（基础比较坚实）以及工业机关看来是用不着你们取代它们的。这很好。情况差一些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农业机关。应当尽全力派人加强这些机关，而主要是应当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的方法，不要取代这些机关并使它们陷入无人负责的境地，而要帮助这些机关，巩固这些机关，不是撇开这些机关而是通过这些机关去领导。问题正在于此。

只要农业机关还没有得到充实，得到巩固，你们，很遗憾，在最近时期内就不得不直接从事农业事务，以防这些事务根本无人过问。所以说，必须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机关、领导整个经济即工业和农业的方法。应当巩固经济机关，以优秀人才充实这些机关，从旁帮助这些机关，给这些机关提供领导思想并通过这些机关领导经济，不应跑到另一个极端，也不要拒绝做经济工作。这样就不会产生，同志们，就不会产生另一个极端。

下面谈一谈关于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和其他一切托洛茨基主义和非托洛茨基主义代理人、外国代理人的问题。我想，所有的同志们都已懂得，都已认清，不管这些人用哪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己，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这些人同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都毫无共同之处。

这些人是一伙无廉耻的匪帮，其中有雇佣杀手，破坏分子，间谍，暗害分子，等等，等等。对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但我担心的是，在一些同志的讲话中流露出一种想法：让我们左右开弓，打击那些曾经与某个托洛茨基分子在一条街上同行的人或者曾经在一个公共食堂同托洛茨基分子同桌吃饭的人。现在让我们左右开弓

地打击这些人。

这是不行的，也是不对的。在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中间，有我们一些出色的人才，这大家都知道，有优秀的工作人员，他们过去偶然动摇到托洛茨基分子一边，后来同托洛茨基分子断绝了关系，并且像令人羡慕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进行工作。捷尔任斯基同志就是这样的人之一。（有人喊道：谁？）捷尔任斯基同志，你们是知道他的。因此，在捣毁托洛茨基分子的巢穴时，你们应当认真观察，亲爱的同志们，打击对象要有所选择，我再说一遍，不要殃及那些曾经与托洛茨基分子在一条街上偶然同行的个别的同志。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什么叫正确地挑选干部。什么叫正确地挑选干部？布尔什维克对这件事的理解如下。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挑选工作人员，第一，要看他们是否忠于党，政治上是否可靠；第二，要看业务能力，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这样的工作。这是公理性的准则，对此用不着多说。在我们这里这个准则遭到了破坏。这个准则遭到破坏的情况已经谈到了。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布尔什维克准则遭到破坏的情况，我要举的这两个例子说明，有的时候挑选人不是根据政治和业务的原则，而是从私人交情、哥们义气、朋友关系的角度出发，总之是根据种种庸俗的标准，根据在我们的实践中不应有的标准。就拿米尔佐扬同志来说。他现在哈萨克斯坦工作，原先他长期在阿塞拜疆工作，离开阿塞拜疆之后曾在乌拉尔工作。我曾几次警告他：既不要从阿塞拜疆，也不要从乌拉尔带出熟人，而要在哈萨克斯坦挑选人，不要同哈萨克斯坦当地人相隔绝，原因是——从阿塞拜疆带出一大批同哈萨克斯坦根本没有联系的熟人、朋友意味着什么呢？从乌拉尔带出一大批同哈萨克斯坦同样根本没有联系的熟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有了某种对当地组织的独立性，甚至是某种对中央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的小团体，我有自己的小团体，它们全都忠于个人。请看，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巴达巴什扬同志当上了南哈萨克州委

组织计划部部长，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萨克扬同志当上了库斯塔奈州委书记，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萨尔基相同志当上了贾塔戈里区委书记，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波乌兹比克扬同志当上了赛桑区委书记，他从格鲁吉亚带去的艾拉佩当上了列宁区委书记。我讲的是中央机关提供的情况。

他从阿塞拜疆带去的什拉江同志当上了卡尔萨克帕伊区委书记，他从巴库带去的阿斯里扬当上了边疆区委组织计划部部长，当上了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市苏维埃主席的萨乌莫夫同志也是他从巴库带去的。萨尔基索娃当上了阿拉木图市斯大林区委书记，尤素波夫当上了阿拉木图市委书记，这两人都是他从巴库带去的。他从原先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带去的平哈西克当上了卡拉干达州委书记。有一个姓斯维尔德洛夫的人当上了东哈萨克州委书记，他也是从巴库带去的。先是把他库调到乌拉尔，然后从乌拉尔调到这里，调到哈萨克斯坦。当上阿拉木图州委书记的基谢廖夫是从乌拉尔带去的。来自亚速海-黑海地区的斯捷潘诺夫当上了北哈萨克州委书记。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库利耶夫当上了奇姆肯特州委书记。卡马基泽当上了哈萨克边疆区委员会农业局副局长。（贝利亚；相当可疑的一个人。）人们怀疑他是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总之，所有这些人，在他们原先的共和国里都有程度不同的嫌疑。（有人喊道：库利耶夫被解除了政治部的工作。）公用事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尔扎耶夫原任阿塞拜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有人喊道：他由于工作不称职而被解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他也是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利耶夫·铁木尔是从阿塞拜疆带去的。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巴拉诺夫是从阿塞拜疆带去的。巴拉诺夫先是被他调到乌拉尔，又从乌拉尔被他带到了哈萨克斯坦。（米尔佐杨：他从未同我一起工作过。）巴拉诺夫我们还是了解的。

这像什么话？难道可以这样挑选人！请问，这会导致什么后果，

能有什么好结果。我可是警告过米尔佐扬同志，叫他不要这么做，应当从当地人中间挑选干部。可他，大家知道，却组成了忠于他个人的小团体，他不是按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挑选人，而在这些人中有托洛茨基分子。但他认为，既然他们忠于他，他们就能永远与他合作。那以后他要是不在了呢？

另一个同志是瓦伊诺夫，他同米尔佐扬一样，也从其他州带去人，特别是从〔……〕带去了 23 个人。这样的人在那里多得多，因为在苏维埃机关里还有许多人。从顿巴斯带去了 9 个入：苑拉夫廖夫、魏斯贝格、克里梅尔、伊万诺夫、卡茨、波努卡洛夫、尤尔洛夫、亚历山德罗夫和伊萨耶夫。他从顿巴斯调到雅罗斯拉夫尔当书记后，便逐渐从顿巴斯把这 9 个人弄到自己身边——离开这些人他就无法工作。这些人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位。瓦伊诺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地的干部如何对待这些外来的人呢？当然是怀有戒心。带去人，用外来的、忠于个人的人组成小团体，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信任当地干部。米尔佐扬或瓦伊诺夫有什么理由对当地干部不信任——请他们说清楚。这些同志包揽的事情太多，从而使自己、使党都陷入了窘境。

这样挑选人是不行的。谢尔戈[①]同志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间最重要的、最杰出的政治局委员之一，是经济工作高级领导人，可我认为，他也染上了这样的毛病：欣赏某一个人（公开说某些人忠实于他个人并对这些人恋恋不舍，而听不进党和党中央的警告。他为了拉拢洛米纳泽而大伤脑筋。他大伤脑筋的是，他始终认为他能够使洛米纳泽改邪归正，可洛米纳泽却总是欺骗他。他为了维护所有那些现在来看显然是坏蛋的人如瓦尔达尼扬、戈戈别里泽、梅利克谢托夫、奥库贾瓦（现在在乌拉尔被揭露）而大伤脑筋。他自己大伤脑筋，也让我们大伤脑筋，而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最信任和他认

① 谢尔戈，即奥尔忠尼启则，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忠实于他个人的那些人，原来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坏蛋。这样一个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的经验表明，以个人的好恶来挑选人是极其有害的，尤其是像米尔佐扬和瓦伊诺夫这样的人，我不能认为他们是高级领导人，但我举他们的例子是为了指出，这些人欺骗了他们也欺骗了党。这种挑选方法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党的挑选人的方法，趁现在为时还不算晚，同志们应当摒弃这种方法。

第四个问题。检查工作，检查执行情况，这是什么意思呢？应当怎样审查工作人员，一般来讲是否需要审查呢？毫无疑问是需要的。如果不根据人们的工作结果来对他打进行审查，就无法了解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就无法确定他关心的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说，不能根据言论、宣言和口头上的声明来对一个工作人员的本质作出结论。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这是危险的，这是幼稚的。为了了解工作人员，应当在工作中根据他们的工作结果对他们进行审查，应当日复一日地进行审查。一般来说在我们的实践中有什么样的审查办法呢？有自上而下地审查，即上级领导人对其属下的下级领导人进行审查，到他们中间去，或请他们来，总之根据工作结果进行审查。这样做非常正确，非常好，但这是不够的。在我们中间甚至这一准则也常常遭到破坏。选定一个人并把他放到工作岗位上就完事大吉，以后就把他忘记了，不过问，不检查，也不给任何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给予帮助，他们发牢骚，叫苦连天，一封又一封地写信，一份又一份地发电报，但既得不到答复，也得不到安慰，总之把你往工作岗位上一放，就算把工作包给你了。这是破坏列宁关于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的最起码准则的行为。

这就是自上而下的审查，来自上级的审查，即上级对其下属进行审查；还有自下而上的审查，即党员群众或非党群众对领导者进行审查。党员积极分子或非党积极分子，或者是人民通过选举亲自进行审查。例如我们组织的我国最高机关的选举，这次选举是对我们的许多

工作人员的一次大审查。自下而上审查的手段——这就是经常性的积极分子会议，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和非党积极分子会议，以及领导者的工作报告，即关于自己工作的诚实的、实际的工作报告。许多同志逃避这项工作，他们陶醉于经济运动，认为自己〔……〕世界。然而他们错了，显然他们迷失了方向。

应当在各人民委员部恢复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和非党积极分子会议，在各企业恢复原先叫作生产会议的东西。召集整个工厂的人开会是困难的，我们有些工厂有 3-4 万人，但可以从优秀的党员和非党员中挑选出积极分子并向他们报告工作和了解他们这些积极分子关心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发现了哪些错误。

党员积极分子会议，非党和党外积极分子会议，领导者在这些积极分子会议上报告工作——这就是自下而上地审查工作人员的一个手段。还有另一个手段——在我们的党内生活中恢复复民主集中制。这也是一种审查，同志们。在党章的基础上恢复党的机关的选举制，不记名投票，对任何一名候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批评的权利。你们看，这就是自下而上地审查的第二个手段。两种手段都应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因此，我们有两种审查工作人员的途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上级审查下级，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即自下而上的监督。同时自下而上的监督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的监督是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并由领导者报告工作，另一种形式的监督是恢复我们党内的民主选举制，即党员有对任何一位候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有自由批评的权利，有要求领导者向党员群众报告工作的权利。

第五个问题。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教育干部，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曾经教导我们说，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教育干部——这是教育干部，培养和训练党及其他组织后备力量的好的方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及时帮助干部揭露他们的错误；及时帮助每一个工作

人员、每一个领导者揭露他们的错误，帮助他们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些错误并帮助他们老老实实地彻底改正错误，而不要像有些人那样，担心这样做会被坏人所利用。

有为数不少的人或工作人员不高兴这样做，然而应当教育这些人，使他们有勇气倾听批评意见，养成习惯，从而使工作人员有可能步步向上、不断进取。

举几个例子。你们都记得1930年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上的错误，当时称之为胜利冲昏头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无情地批评我们的干部的坚定方针。而当时，你们知道，在建立集体农庄时，在各州之间展开了一场大竞赛，看谁集体化的百分比高。一队宣传员来到村里，把500-600户村民召集到一起开大会，并询问谁拥护集体化。同时作了非常明显的暗示：你要是反对集体化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农夫们说：我们没什么说的，你们组织吧，我们拥护集体化。这以后电报一份接一份飞向党中央委员会，说我们的集体化在发展，而经济却依旧在旧轨道上运行。根本没有集体组织，只不过是表决拥护集体化。

我们检查过莫斯科州的情况，表面上1930年集体化似乎达到了85%。这一百分比的实际可信程度有多大呢？实际上，集体化最多达到了8%，而不是85%。是的，你们在摇头，而实际上所有人都是这样。这是一种通病，每个州或多或少都染上了这种病。

中央委员会对这些错误进行了抨击。我们的干部最终扭转了这件事，而且我们通过这件事也培养了我们的干部。如果我们不揭露这些错误，如果中央委员会担心我们会失去某些干部，担心我们会招致不满，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敢说出某些人不爱听的意见，如果中央委员会不顶着这股潮流而上，我们就会把整个事业断送掉，并使我们的全体干部灰心丧气。我们就会断送农业干部的成长，断送集体农庄的发展。现在我们拥有集体农庄运动的一些不错的领导者，我们通过彻底揭露他们的错误使他们承认了这些错误并走上了新的道路。

另外一个例子是沙赫特案件，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地抓这件事，没有按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式给予我们的干部通过自身错误得到教育的机会，那可真是我们所有人的一大失误，就会毁掉工业事业。许多同志担心反潮流会对敌人有利。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开展了自我批评，不留情面的自我批评，结果我们胜利了。揭露了自己的错误并通过这件事教育了自己的经济工作干部。从那时起——沙赫特事件以后——已经过去了 10 年，我们培养出一批从事技术领导工作的优秀布尔什维克干部。如果我们听信（哪怕是一时片刻）所谓反潮流会得罪人、会对敌人有利的论调，就不会有这些干部，他们就会灰心丧气，变成一盘散沙。

这就是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教育干部。这就是要勇于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分析自己的错误并找到改正错误的途径。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干部才能成长才能得到锻炼，列宁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且列宁的这些话也多次得到证实，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第六个问题——什么叫爱惜干部？到底怎样才能保护和培养干部呢？爱惜干部。有许多同志认为，如果对一些同志的错误轻描淡写，如果掩饰并只是部分地指出同志们的错误，那我们就是爱惜干部和保护干部。这种说法是对还是错呢？谁要是认为掩饰我们干部的错误就是保护干部，爱护干部，谁就是在害干部，毫无疑问，他就是在害干部。对我们干部的错误轻淡写，对错误加以掩饰——这不是爱惜干部，而是害干部。害干部。

我想从我们某些非常负责的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当中举个事实。例如谢尔戈同志，我对他的尊重不是亚于而是胜于某些同志，但对他的错误我应当在这里指出来，以便我们大家能从中吸取教训。

就拿他与洛米纳泽的关系来说。洛米纳泽在党务和政务工作方面出现过一些相当严重的错误。早自 1926-1927-1928 年起谢尔戈同志对这些错误就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多。他没有告诉我们这

些错误，他寄希望于自己，希望他自己能扫除这些错误，从而在这件事上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他与他即谢尔戈同志与洛米纳泽书信往来频繁。我们只是在后来，在这些信件写成八九年之后，我们后来在中央委员会才知道这些信件具有反党性质。谢尔戈同志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纯粹是出于他的善良愿望，显然他是希望对此加以改正。

由于我们不了解洛米纳泽的本质，我们，中央委员会不了解，所以我们曾把他放到一些不同的岗位上，看看他做得如何。了解一个人非常困难。有一种方法——冒着风险安排，给予他责任重大的工作并关注这样做的结果。我们采取了这种冒险的方法，安排他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织的书记。如果我们知道他与谢尔戈的往来信件，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就不会把他安排在这个岗位上。然而我们不知道。安排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人不是拥护党而是反对党的。

恰恰在这一时期谢尔戈同志收到了洛米纳泽的一封很不像样、令人厌恶和违反党性的信件。他跑到我那里说：“我想给你看看洛米纳泽的信”。——“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写得不像话。”——“把信给我，我向政治局汇报，中央应当知道工作人员的情况。”——“不行。”——“为什么？”“我答应过他。”——“你怎么能答应他，你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是党的传统的保卫者，你怎么能答应别人不把有关中央和反对中央的反党信件告诉中央委员会呢？怎么，你同他、同洛米纳泽有什么反对中央的秘密吗？这像什么话，谢尔戈同志，你怎么能这样做呢？”——“确实不行。”他一再请求，请求我看看这封信。看来，他是想让我在道义上对他与洛米纳泽的那些秘密同他共担责任，当然，他对洛米纳泽那些无疑是反对中央的观点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这纯粹是对事业的贵族态度，甚至是骑士态度。我对他说，我不想参与这样的秘密，我迄今为止一直自认为是中央委员。你把信给我，我马上把信分送给政治局委员，让他们知道工作人员的情况，我向中央作汇报，而谢尔戈却说：“你会毁了他，毁

了洛米纳泽。”——“为什么？如果你在这件小事上，——信是反党性质的，但还不是那种可以据此将他开除出党的信件，——如果你在这件小事上，把信的事情告诉中央委员们，那么在大事上洛米纳泽就会变得收敛一些。如果你在件事上瞒着中央并对他百般袒护，洛米纳泽今后就会认为以后还可以犯反对中央的某种错误，因为反正有人保护他，这样洛米纳泽就会重犯这类错误，今后他就会在大事上栽跟头，而如果他在大事上栽了跟头，我们就会让他粉身碎骨，彻底灭亡。你害了他，你认为你是爱惜他洛米纳泽。按照庸人的观点来看可、能是这样，但按照实际的观点，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你是害了他，因为你没有及时制止他。”他说，这样的信件过去也收到过。“那么就更糟了，无疑是你把他毁了，是你把他置于中央的打击之下，因为他现在在大事上栽了跟头，已经无法饶恕他了。”

结果就是这祥。在大事上栽了跟头。当然，对这一悲剧谁都不像谢尔戈这样痛心疾首，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而这个人却对他的信任报之以欺骗。他要求枪毙洛米纳泽。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从袒护他变成了要求枪毙他。我们说：“不，不会枪毙他，我们不会逮捕他，我们甚至不会把他开除出党。我们只是要把他从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同志们，这就是给你们举的一个例子，谢尔戈同志一个人的例子，经他的手任命的人数以万计，他培养了数千名优秀的经济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

看，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掩饰、袒护一个同志的错误，不及时地制止他，相反却加以袒护——你就害了他，肯定会害了的。

那么，什么叫爱惜干部、保护干部呢？这就是说，如果干部犯了错误，就要及时给他们指出，及时加以制止，而不是袒护和掩饰。这是爱惜干部的唯一的方法，保护干部的唯一的方法。

应当怎样用列宁主义的精神对我们的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呢？决议草案对这个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我在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谈了一

些意见，现在还可以更具体地说上几句。

首先，同志们，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鼓足干劲，首先自己培养两个副手。现在在职的第二书记或其他什么人，他能否称职，可以说，这取决于你们的洞察力，取决于你们了解人的本领。但副手应当成为真正的副手，名符其实的副手，有能力代替你们的副手，因为如果中央通过了决议草案的这一条，看来，中央会通过这一条的，那么我们显然将要着手做这件事。我们党有 102000 个支部，即 102000 个基层党组织。那么就有 102000 个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们将每隔 4 个月，每隔 5 个月送他们所有人去培训班，或每隔 3 个月，每隔 4 个月送去——将视实际情况而定。但在送他们去之前，他们这些书记们应当为自己推举两个副手。而为避免他们选错人，副手名单应当由有关的区委会予以批准。我们应当送 102000 个书记去接受党政培训和再培训。这是我们党的士官，很多事情都取决于他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十分之九的工作都取决于他们。

我们有 3500 多个城市和非城市的区委书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挑选两名名副其实、有能力代替他们的副手，入选的是否是现职的第二书记，找不知道，但我们对书记们挑选唯命是从的人做自己副手的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了。这样做是不行的。中央将要求副手们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和有能力代替区委书记的副手。我们有大约 3500 个书记。我们将派他们所有人去学习，去接受再培训，去上培训班即我的列宁培训班。这些培训班的教学大纲将由我们制定，我同你们这些各州和各共和国的代表一起做这件事。将指定若干个中心来组织这些培训班。当然，决议草案中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硬性规定，中心可以多一些，也可以少一些，只要教学能够真正安排好就好，不能像现在这样，很遗憾，是为了统计，为了汇报，为了编制名册，而应当是为了真正列宁式的政治学习。

我们有数百个市级委员会。这次全会以后，州委或边区委第一书

记看来要担任市委第一书记。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城市工作，为此应当赋予他们直接的责任。市委将设第二书记，数量可能是两个。我们希望市委第一书记为自己挑选两名名符其实的副手，也派他们去参加党史培训班的学习。

我们有100多个边疆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也有书记，各民族州也是一样。我们也将要求每一个第一书记尽力为自己推举两个副手，两个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副手。我们将在中央批准对他们、对这些副手的任命，以便后来州委、边疆区委和民族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能来到莫斯科并召开这样的会议。我们认为这样的会议有一定的意义。我在报告中讲过，这里再重复一遍，我们这些老头子，政治局的委员们，很快就将退出舞台。这是自然规律。因此我们希望我们能有若干个接班人，而为了组织好这件事，现在就应当着手去做。亲爱的同志们，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们应当同我们一起认真地参与国际和国内事务。

这就是我们的方法，必须借助这些方法对我们的干部进行真正列宁式的培训和再培训，这些干部包括：102000名基层党组织第一书记，3500名区委书记，200多名市委书记，100多名州委、边疆区委和民族共产党中央书记。这就是应当再学习和不断完善自己的领导人员。

下一个问题。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这是什么意思呢？同志们，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讨论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大家都有决心改正错误，当然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愿意就能改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我们实际政策和组织政策的某些具体问题还缺乏理解。因此我认为，在闭幕词中谈谈这些问题并非多余。

列宁提出，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要求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都懂的聪明人。这是不对的，我们领导者是从一个方面来看事物、事件的，而被领导者则是从另一

个方面来看同样的事物的。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也许普通党员看不到，而他们能看到的东西，我们大部分是看不到的。而为使我们能对事物有一个很好的认识，认识事物就是从各个方面来了解事物，为此就必须把从上面来看事物的领导者的经验同也有生活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从下面来看事物的普通党员的经验结合起来。把这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会使我们对事物、对情况和事实有一个真正而充分的认识。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些同志认为，既然他是人民委员，他就什么都懂，他们认为。官衔本身就会提供丰富而全面的知识，或者认为：既然我是中央委员，因此我这个中央委员就不是随便当上的，因此我就什么都懂。这是不正确的。老年人都应当活到老学到老。就更不用提青年人了。作为领导者的我们和作为被领导者的他们应当互相教育，以使学习名符其实和真正落到实处。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分钟也不能削弱、不能断绝我们同群众即同党员群众、同工人群众、同农民群众、同全体人民的联系，一分钟也不能削弱和断绝联系。这就是说，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即人们所说的倾听下层的呼声，或人们所说的倾听普通小人物的呼声；要学会倾听小人物的呼声，这些小人物没有官衔，没有职位，但他们并非白白活在世上，他们有丰富的经验。

为了使这个道理明白易懂，我给你们讲两个同我们的领导有关的事例。这是大约三四年前或更早，也许是五年前的事。我指的是当时在这里，在莫斯科，中央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共同制定了关于顿巴斯重新调整工资、重新安排工作和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的新的方针。这大概是五年前的事。

当时我们的状况非常困难，顿巴斯要求我们动员工人，因为人不足。我们动员了几十万工人，动员了 20 万。一星期之后 20 万工人都离开了顿巴斯。人们对我们说，你们对我们的供应太差，因此也就没

法采煤。我们回答经营管理者说：去年你们采掘了那么多煤，得到了那么多供应，而如今你们获得的供应增加了 20%，我们为你们动员了几十万人，但这些人却跑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这种情况一年复一年。这简直是西绪福斯式的工作[①]。我们好不容易动员了几十万人，30 万人，结果这 30 万人又离开了顿巴斯，我们给了最好的供应——同样无济于事。

我们向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请拿出你们的摆脱这种状况的草案来，因为那里形成了某种不可救药的局面——供应是最好的，新给了几十万人，30 万人，结果 30 万人都走了，再动员 30 万人，结果又都走了。事情搞得乱七八糟，顿巴斯成了穿堂大院。先后提出了三个草案。参与这件事的有谢尔戈、约瑟夫·柯秀尔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员。我们，政治局委员们，认为这些草案一点用处也没有。人们根本不知道顿巴斯的实际需要，提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东西来，于是决定从顿巴斯找几个普通人、基层工作人员和普通工人。人找来了，问他们——问题到底在哪里，怎样才能摆脱困境？我们同他们谈了三天，在他们的启示下我们作出了那个后来使顿巴斯的局势向好的方面转变的决议。原来，工人离矿井越远，他所得到的薪金越高，离井下越近，得到的薪金越低。显然，优秀的工人远离矿井，不好的工人却向矿井靠近。然而不好的工人不可能给事情带来任何好处。井上工人得到的薪金高于井下工人。那有经验有创造精神的工人谁还愿到井下去呢？谁也不愿去，因为他在井上工作得到的薪金高得多。这里暴露出职权分散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过批准的，而主要的是，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具体办法。我门把工人给我们讲的东西形成了文字，读给他们听，他们表示赞成，而后付诸实施。你们看，这就叫倾听小人物的呼声，不中断同小人物、同群众的联系，不削弱

——————————————

① 西绪福斯式的工作，来自希腊神话，意为令人厌倦的繁重而无效的劳动。

这种联系，而是永远牢牢地保持这种联系。

另一个例子——尼古拉延科的例子。关于她已经说了许多，这里没什么可多说的。她是正确的——小人物尼古拉延科，一位妇女。她告状，向各级告状，谁都不理睬她，待到理睬她时，便为此给她扣上了帽子。后来信转到了中央。我们进行了审查。为了弄清真相，她经受了多少磨难走过了多少曲折的路！这你们都是知道的。然而这就是事实——一个小人物，不是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委员，不是人民委员，甚至不是支部书记，而是一个普通人——可她是正确的。像这样呼声被压制的人我们有多少？因为什么打击她？就因为她不屈服，她碍事，她不安分守已。人们说：既然你已被开除，那就别吭气，老实呆着，省得搞坏身体。可她不，她不甘心，她撞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不行再撞一个地方，——所幸她的精力旺盛，大家都对她表示支持，而当她最终弄清事情真相时，结果证明她是正确的，她帮助你们揭露了一大批人。这就是倾听基层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的意思。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他就是人们公认不可战胜的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据神话说，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这个每次往地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的英雄成了不可战胜的人，但他最后还是被别人战胜了，战胜他的是海格立斯。怎么战胜的呢？他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离开了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我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很像安泰，应当像安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安泰，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不愿意断绝和削弱同生育和抚养他们成人的母亲的联系，即同群众、人民、工人阶级、农民

和小人物的联系。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是人民的儿子，他们只有不让任和人使他们离开地面，使他们失去靠向大地、靠向母亲即靠向群众从而取得新的力量的机会，他们才将是不可战胜的。

只有懂得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的人，只有懂得一分钟也不能同母亲——人民、工人阶级和生育、抚养和教导我们成人的群众失去联系的人，只有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才可能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们必须实行列宁的这一遗教和论点。不这样做就会脱离群众，不这样做就会导致官僚主义僵化，不这样做就会灭亡，不同我们的母亲——群众、同生育和教导我们成人的工人阶级建立起这种联系，不建立起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就会导致官僚主义僵化，就会灭亡。这就是列宁关于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的原则。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关心党员和党员的命运。我不能说我们对党员和党员的命运非常关心。总之我们出了一些气魄大的人，考虑起来就是几千几万人。说开除 1 万个党员无关紧要，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我们有 200 万党员和预备党员，开除 1 万个被叫作包袱、消极因素的人意味着什么，对这种人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叫法——是叫消极分子吗？（有些人喊道：消极分子。）对普通党员的这种态度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所有敌人的帮助。原因是，如果我们将许多人开除并容忍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开除，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数十人，而将“个人”、个别党员忘在一边，那么显然并非所有被开除的人都会安于自己的现状。这样就会给托洛茨基分子、我们的敌人以可乘之机，给他们提供后备力量，给他们提供一支大军。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的力量从来就不大。

请回想一下 1927 年我们最后的一次争论，一次公开的争论，这是一次全党投票。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在 854000 名党员中，参加这次全党投票的有 73 万党员。这就是说，有 123000 名党员没有参加

投票。或者是因为他们当时在倒班，或者是因为外出或休假等等。因此，在854000名党员中，参加全党投票的有730800人。赞成布尔什维克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占0.5%。弃权的有2600人。我认为，应当把弃权的人列入赞成托洛茨基分子之列。这样就是6000多人。我认为，在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参加这次全党投票的党员中，即在121000名党员中，可以把10%的人划到托洛茨基分子一边。当然，参加投票的人的力量对比是，99.5%的人赞成布尔什维克，0.5%即半个百分点的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然而在那些未参加全党投票的人中，我想将10个百分点不是半个百分点，而是10个百点，划到托洛茨基分子一边。这样，在12万人中占了大约11000人。

你们看：投票赞成托落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弃权的有2600—6600人。再加上11000人，共18000人。可以假定赞成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有大约1万人，这样一共28000人。让我们为客观起见多算一些，比实际数量多算一些，统共为28000人。再加上形形色色的其他坏人：右倾分子等等，让我们算为30000人。你们看，拥护反党派别、拥护托洛茨基分子、拥护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就是这些人，其数量绝对没有夸大。许多人拥护季诺维也夫分子，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小股力量：工人反对派，右倾分子，民主集中派，等等，——在854000党员中占30000人。现在我们有150万党员，加上预备党员大概是200万人。在上述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已被逮捕的有18000人。如果以3万人计，那么还剩下12000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到了党的一边，而且转得相当坚决。一部分退出了党，一部分仍留在党内，似乎成了不很大的一支支力量。然而，第一，要进行暗害和破坏活动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第二，苏联境内的托洛茨基分子并不止这些。

我们在这段时间内开除了数万、数十万人，我们对个别党员的命运常常表现出残酷无情、官僚主义冷漠的态度。在近两年中先后进行

了清党和更换党证的运动——有 30 万人被开除。所以说，从 1922 年起我们有 150 万人被开除。在某些工厂，例如在科洛姆纳厂……该厂有几千工人？（有人喊道：13000 人。）党员数量现在为 1400 人，而原来是党员后来离开该厂或被开除的达 2000 人，这是一个工厂的情况。你们看，该厂力量对比就是这样：1400 名党员——和 2000 名原来是党员的人。看，你们干下的所有这些咄咄怪事，——所有这些都是在帮我们敌人的忙。你们不要自己安慰自己，说什么旧的力量中剩下的大概不过 12000 人，托洛茨基分子投入了最后的力量来搞破坏，而这些人即将被我们所消灭，不要安慰自己了。对普通党员采取冷漠的、残酷无情的政策，我们的领导者中有许多人对个别党员的命运漠不关心，容许开除数千名经我们审查实为优秀人才的人，实为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的一流的斯达汉诺夫作者。

所有这一切都为增加敌人——右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等所有敌人的后备力量提供了条件。同志们，应当摒弃这种冷漠的政策了。

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简直是荒谬的。我们有一个老的、经过考验的、为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列宁的公式：凡是承认党纲，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承认党纲——这并不是说必须成为读马克思书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要达到这两点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连时间都没有，怎么能够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工人的处境促使其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了解党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党纲，并准备为实现党纲而同敌人进行斗争。这就足够了。然而要是说他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是说他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有人喊道：没有掌握。），没有掌握——这是愚蠢的。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就犯了这种愚蠢的错误，在党的章程中加进了有关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积极分子和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消极分子

的解释。我们无法改变章程。我们无法在全会上消除我们由于疏忽而犯下的错误，但我们可以凭良心去做，不实行这一条，因为这一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反列宁主义的，是违背真理和良心的。

如果一个人承认并基本上接受我们党的纲领，如果他在我们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如果他尽自己的可能缴纳党费——这就是一个合格的党员。不能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中央委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会场上活跃起来。）

是否有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呢？要有10年功夫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是怎样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呢？他是怎样读马克思的著作的呢？他不是一般地读，而是细细咀嚼。他做笔记，一遍、两遍、三遍地反复读，领导运动。于是他最后成功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不能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能这样。这是愚蠢的。

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闪失和过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一个普通人要是犯了错误，我们的人对他除了开除就不会采取其他的措施，就像一段时间内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或者是枪决，或者是宣告无罪，似乎就不存在中间的办法。我们假定一个党员有一次、两次不能到会。那么你可以把他找来，提醒他党的会议不能缺席。如果他仍然不能到会或者出现了不能缴纳党费的情况，那么你可以再次提醒他注意。这时，可以作出指示，以后还可以提出警告，再以后还可以给他记过，最后可以规定期限——给你一个期限一一在这段时间内你必须要改正。还有，如果他连我们党的思想体系的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有一些初步知识党员必须学习，那好，给他一个期限，帮助他学习。如果不见效果，把他转为预备党员，如果这仍然无效，把他转为同情分子。但是，我们的人却不打算这样做。或者你是党员，或者你就退党。这样不好，同志们，这不好。

以上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几个问题。（经久不息的掌声。）

安德列耶夫：现在我们来通过关于斯大林同志报告的决议。得到政治局基本赞同的草案已经分发给了大家。对草案还有没有修改意见或补充？（有些人喊道：没有。哈塔耶维奇：有一处文字需要修改。草案中说：“全会责成州委书记承担起市委书记的职责”。这有些不妥，因为市委书记应当是选举产生的。**斯大林**：草案中说，应当进行选举。承担职能——并不意味着要成为书记。）没有必要接受你的修改意见，哈塔耶维奇同志，这本来就是清楚的。

还有没有修改意见或补充？没有。现在表决。同意通过决议草案的请举手。有反对的吗？有弃权的吗？没有。一致通过。全会议程到此结束。

斯大林：看来，同志们，在根据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的基础上进行的苏维埃系统的选举，无疑要推到5月20日了。我们在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必须像这样详细地讨论一下我们的苏维埃也要按新的方式进行改组即在苏维埃中恢复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苏维埃中的选举搞得很糟糕。不仅党的组织忘记了党的机关应当选举，而且苏维埃机构也忘记了这一点并且错误地运用选举原则——代表们不知去向，没有名单，没有报告。然而，只要我们能将党的组织进行改组（将党的组织按民主的方式进行改组是可能的），我们就能够帮助它们积极参加并领导最高国家机关的选举。此外，你们应当按民主的方式对我们的地方苏维埃进行改组，包括所有这些区执委会、执行委员会、市苏维埃，因为那些地方的民主未必很多，你们怎么看呢？（有些人喊道：不多。莫洛托夫：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总的意见是在下次全会上结合通过新宪法提出苏维埃对新的选举条件做好准备的问题……（有些人喊道：对！）……邀请原执委会委员们和全体苏联人。（有人喊道：工会问题也应讨论。）关于工会和共青团问题，下次全会大概也要进行讨论，不光是工会，还有共青团，或许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但核心问题是对我们地方苏维埃的

工作人员队伍进行改组，地方苏维埃中的民主太少，工作无人过问。（卡冈诺维奇：对。有些人喊道：对。）如果这样做对，那么可以通过了。

安德列耶夫：对斯大林同志的这个建议有不同意见吗？（有些人喊道：没有。）

斯大林：只有当同志们在党内实行了选举原则并同应我们邀请列席下一次全会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交流自己的经验后，才可以讨论改组问题。那时就会有民主经验了。（卡冈诺维奇：那样一来你们就可以报告工作了。）

安德列耶夫：同意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吗？

有些人喊道：同意。

安德列耶夫：现在我宣布中央全会闭幕。

原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
1995 年第 11-12 期合刊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二第 67—88 页

要有年轻的新鲜力量注入中央委员会

——在十九大闭幕后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摘录）

（1952 年 10 月 16 日）

现在我们开完了党的代表大会。会开得很好，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有了完全的统一。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统一。有些人表示不同意我们的决议。

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大大地扩大中央委员会呢？可是必须给中央委员会注入新的力量，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们这些老头子，一个个都会死去，但是应当想一想，我们要把我们伟大事业的接力棒交给谁，交到什么人的手里，由谁来举着它继续前进？为此需要更年轻的、忠诚的人，需要政治活动家。而这是不是说，要培养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呢？而为此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培养出一个国务活动家需要 10 年，不对，整整 15 年。

而且，仅仅有这种愿望还是很不够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在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日常工作中，在克服形形色色敌视我们的、极力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反抗中，才能培养出思想坚定的国务活动家。我们党培养的、掌握了列宁经验的政治活动家必须在斗争中摧毁这些敌对的图谋，夺取实现我们伟大目标的完全胜利。

我们必须提高党及各级党委的作用，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列宁教导我们要改进党的群众工作，这难道可以忘记吗？这一切都要求有年轻的新鲜力量注入中央委员会——我们党的领导司令部。我们根据列宁的教导，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才扩大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我们党自身也扩大了一些。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解除了一些著名党务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的重要部长职务。这方面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解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一些人的部长职务，用新干部取代了他们。为什么呢？根据什么呢？部长的工作是很吃力的事情，它需要有许多精力、具体的知识和健康的身体，因此我们才解除了某些功勋卓著的同志现任的职务，任命了更熟练的、更有主动精神的新干部来代替他们。他们是年轻人，精力充沛，我们应当支持他们担任责任重大的工作。

至于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本身，他们仍旧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我们调他们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因此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少个副手。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 年版第 754-755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二第 95—96 页

关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

——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37年6月2日）

斯大林：同志们，关于有过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现在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怀疑。事实、罪犯自己的这么多供词和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们的观察结果，这些东西是这样多，毫无疑问这里有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这个阴谋受到德国法西斯分子的鼓励和资助。

大家在骂这些人：骂一些人是坏蛋，骂另一些人是怪人，骂第二类人是地主。

但是骂人本身无济于事。为了把这个祸害连根拔掉并把它消除掉，应当研究它，心平气和地研究，研究它的根源，揭露并看准其手段，以便今后无论在我国，还是在我们周围都不再发生这样丑恶的事情。

我就是想就这方面的问题说几句话。

首先请大家注意军事政治阴谋的首要分子是什么人。我不拿已被枪毙的那些人来说，我拿不久前还逍遥法外的那些人来说。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可以说是政治上的领导人。属于他们这类的我认为还有鲁祖塔克这个人也是首要分子，干得很狡猾，把一切都搞乱，原来是个德国间谍，还有卡拉汉、叶努基泽，接着是亚戈达、图哈切夫斯基——军队系统的，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

---

① 鲁祖塔克，1926-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6-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5月26日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7月28日被判死刑。

尼克，—— 一共13个人。这是些什么人？知道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些人是军事政治阴谋的核心，是与德国法西斯特别是德国国防军有经常联系的，使其全部工作都适合德国法西斯的口味和目的。这是些什么人？

有人说图哈切夫斯基是地主，另一个什么是牧师的儿子。同志们，这种态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绝对解决不了问题。当人们把贵族作为与劳动人民敌对的阶级来谈时，指的是一个阶级，一个等级，一个阶层，但这不意味着贵族中某一些个别的人不能为工人阶级服务。列宁就是贵族出身——这个你们知道吧？

有人回答：知道。

斯大林：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不管怎么说是非无产阶级分子。恩格斯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厂并以此供养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牧师的儿子——这个人不错。相反谢列布里亚科夫[①]是个工人，但你们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坏蛋。利夫希茨[②]是个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原来是个间谍。

大家谈到敌对力量时指的是一个阶级、一个等级、一个阶层。但并非该阶级中的每个人都可能干坏事。贵族、资产阶级中的个别的人为工人阶级工作而且工作得不错。比方说律师这个阶层中就有许多革命者。马克思是律师的儿子，不是雇农的儿子，也不是工人的儿子。在这些阶层中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服务，而且不比纯血统的无产者差，而是比他们好。因此是不是雇农的儿子

———————————————

① 谢列布里亚科夫，十月革命后历任俄共（布）中央书记、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等职。1936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在“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中被判死刑。

② 利夫希茨，1930年起历任南方铁路局、北高加索铁路局、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局长、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37年在“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中被判死刑。

这个一般的尺度，对个别的人不适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要说这是生物学的态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生物科学，而是社会科学。所以这种一般的尺度，尽管对一些等级、集团、阶层而言是完全正确的，但不适用于非无产阶级或非农民出身的任何个别的人。我将不从这方面来分析这些人。

你们还有另一种流行的、也是不正确的观点。常常听到有人说："1922 年某某人投票赞成托洛茨基。"这也是不正确的。这个人可能年轻，有些不明事理，好惹是生非。捷尔任斯基也曾投票赞成托洛茨基，不仅是赞成，而且是在列宁在场的情况下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列宁。这个你们知道吗？他不是个对什么事情能消极对待的人。他曾是个非常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还想把整个国家政治保卫局发动起来保卫托洛茨基。这一点他未能做到。安德列耶夫 1921 年曾是个非常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

有人在座位上问：哪个安德列耶夫？

斯大林：中央书记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所以你们要知道，某人某时投票赞成或某人某时动摇这样一种一般的观点也不是绝对的，也不总是正确的。

因此这第二种流行的，在你们中间乃至全党非常普遍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我说它不总是正确的，是它常常使人陷入迷途。

这就是说，在评价这个核心及其成员时，我也不使用这个不正确的观点。

判断人最好是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据他们的工作。有人动摇过，后来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公开地、诚实地脱离了，与我们在一个队伍里很好地同托洛茨基分子战斗。捷尔任斯基曾战斗得很好，安德列耶夫同志现在战斗得很好。我们可以举出二三十位这样的人，他们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彻底脱离了，现在同它战斗得很好。而且不

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事实证明列宁——托洛茨基派与其开始了公开的战争——的路线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后来，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整个党的路线也是正确的。这不能不影响到一些前托洛茨基分子。像捷尔任斯基、安德列耶夫这样的人和二三十个前托洛茨基分子明辨了是非，认识到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转到了我们这方面，这是毫不奇怪的。

我再多说几句。我知道有些人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过去也不曾是托洛茨基分子，然而他们也不曾带给我们多大益处。他们形式主义地拥护党，这样的列宁主义者有多大价值呢？相反有些人过去固执己见，怀疑过，不承认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们没有怯懦到要掩饰自己动摇的程度，他们曾投票反对党的路线，而后来转到了我们这方面。因此这第二种观点，在你们中间流行而普遍的观点，作为绝对的观点我不能接受。

在评价这个阴谋的核心的领袖们时需要第三种观点，这就是根据这些人多年来所作所为来评价他们的观点。

现在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举出了 13 个人，现在重复一遍：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其中 10 个人是间谍。托洛茨基组织了这一集团，直接训练他们、教导他们去给德国人提供情报，让他们相信我托洛茨基手下有人。去进行破坏、颠覆，让日本人和德国人相信我托洛茨基有力量。这个人在自己的人中间鼓吹进行间谍活动的必要性，他说，因为我们托洛茨基派应当与德国法西斯联合，所以我们应当合作，所以我们应当像他们在需要时帮助我们那样去帮助他们。现在他们需要情报方面的帮助，那就给他们情报。你们还记得拉狄克[①]的供词，你们还记得利夫希茨的供词，你们还记得索柯里尼柯夫[②]的供词——他们都给了情报。这就是间谍活动。托洛茨基是从我们党内的人或我们党周围的人当中物

色间谍的组织者，是头号间谍。

李可夫。我们没有资料表明他本人向德国人提供情报，但他通过自己的人鼓励这种情报活动。与他联系很密切的是叶努基泽和卡拉汉，他们俩是间谍。卡拉汉从1927年起，叶努基泽也是从1927年起。我们知道他们通过谁送交秘密情报，通过谁送交这些情报——通过德国驻莫斯科使馆某个人。我们知道。李可夫知道这一切。我们没有材料表明他本人是间谍。

布哈林。我们没有材料表明他本人提供过情报，但是同他联系很密切的既有叶努基泽，又有卡拉汉，还有鲁祖塔克，他们劝他，提供情报吧，他们自己没有提供。

加马尔尼克。我们没有资料表明他本人提供过情报，但是他的所有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乌博列维奇，特别是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为德军总参谋部从事经常的情报活动。

剩下的人。叶努基泽、卡拉汉我已经讲了。亚戈达是间谍，而且在自己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培植间谍。他告诉德国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中谁有什么毛病。他把这样的肃反工作人员派到国外去休假。德国情报机关抓住这些人的这些毛病，吸收他们加入组织，这些人回来时都成了间谍。亚戈达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已被德国人吸收加入了组织，不管你们认为怎样，要么你们做我的人，为我个人工作，我让你们怎样就怎样，惟命是从；要么我向中央委员会告发你们是德

——————————————

① 拉狄克，曾任《消息报》国外部副主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等职。1937年因“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而被判10年徒刑，死于狱中。

② 索柯里尼柯夫，十月革命后历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财政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副外交人民委员等职。1937年在“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中被判10年徒刑，1939年死于狱中。

国间谍。那些人被吸收加入组织，作为亚戈达的人听命于他个人。他同加伊[①]这个德日双料间谍就是这样干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这些人也供认了。他同沃洛维奇[②]也是这样干的，后者自己供认是德国间谍。他同保克尔[③]也是这样干的，这个人是个老德国间谍，从1923年起就是了。这就是亚戈达。下一个是图哈切夫斯基。他的供词你们都看了。

有些人回答：是的，看了。

斯大林：他把我们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是我们神圣的东西——交给了德国国防军。与德国国防军代表会过面，是不是间谍？是间谍。在西方为了体面把这些西欧文明国家的骗子称做情报员，而我们按俄罗斯的方式去理解，这就是间谍，亚基尔经常向德军参谋部提供情报。他诡称自己患肝病。这个病也许是他虚构的，也许他确实有这种病。他去那儿治病。乌博列维奇不仅伙同朋友和同志们，他本人也亲自提供过情报。卡拉汉是德国间谍，埃德曼是德国间谍。卡拉汉从他在德国当武官时起就向德军参谋部提供情报。鲁祖塔克，我已经说过他不承认他是间谍。但我们掌握所有资料。我们知道把情报交给谁了。在德国，在柏林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女情报员。等你们以后有机会去柏林，说不定你们中间有谁认识约瑟芬·根茨。她是个漂亮女人，老情报员。她吸收了卡拉汉加入组织，是靠女人那方面本事吸收的。她还吸收了叶努基泽，帮助别人吸收了图哈切夫斯基。她把鲁祖塔克抓在手里，约瑟芬·根茨是个很有经验的情报员。她本人好像是个在德国国防军中服务的丹麦人。长得漂亮，很愿意响应男人们的任何提

——————————————

① 加伊，苏俄国内战争期间任师长、集团军和骑兵军司令员。1933年起任空军学院军事史和军事艺术教研室主任、教授。

② 沃洛维奇，1936-1937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局长。

③ 保克尔，1933-1937年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作战处工作人员。

议，然后伺机破坏。你们也许在《真理报》上读过一篇文章，谈到招募者举行的一些包藏祸心的招待会。她是在这种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德国国防军女情报员之一。你们面前就是这样一些人。10 个确定的间谍和 3 个德国国防军间谍活动的组织者和纵容者。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

当然，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些昨天还是共产党员，突然自己就成了德国间谍机关手中的无耻工具？是这样的，他们是被吸收加入组织的。今天要求他们给情报。如果你不给，我们手里有你签过字的条子，说明你已被吸收入伙，我们会把它公布于众。他们害怕被揭露，只好提供情报。明天要求：不行，给太少，多给一些，把钱拿去，开个收条。在这之后又要求：开始搞阴谋，搞破坏，首先搞破坏活动，证明你们对我方有用。你们若不证明，我们就揭发，明天就把你们交给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你们的脑袋就得搬家。于是他们开始搞破坏活动。在这之后德国人又说——不行，你们得想法在克里姆林宫或莫斯科卫戍部队里干点什么，干脆去占据指挥员职位吧。于是这些人一旦有可能就开始卖力。后来这又不够。你们干点值得干的实事吧。于是他们就杀害了基洛夫。德国人说，这是钱，拿走吧。又对他们说，继续前进，能不能把整个政府都除掉。于是他们就通过叶努基泽，通过戈尔巴乔夫[①]、叶戈罗夫[②]——当时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所学校校长，而学校就在克里姆宫里——还有彼得松[③]来安排。德国人对他们说，组织一个小组，让这个小组去逮捕政府成员。

————————————

① 戈尔巴乔夫，苏联红军指挥员，曾任军长，30 年代在不同地方担任指挥员职位。

② 叶戈罗夫，苏联元帅。曾任集团军、方面军和军区司令员。1931-1938 年历任工农红军参谋长、总参谋长和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

③ 彼得松，1920-1935 年任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后任基辅军区副司令员。

报告飞速传去，说有一个小组，我们一切都会办到，去抓人，等等。但是抓几个人，杀几个人还不够。还有人民呢，还有军队呢。所以他们又报告说，我们已经占据了一些指挥员职位，我们几个占据高位，我，图哈切夫斯基，他，乌博列维奇，还有亚基尔。又提出要求——关于日本、远东的情况怎么样？于是又开始了一个战役，非常重要的战役。他们要撤掉布柳赫尔①。那里已经有了候选人。当然是图哈切夫斯基了。不是他还有谁呢？为什么要撤掉呢？是加马尔尼克、阿隆施塔姆②进行鼓动的结果。他们进行得这么巧妙，以至于把布柳赫尔周围的人几乎都发动起来反对他。此外，他们使军事中心的领导人深信应当撤掉他。有人问为什么，你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他好酒贪杯。那好，还有什么？他早晨起床晚，不去巡视部队。还有什么？老了，不了解新的工作方法。可是今天不了解，明天会了解的，一个老战士的经验不会没有用处。你们看，在对布柳赫尔说那些下流话这一事实面前，中央委员会挺身而出。普特纳在烦扰，阿隆施塔姆在莫斯科烦扰我们，加马尔尼克也在烦扰。最后我们召开了会议。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同他见了面。是个不错的男子汉，我们不了解他，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让他发表讲话，讲得极好。我们用这种方式对他进行了审查。各地都有人提醒，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大厅召开会议。

当然，他比任何图哈切夫斯基，比任何危言惑众的乌博列维奇，比任何在军事上毫不出众的亚基尔都更有智慧，更有经验。有过一个小组。我们拿科托夫斯基来说，他从未指挥过集团军，也未指挥过方

————————————————

① 布柳赫尔，苏联元帅。1921-1922 年任远东共和国总司令、国防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 年后历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远东特种红旗集团军司令员。1938 年 10 月 22 日被捕，后被处决。

② 阿隆施塔姆，1934-1937 年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1937 年任莫斯科军区副司令员，1937 年调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

面军。如果有人不了解本行，我们就会骂他们，见你的鬼去，我们这里不是修道院。把不喝酒但也不会打仗的人放在指挥员的职位上是不好的。有些人拥有十年之久的指挥经验，年龄确实够老的了，但不能撤掉他们，相反要留住他们。我们当时骂过加马尔尼克，而图哈切夫斯基却支持他。这是惟一一件达成协议的事。想必是德国人告发了，采取了一切措施。想安插另一个人，但未能得逞。

这个核心是由 10 个货真价实的间谍和 3 个货真价实的间谍教唆者组成的。很清楚，这些人的思想本身取决于德国国防军。如果他们将执行的是德国国防军的指示，那么很清楚，国防军将怂恿这些人到这里来。这就是阴谋的内幕。这是一个军事政治阴谋。这是德国国防军一手安排的。我认为这些人是国防军的傀儡和玩偶。国防军要在我们这里搞阴谋，这些先生就着手搞阴谋。国防军想让这些先生经常向他们提供军事机密，这些先生就把军事机密通报给他们。国防军想要推翻现政府，杀掉政府成员，他们就着手办这件事，但没有成功。国防军想在战争爆发时一切准备就绪，想让军队去从事破坏活动从而对防御不作准备，国防军想这件事，他们就去准备这件事。这是一些代理人，是在苏联搞军事政治阴谋的领导核心，由 10 个货真价实的间谍和 3 个货真价实的间谍教唆者组成。这是一些德国国防军的代理人。这是主要之点。因此，这个阴谋与其说有内部基础，不如说有外部条件，与其说在我国有内部方针上的政策，不如说有德国国防军的政策。他们想把苏联变成第二个西班牙，找到并招募了从事这方面活动的奸细。情况就是这样。

特别是图哈切夫斯基，他一直扮演着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不会干卑劣害人勾当的有教养的人。我们都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军人，我曾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军人。我问过他：您怎么能在 3 个月内把一个师的兵员搞成 7000 人。这是什么？是门外汉，不是军人。什么是 7000 人的师。要么是个没有炮兵的师，要么是有炮兵但没有掩护部队的师。这

根本就不是一个师，而是一个耻辱。怎么能有这样的师。我问过图哈切夫斯基，您这个自称此事行家的人怎么能坚持把一个师的兵员搞成7000人，同时又要求我们每个师都配备60-40门榴弹炮和20门大炮，要求我们有这么多坦克武器，这么多炮兵，这么多迫击炮。这里二者只能选一，或者您让所有这些军事装备都见鬼去，只提供步兵，或者您只供应军事装备。他对我说：“斯大林同志，这是爱好”。这不是爱好，这是按德国国防军要求进行的破坏活动。

这就是核心，而核心是什么？他们投票赞成过托洛茨基没有？鲁祖塔克从来没有投票赞成过托洛茨基，但他是个奸细。叶努基泽也从未投票赞成过托洛茨基，他也是个奸细。这就是你们的观点——谁投票赞成谁。

地主出身。我不知道那里还有谁出身于地主家庭，好像只有图哈切夫斯基一人。阶级出身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在每个个别的情况下都需要根据事情来判断。这些人多年来与德国国防军有联系，给他们当间谍。也许他们常常犹豫并且并非总是进行自己的工作。我认为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自始至终干自己的事情。我看到把他们带到监狱时他们是怎样哭泣的。就拿那个加马尔尼克来说吧。你要知道，如果他自始至终是个反革命分子，那他的表现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我若是处于他的位置上，作为一贯的反革命分子，首先会要求见斯大林一面，首先把他打死，然后再自杀。反革命分子都这样干。这些人什么也不是，只是德国国防军的俘虏，被吸收加入组织的间谍，而这些俘虏只能沿着搞阴谋的路，沿着搞间谍活动的路，沿着拱手交出列宁格勒、乌克兰等地方的路滑下去。国防军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把那些软弱的人抓来当俘虏，做奴隶，而软弱的人应当按照给他们下达的命令行事。俘虏就是俘虏。这就叫落入间谍活动的圈圈。只要你落入这个轮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要把你卷进去，你只能顺着斜坡滑下去。这就是基础。原因不在于他们的政策和别的什么，谁也没问他们政策的

事。这不过是这些人在听从而已。

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你们要知道，他们可怜起农民来了。就是这个坏蛋叶努基泽，1918 年把农民赶走并恢复了地主经济，现在他又可怜起农民来了。然而因为这个傻大个儿（笑声），能装成老实人的样子并痛哭流涕，所以大家就相信了他。

第二次，在克里木，当时有几个老太太，妇女不找他，像在白俄罗斯那样，来找他哭了一顿儿，他就把庄稼人赶走了，就是这个坏蛋把农民赶走并让一个什么贵族卷土重来。我当时就提出把他开除出党，但大家不相信我，认为我作为格鲁吉亚人，对格鲁吉亚人太严厉了。你们要知道，是一些俄罗斯人给自己提出了保卫“这个格鲁吉亚人”任务。农民们与他，与这个让地主卷土重来的坏蛋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的问题不在政策上，谁也没问他关于政策的事儿。他们是德国国防军手中的俘虏。执行命令。这些傻瓜以为我们是瞎子，什么也看不到。你们要知道，他们要在克里姆林宫把政府成员抓起来。结果我们有所察觉。他们想在莫斯科卫戍部队里找到自己的人并把整个部队发动起来。他们以为谁也不会发现任何情况，以为我们这里是撒哈拉大沙漠，而不是一个有居民，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政府和政党的国家。结果是我们有所觉察。

而现在这些德国国防军的俘虏正坐在牢房里哭呢。政治家！领导者！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先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吸收那些人呢。我们在军队系统逮捕了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好人。他们是怎样被吸收的呢？

我不能说这是一些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列宁生前身后他们发动过多少次反对列宁、反对党的公开斗争，但每次都被击败了。现在他们又发动了一次大运动，再次遭到失败。这些人本事并不大，从 1921 年起到 1937 年止，他们不断遭到失败。本事不大，不是什么天才。

他们怎么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吸收那些人？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认为他们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的。一个人对某件事不满，例如他对因从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或季诺维也夫分子而不能随便得到提升而不满，或者他因为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而被降级不满，而他自认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有时候一个人很难了解自己有多大力量和自己有多少优点和缺点。有时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个天才，因此在得不到提升时自己就会抱怨。

先是小打小闹，搞个意识形态挑战集团，然后越走越远。进行了这样的谈话：伙计们，事情是这样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我们手里，亚戈达在我们手里，克里姆林宫也在我们手里，因为彼得松同我们在一起，莫斯科军区、科尔克和戈尔巴乔夫也在我们这一边。所有的人都在我们这边。要么你现在就出人头地，要么明天，当我们取得政权时你一无所得。于是许多意志薄弱的、不坚强的人就想，这件事现实可行，真不得了，这件事好像还有利可图呢。若是你错过了机会，在这期间别人逮捕了政府成员，控制了莫斯科卫戍部队以及诸如此类的勾当，那你可就一筹莫展了（全场活跃）。

彼得松在自己的供词中就是这样考虑的。他摊开手说：“这件事现实可行，怎么能不被吸收呢”？（全场活跃）

原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现实可行。然而这些意志薄弱的人正是这样考虑的：真不得了，说什么也不能落到别人后面。赶紧着手办这件事吧，不然就一筹莫展了。

当然，这样也只能吸收几个人。当然，坚强也是可以做到的，有些事取决于性格，然而也可能取决于教育本身。同志们，我要说这些不够坚强的人，他们就是些被招募的材料。这就是这些坏蛋能如此容易地吸收不够坚强的人的原因。催眠术对他们起了作用：明天所有的人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中，德国人与我们在一起，克里姆林宫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将从内部起作用，他们从外部起作用。这些人就这样被招

募了。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令人费解地忽略了这件事？有过预兆的。2月份开了中央全会。不管怎样这件事还是提了出来，而我们毕竟还是忽略了。我们自己从军人中发现得很少。这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我们是些能力差的人，或者眼睛全瞎了？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当然，军队并未脱离国家，脱离党，而在党内，你们知道，这些成就有点儿冲昏人们的头脑。每天都在取得新的成就，计划被超额完成，生活在改善，政策好像不错，我们党的国际威望无可争议地增长，军队本身从基层到中层甚至上层的一部分，都是非常健康和强大的力量，整个事业都在前进，这时候人们不由得就松劲了，失去了视觉的灵敏，开始考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还有什么不够的？政策不错，工农红军拥护我们，我们国家的国际威望在增长，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前程远大，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人想当反革命吗？这些毫无价值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是有的，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核心已被德国人吸收进了组织，他们甚至在希望脱离反革命道路时也不能脱离，因为他们总是害怕被揭发出来丢掉脑袋。然而总的形势，我们力量的增长，军队、国家和党蒸蒸日上的发展，这些使我们的政治警觉性变得迟钝，使我们的视觉变得不够灵敏了。我们恰恰在这方面是软弱无力的。

需要对人进行审查，不管是外来的人还是自己人。这就是说应当有一个广泛设立分支机构的侦察机关，以便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同侦察机关在一起，扩大自己的网络并更警觉地观察。我们在所有方面都粉碎了资产阶级，惟独在侦察方面像一些乳臭未干的小孩一样被打败了。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弱点。没有侦察，真正的侦察。这个词我既是在广义上使用，指的是保持警觉；也是在狭义上使用，指的是对侦察的良好组织。我们军事系统的侦察机关不好，很薄弱，内部间谍活动泛滥。我们政治保卫总局系统的侦察机关由间谍加伊领导，我们的肃反委员会侦察机关

内部有一批主宰这件事情的人，他们为德国、日本、波兰工作，让他们干多少他们就干多少，就是不为我们工作。侦察是我们在 20 年间首次遭受最惨重失败的领域。现在的任务是要把侦察机关扶植起来。这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同志们，他们取得的胜利太大，对所有的掠夺者而言苏联是一块极香的肥肉。泱泱大国，出色的铁路，船队在扩大，粮食生产在增长，农业兴旺而且将继续兴旺，工业蒸蒸日上。这块肥肉对帝国主义掠夺者而言是如此诱人，以至于它要求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命运和历史把这样巨大的财富，把这个辉煌伟大的国家托付给我们，而我们却在酣睡，忘记了像我们国家这样巨大的财富不可能不引起渴求、贪欲、忌妒和侵占这个国家的欲望。德国第一个认真地伸出了手。日本是第二个，把它的情报员放进来，有自己的暴动核心，那些人想得到滨海地区，而这些人则想得到列宁格勒。我们却疏漏了这一点，不懂得这一点，在获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最富有的国家，又是一块令所有掠夺者垂涎的肥肉，这些掠夺者在使尽浑身解数从这块肥肉上夺下一点儿之前是不会安心的。我们对这方面疏漏了。这就是我们的侦察机关不好，我们在这个领域像乳臭未干的小孩一样被击败的原因。

侦察机关不好，但这还不是一切。很好。现在开始安心了。这是事实。取得一些成绩。成绩是一件大事，我们大家都渴望取得成绩。然而这些成绩也有其阴暗面——自满使人失去理智。但我们也有另一些缺点，不管有没有成绩，这些缺点都存在，并且应当克服这些缺点。现在有人在这里谈论报告，也有人报告过。我要说来自地方的报告搞得很不好。不好。如果报告得更多，如果我们把事情像列宁所想的那样提出来，那么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党外人士都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对他发现的缺点写出自己个人的意见。他也要这样想，伊里奇也这样努力过，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学生都未能安排好这件事，需要的是不仅要看，要观察，要发现缺点和漏洞，发现敌人，而且要所有其他的同

志也看这件事。我们从这里不能看到一切。人们认为中央应当知道一切，看到一切。不，中央不能看到一切，没有这么回事。中央只能看到一部分，剩下的在地方上才能看到。中央把人派出去，但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地了解这些人，你们应当审查他们。有一个真正的审查手段——这就是在工作中审查人，根据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审查。而这些只有地方上的人才能看到。

戈里亚切夫同志讲了冲昏头脑的实际事。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当然会采取措施。有人说这说那，说我们的步枪的情况不好，说我们的战斗用枪有变成运动用枪的趋势。

（有人说道：马赫诺的半截枪）。

不单是半截枪，有人放松弹簧，为的是不需要张力。一个普通红军战士告诉我，有一件不好的事，委托该委托的人去审查了。一个人为瓦西连科辩护，另一个人不辩护。最后弄清楚了他确实有罪。我们未能知道这是破坏活动。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原来是间谍。这是他自己讲的。从哪年开始，叶若夫同志？

叶若夫回答说：从 1926 年开始。

斯大林：当然，他称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当托洛茨基分子可比当间谍好多了。

报告搞得不好，但没有你们的报告，无论军事委员会，还是中央委员会什么也不能知道。派出的人并非百分之百经过全面审查。在中央这样的人不多。派出去的人可能有用。你们的责任是在事业中，在工作中审查这些人，如有差错你们就报告。每一个党员、忠诚的党外人士、苏联公民，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报告他所发现的缺点。如果属实，哪怕百分之五属实，也不错。必须把信寄给自己的人民委员，把副本寄给中央委员会。随你们的便，谁说只给人民委员写信就行了？不对。

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它发生在伊里奇与托洛茨基之间，发生在

组织国防委员会的时候，似乎是在1918年或1919年末。

托洛茨基来抱怨说：中央委员会收到一些共产党员的信，这些信的副本有时寄给作为人民委员的他，有时甚至不寄副本，信越过他寄到中央委员会。“这不合适”。列宁问：为什么？“怎么能这样呢，我是人民委员，那样我不能负责任”。列宁当时像对一个孩子一样把他顶了回去：“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一个人关心军事。战争是全国的事，是党的事。”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由于记性不好或别的什么原因直接给中央委员会写信，那么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应当向中央委员会控告。您是怎么想的，中央委员会会把自己的事让给您吗？不。请您务必把这个控告的实质弄明白。您以为中央不会告诉您，会告诉的。您感兴趣的应当是这封信的实质——是对还是错。甚至连副本也可以不寄给人民委员。

难道什么时候伏罗希洛夫禁止你们给中央写信？（有些人说：“没有，从来没有”）。你们中间有谁能说禁止你们给中央写信？（有些人说：“没有，谁也不能”。）既然你们拒绝给中央写信，甚至不给人民委员写信，报告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么你们就是在继续原来的托洛茨基主义路线。与头脑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的斗争现在也应该进行，应当拒绝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径。我再说一遍，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对混乱局面感到担心的党外人士——说实话，有些党外人士比其他党员的信写得还好——都有责任给自己的人民委员，给副人民委员，给中央写信，报告那些他们认为危险的事情。

这就是说，如果这个规则得到执行，而这是列宁主义的规则，你们在政治局里就找不到一个对此说出反对意见的人；如果你们执行了这个规则，那我们早就把这件事揭露出来了。

这就是有关报告的情况。

在由上级对人进行审查方面还有缺点：没有进行审查。我们为什么要组建总参谋部，为的是让它对军区司令员进行审查。可它在干什

么呢？我没有听说总参谋部对人进行过审查，没听说总参谋部在乌博列维奇那里发现了什么并揭露了他的所有诡计。刚才这里有一位同志发言，谈到关于骑兵的问题，谈到事情在这里是怎样提出来的，总参谋部究竟在哪里，你们是怎么想的，总参谋部是为摆样子而存在的吗？不是。它应当从上面在工作中对人进行审查。军区司令员不是张作霖，把一个军区交给他任其摆布。

有些人说：有过这样的情况。

斯大林：这种做法不合适。当然，有的时候人们不喜欢听不顺耳的话，但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当然，有时候人们逆潮流而说一些不顺耳的话。但也有的时候人们不想得罪军区司令员。这是不对的，这是极其有害的事。总参谋部存在是为了让它天天对人们进行审查，给他出主意，改正他的错误。也许有个军区司令员经验不足，无意中自己惹出什么事来，应当让他改正过来，去帮助他。好好地审查一下。所有这些勾当都可能发生——在乌克兰有亚基尔，在白俄罗斯这里有乌博列维奇。

他们的所有勾当我们并非都知晓，因为这些人可以自行其是，他们在那里搞什么鬼，只有天知道。

总参谋部该了解这一切，如果它想真正在实际上管好自己的事。我还没看到总参谋部高水平挑选人才的迹象。

还有，在我看来，对任命指挥干部这件事不够重视。你们看看会出什么事。要知道如何分配干部是很重要的问题。军事上的惯例是有命令就得服从。如果领导这件事的是一个坏蛋，他就可能把一切搞乱。他可能把好的士兵，好的红军，卓越的战士派到不应当去的地方，不是去包抄敌人，而是去帮助敌人。军事纪律比党内纪律更严格。一个人被委派到一个职位上，他就要进行指挥，他是主要力量，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所以在任命干部时应表现出特别的谨慎。

我是局外人，不久以前才有所觉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在几

乎所有的机械化旅都有一些未经审查的人，不坚定的人。为什么这样，怎么回事？就拿阿博希泽来说，他是个放荡的人、大坏蛋，这是我偶然听说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机械化旅交给他呢。我说的对吗？伏罗希洛夫同志？

伏罗希洛夫：他是一个军的“阿勃特”部队司令。

斯大林：我不知道“阿勃特”是什么？

有人在座位上说：一个军的汽车装甲坦克兵部队司令。

斯大林：祝贺！祝贺！很好！为什么他应该在那个职位上？他有什么优点？已经开始了审查。原来他几次被开除出党，但后来又恢复了党籍，因为有人帮他的忙。给高加索发了电报进行了审查，原来他过去是个格鲁吉亚的执法队员，酒鬼，打过红军。但有军人姿态！（全场活跃）

开始进一步分析。究竟是谁举荐了他呢，真该死！你们想像一下，原来举荐他的是埃利亚瓦[①]，还有布琼尼[②]和叶戈罗夫同志。布琼尼和叶戈罗夫也不了解他。这个人看来很能喝酒，善于当主持人（笑声），但有军人姿态！今天他发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宣言，明天又发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宣言，全凭自己的意愿！难道可以举荐这样未经审查的人吗？当然，他已被开除了。

再进一步地察看，发现到处都有这种情况。例如在莫斯科，还有个奥尔尚斯基……

有人说：骗子！

————————————

① 埃利亚瓦，1923 年任格鲁吉亚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 年任外高加索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31 年起任苏联国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36 年起任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② 布琼尼，苏联元帅。国内战争期间历任骑兵军长和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员，1924-1937 年任工农红军骑兵监。1937 年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有些人问：是奥尔尚斯基还是奥尔舍夫斯基？

斯大林：是奥尔尚斯基[①]，还有个奥尔舍夫斯基。我说的是奥尔尚斯基。我向加马尔尼克问起过他。我知道一些格鲁吉亚公爵，是些大坏蛋。他们失去了很多，因此任何时候也不会与苏维埃政权善罢甘休，阿博希泽这个家族尤其坏，他是怎么到了你们那里的？有人说：怎么会这样，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他当上了指挥员。抓住了装甲坦克部前部长哈列普斯基[②]的尾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他是个酒徒，不是个好人，我把他从莫斯科赶出去了，他怎么来的？后来追究到叶戈罗夫、布琼尼、埃利亚瓦那里，他们说是谢尔戈举荐的。现在发现他做得很谨慎——没有签字（有人说：他只要求）。我手头没有推荐书给你们读。

叶戈罗夫：这个时期他在科学院。

斯大林：他是作为一个头脑清醒、仪表堂堂、意志坚强（笑声）的人而被推荐的。这就是一切。至于他在政治上怎么样，不知道，但把坦克部队交给了他。对这件事太疏忽大意了。还有一件事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就是加里卡维[③]、萨维茨基[④]、费尔德曼[⑤]、叶菲莫夫[⑥]连续多年占据指挥官的职位。当然，他们也尽过力，但许多事情还是不取决于他们。人民委员应该签字。他们使用的是什么巧妙手段？

——————————————

① 奥尔尚斯基，曾任工农红军汽车装甲坦克部副部长。

② 哈列普斯基，国内战争中任集团军和方面军通信主任，后任工农红军通信部部长，1934-1937 年任工农红军汽车装甲坦克部部长。1937—1938 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

③ 加里卡维，1935 年起任乌拉尔军区司令员。

④ 萨维茨基，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

⑤ 费尔德曼，曾任工农红军指挥人员管理局局长。

⑥ 叶菲莫夫，1935-1937 年任工农红军总炮兵部部长，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听说需要一个武官，就提出 7 个候选人——6 个傻瓜和 1 个自己人，他在傻瓜中间看去像个聪明人（笑声）这 6 个人的公文退回去了——不合适，把第 7 个派出去了。他们有很多办法，当提出六个傻瓜和一个聪明人作候选人时，你不得已只能签批他。对这件事需要特别注意。

然后就是对军事学校，在我看来就是对良好的教育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把所有的人都堆在那里。这一点应当改正，应当清醒。

有人说：这个问题提过多次了，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光提出问题还不够，应当解决问题。

那个人说：我无权解决。

斯大林：问题不是为提出而提出，是为解决它们而提出的。

对军事部门的出版机关也未给以应有的注意。我读过一些杂志，有时就发现一些很令人怀疑的东西。你们要考虑到，我们的青年军人读杂志是认真地去理解的。对我们来说杂志可能不完全是重要的东西，而青年人对这件事看得很神圣，他们读杂志是要学习，如果往出版物中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不合适的。

现在给你们讲这样一件事。有过这样一个事件。胡佳科夫寄来了自己的小册子，但未被出版。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其他情况知道，既然这个人写作，他是个指挥员、老游击队员，需要对他加以注意。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我从前就知道他头脑不清楚。我写信告诉他，这件事办不成，不合适。我在信中对他说，列宁格勒人什么样的都有——邓尼金也是列宁格勒人，米留可夫也是列宁格勒人。但是会聚集起不少对旧东西感到失望并且不反对回来的人。我们会放他们来的，干嘛为这个举行各种各样示威游行呢，我写信给自己的大使放他们来就是了。只是他们并不想来，纵然他们回来了，他们也不是斗士。他们厌倦了纷乱，他们不过是想当一当家而已。心平气和地对他作了解释，他满意地留了下来。后来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信中说：我受到了排挤，说我写了本关于苏波战争经验的书。

有些人说：是《基辅的石头》[①]。

斯大林：关于1920年的《基辅的石头》。他们没有出版。你读一读。我很忙，问一些军人，他们说糟极了。问克利姆，也说是糟极了的东西。但还是读完了。确实是槽极了的东西（笑声）。它极力颂扬波兰的指挥部，过分诋毁我们的指挥部。而我看，小册子的整个目的是要揭发当时在那里解决问题的骑兵军并认为第28师——好像是它——是最重要的。

有人说：是第25师。

斯大林：他那儿有好多个师。我知道一点，那儿的庄稼汉挺满意，巴什基尔人去了吃落果、马匹，也没有去扰民。这是些好汉子。而为了让这个师特别突出，这一点看不到。有意思的是，谢佳金[②]同志写了这本书的前言。我对谢佳金同志不大了解。也许这样不好，我不大了解他，但如果从这篇前言来判断，是很令人怀疑的前言。我不知道，他是个军人，怎么咬不开小册子这个核桃。出版这本玷污我军指挥员、把波兰的指挥人员捧上天的小册子。小册子的目的是让骑兵军名誉扫地。我知道没有这个军西南方面军一个重大问题也解决不了。他过分赞扬自己的28师，随他的便，这是可以原谅的；但他不公道地把波兰指挥人员捧上了天，把我们的指挥员踩在污泥里，想使骑兵军名誉扫地，这是不对的。这一点谢佳金同志怎么没发现呢。前言说：一般地看是有缺点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总的来说也有有意思的经验。这是一个未必真实的甚至令人怀疑的前言。

有人说：我同意。

————————————

① 原文如些，应为《基辅的美人蕉》。

② 谢佳金，1933-1936年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37年7月起任巴库地区防空司令。

斯大林：同意什么，对出版物未加注意，出版物一定要掌握在手里。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些缺点应当消除，这些我不再重复。

阴谋家的主要弱点在哪里，而我们的主要力量又在哪里。这些先生受雇去做德国破坏活动的帮凶，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正在沿着搞阴谋和毁灭苏联的路上滑下去。没人征求他们意见，而是吩咐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就得执行。

他们的弱点在哪里？在于同人民没有联系。他们害怕人民，努力从上面进行，在那里建立一个点，在这里占据一个指挥员职位，在那里再占一个，在那里勾结一个被关押过的人，勾结一个心怀不满的人。他们指望自己的力量，以为德国人会支持他们但德国人不想支持。德国人想：喂，你去惹点麻烦，我们还得看一看。在这里事情难办，他们想做出成绩让他们看看，说波兰人不放行，这里是边境缓冲国，若是往北，去列宁格勒，那里情况要好些。而且他们也知道在北方，在列宁格勒，他们也并非这么强大。他们指望德国人，不懂得德国人不拿他们当回事儿，在逗弄他们玩呢。他们害怕人民。假如看过他们的计划，你就会知道他们想怎样占领克里姆林宫，他们想怎样欺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他们想欺骗一些人，把一些人安插到一个地方，把另一些人安插到另一个地方，把第三批人安插到第三个地方，并让他们守卫克里姆林宫，说应当保卫克里姆林宫，而在里面他们要逮捕政府成员。当然白天怎么干这事呢？“您知道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会先开枪的，这是危险的”。因此决定最好是夜间干这事（笑声）。但是夜间也有危险，也会开枪的。

这些软弱、不幸的人，脱离了人民群众，不指望人民的支持，军队的支持，害怕军队，躲避军队和人民。他们指望德国人和自己的一切诡计，如何欺骗克里姆林宫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如何欺骗卫队，在卫戍部队里制造混乱。他们不指望军队，这就是他们的弱

点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有人说，怎么这么多指挥人员离职。我看到有人感到不安，怎样接替他们。

（有些人说：这是胡说。非常好的人有的是。）

在我们的军队里人才不可胜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里人才数不胜数。不要怕提拔人，我们要更大胆地从下面提拔。现在给你们讲一个西班牙的例子。

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请求放他们去西班牙。我们说：“不，我们不要名人。我们将向西班牙派不大出名的人，你们看看结果怎样？我们对他们说，如果派你们去，所有的人都会发现，不值得。于是我们派出了不太出名的人，就是他们在那里也创造奇迹。巴甫洛夫[①]是什么人？难道他出名吗？

有人说：是个团长。

另一个人说：机械化旅旅长。

布琼尼：第6师机械化团团长。

伏罗希洛夫：那儿有两个巴甫洛夫：上尉……

斯大林：巴甫洛夫表现特别突出。

伏罗希洛夫：你要说的是年轻的巴甫洛夫吗？

有人说：那儿有个古里耶夫和巴甫洛夫大尉。

斯大林：谁也没想到，我也没听说别列津有指挥员的才能。你们看他把事情安排得怎样？事情办得非常好。

你们认识施特恩吗？原来不过是伏罗希洛夫同志的秘书。我认为施特恩不比别列津差多少，也许不是差一些，而是好一些。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没有名望的人。他们说：“派我们这些有名望的人去西班牙吧”。不，让我们派没有名望的人，派我们的中下级军官去。这

① 巴甫洛夫，曾任机械化旅旅长，西班牙战争参加者。

就是力量，这个力量与军队联系在一起，它将创造奇迹，我向你们保证。就从这些人中间更大胆地提拔吧，把一切都打破，彻底摧毁。更大胆从下面提拔人。大胆一些——不要怕。（长时间鼓掌）。

伏罗希洛夫：我们将工作到4时。

有些人说：休息一会吧，抽支烟。

伏罗希洛夫：现在休息10分钟……

伏罗希洛夫：需要分发速记记录，像我们通常做的那样。

布柳赫尔：回到部队以后，我们得立即召集少数积极分子，因为在部队里或多或少有些议论，而且说些不该说的话。总之需要告诉部队这里是怎么回事。

斯大林：也就是说说谁被逮捕了？

布柳赫尔：不，不全是这样。

斯大林：我若是处于您的位置，作为特种远东红旗集团军司令员，就会这样做：召集级别较高的人员，向他们详细报告。然后还是我，在我参加的情况下，召集级别较低的指挥人员，向他们比较简要而又明白易懂地解释，让他们懂得敌人混进了我们军队，他们要破坏我们的强大力量，这是我们的敌人日本人和德国人雇佣的人。我们要把他们从我们的军队中清除出去，不要怕，我们将把一切挡路的人揍扁。要是我就这样说。对高级干部说得要全面一些。

布柳赫尔：需要对红军战士说那些给小范围的人讲的情况吗？

斯大林：说那些给大范围的人讲的情况。

伏罗希洛夫：为简便易行可能颁布专门的命令，说明军队中揭发出这样的事情。指挥干部们会带着这个命令到各部队去宣读。

斯大林：是的。还应当进行解释。为了让高级指挥员和政治领导人了解，还是得分发速记记录。

伏罗希洛夫：是，这样会很好。在速记记录中我引证了很多材料。这样就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斯大林：如果同志们着手去做，在每个固定的组织中预定两个自己的副手并开始在政治方面和军事指挥方面培养他们，这就好了。

伏罗希洛夫：让我们采纳这个做法吧。在党的系统通常是这样做的。

斯大林：这将使我们有可能去了解人。

伏罗希洛夫：就是这个费尔德曼先生，多年来我一直要求他：给我150个可以预定提拔的人。他给司令员们写了信，又等了两年半差不多三年。这个名单还在什么地方。应当找一找。

布琼尼：我看过这个名单，上面列的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一些人已经抓起来了，其他人也有嫌疑。

斯大林：既然其中一半人已被逮捕，这就意味着这个名单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布琼尼：不需要印发这个命令，说一下就行了，此事不宜宣扬。

斯大林：只发给军队，然后把它收回。速记记录也收回。

还有一件事怎么办才好。你们怎样两个月聚会一次？

伏罗希洛夫：3个月一次。

斯大林：既然你们没有公开的批评，那么就在你们委员会内部开展批评，要有1个来自你们要批评的国防工业的人参加。

（有些人说：对。）

斯大林：你们需派5个人去国防工业委员会当代表。

（有些人说：好。）

斯大林：可能从团长开始就应该有副手，再低一点儿更好。

伏罗希洛夫：我将给师长或团长委任副手。

（有些人说：有过这样的命令。）

伏罗希洛夫：命令是有的。但我们应该有更好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那里找到这样的人，这样就不用我来动手了。我会知道在科扎诺夫那里，22号潜水艇艇长或“红色乌克兰”号的指挥员是他选

中了要培养的人。我就不用管了。

（有人说：这样的命令下达过。）

伏罗希洛夫：完全不是一回事。

斯大林：也许你们那里没有可以当副手的人。

伏罗希洛夫：有。我们这里人所共知按高低排队。指挥叶菲莫夫，他是军长，他将在师长里面找，然而因为师长人少，他不能从中预定，他将到营长里面找。

斯大林：不会害怕撤掉这些预定的人吧？

（有人说：这种害怕是有的。）

斯大林：所以，应当寻找和培养，如果有好的人选的话。

伏罗希洛夫：那么8点钟在我那儿大厅里开会。

斯大林：有一个不客气的问题。我想，在我们的人中间，无论是指挥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还有这样一些偶然被触犯的同志。有人对他讲了些什么，想吸收他，恐吓他，讹诈他。如果这些人来自己讲出一切，那就原谅他们，采用这种做法很好。有这样的人吗？

有些人说：毫无疑问，有。

斯大林：工作了5年，偶然地触犯了某些人。还有些等着瞧的人，要对这些等着瞧的人说，他们干的事是要失败的。需要帮助这些人为的是原谅他们。

夏坚科[①]：像以前对匪徒许诺予以宽恕一样，如果他交出武器并前来请罪（笑声）。

斯大林：这些人连武器也没有，也许他们只是知道敌人的情况，但没有报告。

伏罗希洛夫：顺便说说，他们的处境都不太好，当你们将来说明

———————————————

① 夏坚科，1937年5月起任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11月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

和解释时，就应当说明，现在不是一点、两点、三点的问题，全都要说清楚，最好让他们自己来。

斯大林：应当宽恕，我们答应宽恕，我们保证。

夏坚科：应当从军事委员会开始，库钦斯基和其他人。

库钦斯基[①]：伏罗希洛夫同志，我不属于这个集团，不属于斯大林同志说过的那个集团。我一直是诚实的。

伏罗希洛夫：还有这个梅列茨科夫。这个无产者，见鬼去吧。

梅列茨科夫[②]：这是谎言。况且我从未与乌博列维奇一起工作过，在索契也没见过。

伏罗希洛夫：这些人与他们非常亲密。就这样吧，8 点钟到我那里。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二第 107—133 页

———————————————

① 库钦斯基，1934-1937 年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1937 年任总参谋部学院政委。

② 梅列茨科夫，1920 年起至 30 年代历任莫斯科军区、白俄罗斯军区、远东特种集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

丧失警惕性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

——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的片断

（1940 年）

在及时和正确清洗钻进我们武装力量的外国间谍的过程中，伏罗希洛夫同志及其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副手们显然过分卖力了。他们相信了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提供的“情报”，解除了近千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的军职，据说是因为他们政治上不可靠。大部分人被解除军职的借口是现在流行的口号：由于勾结人民的敌人或由于丧失警惕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只要确认，军人的熟人或日常工作中有交往的人中有人被揭发是外国情报部门的间谍（这一点他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就立即解除这样的指挥员的军职。

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丧失警惕性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因为在前线进攻要取得胜利，需要几十万战士英勇作战，而要使进攻失败，只要总参谋部出两三个该死的叛徒。但是不管如何为 4 万名指挥员被解除军职辩解，这项措施不仅过了头，而且在各方面都极其有害。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

到 1938 年 1 月，有 1.1 万名被解除军职的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重新回到陆海军中。我们国外的敌人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散布谣言说，苏联大肆枪决人，他们为被我们揭露并处决的间谍，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亚基尔之流流下了鳄鱼的眼泪。他们说，苏联揭露了外国间谍会使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力下降，而苏联被处决的人数几乎超过 100 万。这是别有用心的诽谤。1937 年法院因反革命罪判处了 841 人有罪，其中 121 人被枪决。1938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关于反革命

罪的条款逮捕了 52372 人，经法院审理有 2731 人被判有罪，其中 89 人被处决，49 人被宣告无罪。这样大数量的无罪判决证明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没有充分根据就逮捕了许多人，背着党中央胡作非为，因此他于 1939 年 4 月 1 日被捕，1940 年 4 月 4 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的判决，内奸叶若夫及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被枪决。至于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系统劳改营中的大多数在押人员，他们是出于对苏联人民安全考虑不能使之自由的普通刑事犯罪分子。

我们消灭了一贯策划并挑起反苏行动的外国间谍。同志们，我们清除了武装力量中的阴谋分子和叛徒，清除了我们国内的外国间谍，这是共产党为苏联人民立下的大功。不这样做，就无法使全国作好防御准备，因为已被处决的人民敌人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苏维埃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苏联的政权，他们一旦得逞，苏联就会变成西方的原料附庸国，而苏联人民就会变成世界帝国主义的可怜的奴隶。人民敌人的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破坏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协助外国侵略者进攻苏联，为苏联军事上的失败准备条件。

……

这些卑鄙可怜的叛徒在依靠他们武装起来的反革命败类、刑事犯罪分子和丧失阶级特性分子夺取政权并在我国建立波拿巴制度后，首先试图放弃社会主义所有制，把我国经济上重要的经营项目出卖给资本主义分子，成为他们的私人财产；以亏损为借口撤销国营农场并解散集体农庄；把拖拉机和其他复杂的农业机器交给被称作农场主的个体农民，以在农村中恢复富农制度；通过获取外国贷款使我们遭受奴役；把对帝国主义国家十分重要的我国工业企业租让给他们；把萨哈林的石油给日本，把乌克兰给德国。与此同时，被判处有罪的人民敌人千方百计想破坏苏联武装力量的战斗力。

例如，反苏阴谋积极参加者之一的索柯里尼柯夫在受审时谈到人

民敌人的计划时说：“……我们明白，我们的纲领性方针是要回到资本主义去，提出资本主义纲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依靠我国的某些阶层，培养出小资本主义阶层、小商人、小资产阶层。”

这伙人、这一匪帮的根子应该到收买他们、豢养他们、为他们忠实的奴才表现付了大价钱的外国情报机关的密室中去找。

外国间谍不倦地活动，寻找并令人遗憾地在我国找到了盟友，在敌视苏维埃制度的腐化堕落分子中找到了助手。

由于被揭露和被处决的人民敌人的目标是为外国敌人、侵略者打开大门，及时揭露并消灭他们是我们为成功防御作好准备的工作中十分重要的措施之一。

引自《大元帅斯大林》
2005 年版第 123-125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二第 134—136 页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①]

（1938 年 10 月 1 日）

（速记记录）

斯大林：同志们，我原想，聚集在一起的同志们会帮助中央委员会并将提出一些重要批评意见。很遗憾，我应当指出，批评是轻描淡写的，不深刻的，而某些地方简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认真的批评会对中央委员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央委员会不是一切都能看到，也不能看到一切。你们在各地工作，你们从一个侧面见到一些事情，我们在上面——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而把上面的和下面的经验结合在一起那就好了。但是没有得到这种结合。你们走马看花地滑过去了。

一　关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批评意见[②]

有人说，关于莫斯科的情况谈得太少——一些人在埋怨。这是对的。当然，谈得太少了。可以谈得更多一些。于是，据说，工人们在问：“为什么关于莫斯科的情况谈得这么少呢？”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乌拉尔人、巴库人或者哈尔科夫人，如果有的话，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要求：“为什么关于我们的事情谈得这么少呢？”如果按照演说家

——————————————

① 这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传员会议上讲授《党史》的发言，其节选已收入新编《斯大林全集》第 15 卷，这里刊载的是全文。

② 文中小标题是我们拟加的。——本书编者注

在这里所叙述的那种宗旨来作判断，就应该满足一切人的要求，谈谈乌拉尔、谈谈莫斯科、谈谈列宁格勤、谈谈哈尔科夫、谈谈叶卡捷琳娜斯拉夫人——他们有过非常伟大的业绩,叶卡捷琳娜斯拉夫人有过，谈谈罗斯托夫、谈谈巴库等等。这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就不是联共（布）的党史，而是我国各个地方的革命运动概况汇编。这是中央不想做的事情，因为这类概况汇编我们多得很。我们需要的不是各地革命运动概况的简单汇编，而是需要党发展过程中各重大关键问题的经验总结的历史。

所以，从这方面批评简明教程的同志是不对的,他们根本不懂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任务是什么。最容易不过的事就是，如增加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增加一些关于乌拉尔的情况，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事了。谈谈哈尔科夫、谈谈巴库，但这将成为贪多嚼不烂的事，这将不是联共（布）的党史。

另一些人埋怨说：“譬如，关于农业问题方面谈得太少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譬如，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都做出过一些决议，而在教科书中却丝毫也没有谈到”。中央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如果叙述我们党过去的农业方针，那末，应当全面地叙述农业问题的基本原则。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曾要求把一小块土地归还给农民。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否具有代表性呢？这不具有代表性。这不能说明党的农业问题方针的全部状况。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提出过没收所有的公有土地的问题。这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政策的全部实质呢？不，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农业问题方面的政策实质在于，在把全部土地没收充公的情况下，宣布对所有一切的土地实行国有化。这个观点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明过。关于这一点在党史简明教程中作了说明。还需要什么，让人不理解。

有人说，关于民族问题谈得少了。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党的主要决议作了充分的叙述。你们还想要我们说些什么呢？要求联共（布）党

史简明教程叙述列宁及我们党的其他理论家的文章的详细内容是不可以的！依我看，这是多余的。

第三部分人埋怨说：他们说，丝毫也没有谈到我们党为党章第一条款所作的斗争[①]有什么国际影响。是的，好像，谈过？

喊声：谈过，谈过。

斯大林：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我们为党章第一条款所作的斗争对无产阶级国际运动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理解这一点。同志们，这是胡言乱语。为争取这一条款所作的斗争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国际革命运动没有任何国际影响，没有任何的。他想说什么？他在那里？让他来说吧。

情况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曾为党章第一条款进行了斗争，而西方社会民主党左翼最优秀的人士反对过布尔什维克：罗莎·卢森堡[②]、巴甫洛夫[③]反对过。在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一个人。如果把这种情况称为布尔什维克争取党章第一条款斗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不知道，什么叫作不是影响？（笑声）。

至于谈到问题的本质，谈到我们党章第一条款在我党的历史上的意义，那末，依我看来，这是十分清楚的，并无必要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作冗长的叙述。

————————————

① 指 1903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3 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与马尔托夫在党章的第一条“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当时列宁提出，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活动的人均可成为党员。而马尔托夫则主张，只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而无需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便可称为党员，每个罢工者、每个示威者都能宣布自己为党员。当时是马尔托夫的主张获得通过。

② 罗莎·卢森堡（I871－1919），德国和波兰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的左派代表之一。

③ 此人身份不详。

有人说，关于1905年革命对国际的影响问题谈得太少，或者丝毫没有谈到。很对。而且对1917年的革命的国际影响谈得更少。但如果研究我国三次革命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国际影响或国际作用，那末我们就不得不成倍地扩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范围。

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是研究联共（布）党史的一些问题。所有现存的教程或是教科书中的缺陷中的一个通病是，他们想怎么教就随便怎么教，1905年革命的国际影响——添枝加叶详细地叙述了好几页并丝毫不谈比1905年的革命深刻得多、重要得多的1917年十月革的国际影响。

为什么这样守旧，用老习惯把1905年革命的国际影响提到首位，而丝毫也不谈1917年革命的国际影响呢？这对还是不对呢？不，不对。一切都不成比例，不相称。

如果谈我们的所有的重大措施——我重复一遍，他们都具有国际影响，势必写出的不是联共（布）的历史，而是写的我们三次革命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历史。这倒是一个专门的题目。而第二，简明教程不能经常离开革命是怎样发展的、党是怎样发展的这样的主题，而转到不是本题的其他实际理论方面去，去论述1905年革命有什么样的国际影响或1917年的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国际运动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人埋怨说，关于共产国际大会谈得太少了或是丝毫没有谈到，多半是谈得太少了。我熟悉联共（布）党史方面的一些教科书，书中相当详细地说明共产国际大会的情况。这对不对呢？不，不对。要么应当写联共（布）党史，要么写共产国际大会的历史。两者中写一个。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是胡言乱语，这是“国际主义”，这是沿着树干四处漫流，当一个人失去目标时，他就开始向各种题目四处漫流。中央委员会，这样说吧，不能去仿效到处游荡、四处漫流的那些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的目的是希望让这本教程去说明联共（布）党的历史。你看这里提出的所有批评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太少，是轻描淡写、浮光掠影的批评。

提出一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抱的目的是什么？中央委员会已了解，我们图书界有大批的简明的和非简明的各种教程、指南，搞出许多波波夫的、布勃诺夫的、克诺林的、因古洛夫[①]的各种的政治常识教程。中央委员会知道，各类指南、教科书、政治常识教程、各类文选读本多得要命，这真把人弄糊涂了。党员同志们不知道，选择什么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没有任何一种教程、没有任何一种选读本或是政治常识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鉴定、签证，因而这更加把人们搞乱了。人们不清楚．买谁的更好，买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买波斯佩洛夫的，买克诺林的，买布勃诺夫的，或是买波波夫的，还是买随便什么人的。在教科书这样丰富的情况下，在观点上缺少实际上的统一，缺少中央对各类教科书的鉴定。这一切造成了人们头脑中的紊乱现象，而且连我们党的干部们也不知道买哪种好，需要紧握住的指南针在那里，不声不响地认为，如果给我们一本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或是波斯佩洛夫的教科书，这就意味着有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但同时又怀疑了起来，有没有同意？的确，没有得到中委员会的任何同意。有人曾委托过写本教科书，而后来中央委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鉴定这本教科书，这可就不好了，这是一个错误。可以用工作负担过重对此加以解释。工作负担过重未能有机会从头至尾审阅那怕教科书中的一种并给予签证。情况就是如此。

怎样摆脱这种状况呢？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对联共（布）党史给予指导，并希望能得到中央委员会鉴定。在学习这种指导的时候，希望党员和积极分子不要产生任何的怀疑，希望党员以及积极分子在

——————————————

① 均为当时的党史研究工作者。——本书编者注

这方面能看到中央委员会向他们所推荐的东西。

那么首要的任务——从各式各样的、多种教科书、教程、选读、政治常识中，从这种混乱中进行挑选，我想说，要给党的积极分子对联共（布）党史有一个统一的指导，使党员和积极分子对这种指导不会产生怀疑——这就是中央委员会所正式建议的：应怎样表达思想、说明观点、阐述党的方针，这是首要的任务。

对联共（布）党史的材料应当怎样讲述，应当怎样沿着批评此书的同志们给我们所指出的道路去叙述？当然,他们是为中央委员会好，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一片紊乱,完全是一团糟。

问题不在于想要去描述涉及到各方面的一切事情，问题不在于想说很多的事情，想说一切事情，问题在于要使这本教科书，简明教程，或是随便叫什么名称，使其能包括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重大的关键问题，党的主要发展阶段。围绕这些问题，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能够说明这些阶段特点的一切主要的问题上。

二 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遵循的提纲

在我们党内有什么样的阶段呢？我认为，我们党经历了这样的三个关键性的阶段，三个关键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想称为：“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或是按照一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阶段”，开头的四章叙述了这个问题。问题不在于要谈论某些事情的一切细节，问题在于在四章中对所叙述的一切事情要围绕主要的轴心，围绕着从 1900 年到 1912 年，到布拉格代表会议。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准备的一个阶段，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的阶段。应该这样去安排材料。

由此可以看清楚，为什么简明救程把重要的注意力转向列宁的这样一些书，如《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两种策略》、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正好这四种书及与其相联系的一切内容是布尔什维克准备从政治团体组成独立政党的东西。由此拟订开头四章的计划。与这个计划比较，所有批评意见，如某段对民族问题的某些细节没有谈到，某段关于莫斯科谈得太少了，——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是尘土。主要的问题在于，要让开头的四章指出一切本质的东西，并能说明布尔什维克为建立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而斗争的特点。这就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包括以下三章：第五章，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到第四章结尾和第五、第六和第七章。①

这个阶段，或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党成立了而且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着，它在为开辟通向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而斗争着。我想为这个阶段加上的标题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

所有的缺陷，如哪一点没有谈到，哪一点没有强调，——这一切都是琐碎小事，与说明党的两个阶段特点的那些主要事实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所有的事实及引证应围绕这些重点。因此，一切微不足道的、无足轻重的意见，都偏离了摆在简明教程面前的任务，即搜集事实并集中思想，使它们像聚光灯那样照耀布尔什维克党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第三阶段——剩下的五章：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和结束语。可以给这个阶段加上这样的标题：“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时期。是的，布尔什维克在执政。

这就是作者在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时所遵循的提纲。

——————————————

① 原文如此。按本意应是：“第二阶段包括第四章的结尾，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和第五、第六、第七章”。

三 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遵循的宗旨

所以，出版这本教科书时，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这是唯一一部经中央委员会核准的、手续完备的、具有中央委员会签证的、统一的教科书，这是统一的指导，希望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对它要有信心，这不是波波夫，这也不是因古洛夫，而是中央委员会。这是第一位的任务。

第二个任务在于，要去消除近年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相脱节的现象。你们要知道，我这里有一份为党的教育小组准备的关于列宁主义的学习计划，你们看，共有十一个专题。大概，大纲你们是知道的。第一个专题——讲座前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我至今不能理解，这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这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缔造者的历史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列宁评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二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第二个时期——从巴黎公社到1905年的俄国革命；第三个时期——从俄国革命开始，等等；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中的形成和发展；列宁与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和继承人。

这就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列宁奠定了基础。其余的一切谈的是列宁关于斯大林的书写了些什么[①]，与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那些标题丝毫不差，完全相同。这本

——————————————

① 原文如此。其本意应为：“关于列宁，斯大林的书中写了些什么”。

书叙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带来的新的、特殊的贡献。因此我们这里就出现了列宁主义这一术语。假如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宝库的极重要的部分带来任何新的贡献，我们就不会有列宁主义这个术语。我不想说，斯大林在书中对一切都谈得非常详细。如果仔细地去读，不是 2 至 3 遍，而是 10 遍，15 遍地读列宁全集，那末在那里可以发现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带来的多得不可比拟的新思想、新方针、金刚石。但不管怎样，斯大林的书是试图叙述列宁带给马克思主义宝库的主要的新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本书或多或少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还不意味着，研究列宁主义，学习斯大林所论述的“列宁主义基础”就足够了。绝对没有的事。在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相比较的过程中叙述列宁提出的新东西是一回事，提出怎样研究列宁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要弄懂列宁主义，应当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应当学习恩格斯的著作。列宁一向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学生，他是正确的。当然，这不单是他谦虚,而是历史事实。要弄懂列宁主义，应当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应学习恩格斯的著作，不仅要学习《共产党宣言》或是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其他政论著作，还要学习像《资本论》这类的主要著作。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现在认为，什么《资本论》？在苏联资本主义早已经完蛋了，是否还有必要花精力去研读《资本论》这部书。同志们，这是错误的。列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最本质的、主要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都有，并有论证。

凡是想研究列宁主义和想研究列宁的人，都应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西。列宁之所以能够产生新的思想是因为，他肩负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责任。新的思想是好的，但是要知道，新思想所负的责任也是好的，这是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有存在过的社会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一切都是这样

一回事。同志们，不了解它们是不可能弄懂列宁主义的。而在我们的一些大纲中，大概地说,出现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脱离的现象。

因此，《简明教程》的第二个任务在于，要消除这种分离现象并把马克思提出的东西与列宁提出的东西结合起来。不仅第四章要完成这项任务，整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第二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都要完成这项任务。把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思想联系起来。史册所谈的，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个别草稿，如分散的、顺便说出的想法或是在来往书信中某处顺便说出的论点，这些思想怎样被列宁抓住并进一步发展了，而又用新的观点提出论证。这一切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尽可能地都提到了。

因此，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二个任务就在于堵住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出现的缺口，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基础提出的东西与列宁继承发展了的东西之间的缺口。因此，要更好地、科学而更准确地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使作为列宁主义基础的旧东西与作为这些基础的继承和发展的新东西之间出现脱节现象。

第三个任务在于，要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的历史时期中的作用。因为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叙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以讲授的方法在人所共知的前提基础上概括某些思想；但也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在并非杜撰而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从而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史数十年的时期内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就是说，第三个任务就在于要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授变得简捷，当然要简捷，不是按叙述某些前提和思想的演讲叙述方式进行教授，而是要在联共（布）党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第二种方法——不是演讲的方法，而是历史

的方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为你们是与事实打交道，你们能够查验大量的文献并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判断列宁主义的价值是什么，当历史向我们提出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时,而它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这是一所学校，这是很大的考验。假如在几十年的时期内理论证明自身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它是有某些价值的。这就是第三个任务。

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个任务在于，要在这本不太厚的书中证明、显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和意义，表明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力量和意义。理论——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旧规律不够时去发现新规律的指南。这是很好的事情,请你们确实相信。而且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认真地去学习。理论——是完全可以掌握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们不要害怕。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有很多人认为，理论——是很困难的事情，怎样才能掌握它呢？不对的。理论同一切知识一样——是完全可以获得的东西，要有掌握它的愿望，最主要的是，不要头一回遇到障碍就退却,不要躲避障碍，而要迎着它，克服它，而在不能迎着上的地方，就用迂回的办法来克服，那么理论也就为你们掌握了。

这样，要用历史事实来指明我们党的发展，指出理论的力量和意义。我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尤其令人信服地谈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们要想一想，假如列宁和列宁周围的那些人，他们人不多，假如他们在 1917 年 4 月没有提出从民主共和国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方针[①]，党就会迷失方向，在黑暗中徘徊。我还清楚地记

——————————————

① 指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堡后，于 1917 年 4 月 17 日（俄历 4 月 4 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议上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作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演说，即著名的“四月提纲”（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9 卷）。

得我们在列宁格勒的情况，——在黑暗中徘徊。结果列宁回来了，提出了新的方针，于是大家开始明确了：党把事业推向何处去，党知道它的目的何在？这不，我把一切情况都对你们讲清楚了。假如说没有四月提纲，没有党的这一新方针，没有新方针，革命就会遭到失败，我敢保证，苏维埃就会变成附属品，变成预备国会，围着这个不幸的民主共和国转，并会失去很多东西。你们瞧瞧，理论有多么大的力量和意义，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有多么大的力量和意义,善于发现新规律，假如新的规律不能很快被发现，那就提出路线，给个引导事业向何处去、确定打击目标为谁的照明灯。

或者，譬如，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一国取得胜利的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吧，沙皇已被打倒了，克伦斯基及李沃夫雷总理也在摇摇欲坠。而下一步事业将向何处去，没人知道。大家都说，俄国还不发达，关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好想的，这里哪有什么社会主义，上帝保佑，就维持民主共和国的状态吧。人们是这样说的，社会舆论也是这样的。你们想象一下，党也是这样指示方向的，俄国在政治方面不发达，文明程度也不高，——这儿哪有什么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有人曾这样说：你们算什么社会主义，上帝给你们的那些自由，暂时设法抓住并保持住。这也是普遍的风气。而伊里奇却闯进了这个泥潭并说：“不，不对。俄国已经成熟到了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他也正在证实这一点。如果没有列宁的这个小组及其着手这项事业的学生们从理论上提出根据，并不顾大家的反对，开始努力向前奋斗，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理论，先进理论给你们带来的力量和意义！中央委员会就是想以简明教程来向我们的干部证明，理论的力量是伟大的和无法估价的，证明没有它，没有理论，党势必有时在经验主义的黑暗中徘徊：今天指示你向这个角落走，向那边瞎闯，明天指示你向另一个角落走，像一条瞎眼的小狗向那边瞎闯，明天从背后把你拽回来，往回

走，这就是你的领导！这算什么领导？要领导就应当了解情况，要有预见，而为了善于预见，就要掌握理论，也就是说要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规律。这就是理论。

或者，譬如拿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可怜的人——民粹派，当他们想把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活动的基础和支柱力量时，他们为什么会受挫？他们受挫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构成了大多数。为什么他们谈到无产阶级，或是如他们所说的无产者时忸怩作态？因为无产者人数很少，要手持蜡烛去寻找无产者。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不懂得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是在发展，而是在解体，与农民相联系的那种生产形式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只有理论才能帮助马克思主义者抓住社会上数量不多的少数无产阶级。抓住什么阶级作为依靠力量，这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党的命运。民粹派的失败即在于此。

或者，譬如，他们希望在俄国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认为，取得社会主义的成功应当从农村，从村社开始，因为他们不懂得经济发展最简单、最起码的规律，不懂得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在起领导作用，不懂得社会中的领导力量不是农村而是城市，不懂得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要从城市开始。他们说，城市是毫无希望的事情，说城市——是又脏又乱的地方，而农村——则是另一回事情，这是村社。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决定着农村的命运。

这就给你们指出了两种人：一种人是民粹派——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而另一种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掌握了理论、懂得历史发展规律，推行一条能取得成绩的正确路线。那就是说，第四个任务：要在这本最简明的教程中证明理论的力量和意义，以使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尤其要去学习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牢记住。这不是什么困难和大不了的事情。理论是完全可以掌握的东西，可以十分容易、心安理得地去掌握它。不要认为，老布尔什维克绝顶聪明。

他们也是如你们一样的非常普通的人，懂得的东西比你们还少，读的书也比你们少。现在给了你们非常丰富的书，在手头上有各种各样的书，我们当时弄不到书，我们也见不到书。我记得，在1898年梯弗里斯，为了租《资本论》第一卷来阅读，我们，这些穷光蛋，每人5戈比，将近100人，凑够了25卢布，将《资本论》租来看了两星期并把它抄下。而你们现在手头上有各种书。权力是你们的，出版是你们的，所有的书也都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会很容易地就掌握理论。好吧，而如果不想去掌握——那是你们的事。

第五点，中央委员会出版简明教程，任务是为了使我们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我们的领导在一些理论问题上避免简单化，避免对某些原理的庸俗化，避免低级趣味。

例如，常常有人把布尔什维克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描写成仅仅是护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反对战争，但如果有人要进攻，当然，这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他们反对战争”。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归结为这一点。应当说明白，这不对，不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懂得各种战争之间的区别并完全不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也会开始进攻。我们还记得列宁在《论欧洲联邦》[①]的著名文章中所说的话。他直截了当地说，无产阶级在一国夺取了政权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之后，形势将迫使其对其余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征讨，以便帮助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应当对布尔什维克的关于战争问题的一切精微处，一切细微差别、方针说明清楚，说明布尔什维克不单纯是为和平而伤感的和平主义者，仅在有人进攻他们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拿起武器的。这不对。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战争是正义的，如果形势比较合适，如果条件有利，布

——————————————

① 原文题为《论欧洲联邦口号》，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

尔什维克也将主动进攻,他们将主动开始攻击。他们完全不反对进攻，不是反对任何的战争。我们现在大声呼吁防御——这是面纱，面纱。所有的国家都在掩饰。“与狼生活在一起，就不得不学狼嗥”。（笑声）敞开心扉地坦白是十分愚蠢的。人家会说，你们是大傻瓜。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问题也有点儿被庸俗化了。有人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单独在一个已经夺取政权的国家取得胜利，而没有考虑另一面，即社会主义很快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列宁不仅教导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因为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落后，一些国家刚开始起跑，但列宁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一些国家落后，另一些在起跑，一些在作战，另一些在搔痒，同时进行打击是不可能的。

这正好与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原则相对立。可不知什么原因，这第二句话人们通常避而不谈。什么是发展不平衡？如果说所有国家都平衡发展的话，可以说，进行打击时所有的国家也都同时成熟，那么在这里也可以说，同时打击是完全可能的。列宁曾说过：“发展是不平衡的”，今天一个国家跑到前面去了，明天另一个国家跑到前面去，落在后面的其余国家逐一在赶过去，以各种不同的速度在发展，一些国家落后了，另一些又跑到了前面。就是说，在各种不同的国家社会主义成熟的程度各不相同，怎么可以说，社会主义在所有的国家可能同时取得胜利。这是傻话。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方面人们避而不谈，而仅谈社会主义在单独一国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这没有充分地表达列宁的观点。应当对这一点说清楚。一些问题在普及的过程中被简单化了。在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教科书、政治常识、各种文选中简单化导致了庸俗化、低级趣味。

或者，譬如，关于抵制杜马的问题。所有的教科书都对读者避而不谈在抵制第一届杜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结果在这里进行

了掩饰，而这有什么好掩饰的？抵制还处在妊娠中的布里根杜马，抵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埋葬了它，在全俄罢工的情况下没有让布里根杜马诞生。

而后来的维特杜马，莫斯科 12 月武装起义失败后召集的杜马，我们也对它进行了抵制；在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上决定抵制。所有的教科书都隐瞒这件事是不对的。列宁承认，这是一个错误,错误不大，可以很快纠正这个错误，也很快地纠正了，但这总归是个错误。

而你们是怎么想的,历史可以修改吗？历史应当是与事实相符的，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丝毫不能增补。我们这里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人用现在的观点去评论 500 年前发生过的事情。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这怎么可能呢？

在圣弗拉基米尔[①]时代宗教起过积极作用，当时是多神教，而接受基督教还是后来的步骤。现在我们的哲人身处 20 世纪，他们从新形势的观点出发，说弗拉基米尔是下流的东西，多神教徒是下流的东西，而宗教也是下流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想辩证地评价所发生的事件。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时间、地点。

这里也是同样的，我们的历史既不能往好改，也不能往坏改，根本不能有丝毫的增补，它是怎么发展的，就应当怎么叙述，不能有丝毫增补。比如在抵制第一届杜马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并应该去纠正，这要不容争辩地去纠正。

或者，譬如，有人把社会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庸俗化了，他们说什么，经济发展——这是根本的基础，上层建筑算什么，它有什

——————————————

① 圣弗拉基米尔，即弗拉基米尔（960－1015），诺夫哥罗德王公、基辅大公（980－1015）。他在基辅确立了统治地位后，立即将许多不同民族和部落的众多神祇的偶像树立起来，顶礼膜拜，企图以此加强和巩固罗斯国家的统一。

么作用，它的作用是不值一提的，他们把这庸俗化了并陷进了低级趣味的泥潭。而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列宁对此作了强调。列宁是专门深入研究先进思想作用问题、并发展了社会思想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组织人们、动员并引导他们将旧社会改造成为新社会。新思想是在经济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新思想，对行为的改造、对革命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新的思想如同新的生产方式一样也是必须的，虽然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能够产生新的思想。这被庸俗化了。在这被简单化后，社会理论的积极作用变得模糊不清了，人们滑到了经济唯物主的或者低级趣味的唯物主义路线上去了，这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丝毫共同之处。——这是简明教程的第五个任务。第五个任务——是要清洗脑筋，以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概念和术语低级趣味化，完全恢复作为布尔什维主义财富的那些观点，使其不受灰渣的侵袭，使其不被低级趣味化。

于是，第六个任务是提供这种统一的教科书或是统一的教程，要使书中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原理或多或少地集中起来，因为这将帮助我们的宣传员改变工作方式，帮助他们提高宣传质量。

对我们，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十分清楚，宣传质量大家不很关心，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数量上，希望网点能多些,希望小组多一些，办公室大一些，想炫耀一下：瞧我们这里小组有好几千了，而你们那里有多少？没那么多，就是说，你们的事情没有办好。完全有可能，哪儿少，哪儿的情况可能会更好。

这样一来，出版这本简明教程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宣传员改变工作方式，从数量强度转向广度，转向质量，转向提高宣传质量。中央委员会出版这本简明教程，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宗旨。

四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现在让我转到一些理论问题上。你们这些宣传员坐在这里,当然,你们感觉到,在学习时或是在学这本教程时,好钻研的人会来向你们请教许多问题,你们知道这是些什么问题,但不知道因为什么,你们没有谈这些问题。你们会说,因为在教程中没有叙说这一点,这是怎么回事?是否有那样一些问题?你们会说,当然,有这些问题。在课堂讨论中,在小组里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向你们请教。你们不但不把问题提出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避开这些问题。你们愿意躲起来,而我尽量设法把你们拽出水面来。(笑声)

以恩格斯为例子。在简明教程中是这样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关系及社会政治、社会意识的发展。讲述这一点不受任何时期的限制。而有人就会来问你们:"对不起,恩格斯不是那样说的,而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①。"

宣传员同志们,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这一点对还是不对?我认为,这不对。在任何条件下社会形态往往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往往如此。恩格斯引证了群婚,引证了母权制。但母权制本身也是繁衍来的(正如现在大量的材料对此所作的阐释一样),即在当时,男子去打猎,而打猎不是获得食物的经常性源泉,妇女从事原始的农业,栽种作物,从鸟巢里取蛋,取鸟雏,驯养禽类。当男子打死扁角鹿后,把活着的鹿的幼子留下,妇女们将这些鹿的幼子拿去驯

———————————————

①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6。

养，这样，妇女就成了奠定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基础的第一个群体——即简单地驯养禽类和动物。她们（妇女们）或多或少地有了些经常的食物储备。事实说明了什么？男子打猎归来,什么也没有猎获到，向女人乞讨：“给点吃的吧！”——“没有什么吃的，再回去，去打猎”。而男子便坐下来像小孩子一样地哭泣，因为是野人,不太像人，他们央求，哭泣，要吃的。这就是母权制所建立的基础。

在从原始的农业转向畜牧的生活方式之后，妇权（母权制）也就失去了意义，家庭也变化了。

恩格斯试图把家庭形式和生产形式作为两种起同等作用的因素相提并论，存在着推翻这种试图的事实。马克思从来不赞同这种观点，从来不。顺便提一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作过任何一点儿暗示,无论是注释中还是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他们是如何看待恩格斯的《家庭》的呢？伊里奇在其《人民之友》一书中说“大概这属于非常远古的时期，人和猿猴还不能区别开的时候”。别尔托夫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你们怎么，你们在挖苦我们？”米哈伊洛夫斯基当时也挖苦过我们——他说，“你们说什么？时而是生产方式决定，时而是家庭决定？你要明白，忽而这个，忽而那个，将会有什么结果”。普列汉诺夫也不承认，并说这应当从下述观点来理解，即从这属于什么时期，也就是说从属于那个当时连人与猿猴都不能区别开来的时期来理解。试问，难道我们在研究猿猴，而不是在研究人？这种理论是属于猿猴还是属于人类社会？如果理论是属于类人猿时期的，那么就给猿人留下吧。至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在其中处处都是基本因素。

血缘氏族，氏族公社。什么是血缘氏族？对它是如何定义的？就拿家庭为例来说：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个阶段是贫穷的，食品缺乏，而人在繁衍，家庭就要分成若干个单位,一批人就应当从家庭中分出来。

在血缘氏族的基础上，还行吗？不，当然不行。生产资料不允许一家的人太多。于是就产生了原始氏族公社的萌芽。结果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血缘氏族，而是那种辅助力量，即生产工具状况，生产工具状况为在该领域内拥有达到一定范围的大的氏族公社提供了可能，而后来当它无法维持大的公社生活时，这些公社就解体了，由两个分成了四个，血缘氏族就渐渐消失了。

依我看来，这是冒险的事，它不完全符合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儿所学的东西，应当勇敢地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起同等作用的两种基本因素：家庭和生产方式，只有一种形式，即生产方式，它决定了社会形态、家庭形态和婚姻形态。

我不知道，难道从来没有人问过你们——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没有问过吗？没有问过是不可能的！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到处都写着："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而在这里"在一定历史时代和某个国家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形式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制约"。或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自身的生产。这是什么样的胡说八道？这不对。如果要我提建议，那么我建议你们，如果人们向你们请教的话，他们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在简明教程中说的是一回事，这里说的又是另一回事"。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这不对。我们的理论家不是那样处理的。例如，以米丁[①]同志为例。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第 2 卷。米京同志，他在这里吧？

喊声：在这里。

斯大林：他引用了这句引文，但很巧妙，巧妙地引用（笑声）。他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这样的引文："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

——————————————

① 米丁（1901－1987），苏联哲学家，1939 年起为院士。——本书编者注

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这些。什么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没有说明并对读者暗示，这反正都一样，都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其余的一切他都撇开了。为什么？不适用的——（您这里没有全部引用）——他都撇开了。依我看来，这里不必使用巧妙的办法，也没有必要断章取义，虽说这引文是恩格斯于1884年提出的，当时马克思已不在人世——最好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诚实地说：“依我们之见，这是对的”，或是说，“依我们之见，这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好钻研的人会向你们提出来的，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时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不管怎样都要明确地回答——或是，或不是。

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的问题。经常有人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化，国家就要消亡。为什么它不消亡？该消亡了，20年都过去了，生产资料都公有化了，而你们还不想消亡（笑声）。

真的，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消亡？这个问题你们感兴趣吗？感兴趣。我给你们读一读恩格斯的某些原理，而且不仅是恩格斯一人，而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那种论点，我所读的也是很多人所遵循的论点。

这里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们这里国家为什么不消亡，它什么时候最后消亡。你们熟悉关于国家的理论。你们熟悉马克思的理论，当然也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对抗大多数被剥削的劳动大众的阶级工具，国家是秩序、是保障，是多数服从少数。如果阶级和敌对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存在，国家也得存在。当敌对的阶级消亡了，国家就该消亡了。这是你们所熟知的普遍原理。

以此为根据，恩格斯说：“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

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的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①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国家形式上是社会代表，而实际上仍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在粉碎资产阶级和出现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国家第一次能够在实际上代表社会说话。它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这将是这个国家政权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到那时，国家政权对这方面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国家就逐渐自行消亡。到那时,对物的分配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将取代政府对人的统治。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逐渐自行消亡的。这就是说，当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而不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在整个历史上取得所有权时，它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这就是把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

这也将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在这以后国家将逐渐消亡。我们在 1918 年已经完成了这一行动。但为什么国家还不消亡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是，例如，有这样一句话：“国家在最好的情况下都是个祸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又能是什么？），它以继承的方法传给了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像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刻消除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一直到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后才能抛弃国家组织这个废物”②。

对这个问题人们是如何看待呢？这一切是否都正确？资产阶级被

————————————————

①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0 页，人民出版杜，1972。

推翻了，它的政权被摧毁了，按照我们的理论被打碎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政权不仅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且旧的国家机器被毁坏了，旧的国家机器由新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所取代。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使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而在此之后它的作用开始失去效力，逐渐消亡。这正确吗？据我看，这是正确的，但仅在一种情况下，那就是假如不仅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的国家，至少是在大部分国家存在着无产阶级政权。假如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周围的大多数国家实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权，那时，大概国家政权就不需要了，它应该消亡。而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仅在一国取得了胜利，它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那时该怎么办？这一理论对这种情况是否适用？不适用。20 年来我们的全部实践，我们的全部工作——它对其他的国家也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毫无疑问，——这一点正得到证实。须知理论是怎样发展的？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验怎样产生？在实践中，或是在实验室，或是在群众的实践中。社会也是实验室。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实践常常发出信号说，某种理论不完全适用，说这种理论是有害的，像巴巴宁[③]报告所说的那样，有关北极的理论认识不符合实际情况，请作些修改。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理论与实践要相联系。理论有助于向前发展，而斗争过程中的实践又在不断得出理论应该注意的新的经验。

在 1905 年以及后来 1917 年 2 月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我国出现之

——————————————

② 该引文出自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译文是：“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3 页，人民出版社，1994。——本书编者注

③ 巴巴宁（1894－1986），苏联第一个漂流站——“北极”第一研究站的站长，苏联英雄（1937、1940），第一、二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前，经验证明，民主共和国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法国、德国等国革命基础上产生的，那里的民主制是一种特殊的形式。

但是革命运动,即实践产生了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代表苏维埃。当然，彼得格勒的工人，当他们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时,并没有想到，他们是在按马克思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的理论进行大变革。他们不过是想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帮助下实行自卫以抵抗沙皇。1917年2月，当工兵代表苏维埃出现后，其倡议者也没有料到，能由此搞出个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不过是想有个可依靠的特殊据点，以便打击敌人。但经验证明，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组织，而是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支撑点。这就是实践，这就是革命运动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如何指导着这个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看来，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或者他们不顾外部条件地去发动革命——是实验室式的。这样说吧，这是方法论，这种研究方法在科学中存在，使一种现象与周围现存的一切相脱离：离开空气，离开水等等，并在特殊的条件下来研究它，以便研究这一现象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的因素，这样的方法是存在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管国际因素，按照这种实验室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可能的。这样他们可以完全正确地阐述，国家不是从外部带来的，而是在经济需要的基础上、在存在阶级社会的地方从内部产生的。而我们的任务在于研究这些规律，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即如果国家政权，或是有政治权力的该国家，没有摆脱国际因素怎么办，因为被罩在玻璃罩里、不被其他国家所包围的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假如在按实验室的方式研究了国家政权的发展规律之后，我们就提出对事情产生影响的国际因素问题,那么，情况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也会得出另外一些结论。

他们用实验室的方法来研究国家政权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可能的，因此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我对国际形势不感兴趣，有包围或是没有包围，这与我无关。作为学者，我研究国家政权，它是在阶级社会中

产生的，如果阶级社会没有了，那么我们也就不应该有政权。我作为学者，不准备去考虑国际上的包围），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中它不是始终适用的，因为在实验室里随便丢开什么都可以，而在现实中你不能丢开，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包围着你。我想对这种形式的不完备性加以解释。或是这样，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发点是，如果所谈的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出现，那么这将在所有的国家发生，而且他们当时不容许无产阶级政权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但是现在历史经验和形势都表明，应当容许有这样一种意外情况，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所有国家而是仅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而且它没有被击溃，相反,获得了巩固，存在着，并想继续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提出这种情况，因此他们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但是，因为我们，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个政权本身也存在着，它在巩固，在加强，社会主义在建设着等等，那么，我们，当然,不能局限于对问题的现有提法，而应该继续前进，可以说，应对问题做出另一种提法：如果无产阶级政权仅在一国取得了胜利，而在其他国家它还未获胜利，那该怎么办？而在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周围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又该怎么办？那时国家怎么办？消亡还是不消亡？如果这样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大概会说：“不消亡，不应该消亡”。但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于是他们自己可能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正确的，而历史证明，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我们存在了 20 年。

尽管马克思写完了关于无产阶级在巴黎执政两个月的一本书[①]，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并看到了无产阶级政权存在了 20 年，那他就会写出非常有价值的新书，会找到我们没有见到的、而他也是很晚才发现的新真理。

① 指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

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问题的提法。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一种实验室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在实验室里，但我们应予以尊重。

以实验室的方式来研究政权内部发展规律的方法是正确的，是非常好的。这一切都是对的，但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在弄清某些问题时，是比较好的方法，而当你转入实际生活时，这里实验室不能避开任何现象，既避不开空气，也避不开气候。你们并没有罩在玻璃罩中。这里既有周围各国人民,也有周围的各个国家，应该考虑到他们。

假设说，如果无产阶级政权在一个国家存在，它也就应该在其他国家存在。如果这种假设成立，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即政权不是在一个国家而是要在所有的国家取得胜利，在这种假设成立的情况下，从而可以这样说，国家先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然后它自行消失。

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问题的提法是,现在的情况不同。如果不是在所有的国家，也不是在大部分的国家，而是仅在一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而除了这个政权之外，形成了憎恨社会主义国家、并找机会进行破坏的资本主义的包围，那该怎么办？那时，国家怎么办，是消亡呢，还是不消亡？这里应当回答说，不消亡。即使各地将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国家无论如何也不会那样快消亡。真的，假如在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在我们这里都发生了革命，那时我们就不需要常备军了，这是不容争辩的。什么叫常备军？它是构成国家的基础。我们将不需要庞大的国家机关对军队提供补给，不需要庞大的国家机关动用国内的一切资金来进行防御。这就是国家所创造的一切要素。

我想，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它经历了两个时期,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它还是阶级的政权时，它与任何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都是一致的，因为其目的就是镇压反抗。但是也有不同之点，即以往的一切国家政权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镇压，

而我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代表大多数人，代表劳动居民对不劳动的剥削阶级的少数人进行镇压。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我们这里国家不仅仅是进行镇压,如果拿 1918、1919、1920、1925、1930、1934 这些年代来说，在消灭敌对阶级之前,国家在我们这里还有其他职能，捍卫职能，保护生命、财产和国家领土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还有第三个职能即接管公有化的生产资料，调整自身的生产，进行有组织的经济援助）。而在阶级社会中，一切国家政权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少数人利益的政权，它们也有保卫领土不受外部敌人侵犯的职能，在进行自卫以免外部敌人侵犯之时，它们同时也行使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职能。

在我们这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政权。它有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职能，在这方面它和其他所有的阶级政权是一样的，因为任何阶级的政权都是镇压之权，但是无产阶级政权与其他所有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性区别在于。它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大多数人镇压剥削者，而不是镇压被剥削者，——这是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经济组织的职能。完成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经济组织任务。第三个职能是保卫生命、财产和领土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就这三种职能。这是第一阶段——在消灭了阶级，政权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权的发展。我不想说，现在是阶级政权，说这是一个阶级的政权。劳动人民的政权，要知道在我们这里不是白白地使用劳动人民苏维埃这个称呼的。而且，在我们这里镇压的职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富农阶级已被消灭，也就是说构成阶级政权典型特点的这种镇压的职能在消失。也就是说，这种职能残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在这里其职能已不是要对付什么阶级的反抗，而是要去对付个别人和一些小团体的反抗，只要有惩罚机关来对付他们就足够了，不需要军队，不需要军队来对付，有些规模不大的惩罚机关就足够了，这些惩罚机关能够消灭恐怖分子

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镇压一些个别人。就是说，镇压的职能在我们政权内部，它的确是已无必要了，但是经济领导的职能却相当大地增长了。这里也不需要镇压。这里需要有组织的工作，任何镇压都不需要，经济领导也不需要任何的部队，甚至连惩罚机构也不需要，镇压职能也就失去意义，但破坏分子中有人受惩罚被擒获,这种情况除外。

第三种职能——保卫生命、财产和国家领土不受外部敌人侵犯的职能获得了特别的发展。恩格斯说：“政权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那么，好吧，阶级在内部消灭了，而在外面却留了下来。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权，而那里有还想与我们作战的资本家，就是说在国际范围内阶级还没有被消灭。

我想以恩格斯的先决条件作为依据。既然没有敌对的阶级了，就不需要国家政权了。这是在国家内部，而假如在国际范围内还存在敌对的阶级呢？我们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在其他国家，国家政权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把恩格斯的属于内部阶级制度的观点挪到国际领域去，那就会发现，在那里阶级没有被消灭，我们没有脱离开世界，剥削者依旧在那里逞威作福，而我们这里是劳动人民，我们之间的冲突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大概，政权还是需要的。

只要在国际范围内处于敌对状态的阶级还存在，也就需要这第三种职能，保卫生命、财产及国家领土的职能就要不断发展，目的是，譬如说，镇压某些极少数的阶级敌人及他们的残余，不需要军队，——这是第一种职能的事，镇压的职能，这种职能逐渐在消亡，我也许会说，它已经消亡。

就经济领导的第二种职能来看，进行管理，甚至不需要军队，也不需要国家的特殊机关。而要履行第三种职能——防御的职能，保卫受到致命威胁的生命、财产及我们国家的领土，这里非要有军队来履行这种职能不可。

什么是军队？这里说的可不是民警机关，有人报警，工人来厂，拿起步枪，去进行战斗，这不会有结果的。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国家一定要有高技能的军队。问题不在于，拿起步枪就可以结束一切，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空军，多种多样的空军，各兵种部队，需要有炮兵，有炮兵的各兵种，需要坦克，需要化学武器和反化学武器，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些人材不是很快就能训练出来的，这里需要经验，需要常备军。在民警制度的基础上，在民兵制度的基础上，不能组织任何的防御，不能组织任何对生命、对国家领土的保卫。一定要有常备的、训练有素的、具有高技能的、在各个方面造诣很深的军队。这种军队将要有第一流的空军、化学、坦克、炮兵、工程师、技术员，因为这里是技术决定着一切。

而如果有军队，那么，军队的存在就需要经费来供养军队，就要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为此需要国家机关，需要官员，但不是那样的官员，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可以从选举中产生的，今天选出了，明天又赶走了。需要那种非常有经验的官员，非常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一点，对军队的任何供给，军队的任何防御都是不可能的。这里也需要普通的工作人员。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既然军队将存在，国家、国家机关、政权机关也将存在，它要粉碎敌人并借助于军队进行反击。既然有军队，那么，也要有侦察机关，有反侦察机关，就是说，国内的肃反机关也得加强，因为我们的敌人,他们不是在睡大觉，他们时常暗中向我们派新的人员来摸情况，看看在我们这里可干些什么事，能不能炸毁些什么,毁坏些什么。就是在党内也有这样一些人，是有的，是有的，将来还会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是为了暗派人员，收买和贿赂人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已肃清了一切。只要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这些人就将继续存在。这就是同家政权机关存在的依据。因此，如果有人要问你们：“亲爱的同志们，何苦你们坐着 20 年而不想消亡呢？”你们对他们说：“不是我们的过错。假如社会主义在

各国都取得了胜利的话，我们早就消亡了，但是因为社会主义只在我们国家取得了胜利，而周围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需要军队，为了军队需要有国家机关，需要国家政权，它不能消亡，相反，我们还要加强它”，非得要给这样的回答。这一点你们同意或是不同意，而如果要按照马克思或是恩格斯对此所做出的那种回答行事，我们早就应该关门了（笑声）。而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想停业（笑声）……而相反，想要继续生活下去。击退敌人，甚至粉碎他们，那么国家政权一定要存在，并一定要加强，无可争辩地应当加强。

有求知精神的人在小组里和在课堂讨论中还会向你们提出一些问题。有求知精神的人你们那里是否很多，我不知道，但在你们那里大概总会有的。例如，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一会儿生产资料，一会儿生产力，一会儿生产方式，一会儿又是生产工具？请你告诉我，在你们那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接生活的生产，直接生活的再生产，这是怎么定义的，请明确的告诉我们，能不能将这些术语条理化？”混乱不堪的情况，往往使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混淆在一起，生产工具与生产力混淆在一起，总的来说，这里是一团糟。因而旧时代敌人嘲笑我们说：“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你们自己都谁也没有搞清楚，分不清哪儿是主要的，哪儿不是主要的”。因此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们想对一些术语做出某种精确的和明确的规定，而且也应当做出规定。例如，米丁同志引证马克思的话。依我看来，要善于引证马克思的话。比如，米丁在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书中说，“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工人阶级是生产工具之一。马克思在 40 年代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后来在《资本论》中他抛弃了这个结论，对它作了更为准确、更为清楚的表述，在书中他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另一种态度。总之，

应该指出，在《资本论》写成之前，马克思更喜欢谈物质的，使其与精神的对立起来，因为他在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战，为争取它的胜利而战，因而他对物质生产的某些因素下定义时就不是很规范。他想为那条被称为生产资料的总航线开路，也就是说，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他围绕这个问题而奋斗，而存在的构成要素，特别是生产的组成要素，他不是始终都能做出确切定义的，因为这不是他的任务。50 年代以后,当历史唯物主义完全获得了活动舞台，当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后，他对个别术语的定义就比较准确、比较规范了。如果你们回想一下，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 1 卷和第 2 卷中所下的这些定义就清楚了。如果使用马克思的术语，当然，就应当使用最好的术语，我指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把劳动过程分成三个部分。在《资本论》中,假如你们还记得的话,有：人的活动，也就是劳动；劳动手段，也就是生产工具，即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们用来加工改造劳动对象——自然界的原材料——水、矿藏以及随便什么东西所使用的那些东西，他没有把人归入生产工具一类，要不然，你们自己想一想，假如无产阶级成为生产工具中的一种的话，那么结果将是，现在无产阶级作为生产工具便构成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在革命时势必要把这些劳动工具（无产阶级）变为社会公有的，这是十分荒唐的。在《资本论》中及在《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从对社会物质生活作一般性的界定转向了对生产组成要素的界定，因此，我们只能在《资本论》中看到他的准确清楚的表述，就应当使用这种表述。他说，假如把劳动手段，也就是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结合起来，也就是人进行改造的一切——土地、森林、江河湖海、矿石，——这一切将构成生产资料。就是说，生产资料包括机器、一切仪器设备、土地、森林、江湖河海、矿藏、原料、交通工具——这一切构成了生产资料。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概念包括机器、所有的设备、土地、森林、水源、矿藏、原料、交通工具——所有这一切一起构成了生产

资料，即应当综合的那些东西。

生产力——这一概念——这是人与生产工具的结合。那么，这里也应当说说“在所有的生产工具中，工人阶级是最宝贵的工具”。应当说，工人阶级在所有的生产力中是生产的最重要因素，要不然，工人阶级作为生产工具势必也要变为社会公有，势必会认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家的个人财产，这也是错误的。

就是说，生产力——这是生产工具加上使生产资料运转起来的人。劳动手段，换言之，生产工具，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篇第二点里有。你们打开《资本论》的第2卷——那里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是分开的。他说，有生产资料，有工人，假如把它们割裂开来，无论是工人，还是生产资料——它们都不能代表任何的生产力。

我讲这一点是鉴于在一些教科书中在这方面存在着十分紊乱的现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拿起它来阅读就恶心，完全是杂乱无章，应该增强明确性。

有时说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问题，假如拿我们的宪法来看看，那里也是这样的说法。有人可能会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那里是生产资料，这里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这是为了通俗化。通常，假如以我们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为例来说，他们把生产资料主要理解为建筑物、原料等等，而把生产工具撇开了。为了使宪法明白易懂，为了能使它不引起任何的非难，将生产资料列入了,从学术方面来看这是不对的，但是这样做是为了通俗化。我本人也不鼓励这种事情，但是这是由大家所希望的通俗化造成的。在联共（布）党史中经常有某些重复，这是容许的，是为了不引起误解。而从理论和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容许的，因为生产工具是生产资料的一个部分。

还有,在结束语中还会产生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怎么会这样，这一切都是你们杜撰的,过去说的所有原理都是正确的，而在这里竟然要篡改它们。却说什么,这叫做用新的经验来丰富理论。

在制定某些方针之前，为了不至发生变化，你们此前要从事丰富的工作。而很多人可能会想,我们是否学习得太仔细了，说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他们想。由于情况的变化，新问题的产生，这些原理和结论可能会改变的。

这不，关于国家问题。恩格斯推测，社会主义将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因为关于三个要素的问题没有什么好说的。而结果是，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了胜利，而周边是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是说，这是新情况，不得不改变对国家及其消亡问题的看法。有人可能会想，我们决定要做的某些事情实在是太难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多数人还都认为，理论和结论应是一劳永逸的，只要将其背熟并静静地坐等，不会不成功的。而现在看来，原来并不是一切都那样永恒不变，并不是一切都是完美的，有些东西必须要改变。试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比较自由主义的态度看待个别原理和结论的，这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进行了叙述。就拿《共产党宣言》来说吧，这如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好著作，也是较好的著作之一。依我看来，恩格斯虽署了名，但这是马克思写的,因为我们知道,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共产党宣言》的，我们熟悉宣言的原则。马克思比恩格斯花了更多的精力。这是一部非常好的著作，这是赞美诗，我说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上杰作。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称这本书是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 40-60 年代的国际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纲领。《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和实践纲领也是萌芽中的国际[①]的理论和实践纲领。这本小册子出版 25 年后，各种语言的版本几乎都有，而且出了好几版，它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小册子中最

① 即 1864 年 9 月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三国际成立后，前者通常被称为第一国际。

普及的一种。在这本小册子出版25年后，马克思考虑到[18]48年的革命经验及后来的公社，他认为，这本书中的很多东西已过时了，他认为，如果他不得个重新写的话，他会按另一种方法写这本书。就是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完全不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个别原理和得出的个别结论是一劳永逸的。他们作为懂科学的人和作为真正的辩证法学家懂得，一切都需要不断地丰富，而且个别的原理和结论会由于发展的进程而不适用了，也就是说，要求提出新的结论．提出新的原理。

瞧瞧,在1872年德文版的前言中他们写了什么：“最近25年来，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基本原理总体说来直到现在都是完全正确的。在个别的地方应该作某些修改。实际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正如在宣言中所说的,要以当时当地的条件为转移。因此，绝不应该认为，在第二章的末尾所附加的革命措施具有特别的意义。

“对这一点现在势必要在很多方面进行发展，其根据是，由于最近25年来，大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发展，由于二月革命的实践经验，及后来规模更大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在那里首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这一点现在在某些地方已过时了。”

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他对我们20年的革命经验会谈些什么呢？“这一纲领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过时了，公社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使其运作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基础。现在他对这一切评价说，这个基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说不应该简单地掌握政权，而应该打碎旧的机器并建立新的机器，公社尤其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使其运作为自身的目的服务，需要摧毁这个旧的国家机器。

接着：“不言而喻，社会主义文献的评论对现时来说还不全面，

因为它只写到1848年，这方面的评语也是这样…… 尽管对现存的一些评语已过时，特别是因为，政治形势完全改变了，而且事件的发展使得已出现的共产党的大多数都被彻底消灭了。但是《共产党宣言》是历史性文献，而且我们不认为自己有权改变其中的任何地方，以后的各版中将有一版出版时可能将附有增补遗漏的前言。而目前版本的出现使我们感到突然，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对这项工作进行改变”。

你们瞧，一切都在变化，也可能会变化．假如有人问：你们这里为什么没有什么永久性的东西？今天是一回事,而明天又是另一回事，怎么生活？应该这样去解释：如果你们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就应该懂得，理论基础是没有变化的,而个别的原理可以改变，就是说,应当动脑筋去思考。

好，我就指出这四个问题，是很棘手的问题，你们也会碰到这些问题的，我尽力设法帮助你们解决这些问题,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回答。

五　宣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一些实际问题

现在来谈一些实际问题。

怎样改变宣传工作的安排？我们这里的宣传工作安排得不太好，从中央委员会开始，这我们应当承认。这项工作那里安排得不好，很不好。这是我们的错误、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我的错误和有关部门的错误。我们都很忙。这不是辩护的理由。不过我想解释，但如果承担了这项工作，就应该去做，用不着推诿说工作忙。但是，我想说，实在是忙，就算是理由。但宣传工作安排得不好，无组织性，很分散，工作方法很落后，大家都在竭力追求小组的数量，谁那里的小组多，而很少去研究，小组在做什么；追求课堂讨论的数量，但很少去关心课堂讨论中做了些什么；或是夸耀党的研究室的数量，而不说党的研究室里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应该明白，这件事没有组织性。宣传的

质量因素被忽略了，这一切直接向广度发展开来，而要想控制住，就要了解，做了什么事情，不仅要了解领导或监督情况，而且还要了解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这一点就没有做到。这是一个主要缺点——向广度发展了，而没有深入进去。

依我看，对待小组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多的小组，为什么？我不理解，要知道人们是能在自己家里阅读的，要知道是用俄语写的，假如有不懂的地方，有辞典，还可以向随便什么人去问。难道为了能理解所读的内容就需要有上千个小组。我对很少利用报刊，而总是指望小组这一点很不理解。在我们没有掌权时，报刊不属于我们的，那时可以这样去做，而现在报刊是我们自己的。

在某个小组里，想必会有好的宣传员，假如把他的全部讲课内容登载出来，这些讲课材料就成为大家的财产了，否则他仅能将自己的经验局限于自己小组的范围内。须知，这是手工作坊式的工作方法。机械化的生产与手工劳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将所有的零部件都集中在一起、用于一处。这是一个起码的组织任务，而我们，想必有许多可以写出好的讲课内容的好宣传员，是有很多，不能有另外的情况。他们就在小组的范围内进行教授。仅仅在小组里才认识他们，而哪怕向莫斯科委员会、区委员会提出任务，听听 10—20 个宣传员的课，看他们怎样讲解，要他们讲述并作为例子刊登出来，这或许能将其经验传遍全俄罗斯。你们看看，手工作坊式的工作方法意味着什么。以国家的方式提出问题是一回事，以家庭手工业的方式提问题，这是另一回事，很多的小组是不必要的，报刊利用得太少。

其次，依我看，你们党的研究室太多。依我看，这不对。这里有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不很熟悉这事情，所以我唠叨几句。这不，在听人们讲课时，就可以看出，在党的研究室里完全不受监督，完全是独立的，无论是在组织宣传时还是在进行辅导时都没有集中的管理。没有集中的管理，个别的点、小组、党的研究室是完全独立的。那里，

大概坐着一些好人，但要帮助他们．要知道我们这儿的人会白白浪费时间，会在政治上毁灭。你瞧，他坐在那里，在工作，工作是好是坏，没有人知道。谁也不关心他们，谁也不来问问。而如果有任何人两次、三次来提醒，帮助这种人就好了，不然的话会被抛弃，这种人会被抛弃的，因为没有人来帮助。我很担心的是，党的研究室也是这种状况，他们已被抛弃，没有人领导他们，没有人询问他们，没有人进行检查。而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宣传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一些人是这样解答疑问，另外一些人按另一种说法解答，第三部分人按第三种说法去解答。这件事情要在某种程度上集中管理。我反对压制人们的首创精神。不，人们的首创精神——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应当这样来安排工作，以便中央和地方机关之间能有共同的东西，以便对人检查。这就是需要做的事情。

没有利用报刊来进行辅导。在党的研究室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他们对各种问题作了很好的准确的解答。那为什么不去搜集他们在党的研究室中的经验，搜集他们对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解答？实质性的问题是，不仅要说，在什么书里，在第几页可以找到。实质性的问题是，要搜集这种资料，印刷出版，以便使其变为大家的财产。

国家和家庭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国家能够总结经验并把它变成苏联的东西，而手工业者仍然停留在自己手工作坊的范围内，谁也不知道他：当不得不按旧的手工业的方法在办公室里非常勤快地干活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掌握政权。在党的研究室里有好的经验，而报刊不登载它，这是不对的。

小组的数量要减少，但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减少，不是减少 50%，我反对这种做法。应当研究一下，什么地方有哪些小组，什么地方由谁在教课。或许在莫斯科在 2-3 个月内小组就有可能减少，而宣传员可以调到其他工作岗位去，调到党中央机关，或是调到莫斯科市委的机关去。

宣传局在干什么？它好像不见了，有谁见到它没有？乌加罗夫同志，你们那里有宣传局吗？

乌加罗夫：有。

斯大林：好。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即停办了高级党校，撤消了红色教授学院[①]。还有什么专修班吗？

莫洛托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专修班。

斯大林：我不敢说，那里的工作室安排得很好。停办了学校，是因为学校提供了两边摇摆的人。

喊声：对。

斯大林：但是应当改进，而你们立刻就停办了，高级党校一定要有，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要分开。不然的话会弄成这个样子，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从事活动的基础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级党校应当组建不只一所，而要好几所，因为非要办这样的学校不可。是否将这样的学校与其他培养组织家的学校合并，或是分开，——这应当讨论一下，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级党校一定要办，无可争辩地要办。[②]

再次，至于是否要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制订学习计划的问题？我认为，你们已经谈过这件事。你们这里什么叫学习计划？是问题或题目的项目单吗？

喊声：题目的项目单。

斯大林：你们要明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使我们的干部积累丰富的知识，提高理论水平。我指的是党的干部，不是指那些按党的狭隘路线工作的人，而是指在苏维

——————————————

① 红色教授学院成立于1921年，是培养高校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及科研机构、党中央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的教学机构。

② 斯大林的这一指示在战后才得以执行，成立了社会科学学院、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以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两年制党校。

埃的工作中、在经济方面、在商业组织系统的共产党员，合作社工作人员，教育工作者，在保健方面，总之，在一切管理部门，希望在各地的共产党员——这些有知识的人能够成长。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一点要牢记。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应该是我们最优秀的分子。过去对知识分子进行挖苦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最优秀的分子，而实际上是轻率无知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为国家服务，而是为上天服务，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剥削者服务。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干部，不太说从前他们是工人、从前他们是农民。就拿什基里亚托夫[①]同志打个比方，既然离开了车床并开始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您就已经是知识分子了。请原谅（笑声）。十年前您是干什么的，与谁也不相干，而现在您是知识分子。

什基里亚托夫：对，斯大林同志，我同意您的意见。

斯大林：我们全体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应当成为国家最优秀的分子，而且也能够成为。只有知识界能够成为国家最优秀分子，为使他们真正成为国家最优秀的人，他们应该学习，应该把书带给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学习。我不知道，或许他们自己也想学习《简明教程》，要帮助他们提高其政治水平并使其积累丰富的知识。

外国情报机关破坏了我们这些知识界干部的一个小组——这件事不是偶然的事件。我们对知识界的及国家政权机关的这些干部本身没有进行政治教育。

我想再重复几句我在第一次讲话中所说的话。我们这里过去曾对知识分子持一种荒唐可笑的轻视态度。我们大家都深入过车间，走近工人，却忘记了在工人中很少能找到那些能找到空余时间成为理论家

——————————————

① 什基里亚托夫，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1883—1954)，党的活动家，农民出身，小学文化。从1921年起在中央机关工作，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的工人，或是他们掌握了理论，这样的人很少。工人工作 8 小时，他们不习惯看书，不习惯于总结，他们应当去习惯。你们带着宣传材料钻进那儿，却忘记了在你们的周围有上百万的人，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在机关里有知识分子在工作，这是以前的工人，以前的农民，是我们的人，他们已成为有文化的人，他们同样与我们一起在管理着国家！你们不要认为，这仅仅是写写指示。这是胡扯。管理国家，意味着要在实际中执行，要善于在实际中执行决议，有时甚需要修改决议，假如这些决议不好，通过的决议不是一向都是好的，也有错误。有这样一些实践家，他们修改决汉，说我们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老爷派的夜郎自大习气，相反，我们认为，有时要有人向我们提醒，说我们不对。要使我们的一切决议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了解全国的情况。这是胡扯。于是，这些人在进行管理。他们在执行我们的决议，意味着在进行管理，而我们对他们估计过低，轻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异己的。昨天车床旁边的工人是很有才能的人，受到尊敬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他配得上去学校学习，受教育，为什么又对他瞧不起。我或许说，这是以粗野的、马哈伊斯基[①]式的、流氓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知识分子，这种态度对我们党来说是有害的、危险的。正是由于在军队里，在合作社，在商业，在工业中，在农业中以这种流氓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知识分子，正是由于这种流氓式的态度，我们才把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抛弃了，没有使他们在政治上积累丰富的知识，而使他们成为所有这些情报机关的猎获物——德国的、日本的、法国的，随便哪个国家的。由于我们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疏忽大意的、错误的、流氓式的、有害的、轻视的态度，几十个人被毁掉了。所以应该把这本书发送给这些知识分子，让党员以及那些不比党员差的非党员读读，让他们能够积累丰富的知识并提高自己的水平线、自己的政治水平。

———————————————

① 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流派。

要有什么样的计划？我认为，有三点是主要的,让他们来读一下，以便于学习。

第一点——这是基层小组，政治上还未成熟者的小组，他们是一些忠心耿耿的、革命的、一切都作好了准备的人，但是在政治上还未成熟的人。我想为他们提出这样的学习计划：把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前四章“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阶段”，当时党本身还没有出现；第二部分——有三章“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和第三部分“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当它掌握政权后，它在做些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简短地教授了这个问题。大概，基层小组不可能完全掌握全部内容，但稍微减少一些并分成三个阶段：党的发展史以这种形式教授。或许，这会容易些。而一年后，他们开始看书，懂得会更多一些。

中级小组——人数最多并对我来说是最感兴趣的，由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组成。按书中的内容、按章篇，12 章，12 个主要部分来制定学习计划，再没什么了。

第三小组——高级小组。对这个小组可以按照附加的章篇制定学习计划。每一章中有一附加的章篇，每个附加的章篇都列有书目、文献资料。学了一章后，就转向附加章篇，让他们看文献资料，以便他们学得扎实，让他们掌握比书中提供的更多的内容。附加的章篇是为了高级小组掌握基本的问题，十分清楚的问题，并迫使他们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找到向这一章过渡的相关书籍。

我想这样去安排。如果是很少受过训练的，就用简明的方法；具有中等知识的要学完全书的内容；而对知识比较丰富的人，要按照书目，按照附加的章篇学习书中所讲的内容以外的更多的东西。

引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 11 卷第 607—650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二第 160—200 页

把个体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

——在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1928年1月20日）

同志们，我想就解决苏维埃国家的农业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谈几点原则性意见。我拿不出材料，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也不大了解，不过对于农业的总方针及其前景倒可以讲上两句，这点必须提一下。

需要指出的第一个事实是：我国在革命后成了最典型的小农国家之一。革命前我国有大约1500万个体农户。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很难说，不过看来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如今革命后情况怎样呢？如今个体农户数目已达2500万。这方面地主的破产、大农户的解体，农户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起了作用，分割的开始也起了作用。

我认为，按照我们现有发展农业的途径，每过10年就会出现新的分割苗头。尽管农业人民委员部有关于阻止分割的法令，但也无济于事，分割还会发生。可见，不仅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是小农最多的国家，而且从发展前景看，如果我国在农业的发展方面不来一个转折，今后仍将是一个小农国家。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主要经济部门的专业化不会有多少进展。小农户抵御各种灾难、挫折和偶然事件的能力不强，为了保险起见，它们尽量继续保持其混合型经济的格局。它们不愿成为单纯生产小麦的农户，它们想什么都有一点，因为它们认为，谷物如果没有收成，马铃薯会有收成，要是向日葵没有收成，还会有乳制品，小牲畜会增加。这种混合型经济，小型经济，对大国说来是一个不幸。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形态的农户不能保证使用农业机器，不能保

证运用改良农作物的科学知识，不能保证使用肥料，等等，等等。比方说，现在使用农业机器、使用肥料和运用科学知识等方面的情况如何呢？这里十分之九是为大农户服务的。显然，有数百万农户没有这些也行，它们认为使用农业机器不合算。在小农户现有的资金状况下，有数百万农户显然根本用不着机器，难以使用这些机器，因为必须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才能使用机器。

富农的力量在哪里呢？富农的力量根本不在他生来就是如此，而在于富农有大经济。富农经济的规模使它们能够利用一切科学资料，能够使用机器、化肥，什么都可以使用。富农很有力量，各经济部门的大经济无不如此。这就是富农的力量所在。

我们能否按照作为个体农户的富农农户的路线，按照培植大农场的路线，按照象匈牙利、东普鲁士、美国等那样培植大地产的路线来发展农业呢？不能，因为我们是苏维埃国家，我们希望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培植公有经济。我们应当遵循这条路线。只要我们尚未循着这条路线真正起步，富农就会始终表现出……（听不清）①

这就是富农相对于同样是小经济的中农所具有的力量。谈起中农，不能认为我国的中农同德国的一样，完全不是，我国的中农是小农，在经营中极少使用机器。而我国的贫苦农民是更小的小农。我再说一遍，富农的力量就在于它拥有大经济，富农拥有大经济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结果，就可以使用所需的一切农业机器，使用肥料和利用一切科学条件。贫苦农民还有中农不可能这样做，便摆脱不了目前的处境。农民真实的经济状况就是如此.

既然认为我们应当按照扩大农业的方针、按照逐步把小农户和极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大农户的方针发展农业，那就应当按照这个途径认真地采取措施，应当开始这项工作，否则前途将……（听不清）富农

① 此处的注释系速记员所加，下同。

是不会止步的，他要继续前进。这里产生了第一个问题：是向富农供应机器呢，还是限制供应。

可见，继续发展农业有两条道路可走：要么走发展个体大农户的道路，要么走发展集体大农户的道路。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即使我们当中有人想偷偷地按照加强个体大农户即富农农户的方针发展农业，到头来也成功不了，因为整个苏维埃制度，我国整个立法制度，所有财政措施，所有向农村供应农业机器的措施，无不遵循限制个体大农业的方针。这是不是事实呢？即使是想扩大经营的中农，处在这种制度和条件下也没有任何发展前途可言，而且还受到种种经济……措施的限制。农户不能原地踏步，走下坡路又不愿意，于是中农就没有前途。

他不愿意走下坡路，那么走哪条路呢？当然，富农是有前途的，但我们想方设法不让他们发展，结果农业目前走进了死胡同。应当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单靠决议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应当振兴农业，应当实行集约经营。这里有两条道路：一方面可以走富农路线，走发展富农的路线，走振兴富农大农户的路线，然而因为单一发展个体大农户在我国是不允许的，因为苏维埃政权的目标是限制大农户。于是就还有另外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这就是发展集体大农户，但不是发展个体大农户。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把收获量提高两倍，按照技术革新、使农业在科学的经济学的指导之下发展的方针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

听了同志们刚才的发言，我认为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些前景，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在进一步发展农业的问题上正处于某种困境，没有看到我们在这方面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巩固、继续发展个体富农农户，对我们来说此路不通。另外一条是巩固小农户，必须把它们联合成为大农户，联合成为集体。这第二条路对我们来说是唯一可行的，既然如此，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走上这条路呢？

顺便说说，刚才有同志谈到租赁站和救济贫苦农民。这一切都很好，但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一半以上的贫苦农民救济款都吃光了，而且是个填不满的窟窿。这些基金应当给，贫苦农民基金肯定也应当有，因为一个政权如果只是许愿而从不兑现，那它就一钱不值。贫苦农民基金是需要的，救济也需要，这方面什么事情都应当做——这一切都很好，可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确切地说，解决问题不能靠这个。应当拟定逐步把个体小农户联合成为大农户和把小农户、中等农户、大农户联合成为更大的农户的具体途径，并遵循唯一能够战胜个体农户即富农的有组织的计划。

应当谈论的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步骤。当然，这在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但必须坚定地采取拟定具体途径、把个体农户联合成为大农户的方针，因为这是在农村培植真正合作社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推动农村赶上城市的唯一办法。这是拯救贫苦农民的唯一办法，而且拯救的不光是贫苦农民，连中农也在内。

你们对中农不能联合成为信用合作社的说法如何看呢？中农当然能够联合成为信用合作社，但必须让中农看到前途，必须向中农保证今后不把他们划为富农，而且应当相应地改善他们的经济。贫苦农民更可以联合了，不过当然别忘了，这是很费钱的。实践表明，新的生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离不开巨额财政支出，但还是要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我们正处于没有出路的困境之中，因为这是认认真真地继续发展农业、像我们过去振兴今天的社会主义工业那样振兴农业的唯一途径。

你们这里集体农庄不多，它们有点被当成旁门左道，这些农庄不在整个农业所处的大道上——你们的所有各区都是这种看法。有时人们认为，集体农庄是一回事，而集体形式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注意到有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发生在许多农业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的事情是一回事，至于集体农庄，据说这反映了过去贫农委员会的时代，而

且集体农庄也不是合作经济的组成部分，刚才我们一些同志也是这么说的。小个体农户和极小个体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是在贫农委员会取消之后，在剥夺富农的时期结束后进行的。刚才查古明尼同志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我回头再讲），从信中可以看出，他显然不清楚剥夺富农与限制富农是两码事。在停止执行剥夺富农的政策后，这一转变已经完成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形成文件……（听不清）。事情经过是怎样的呢？伊里奇说应当限制富农，在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停止执行剥夺富农的政策之后，开始向培植贫农委员会的政策转变，恰好在这个时候伊里奇说，看来我国的集体农庄问题似乎同富农没有联系。这话不对：正是在取消贫农委员会、停止剥夺富农、我们转而走上持久建设的道路之后，集体农庄问题才成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当时这个问题亟待解决，而且现在，当我国已出现实际拟定把小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的具体途径的某种机会后，我要说，集体农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为什么恰恰现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首先，因为我国的工业发展了，它要为农村指明道路；其次，因为富农农户发展了，现在不仅贫苦农民而且中农都很清楚：我们应当继续前进，而不是步富农的后尘；我们不应以单干的方式、而应以把单个农户联合在复杂机器周围、联合在我们制度周围的方式巩固我国的经济。

我国许多人都在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大农户、大庄园、中心试验站、特殊的机器系统进行研究，在那里星星点点的土地都得到了利用，那里由于这一切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我国富农农户的 20 倍。我们应当发展的是这种类型的经济，但不是以资本主义农户为基础，而是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只要善于处理这个问题，农民是愿意走这条路的，因为这是推动农户前进的唯一方法。其他道路是没有的。如果农民要走富农道路，那么他会发现会遇到许多不快。

我们过去是这个政策，现在和将来也是这个政策，它会使所有富

农感到沮丧，使中农脱离富农。除了把小农户和极小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别无他途。在苏维埃制度下其他道路是没有的。就是说，伊里奇提出集体农庄问题时基本上同贫农委员会没有关系，他是在贫农委员会取消后重谈这一问题的。

什么是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个体农户的生产联合体，是搞生产的，不是象消费合作社那样搞销售，也不是象农业合作社那样搞供应，而是直接从事生产的。有 3 种甚至 4 种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供应合作社、销售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是生产合作社，正因为如此集体农庄是合作制的组成部分之一。不应把集体农庄同合作制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应当善于在合作制中发现集体农庄。的确，我们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农业中的贫苦农民和中农是搞生产的，这很重要，也很关键。

销售方面的联合非常好，因为这是为生产方面的联合作准备。供应方面的联合更好，这是在生产方面、在订购方面、在经济作物方面把中小农户联合起来的直接途径和直接准备。

关于农户集中的问题我不再多说，因为这点大家都知道。为了从供应、代销的集体化过渡到需求的集体化，我们必须这样做。集体农庄是纯粹型农户联合体。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便是合作制。

毫无疑问，我们已着手认真解决振兴农业、使生产发展上一个新台阶的问题，而如果不把小农户和极小农户联合成为集体大农户，振兴就无从谈起。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就是如果希望我们今后的运动能真正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所应当注意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提高整个农村的福利，而不是提高那正在建设大庄园、雇用工人并且大搞剥削的个别上层集团的福利，那么我们就别无他途。我想就这些前景说几句，以便把讲过的那些零散措施阐述得更清楚。如果你们不按照正确的前景把这些措施归纳为一个总体系，措施就会落空。我再说一遍，

这就是把小农户和极小农户联合成为搞生产的集体大农户。

关于查古明尼同志给我的信，我简单地说几句。他是就我们为执行第107条而作出的那些决定写这封信的。他认为，我们关于第107条的决定不是把富农当作粮商，而是当作占有大量商品粮却不把粮食上市的人，查古明尼同志认为这样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认为富农的剥削本质不是表现在贸易上而是表现在农产品的生产上。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私人生产者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是为出售而生产。我们有些商品生产农户的产品卖不出去……（听不清）。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家常常遇到危机，届时资本家采取烧掉粮食这样的措施。例如在美国，当生产的粮食很多、而粮价不高的时候，就烧掉粮食。这怎么解释呢？

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在……[①]是城乡之间的基本调节器的条件下，如果生产是为了出售，如果市场没有保障，生产就会落空。可是富农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生产量大，而在于他们搞的是众所周知的哄抬物价。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商品。商品的主要部分掌握在中农手里，但如果论个体农户分门别类的囤积商品，那么还是富农囤积的商品最多。他们的力量就在于他们是为出售而生产。您对富农剥削本质的定义是不正确的。

查古明尼同志说：“我认为，如果采取上面谈到的措施……（听不清），由此而引起粮食的市场投放量进一步减少”。我前天[②]提到的那些准备采取的措施将给富农、商人以打击，为的是消除哄抬价格的现象。到那时农民就会明白，价格不会再涨了，应当把粮食拿出来，不然还得蹲监狱。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查古明尼同志说，这样会减少粮食收购量。何以见得呢？

————————————————

① 速记记录有遗漏，按意思应为“贸易”。

② 斯大林指的是他1928年1月18日在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我从莫斯科获悉本月第三个5天的数字，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收购量提高了，由于实行这一政策收购的谷物增加了350万普特。乌克兰已经收购200多万普特，而从这5天来看，可以收购到450万普特。情况就起了这样的变化。给商人以迎头痛击，市场就得到了改善。请看实例：在乌克兰最先采取查古明尼同志提到的方法，以打击商人和富农，结果乌克兰的收购量从230万普特上升到现在的450万普特，也就是增长了一倍。中部各省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收购量原来为50-60万普特，现在已将近150普特。

这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北高加索前不久报来的5天情况简报说，收购量原先将近50万普特甚至降到了40万普特，而现在的收购量为150万普特。这些事实是回避不了的，事实推翻了你的推测，因而也证明我们的措施比预想的还有效。就是说，我们抓住了市场的关键，打中了要害，从而提高了粮食收购量。

“如果你们现在对富农采取某些行政措施，你们就篡改了新经济政策。”完全不对！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商品流通自由，我们希望对商品流通加以调节。列宁同志也说过，我们允许私人资本存在，允许商品流通自由，但我们应当对一切加以调节，我们是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我们实施监督的情况下，允许这种商品流通自由。这是调节我们所允许的商品流通的手段之一，但这绝不等于我们说：“你们爱怎么调节、爱怎样干都行！”对不起，不是的。我们说过，我们允许商品流通自由，但有一定的范围，为的是这种自由不致妨碍国家，为的是让这种自由对工人、农村的贫苦农民和中农有利，而不是对富农有利。这绝不是说我们让自发势力为所欲为。那样一来就不是新经济政策，而是恢复资本主义了。我们并不是恢复资本主义，我们是确立苏维埃制度，而且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我们保持了城乡的调节作用，我们不能在我们的苏维埃制度下恢复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允许搞新经济

政策，同时又保留了国家的最后决定权，所以我们做得对。查古明尼同志说这是失败。完全不对。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后一直是这样说的，情况不是这样吗？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这封信是写给我和瑟尔佐夫同志的。也许我收到信后应当给查古明尼同志回信，也许我在全体同志参加的大会上稍微泄露了他的疑虑这个做法不对。我认为归根结底我是做得对的。也许从一个完善社会的礼貌（笑声）的角度来看我的做法不好，但从有利于事业的角度，从我们目前的政治路线的角度，从目前形势的角度来看，我是做得对的。

有什么可隐瞒的呢？您有疑虑，我们大家也都有疑虑——干吗要隐瞒起来呢？这方面我们可以有所改进，而且总的来说有好处，尽管有些人显然会感到委屈，也就那么两三个人，包括写信人（查古明尼同志说：一点也不）。不觉得委屈？那就更好了。我认为，如果说我违反了某些礼仪准则、这方面有欠妥之处的话，那么我在使人们消除疑虑方面就大有收获了，这种疑虑许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大家在许多问题上都会有各种疑虑，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百分之百地弄清问题，即使我们还会有疑虑，可只要我们理出头绪，人们终归会理解的，最后只会有好处。我觉得，我在讲话中泄露了您的疑虑虽有欠妥之处，但还是好处多，所以正式地说来我做得是对的。

现在谈谈信本身。我已经讲过，这里只好再讲一遍，不能这样谴责靠别人的劳动[①]生产的人。富农自己生产，同时也强迫他人生产，而商人则是低进高出。很难在这两种人——两种剥削者之间划这样一道分界线。富农为生产[②]而生产，他们出售自己的商品，因为在商品关系下销售对生产者说来具有决定意义。我们在销售方面、在供应方

——————————————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按意思应是“为出售”。

面实行合作制，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从买卖的角度对待个体农户的态度，这是对待个体农户的最正确的态度，因为个体农户生产东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出售，否则就无利可图。

这种从商品流通角度确定的对待个体农户的态度，就是对待个体农户的基本态度，因为从其产品的销售角度说来恰恰应当这样对待他们。我们对富农的打击，在这方面的打击，是主要的打击。怎么能在生产方面打击富农呢？无法打击，而应组织与之并存的另一种类型的农户，这种农户要更完备，生产力要得到更大的增长。这是打击富农的方针。要把个体农户组织成大农户，这相当困难，而富农作为自己产品的支配者在给我们设置障碍，因此打击的矛头正应当对准产品方面。

这将对中农的状况产生什么影响呢？我前天就对大家讲过，一部分人要抱怨，一部分中农要[抱怨]说，人家劳动，可又不让人家好好地出售。他们会感到委屈，尤其是一部分中农，他们会抱怨说，我们把他们当作不把自己的商品拿到市场上的人甚至当作商人来打击。我前天说过，中农可能会说，我自己花钱买粮食，你想买你也买。看来，应当奉行一种谁也不得罪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永远不会有，不管它有多么正确。既然我们不仅把富农作为不拿出货物的人、而且作为商人来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能因为一部分中农感到委屈就止步不前，因为他们会说：“他们自己花钱买粮食，你想买你也买。”我们同富农打交道不可能一个中农也不得罪。这样的政策是没有的，一部分中农会感到委屈，他们不会很快就理解，甚至不仅中农，包括我们共产党员也不会很快就理解我们的路线。你向他们作解释，他们却左右摇摆：先走这个极端，然后又走那个极端，因为我们缺少治理国家的有经验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要求工人完全理解，不能要求他们全都马上理解我们的整个路线。农民受管理者的压迫达300年之久，管理干部……（听不清）。令人惊讶的是，工人阶级掌权才10年，自

己的队伍中就涌现出了许多充当管理人员的优秀人才，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我们在这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我们毕竟胜任了这项工作，毕竟应当记住，不仅一部分中农不理解我们的政策，而且我们的共产党员兄弟们也并非任何时候都理解。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总之，世界上还没有一项政策能立即让我们的共产党员兄弟们百分之百地理解，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不满。共产党员中间也会产生不满。一部分中农可能会产生不满，这点要估计到。不能因此而止步不前，我们正在前进，正在带领他们前进，领导他们，哪怕有一部分人感到不满，这部分人可能是少数，不过也要带领这部分人前进，其余的落伍者以后会弄清是怎么回事，最后大家都会理解，而如果考虑有些人不理解，那就意味着原地踏步。查古明尼同志应当学会这种辩证法，否则我们什么政策也搞不成。

中农会认为，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个转折。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一部分中农会这样来理解：我们原来认为准许搞商品交换呢，——私人资本可能复活，而经济措施则限制私人资本。中农会说：“布尔什维克先生们，这是你们自己的不对，——自发势力多会儿想发展就让它发展吧。”

我们对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应该向中农讲清楚，那不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要让国家保留调节作用。这点不仅要给中农讲清楚，而且要给我们某些不理解的共产党员讲清楚。

谈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并没有提出我们只应限制富农或者只应用经济措施限制富农的问题。有行政措施吗？有，我们正在采取行政措施。你们必须证明现在还不是采取行政措施的时候。这你们是没法证明的。你们主张对我们的工作人员，首先是那些为私商运输粮食发放优待证的村苏维埃主席执行第105条。而情况究意怎样呢？有一些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对头。要给中农、给那些不理解的共产党员解释新经济政策。如果谁不理解，要给他调换工作

环境，他就会理解了。至于对那些策划积极反抗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人，要采取行政措施。不这样做不行。我国还存在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大家以为，在粮食收购工作方面无所作为的关头，商人不会利用这一时机吗？完全不对，商人在搞自己的一套。因此，除了迄今我们采取的经济措施外，还得有补充措施。大家对商品抱着很大希望。这是不对的。这是所有合作社系统和采购机关的错误。不管是合作社还是采购机关都在喊叫："给商品。"商品给了。他们以为这回农民该满足了，商品的价格问题也没有解决，因此，一个地区需要多少工业品就运去了多少，可农民关心的是另一回事。他想的是："你拿 1 俄尺印花布换我 1 普特粮食，可我想拿 1 普特粮食换你 2 俄尺印花布呢。"商品本身还不能解决价格——这个农民的主要问题。农民想多得，我们想少给。这方面谁在妨碍我们呢？就是破坏市场的人。人们都说，是投机商在起妨碍作用，投机商有大量商品，并用这些商品耍手腕。我说过，市场是个封闭的链条。

如果把市场比作由 1000 个单位组成的整体，那么只要破坏其中的 2 个单位，整个市场、整个机制就会被破坏。只要有 2 个坏单位和 998 个好单位，整个市场机制就会被破坏。这就是市场的本质，市场的复杂机构。例如，我们要是在国外市场上卖得便宜些，那么资本家的全部生意都砸了，他们肯定要跟着我们……[①]，所以我们就要卖得更便宜。如果我们是卖方就会这样做，而如果我们是买方呢，我们就会比资本家出价稍高一些，去购买某种纺织品或其他商品，我们就把资本家的整个市场都搅乱了。如果你是买方，只需往降价那边加个砝码，如果你是卖方，只需往提价那边加个砝码，整个市场就会动起来，——给搅乱了。

为使情况得到改善应当打击谁呢？应当打击那些叫嚷提高粮价的

① 速记记录有遗漏。——原编者注

人。粮价一高，农民不种经济作物就很合算。如果种粮食更合算，农民就不会种经济作物，就不会种亚麻等等。

市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在一个地区只要有两个富农串通好了哄抬价格，所有的经济单位都会受影响，大家都会采取观望态度。查古明尼同志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们要打消中农以为今后粮价肯定提高的想法。怎样打消呢？靠执行第107条。

请看事实：我已经说过，我们原先5天内在全国收购600万普特，如今是950万普特。这算什么，算不算成绩？

你们在这里预言：“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不作预言，我让事实说话。请看乌克兰：原先5天收购200多万普特粮食，现在是450万普特粮食。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已着手对市场里无数农户中的这两个破坏市场的经营单位进行打击。

中农怎么想呢？中农想：“要是能多卖钱就好了，但现在事情不妙。彼得鲁哈蹲监狱了，瓦纽什卡蹲监狱了，弄不好我也得蹲监狱。算了，我还不如把粮食卖了。苏维埃政权可是惹不起。”这种强制办法对中农产生了影响。

我们还有经济上的办法，我们不得不这样行事：如果哄抬农产品价格，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办：如果1普特粮食卖1卢布50戈比，就是多卖50戈比，那我们的印花布也加50戈比。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农。这点要给中农讲清楚。有制服富农的论据，有经济上的论据：只要富农提高粮价，就得提高工业品价格。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农，更不必说哄抬上去的粮价会破坏整个工业，破坏亚麻工业、棉纺工业及其他一切工业。这样一来商品就会比今年还少。如果压缩亚麻、棉花的生产，还是中农吃亏。这就叫强制的办法。

经过阶级斗争考验的工人对阶级非常敏感，工人立刻就会明白，农村——这是个阶级。工人很快就会理解我们的政策。如是派没有经过阶级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去，他们就会认为不存在农民阶级。这样

不行，同志们。阶级确实存在。强制的办法可以起同经济的办法一样的作用，有时甚至作用更大，就是有人扰乱市场、竭力把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转向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资本主义轨道上的时候。

现在就有关集体农庄建设的各种报道和声明谈几句。我在这里发现了（也许我看错了）某种偏重生产合作社的倾向。如果你们认为这是培植公有成分的唯一途径，那就错了。农业合作社中从事产品加工的农户联合体，例如黄油厂、干酪厂、榨油厂及其他所有通过把单个农户联合起来而组成更大联合体的企业是一回事……（听不清）。这是基本的途径，是较为广泛和普遍的途径，农业合作社——集体农庄等就是走的这条路。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这也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伟大思想，他把销售方面和生产方面及粮食生产内部的各种农户都包罗到这一计划内。当然，榨油厂、黄油厂主要是集体农庄部分，而集体农庄是粮食生产即主要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农业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中还没有其他把粮食生产联合起来的联合农户。就农业合作制而言，什么都组织好了，唯独没有粮食生产，而这是一个主要问题。所以集体农庄目前是主要的、而不是唯一的……应当重视这一修正，我再说一遍，不仅要有从事销售和供应、在供应基础上成立的联合体，而且要组织集体农庄即在农业的基本部门——粮食生产方面集体农户组织的生产形式。

速记记录，未经整理

载于《斯大林研究》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93 年出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四第 3—16 页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和实际结论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1928年4月6-11日）

主席：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由于前面几位发言人已经十分详尽地通报了沙赫特案件[①]，我就只谈几个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是关于我们争论的性质问题。你们看到我们就全会日程上的问题的争论，不管是关于粮食收购问题，还是关于沙赫特案件问题，是在极其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对自己错误的批评，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组织的自我批评是我们争论的共同的调子。这说明了什么？这种“抑制不住的”自我批评从何而来？总之，我们需要这样的自我批评吗？

这一自我批评的浪潮是从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自我批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它对我们来说像空气和水一样需要。有哪些原因？其原因至少有三个。

第一，因为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由一个党——共产党执政的，该党不与也不可能与其他政党分权，因此，如果我们想前进的话，我们应该自己来揭发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因为再没有别人来纠正它们了。这自然是清楚的，我也不准备就此展开来说。

第二，因为在消灭了反对派的十五大以后，党内形成了新的局面，

——————————————

① 指顿巴斯的沙赫特区及其他区内资产阶级专家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这个组织于一九二八年初被破获。

对此我们不可忽视。这种局面新的特点在于我们再也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了反对派，于是有了一种危险性：认为党在摧毁反对派后想吃老本，想稍作歇息而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视而不见。为了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早在十五大上就应该提出全面加强自我批评的口号，以此作为我们前进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第三，因为最近以来，我们的党内在领导人与群众的关系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对这些变化我们也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些变化表现在哪里？它们表现在：我党的领导集团爬得太高，他们的威望过高，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他们变得几乎高不可攀了。我们拥有这样一批权威领导人的事实反映了我党最伟大的成就。但是，事实上，群众开始从下边眯缝着眼睛向上看这些领导人，不敢经常去批评他们，这个事实反映出群众远离其领导人的危险，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映出领导人脱离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危险。这种危险可能会一方面现实地导致群众远离高层领导和对他不信任，另一方面，导致高层领导的骄傲自满。如果高层领导骄傲自满和开始俯视群众的话，那能有什么好结果？很清楚，这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为了不出现这种情况，要永远开放自我批评的渠道，要使苏联人民能“斥责”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以便使他们不骄傲自满，而使群众不远离领袖。

这就是我党召开十五大以来出现自我批评蓬勃发展的总局面的基本原因，这一局面给今天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整个工作打上了烙印。

正因为如此，应该欢迎《真理报》在组织《工农检查院专页》这个问题上的倡议。由于同样的原因，要欢迎《共青团真理报》为批评我们的不足和我们组织的自我批评开辟专页的倡议。应该希望的只是批评将是深刻和严肃的，而不是轻描淡写地停留在表面上。

有人有时责备批评者们的批评不完善，说他们的批评有时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同志们，这是错误的。这是很大的误解。不能要求批评

百分之百正确。谁要是对批评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就排除了提出批评的任何可能，特别是来自工农群众的批评的可能。普通的工人或农民哪里能组织最最完善的批评？同志们，这是空想。如果批评哪怕只要5%-10%是正确的，那么，这样的批评就应该欢迎，应该认真地去倾听并考虑好的地方。否则，我们就得堵住千百个来自基层的我们的文学家和评论家们的嘴，他们在自己的批判工作中还不够内行，但他们所反映的是事实的真相。正是为了不压制批评，而是要鼓励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认真地听取苏联人民的各种批评，即使有时批评甚至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所有部分都正确。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群众才能相信他们不会因为不完善的批评而受到申斥以及相信他们不会因其批评意见中的某些错误而被“讥笑”。

为什么我说这些？因为一些发言人对批评的意义和目的并不完全清楚，一些同志这样议论：既然开展自我批评，那就意味着一定是想要撤某人的职。（笑声）而有些人认为，既然批评教育人民部的实际工作，那就意味着想搞垮教育人民部而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受益。当然，这一切是不正确的。问题并不在于撤某人的职或者搞垮一个人民委员部和加强另一个。不，同志们，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揭露我们管理国家的实践中的缺点，并在揭出这些缺点后，本着减轻和加速我们发展的精神来改变我们的实践工作。说的是这个，而不是什么别的，同志们。如果想要知道我个人的观点，那我主张不撤任何一个与沙赫特案件有关的管理人员的职。有人在这儿找被告。不用找被告，同志们。如果要找的话，那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是被告……

喊声：对。

斯大林：从党和国家中央机关到基层组织。问题是要揭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共同消灭它们。而为此需要开展自我批评，诚恳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希望改正这些缺点。

有关第一个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同志们在此很少涉及，这是关于沙赫特案件的阶级内幕。事实上，沙赫特案件的根子隐藏在何处？这种经济反革命在何种阶级秩序的基础上能够发生？有些同志认为沙赫特案件是偶然的。他们通常说：我们这儿忽略了秩序，没有注意到，假如我们不疏忽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沙赫特案件。这里有疏忽，而且疏忽还很大，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但是，用疏忽来解释一切，这表明不明白事情的实质。事实说明了什么？事实表明，沙赫特案件是由过去控制煤炭工业的部分资产阶级专家们挑起的一场经济反革命事件。事实接着表明，这些曾经组织起秘密小组的专家，从现移居国外的原老板[在欧洲]和西方的反革命的和反苏的资本主义组织那里得到搞破坏活动的经费。事实最后还表明，这个资产阶级专家小组是根据西方的资本主义组织的指示进行活动和破坏我们的工业的。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在这里与西方反苏的资本主义组织对我国工业进行的经济干涉打交道。过去有过军事、政治干涉，我们用国内战争的胜利消灭了这种干涉。现在我们遇到了经济干涉的企图，为了消灭它，我们并不需要去进行一场国内战争，但我们还是应该去消灭它，我们应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方法去消灭它。

设想国际资本不来干涉我们是愚蠢的。不，同志们，这不对。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国际资本，它不会平静地看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发展。过去，国际资本想用直接军事干涉的方式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前途落空了。现在和将来，它将一如既往地用看不见的、不经常看得见的，但有足够威力的经济干涉的方式来削弱我们的经济实力，组织破坏活动，在各个工业部门蓄意制造各种“危机”，以便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干涉更轻松些。这里的一切都交织在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任何偶然性可言。只有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要么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采取革命的政策，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把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组织起来，到那时，国际资本将

竭力来干扰我们前进；要么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转而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可能国际资本看来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有些人觉得，我们可以采取革命的对外政策，并同时争取得到西欧资产阶级的好感。我不再去证明这些人与我们的党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了。例如，英国要求我们同它确定在某地，譬如说在波斯湾、在阿富汗或者在土耳其的势力范围，并且它提出保证，如果我们做出这一让步，它就准备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怎么样，同志们，也许我们走这一步？

喊声：不！

斯大林：美国要求我们原则上放弃世界革命的政策，要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做出这种让步的话，一切都会顺利。怎么样，同志们，也许我们要做出这种让步？

喊声：不！

斯大林：如果我们同意与日本分割满洲里，我们就能与它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能做出这种让步吗？

喊声：不！

斯大林：或者比如有人要求我们“减少”对外贸易垄断并同意偿还所有战时和战前的债款。也许去这么做，同志们？

喊声：不！

斯大林：但是，正因为我们不能违背自己去做出这些和这样的让步，所以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国际资本将总会一直给我们制造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管这是沙赫特案件还是什么别的类似的事件。

这就是沙赫特案件的阶级根源。

为什么国际资本的军事干涉得以在我们这里发生？因为我国有一大批军事专家、将军和军官、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孝子贤孙，他们总是准备挖苏维埃政权的墙脚。这些军官和将军如没有国际资本的财政及

其他援助，能否组织像样的反对苏维埃政权战争呢？当然不能。如没有这个白匪军官和将军集团的援助，国际资本能否组织重大的干涉行动？我想，不能。那时我们有的同志认为军事干涉是偶然的现象，如果我们不释放克拉斯诺夫、马蒙托夫等人，那干涉本不会发生。这当然是不对的。释放马蒙托夫、克拉斯诺夫等其他白匪将军在国内战争的发展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对此不可能有怀疑。可军事干涉的根源并不在此，而是在于以苏维埃政权为一方、国际资本及其俄罗斯的将军残渣余孽为另一方之间的阶级矛盾，对此也不可能有仟何怀疑。

如果没有国际资本在财力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不是寄希望于国际资本能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一些原为矿主的资产阶级专家们能在我们这里制造沙赫特案件吗？当然不能。如果在我国不存在某个准备进行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专家集团，国际资本能在我们这里组织类似沙赫特案件的经济干涉吗？很清楚，不可能。总之，我们这儿有没有这样的准备进行经济十涉的资产阶级专家集团呢？我想是有的。

喊声：他们有很多。

斯大林：我不认为他们会有很多。但是，我们这儿存在着某些不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专家集团，他们比干涉时期存在的要少得多，对此是不可置疑的。这两股势力结合在一起就会给对苏联进行干涉提供基础。

沙赫特案件的阶级内因就在于此。

现在来谈谈从沙赫特案件得出的实际结论。

我想讲一下沙赫特案件提示我们的四点实际结论。

1.列宁说过，选拔人才问题是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沙赫特案件表明，我们没有很好地选拔我们的经济工作者，而且不单单是没有很好地选拔，给这些干部所提供的条件还阻碍了他们的成长。有人在这里提到了第33号法令,特别是提到了这一法令附带的《规范条例》。这个《规范条例》的特点是它几乎为技术经理提供了所有的权力，而

只给经理留下调解冲突、“当代表”和弹巴拉莱卡琴[①]的权力。很清楚，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经济部门的管理干部们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当时这条法令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它是在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经济部门管理干部的时期颁布的，那时，我们不会管理工业，出于无奈不得不把主要的权力交给了技术经理。但现在这条法令变成了枷锁。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经济部门管理干部，他们有经验并能成长为我们工业部门真正的领导人。正因为如此，是到了取消陈旧的规范条例和将它更新的时候了。有人说，共产党员们，特别是工人党员—经济工作者们不能掌握化学公式，根本不懂技术知识。这是不对的，同志们。世界上没有布尔什维克工人们不能攻破的堡垒。我们过去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攻下的岂止是这样的堡垒。所有问题在于要有掌握技术知识和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布尔什维克式的耐心武装自己的愿望。但为了改变我们经济部门管理十部的工作条件和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的和全权的事业主人，必须取消老的规范条例，用新的条例取而代之。否则，我们会有损害我们的人的危险。譬如说在 3 年前，难道雷库诺夫比我们中的任何人差吗？像雷库诺夫这样的人在其生活中同资产阶级混到了一起，开始腐化堕落。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经济的实践是不正确的，说明我们经济部门选拔干部和工作的条件阻碍着这些工作的开展，使他们变为资产阶级专家们的尾巴。应该结束这样的实践，同志们。

2.沙赫特案件提示给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在我们的高等技术学校里教育干部，我们没有很好地培养我们的红色专家。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结论。我满意地听到了安德烈耶夫同志的真正的革命的讲话。他建议在完善我们的实践方面改变方向。这是完全对的。但遗憾的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必须在这方面讲一下。安德烈耶

———————————————

① 俄罗斯民族的一种三弦的三角琴。——译者注

夫同志同意在我们管理的所有领域，即在党的、工会的和经济的领域里改变我们的实践工作。可他留下了一个领域没有触及，那就是培养新的红色专家这个领域。他想仍然按照老办法来做这项工作，他不明白原来教育和培养新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实践需要有重大改变，他不明白在这方面同样需要改变方向，使其朝着完善我们的实践工作的方向发展。安德烈耶夫同志要我们相信在新老专家之间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在新的专家中间有时会遇到这种在做坏事方面不亚于某些老的反革命专家的无赖。但是，如果在这里真的有阶级斗争的成分，而它们确实在这里存在着，那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应该这样来武装新的专家们，要使他们在同老专家们的斗争中获胜，而不是失败。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新的年轻的专家们不断地在与老专家们的斗争中失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照着书本学的，他们是书本知识的专家，但他们没有实践经验，他们脱离生产，他们自然也要失败。难道我们需要这样的专家？不，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专家，哪怕他们是年轻三倍的专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专家：不管他们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他们不仅要擅长理论，而且在实际经验和与生产的联系方面也要有很强的能力。一个未见过矿井和不想进矿井的年轻专家，一个未见过工厂和不想在工厂里蹭脏自己的年轻专家，这样的专家永远不能战胜在实践中久经考验的老专家。所以，不仅老专家们，不仅我们经济部门的工作者，而且还有工人们，常常会与这样的年轻专家格格不入，就容易解释清楚了。

但为了不发生与年轻专家们的这种突发事件，必须改变对他们的教学，而且要这样来改变：要使年轻专家们从他们在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的最初年代就开始与生产、工厂、矿井等保持紧密的联系。那谁更容易在教育年轻专家的实践中进行这种改革——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还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呢？我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更容易实施这

种改革措施。我想，如果我们哪怕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我们就会在加快培养新的、真正有经验的专家方面获益。我想，在这种条件下，年轻的专家们就会在同资产阶级老专家们的斗争中更好地武装起来。那时，我们会有几十所高等技术学校掌握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手里，有几所高等技术学校掌握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手里，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建立起一种竞争关系，它们就不得不改善教育年轻专家们的工作，那我们最终就能加速进行培养新专家的工作。

就是这么回事，安德烈耶夫同志。

为什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比教育人民委员部更容易做好这件工作呢？不是因为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人比起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经验更少或者能力更差吧？当然不是。从这个观点来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可以说是处于同样的位置。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第一个区别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并且它比任何其他人民委员部更关心加速培养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事情，而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把其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这项工作上。教育人民委员部则是另一回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应该培养数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生、律师、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等等。教育人民委员部不可能同样程度地去重视所有这些学习领域。从这一观点出发，应该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负担过重，只要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管理，它就能顺利地减轻负担。

第二个区别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比教育人民委员部更合理地挑选自己的教师队伍，因为前者不仅有研究理论的教授，而且还有能在高等技术学校教书的精通工业的实践家。而这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最后一个区别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由于自己的地位，将更

容易使高等技术学校同工业实际结合起来。不见得能证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能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平起平坐。而大学生们同工业部门的联系是减轻从年轻干部中培养优秀专家工作的主要因素。

有人说，外国的高等技术学校集中掌握在人民教育部的手中，而不是在私人资本家的手中。就算情况是这样的。

古比雪夫：不是到处都是这样。

斯大林：就算情况是这样吧。它也应该是这样的。我想，培养专家的工作应掌握在国家或者国家的人民委员部手中，而不是私人资本家的手中。但是，难道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吗？要知道我们是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不是转交给私人资本家，它同教育人民委员部一样，也是国家的一个人民委员部，区别仅在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全联盟的人民委员部，而教育人民委员部则是共和国的，而且这个区别并非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利，而只对它有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几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同时保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机构参与这些高等技术学校的领导工作，那么，我们无论在培养新专家还是从工人中选拔学生的工作中只会得益。

这是否意味着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注定要垮台？当然不是。大部分高等技术学校还继续留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而教育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竞争只会有好处。假如我们不把任何高等技术学校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是否意味着这样做我们就会毁了事业呢？不，没有这个意思。

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在加速培养新专家方面失利了。而速度对于我们来说意义最为重大。

菲加特纳：这些高等技术学校会不会处于特权地位。

斯大林：不，菲加特纳同志，根本不一定是这样。问题并不在于

特权，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把高等技术学校与生产结合起来。

霍多罗夫斯基：我们在这方面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没有争论。

斯大林：不，霍多罗夫斯基同志，这里所说的不是指高等技术学校目前的领导人，而是指要改变和改进对高等技术学校大学生的教学实践。

霍多罗夫斯基：我指的不是那个。

斯大林：有人说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转交几所高等技术学校意味着当前体制的瓦解，当前教学模式的瓦解。这不能令人信服，同志们。不能使模式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我们从未答应要做模式的奴隶，也从未发过誓要对任何一个模式绝对忠诚。例如，众所周知，一年前，当我们面临有关我国工业部门指挥人员的问题时，我们组织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工业学院。这个学院至今还在，而且如了解情况的人士所说，它运作正常。大家知道，那时我们对由哪个人民委员部参与组织工业学院的问题有过争论：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还是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参与。争论的解决是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参与。因此，我们对模式有所“摧毁”，如果你们想这样说的话。我们从中得到好处了吗？我想，我们是获利了。接着你们知道，高等军事学校是掌握在军事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手中。这是好还是坏？了解情况的人说，这非常好，因为这种情况减轻了培养军事管理部门的指挥干部工作的困难。这是否是某种“摧毁”或者是模式的改变？很清楚，是的。同志们，那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由于害怕模式而畏惧改进对工业部门新干部的教学工作吗？

我们有没有任何关于向有关部门或组织转交某些高等专业学校从而得到良好结果的经验？我想，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以党为例。大家知道，党有自己的高等院校。正因为它直接领导自己的高等院校，所以，可以认为我们的党是一个配备最为齐全的组织之一，从县的工作人员一直到州的工作人员。也许为了模式要把这些高等院校交给教

育人民委员部，那会怎么样？或者比如军事部门。众所周知，中等和高等军事院校（总参谋部的学院）集中由军事部门把握。在这些学校里就读的大约有 2.5 万—2.6 万名大学生。那又怎么样？可以肯定地说，军事部门是干部配备最为齐全的部门之一，从连队指挥员一直到军区指挥员。这好吗，同志们？我想是好的。但如果按照模式来进行的话，那这些学校就应该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去管理了。

我知道在培养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之间是有区别的。洛莫夫同志是完全对的，他说军事干部的培养要比经济干部容易些。事情本来就很清楚，正因为经济工作更为复杂，所以必须使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转交某些高等技术学校的事有所进展。这将是有益的和符合逻辑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整个实践中正在转变方向，似乎在培养经济干部方面也应该改变方向。

某些同志害怕事情向好的方面迈出一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种胆怯来自何方，它对于布尔什维克们来说是否体面？我想，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有些人就像是契诃夫笔下的那位动不动就说，“可别出什么事”的主人公。众所周知，不管雨天还是炎热的天气，这位契诃夫的主人公总是带着雨伞、穿着套鞋，这是“为了小心翼翼”。比方说，跳出一只蟑螂,露出了触须，我们的主人公就急忙闪到一边,说：“可别出什么事。”同志们，可我们不能去模仿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我们不能这样去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向前迈一步，即便是能确保培养新专家的工作加速进行的一小步也好。

喊声：重要的一小步。

斯大林：不很重要的一小步，同志们。两年前，我们拖延了这个问题，后来把它官僚主义地推给了一个委员会，它最终艰难地产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下的工业学院。可这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有以沙赫特案件这种形式出现的警告和报警信号。为了向前迈出新的一小步，难道这还不够吗？

古比雪夫：是不是迈出更勇敢一些的一步呢？

斯大林：古比雪夫同志，我反对更勇敢的一步。

古比雪夫：我只主张迈一步，总共8所高等技术学校。

斯大林：让我们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之内，我们瞧瞧，比任何其他人民委员部更关心此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干些什么（笑声）。如果它证明它能做更多的工作，那时就能看清楚了。

喊声：那如果不能呢？

斯大林：3.第三个结论关系到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工业的工作问题。根据沙赫特的材料来看，这方面的情况怎样？非常不好。坏到了极点，同志们。已经证明，劳动法典遭到破坏，每日6小时地下作业的制度得不到履行，劳动保护的条件受到压制。而工人们忍着；工会不说话；党组织不采取措施去消除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党要求每天地下作业7小时的说法使工人们惊愕，但工人们仍在干着活，因为如果党有指示的话，他们准备干得更多。谁需要这种欺骗，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手段？为什么要嘲弄那些有充分理由被称为英雄的工人们，而且不只是工人们？不久前去过顿巴斯的莫洛托夫同志，跑遍了那儿的矿井，并向矿工们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条件。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矿工认为需要对条件去发牢骚。莫洛托夫问他们：“同志们，你们过得怎么样？”矿工们回答他说:“没什么，同志，过得不坏。”莫洛托夫问：“我去莫斯科，告诉我,我应该向中央汇报些什么？ ”矿工们回答他说：“告诉那里的人，我们过得不坏。”莫洛托夫对他们说：“听着，同志们，我可不是外国代表团（全场大笑），我是俄罗斯人，到这儿来是为了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矿工们回答他说：“我们无所谓，莫洛托夫同志，我们对外国人和对我们的人都说真话。”这就是我们的矿工们的面貌。他们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英雄。这正是我们得以积累在工人们心坎里的那种精神资本的财富。只是要想想，我们是在亵渎地、罪恶地滥用这笔无价的精神资本……

喊声：对。

斯大林：十月革命最伟大遗产的继承者是多么愚蠢和毫无用处呀！但是，同志们，总是抱着过去的精神资本不放，轻率地滥用它是不行的。该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早就到时候了。如果说工作 6 小时，那就应该诚实地和认真地去完成。谁不想去完成，就让他尸首分家！如果有工人们的工会，它们有义务捍卫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那就应该做到让这些工会运用相应的权力，让它们不要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工人的国家也是为此而存在的。如果有人说，提拔工人的工作做得不好，那就应该明白，在破坏劳动保护最起码的条件的情况下，这方面的情况不可能好。如果事情发展到了甚至沙赫特区的工人中都有人怀疑：“这是他们（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还是我们的”，那就应该明白，在这种秩序下，我们就将无法吸引广大的工人群众参与工业管理的工作。到时候了，是该结束我国工业部门中这种混乱现象的时候了！

4. 最后，第四个结论是关系到执行情况的检查问题。沙赫特案件表明，在所有的管理领域里，在党、工业和工会领域里，我们这里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状况坏极了。写决议，发指令，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要问问自己：这些决议和指令完成得如何，它们是被执行了还是被压在了书桌上的垫毯下面？伊里奇说过，国家管理事业中的严肃问题之一，是检查执行情况问题。但是恰恰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糟糕极了。领导不光是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意味着要检查指令的执行情况，而且不仅是指令的执行情况，还要检查指令本身，它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认为我们所有的指令都百分之百正确的想法是可笑的。这种情况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同志们。检查执行情况也正是为了使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际经验的熔炉里不仅要检验我们指令的执行情况，而且要检验指令本身的正确性。所以，在这方面的漏洞就意味着我们整个领导工作中存在漏洞。

就拿检查纯粹党的系统的执行情况为例吧。我们通常是召见州委和省委书记到中央作汇报来检查中央指示的执行情况。书记们汇报时承认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中央揭出这些问题并做出公式化的决议，指出要加强和拓宽工作，强调这点和那点，要求重视这点和那点等。（笑声）书记们带着这些决议回到地方上。以后又重新把他们召来，又还是那些加深和拓宽，等等，等等。我不是说整个这项工作没有用处。不，同志们，这件事在培养和振兴组织这个意义上有其好的一面。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检查执行情况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必须承认这种方法应该由其他方法来补充，这就是用派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成员去参加地方工作的方法。

喊声：这是件好事。

斯大林：我说的是把我们的领导同志派到地方去临时工作，不是作为指挥人员，而是作为听从地方组织命令的普通的工作人员。我想这件事有远大的前途，如果诚实地和认真地去履行的话，它能使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得到改善。

乌加洛夫：应该让这些去的同志不住进经理的家里。

斯大林：经理是各种各样的，乌加洛夫同志。不久前，我看了话剧《轨道在轰鸣》，其中描绘的主人公是一位工人出身的党员经理。去看看这个话剧，你们就会知道，工人出身的经理是一个应该竭尽全力给予支持的、饱经忧患的人。

喊声：对！但不是任何人都这样。

斯大林：耐普曼[①]暗中监视着他，任何一个专家都对他吹毛求疵，妻子攻击他，尽管这样，他经受住了这场斗争，他清清白白地通过了这场斗争。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在这样的经理家里住下呢？

那么，同志们，政治局关于派遣我们的领导同志参加临时的地方

① 耐普曼，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

工作的相关决议草案务必要通过。如果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人民委员及其副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工会中央主席团成员，其中还有施瓦尔茨同志……

喊声：首先。

斯大林：如果他们将有组织地到地方上去并在那里开展工作，为了了解工作、研究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短处和长处，那么，请你们相信，这将是最真实的和最有效的一种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这将成为丰富我们尊敬的领导人经验的最好的方法。如果这成为一种制度，而且这务必要形成制度，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在这里签署的法令和我们所发布的指令会比目前的这些要更具有生命力和正确得多。

原载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第一卷第 233—244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四第 17—32 页

关于工业化、集体化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原始记录）

（1928 年 7 月 9 日）

斯大林：同志们，在谈到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具体问题之前，请允许我谈一下有理论意义的和在全会的辩论时在这里出现的几个总的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源泉问题，关于发展我国工业的途径问题，关于形成它的源泉问题。奥新斯基同志和随后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直接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可能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想，滋养着我国工业、让它能够快速发展的那些源泉，基本的和首要的当然是工人的力量，是工人阶级。但是只有一个源泉是不是就足够能让我国的工业迅速发展了呢？这就是问题。通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发生是以极其巨大地和系统地掠夺其他的国家为基础的。

你们知道，英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它从所有的国家榨取民膏，投入附加的资本，最终变成了“世界工厂”。你们知道，德国是靠在 70 年代掠夺了法国把自己的工业向前推进了的。法国现在是靠掠夺德国和从它那里得来的战争赔款来推动自己的工业的。是不是有其他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被历史上奉为神明的道路呢？这就是新的道路，德国的道路，它是靠从美国得到的借债推动自己的工业的。这条路并不是全新的，这样的道路以前也有过。通常，各种不同类型的道路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这样的工业在这个或者那个国家是通过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得到快速发展的。从工业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般性规律来，那就是，

只靠自己的国家工业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一个国家要是抱定了工业化的目标的话，它要么就要有系统地掠夺其他国家，要么就是能够得到非常多的债款，靠这个来发达起来。在我们这里，在沙皇时期，也有过工业化。你们知道，我们的债款也相当不少，你们也知道，在我们这里没有一条铁路不是靠了大笔的债款建设起来的。现在正在建设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全长 1400 俄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你们说不出任何一种情况，在原来的俄罗斯，像这样大型的项目，只是靠国内的资金建设的。你们说不出来。我们建设的第聂伯国家建筑工程是如此大的工程，它需要大得可怕的钱。你们能说出旧的、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有过哪怕是一种情况，像这样庞大的工程只靠国内的力量就建设了吗？你们说不出来。我们不能掠夺别人，我们不想为自己建立一个喂养工业的危险源泉，别人又不借债给我们。剩下的是什么呢？靠国内的力量。这个国内的力量在哪里呢？这就是农民。如果不是向农民收取一部分，相当大的一部分贡赋，——我说的要粗鲁些，为的是更清楚些——我们就没有能力继续快速地推动工业，我们就做不到，就没有可能做到。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看来不懂得这个最简单不过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的发言建立在了这样一点上，那就是农民在商品上支付的过多了，这是对的，我们为农产品给农民支付的并不够，这也是对的。我要回答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奥新斯基同志的是，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不能不这样做。这是把我们的工业推向前进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所以谁要是想现在就把支付不够的部分支付给农民，把价格提高到恢复性的水平上的话，谁要是想同时不从老乡那里为城市的商品收受更多，把价格降下来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话，谁就是在这个阶段上把我国工业化的源泉从我们这里夺走。同志们，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它对于我们有着某些理论上的意义，但它同时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最大程度的

实际问题。这个剪刀差是不是该扯平呢？当然，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所在。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把这个剪刀差削平呢？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们的工业薄弱，它还没有合理化，为了今后的发展，它没有外部源泉。只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源泉太少了，而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如果不想垮掉的话，就应该向前推进，因为没有工业的发展我们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站住脚跟。“剪刀差”我们是应该缩小和消灭的，但是不可能是在今年，也不可能是在两三年之后，因为我们的工业还年轻，还薄弱，还没有合理化。谁要是不想理解这一点，那他就是在反对国家的工业化。正是这一点，奥新斯基同志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并不想搞明白。奥新斯基同志问道：既然事情是这样的，那么，中央的立场和反对派的立场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奥新斯基同志，我要劝你相信，有根本的区别，是根本的区别。他可能会对我的回答感到吃惊。我要说的是：他在形式上是有权吃惊的。的确，为什么是这样呢？反对派本来是超级工业主义者，但却是他们要求在我们这里采用农产品的回复性价格。怎样才能把这两种极端的看法中和起来呢？非常简单。反对派有两个心思，原来就有两个心思，现在剩下来的还是两个心思：一个心思是扭曲的。给我一个超级的工业化！这是愚蠢的，当然也是很怪的。但是，他们这样喊是为了引起关注，“揭发”我们，好像我们是反对我国高速度的工业化的。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和扭曲的心思。另一个心思是实际的心思，那就是要求实行农产品的恢复性价格。为了作为所谓的极左派，反对派需要这种叫喊出来的心思，而作为极右派，它需要的是这种实际的心思。要知道，我们总是在说，反对派是所谓的叫喊的左派和所谓实用的右派的混杂物和乌合之众。

米高扬：是投降派。

斯大林：是投降派，半孟什维克，如果你们想这样说，也可以算是半社会民主党人，而我们总是说，反对派左边叫喊的这一翼是在掩

饰右翼所干的事情。你们是不是愿意，我这里手上有一份整个反对派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党团会议上关于收购问题的声明。他们要求什么呢？是穆拉洛夫代表他们发的言。他是整个反对派派出的人。你们听听看：“粮食收购运动应该不仅是按收购到的粮食数量和年平均价格来评价，而且应该根据这个运动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和农民结合的利益来评价。粮食价格的政策应该符合以下的基本要求：第一，生产者应该为自己的粮食得到生产价格；第二，必须力求让没有什么实力的各类农民得到和富裕类型的农民同样的粮食价格。”

当然了，当一个人想要出卖工业化的话，他一定会拿结合的问题做文章，但这是借口，我们对这一点是很了解的。奥新斯基同志，您的立场和这种立场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对您所提出来的中央的立场和反对派之间有什么差别的问题的回答。没有任何差别。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的是和中农结合的问题以及为什么需要这种结合，我们用它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再一次涉及奥新斯基同志了。照他的说法，城乡之间的结合，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结合是通过纺织、通过满足农民的个人消费这条线进行的。

这对不对呢？这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同志们。当然，通过纺织这条线满足农民的个人需求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是从这一点开始的。我们是从这里开始，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加强结合的。但是说事情就此完结了，说这构成了结合的基础，对于结合来说是足够的基础，这是完全不对的。城乡之间的、工农之间的结合不仅发生在满足对纺织的个人需求上，而且发生在满足农民作为生产者的需求上。你们给他们种子，给他们小型和重型的机器，给他们铁，给他们肥料，把他们作为生产者，给他们贷款。所有这些都是把结合变得牢固的成分，不仅是在纺织方面，而且也包括在钢铁方面，奥新斯基同志把这个方面忘记了。可是这是不能忘记的，这是无论如

何也不能忘记的。如果我们只是在纺织上推行结合，这就意味着是要俄罗斯农民个体小型经济停留在它现在的这种状态。它的生产被抛弃了，小农经济的联合组织的机械化被作为次要的东西抛弃了，于是重心就转移到了只是满足农民个人的需求上来了。这不是能够让我们满意的那种结合。

结合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是让它，让这个结合本身，能够加强工人阶级，给中农带来好处并加强工人阶级；是让它，让这个结合，能够在这个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里保障工人阶级的领导。结合往往是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也能和农民有结合，但是在这个结合里的领导是资产阶级，而在工人和农民的结合中，领导是属于工人的。如果有人建议一种不是用工人阶级当领导的结合，那么这样的结合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结合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把各个阶级固定下来。完全不是这样的。结合的目标是为消灭阶级做准备。我们想和中农结合并不是为把中农作为一个阶级，让它永远存在，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结合是为了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中农。因此，需要结合是为了消灭阶级，不是为了把他们固定下来。谁要是想只在纺织方面推行结合，那他就是要把阶级固定下来。谁要是想在生产上推行结合，那他就是在准备土壤来改造老乡，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和走上消灭阶级。

一般来说怎样才能改造农民，我们逐渐改造中农、消除他们的那些旧的心理和让他们走上新的轨道所要借助的那些手段在什么地方呢？为此需要鼓动和宣传，它们是有意义的，所有这一切之所以需要，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准备土壤。当然，奥新斯基同志是对的——在销售和供应方面，合作社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我们也就没有合作社的基础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农民才发生了向合作社的转变，向合作社这方面的转变，有利于合作社的转变。

但是基本的手段到底是什么呢？是技术。农民的心理是通过新技术而彻底地得到决定性的改造的。

奥新斯基同志引用了列宁的话。他想用列宁把自己装扮起来，这很好。但是在这里把列宁描绘成是一个农民哲学家，拿来列宁的一部分话，不愿意完整地引用他的话，这就不好了，奥新斯基同志。

你可以看看这一段语录，它提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的工人国家应该怎样逐渐地争取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改变农民："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列宁是在什么地方说到这一点的呢？也许是在新经济政策之前？关于这一点，列宁是在一本论证新经济政策的小册子里，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里说的。

如果奥新斯基同志善于引用列宁关于需要进一步发展小农经济的语录的话（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就不能只限于这样的语录，应该是完整地把列宁的话都拿过来。您想要完整地引用列宁的话，那就请完整地引用。我可以再引用另一条语录，说的是不能在搞结合的时候只顾了消费方面而忽略了这件事的生产方面。如果我们不用金属上的结合来补充纺织上的结合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牢固的和扎实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也就不可能逐渐改造农民、让他们和无产阶级接近和把他们转到集体主义的轨道上来。

第三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关于新经济政策，还在讨论共产国际纲领问题的时候……同志们，很抱歉，但是 30 分钟不够用。

喊声：再给些时间。

斯大林：这些一般性的问题我在这里只能简短地涉及了，因为这些问题是在讨论的时候在这里出现的，必须做出回答。

当时我曾经说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不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

后提出来的，而是在它之前，在1918年初，当我们第一次有了可能开始真正进行建设的时候，提出来的。我可以引证1918年初出版的伊里奇著名的小册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那里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建设所需要的那种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政策被称为“新”的，是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有了可能推行它。

布哈林：当时在一定时间内把它忘记了。

斯大林：奥新斯基同志没有表示反对。我不想争论，但是我想引用一个著名决议，那是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列宁的报告做出的决议，白纸黑字写着的是我和布哈林同志所说的，还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奥新斯基：我并没有反对。

斯大林：就算是您没有反对，但是其他的人将会反对。

奥新斯基：我甚至自己说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您也许总还是能允许我引用几句话吧。在1921年末，就是在新经济政策过了一年的时候，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个决议里……

伏罗希洛夫：这是在1920年初。

斯大林：这是在1921年末，12月，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

伏罗希洛夫：对，对！

斯大林：我是这样说的——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那时通过了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和关于共和国工业的决议。是一个著名的决议，我建议同志们读一读。“还在第一次喘息的时候，在1918年春天就准确确定了基本原则的所谓新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力量的严格考虑的基础上的。实行被俄罗斯地主、资产阶级和欧洲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势力对工农政府的配合进攻中断了的这个政策，只是在从军事上消灭了反革命的各种企图之后，到1921年初才有了可能”。我说这一点是针对着这种情况的，如果说，甚至人们

认为……——而我应该承认这一点，就是奥新斯基同志也没有反对，在共产国际内部和在我们党的内部，有一系列人们的想法是，我们只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明白了，必须要在允许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对的。还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前，列宁代表的党就知道这一点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我说这一点还因为反对派对采用新经济政策的评价也是有些不同的。它也只是这样理解的：我们拓宽新经济政策的范围是倒退了，而且还要继续倒退。

布哈林：一直倒退到“国际革命”的到来。

斯大林：倒退到“国际革命”的到来，退到这场革命将会兴起并且拯救我们，让我们不用再后退了。你们知道，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允许在农村采用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做法，你们知道，可以这样说，允许这样做成为了反对派的一系列进攻的借口和原因。我们扩大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背离了列宁，——他们是这样说到这一点的。后退吧，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是要为此负责的。我们要对你们说的是——你们背离了列宁，但是在合适的时机我们要打击你们。反对派就是这样说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评价的。你们看看：“而苏维埃政权最近在农村的措施是什么呢——是允许租赁土地，雇佣劳动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展农村新经济政策的一切。”“但是能在农村不扩展新经济政策吗”——他问道。他说：“不能不扩展。”我要问：这是扩展，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从列宁的立场哪怕是后退了一点点吗？我要说的是，一点也没有背离列宁，新经济政策一点也没有扩展。要知道，扩展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那是要把权利送给富农，恢复耐普曼，无条件地取消市场上现在存在的、将总是作为国家在市场上发挥调节作用的那些限制，等等。我要说的是，早在 1922 年初，在十一大上，列宁就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应该沿着这条路线走，沿着允许租赁土地的路线，沿着雇佣劳动力的路线走。可以援引 1921 年末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著名决定，

那里对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力也是说得明明白白的。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我觉得不好意思的是，这是最近这些天我才在各种著作中发现的。你们看看，关于允许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问题，列宁同志在 1922 年 4 月写给奥新斯基同志的信里就说到了。你们应该记得这一点，这是“致奥新斯基同志的信”，他在第三点里写的是：“在采用雇佣劳动和土地租赁的条件问题上（希望党的代表大会能通过这样的决定），党的代表大会建议这个领域里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要受这两种现象的各种过分的形式约束，只是限于推行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即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研究可以用什么样的具体措施能够更适宜限制上述关系中极端的做法和有害的夸大。”你们瞧，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扩展。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只是按照党的规矩，表述了 1922 年 4 月列宁对我们的指示。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呢？因为现在有些人认为，我们把一切都收缩了，如果我们想要前进的话，现在应该扩展。

现在我有一个人的一份文件，谁都不会怀疑他的诚实，他和我们靠得很近，是甘愿为苏维埃政权牺牲的。他是切尔诺夫，一位来自“别德诺塔”的农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布哈林：看来现在是共产党员了。

斯大林：感觉他还是一个非党人士，但是要比一些共产党员更强，头脑很清楚。

加里宁：对！

斯大林：他赞成中农，反对富农，但是这个人的脑子搞得如此之乱，老是要把一切都扩大了。想要给农村的资产阶级完全松绑，把选举权还给他们。这个文件没有印出来。它是通过高尔基送到我这里来的。他请我和他谈谈，当然我要和他谈谈，但是就是有这样一些想法在一些人的脑子里转，当然，这是一些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有些甚至是党员。难怪在 1 月份，在收购运动的时候，在第一次受到压力的

时候，不得不把一些同志开除出党，因为他们不想着手进行收购。既然你们是工农政权，就该是提高粮价，否则的话，农民就不会缴粮。请允许我引用两个地方，因为我要再说一遍，这些想法在人们的脑子里打转，必须要做出某种澄清。“第一，基本的原因当然是渐进的所得税制度。第二个原因是重新选举的指令改得不对，指示不清楚。”他要求什么呢？“第一是要取消现在这个样子的渐进的所得税制度，取代征收土地税，对牲畜和大型农具略征一些税”。

第二个措施也很重要——“改变选举办法，对有剥削的富农经济该从什么地方算起，要画出另外的标记来”。

第三个措施他没有表述，但是他在文字中指出了我们对农村中的租赁压缩得太厉害了，应该扩大租赁，而且这不是只对富农，而是对全体居民都有好处的。而在出现斗争的时候，他将会在街垒上为苏维埃政权而战，对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

在这方面，在关于新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还想指出一个事实。我指的是在座的一位同志所说的，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联系到粮食收购的阶级斗争好像只是有着最为次要的意义，它，也就是这场阶级斗争，解决不了问题。同志们，我认为这个声明是绝对不正确的，不对的，在我们的全会上提出来是带有侮辱性的。我们对这一点也是说过的，只要我们掌握着政权，只要制高点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一直也都要说到这一点。鼓动和煽动阶级斗争不是我们要干的。当我们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让我们能够采用那些对我们特别有利的阶级斗争形式，不是煽动起阶级斗争来，而是把斗争的成分吸收掉，把它们消除掉。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政策呢？因为我们掌握着政权，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制高点，我们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多余的麻烦。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主要是在经济措施方面，我们从敌人的营垒里把一些分子中立化了，的确是中立化了，而不是煽动起阶级斗争，我们把这些分子中立化了，减缓了斗争的气焰，把我

们敌人中的那些最好斗的分子、那些最起劲的和最不服输的分子化解了，孤立了——用经济斗争的和平方式把敌人的军队拖开、冲散和孤立了，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政策。可能彼得罗夫斯基想要说的是这个，但是要知道，我们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敌人所需要的。我们给出指令来——不要煽动起阶级斗争来，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本来就这样强大了，我们应该用经济的措施来进攻、排斥、削弱对手，中立反对的分子，孤立最起劲的那些人，但是敌人是不听我们的。就拿沙赫特事件来说吧，我们是怎样对待那些组织了阴谋活动反对我们的专家呢？这些专家是些什么人？这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敌人的一部分，我们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是建议合作——这是事实。把专家吸收过来，给他们提供保障，对他们说——为我们工作吧，给你们钱，可以过着像样的生活，反正我们是有力量的，你们该和我们……（听不清楚）。我们对他们是采用了合作的态度，可是他们干了什么呢？他们这些拥护旧制度的人看到了，我们的前进意味着要排斥资本主义成分，削弱旧世界，加强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于是他们投到了外国资本家那里去了，投向了这里的资产阶级，组织了阴谋，要向我们进攻。要知道，这是事实。我们要和他们合作，而他们要和我们打仗。显然，我们在经济方面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我们的敌人，最好斗的分子们的反抗。

不可能想象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前进，我们在前进，在用经济的办法排斥自己的敌人，而他们一直在后退。我们又用经济的办法前进，他们还是一直在后退，然后一看，我们就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反抗。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这种情况从来就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是走向消亡的阶级会不声不响地交出自己的阵地，没有反抗，没有厮杀，也不组织对抗。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在前进，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这种前进都在压迫着、挤压着我们的敌人，他们就要反抗，因此阶级斗争就会尖锐起来。富

农的情况或者粮食收购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在1月的时候，在1月之前，我们是怎样开始粮食收购的呢？就拿去年的8月、9月、10月来说吧——是放任自流的。我们绝对没有采用任何非常措施，任何非常措施都没有。这你们是很清楚的。一个卢布就一个卢布——拿去。价格当然是你不满意的，它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伏罗希洛夫：而且远远不是恢复性价格。

斯大林：但是你去年就是用这个价格卖的粮食，别固执了，现在还这样卖吧。于是他卖了。8月、9月勉强卖了，甚至在10月以前也还算好，在10月里就开始减少了，在11月的时候就更少了，而在10月的时候甚至到了总共只有3900万[普特]。这是我们挤压的阶级，也就是农村的富裕阶级的一定形式的反抗。我们是挤压了，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让他们能敞开地干，没有让他们能回过头来，没有让组织成粮食辛迪加，拿价格做文章，没有让租赁扩展开来。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对他们征收了很高的税，是累计税，这是真的。当然，对这种反抗我们是应该打击的。不这样不行。我们不想发生这样的战斗，但是人家强加给我们了。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这样的，我们前进了，在城市和乡村里，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式发展了，在这种前进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如何和平地进行，它肯定会压迫资本主义分子，压缩他们的规模，它会挤压他们，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有组织地抵抗我们，这样阶级斗争也就越来越尖锐了。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行动，没有一个是不能恰恰完全或者主要地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得到解释的。在做了这样的解释之后，又怎么能说阶级斗争不是起着首要的作用呢？不，它是决定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继续。

喊声：对！

斯大林：斗争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是会改变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我们想让这些形式具有和平竞赛的形式。虽然我们是

这样希望的，但是敌人不想这样，因为这种形式会削弱它，于是它就要反抗，这样，阶级斗争也就会不断增长。情况就是这样的，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能说联系到新经济政策，在粮食收购的条件下，阶级斗争具有次要又次要的意义。不能说，也不能对立起来，说是我们奠定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我们是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的，而我们前进迎面对着的那些人都是在后退，都是处于一种和平生存的状况的，没有任何的波动。我们是在前进，他们是在后退；我们再向前进，他们又在后退，你瞧，于是就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了。不是也不可能是这种情况，即便是我们这里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新经济政策，也不可能是这样的！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对此应该有所准备。应该让工人阶级对此有所准备，不要再让我们遇上粮食收购这方面的意外情况，或者是像沙赫特案件这样的意外情况。

一般性问题中的第四个问题，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对富农的非常措施问题。不能把非常措施看成是什么绝对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些措施“一般来说”是好的，或者“总是”好的，或者它们一般来说是不好的或者总是不好的。从思想上说，不能这样来对待这个最最重要的问题，绝对不能允许这样来对待。

在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采用非常措施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呢？现在大家都承认这不是错误，这是局势强加给我们的。李可夫同志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在 1 月面临的某些坏事中，这是最小的一件了，但总还是坏事，是一种我们不可能回避的手段。你们自己真的也可以评断一下。1 月来了，收购下降了，和去年相比，我们缺了 1.28 亿[普特]的粮食。可以说，通常施加影响的所有措施都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有 1 亿左右的粮食储备，可以让我们再等一等，把持有粮食的人围困起来……

伏罗希洛夫：将来一定需要有储备。而且不把这些粮食给人民委

员部。

斯大林：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储备；或者我们有 1 亿-1.5 亿卢布的外汇储备从国外进口粮食。我不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口粮食是耻辱。我完全能够想象这样的情况，一个种类的粮食，一种作物我们可以进口，而另一种我们可以出口，在平衡表上我们还是有赢利的。

有人喊：对！

斯大林：但是我们没有这些储备。正是因为没有这些储备，我们就不得不采用非常措施了。未必能否定的是，没有这些措施，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非常严重的危机了。

伏罗希洛夫：对！

斯大林：有的时候会是这样的，如果粮食不够了，应该进口，这没有什么耻辱，而如果没有外汇，那该怎么办呢？那就要无论用什么办法也要摆脱出来。人家不把粮食运到市场上来，没有粮食储备，没有外汇储备，剩下的只有一条了——企求非常措施。现在谁也不能说非常措施就是错误的。这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措施，它拯救了……

有人喊：对。

斯大林：〈拯救了〉国家免遭整个国民经济极其严重的危机。

伏罗希洛夫：当然是的。

斯大林：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我们缺了 1.28 亿粮食，这是赤字。我们应该把它补上，到地里泥泞的时候剩下两个半月了，大约是 3 个月的时间。我们应该在这段时间里把丢失的补上。弗鲁姆金同志在他的信里做了计算，如果我们提高了价格，一个月可以收到 6000 万，也就是说，3 个月是 1.8 亿，而我们收到的是 2.75 亿，而且这还是不够。

伏罗希洛夫：也就是说都吃掉了，如果还有的话，也都是全吃掉了。

斯大林：我将会说到，我们是怎样把用了这样的力气收集到的粮食没有理智地和不能允许地分散掉了，我会说到这一点的。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在今后也还要采用非常措施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为的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用采取非常措施了，不仅是在这场收购运动中，而且是永远。我们应该采取所有措施来达到排除必须采用任何的非常措施，至少是在将进行的收购运动中要能做到这一点。一些人说，非常措施一般来说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些措施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的，他们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绝对不对的。也有人说，采用非常措施是一个错误，应该谴责这些措施，这也是不对的。同志们，还有这样的说法，这也是不对的。在这里应该两面出击：既要打击犯了一种极端的人，也要打击犯了另一种极端的人。我要再说一遍的是，我们应该采用一切措施，在未来的粮食收购运动中排除采用任何非常措施的任何必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这里就发誓说，我们什么时候也不会采用它们。不是这个意思。和剥夺富农以及贫农委员会的做法相比，这样说非常措施意味着什么呢？放空炮。列宁甚至对贫农委员会也没有发誓说，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将永远不会采用它们了。相反，他认为可能会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将不得不甚至采用贫农委员会的办法。同志们，这些情况你们可能不清楚，但是有些人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请允许我能让同志们回忆起这一点来。你们知道，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出了一个所谓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决议《关于农村工作》，这是他提交给代表大会批准的。你们知道，列宁狠狠地批评了这封信，把它批得体无完肤。那里有关于贫农委员会的方法问题，是针对富农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不接受这些阶层（即富农和富裕的阶层）和用 1918 年贫农委员会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粗暴的、非经济的镇压的政策是一个极其有害的错误。”也就是说，是富农和富裕农民不能接受的政策；而且他鼓吹说，这是非经济的镇压措施。他

说的是用贫农委员会的办法，说这种政策是不能允许的。列宁对他的回答是：“第二句（反对‘贫农委员会的做法’）是有害的，不正确的，因为，例如战争就会迫使我们采取贫农委员会的做法。关于这一点，应该用全然不同的说法，比如这样说：鉴于发展农业和增加农产品的极端重要性，目前无产阶级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政策主要应该是限制他们的剥削趋向等等。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限制和能够怎样限制这种趋向，应该怎样保护和能够保护贫苦农民，全部实质就在于此。这应该研究，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去研究，泛泛谈论毫无意义。”你们看到了，列宁知道什么是贫农委员会的方法，他甚至也不想坚决放弃这些做法，并没有发誓无论何时都不采用这些做法。我们就更不能事先就发誓永远不采用非常措施，不能采用这些措施了。我们的政策就在于，我要重复的是，让我们工作的环境能够完全排除采用任何非常措施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形势可能会迫使我们的话，我们就要聚在一起，决定一下，是不是没有另外的出路了，而且我们可能要采用某些非常措施。所以，如果是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话，如果是从总体上看待问题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的那些倾向、那些极端的做法，无论是要绝对主张采用还是绝对反对非常措施，都应该抛弃。

在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请允许我谈谈粮食这件事。我想，有一些同志，包括奥新斯基、斯捷茨基同志和克里茨曼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都有一个毛病，把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各种原因都堆到了一起。

我们的困难原因中，有长期的、基本的原因，这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两年就克服的，消除它们需要很多年，也有和行情变化有关的、特殊性的、暂时的原因，我们现在就能消除。把所有这些原因混淆起来，都堆到一起，是不行的。一些同志，包括我提到的那些同志，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困难的意义何在呢？就在于它们在我们的面前把粮食、粮食生产、

总的农业上的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问题，全部提了出来。

总的来说，我们是不是存在粮食问题呢？这里有些人表示怀疑。当然存在。我们不可能像茨冈人那样，每年都是对付着过日子——比如说，缺了 1000 万[普特]，或者多了 2000 万，就凑合着够了。没有出口的粮食，没有军队的粮食，没有防备歉收的储备，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我们是不能这样过日子的。甚至是小农经济，他们的家里总共也只有少得可怜的东西，就是他们也不能没有储备。比方说，我们这一茬的过冬作物在乌克兰没有被毁掉，甚至是在北高加索也没有遭殃。就算是我们勉强可以过关了，难道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吗？当然不是。你们是怎么想的，同志们，要是打起仗来，能够一方面在前线和波兰人打，而同时又在后方和富农打吗？当然不行。李可夫说得对，一旦战争打起来，富农就不是那样子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强制他们拿出粮食来的。他们是要调皮捣蛋的，还有中农，还有贫农，但特别是富农。他们会说：去你们的吧，谁知道战争会拖多久。你们不是想给军队搞到粮食吗——那好，可我们怎么过日子呢？也许会有歉收，会没有保险基金了，我们是不习惯没有保险基金过日子的。而且他们是对的。人家就会这样说了。如果和打仗相比，今天的困难是很小的（粮食上的困难当然是不大的），如果说在今天有这种相对不大的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在政治的地平线上看到的是乌云和国内会发生某些分离的威胁，如果是威胁已经形成的话，那么我就要问了，如果发生战争又会怎样呢。敌人就会把头抬得更高了，就会去找军队、贫农、中农和落后工人的某些阶层了。他们是会去找的——这是肯定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储备了，如果打起仗来，就需要有 5000 万到 6000 万，为的是在最初的 6 个月或者可能是更多一些时间里，在打起仗来的时候，在关于战争的议论传播到全国的这段时间里，在国家看到战争是因为什么开始的，看到有人在进攻我们，看到我们是正确的、不是他们正确的这段时间里，直到这整个浪潮平息下来

（按照公认的道理计算，要能够传播到全国去，需要 3 个月的时间），而关于打仗的传说会产生一大堆的风言风语，而这一切平息下来需要有 6 个月的时间，因为我要重复的是，我们不可能是在战场上和波兰人打，在后方又和富农打。富农不是原来的富农了。他们是不会白给东西的。他们不会再害怕地主把他们的土地夺走了，他们已经忘记这一点了。他们会说这是过去的事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们把这件事忘了吧，来点什么新的东西吧。

伏罗希洛夫：他说的也对。

有人喊：早就该建立储备了。

斯大林：如果我们满足于“不多也不少”地过下去，我们就不会有备战的储备了。

伏罗希洛夫：你听听，米高扬。

米高扬：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

斯大林：将不会有防备歉收的储备了，不会有国内的储备了，而没有这些是很难周转的。我们的粮食今年不能出口了，可能明年也不能出口了，要知道，我们是不能长期这样生活下去的。要知道，我们应该努一把力，让粮食能够列入出口的清单。不这样是不行的，同志们。现在我们大体上要有 3000 万[卢布]用于进口粮食，而我们要节省下这些钱是为了进口拖拉机的。那你们就看看，怎么才能支配得开吧。粮食不能出口了，相反我们不得不进口，外汇的储备非常少，还不得不用在粮食上，而进口它我们就不能进口拖拉机了。这就是不能出口粮食意味着什么。在早先的时候，在资产阶级的条件下，运出的是 5 亿-7 亿。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还是出口了。不能否定的是一点，安德烈耶夫同志，那个时候的商品粮比现在多。我们不能在老的基础上扩大商品粮，但是在新的基础上，在改善农民的物质状况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应该建立起商品粮的储备的，因为如果不出口粮食，就得不到设备，就得不到农业用的机器。这就是四种类型的储备。出

口粮食是为了进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而这是我们所没有的。在说到了这些之后，又怎么能否认，说是没有粮食问题呢？不是的，同志们，它在我们这里是主要的问题，粮食问题在我们这里是基本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了一系列例行任务中的一项基本任务。

基础，基本原因，基础……在转到这上面之前，在评论了粮食战线上的困难之后，在这之后，我想要涉及的是政治性的困难。我刚才说了粮食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我们面前提出了关于总的粮食生产和总的农业方面的一个基本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这里出现了政治性的困难。

这一点，同志们，是不能否认的，同志们，相当多的一部分农民的情绪被破坏了，富农在政治上用这一点赢得了一些东西，这种情绪开始传播到一定阶层的工人那里，甚至是在粮食足够的地区，甚至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为结合制造了某种威胁，——这是不能否认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是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他们应该善于正视危险。但是我不想说这就是分离，这是不对的；说“我们这里有的已经是分离”，就像奥新斯基同志说的，是在做文字游戏。这是不对的。分离如果不是国内战争的话，也是国内战争的前夕，也是国内战争的开始。难道我们这里是这种情况吗？如果我们这里是分离的话，难道农民将会是像这样生活吗？难道在基本的工人地区将会是像现在这样，有那种相对的平静吗？从来就不会是这样的。对结合构成的威胁当然是有的，分离则是什么样的都没有。如果分离有的话，如果农民想要和苏维埃政权斗一下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扩大春播的面积了。当工人对政权严重不满的时候，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他们至少是要罢工的。当农民对政权严重不满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为你们扩大春播面积了。当然，不能像奥新斯基同志那样，把两个东西混淆起来，把春播面积和过冬作物的面积混淆起来，把这一切都推到我们所采取的非常措施身上。这是不对的，同志们。过冬作物的播种面积是去年秋天播下的，

那时非常措施还没有呢。如果你们想要解释清楚，说是非常措施能够影响或者已经影响了播种的增长的话，就应该把春播的面积拿出来，而且只是把它拿出来，因为它是在非常措施采取了之后播下的。当然，像一些同志那样，像克里茨曼同志的文章那样得出结论来，夸大地想象到，好像是非常措施推动了农村，刺激农村扩大了播种面积，这当然也是太做作了。克里茨曼同志没有这样说，但是得到的印象是这样的，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编辑部的评述是正确的。要不就不对头了，但是问题不是这样提出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农民是不是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已经对苏维埃政权丧失了信心，要分离而不要结合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要准备讨伐苏维埃政权了，而且由于这一点，就像克里茨曼所说的那样，农民的经济计划已经没有前途了。这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要再说一遍：当工人想要讨伐政权的时候，他们至少要开始罢工。当农民想要讨伐苏维埃政权，而且是要整个和政权对着干的时候，他们至少要等待，而且至少不会扩大春播的面积。而我们这里得到的是怎样的情况呢？至少他们应该是让播种面积保持不变，至少是该缩小播种面积。可是要知道，在我们这里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拿来的不是奥新斯基提供的那些混乱的数字，那些没有用处的材料，而是我们所有的那些实际的材料，如果拿来的是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西伯利亚，可能还有乌拉尔的材料，那么到处……——我不说北高加索了，那里有复种，会把整个情况都搞乱的；我也不去说乌克兰了，那里也有复种的情况，而且规模更大，我说的是5个地区的情况，而且其中有4个是主要的产粮区。

斯克雷普尼克：为什么不拿复种的材料？这也是能表现出农民的积极性来的。

斯大林：春播的面积扩大了，这是事实。清楚的是，如果农民怀疑，准备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话，如果他们已经恼火到了要分离的程

度，如果他们感觉到已经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局面，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的话，这样的农民如果有要分离的想法，他们是不会扩大自己的春播和过冬的面积的，这就是不正常了。这是一个证据，说明不可能谈上什么分离，需要说的有分离的威胁，这种威胁已经存在了，我们应该把它排除掉。这就是粮食上的经济困难。

这些困难的基础是什么？这些困难越来越大的基础是什么呢？决议里说了，我不做任何补充了。基本的一点是农业越来越更加分散和零散。这是事实，农业变得越来越零碎了。如果说我们在革命前有大约 1500 万-1600 万农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有的是 2400 万-2500 万了，这就意味着，农民经济越来越小型化，所以它变得不能赢利了。经济单位越小，它的盈利就越小，它的商品率就越小，而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商品粮。播种面积几乎还是那样，大体上比战前的标准低了 5%。粮食生产几乎也还是那样。如果说粮食的话，那就是要比战前落后大约 5%、6%，而商品粮的数量几乎要落后 50%-60%，因为小农经济盈利少，商品率低，和 50 亿的粮食相比，生产出来的几乎少了 3 亿，而提供的商品粮要比在资产阶级经济时期少一半。我们有大约 6.3 亿-6.5 亿普特，大约 7 亿普特的商品粮，这太少了；从农村的周转中抽出来的粮食要比沙皇时期少一半。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受的基本困难。

如果说到长期的原因而不是行情造成的原因的话，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何在呢？关于行情造成的原因，我在下面要谈到。如果不是指出这样的原因，而是向自己提出消灭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的话，那就像决议所说的，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应该是提高中小个体经济。当然，说个体农民经济已经耗尽了自己发展的所有条件，这是可笑的。这是不对的。条件有很多。这当然是不对的。可以采用改良的种子，可以采用农具，还有肥料，总的来说，可以有上万种条件能够把农民经济的收成提高一倍。这是事实。我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我们没有像样

地利用这些条件，关注得太少了。

有人喊：我们不善于这样做。

斯大林：部分原因也在于我们不善于这样做。卡尔平斯基同志证明说，农民经济已经耗尽了发展的所有条件，这是绝对愚蠢的。

我不能同意的，不仅是有些人对小农经济的条件估计不足，而且也不能同意有些人过高地估计这些条件。还是应该注意到，中小农民经济发展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而且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说，要是我们真正严肃地想要把原料经济以及整个农业向前推进的话，在我们这里，把小农经济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的问题就是最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抓住的和必须要贯彻的第一个出路，就是进一步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提高它的收成，供应肥料，供应机器和良种，等等。

有一种手段，借助于它可以更轻松地提高这种小农经济。这就是合作化。非常奇怪的是，有些同志最近在不懂得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是什么的情况下，开始批判性地评价这个计划。不久前，布哈林给我看了从列宁格勒的《红色报》上摘录下来的一段话，说是以前我们是在生活和供应上用合作化的办法把农民联合起来的，而且是用这样的办法把这种经济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形式上来，集体化的形式上来的。

现在看来，这是不对的。这是愚蠢的，怎么能允许这样做呢？我搞不明白。要知道，如果我们这里没有那种在最近这些时间建立的那种合作社团体，如果我们没有把个别的农民经济收拢到共同生活和供应的组织里的话，那我们这里就没有任何集体农庄运动了。既然在我们这里可以说是已经为农民转向集体农庄，转向协作组织的经济单位创造了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的话，那么，这就是说，在生活和供应上的合作社组织正在我们这里得到发展，并且将要继续发展，把小农经济逐渐转向集体经济的轨道会变得更容易了。这也就是第一个出路。

第二个出路就是决议所指出的，逐渐地把小农经济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这里指的是这种集体化的所有形式，从最简单的机器上的、土地耕作上的协作组织，劳动组合等等开始，直到集体农庄，公社。

我不能不指出的是，当一些同志说到例行任务是发展集体农庄的时候，一些人，远不是所有的人，通常是背朝着小农经济的，说是现在我们有的是新的任务——集体农庄，而小农经济是枷锁，应该尽量快地摆脱它。当我听到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米柳亭同志说的话时，感到很吃惊。米柳亭同志威胁说，“如果你们想要给小农经济恢复名誉，那没有你们的好”。这是很怪的。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走得更远了，说是小农经济是我们该诅咒的东西。我不明白。如果是该诅咒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和它们联盟呢？这怎么能放在一起呢，原来我们是和这种该诅咒的东西，和小农经济搞联盟，而且已经有 10 年了，已经是第 11 个年头了，而且我们有根据在今后还要维系这个联盟。怎么会是这样，哪里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一个列宁主义者怎么会是这样看待小农经济呢？我们并不是要努力把它从自己身边推开，我们并不是要竭力摆脱它，就像要摆脱枷锁，要摆脱该诅咒的东西一样。我们要有它并不是为了给它恢复名誉，因为它并不需要恢复名誉，而是相反，我们是要把它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难道您，米柳亭同志或者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了要发展合作社，就将提出一个口号，或者即便不是口号，那就是指示，或者哪怕是一种暗示，说是小农经济对于我们是枷锁，是该诅咒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最后要垮掉的东西，不值得我们去给它恢复名誉，也不能由我们给它恢复名誉吗？而我所担心的是，在你们能够勉强让合作社站立起来之前，你们就已经把我们和农民有的那个联盟破坏掉了。

喊声：对，对！

斯大林：我们和小农经济是有着联盟的，你们却在灌输这样一种

鄙视和轻视它的情绪，那你们将立足于什么呢？那么，这个联盟还有什么用呢？这根本就不是在帮助合作社经济，完全不是。我们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说：我们要通过为集体农庄提供基础的合作化来解决第一项任务。我们希望的是，让农民不是把集体农庄看成自己的敌人，看成要把他们搞得忍无可忍的东西，而是要让他们把集体农庄看成是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朋友。

米柳亭：对。

斯大林：如果这是对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为小农经济“恢复名誉”和把它说成是我们的经济中该诅咒的东西。应该说的是，和大型的合作经济相比，小农经济是没有多大好处的，不大能赢利的或者甚至是最没有好处的，——但是总还是有一定好处的，而且该说的是，为什么应该逐渐把小农经济转移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列宁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你们看看，他是怎样从我们今后的发展的角度评价小农经济的。如果农民经济能够继续发展，那么还应当为进一步的转变提供可靠的保证，而进一步转变就必然是使效益最差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单干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有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看待这种评价的，我们的党也正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米柳亭：我并不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按您的说法就是，它，小农经济，不仅不是有利的，而且是有害的。按您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否则它就不需要恢复名誉了。按列宁的说法，它是最少有利的，——但还总是有一些利的，——比起大型的合作社经济来说，当然是很少有利的。接着列宁说到了个体农民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应该确立的相互关系。他接着是这样说的：既然提出了合作社的任务应该是什么，那么合作社是应该和小农经济斗争，还是应该把它们拉过来呢——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既然你们面临的是两种形式的经济，如果是一种在和另一种斗争，这样就是一

种关系，而另一种关系是两种经济形式，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一种是在帮助另一种提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列宁接着说：“特别应当做到切实执行并彻底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这个法律要求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一切类似的联合组织对周围的中农给予迅速的和全面的帮助。只有给予这种实际帮助，才能实现和中农的妥协。只有这样才可以而且应该得到它的信任。”

这里没有说到恢复名誉或者说这种经济是我们该诅咒的。这里说的是一种经济盈利少，另一种盈利多，更有利的经济应该帮助不大有利的经济提高，而不是把它从自己身边推开，应该把它作为个体经济，给它帮助。就说集体农庄吧，它的周围是农民，其中也包括中农。一件事是帮助小农经济活下去，另一件事就是要把它作为小农经济，给它帮助，让个体农民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这种天长日久的组织上的帮助下，比较容易地，不用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加入到集体农庄里来。

米柳亭：我没有否认这一点……（这句话的末尾没有听清楚）

斯大林：第一段语录说到小农经济是最落后的，盈利最少的，应该逐渐地把它们联合起来。这段语录我是从列宁《论粮食税》的小册子里引来的，它论证了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在《论粮食税》这个小册子里，恰恰首先说到的是关于个体的小农经济，而且他也没有忘记提到集体农庄。

第二条语录我是从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摘下来的，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这里制定出了我们和中农结成牢固联盟的政策的基本原则。

还有第三条语录，是从集体农庄运动的观点解释我国发展的前景的。“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还没有集体化的农民

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这次讲话他也是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同志们，这就是方针：千方百计地发展作为个体经济的农业经济，利用所有的条件，而它们是很多的，在农业的发展中，这是一项基本的，这是现在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因为正像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说的，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小农经济依然是农业的基础——这一点是不该忘记的。像奥新斯基同志或者另外的什么人那样的人，对这一点的估计不足，他们是反对我们的政策的。那些过高估计和看不到除了小农经济外还需要建立大型的集体经济的人们，他们也是反对我们的政策的。我们既不需要指责个体农民经济的人，也不需要为这种经济唱赞歌的人，这两种人都应该刮他们的鼻子。而且从这方面说，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有一系列同志在这里发言，说到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说到对它支持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到集体农庄，就好像根本不存在这项任务一样。我把奥新斯基同志的讲话看了三遍，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到，在我们面前，除了提高个体农民经济外，有另外一项任务——这就是发展集体农庄。一句话都没有说到这一点。斯捷茨基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布尔什维克，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忘记了这件事，讲了话，也咬了什么人，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除了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发展集体经济。照我的看法，对这样和那样的人，都应该当场就向他们指出，除了农民经济这项任务外，还有一项任务是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关于国营农场我就不说了。发展国营农场的任务——这是一项无可争议的任务，加里宁同志会说到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说了。这就是 3 项任务。

从农业角度看，当前时刻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提高个体农民经济是一项老的任务，现在它也是一项新的任务，但对我们来说，完成这项任务已经不够了。在这个任务之上，还要加上两个实际任务，

提高所有形式的集体农庄和提高国营农场，包括老的也包括新的国营农场的任务。谁要是不理解这一点，谁要是想，总的对于农业来说，特别是对于粮食经济来说，用这样的一项任务，也就是说用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就能把我们的任务全部说清楚了的话，那他就是对我国现在的局势一窍不通。应该是把所有这三项任务都看成是例行的任务，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解决农业问题的话，如果我们想要这样来安排我们的事情，让我们有对内和对外的需求的储备的话，在这三个方面都要有所前进。我说的是粮食的储备。

有意思的是，列宁同志是怎样看待这三项任务的结合问题的呢。你们可能读过列宁同志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命令——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列宁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文件说到了，请全会注意的政治局决议是和列宁在这个文件中勾画的发展农业的实际计划完全吻合的。我指的是列宁亲手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

米高扬：1921 年 8 月。

斯大林：他是在 1921 年 5 月颁发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命令。

布哈林：还有经济会议。

斯大林：在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之后，他给出了纯粹实用性的、没有废话的、实实在在的指令，说到了怎样在实践上扭转我国的经济政策，沿着新经济政策轨道前进。列宁把这个命令里的任务分成了三类任务和三类问题。第一类涉及的是总的商品流通和工业的问题，包括了除国家工业外的其他所有类型的工业的所有相互关系。第二类涉及的是提高农业。第三类是组织掌握市场的制高点所绝对必要的经济会议和各种这样的经济领导调节机关。我来说一说第二组问题——是这样说的。发展农业。就是这样说的——第二组问题——发展农业：(1)农民经济；（2)国营农场；（3)公社；（4)劳动组合；（5)协作社；（6)其他形式的公有经济。还是在 1921 年，在 7 年以前的时候，

当我们这里可以说还是手里拿着蜡烛一台台地寻找拖拉机的时候，当我们这里的集体农庄还少得可怜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领袖，一个真正的领袖，是怎样评价我们的实际任务的呢？他没有把两个任务对立起来，他没有把任务的一个部分和另一个部分扯开，他是从总体上看的，于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发展农业——发展农业，那就发展农民经济，发展国营农场、公社、劳动组合和其他类型的协作耕种土地的组织。在我们这里，决议所作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决议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我们要在三个方面前进，在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方面，在发展国营农场方面，在发展集体农庄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生产方面。

非常有意思的是，列宁这个能够搬动大山，让它们彼此相撞的巨人，怎么能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迎接关于建立每一个并不起眼的集体农庄或者从美国发来了几台拖拉机的每一个小消息的。这就是 27 日（听不清楚）……的一封信，我来读读。《致苏俄技术援助协会》。亲爱的同志们……（读）

雅罗斯拉夫斯基：可惜没有帮上他们。

斯大林：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他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在看待我国农业未来的组织，他对从不大有利的和落后得可怕的个体经济这样一种生存的基础向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过渡理解到了什么程度，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像这里的某些人引用他的话时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农民哲学家。

现在请允许我转到那些暂时的、市场行情上的困难上来，对这一点说上两句，因为这里有许多要说的，我就要结束自己的话了，拖得太长了。

决议里说了，产生我们的粮食困难危机的暂时原因、特殊原因有 4 个。在这里列举的是：市场平衡受到破坏，价格的对应关系，计划领导的错误，收购机构和党的机构的缺点以及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利用了所有这些结论。

我想就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意见说几句。我要说的是第一点，关于破坏市场平衡和关于农村中富裕的富农阶层以及总的来说农村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提出了过多的需求，我们没有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且在这种差距的基础上造成了困难。他不想相信这一点，于是说："怎么是这样呢？一方面你们那里说农业是最落后的，另一方面它又积累了，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工业不能满足它。"我想，这里没有任何矛盾。我们那里说的是农业的落后，是它和工业相比非常落后，而这里说它前进了，不是和工业相比，而是和前些年相比。这也是正确的。这是事实，和前些年相比，农村成长了，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否则的话，干什么要提高税收，干什么要一个劲地大搞捐献呢？农村是积累了钱。这是当然的。这些年它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而且特别是它的富裕的富农成分提高了这种收入。这是事实，这里说的是农村今天的收入和它以前的状况的比较，和它过去的收入的比较，而那里说的是农业、它的速度和工业速度的比较，——这里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是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的。所以决议是正确的。

我想，在这里开列的造成今天收购危机的特殊原因里，在这个清单里，还缺一条：应该在这5条原因里再加上一条，那就是我们错误地消耗了粮食。

有人喊：一定要加上。

斯大林：不要把矛头指向商业人民委员部，在这一点上不只是它一家有过错，我们大家都有错。（笑声）

伏罗希洛夫：当然是大家都有错，但首先有过错的是商业人民委员部，因为它是管这件事的。（笑声）

斯大林：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有错。在3个月里收到了2.75亿普特，但是显然我们看花了眼。

有人喊：收了很多！

斯大林：那就分配吧。不是像一个真正精打细算的主人，知道除

了好日子外还有不好过的日子，不是一点点地分配，我们开始把粮食都分散了，给了一个区，又给了另外的一个区。为什么在3月份就该是把5500万都分出去供应了呢？难道是为了在5月或者6月只能分配2300万吗？你们看看，是怎样的差距呀，有那么一个月，我们是从大家的锅里拿出5500万来供应分配给消费者的，可是到了紧的时候，就变成2300万了。为什么不能在那个时候，在3月份的时候，和现在，在6月份的时候，都拿出3500万来呢，那我们就能省下1500万了，而这样做是有很大意义的。照我的看法，这一点应该写到决议里去。

关于需要采取措施排除必须采用非常措施的任何可能，——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在这里更多地展开说了。我只想说说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们这里指出的、我也想强调的3个事实。

第一，我们的粮食收购运动的缺点之一，无论是在第一个时期，在1月到4月这段时间，还是在后半段时间，在5月和6月的时候，是我们的党组织手伸得太长了，把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完全取代了。

有人喊：不这样就什么也做不成。

斯大林：我懂得这一点，说这些不是为了要责怪谁。是由于什么原因，把党的组织这样推到了前面呢？你们都知道，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没有能动起来，应该把它们动员起来，应该监督、领导和帮助它们。

有人喊：指令是相当吓人的。

斯大林：指令是很吓人的，因为大家都是火急火燎的，但是我们总还是应该避免发生这段时期在我们这里发生的那些事，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避免让党的组织取代合作社和苏维埃组织。

有人喊：对。

斯大林：要让农民不是一定要找区委书记来告状，而不是去找执

委会主席，去找收购单位，去找一个什么合作社的主席告状——农民不认他们，他们就是要找区委书记。这样是不行的。非常的局势，非常的措施，然后就是局势恶化，出现一系列的扭曲——所有这些造成了这样的气氛，当然就需要有人来有力地把事情推动起来。党的工作者们便出头了。照我的看法，不该再这样下去了，应该采取措施，不要让党的组织这样出头，让它们替代了苏维埃组织、合作社组织以及其他的组织。不能允许这样，否则苏维埃组织、合作社组织和其他组织将不能得到发展，将不能强壮起来，它们的威信将会降低，而且党将会在这上面栽跟头。需要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的政权形式就是为了有一个可以向老百姓交待的外壳。党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党员和围绕着它的、党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也就是说100万的党员和党的周围的200万积极分子——党是要和他们打交道的。而我们打交道的不仅是这些人，而是所有的老百姓，而我们有1.5亿的老百姓。谁能和他们打交道呢？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党应该是在内部领导、帮助，但不是取代。见鬼了，我们为夺取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的形式进行了斗争，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我们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是在争取得到它的，为的是建立能够从内部进行领导的管理形式的。如果我们将在老百姓那里把它们消灭了，自己伸头太多，取代它们，那我们就会断送事业的。这就是我想要指出的。我明白，当时是需要的，是由于需要才不得不这样做的，但是总还是应该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要避免出现这种扭曲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谷物加工费问题。我想，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有10亿多普特的粮食是农民在磨坊里磨了之后供个人用的。这些粮食有一部分是用风磨加工的，有一半是在我们国家和合作社的磨坊里加工的。而且所有的人——农民，贫农、富农和中农，都承认，应该为此支付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大体上是这样的。结果是多

少呢？

有人喊：一普特交3俄磅。

斯大林：一普特支付3俄镑，而有的地方是4-5俄镑粮食。按照懂行的人的计算，合作社的和国家的磨坊大约可以拿到完全有保障的、完全没有问题的5000万普特的粮食。

米高扬：对！

斯大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些粮食没有受到监控。我的感觉是，商业人民委员部有一个决定，我知道得不准确，说的是把这些粮食的一部分交给贫农基金，而另一部分用做……收购。至于这些粮食是不是一点点地用在了私人的市场上去了，没有任何监督和任何把握。要知道，往往是这样的（请合作社的人员不要见怪），有一定数量没有控制的粮食是放到了私人市场上去了，因为合作社想要把平衡表扯平，给这部分粮食支付的钱要多出一倍，这样的诱惑是非常大的。能不能把这些粮食控制起来呢？既然数量达到了不少于5000万普特，这可是我们有保障的和完全无可争议的粮食呀。

米高扬：可以而且应该。

有人喊：现在就干起来。

斯大林：这个问题应该从实际上得到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梅德韦杰夫同志在这里提出来的，是关于社会商店的问题。好像您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吧？这一点不可能写到决议里去，但是显然这个问题将对我们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既然我们在1月、2月、3月已经把贫农动员起来了，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了——这是事实，这是大家都明白的。我们在1月、2月和3月已经把夺来的粮食的一部分给了贫农，他们的情绪是好的，在这里，就情绪而言，情况是越来越好些了，而且只是在4月、5月和6月被搞坏了，只是因为没有可能给贫农挪出更多的800万-1000万普特粮食作为消费基金。那么，该怎样安排，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在新的收购之前，在收成打

下来之前，能够让贫农有一定数量的储备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商店当然是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的。

有人喊：那里也有中农参加。

斯大林：实际上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说完了，同志们。关于主要的困难已经说了，关于特殊的困难也说了，所有这些困难的意义就在于，它们迫使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最终要注意到农业了。遗憾的是，历史总是这样教训我们的。只有经历了困难我们才学会了纠正局势。只是由于在东部战线上，当高尔察克少许触动了我们一下的时候，我们才得以建立了步兵。只是通过在南部战线上和邓尼金的斗争，我们才明白了必须要建立炮兵。只是在遇到了与沙赫特案件有关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明白，不培养自己的工人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不培养来自工人阶级的人们的新知识分子，能够自己推动事业的技术方面前进的技术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行，我们没有他们就会完蛋。现在是新的困难，粮食上的困难，只是到了现在，布尔什维克才严肃地抓起了农业。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搞的是工业和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社，只是议论了农业，只是泛泛地随意抓了一些事。应该利用这些困难来严肃地、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抓农业和粮食经济这件事，采取一切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消除我们困难的那些特殊原因和向前迈进。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558 号全宗 11 号目录 1032 号案卷
第 115—178 张。原件。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四第 33—65 页

发展农业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撑点

——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原始记录）

（1928 年 7 月 11 日）

斯大林：同志们！我今天本不想讲话。但奥新斯基同志和其他同志让我不能不讲了。我总共用 10—15 分钟，不会多。

我们昨天争论的是什么？说到的是城乡之间存在剪刀差，农民购买商品时多付钱，而在出售农产品时少收钱。这里讲的是，为了工业，为了更快地前进，必须要有两个基本条件——用自己的脊梁支撑着工业的工人和支持这个工业的农民。这里所说的是，农民购买商品时多付的钱和在出售农产品时少收的钱，它们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对农民的附加税，而且我把这叫做某种贡赋。某些人不喜欢这种说法，其中也有奥新斯基同志。当然这是各人的口味。但是应该给各种东西一个正名——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在自己党的中央全会上，不是在农民大会上，应当照直讲出实情。这有些呛鼻子——贡赋，附加税。

就算这是呛鼻子的字眼。我们就应该是更多地和更快地努力结束这种贡赋，发展工业，把它变得合理，把商品的价格降下来，这样来把“剪刀差”消除。说的就是这个。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走，越是到后来就应该越是更多地这样做。需要多少年才能消除“剪刀差”，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在今年还是在明年，也无论是在今后的年份里，如果我们不想把我们的工业搞垮的话，我们做不到消除“剪刀差”。这里说的是这个。奥新斯基同志非要在最近就消灭剪刀差。我与其他同志一起，把这称做是农产品的恢复性价格理论。今天奥新斯基同志承认说，他反对恢复性价格。这

很好。也许奥新斯基同志丢掉了他所犯的片面性。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这样的：批评没有白费。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我和其他人一起，特别是我，强调的是，我们党最著名的活动家奥新斯基同志在这里的发言中大谈特谈了发展农业的途径问题，谈了应该按照什么渠道快速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经济，却只字未提诸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是不能允许的。他说到了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决议承认个体经济长时间内仍将是农业的基础。发展和提高它是一项主要的任务，虽然光这样是不够的。奥新斯基同志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整个发言都用在这个问题上，而完全不提我们所面临的全新任务，不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呢？我说了，奥新斯基同志对这件事保持了沉默。奥新斯基同志今天声明说，他以前就支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和将来仍然支持。这很好。

奥新斯基：如果给我两个小时，我会把这件事说得更加详细。

斯大林：很好。可能又是批评没有白费。

第三个问题是衔接工业的问题。在这里，奥新斯基同志犯的还是原先的错误。他今天和以前一样，只认为纺织工业是衔接工业。

奥新斯基：只有纺织工业……不是这么回事。

斯大林：显然，您发言的时候连自己讲的话都没有听。

奥新斯基：请允许我现在就读速记记录。

斯大林：有人当场就喊了，而且丘巴尔在自己的发言里纠正了您，说是不只是纺织工业代表了衔接工业，还有冶金业以及整个重工业。如果奥新斯基同志没有听自己在说什么并且承认说，衔接不仅是在消费品上，而且也还有给农业的商品的话，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分歧了。这很好。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谈国营农场问题。有一些意见，又是关于奥新斯基同志的一系列申明的。当然，说在美国没有大型粮食经济的样

板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奥新斯基同志不可能不知道图拉伊科夫的著名著作，他不久前去了美国，转述了自己的印象。奥新斯基同志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那里描写了几个粮食类型的大型农业经济单位中的一个，这是一个还在生存并发展着的单位。可以就这方面的情况读上几段话。

“蒙大拿州的小麦农场属于肯博尔农业公司……”

奥新斯基：我说的就是这个。

斯大林：您是这么唾弃了这个公司，简直就没有剩下什么可以从这个公司拿来例子效仿的了。

“它的面积是 32000 俄亩。农场位于……（读）它的总收入是 50 万美元”。

这样的大型农场在美国的北部有，在南部也有。它们生存着，但是他们在那里生存得比较差：对于这样大型的粮食经营单位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良好的成分要比我们这里少。我的意见涉及的问题是，奥新斯基有些脱离开了一点，那就是对于大型经营单位来说，我们的环境，苏联的环境，和资本主义环境的差别。就拿这一点来说吧，那里有的是绝对的私有制，在那里，土地是应该买来的，而在我们这里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土地是国家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再说了，那里对土地是要上很高的税的，而我们可以向自己的大型经营单位提供优惠，当然是优惠的地租，总的来说，可以列举出一系列因素，通过它们可以揭示出苏维埃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基本差别来，这种差别不是不利于，而是有利于大型粮食经营单位的。

现在来总的说一说国营农场。我不是仅仅从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看待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而且首先是从加强结合的角度，从在农村里为加强结合建立经济支撑点的角度看待它们的。同志们没有从这方面看待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自己有权从这个方面说上几句。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社联合会通知说，

它同集体农庄、劳动组合和合作社签订了今年耕种土地的合同，可以得到2亿-2.5亿普特粮食。资料说，我们的国营农场，老的和新的，在今年可以提供不少于2亿普特粮食。

安采洛维奇：要多一些。

斯大林：安采洛维奇同志说，要多一些。而我用的是比较少的数字。这就是4000万普特的粮食了。这是非常好的储备。如果我们在去年的收购运动中能有这样的支撑基础或者这样的储备来等待时机，压价，保持价格和平息市场上的发热状况的话，可能我们就不必使用非常措施了。很可能是这样的。

柯秀尔：至少用不着再动用这些措施。

斯大林：我们的粮食经济的支撑点是和农业合作社有合同的各种类型的集体农庄，乃至机器联合组织；还有国营农场，包括老的和新的；然后是合作化的、用预约合同联系在一起的、和我们和合作社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农民，而在今年，你们要记住，我们是有4000万普特的合同的。如果我们能够争取到，如果我们通过这三条渠道能够得到一些储备，可能不是很丰厚的储备，大体上有8000万到1亿的话，那我们也就不需要用任何非常措施去触动中农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支撑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竭尽全力和千方百计地推动这些支撑点前进了。我们并不像昨天托姆斯基同志所说的那样，在维护结合的事业中是那么无助的。听着托姆斯基同志所说的话，我得出的印象是，见鬼了，难道我们的处境就那么无助吗？难道我们在维护结合的问题上就那么束手无策吗？原来我们剩下的就只有一种维护的储备手段了——让步。今天让步，明天让步，后天还是让步。照他的说法，这样可以加强我们。我非常怀疑，在农民施加了压力之后，在富农组织施加了压力之后，就不断地对他们让步，就不断地对中农让步，以便他们能大大加强苏维埃政权，——对这一点我是非常怀疑的。

有人喊：正确。

斯大林：不，我们所具有的储备办法，不仅是为保持结合而做出的让步，而且还有组织起经济的支撑点，那就是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合作社，还有就是在农村建立起能够提供政治支撑的政治储备。什么是政治的支撑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两句。如果除了让步的储备外，我们在农村不加上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各种签订预定合同形式的合作制这样的、不断发展的储备的话，如果是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了像是在贫农中间开展工作（这项工作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牢固的支撑）这样储备的话，如果在农村没有这些牢固的支撑点的话，——我们的处境就的确是没有指望了。我们就只有退让了，但是这些退让是不可能有止境的。难道我们能在所有方面都退让吗？今天退，明天再退，后天还要退，而如果要求我们开放不要有国家的调节性影响的自由市场，如果要求我们组织农民联盟，——要知道有人已经在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如果是要求我们取消关税壁垒、对外贸易的垄断和为商品的最低价格开辟道路（而这样的价格顷刻之间就会扭断我们工业的脖子的），那我们是让步还是不让步呢？而如果是所有人都要求这一点，如果是已经没有指望了，苏维埃政权是不是就完全无望了呢？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有的不仅是像集体农庄这样的支撑点——我们要发展它们，不仅是以国营农场的形式发展它们——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发展它们，不仅是用农业合作制预约合同的办法——我们要想方设法把它们扩展开来，而且我们还有对中农施加政治影响的支撑点——这就是加强在贫农中间的工作。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除了我们这里说到的那些修改之外，完全有必要在关于收购的决议里再加上一条展开的修正，说到关于在贫农中间的工作。

喊声：正确！

彼得罗夫斯基：只是这样做需要钱。

斯大林：对，关于钱我现在就要说到。你们自己瞧瞧，2月、3月

——收购搞得热火朝天，收来的粮食有一部分给了贫农。贫农转向了我们。这是大家都认的，大家都这样说。贫农是支柱——农村感觉到了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农的表现又怎样呢？是反对富农的，不赞成富农。5月和6月，收购降下来了，我们没有了储备，没有什么可以给贫农了。他们是不是需要很多才能拖到新的收成下来呢，在6月、7月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给最需要的贫农很多呢？最多是1000万、1200万、1500万[卢布]。而如果像托姆斯基说的，提高40%的话，1500万又算得了什么呢……

托姆斯基：我没有建议，我说的是“大体上”。

斯大林：如果大体上提高40%，这就是大约3亿-2.8亿了。从哪里能拿到它们呢？你们计算一下：要么我们是用一切办法建立贮备基金，用一切力量为贫农得到大约1200万粮食，为的是在新的收获年份开始的时候，能够有一点东西给他们补充一下，要知道他们是不会平白无故地要求的，贫农想要的是比较便宜地得到粮食，——这就需要我们花费3000万左右，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给出这些来——3000万卢布，——那我们就得每年给中农1.4亿。事情就会变成这样了。

同志们，我在结束的时候要说的是，我们的事情不是像一些同志的发言所表现出来的那么糟糕。我们有储备来保持和中农的联盟，但是这些储备不仅仅就是退让，它们还在于要全面展开农村中的经济秩序的支撑点，要有储备和保持物价水平，要等待。它们在于要建立起政治秩序的支撑点，为的是加强在贫农中的工作，从而迫使中农向我们这边摇摆。中农是一个摇摆的阶级。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像此前那样，凭着一时的印象进行，而是天天都是在系统地进行的话，那么，贫农就将会是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牢固支柱。而且工作不仅应该是宣传鼓动——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而且应该表现在物质方面。请你们相信，中农将会倒向我们这一边，而富农的日子将会不好过的。中农是听信力量的。谁要是胆小怕事，他就不可能把中农拉到自己这

边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营农场，不光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它们能够建立起支撑点来，依靠着这些支撑点，我们就能够让中农倒向我们这一边。这样就可以在没有重大的原则性让步的情况下保持结合。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中农要求我们组织农民联盟。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们是怎样把这种打击挡回去的呢？是通过加强贫农的工作，通过贫农向中农群众进行劝说，说是这样是不行的，这是富农的诡计。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们的工作体系中的这种劝说的成分几乎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被排除掉了。在这方面，过错可能在于各种非常状态吧？同志们，应该把贫农工作中的这种说服的成分再拿起来，要知道，有的时候中农会说：你们的调节见鬼去吧，把自由的市场打开吧。中农一直都是会围绕着这个问题动摇的。你们开放自由的市场看看。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投机商给出的是 1.5 卢布，我们就该是给出 1.6 卢布，如果投机商给出的是 2 个卢布，你就该给出 2.1 卢布，就像是人们实践工作中所说的那样——该啐口唾沫把这个投机商淹死。如果是这样下去，同志们，如果是这样办事的话，如果在这里拱手托出的话——这就意味着要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出去，因为那样就得把工资提高两倍；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工业商品的价格，把一切都来个底朝天。我们怎样把这一切挡回去呢？要通过加强对贫农的工作，用这样的办法把中农拉到我们这边来。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我们才能说服他们。应该让他们能够有所准备，让他们知道，采取这样的措施——取消国家机关的所有调节职能，建立自由的市场，将会导致加强富农的力量，这可能会使得期限更加延长。富农可能会去拉中农，但是能够教训中农，鼓动他们去让人家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的人，在我们俄罗斯有很多。

我们在这里要确认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联盟的分裂已经来临，我们就要撒手不管了呢？不是的，我们要斗下去。要通过贫农去说服

中农，说明这样做是会导致我们的国家丧命的。我们不仅是在让步上有储备的手段，而且在发展我国经济的领域里建立起我们的支撑点上，我们也有储备的手段，而且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结合将是牢固的。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558 号全宗 11 号目录 1033 号案卷
第 59—72 张。原件。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四第 66—73 页

展开一场宣传集体农庄的运动

——致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30年9月2日）

维亚切斯拉夫：

……

五、我认为，大张旗鼓地公布乡镇协作社新章程并在报刊上大肆宣扬，是错误的。这样做让人觉得是在用“参加乡镇协作社”的口号来**对抗**“参加集体农庄”的口号。这样做使人产生了从“拥护农庄！”的号召**退到**“拥护乡镇协作社”的号召的错觉。莫斯科是否打算这样做，——已经无所谓了，**实际上**让人觉得是要用非驴非马的和凭空虚构的口号“拥护还是反对乡镇协作社”**来取代**意义重大的和胜利在握的口号“拥护还是反对集体农庄”。而且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我认为这种想在集体农庄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刻拉我们后退的企图只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并削弱加入集体农庄的势头。我已经就这个问题给你发了一份电报，也许不应当发这份电报，但请你不要为此而骂我，因为我觉得，把我的意见越早告诉你越好。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意见，但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就可以立即开始给整个这场“乡镇协作社”闹剧逐渐刹车。我认为，应当，**第一**，给各州委和各区下一个**内部**指示，告诫不要迷恋于乡镇协作社，不要用“参加乡镇协作社”的口号偷换“参加集体农庄”的口号，**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组织加入集体农庄运动上来[①]；**第二**，用“加入集体农庄”口号的精神武装《真理报》和我们的所有报刊，责

成它们**每天**和**一贯地**至少拿出**一版**来刊登加入集体农庄的**情况报道**，刊登集体农庄优越于个体经济的**报道**，并且要把这些**报道、通讯、来信**等刊登在显要位置上，而不能用小号字刊登在犄角旮旯里。总之，要在报刊上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地展开一场宣传集体农庄运动的运动，因为集体农庄运动如今已成为农业建设的一个主要的和决定一切的因素。

好了，暂且就写这些。握手！

约·斯大林

1930 年 9 月 2 日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四第 102—103 页

————————————

① 1930 年 9 月 24 日政治局批准了联共（布）中央致各个边疆区委、州委和各个共和国的党中央有关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信的草案，在信中特别谈到：党中央警告在个别组织中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以农业协作社偷换了劳动组合组织。在一些农业集体化运动比较薄弱的地区恢复了农业协作社。必须展开顽强而坚定的工作，组织作为这一阶段农业集体化运动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组合。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①]

——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的讲话（摘录）

（1935年2月）

如果你们想巩固劳动组合，如果你们想有一个包括千百万农户，而不是几户或几百户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如果你们想达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在现时的条件下就应当除了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共同利益外，还一定要考虑他们的个人利益。

你们说给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不得超过十分之一公顷，这就是一点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你们有些人认为奶牛不能给，另一些人认为母猪不能给，总之，你们想挤压集体农庄庄员。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这是不对的。

你们是先进人物。我懂得你们是很关心集体农庄制度，很关心集体农庄经济的。但是所有的集体农庄庄员都和你们一样吗？你们在集体农庄中毕竟是少数，而多数人想的是有点不一样的。应不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应当考虑的。

如果你们的劳动组合还没有极丰富的产品，如果你们不能供给集体农庄所有庄员及其家庭所需要的一切，那么，集体农庄便不能承担

——————————————

① 本篇是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上的讲话的摘录。这次大会于1935年2月11-17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为此，大会于2月14日选出了有斯大林参加的一百六十七人的审查这个章程草案的委员会。斯大林在这个委员会上的讲话全文没有发表，这篇摘录是苏联《真理报》1935年3月13日的社论《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引用的部分。

起既满足公共需要又满足个人需要的担子。在这种情况下，倒不如直率地说：某一部分工作是公共的，而某一部分工作是个人的。倒不如直率地、公开地、老实地同意：集体农庄中的农户应该有自己的个人的经济，它规模不大，但是是个人的。倒不如承认，既要有满足公共需要所必需的公有的、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组合经济，同时也要有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需要所必需的不大的个人的经济。既然有家庭、孩子、个人需要和个人口味，那就不能不加以考虑。因此你们没有权利不考虑集体农庄庄员个人的生活利益，否则就不可能巩固集体农庄。

把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农庄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是巩固集体农庄的关键所在。

引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2 辑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四第 104—105 页

关于目前中国大革命的形势

——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27年4月5日）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同志们，我就讲几句话，因为我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报告，虽然一些挑拨是非的人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好像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存在分歧。不需要再重复布哈林同志的话。我声明，我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同志报告讲的所有观点。那些挑拨是非者散布谣言说中央有很大分歧，这令我震惊，因为那些谣言绝对毫无根据。——这些挑拨是非者应当知道，我们没有分歧，我们也不会有分歧（掌声）。

现在谈谈问题的实质。首先讲我们常说的性质问题，及前景问题，即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现在中国形势怎么样呢？在农村——是封建残余的压迫。拉狄克同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明白，在中国农村，封建主义残余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原始积累型城市资本结合在一起。拉狄克同志不明白这一点。这就是封建残余，就是它在中国农村压迫农民，使他们无法生存。此其一。再者有各省的封建官吏。中国的一些省份的人口少说也达到三四千万。掌管这些省的是省长及其幕僚，他们以种种苛捐杂税剥削农民。此其二。那里有中央当权集团，北方的张作霖和张宗昌等，他们同样在压迫、掠夺、剥削农民和工人。此其三。还有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它也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剥削中国工人。此其四。在中国，有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帝国主义，还有日本、法国、美国等等。这些帝国主义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坚船利炮；是因为这些帝国主义者把持着主要的工厂、银行、商号和铁路，国民

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它们手中。中国资产阶级依赖于帝国主义，因为它被像条链子一样拴在英、美、日银行身上。此其五。那么，最后，是工人和农民。

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

谁是主要的敌人，最强大、最凶残、最有威力的敌人？帝国主义。这才是主要的敌人，因为它支持中国的封建残余、官僚政治、官吏集团，当革命者在中国刀上膛剑出鞘朝封建残余和军阀挥去时，帝国主义就给它们撑腰，给它们提供保护。

主要的革命力量：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然后是同路人：民族资产阶级。它对帝国主义不满，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它受到帝国主义银行的束缚，受帝国主义商号的束缚。然后是民族知识分子。这些人中工人和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动力。其余所有的阶层虽然也支持反帝战线，但却是辅助阶层，它们很重要，但毕竟是辅助性质的。从这里可看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类似 1905 年我们经历过的这么一种革命。

但是，同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者却有区别，并且是根本区别。我们那时的革命是针对沙皇制度和地主，而在中国这里，主要说来，是针对主要势力，即主要敌人——针对支持地主，也支持官吏的帝国主义。可见我们面对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锋芒所向主要是帝国主义。由此，这个革命被称为民族解放革命。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在上述阶段，中国的政权应当是何种性质？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主要动力，如果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显然政权应当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与 1905 年时我们所说的相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以反帝斗争为主要目的的专政。我想，我们这最后一个问题不叫分歧，因为拉狄克同志说过，他承认中国走的是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道路，即以无产阶级

和农民阶级专政为形式的政权。所以，如果不提他对中国封建主义残余认识混乱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拉狄克同志没有任何实质分歧。

可是接下来我们之间就出现分歧了。拉狄克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或者革命民主政权有能力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同志们。这是根本错误的。任何一种革命民主政权都不能消灭帝国主义。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应当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拉狄克插话：我完全同意这一条）。拉狄克同志，您说过很多次，这都有记录，说革命民主政权是一个将消灭和根除帝国主义的政权。这是幻想，拉狄克同志。（拉狄克插话：我完全同意这一条，这里可能有错误）如果您同意，我很高兴。所以，为了使中国革命能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为了这个，革命应当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进行斗争的阶段。同志们，这才是前景。

如果我们说，革命民主性质的政权必须向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过渡，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列宁早在 1905 年讲到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时就说过，这种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是其过去，即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一是其将来，即反对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所以为了这个将来，中共应该抓住越来越多的东西，以便将现在的革命，极其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那时，也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真正谈得上在中国根除帝国主义。

正因为如此，虽然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中表示反对，但布哈林同志在这里讲的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可能性，从现在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都是完全正确的。

我想，拉狄克同志所有的报告中的错误，在共产主义学院以及在这里，在这次会议上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忽略了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

它所处的国际环境。他在这里慷慨陈辞，说是胡汉民在什么地方说过，他们国民党人有时应当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暂时妥协。拉狄克同志慷慨陈辞，说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出将资产阶级部长从中国国民政府赶出去的口号。这样的部长那里是有的。他们不占优势，但他们存在。他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我们没有采取措施使中国像我们的十月革命那样超阶段地跃进。但他不了解，现在的世界形势不一样了。他的根本性错误在这里。他老是将目前的中国革命的形势等同于我们的十月革命的形势。这是愚蠢的，这是不严肃的。十月革命的时候，帝国主义被分裂成两个同盟，两个阵营，因为那时进行着帝国主义间的战争。那时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瓦解了他们自己，削弱了他们的力量。正因为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帝国主义前线的瓦解，正因为如此，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那时才得以如此轻松地跃进到社会主义。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我们可能已经完蛋了。

中国现在有这样的环境吗？当然，没有。现在没有出现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帝国主义从战争中解放出来了。中国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市场。它成为全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市场。四亿人口，庞大的铁路网，三条大河能承载一切运送货物到中国内部去的船只，巨大的港口上海——世界第二大港，仅次于纽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市场，现在帝国主义算是在争抢这唯一的前线。日本帝国主义耍花招，装扮成自由派，但这并不表明他们能白给中国哪怕一团羊毛。绝对如此。美国有时候会玩弄点自由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向中国人开枪，绝对如此。我就不说英、法等国了。目前并不存在帝国主义在前线的分裂。并不存在交战的两个联盟。不存在十月革命时期的那种有利形势。现在中国革命的条件更为艰苦。因此这个革命将进展得很缓慢，比我们的 1917 年革命更慢，曲折而又坎坷，失败和成功相伴，挫折和跳跃共存。而且毫不奇怪，在这条曲折行动的道路上，国民党政权有时不得不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以便先消灭一个敌人，再消灭另一个敌人。

全部一起消灭相当困难，同志们。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拥有一个有25年历史的党（而中国的党才成立不久），拥有像列宁这样一些领袖，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人。与中国人相比，虽则我们同西方工人的联系比较密切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况且还是在战时帝国主义分裂的形势下，但就是这样，我们在各个革命阶段推动革命都还是举步维艰。毫不奇怪，中国人缺乏这些有利因素，必然艰难得多。毫不奇怪，中国革命的进度会慢一些。拉狄克同志的错误在于，他不明白这个国际形势的差异。

听了拉狄克同志的发言，我就想：如果让他来领导革命，他就会慷慨激昂地唱一番革命高调诸如赶走资本家部长、上海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之类，三下五除二就把革命糟蹋完了。（笑声）

所以我说，拉狄克同志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没有研究国际形势，没有看到现在帝国主义像一道墙一样挡在中国面前，它不像我国十月革命时期那样处于分裂状态。

拉狄克同志的其他所有的错误都发端于此。

举个例子，就说上海问题吧。拉狄克同志说，上海人民应当起义，立即赶走帝国主义。这是愚蠢的，同志们。拉狄克同志不知道，我现在秘密地告诉他，自从南京枪击事件后，我们从上海接到过类似的电报，里面说：我们想举行起义，立即武装推翻帝国主义。我们回答他们：再等等，同志们，不要单独组织上海工人与帝国主义军队战斗。形势如此，现在不能进行决战。我们希望上海工人稳住，为以后的决战保存力量。我们不希望上海工人组织巴黎公社那样的流血行动。上海工人——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推动力。我想问：决战刚刚开始就让这个推动力遭到毁灭，难道是明智的吗？显然，不是，这形同犯罪。这就是拉狄克同志不想搞清楚的地方。

我们禁止他们组织武装暴动，保住了实力，用于未来的反帝斗争。而战斗才刚刚开始。根本问题还没有摆上日程。应当从帝国主义手中

把铁路夺过来——这是一场战斗；应当夺回各类工厂——还是一场战斗；还应当夺回银行——又还是一场战斗。数不清今后还有多少战斗。我们需要后备力量，而最好的后备力量，就是需要极其慎重地使用的上海人民。（有人插话：大声点。）

我刚才没说话，再开口说话的时候，能让你们听见（笑声）。

国民党问题。国民党是什么——它是一个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它是一种类似革命议会的东西，有着自己的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并建立了政权。有人对我们说："不能参加这个议会。"这可不严肃，同志们。严肃的人不能这么说。这个天赐我们的革命议会，里面聚集了所有持反帝主张者的代表，应有尽有，包括明天可以搁置起来的右翼，——但现在还不能急于动它。那里有中间派，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情况就这么摆着，有一个议会，事实上是共产党人在那里起领导作用，共产党周围团结了多数人，有这样一个在全国的意义非同小可的议会——有人居然建议我们离开它。拉狄克同志，你说，这是为什么？如果右派听从多数人的决定，而这个多数又是我们的人，那我们见什么鬼就得退出议会，为什么急于赶走右派？难道不能利用右派，就像到今天为止所做的那样？要是有一匹母马，它不怎么好，可是毕竟有点用，也还听主人使唤，哪个主人会同意把它赶走呢？（笑声，掌声）谁同意这样做呢？母马再不好，只要它听话，能使唤，它也是马呀。右派要是不听话了，我们就把他们赶走。右派开始阻挡革命的时候，我们不是已经两次赶走他们了吗？只要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我们就叫他们滚，我们还会再三次五次地甩掉他们，到时候人民就明白把右派甩开是应该的了。

在国民党内，右派是中国人里最老谋深算的一部分人，虽然它代表少数派。这些老练的老政客，在中国之内算得上老谋深算。有时甚至是顶级的骗子。他们与商人有密切的商业联系，他们向帝国主义送

秋波，并和他们有来往。试想，把共产党人从这么一个国民党里拉出来将意味着什么？这将意味着——让国民党听凭右派摆布，让国民党的旗帜，这面全中国旗帜中最深入人心的旗帜被右派耍弄，使右派更加强大。这就是拉狄克同志的策略。但究竟是谁，请原谅（笑声），究竟是谁，除了（笑声）（拉狄克插话：“都明白，都明白。”）有谁，除了极其精明的人（笑声）和极其有经验的人，可能提出现在这样的策略？

说到右派和强行驱逐他们，拉狄克同志不明白中国存在的独特国情。这种独特性是什么？我顺便说说：尽管这些右派身上有各种毛病，有各种缺点，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性质，尽管他们是中国新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和将来反革命的中心，从这些人中将来会产生中国真正的反革命政党，尽管这，尽管那，然而这些人眼下毕竟正领导着反帝军队。这是不是事实？独特性就在这里。蒋介石是否领导着反帝军队？是的，是领导着。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在这方面他比所有的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们都高。当然，蒋介石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而策列铁里和唐恩以及克伦斯基也许读过马克思著作。蒋介石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情况恰恰是，他高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高于这些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唐恩之流。为什么？因为，由于事物的逻辑所致，他领导着反帝的战争，迫于形势他在打仗。因为他不想失势。而克伦斯基与帝国主义者一起，挑起反对被压迫人民的战争。这就是根本区别所在。

这就是不能放弃利用右派的原因。目前还有可能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谁不这么做，谁就是笨蛋。这是我的看法。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由于开展革命，建立起了一个极其独特但非常强大、群众基础相当广泛的政党，一个工人、农民、民族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在这个党内，在这个组建了政府的革命议会里，实际的掌权者是共产党人。这个，同志们，不是说大话——就是这样。别以为鲍罗廷同志和其他同志在那里白呆着。如果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帝国主义（笑声，掌声）。这样，同志们，就说明，如果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退出，由于国民党中间派和左派的组织水平差，右派就会成为领导力量，他们会将革命引上别的道路，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道路，不是进一步开展革命的道路，而是消灭革命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拉狄克同志不对，他在不自觉地帮助右派，不自觉地帮助同样也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者。

拉狄克同志不是第一个得出这样结论的人。托洛茨基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早就提出过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建议。这些同志不明白，他们喊着让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革命口号，实际上是在帮助右派，帮助军阀。

关于该不该让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的争论由来已久，同志们。还在 1926 年 4 月下旬，拉狄克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时，争论就开始了。我不记得当时托洛茨基同志是否在政治局里。托洛茨基以前就提出过这问题，但中央政治局当时一致否决了这个提案。（当时季诺维也夫不得不同意，因为他什么也没有了，因为那些提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人被斥为中国革命的取消派）。政治局当时通过了如下决议：

（略：关于让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及将右派孤立和排挤出国民党的方针的引文。）

这就是我们当时发出的基本指示，我们执行了，现在仍在执行。

我想问，采取这个政策的结果，我们是不是赢了？我想是的。共产党在中国壮大了，它在国民党内的领导角色，好也罢，坏也罢，还

是有保障的，前方战事取得了成功，孤立了右派，把革命向前推进了。

这就是上述政策的结果。

如果当时我们赞成拉狄克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让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在拉狄克同志口中共产党员和共产党是一回事）退出国民党，结果将会怎样？我们，我是说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就会在国民党内被孤立，右派会占大多数，革命运动会面临灭顶之灾。

现在，谈谈参加革命政府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拉狄克同志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员加入拥有革命议会的国民党，另一方面却又赞成共产党员参加由国民党建立起来的政府。如果国民党内的革命议会建立了政府，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加入这个国民党，可又加入这个党建立起来的政府——您的逻辑究竟何在，拉狄克同志？我想，就像刚才布哈林同志所说的，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些混乱。拉狄克同志不能自圆其说，这就是一个实例。

好了，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拉狄克同志在这里提出的我们的分歧这个问题，以外交方式来缓和这个状况。他认为，不是他，而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退缩了；不是他，而是共产国际或者我们的党中央应该受到责难。这是在耍滑头，而且是目光短浅地耍滑头。毋庸置疑，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存在过分歧。去年 4 月拉狄克同志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是事实。党否决了这个意见，也是事实。

事实是，现在拉狄克自己在这个讲台上也不得不说，他也不是反对加入。到底是谁在退缩，谁在前进？我想，是拉狄克同志在退缩。谁应受谴责？我想，是拉狄克同志。可是为什么要把事情说成这样呢：好像拉狄克扮演了原告的角色，那谁应当成为被告？哪儿来的这种狡猾手段，为什么要这样？

最后说的是，有人认为我们像是在掩盖国民党的缺点，不向党通报过去和现在依然在持续的国民党右派在一些省份的恶劣行为。它有

没有枪杀、逮捕，或者以逮捕相威胁？有没有过这样的事实？是的，有过。以后还会有的，同志们。如果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年前共产党才开始发展的国家，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70年摧残、文明程度低、组织软弱无力、帝国主义到处进行挑拨活动的国家，——如果以为在那里不存在恶劣行为，是很难想象的。说我们掩盖它们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没有在这里夸大这些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应当核对“事实”，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在中国发行的帝国主义的英文报刊的报道（他们经常撒谎）。其次我们不能公开地从莫斯科发出指示。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同志，采取对外界来说是内部的、不为人知的方式进行，用建议的形式来体现指示。而我们相信我们的建议会被采纳和发挥指导作用。我们对此毫不怀疑。本来中国共产党就受到责难，说它似乎靠俄国革命者的帮助才得以发展。有人叫嚷，在中国进行的不是国民革命，而是“莫斯科的狡猾伎俩”。面对这些情况，请想想该不该在报刊上夸耀我们的领导作用。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愚蠢的和不严肃的。我们有别的非常严肃而可行的方法，以根据需要来把握方向。我们有这样的方法吗，拉狄克同志？（拉狄克：我深表怀疑）非常遗憾，您没有说明这些方法为什么可疑。我想，恐怕您现在可以说，该是我而不是您做“结论”来表述一些您无法驳倒的论点了。但是，拉狄克同志，我不打算在这里，也不能演示我们拥有的各种方法和渠道。我可以说，这些方法是存在的，而且它们是切实可行的，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就看不到国民党的左倾化，不会有北伐大业的成功，不会把右派逼得像现在这样躲躲闪闪和表示自己的忠诚，就不会使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动摇”，乃至有时让帝国主义的统一阵线不再铁板一块。我这里说的是——日本人。他们已经感到骨鲠在喉，因为一旦革命的中国扩展到北方，那么朝鲜就要发动起来，日本人感到了，所以沉不住气开始动摇。有了这个，怎么能说，我们没有领导运动呢？

我就讲这些了，同志们。总之，拉狄克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没有研究中国在世界政局中的特殊性——鉴于帝国主义阵线的统一，你不可能以比目前更快的速度或者和我们的十月革命一样快的速度推动革命。那时是帝国主义阵线瓦解了，他们正兵戎相见，互相厮杀。

再者，拉狄克同志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不明白，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想把国民党交由右派摆布的话，它目前就不应当退出革命议会，退出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国民党。

第三，拉狄克同志的逻辑一片混乱，准许共产党员进入政府，但不准许他们进入国民党。这简直是语无伦次，简直是无稽之谈，胡说八道，我甚至懒得驳斥。就说这些了。（掌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全宗 558 目录 11 案卷 1110 第 77-93 页。
打字件，经校对的速记记录，原件。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七第 251—261 页

关于在中国成立苏维埃的问题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①]

（1927年9月27日）

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讲到了广东的革命运动，讲到了贺龙和叶挺的军队，责备我们似乎正在成立新的国民党来领导这个运动。我不来驳斥托洛茨基同志这种无中生有的诽谤。我只想谈谈南方革命运动整个这个事件：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从武汉出发，向广东挺进，同农民革命运动结合等等。我想说，整个这个事件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倡导发动的，而且只是根据它的倡导。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是知道这一点呢？他应该知道这一点，如果他知道一点儿情况的话。如果这个运动取得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新的高涨成为事实，那末，谁来领导这个运动呢？当然是苏维埃。如果说以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没有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那么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即使革命的国民党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设想既可成立苏维埃，同时共产党人又可参加国民党。把这两个不能相容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苏维埃的本性和使命。共产国际已经给我

———————————————

① 这里发表的是斯大林讲话的最初记录稿，与后来公开发表的文本（见《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第41期）有所不同：南昌起义军向南推进的计划被改成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还删去了关于对待革命的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态度的一段话。——本书编者注

们中国同志发出了相应的指示。我们不对此大喊大叫，我们不在报刊上宣扬这一点。也不应该这样做。就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

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
全宗 495 目录 2 卷宗 83a 第 28-29 页。
打字稿，经过校对的速记记录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七第 262—263 页

周恩来记录的

斯大林同瞿秋白等人的谈话

（1928年6月9日）

瞿秋白等人同斯大林的谈话

出席：斯大林、瞿秋白、米夫、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

瞿秋白提出要谈的问题：

1. 形势。

2. ①

斯大林说：他已读了秋白的报告②，关于五大矛盾的结论。五大③报告中有许多对的，但亦有不对的。因为现时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高涨了。诚然，有些地方城市工作已起来，有些地方农民暴动已高涨，而统治阶级不能稳定，人民不满意资产阶级的统治。但这不能说，革命已高涨了。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在俄国，1906年后是如此地争论了许多。

城市不能暴动。

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④，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

———————————————

① 记录原文如此。根据内容判断，应为：中共的任务。——原注

② 指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俄译本（莫斯科1928年）。——原注

③ 即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本书编者注

④ 记录原文如此。——原注

1.以零星部队可集中甚至取得某些城市。

2.农民武装暴动。

广州暴动是革命临时退后的一个动作，现在准备一个高潮。

俄国1905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

少年先锋主义是看轻了资产阶级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

斯大林说：我们以1905年同中国（作）比较（并）非全部。只是说失败后的新潮流未来时的短时期。

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较俄国当时（更）为（困）难。尤其是忘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势力。

俄国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改良主义。

帝国主义的力量是主要的，如忘记了是什么革命问题，讨论（就会）得出，革命高涨是革命进攻，而反革命退让。在现在的中国，是日本掌握着北方，英日美掌握着长江，南方法英在压迫着，而我们工作（范围）小了。

说中国现时较俄国危险少是不对的，主观上，中国的工人少，国内即不讲其他危险，帝国主义仍是最主要的力量，在华（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决不同于俄国革命。俄国一、二次革命不必说了，而十月革命，帝国主义也无略加以大的压迫。

现时，帝国主义对华是一致的，日美是相当好的。在北方扬子江，帝国主义都是（帮）助反动势力在中国取得胜利的。

第一次浪潮：自香港罢工、北伐，打到武汉。

在此过程中，帝国主义常常取吊膀子和让步政策，他们不敢向革命迅攻。

南京事件起，革命渐渐低落，（不久）到叶贺，他们是一个反抗的尝试，广州也是一个尝试。

广州暴动引起了全国的同情。1871年、1905年和1917年7月都唤起了工农群众的同情。1905年11月也干了（采取了行动），虽然

暂时取得了胜利，但终究还是失败了。

农民游击战争是农民革命行动的宣传。过去有的，将来也是有的。是不是它们可以取得一省政权？不可能的。不过只是革命准备时期。如一壶水在未开前，亦有波动，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

虽然高潮有了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至，而不是现在已高涨了。

两个高潮中的时间，当然不像俄国那样长，因为战争的痛苦不能再使中国工农长期忍受下去了。

现在此中间时期，我们如何做呢？

1.党要有坚固的、觉悟的、好的、马列主义的……是质量问题，不是数量问题。中国同志多只做实际工作，但不够，要多注意发展党员的觉悟，马列教育。尤其是马列主义对工人及斗争的农民的教育，以及新奋斗的知识分子。此责任是传达马列新作，不是只“打倒”、“万岁”而已！

党员成份中工农都有，就觉悟程度说，如能有百分之一的马列主义者，才容易形成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假使真能有从50到100个（这样的人），力量（就）很大了。

2.群众工作：工人和雇主发生任何小的冲突，都应该利用之发展，不是我们主观硬造的。

3.农民工作：中国资产阶级的军队虽少，但帝国主义常利用之，以保护其利益。如我们有些地方可作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战争。但农民有一缺点：有小部军队，有了土地，便不想进取了。此便是工农间的矛盾。

党便在此处利用此机会以创造军队，因为没有武力是不行的。

4.知识分子，中国同志看成太不行了。如学生对帝国主义的仇视，我们就不应（将他们）撵出去，（而要）使之做党的工作。

5.破坏军阀军队的工作要加紧工作。

以上尚不是暴动。

————————————————

1.用术语（的混乱）是有不同的意见的结果。

革命高涨：反革命退步（却），革命进攻胜利。

在反革命中心，大城市都在反革命手里，没有一个严重情形在主要城市中，仅仅在乡村中从彼处至此处，此处至彼处。而反革命则（掌）握住主要城市。

我们敌人帝国主义在华并未一点减弱。

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现在（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来了。

因为对于高涨的了（理）解不同，便对于环境的观察有异了。

不是每一（次）工人的暴动都能（发展）成为革命。

农民的游击战争如没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决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即使有（取得）胜利也不能巩固。故城乡的关系不能建立，则胜利无望。假使我们视为潮流高涨了，则我们应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为中心。简单地（说），为什么资产阶级还能坐在城中，因为他们有力量（的缘）故。

现在仅仅是农民暴动，说他（它）破坏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对的，但对全国却不能说高涨。

以为国民党能北伐，因有公开旗帜，政纲，好否？（这）是另一问题。而现今苏维埃革命尚未开展这一局面，故不能谓为高涨。

2.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他们向国内外作一次公开的反抗。一方面是想巩固自己的革命势力，另外开展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的局面。

这个企图结果是失败了。

当暴动者去暴动时，一定要想是可以战胜敌人的，故他们可以说，这是新的革命高涨的开始。但在客观上只是工人阶级在过去高潮中的最后一次斗争——回光返照的企图，故遭到失败了。

假如我们如此说，是否减轻了广州暴动的意义？1871 年的巴黎公社和 1905 年的十二月暴动也是一个最后的企图？中国工人阶级最后的英勇企图，虽未展开新的革命高潮，但给了一个苏维埃形势的信号，指出了以后新的高潮来时的新阶段，这仅是信号，不是已经开展了这个高潮。

3.关于大会决议案事，我未看见，无意见可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决议案事并非科学的，无事实可加的，但在当时确是正确的。

我关于党的任务，已说的不再重复了，宣传教育、工人运动、农村斗争，以及训练军事人材等等。我现在只说其最重要者——农民运动。其最重要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结果在（是）建立红军，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给国内外仇敌以经济上的打击。

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无论在何时，农民不会指导工人，不会指导革命，而需要工人阶级指导他。

工人阶级及党在能利用农民运动在党指导内为工人用，非是为相反的目的。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争的分子成立广大的红军。这是这一时期革命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

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994 第 4-7 页
中文手稿，影印件。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七第 264—268 页

同王明等谈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

（1937 年 11 月 11 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季米特洛夫、王明[①]、康生、王稼祥。

[**斯大林：**]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

“这就是人们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

“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1）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2）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

（税收必须有利于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一个：

“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

“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4）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

————————————

① 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此次谈话后即回延安，却完全违背斯大林的谈话精神，竭力推行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本书编者注

（5）现在中国人所处的条件比我们在1918-1920年时的条件更加有利。

当时在我们这里，国家在社会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

在中国，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把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了。

（6）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将取得胜利是对的。只是必须在已经打响的战争中坚持下来。

（7）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

生产飞机。飞机容易生产，但是运输很困难。

（我们会提供制造飞机的材料!）必须创立飞机制造业。

还要生产坦克。

（制造坦克的材料我们能够提供！）

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谁都不可能战胜它。

（8）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

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

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

（9）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

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10）不管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

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

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

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是不希望这条狗有独吞猎物的可能。

（11）对于中国的党代表大会[①]来说，讨论理论问题是不适宜的。理论问题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谈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比起过去，机会更少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正在发展吗！）

（12）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问题迟迟未决。

（13）在武汉的八路军和党的合适的代表。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第 59—61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七第 269—271 页

——————————————

① 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本书编者注

与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革命的谈话

（1936年11月—1942年3月）

1936年11月26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应该改变对中国工作的决定。目前不能搞苏维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国防政府，以保卫中国人民的独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苏维埃，但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的组织。不搞没收。您起草一个初稿。我们再看看！”

同伏罗希洛夫谈对中国的援助。

1936年12月14日

2. 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

把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

请他对我们的中国同志的立场提出意见。建议是：

“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①]，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深夜12点，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

① 即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本书编者注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随后莫洛托夫来电话：

“明天下午3点半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只有您和马努伊尔斯基，别人不用来！”

1936年12月16日

到克里姆林宫见“五人小组”。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

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

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

“复电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由于这一行动已经做出，我们应该考虑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1、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进行政府的改组；

我们在草案中建议的文字为：“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

2、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

4、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1937 年 1 月 19 日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叶若夫）。

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方针——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为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

2）询问[中共]中央是否已认识到是从苏维埃制度向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及时转变，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的时候了。

1938 年 2 月 17 日

我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叫去见斯大林、莫洛托夫。

斯大林：

……

3、中国。

两个方案：（1）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盟；（2）建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民族革命联合会（其他党派参加）。联合会不要加入共产国际。

援助中国共产党——50 万美元。

1940 年 2 月 25 日

和斯大林同志通话，斯大林称不能接见我去谈中国问题，因为他很忙。没有阅读送去的材料。他说：“很多东西我未能读完。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 30 万美元的援助。”

1941 年 1 月 13 日

致铁木辛哥、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诸同志：

“共产国际执委会问题

应准许国防人民委员部把一组中国共产党员共26人转移到延安。

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

1941年1月21日

我同斯大林谈了中国问题。

“叶挺是不守纪律的游击队员。应该看看他是否为此事件提供了借口。在我国同样有一些好游击队员，由于不守纪律和其他原因，我们被迫枪决了他们。”

“看来，3年时间呆在同一块领土上的八路军问题比这个要复杂。”

我们商定以后几天讨论这一问题。

1942年3月19日

斯大林同志来电话询问德国同志何时抵达，中国同志是否启程。“他们到后，请马上通知我，我现在关注的是德国人和中国人，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会见崔可夫少将（驻中国武官），他通报了中国的局势以及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摘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七第272—275页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

——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二）[①]

（1951年2月9日）

斯大林同志：

……

你们问：应该怎样看待即将到来的印度革命？

我们俄国人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场农业所有权的革命。这意味着要消除封建的财产所有制，并把土地分给农民自己所有，意味着要为了确立农民的私人所有制而消灭封建的私人所有制。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不认为，印度正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普遍都在谈论的关于中国的道路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它是一场农业革命，一场反封建的革命，它不把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充公和收归国有。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革命之前发生，它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革命或农业改革，无论愿意与否。战后初年，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经历了这个阶段。中国现在处于这个第一阶段。印度也在向这一阶段接近。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正如在东欧所表现出来的，它在于：从农业革命转入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这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在欧洲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工厂、银行都被国有化，转交国家所有。中国距离第二阶段还很遥远。这个阶段距离印度也很遥远，或者说印度距这个阶段很遥远。

————————————————

① 本篇是这次会谈记录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谈印度革命的道路问题，刊于本卷第569—579页。——本书编者注

我们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的社论中谈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这篇社论是由兰纳迪夫[①]的文章和言论引起的。兰纳迪夫认为，印度正处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

……中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中国只是把日本人的财产收归了国有，甚至没有把美国人的企业收归国有，美国企业仍然在工作。如果你们处在中国革命的阶段，你们暂时就不能采取一些把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推向英帝国主义一边的措施。这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被碰到，而他们现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帮助中国人民政府。这意味着可以认为，在中国国内美帝国主义者被孤立了起来。

……兰纳迪夫批评毛泽东太左，但毛泽东是正确的，他的行为符合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路线行动，不要在乎左翼的批评。

现在谈论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的道路。

关于中国道路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我已经谈过了，这就是农业革命。这涉及武装斗争，但是应该说，中国人没有谈论武装斗争，他们谈的是武装革命。他们认为，这是同解放区和同解放军一起进行的游击战争。这意味着应该谈论的是关于武装革命和游击战争，而不是关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说法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报纸中经常刊登。武装斗争的含义要大于游击战争，意味着要把农民的游击战争同工人总罢工和起义结合起来。中国的武装革命是怎么开始的呢？

1926—1927 年，中共的同志脱离了国民党。他们组建了另一阵营，并组建了 4—5 万人的军队反对国民党。这支军队主要开展游击战。他们隐藏在森林和山地，远离城市和铁路。当然，那里设有中共中央，主要的干部也在这里。中国的军队不能在城市建立根据地，在城市他们很容易被包围，为了不被包围和消灭，他们继续远离城市和

———————————————

① 兰纳迪夫，1948 年出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编者注

铁路，驻在了一些游击队解放区。在被包围的时候，他们冲出了包围圈，放弃了原来的解放区，建立了新的解放区，并尽力不进行战斗，越这样进行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越脱离了工人和城市。毛泽东当然不希望中断同工人的联系，但游击战道路的结果是，导致了他脱离了城市。这是苦恼的，但也是必需的。最终，他们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并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防守。他们把农民吸引到了自己的一边，并武装了他们，开展农业革命，壮大自己的军队，并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避免一些损失，这种损失是游击战不可避免的。

什么是游击队解放区呢？它仍然是国家中的孤岛，在这些地区没有后方，它会被包围和封锁；它没有可以依靠的后方。事情就是这样。延安被包围了，而中国共产党离开了那里，遭受了巨大损失。而这种状况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决定转移到东北的话。在转入东北以后，他们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状况，获得了以友好国家为代表的后方。现在这一地区已经不再是孤岛了，而像是一部分深入到苏联的半岛。在此之后，蒋介石不再有机会包围中国的游击队。而只有在中国同志得到休整之后，他们才得到了自北向南发动进攻的机会。历史就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呢？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它非常有益于革命。在此方面，中国人对革命的实践进行了创新，特别是在落后国家。当然，在农民占80%—90%的国家的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牢记这种斗争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从中国同志的经验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解放区进行的游击战争有巨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于，游击区总是很容易被包围。要想克服这种包围并取得胜利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与友好国家接壤的地区建立巩固的后方，并把这个国家也变为自己巩固的后方。中国人采取了理智的措施，转向了东北。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么我还不知道事情会怎样结束。游击战没有拥有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如果游击战有可

以依靠的友好邻国，那么一定就会取得胜利。非常典型的是，在向东北转移之前，中国同志不愿发动进攻，他们害怕被包围。只是在转移到东北之后，他们才开始有计划地发动进攻，并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游击战争的缺陷应该被考虑到。你们经常说，要取得印度革命的胜利，游击战就足够了。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条件要比印度有利。中国已经培养了人民解放军。而你们没有培养军队。中国没有像印度这样密集的铁路网，这对中国的游击队是非常有利的。相比中国，你们取得游击战争胜利的机会要小一些。工业方面，印度比中国发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好的，但是，从游击战的角度来说就不好了。无论你们建立什么样的队伍，建立什么样的解放区，都将会被孤立。你们没有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以依靠的友好的邻国。

阿富汗、伊朗和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到达的西藏，都不是像苏联这样的后方。缅甸？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只有陆上边界，而其余国家都只有海上边界。因此，应该寻找出路。

需要游击战争吗？当然需要。

……

中国的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

但是，这条道路对印度人来说是不够的，印度需要把城市的无产阶级斗争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一些人认为，中国同志反对这样的结合。这是不对的。

如果上海的工人们罢工了，或者在进攻南京的时候，军工厂的工人们罢工了，难道毛泽东不高兴吗？当然，不会的。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因为毛泽东同城市失去了联系。如果铁路工人罢工了，蒋介石不能取得弹药，那么毛泽东是会高兴的。但是，缺乏同工人的联系，这是悲哀的，也是必需的，但不是理想的。如果你们取得了中国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把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那么这样就理

想了。

丹吉[①]：我们几乎把没有工人参加的游击战争转变成了一种理论。

斯大林同志：如果毛泽东知道了这一点，他会咒骂你们的（笑声）。

……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3卷第228—236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七第276—280页

① 丹吉，时任印度共产党主席。——编者注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诸问题

——与刘少奇会谈纪要

（1949年6月27日）

莫斯科，1949年7月28日

会谈于6月27日23时至24时进行。

参加会议的人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同志，刘少奇（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王稼祥（中共中央委员）、卡尔斯基（即师哲，翻译）和И.В.科瓦廖夫。

在与代表团成员握手和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要他们转达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问候。

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在此之后，斯大林转入讨论代表团提出的问题。①

一、关于贷款。**斯大林**说，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注意到，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

——————————————

① 以下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问题的序号和正文中的着重线是斯大林加的。——原注

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以他个人的名义表示，对于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少了，应当提高。

斯大林对此向代表团解释说，苏联向东欧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为2%，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减少了一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民主国家不同。东欧民主国家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中国还在进行战争，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量援助。

然后．斯大林笑着说，当然，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关于签订贷款协议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①

二、关于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斯大林说，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

————————————

① 7月11日，中苏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样参加。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贷款协定。——编者

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的国家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

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

在回答斯大林的这些话时，刘少奇说，在中国有一些与帝国主义的活动没有联系的外国专家，他们得到的报酬大大高于中国专家。斯大林对此回答说，在苏联，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和制度。我们想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制度办。

三、关于派遣专家去上海。**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在任何时候派过去。请你们研究并通知我们。但是，一般来讲，你们应当注意到，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有许多你们自己的专家和高级技术工人，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大于而不是小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你们必须吸引他们积极地投入工作。

四、**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准备帮助你们清除上海的水雷，既可以派专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提供扫雷艇。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比如，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斯大林接着开玩笑说，东北政府可以把他们再“卖给”中央政府。

五、关于新疆。**斯大林**同志说，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能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防卫。

总之，为了巩固中国的国防，应当让汉族住进所有的边境地区。

斯大林同志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六、关于舰队。**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舰队。然后又补充道，你们好像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舰只。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

七、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给予的巨大帮助，这些帮助体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并感谢向中国提供的异常优惠的条件，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他同时强调，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八、**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九、在回答中国同志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这条航线。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可以向你们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①]。你们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或者是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这样你们就可以培养自己的飞行人员了。

十、**斯大林**同志同意代表团提出的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他们关于

———————————————

① 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在这里画了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原注

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的请求。同意再过三四天开会，以便代表团做好准备。①

十一、**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但为此目的，应当称你们是来自东北的贸易代表团，以便你们能够公开进行访问。

十二、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样你们就有可能广泛地进行参观，包括去各种值得参观的企业。

中国同志表示，等他们请示毛泽东后再对此做出回答。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71—74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八第77—81页

————————————

①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编者注

关于中苏条约及撤军、贷款、援助等问题

——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16日）

在互致问候和寒暄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卫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将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保证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它实现和平已有四年。至于说中国，现实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起来，因此它还没有准备好打仗；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到中国去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的保证可能不仅5-10年，而且可能20-25年，也许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需要弄清的是：是否有必要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

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根据中方的要求，可以做这样的修改。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还不足以单独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例如英国人能不能驻军香港，美国人能不能驻军东京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和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军。但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 2 年、5 年或 10 年，就看对中国如何做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 20 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

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眼下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由旅顺撤军一样。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3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现在我们需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正是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方面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援助将有保证。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出船。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船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

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斯大林同志：有可能给予援助。但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和教官，我们随时都有。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登陆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原国民党的陆战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选一个连的陆战队员，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将来派往台湾，并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部队已进抵中缅和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否会越过边境。

斯大林同志：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并以此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

斯大林同志：这是正确的政策。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采用广东省与香港冲突来做到这一点。而为了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避免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

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们有稽查人员和谍报人员吗？

毛泽东同志：有。我们在研究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国人。

钨、钼、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发展矿物开采。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先建兰州以西至成都的输油管，然后再由水路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石油、煤炭、金属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

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中国有气象服务吗？

毛泽东同志：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著作目录，这些著作可以

译成俄文。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曲解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看完材料。但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译者一起对文字做些润色；第二，在中文原著的校订上得到帮助。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您在您的著作编辑方面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并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费德林同志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费德林同志记录。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175—178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八第125—130页

关于签订新约及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

——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1950年1月22日）

互相问候、简短叙谈以后，举行会谈，内容如下：

斯大林：有两类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有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有关东北、新疆等现实问题。

我想，最好不从现在的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请对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定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有关草案。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既然两国的繁荣对我们有利，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所说的两点是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

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联合国应缔约国双方的要求承担起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对。

斯大林：委托谁去起草草案呢？我想，应该让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去做这件事。

毛泽东：同意。

斯大林：现在转到中长铁路协定上。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

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斯大林：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对日战争时期签订的现有条约。我们不知道蒋介石会被推翻。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军队驻旅顺将对苏联和中国民主事业有利。

毛泽东：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哪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对日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希望在旅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当年罗斯福曾坚持让大连成为自由港。

毛泽东：这么说，保留自由港是符合美、英利益喽？

斯大林：当然，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斯大林：那就讨论贷款协定吧。对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要赋予国家间协定的形式，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军事装备供货是否纳入贷款额之内？

斯大林：这可由你们自己决定：可以用贷款支付，也可以按贸易协定办理。

毛泽东：如果军事供货用贷款来支付，那么，我们为工业剩下的资金就不多了。因此，看来军事供货只能部分靠贷款来支付，部分用商品来支付。不能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贷款供应期限从5年缩短到3-4年吗？

斯大林：要看我们的能力如何，要看我国工业的订货情况。然而，毕竟可以把贷款协定的有效期提前到1950年1月1日，因为实际上现在就应开始供货。如果在协定中从1949年7月就开始提供贷款，那么，国际舆论就会不理解，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呢？[①] 我想，你们应赶快提交工业设备订货清单。应当考虑到，这种清单提交得越早，对事情就越有利。

毛泽东：我们认为，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为这笔贷款我们总共只付1%的利息。

斯大林：我们为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2%的利息。斯大林同志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当然，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从接到的电报中看到，中国政府正准备把军队用于经济建设。这很好。当时，我们也曾把军队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的，我们正在利用苏联同志的经验。

斯大林：你们提出中国要为新疆弄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吗？

毛泽东：小麦和纺织品。

斯大林：为此，你们要提供一个相应的申请数。

毛泽东：好的，我们起草一个。我们怎样起草贸易条约？

斯大林：你们有什么意见？至今只同东北有贸易条约。我们想要

---

① 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1949年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已经分别代表中共和苏共签订了关于贷款的协定。

知道今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同新疆、东北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

毛泽东：我们希望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但同时新疆可以有单独的协定。

斯大林：只是新疆，东北呢？

周恩来：对东北则不签订单独的协定，因为中央的条约基本上要靠东北供货来保证支付。

斯大林：我们希望，同新疆或东北的协定要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并且中央政府要对这些协定负责。

毛泽东：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

斯大林：对，因为省政府考虑不了那么多，而中央政府总是了解得更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东北的经济。

斯大林：我想，我们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准备一下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共运送了将近10000人。请允许我，斯大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为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提供帮助。

斯大林：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和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卡尔斯基）。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第265—269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八第131—136页

致苏驻捷大使电

关于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

（1950年8月27日）

绝 密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口头向哥特瓦尔德[①]转达下面的内容。如果他需要书面材料，可以给他一份。

“对苏联6月27日退出安理会及随后事态的发展，我们同哥特瓦尔德同志有些不同看法。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利坚合众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世界均势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

① 哥特瓦尔德，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共和国总统。——编者注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拖着中国去为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的独立而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世界均势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菲利波夫

1950 年 8 月 27 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 3 卷第 42—43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八第 281—282 页

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出兵的关系

——致毛泽东电

（1950年10月5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转交毛泽东：

您的复函已收到。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

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对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在您的答复中，谈到了关于中国国内的状况，这对于我来说是新的情况。您肯定地说，在由于朝鲜事件而出现新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将会出现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国内非常渴望和平。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中国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党派，在出现战争的情况下，将利用国内的不满情绪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当然，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国内的形势。而是否能够克服中国国内局势的这些困难，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同志来决定。

至于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前来我处事宜，我将非常高兴欢迎他们并与他们交谈。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 年 10 月 5 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 581—584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九第 73—74 页

对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展开攻势表示祝贺

——致毛泽东电

（1950年12月1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转交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的第3153号电报。

感谢您告知中国国内情况，并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顺利地展开攻势。

你们的胜利，不仅使我和我们的领导同志感到高兴，而且也使全体苏联人民为之振奋。请允许我向您和你们的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他们在抗击美国的斗争中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

正如苏军在与第一流武装的德军作战取得了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并变成为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一样，在反击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美军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无疑地也将取得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其本身也将变成完全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威力强大的军队。

祝你们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菲利波夫

1950年12月1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633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九第108页

不宜过早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

——致周恩来电

（1950年12月7日）

特急

1950年12月7日19时10分收到

1950年12月7日20时40分发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拜会周恩来，并转告下述事项：

“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

此外，我们认为，对这三个国家的代表不能过于坦诚和过早地摊开自己的底牌，他们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我们考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是中国亮出自己全部底牌的时候。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一旦被美国利用，就如同打了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机会。

因此，我们考虑，在此可以仅限于提出下述说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你们，英国、瑞典、印度的代表先生们一样，欢迎尽快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将竭尽全力，以便尽快结束强加给朝鲜和中国的军事行为。

二、因此我们想知道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停战条件的看法。我们十分清楚，你们既不是联合国，也不是美国授权同任何人谈停战条件的全权代表。况且，英国代表团已同美国、法国、挪威、厄瓜多尔、古巴代表团一起，向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谴责中国并以此阻挠

朝鲜问题调解事宜的决议案。

三、因此，我们将耐心地等待联合国和美国关于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所提出的意见。①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50 年 12 月 7 日

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维辛斯基同志、十处，副本存档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 641—642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九第 112—113 页

————————————

① 12 月 12 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13 日，周恩来电示伍修权、乔冠华向提出十三国提案的国家表明中国的立场：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

给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

——致毛泽东电

（1951年5月6日）

发自莫斯科

致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

我们已拟定了对美国政府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复函，并决定于5月8日（星期二）将其送交美国大使。我们于5月6日晨将我们复函的内容给您送去，请至迟于5月7日24时前将你们的意见寄我。

我们复函的内容可归纳如下：

一、我们对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要求和约的准备工作应由中、苏、美、英政府共同进行，并吸收其他有关国家参加。

二、我们要求该条约草案中应明文确定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

三、我们认为把日本琉球群岛及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是不妥的。

四、我们坚持要仿照同意大利签订和约时的做法，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

五、我们的复函是这样结束的：

“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坚决主张尽快同日本签订和约，并且认为，该和约必须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强国所签订的国际协定加以制定，该条约草案的准备工作必须由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和英国政府共同进行，并吸收远东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参加这一工作。

据此，苏联政府提出：

第一，1951年7—8月份召开美国、中国、英国、苏联代表组成的外长会议，以便起草对日和约，并且要吸收所有曾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代表参加制定对日和约的起草工作，然后将该和约草案提交和平会议审定。

第二，对日和约的制定，要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雅尔塔协定为基础，并遵循以下主要目的：

（一）日本应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

（二）必须如同对意大利和约所规定的那样，确保日本国民有民主的权利，不允许有那种以剥夺日本人民民主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军事或军事化组织的存在；

（三）如同对意大利和约所规定的那样，和约中必须规定限制日本武装力量规模，以使其不致超过自卫需要；

（四）在发展日本和平经济方面不对日本施加任何限制。

第三，该条约中应规定，日本不得参加那些旨在反对曾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参加对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的某一国家的联盟。

第四，该条约中应明确规定，自对日和约签订之日起，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无论哪个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

第五，还要商定，凡与日本签订和约的国家均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6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755—756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八第284—285页

关于打英美军的战术问题

——致毛泽东电

（1951年5月29日）

发自莫斯科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我看过了您给彭德怀关于打英美军战术的电报。

该电报中所述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样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

英美军很容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

如果你们在前线后方有构筑很好的防御工事，能迅速将敌主力吸引到这里，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倒不妨再冒险试一试，采用这一计划。然而，据我所知，你们目前在朝鲜尚无这样的工事。因此，这里的危险性就在于，英美军一旦识破了你们的计划，就不会给你们以实施机动的可能性。而由于你们是第四次重复这一计划，那也就很容易被英美军识破。

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难以不付出巨大损失就能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1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还应注意到，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

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

菲利波夫

第284号密码电报　　1951年5月29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774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九第130—131页

关于持久作战和提高士气等问题

——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6 月 5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 6 月 4 日的电报以及彭德怀同志的两个指示。

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的进程，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战场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降低英美军队的军事威信。

我在自己的电报中主要谈的是，如果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没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匆忙地进行机动作战是危险的，要能够迅速地把主力调到那里去。彭德怀同志写道，他在后方建立了三条防线。如果这样做，防线就将是真正巩固的，事情就会进行得更好，军队就不会陷入包围。

您抱怨说，你们那里大炮、反坦克炮和其他武器很少。两个月前我已通知您，波兰人放弃了他们的订货，因此我们能在今年给您额外的供应，并相应地增加 1951 年度的军事贷款额。周恩来同志欢迎我的这个通知并告诉我们，您很快就会寄来新的订单。但是，没有收到您的订单，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我再次通知您，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新的大炮、武器。

彭德怀同志认为应加强敌人后方游击队的行动，这是对的，是绝对必要的。

彭德怀同志谈到英美军队有较高的士气，而中国军队中则战现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采取的先是稍稍向前推

进，然后又数次重复后撤的局部性机动作战，给你们的部队造成中国人和朝鲜人力量弱小的印象，而给英美军队造成他们强大的印象。我担心，这种情况可能破坏中朝军队的士气。我认为，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 3-4 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这种打击将导致中朝军队和英美军队士气的重大转变。当然，这不是广泛的和大规模的进攻，而只是对敌人进行短暂而重大的打击，但这将是使敌人清醒和提高中朝军队的士气的一次打击。此外，这样还可以使您能够在以后进行更广泛和更有效的局部战役这是消耗敌人所必需的。

菲利波夫

1951 年 6 月 5 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 784—785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九第 132—133 页

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

——致毛泽东电

（1951年6月30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认为，应立即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这个协定应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签署。如果没有中国志愿军司令员签署，那么，美国人会认为朝鲜单方面的签字不具有任何意义。应坚决拒绝把元山地区的丹麦医疗船作为会晤地点，应要求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正如您指出的，现在您掌握着停战的主动权，所以美国人将不得不在会晤地点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您今天要给李奇微发出大致如下的答复：

“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您28日[①]关于谈判停战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命向您声明，同意与您的代表会晤，以进行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停战的谈判。我们建议以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作为会晤地点。如果您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在7月10-15日同您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在电报中，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当然，这是不

① 这里指的是北京时间，按美国东部时间，该声明是29日发表的。

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

菲利波夫

第 335 号密码电报　　1951 年 6 月 30 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 839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九第 143—144 页

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

——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8 月 29 日）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您 8 月 27 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们同意您对目前开城谈判情况的评价和你们的立场，对美国人为压制中朝方面的挑衅事件需要得到一个满意答复。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根据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

你们建议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在目前谈判阶段的监督员和观察员参加谈判，我们认为这没有益处。此建议的不利方面是，美国人将认为中朝方面比美国人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对此问题如果您坚持这个观点，那么应向金日成通报此情况。

菲利波夫

1951 年 8 月 29 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第 986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九第 160 页

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

——致毛泽东电

（1951 年 11 月 19 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

近来谈判全过程表明，美国人虽然在拖延谈判，但是他们更需要尽快结束谈判。

这是根据总的国际形势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中朝方面应继续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躁和尽快结束谈判的表现。

在确定分界线和在 1-2 个边防站进行检查问题上，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们还同意关于履行检查职能的委员会人选问题。

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至于在签订停战协定后，为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而召开会议的可能的方案，我们认为，召开目前谈判双方政治代表的政治会议是适宜的，但必须要有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

菲利波夫

1951 年 11 月 19 日”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第 1108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九第 209 页

不要像老师那样对工人说话

（1934年4月7日）

1934年4月7日

去克里姆林宫见**斯大林**。

关于致奥地利的信，他指出：

（1）压缩一下！

（2）不要训斥，而要辩论、说服。欧洲工人从历史上就同议会民主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明现在资产阶级背弃了民主，正在向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转变，因为它不会用别的办法进行统治。与过去不同，对于工人来说为争取议会民主而斗争现在已经没有意义。

（3）是武装斗争，而不是起义。只有在以夺取政权为任务时，才有起义。奥地利的情况不是这样。

（4）不要直接号召工人加入奥地利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听到这一点会有偏见。他们会想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他不得不这么讲。此外，加入共产党这样一个地下政党，对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应该让他们自己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党也曾经很小，但有许多追随者。

（5）信中不要把结论写透。要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自己得出这些结论。

不要像老师那样对工人说话。

对于欧洲工人必须耐心地、易懂地说明为什么议会民主对工人阶级已经没有价值。以前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需要通过民主让工人阶级跟着他们走，为此作出某些让步。现在它在战胜了封建

主义之后，面对着新的敌人——无产阶级，而且还要在资本主义危机条件下克服极大的困难，它就不能用议会民主的办法进行统治了，它便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所有国家，资产阶级都会向法西斯主义转变。英国也一样，尽管形式有所不同。

我们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人往往把对俄国工人来说正确的东西照搬给欧洲工人。他们不明白，我国实际上从来没有过议会制。俄国工人没有从杜马得到什么，而欧洲不是这样。如果我国的资产阶级再有30年时间，它也会通过议会制同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推翻它就会困难得多了。

不要斥骂议会民主，而要向工人群众阐明这个发展过程。

季米特洛夫：我在监狱里也曾经反复思考过，为什么我们的学说正确，但是在关键时刻千百万工人不跟我们走，却仍与在行动上如此叛卖的社会民主党站在一起，譬如在德国，他们甚至还走到国社党里去。

斯大林：您的结论呢？

季米特洛夫：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宣传系统和我们对欧洲工人的不正确做法。

斯大林：不，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历史的发展——欧洲群众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性联系：其次，在于欧洲的特殊情况——欧洲国家缺少足够的本国原料，煤、羊毛等。它们要靠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它们就无法生存。工人知道这一点，他们也怕失去殖民地。在这方面他们倾向于同本国资产阶级走在一起。从内心来说，他们不赞成我们的反帝政策。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耐心的解释工作，对这些工人采取正确的做法。要坚持不懈地争取每一个工人，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轻易地争取到欧洲的千百万工人。

千百万群众有一种随大溜的心理。他们只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人物，通过自己的领袖行动。当他们对自己的领袖失去信任时，他们就

会觉得软弱和迷茫，他们怕失去自己的领袖，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尽管对领袖不满，还是跟着他们走。只有出现了别的更好的领袖时，他们才会离开以前的领袖。这需要时间。

马努伊尔斯基不明白这一点。他每年都预计会有无产阶级革命，可总是没有发生。有一次他汇报说有个村子起义了，可是却无法找到那个村子……

这些人不注意细节。但往往是细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进行马克思上义的分析。我为写一个报告曾叫过瓦尔加来，要他提供有关危机的数字，他又惊奇又害怕地问我：“要什么样的数字？”

我说：“实际存在的数字。”

“真实的数字吗?”

“是啊，当然是真实的数字！”

他拿给我那些数字，松了一口气。他说，天啊，总还有人喜欢听真话！您想想，他怕给共产国际提供真实的数字，因为那样他就会马上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要我同意他才敢发表这份报告。

莫洛托夫：是啊，瓦尔加是个很好的学者，可是胆子很小！

斯大林：这些人不爱进行马克思上义的分析。总说些大话和一般论断。这还是季诺维也夫留下的东西。

哎，在这方面伊里奇可是十分精确的，多么精确啊！

斯大林：现在谁在那里（指共产国际）带头呢？谁应该带头呢？

季米特洛夫：我现在很难弄清楚。

斯大林：您别耍滑头啦！

季米特洛夫：以前我知道马努伊尔斯基是政治领导人。现在只知道……如果皮亚特尼茨基不在，工作就会乱糟糟，他就是通常所说的主心骨。

莫洛托夫：是啊，所以我们总是只找皮亚特尼茨基。

斯大林：库西宁挺好，但是个学院派的人；马努伊尔斯基是鼓动家；克诺林是宣传家；皮亚特尼茨基……

季米特洛夫：我在狱中常常想，共产国际终于在您的领导下历史地凝聚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马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克诺林）。

斯大林：谁说这“四个人”应该这样呆下去。您说的是历史，而历史有时也需要矫正。

季米特洛夫：我想您作为我们的最高统帅，总还应该担负领导共产国际的责任，尽管您万分繁忙，也应该参与对重大问题的研讨。

斯大林：是的，我们曾在这张会议桌上讨论过全会的提纲，后来怎么样？他们回去后就依然如故了。

您看见我们有多忙了吧。

我们的最优秀干部都到建设工地去了……哎，您跟几个同志先干起来吧，我们会帮您的。

莫洛托夫：您曾面对敌人。现在出狱了，就把工作抓起来吧……

季米特洛夫：我的苏联国籍会怎么样？[①]它对我发表意见会有什么障碍吗？

斯大林：必要时您可以放心地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并不对每个苏联公民的行为承担责任。

……

（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米高扬等在座。）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第 35-38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5—8 页

———————————

① 1934 年初，季米特洛夫出狱后到共产国际工作，并取得苏联国籍。

需要提出符合战争当前阶段的问题

（1939年10月24、25日）

1939年10月24日

日丹诺夫关于文章[①]的问题来电：“我与**斯大林**同志谈了——他看过文章了。还修改了。文章很好。他想今天晚上和您一起看看修改的地方，但是他那里没有文章。他说他会给您打电话的！”

1939年10月25日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同志，关于文章问题。

不要着急！

不要一下子提出所有问题。

必须提出那些符合战争当前阶段的问题。

必须提出那些成熟的、群众可以理解和可以接受的问题。必须逐步引导群众接受革命口号！

必须提出那些能够帮助群众脱离社会民主主义头头们的口号！

（1）目前主要是一些否定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战争！

停止战争，停止流血！

驱逐主张战争的政府！

我们不会反对主张和平的政府！

现在提出在消灭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和平——就意味着帮助张伯伦，

——————————————

① 指季米特洛夫的《战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共产国际》杂志1939年第8-9期。

帮助战争煽动者，就意味着在群众中孤立我们自己！

（2）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就过高估计了形势。

当时我们大家都性急了，犯了错误！

这可以用当时的条件来解释，但是不能自我辩解。

现在不应该再重复布尔什维克当时的立场。

从那以后我们学了点东西，变得聪明些了！

但是也必须注意到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时共产党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掌权。

现在有苏联！

（3）共产党不应该是宣传小组，而应该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现在不是研究理论的时候！

需要的是动员群众进行斗争。

我们认为，我们在（与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缔结的）互助条约中找到了我们能够把许多国家置于苏联影响范围之内的形式。但是，为了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必须严格维护它们的国内制度和独立。我们不谋求它们的苏维埃化。它们自己进行苏维埃化的时候会到来的。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第 101-102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12—13 页

必须注意欧洲工人的这些特点

（1939年11月7日）

1939年11月7日

检阅和游行（人们抬着季米特洛夫的画像和几幅台尔曼的画像。）

在斯大林那里吃午餐。

斯大林：欧洲合众国[①]的口号是错误的。列宁发现后即取消了这一口号……

我认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只对俄罗斯合适，在俄罗斯，工人与农民密切相连，在沙皇制度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强攻资产阶级。

对欧洲国家来说，这个口号就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工人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了某些民主改革，被它们紧紧抓住，没有准备好走上内战（革命）的道路反对资产阶级。（必须用另外的方式对待欧洲工人。）

必须注意欧洲工人的这些特点，以另外的方式提出问题，为他们提出另外的口号。

在德国，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善于作剧烈的转变，他们没有同资本主义传统连在一起，与张伯伦一类的资产阶级领导人不同。

————————————

① “欧洲合众国”的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在1914年10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宣言《战争和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中提出的。列宁曾在1915年发表的《论欧洲合众国口号》一文中批判过这个口号。

官僚主义墨守成规、老套，不进行独立思考，不吸收由于条件改变而出现的新东西……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第 102-103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14—15 页

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

——谈共产国际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1941年4月20日）

1941年4月20日

在大剧院中。

塔吉克斯坦的闭幕演出。出席者（在政治局包厢中）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什维尔尼克、什切尔巴科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季米特洛夫。

演出结束后我们呆到两点。

……

当时**斯大林**说：一些党（暗指美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它们应变成叫做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党等名称的本国的共产党。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应到本国人民中间去并把力量集中于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

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是在列宁时期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

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从（共产国际）本位主义利益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不愉快的事，然而，这种利益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当前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从属于共产国际使得资产阶级更易于迫害它们，使其更易于实现把共产党同本国群众隔绝起来的计划，而对各国共产党来说，则会妨碍它们的独立发展以及作为本国的政党来实现自己的任务……

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第 134-135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16—17 页

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

（1943年5月8、11日）

1943年5月8日

当晚，与曼努伊尔斯基一道去莫洛托夫处。就共产国际的未来进行了商讨。得出结论是：在已形成的条件下，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独立发展和执行其独特任务的障碍。要制定一个解散这个中心的文件。

1943年5月11日

与曼努伊尔斯基校订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草案。

我将这个草案发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当晚和曼努伊尔斯基去斯大林处（莫洛托夫在座）。**斯大林**同意我们的草案。讨论了如何通过决议。谈到了下列程序：

(1)草案在主席团会议上审核并作为向各支部的建议予以通过；

(2)通知各支部并取得它们同意；

(3)得到各支部同意后予以公布。

哪些职能和在什么形式下今后还应继续存在——这一问题交由马林科夫和我去讨论并准备出具体的建议。

就此，**斯大林**说：经验表明，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这在马克思时期、列宁时期和现在都已显示出来。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域性的联合，例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但是这也不要急于行事……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第243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18页

我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1943年5月21日）

1943年5月21日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我和马努伊尔斯基。

莫洛托夫宣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

斯大林阐述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现在，在战争条件下，当德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任务是打倒本国政府和执行使它们失败的策略的时候，而在苏联、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则是相反，他们的任务是完全支持本国政府争取最迅速地消灭敌人。

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领导所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这是我们的过错。共产国际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际主义的思想名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

解散共产国际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在决议中并没有提到。敌人诬蔑各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是外国的间谍，这也有碍他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手中的这张王牌就被打掉了，所采取的这个步骤无疑将巩固作为全体工人阶级政党的各国共产党，同时也将加强以苏联为基地的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第247-248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19页

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德国革命提纲的意见

——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和鲁祖塔克

（1923年8月20日）

绝密

第3216/C号

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鲁祖塔克等同志

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委托，寄上他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的意见，供参阅。

中央书记助理（签名）

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意见

绝密

1.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出的提纲不应公布。应当在一定时间内禁止俄国同志在德报刊上发表自己关于德国革命的指导性文章。应当想方设法避免一切可能让人认为革命是有人从俄国“操纵”、“策动”的任何借口。必须绝对通过德国共产党和以它的名义行动。

2.必须在提纲中直截了当和明白无误地说明，所指的是由共产党人夺取政权，而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应当直截了当地指出，工人政府的口号只不过是包含有统一战线的思想的鼓动性的口号，它的最终形式（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如果它万一竟能实现，那么这样的政府必定是瘫痪的和一片混乱的政府，由于软弱无力注定要在最短时期内立即垮台的政府。应当明白无误地告诉德国共产党人，只能靠他们单独在德国夺取政权。

3.提纲中正确地指出，当前的基本口号应当是工农政府。但是，

应当坚持不懈地向群众解释，这个政府不是国会的机关，而是由他们批准的，对他们负责的苏维埃的机关。地方苏维埃应当在发生第一个革命高潮时就组建起来。也许在萨克森这样的地区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应当说明，没有地方苏维埃作为其支柱和组织基础，工农政府只会是无根之木。

4.提纲丝毫没有提到，或者极少提到，德国共产党人能不能保持政权，以及根据哪些主要条件可以期望能够保持政权。提纲主要谈到必须和可以夺取政权。然而，保持政权目前是德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础，提纲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此。众所周知，列宁同志在号召俄国共产党人发动起义时，把自己论据的全部重心都集中在说明“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政权”的问题上。现在，由于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这一点应当以更大的力量加以强调。

5.应当在提纲中直截了当而明确地指出，德国的工人革命意味着法国和波兰（也许还有别的国家）有可能同德国开战，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封锁德国（不让从美国运来粮食，等等），对此现在就要制定对策。提纲中这个问题含混不清。

6.应当在提纲中清清楚楚地说明，德国发生革命和我们用食物、武器、人员等帮助德国人，这就意味着俄国将同波兰也许还有其他缓冲国爆发战争，因为，显而易见，不进行一场胜利的战争，至少战胜波兰，我们就不仅不能运去食物，而且也不能同德国保持联系（期望德国发生工人革命时波兰会保持中立，并让我们能够从波兰走廊和立陶宛过境——这不啻是期望发生奇迹；关于拉脱维亚也应这样说；至于英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不会允许我们从海上运输的）。我已经不去说从我们方面给予革命的德国以军事支持的其他论据了。如果我们想真正帮助德国人——而我们愿意也应当予以帮助——，我们就必须准备好作战，而且要认真和全面地作好准备，因为事情归根结蒂涉及苏维埃联邦的生存和世界革命的近期前途。提纲中对这个问题也说

得含混不清。

7.必须制订出德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具体经济纲领。

8.其他较次要的意见以后再谈。

约·斯大林

1923年8月19日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22—24页

对德国革命共产国际不应下达具体指令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国际形势》
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23年8月21日）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讨论纪要

俄共中央政治局1923年8月21日会议

主席：鲁祖塔克同志

出席：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

中央委员：安德烈也夫，伏罗希洛夫、皮达可夫、拉狄克。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

书记处：纳扎列强、巴扎诺夫。

……

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这里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我们联邦的存亡问题。或者是德国革命失败，我们被打倒，或者是革命获得成功，一切顺利，从而我们地位得到保障。没有别的选择。重要的是俄共的行动路线。而问题的核心是必须把我们的军事力量全力调动起来。

“工农政府”、“统一战线”口号。不能取消这些口号，它们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要向我们的共产党员亮清底牌，应当说明他们要承担起主要的重担。必须约束左派，必须向布兰德勒说清，基本的重

负要由上层承担。

凡尔赛条约——在这方面正确的是托洛茨基同志，而不是拉狄克同志。不能提出承认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最好是玩弄手法：也许承认，也许不承认（拉狄克：“我赞成这样做”），那就好。应当加进托洛茨基的修改意见。还有一个措施可以缓和局势：必须加强我们在缓冲国中的力量。应当选派这些民族的共产党员去那些国家。有一小块同德国的共同边界对我们很重要，也很必要。应当力求在某一个资产阶级缓冲国打开一个窗口，从而形成一个通往德国的走廊。到革命开始时，应准备好这步。目前还不清楚怎样做，但应当研究这个问题。

至于日程表，我怀疑它是否适用。工人们仍然相信或半信社会民主党。也许希法亭有8个月就够了（布哈林：“他无事可做。”拉狄克：“也可以8个月什么也不做”）。可以规定尝试性发动的日期，不能规定决战行动的日期。

应当把俄共问题从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删去。问题要分成两个：一个是涉及德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涉及我们俄共。这第二方面要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划去。自然决定不能透露出去。

……

斯大林同志：关于日程表问题。我们完全赞同制订我们的日程表。在德国则是另一回事。有些因素是无法事先预见到的。而举行发动恰恰应当赶上这类有利的因素。我们当时曾存在这样的因素：苏维埃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撤出（托洛茨基：“这些因素是我们创造的。”斯大林：“是我们激起的”）。我赞成制订时间可变动的大体的日程表，而且要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发动的时间要赶上有利的因素。

关于左派。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最危险的人物。过早地夺取工厂等等，会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危险。应当束缚左派的手脚，但不要打击他们。

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要用公开发表关于援助、关于重心转移、关于德国革命等等的一般性言论来敷衍，而不应下达具体的指令。共产国际只应核准，而不是提出具体计划，不要采取主动行动，不应通过报刊而是暗地里纠正错误。

当前，外交游戏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必须换牌，对我们外交政策上的许多问题要重新审视。必须见机行事。同外交人民委员部要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关于凡尔赛条约最好避而不谈。这样可以显示出正常的民族色彩。

应当在我们国内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应当告诉庄稼汉，土地和自由面临巨大的危险；应当向他们说明，一旦吃掉德国，接着就会吃掉我们。

……

巴扎诺夫记录。

1923 年 8 月 22-25 日整理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25—27 页

论美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派别分子

（之一）

（1929年5月6日）

同志们！在这里发言的已经不少了，美国共产党内两派的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清楚，我就不用长篇大论地讲了。我不准备涉及多数派和少数派领导人的政治立场。我不准备涉及，是因为在这里的辩论过程中已经弄清楚，两派在夸大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方面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你们知道，这种夸大是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两派的一切机会主义错误的基础。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是不对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当考虑熟这些特点。但是把这些特点当作共产党活动的基础，那就更不对了，因为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共产党活动的基础应当是对所有国家来说基本相同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特点，而不是某个独立国家的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独有的特点仅仅是对于共同特点的补充。两派的错误在于，它们夸大了美国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的意义，从而忘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而这些基本特点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所共有的。因此，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领导人互相责难，说对方有右倾分子，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否认，美国现实造成的环境，使共产党容易陷入迷途，夸大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和稳固性。这种环境也促使我们的美国同志——不论是多数派的，还是少数派的——犯右倾类型的错误。正是由于这种环境，美国共产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看不到美国的改良主义，对工人阶级向左转估计不足，并且一般喜欢把美国资本主义看作某种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之

外和之上的东西。美国共产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在原则上不坚定，根源都在这里。

讲了这些一般性意见以后，现在来谈谈政治实践问题。

多数派和少数派领导人在实践中的基本缺点是什么呢？

第一，他们——首先是多数派的领导人——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受无原则的派性考虑的左右，把自己一派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

第二，这两派——特别是多数派——患有派性病，以致他们不是把信任的原则，而是把腐朽的外交手腕、外交把戏的政策当作他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基础。

举几个例子来说。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多数派领导人和少数派领导人都在拿联共党内的分歧进行投机。你们知道，美国共产党的这两个部分像赛马似地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拼命拿联共党内的和不存在的分歧来投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许美国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吧？不是，当然不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一派得益，而让另一派受害。在福斯特和毕尔特曼看来，宣布自己是“斯大林派”以显示自己对联共忠诚，这是无可指责的。但这恰恰是不体面的行为，亲爱的同志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没有也不应当有什么“斯大林派”吗？少数派为什么干出这种不体面的事呢？是为了伤害多数派，即洛夫斯顿同志那一派，为了表明洛夫斯顿派反对联共，因而也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基本核心。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和不严肃的。但是少数派却不管这些，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少数派的派别利益伤害多数派，使它信誉扫地。

而洛夫斯顿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又是怎么做的呢？也许它的行为比少数派要体面些吧？可惜并不如此。可惜它的行为比少数派更不体面。你们自己判断吧。福斯特派宣布自己是“斯大林派”，以显示自己靠拢联共。洛夫斯顿看到，这样一来，他自己那一派会受到某种损失。因此，为了进行报复，洛夫斯顿派突然来一个“使人头晕目眩的”跳

跃，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撤销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的职务的决议。结果成了一场按照谁胜过谁的原则互相追逐的游戏。这样做不是在进行原则斗争，而是拿联共党内的分歧进行最无原则的投机。你们看，把派别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的政策，结果就是如此。

另一个例子。我指的是佩帕尔同志事件。这个事件的经过，你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共产国际两次要求把佩帕尔同志召回莫斯科。美国共产党中央进行抗拒并且在实际上违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佩帕尔的一系列决定。美国共产党的多数派就是以此表示自己同佩帕尔亲近，而佩帕尔的机会主义动摇是尽人皆知的。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出席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重新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要求立即召回佩帕尔。以洛夫斯顿和吉特劳为首的多数派又一次进行抗拒，并且不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福斯特派便利用这一事件反对洛夫斯顿派，断言美国共产党多数派反共产国际。洛夫斯顿派终于领悟到，它要是落到同共产国际对立的地位，那么从自己一派的利益来看，它会输掉这一局，因此洛夫斯顿派又来一个“使人头晕目眩的”跳跃，把佩帕尔同志开除出党，开除的正是它昨天还不惜反对共产国际而加以维护的佩帕尔。这又是一场看谁超过谁的相互角逐的斗争。为什么多数派拒不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佩帕尔的决定呢？当然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这只是为了多数派这个派别的利益。为什么多数派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把佩帕尔开除出党呢？也许是为了党的利益吧？当然不是。这只是为了洛夫斯顿派的利益，这一派不愿让自己的对手——福斯特和毕特尔曼派别集团——多得王牌。派别利益高于一切！

福斯特派不是希望显示自己对联共的忠诚，宣布自己是“斯大林派”吗？那很好。我们洛夫斯顿派要比福斯特派更进一步，要求撤销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的职务。让福斯特派试试赶上我们吧！让莫斯科的人们知道我们美国人多么会玩交易所的把戏！

福斯特派不是希望显示自己靠拢共产国际，力求执行共产国际关于执行召回佩帕尔的决定吗？那很好。我们洛夫斯顿派更进一步，把佩帕尔同志开除出党。让福斯特派试试赶上我们吧。让莫斯科的人们知道我们美国人多么会玩交易所的把戏。

请看，这就是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派性造成的结果。

但是，同志们，共产国际可不是交易所。共产国际是工人阶级最神圣的东西。因此不能把共产国际和交易所混为一谈。要么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支部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应当像水晶那样纯净透明，——那么，腐朽的外交把戏在我们的队伍中就不应当有存在的余地。要么我们不是列宁主义者，——那么，腐朽的外交手腕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在我们的关系中就会有充分的市场。二者必居其一。同志们，对此必须做出选择。

为了说明在派别斗争过程中纯洁的共产主义风气怎样被歪曲被玷污，还可以举出一件实事，比如我同福斯特同志和洛夫斯顿同志谈话这件事。我说的是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的那次谈话。值得注意的是，福斯特同志在同自己朋友通信时把这次谈话描绘成某种神秘的、不公开谈论的事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洛夫斯顿同志就这次谈话向福斯特同志提出控诉书时，提到他同我的谈话，而且在这里吹嘘说，他洛夫斯顿同志与福斯特不同，他能保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成宣扬他同我谈话的内容。亲爱的同志们，这种神秘主义从何而来，有什么必要呢？我同福斯特同志和洛夫斯顿同志的谈话中能有什么神秘东西呢？听了这两个同志的话，会以为我同他们谈了某种不好意思在这里说的事情。但这是荒唐的，同志们。为什么要来这一套神秘主义的把戏呢？我没有什么可向同志们隐瞒的，这难道不好理解吗？我随时都可以把我同福斯特同志和洛夫斯顿同志谈话的内容从头到尾讲给同志们听，这难道不好理解吗？到那时福斯特和洛夫斯顿在这里竭力散

布因而闹得满城风雨的神秘主义会怎么样呢？

福斯特同志跟我谈了什么呢？他埋怨洛夫斯顿同志那一派搞派别活动，不讲原则。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肯定洛夫斯顿同志那一派有这些毛病，但当时就补充说，福斯特同志这一派也有同样的毛病。福斯特同志根据这个话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说我同情少数派。试问，根据是什么？福斯特有什么根据可以认为，我没有看出少数派的缺点，甚至还同情这一派呢？福斯特同志把愿望当成了现实，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洛夫斯顿同志跟我谈了什么呢？谈了福斯特同志和毕特尔曼那一派如何不行。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回答他说，两派都有重大的缺点，我劝他设法肃清派别活动。这就是全部内容。

这里有什么不好公开谈论的神秘之处呢？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同志们竟把这些简单明了的事实搞成只能引起严肃的人发笑的秘密，这岂不是怪事吗？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毒化美国共产党的生活、败坏质朴纯洁的共产主义风气的派性气氛，这里就不会有这种故弄玄虚的事，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也许可以再举一个事实。我说的是几天前同洛夫斯顿同志的一次谈话。值得注意的是，洛夫斯顿同志又借着我同他的这次谈话散布荒唐的流言，把谈话说成是一种秘密。真好像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追求“神秘”……的癖好。他前几天跟我说了什么呢？说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取消把他从美国召回的决定。说只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议中的决定不把矛头对准美国共产党多数派领导人，他洛夫斯顿准备执行这个决定。说他保证做一名共产国际的忠实战士，并且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如果共产国际给他相应委托的话。说他并不谋求美国共产党内的任何高位，只要求考验他，让他有标明自己对共产国际忠诚的机会。对于这些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回答说，检验洛夫斯顿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已经检验三年了，可是什么好的结果也没

有得到。我回答说，洛夫斯顿同志和毕特尔曼同志暂时留在莫斯科，不论对美国共产党或者对共产国际都较为有利。我回答说，共产国际的这种做法是治好美国共产党的派性病，使美国共产党免于瓦解的最可靠的手段之一。我回答说，尽管我的意见是这样，但我同意把洛夫斯顿同志的建议转交俄国同志们研究，并保证把俄国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他。

看来好像是很清楚了。然而洛夫斯顿同志又试图把这些很清楚的事情搞成秘密，并且接着我同他的这次谈话散布了种种谎言的留言。显然，如果没有把派别利益置于党的利益至上、把外交把戏利益置于共产国际利益至上的政策，就不会有这种故弄玄虚的事情，就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搞成神秘的传奇。

为了肃清所有这些不像话的事情，使美国共产党走上列宁主义政策的轨道，首先需要铲除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

上述事实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

出路何在呢？

福斯特同志设想了一种出路。从他的建议中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把领导权转交给少数派。能不能接受这种出路呢？不，不能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明确地和多数派划清界限的同时，没有同样明确地和少数派划清界限，这是犯了错误的。如果主席团委员会重复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这一错误，那就可悲了。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在自己的草案中应当既和多数派的错误划清界限，也和少数派的错误划清界限。正因为他应当和两派的错误都划清界限，它不能建议把领导权转交给少数派。因此，福斯特同志的建议以及由此得出的一切结果自然不能成立。

美国代表团提出了同福斯特同志建议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出路。大家知道，美国代表团的建议包括十点。这个建议的内容归结起来是：为多数派领导人完全恢复名誉，承认多数派的派别活动是正确的，取

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召回洛夫斯顿同志的决定，从而肯定扼杀少数派的做法。能不能接受这种出路呢？不，不能。之所以不能，是因为这种出路不是肃清派别活动，而是把派别活动奉为原则。

那么出路何在呢？

出路在于：

（1）要基本上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活动和建议，删去建议中同福斯特同志建议相近的各点；

（2）要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发出致美国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明党内两部分人的错误，并且着重说明铲除一切派别活动根源的问题；

（3）要谴责多数派领导人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活动，特别是在佩帕尔问题上的活动；

（4）要结束美国共产党目前的这种状况，即必要的工作的问题，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斗争的问题，工资、工作日、工会工作、同改良主义斗争、同右派斗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人去注意，反而被洛夫斯顿派和福斯特派的派别斗争的小问题所取代；

（5）要更新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而且要吸收那些除派别斗争之外还能够承认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能够把党及其统一的利益放在各派及其领袖的利益之上的工作人员；

（6）要召回洛夫斯顿同志和毕特尔曼同志，由共产国际调配，让美国共产党工作人员最终能够懂得，共产国际在十分认真地肩负起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

据我看，出路就是这样。

下面简单讲讲美国共产党的任务和使命。同志们，世界上有少数几个共产党肩负着历史所赋予的、从世界革命运动角度来看具有决定性的任务，我认为美国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实力，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许多人现在以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不会触及美国。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加速发展，它不能不触及美国资本主义。美国现有的三百万失业工人，是表明危机也在美国成熟的第一个征兆。美国英国之间对抗的加剧，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斗争，还有军备的巨额增长，则是说明危机迫近的第二个标志。我认为，革命危机在美国爆发的时刻不远了。而革命危机一旦在美国爆发，这将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末日的开始。必须使美国共产党能够全副武装地迎接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并领导未来美国的阶级搏斗。同志们，需要用全部力量和一切手段做好这种准备。为此要改进美国共产党，使之布尔什维克化。为此要努力肃清这个党内的一切派别活动和种种倾向。为此要努力重建美国共产党的统一。为此要努力造就真正革命的干部和真正革命的、能带领千百万美国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阶级搏斗的无产阶级领导人。为此要抛弃一切个人因素和派性考虑，把对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教育放在首位。

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需要极其认真地对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提交你们审议的这些建议，因为这些建议就是要使美国共产党健壮起来，消灭那里的派别活动，建立统一，巩固党，并使它布尔什维克化。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 10 辑
人民出版社 1980 出版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140—147 页

力量不足以继续战斗的情况是会有的

（1939年4月7日）

1939年4月7日

去克里姆林宫（何塞·狄亚斯，马奴伊尔斯基、季米特洛夫、翻译基里洛娃）。

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

关于通过法国同志转交西班牙党的珍贵文物问题。

直接由西共中央根据清单、交接书等转交。

斯大林：西班牙人勇敢，但是漫不经心。马德里好像在共产党人手中，可忽然别人夺取了政权，并开始屠杀共产党人。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看来，共产党人好像是溜掉了，留下了群众自己，没人领导。

任务并不是在力量不够的时候一定要打。如果形势无法控制，党可以宣布它认为可以更换一个对当前形势更适合的政府，可以考虑停止战争。但是党有责任把这点向群众说清楚！

力量不足以继续战斗的情况是会有的！

会有失败的。列宁在1915年说过，敌人把我们打败了。不是一定要进攻不可，但是党有责任告诉群众做什么，而不是退到一边，让群众无所适从。

党有责任向群众解释政府为什么不战而退。对马德里军事独裁政权要采取正确的立场。最大的缺点是米亚哈等人从前就是暗藏的阴谋家并作为阴谋家行事。

当战斗不在加泰洛尼亚进行的时候，他们在马德里站稳了脚跟。

马德里变了天！

共产党人忽视了这一点。

西班牙的共产党人很好地表现了应该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并积累了重要经验。

他们没能很好地表现出应该怎样交出政权，怎样退却。必须召开西班牙共产党人会议，弄清所有这些问题，以便其他党也能吸取教训。

也必须从反面经验吸取教训。

关于陶里亚蒂在信中解释说他们未能推翻军事独裁政权是因为未能开辟战线，**斯大林**叙述了1918年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的一段往事：当我们被团团包围时，反革命分子发动了暴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向每个团里要了70名战士，把暴动镇压了下去。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年版第91-92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166—167页

对法国共产党工作的建议

（1944年3月5日）

1944年3月5日（星期日）

爱尔科利来。告知他同斯大林的谈话：

……

委托爱尔科利向法国同志（马尔蒂、居约等）口头转达下述指示：

“我的建议：

（1） 在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中贯彻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时，不要在次要问题和形式问题的争论之中，在类似那种只能激化同戴高乐关系（例如吉罗的候选等）的鼓动政策的冲突之中，纠缠于细小问题，而要把战争的基本问题置于中心地位；

建立法国军队及其积极参加反对德国人的战斗行动；

从国家和军事机构中清洗贝当—赖伐尔的爪牙；

对武装的、战斗在法国的游击小组给予援助。

（2） 有关法国未來宪法的辩论完全是操之过急的和不必要的。在需要用一切手段去彻底消灭希特勒军队的条件下，这样的辩论会偏离方向而转向抽象的宣传活动。不能允许党像流亡者那样滑向愚蠢的议会争论道路，用想入非非的宪法议论替代粉碎希特勒德国的斗争。

（3） 党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表现为能代表民族意愿的民族领导力量，应表现为有从事国务活动能力的党，它不只善于言之有据地说服思想一致的人，而且同样能说服更广泛的阶层，也包括动摇的人士和集团。

（4） 同时党对有些人不能做任何让步，因为这些人企图扭转法

国民族拯救委员会的政策，使之朝向业已过时的、相当反动的老方针的方向发展，从而是在为贝当—赖伐尔服务。

（5） 党不要为维护苏联而表现出多余的热心，以免敌人借机把党说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相反，要把法国和苏联的真挚友谊作为法国外交政策和法国人民复兴的基础而加以普及和维护。

（6） 对马尔蒂的意见，他应在活动中更策略些。

（7） 党要为争取多列士回到阿尔及利亚而努力。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第 280-282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169—170 页

关于在保加利亚成立劳动党的建议

（1946年9月2日）

1946年9月2日

晚上在斯大林处(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在场。后来布尔加宁也来了。

……

关于[保加利亚]新宪法问题，**斯大林**阐述了下列思路：你们的宪法应该是人民宪法；尽可能少一些细节；议会制度下的人民共和制国家的宪法；不要让非劳动阶层感到害怕；使宪法比南斯拉夫宪法更偏右一些。（答应看看我寄给他的第一部分意见，并写出自己的意见。）

对此，斯大林还说：你们有必要在保加利亚成立劳动党。将你们党和其他劳动者政党（比如农民的政党等）团结到这样一个政党中。有工人党，或称为共产党，这并不好。早先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帮助工人阶级独立成为工人政党。那时候他们是反对派。现在你们参与国家的管理。对你们来说，最低限度有必要把工人党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团结起来，至于最大限度的团结，那是将来的事。农民把工人党看做别人的政党，而把劳动党看做自己的政党。我特别奉劝你们做这件事，劳动党或者工农党适合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这将会是人民的政党。相信我，你们不会损失任何东西，相反，只会获得。况且从你们国家的国际地位看，这会大大减轻你们的任务。就实质而言，这个党是共产党，但在现今这个时期将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和合适的掩护。这将帮助你们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不用无产阶级专政[①]而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革命时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必要采取别的方式

和形式，而不要模仿俄罗斯共产党人，他们所处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

不要害怕我会指责你们在搞机会主义。这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而是在当今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第 385—386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216—217 页

———————————————

① 斯大林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苏联采用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形式是工人阶级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共和国。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本卷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本书编者注

关于苏南关系诸问题给铁托的信

（1948 年 3 月 27 日）

致铁托同志并南斯拉夫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员

你们 3 月 18 日和 20 日的回信均已收到。

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是不真实的，因而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关于加加里诺夫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了结，因为你们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尽管我们依然认为有过对加加里诺夫的诽谤性指控。

所谓克鲁季科夫同志讲的苏联政府曾拒绝在今年举行贸易谈判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克鲁季科夫同志断然否认强加于他的那种事情。

二、关于撤回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的消息来源于武装力量部代表的反映和顾问们自己的报告。众所周知，我国的军事顾问是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迫切要求而派往南斯拉夫的，况且派往南斯拉夫的苏联军事顾问比南斯拉夫政府所要求的数量少得多，因此很明显，苏联政府无意强迫南斯拉夫接受自己的顾问。

但是，后来包括科切·波波维奇在内的南斯拉夫军方领导人认为，可以声明必须把苏联军事顾问的人数减少到 60%。他们为此摆出了种种理由。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花在苏联军事顾问身上的费用太大；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军队根本不需要苏军的经验；有人声称，苏军的条令是刻板公式，陈规旧俗，对南斯拉夫军队没有价值；还有人毫不掩饰地暗示，苏联军事顾问白拿薪饷，因为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那篇侮辱苏联军队的尽人皆知的言论，说什么苏联军官在道德

方面还不如英军军官。但是，众所周知，吉拉斯的这一反苏言论没有遭到南共中央其他成员的反对。

因此，南斯拉夫军方领导人不是与苏联政府友好地进行磋商和解决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问题，而是污辱苏联军事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声誉。

显然，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在苏联军事顾问周围造成不友好的气氛。如果认为苏联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同意把自己的军事顾问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

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对这种败坏苏军声誉的行为没有采取措施进行抵制，它就应对业已形成的局面承担责任。

三、导致我们撤回苏联文职专家的情报，主要来源于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还有专家们自己的报告。

你们的声明，即似乎斯尔曾蒂奇对商务代表列别杰夫说过，苏联专家如要索取经济情报的话，应向上级当局即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要求，完全不符合事实。请看 3 月 9 日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

“基德里奇在经济委员会中的助手斯尔曾蒂奇把一项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经济情报的政府决定通知商务代表列别杰大。所以，不论过去有过什么许诺，他也不能向列别杰夫提供所需的有关资料。国家安全机构受命监督此事，斯尔曾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想亲自与列别杰夫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从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可以看出，斯尔曾蒂奇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从南斯拉夫中央或政府那里获得经济情报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在苏联专家以前直接获取必要的经济情报的一些经济机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认为索取一切经济情报都必须向中央和政府交涉，那是可笑的。

其次，真实情况显然与你们在来信中所述的完全相反，从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看，苏联驻南斯拉夫的代表确实受到了南斯拉夫安全机

构的控制和监视。

不妨指出，这种监视苏联代表的做法我们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才会遇到，而且那也不是在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

同时应当指出，南斯拉夫安全机构不仅监视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且还监视联共（布）驻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

如果认为苏联政府会同意在这种条件下把自己的文职专家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

显然，对业已造成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也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这就是苏联政府不得不从南斯拉夫撤回其军事和文职专家的原因。

四、你们在来信中还希望向你们通报引起苏联不满和导致苏南之间关系恶化的其他事实。这种事实的确存在，虽然它们与撤回文职和军事专家没有联系，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向你们通报这些事实。

第一，我们知道，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间流传着种种反苏言论，诸如：“联共（布）正在蜕化变质”，“苏联盛行大国沙文主义”，“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控制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是以左的辞藻掩盖起来的，即“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有南斯拉夫才真正代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从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令人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听到这些关于苏联的言论，当然让人觉得好笑。但问题在于，这些言论在南斯拉夫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中久已流传，如今还在流传，这自然正在造成一种恶化联共（布）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反苏气氛。

我们当然承认，任何一个共产党，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权批评联共（布），如同联共（布）也有权批评其他任何一个共产党一样。但马克思主义要求批评应该是公开的，真诚的，而不能是背地里的，诽谤性的，从而剥夺被批评者对批评进行答辩的机会。然而，南斯拉夫活动家们的批评不是公开的和真诚的，而是背地里的和没有

诚意的，同时还具有两面派性质，因为他们一面背地里以其“批评”来败坏联共（布）的声誉，一面却在公开场合伪善地颂扬它，把它说得天花乱坠。正因为如此，这种批评就变成了诽谤，变成了企图损害联共（布）声誉、丑化苏维埃制度的手段。

我们相信，如果南斯拉夫的党员群众知道这种反苏批评是异己的，怀有敌意的，他们一定会愤怒地驳斥它。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活动家们背着群众暗地里进行这些批评的原因。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当托洛茨基打算向联共（布）宣战时，他也是从指责联共（布）蜕化变质、犯有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开始的。当然，他以左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藻掩盖了所有这一切。然而，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本人就是蜕化变质分子，而当他被揭露后，他便公开转到联共（布）和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营垒中去了。

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足以发人深省。

第二，目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令我们感到不安。作为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迄今尚未完全合法化；仍然处于半合法的状态，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党的机构的决定通常不在报刊上发表。党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也从不公布。

在南共党内生活中看不到有充分的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党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主管干部的书记是国家安全部部长。换句话说，党的干部实际上受国家安全部长的监督。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应该控制一个国家的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国家安全部在内，而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在控制着党。这大概是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独立自主性尚未达到应有程度的原因。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这样一个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是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看不到有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资本主义成

分正在农村中迅速增长，在城市中也很活跃，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资本义成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搞得昏昏沉沉，而这个理论是从伯恩施坦、福尔马和布哈林那里沿袭来的。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特定的纲领，不能混同于非党群众。在南斯拉夫则恰恰相反，人民阵线被认为是主要的实际领导力量，而且有人企图把党溶入人民阵线。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没有什么不同于人民阵线纲领的另外的纲领呢？没有。共产党没有另外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就是党的纲领”。

在南斯拉夫，这个关于党组织的奇怪理论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新理论。其实这里毫无新先西。早在 40 年前，俄国一部分孟什维克就提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溶入非党工人群众组织，并以后者代替前者；而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则提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溶入非党工农劳动群众组织，并以后者代替前者。众所周知，列宁当时认为这些孟什维克是用心险恶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派。

第三，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间牒韦莱比特[①]还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担任第一副部长。南斯拉夫的同志们都知道，韦莱比特是英国间谍。他们甚至还知道，苏联政府的代表也认为韦莱比特是间谍。尽管如此，韦莱比特依然是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南斯拉夫政府也许正是想把韦莱比特作为英国的间谍加以利用。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保证博得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感而把它们的间谍作

————————————————

① 韦莱比特，1943 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派驻开罗的军事使团团长，后任最高统帅部驻伦敦军事使团团长，回国后历任外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为自己的工作人员，是完全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可以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控制之下。我们认为，这种政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同南斯拉夫政府的通信往来置于英国间谍的监督之下。显然，由于韦莱比特依然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领导层，苏联政府认为自己被置于困难的境地，不可能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系统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开诚布公的通信往来。

这就是引起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不满并导致苏南之间关系恶化的事实。

如上所述，这些事实与撤回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没有联系，但它们是恶化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维·莫洛托夫（签名）

约·斯大林（签名）

1948 年 3 月 27 日于莫斯科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257—262 页

关于蒙古与苏联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同乔巴山会谈纪要

（1946年2月22日）

1946年2月22日22点

出席会谈的人员：B.M.莫洛托夫和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公使伊万诺夫。

以下是乔巴山提出的供讨论的问题：

1．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和互助条约的签订。

乔巴山详细地论证了签订条约的必要性。他说，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互助议定书，今年已经到期，尽管目前还没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的直接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日本已经被粉碎，但是，仍然可以预料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意图。

在预见到中国可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的意图的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其内容类似于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可补充1—2条关于两国之间进行文化和经济合作内容的条款。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同志说，根据互助议定书，我们（苏联方面）应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自己的军队了。

乔巴山请求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因为红军部队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将是国家安定的最好保证。

在讨论了与即将签订的条约内容有关的一切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把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变成条约，在条约中保留议

定书中的所有条款内容，并对新文件重新进行签字。关于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可列入单独的协议中。

乔巴山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2．关于在内蒙古和联合的兴安岭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工作。

乔巴山通报了关于一些地区的蒙古游牧点的情况，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的组成部分。按照乔巴山的意思．在这些地区需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便准备把蒙古族居民从中国分离出来，归入到蒙古人的境内，建立独立的蒙古族国家。乔巴山说，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内蒙古和兴安岭保持中立态度。

斯大林同志：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需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现在是否需要这场战争呢？

乔巴山：是否可以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呢？

斯大林同志：可以悄悄地进行。

3．关于在确定外交关系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乔巴山希望协商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种关系。他表示担心中国人可能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搞阴谋，并询问是否能够拒绝他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您不能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由于国内缺乏干部，不应该急于设立领事馆。以此理由您可以拒绝中国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开设自己的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蒙古政府是否有意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往来？

乔巴山：不，中国人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不愿意也不会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再则，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苏蒙贸易代表处进行。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问题——蒙古方面是否已经有了派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的入选，乔巴山先是阐述了对于候选人个人品质方面的一些

要求，然后说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的名字，并竭力获得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任命的预先支持，即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

（备注：乔巴山希望让苏伦扎布到远离自己的地方。他知道，这个任命将会受到苏伦扎布本人的反对，并会在中央机关引起不满情绪。为减轻这件事的难度，乔巴山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这样的回答，以便使他能够在乌兰巴托说："斯大林对我说的，任命苏伦扎布前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

斯大林同志详细地询问了1945年的情况，其结果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损失了300万头牲畜，还询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经济的管理方法和牲畜种类，并给予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是来自高加索和其他地区的经验。他还向交谈者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为了消除——而这多少是可能的——自然灾害给畜牧业发展造成的危害，应该组建保护牲畜的场所，组织国家对井水的监督，建立灌溉大田以便给牲畜创造牢固的饲养基地。

接着，谈话转到了畜牧产品方面，当斯大林同志了解到，在战争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奶油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他问乔巴山，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否卖给苏联黄油。

这个问题对乔巴山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也是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要具体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投入很大的物力和人力。希望回避这个问题，乔巴山开始列举各种理由（有些甚至是不正确的），以便不直接拒绝向苏联出售黄油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大概明白了这一点，简短地说："如果你们不能的话，那就不需要了。"

在会谈过程中，乔巴山还触及关于建设从纳乌什基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这条铁路可能在第二期工程中建设。

记录：*伊万诺夫*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309—312页

与哥穆尔卡和明茨
关于波兰局势的谈话内容

（1945年11月14日）

抄送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

秘密

送莫洛托夫同志并四人小组阅

谈话未做记录（波兰人认为不需要做记录），因此我以问答形式转述本次谈话的内容。

波兰人问：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其中包括对波兰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否已经改变？

斯大林答：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我们对波兰人和对波兰共产党人像从前一样友好。

问：是否需要通过一部关于对大型工业和银行实施国有化的法案？

答：在贝奈斯通过这样一项法案之后，在波兰也必须通过这样一项法案的时刻已经到来。

问：在波兰是否需要允许以租让或其他某种形式吸收外国资本？

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此需要由波兰人自己去深思熟虑。

注：波兰人只字未提他们当时曾经拒绝了苏联关于建立合股公司的建议。我得到的印象是波兰人不反对在这方面向外国资本做出让步。

问：是否应当接受波兰社会党关于取消粮食收购和宣布实行没有限价的自由市场运作的建议。

答：不论这样做是多么令人不快，波兰人迟早都不得不采取这一

措施，因为在非苏维埃制度下，又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长久地保持粮食收购和限价体制的。

问：我是否反对波兰人向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借债，我是否认为可以在或多或少对其在波兰的使用自由加以限制的条件下接受这种借贷？

答：债可以借，但是要在没有任何限制波兰使用借款权利的条件的情况下。

问：可否同法国签订互助条约？

答：可以，但是要使该条约完全符合波兰与苏联之间签订的互助条约的精神。

问：是否应当深究关于特欣的问题[①]，苏联能否在波兰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特欣问题举行的谈判中给波兰以支持？

答：我不主张深究这个问题，因为在波兰得到了西里西亚的能产焦炭的煤之后，波兰已经没有理由再要求把特欣划给波兰人了，因此苏联也就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给波兰人以支持。最好还是尽快消除这个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纠纷问题，限制特欣地区的波兰人迁居波兰并恢复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良好关系。在特欣地区波兰人迁居波兰的问题上，苏联在波兰人同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谈判中可以支持波兰人。

问：是否应当邀请联共（布）的代表出席不久将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

答：最好还是不要邀请，以免反对派们说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是在联共（布）的监督下进行的。

问：可否在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说波兰工人党是早在战争之前已被取缔的波兰共产党路线和传统的继承者？

答：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尽管敌人们把波兰共产党说成是联共（布）的代理人，但实际上该党当时已经变成了毕苏茨基分子的代理

———————————————

① 指波捷之间关于特欣地区归属问题的争论。

人。最好在波兰党代表大会宣布说，波兰工人党是一个新的政党，它同波兰共产党的路线和传统并无联系。

问：我们关于把波兰的大选再推迟一年举行更为适宜的意见是否正确？

答：我想大选最好不迟于1946年的春天举行，因为不论从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方面考虑，再往后推迟此次选举都将是困难的。

问：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表现很不好，如果他在近期内不能改正，我们想在选举进行之前就以朗格先生（现任波兰驻美国大使，是一位温和的波兰社会党人，据波兰人认为，他对共产党人颇具好感）取代他。您的意见如何？

答：如果你们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在目前情况下不能提贝鲁特为替补人选（波兰人认为这一作法不适宜），那么你们可以通过试试借助朗格来分化波兰社会党。请你们去同万达·利沃夫娜商量一下，她同朗格很熟。

后来的谈话涉及的是有关从罗科索夫斯基[①]的储备中借给波兰人3吨谷物种籽问题和关于满足波兰人有关铁路运输方面的请求问题。但这些事情你们均已知晓。

斯大林

1945年11月14日于莫斯科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315—317页

———————————————

①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时任苏联北方军队集群总司令，1949年起任波兰国防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

致伊朗人民党主席比雪华里的信

（1946年5月8日）

比雪华里[①]同志：

我认为，您对伊朗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评价是不正确的。

首先，您希望现在就实现阿塞拜疆革命的全部要求。但是，目前的形势排除了实现这一纲领的可能性。列宁提出的革命的根本要求是实际要求，我要强调的是，实际的要求只有在出现因与外敌的战争失败而加深的强烈的国内革命危机的时候才能实现。对日战争失败时的1905年，情况就是这样。对德战争失败时的1917年，情况也是如此。您想现在就按列宁的话去做，这是很好的，并且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伊朗现在完全是另一种形势。目前在伊朗没有深刻的革命危机。伊朗的工人很少并且组织得也不好。伊朗的农民暂时还没有表现出真正的积极性。伊朗现在也没有爆发有可能在失败的时候削弱伊朗反动集团的与外敌的战争。所以，伊朗不存在能让列宁1905年和1907年的策略得以实现的形势。

第二，如果苏联军队继续留驻伊朗，您当然可以指望争取实现阿塞拜疆人民革命要求的斗争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不能让苏军继续留在伊朗，主要是因为苏军驻扎伊朗损害了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原则。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我们说，如果苏军可以留在伊朗，那为什么英军不能留在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希腊；美军不能留在中国、冰岛和丹麦呢？所以，我决定从伊朗和中国撤军，以便夺走英国人和美国人手上的这件武器，发动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从而使我们的

————————————

① 比雪华里，时任伊朗人民党（原伊朗共产党）主席。

解放政策更为有理和有效。您作为一个革命者当然能理解我们不能那样做的原因。

第三，根据上面所述，可以就伊朗的形势得出下述结论。伊朗不存在深刻的革命危机。伊朗没有发生同外敌的战争，从而也就不会出现能够削弱反动派和加深危机的战争失败的情况。在苏军还在伊朗时，你们有可能在阿塞拜疆展开斗争，发动提出深远要求的广泛的民主运动。但是我们的军队必须撤离并且已经撤离了伊朗。现在我们在伊朗究竟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卡旺政府同代表伊朗最反动分子的亲英集团发生冲突。不管卡旺过去是什么样的反动分子，他现在为了自卫和维护自己的政府也不得不去进行某些民主改革并在伊朗民主力量中寻找依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冲突来迫使卡旺作出让步，我们应当支持卡旺，孤立亲英分子，从而为进一步实现伊朗民主化创造一定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根据形势给您的建议。当然，也可以采取另一种策略：唾弃一切，与卡旺决裂，从而使亲英反动派稳操胜券，但这不算策略，而是愚蠢。实际上这是对阿塞拜疆人民和伊朗民主事业的背叛。

第四，您竟然说，我们先是把您捧到天上，然后又把您抛入深渊，使您蒙受耻辱。如果这话是可信的，那我们会感到惊异。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们在这里采取的是每一个革命者都知道的通常的革命手段。为了保证在像伊朗这样的局势中实现运动的某些最低要求，必须使运动超前发展，超越最低要求并对政府形成威胁，创造从政府那里取得让步的机会。如果不使运动大发展，您在伊朗现在的局势下就不可能实现卡旺政府现在被迫同意的那些要求。革命运动的规律就是这样。对您来说，谈不上任何耻辱。如果您认为我们让您蒙受了耻辱，那就非常奇怪了。相反，如果您理智地行动，并在我们的道义支持下实现使阿塞拜疆现在的局势合法化的要求，那么，无论是阿塞拜疆人

还是伊朗人都将赞扬您这位中东进步民主运动的先锋。

斯大林

原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
1994 年第 3 期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352—354 页

关于印度革命道路的问题

——与印共中央代表的会谈记录（节选一）

（1951年2月9日）

斯大林同志：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收到了。我将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然后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许，你们会感到奇怪，我们总是在晚上举行会谈。我们白天很忙，要不断工作，晚上6点才能从这些工作中解脱出来。

或许，你们感到奇怪，会谈要持续这么长时间。但遗憾的是，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的中央委托我们亲自接见你们，向你们提出一些建议，对你们的党进行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党了解得很少，对于你们也了解不多。对于这一任务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如果我们承担起提供建议的职责，那么我们也就以此承担起了在道义上对你们的党负责的义务，而我们也不能轻率的提出建议。我们希望熟悉材料，了解你们，然后给出建议。

你们或许会感到奇怪，我们向你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进行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询问。但是我们所处的状况是,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材料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情况，因此我们采取了这种方法。这是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没有办法。局势要求必须这样。让我们转入实质性的讨论。

你们问：应该怎样看待即将到来的印度革命？

我们俄国人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场农业所有权的革命。这意味着要消除封建的财产所有制，并把土地分给农民自己所有，意味着要为了确立农民的私人所有制而消灭封建的私人所有制。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不认为，印度正面临社会主义

革命。现在普遍都在谈论的关于中国的道路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它是一场农业革命，一场反封建的革命，它不把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充公和收归国有。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革命之前发生，它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革命或农业改革，无论愿意与否。战后初年，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经历了这个阶段。中国现在处于这个第一阶段。印度也在向这一阶段接近。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正如在东欧所表现出来的，它在于：从农业革命转入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这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在欧洲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工厂、银行都被国有化，转交国家所有。中国距离第二阶段还很遥远。这个阶段距离印度也很遥远，或者说印度距这个阶段很遥远。

我们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的社论中谈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这篇社论是由兰纳迪夫[①]的文章和言论引起的。兰纳迪夫认为，印度正处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

我们俄国共产党人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因此就进行了反驳，指出，印度将会经历中国的道路，也就是将经历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这意味着,你们将不得不以如下方式建设自己的革命阵线：鼓舞所有的农民和富农起来反对封建主义，把所有的农民都鼓舞起来孤立封建主义者。应该把社会舆论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进步阶层都鼓舞起来反对英帝国主义，孤立英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集团。你们经常说，应该通过一次性的打击，把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英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都驱逐出去。不能够建立这样的阵线。在全民族阵线中，迫切的问题应该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让其他的帝国主义者，其中包括美帝国主义者认为，你们不会触及他们。为了不使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你们，为了使他们之间产生分歧，这样做是必需

——————————————

① 兰纳迪夫，1948 年出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编者注

的。但是，如果美帝国主义者自己插了进来，那么，那时候印度的统一战线就应该把矛头也转向他们。

高士[①]：我们不明白，当前美帝国主义者被认为是反民主的阵营的中心，全世界都在同美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只反对英帝国主义者？

斯大林同志：非常简单。为了建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为了获得民族独立，需要反对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这是你们的民族特点。由于谁，印度才处于半独立状态？是由于英国而不是美国。印度存在的状况是：不是在同美国人合作，而是在同英国人合作。你们军队中的一些军人和专家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这是历史事实，是不能够摆脱的。我想说的是，党不应把所有的任务都承担起来，不应承担起同全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任务。需要承担的一项任务是：摆脱英帝国主义。这是印度的民族任务。对于封建主也是一样。当然，富农是敌人。但是，反对富农和封建主是不明智的。承担起反对富农和封建主这两项沉重的任务是不明智的。应当这样组建阵线，以便被孤立的不是你们，而是敌人。这可以说是减轻共产党斗争压力的一种战略。如果某人是明智的，那么他就不会把所有的重担都扛到自己肩上。应当承担起的一项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和英殖民主义者的残余。孤立封建主、消灭封建主，消灭英帝国主义，其他的帝国主义暂时先不要碰。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减轻工作的阻力。但是，如果美帝国主义插了进来，那么也应当同他们作斗争，但人们将会了解,不是你们,而是他们发动了进攻。当然，也会轮到反对美国人和富农，但这是后来的事情。每件事情都有它的顺序。

高士：我现在明白了。

丹吉[②]：但这不会妨碍开展宣传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同他们作斗争

———————————————

① 高士，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后担任总书记。——编者注

② 丹吉，时任印度共产党主席。——编者注

的宣传吗？

斯大林同志：对于敌人应当明智地予以孤立。你们进行的革命不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者，而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如果美国人进行了干涉，那么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拉奥[①]：富农中有一小部分人从事封建剥削，他们出租土地，也放高利贷。他们通常站在把土地出租给农场主的大地主的一边。

斯大林同志：这不意味着什么。同消灭封建主这一总的艰巨任务相比，这只是部分任务。你们在自己的宣传中需要反对封建主，但不要反对富裕的农民。而你们也不应把富农推往一边，使其同封建主建立联盟。不应该使封建主得到自己的盟友。富农在农村中有巨大的影响。农民认为，富农之所以出人头地是由于自己的能力等。不应该给富农分裂农民的机会。在你们国家，封建主中有贵族吗？

拉奥：有的。

斯大林同志：农民不喜欢贵族。应当抓住这一点，使封建主没有机会在农民中建立联盟。

布尼亚[②]：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我们的理解还有一些混乱。应当怎样理解民族资产阶级？

斯大林同志：帝国主义就是掠夺别的国家的政策。难道你们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会考虑去掠夺别的国家吗？现在掠夺印度的是英帝国主义者。民族资产阶级,这指的是印度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他们是国家的剥削者。应该说，你们不要反对他们，而要反对现在的敌人，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在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有许多人是赞同你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已经同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联盟，但他们只是一部分，而且以后也不会很多。资产阶级对你们的支持主要在于他们

———————————————

① 拉奥，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编者注

② 布尼亚，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编者注

感兴趣的是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他们的兴趣还在于,消灭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需要市场，需要良好的市场，如果农民得到了土地，将会产生国内市场，将会产生能够购买的劳动力。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报刊进行解释。如果资产阶级不站在英国人一边，对你们将是有利的。你们应该这样做：要使英帝国主义者不能在印度获得新的盟友。中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中国只是把日本人的财产收归了国有，甚至没有把美国人的企业收归国有，美国企业仍然在工作。如果你们处在中国革命的阶段，你们暂时就不能采取一些把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推向英帝国主义一边的措施。这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被碰到，而他们现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帮助中国人民政府。这意味着可以认为，在中国国内美帝国主义者被孤立了起来。至于印度的革命，完全是英国人发动的骗人的把戏。如果你们制定了行动纲领，那么，你们应当在纲领中说明，你们需要建立巴基斯坦、印度和锡兰的军事和经济联盟。这三个被人为地分割开来的国家将会接近。结果将是这些国家的联合。你们应当提出这些国家需要接近的想法，而人民将会支持你们。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上层将会反对，但是人民将会对他们产生怀疑。从孟加拉就可以看出这种人为的分割达到了什么程度。孟加拉省首先脱离了巴基斯坦。

丹吉：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解上我们经常受如下精神的教导：中等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印度的大资产阶级转向了英帝国主义的一边。

斯大林同志：在印度有纯粹的英国银行吗？

丹吉：是的，在印度有英国银行，也有同英国人合办的银行。在我们的纲领中有民族大资产阶级的要求，这就是官僚资本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这不是官僚资本。这是工商业资本。中国的官僚资本成了国有资产的积累。这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同工业的关系很少。它依赖宋氏等家族同美国人签署的优惠合同得到钱财。至于中

国大的工商业，它们是完整的。我建议你们没收大资本家的资本，如果他们仍然同美英的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话。最好大声地说，那些公开地转向敌人一边的人将会丧失自己的财产。毫无疑问，如果你们的革命达到了高潮，将会对部分的大资本家进行打击。到那时候宣布他们为叛徒并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而没收大资本家的资本是由于他们同英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联盟，这我就不再建议了。就要像中国做的那样。如果在你们的纲领中有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的要求，那么应该删除这一点。应该制定新的纲领或者行动纲领。中立大资产阶级并使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百分之九十脱离其影响对你们是非常有利的。你们不必人为地为自己制造新的敌人。何况你们的敌人已经很多了。以后你们着手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时机会到来的。应该分阶段地解决革命的问题。不应把所有的阶段都混在一起。应当分阶段地解决问题，应当部分地消灭敌人：今天消灭一些，明天消灭一些，而当巩固的时候，可以消灭所有的敌人，而现在你们还很弱。你们中有人模仿我国的革命。但这是不同的阶段。其他兄弟党的经验应当批判性地接受，并且这种经验应当与印度本地的条件相结合。你们会被批评太左，不要害怕。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曾批评列宁太左，但他们被证明是可笑的。兰纳迪夫批评毛泽东太左，但毛泽东是正确的，他的行为符合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路线行动，不要在乎左翼的批评。

……

让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能否把尼赫鲁政府看作是英帝国主义的傀儡，就像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就像把现在的普列文（保加利亚城市）政府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

在我看来，当蒋介石在中国还有基础的时候,不能认为他是傀儡。当他转入福摩萨[①]的时候，他就成了傀儡。我不能把尼赫鲁政府看作

————————————

① 指台湾省，这里沿用了西方的称呼。——本书编者注

傀儡。他在人民中仍然有自己的基础。这不是保大政府，保大确实是傀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能把游击战看作是印度主要的斗争形式。或许应该说，是最高的斗争形式。在走向最高的斗争形式中有各种斗争形式。农民的斗争形式：抵制地主，农业工人罢工，拒绝佃户的工作，同地主进行个别的冲突，夺取地主的土地，然后把游击战作为最高的斗争形式。工人的斗争形式也一样：地方性的罢工，行业性的罢工，政治性的罢工，举行政治总罢工，把其作为起义的前夜，然后举行武装起义，把其作为斗争的最高形式。不能因此就说，游击战是国内主要的斗争形式。如下论断也是不正确的：现在的国内战争正处于高潮。这是不正确的，现在还没有国内革命的高潮。在特伦嘉人民夺取了土地，但这现在还不能说明什么。这只是进行公开斗争的开端，但不是斗争的主要形式，对此印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应当在如下一些小的问题上教导农民进行斗争：减少租金，减少要交付给地主的粮食税，等等。应当在这些不太重大的问题上教育干部，而不要马上就谈论进行武装斗争。如果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那么你们将会出现重大的困难，因为你们的党是弱小的。

要使党的力量强大，在需要的方面开展群众斗争，而有时还要抑制群众。1917 年我们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们在陆军、海军中有许多同情者，我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苏维埃。但是我们制止了举行工人起义的决议。有人提出了赶走临时政府的要求。但这当时还不在我们的计划中，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列宁格勒的近卫军。7 月，有 4—5 万名工人的布吉罗夫斯基工厂的工人开始游行，海员、士兵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要求推翻临时政府，并前往中央大楼提出了这些要求。我们制止了他们，因为还没有准备好一切，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大规模的起义。出现了起义的客观因素——当时群众在向前冲，但还没有举行起义的主观因素，党还没有准备好。

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我们在9月一个月内提了出来。决定举行起义，但这是秘密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发布任何消息。但当时政治局成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报刊发表了反对举行武装起义的声明，他们认为这是在冒险。列宁宣布他们是叛徒，并且说，他们成了我们敌人的俘虏。因此，关于举行武装起义是不能批评的，起义是非常突然的。

拉奥同志会说，让我们向人民发表演说，询问他们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意见……是不能这样做的，不能大声说出自己的计划，你们所有人都会被逮捕的。允许我假设一下，农民们会说：好，应该起义。但这不意味着，应当跟着人民走，拍人民的马屁。领导人就是要使人们跟随自己。人民有时候会说，他准备举行起义，他考虑的只是本地区的事实和事态，而不是从全国举行起义的合理性的角度进行考虑。中央应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就让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

印度同志：是的，明白了。

斯大林同志：你们问道，对于被怀疑背叛的党员，党组织能否宣判死刑。

不能。列宁总是教导说，中央能够做出的最高的惩罚形式就是开除出党，但如果党掌握了政权，某一党员违背了革命的纪律，那么政府可以追究其责任。从你们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同志们经常倾向于对敌人采取个人恐怖主义。如果你们向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询问这一点，那么我们应该对你们说，在我们的党中，总是以反对进行个人恐怖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如果人民自己开展了反对地主的斗争，在同地主进行的冲突中杀死了地主，那么我们不认为这是个人恐怖主义，因为在这一冲突中参与的是群众。如果为了杀死地主，党组织自己组织了恐怖小组，并且没有群众的参与，那么我们通常是反对的，正如反对进行个人恐怖主义一样。在群众消极的情况下，个别恐怖分

子的这种激进的行为会扼杀群众的独立精神,会使群众产生消极情绪,而且，对此人民会这样认为：我们不必行动，有英雄为我们代劳。因此，存在英雄的时候，另一方面就存在不参与斗争的群众。从培养和组织群众积极分子的角度来说，这些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在俄国就曾存在这样的党——社会革命党，这个党有特别的队伍，对一些主要的部长实施恐怖行为。我们一直反对这个党。他们在群众中丧失了任何威信。我们反对英雄主义理论和群众主义理论。

你们也许会问，现在应该怎样提出关于印度土地国有化的问题？

在现阶段你们不应该提出这一要求。不能一方面提出划分地主土地的要求，同时说，土地应该转交国家。在人民民主国家从来都没有宣布过土地国有化，更不要说在中国了。人民民主国家是怎样做的呢？这些国家都禁止买卖土地。这就是对土地实行国有化的政策。只有国家才能拥有土地。禁止私人购置土地。现在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对你们不利。

你们中的一些同志现在认为，印度正在进行内战。关于这一点言之尚早。你们正在酝酿内战的条件，但这种条件还尚未成熟。

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有了纲领，或者说有了行动纲领就好了。当然，你们会有分歧。我们也曾有分歧,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由多数人决定，这是不变的法则。即使那些不同意多数决定的同志，也要认真地执行决议，因为党应该有统一的意志。你们都愿意进行讨论。在和平时期这是允许的，但在你们那里，革命的局势正在加剧，你们不能讲究这些。何况你们的党员数目是如此的少，你们进行的无休止的讨论会使群众误入歧途。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 1903-1912 年期间公开进行了讨论，因为这在沙皇的条件下是允许的，以便驱逐出孟什维克，当时我们制定了分裂的路线。但是我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党内有敌人。我们在 1912 年驱逐了孟什维克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摆脱了孟什维克

的党，党成了纯洁的党。当时也存在分歧，但是在小范围内召开了会议，讨论问题。根据大多数人的决定，大家都开始行动。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后，托洛茨基使党陷入了我们不愿意进行的一场讨论，但不得不进行这场讨论，因为托洛茨基挑衅性地断言，党不愿意进行讨论是由于党害怕真理。我们进行了讨论，击败了托洛茨基。但在这场讨论中，反对托洛茨基的是整个党。如果党在某种程度上纯洁了，在思想上达到了统一，那么该党就不需要进行讨论了。讨论应该在小范围内进行，不要在报刊上发表。大多数人的决定就是法则。

高士：斯大林同志是正确的。我们不会再允许进行公开的讨论了。

斯大林同志问道，在印度共产党内是否有关于共产党同情者的组织？

拉奥、丹吉：没有，我们只有党员。

斯大林同志：我们党有560万党员和80万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愿意入党的人，我们在其入党之前，对其进行考验。对一些人的考验要进行4年、5年，并对其进行教导。许多人希望入党，但他们首先要经受考验，其次，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对其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是必需的，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接受其入党。在我们的实践中，这种候补党员的制度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党的周围我们有共产党同情者的巨大力量。但我们也不应使党过度增加新党员，不应过度扩充党。关键的是提高已被接收入党的人员的素质，而不是党员的数量。

你们也问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开始游击战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游击战争没有大的意义。游击战在中等发达的国家和在落后国家具有巨大的意义。比如，在美国或德国很难开展游击战争。这里有许多大城市，发达的铁路网和工业区，在这种条件下，游击队很快就会失败。要让人民群众把自己视为英雄，而把英雄视为自己意志的执行者，以便使人民群众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反对敌人。但

是，不应该只是指望游击战争。当然，游击战会有所帮助，但是游击战本身也需要帮助。应该在工人、军队、知识分子和农民中间开展更多的工作。如果在工人中间存在武装，那么在混乱的情况下，他们将会夺取政府机关。我们在列宁格勒曾建立了工人近卫军，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夺取了冬宫。我们的农民从工人阶级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帮助。总之，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农民最忠实于工人阶级。应当把两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工人的斗争和农民的斗争，农民起义和工人游行。

你们记得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印尼有很好的共产党领导人，但是他们受到挑唆，过早地发动了起义。他们都是非常忠实的、优秀的、勇敢的人，但是被挑唆起来（发动了起义），并且牺牲了。

你们最好有纲领或者行动纲领。把这一纲领或农业革命的纲领置于最为重要的地位。

你们也向我询问关于尼赫鲁对外政策的性质。其性质是一种游戏和手腕。他企图显示，好像他们是反对美国的政策的。事实上，尼赫鲁政府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进行游戏。

拉奥、丹吉、高士和布尼亚同志对斯大林同志的谈话表示了感谢，并说，他们将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对自己的整个活动重新进行审议，并将根据这些指示行动。

斯大林同志：我没有向你们做出任何指示，我所说的只是建议，对于你们来说并不是必需的，你们也可以不接受这些建议。

会谈持续了 3 个多小时。

B. 格里戈良记录

1951 年 2 月 10 日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 3 卷第 228—236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361—371 页

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
资本家们分化为两大派别

（1945 年 1 月 28 日）

1945 年 1 月 28 日

在斯大林别墅。……

很多人祝词。

在自己的祝词中，**斯大林**强调，……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资本家们分化为两大派别——一个是法西斯派，另一个是民主派。目前出现了我们与资本家民主派间的联盟，因为后者不能接受希特勒的统治，而这种野蛮统治能导致工人阶级的极端困境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垮台。我们现在和这一派反对另一派，而将来也要反对资本家的这一派。

如果认为苏维埃形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形式，那我们可能会犯错误。实践证明，苏维埃形式是最好的，但完全不是惟一形式。也可以有其他形式——民主共和国，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君主立宪制……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第 331—332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380 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

——答季米特洛夫

（1948年11月6日之前）[①]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可能性或者两种形式。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我们认为这是一条定理。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民主共和国，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中看到的，并指出无产阶级在其中占优势的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民主共和国不是像美国或者瑞士那样的民主共和国，而是工人阶级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共和国。此后，列宁发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形式是一种在我国条件下更加合适和更加合理的形式。在我们俄罗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通过内部起义实现的，而一旦开始起义，便摧毁了一切。苏维埃形式表明是最合适的形式。在你们那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不是内部起义完成的，而是通过外部——苏军的援助，也就是说比较容易，没有经过特别的努力，可以不采用苏维埃形式而回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的那种形式，即人民民主议会制的形式。我们认为，你们不采用苏维埃制度也行。对你们来说，人民民主制度就是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这种制度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取消了富农和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我们这里，只有劳动者才有选举权。200万富农须要迁移到北方去，在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后，我们才给所有的人选举权。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资产阶级

——————————————

① 这是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1948年11月2日来信的答复。——本书编者注

和地主跟我们斗了四年，而在你们那里，他们干脆逃跑了，没有经过搏斗就投降。那时，没有一个外国像我们现在帮助你们一样帮助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权组织的另一种形式。你们可以不采用苏维埃制度。但这种在你们那里存在的制度起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哪里有对抗的阶级，哪里执政的工人和劳动者就不能没有专政。但是，你们可以用合法的理由打击敌人。现在，你们那里还有内战的因素。只有当你们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时候，才能宣布你们那里已经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了。

工人阶级在其中占优势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合适的形式。而在我国出现的苏维埃，不是议会制，而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的苏维埃，排除了一切非劳动者。说苏维埃形式好，是因为它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要流血，但很快。而你们可以不经过这种形式，因为你们的资本家立即就投降了。一句话，适合于你们，我们承认也许我们这方面错了。

只要存在对抗性阶级，就要有无产阶级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在你们那里有另外的形式，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你们可以不经过苏维埃制度。但是，人民民主制度可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职能，即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2002 年版第 485—486 页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385—386 页

一九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

——在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1948 年 3 月 14 日）

[1948 年 2 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联共（布）中央为此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3 月 14 日，又逢马克思逝世 65 周年纪念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斯大林就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任务作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堪称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为各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本书编者]

在政治局 2 月会议上，莫洛托夫同志给我们详尽地论述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我同意他所作的结论，但是对当前世界危机的原因的判断，我还有些不同的看法。以前我曾提出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由掌握着金融资本、剥削地球上大多数人的那些人所组成；另一个阵营则由殖民地和附属国那些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所组成。很自然，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成为前一个阵营的头领，而依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原理而发展起来的苏联，则成为后一个阵营的领袖。由于两个阵营的各自目标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冲突迟早要发生。

准确地讲，现在这一时刻已经来到，所以，寻找两个敌对阵营和解的办法是徒劳的，理由很简单，它们各自的观点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除非一个阵营向另一个阵营投降，否则，它们之间的武装冲突早晚要发生，绝不可能避免，近年召开的无数次会议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

们，我们无法同反对我们的阵营达成协议，就如同水火不相容一样。

目前敌对而又和平的世界局势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但是我要重申，不可避免的冲突时期将要来临。同志们，那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应当毫不拖延地增强我们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同时，我们应当有力地支持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种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方法，对他们来说，没有别的出路。许多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民族解放运动将引起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革命阵线的指导和联合，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和被压迫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阵线早已存在，虽然我们对它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还不满意，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尤其应当对西班牙和南美国家给予特别的重视。

所有中、南美洲的国家政府无一例外都是借助于忠实它们的几万名士兵的刺刀来维持统治的，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如同小孩子用纸牌搭成的房子。只要劲风一吹，它们就会被吹垮，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我们都应当拥有这种力量，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被压迫的群众推翻这些可笑的独裁者，帮助群众执掌权力，剥夺美国所必需的原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桩完全可以实现的任务，这里并没有什么乌托邦的色彩，只要我们注意到，在中、南美洲国家里，70%（有时甚至更多）的人口是受压迫和被剥削的贫苦人民，他们对压迫者非常痛恨。我们要强调，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如果情况需要，我们将向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现在，需要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宣传和全面地组织起我们的所有力量。

美国试图把中、南美洲国家变成它可靠的据点，就南美各共和国政府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也确实如此。至于工人群众，我们清楚

地知道，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以同压迫者进行不懈的斗争。下个月，将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召开泛美国家会议，我坚信会议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成果。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利益和目标也有很大的差异，它们之间只有胃口是一样的。在悦耳和奉承的词句下，隐藏着相互间的深深的不信任和尽可能多取少给的愿望。一切结果都将以相互团结和共同利益的优美动听的辞藻来表达，而当真正危险来临时，它们之间就会出现不协调、以至于使它们变为美国的债务而不是财产。

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巴西，巴西拥有如此巨大的原料资源，以至于美国有很好的理由指望巴西成为它的天然贮藏库。在巴西，共产党受到残酷的迫害，但这对它来说只是一种帮助。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共产党将经受炮火的洗礼，从而能够使它摆脱机会主义者、意志薄弱者和那些简单地反对任何政权的人。我们希望巴西人民能为共产主义理想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巴西共产党只要由这样几百名优秀人物所组成，那她就能乐观地面向未来。

巴西之后，我们要特别重视的是委内瑞拉。在这个国家，巨大的石油资源全被北美的资本家所利用。一旦战争爆发，我们首先应当做的事情就是阻止美国的工业使用委内瑞拉的石油。因为我们已经就此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所以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对你们重复该计划。

关于巴拿马运河，我认为它对我们来说最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以后发生战争，水面舰只将完全失去其价值，我们没有理由对巴拿马运河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如果它被摧毁，恢复运河将需要很长时间，这仅仅会延缓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欧洲，我们应当特别关注西班牙。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那里的佛朗哥政权很快就要垮台。当然，我们能加速它的崩溃，但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目前这样做的时机尚不成熟。日丹诺夫同志也曾论述过为什么现在在那个国家促成这种变更于我们不利的原因，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目前，在加强我们的地位和宣传方面，我们应

该有所限制。

在意大利和法国，我们的地位非常牢固，因此我们不必害怕任何选举和任何政府变更。必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将与我们站在一起，虽然有很多人设法把自己出卖给美国资产阶级。

我们不怕英国或者欧洲的一些小国。它们追随美国是迫不得已，因为害怕而屈服于美国，这种害怕是由熟练的宣传制造出来的。对这一点我们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我们已制定了我们的灵活计划，现在它有赖于我们去贯彻执行。

我们最重要的王牌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亚洲。千百万受奴役的群众在本世纪已经觉醒，不管殖民帝国主义者玩弄怎样的诡计，它们都无法扼杀千百万群众争取自由和享受独立生活的愿望。所有的殖民帝国都已面临末日，它们的彻底崩溃仅仅是一个不远的将来的问题。显然，我认为今后我们在这方面要以十倍的努力进行工作，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作巨大的努力以加快亚洲各民族的解放。

对我们来说，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它已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典范。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败绩。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的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至他们能肯定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

接下来我们应注意的是印度。印度现在从英国那里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看来只是一种神话。印度千百万劳动群众不能也不愿意按旧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他们懂得，帝国主义者玩弄阴谋诡计的真实意图是要变换手法以延长他们在亚洲的统治。反帝斗争正在更为广泛的人民中展开。我们将帮助他们赢得并享受自由的各国人民大家庭中

的平等权利。

总之，在整个亚洲，我们要坚定地和不懈地执行我们去年制定的计划，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项计划已经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成功里面有时候也有些不利因素，这些因素有时会引发一些危险，如果任其发展，就可能会功亏一篑。有些人因为成功而过分骄傲。危险的是，我们有些同志被成功所迷惑，忘乎所以，夸耀地说，“世界正跪伏在我们脚下”，“我们能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不能这样，同志们，我们要再接再厉，更努力和更艰苦地工作，因为总的说来，世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情。

在综述我们在国际上所做的工作时，我们不应当忘记苏联国内的工作。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正继续进行，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我们的任务是要在短期内克服这些不足，既不要在任何障碍面前停滞不前，也不要因那些居功自傲的人的阻挡而裹足停步。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摒弃那些陈旧的东西和妨碍我们前进的人。

我们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正在继续顺利地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将在四年内完成。

我们应当永远重视苏联的陆、海军的建设。我们掌握了绝对可靠的有关美英军队的情报，把苏军的现状同美军和英军相比，我可以明确地说，只是在水面舰只这方面，我们处于劣势，而在其他方面，我们远占优势。尽管美国玩弄诡计，尽管它为陆、海军拨出巨额预算，但是美国的军队无法赶上我们。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苏军与美英军队的力量对比方面，将会产生有利于我们的更大优势。我们不想要战争，但我们也不怕战争。

从现在起，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防止人类遭到新的灾难，但是如果帝国主义者想要引起灾难，那么，这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只会对他们产生更糟的结果。

对“联合国”组织所起的极为可鄙的作用，我不能保持沉默。就

是那个设在日内瓦的已破产的“国际联盟”还曾经保持着较大的尊严和独立性。现在的“联合国”，只是木偶的聚会，他们通过举手表决听从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他们的行动常与自己的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相矛盾，只是为了取悦于那个强大的家伙，所以，我们同这样的组织毫无交道可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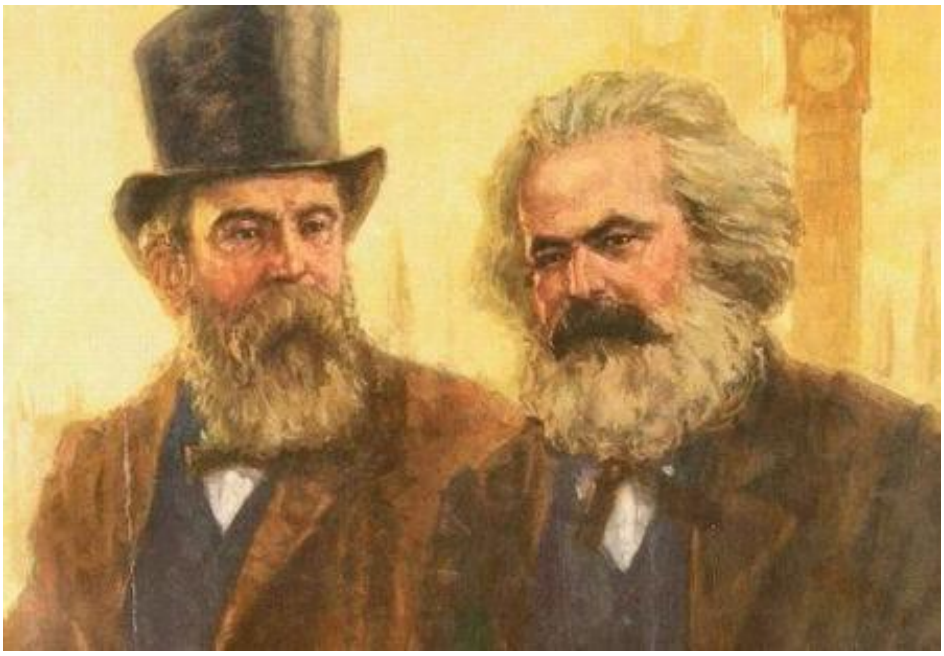
再以马歇尔计划为例。从经济角度看，马歇尔计划不过是早在美国提出过的有关“出口或失业”问题的战时计划的更描劣的翻版而已，它试图把威胁美国经济的灾难转嫁给其他国家。华尔街的垄断者们希望通过向欧洲大陆的国家出售那些在美国经济恢复中不需要的东西来达到上述目的。他们输往欧洲的不是机器设备和重要的工业原料，而是成品。这些进口产品将构成一种威胁，会扼杀西欧国家的重要工业部门，使工人阶级处于长期的失业状态。所以难怪许多欧洲国家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些国家的政府认识到，所谓的“美援”将会给它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带来严重的危害。虽然帝国主义者竭力欺骗人民和瓦解人民的抵制，但是，反对阴险狡诈的华尔街的浪潮已不可阻挡。工人阶级不能同意把他们的祖国出卖给美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奴役他们国家的马歇尔计划。我们要挫败这一计划，这也是为了世界工人的利益。

苏联同那些向美国乞求援助的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援助，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因为我们有党的正确的领导路线，我们可以组织群众贯彻这条路线。看看其他国家，有多少国家有拥有一条正确路线并将其贯彻执行的执政党呢？实际上，现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党，因为所有的政党都前景暗淡，为混乱的经济危机所困扰，无法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只有我们党懂得怎样驾驭形势和向胜利挺进。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已经有 100 年了。在这段时期里，许多资产阶级政府都试图消灭马克思主义。结果怎么样呢？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而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个

崩溃了。所以，同志们，我们必须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旗帜下，为我们的成功而工作而斗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永远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旗帜，永远忠于所有国家兄弟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事业。

原载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冷战国际史研究专题论文集》

选自新编《斯大林全集》
档案附卷十第 387—393 页



（590）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ЛЕНИНА,
ПОД ВОДИТЕЛЬСТВОМ
СТАЛИНА,—
ВПЕРЕД
К НОВОМУ РАСЦВЕТУ
СОВЕТСКОЙ РОДИНЫ,
К ПОЛНОЙ ПОБЕДЕ
КОММУНИЗМА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诸夏怀斯社
二〇一七年五月制作